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199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邓力群主编.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7  
ISBN 7-5000-6218-4

I. 中… II. 邓…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988 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39.75 彩面: 8 字数: 1889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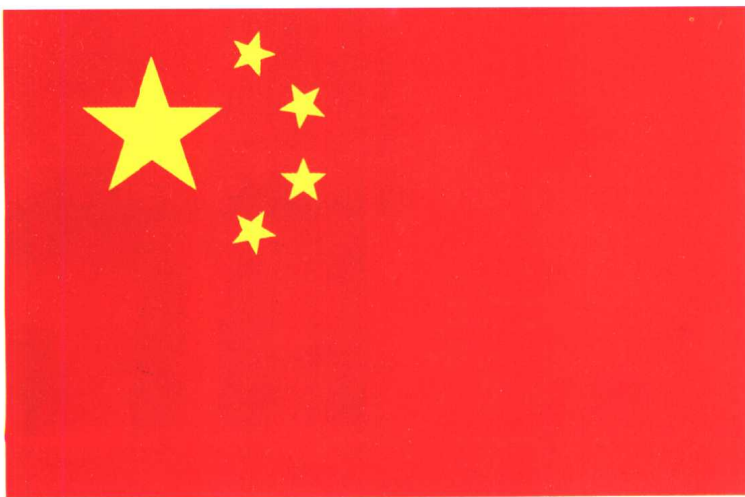
定价: 146.00 元



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词  
聂耳曲

进行曲速度

起

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

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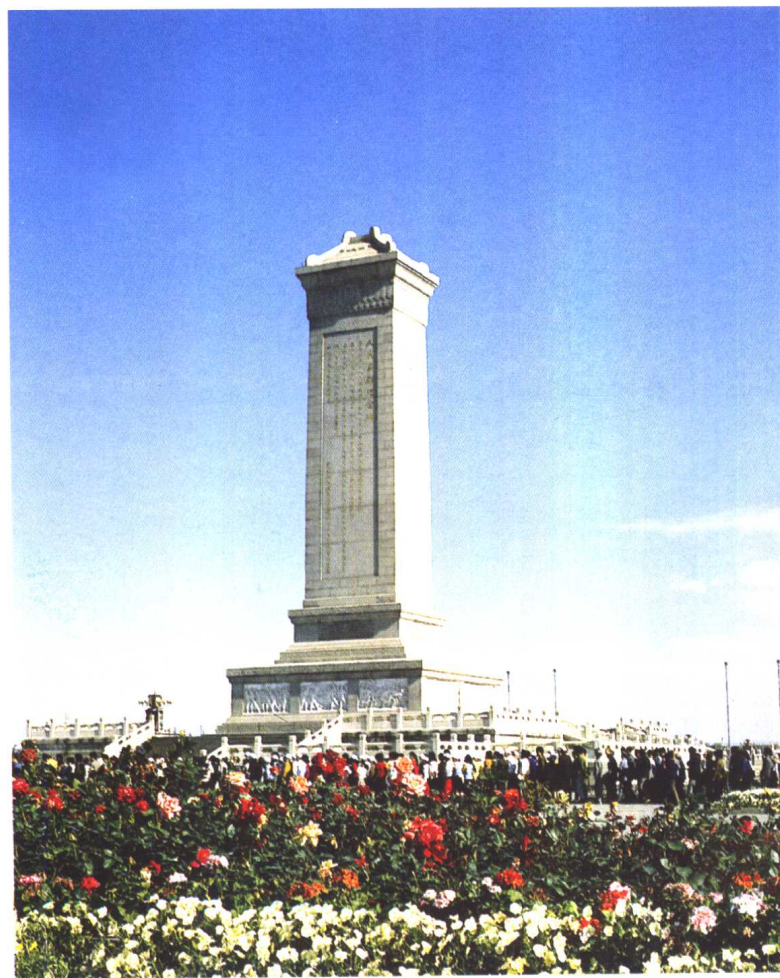


天安门



新华门

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礼堂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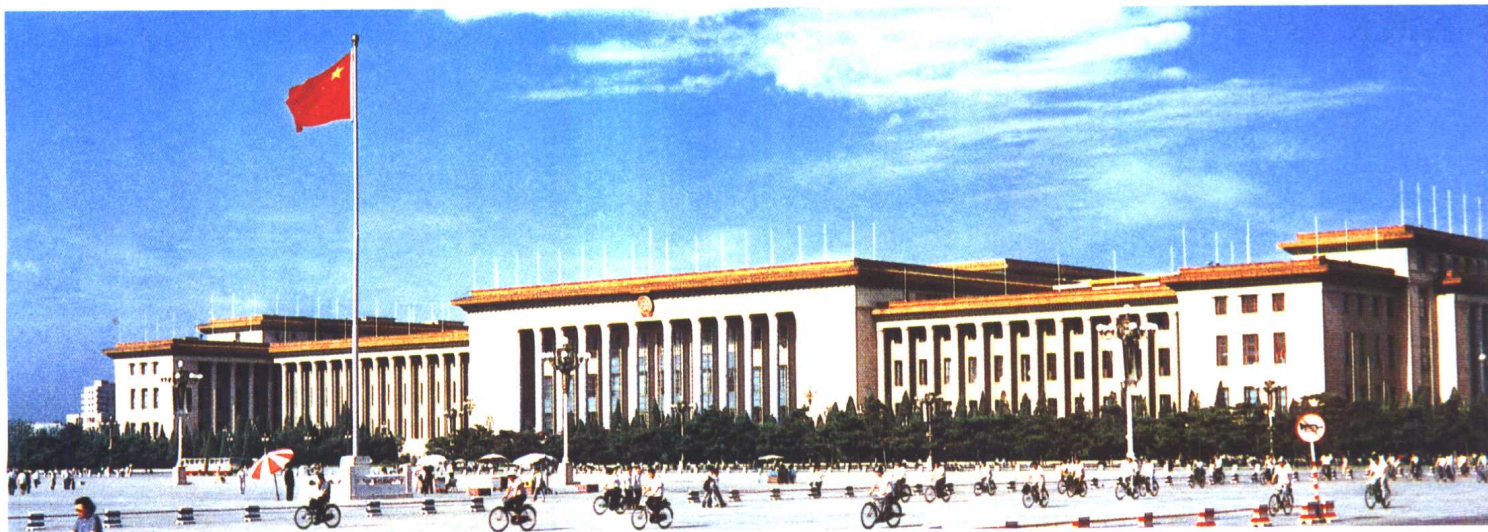
邓小平



江泽民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汉、蒙古、维吾尔、藏、哈萨克、朝鲜文字版本



人民大会堂



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74年4月1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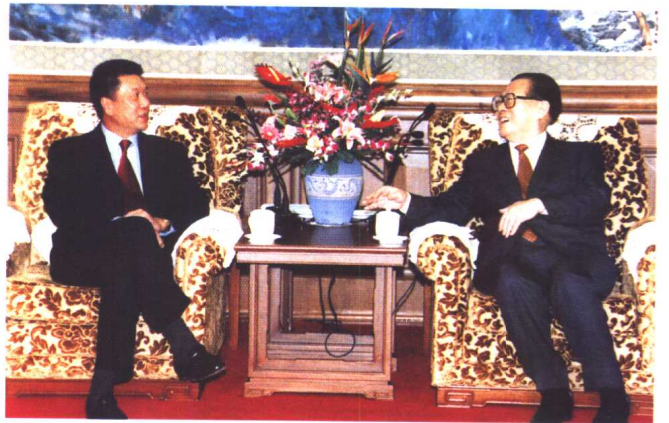
各族人民大团结



### 全国对台工作会议



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再次强调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加速国家统一进程



1999年5月2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铨



1997年7月1日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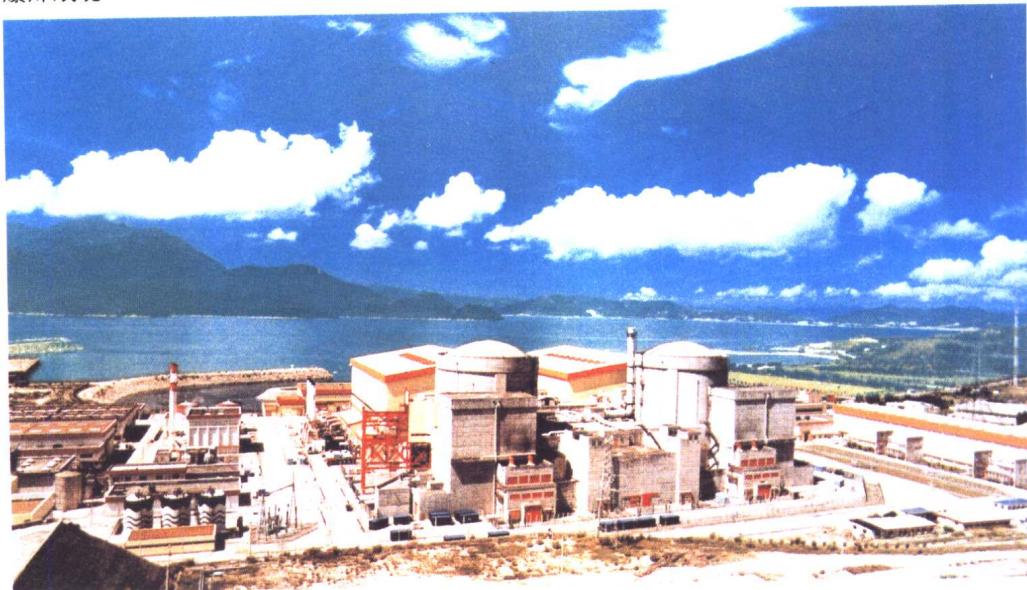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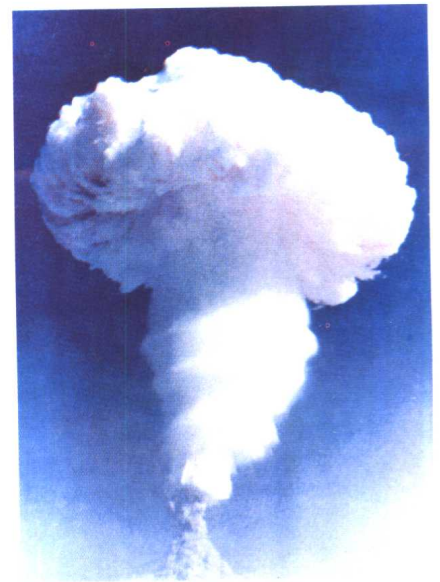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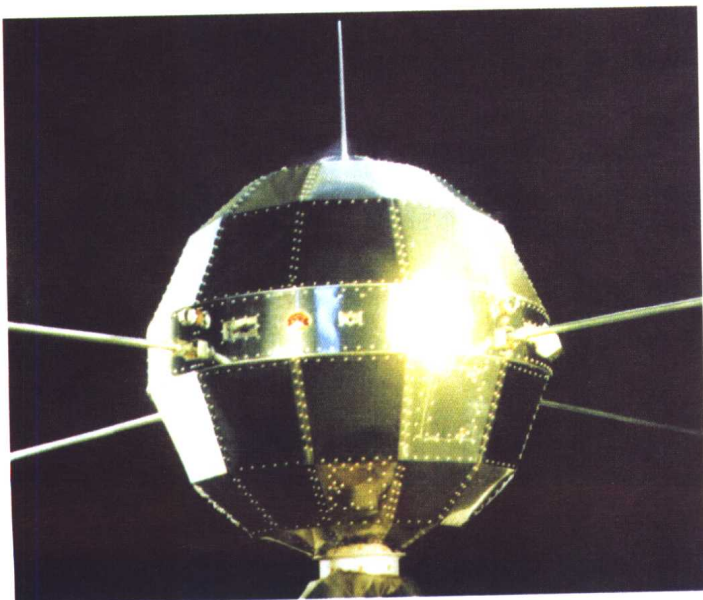
1994年2月8日中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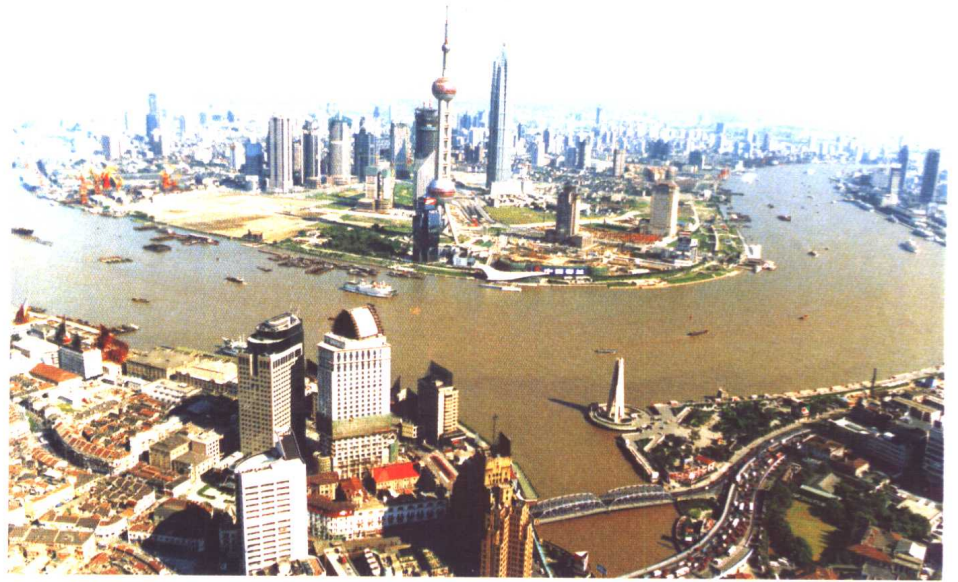


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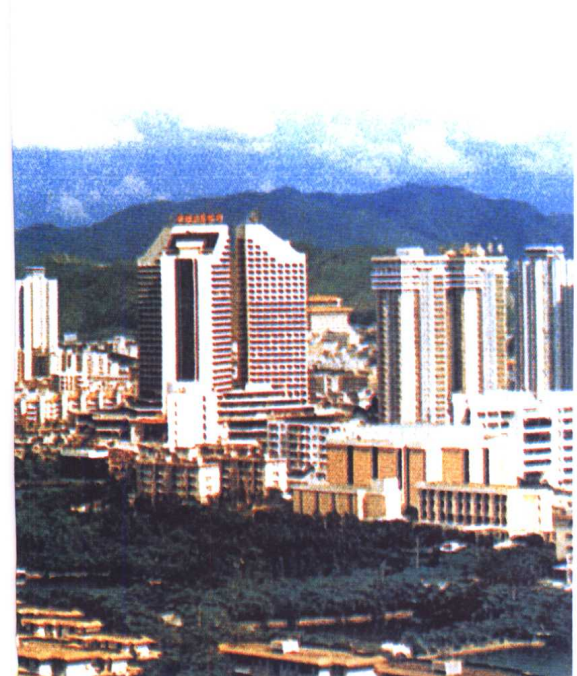
杂交水稻育苗田



上海浦东新区



沈大高速公路



深圳经济特区



大庆油田水上采油井区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洪抢险情景



珠海的城市建设风貌



大连的城市建设新貌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友先 马文瑞 王忍之 郑天翔 荣毅仁  
逢先知 徐惟诚 龚育之 雷洁琼 廖汉生

主 编：邓力群

副主编：李力安 有 林 张启华

程中原 田居俭 陈东林

特约分支编写主编：乔晓阳 杨胜群 章百家

副主编：沈学明 郑 谦 高志新 汪永清

柳建辉 梁澄宇 蒋凤波 金兆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二友	丁 明	丁 锋	丁玉兰	力 平	于俊霄	于 倩	卫裕国
马云飞	马仲扬	马国梁	王世瑚	王文友	王玉祥	王丛标	王 光
王延中	王戎笙	王迎新	王 岩	王冠军	王素莉	王振江	王 倩
王 健	王海光	王 野	王 清	王超英	王善中	王新义	王燕梅
尤重远	毛大平	方 茂	方晓东	方晓贤	方晓霞	尹中卿	邓力群
邓广荣	邓礼峰	双 木	艾 丽	左 力	石 峰	龙平平	卢之超
田 波	田居俭	史 敏	丛 文	丛 林	印红标	乐 谐	冯房柱
冯 蕙	宁春富	宁 珊	边彦军	有 林	匡 林	过庚吉	毕英达
吕小蓓	吕振羽	朱元石	朱 钢	乔晓阳	仲文先	任 宗	任 蕾
朱卫国	朱铁志	庄 健	刘小萌	刘长春	刘自健	刘兴合	刘志男
刘 芳	刘丽琼	刘佛年	刘雨亭	刘国云	刘国新	刘春华	刘 政
刘崇文	刘晓霞	次 旺	安 建	安建设	许立新	许安标	孙文年
孙业礼	孙关龙	孙金焕	孙 哲	孙 容	阳 木	纪 泉	纪晓华
严冬枫	苏国霞	苏 星	杜 蒲	李丹慧	李玉非	李巧红	李正华
李乐毅	李甲芹	李西琴	李华新	李向前	李寿伟	李迎选	李 芳
李明征	李 实	李 健	李哲民	李 格	李凌燕	李 捷	李焕雅
李谋胜	李新芝	李玉非	李禧华	杨云博	杨火林	杨先材	杨华柏
杨兆业	杨茂荣	杨 奎	杨思群	杨胜群	杨逸畴	杨照德	肖根兴
吴正裕	吴国昌	吴殿尧	何 山	何永坚	何振一	何雪峰	何盛明
余传隆	冷 溶	汪永清	汪裕尧	汪勤模	沈传宝	沈 杰	沈学明
宋文博	宋 则	宋 全	宋全中	宋春富	宋瑞霖	迟爱萍	张士义
张万晨	张小梅	张 化	张世贤	张永建	张 民	张光佑	张伟国
张问敏	张兴祥	张志明	张宏志	张启华	张茂君	张忠恕	张建华
张春萍	张保军	张 彦	张桂龙	张桂英	张健松	张 培	张 维
张智英	张 鹏	张嘉强	张耀明	陆学艺	陈义方	陈子俊	陈东林

陈立旭	陈立骅	陈永刚	陈 伟	陈杏年	陈 述	陈明显	陈佳林
陈 勇	陈爱菲	陈鸿庆	陈斯喜	陈 朝	陈惠芬	陈富智	陈 新
陈 群	陈耀寰	武国友	武媛媛	武 增	范 硕	林 泉	林蕴晖
国鲁来	罗 伟	季怀银	金冲及	金兆丰	金武卫	周卫东	周玉良
周惠琴	郑广荣	郑有贵	郑昭红	郑雅茹	郑 谦	孟宪彬	赵士刚
赵 欣	赵春生	赵春伟	赵晓光	赵 晖	赵海宽	赵 舒	胡可明
胡庆美	胡茂桐	胡建华	柯 言	柯 榭	柳建辉	钟显林	段启明
段京连	俞 晶	逢先知	饶红践	施汉生	施祥根	姜 波	姜淑萍
官 力	祖雷鸣	姚 红	骆 珊	莫日达	栢 林	贾东明	贾 强
贾 毅	夏杏珍	夏 潮	原庆丹	顾 颀	柴寿桂	钱红樱	钱明辉
铁木尔	倪纪晖	徐元明	徐文虎	徐学刚	徐晓虹	徐 敏	徐耀魁
殷华雷	翁 鸣	高 屹	高均凯	高志新	高燕凌	郭文芳	郭 旃
郭聊町	郭庶增	郭鸿庆	唐合俭	唐 钧	阎建琪	涂卫东	涂能文
黄开亮	黄文军	黄 华	黄述贤	黄 稻	黄 薇	曹志为	曹应旺
龚育之	章百家	章学新	梁云福	梁文明	梁澄宇	寇作鹏	宿世芳
董志凯	董彦彬	董超洁	蒋凤波	蒋仲辉	韩 钢	棠 丁	程大方
程中原	程连升	童卫东	谢玉田	谢惠定	雷 厉	楼 遂	蔡庆新
廖文锦	廖心文	谭幼萍	谭秋成	熊小平	熊华源	熊晓正	缪文荣

Chris Buckley

## 主要编辑、出版人员

总编辑 徐惟诚

社长 单基夫

顾问 孙关龙

特约编审 石磊 左步青 黄鸿森 石家金 杜友良

主任编辑 楼遂 胡人瑞 邓茂 梁云福 王琰

责任编辑 楼遂 李西琴

编辑 张健松 欧绍全 殷华雷 李晓红

特约编辑 李小文 睢联五 范宝新 赵舒凯 刘正萍 李任

索引编辑 李西琴 张健松

图片编辑 顾文荃

图片助理 黄勇

封面设计 高原

责任校对 赵红征

责任印制 赵红征

# 前 言

在全国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的日子里，我们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呈献上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整整 50 年了。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发展最为迅速的 50 年，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少有的艰难地探索和坚持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 50 年。50 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把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把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变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亚巨人。中国人民历尽坎坷，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寻找到了—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50 年中，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走过的道路又是相当曲折的。为客观地记录这 50 年的历程，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组织编纂了这部国史百科全书。

全书共收条目 1500 余个，约 180 万字。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年历史的方方面面，有各领域史、行业史，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会议、文献和法律，重要的理论和概念，重要的人物和机构等。

为了使本书成为一部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兼备的工具书，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地着眼于历史的本来面目，言必有据，以便于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未经历者都能阅读使用。

本书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主编单位，全书的编纂工作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协全国委员会研究室、国务院法制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以及其他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工作的难度较大，时间又紧迫，本书还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恳盼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编 者

1999.7.18



# 凡 例

1. 本书由条目、附录和索引三大部分组成，共约 180 万字。
2. 条目是全书主体，供读者寻检查阅。本书共有 1554 个条目。
3. 条目一般由条目标题，及相对应的汉语拼音、英文，条目释文组成。
4. 条目按条头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序。条目标题以阿拉伯数字开头的，依次排在全部汉字条头之后。
5. 为了提高检索率，避免个别字头过于集中，部分条目标题采用主题词方式标引，例如：“科学技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6. 条目与条目之间以“参见”方式联系，互为补充。被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条目释文中出现时，用楷体字排印，例如：“继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之后，……1984 年 4 月决定进一步开放……14 个沿海港口城市。”未在条目释文中出现时，则加括注，例如：“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始于 1986 年，为期 15 年，是高新技术研究发展的中长期计划（见 863 计划）”。
7. 本书正文前配有彩色插图。
8. 附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一、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指标（一、二）》及《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览表（其数据均由国家统计局提供），以及《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览表》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览表》。
9. 索引有条目汉字笔画索引、条目外文索引。
10. 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11. 科学技术术语以有关部门审定公布的为准，未经审定或尚未统一的则用习惯术语。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公布的为准。
12. 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依据。
13. 本书采用的重要资料和统计数据截至 1999 年 7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邓力群

1949年10月1日，古老的神州大地响起了震撼世界的最强音，毛泽东代表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剥削阶级统治的告终和百年来帝国主义掠夺、宰割和奴役中国的结束。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和新生，而且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用法律形式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确定下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光照千秋的英雄业绩，也经历了艰难曲折，既有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又有失误和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发展和显示生机和活力的历史。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国人民是在外忧内患的严峻挑战中艰苦创业的。建国伊始，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就在外交上孤立中国。他们无视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严正立场，继续承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求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必须和美国步调一致。从1951年操纵六届联大通过“延期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开始，将中国长期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同时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1950年，下令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禁止美国商界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存款。1951年，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在军事上还以武力相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派飞机连续侵犯中国领空。还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动势力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条约，对中国造成新月形军事包围圈。

在诸多的内患当中，最令人棘手的是，蒋家王朝留下的是一副千疮百孔、难以补救的经济烂摊子。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和中外统治者的压榨摧残，城市厂矿倒闭，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农村灾祸肆虐，农民逃亡，耕地荒芜。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济最好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只有140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原煤减少48.4%，只有0.32亿吨；钢减少82.9%，只有12万吨。农业总产值减少两成以上，只有326亿元。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减少24.5%，只有11318万吨；棉花减少47.6%，只有44.4万吨。工厂矿山和交通运输设施破坏严重，到处是残垣断壁。全国有上万千米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1/3的机车不能投入运营。连接南北东西的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无一能全线通车，福建、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竟无铁路。城市失业工人多达400余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农民无地可耕，又遭特大洪水，流浪灾民达4000万之多。城乡人民不得温饱，缺医少药，平均寿命只有35岁。文化也极为落后，高等学校在校人

数只有 11.7 万人，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也不过 2439 万，农村中的成年人大多为文盲。

中国人民就是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基点上从事建设的。从 1949 年 10 月开国奠基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 7 年，是初创辉煌的 7 年。

在这 7 年的前 3 年，对外废除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他们在华攫取的驻军、司法、海关管理、内河航行、自由经营等一切特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友好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对内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恶霸，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财政经济，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

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治愈了战争创伤，把当时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到近代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 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年递增 21.1%。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1%，年递增 34.8%；农业总产值增长 53.5%，年递增 15.3%。工农业主要产品，钢为 135 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多 43 万吨；原煤为 6649 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多 461 万吨；粮食为 16 390 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多 1390 万吨；棉花为 130.4 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多 45.5 万吨。

在这 7 年的后 4 年，即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转入有计划地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 156 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 694 项工程组成的工业建设；同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从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出现过缺点和偏差，如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下一些问题。但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里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适时调整政策，避免了通常情况下因生产关系急剧变革造成的生产力破坏，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 1953 年到 1957 年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农业总产值已达 1241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67.8%。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704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28.6%，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 18%。农业总产值为 537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24.8%。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钢为 535 万吨，比 1952 年多 400 万吨；原煤为 1.31 亿吨，比 1952 年多 0.65 亿吨；粮食为 19 505 万吨，比 1952 年多 3113 万吨；棉花为 164 万吨，比 1952 年多 33.6 万吨。尤其可喜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呈现出好的变化势头。1954 年，毛泽东谈到工业落后的状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可是，仅过两年，到 1956 年，就自行制造出了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和第一台大型蒸汽机车，为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初步基础。

## 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从 1957 年到 1966 年 5 月，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10 年，是为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10 年，也是历史曲折发展，正确与失误、成就与挫折错综交织的 10 年，或者说是前进道路上成就伟大、失误明显的 10 年。

1956 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解决了当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又为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仍然薄弱，距离实现工业国的战略目标还很遥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加速发展生产力。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宣布：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状

况认识不足，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就提出并执行了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方针、政策，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如1957年错误地反对“反冒进”，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援建合同，使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遇到了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棉花产量急剧下跌，轻工业产品极度匮乏，居民副食供应不足。1960年冬开始纠正上述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引导经济建设走上正确轨道。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力求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针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盲目追求“大、公、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偏差，在城镇，调整手工业所有制结构，对一些转为集体所有制后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合作社，采取稳妥的步骤适当收缩，注意发挥手工业的作用；在农村，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确定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允许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规定生产大队（规模相当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得随意抽调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如牲畜、农具等）。

尽管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有过失误和挫折，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坚持发展生产力，及时总结经验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经过1962~1965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得到了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尤其突出。从1965年开始实现了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基本自给。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在基础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两者相结合，使无线电、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宇航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标志着科技战线开始向世界先进水平的进军。交通运输业成就卓著，全国铁路新增通车里数7200多千米，建成或部分建成12条干线，除西藏以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有铁路通达。公路运输、内河和海洋运输、民用航空运输以及邮电通信等，均有明显发展。

农业方面，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1966年比1956年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从1958年年初开始，广大农村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截至1966年，大中型水利建设项目比1956年前多1.2倍，其中绝大多数工程在抗洪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技术改造也提上日程，利用各种半机械化农具日益普遍，现代技术装备程度大为提高。植树造林、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预报等工作也大力开展起来。

在着力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全国各条战线培养和造就出大批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其中杰出的楷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在全国倡导和树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社会主义新风。

对外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到1965年，又同22个亚洲、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建立了半官方外交关系。1964年1月，还同西方大国中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于打破美国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图谋，具有重要意义。

这10年，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宣布：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可惜，此后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形势出现反复，延缓了宏伟目标的实现。

## “文化大革命”时期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为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

决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失误。它的发生，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中国当时的阶级形势以及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极不符合实际的判断，认为中共党内存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地区、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因此，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一场被一小撮野心家利用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前3年，即从1966年5月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前，由于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进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国家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执政党和国家各级机构陷于瘫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被迫中止活动，经济建设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后7年，即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国内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坚持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具体表现在围绕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酝酿新一届政府领导成员的斗争上。1970~1971年，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协助下，粉碎了林彪为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自1972年起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大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各项政策，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1973~1974年，周恩来、叶剑英和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江青等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又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了实现四届人大重申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对各个领域着手进行整顿，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整顿被迫中断。然而广大人民日益认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和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成效，也日益认清了“四人帮”的真实面目，终于在1976年春天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全局性损失，而且使国家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10年“文化大革命”也考验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动荡、内乱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有发展。

从1967~1976年，在执行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动乱严重的1967年和1968年经济建设指标下降，其余各年都有增长。社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8%，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9%。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同1966年相比，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粮食28613万吨，增长33.3%；棉花205.5万吨，减少12.6%。此外，完成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成昆、湘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和攀枝花、六盘水等大型工业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交通的不合理布局。籼型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和推广，将单位产量提高20%，为世界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1976年，尖端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首次成功；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0月28日，第一次成功地回收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批成果，对于国力的增强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的外交又打开了新的局面。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和第三世界众多国家的积极支持，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到1976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09个。

上述各方面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倘若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1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困难的环境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同时也有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中国带进伟大转折的历史新时期。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伴随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批判“两个凡

是”，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基础上，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重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开辟了致富新路。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轨道继续前进。1982年9月，中共召开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起步。1979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立出口特区，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之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和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接着，又设立海南省并定为经济开发区，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东北口岸和沿海、沿江、边疆、内陆的一批城市，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从创立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成为强国之路。198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了新阶段。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以此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按照这一目标，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出全面的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2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27年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探索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更加巩固，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多年的改革，基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经济增长方式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进出口贸易和外

汇储备大幅度上升，中国经济已经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1997年，对外贸易由1978年居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十位；出口达1827亿美元，比1978年扩大17.7倍；进口达1424亿美元，比1978年扩大12.1倍。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139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3483.5亿美元。

——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1979～1997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比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3.3%高6.5个百分点，居世界首位。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4.9倍，按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1997年为902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钢、煤、布、水泥、电视机等产品居世界第一位；电力、化肥居世界第二位；原油居世界第五位。12亿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居民生活已经接近小康水平。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6280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为3744元。城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由1978年的3.5平方米扩大到1997年的8.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则由1978年的8.1平方米扩大到1997年的22.5平方米。居民生活的整体水平已从量的满足开始转向质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达70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准的63岁。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状况正在改善，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由于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1998年，战胜了长江、松花江、嫩江的特大洪水，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全国城乡建立居民委员会11万3千多个，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90万5千多个。法制日益完备。20多年来，在制定1982年新宪法的基础上，制定了194部法律，646件法规，基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框架，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扫黄”“打非”和禁毒斗争，人们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社会风气、治安状况有所改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

——祖国统一大业获得历史性胜利。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了繁荣和稳定。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将回归。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发展，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锐不可挡。

——国防建设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依靠科技强军，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国防总体实力和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加。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过充实调整，形成了面向21世纪的外交格局。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日益加强，成功地解决了同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7000多千米的边界问题；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在改善和发展。到1998年底，同世界16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世界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为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物质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焕发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然而，中国人民面对伟大胜利，并没有盲目陶醉，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还不强。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必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谦虚谨慎，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努力奋斗！

# 目 录

前言 .....	I
凡例 .....	I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1
正文 .....	1
附：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	563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览表 .....	565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量指标 .....	566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指标 .....	568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5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 .....	571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	587
条目外文索引 (INDEX OF ARTICLES) .....	605



# A

Apei Awangjinmei

**阿沛·阿旺晋美** (1910~ )

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三、八、九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藏族。1910年2月出生于西藏拉萨市。1936~1952年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噶伦、昌都总管。1950年昌都解放，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14日，达赖亲政。次年2月28日被任命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赴京与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于5月23日共同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952~1959年，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3月~1964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65~1979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83~1993年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八、九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Aiqing

**艾青** (1910~1996) 现代诗人。

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10年3月27日生。192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绘画，接触大量文学、哲学著作。1932年回国，以自由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入诗歌创作高潮期。1941年春赴延安，主编《诗刊》，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有《向太阳》、《北方》、《火把》等9部诗集出版，是自由诗体的代表诗人。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以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中央美术学院。7月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10月，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57年任《诗刊》和《收获》编委，被错划为右派。“文化

大革命”中又遭迫害。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1983年当选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出版。1985年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自1979年起先后访问德、奥、意、法、日、美、新加坡等国，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雪莲》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新诗奖。论著有《艾青谈诗》、《中国新诗六十年》等。1996年5月3日逝世。

Ai Siqu

**艾思奇** (1910~1966) 哲学家。

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1910年2月3日生。早年两度赴日本求学，曾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4年著《大众哲学》一书，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启蒙作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1937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文化》主编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当选为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共第七、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30年代初，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哲学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他十分注意哲学的通俗化和群众化。他的《大众哲学》一书，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起到了启蒙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努力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进行分析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作出了显著贡献。主要著作还有：《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66年3月22日逝世。

aiguo weisheng yundong

**爱国卫生运动** (patriotic movement for public health) 中国以除

“四害”（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臭虫）、讲究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为基本内容，以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为根本目的的卫生运动。运动是1952年3月由中共中央、政务院领导发起的，其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的细菌战，因而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卫生事业的要求，爱国卫生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增添新的内容。如“两管五改”（管理粪便和水源，改良厕所、畜圈、水井、环境和炉灶）、“治理脏乱差”、“美化环境”等，并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各级政府提高人民卫生文化和健康水平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爱国卫生运动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城乡卫生面貌和环境，发展人民卫生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aiguo zengchan jieyue yundong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patriotic

campaign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economize)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的全国性的生产运动。

1951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决议，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运动中采取的增产节约措施有：清产核资，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加快流动资金周转；降低商品流转费用；缩短基本建设投资；提高生产效率；努力降低成本；压缩国家机关和企业组织人员的编制；杜绝浪费现象等8项。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事迹。在农村，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湖南省推广了李承桂的水稻丰产经验，陕西省大力宣传史安福的小麦丰产法；在城市，纺织行业的“五一织布工作法”，建筑业的“苏长有砌砖法”，大同煤矿马六孩小组的“两个半孔道循环掘进法”，长春铁路局李锡奎调车组的先进调车法等。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总值为11660万元，生产和基本建设因降低成本节约资金有13700万元，节约流动资金有6406万元。

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斗争，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管理的改善，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在运动中，还发现贪污现象屡有发生，从而引发了“三反”运动。

aiguo zhuyi laodong jingsai

**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patriotic labor emul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朝鲜战争,在国营企业中开展的群众性劳动竞赛。

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依靠工人阶级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这一运动在工矿交通和商贸企业的主要形式就是以创造生产新纪录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1951年1月,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矿企业提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倡议,得到各方面支持。10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地各产业在继续进行创造生产新纪录活动的同时,普遍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1950年8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奖励有关生产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进一步激励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仅1952年就提出合理化建议90多万件。在此基础上,各产业部门、产业工会又组织了对先进经验、先进操作法进行总结和推广的活动。郝建秀工作法、马六孩掘进法、平炉快速炼钢法、满载超轴500公里竞赛等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迅速推向全国,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充分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力和主人翁精神。这一时期劳动竞赛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企业盲目追求数字,忽视质量,造成浪费;有的忽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

Aixinjueluo Puyi

**爱新觉罗·溥仪** (1906~1967)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氏,字浩然,笔名植莲。满族。满洲正黄旗人。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清宫为皇位继承人。1909年3岁时被立为皇帝,年号为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依清室优待条件,居住皇宫内保持帝号。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废大清皇帝称号后,被逐出宫,移居天津日本租界,积极进行复辟的准备。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他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任伪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虏,押于苏联监禁5年。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时,曾到

东京出庭作证。1950年8月苏联政府将溥仪移交中国政府,先后在哈尔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和学习。1959年获特赦,安置在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被选为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因病逝世。著有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anding tuanjie

**安定团结** (stability and unity)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维护和巩固的政治局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实现安定团结是1974年8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而提出的。1975年,邓小平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但因形势出现反复而中断。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中共十四大提出,“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共十五大继续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摆在重要的位置。

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际上存在的敌对势力,国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时起时伏,以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有的是不安定因素,有的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如果缺乏警惕,不进行认真处理或者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乱、磨擦冲撞以至社会动荡,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家为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反腐倡廉,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线的稳定,保持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各种重要政策的稳定;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并适当调整利益关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依法治国,健全法制,利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持和创造良好社会秩序;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等。

anju gongcheng

**安居工程** (urban housing program)

自1995年始,中国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结合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城镇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进程,促进城镇住房建设。为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提供政策示范。具体步骤是由各级政府固定资产贷款计划中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配合各自自筹的住房资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以成本价出售或以成本租金出租给中低收入家庭。为降低建设成本,安居工程的建设用地由政府划拨,相应减免有关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用,原则上由政府承担,小区级非营业性配套公建费,一半计入房价。开发建设安居工程不得赢利。

An Zijie

**安子介** (1912~ ) 政协第八、

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定海人。1912年6月26日生于上海。上海圣芳济书院毕业。1938年赴香港。1942年后曾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在香港定居。1950年与人合办中南公司、华南漂染厂。1969年成立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1970~1974年任港英立法局议员。1974年后,任港英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并任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副主席,贸易发展局主席,训练局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及棉纺织业同业会主席,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197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聘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名誉教授。是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发明了安子介汉学电脑编码法。著有《国际贸易实务》、《解开汉字之谜(学习汉语)》、《劈文切字集》等。

Angang sanda zhongdian gongcheng

**鞍钢三大重点工程** (three key projects at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Works)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辽宁省鞍山新建的7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

鞍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后遭到很大的破坏,国民党政府接管后陷于停产和半停产的境地,

年生产能力仅为生铁 50 万吨、钢 58 万吨、钢材 29 万吨。中共接收鞍山后,1948 年 11 月成立鞍山钢铁公司,1949 年 7 月恢复生产。1950 年 3 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改建扩建鞍钢的协议。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根据首先利用原有工业基础、加速经济建设的方针,决定再次扩大鞍钢规模,利用苏联最新技术成就完成对鞍钢各项主要工程的改建和新建。1953 年,鞍钢以容量 918 立方米的 7 号高炉、生产 140 毫米钢管的无缝钢管厂和生产 800 毫米钢板的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开始了从矿山到焦化、炼铁、炼钢、轧钢、机修等 42 项工程的大规模建设。这些工程由苏联设计,经中国政府审核批准,从苏联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再由中国组装投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国家筹集了必要的资金,组织了全国性的协作,边建设边生产,经过四年奋斗,所有的工程都顺利建成投产。到 1957 年就生产生铁 338 万吨、钢 291 万吨、钢材 192 万吨,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的任务,并且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大型、特种钢材的历史。

#### Angang Xianfa

#### 鞍钢宪法 (Constitution of Anshan Iron and Steel Works)

20 世纪 60 年代初对鞍山钢铁公司企业管理基本经验的概括和总结。1960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所写的批

示中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他说,鞍钢创造了不同于“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管理办法)的“鞍钢宪法”,要求一切大中企业、大中城市学习这一经验,有领导地开展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鞍钢宪法”的要点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为内容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所规定的许多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有些正确的原则未得到很好实施。

#### anlaofenpei wei zhuti duozhong fenpei fangshi bingcun

####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concurrent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forms of distribution in which the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labor plays the central role)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分配制度。它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

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中必然

占有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社会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于其他所有制的存在,客观上有其他分配方式存在的必要,即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存在的必要,主要是个体劳动收入、资金收入、资本收入、经营风险收入等。个人劳动收入是指个体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或流通领域的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资金收入是指个人通过购买债券、投资、入股等形式,凭借资金所有权获得的利息、红利、股息等。资本收入是指“三资”企业中的外方资本家和国内私营企业主以拥有的财产资本,通过雇佣工人,由雇工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获得的收入;也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所拥有的技术资本,以其科研成果和技术创造的价值而获得收入。经营风险收入是指企业租赁承包者的经营收入,实际上是一种机会收益或经营风险报酬。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又可以为多种所有制提供劳动力机制和市场机制,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率。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其他分配方式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发展其他分配方式,才能促进按劳分配方式的完善和发展。

# B

ba da junqu silingyuan duidiao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transfer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eight military regions)

1973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中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实施对调,其主旨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为反侵略战争做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具体对调情况是: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且在接到命令后的10日内到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bajiu zhengzhi fengbo

**“八九”政治风波** (political upheaval in 1989)

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发动了一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动乱,并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取得了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1988年末至1989年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极少数人策划利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机会,煽动学潮,挑起事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酝酿已久的学潮提前在北京爆发。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操纵和利用,具有政治动乱的性质。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次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完全赞同和支持中央常委的决定,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发表后,形势开始趋向

平稳。但是5月4日下午,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的讲话,使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以及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外地已经平稳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5月13日,一些人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绝食活动,从此长时间地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在错误舆论的引导下,绝食期间,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与日俱增。致使北京的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根据宪法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于所有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戒严部队进城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为了制止动乱,戒严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不同方式,有计划地向城里开进。6月3日凌晨,在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继续进入警戒目标过程中,一伙暴徒在全城发动了疯狂的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在此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6月4日5时半,天安门广场清场完毕。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被迅速粉碎。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9年6月23~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李鹏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0年1月10日晚,李鹏宣布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的戒严,标志着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彻底胜利。

Bajin

**巴金** (1904~ ) 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11月25日生。“五四”运动时期,阅读了《少年中国》、《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知识新思潮的刊物,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参加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并发表宣传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底回国后,创作大量的

中长篇小说并有译著多种。1934年秋东渡日本。次年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季月刊》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2年和1953年两次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拓宽了创作的视野。1982年,他成为东方第一位荣获但丁国际奖的作家;翌年又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他荣誉外籍院士称号。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从创作小说《灭亡》开始,先后写下了《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抗战三部曲》、《憩园》、《寒夜》等20部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童话等,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和著作。他的作品以炽烈的情感,倾诉了对黑暗的满腔憎恨,对光明的热烈追求。猛烈抨击、鞭挞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讴歌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对被压迫的、善良的小人物和封建家庭的牺牲者寄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愤。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群。1949年以后,作者又写了大量散文、小说、特写,编成《保卫和平的人们》、《友谊集》等。1976年以后出版的《创作回忆录》、《随想录》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7年开始出版《巴金全集》。

baijuan shijian

**“白卷”事件** (blank examination paper incident)

1973年,江青等人借一份考生试卷制造的一起“反右倾复辟”的事件。由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一措施被江青等人说成是“智育第一”,并指使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拿出材料来,“找一块打人的石头”。6月下旬,辽宁锦州市兴城县白塔公社的插队知识青年张铁生(时任生产小队队长),在参加入学文化考查中,自感成绩不够理想,录取无望,便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下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说自己“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像“书呆子”那样有时间复习，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查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毛远新获悉后，亲自删改该信和写出编者按，说这名考生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事实上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理化得6分），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经他指示，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予以刊登。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称“白卷”“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其他报刊立即转载，发表文章，说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由此再次掀起一股否定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的浪潮。江青等人吹捧这个考生敢于反潮流，是个英雄。此后，张铁生上了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还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到处演讲，煽动造反。“白卷”事件是江青集团制造“反右倾回潮”运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教育界、文化界产生了恶劣影响。

#### Bai Lichen

**白立忱**（1941～）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回族。辽宁凌源人。1941年1月生。1964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机系。任辽宁省营口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技术员。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宁省营口市人事局副局长，中共营口市郊区区委副书记、书记，营口市委副书记、市长，盘锦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助理，副省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1997年后任中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 Bai Shouyi

**白寿彝**（1909～） 历史学家。回族。河南开封人。1909年2月19日生。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后任禹贡学会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辑。自1938年起，任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师，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

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学会顾问。并任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席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还连续当选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涉及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独著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回民起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和大型12卷本《中国通史》等。

#### Bai Yang

**白杨**（1920～） 电影、话剧演员。女。原名杨成芳。原籍湖南湘阴，1920年3月4日生于北京。1931年开始演艺生涯。1936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二厂，主演《十字街头》等影片。抗战期间，主演过《日出》、《屈原》等话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先后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后者标志着她表演艺术已臻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主演《为了和平》、《祝福》、《春满人间》等影片。《祝福》获第10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50年代曾重演话剧《屈原》、《日出》中的南后、陈白露。在舞台和银幕上，她的表演细腻、生动，自然、流畅。塑造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形象各有鲜明个性，又都表现出东方女性的风韵和气度。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等职。著有《电影表演探索》等。

#### baihua qifang baijia zhengming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free con-

tention among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nd different forms of art) 1956年4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化的重要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

**背景和形成** “双百”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还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国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这就迫切需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指导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这个方针正式提出是1956年，但酝酿比这要早。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1955年，毛泽东又多次把“百家争鸣”作为解决历史领域问题的办法。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主题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以苏联为鉴，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陆定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们自由发表。有人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方针。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个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双百”方针，对影响文艺繁荣、阻碍科学发展的进行了批评。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思想指导方针写入政治报告及其决议中。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语言，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

**基本内容** 主张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提倡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自由竞赛；允许不同学派并存；学术、文艺领域的是非问题，通过自由讨论和学术研究、文艺实践去解决，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方法。这一方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

艺术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有利于充分发挥科学、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科学、文艺事业得到发展和繁荣。

**贯彻和效果** “双百”方针提出后，立即付诸实施：大力扶植昆剧《十五贯》的演出，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榜样；破除清规戒律，开放戏曲剧目；《人民日报》改版，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发扬百家争鸣精神；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毛泽东还严肃批评党内怀疑“双百”方针的言论，排除贯彻“双百”方针的干扰。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会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继续阐述“双百”方针，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亲自写“本报编者按”，“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并替作者换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在毛泽东等领导人大力推动下，“双百”方针贯彻不到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学术界自由讨论的风气开始浓厚起来，遗传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美学、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等方面，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文艺创作方面，题材范围扩大，体裁风格多样化，出现了一大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品。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曲折中前进**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1961~1962年，在中共中央调整方针指导下，对科学、教育、文艺进行了调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新侨会议）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和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这些领域制定了科学、教育、文艺的工作条例草案，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但是，1963年开始，意识形态领域

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双百”方针几乎破坏殆尽，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1975年毛泽东对此不满，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要求党的文艺政策调整一下。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文艺界才有了一点起色。但是，又很快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来在意识形态、科技等领域的“左”的错误，自觉地贯彻“双百”方针。它同文艺、学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文化科技领域其他重要的方针政策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

#### 推荐书目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92。

Banchan e'erdeni Quejijianzan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藏传佛教领袖。原名贡布慈丹。青海循化人。藏族。1938年1月3日生。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即黄教）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37年九世班禅逝世后，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照宗教程序，选定出生于藏族农民家庭3岁的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4年被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1949年6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为第十世班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之日，羁留青海的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1950年派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1951年4月率堪布会议厅官员45人到北京，参与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3日达成《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2年由青海返回西藏。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在处理西藏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态度。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同年11月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印度婆罗奈斯佛学大学荣誉佛

学博士学位。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分裂国家的武装叛乱时，他同叛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他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当选为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至1988年，他针对极少数西藏分裂分子同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在拉萨制造的几次骚乱事件，多次发表讲话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严厉谴责分裂祖国的行径，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89年1月，在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于1989年1月28日逝世。

baochan daohu

**包产到户**（fixing of farm output quotas at household level）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下，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又称“联产到户”。其实施办法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以契约的方式向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一般为生产队，人民公社解体后为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承包一季或全年的一定耕地面积的农作物产量指标。根据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减产扣分的“三包一奖”的管理办法，由家庭负责从耕种、田间管理直至收获的整个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约定上交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则根据承包农户完成任务的情况，以记工分的形式在年终对其分配。但是，超产部分可以按照约定，全部或部分以实物或仍以记工分的方式奖励给承包者。

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有多次实践。在农业合作化后期的1956年，浙江、江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了包产到户。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当“资本主义主张”而被明令禁止。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1959年在河南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又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而遭遏制。1961年，安徽省的一些地区，以及甘肃、河南、湖南等省的少数地区又相继试行了包产到户，并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子恢等的支持，但自1962年以后，这一做法同样遭否定。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包产到户更被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遭到严厉批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真正得到肯定，并且在中国农村广泛实施。此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它又进一步发展为更受农民欢迎的“包干到户”（即“大包干”），从而包产到户的实施比例迅速下降。到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的1984年，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村（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中，实行包产到户的已不到1%。

Bao'erhan Shaxidi

### 包尔汉·沙希迪 (1894~1989)

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五、六届副主席，语言学家。维吾尔族。祖籍新疆阿克苏。1894年生于俄国一个华侨农民家庭。早年在俄国参加革命工作。1912年独自回到新疆。1920年在新疆省政府工作。1929年因公去德国，后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自学和研究突厥语，并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3年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次年，出任新疆反帝爱国会民众部部长。1937年盛世才政府派其赴苏联，任驻斋桑领事馆领事。第二年回国述职，被逮捕关押，直至1944年11月底释放。1946年参加三区革命联合政府，任副主席兼新疆学院院长。1949年年初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同年9月，与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省政协主席、省高等法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后，除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多届副主席外，还担任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二、三届主任，第四、五届名誉会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等职。80年代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民族》卷编辑委员会主任。在突厥语研究方面造诣颇深，40年代编撰的《维汉俄词典》是中国第一部把现代维吾尔语同汉俄两种语言进行对照的大型辞书。出版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选集》等著作。1989年8月27日逝世。

Bao-Lan Tielu

### 包兰铁路 (Baotou-Lanzhou Rail-

way) 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自包头西站至兰州东站，东接京包铁路，西连陇海、兰新、兰青、干武铁路，全长990千米。单线。1954年10月和1955年10月分别从西、东两端动工修建，1958年7月30日在银川接轨，10月交付运营。线路在中卫与干塘间通过腾格里沙漠边缘，是中国修建最早的沙漠铁路。在路基两侧100~200米地带用机械和植物相结合固沙的方法使铁路免受风沙灾害顺利运行，此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3年石嘴山至兰州东共567千米电气化改造工程动工，1998年11月10日启用。1994年5月包头西至石嘴山401千米增建第二线工程动工，至1998年12月已有263.5千米开通。

Bao Yugang

包玉刚 (1918~1991) 香港实业家。浙江宁波人，1918年11月16日生。父包兆龙为上海实业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1945年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1949年赴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创立环球轮船有限公司，任董事会主席。1980年以后，相继收购九龙仓有限公司、会德丰有限公司，并任董事会主席和汇丰银行董事局副主席。后任环球航运集团公司监管董事局主席、九龙仓集团名誉主席。先后兼任英国渣打银行集团副主席、美国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董事、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香港港龙航空公司主席。1975年、1977年分别被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71年、1976年、1978年被授予“太平绅士”称号。1982年获美国“世界经济实业家”称号。198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玉刚关心祖国建设，多次为祖国教育等事业捐资，创办了宁波大学，并设立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1991年9月23日逝世。

Bao-Cheng Tielu

宝成铁路 (Baoji-Chengdu Railway) 沟通中国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北起陇海铁路的宝鸡站，南至成都站，全长669千米。在成都与成渝、成昆铁路相连，中接阳安铁路于阳平关。1952年7月和1954年1月分别从成都、宝鸡动工，1956年7月12日在黄河接轨，1958年元旦交付运营。按Ⅱ级单线铁路标准设计，正线辅轨667.71千

米；隧道304座，总延长84.4千米；桥梁1001座，总延长28.1千米。限制坡度为12‰，跨越秦岭地段采用了30‰的多机牵引坡度，会龙场越岭地段采用了20‰的双机牵引坡度。1975年6月全线实现电气化，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92年12月29日，增建电气化第二线南段阳平关至成都工程开工，至1998年1月开通67千米。

baoshui qu

保税区 (bonded area) 经海关批准设立的既可仓储商品，又可加工生产的，暂不交纳进口关税或免征关税的一国关境中与关境其他部分隔离的特定地区。是世界经济性特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作用是推动出口、转口和三角贸易，拓展经贸活动。它是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的融合体，可视为“微型出口加工区”。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此后又相继批准了天津港等15个保税区。设立保税区的根本目标是：利用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改善投资、建设软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保税区具有出口加工、国际转口贸易和仓储、商品展示等贸易服务功能。

baoxianye

保险业 (insurance) 中国保险业通过签订保险合同，集中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对个人因死亡、伤残给付保险金，从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曲折发展历程 1949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保险事业的方向，积累保险资金，对私营、外商保险公司的政策，人民保险公司的组建、发展和权限，以及与人民银行的关系等问题，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事业的开端。会议结束后，经过半个月的筹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在此之前，人民保险事业已经在东北、天津、北平、汉口等地展开。

在发展人民保险事业的同时，对原有保险业的整顿改造工作也同步开展。整顿改造工作，首先从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经营的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附属这些机构的保险总公司、总管理处、事务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所以接管工作以上海为重点。被接管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因为资金转移，或者负责人贪污、挪用，资金已经枯竭殆尽。随后，武汉、天津、广州、重庆等地也先后颁布了管理保险市场的法令。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因在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逐年下降陆续申请停业，最终全部自动撤离中国保险市场。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挫折和磨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以后，曾试办农业保险，并拓展新的保险领域，努力实现“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增进人民福利”的业务方针，使保险业在50年代初得到积极发展。由于当时缺乏办保险的经验，曾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财产推行一系列强制保险措施；在试办农业保险过程中，采取变相强迫命令，粗暴威胁群众参加保险，造成群众对保险的反感。在1953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保险工作会议上，遵照中央指示，立即停办农村保险业务，整顿和调整城市业务。从总的方面看，1949~1957年期间，中国的保险事业做出了一定成绩，也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1958年，极左思想的影响使中国的保险业面临重大困难。当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财贸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此后，曾经一度轰轰烈烈的国内保险业务进入了空前低谷时期，保险业务只在少数地区继续经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保险业被认为是私有经济的产物，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提出“砸烂中国的保险业”，停办全部涉外保险和国际再保险。1969年发生的手表和铂金丢失事件，成为中国保险业在困境中开始恢复的契机。1969年上半年两次丢失手表2万只、铂金6公斤后，无法获得保险赔偿，周恩来总理在追查有关责任时，方知保险业已经停办。因此对“砸烂保险”的错误言论给予严厉的批评，明确提出海外保险与再保险必须继续办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掀起了中国保险史上辉煌的一页。

**保险业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保险业进入了一个稳步和快速发展时期。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

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2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各级分、支机构1214个，处理赔案11万余起，使3万多家工商企业恢复生产经营，1.5万多个家庭重建家园，初步建立了国家经济补偿制度。国外保险业务发展迅速，1983年已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保险公司建立了国际业务关系，全年收入的保险费为1.5亿多美元，并承保了对外贸易的70%以上的业务。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为国务院直属经济实体，按照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独立行使职权和进行业务活动。1985年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公司，实行由总公司和当地人民政府双重领导。这标志着新时期中国保险事业恢复任务的完成。

1986年起，中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保险费收入迅速增长，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加，保险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保险理论与教育的健康发展。1980年是全面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第一年，全年保险费收入为4.6亿元，1986年上升至45.8亿元。90年代以来，中国的保险业务量突飞猛进。截至1997年底，保险费收入达到1080多亿元。从1980年至1997年期间，年保险费平均递增40%左右，远远超过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保险费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给付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从1980年到1997年，中国保险每年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平均每年增长50%左右，超过保险费收入增长的平均水平。

1986年以后，中国保险市场上相继设立了交通银行上海保险部（1991年改建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平安保险公司（1992年改建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多家保险企业。中国保险市场主体在进入90年代后发展迅速。截至1997年底，中资保险公司主体有13家，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主体有9家，另外还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家保险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了189家代表处。随着中国保险市场趋于成熟，保险市场的中介要素开始活跃，通过全国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人数达35万人左右。

**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 中国保险法律法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了专门规定。198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

1985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规范中国海上保险合同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在1996年2月2日颁布《保险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同年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2月16日，出台《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条例。在制订和出台各种保险法律法规的同时，保险业自律组织开始建立。这对加强保险行业自身管理，协调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的监管趋于成熟化、专业化，对中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与国际接轨，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保险理论研究成果显著。中国保险教育成功地建立了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资格考试两套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 Beidaihe Huiyi

### 北戴河会议 (Beidaihe Conference)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的严重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 Beiguo Jiangnan de pipan

**《北国江南》的批判** (criticism of the film *Beiguo Jiangnan*) 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北国江南》等影片展开的一场批判。

1964年7月，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





米区域,包括1988年建立的海淀试验区、1992年建立的丰台科技园区和昌平科技园区。海淀试验区位于海淀区,以被誉为“科学城”的中关村地区为核心,其中建有1.8平方千米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丰台科技园区位于南郊的丰台区,昌平科技园区位于北郊的昌平区,两园区面积各占地5平方千米。各园区由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

北京试验区自建立以来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1998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513.8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57亿元,工业总产值(不变价)332.5亿元,出口创汇3.34亿美元,上缴税费17.9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5.7%、20.9%、42.4%、10.4%和40.4%,对北京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0%以上,成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涌现出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试验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有6000多家,其中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7家,过亿元的企业60家。

高新技术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到1998年底,在试验区工业总产值中,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与新能源、新药物与生命科学的产值分别占63.3%、12.2%、10.6%和10.7%。其中,海淀试验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1998年产值(现价)155.4亿元,占总量的68.8%;丰台科技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已占其总量的47.3%;昌平科技园新药物与生命科学产业已占其总量的41%。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初具规模,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形象。试验区建有上地、丰台和昌平三个产业基地,截至1998年底,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3亿元。其中1998年完成11.07亿元,同比增长53.8%;累计开发土地面积4.65平方千米,累计完成建筑面积223.4万平方米。三个产业基地共签约进驻企业241家,其中三资企业71家,内资企业170家。

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到1998年底,试验区共有在册员工16.24万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2.1%,其中有硕士10700多人,博士1600多人,留学归国人员近1000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

重视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充分利用国际各类资本发展高科技产业。到1998年底,试验区拥有三资企业1000多家,约占企业总量

的17.3%;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投资总额达16.4亿美元。

1997年北京试验区被批准作为中国政府首批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开放合作的科技工业园区之一。试验区作为国际科技园区协会(TASP)的正式会员单位,于1995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科技工业与研究园第四届世界大会,1997年又被推举为该协会亚太分会理事单位。

### Beijing Shoudu Guoji Jichang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ijing) 始建于1958年,初名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候机楼建筑面积为10500平方米,跑道长2500米,宽80米。1966年和1974年曾两次进行扩建。第二次扩建历时10年,新建一座6万平方米的卫星式候机大楼,修建了长3200米,宽50米的西跑道,扩建了东跑道,使其长达3800米,宽60米;并修建航管楼,扩建收发信台,又在跑道上安装精密的全套仪表着陆系统。新候机楼内设置有自动人行步道、自动扶梯、行李接收分检输送提取系统、飞机动态电子显示牌等。

1988年北京首都机场更名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适应改革开放后民航运输量激增的需要,1989年机场再度进行扩建,候机楼面积增至7.8万平方米,对楼内的部分设备进行更新,值机柜台增至84个,行李传送带增至10条。1992年,机场候机楼又进行技术改造,将二楼平台改为出港大厅,使候机大厅面积增加了7000平方米。

1997年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为16907954人,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一,货邮吞吐量457540吨,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二,飞机起降141184架次,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二。更大规模的机场扩建工程已于1995年10月正式开工,将于1999年10月竣工。新候机楼为工字形指廊式结构,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14000平方米的值机大厅将设置168个值机柜台,16000平方米的行李大厅设有17个行李提取转盘。航站楼前将建一座17万平方米的停车楼,能同时停放5100多辆汽车,有停车泊位引导系统、自动水平步道,车辆通道与航站相连。航站楼旁新建站坪48万平方米,共有近机位36个,其中包括17个国际机位。同时还新建8个远机位。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11500人。新航站楼与现用候机楼之间由自动人行步道长廊相连。

### Beijing Xizhan

#### 北京西站 (Beijing's West Railway Station)

中国最大的铁路客运站。位于北京市城西海淀、丰台、宣武三区交界处。北京西站的主体建筑是一组展现古都风貌、民族风格的现代化建筑群体。采用上进下出、高架候车、地下大厅出站、南北开口、以北为主的布局,集行车指挥、客运服务和商业、餐饮、邮电、娱乐等多种功能,总面积50万平方米。主站房高102米,东西长740米,由中央主楼,东西副楼,东西配楼组成。共有21个候车室,可同时容纳2万人候车。首层大厅东侧售票厅设38个售票窗口。站场为通过式,10座站台均可停靠20辆编组的长大列车。设计能力为近期接发旅客列车60对,远期可达90对,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客运站。1993年1月19日开工,1996年1月21日开通运营,缓解了北京站的运营压力。

### Beijing zhengfu dianzi duizhuangji he beijing puyi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 (Beij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ctrodes collider and Beijing spectrograph)

高能物理是当代自然科学三大前沿学科之一。1974年 $J/\psi$ 粒子的发现揭示了第四个夸克——粲夸克的存在,开创了粲物理研究的新领域,但粲物理和 $\tau$ 轻子物理中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在质心系3G~5.6GeV能区存在着研究粒子物理的“窗口”。

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和北京谱仪(BES)的计划,1983年经国家批准,1988年建成并于10月第一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1989年7月通过国家鉴定。由于对撞机的对撞亮度高(在 $2 \times 1.6\text{GeV}$ 能量已达 $2 \times 10^{30}/\text{cm}^2\text{s}$ ),束流能散度较小(0.64MeV),加上北京谱仪探测立体角大,粒子分辨性能好等特点,所以它们是目前世界上同能区性能最好的对撞机和谱仪,可以积累更多的、质量更好的 $J/\psi$ 粒子及其家族的事例。而且,除了可以深入研究 $J/\psi$ 粒子物理,寻找胶子球的工作以外,还可以对D、F介子以及粲重子和 $\tau$ 轻子的性质进行研究,这些都是当今国际高能物理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除用于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外,还可以作为同步辐射光源,提供真空紫外至硬X光方面的应用研究,

用于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光化学、固体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表面物理、材料科学、医学以及光刻研究等方面。

作为一项大规模、多学科、高科技、综合性的科研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自行设计、建造成功，对促进和提高中国相应学科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有着直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最大的多学科研究基地和培养人才、进行国际合作的中心。

此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的前后，还建成了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这些项目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Bei Shizhang

**贝时璋** (1903~ ) 生物学家。浙江镇海人。1903年10月10日生。1921年毕业于同济医卫专门学校医预科。1921~1928年留学德国，1928年获德国蒂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0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0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杂志副主编。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四、五、六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常委。长期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对生物的细胞常数、再生性转变以及细胞的结构、分裂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在丰年虫中间性的性转变过程中，观察到细胞重建现象：在生物体内除细胞分裂外，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也可一步步形成完整细胞。在丰年虫和鸡胚早期发育中，多次重复研究，证明以卵黄颗粒为基础或细胞质为基地，重建为细胞，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并从卵黄颗粒中提取出染色质。30年代创办了浙江大学生物系，50年代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为中国的生物学、特别是实验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著有《细胞重建论文集》等著作。

Bingxin

**冰心** (1900~1999) 现代作家。

女。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祖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1918年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后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教书。1934年任《文学季刊》编委。抗战期间辗转于昆明、重庆等地。1946年赴日本讲学。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最初，她以“问题小说”步上文坛，并因此引起读者注意。早期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表现对封建旧家庭的当权者和压抑个性的旧制度的不满，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时代苦闷，具有醒世作用。“五四”退潮后发表的《超人》等小说开始宣扬用“爱的哲学”来改变人生。1920年开始哲理小诗的创作，后结集为《繁星》、《春水》。诗作抒写瞬间感受、人生哲理，赞颂母爱、童心，含蓄、温婉、隽美，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形成小诗创作热潮。有人将这类小诗称为“春水体”。同时，这一时期开始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笑》、《“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往事·一》等。1923年留美期间，她不断把赴美途中和在异邦的见闻以及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成《往事·二》、《山中杂记》、《寄小读者》等，这些是她影响最大的几部作品。尤以《寄小读者》为散文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笔调优美，感情细腻澄澈，熔白话文的明白晓畅和文言文的凝练简洁为一体。50年代后仍致力于散文与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归来以后》、《小橘灯》、《樱花赞》、《三寄小读者》、《记事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1999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bingqi gongye

**兵器工业** (ordnance industry)

研究制造坦克、装甲车辆、枪械、火炮、火箭、战术导弹、弹药、爆破器材及保障器材等常规武器的军事工业，是常规战争的主要支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兵器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改进设计到自行设计，逐渐形成新型的、比较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发展历程** 50年代初期，兵器工业的基础主要是原解放区根据地兵工厂和接管的原国民党政府兵工厂。1950年5月，

在重工业部下设兵工办公室，下辖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南5个兵工生产基地，完成了管理体制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转变。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前线需要，组建坦克专业工厂，仿制成功第一种制式武器——7.62毫米冲锋枪，还生产大批枪械弹药。1952年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统一管理国防工业。1953年至1959年，兵器工业进入第一次大规模发展时期，围绕装备制式化的中心，以提高技术水平为先导，改造老企业，兴建新工厂，试制出国家规定的制式武器和弹药，全面更新了陆军武器装备。同时，贯彻平战结合的原则，支援国民经济建设。到50年代末，初步形成行业基本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的兵器工业体系。5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苏联援助下进行仿制，后期开始自行制造。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中受阅的59式中型坦克、59式130毫米和152毫米加农炮、59式100毫米高射炮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进入60年代，国际形势相对严峻，兵器工业转入战备时期。1960年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根据中央方针制定了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主、加强常规武器的规划，优先安排原子弹和导弹配套设备的研制，积极试验海军、空军装备，同时加快自行研制陆军武器。1961年起，开始全面整顿国防工业，缓建、停建了一批兵器工业企业。1962年，台湾当局妄图窜犯大陆，中印边境地区印度军队入侵，兵器工业由一般战备整顿转入临战生产，重点是生产滩头抗登陆作战的远射程压制火炮和轻便武器，及耐高寒山区作战的武器弹药。从1958年起，为了自行发展武器研制生产，陆续建立了一批研究所、设计所和院校研究室，构成科研体系，展开探索和研究工作，重点是改进苏制武器、研制缺项武器、为导弹和原子弹配套、研究新技术。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专家撤离，兵器科研工作进入攻关阶段，到1965年取得了重大进展，自行生产出107毫米和130毫米火箭炮、水陆两用坦克、装甲运输车及一批高性能的装甲钢、枪钢、炮钢等原材料，标志着兵器工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1963年，成立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兵器工业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1964年，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兵器工业在三线建设中开始调整战略布局，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产基地，同时各地也兴建起地方军工企业。“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由于战备需要，兵器工业得到大发展；另一方面动乱也严重影响

了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从1972年起,兵器工业进行了整顿,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研制得到发展,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提供了有力援助。

进入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兵器工业首先进行了全面整顿,在抓新武器研制的同时大力开发民用产品,积极开拓对外贸易,开始从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1981年,中央确定了保证军品的前提下,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发展民品的方针。到1985年,兵器工业生产的民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33.4%,还成立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负责兵器工业系统的对外贸易。这一时期,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上缴利润定额包干”的改革,打破了兵器工业几十年来吃“大锅饭”的传统,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1982年第五机械工业部改名为兵器工业部后,兵器工业又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确定了包干一定三年不变的规定,组建了嘉陵摩托车集团等大型民品企业。1986年撤销兵器工业部,与机械工业部合组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七五”计划期间(1986~1990),兵器工业直属企业民品产值比“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增长2倍,民品比重上升到48.7%,1990年产值达到45.6亿元,比1980年增长6.35倍。在军品方面,从“七五”计划起,兵器工业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到1989年先后研制成功88式主战坦克、551轮式步兵战车、红箭8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新122毫米履带式自行榴弹炮、85式7.62毫米轻型冲锋枪、GSI履带式火箭扫雷系统等14项新型装备,加强了部队作战的威力和机动性。

进入90年代,中央作出了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体现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科技强军的重大决策。为加强行业管理,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兵器工业总产值增长近两倍;“九五”计划的前3年(1996~1998),一批新研制成功的武器装备相继服役,使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装备集团公司。

研制和生产 50年来,兵器工业研制生产的常规武器主要有:

①坦克。1958年制造成功的59式中中型坦克,是中国第一种自行制造的坦克。60年代初,开始自行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到1987年先后研制成69式、79式、88

式主战坦克,形成主战坦克系列。88式主战坦克于1988年在北京国际展览会上公开展出,引起强烈反响,标志着中国坦克工业进入了新阶段。

②火炮。50年代末期,仿制和自行研制成功迫击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20个型号的第一代制式火炮序列。1960年至1989年,先后研制定型火箭筒9种、火炮79种、火箭布雷车和火箭扫雷车6种,部队装备更新了一代至二代。1989年研制成功的新型122毫米自行火箭炮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③枪械。50年代以学习苏联技术为主,在高起点上实现制式化;60年代至70年代以自行研制为主,在新水平上完成了系列化;80年代以来,以赶超国际水平为目标,全面提高枪械战术技术性能。到1989年,已拥有10个综合研究所、64个生产厂,共研制成功新型枪械55种。

④战术火箭与战术导弹。完全是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火箭弹、战术导弹的科研和生产体系。研制的火箭弹有反坦克、野战、空空、布雷、特种用途火箭弹等49种;1988年定型的第二代单兵火箭、1984年定型的122毫米火箭布雷弹,都达到或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研制的战术导弹有空空、地空和反坦克3大类5种型号,1987年定型的红箭8型反坦克导弹,一些性能优于国际同类水平,使中国反坦克导弹技术向世界先进水平前进了一大步。

⑤军用光电仪器。50年代主要发展可见光技术,60年代着重发展主动式红外线夜视技术,70年代发展激光技术,80年代又大力发展了微光、激光、红外热成像和微处理机技术。研制开发的产品有可见光仪器、夜视仪器、火力控制系统、制导系统等4大类200个型号,不仅为常规武器服务,也为人造卫星、原子弹、导弹配套服务。

50年来,兵器工业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走过不少弯路。现正在从过去单一为国防服务转向为整个国家四个现代化服务,从自成体系转向对外对内开放和发展联合,建立起在全社会进行分工协作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新体制。

## boluan fanzheng

拨乱反正 (effort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state of affairs)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各个领域工作中,为揭露林

彪、“四人帮”的罪行,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的总称。

拨乱反正工作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局部的拨乱反正,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随着“两个凡是”方针的逐步动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局部的拨乱反正取得一定的成绩。教育战线推翻“两个估计”,肯定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文艺战线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为一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恢复了全国文联和5个文艺协会。经济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计划、农业、铁路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国民经济扭转了“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经济理论界批判了“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生产目的、按经济规律办事等方面的错误观点,澄清了是非。被“四人帮”破坏的中共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在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恶果,逐步得到清除。在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基本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各种犯罪分子遭到打击,社会秩序逐步趋于安定。

第二阶段,全面的拨乱反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2年底。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清理了中共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阐述,使广大干部群众从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32年的历史,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维护了中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毛泽东的

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与此同时,在各个领域、各项具体工作中,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1978年11月24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同年12月为所谓1967年的“二月逆流”平反,为彭德怀、陶铸平反。1979年6月为贺龙平反,1979年8月为张闻天平反,1980年2月为刘少奇平反,1980年9月为胡风平反。继1978年4月决定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还有步骤地处理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调整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从1979年1月起,开始为已经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掉帽子;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落实政策;明确肯定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为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人摘帽。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恢复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落实宗教政策。重申中共的侨务政策。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和技术职称。

全面拨乱反正的完成,为长期稳定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 bowuguan shiye

**博物馆事业** (museums) 博物馆是征集、收藏文物和自然遗存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开展宣传教育等业务活动的多功能文化复合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16个博物馆和外国人办的8个博物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办过一些陈列馆、博物馆,规模都很小。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博物馆事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 第一个发展阶段(1949~1977)

①整顿和改造原有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和外国人在华办的博物馆,采取保护和收集文物、整顿和改造原有博物馆的政策。1950年5~6月,政务院相继颁发了《禁止珍

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和《征集革命文物令》等一系列法规政令,规定中国的革命文献及实物、古生物、史前遗物、建筑物、绘画、雕塑、铭刻、图书、货币、舆服、器具等文物一律禁止出口,严禁破坏、损毁及散失,制止了当时文物与自然遗存标本的破坏和走私外流,为原有博物馆的整顿和改造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确定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历史博物馆为重点,改造陈列内容,整顿库房管理,加强群众工作,建立健全制度,努力清除过去的不良影响。全国各地博物馆也认真对藏品进行清点、登记、编号、分类和排架,基本上克服了家底不清、管理混乱的状况,做到了专库(或专柜)度藏、专人管理,保障了藏品的安全。还改造博物馆零乱不堪的“古董摊”式的陈列布置,按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新的陈列设计,创建科学的陈列体系,建立讲解、宣传等工作制度。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原有博物馆的整顿和改造工作。

②建设新型博物馆。在整顿和改造的同时,开始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工作,重点是建立省博物馆和纪念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性博物馆。提出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历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成绩)三部分为陈列内容,注意全国性 with 地方性的配合。1953年文化部确定以山东省博物馆为试点,从北京、黑龙江等10多个省抽调专业人员协同山东省博物馆人员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该馆成为拥有以上三部分陈列内容的综合性省级博物馆,为各地新建博物馆提供了经验。到1957年,除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台湾省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省级博物馆。一批地、市、县也建立了中、小型博物馆和革命纪念馆。1958年中国博物馆已发展到360个,是1949年的15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是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数以百计的单位为这三个馆的建设支援人力、物力,各地许多博物馆和有关部门为这三个馆捐赠、借调了大量文物藏品。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三馆建成开放。这

三个馆的陈列,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博物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

③十年摧残。60~70年代,因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大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被诬为“封、资、修的黑窝”、“藏污纳垢之所”,馆藏文物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许多博物馆长时间关闭,场地被占用或改为他用,博物馆工作者的身心遭受摧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博物馆事业才有所恢复。

### 第二个发展阶段(1978~1999)

①确定博物馆工作重点。70年代末,博物馆界拨乱反正,清除“文化大革命”对博物馆工作造成的混乱,确定把搞好基本陈列和加强科学研究作为工作转移的重点。全国各博物馆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布置陈列展览,尊重历史和客观实际,使陈列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博物馆事业走上了适合国情、循序渐进、讲求实效、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②各行各业兴办博物馆。除文物部门兴办博物馆外,各行各业也兴办体现行业特色、地方特点的博物馆,为本行业生产和建设服务。197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有几十个新博物馆成立。到1997年,全国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已达1274个(1978年为379个),加上其他行业兴办的博物馆,全国各类博物馆总数约为2000个。博物馆的品种也日益齐全并逐步形成体系:社会历史类博物馆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然、地矿类博物馆业已具规模,民族、民俗类博物馆纷纷设立,一批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直接为各行业生产发展服务的科技和产业类博物馆相继诞生。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正在改变着中国博物馆数量小、品种少的状况。

③提高博物馆综合水平。“七五”时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新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西藏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等及改建、扩建的一大批省、市博物馆相继竣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博物馆文物、标本的收藏保护、陈列展示、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设施保证。这些博物馆馆舍建筑恢宏,藏品丰富,陈列各具特色,科学研究成果丰硕,经营管理水平

日益提高，受到国内外观众青睐。

④加强中外交流。8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的国际交流逐渐增多。故宫博物院的明清工艺美术展览、中国明清绘画展览、故宫珍宝展览、故宫钟表展览、清廷服饰展览等11种专题展览先后赴澳大利亚、日本、联邦德国、新加坡、美国、奥地利和香港展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文明展览、中国传统技术展览、中国古代科学展览等6个专题展览先后赴意大利、南斯拉夫、加拿大、日本和西班牙等国展览。上海、南京等10多个省、自治区、市的博物馆（院）都举办出国展览。80年代以来，与外国博物馆事业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日益增加。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科学研究已摆脱了“封闭状态”。

⑤迎接远景目标。9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努力建立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为骨干，各地方博物馆和各行业博物馆全面发展的博物馆体系，进一步改善中国博物馆的地理分布和门类格局。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工程”，努力办好精品展览，运用现代技术，突出陈列主题，尽可能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强化宣传教育的效果。继续提高管理水平。博物馆工作在努力实现国家文物局1996年10月制定的《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九五”计划及2010年发展远景目标纲要》。

**科研、教育与技术应用** 1956年提出博物馆三重基本性质和两项基本任务（简称三性二务）：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和为科学研究服务，为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后重新肯定了三性二务，并作了调整，即确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博物馆的工作重心也进行了调整。科学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创办了《中国博物馆》等20多种学术性刊物，出版了一批博物馆学专著，专业性书刊，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

1978年以后开始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注意专业人才的培养。20多所大学设置了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专业，有的中学开设文博职业高中班，有些大学开设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古建筑学专修班和研究生班，实现了文物博物馆干部教育（培训）的经常化、制度化、正规化。

中国博物馆应用现代化技术起步较晚。60年代初，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1963年首次制定文物保护科研规划，即《1963—1972年文物保护科技发展规划》。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实施一些重要文物的迁移保护工程和维修工程，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保护技术、文物复制技术也取得了进展。80年代以来开始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提高了文物保护技术的地位。1989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文物研究所。国家文物局直属博物馆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博物馆也设置文物保护科技机构。同时，健全文物科技管理体制，统筹全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对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和文物保护科技人员的培训以及与国外进行文物保护技术的交流。一些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项目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文化部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省级科技进步奖等。现代化技术在文物陈列展览等方面的应用80年代以来亦有较大进展，例如在陈列展览中运用录像手段，实行电脑管理与操作，在新建博物馆建立具有世界水平的全景画馆、半景画馆等。

**管理体制** 1949年10月底，在文化部设立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和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工作，各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有关文物政策法规。1973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和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事业。

1984年全国博物馆整顿改革座谈会后，对博物馆进行改革：明确博物馆的三大职能；各级文物博物馆行政管理部门简政放权，使基层博物馆在人、财、物和业务工作开展有相当自主权；建立和健全博物馆各项规章制度，实行全面科学管理；改革博物馆领导体制，改党组织（总支、支部）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为馆长负责制，改任命制为聘任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岗位责任制；打破束缚博物馆发展的禁区，允许博物馆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适当组织创收，等等。

Bo Yibo

**薄一波**（1908～）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山西定襄人。1908年2月6日生。1922年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参加太原声援“五卅”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不久，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毕业后，任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太原地委委员，参加领导太原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27年后转入晋北农村从事秘密工作，恢复、整顿中共党组织。1929年调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指导兵运工作，先后在唐山、大沽、塘沽和平汉铁路沿线地区组织领导士兵暴动。后被捕入狱，任狱中党支部书记，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36年8月，经中共党组织营救救出狱，回到山西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以抗日救亡活动家的名义，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应阎锡山之邀，接手改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山西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政治委员。不久，扩充部队，建立新军，率部开赴晋东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率部参加反击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取得胜利。1939年底至1940年初，指导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后所部编入八路军129师。曾先后担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治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为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43年10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组织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47年全力支援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刘、邓率部挺进中原后，主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平津卫戍区政治委员，参加平津战役的组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在陈云主持下制定并实施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并在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任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1951年后受中央委派负责主持“三反”、“五反”运动。1954年10月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主持国务院重工业口的工作。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

会成立，任主任。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1月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主持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严重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1979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82年5月改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主任，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1983年10月，被选为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被推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著作有：《薄一波文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

**推荐书目**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6。

**Budalagong weixiu**

**布达拉宫维修** (restoration of the Putala) 1989年至1994年实施的维修布达拉宫的工程。

布达拉宫是西藏现存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坐落在拉萨旧城西面2000米的北玛布日山（红山）上。“布达拉”亦译作“普陀”，梵语意为“佛教圣地”。相传7世纪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在此首建宫室。后经累世重修扩建，始具今日规模。宫体建筑分红宫、白宫两大部分，主楼13层，高117.19米，东西长370余米，全部为石木结构。内有宫殿、佛堂、习经室、寝宫、灵塔殿、库房、庭院等，具有藏式建筑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特点，是藏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西藏和平解放后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和加固，并成立了以李铁映为名誉组长的领导小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从1989年起实施，总投资达5300万元，施工项目共计111项，总面积约3.39万平方米。中央政府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此项工程，整个维修严格按照“尊重传统、尊重科学、尊重民族风格、尊重宗教需要”的原则，施工以藏族工匠为主，同时从内地

调集大批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在布达拉宫维修史上，此次维修工程是投入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整个维修工程于1994年8月竣工。为纪念这项工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了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纪念碑，以示“共庆功成，感戴恩德，齐奏团结颂歌，同贺雪域昌盛”。纪念碑揭幕仪式于1996年4月17日在布达拉宫脚下举行。纪念碑碑文记载：“工程进展顺利，质量合格。宫内文物，保护完好，无一损失。老残古宫，修葺之后，稳固如初。国内外专家名流同声称道。”

**Buhe**

**布赫** (1926~ )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蒙古族。1926年3月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1946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学习。1946~1954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组织干事，内蒙古自治学院中学部副主任兼政治教员，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57~198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兼自治区文联主任，自治区文委党代委书记、主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呼和浩特市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1993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1993年后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Budui Wenyi Gongzuo Zuotanhui**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Army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召开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活动之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谋，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政治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在北京等地受到抵制，江青企图寻求军队的支持。她首先找到罗瑞卿，提出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遭到拒绝。当罗瑞卿被林彪捏造罪名打倒后，江青在1966年1月21日，专程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提出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彪妻子叶群出面，将林彪

意见电话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并传达林彪指示，称江青“政治上很强”，要求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人参加会议。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和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座谈会于2月2日开始，气氛十分不正常。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讲一点意见。她还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甚至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座谈会主要进行4项活动：一是看电影和戏剧。先后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江青到场看了13次。二是所谓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人交谈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每次谈话，都是由江青一个人讲。三是阅读《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和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9个材料。四是江青接见戏剧《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3次。江青在谈话中全盘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方针和成就，肆意点名批判和诽谤文艺界人物，并极力吹嘘自己，点名攻击周恩来。

会后根据江青发表的意见，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主持整理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报送毛泽东审阅。由于这个《纪要》符合了毛泽东当时得出的“党内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判断，他十分重视，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并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形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于4月10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印发全党贯彻执行。《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7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宣称17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文艺界扣上了3顶帽子，即理论黑、作风黑、队伍黑。这些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舆论准备。1967年5月29日，《纪要》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由林彪支持、江青召开的这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形成的《纪要》，是江青插手军队，与林彪相互勾结，打击迫害文化界干部群众的一个重要步骤。《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

根本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文艺战线的实际情况，是完全错误的。《纪要》的贯彻和推行使大批文化工作者遭到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给社会主义

的文化艺术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7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推荐书目**

刘志坚著：《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



# C

caizheng

**财政** (government finance) 执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 满足政府公共活动支出,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作用, 实现财政职能的宏观经济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是在新民主主义财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新民主主义财政是一种供给、战时财政,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体农民农业税, 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开支, 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由于根据地分割, 新民主主义财政在财政管理上处于分散状态, 未能形成统一的财政。但是, 新民主主义财政“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政策, 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 控制赤字、力争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等,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

**50年代的财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始实行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 逐步建立了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体制。新民主主义财政开始向社会主义财政过渡。50年代初期, 国家运用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等职能, 运用预算、投资、税收等多种手段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壮大国营经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提出了改变国家财政经济偏重于工业, 在工业中特别是偏重于重工业, 以及财政管理偏重于集中和统一的作法的理论基础。随后,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财政经济工作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左”倾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 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挫折。

**60年代的财政** 1960~1965年, 中国财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加强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援; 压缩基建投资, 合理分配资金, 调整经济结构; 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 搞好综合平衡; 节减支

出, 回笼货币, 稳定市场; 清仓核资, 扭亏增盈, 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克服财政困难, 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贡献。

**10年内乱时期的财政**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财政遭到严重破坏, 国家财政靠停办缓办各种事业过日子, 靠冻结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等在银行的存款来渡过财政难关, 但10年间仍然留下19亿赤字, 而且背后隐藏的问题成堆, 积重难返。10年内乱使中国财政在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大大削弱, 财政职能作用得不到发挥, 财政投资结构畸形发展,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边缘。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财政**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财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经过几年努力, 1981年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国家财政不断深化预算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文教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等改革, 有力地支持了国企改革, 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增强了企业活力; 不断探索新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 调动地方理财积极性; 采取灵活有效的经济手段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共十四大之后, 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家财政加快了财政改革步伐和力度, 建立了分税制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理顺了中央、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深化税制改革, 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多环节的复税制税收体系; 转变政府职能, 调整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改革了财务会计基本制度, 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 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格局。

**体制改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方 向, 是调整、变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收支范围和预算管理权限的划分, 形成合理的分层次的, 有利于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 适应经济体制要求的预算管理体制。1980年起, 国家对地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由全国“一灶吃饭”, 改为“分灶吃饭”; 财政分配由过去“条条为主”改为“块块为主”; 收支划分和分成比例由过去“一年一定”, 改为“一定五年”。其中, 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广东、福

建分别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 “划分收支, 定额补助”。民族地区和青海、云南、贵州三省在此基础上实行定额补助, 每年递增10%。以此建立了分级财政的基本框架。1985年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并建立了乡财政预算体制, 五级预算管理体制初步形成。1988~1990年在原体制基础上, 实行六种不同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办法。1992年开始在辽宁省等9个省、市、自治区分税制试点, 探索建立稳定、规范、集分适度的中央、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正式出台, 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级财政体制前进了一大步。分税制改革取得了以下实质性突破: ①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相应支出。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 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②划分税种, 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有关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 适合地方征管的税, 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如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 则由中央与地方共享。③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返还办法, 为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④分设税务机构, 成立中央的国税局和地方的地税局。

在预算编制上, 1992年实行复式预算, 将国家预算划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 收支对应, 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 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税收制度改革** 增强税收的调控作用, 税收制度改革一是改变过去比较单一的税制, 向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征收的复合税制发展。其内容包括: ①逐步完善流转税制。1984年把原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 并建立城市维护建设税, 以后又开征特别消费税。②建立与健全所得税制。1983年开征国有企业所得税; 1985~1988年先后建立集体企业所得税、城市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私营企业所得 税。③建立与健全资源、财产和行为税制。1982~1991年陆续开征烧油特别税、建筑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筵席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④建立与完善涉外工商税制。除明确工商统一税是适用于外商投资经营的涉外税种以外,1980年、1982年先后开征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991年两种涉外企业所得税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⑤改革与完善农业税制。1983年进一步明确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范围和方法;1985年农业税由征粮为主改为折收代用金为主,并于1987年开征耕地占用税。

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伴随分税制改革,按“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原则推出税收制度改革:①流转税制改革。简化流转税系,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三种;缩减增值税税率档次;缩小营业税范围;新增消费税。形成了以增值税实施普遍调节,辅之以消费税特殊调节的流转税制。②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禁止企业包税现象发生。③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合并个人收入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在华外籍人员所得税为个人所得税。④扩大税收调节范围。开征土地交易增值税、证券交易税、遗产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方向是扩大企业财权、增强企业活力、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1978~1981年先后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和利润留成制度,1983~1984年分两步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并同时部分企业和行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度。1987年在利改税基础上,推行多种形式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部分地区试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试点。另外还改革折旧制度、资金拨款制度和管理办法。1994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企业向国家的纳税关系,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在改革国有企业,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社会统筹改革,着力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完善改革环境。

**改革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1980年开始,各行政事业单位逐步试行“预算包干”办法,年度预算核定的经费全部归单位掌握使用,年终结余留用,超支不补。鼓励有条件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税后净收入建立事业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制度改革还要求重新界定财政在事业领域供给范围,改变国家财政包办一切事业供给的状况。逐步将不该由财政供给和不应全部供给的各项事业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改革。

**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体制改革** 1988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国家投资收益权、资产处置权。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财政部内设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司、国有资本金统计评价司和资产评估司,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所作的改革有:有步骤地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管理制度;组织闲散资产的流动,推动资产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着手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开展评估工作。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以及“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明确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体制改革方向。

**改进国债发行方式,开放国债流通市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澄清了对国债的错误认识,198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恢复国债发行。国债发行方式改革有:1988年增加国债品种,包括国库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1989年开始,国债多渠道推销;1991年开始国债发行的承购包销试点。“十四大”后,国债发行全面实行承购包销,1995年建立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为国债发行全面市场化奠定了基础。一个国债发行品种多样化、方法多样化,现券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回购市场齐备的国债发行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改革企业财务会计基本制度** 1993年7月实施《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对中国1949年以来原财务会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统一规范了境内所有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建立资本金制度,实行资本保全原则;取消专用基金专户专用、专户存储制度;改革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实行快速折旧;改革成本核算手续,实行制造成本法;实行备抵法,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规范企业利润分配程序;采用国际通用的财务报表体系。

**改革效果** 改革开放20年中国财政的基本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国

家财政总收入为65.5亿元,1978年为1121.1亿元,为1950年的16.1倍;1998年达到9769亿元,为1978年的8.71倍。1950~1978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68%,1978~1998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43%。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大幅度增长,1998年达4078.74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41.75%,同比收入1978年为当年财政收入的33%。国家财力的显著增长为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①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比重上升。1978年税收收入519.28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6.3%,1997年各项税收收入达8234.04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5%。②财政收入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上升,来自国有经济的收入比例相对下降,反映了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1978年国有企业上缴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6.6%,1997年下降为66.7%。③财政收入中来自商业、第三产业和其他部门的比例上升,来自工业的比重下降。1978年财政收入各部门比重是,工业为73.5%,商业为12.2%,其他部门为2.1%。1995年工业为44%,商业为32.6%,其他为24.8%。④财政收入中债务收入从无到有,比重上升,1979年债务收入比重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2%,1998年占财政收入的56.15%。

**支出结构变化:**①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上升。1978年社会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0.1%,1997年这一比重提高为20.61%。②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1978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为40.7%,1997年为11.79%。③在全国财政总支出中,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1979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9.2%,1997年上升为72.57%,地方财力进一步增强。

### 不足和问题

**财政职能转换未能根本解决** 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财政供给范围过大,财政职能“缺位”、“越位”仍一定程度存在,制约了财政、经济的发展。

**分税制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和完善** 特别是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落实,以及规范、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亟待建立。

**税收体系有待完善** 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控作用应扩大税收调控的覆盖面,

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各环节的普遍调节；适时开征新税种，调整税率，淘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税种，增强税收调控的灵活性，完善税收体系；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壮大地方财源。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财政预算外收入膨胀，严重侵蚀了国家财源，制约了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扰乱了分配秩序。必须加快“费改税”建设，加强预算外收支管理；清理整顿乱收费，重建合理、有效的非税体系刻不容缓。

#### 推荐书目

许毅主编：《走向新世纪》，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

### caizheng tizhi gaige

**财政体制改革** (reforms in government finance)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体制改革。

改革大体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80年至1993年。改革的主要宗旨在于，尽快突破过去财政统收统支体制，以利推动经济改革和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对此，先后进行3次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其特点是由过去中央统一承担预算收支平衡责任的“一灶吃饭”办法，改为分级承担各自收支平衡责任的“分灶吃饭”办法；收支划分由过去1年一定，改为5年不变。这不仅稳定了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关系，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地方财政自主权，从而为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分级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其目的主要是为适应利改税改革。利改税后，企业向财政上缴收入的大部分采用税收形式，从而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划分只能划分税收，故改为划分税种体制。第三次是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收支大包干体制。加大地方包干的力度，实行了“边际递增分成”，即地方可以从增收和超收中多留，这次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

第二阶段，自1994年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其目的是为消除包干体制的弊端，以建立市场经济财政为导向，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①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

政的收支范围；②根据事权与财权一致原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③逐步建立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经过改革，使中国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朝着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迈出新步伐，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体制框架。

#### 推荐书目

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编：《财税改革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9。

张卓元等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北京，1998。

### caijun baiwan

**裁军百万** (reduction of PLA strength by a million) 1985年至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的重大举措。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将军队工作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据此，百万大裁军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在全军展开，依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

百万大裁军的主要内容有：①精减机构。各总部、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撤并业务相近的部门和重叠机构，降低部分部委的等级，减少层次，人员精减40%左右。②裁减部队，加强部队的合成。将原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南京7个大军区，撤并武汉、昆明、福州、新疆4个大军区。同时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海军和空军淘汰一批陈旧落后的飞机和舰艇，相应减少人员。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③减少军官数量。在确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的服役制度后，军队中原先由军官担任的行政管理、技术领导等76种职务，改由军士长担任。④提高合成程度。较大幅度地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特种兵部队，陆军的军全部整编为合成集团军。集团军加大特种兵的比重，陆军中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步兵数量，加大陆军的独立作战能力。⑤调整军队院校编制体制。全军院校数量精简12%，人员数量减少20%多。全军指挥

院校实行军官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至1987年底，基本完成裁军百万的精简整编工作。这次大裁军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奠定坚实的基础。

### cailanzi gongcheng

**菜篮子工程** (Project Food Basket) 规划并实施包括菜、肉、禽、蛋、奶、鱼等在内的中国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系统工程。1988年由农业部提出，经过国务院批准，得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的积极响应。它把副食品作为一个整体，从政策、技术、资金、物资等各个方面统一规划，集中力量分期实施，重点是强化基础设施，推广实用技术，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副食品供给水平。为了推动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国务院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放开副食品市场，建立蔬菜基地和基金制度，向农民平价供应生产资料，以工补菜，实行市长负责制等。1989年后，国家安排大量投资，专项用于菜篮子工程建设，在良种繁育、生产加工、批发市场等方面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有力地推动全国菜篮子工程建设。10年来，该工程的效益明显，中国副食品供应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

### Cai Chang

**蔡畅** (1900~1990) 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女。湖南双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16年毕业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兼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和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江苏省委妇委委员、中央妇委委员。1928年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中央苏维埃政府委员。参加长征。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央陕甘省委常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46年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8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同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

女工部部长。1949年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委第一书记，全国妇联党组书记。是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逝世。

Cai Tingkai

**蔡廷锴** (1892~1968)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贤初。广东罗定人。1892年4月15日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连长、营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陈炯明等战役。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团长。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第十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968年4月25日逝世。

Cai Xiao

**蔡啸** (1919~199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台湾省

台南市人。1934年离开台湾到福建。1937年参加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任政治部宣传干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一、二、三队副队长，教导大队队长，苏中军区侦察科长，团参谋长。1947年后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作战科长，第三野战军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三野战军台湾干部训练团团团长，空军副师长、航校校长，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体育协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主任。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8年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次年任台盟第二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1990年1月11日逝世。

Cao Yu

**曹禺** (1910~1995) 现代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192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加入“南开新剧团”。1928年进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接触欧美国家的大量戏剧名著。1933年完成处女作《雷雨》，轰动剧坛。同年，大学毕业，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1934年中断学业，赴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5年写成《日出》。1936年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年冬写成《原野》。三部剧本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创作《蜕变》、《北京人》等剧本，还将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成同名话剧。上述作品先后被译成日、英等多国文字。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以后，创作的剧本主要有：《明朗的天》，获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和演出一等奖；历史剧《胆剑篇》(合著)、《王昭君》等。其中《王昭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中，获戏剧创作一等奖。他擅长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富于诗意，结构精巧，戏剧氛围浓重。

是中国话剧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剧作家。1995年12月13日逝世。

Cao Zhi

**曹志** (1928~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山东安丘人。1928年5月生。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1949年任松江省政府教育厅干事，阿城县委土改工作队组长、队长，中共阿城县红旗区委书记、红石区委书记。1949年后曾任中共松江省阿城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松江省委宣传部副科长、副处长、处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办公厅副主任、合江地委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8年起先后任黑龙江省合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国家计委负责人，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兼机关党组书记。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cehui shiye

**测绘事业** (surveying and mapping) 从事获取、处理、提供地球空间数据与地理信息的工作。广泛服务于国家规划管理、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是国家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先行性、基础性、公益性事业。内容主要包括大地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工程测绘、海洋测绘、测绘仪器的研究等领域。其产品为测绘成果以及建立在各地的测量标志。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测绘事业大致分为4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是测绘工作起步并为开展全国大规模测绘进行准备的阶段。1950年2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作战部测绘局(后改为总参谋部测绘局，简称总参测绘局)管理全军测绘工作，同时筹划全国基本测绘业务。各经济建设部门的测绘工作也陆续开展起来。到1956年，全行业测绘人员已达4.5万。解放军测绘学院、武汉测量与制图学院、地图出版社、测绘出版社和中国测绘学会相继成立。1956年1月23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主管全国测绘工作，并与总参测绘局分工担负

国家基础测绘。这期间，总参测绘局在初步筹划国家基础测绘的同时，先后建立起1954年北京坐标系和1956年黄海高程系作为全国划一的测绘基准，开展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的测绘，为进行全国基础测绘作准备。还根据当时军事和地方的需要完成了治淮、抗美援朝等多项测绘保障工作。地质、城建、交通、重工业、水利等部门，也各自承担起本部门急需的测绘任务，为国家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出了贡献。

1957年至1966年，是中国测绘事业经历发展、整顿、再发展并在全国大规模测绘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阶段。1958年2月6日，国务院决定国家测绘总局归地质部代管，属国务院建制，地质部测绘局及其所属单位并入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在总参测绘局和石油部的支援下，并接收其地质测绘力量，在西安、哈尔滨、青藏高原建成了3个分局。国家测绘总局为加强测绘行业管理，于1958年至1964年按国务院批示，陆续建立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测绘管理机构，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测绘管理机制。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草案）》经国务院批准颁布执行，随后《地图测绘基本原则（草案）》及一批技术标准和业务规章制度的实施，使全国测绘工作有了技术依据。全国测绘行业职工总数1966年达到6万人。在这阶段，国家天文大地网、精密水准网、重力网的主体已基本形成；除特别困难地区外，规划的全国测图任务也已接近完成；为国家农田水利建设施测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1:1万地形图；各种地图和测绘书刊大量出版；拥有测绘力量的建设部门从原来的10来个发展到约20个，开展的工程测绘大中型项目近1000个；海岸带和近海海洋测绘已广泛开展。

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中国测绘事业受到冲击、摧残，而后再重新恢复的阶段。1969年，国家测绘总局及所属机构被撤销，人员被下放或调离。总参测绘局在困难的条件下兼负起原由国家测绘总局所担负的任务。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重建国家测绘总局及其各级机构，恢复原来职能。军事系统及经济建设部门的力量也陆续得到恢复。这期间，主要由总参测绘局开展并完成了“三北”地区及青藏高原无图区的测绘工作。

1977年至1999年，是测绘事业实行改革开放、持续健康发展并逐步过渡到现代测绘的阶段。1982年9月，国务院决

定把国家测绘总局改名为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基本保持不变。为加强地方人民政府对辖区内测绘工作的规划、管理，国家测绘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省、自治区测绘局和直辖市测绘处。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地方测绘管理的发展，大部分地区、市、县先后设立专管测绘工作的机构，从而在全国基本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测绘管理机制，促使全国测绘行业更加有序地稳步发展。1992年12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于1993年7月1日起实行。随后陆续出台了一批配套法规和地方制定的相应法规。1996年中央军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条例》于1996年1月10日起实行。这些法规的颁布执行，使中国测绘行业的管理进入了法治轨道。此外，中国测绘学会在国家测绘局重建后也恢复活动，测绘科技情报网、地名办公室等相继成立。陕西、黑龙江、四川3个测绘局由地方为主改为以国家测绘局为主进行领导；海南测绘局则由国家测绘局为主直设，使测绘机构的布局更趋合理。测绘行业职工总数从1977年的6万人逐步发展，进入90年代已稳定在20万人左右，队伍与设备更加成龙配套，具有承担各种测绘任务的能力。这阶段中，测绘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建成了更加精化和完整的1980西安坐标系、1985高程系与1985重力系统等新的基准；全面完成了国家规划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开拓了测绘领域，更紧密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的各项规划与建设，促使中国测绘从传统的测绘体系过渡到现代测绘体系。

**主要成就** 5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普遍遵行的测绘技术标准。测绘基准是国家进行测绘必不可少的统一起算依据，包括各种大地测量参数、统一的起算面、起算基准点、起算方位和有关地点、设施、名称等。解决了中国测绘历史上缺乏统一的高精度基准的问题，且具有世界测绘基准水平。50年来，全国共制定较重要的测绘标准300多个。

②基础测绘取得了丰硕成果。从1952年至1982年，经过30年的努力，完成了全国天文大地网的布测和整体平差，在条件困难、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高速完成这一大规模工程，一次计算处理4.84万点，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繁难的技术问题，取得精确的平差成果，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与此同时，国家还进行了

构成100个环、总长达9.33万千米的一等水准网的布测、复测和平差，构成793个环、总长达13.7万千米的二等水准网的布测和平差。此外，还完成了三、四等三角导线、水准准确性点的加密测算工作。70年代后期起，重新布测了中国重力网，测定了11个高精度绝对重力点并与国际重力网进行了可靠联测；为掌握和运用测绘高新技术，先后建立了卫星多普勒网和全球定位（GPS）网，并在90年代后期建立了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据统计，50年来全国累计完成一等至四等三角、导线点26万余点，一等至四等水准路线总长130余万千米（不含复测量），重力网（含加密点）20余万点，卫星定位近1000点。建立永久性测量标志90余万座，其中10余万座属国家高级控制点。累计完成全国航摄大部分地区达两次覆盖以上；全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1:1万图约15万幅，并更新约5000幅；1:2.5万图约1.6万幅，并更新3500多幅；1:5万图约1.45万幅，并更新1.3万余幅；1:10万、1:20万、1:50万、1:100万图均已覆盖全国，有的已编绘多次；制图和印刷工艺较之50年代有很大提高。海洋基础测绘在近海海域已经完成，多次进行了远洋调查测绘。完成了全国地名调查，建立了地名档案馆。90年代后期，中国已先后建成了大地数据、基础地理信息、1:100万地图数字化、1:25万地图数字化等多种类型的国家级数据库，在测绘产品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

③为国家各项建设与活动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测绘保障。测绘所获得的成果资料，大多属于密级，在全国已经建立一套严密的、完整的资料管理体制和以库、站形成的网络。近20年来，资料的管理与提供逐步实现电子化、自动化和初步数字化。据概略统计，资料年提供量约为：大地成果20万~80万点、航摄像片50万~180万片；地形图100万~300万张。国家多年来投资的包括500多个大中型工程在内建设项目，自始至终都有测绘工作相配合，例如南水北调、江河治理、三峡工程，多次珠穆朗玛峰高程测定，南极和北极考察，地质、地震、农业、林业、矿山等勘测，城市改扩建，航空与航天基地建设，海洋资源勘测，大规模的铁路与公路建设等，无一不靠测绘的支撑和保障。90年代初建成的国务院综合国情地理信息系统（9202工程）及其在各地的分支系统已逐步形成网络。测绘部门还用高新技术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及时提供了多种服务。

④测绘出版、教育、仪器、科研以及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50年来累计出版地图约8000种,印量超过22亿册(幅);测绘书刊出版3000多种;拥有测绘院校及设有测绘专业院校达30余所,总共培养、培训测绘人员超过12万人;建成专产或兼产测绘仪器的工厂40多家,能适应国内部分精密及全部中低度仪器的用量需求,还能部分出口;建成科研院所(室)23个及一批供研究开发用的数据库,拥有一大批向测绘高新科技攻关的人才。中国测绘界与世界20多个国家进行了测绘科技合作,与70多个国家、地区有测绘交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测绘事业,已开始跨入世界现代测绘行列,正在迅速实现电子化、自动化、数字化,为投入“数字地球”战略作准备,迎接21世纪的到来。

#### 推荐书目

李曦沐主编:《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Changcheng Gongsi feifa jizi an  
**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 (illegal funding case of the Great Wall Corporation)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简称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等人非法集资案件。1992年6月到1993年初,沈太福等人打着民办集体企业和发高科技的幌子,以24%的高利息为诱饵,向社会非法集资,在8个月内集资额达人民币10亿多元。此案涉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酿成1949年以来罕见的金融大案,在国内外产生恶劣影响。

1989年沈太福在北京成立了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长城公司的前身)。他用公司的钱购买了一名工程师的电机发明专利,并将公司的专利权记到他和其妻、长城公司副总裁兼财务部长孙继红的名下。从此,沈太福便打起“机电开发”的旗号,又在海南、长春两地成立两个公司。他既不懂技术又大肆挥霍,很快就失去生存的根基,于是搞非法集资活动。公司筹得的资金被沈太福等人侵吞。1993年2月,他以借专利提成为名,先后两次各提取100万元据为己有。3月,沈太福和孙继红又以借机电款为名,提取现金100万元,以孙的名义存入银行,化公为私。从1989年至1993年3月案发期间,他先后向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及有关新闻单位、银行等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达25万多元。

1994年3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沈太福死刑;判处贪污犯孙继红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沈、孙不服,提出上诉,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被依法处决。对其余11名违法者均作出了处理。

Chang Jiang Huai He hongshui  
**长江、淮河洪水** (1954)  
(Yangtze and Huaihe River floods, 1954) 1954年6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连降大雨,形成罕见的特大洪水,长江武汉关和淮河正阳关水位,均超过历史上最高水位。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沿岸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洪斗争,在淮河汛情紧张的关键时刻,有80多万人参加防汛工作,堤岸加宽加高1米以上。8月下旬淮河下游遭到台风袭击时,堤上8万民工奋战17小时,保住了大堤。这次抗洪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1949年以后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如荆江分洪工程、淮河水利工程,在蓄水、分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3个月的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10月武汉关水位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保住了沿江武汉等大城市和长江大堤。这次特大洪水,农田受灾面积共达1131万公顷,受害人口6000万,国家用于抗洪、抢险、堵口和复堤等方面的费用2.4亿元。

Changjiang Sanxia gongcheng  
**长江三峡工程**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 以防洪为主,兼有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的巨型水利工程。位于长江的西陵峡中段,坝址在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距宜昌市40千米。控制集水面积100万平方千米,占全流域面积的56%,每年通过坝址的平均水量4510亿立方米,约为长江入海年平均水量的一半。

兴建三峡工程的构想,最早由孙中山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实业计划”中提出,40年代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曾与美国垦务局合作,提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初步计划。1949年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科研工作。195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曾作过《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对建设三峡工程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责成水利电力部在广泛征求意见、

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1992年4月3日经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并授权国务院选择适当时机动工兴建。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动工兴建三峡工程。经过近三年努力,1997年11月8日,大江正式截流,三峡工程进入主体工程兴建阶段。

三峡工程由水利枢纽建筑物和库区移民工程两部分组成。枢纽建筑物主要由拦河大坝、水电站厂房、通航建筑物三大部分组成。拦河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175米,长2335米,泄洪坝段居河床中部,两侧为左右厂房和非溢流坝段。水电站为坝后式,左右厂房分别安装14台和1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时。通航建筑物位于左岸,是双线5级连续梯级船闸,每级船闸闸室长为280米、宽34米、深5米,与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1、2号船闸相同,可通过万吨级船队,年通过能力为5000万吨,另在左厂房左侧设置垂直升船机。为了保证施工期长江干流不断航,采用“明渠通航,三期导流”的施工方案。总工期17年(1993~2009年),准备工程和一期工程5年,二期工程6年,三期工程6年。

库区建成后淹没人口84.4万人,各类房屋3459万平方米、工矿企业1599个和县城9个。考虑各种增长因素,规划动迁人口约120万人。国家对库区移民工程采取“开发性移民方针”,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省负责,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三峡工程静态投资(按1993年5月底价格水平)为900.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为500.9亿元,移民工程投资400亿元。

兴建三峡工程首先是解决长江中下游严重洪水威胁,确保江汉平原、洞庭湖区1500万人民生命财产和2300万亩农田及一批重要城市、交通干线的安全,它可使荆江大堤等重要长江干堤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1998年大洪水再次说明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不可替代的关键工程。其次三峡水电站的规模和发电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每年发电847亿千瓦时,可为5000亿元国民生产总值提供电力保证。水电是清洁能源,它的环境效益十分显著。第三,三峡水库可改善600多千米的川江航道,使宜昌到重庆由原来通航3000吨船队提高到10000吨,还可改善中下游枯水期通航能力。另外三峡工程对提

高长江中下游灌溉、供水保证率，促进南北水北调，都有较好效益。

Changjiang zhongshangyou fanghulin tixi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ests in upper and middle Yangtze valleys) 中国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建设的大型防护林体系。为改善长江流域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1986年4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营造长江中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局）根据这一要求，在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总体目标。初步设想，用30~40年时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增加森林面积2000万公顷，建设起布局科学，结构合理，带网片点有机结合，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效益相统一的防护林体系。整个体系分两期进行，计划到2000年完成一期工程，2000年以后实施二期工程。1989年6月，国家计委批准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总体规划》。规划确定，1989~2000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河南、重庆12个省、直辖市，271个县（市、区）（1991年和1995年进行过两次调整），采取多种形式新增森林面积666.7万公顷。截止1995年底，一期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600万公顷，其中重点工程406万公顷，并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changqi gongcun huxiang jiandu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long-term coexistence and mutual supervision)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之一。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Changzheng xilie yunzai huojian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Long March” series carrier rocket) 中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大型运载火箭系列。自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以来，“长征”火箭已形成由“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号捆、“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四

号9种火箭构成的长征火箭系列。这些火箭已具备发射高、中、低各种轨道卫星的能力，可以满足当今世界发射市场各种卫星发射服务要求。发射成功率已达88.9%。

1984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卫星，标志着中国火箭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具有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能力的国家。发射1450千克重的通信卫星，从运载能力上讲居世界第四位。掌握并使用低温高能推进剂（液氢液氧）居世界第三位。解决了发动机高空二次启动技术居世界第二位。发射商业卫星费用低廉，居世界第一位。

“长征”一号是三级火箭，第一、第二级为液体燃料火箭，第三级为固体燃料火箭。1965年为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而研制，历经4年完成，具有将300千克卫星送入440千米圆轨道的运载能力。它的研制成功为中国多级火箭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全面技术基础。改进型“长征”一号丁的运载能力为1000千克，火箭直径2.25米，总长31.28米，主要用于发射低地球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小型卫星。

“长征”二号是两级火箭，使用液体推进剂。火箭直径3.35米，总长31.65米，运载能力为近地轨道2000千克。改进型“长征”二号丙，是中国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卫星，并多用于发射返回式卫星的主要工具。它可将2800千克的有效载荷送入近地椭圆轨道。“长征”二号丁其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3700千克，可发射各种科学试验卫星和探测卫星。“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长二捆”火箭）芯级与“长征”二号丙基本相同，在它的第一级火箭外部捆绑有4个直径为2.25米、高为15米的助推器，主要提供近地轨道发射服务，运载能力可达9500千克。“长二捆”增强型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000千克。“长二捆”火箭1990年7月16日首次试飞，投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后，成功地发射了“澳星”、“亚洲”二号、“艾科斯达”一号等国外卫星。

“长征”三号是三级火箭，使用液体推进剂，第3级装备了具有高空二次启动能力的液氢液氧发动机，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600千克，1990年4月7日因成功地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而闻名于世。此举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国际卫星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改进型“长征”三号甲，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2650千克。“长征”三号乙，是以“长

征”三号甲为芯级，在它的第一级火箭上捆绑了“长二捆”火箭的4个助推器，它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一跃达到5000千克，近地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力分别为11000千克和6000千克。

“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是三级液体燃料火箭，它的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500千克，可发射极地、太阳同步、地球同步和近地轨道卫星。1988年9月7日和1990年9月3日两次利用“长征”四号火箭发射了两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均获得圆满成功。

Chang Xiangyu

**常香玉** (1922~ ) 豫剧演员。女。工青衣、花旦。原名张妙玲，河南巩县人。1922年11月3日生。自幼随父学戏，并拜师学豫西调。初学小生、须生，后专工旦角。她在艺术上勤奋好学，勇于革新，在西调基础上，逐渐融合豫东、祥符等调，并吸收京剧、评剧、秦腔、曲剧、坠子等艺术之长，独创新腔，成为豫剧中的一支主要流派。她的演唱热情奔放，有刚有柔，挥洒自如；做功刚健清新，优美大方。代表剧目有：《拷红》、《白蛇传》、《花木兰》、《战洪州》、《大祭桩》和现代戏《人欢马叫》、《红灯记》等。1948年，在西安创办香玉剧校，培养了不少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香玉剧社。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率领剧社在西北、中南和华南等地义演，以全部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被誉为“爱国艺人”。1952年，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誉奖。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豫剧院院长、省戏校校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chaodaoti yanjiu

**超导体研究** (research in superconductors) 导体在极低温度（接近绝对零度K，即-273.16℃）的条件下，会出现超导现象，即导体直流电阻为零并具有完全抗磁性，因而可以通过强大的电流，并取得高达8万高斯以上的稳态强磁场，而只消耗微小的电力。超导现象被发现以后，各国物理学家经过70多年的努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底仍未能使超导转变温度突破液氮（4.2K）和液氢温度（20K）的禁区。直到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发现Ba-La-Cu-O系化合物转变温度可达30K。1986年底，中国

科学院赵忠贤等人研制出起始转变温度为48.6K和46.3K的Sr-La-Cu-O和Ba-La-Cu-O超导体,是当时世界上超导温度最高记录。在多相Ba-La-Cu氧化物中,赵忠贤等还发现70K超导现象,这一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1987年2月初美国吴茂昆和朱经武等人发现90K附近超导氧化物,但未公布任何科学信息。赵忠贤等在2月19日独立制出Y-Ba-Cu-O超导体,其抗磁出现温度为93K,并于2月24日向全世界首先公布元素成分。这一发现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实现了在液氮温区(77K)以上呈现超导的转变。接着与国际上同时,他又独立地用多种稀土元素替代Y-Ba-Cu-O中的Y获得10种液氮温区的超导体。在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发现后,又对其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获得了一批属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此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Chaoxian tingzhan tanpan

**朝鲜停战谈判** (Korean War armistice negotiations) 朝鲜战争期间,以中朝为一方,以美韩为主的参战诸国为另一方进行的停战谈判。

经过五次战役后,中朝军队把美军打至三八线一带,美方见取胜无望,只得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战争,1951年7月10日,双方在开城举行谈判。

然而美方并没有诚意,提出“海空优势的补偿”,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分界线后退38~68千米,共让出1.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谈判陷于僵局,8月23日谈判中断。为取得谈判桌前的优势,美方在用飞机对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进行“绞杀战”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同时,对中朝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由于中朝军队的坚决抗击,美方的图谋未能得逞。

1951年10月8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重新开始谈判。美方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停战监督、禁止朝鲜北方修建飞机场等问题。为丑化社会主义中国,美方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纠缠,声称很多志愿军战俘“自愿”去西方国家和台湾。谈判再次中断。为了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美军又对志愿军阵地加强进攻,志愿军在几十公里长的防线上,建成了以坑道为中心的“万里长城”,顽强抗击。1952年10月,美军发起“金化攻势”。14日双方在上甘岭进行了激战,美军惨败(见上甘岭战役)。1953年5月朝、中军队发起夏季攻势取

得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共投入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1/2的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耗用了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支出战费830亿美元,拼凑了15个国家的兵力,伤亡总数109万,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伤亡的1倍,然而却未能取得胜利。1953年7月27日,美方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一方同联合国军总司令M.W.克拉克为另一方,在《朝鲜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 Chen Boda

**陈伯达** (1904~1989)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名陈健相。字尚友。福建惠安人。1904年7月29日生。早年就读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1924年入上海大学读书。1927年初参加北伐军,任第一军四师秘书、东路军官学校教官,4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1931年在天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2年出狱。1934年后在天津、北平任《实话报》、《华北烽火》等刊物编辑,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委员,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37年到延安,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递补为中央委员。这一时期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继续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两次随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起草中共八大政治决议等重要中央文件。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这一时期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关于十年内战》等。1966年5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林彪、江青集团主要成员,积极策划动乱,制造了“冀东地下党叛徒集团”等大批冤、假、错案。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

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8月在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追随林彪集团制造分裂活动。毛泽东写《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揭露批判,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释放。死于1989年9月20日。

#### Chen Daisun

**陈岱孙** (1900~1997) 经济学家。原名陈总。祖籍福建闽侯。1900年10月20日生。1918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20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2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起先后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教授等。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对财政、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造诣尤深。提出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借鉴。主要著作有:《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战略》、《政治经济学史》(上、下卷)、《陈岱孙文集》。1997年7月27日逝世。

#### Chen Geng

**陈赓** (1903~1961)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庶康,字传瑾。湖南湘乡人。1903年2月27日生。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1926年赴苏联学习,翌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共组织的安全做出重要贡



献。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潢、潢光等战役。1932年9月因伤秘密到上海就医，同年3月被捕，经中共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于5月底脱险到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等战斗。解放战争初期，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后转战晋南、晋西前线，指挥了闻夏、同蒲、晋南等战役。1947年8月，率陈（赓）谢（富治）集团强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继而进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后与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野战军密切协同，经略中原。同年11月指挥伏牛山东麓战役。12月参与指挥平汉路破击战。1948年3月起，率部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先后进行了洛阳、宛东、宛西、郑州等战役。同年11月率部参加淮海战役。翌年2月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所部南渡长江。后参与指挥了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1950年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同年7月，应邀赴越，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曾参与指挥边界战役，取得越南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翌年6月回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1年3月16日逝世。

Chen Hanbo

**陈翰伯**（1914~1988）新闻出版社家、国际问题评论家。1914年3月14日生于天津市。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到西安参加编辑《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以新闻记者身份先后到延安、四川、湖北等地采访和办报，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到上海，任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晚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1949年到河北省平山县，任新华通讯社国际新闻部主任、

新闻训练班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工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国际问题研究也有较深造诣，写过许多评论文章。1988年8月26日逝世。著作有《论美苏关系》等。

Chen Hansheng

**陈翰笙**（1897~ ）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897年2月5日生。1915年赴美国勤工俭学，1920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即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编委，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建设》副主编，外交部顾问，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职，并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外交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工作。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深入农村进行研究，曾先后在江苏、河北等省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论证和提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分析外国资本如何渗入中国农村，对农民进行直接的剥削。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在毕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社会科学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的原则，百岁高龄时还撰文呼吁大力兴办教育。1996年，在他百岁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主要著作有：《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英文）、《美国垄断资本》、《陈翰笙文集》等。

Chen Huangmei

**陈荒煤**（1913~1996）文艺评论家、作家。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

1913年12月23日生。30年代初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后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1945年后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主编《北方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文化战线的各种领导工作，历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34年开始创作小说，发表过《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印象记》等报告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热情推荐佳作，扶掖新人。在繁荣创作、活跃理论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著有评论集《为创造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荒煤文学评论选》等。还出版了《荒煤散文选》。1996年10月25日逝世。

Chen Jiageng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1890年随父去新加坡经商。1906年开始经营橡胶园，取得成功，到1925年已成为拥有橡胶制品、航运、房地产等多种企业的大企业家。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1912年回国兴办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在海外发动募捐活动，捐赠了大批资金，并亲自组织华侨慰劳视察团回国，到延安考察，称赞根据地的成就。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创办《南侨日报》。1949年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和厦门创办多所小学、中学和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有，包括中小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和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著作有《南侨回忆录》、《新中国观感集》。

Chen Jiangong

**陈建功**（1893~1971）数学

家。浙江绍兴人。1893年9月8日生。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同时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和东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杭州高等工业学校任教。1918年再次东渡日本留学，1921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堂。1926年第三次赴日本留学，1929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47至1948年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任访问学者，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杭州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实变函数论、复变函数论和微分方程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中国数学界公认的函数论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许多分支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其研究着眼于当代分析学的主流及其核心问题。以三角级数而言，傅里叶级数的几乎处处收敛问题是在勒贝格积分意义下整体收敛的必然形态，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陈建功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他在1961年公布的关于无条件收敛的判别理论，引起国际注意。著有《直交函数级数的和》、《实函数论》、《三角级数论》等。1981年出版了《陈建功文集》。在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71年4月11日在杭州逝世。

Chen Jinhua

**陈锦华** (1929~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安徽青阳人。1929年8月生。1946年进上海第一印染厂艺徒训练班学习。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华东纺织管理局、纺织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秘书(1953~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函授专修科学习)。1960~1971年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兼党组书记(1960~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修班学习)，1963~1965年在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1971年后历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1998年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

Chen Jingrun

**陈景润** (1933~1996) 数学家。福建福州人。1933年5月22日生。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先后任中学数学教师、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由于他对塔里问题的一个结果作了改进，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先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再越级提升为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甘于清贫，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刻苦的献身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研究成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1966年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3月19日逝世。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有《初等数论》、《组合数学》、《歌德巴赫猜想》等。

Chen Jingkai

**陈镜开** (1935~ ) 举重运动员。广东东莞人。1935年12月1日生。从小喜爱健美运动，1953年转练举重，成绩提高得特别快，一年之间挺举成绩从95公斤猛增到130公斤。1955年入中南军区体工队，后入选国家举重集训队。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G. 温奇保持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成为中国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6~1964年，在上海、广州、北京、太原、莫斯科、莱比锡等地举行的国内外重大举重比赛中，又先后8次打破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之后，担任中国举重队教练员，曾指导过包括陈满林在内的一些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对中国举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奖励，荣获一等奖；被国家体委授予一等奖、特等功。1959年起先后5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79~1995年任中国举重协会主席。1980~1995年任广东省体委副主任。1980年获国际举重联合会金质奖章，1983年获亚洲举重联合会金质奖章和国际健美联合会银质奖章。1984年和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1987年获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铜质勋章，1995年又获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国际举重联合会铜质奖章、亚洲举重联合会金质勋章，以及国际健美联合会金质勋章。1996年任中国举重协会顾问。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Chen Junsheng

**陈俊生** (1927~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黑龙江桦南人。1927年6月生。1946年参加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合江省桦南县五道岗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桦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委书记秘书，黑龙江省委绥化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富裕县委代理书记，克山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3年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委员兼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长。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Chen Muhua

**陈慕华** (1921~ )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女。浙江青田人。1921年6月21日生。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军事助理员，延安留守兵团警备五团参谋、兵团司令部教育科参谋、兵团军事研究室研究员，延安联防司令部后勤部家属招待所所长兼指导员。1945年后，历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穆陵煤矿工运特派员、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1950年后历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处)处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处)副部长，国家计

委交通局副局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1971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托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旅游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1988年后任第六、七、八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主席。1998年后任第八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曾当选为第五、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第十至十四届中央委员和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Chen Pixian

**陈丕显**（1916～1995）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用名陈家煜。福建上杭人。1916年3月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宣传队分队长，中共长汀县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长汀县委巡视员，共青团福建省少先队训练部部长、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粤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曾任共青团闽赣边区太宁地区中心县委书记、青年团赣南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称东南局）青年部部长、青委书记。1940年到苏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1945年4月任党委书记兼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中共华中工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政委，苏北军区政委。1949年4月任苏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后任中共上海市第四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政协上海委员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迫害。1975年10月后，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0年5月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5年8月23日逝世。著有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

Chen Qiyou

**陈其尤**（1892～1970） 中国致公党第五、六届中央主席。别名陈定恩。广东省海丰县人。广州博济医学堂肄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及光复惠州之役。1916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福建省东山县、云霄县县长。1925年加入中国致公党。1935年至1938年任蒋介石私人驻香港代表。后被蒋监禁至1941年释放。1947年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和第五、六届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委。1970年12月10日逝世。

Chen Shutong

**陈叔通**（1876～1966） 政协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工商联主席。名敬第，字叔通。浙江杭州人。早年投身维新运动。1903年中进士，授清政府翰林院编修。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1906年回国，任清廷宪政调查局会办、资政院民选议员。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参加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先后任浙江督府秘书长，大总统秘书，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并任《北京日报》社经理。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参加反袁护法斗争。1927年后，

长期担任浙江光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1946年5月参与筹备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起草著名的“十老上书”，支持进步青年和学界的民主斗争。1948年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潜赴香港，后抵达北平。1949年9月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参与领导筹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是第二、三届全国工商联主席；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2月17日逝世。著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政治学》、《政法通论》和诗集《百梅书屋诗存》等。

Chen Xitong

**陈希同**（1930～） 原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四川安岳人。1930年6月生。194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副所长、市公安局分局文书股长。1953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北京第一机床厂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63年后任中共昌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1971年任昌平县十三陵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昌平县马池口公社书记。1973年后任中共昌平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市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8年任国务院国务委员。199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5年4月因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经济犯罪案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1997年9月被中共中央纪委审查查明有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报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Chen Xitong an

**陈希同案**（Chen Xitong case）

发生于90年代中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违法犯罪案件。

**案件的起因** 1994年5月，中共中央纪委联合专案组在审理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时发现，此案虽发生在无锡，但根子在北京。联合专案组随之对此案的后台——北京兴隆公司采取强制措施。同年10月22日，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被收审。在办案过程中，联合专案组发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秘书阎振利均涉嫌此案。

1995年2月13日，中央成立“北京2·13专案组”。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同王宝森有很大关联，中纪委联合专案组开始对王宝森利用职权涉嫌经济违法案件进行调查。同年4月4日，调查正在进行中，王宝森却于北京郊区畏罪自杀。陈希同自认为对王宝森经济犯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向中共中央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请求。4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陈希同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在随后两个多月的审计、调查、侦查王宝森案情的过程中，中纪委联合专案组发现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陈希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侵吞大量贵重物品；腐化堕落，大量挥霍公款；利用职权支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经商，谋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对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开除陈希同的党籍。检察机关已对他立案侦察。

**主要内容** 在检察机关对陈希同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立案侦查后，1998年2月27日，因涉嫌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对陈希同逮捕。是年6月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上述两罪对陈希同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经过对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质证核实，充分听取公诉人意见、辩护人意见以及陈希同本人的辩护和陈述后，合议庭进行了评议，认定：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元，未按国家有关规定交公，而由个人非法占有。同时还指使、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国家财政资金建造豪华别墅，供陈希同、王宝森个人享用。违规建造的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财政资金人民币3521万元，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242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105万元。为此，1998年7月3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陈希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进行了公开宣判，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这一案件的查处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重大成果，充分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Chen Xilian

**陈锡联**（195～1999） 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5年1月4日生。1929年参加（黄）陂（黄）安南游击队，同年秋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团长、旅长，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1937年10月指挥第769团取得夜袭阳明堡战斗胜利。1943年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参加上党、邯郸、鲁西南、淮海战役。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西南等战役，兼任重庆市市长和川东军区司令员。195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69年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0月参加了隔离审查江青集团的斗争。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1月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2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4月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1992年后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

年6月10日去世。著有《陈锡联回忆录》。

Chen Yi

**陈毅**（1901～1972）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原名陈世俊。四川乐至人。1901年8月26日生。早年读过私塾，后进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8年考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赴法国。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做政治工作。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带领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干部学员赶赴南昌，在临川加入起义军，任25师73团指导员，与朱德率余部向粤赣湘边界转进。1928年1月参与发动湘南起义。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任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2师师长，7月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929年1月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12月，与毛泽东一起主持在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协助制定大会的各项决议。1930年任红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931年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授予红星奖章。1932年任江西省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了3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组建新四军。1937年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主席，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1940年指挥黄桥战役，击溃韩德勤部队进攻。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与粟裕、谭震林等领导莱芜和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1948年任总前委常委，参与组织和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委书记。4月参加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广大地区。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等职。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4月随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任外交部部长、中央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参与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并多次率代表团和陪同刘少奇、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欧洲各国，为扩大中国在世界影响，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起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副主席。196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7年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干将”，遭到批判和打击，离开了领导工作，后下放工厂。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毛泽东委托，与叶剑英等人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开拓外交新局面的重要建议。1971年林彪事件后，带病揭发林彪历史问题。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部分论著收入《陈毅军事文选》，撰写诗词，收入《陈毅诗词选集》。

#### 推荐书目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Chen Yinke

**陈寅恪**（1890～1969） 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在家塾读书并开始接触西学。1902年赴日求学，入东京巢鸭弘文书院高中，后因病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攻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年回国后，任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清华

大学南迁长沙。翌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遂去昆明执教。1939年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1940年赴英履任，因战事滞留香港，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7月去桂林广西大学执教。1943年9月抵成都任教燕京大学。1945年秋赴英应聘，不久因病回国。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外国籍院士称号。1946年10月，复归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应广州岭南大学之聘，就任历史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留在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一生治史的范围甚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均有重要建树。治学态度谨严，待人坦诚，受人敬重。发表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

Chen Yonggui

**陈永贵**（1914～1986）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劳动模范。山西昔阳人。1914年2月14日生。解放战争时期加入农会，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头组织合作社。先后任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陈永贵带领大寨村农民坚持穷干苦干，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努力改变生产条件，逐步建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为山区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被选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7年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1969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1977年继续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因在“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中犯有错误，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3年起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Chen Yongkang

**陈永康**（1907～1985） 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上海市松江县人，1907年9月生。原是普通农民，从青年时期开始钻研水稻栽培技术，通过“一穗传”的选种方法，培育出“老来青”晚粳良种，1951年创单季晚粳亩产716.5公斤高产纪录，成为农业战线先进人物。1958年，提出水稻单季晚粳“三黄三黑”的看苗诊断技术及整套高产栽培经验，并通过与有关科学专家共同研究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综合性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对大面积水稻高产稳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被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聘为研究员，后任该院副院长。一生中发表论文和技术报告30多篇。1979年12月28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3月9日因病逝世。

Chen Yuan

**陈垣**（1880～1971） 历史学家、教育家。号援庵。广东新会人。1880年11月12日生。自幼好学，无师承，靠刻苦读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1897年曾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28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名誉教授。1935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史研究》杂志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自1956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他知识广博，研究领域涉及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多方面。主要代表作品有：《元也里可温考》、《元代西域人华化考》、《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通鉴胡注表微》、《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又名《校勘学释

例))等。

Chen Yuan

**陈原** (1918 ~ ) 语言学家、出版家。广东新会人。1918年5月23日生。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先后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作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际书店、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商务印书馆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全国术语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副主席等职。主持设计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汉语大词典》等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图书,在语言研究方面也有很深造诣。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社会生活》、《辞书与信息》、《社会语言学》等。

Chen Yun

**陈云** (1905 ~ 1995)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

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

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2000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而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

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例如，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提拔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等。他还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Chen Yun Wenxuan

《陈云文选》(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

陈云重要著作选辑。共3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委托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1984年7月和1986年5月先后出版。1994年12月，经作者同意，对第一版进行了增补和修订。1995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批准出版第二版，改称《陈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共收入190篇著作、约70多万字。按照著作年月次序编辑，各篇著作都经作者校阅。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5种外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朝鲜

文、藏文、维吾尔文4种少数民族文版。1996年7月，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一卷本。

第一卷，收入陈云1926年7月至1949年6月的重要著作55篇。内容有最早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章《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涉及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财经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其中，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文章占突出地位，主要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等文，记录了他为东北全境解放所提出的关系全局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

第二卷，收入陈云1949年8月至1956年7月的重要著作52篇，主要有《制止物价猛涨》、《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要使用资方人员》等。这些著作，1982年6月曾在内部发行过，书名为《陈云文稿选编》。这卷著作，集中反映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点。①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②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③实行计划收购政策，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④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应该有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⑤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摊贩等小商贩。安排小商贩的原则是，既要照顾居民消费的方便，又要保持小商贩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收入。

第三卷，收入陈云1956年9月至1994年2月的重要著作83篇，主要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目前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计划与市场问题》、《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等。其中1956年至1962年的大部分著作，曾于1980年10月单独编辑成《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内部发行。这部著作，反映了陈云同志在若干重要关头，对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和若干重大政治问题方面的主要观点。特别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粉碎“四人帮”后面面临的两件大事》、《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等文章中，集中地反映了陈云在新时期有关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陈云文选》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许多重要经验，反映了陈云在2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70年的革命生涯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基本思想、观点和主张，也反映了陈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作风，以及开门见山、重在论理、要言不繁的文风。

Chen Yunpeng  
陈运鹏 (1935~ ) 游泳运动员、教练员。广东惠来人。1935年10月2日生。1952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游泳队，同年获年度游泳选手称号。1953年入选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游泳班，1954年被选派赴匈牙利训练。自1957~1959年多次获男子100米、200米蝶泳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最佳成绩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2名。

Chen Yunpeng

1965年起任国家队教练，1980年任副总教练，1987年任总教练。在他的训练指导下，1988年4月第3届亚洲游泳锦标赛上，中国游泳女选手杨文意以24秒98的成绩刷新了25秒28的女子5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成为1960年以来首破世界纪录的中国游泳运动员。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获得了3银1铜的好成绩，实现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游泳奖牌“零”的突破。1991年在第6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女选手一举夺得4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实现了在大型世界游泳比赛上

31

金牌“零”的突破，震动了世界泳坛。1992年第25届奥运会上，中国女选手夺得4枚金牌、5枚银牌，同时创造了2项世界纪录、1项奥运会纪录，跃居世界泳坛女子四强之列。从1985年起多次被评为中国游泳十佳优秀教练员。1986年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教练员称号。

Chen Zaidao

**陈再道** (1909~1993)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麻城人。1909年1月24日生。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和本县农民自卫军。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加了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和反“围剿”。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11师的团长、师长，率部参加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长征中任红四军副军长，到陕北后任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等战役。鲁西南战役中，曾统一指挥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继而进军大别山，参加宛东、宛西和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1972年起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4月6日逝世。他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Chendou Huiyi

### 成都会议 (Chengdu Conference)

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讨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关于协作、第二本账、平衡与不平衡、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整风反右、国际形势、工作方法等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多次讲话，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并提出要在15年赶上英国的基础上，20年赶上美国。他还指出，中国当前仍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

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等37个文件。这次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发动。

Cheng Fangwu

**成仿吾** (1897~1984) 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湖南新化人。1897年8月24日生。191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文学团体创造社。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文学评论、小说和诗歌。1924年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编辑中共巴黎—柏林支部杂志《赤光》。1931年回国，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创办学校，普及教育。1934年到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教育工作。1935年到陕北，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会议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和第五届常委，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大批人才，在教育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5月17日逝世。著作有《成仿吾教育论文集》。

Cheng Kejie

**成克杰** (1933~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壮族，广西上林人。1933年11月13日生。1952~1957年在北京铁道学院铁道管理专业学习(1953~1954年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8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7~1986年，任柳州铁路局湛江车站实习生、技术员，南宁分局技术员，湛江办事处业务指导员，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柳州铁路局南宁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柳州铁路局副局长，柳州铁路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1986年起，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Cheng-Kun Tielu

### 成昆铁路 (Chengdu-Kunming Railway)

中国西南地区的铁路干线之一。北起成都站，南至昆明站，北接宝成、成渝铁路，南联贵昆、昆河铁路，并与渡口、昆阳等铁路支线相接，全长1100千米。1958年、1960年、1961年三次动工，三次停工，1964年9月复工后又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延误工期两年。1970年6月29日完成铺轨，1971年1月1日交付运营。这条铁路由海拔300米左右的川西平原，逆大渡河、牛日河而上，穿越海拔2300米左右的沙马拉达分水岭后，沿孙水河、安宁河、雅砻江下至海拔1000米左右的金沙江河谷，再溯龙川江上至海拔1900米左右的滇中高原。按I级铁路标准设计，单线。主要工程量：土石方9688万立方米；挡土墙和路基加固工程163万立方米；隧道427座，总延长344.7千米；桥梁991座，总延长106.9千米，完成铺轨1083千米。线路在险峻山区7次盘山展线，桥、隧总延长占线路长度的41.6%。从金口河到埃岱的58千米线路上，有隧道44千米，几乎成了“地下铁道”。全线122个车站有41个不得不设在桥梁上或隧道内。用内燃机车牵引，隧道预留了电化净空。限制坡度为6‰，在不同地段分别采用了12‰、13‰、16‰加力坡度。隧道施工采用了全断面开挖、喷锚支护等新技术，铺设新型轨下基础82千米。桥梁采用了栓焊钢梁、钢筋混凝土柔性桥墩、大跨度悬臂灌注、悬臂拼装钢筋混凝土梁等新技术和新结构。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在不良地质地段采用锚杆挡墙、桩基挡墙、托盘式路基挡墙等新型和轻型支挡，并采用了锚杆喷浆护坡、锚固桩加固地层等工程措施。在成都至燕岗150多千米线路中，铺设无缝线路，安装电子调度集中、大综合小同轴电缆，300路载波机；安装长途自动交换等设备。建设工程于1985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电气化工程分北（成都至樊枝花763.4千米）、南（樊枝花至昆



明 347.1 千米) 两段施工, 北段 1993 年 3 月开工, 南段 1998 年 8 月 30 日开工, 计划“九五”期间全部完工。

Cheng Siwei

**成思危** (1935~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湖南湘乡人。1935 年 6 月 11 日生。1956~1958 年在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1973 年任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1973~1981 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工程师。1981~1984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 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 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化工部副总工程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主任,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化工部副部长, 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 年当选民建中央主席。是政协第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八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增选为常委;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管理科学方面有深入研究。他主持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奖和化工部奖, 从 1994 年起主持出版每年一册的《中国化学工业发展指南》。

Chengyu Tielu

**成渝铁路** (Chengdu-Chongqing Railway) 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成渝铁路北起成都, 南至重庆, 全长 505 千米。

从 1903 年开始, 四川人民就为修建成渝铁路集资, 并在 1911 年为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筑路权发动了“保路”运动。直至清朝灭亡, 寸路未修。1936 年国民党政府又借外债修路, 十几年只完成少量路基工程, 寸轨未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 从 1950 年 6 月动工, 于 1953 年 7 月正式建成通车, 实现了四川人民 40 多年的梦想, 结束了四川没有正式铁路的历史。成渝铁路是中国使用国产器材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对发展四川和西南地区的交通, 繁荣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大作用。

chengshi wufan yundong

**城市“五反”运动** (measures against non-socialist remnants in the cities) 1963 年在全国各城市展开的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

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之后, 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克服困难的措施, 国内经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但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在企业中存在浪费国家资材、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本位主义思想, 更有一些党员、干部贪污盗窃国家财产, 搞投机倒把。为了保证 1963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圆满完成, 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全面好转, 同时也为了健全制度, 改进思想作风, 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在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五反”运动。1963 年 3 月 1 日, 中央颁发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后, “五反”运动陆续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针对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中央在政策上给予了指导。但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认为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 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 是激烈的两条道路斗争。1963 年秋后, 中苏两党论战日趋激烈,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五反”运动被视为国内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五反”运动中出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把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不良影响。

Cheng Qian

**程潜** (1882~1968)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882 年 3 月 31 日生。清末秀才。1899 年后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读书。1903 年肄业于湖南武备学堂。1904 年留学日本, 先后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其间加入孙中山在日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08 年回国后任四川新军参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 任湖北汉阳(今属武汉) 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回湖南任都督府参谋部部长、军务司司长、军事厅厅长, 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13 年再赴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5 年回国后, 任护国军湖南招抚使、总司令, 湖南省省长, 护法军湖南总司令。1920 年后任广东大元帅府陆军次长, 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

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战争时期, 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九江卫戍司令, 右江军总指挥,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拥护三大政策, 与共产党人合作。1928 年 2 月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第四路军总指挥。1935 年 12 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湖南保安司令。1939 年任西安行营主任、天水行营主任。1940 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5 年 12 月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 年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 年 8 月在长沙同陈明仁率部起义。9 月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湖南省省长。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二届中央常委, 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8 年 4 月 9 日逝世。著有《程潜诗选》等。

Cheng Siyuan

**程思远** (1908~ )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宾阳人。1908 年 8 月生。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0~1934 年, 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秘书。1934 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 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8~1942 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秘书, 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 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书记, 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1942~1946 年, 任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处长、中央常务干事, 国防艺术社社长, 广西省政府驻渝、驻京代表,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1947 年后, 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 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 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去香港, 曾任《正午报》专栏作家。1965 年随李宗仁回北京定居。1978 年后, 任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 年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提案委员会主任。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有《李宗仁先生

晚年)、《政坛回忆》等。

Cheng Xiaogang

**程孝刚** (1892~1977) 铁道机械专家。江西宜黄人。1892年8月16日生。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得硕士学位。1919年后历任中东、津浦等铁路工程师、机务处长、总工程师,铁道部技监,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交通大学运输起重系主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为培养铁路交通技术人才做出了贡献。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1977年8月1日在上海逝世。

Cheng Yanqiu

**程砚秋** (1904~1958) 京剧演员,工青衣。满族。1904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承麟。早年艺名程菊农,后更名艳秋,号玉霜。1932年起易名砚秋。6岁从师学习京剧,先习武生、花旦,后攻青衣。12岁正式参加营业演出,13岁成名。曾拜梅兰芳为师。广泛涉猎文学及多种艺术。在不断的艺术实践和创新中,逐步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创立了有广泛影响的艺术流派,世称“程派”,并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主要的代表剧目有《荒山泪》、《青霜剑》、《锁麟囊》、《春闺梦》、《三击掌》、《打渔杀家》、《文姬归汉》等。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为敌伪演出,在京郊务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改编演出《窦娥冤》等剧目,并以主要精力从事总结、传授艺术经验和戏曲理论研究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3年任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同年赴朝鲜前线,参加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演出。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界协会常务理事。1957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10日逝世。著有《戏曲表演艺术的基础》等,均收入《程砚秋文集》。另出版有《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

Cheng Zihua

**程子华** (1905~1991) 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山西运城人。1905年6月20日生。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三十五军第三〇七团团团长,独立第三师师长,红五军第四十师师长、第四十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十四师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6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1月,率部进行长征。1935年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西安事变后,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39年1月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10月,任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4月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关押。1975年,到中共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1978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3月30日逝世。

Chi Haotian

**迟浩田** (1929~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山东招远人。1929年7月9日生。1944年6月参加八路军,任招远县齐山区中队文书和招远县独立营通信员、班长。1945年9月入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学习。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山东军区第5师13团8连文书,华东野战军

第9纵队73团3营文书、文化干事、连副指导员。在参加胶东保卫战和莱芜、孟良崮、潍县、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1949年参加上海战役,在第三野战军27军79师235团(即济南第一团)任第7连指导员时,曾带领一个排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连,迫使一个营投降,俘敌副师长以下千余人,被评为甲等战斗模范,同年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3营教导员,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立一等功两次。1952年底回国后,任团政治处主任。1957年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合成系。后任陆军第27军79师235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团政委。1966年起任27军79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起任81师政委,《解放军报》核心小组成员。1973年起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曾赴唐山指挥部队抗震救灾。粉碎江青集团后,曾任《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第一副总编辑。1977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1985年6月任济南军区政委。1987年11月起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家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95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起任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chuban shiye

**出版事业** (publication industry)

包括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的革命出版事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出版业规模很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却是后来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基本力量。还有一些私营的民营出版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改造成为共和国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起点。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事业经历4个发展阶段。

**初创阶段** 1949年10月1日至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贯彻会议“统筹

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现象。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将兼营出版、印刷、发行三种业务的新华书店实行专业分工，改组并发展成为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只负责发行）三种专业系统的企业；建立规章制度，如《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全国杂志书籍定价标准》等；将私营出版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企业。到1956年，中国当年共出书28773种，总印数17.8亿册（张）；出版各类杂志484种，印数达到3.53亿册；出版报纸347种，印数达到26.12亿份；书刊印刷业也有较大发展，1949~1956年，全国书刊铅印刷从13万令增长到283万令，胶印印刷从7万令增长到207万令。1956年书刊印刷工业总产值1.93亿元，是1949年的37倍。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加快，1956年国营新华书店全国已有2105处，销售图书从1950年的2亿册增长到14.8亿册，销售金额从0.5亿元增长到3亿元。

出版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典著作大量出版，到1956年已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241种，印行2700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出版48种，印行6200万册。学术著作出版空前活跃，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五四”以来中国的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的文集系统成套出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技术书籍出版成倍增长。同时，还翻译出版43个国家的各类图书15700多种。

**初步发展阶段** 1957~1965年。最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出版十分活跃，出版了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林海雪原》、《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一批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出版了一批回忆录，如《星火燎原》等，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组织实施1956年拟订的《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和1958年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长远规划。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方面的重要著作出版已初具规模。期刊出版从1957年的634种增加到1965年的790种，总印数从3.15亿册增加到4.41亿册。报纸出版这期间减少21种，总印数却从24.42亿份增加到47.41亿份。书刊印刷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铅印刷从256万令

增加到472万令，胶印印刷从197万令增加到444万令。1956年以后，各地新华书店依靠供销社建立农村图书销售点，使图书销售网点遍及城乡。1965年全国图书发行网点已达5万多处，当年销售图书18.6亿册（张），销售金额4.3亿元。

**十年挫折** 1966~1976年。1956年冬至1957年春的反右派斗争，使出版界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严重挫伤了作者和出版者的积极性。1958年受共产风浮夸风的影响，出版了大量根本够不上出版水平的小册子，1959年~1960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批判了一些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这些负面影响都是局部的，短时间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17年的出版工作被诬蔑为是“反革命专政”，出版队伍被诬蔑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出版机构被撤销，出版工作者被遣散，大批图书被当成“封、资、修毒草”遭到批判。1966年全国出书品种从上年的20143种下降为11055种，1967年又猛降到2925种。期刊出版到1969年时只剩下20种，总印数只有0.46亿份。报纸出版1969年也只有42种，总印数仍有41.11亿份。10年共出版图书9.2万种，总印数为300.17亿册（张）。出版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含语录本）42亿册。但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极少。图书出版业十分萧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书荒。

**空前繁荣阶段** 1977~199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部门认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出版事业发展迅速。1998年与1978年比较，图书年总品种从1.5万种增长到13万种，总印数从37.7亿册增长到72.7亿册，总印张从135.4亿张增长到377.6亿印张；期刊年总品种从930种增长到7999种，总印数从7.6亿册增长到24.9亿册；报纸年总品种从186种增长到1902种，总印数从127.8亿份增长到287.6亿份；音像电子出版从无到有，1997年全国共出版各种录音制品1.1万种、1.5亿盒（亿张），出版各种录像制品1.2万种、5734万盒（万张）。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进一步加强，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的20多家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1997年共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图书3429种，近20年出版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和教育、科技、文化类读物，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通过实施“精品战略”带动全面繁荣，新版《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1至3卷、《列

宁全集》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中国美术全集》（60卷）、《乾隆版大藏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机械工程手册》、《中国文化通志》（100卷）、《中国政治通史》、《韬奋全集》、《齐白石全集》等一批具有很高政治思想、文化积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图书问世。

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了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阶段性转移”。经过几年努力，“阶段性转移”取得了显著成效。图书出版在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方面已出现两增两降的趋势，即图书总品种下降，新书品种下降，总印数增加，重版书增加，出版总利润持续增长。为实现新闻出版事业精心设计，优化结构，整体推进构想，正在实施一系列工程，如“‘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九五’国家重点音像制品出版规划”和“‘九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以及“中国动画5155工程”，经营管理“百好报纸”、“百刊工程”和“社刊工程”。并正在积极推动出版工作集约化、集团化的进程，已经成立6家报业集团、3家发行集团、两家出版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直属的出版总社、总公司也正在运行。

**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出版事业基本形成了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到教育、科研以及对外贸易等较完备的出版体系，并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出版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出版能力显著增强。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565家，其中483家是1978年以后恢复和新建的。地方出版力量增长更快，全国有345家地方出版社，出书品种占全国的64%；全国有期刊7918种，有报纸2149种；有音像出版单位296家，电子出版单位41家。与之相适应的印刷、复制、发行能力也有很大提高。1997年全国共有国家和省级定点书刊印刷企业1214家，排字量完成201.56亿字，书刊印刷4612万令，工业总产值123.75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85496处，其中新华书店发行网点13309处，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集体、个体书店（摊）有35827处，已成为图书发行的一支重要力量。图书发行从业人员245651人，全年累计纯销售74.7亿册、313.2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2.26倍和33.68倍。全国出版系统1997年利润总额370027万元，是1979年的11.4倍。科研教育成龙配套，出版、印刷、发行专

业院校有18所,科研机构19个。印刷物资、器材供应联成网络。

**品种质量** 出版物品种持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1978年,图书再版率为20.7%,1996年~1998年,图书再版率依次为43.6%、45%、44%,增长一倍以上。图书出版按整体质量,成规模进行,一大批图书出版“骨干工程”以规划、重点图书工程等形式有计划出版。报纸、期刊质量通过整顿明显提高。图书出版已形成并建立起《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国家规范了各种出版物的评奖活动,有计划评选各种优秀出版物,图书有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期刊有中国期刊奖,音像有全国优秀音像制品奖,报纸有全国地方报纸先进单位(报纸质量是评选要素之一)。多媒体光盘《颐和园》获第7届法国“莫必斯”国际大奖赛人文学艺术奖。

**中外出版合作** 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中国之旅》,首创中国与国外合作出版。20年来,许多出版社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出版合作的形式日益多样化,效益越来越好。版权贸易开展得十分活跃。自1986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的国家越来越多,每次都有几百个项目成交。同时,还有选择地组织出版社到国外去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1997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有80多家出版社参展,正式签订版权贸易协议160种、意向性协议390种,协议总金额约300万美元。

**法规建设** 1992年以来,新闻出版系统颁布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达170多件。特别是1994年、1997年,国务院先后颁发《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宏观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出版行政管理形成基本的法规体系和出版管理体制的法制框架。执法工作加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执法责任制,提高了依法行政的水平。同时通过普法教育,增强了出版系统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技术改造** 新闻出版业各部门都在加快采用高新技术。新闻出版系统正在建设全国信息网络系统控制中心。出版物编辑工作在大部分出版社建立了照排系统或采用桌面出版系统。出版物印刷业基本采用了激光照排。出版发行已启动全国信息网络系统,已与部分省市实现远程数据交换。音像电子出版已建立三个国家光盘生产基地。一批重要报纸、国家通讯社的技

术改造已全部启动,有些改造已经完成。

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经过50年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切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出版事业的指导方针,并且积累了一些坚持贯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指导方针的基本经验,这就是:(一)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出版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二)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出版方针任务,是坚持出版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条件;(三)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坚持出版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问题;(四)促进出版繁荣,是坚持出版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最终体现;(五)依法管理出版事业,是保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六)加强出版队伍建设,是坚持出版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战略措施。

**体制沿革** 50年来,中国出版事业的体制有了很大变化。

**出版管理机构** 包括中国共产党出版管理机构、政府出版管理机构、行业管理机构。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195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出版处,1977年改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至今(1999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领导机构。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是国家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政府出版管理机构,它在国家机构变革中多次变动。1987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并一直至今(1999年)。它负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③行业管理机构。70年代末,开始建立出版业各种协会,主要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等。行业协会是联系政府机关和出版业的纽带和桥梁,是维护出版业自身合法权益,规范行业行为的重要组织形式。

**体制改革** 1984年出版单位由纯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实现出版单位的岗位责任制。1992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实行出版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新出版体制。随后,出版单位以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进行改革,同时围绕确立法人制度,重视资产、资金和资本运营,通过兼并与联合实现不均衡发展,增强多媒体综合经营能力等方面深化改革。发行体制改革在经过“一主三多”和“三放一联”两个阶段后,已进入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

书市场阶段。出版管理体制向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从主要依靠行政管理到主要依法管理,从微观管理向已初步建立宏观管理体系的方向发展。

Chu Tunan

**楚图南** (1899~1994)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主席。又名楚曾,字高寒。云南文山人。1899年8月28日生。1919~1923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参与组织劳动文化社,主编出版《劳动文化》周刊。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师毕业后,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中学任教,并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被捕入狱。1934年出狱后,到河南开封北仓中学、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云南大学教授、系主任。曾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会长。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任上海法学院教授。1947年8月任民盟西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委员。1948年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兼文教部部长,民盟中央西南特派员,民盟西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顾问。是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主席;政协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补选)。1994年4月11日逝世。著有《刁斗集》、《荷戈集》等。

Chuan-Zang Gonglu

**川藏公路** (Sichuan-Tibet Highway)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修建的从四川省成都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干线公路。途经四川、西藏两省、区6个地、州,21个县市,南与云南中甸相连,北与青海玉树相通,西与新藏公路衔接,形成了川西和藏东地区的公路网。全长2410千米。其经济、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50年初,川藏公路雅安(原西康省金鸡关)至拉萨段开始动工。工程完工后名康藏公路。1951年公路起点延至成都,改称川藏公路。1954年12月25日全线建成通车。

川藏公路堪称“世界屋脊”之路,全线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翻越海拔4200米以上的大山12座,其中线路最高点的雀儿山垭海拔5047米。沿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氧气稀薄,人烟稀少,物资供应困难,施工难度极大。修路的藏、汉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不畏艰难险阻,科学勘测、设计、施工,创造了公路建筑史上的奇迹。

为便利云南、西藏、四川之间的交通,缩短运输线路里程,1957年又修筑了川藏公路的南线。这条线路由东俄洛起改线,在邦达与原线路接线。南线长769千米,比原线北段缩短242千米,而且南线冬季积雪少,利于冬季交通。

南线修建技术标准较低,加上沿线地质复杂,自然病害多,多年失治失修,路况急剧下降。从1987年起,交通部,成都军区,四川、西藏两省区多次组织调查组对川藏公路南北两线进行全面调查,提出了整治改建工程计划。“九五”期间,国家计划总投资20亿元,对川藏公路全线分段进行改建、整治。

## chuanbo gongye

### 船舶工业 (ship-building industry)

以船舶制造和修理为主的国家重点机械制造业,是为中国现代国防、航运、渔业、海洋开发、江河治理提供技术装备和机电产品出口的重要行业。

**发展历程** 中国船舶工业始于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工业最早建立的五大产业之一。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物质基础薄弱,到1949年,全国主要钢质船厂仅有十几家,工人不过一万人,机床设备不到一千台,而且由于战争破坏,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船舶工业的生产迅速恢复。全国各地船厂修造了一批货驳、拖船、渔船和木帆船,自行设计建造了小型炮艇等军用舰艇,基本满足了当时国家运输和国防的需要。

50年代,中国船舶工业进入了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1953年,与苏联签定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在苏联技术的援助下,中国船舶工业以军为主,以制造苏联转让的6

种型号的舰艇为重点开展全面建设,国家投资1亿多元改建和扩建6家船厂,为中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60年代以后,苏联中断技术援助,中国船舶工业自力更生,开始国产化建造,独立自主地研制了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中国第一代舰艇,发展较快,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形成了配套体系,增强了整体实力。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发展和建立远洋船队的需要,在建设港口的同时,沿海船厂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加快了近海和远洋船开发建造步伐。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船舶是5万吨级油船,至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生产体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船舶工业面对军品任务下降,生产严重不足的困境,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船舶要出口的指示精神,调整建设重点和生产结构,由“以军为主”向“军民结合,保军转民”转变,发展民船和非船产品生产。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船舶设计技术、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对现有船厂进行技术改造,使中国船舶工业具备了建造出口船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并在产品种类、质量和技术标准方面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从1979年到1981年,当时的六机部共承接出口船80万吨,打开了国际市场。1982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后,继续把建造出口船作为生产经营的重点,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共开发新船型500多种,船用设备国产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为适应国内航运的需要,开发了浅吃水、江海直达等多种船型。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重点改建、扩建了沿海老厂和一批造机厂,建成了大连造船新厂20万吨级船坞、文冲船厂15万吨修船坞、山海关船厂10万吨级修船码头等基础设施,完成了大连、江南、广州、上海船厂等五大船厂的改造。

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日益开放,国内造船市场需求旺盛,各省、市、地方、交通部等部门的造船生产迅速发展。部分地方船厂扩大造船能力,与日本、韩国等建立造修船合资企业,发展造修船业,显示了发展的强劲势头。

**体制沿革** 1950年10月1日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船舶工业第一次有了全国的领导机构。船舶工业局成立以后,经营管理范围逐步扩大,

直属企业由刚建时的一家——江汉船舶机械公司(今武昌造船厂),发展到1956年的9家,包括江南、沪东、求新、中华、大连、武昌和芜湖船厂,同时组建了船舶研究设计机构。1953年,船舶工业局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改名为船舶工业管理局。1958年,第一、二机械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管理局改名为第九工业局,其部分直属厂下放地方领导。1960年,第九工业管理局改名为第九工业管理总局,隶属于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为了促进海军装备建设和航运事业发展,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第六机械工业部。六机部成立以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重点实施舰艇仿制和国产化,以及立足国内的船舶设备的生产协作,对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建造出口船的需求,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由原六机部直属的138个单位和交通部直属的15个单位,共153个单位组成,它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相当于部级的全国性公司,也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部门改为企业性经济组织的全国性工业公司。总公司成立后,对计划管理逐步进行改革,除军品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对国内民船和出口船放开管理,由下属企业直接与船东签合同。

中国船舶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实行多系统、分部门辖属的管理体系。根据现行管理体制,一类由原六机部(即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为主及交通、水产、海军等有关部门分别管理的大中型造船厂和造机、水中兵器、水声与导航设备等骨干配套企业、及有关科研设计院等事业单位,是船舶工业的骨干部分;另一类则是由各省、区市的机械、交通、水产等有关厅局负责管辖的地方中、小型修造船和有关配套企业。

根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船舶行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95年,全国船舶工业行业共有各类造修船企业1800家,职工40万人,其中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集中了国内主要大型船舶建造设施和船舶设计力量,造船能力占全行业37%,产量占全行业36%,工业总产值占全行业55%。八十年代后期,由交通部、地方等部门管辖的修造船企业有了较快发展。

**主要成就** 包括4个方面。

**造船生产快速发展** 50年来,中国船舶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以沿海、沿江为中心,以大连、天津、上海、广

州、武汉、重庆地区为主的造船基地。年均造船产量、产值及造船能力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中国船舶工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造船产量由1982年的42万吨提高到1998年的222万吨，年均增长10.3%，翻了两番多，占世界造船产量的份额由1982年0.8%，居世界第17位，提高到1998年底的6%，居世界第三位；造船产值从1982年的8.2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221亿元；造船能力由1982年的70万吨，提高到250万吨，坞修容量由1982年38万吨提高到73万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以来的15年间，修船产值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非船产品产值比重不断增加。

**船舶出口不断扩大** 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船舶工业以易货贸易及经济援助方式共计出口船舶864艘，16万吨，主要是中小船舶。1998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完工出口船142万吨，从1982年到1998年，累计承接出口船订单1300多万吨，已完工交付近1000万吨。造船产量和手持订单居世界第三位。出口船舶进入世界主要航运大国、经济发达国家和造船先进国家，创出了“中国大连型”“中国江南型”等知名船型，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信誉。外轮修理和机电产品出口都有较快发展，已形成以船舶出口为主、外轮修理、海洋工程和机电产品出口为辅的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船舶工业已成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支柱产业。

**科技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中国船舶工业船舶设计与建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逐步提高。中国不仅能建造符合各种国际标准的常规船型，还能设计建造包括液化气船、化学品船、汽车滚装船、大型冷风集装箱船和高速水翼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造船最大吨位达15万吨，并具有建造30万吨船舶的能力。船舶建造技术也不断提高，造船周期逐步缩短，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万吨级船台年产量达到5条。船用主机从依赖进口到基本立足国内制造，并且开始出口。一批技术先进的非船产品形成了规模。

**军品生产和科研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1949年到1998年，中国船舶工业为海军提供大量现代化装备，使中国海军具备了相当的近海防御能力和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船舶总公司先后为中国海军提供了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常规动力和核动力潜艇等主要舰艇以及炮艇、护卫艇、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登陆快艇等多种战斗舰艇和军辅船。为适应发展洲际运载火

箭、航天技术以及海洋开发的需要，成功地建成了远望号测量船、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为国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 Chuangye Haixia shijian

**《创业》《海霞》事件** (incidents involving the films *Start of the Project and Haixia*) 1975年围绕电影《创业》、《海霞》进行的一场斗争。《创业》是一部反映中国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影片，1975年春节上映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是江青等人却给影片罗织了为刘少奇“涂脂抹粉”等10条罪名，下令禁演，并要求追查背景，写批判文章。《海霞》是一部描写海岛民兵保卫海防的影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看后均认为很好，但因为不是江青等人领导制作的，也遭到他们的非难被禁演。同年7月，毛泽东要求调整文艺政策后，胡乔木遂托人与《创业》作者联系，向毛泽东、邓小平写信，反映影片《创业》受到压制的情况，建议重新上演该片。7月25日，毛泽东对《创业》编剧的来信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同日，《海霞》摄制组的编剧等人也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四人帮”对《海霞》及其创作人员的批判打击。7月29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7月30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审看了这部影片，决定上映。毛泽东的批示，在长期受到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亦使中国文艺界和电影事业开始活跃起来。

### congyan zhidang

**从严治党**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则。最早正式提出是中共十三大报告。在党员管理中坚持从严治党，就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和措施，提高党员素质，保证中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①强化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使广大党员增强党员意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要把好发展党员关；二要加强全体党员的经常性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的理想和宗旨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教育。②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从

严治党，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制度建设更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会制度，坚持民主评议党员和领导干部制度。③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领导干部要带头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以律己，自觉接受监督，发挥表率作用；党组织对党员领导干部要实行有效的监督。④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弘扬正气，反对歪风，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素质，增进党的团结。⑤严肃处理不合格的党员，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 cunmin zizhi

**村民自治** (self-government of the villagers) 中国农村中农民依法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大举措。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后，随着政社分开、撤社建乡工作的进行，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自1998年6月1日起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本法进行了修订并通过，同日由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布施行。

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由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一种很好的直接民主形式。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广大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这种形式，根据需要与可能，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比一切都由政府包办更适当、更有效，并且有利于群众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处理好自己内部的矛盾，促进基层直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群众，村民群众通过村民会议行使自治权。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2/3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为了保证在村民自治活动中真正实行民主，村民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

事，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包括全村性重大事情的办理，费用的筹集和使用，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和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以及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和发展有效地加强了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素质和社会事务管理水平。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密切乡、村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基层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村民自治在全国各地的发展

还不平衡，村民自治工作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cuobai Taiwan tewu cuanrao dalu huodong

**挫败台湾特务窜扰大陆活动**  
(frustration of Taiwan infiltrators' harassments on the continent)

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东南沿海军民粉碎国民党军小股武装特务袭扰的行动。1962年秋，台湾国民党当局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搜罗和挑选了一批职业特务、军官、惯匪首领和大陆土改时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编成“反共救国军”，

经专门训练后，开始执行代号为“海威”、“班超”的窜扰作战计划。同年10月1日至12月6日，他们派往大陆东南沿海的9股武装特务，先后由台湾高雄和东沙乘船出发，在广东省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等县的沿海地区登陆，均被沿海军民全歼。随后，台湾国民党当局转变方式，由公开武装登陆变为化装潜入偷袭，至1964年3月，又连续派出50多股武装特务在华东、华南沿海登陆，上岸的特务大部被沿海军民歼灭。至1965年1月，东南沿海军民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594人，并击毁和缴获各种船艇24艘。

# D

Dalai Lama Danzengjiacuo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1935~ )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俗名拉木登珠。藏族。青海湟中人。1935年7月6日(藏历第16“饶迥”的木猪年5月5日)生。1933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他于1937年被西藏噶厦选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1939年被迎往拉萨布达拉宫供养,开始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1940年2月5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于同年2月22日,中央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布达拉宫主持举行坐床典礼。1951年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后,特派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率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分两路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同年5月23日正式达成《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4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十七条协议。1953年任中国佛教学会名誉会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9年西藏上层在国外反华势力支持下发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平息叛乱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后长期流亡国外,继续进行分裂活动。

dabaogan

**“大包干”** (all-round contract system) 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最主要的形式。

**形成过程** 1978年,安徽凤阳县马湖公社有10个生产队把种烟叶允许的“包产到组”的方法用到种粮食上,在大旱之年略有增产。中共凤阳县委即在全县推广此法。同年,中共安徽肥西县山南区6个公社搞了“包产到户”,也在大旱之年获得丰收。这年11月24日夜,凤阳县

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字据,搞了“包干到户”。群众称这种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大包干”,并用顺口溜概括:“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0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包干到户”。“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邓小平十分重视农民的创造,在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中,肯定肥西县“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县“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后发出的文件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1号文件,肯定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已经建立的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确认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形式中,“大包干”即“包干到户”这种经营、分配方式被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所选择。到1983年底,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7.8%,成为多种责任制的主体。

**重要意义** “大包干”有3项制度创新:一是在不改变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归农户,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直接结合;二是把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形成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三是把农户的劳动投入与劳动收益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包干”冲破了旧的经济体制,改革了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把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引发了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对中国城市改革和整个改革事业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Dagang Youtian

**大港油田** (Dagang Oil Field)

位于华北东部渤海湾地区的大型油田。1964年1月开始石油勘探,12月21日在天津北大港以东地区钻遇油层,发生井喷。1965年7月投入开发,建设矿区。到1969年底,形成了年产原油70万吨的生产能力。1974年5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大港油田建成的消息。大港油田生产的原油绝大部分经管道和铁路运往天津炼

油厂、沧州炼油厂和其他地区。天然气经管道输往沧州化肥厂,生产合成氨和尿素。到1985年,大港油田已累计生产原油5000万吨,上缴利税25亿元,国家收回了对油田的全部投资,还建成了年加工能力30万吨的炼油厂。1995年12月1日,大港油田集团公司作为石油行业中唯一一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正式挂牌运营。1997年成为中国陆上石油企业中整体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第一家。1999年4月8日,大港油田宣布找到“千米桥古潜山油气藏构造”,油气储量达亿吨以上,规模超过油田开发以来所发现的各个油气区。

Da-Qin Tielu

**大秦铁路** (Datong-Qinhuangdao Railway)

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开行重载单元列车的运煤专用铁路。西起大同,东至秦皇岛,途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全长653千米。一期工程西起大同枢纽的韩家岭站,东至河北大石庄,经联络线接入京秦铁路,全长410.8千米,1985年开工,1988年12月开通试运煤。二期工程西起大石庄站,东至河北抚宁,进入秦皇岛煤港,全长242.2千米,1989年开工,1992年12月开通试运煤。全线近期运量为5500万吨,远期运量可达1亿吨。主要工程量有: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桥梁370座,总延长63千米;隧道54座,总延长67千米,其中军都山隧道长达8460米。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大量采用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设备。

Daqing Youtian

**大庆油田** (Daqing Oil Field)

中国最大油田,世界特大油田之一。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松辽盆地北部。大庆油田年产原油5000万吨,已连续稳产20年,累计产量超过13亿吨。

1955年东北地质局开始在松辽平原进行地质普查,1959年9月第一口井喷出工业油流。为了庆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喷出原油,将大同镇改名为大庆,并把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为扩大勘探成果,1959年10月至1960年初,除在南部葡萄花构造控制200平方千米含油面积外,又向北钻探萨尔图、杏树岗和喇嘛甸3个高点,相继喷出高产油流,展示了长垣构造整体含油。到1960年底,大庆长垣油田勘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松基3井喷油到探明油田



的储量，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用 93 口井探明了一个世界特大油田。

截至 1995 年，已探明含油面积 3 237.17 平方千米，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52.6 亿吨；投入开发面积 1 780.3 平方千米，动用石油地质储量 46.69 亿吨。建设各种站 3213 座，建各类井 3.8 万口。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502 亿元，净值 266 亿元。

大庆油田自 1976 年实现年产原油 5000 万吨以来，已连续稳产 20 年。截至 1995 年底，累计生产原油 13.49 亿吨（1995 年生产原油 5600.69 万吨），出口原油 3.08 亿吨，创外汇收入 438.1 亿美元，上交各种税费 1439 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家投资的 41 倍。

### Daqing Youtian de faxian

#### 大庆油田的发现 (discovery of the Daqing Oil Field)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的地质学家抛弃了某些外国学者关于中国贫油的说法，论证了中国大陆含油的光明前景。20 世纪 30、40 年代多位学者分别提出了陆相“沉降带”成油等论说，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内可能有白垩纪内陆拗陷，并可能含油。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增强了在陆相地层中找油的信心。中国不同学派的地质学家，分别从构造、地层、沉积和生油环境等方面对中国石油的分布进行探讨。其中，关于沉降带成油的理论，关于油气盆地的性质类型、沉积发育阶段的划分及其含油气远景的推断，关于深部断裂控制盖层含油构造等理论的提出，在当时世界上是最早的或是比较早的，它对指导寻找中国石油资源起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质学家的认识，从 1955 年起，在中国陆地范围内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特别是对松花江流域进行调查，查知深拗陷对生油有利，在地表没有任何油气显示的地方也有可能找到油气田，找油应从分析沉积盆地出发。这些成油理论认识和找油的实践，为发现大庆油田以及东部一系列油田提供了可靠资料和科学依据。

国务院据此于 1958 年初作出决定，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重点从西部向东部进行战略转移。在松辽平原更全面地展开了地质、物探和钻探工作，终于在中央拗陷发现了南北向的大同镇长垣构造，认为这是“拗中之隆”，是油气聚集最富的地区。经钻探，于 1959 年 9 月在松基三井首先喷出了工业油流。尔后，又在南起葡萄花，北至喇嘛甸子等构造上先后打出工业油流或高产油流。经过大会战和进一步

勘探，断定大庆油田是世界上大油田之一，并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这一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Daqiu Zhuang'an

#### 大邱庄案 (Daqiu villager incident)

90 年代上半期发生在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的违法案件。大邱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由穷变富，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村”的农村先进典型。大邱庄村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曾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因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被列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随着财富的增加，在荣誉面前，禹作敏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最终沦为罪犯。

1992 年 12 月，在清理大邱庄原大华集团公司经济问题时，禹作敏先后多次组织、指挥其下属对原大华集团公司职工田宜正、侯洪滨、朱宝等人非法拘禁、侮辱殴打。在审查过程中，原大华集团养殖厂职工危福合被怀疑有贪污问题。同年 12 月 13 日，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经理刘云章等人私设公堂，审讯危福合，当晚危被刘云章等人殴打致死。事件发生后，禹作敏多次指使他人窝藏 4 名重大案犯，雇用打手以暴力阻碍司法机关依法勘察现场、搜捕案犯，扣留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导致公安、检察人员不能正常执行公务。在此前后，为获取国家重要机密、干扰案件的查处，禹作敏和其子禹绍政行贿数万元。禹作敏还指使他人对村民刘玉田的家属非法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非法管制。在他的示意下，还非法拘禁和侮辱殴打北京某干部学校的师生。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3 年 8 月 23 日和 24 日依法对禹作敏和 7 名同案犯进行公开审理。是月 27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其同案犯也受到应有的惩处。

### Daxing'anling teda senlin huozai

####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extraordinary forest fire in the Major Xing'an Mountains)

1987 年 5 月间发生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特大森林火灾。起火原因是由西林吉林业局古莲林场的割灌机在 5 月 6 日作业时跑火引起。6 日下午 3 时左右，西林吉、图强、阿尔木、塔河 4 个林业局的几处林场同时

起火。火势不大，扑救及时。由于突然刮起 8 级左右大风，致使火势迅速蔓延，形成特大火灾。大片森林被烧，有 2 万多居民的西林吉镇大部分建筑物被烧，西林吉、图强、阿尔木 3 个火车站也被烧，通往西林吉、图强、阿尔木、塔河 4 个林业局的铁路、公路和有线通信全部中断。火区范围达 40 多万公顷。

火灾发生后，森林警察部队和广大林区群众奋力扑火，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指战员赶赴火场扑火。有关部门派出 25 架飞机，调去 320 台风力灭火机和多辆消防车奔赴火区。为扑灭这场特大火灾，黑龙江省成立了塔河前线扑火指挥部。国家财政部、商业部、铁道部、民政部、国家物资总局、国家气象局和黑龙江省密切配合，全力支持大兴安岭抗灾。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国务院秘书长、扑火指挥组组长陈俊生于 5 月 12 日乘飞机抵达塔河，察看火灾现场，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战斗在扑火前线的全体职工、全体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受灾群众表示深切慰问。经过军民奋力扑打，加上出现降雪气候，5 月 12 日晚，火势开始减弱，火头减少，灾情有所缓解。到 5 月末，火灾被全部扑灭。

扑灭火灾后，灾区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支援灾区的 40 多万斤熟食、60 万斤粮食、70 幢活动板房、560 架帐篷及其他救灾物资陆续运抵灾区。大多数伤员及时得到治疗。总指挥部在齐齐哈尔、加格达齐、呼玛、松岭、满归等地设立了 5 个灾民转移站、6 个安置点，安置、转移灾民 7900 多人次。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10 个城市居民募集衣物、资金支援灾区。内蒙古、吉林、上海、辽宁、北京、广州等省、市、自治区也向灾区支援了大批粮食、药品和人工降雨飞机。

### daxing diaocha yanjiu zhi feng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measures to encourag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1961 年毛泽东倡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领导方针和工作作风。

在 196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 1958 年“大跃进”运动以后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等，号召全党不能只凭主观估计办事，要求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月 21 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带一个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

毛泽东也动身南下广州，沿途进行调查。很快毛泽东发现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由田家英等建议，毛泽东决定用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来解决这一问题。3月10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由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3月15日，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见广州会议），继续进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讨论。22日，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针，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建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就农村工作的若干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此后，刘少奇到湖南省长沙县和宁乡县进行调查，周恩来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做调查，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党政负责人也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大兴调查研究对于转变干部作风、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方针都有重要的意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工业、林业、商业等方面工作条例的制定，都是当时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

#### da xingzhengqu zhidu

**大行政区制度** (system of major administrative regions) 大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设置的地方最高一级政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划为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和西南6大行政区，分别设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既是地方最高一级权力和行政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地方的代表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

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辖若干省市和行署，西北军政委员会设于西安，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华东军政委员会设于上海，辖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北、苏南、皖北、皖南4行署及上海、南京2市；中南军政委员会设于武汉，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及武汉、广州2市；西南军政委员会设于重庆，辖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行署以及重庆市和西藏；东北人民政府设于沈阳，辖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6省和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5市；华北人民政府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平原5省和北平、天津2市。其中，华北大行政区于1949年10月31日撤销，改由政务院增设“华北事务部”，作为政务院直接领导下联系、指导5省2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行政区制度进行改革，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以及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而且，大区行政委员会只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督导机关，不再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关。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大行政区制度从此不复存在。

#### daxing qiye jituan

**大型企业集团** (major enterprise corporations)

中国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产权、资本等为纽带，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联合体。

1980年国务院发文支持和推动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以其产品、技术和管理的优势，率先突破行政条块管理的制约，采取联营、合营等多种形式组成经济联合体，中国企业集团开始孕育。1987年12月，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联合发出《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在总结横向经济联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企业集团的建议，将发展企业集团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企业集团的文件。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集团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的请

示》，开始进行第一批57家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果。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实施，又将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纳入了法制轨道。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家必须重点抓好一批在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精神，国务院于1997年4月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意见》，公布了第二批试点的63家企业集团名单，明确指出企业集团试点的目的和要求，使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的行业分布是农业5家，机械、电子14家，冶金4家，化工3家，煤炭2家，轻工、纺织5家，医药3家，铁道、交通3家，建筑、建材4家，内外贸12家，乡镇企业4家，其他4家。乡镇企业入选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名单，标志着试点突破了国有制的范围。经过改革与发展，企业集团已逐步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成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产业组织。

#### daxing yinyue wudao shishi Dongfanghong

####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song and dance epic *The East is Red*)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1964年9月，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全国各方面的艺术家开始创作这部大型音乐舞蹈作品，1964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北京、上海以及部队共70多个单位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业余合唱团共3千余人。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东方红》以“葵花向太阳”为序曲，以下依次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等六场音乐舞蹈，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壮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斗争历程。整部作品以18段朗诵诗、39首歌曲，以及表演唱、舞蹈、歌舞等35个片断，37个不同的场景组成。场面恢弘、气势磅礴。集中表现了中国音乐和舞蹈艺术的成就。

#### Dayawan Hedianzhan

**大亚湾核电站** (Daya Harbor Nuc-

lear Power Plant) 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部大亚湾畔大坑村。由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并组成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

电站范围 198 万平方米,厂区占地 63.5 万平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 2 台 900 兆千瓦,总规模为 180 万千瓦,电站反应堆采用 2 个 900 兆瓦压水堆。工程于 1982~1984 年 4 月开始筹备,1986 年 8 月进行土建基础开挖。1990 年 11 月中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 9 个国家对大亚湾核电站进行运行前安全评审。1993 年 5 月装首炉核燃料,7 月达到临界,8 月并网,12 月投入商业运行。整个电站建设在技术、装备、管理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电站核岛设备由法国法马通公司供应,常规岛设备由英国通用电器公司供应,工程服务包括总体设计和建造的总体技术责任由法国电力公司承担。美国柏克德公司承担核电工程质量保证顾问。

核电站年发电量可达 100 亿~126 亿千瓦小时,按照合同规定,投产后 20 年内分别以 70% 的电力输往香港,30% 的电力输往广东。

dayang kuangchan ziyuan kantan kaifa

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prospecting and exploitation of oceanic mineral resources)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多次进行了大洋矿产资源调查。特别是 1983 年以后,中国积极开展了大洋多金属资源调查研究活动,先后在太平洋赤道水域、中太平洋海盆和东北太平洋海盆进行了数十个航次的调查,取得了大量数据、资料和样品,圈出了 30 多万平方公里的远景矿区。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并于 1990 年 8 月 22 日向联合国海底筹委会提出矿区申请。1991 年 3 月 5 日,联合国海底筹委会批准了中国的矿区申请,将其中 15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分配给中国作为开辟区,成为继法、日、苏联和印度之后的第五个登记的国际海底开发先驱投资者。此后,中国大洋协会积极组织协调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研究开发活动,至 1998 年底,对中国登记的多金属资源开辟区共进行了 9 个航次的海上作业。在此基础上,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要求,最终在东北太平洋克拉

里昂—克林帕顿区获得 7.5 万平方公里享有专属勘探和优先开采权利的多金属结核资源专属勘探开发区。

da yuejin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

沿革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后期,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1957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内对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 1956 年提出的反冒进决策产生了分歧意见。在 1957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批评了反冒进。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更为严厉地批评“反冒进”,称之为“右倾”,使 6 亿人民泄了气。同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 月 1 日至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58 年的过高的经济计划指标。3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3 月 9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远高于人大已通过的已通过的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样,在经济建设中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脱离实际,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内容 这次“大跃进”,以农业中的严重浮夸和工业中的全民大办钢铁为主要内容。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在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农业“大跃进”自此开始。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全国动员 6000 多万劳力投入冬季农业生产高潮。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通过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 1958 年计划指标,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一个月前人大确定的 6.1% 提高到 16.2%,粮食由 3920 亿斤增加到 4316 亿斤。这些本已过高的指标到了省、地、县被层层拔高,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发生。各地不断爆出农作物产量“卫星”上天、“元帅”升帐的新闻,诸如小麦亩产 7000 斤、水稻亩产 36 000 斤等。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切实际

地认为: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 6000 亿~70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 1000 斤左右;棉花将达到 7000 万担左右,比上年增产 1 倍以上;到 1959 年粮食产量达到 8000 亿~10 000 亿斤,1962 年达到 13 000 亿~15 000 亿斤;粮食、棉花的产量将提前 8 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基于这种盲目的估计,会议决定全国和地方把注意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上来。于是出现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钢产量要比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为完成这个难以实现的钢铁翻番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决定,并提出采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现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针。当时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却从农业战线上抽调 5000 万劳动力搞土法冶炼。城市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至街道居民也支起炉灶大炼钢铁。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1958 年底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 1070 万吨钢的任务胜利完成;12 月 31 日又宣布全年累计钢产量为 1108 万吨,生铁产量为 1369 万吨。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 800 万吨,其余 300 万吨基本上是无实际使用价值的土钢;在 1369 万吨生铁产量中合格的也只有 800 万吨。上述一系列做法,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急剧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部门工业,影响了农业生产,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7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并对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 1959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一些原确定缩减的项目重新上马,经庐山会议调整过的经济计划又一一加码调了上去,一场新的大跃进又发动起来。具体表现,(1)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又大搞高指标;(2)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又加快

过渡。“共产风”、“过渡风”、“浮夸风”、“瞎指挥风”重新盛行。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场始于1958年、1959年继续进行的“大跃进”运动才告结束。

后果 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1)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 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3) 工业交通部门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4) 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这些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生活必需品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

#### Dai Ailian

**戴爱莲** (1916~ ) 舞蹈艺术家。女。祖籍广东新会。1916年5月10日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岁开始学习舞蹈。1931年到英国学习芭蕾舞，奠定了良好的舞蹈创作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先在国外参加义演，为救亡活动筹集资金。1940年回国，参加抗日宣传演出，创作了《游击队的故事》等舞蹈。在重庆等地培养舞蹈人才，普及民间舞蹈。并首次将少数民族舞蹈搬上舞台。1947年后，在上海乐舞学校、国立师范学院、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华北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芭蕾舞团团长，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等职。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舞蹈理事会副主席。是中国新舞蹈的开创人之一。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和第六、七、八届常委，民盟第六届中央常委。演出和创作代表作有：《人民胜利万岁》、《建设祖国》、《和平鸽》、《荷花舞》等。多次出国访问交流，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将她的雕塑头像陈列在学院，表彰她的贡献。

#### Dangdai Zhongguo congshu

《当代中国》丛书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各行业领域专史和地方史大型丛书。分部门(行业)卷、专题卷、地方卷、专题综合卷等类别，叙述和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领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道路、历史贡献和基本经验。陆续成书于20世纪80至90年代。

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同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指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邓力群、马洪、武衡担任《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1983年2月，《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正式部署丛书的编写工作。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胡乔木、薄一波作重要讲话。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问世。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4卷，此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至1998年底，共完成150卷，208册，约1亿字，3万多幅插图，印行490余万册。

作为一项规划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代中国》丛书涵盖的主要是各卷成书以前该地区、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和成就。其中部门行业各卷包容了国家政法社会生活，国民经济领域，科技文教，对外交往和国防军事等方面。对各项事业的阐释，既有纵向的发展历程，也给予横向拓展，全方位地勾勒出事业的概貌。各省、市、自治区卷是本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有概述，更有国计民生各专业门类的发展状况；有些地方卷还记述下属市、地区的发展情况。专题综合卷所阐述的是对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的某些专门领域或重大历史过程，如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的人口等。

《当代中国》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由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撰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

#### Dang he Guojia Lingdao Zhidu de Gaige

####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Reforms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现行体制中的各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8月31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

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在谈到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时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损失。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讲话还指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几项重大改革：修改宪法，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讲话最后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这篇讲话是指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Deng Jiaxian

**邓稼先** (1924~1986) 物理学家。安徽怀宁人。1924年6月25日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回国，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易名为第九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后改为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副院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研究员、院长，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部学部委员。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1958年后组织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组织领导了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的研究，组织领导和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与试验工作。70年代后，在组织领导与规划中国新的核武器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主要参加者，获1982年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6年获两项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和1989年又获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6年7月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Deng Liqun

**邓力群** (1915~ )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南桂东人。1915年11月27日生。1935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肄业后，任北平学联执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长、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干事。1937年到延安，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务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等职。1945年后历任中共榆树县委书记、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巡视员、东北财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949年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受中央委派去新疆，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第一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50年代末60年代初，参加毛泽东组织的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活动，为中央整理了毛泽东的有关批注和谈话记录。“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后到“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予以坚决批判。1977年后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积极表态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参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活动。1980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具体负责人之一。1990年后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和撰写。主编《当代中国丛书》（150卷）、《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倡议并组织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论著收入《邓力群文集》（3卷）。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1904~1997)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

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

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

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3卷)。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

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Deng Xiaoping disanci fuchu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Deng Xiaoping's third return) 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工作，第三次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在1975年冬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受到批判，在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中，他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继“文化大革命”前期被打倒、1973年复出之后，又一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叶剑英最先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华国锋等以“两个凡是”加以拖延和阻挠。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未被立即采纳。同年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在信中，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准确的、完整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上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Deng Xiaoping fangwen Meiguo

**邓小平访问美国** (Deng Xiaoping's visi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美国。

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他说，用什么方

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推荐书目

官力著：《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2。

Deng Xiaoping fuchu

**邓小平复出** (Deng Xiaoping's return)

1973年，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并逐步担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1969年10月下放江西劳动。1972年8月，毛泽东对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作出批示，肯定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经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多方努力，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小平于1973年春返回北京，并于4月12日公开参加外事活动。此后，主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处理党、政、军事务。1973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年底，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行追任）、中央军委委员。邓小平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Deng Xiaoping Lilun

**邓小平理论** (Deng Xiaoping Theory)

即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决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增写进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党章中，成为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指导思想，并增写进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的序言中。

**产生的根据** 产生邓小平理论的根据可分为现实根据、历史根据、时代根据3个方面。

**现实根据** 邓小平理论，是在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的进程中，以这一转折所开辟的新时期新道路上的实践为源泉和基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实践的总结。

**历史根据**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总结1949年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的经验。纠正50年代后期起，中国经历严重的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困境的错误。肯定毛泽东逝世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主持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重新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任务，为实现历史转折准备前提的历史贡献。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在政治和理论上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拨毛泽东晚年错误之乱，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指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左倾”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区别开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对1949年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综合，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的综合，是邓小平理

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时代和国际根据**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时代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世界变革和国际竞争中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对世界局势大转折提供的伴随严峻挑战的历史机遇，进行科学判断的成果。这些新判断是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的根据，是中国的国内路线和战略调整的根据，是判定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根据，是用新的思想、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经历了如下过程：

**形成前的直接酝酿**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时全面整顿，这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是后来拨乱反正的一个预演、改革的一个预演。这个进程随即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

**开始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标志。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大框架开始形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政治保证论开始提出。

**形成主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农村的包产到户和沿海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起步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为中共十二大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纲领。至此，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邓小平理论形成主题，即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宣布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形成轮廓** 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包括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十二届三中全

会形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理论上的两大突破，成为全面改革深入发展的理论指导。在全面改革的逐步深入中，邓小平理论形成轮廓。

**形成体系** 中共十三大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面对这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即国内国外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发展机遇论和台阶式发展战略论，并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奠定了基础。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从九个方面作了系统概括，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

**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 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同“毛泽东思想”相比拟的理论概念，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理论精髓和根本问题、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时代精神和革命风格。邓小平理论通过十五大写进党章。

**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是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它是在个人迷信极度发展和“两个凡是”承其余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受到严重损害、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社会主义前进遇到严重阻碍的情况下，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权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它既尊重和继承前人的创造，又敢于突破陈规，敢于纠正前人的错误，敢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和未曾遇到的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基础，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各方面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不断推进的全过程。

**邓小平理论的关键是创新** 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过去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根本问题，从总结历史和开拓新路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上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挥、发展和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科学的理论观点。包括：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分三步走，先解决温饱、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强调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为目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取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按照这个原则，已经解决了香港回归的问题，即将解决澳门回归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必将得到解决。

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Deng Xiaoping shicha nanfang

**邓小平视察南方** (Deng Xiaoping's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outh)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在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谈话。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Deng Xiaoping Wenxuan

**《邓小平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重要著作集。共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出版社和外

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种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日、俄、德、西班牙等外文本。收入邓小平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述共222篇，约85万字。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的卓越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一直主持一个战略地区的工作。1952年到中央工作。195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协助主席、副主席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所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思想，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

《邓小平文选》于1983年7月出版1975~1982年卷，1989年5月出版1938~1965年卷。1994年10月，这两卷经增补修订，出第二版，1938~1965年卷改称第一卷，1975~1982年卷改称第二卷。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邓小平文选》所收著作均经作者审定。

第一卷收入邓小平在1938~1965年这段时间的重要著作共43篇。这是他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著作。其中抗日战争时期9篇。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中，论述了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及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作准备，以坚持敌后斗争去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解放战争时期7篇，包括《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文章体现了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以及按照中央指示，从新区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制定的一整套适合新区土地改革和整党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7年的前3年，邓小平主持西南地区的工作。这一时期的著作7篇，内容涉及经济、新闻、统战、土改、镇反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一文提出，要反对党在夺取政权后产生的骄傲自满倾向，以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蜕化腐朽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做好民族工作的具有原则性的意见。1952年到中央工作，至1965年，共收著作20篇。这一时期的文章，反映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在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等文中，强调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任务，搞建设的指导思想要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生产关系采取的形式，要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根据群众的意愿。他特别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他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要经常警戒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接受党内外监督。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

第二卷收入1975~1982年这段时间的著作共60篇。这是邓小平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和引导改革开放进入起步阶段的著作。1975年的著作9篇。这一年是党同“四人帮”进行艰苦斗争的一年，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军队要整顿》、《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方面都要整顿》等文中，反映了他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狠抓各项工作的整顿，为消除动乱，促进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正确政策。1977~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著作16篇。这时党的工作正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冲破教条主义和“左”的束缚，首先在科学教育战线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从各方面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准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

二大召开前，共收著作 35 篇。这段时间的文章中，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关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专心致志地搞现代化建设；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提出；关于在 20 世纪末实现小康；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等等。重要著作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对外政策》等。

第三卷是邓小平 1982 年 9 月至 1992 年 2 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 119 篇。作者亲自指导编辑工作。1982~1992 年是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 10 年，是经历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局势巨大变动的 10 年。这一卷文选记录了邓小平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日益丰富、完善和继续发展的新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为开卷篇，文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书的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终卷篇，也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收入此卷的重要著作还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等。这一卷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关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判断标准；关于 20 世纪最后 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关于建立经济特区，把特区作为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对自我封闭和孤立；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设想，以及对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关于中国不允许乱，稳定压倒一切；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关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把共产党内部搞好；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等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最富独创性的著作，是邓小平理论的奠基之作。

Deng Xiaoping zhuchi de 1975 nian zhengdun

邓小平主持的 1975 年整顿 (Deng Xiaoping-led reforms in 1975)

“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5 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力量为扭转错误局面、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而进行的整顿工作。

1975 年初，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对各个领域进行了整顿。

过程 整顿工作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铁路整顿成为突破口。由于“四人帮”及“文革”的破坏，铁路系统局势十分严峻，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直接影响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3 月 5 日，邓小平到会讲话。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央作出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深入到一些单位进行部署，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帮派头头。1975 年 2 月到 4 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 20 个铁路局中有 19 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 53 700 多车，比 2 月份平均日装车多 1 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 17 800 多车，是自 1970 年起，5 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

接着整顿钢铁工业。1975 年前 4 个月，全国钢铁生产没有完成任务，拖欠钢产量 195 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欠产尤其严重。5 月 8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强调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针对“四人帮”只讲毛泽东要求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的情况，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结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着、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 月 4 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后两项指示提高到“纲”的高度，在当时被简称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在铁路、钢铁部门整顿的同时，工业交通其他部门也开始了整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军队整顿正式开展。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决不允许派性存在。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叶剑英主持对军队 25 个大单

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同时，对驻京及北京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这些措施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科技工作也开始了整顿。6月3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担负着国防科研任务的七机部问题的报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进行整顿。7月，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此前，邓小平还派人着手恢复和整顿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

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7月，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现状表示不满，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抓住机会促进文艺调整，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还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在他的支持下，国务院组织人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反映情况的信件和材料。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一批被江青等人作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话剧等作品陆续开禁。

在教育战线，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的意见，明确否认了17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提法，教育部的机关刊物根据邓小平关于“要后继有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的谈话精神，连续发表文章阐述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农业方面，在9月到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大规模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说，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中国建设的后腿。这表达了要求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但是，由于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被迫于11月中断，农村整顿没有正式开展。

在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整顿党组织和整顿思想的任务。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作为指导整顿的纲领。

效果 整顿后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

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最初是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的。但是随着整顿的深入，他又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是在1975年年底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尽管如此，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工作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的最高峰，为以后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思想准备。

Deng Yingchao

**邓颖超**（1904～1992） 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女。河南光山人，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1910年随母迁居天津，后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演讲队队长，并与周恩来等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1925年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曾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和女星社，兴办妇女文化教育，宣传爱国思想，1924年初，参加并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曾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发起组织了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支援上海“五卅”斗争。同年8月，调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年底，与周恩来结婚。1926年，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5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1月返回上海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

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3月，参与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夏，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与蔡畅等人以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名义致电国际民主妇联，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内战，并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6年1月，以中共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11月，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曾主持起草《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等文件。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后历任第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1987年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1991年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92年7月11日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颖超文集》。

Deng Zhaoxiang

**邓兆祥**（1903～1998） 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广东高要（今为肇庆市）人。1903年4月1日生。1914年起先后在黄埔海军学校、吴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及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1923～1929年在北洋海军军舰任少尉、中尉，东北海军第一战队中尉副官，国民党海军军舰少校副舰长。

1930~1934年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鱼雷航海信号枪炮学校学习。回国后任国民党海军军舰少校枪炮长，海军水鱼雷营少校营长，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中校参谋，贵州桐梓海军学校训育主任，长治舰舰长，重庆号巡洋舰上校舰长。1949年3月在上海吴淞口率部起义后，历任解放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安东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8月6日逝世。

Deng Zihui

**邓子恢** (1896~1972) 原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1896年8月17日生。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1923年9月，创办《岩声》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闽西起义，任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0年8月，任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任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春，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1949年3月，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同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

长，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1955年，因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受到批判；1962年，因探索“包产到户”再次受到批判，于1965年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2年12月10日逝世。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1981年，中共中央为邓子恢曾受到的两次批判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difang renmin zhengfu

**地方人民政府**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包括全国省、县、乡(镇)三级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大行政区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为地方最高一级人民政府。1954年6月大行政区撤消后，省、直辖市、自治区上升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人民政府的建立有了宪法依据：①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②省分为县、市、自治州；③县、自治县分为乡、镇。从此，省、县、乡(镇)成为正式的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均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为实级；省、县、乡之外另设专区、区，分别为省政府或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为虚级。

省人民政府是最高一级地方政府，由省长1人、副省长若干人组成，下设办公厅及民政、公安、司法、监察、计划、财政、粮食、工业、商业、交通、农业、水利、劳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运动等厅、局或委员会。民族、华侨事务较多的省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或华侨事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由县长1人、副县长若干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及民政、公安、财政、粮食、税务、工商、农林、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科或局。乡(镇)人民政府为地方最基层的政权，由乡长(镇长)1人、副乡长(副镇长)若干人组成，下设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财粮、文化教育、调解等工作委员会。

各省划分若干专区，设专员公署，由省人民政府直接委任，专员公署由专员1人、副专员若干人组成，下设秘书室，以及民政、财政、教育、卫生、农业、水利各科。各县划分若干区设区公所，由县人民政府直接委任，由区长1人、副区长若干人组成，下设干事数人。

市作为地方一级人民政府大体分为：①直辖市，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地位相当于省；②省辖市，地位相当于专区；③隶属于专区的市，地位相当于县。

dixia heshiyan chenggong

**地下核试验成功** (success of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1969年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地下核试验是指把核装置埋设在地下一定深度进行的核爆炸试验。分平洞地下核试验和竖井地下核试验两种方式。地下核试验与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相比较，技术要求高、工程量大、投资多，但能将放射性产物控制在地下，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取得各种反应产物的样品，且能靠近核弹进行各种反应过程和参数的物理诊断测量，是研究、提高核武器理论和设计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于1969年9月23日零时15分取得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1978年10月14日9时取得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核试验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dizhi shiye

**地质事业** (geological sector)

提高国土地质研究程度，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所需的地质勘查成果，以及各类地质矿产资源的基础性事业。中国的地质事业自1949~1999年的50年间，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不少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工作，是外国人做的。直至19世纪末，中国没有自己的地质人才和地质管理、调查机构，更没有中国人自己进行的地质工作。1894年在南京创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曾开设地质学和矿物学课程，但没有培养出地质人才进行真正的地质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工作管理机构。1913年，地质科改为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规划和总管全国地质调查工作，同时设立以培养地质人才为宗旨的地质研究所。1916年，从地质研究所毕业、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地质人员参加工作，结束了中国国土只有外国人进行地质调查的历史。直到1949年，地质工作者在逆境中工作，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尤其是在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研究等方面。

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地质工作在前人基础上进入到现代阶段，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

**50年历程** 1949年10月以来，中国的地质工作经历了转变发展和繁荣发展两个时期。

**转变发展时期** 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经过时间不长的恢复,于1952年11月17日~12月8日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地质工作必须进行大转变,大批训练地质人才,大批地质人员去野外工作,为新建企业的设计提供矿产储量,为缺乏资源的地区寻找矿藏,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提供地质勘察资料等。这次会议是地质工作转变、发展的标志,从此中国地质工作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轨道。

1953~1957年,中国的地质工作走上初步发展的道路。为鞍山、包头、大冶三大钢铁基地所需的矿产资源,提供了足够的储量。为建设大型煤矿基地,勘探到了足够的资源。原计划要求对19种矿产进行地勘,取得进行工业设计所需的储量。实际结果是对74种矿产进行了勘査,其中63种获得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超过原计划的2倍多。各种矿产储量比1949年前的估计储量高3~4倍,例如铜储量增14倍,石油储量增32.5倍,铅储量增50倍。还在众多地区和城市进行了地下水供水勘察,提供了工业和居民用水的地下水资源,矿区用水和排水所需的地质资料。为一些流域开发,为铁路、桥梁、海港、工厂、水库和国防工程建设进行了工程地质勘察。建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原为北京地质学院)等多所高等学院,在全国重点大学建立了10多个地质学系,还建立了数十所地质学校、技工学校 and 一批研究所,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8~1999年是曲折中发展的20年。主要有两次大干扰:第一次是“大跃进”,搞浮夸风、共产风,批“技术挂帅”、“质量第一”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造成探明储量不实、勘探工程质量不好等局面;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其危害程度大、时间长,有些危害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乃至下个世纪。但是,在地质战线广大员工努力下,这20年中国的地质事业仍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①这是中国石油勘探突破“陆相地层无油”或“陆相地层无大油”的传统理论,获得大面积油气储量时期,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南阳油田、任丘油田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现和开发的;还发现四川中坝油气田、中原油田、苏北油田、柴达木油田、渤海含油盆地等。从而,使中国石油产量从50年代初年产12万吨,到1959年达

300万吨;1963年则达648万吨,基本实现自给;1978年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家之一。

②由于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又中断对铀矿勘探工作的援助,中国铀矿等勘探工作走上完全靠自己力量的发展时期。1958年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第一批工业铀储量,到1960年已提交8个开采基地,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到70年代末,已探明各种类型的铀矿100多处,仅广东地质局七〇五队从1967~1979年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交相当一个大中型铀矿的储量。

③全国煤炭储量至1979年为6000多亿吨,比1957年时的370多亿吨增长15倍多。

④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的资源勘查都获得重大突破。例如1958年发现最终储量超过1亿吨的广西大新下雷锰矿;六七十年代发现中国至今最大最富的藏南铬铁矿产地;1958~1967年发现和探明世界第二个特大型硫化镍铜矿——金川镍矿,从此结束中国贫镍的历史;六七十年代查明,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是世界上罕见的特大型稀有、稀土金属矿区,含有70多种元素,114种矿物;50年代末至60年代后期,发现和探明世界上罕见的大型含钾盐湖——察尔汗盐湖,等等。

⑤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区域地质调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地质勘查工作。

**繁荣发展时期** 1979~1999年。这是中国地质工作获全面发展、且出现繁荣时期,具体表现为:

①新探明的矿产储量全面丰收,据不完全统计,1983~1997年共新发现矿产地4175处。例如,在四川石棉县发现世界上罕见的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碲原生矿;于贵州兴仁县发现在中国和世界都是首次发现的红铊矿;在湖北恩施市双河第一次发现中国独立的硒矿床;在青藏高原盐湖研究中,首次发现新型的铯矿床,而且发现世界级规模的铯矿带,盐湖中铯、锂、硼资源分别占世界已知资源量的25%、12%、10%。

②能源资源的增长突出。东部石油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现期,大庆、胜利、辽河、中原、大港、华北等油田的油气资源均有新发现,又先后发现江苏油田、冀东油田、吉林油田等;西部找油获得重大突破,发现塔里木油田、准噶尔油田、吐鲁番油田,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二连和鄂尔多斯、青海柴达木和尕斯库勒、川西、川东、川北等都发现有石油、天然

气。1999年4月在塔里木发现中国最大天然气田——克拉苏气田,探明和预测储量达5679亿立方米,为世界级大气田之一。海洋油气资源亦有大的突破。煤炭探明储量从1979年的6000亿吨到90年代前期的10024.9亿吨,增长67%。

③金、银、铜等重要紧缺矿产勘查获得重大突破,发现一批大型或特大型金矿,仅“八五”期间(1991~1995)新增金储量1900吨、银26000吨。中国黄金的储量和产量均已进入世界主要金矿资源国和产金国之列。

④开辟了一系列新领域。例如,海底油气资源于80年代相继发现渤海、南海、东海、台湾浅滩、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7个大型含油气盆地,并在南海北部大陆架打出一批高产油气井、找到一批油气田,北部湾找到5个油田,莺歌海打出2口日产120万方和180万方的高产气井。90年代又在东海等海域多处找到石油,在南沙群岛海底也找到石油,而且储量大,是世界已知的四大海底油田之一。1996年中国海上原油产量为1500多万吨、天然气产量为27亿立方米。截止1997年底,在中国管辖的海域已知有51个沉积盆地、油气资源量310亿吨,分别占中国石油、天然气总量的20%和30%;占世界已知海底石油总量的13%。

⑤“西北找水计划”取得重大进展。在干旱的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沙漠边缘地区、宁夏固原县和同心县等苦水区找到大片地下淡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大面积可供直接饮用的地下水,等等。

⑥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区域地质调查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例如,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地面沉降基本得到控制,为京九铁路、长江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等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地质调查等。

**体制沿革** 1950年8月25日,成立中国全国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组织指导了1951年对全国各地区的地质普查等工作,包括对西藏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地质调查。1952年8月7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指导委员会相应撤销。同时,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也各自加强地质勘探机构和地质研究机构,与地质部一起规划、领导了中国的地质工作。1970年6月,地质部被撤销,改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地质局;同时其他部委(含科学院)地质机构也相继被撤销或合并。1975年9月,国家计委地质局改为国家地质总

局。197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国家地质总局相应撤销。1982年5月,地质部增加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能,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同时冶金部、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等部委也相继恢复和组建地质工作机构。1998年,根据国务院精简机构和政企分离的原则,地质矿产部的职能由以找矿为主转向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为主等原因,于3月与国家土地局、国家海洋局等合并组建为国土资源部。

**丰硕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事业在1949~1999年50年间,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①矿产资源勘查成就显著。1949年全国勘查的矿产仅18种,截至90年代后期中国已勘查发现矿产160多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约有150种,为1949年8~9倍;探明储量为世界第一的有稀土、石膏、钛、钽、钨、锑、锡、膨润土、芒硝、重晶石、菱铁矿、石墨等12种,钒、钼、煤等7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二,还有铁、锰、镍、铜、汞等20多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发现和探明的矿产地20多万处;除建筑用料外,全国各种矿石采掘量20多亿吨,矿业开发总规模居世界第3位;目前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亦位居世界第3位。中国已是世界上矿种齐全、储量丰富、矿床类型众多的少数国家之一,从1949年的贫矿国已改变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

②大地构造各种学说涌现。50年中,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黄汲清创建了多旋回大地构造演化理论,陈国达提出了地洼学说,张伯声提出了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张文佑创立了断块构造学说,并都出版了高水平专著。这些学说和著作都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地质构造、地壳运动、指导找矿,开辟了一系列新途径,创造了一系列新方法。

③矿物学研究跨入国际先进行列。50年中,从描述矿物学进展到基础矿物学、理论矿物学,开辟了成因矿物学,实验矿物学、结构矿物学、光性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工艺矿物学等领域。从1958年中国发现第一个新矿物——香花石以来,至1985年已发现160多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科学家提出的陆相成油理论是正确的,而且直至20世纪末世界上大型陆相油田惟在中国有发现。中国学者还提出一系列经实践证明是有价值的成矿理论,包括碎屑岩类成矿理论,矽卡岩成矿理论,外生矿床陆源汲取

成矿理论,多成因、多来源、多阶段成矿理论,层控矿床理论,多因复成矿床理论,动力岩成矿理论,铁矿成矿系列理论,锰矿成矿理论,粒向溶液成矿理论等。

④地球物理学蓬勃开展。50年中,地球物理学研究基本上从无到有,并蓬勃发展,不但为国家经济建设寻找到了大量矿产资源,而且为海军、航空航天提供各种数据。70年代以来,已程度不同地预报辽宁海城地震(1975)、云南龙陵地震和四川松潘地震(1976)、云南澜沧县地震(1988)、山西大同地震(1989)、河北张家口地震(1997)等,减少了人员伤亡,减轻了财产损失,并表明中国对地震的地球物理学研究处于世界前列。在实践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和新见解,例如地磁低点位移预报地震方法、大地电场地震前兆过滤电势机制、地质-地球物理模型、第一代地球物理勘探理论、第二代地球物理勘探理论等。

⑤地球化学迅速发展。地球化学在中国是1950年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至90年代末在寻找矿产资源、研究地震防灾、农业植保、环境保护、人类健康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例如攀枝花铁钛矿床物质研究、新疆东部金矿成矿规律地球化学研究、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架石油化学研究等。研究范围从地表深入地壳、地幔,从陆地延伸到海洋,从地球扩展到宇宙空间。在矿床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宇宙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元素地球化学、天体地球化学等方面均从无到有,并获得可喜成就。

⑥地层古生物研究工作空前发展。50年中开拓了微体古生物学、超微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孢粉学、古生物化学、生物地球化学、生物探矿学、生物地层学、生态地层学等领域。新发现不断涌现,例如1984年发现世界上罕见的澄江动物群,1985年在世界上首次发现6亿年前的古被囊类动物化石,1997年发现距今18亿年世界上最古老的多细胞藻类化石,1998年发现世界上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化石,1999年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有花植物化石。在浙江常山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晚奥陶纪剖面,1998年经国际批准为世界标准剖面,取代原来英国的剖面,这是全亚洲的第一个世界标准剖面。还有关于前寒武系与寒武系分界线、二叠系与三叠系分界线等研究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⑦新学科、新领域不断涌现。除上述新学科、新领域外,还有一系列全新的研究领域或学科。例如同位素地质学、核地

质学、地球动力学、岩石圈动力学、深部地质学、宇宙地质学、数量地质学等。“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已于1997年6月正式列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8月选定江苏东海县为该项目的第一个实施地点,项目正在实施。对深海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等矿产的研究和开发已起步,自1991年中国成为继法、日、俄、印之后的第5个海底开发先驱投资者,获15万平方千米的海底矿区开发权,之后进行了大量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工作。1999年3月,其中一半已成为中国专属矿区,为中国大规模参与海底矿产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⑧基础地质工作成果累累。例如,已完成全国陆地1:100万和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航空磁测、区域重力调查等也基本覆盖全国陆地面积,查明了全国地下水资源的基本特征和分布规律,等等。

⑨矿产资源管理得到加强,并走上法制轨道。其标志是1996年4月3日全国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并于同年8月29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7年1月1日起实施。

**存在问题** 中国虽是世界第三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然而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还不到世界平均的50%,仅居世界第80位。从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分析也有许多自身的不足:①储量具有优势的矿产,除煤以外,绝大部分是国民经济中用量不大的矿产。②国民经济中用量大的矿产,大都储量不足或可利用储量不足。③大宗矿产贫矿多,富矿少;共生矿、伴生矿多,增加了采矿和冶炼的难度,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做到各种元素充分地利用,选矿成本高,资源浪费大。④中小型矿床偏多,大型矿床不多,不便于机械化开采,形不成规模效益。⑤矿产分布不平均,据1996年统计,煤炭资源80%在北方,西南占10%,南方八省仅占2%;石油资源85%在长江以北;天然气资源67%在四川。这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和利用难度,而且使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交通运输条件的严格制约。

中国有90%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材料都依赖于矿产资源。而占中国矿产消耗量达90%的45种主要矿产,据统计在21世纪初将有半数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2010年后则绝大多数的探明储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①亟需大力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加大投入,尽快实现找矿工作的再突破。从1996年起,已全面启动“矿产勘查跨世纪工程”,3年多来发

现了数十处重要矿产；制订了走向海洋，向深海要新资源战略等。②实行“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把节约矿产资源提高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切切实实地加以实施。③坚决贯彻《矿产资源法》，把矿产勘察开发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做到依法办矿，科学采矿，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实现经济效益、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④加强科技试验研究，开展科技攻关，走人造富矿的道路，尽最大努力提高采矿、选矿、冶炼的回收率。⑤加强宣传教育，使全社会了解中国的矿情，树立资源危机意识，把十分珍惜、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Dibage Wunianjihua

**第八个五年计划** (Eighth Five-Year Plan) 1991~199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简称“八五”计划。

**制定** 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虽然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市场无序、调控乏力、秩序混乱等现象，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根据该建议的精神，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经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付诸实施。

**基本内容** “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改善；充分挖掘潜力，积极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有效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健全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推进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物资、商业、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

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

“八五”计划要求，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按1990年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农业、工业的总产值分别为8780亿元和32700亿元，五年内分别增长33.6%、18.9%和37.1%，年均分别增长6%、3.5%和6.5%；第三产业增长53.9%，年均递增9%；国民收入五年内增长27.6%，年均增长5%；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每年递增2%，农民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3.5%。

**效果**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圆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迅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基本稳定；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95年就已提前完成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

#### 推荐书目

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北京，1996。

马洪等主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199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97。

Diba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5次会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30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9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3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罗干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说明》，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其他有关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冲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刘复之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荣毅仁为副主席；选举乔石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秦基伟、李锡铭、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甘苦、李沛瑶、吴阶平等19人为副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任命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副总理，李铁映、迟浩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佩云、罗干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会议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思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通过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

第二次会议于1994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与199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预算法》，通过了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田纪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思卿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3月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教育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田纪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张思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5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通过了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田纪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思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陈锦华作的《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刑法》、《国防法》,通过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关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田纪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思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布赫作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钱其琛作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Di'erci Zhengzhou Huiyi

**第二次郑州会议** (Second Zhengzhou Conference)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中央主席毛泽东讲话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

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采取三级所有、三级核算、以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人与人之间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这些方针被概括为14句话,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会后,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展开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Di'erge Wunian Jihua

**第二个五年计划** (Second Five-Year Plan) 1958~196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简称“二五”计划。

1956年6月,周恩来根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始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和研究国家计委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对部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压缩和调整。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

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一倍左右;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将增长35%左右。

从1958年开始,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致使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仅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而且还根据“大跃进”的需要修改了原定计划,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建设任务和过高的奋斗目标。结果,“二五”计划期间农业、工业生产遭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0.4%,粮、棉产量都低于1957年产量。并连续3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见三年严重经济困难)。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不得不被迫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作为从“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二五”计划向“三五”计划过渡阶段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6年起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

推荐书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Di'er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59年4月至1964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4次会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137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14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



议。会议还作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程潜、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等16人为副委员长，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等16人为副总理，并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会议还决定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次会议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召开的，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会议批准了脱离实际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号召各条战线努力实现新的大跃进，给后来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二次会议于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74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谭震林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仍然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经济形势，再次批准了脱离实际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号召继续“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进一步的困难，到1960年冬不得不对经济计划进行调整。

第三次会议于1962年3月27日至4月1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197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64位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还批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和相应的国家预算。这次会议距离上次会议相隔将近两年时间，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国民经

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对于克服国民经济困难，发展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四次会议于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12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1963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批准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1963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议，决定第三届的代表名额比第二届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多，以适应国家大、人口多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Di'ershiliujie Shijie Pinpangqiu Jinqiaosai

##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26th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1961年4月4日至14日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规模的锦标赛。参加这届锦标赛的有各大洲32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乒乓球队的组成人员有领队张之槐，副领队李文耀，教练员为梁焯耀、傅其芳、姜永宁、陆汉俊、鍾汝楷，男队员36名，女队员34名。中国运动员共夺得3项冠军、4个亚军和8个第三名，结束了日本称雄世界乒坛的历史。中国获胜项目如下：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亚军李富荣、第三名徐寅生、张燮林；男子双打第三名庄则栋、李富荣，周兰荪、王家声；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第三名王健；女子双打亚军邱钟惠、孙梅英，第三名胡克明、王健，韩玉珍、梁丽珍；混合双打亚军李富荣、韩玉珍，第三名王传耀、孙梅英。

为办好这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工作班子，黄中副主任负责世乒赛的筹备组织工作，荣高棠负责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荣高棠调集包括竞赛司司长李梦华、球类司司长张之槐和群众体育司司长、全国乒乓球协会主席陈先在内的干部组成一个小组到乒乓球队蹲点，实行领导、教练员与运动员三结合，为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为了主办这届世界锦标赛，在北京修建了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

Dijiuge Wunianjihua

## 第九个五年计划 (Ninth Five-Year Plan)

1996~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简称“九五”计划。

制定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未来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 and 指导方针、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国务院根据该建议的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经过讨论和审查，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基本内容 “九五”期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顺经济关系，推进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为21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纲要》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①经济体制由传统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②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效果 “九五”计划执行头三年效果良好，计划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8%的年均增长率基本实现。1996年增长率是9.7%，1997年是8.8%。1998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上半年增长率仍达7%。尽管7~9月份长江、嫩江全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经济损失惨重，但国家通过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刺激内需，及时调整出口战略，使1998年全年仍达到7.8%的增长率，市场也有启动的迹象。在最后两年中，年均只要达到7.3%的增长率，就能完成“九五”期间年均增长8%的任务。

评价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一个中长期计划，它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战略。它突出了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提出的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中存在的指令性、规定性指标多

的状况，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同时，它还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全面性、科学性是“九五”计划与以往计划不同的特点。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Dijiu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98年3月开始。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1999年3月已举行2次会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至1999年3月已举行7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98年3月5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陈锦华作的《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刘仲藜作的《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胡锦涛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田纪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思卿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副主席；选举李鹏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田纪云、谢非、姜春云、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佩云、何鲁丽、周光召、成克杰、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等19人为副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任命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为副总理，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会议选举肖扬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韩杼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通过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

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5日至15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朱镕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曾培炎作的《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项怀诚作的《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合同法》，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姜春云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肖扬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韩杼滨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Diliuge Wunian Jihua

**第六个五年计划** (Sixth Five-Year Plan)

1981年至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中国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中国继“一五”计划之后又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并经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下达的五年计划。简称“六五”计划。

制定“六五”计划的编制，经历了近3年的详细调查和反复研究的过程。1980年2月13日，国务院在下发《关于拟定长期计划的通知》中，传达了关于着手制定1981~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的决定。三四月间，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1981年3月16日，国家计委根据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拟定的“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都定为4%。198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六五”计划控制数字。会议认为，拨乱反正后的头一个五年和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并要留有余地。计划指标定为4%，争取5%。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正在编制的五年计划，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安排上都要有一定的转变，要充分体现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要求，走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1982年4月至6月间，国家计委多次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六五”计划问题。七八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六五”计划草案，对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了调整。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终审议和批准了这个五年计划。

基本内容 “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计划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求得国民经济按比例地长期稳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使重工业积极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技术基础上来，积极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努力加强能源、交通、教育事业发展，把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1.7%，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到1985年，社会总产值要达到1030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8710亿元，国民收入4450亿元，财政收入1274亿元，并要把工业产品的技术标准大加提高。“六五”期间计划安排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2%，年均递增4.1%，并保持国家财政、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

效果 “六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都大大超过了计划设想的速度。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提前1年至2年实现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指标，使“六五”计划得以全面地、超额地完成。在此期间，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是在农村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初步解决了3个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日用消费品紧张问题和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问题。这些转变和成就具有历史性的深远意义。

Diliu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5次会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25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6月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84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姚依林作的《关于1983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以及杨尚昆、江华、黄火青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根据1982年宪法关于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丕显、韦国清、耿飊、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史良、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荣毅仁、叶飞、廖汉生、韩先楚、黄华等20人为副委员长，王汉斌为秘书长，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6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人选；选举郑天翔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任命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副总理，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等10人为国务委员，并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会议还根据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名，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委员。这次会议是按照1982年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会议于1984年5月15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09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宋平作的《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了《兵役法》，通过了《海南行政区建置的决定》。

第三次会议于1985年3月27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712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宋平作的《关于1984年

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经过审议，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通过了《继承法》。

第四次次会议于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87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宋平作的《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原则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义务教育法》、《外资企业法》。会议补选楚图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决定乔石为国务院副总理，宋健为国务委员，并增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五次会议于1987年3月24日至4月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31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宋平作的《关于198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陈丕显、郑天翔、杨易辰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决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有关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任免事项。

## Diqige Wunian Jihua

**第七个五年计划** (Seventh Five-Year Plan) 1986~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简称“七五”计划。

制定 1983年，国务院开始着手进行“七五”计划的拟定工作，组织有关部

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论证和预测。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国务院据此编制出“七五”计划草案。1986年4月由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并付诸实施。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计划期伊始就已制定完备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的五年计划。

基本内容 “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基本任务的要求，“七五”计划规定，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包括村以下工业为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不包括村办工业为7%）。五年计划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要求五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五年内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增长27%，平均每年增长5%，并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七五”期间的工作部署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稳定经济，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后三年，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生产建设。“七五”计划把经济建设计划和体制改革计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适应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新形势，反映了计划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具有崭新的特点。

效果 “七五”计划提出的基本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均超过计划的要求。同时，通过经济体制改

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单一的经济形式和所有制结构被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多种经济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凸现，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七五”计划的完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

**推荐书目**

国家统计局：《“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1。

**Diqi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88年3月至1993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5次会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31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92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宋平作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姚依林作的《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审查和批准了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通过了关于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省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陈丕显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郑天翔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杨易辰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副主席；选举万里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习仲勋、乌兰夫、彭冲、韦国清、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等19人为副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任命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为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秦基伟、王丙乾、宋健、王芳、邹家华、李贵鲜、陈希同、陈俊生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复之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通过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通过关于确认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通过关于确认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议。

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67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姚依林作的《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8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9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审查和批准了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了1988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9年国家预算。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深圳特区法规和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冲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刘复之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有关决议。

第三次会议于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89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和批准了198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了1989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0年国家预算。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会议听取和通过了彭冲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刘复之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通过关于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任命刘华清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通过关于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贺敬之、伍觉天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务的请求的决

议。

第四次会议于1991年3月25日至4月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90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1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通过了《民事诉讼法（试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冲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刘复之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决定任命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国务委员。

第五次会议于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作的《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了1992年国家预算。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邹家华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护法》，通过了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冲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建新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刘复之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Disange Wunian Jihua**

**第三个五年计划** (Third Five-Year Plan)

1966~197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是中国按五年计划进行的经济建设由于“大跃进”的严重困难局面被迫中断，经过三年调整恢复后，又重新开始的五年计划；也是受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的五年计划。

制定“三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到建设

三线的变化。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三五”计划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①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②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③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5月至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恶化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会议决定,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要加强三线基础工业的建设。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毛泽东又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三五”计划由原定的设想逐步解决“吃穿用”向以战备为中心转移。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三五”计划“汇报提纲”,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具体安排是,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85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2000个左右;预期到197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700~275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7%;农业递增4%~5%,工业递增8%。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这个提纲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计划,也没有付诸批准,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依据《汇报提纲》的方针安排的。

执行“三五”计划的许多重点项目从1964年底就已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966年4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认为,“三五”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指标。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国民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1967、1968年出现经济倒退,1968年甚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预计能提前完成的“三五”计划连按时完成都得不到保证。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形势稍趋安定,在加强战备口号下,“三五”计划以发动“新跃进”方式进入最后阶段。到1970年底,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三五”计划期间工

农业总产值指数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工业增长12%,农业增长2.9%。

评价“三五”计划制定过程中指导思想发生转变,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防御外侵的现实意义,从长远规划角度看也起到了改变国家工业布局不合理的作用。计划的指标安排留有较大余地,基本适合当时的国力。但是,由于中央对国际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农业、轻工业投资过少。在执行过程中,前三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丧失了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宝贵时间,是一个巨大损失。最后两年的经济跃进,一方面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动乱、坚持建设的努力;一方面暴露出“左”倾思潮影响下,用高投入追求高速度,安排基本建设过快过大,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造成了损失浪费和全国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基本建设投资“三个突破”的趋向,给以后的“四五”计划带来了隐患。

Disan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hir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64年12月至197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举行1次会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只召开33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4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谢觉哉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鼎丞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黄炎培、陈叔通、李雪峰、徐向前、杨明轩、程潜、赛福鼎·艾则孜、林枫、刘宁一、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等18人为副委员长,杨秀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决定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任命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等16人为国务院副总

理,并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次会议是在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发经济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宣布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系统总结了前些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第一次完整科学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和完成这一目标的步骤方法。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仅仅5个月,就被猝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从1966年7月7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33次会议开始,在随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仅仅保留一个名义,失去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人民委员会,逐渐被所谓“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被砸烂,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

Dishiyishi Banchan zuochuang dianli  
**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 (Inauguration of the 11th Panchan) 1995年12月8日举行的坚赞诺布继任十一世班禅的重大宗教仪式。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3天后,国务院作出《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此后由扎什伦布寺组成寻访班子,通过占卜、观湖、秘密寻访等宗教仪轨,遴选出3名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1995年11月29日,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最后认定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6岁男童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国务院于当天下午发出批复:“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年1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在第十一世班禅驻锡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庄严隆重举行。上午8时,坐床仪式在“拉让”的益格曲增殿开始。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负责主持和督察坐床典礼。国务院代表、

国务委员李铁映宣读了《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举行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的请示〉的批复》。在李铁映的照护下，在扎什伦布寺僧人高诵《坐床经》声中，6岁灵童坚赞诺布安稳地坐上了檀香木根本法床。参加坐床仪式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扎什伦布寺民管会名誉主任生钦·洛桑坚赞、第十一世班禅的经师波米·强巴洛珠和第十一世班禅的父母分坐两侧。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代表向坐在法床上的第十一世班禅行礼，敬献哈达。随后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典礼上，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颁授金册、金印，宣读册文，并宣读江泽民主席题赠扎什伦布寺的金字匾文：“护国利民”。该寺民管会名誉主任生钦、主任喇嘛次仁恭敬地接过匾文，并把金印、金册捧至法座前的供桌上。殿内掌声一片，鼓号齐鸣。随后，李铁映在典礼上发表讲话表示热烈祝贺，并与第十一世班禅互献哈达。叶小文宣布国务院向第十一世班禅赠送礼品的礼单，扎什伦布寺代表第十一世班禅向国务院回赠了礼品。最后，李铁映勉励第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继续发扬爱国爱教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推动西藏的繁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十一世班禅向李铁映表示：“感谢中央，感谢江主席、李鹏总理，感谢国务院代表。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爱国爱教。”坐床典礼于上午10时半结束。1200多名僧俗群众在扎寺“多佳”讲经大院举行了庆贺大会。国务院、西藏自治区政府、日喀则地区行署向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

#### Disige Wunian Jihua

**第四个五年计划** (Fourth Five-Year Plan) 1970~197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简称“四五”计划，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制定 “三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等严重问题，在制定“四五”计划时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要求继续跃进。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拟订“四五”计划“纲要”时提出：这是一个战备的计划，跃进的计划。到1975年，大三线地区将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各有特点，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战略后方。在全国划分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10个经济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根据毛泽东的设

想，会议要求到1975年，全国钢产量达到3500万~3800万吨；江南各省要在1972年做到煤炭自给，扭转北煤南运状况；各省、市、区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到粮食、油料自给有余；一般轻纺产品逐步做到自给。按农业人口每人平均达到一亩稳产高产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40%~50%。五年中合计基建投资1200亿~1300亿元。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这个《纲要》。1971年3月，中共中央将《纲要》的主要计划指标下发。这个起点过高的计划指标在执行中又被各地区、部门层层加码。1970年底，毛泽东指出：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然而总体跃进的指导方针并未改变。

执行 在当时条件下要达到“四五”计划的高指标，不得不借助于高投入和大会战的方式来实现。“四五”计划的头两年已造成了全国性严重后果：①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见三年经济冒进)。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过高，1971年达到34.1%，农轻重比例更趋不合理。③投资效果、劳动生产率等各种经济效益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浪费现象严重。1972年起，周恩来主持进行了两年调整。首先，压缩了“四五”计划的工业高指标，适当放慢大三线建设的进度；其次，压缩基建规模，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投资比例，增加轻工业、农业投资。经过调整，各个领域开始好转。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使经济建设再次出现严重混乱。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首先进行铁路、钢铁工业的整顿，并以此带动全国工业的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的47.4%，年底“四五”计划的多数指标基本上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4.5%。“四五”计划期间一批重要建设项目取得成果，如：湘黔、焦枝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的建成；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回收，洲际火箭的首次发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实验成功和推广等。“四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6%，其中工业增长9.3%，农业增长3.4%。

评价 “四五”计划是在左倾思想严重干扰下制定和实施的。其指标一开始就起点过高，在执行中又不断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1974年的

批林批孔运动，对工业、交通冲击很大。“四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一方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造成的持续损失，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了“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造成的危害。“四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工业化基础的阶段任务的结束，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大发展提供了一定物质准备。

####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北京，1987。

Disi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Four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75年1月至1978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举行1次会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只举行4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61人。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了1964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重申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包括：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等。会议听取了张春桥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虽然在某些方面继承了1954年宪法确立的原则，但也错误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加进了许多违背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内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会议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等22人为副委员长，共选出

委员 143 人。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 12 人为副总理，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权力机关停止活动近 10 年，宪法和法律遭到严重践踏和破坏的特殊情况下召开的。会前，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通过这次会议篡夺国家权力。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江青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周恩来主持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国务院人选的安排。会议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篡权的阴谋，为 1975 年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明显好转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1970 年 3 月，在局势相对稳定一些、各级党政领导体制逐渐恢复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党中央随即开始进行酝酿和筹备。从 1970 年到 1975 年，国家经历了激烈复杂的斗争，先是林彪一伙企图发动政变，继是“四人帮”企图“组阁”。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再分配”，党和人民同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极端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秘密举行的，直到闭会之后才发表了大会新闻公报。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推荐的，有的是指定的或特邀的。大会举行了 7 天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只有 5 天，第一天大会开幕，最后一天闭幕，中间 3 天分组讨论。

在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前，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只举行了 2 次会议，除了通过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和几个任命事项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国家的重大问题根本不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甚至连 1976 年 4 月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也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经过 8 年多的动乱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活动开始有所恢复，但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起的作用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Diwuge Wunian Jihua

### 第五个五年计划 (Fifth Five-Year Plan)

1976~198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简称“五五”计划。它并未单独成文，而是包含在《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

制定 1975 年，根据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按照两步设想的目标制定十年规划的精神，国务院制订了《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安排了“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这个规划虽然在当时起到了强调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但它提出的生产指标和建设规模总体偏高偏大，脱离实际。1978 年 2 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具体描述了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出届时中国的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重新修订的《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作为其后五年和十年发展经济的指导和目标。

基本内容 新修订的十年规划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拔高目标，不仅要求把“四人帮”破坏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而且还提出了比原订水平更高的发展速度。规划规定，到 1985 年，粮食产量要达到 8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 6000 万吨，原油 2.5 亿吨；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有 10 个钢铁基地，9 个有色金属基地，8 个煤炭基地，10 个油气田，30 个电站，6 条铁路新干线和 5 个重点港口)；形成 14 个实力比较雄厚、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基地，6 个各具特点、不同水平的工业体系的大协作区初具规模。从 1978 年到 1985 年的 8 年间，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 4%~5%，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 10% 以上，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超过过去 28 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 28 年的总和。根据 1976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1980 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即农、林、牧、副、渔作业的机械化水平都要达到 70% 左右，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

效果 在执行“五五”计划的过程中，1976~1978 年国民经济出现转机，国民经济经过多年停滞、下降之后，得以

恢复发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时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矛盾和困难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重犯高指标、高积累的错误，再加上脱离实际的大规模引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工作重点转入拨乱反正，利用 1979 年和 1980 年两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趋于好转，基本上放弃了原来“五五”计划的设想。所以，实施“五五”计划的时期是新旧经济指导思想交替的时期。原定的“五五”计划各项指标因不合国情而被中途放弃。

Diwu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 1978 年 2 月至 1983 年 6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 5 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 27 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 197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3460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华国锋作的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报告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 16 个月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和 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的纲要，重申了在 20 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叶剑英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国歌新歌词。由于历史条件局限，这次修改宪法来不及全面地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来不及彻底清理和清除十年动乱中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条文的影响。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艾则孜、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等 20 人为副委员长，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等 13 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任命了国务院各

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会议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强调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提出要建设 120 个大的项目，脱离了客观实际。由于经济工作上急于求成，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第二次会议于 1979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326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华国锋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的《关于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的《关于 1979 年决算和 1980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 1979 年起用 3 年时间，认真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还听取了彭真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审议并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7 个法律和《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会议补选彭真、肖劲光、朱蕴山、史良等 4 人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决定陈云、薄一波、姚依林等 3 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这次会议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重要决策，纠正了多年来在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观点；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次会议于 198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325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姚依林作的《关于 1980、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 1979 年国家决算、1980 年国家预算草案和 1981 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江华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黄火青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经过审议，

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了武新宇、顾明分别作的关于 4 个法律草案的说明，通过了修正的《婚姻法》、《国籍法》、《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决定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定》，组成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批准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会议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杨尚昆兼任秘书长。会议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决定任命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民主气氛，与会代表既肯定政府工作的成绩，又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质询和建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和回答。会议对国家领导人员作的调整，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步骤。

第四次会议于 198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3154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并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阐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 10 条方针。报告还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经济合同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原则批准了《民事诉讼法》草案。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王丙乾作的《关于 1980 年国家决算和 1981 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彭真作的《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杨尚昆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江华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黄火青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决定批准这些报告。会议还听取和审议雍文涛作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决议〈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补选朱学范为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进行审议和决定。

第五次会议于 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305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紫阳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王丙乾作的《关于 1982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 and 1983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 杨尚昆、江华、黄火青分别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相应的决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和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加以具体化，是实现宏伟目标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会议听取了彭真作的《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经过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新宪法，继承和发展了 1954 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注意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宪法。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消 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歌歌词的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会议还听取杨尚昆作的《关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规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 3 000 人，代表的选举应在 1983 年 4 月底以前完成。这次会议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Diyici Quanguo Baoxian Gongzuo Huiyi

**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 (First All-China Insurance Conference)

1949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关处室的代表，有关区行、分行负责人和若





干区、市保险公司负责人，保险总公司筹备机构负责人，华东、东北、西北、中南、华中、西南等地的代表。会议由总公司筹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及各大区公司代表9人参加的主席团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新民主主义保险事业的方向；保险资金积累；对私营保险公司、外商保险公司的有关政策；人民保险公司开业后的发展规划以及权限等问题，并取得统一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例草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规程草案》以及工作计划、工作程序、再保险办法、会计制度、私营保险业管理办法、火险运输险赔款处理等一系列文件。

### diyici quanguo jiceng puxuan 第一次全国基层普选 (first national grassroots general election)

1953年首次举行的全国县以下单位人民代表直接选举。

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反革命分子和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分子、精神病患者等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国县以上单位施行间接选举，县以下基层单位，即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按照选举法，全国第一次进行直接选举的基层单位共有214 798个，分别建立了乡、县等各级选举委员会指导选举工作，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基层选举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分批展开。同时结合全国人口调查进行选民登记，登记选民总数为323 809 684人，占进行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全国依法被剥夺选举权力的人加上精神病患者，只占选区人口总数的1.64%，占选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2.82%。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全国参加投票的选民共有278 093 100人，占登记的选民总数的85.88%，选民中妇女参加投票的占登记的妇女选民总数的84.01%。在全国首次进行的基层直接选举中，全国各地共选出5 669 144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妇女代表占17.31%。少数民族除部分地区由于条件未具备没有进行基层选举外，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3/4以上的地区都进行了基层选举。1954年6月，第一次全国基层普选

工作胜利结束。

### Diyici Zhengzhou Huiyi 第一次郑州会议 (First Zhengzhou Conference)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后，各地都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比如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甚至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甚至宣布废除商品、取消货币。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他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指出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他批评了在现阶段就要废除商品、取消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指出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明确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会上，毛泽东还讲到注意社员的吃饭和睡眠问题。为此，会议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已经觉察“左”的错误，并开始初步纠“左”。

### Diyige Wunian Jihua 第一个五年计划 (First Five-Year Plan)

1953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1951年开始编制草案，1953年起边执行边补充修改，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1万多个，其中595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建立起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业等，增强了基础工业的实力。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上海等沿海工业基地大为加强，华北、西北地区以及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也开始形成一批新的工业企业。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生产水平有较大提高。五年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自给率达到60%以上。铁路通车里程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一倍。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30.3%，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1%，12个工业部门的产品成本降低了29%，能源、物资消耗和资金利用率等都创造了较高的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22.9%，国家投资新建了9454万平方米职工住宅，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等也有很大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五年中，经济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毛病，主要是1955年底到1956年初许多部门和地区的生产建设出现过要求过高、盲目冒进的倾向；后几年对于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注意不够等。

### Diyi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Fir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任期从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5次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举行110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26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了关于现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培炎、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赛福鼎·艾则孜等13人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选出委员365人;会议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10人为副总理,同时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根据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提名,会议决定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和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替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正式确立。

第二次会议于1955年7月5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118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富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了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会议听取了邓子恢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草案的报告》、彭德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

案的报告》。经过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通过了《兵役法》,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规定了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及实施的具体计划、步骤,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纲领。

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11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先念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准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会议听取了廖鲁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四次会议于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79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作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了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批准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董必武作的《关于195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张鼎丞作的《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和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干扰和影响,民主气氛受到损害,一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

第五次会议于1958年2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15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先念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作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了1958年国家预算,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听取了吴玉章作的《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彭真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

构的决议、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任免的决议。会议补选程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会长,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陈毅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并免除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还对反右派斗争中受到牵连和影响的一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进行了处理。这次会议决定修正1958年国家预算,成为“大跃进”的前奏。

## Diyi Qiche Zhizaochang

**第一汽车制造厂** (No. 1 Automobile Plant)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吉林省长春市建成的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按当时最高的汽车制造技术水平,全面援助中国建设一座年产3万辆的4吨载重汽车工厂。1953年7月破土动工。中央人民政府从全国各地各部门调集大批技术力量,组织各有关行业部门协作;派出大批技术人员赴苏学习,并请进上百名苏联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经过3年艰苦努力,于1956年7月正式建成投产,并成功地装配出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第一汽车制造厂投产后,立即向形成生产规模,提高质量、材料自给率,发展多品种等方面努力。1958年5月试制出“东风”牌轿车,同年7月试制出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1966年、1972年又分别建立起越野汽车和轿车生产基地,开始实现多品种生产。1987年经国家批准,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主体,成立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集团公司。1997年年产汽车26.7万辆,成为一个拥有重、中、轻、轿、微多品种系列发展的国内很大规模的汽车企业集团之一。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实现了国家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和“出汽车、出人才、出经验”的要求,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dianli gongye

**电力工业**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利用火力、水力或其他能源,通过发电、供电设备生产,输送和分配电能的工业。是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电能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工业。

中国的电力工业始于1882年。首座

商用火电厂是上海光电公司的乍浦路火电厂。该厂的发电机组容量仅为12千瓦,只能供19盏弧光灯的照明用电。水力发电则始于1912年,云南石龙坝水电站投产初期装有2台24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1949年以前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缓慢,1949年全国发电设备容量为184.86万千瓦,年发电量43.10亿千瓦时(统计数字不含台湾,下同),分别居当时世界第21位和第25位。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电力工业从小到大,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从主要靠国外设计、提供设备到基本立足国内,建成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其他新能源发电的各种发电厂。到1997年底,全国发电设备总容量达25423万千瓦,年发电量11342亿千瓦时,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建成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域的电力系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相当规模的电力工业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先投入巨大力量进行电力工业的恢复工作。至1950年末,修复了受战争创伤的发电设备出力30多万千瓦。至1952年,生产运行逐步正常。在基本建设战线上,原计划3年内增加发电设备容量32万千瓦,至1953年也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1953~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一五”期间,在火电建设方面,以苏联援助建设的23项火力发电工程为中心,在阜新、抚顺、富拉尔基、吉林、西安、郑州、太原、包头、重庆、武汉(青山)、开远等地重建或新建了一批骨干电厂。

同时,利用已有的资源条件,积极进行水电建设,并重点进行水力资源勘测工作。“一五”期间,建设了吉林的丰满(改建),四川的狮子滩(4个梯级),福建的古田溪(1个梯级),浙江的黄坛口,江西的上犹江,广东的流溪河,河北的官厅,辽宁的大伙房,安徽的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云南的以礼河(2个梯级)等水电站。1955年进行第一次全国水能资源普查,1956~1958年进行第二次普查。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年内计划新增机组容量205万千瓦,实际完成246.9万千瓦,超额完成20.4%;计划年发电量指标1957年为159亿千瓦时,实际完成193.35亿千瓦时,提前1年超额完成任务。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63.50万千瓦,5年内装机容量平均年增长率为18.9%(其中火电为15.3%,水

电为40.2%);发电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1.9%(其中火电为18.6%,水电为21.1%);水电的发展速度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年发电量在世界上排名,从1949年的第25位上升到1957年的第13位。

1958~1962年,在执行“二五”计划中,头3年在“大跃进”的刺激下发展速度极快。1958~1960年发电设备容量增加728万千瓦,年平均增长率为37%;发电量增加400亿千瓦时,年平均增长率为46%。其中,新增火电机组563.02万千瓦,仅1959年就新增324.86万千瓦。涌现出一批进度快、工效高的工程。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电力工业的建设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例如,在建设上不按基建程序施工,忽视前期工作,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使一些工程由于仓促上马不得被迫停建、缓建或另选厂址重新建设。再如,为追求千瓦数,搞“先简后全”、“简易发电”,致使在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中主机、辅机不配套,发电、送电、配电不配套,生产系统和辅助设施不配套,造成许多电厂不能正常运行,或投产后有电送不出,不得不再做大量“填平补齐”的改造工作。在生产上也推行了一些在程序上违背科学与客观规律的事,破坏了生产秩序,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提出并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二五”计划后两年的调整工作。从“二五”计划整个5年电力工业的综合情况看,虽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失误,但仍然取得可观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年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继续成倍增长,5年的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2.5%,发电设备容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4.3%,都高于“一五”计划时期。

在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完成了215万千瓦发电设备的“填平补齐”,使已有的1300万千瓦发电设备达到基本上安全满发。尽管基建规模缩减了,3年中的发电装机容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但由于“填平补齐”工作提高了已有发电设备的发电能力,3年中的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14%的较高水平。

1965年末,全国拥有发电装机容量1507.63万千瓦,年发电量676.04亿千瓦时,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1205.67万千瓦,年发电量571.90亿千瓦时,水电装机容量301.96万千瓦,年发电量104.14亿千瓦时。此时,虽然年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都升到第9位,但技术装备和技术经济指标,大部分还只达

到世界先进国家40年代末期的水平,小部分也只有50年代初期的水平。

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时,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电力建设上,1965年从备战出发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此时被改为“靠山、分散、进洞”(简称“山、散、洞”),给建设带来很大的后患,也给若干工程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浪费。期间,电力工业的年装机容量大大下降,没有完成“三五”计划所规定的1970年达到2490万千瓦的指标。导致许多地区更为严重的缺电局面,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 响十分严重。

“四五”计划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制定和实施的。1975年全国发电量为1958.4亿千瓦·时(其中水电476.3亿千瓦·时)比计划指标要求的低限还少41.6亿千瓦·时,年平均增长率为11.1%。1975年底,全国拥有发电装机容量4340.6万千瓦(其中水电1342.8万千瓦),5年新增容量为1963.6万千瓦,比计划指标要求少456.4万千瓦,年平均增长率为12.8%。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未完成计划。

1976年,十年内乱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5年编制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编制的,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计划指标脱离实际,再加1976年发生唐山大地震等灾祸,在1975~1978年3年里,电力发展速度减慢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转折,经济建设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电力工业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执行“五五”计划的结果:1980年全国发电量达3006.27亿千瓦·时,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8.9%,基本上完成了“五五”计划的低限指标;1980年底发电装机容量达6586.91万千瓦,5年净增2246.31万千瓦,年平均增长率为8.7%,没有完成“五五”计划的低限指标。

1982年提出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明确提出:水电建设的重点是继续开发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干流和赤水河流域,建设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安排一批离负荷中心较近、淹没损失较少、工程较小、投资省、见效快的中型水电站。火电建设,主要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内蒙古东四盟、两淮、渭北等地,

结合煤炭开发建设一批矿口电站，形成一批火电基地。对煤炭资源不足而用电负荷又比较大的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区，根据运输条件，建设必要的火电厂。开始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以上这些具体方案的提出，体现中国“水火并举，因地制宜”的电力建设方针，更加符合中国能源的分布，并取得比较合理的布局。

执行“六五”计划的结果：1985年发电量4106.89亿千瓦·时，年平均年增长率达6.4%，超过了原计划指标；全国发电装机容量8705.32万千瓦，5年净增2118.41万千瓦，平均年增长率为5.7%，也超过了原计划指标。“六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形势大好，特别是在1985年这一年中完成大中型电站装机容量574.75万千瓦（其中水电19.75万千瓦，火电555万千瓦），在当时，是历史上投产容量最多的一年。

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建议（草案）》中明确提出：“能源工业的发展要以电力为中心，要积极发展火电，大力开发水电，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核电站。”根据这个《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七五”计划，1986年4月经过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1987年9月国务院提出发展电力工业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20字方针，为电业改革指明道路。

“七五”计划期间，火电方面继续在主要煤炭产区以及沿海地区、用电负荷中心，建设一批火电厂。如晋北的大同二厂和神头、山东的邹县、内蒙古的元宝山、河北的陡河等大型矿口电厂；江苏的谏壁、山东的黄岛、上海的石洞口、广东的黄浦等大型港口、路口电厂。水电方面继续大力开发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干支流和赤水河流域水力资源，建设青海的龙羊峡、李家峡，四川的龚咀、二滩，湖北的葛洲坝等大型水电站。在核电方面，继续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和浙江秦山核电站。1990年全国发电量达6213.18亿千瓦·时，其中水电为1263.50亿千瓦·时，火电为4949.68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79.66%）；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789亿千瓦，其中水电为3605万千瓦，火电为1.0184亿千瓦（占总容量73.86%），火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1亿千瓦大关。“七五”时期，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为8.65%，装机容量年平均增长率为9.65%。年发电量和发电设备容量在世

界上排名都上升到第四位。

“六五”、“七五”计划实施结果，电力工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提前并超额实现了80年代末的发电量与装机容量比198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

1991年，“八五”计划（1991~1995）开始执行。在此期间，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深入贯彻“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办电方针得到深入贯彻，初步形成“电厂大家办，电网国家管”的发展新格局。电力系统开展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财税、投资、计划建设体制改革及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向科技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使电力企业的发展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八五”期间共投产发电机组7500万千瓦，年均投产1500万千瓦，这在中国电力发展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装机容量突破了两大关。广东大亚湾与浙江秦山两座核电站投产。1995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1722.42万千瓦，全国发电量达到10069亿千瓦·时。电网规模进一步扩大，华北、东北、华东、华中等电网容量均超过2000万千瓦，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4省形成互联电网。企业经营取得良好成果，企业的经济实力有较大的增长，同时促进了全国工农业生产发展。

执行“九五”计划（1995~2000）的前两年，电力企业认真贯彻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和“以安全文明生产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优质服务为宗旨”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电网规模，全国各主要电网已基本形成500千伏和330千伏的输电线路骨干网架，以三峡为中心的全国联网工程开始启动，调整电源结构，继续抓紧大中型水火电站和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核电站的建设，促进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发电、海洋能发电的发展。

1997年，发电量达11342千瓦·时，装机总容量达25423千瓦。历时多年的全国性严重缺电的局面得到缓和。

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电力建设项目都由中央确定，建设资金全由国家财政拨款。但随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用电的加快增长，全国缺电越来越严重，电力建设资金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1982年，山东省首创先例，由地方筹资与中央拨款联合建设龙口和烟台发电厂，确立了“谁投资，谁受益，按投资比例用电”的原则，这一

做法改变了长期以来由国家独资办电的格局。这种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广。“七五”计划以后，集资办电如雨后春笋，电力建设资金成倍增长，投产容量也大幅度增加。1980年电力基建投资为41亿元，当年新增容量287万千瓦；1985年投资96亿元，新增容量637万千瓦；1990年投资269亿元，新增容量1015万千瓦；1995年投资833亿元，新增容量1528万千瓦。1995年的电力投资和新增容量分别为1980年的20.3倍和5.3倍。集资办电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业、内资和外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了电力发展。1993~1997年5年中，投入大中型机组建设的地方资金达1187亿元，占大中型机组建设总投资的30.1%；引进外资513亿元，占13%。地方资金和外资共1700亿元，占总投资的43.1%。

与此同时，中国电力工业还积极利用外资，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利用外资的方式包括：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协力基金等贷款，各国政府贷款，国外商业银行贷款，在境外发行电力债券和股票，中外合资办电，外商独资办电，BOT（建设—经营—转让）和TOT（转让—经营—转让）等。自1978年以来，共引进外资约237亿美元，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达6234万千瓦。

科技进步 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电力科学技术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表现在电力装备水平的提高。1949年以前，电力工业装备全部依靠国外进口。1951年国内生产出第一台水力发电设备，1954年生产出第一台6000千瓦火力发电设备，随后陆续生产出1.2万、2.5万、5万、10万、12.5万、20万、30万千瓦发电设备。80年代初，采取引进——消化吸收——攻关创新的方针，并自主研发，使电力工业在装备、设计、施工、运行和管理方面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引进型30万、60万千瓦火电机组，经过电力和机械制造部门联合攻关和优化设计，成功地试制出技术先进的大容量亚临界火电机组，而且汽轮机热耗指标比原型机低，经济性比原型机提高1.3%~1.5%。在水力发电方面，中国已生产出最大单机容量40万千瓦混流式机组和20万千瓦的轴流转浆式机组，并已能生产转轮直径8米、单机容量55万千瓦的水电设备。迄今，国产机组超过2亿千瓦，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80%。

在核电机组制造上，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已经投入运行，

并已向国外出口。60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的生产已经开始组织实施。

在输变电技术方面,自1972年中国在西北地区建成第一条330千伏输电线路之后,先后在华中、华北、东北、山东、华南等地建成多条交流500千伏输电线路。这些工程基本上是中国自行设计、建设、调试和运行的,通过这些工程,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东北锦(州)辽(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就应用了100余项科研成果,采用首次试制成功的20余种国产新产品,为工程设计、施工、调试、运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100千伏浙江舟山直流输电工程是中国自行研制设备、设计、施工和调试建成的,这是在中国直流输电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又引进了第一条±500千伏葛(洲坝)上(海)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1989年单极、1990年双极投入运行,并实现了华中、华东两大电力系统联网运行,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新能源发电方面亦取得可喜成绩。风力发电、地热发电、潮汐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都已具有一定规模,这些对促进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引进消化吸收空冷机组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型空冷机组的研究和应用,一批空冷机组相继制成投产,运行良好,节水显著,节水率高达65%,对缺水地区的电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多年来,电力部门主要在提高设备可靠性、提高机组自动化水平、合理提高机组出力、节约能源和延长机组寿命等方面,积极应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技术攻关和改造工作,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电网调度自动化,电厂、变电所监控,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电力负荷控制,仿真培训以及管理信息网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果,在电力建设和生产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管理机构** 近半个世纪中,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电力管理体制前后经历了11次变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立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煤炭、电力、石油实行统一领导和和管理。1950年5月和1953年4月,在燃料部领导下,成立了电业管理总局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1955年7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撤销燃

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工业部,同时撤销电业管理总局,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改由电力部领导。1958年初,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提出“水主火从”发展电力工业的方针;同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将电力部和水利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1967年7月,中央决定对水电部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6月,水电部结束军事管制,成立水电部革命委员会。1975年1月,撤销水电部革命委员会建制,恢复了正常的领导与管理。1979年2月,撤销水电部,分别成立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1982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将水电部、电力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1988年4月,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分别成立水利部和能源部。能源部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煤炭、石油、电力及核工业。199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能源部,再次组建电力工业部。1996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通知》,同时批转了《国家电力公司组建方案》和《国家电力公司章程》。1997年1月16日,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并开始运作。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是电力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中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

**存在问题** 中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拥有装机容量仅为0.21千瓦,位居世界第八十五位;人均发电量900千瓦·时,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5。1997年以来,全国缺电局面有所缓和,但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仍然缺电;全国尚有11个“无电县”,还有6000万边远山区和农村人口没有用上电。电源和机组结构不合理,水电开发利用率仅为14%,低于全世界已开发利用22%的水平。全国平均单机容量不足5万千瓦,10万千瓦及以下的火电单机容量还有7570万千瓦,占火电装机总容量的42%;超期服役中低压燃煤机组还有3600万千瓦,每年因此多消耗标煤6000万吨;煤耗比世界发达国家高60~70克/千瓦·时。电力企业机制不活,管理不严,效率不高,自我发展机制及发、供、用电的市场机制都还没有形成。电力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今后,电力工业将坚持多家办电,多渠道集资办电,充分利用外资办电的方针,消灭无电县,实现乡乡通电,村村通电。实施电力扶贫致富、节能节电,建

立、完善和规范电力市场,使电力工业走上一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开拓电力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 推荐书目

张彬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4。

#### dianying shiye

**电影事业** (filmdom) 是进行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推进电影技术发展的文化事业。

1896年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1905年中国人在北京摄制成第一部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中国电影开始诞生。1913年第一部中国无声电影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1920年在上海开始拍摄有声长故事片。以后拍摄《春蚕》、《大路》、《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万家灯火》、《松花江上》、《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建立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制作公司。当时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创作比较落后,不能满足观众的基本要求。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事业进入发展繁荣阶段,取得一系列成就。

**发展历程** 1949~1999年是中国电影发展繁荣阶段。50年间经历3次高潮,也出现几次低潮。

**第一次高潮** 1949年摄制的《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故事片。接着,拍摄《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儿女》、《上饶集中营》、《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腐蚀》和《关连长》等一批优秀影片,还拍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苏联合拍)、《解放了的祖国》(与苏联合拍)、《红旗漫卷西风》和《抗美援朝》等新闻纪录片。

1957年,文化部举办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69部优秀影片和396位电影工作者。其中获奖故事片有《龙须沟》、《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祝福》、《李时珍》、《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等。美术片有《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等,科教片有《防治水稻害虫——三化螟》等。

1957~1958年,随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的错误批判,严重地干扰正常的电影创作和制作,产量急剧下降。在“共产风”影响下,还拍摄一批助长“浮夸风”的影片。

1958年底,中央调整电影工作的指

导思想, 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热情。1959年故事片的产量由1951年的10多部增加到82部, 包括《林则徐》、《聂耳》、《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老兵新传》、《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等故事片, 《和平万岁》等新闻纪录片, 《桂林山水》等科教片, 《神笔》等美术片。1961~1964年又拍摄出一批优秀影片: 《甲午风云》、《李双双》、《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早春二月》、《红日》、《红色娘子军》以及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红楼梦》, 美术片《大闹天空》、《小蝌蚪找妈妈》等, 形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潮。这些影片题材多样, 风格各异, 既充满时代感, 又富有民族特色,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统一。

**十年低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中国电影事业受到全面摧残。在此以前的17年中, 中国电影也有不少起伏。例如, 1952年由于受批判《武训传》影响, 电影创作作品、制片产量下降, 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 1960年等, 电影事业均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时间都不长。1966年之前, 中国已建成一套较为完备的电影制片体系, 创作、生产、科研、教育都已具规模。1966年以后, 上述成果被诬为“黑线专政”; 大量影片被定为“毒草”, 禁止上映; 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残酷迫害, 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1966~1972年整整7年中, 中国没有摄制出一部故事片, 这在中外电影史上都是罕见的。1973~1976年生产的故事片也很有限, 且多公式化、模式化。有一些电影工作者冲破“四人帮”设置的重重藩篱, 摄制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较好的影片。

**第二次高潮** 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电影创作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 突破公式化的框框, 深入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敢于表现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 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出现了多种题材并行、多种样式并存的繁荣局面。拍摄出一批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优秀影片, 如《天山山传奇》、《城南旧事》、《西安事变》、《归心似箭》、《血总是热的》、《人到中年》、《骆驼祥子》、《喜盈门》等;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推出一批重大历史题材影片, 如《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等; 一些中青年导演拍摄的探索片, 如《黄土地》、《一

个和八个》等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闻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都涌现一批题材丰富、风格迥异的优秀影片, 使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在电影创作和制片繁荣的同时, 理论研究也活跃起来。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电影与戏剧的关系, 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电影的艺术特性, 电影的民族化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这个时期还开展了广泛多样的评奖活动。继1980年文化部恢复评选“优秀影片奖”(1957年设立, 现为中国电影华表奖)和《大众电影》恢复评选“百花奖”(1962年设立)活动后, 198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又增设了专家评选的“金鸡奖”。

**迎接第三次高潮** 90年代初期以后, 又涌现《大转折》、《大进军》、《长征》以及《红河谷》、《鸦片战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焦裕禄》、《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优秀影片, 以及《凤凰琴》、《被告山杠爷》、《秋菊打官司》、《过年》、《喜莲》、《变脸》、《安居》、《黑眼睛》、《惹事生非》和《花季雨季》等一批风格迥异、题材广泛的影片。1996年3月, 在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 确定实施电影精品的“九五五〇工程”(1996~2000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内拿出50部电影精品的工程), 以及在世纪之交迎接中国电影第三次高潮的目标。

**体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原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管理局划归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管理机关, 1955年改为电影事业管理局。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 领导全国的电影创作和生产, 安排电影事业的规划和建设, 管辖全国各电影制片单位、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电影艺术院校和科研单位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管理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1986年, 电影事业管理局成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简称广电总局)领导。90年代初期以来, 逐步改革不适应事业发展的国有电影企业原有体制和运行机制, 目标是建立充满活力, 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 建立影视录一体化、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现代企业。

**发行体制** 从1993年开始, 打破计划体制下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 引入竞争机制, 强化市场调节, 还各

制片单位以自主发行权。同时, 在引进境外新片中, 对分账制、院线制的发行方式和经营机制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影视布局** 从1993~1996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北科)、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上科)、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简称上美)划属电视台, 服务于影视两个市场。1996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正式开播。1996年全国电影制片厂成建制划属广电部门管理。1998年进一步放开制片权限, 全国省级以上影视单位拥有单片出品权, 初步形成影视合一的大格局。1997年电影系统开始注重后电影产品的开发, 广电总局3条VCD生产线投入生产。

**调整企业结构, 转换经营机制** 1993年以来, 上海、北京、四川、江苏、广西、辽宁、陕西、吉林等地均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探索; 199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广电总局直属8家企事业单位组建“中国电影集团”, 成为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国有企业试点。

**农村电影市场** 疏通16毫米影片流通渠道, 鼓励多种形式的放映机制并存。从1996年开始, 全国先后组建了7个16毫米影片交易中心, 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

**强化立法, 完善政策** 199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电影管理条例》。这是中国现有最完备的电影行政法规, 是电影走向依法管理的重要一步。近几年, 还制定颁布一系列规范市场、加强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建设成就** 按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电影工业、电影科研和教育、对外交流几个方面分述如下。

**电影制片** 1949年底, 电影管理局下属有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3个国营制片厂, 58个新闻摄影队。50~60年代陆续建成八一、珠江、西安、峨眉、新疆、内蒙古、昆明等电影制片厂(公司), 以及新影、上科、上美、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简称农影)和北科等短片厂和译制片厂。1949~1966年共生产故事片603部, 新闻纪录片8344本, 科教片1980本, 美术片279本。70年代后期、80年代, 恢复并相继成立了天山、内蒙古、云南、潇湘、广西、福建、儿童、青年等一批制片厂, 形成了遍布全国主要省区的故事片创作生产基地。此外, 还成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开展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拍片

的业务, 增进国际交流。90年代电影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截至1997年, 全国电影制片厂已发展到36家, 其中故事片厂(公司)31家、短片厂5家。1977~1997年共摄制故事片2477部, 新闻纪录片2440部、5605本, 科教片2922部、5765本, 美术片393部、812.5本。

**发行放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建立了发行放映管理系统, 成立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50~60年代发行放映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其中农村放映队有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的46.3亿。80年代出现成倍增长, 1984年全国有2700多个县级电影发行单位, 18万个电影放映单位; 观众250亿人次, 平均每天观众7000万人次, 相当于1949年全年观众人次的1.5倍; 建成宽银幕立体电影院700家, 并放映70毫米电影、光学立体电影和环幕电影这些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兴起不久的新形式电影。90年代, 发行放映业又有发展, 1997年全国有电影发行单位3000多个, 电影放映单位近7万个, 城镇影院9000多座, 农村电影放映队5万多个, 全国电影从业人员36万多人。

**电影工业** 50年代, 电影工业已具备相当规模, 建立保定胶片厂、南京电影机械厂、哈尔滨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影机械厂、八一电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洗印厂,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各种设备、器材, 并基本达到自给。

**电影科研和教育** 这方面也得到全面发展, 建有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电影资料馆、艺术研究院电影艺术研究所等单位。80年代电影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 有40多项电影技术项目和科研成果分别通过国家鉴定或受到文化部的奖励。许多摄制工艺技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为影片生产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90年代, 新技术在电影生产和影院的开发应用, 充分提高了声音制作能力和还音效果。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式电影立体制作技术在北京和上海已形成生产规模, 截至1999年2月已有100多家影院进行了数字声改造。上海电影制片厂晏仲方发明的高功率、高性能闪电效果灯于1996年荣获奥斯卡奖。中国环幕电影系统、中国70mm特种电影系统先后研制成功, 还研制完成35毫米轻型摄影机、70毫米摄影机、多功能印片机、70毫米放映机、立体声信息处理等一批新产品, 填补了国内电影技术的空白, 有力地促进中国电影的现代化

生产。

**对外交流** 80年代以来, 电影的对外交流日益扩大, 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国际电影的合作与交流。这一时期与境外合拍故事片211部, 选送了一大批优秀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展, 其中340部影片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 推荐书目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9。

## dianzi gongye

### 电子工业 (electronics industry)

以电子学为理论基础制造电子设备、电子元件和器件及其专用原材料为主的工业, 是世界新技术发展的核心。按行业划分, 电子工业包括通信工业、导航工业、雷达工业、计算机工业、广播电视工业、测量仪器工业、电子元件器件工业、专用设备工业和信息服务业。1949年以来, 中国的电子工业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

**建立与起步** 1949年以前, 中国仅有官僚资本性质的十几家小电信企业, 不能生产电子元器件, 只能靠进口从事进行装配和维修。1950年, 重工业部成立电信工业局,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信工业会议。为了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组织生产了一批小型电台、发报机、步谈机等, 促进了电子元器件工业的起步。1953年, “一五”计划(1953~1957)开始执行, 电子工业划归国防工业, 发展方针为“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列入重点建设的有11个项目, 其中9个是苏联援建的雷达厂、电子管厂等, 1个是民主德国援建的无线电元件厂, 还有1个是中国自行设计的广播发射机厂。到1957年已有5个建成投产。其中北京电子管厂投资1亿元, 有职工5200人, 一次试车即生产出合格的电子管。这一时期的建设特点是: 统一规划, 重点明确, 科学论证, 科研与建设同步进行。从1956年起, 国家加快了对地方原有电子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对私营电子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形成了早期地方电子工业。1957年, 地方电子工业拥有337个工厂, 职工1.56万人, 总产值3458.9万元, 占全国电子工业的32%。

“一五”计划完成时, 整机方面, 已能生产多种雷达、导航设备、广播发射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自动交换机和电子仪器等产品, 收音机全部实现国内配套生产; 元器件方面, 掌握了电子管为基础的真空器件成套工艺及通用元件的生产技术, 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1957年中国电子工业总产值完成1.07亿元, 比1952

年增长3倍, 平均每年增长32%, 为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曲折前进** 1958年起执行“二五”计划, 电子工业成为建设重点之一。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中, 一方面地方电子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到1960年, 地方企业达到470个, 工业产值达3.16亿元, 比1957年增长近8倍。除大量生产一般通信广播产品外, 已能生产高级收音机, 试制成功黑白电视机; 另一方面, 盲目强调大发展, 片面追求高速度, 建设项目多达50多个, 造成正常秩序被打乱, 质量和经济效果下降, 使全国电子工业受到严重挫折。从1960年冬开始, 电子工业实行调整和整顿, 强调质量第一, 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1963年竣工项目的优良率比1962年提高32%。从1961年起, 电子工业停建、缓建了18个项目, 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74.8%, 而投资效益却不断提高。1963年到1965年共完成工程37项, 成为中国电子工业史上竣工验收项目最多的时期。1963年, 第四机械工业部(即无线电工业部)成立, 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子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独立工业门类。1963年, 四机部向中央写出报告, 针对民用产品发展不足的状况, 明确提出电子工业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 制定了电子工业技术政策, 先后召开了各种专业会议。

从1958年到1965年, 电子工业除沿海老基地外, 又建成北京、四川、陕西等新基地, 形成了初具规模、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 电子工业受到严重挫折。1967年和1968年产值连续下降, 片面强调战备, 打乱了协作体系, 在江青等人制造的“蜗牛”事件的干扰下, 又延迟了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引进。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 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 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 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 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70年代初, 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 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 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 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 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飞跃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电子工业飞速发展, 大体经历了3个转变。

①实现军转民、军民结合的战略转

移。80年代初，四机部提出加快向民用转移、大力发展民用产品的决策，同时进行了三线建设企业的调整迁移。1982年，在四机部基础上成立了电子工业部，为扭转品种不配套、质量差的状况，结合引进进行了技术改造，建设起一批现代化元器件企业。到80年代中期，质量和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目前，电子工业的民品产值已达总产值的97%以上。

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七五”计划期间（1986~1990），电子工业形成了较大经济规模，主要途径是努力发展消费型产品，建立效益型机制。五年中，消费类电子产品产值年平均递增19.65%，1990年达到352亿元，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52.4%；当年电子产品出口37.87亿美元中，消费类产品占68%。在引进彩电生产线基础上，电子工业部实施了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使彩电国产化水平达到95%以上，一年可节省外汇135亿美元。1993年又提出“大公司”战略，加快行业生产向大公司、大集团转变的进程，“长虹”、“康佳”、“联想”、“方正”等集团已拥有国际排名位置。同时，已有近百家电子企业实行了股份制，上市公司达57家（含境外3家），促进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③从单一制造业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模式转变。90年代，中国加快了信息化进程，电子工业提出了向制造硬件、生产软件、应用与信息服务并举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国民经济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为电子信息产业开拓市场。集中力量实施集成电路专项工程，“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在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通信、计算机为主体的产业指导思想下，实施了“908”集成电路专项工程；“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又启动“909”工程，建设0.5微米生产工艺集成电路生产线，使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台阶。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形成新增长点。指导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开发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系统软件。1990年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销售额仅有4.2亿元，到1997年已达到260亿元，增长62倍。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电子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1998年约实现总产值5000亿元，是1979年的59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79年的1.4%上升为6.5%，出口额可达到3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5%。音响、电话机、彩电、VCD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程控交换机、计算机、集成电路、新

型元器件等产品质量和性能价格可与国外同类产品媲美。科研开发能力大大加强，1997年制成了“银河-III”100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工业大国之一。

#### 推荐书目

刘寅、张挺等主编：《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Ding Guangen

**丁关根**（192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江苏无锡人。1929年9月生。1946~195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学习。1951年8月毕业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海运局实习生，铁道部运输局、货运局技量员、工程师。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铁道部运输总局工程师。1960年起任铁道部部长办公室秘书。1972年后在北方交通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工作。1975年任铁道部外事局工程师、副处长。1981年任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教育局局长。1983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85年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8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92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7年5月起，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Ding Guangxun

**丁光训**（1915~） 政协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人。1915年9月20日生。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1938年后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曾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员。1946年后任加拿大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194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获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学位。1948~1951年在瑞士日内瓦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回国后，历任上海广学会总干事，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中国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南京大学副校长兼宗教研究所所长，被选为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曾被欧美六所大学和神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今日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徒的声音》等。

Dingling

**丁玲**（1904~1986） 现代作家。女，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1904年10月12日生。1922年入上海平民女校。后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受到文坛瞩目。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书记等职，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陕北。曾任中国文艺协理主任，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1946年至1948年，多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积累大量素材。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早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丁玲创作生涯的里程碑。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及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55年、1957年，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遭受“再批判”，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编《中国》杂志，坚持创作。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写了大量散文、回忆录、序跋、评论、杂文，其中《杜晚香》、《“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等都得到好评。丁玲执着于生活，率真热情，感受敏锐细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女作家。1986年3月4日逝世。

Ding Shisun

**丁石孙**（1927~）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数学家。江苏镇



江人。1927年9月5日生。1944~1950年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1952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校长。1988年后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6年当选民盟中央主席。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专长代数、数论、组合数学等。出版有《高等代数》、《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代数学引论》、《数学与教育》等著作。

Donghai Nanhai he Taiwan Haixia junshi yanxi

### 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军事演习

(manoeuvre in the East and South Seas and the Taiwan Strait) 1996

年3月8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南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并先后在东海、南海、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和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

3月8日至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首先向海域进行地地导弹发射训练，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3月12日至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先后在东海和南海海域举行气势磅礴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实弹演习。先进的战机、舰艇、导弹、电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出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共有10多个兵种参加此次演习，参演兵种、机种之多，出动飞机的批次、架次之多，发射实弹之多，演练难度之大，协同之复杂，都是近年来少有的。3月18日至25日，南京军区在台湾海峡海域，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从争夺制海、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地点攻击，三军密切协同，展现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的壮阔场景。演习获得圆满成功。

Dong Biwu

**董必武** (1886~1975) 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代主席。

原名贤琮，字洁斋，号壁伍，学名用威。湖北红安人。1886年3月5日生。秀才。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湖北军政府财务司科长。1914年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与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后回湖北负责建立和发展中共地方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4年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派驻湖北省指导党务。1926年秋，任中共湖北区委执行委员。1927年任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1928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转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后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部长。1938年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5年代表中国解放区人民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11月回国后，任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6年后，接替周恩来领导中共驻南京代表团。1947年3月率团撤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财政部部长，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政务院中共总党组书记兼政法委员会分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5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兼任中国新法学会和政治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逝世。主要著作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诗选》等。

Dong Jianhua

**董建华** (1937~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浙江定海人。已故船王董浩云之子。1937

年5月29日出生于上海。曾分别在上海、香港接受教育，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曾任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香港公益金赞助人及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区赞助人、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香港船东协会主席、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会员等职务。当选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被聘任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事务顾问。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以320票当选为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国务院任命，于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仪式上宣誓就职。

Dong Qiwu

**董其武** (1899~1989) 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山西河津人。1899年11月27日生。1919年在太原从军。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1927年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北伐战争。从1928年秋起，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历任参谋、团长、旅长。1933年，参加著名的长城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抗战，获百灵庙大捷。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师长。从1940年起，任暂编第四军、骑兵第四军军长。1942年，调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后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1946年后，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和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张家口警备总司令。1949年平津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于9月19日率部起义。后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同年冬回国后任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3月3日逝世。

Dong Yinchu

**董寅初** (1915~ )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安徽合肥人。1915年9月20日生。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1938~1939年在上海《大美晚报》和香港《早报》任编辑。1939年到印度尼西亚任《天声报》社编辑, 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42年12月被日军逮捕入狱, 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恢复自由, 后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1947年回国, 在上海任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中国酒精厂厂长。1949年后, 任上海市公私合营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溶剂厂经理, 上海市贸易促进会副主任, 上海华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76年后, 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主席,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顾问,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 上海海外联谊会名誉顾问,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政协全国委员会华侨委员会主任、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主任。1980年加入中国致公党。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致公党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 第八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 第九、十届中央主席, 第十一届名誉主席。

doupigai yundong

**斗批改运动** (campaign to struggle, criticize and reform)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场为实现“文化大革命”目标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斗”, 指“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批”, 指“批判资产阶级”; “改”, 指“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

1966年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中提出: “在当前,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革”期间, 人们将《决定》所规定的这些目标, 简称为“斗批改”。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斗批改运动主要是“斗”和“批”。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斗争和批判, 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在全国武斗不断的情况下, 所谓“改”并没有提到议程上来。

1968年9月, 庆祝全国29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宣布,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公布的毛泽东指示说: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一指示成为全国斗批改的指导方针。1969年4月, 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进入了斗批改运动阶段。除继续建立基层革命委员会和进行大批判外, 重点转为“改”。主要内容有: “清理阶级队伍”, 即在基层清查、处理所谓“现行和历史的反革命分子”。“整党”, 即用“文革”指导思想整顿党组织。“精简机构”, 即精简党政机关, 实行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即批判和废除原有的规章制度, 大规模下放企业管理权。“下放科室人员”, 即下放大批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运动, 也都属于斗批改运动的范围。在这一运动中, 树立了“典型”和“经验”, 以此来指导全国的运动。

斗批改运动相对前一时期的“造反夺权”运动来说, 有一定秩序, 是在革命委员会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下进行的, 反映出毛泽东力图通过这些步骤肯定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愿望。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路线指导下, 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方针、政策和成就为前提的这场运动, 继续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 根本没有实现“大治”, 相反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和深入。所谓上层建筑的“改革”, 是建立在混淆是非、违反行之有效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上的, 有的甚至是以破坏社会基本常识和道德为代价的。江青等人鼓吹的“全面专政”论, 即是这类上层建筑“改革”的体现。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 斗批改运动中断。

dui wai jingji maoyi

**对外经济贸易** (foreign trad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活动, 包括对外贸

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援助等内容。

**1978年前的对外经济贸易**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主席就提出: 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 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 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 1978年以前的对外经济贸易基本上仅包括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

**对外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中国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产品, 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水平。“一五”计划后, 中国工业迅速发展, 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但直到70年代, 初级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在50%以上。中国对外贸易的经营和管理在50年代初期实行国家统制对外贸易政策, 到1957年后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转入计划经济的需要, 形成国营外贸公司集中统一经营, 国家对外贸公司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 管理和经营一体化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被看作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 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1950年,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 其中出口5.52亿美元, 进口5.83亿美元。1978年, 对外贸易总额206.38亿美元, 其中出口97.45亿美元, 进口108.93亿美元。

**对外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对外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体说来, 1978年以前的对外援助可以分为3个阶段: ①1950~1963年为初始阶段。中国政府和人民竭尽全力支援朝鲜和越南抗击外来侵略, 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经济。1950~1957年中国政府向朝鲜提供了价值1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无偿援助, 向越南提供了近9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其后还向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提供援助。中国先后向亚、非、拉21个国家提供援助, 帮助其中7个国家共建成了101个成套项目。②1964~1970年为发展阶段。1964年1月15日, 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宣布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发展阶段。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都有了较大发展。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共计31个, 帮助其中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 不少是技术复杂的大型项目。③1971~1978年为急剧

增长阶段。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要求援助的国家迅速增多。这一阶段，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共有66个，帮助其中37个国家建成470个成套项目。其中为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项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78年以来的对外经济贸易**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这是中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也为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外经贸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行政性干预大大弱化，外经贸宏观管理逐步走上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的轨道。二是外经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截至1999年3月底，全国经营外经贸业务的企业近17万家，其中外经贸企业24219家，流通性公司8618家，自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11735家，对外经济合作企业852家，边贸企业3078家，私营企业74家。外商投资企业已开业15万多家。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者。三是外经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四是外经贸中介服务体系开始形成。五是外经贸经营的领域和渠道进一步拓宽，总体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对外贸易** 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仅有206.38亿美元，1997年达到3251亿美元，19年增长了15倍多。其中，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的6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1992~1997年间，对外贸易总值达14938亿美元，比从1949年到1991年的总和还多，年均增长速度15.7%，这个速度不仅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199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239.3亿美元，

其中出口为1837.6亿美元，进口为1401.7亿美元。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位次排列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为1992年的第11位，并在连续保持5年后，1997年又跃升至第10位。1998年为第11位，其中出口列第9位，进口列第11位。截至1998年底，外汇储备为1449亿美元。中国的贸易伙伴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1998年的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逐步得到改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工业制成品和机电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9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11.2%，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为88.8%。在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为62.9%，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分别为15.5%和21.6%。

①**技术进出口**。对外技术贸易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计算机软件的许可或转让、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为实施技术而引进或出口的生产线、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及高技术产品等技术载体，以及合资生产、合作生产、合作设计、合作开发和国际工程承包项目涉及上述内容的技术进出口。

中国的技术引进始于1950年，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引进技术28670项，合同总金额为1169.4亿美元。中国的技术引进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新产品开发、轻纺、服装和家电等领域，主要来源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大部分集中在日本、美国和一些欧共体国家。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科研体系，全国已拥有大量成熟的工业化技术，其中不少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生产的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不仅配套能力强，而且在价格上有竞争力。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技术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技术出口起步于1980年，截至1998年底共出口技术9198项，合同总金额为282.2亿美元。技术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是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也占很大比重。技术出口除单纯转让“软件性”技术外，也较多采用成套设备出口、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技术服务等技术贸易方式。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技术出口开始步入发展阶段，技术出口的金额上升较快。技术出口的国别和地区已达50多个，技术出口市场的潜力仍然巨大。

②**机电产品进出口**。据海关统计，

1998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304.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0.3%，是1978年机电产品进出口额的22倍。机电产品进出口继1997年首次实现基本平衡后，1998年出口首次超过进口。其中，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已从1985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665.4亿美元，13年增长了39倍多，年均增长32.7%。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5年的6.1%提高到36.2%。自1995年首次超过纺织、服装出口之后，机电产品出口已连续4年成为全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98年，机电产品进口638.7亿美元，比1980年的51.2亿美元增长了11.5倍，年平均增长15.1%；占全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25.6%提高到45.6%。改革开放20年来，累计出口机电产品3400多亿美元，进口5500多亿美元。

**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形式。1980年起，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又在海南岛设立主要依靠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区。这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扩大出口。经过20年的发展，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92年以来，全国吸纳外资的领域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成就举世瞩目。截至1998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2.47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725.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674.5亿美元。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577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47%上升至48.6%，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已开业14.5万家，就业人数1750多万人。中国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其他形式的外资也达到一定规模，累计达1400多亿美元。从1993年到1997年，中国连续5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列第二位。

在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也不断改善，各项涉外法规日益健全，利用外资的质量有所提高，结构有所改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明显增加，国家鼓励投资类项目增加较多、限制类项目减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中西部地区

对外商的吸引力增强；世界知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多，大项目继续增加，平均单项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提高。

**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 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家企业发展为1998年底的955家，成为一支门类比较齐全、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队伍，业务范围不断向技术性较强的领域扩展，项目越做越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在1997年美国《工程新闻杂志》评选出来的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中，有27家中国企业，它们的业务范围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1998年底，全国累计签订中外经济合作合同额834.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177万人次。其中，仅1998年合同额即达1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完成营业额1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年末有32.5万劳务人员在海外。

**对外援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继续向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方式更为灵活，援建的项目更为实用。

从1979年至1990年，对援外方式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扩大了援助面，使受援国从1978年底的66个增加到1990年的93个。从1991年至1994年，中国调整了援外结构，援助成套项目的比重加大。

1995年以来，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为使有限的援外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优惠贷款援助方式。在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范围内，由中国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对外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直接合作。二是积极推动中国的企业与受援国企业间的合资合作。在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原则协议的范围内，双方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实施项目，以促进双方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的长期合作，培养受援国企业管理人才。三是继续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生产性项目或向受援国提供一般物资。从1995年到1998年底，中国已同43个国家签订了56项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截至1998年底，中国对外

提供援助的国家达114个，援建成套项目1554个。

**对外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境外投资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截至1998年底，中国已在16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600多家境外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超过9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投资涉及贸易、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领域。

中共十五大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在上述方针指引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加大了引导和推动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的工作力度，中国境外生产加工装配项目投资进展较为迅速。

目前中国推动境外投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①以市场为导向、以贸易为先导、以效益为中心，在充分论证、深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投资，避免投资的盲目性。②在行业导向上，重点推动中国在设备、技术上有较强比较优势的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行业的企业到海外办厂，进行产品的组装和加工生产。③在投资主体选择上，重点推动国内竞争能力强、管理科学、经营机制先进、有跨国经营和境外投资办厂经验，有产品出口、信誉好的生产企业到境外投资。④在投资方式上，鼓励企业以设备、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入。

**多双边经贸合作** 截至1998年底，中国的贸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220多个，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华投资。中国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对外投资涉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 dui wai kai fang

**对外开放** (opening to the world) 即对国外、境外开放，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旨是：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扩大对外贸易往来，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的客观要求。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

开放经历了两个阶段。

**有限开放阶段** 1949年10月~1977年。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在当年6月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6年他写了《论十大关系》，其中专门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周恩来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不可以完全闭关自守，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往来，技术的合作。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中国基本上只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阶段，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以引进成套建设项目、设备为主，以及技术合作和商品贸易。如50年代从苏联引进304个大型成套建设项目，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这一阶段对外经济关系有一定的发展，但在“左”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影响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局限性。

**全方位开放阶段** 1978年至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全方位的进行对外开放，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从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开始，有重点地逐步推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经济特区，1988年又在海南岛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9月，批准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是月至翌年1月，陆续批准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广州、福州等11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地带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批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并建立保税区。1992年批准沿边境、沿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同年先后批准设立温州、昆山、营口、威海、福清融侨5个开发区；1993年批准设立东山、

武汉、长春、哈尔滨、沈阳、杭州、芜湖、重庆、萧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 11 个开发区；1994 年批准设立北京、乌鲁木齐 2 个开发区。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先后设立了上海外高桥、天津港、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大连、张家港、海口、厦门象屿、福州、宁波、青岛、汕头、深圳盐田、珠海 14 个保税区。至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由沿海地区扩展到包括沿长江、内陆边境和省座城市，覆盖全国 355 个市（县）、55 万平方千米、3.3 亿人口的广阔地区。在这些进一步开放的区域，政府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实行比其他地方更为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同时，完善立法和服务体系，率先按国际通行做法营造投资环境。这些区域已成为外商来华投资的良好场所，是中国吸收外资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这些区域里，经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新区和保税区等，是发展和改革的先行区域，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发挥着提升产业结构、辐射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扩大对外贸易，推动进一步对外开放。197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扩大地方、企业外贸权限，实行外汇留成，对以出养进的商品实行优惠税利。1984 年，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提出改革贸易体制要政企分开，减政放权。1985 年 6 月发出《关于对若干商品开征进口调节税的通知》。1988 年 5 月批准全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开业。1990 年 12 月作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2 年 2 月，中国首次对海外发行 1 亿元人民币 B 种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同年 5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有关意见。1993 年 4 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宣布，为了使外商投资企业同国内其他企业进行平等竞争，按国际惯例进行投资和经营，中国正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对外国投资实行“国民待遇”。9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边境贸易经营秩序制止假冒伪劣商品出境的通

知》。12 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发布《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1994 年 1 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营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是月，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 10 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1997 年 1 月，国务院就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10 月，国务院再次决定较大幅度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它涉及 4874 个税号的商品，降低幅度达 26%，关税算术平均税率从 23% 降至 17%。

**开放成就** 1997 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4 亿美元上升为 3251 亿美元，年均增长逾 16%，高于全球年均增长率 8 个百分点，在世界贸易排序中由第 32 位跃居世界第 10 位；1997 年末外汇储备从 1978 年的 1.67 亿美元增加到 1399 亿美元。国际旅游收入由 1978 年 2.6 亿美元升到 1997 年的 121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 8 位；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截至 1997 年底，共签订合同额 71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470 亿美元。中国与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结成经贸伙伴，开放海陆空一类口岸 240 多个，其劳务收入也很可观。除商品和服务贸易外，利用外资是重要的形式，1979 年批准利用日本政府贷款，1980 年批准设立中外合资项目。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形式已经发展为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股份制经营和独资经营，其他投资形式有对外发行股票、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中国对外借款的形式有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和对外发行债券。从 1979 年到 1997 年累计，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 3483 亿美元，除外商直接投资外，外商其他投资为 120.8 亿美元，对外借款为 1161 亿美元。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已扩展到工业、农业、商业、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等许多领域。

**长期国策** 经过 20 年对外开放，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转机。中共十五大确定，继续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长期国策。

dui Yue bianjing ziwei huanjizhan  
**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China's counter-attack against Vietnam in self-defence at the borders)

1979 年 2 至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在中越边境挑衅和入侵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

70 年代中期，越南政府开始大肆进行反华仇华活动，并宣称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迫害和驱赶在越华侨；对中国西沙、南沙等岛屿提出领土要求；片面宣布北部湾海域 2/3 为已有；对中越两国共同承认的已定边界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蚕食中国领土。据不完全统计，越军蓄意制造的边界武装挑衅和入侵事件，1974 年有 121 起，此后逐年增多，至 1978 年急剧增加到 1108 起。仅 1978 年 8 月至 1979 年 2 月的半年时间内，越军入侵中国边境地段就有 160 余处，武装挑衅达 700 余次，打死打伤中国军民 300 余人，使中国边疆的和平、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以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再三向越南政府提出规劝和警告，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但越军对中国的挑衅入侵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不断升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自 1979 年 2 月 17 日起，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参战部队在广西、云南各族人民和民兵的大力支援与密切配合下，运用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克服山高林密、路窄沟深和情况多变等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突入越军防御纵深 20~40 千米，予越军几个正规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以沉重打击，攻下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 20 多个边境城镇及战略要点，并摧毁了作战地区内越南针对中国构筑的各种军事设施。3 月 5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当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回撤。至 16 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 E

eryue niliu

## “二月逆流” (“February Counter-Current”)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坚决抗争。这一历史事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称为“二月逆流”。

**事件始末**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碰头会上，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面对全国夺权高潮造成的混乱局面，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斥责了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极端做法。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活动提出尖锐批评，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责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2月16日，继续开碰头会，斗争更加激烈。谭震林指责张春桥等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纷纷发言，对任意批斗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2月17日，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对江青作了严厉斥责，并表明自己要斗争到底的决心。16日散会后，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王

力、姚文元于当晚秘密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汇报，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定案 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异常严厉地批评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根据他的要求，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林彪、江青等人则更是歪曲事实，强加以“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并在社会上鼓动造反派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能。在196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江青等继续组织批判“二月逆流”、围攻参与抗争的老同志。

**平反**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后来逐渐有了改变。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提出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问题。指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正式平反。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Eryue Tigang

## “二月提纲” (“February Syllabus”)

1966年2月，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制定的试图限制学术讨论中过火政治批判的中央文件。全称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江青等人秘密组织的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政治批判浪潮。由于姚文元文章已经打破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要经批准的规定，为了加以控制，1966年2月3日，先于1964年7月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彭真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拟定一个新文件。彭真说：“左派”

（指关锋、戚本禹等人）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彭真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上还讨论了关锋写的把吴晗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的批判文章，多数人不同意关锋的说法。康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只是说关锋的文章经过修改，可以发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将这次讨论情况写成一个向中央汇报的提纲的决定，彭真指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执笔起草。

会后，许立群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五人小组包括康生都圈阅同意。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了关于“提纲”的汇报，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提纲的意见，要五人小组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2月8日，彭真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彭真等人到上海，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二月提纲”，他们也没有反对，但张春桥说“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的说法还需要研究。次日，彭真委托胡绳找张春桥谈话，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经邓小平批准，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指导当时的学术批判活动。

“二月提纲”将当前批判运动的性质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指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充分地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提纲”指出要慎重，要经中央批准。关于队伍，“提纲”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针对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无端政治攻击手法，“提纲”还警告说：“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个提纲是比较符合学术批判原则的，体现了彭真等人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将越演越烈的政治批判活动限制在学术范围的意图。“二月提纲”的下发，不仅限制了江青等人借批判《海瑞罢官》发动的陷人以罪的行径，同时，也给予被诬陷和批判者在学术讨论名义下辩解的一定权利。

江青等人对运动受到限制极为不满，企图制造另一事端以赢得毛泽东的支持。3月11日晚，彭真在电话中批评上海市委张春桥等人擅自发表批判《海瑞罢官》

的文章，是没有党性的行为。康生立即抓住机会，于3月28日向毛泽东汇报了彭真的电话内容，并挑动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两天之中，毛泽东与康生、江青等人在上海进行了三次谈话，他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要解散五人小组。认为北

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此后，形势发生逆转，彭真等人被迫检查，不久离开了领导岗位。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江青等人组织起草的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

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 推荐书目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

# F

fazhi guojia

**法治国家** (nation governed by law)

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和治国理论。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战略目标之一，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中国宪法，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法治国家的开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宪政运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更是要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轻视法律，排斥法治，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了通向法治国家的道路。

**发展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致力于发展人民民主，支持和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从过去领导一切转变为主要是政治领导，自觉确立和严格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把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法律），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模范作用，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革除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各种弊端，保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健全法制** 完善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加快立法，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法律在国家机构运行中的至上权威，造成良好的法律秩序，从而形成法治的基础，建构国家法治体制和各项法律制度的先决条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拥有立法和监督职能；行政机关和审判、检察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并受它监督，对它负责，由此建立依法行政制

度和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下的公正司法制度，构成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法治体制，是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法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之间的各种分工与制约关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国家机构的内部监督和党政机构的内部自我监督等机制，以及各种社会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力量，组成全方位纵横交错的网络型监督制约体系。同时，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范化、法律化、程序化，有效地发挥其控制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的效能。

中国法治国家的根本思想是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宗旨下，把国家权力限制于长期有效的法律制度及尽可能合理的操作运行机制范围之内，实现权力法治化，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化。倡导养成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用法治的基本精神引导和指导民主与法制建设，引导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增强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廉洁、高效的政权机构。

**建设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 中国有很深的封建意识和人治传统影响，正在以建设法治国家，以造就文明的法治社会为依归。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主管理、群众监督与基层自治制度加以发展完善，纳入法制轨道。在系统地建立保障公民的各项法律制度的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健全律师制度和基层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各行各业和城乡社区、企业等基层的依法治理和自治自律活动，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文明，鄙弃人治陋习的新风尚，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社会基础。

fandui baquan zhuyi

**反对霸权主义** (oppose hegemonis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一贯奉行的外交原则和立场。霸权主义是指少数大国为谋求本国利益，妄图主宰世界、瓜分世界，在世界上或在一个地区称王称霸的政策。其特征是依靠强力，践踏别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干涉和控制别国内政。霸权主义是导致国际形势紧张动荡和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

的正义斗争。50年代，美国对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政策。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人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援越抗美斗争等实际行动，挫败了美国对全球利益的图谋。

60年代末，苏联打破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凭借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到处伸手，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政策。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名义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在中国边境不断制造武装挑衅事件，同时大规模地开展军备竞赛，加速扩军备战的步伐。1968年11月，苏联抛出了“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等霸权主义理论，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出动大批武装军人及装甲车等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制造严重流血事件。9月，苏联又拼凑反华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对中国进行遏制、孤立和封锁，并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挑起更大规模的边境冲突。70年代后期，苏联不仅入侵阿富汗，还向非洲进行侵略和扩张，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针对苏联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为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中国在国内开展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备荒运动。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当时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作自己的头等战略任务，并提醒各国注意苏联已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号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进入8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但霸权主义依然存在，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仍然是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据此，中国继续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继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同时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告，中国决不称霸，永远不作超级大国。

fandui jingshen wuran

**反对精神污染** (resistance against spiritual pollution)

1983~1984年中国思想战线上开展的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

1981年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在文艺领域里，相当数量的文艺作品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



向，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潮。“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黄色书刊、录相等，污染社会风气，腐蚀青年。理论界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发表了一些有错误观点和倾向的文章。一些人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了上述现象和主要观点，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上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顾委、中纪委即分别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拥护全会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10月下旬，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就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讲话，并征求意见。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的讲话发至县团级进行学习。其间，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反对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

1984年1月27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问题。这篇文章对统一思想、推进和指导反对精神污染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是对前一段反对精神污染的总结。

1984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

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

fandui zichan jieji ziyouhua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oppose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特征是竭力宣扬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标准全盘“引进”，从根本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1981年对一些文艺作品的批评，是最早的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些作品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创作中的反映。

1982年至1983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文章中有不少关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列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所谓异化。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中，批评了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精神污染现象，特别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搞自由化就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1986年底，在合肥、上海、北京等城市，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

动、操纵一些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罢课，发生了一场学潮。12月底，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向全党提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1987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安徽省委、人民日报纪检委分别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13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9年春，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泛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北京等地出现了动乱，并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动乱平息后，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次事件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fanfubai

**反腐败**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内开展的一场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

腐败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社会丑恶现象。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国家机关中出现了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不满，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腐败行为最本质的内容是以权谋私、以权谋钱、化公为私、损人利己，主要表现为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直非常重视反腐败的工作。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反腐败章程。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提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198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着重抓了7件事：①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②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③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④严格按照规定配车；⑤严格禁止请客送礼；⑥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⑦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这些工作，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和欢迎。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8月19日，国务院监察部发布了《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机关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的通告》。8月28日，中纪委根据人民群众举报，组织了2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查处大案要案。9月1日和14日，监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分别宣布对以权谋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和海南省原省长梁湘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继续进行审查的决定。10月31日，到“两院”通告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国共有53771名违法犯罪分子坦白自首。在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36171人中，直接涉及犯罪金额35亿元；贪污受贿者占70%，犯罪金额在万元以上的超过10%；县处级干部742人，厅局级干部40人，副部级干部1人。在监察机关交待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的17600人中，涉及金额1.6亿元和一些外币；犯罪金额在万元以上的也占10%；其中处级干部679人，厅局级干部21人。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号召全党要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现象进行斗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不能很好地执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再加上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法制不完备，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致使腐败现象在1992~1993年又有所抬头。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加大反腐败力度，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月，反腐败被确定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务院监察部合署办公后的第一个工作重点。8月，中纪委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反腐败斗争是

长期的、艰巨的、又是紧迫的。会议要求全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着重抓好3项工作，务必在短期内取得阶段性成果。①党政机关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②查办一批大案要案；③刹住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10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以后《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决定》、《关于严禁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物预算管理的决定》、《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等文件相继出台，反腐败斗争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4年7月上旬至8月上旬，中共中央继对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反腐败工作监督检查之后，又派12个调查组对全国24个省（区、市）的反腐败斗争情况进行了检查监督。8月，中共中央又确定，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强调研工作，不断调整、充实反腐败工作的内容，改进工作方法；要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注重标本兼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1995年2月，国务院召开反腐败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解决4方面的问题：①正确估价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抓好反腐败各项工作的落实；③要标本兼治，进行综合治理；④切实加强领导，廉政勤政一起抓。这一年的反腐败斗争，无论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不正之风三项工作，还是建立健全制度，强化监督约束机制，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查办大案要案，清理领导干部乘坐超标准小汽车，狠利用公款吃喝玩乐风效果更为明显。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决定查处王宝森和陈希同的问题。王因严重经济犯罪和生活极端腐化，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市长等职务，罢免人大代表资格；陈因严重失职、腐化堕落，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及收受贵重物品等问题，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由有关部门对他查处。1996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反腐败的力度，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

鸣。”“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制止腐败现象。”根据这一精神，中纪委和监察部分别查处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韦泽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黄纪诚、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常征等人的问题。

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反腐败的斗争，实行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江泽民在年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毫不放松地继续推进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对政法队伍进行集中教育整顿；向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这些决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有新的进展，特别是制止奢侈浪费效果明显。②查办案件工作继续深入，突破了一大批大案要案。截至1998年12月底，在受处分的15.8万多人中有县（处）级干部5357人，地（厅）级干部410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2人。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万多件，其中大案1万多件，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干部1820人。全国法院系统审结经济犯罪案件3.3万件，其中贪污、挪用公款、渎职案件1.95万多件。通过查办案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挽回经济损失59亿元。③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几项重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进展顺利，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的目标已经达到。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在1998年底前脱钩的重大举措顺利实现；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有了进展；建立有形建筑市场工作逐步推开；村务公开制度在大部分村初步建立，一些国有企业进行了厂务公开的试点工作。

今后，反腐败斗争将在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同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fanji youqing fan'anfeng yundong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campaign to counter-attack the Right-deviationist wind to overturn verdicts)

1975年11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集团利用的批判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政治运动。195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全国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局势明显好转。整顿工作的实质，就是纠正“左”的错误，因此，整顿的继续深入和全面进行，势必发展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出现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这就为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11月，毛泽东通过指责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写给他信件，开始发动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刘冰等的信是由邓小平转交的，内容是反映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几个共产党员通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他们所在单位负责人的一些情况，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原则的。而毛泽东却认为刘冰等人的信是要否定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他本人的，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

同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由此，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首，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重新出现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层出不穷的局面。邓小平被免除大部分领导权力，只分管外事。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公开指向邓小平，邓小平被点名批

判。江青等人通过控制的舆论工具，策划种种活动，公开攻击批判1975年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以及所谓“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关于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而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草稿）。已经好转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这一运动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各种形式的抵制，十分不得人心。人们通过对比整顿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开始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1976年4月间，在全国兴起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宣告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失败。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fan jingyan zhuyi  
“反经验主义” (anti-empiricism)

1975年，“四人帮”为反对邓小平所主持的整顿工作而制造的一场政治风波。邓小平于1975年初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即着手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这引起了“四人帮”的竭力反对。他们试图利用毛泽东过去对经验主义倾向作过的批评，将各项整顿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予以否定。同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同日，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的会议上讲话，提出：“林彪搞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攻击第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的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4月1日，张春桥又发表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要“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江青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他在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5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对发表张春

桥文章承担了责任，同时对江青等人作了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四人帮”被迫作了检查。“反经验主义”的活动就此停止。

fan maojin  
反冒进 (rejection of “rash advanc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1956年周恩来、陈云为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确保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与综合平衡所采取的正确决策和成功实践。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要抓住国际形势缓和的机遇，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的意见后，国内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讨论确定1953~1967年远景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和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出现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倾向；实际工作中的盲目冒进势头迅速发展，基本建设投资、职工人数和福利支出、支农贷款发放等工作开始失控。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陈云等明确提出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提出经济发展要实行既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国务院对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压缩。将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从21.7%降为19.7%，粮食产量增长率从9.1%降为8.4%，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率从68%降为62%。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冒进势头基本受到遏制。6月以后，周恩来、陈云等又把反冒进的注意力转向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纳。此后，周恩来等又为编制好1957年的经济计划继续反冒进。1956年反冒进不但使当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使1957年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之一。1956年反冒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地纠正经济建设中的盲目发展、急躁冒进倾向、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的一个成功范例。

fanxiu fangxiu Jiaoyu yundong  
“反修防修”教育运动 (universal education in the need to condemn and prevent revisionism) 20世纪60年

代初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以反修防修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双方的公开论战，进而发展为两国之间的争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政党。因此，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在全国城乡发动了多次普遍的“反修防修”教育运动。毛泽东多次讲话表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反修防修”教育运动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由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一直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因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甚至把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

fan youpai douzheng

**反右派斗争** (anti-rightist struggle) 1957年5月至1958年6月开展的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

中国共产党于1957年4月开展整风运动。其间，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共提批评建议。广大群众和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大鸣”、“大放”、“大民主”之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人民群众的不满。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布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6月9日、10日、11日又相继发表《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等三篇社论。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分子进攻的运动在党内、党外全面展开。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成为全国反右派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把反右运动迅速推向高潮。7月17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对反右派斗争作了进一步部署。为了防止过于简

单化的做法，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先后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25日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告》，8月29日发出《关于对右派分子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的指示》，9月4日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10月25日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等。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加上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这场运动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当时把大量认识上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当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甚至把一些人响应号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也当作了右派进攻。许多党的好干部、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受到了伤害，被错误地批判和斗争，并在组织上受到处理。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被开除了公职，监督劳动；有的被开除了学籍，实行劳动教养。这些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极大的损失。据统计，到1958年6月前后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被错划的。

从1959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为止，先后5批给大多数被错划的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未予以平反。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全部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有54万余人恢复了政治名誉。

#### 推荐书目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fanyouqing huichao

**“反右倾回潮”** (“combat against the resurgence of Rightist deviation”) 1972~1974年，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发动的攻击活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并在实践中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消除极左思潮的恶劣影响，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这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他们针对周恩来的纠“左”，提出所谓“反右倾回

潮”。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意见，发表了3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个阴谋家的丑史》。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立即组织追查文章的“背景”，授意《文汇报》内刊《文汇情况》登载批驳文章，借所谓上海工人之口攻击文章是“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同年11月30日，周恩来审阅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张春桥、江青却认为当前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在周恩来同江青等人发生尖锐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12月17日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主张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从此，报刊上不再提批判极左思潮，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等人乘机发动了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制造出种种典型：1973年夏，他们编造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树立一个“白卷英雄”（见“白卷”事件）；12月又制造《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树立一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提出要警惕教育领域的“修正主义回潮”等。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他们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上揪“代表人物”，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下扫“社会基础”，对广大教职工进行打击和迫害。仅清华大学就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受到批判，受到点名指责或被迫作检查交待的人为更多，一批干部被无理撤销工作。“反右倾回潮”运动很快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波及其他学校，从教育界波及其他各界，为此后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使明显好转的局势再度混乱。1977年12月，清华大学党委决定：为“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受打击和迫害的干部和教职工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77。

fanyouqing yundong

**“反右倾”运动** (“anti-right Opportunism” Campaign) 1959年8月至1960年春，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批判所谓“反对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

运动的发起 “反右倾”运动的部署和发动，是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尚在进行中开始的。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重要危险。它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同时，全会还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反右倾”运动在初期，主要是在党政军的中高级机关中进行，重点解决中高级干部的问题。10月，中共中央陆续推广和介绍了湖南、北京、广东、上海、二机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地区 and 部门开展“反右倾”运动的经验，认为“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和部队的一般党员干部中也有。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都必须深入开展“反右倾”运动，检查和清除“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

运动的展开 各机关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领导干部，主要方式是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主要步骤分为3个阶段：学习文件、酝酿和准备阶段，向党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专题辩论和系统提高阶段。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因对经济建设中的错误持有不同意见受到批判和处分，特别是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各工厂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是领导干部，对广大职工群众则以正面教育为主。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由于批评“大跃进”中片面强调政治挂帅，

不切实际地大搞群众运动，造成经济建设的损失，主张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而被当成了反对党的领导“右倾言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而受到批判和处理。

农村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方式是整党整社，斗争的重点除干部外主要对象是富裕中农，主要内容是保卫“三面红旗”，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由于打击面过宽，大批的农民党员甚至党外群众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如对农村的“反右倾”运动抓得较早的湖南省，在运动中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占总人口的1%。

学校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党员骨干教师128人中有2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清华大学参加运动的党员骨干教师174人中有17人被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

部队的“反右倾”运动，至1959年11月底，全军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达1800多人，其中团职以上干部近200人。此后，仍继续深入揭批各级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右倾反党罪行”。

“反右倾”运动的初期和中期，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制定一个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各地区、各部门自定“标准”，普遍发生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广大干部的倾向。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于1959年11月4日下发了《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批判对象的问题的意见》，27日下达了《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1961年1月20日又下发了《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应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查的”。这些文件规定的标准是极为错误的。

运动的后果 “反右倾”运动至

1960年春陆续结束，运动中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60多万人。

“反右倾”运动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风、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中断了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 Fan Changjiang

**范长江**（1909～1970）新闻事业家。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1909年10月16日生。1927年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西北地区采访报道，所写通讯第一次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赴延安采访，发表通讯《陕北之行》，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华商报》等，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到延安，任新华日报社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新华通讯社四大队队长、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新闻事业的领导工作，历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10月23日逝世。1978年中央有关部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著作有《中国的西北角》等。论著收入《通讯与论文》。

### Fan Wenlan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初字芸台，后改仲云。浙江绍兴人。1893年11月15日生。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1914年进文本科学国学门，1917年毕业于并获学士学位，曾任校

长蔡元培的秘书。1918年春赴辽宁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并兼南开大学教授。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秋开始，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授课之余，勤奋笔耕，相继出版了《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2月去延安，先后任马列学院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包括古代和近代）的工作。1941年和1942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北宋至清中叶）。1948年2月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4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即《中国通史简编》下册。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并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52年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至1965年出版了上古至五代部分，共4册，以后多次再版。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和《文心雕龙注》等。

Fang Yi

**方毅**（1916~1997） 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又名方清吉、方静吉。福建厦门人。1916年2月26日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193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1944年任淮南苏皖区党委委员、淮南行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苏皖边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兼财经委员会秘书长、财政厅厅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鲁皖边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军管会副主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1951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56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总顾问、经济代表处代表。1961年回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1970年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78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委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10月17日逝世。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fangzhi gongye

**纺织工业** (textile industry)

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指纺纱、织造工业；广义的还把原料初加工、缫丝、染、整、化学纤维生产，以至服装工业和相关工业纺织机械、器材的制造工业包括在内。按照“大纺织”的行业口径界

定，中国的纺织工业包括：①从事纺织品生产的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绸纺织、印染、针织、复制、无纺布等行业；②从事服装设计、制造、销售的服装业；③从事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和粘胶纤维）生产的化纤工业；④从事纺织、服装、化纤专用机器设备和专用器材制造的纺织机械、纺织器材行业。

现代纺织工业的最终产品有：①服装，包括梭织服装和针织服装；②家用纺织品，如毛巾、被单、窗帘、沙发布、地毯；③产业用纺织品，如土工布、轮胎帘子布、阻燃纺织品工业用呢。随着成衣工业化的推进，服装业在整个纺织工业的生产经营中起到了龙头作用。

纺织工业作为一个密切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产业部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纺织大国。

**发展基础**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以其发达的手工纺织业和精湛的手工纺织工艺技术，为丰富、发展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等多种历史原因，直到19世纪后期，机器纺织工业才开始在中国出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洋务运动”中陆续建成的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四局，开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先河。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实业救国”的召唤下，这一关系国计民生、投资效果较好的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到20世纪上

表 1 1949~1978年纺织工业各主要经济指标对照表

项 目	单 位	1949年前最高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年 份	数 量			
纺织工业总产值	亿元	-	-	-	109.5	619.9
纺织工业职工数	万人	1948	75	75	96.9	396.3
纺织工业税利	亿元	-	-	-	7.2	118.4
占全国财政收入	%	-	-	-	3.8	10.0
全国穿的商品零售额	亿元	-	-	-	50.8	278.5
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	-	-	-	19.3	22.0
纺织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	-	-	0.4	23.3
占全国出口总额	%	-	-	-	5.2	23.9
棉纺织工业	万锭	1946	516.5	499.5	561.0	1561.9
棉纱年产量	万件	1933	244.7	180	362	1327.9
棉布年产量	万吨	-	-	32.7	65.7	238.2
毛纺织工业	亿米	1936	27.8	18.9	38.3	110.3
呢绒产量	万锭	1948	12.9	12.9	12.3	47.8
丝绸工业	万米	1947	751	544	423	8885
蚕丝产量	万绪	-	-	8.9	16.7	72.2
丝绸产量	万吨	1929	1.66	0.18	0.56	2.97
化纤产量	亿米	-	2.2	0.50	0.65	6.11
化纤工业生产能力	万吨	-	-	-	-	28.5
服装（梭织）产量	亿件	-	-	-	-	38.1
						6.73

半叶, 逐渐成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业。1933 年占全国工业经济的 65.5%, 1947 年占 52.5%。虽然发展过程历尽坎坷, 到 20 世纪中期, 终究还是以棉纺 500 万锭、毛纺 13 万锭和棉纱最高年产量 245 万件 (每件 400 英磅)、棉布最高年产量 28 亿米和 17900 个企业、75 万职工的工业总规模, 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部门。

**体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纺织工业。开国不久 (1949 年 11 月), 即设立中央纺织工业部管理这个重要的产业部门。1970~1978 年间, 纺织工业部曾与第一轻工业部, 第二轻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 其后又分立。许多省和直辖市、自治区, 相应设立纺织工业厅、局、总公司。一些拥有较多纺织企业的二级市 (如江苏的无锡、常州, 山东的青岛、济南) 以至县级市 (如江苏的武进、锡山), 也设立了类似的纺织工业管理机构。在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 中国纺织工业实行统筹规划、分级管理的体制。纺织工业部一抓计划指导, 二抓生产手段, 三抓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 四抓全行业的定额管理。棉、毛、麻、丝各种主要原料由政府按计划调拨; 棉纱、棉布、呢绒、丝绸等重要产品的生产计划由政府审批, 产品的销售全部由政府安排国营商业统购统销; 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都由政府全额拨款, 企业利润如数上缴国库。在短缺经济时期, 这一宏观控制较严的管理体制, 保证了纺织工业产供销的协调平衡, 起到了保障全国人民衣被供应、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历史作用。许多企业以至纺织系统领导机关, 片面追求产值产量; 企业难以自主经营, 普遍缺乏活力。

80 年代后期, 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 作为消费品工业的纺织业, 迅速被推入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各地国有纺织企业逐步转为自主经营, 并由生产型转为生产经营型。非公有经济成分的民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纺织业大量涌现。适应这一新形势, 国家对纺织工业的管理逐步转向采用经济办法。1993 年 6 月, 纺织工业部改组为“中国纺织总会”。国务院授权它对全国纺织行业进行行业管理, 重点是“搞好行业规划, 实施工业政策, 进行宏观指导和为企业提供服务”。1998 年 4 月, 进一步改组为“国家纺织工业局”, 并在同年 9 月, 设立社团性质的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发展历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表 2 1978~1998 年纺织工业各主要经济指示对照表

项 目	单 位	1978 年	1990 年	1997 年	1998 年
纺织工业总产值 (分期不定价)	亿元	619.9	3411.0	7149.0	6933
纺织工业主要行业职工数	万人	396.3	1203.8	1064.9	-
纺织工业税利	亿元	118.4	229.6	284.0	-
占全国财政收入	%	10.0	7.82	3.28	-
全国穿的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278.5	1182.2	2952.7	2900
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	22	16.3	11	9.9
纺织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23.3	138.5	455.8	428.9
占全国出口总额	%	23.9	22.3	24.93	23.3
棉纺织工业	万锭	1561.9	3882.0	4245.6	-
万件		1327.9	2574.1	3121.9	-
棉纱产量	万吨	238.2	462.6	561.8	542
棉布产量	亿米	110.3	188.8	248.7	241
毛纺织工业	万锭	47.8	265.9	387.0	-
呢绒产量	万米	8 885	29 505	38 808	-
丝绸工业	万绪	72.2	202.6	323.7	-
蚕丝产量	万吨	2.97	5.66	8.3	-
丝织品产量	亿米	6.11	17.12	65.3	-
化纤工业生产能力和产量	万吨	38.1	202.45	504.6	-
化纤产量	万吨	28.6	165.42	460.5	516
服装 (梭织) 产量 (含服装企业生产的针织面料服装)	亿件	6.73	31.75	96	97

20 世纪末的 50 年间, 中国纺织工业取得了大发展, 成为世界公认的“纺织大国”。以 1978 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奠定基础时期** 前 30 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轨迹是: 纺织工业经过 3 年经济恢复时期后, 在前四个“五年计划”中, 尽全力扩大棉、毛、麻、丝纺织各行各业的生产规模, 增加各类纺织品的产量, 努力保障全国人民对衣被的基本需要, 并挤出一些高中档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换取外汇。同时, 强调通过发展纺织工业, 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提高城镇居民的就业水平。在这 30 年间, 尽管曾遭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 历尽坎坷, 终究还是大踏步地前进了。特别是, 在纺织工业总规模扩大 4 倍的情况下, 全国穿的商品零售额由 50 年代初的 50 亿元上升为 280 亿元左右; 从采用布票进行计划供应、限量消费, 到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衣被的大问题, 并奠定了“纺织大国”的基础 (表 1)。

**基本解决纺织工业布局。**1949 年前, 纺织工业畸形集中在沿海三省 (江苏、山东、辽宁)、二市 (上海、天津)。1949 年, 全国 500 万棉纺锭中, 84.4% 集中在这三省二市, 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 236 万锭。毛纺织工业, 90% 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几个沿海城市。针织工业, 80% 的机器设备集中在上海、广州二市。这一很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不利, 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都会产生多

方面的不利影响。从 50 年代开始, 国家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同时, 大规模地开展了中西部省、区的建设。棉纺织工业, 先是在原料资源、交通运输、工业协作条件较好的关中、中原、冀中平原, 建成了西安——咸阳、郑州、石家庄、邯郸、北京等总规模达 200 万锭左右的新基地。其后, 又陆续在太原、合肥、芜湖、南昌、柳州、成都、黄石、沙市、洛阳、安阳、乌鲁木齐、济南、潍坊等地建设了一大批颇具规模的棉纺织、印染工厂。这些地区后来都形成了中、小型纺织工业基地。到 70 年代后期, 北方五省 (鲁、冀、豫、晋、陕) 拥有的棉纺锭已占全国的一半。在工业布局作如此重大调整的情况下, 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 浙江的杭州、宁波, 辽宁的大连、营口, 山东的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棉纺织印染业, 依靠技术和经营优势, 同样得到发展。

在有计划的安排下, 毛纺织工业着重在中西部羊毛产区建设新厂, 逐步形成了兰州、呼和浩特、西宁、咸阳和新疆北部等毛纺织新基地。到 70 年代后期, 毛纺织工业已遍布全国大陆 29 个省、市、自治区, 成为中国纺织工业分布最广泛的一个行业。沿海地区和内地省、区毛纺锭的比例调整为 2:1 左右。麻纺织工业, 先后在黄麻产区的杭州、蚌埠, 苧麻产区的株洲、益阳、都匀、铜陵, 亚麻产区的哈尔滨等地建成现代化麻纺织工厂, 形成了以

“就原料”为特征的麻纺织工业布局。丝绸工业，从高度集中在江苏（苏南）、浙江、广东、辽宁、上海四省一市，逐步演变为四川、浙江、江苏、辽宁、广东、山东、上海“七雄”竞争的格局。七省市蚕丝产量占全国90%以上，丝绸产量占80%左右。至于针织工厂和中小型棉织厂，由于投资少、产品易于就地销售，到后来更是形成了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格局。总的来说，经过二三十年的“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到70年代后期，中国纺织工业已基本做到了合理布局。

完善了纺织工业行业结构，形成在各国纺织业中行业最齐全的优势。这一进展，反映了中国纺织工业利用原料资源和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状况，也反映了纺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它包括：①在丰富、发展纺织工业的原料资源方面，跟上世界范围的大趋势，着手发展化学纤维工业并初步奠定基础；②适应纺织工业大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实力可观的纺织机械工业和纺织器材工业；③棉纺织印染工业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导行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在纺织工业部门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87.8%降到70年代后期的75%以下，毛、麻、丝纺织和针织的比重则显著上升；④纺织系统各行业内部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派生出许多小行业如毛巾、被单、羊毛衫、拉舍尔毛毯等。产业结构的这些调整，不仅使中国纺织工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部门，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纺织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建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前30年中，成立的主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有纺织科学研究所、纺织机械研究所、华东纺织工学院、西北纺织工学院等50多所，形成了相当雄厚的科技开发力量和人才培养体系。

形成一整套科学管理制度。中国纺织工厂的运转管理、工艺管理、操作管理、设备管理、原料管理、质量管理等，都在这个时期打下了良好基础。

**加速发展时期** 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间，在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激增、纺织业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刺激下，纺织工业成了投资热门。在地方投资新建、许多国有企业改建扩建、乡镇企业兴起、外资企业涌入等多方面投资汇合下，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绸纺织、针织、印染、服装、化纤、纺机等的生产能力，又在1978年的基础上成倍地扩大。棉纺织生产规模从1562万锭扩大到1997年的4246万锭；毛纺织生产规模从48万锭扩

大到387万锭；缫丝生产规模从72万锭扩大到323万锭（表2）。到90年代后期，中国棉纱、棉布、丝绸、针织品、梭织服装等多种主要产品的年产量，都已稳居世界首位。化纤和呢绒，也已处于世界第一、二位之间。惊人的发展速度，带来了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的日益丰富多彩，从而适应了中国社会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客观需要。实行了长达30年的布票制度，终于在1983年得以终止。纺织品出口，也因货源极为充分而得以顺利发展。

①化纤工业后来居上。化学纤维的工业化生产，就世界范围来说在20世纪初始于粘胶纤维（人造丝）。1920年世界上总共仅生产出人造丝1500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有合成纤维（主要是尼龙长丝）的工业化生产，但年产量仅几万吨。二战结束后，各国纷纷发展化纤工业。1950年世界化纤总产量达到168.1万吨，到90年代后期世界总产量已达两千几百万吨。

中国有化纤工厂，晚于工业发达国家20多年。最早的两家人造丝厂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一家是在辽宁丹东的日资工厂，设计能力为年产三四千吨，1945年后停产多年并遭受严重破坏；一家是上海民族资本的安乐人造丝厂，设计能力为400吨，但因设备缺损久久不能投产。

50年代初，国家修复丹东化纤厂和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并使之投产。50年代中期从东德引进设备、技术，建设年产1000吨尼龙丝（锦纶）的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和年产5000吨的保定人造丝厂。这4个厂是中国化纤工业的奠基石。但直到1965年，全国化纤产量还仅是5.01万吨。60年代从日本引进万吨级规模的北京维尼纶厂。以后在全国各地建设了9个维尼纶厂，形成了一个专门行业。七八十年代，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大力发展以石油、天然气为基础原料的合成纤维，先后在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大港）、重庆（长寿）建成4个大型化纤企业，在河南（平顶山）、江苏（仪征）等地建成多个大型合成纤维工业基地。其中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是年产聚酯50万吨的世界级特大型化纤基地。

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之下，随着一些大中型化纤工厂的建成，到1982年全国已有化纤工厂153家（其中大中型厂30多家），化纤产量已达51.7万吨。1986年化纤产量突破一百万吨大关（101.7万吨），1992年突破二百万吨大关（211.1万吨），1997年达461万吨（其中合成纤维316万吨，粘胶纤维45万吨）。1997年中国化纤工业生产能力和

504万吨，仅次于美国。不仅从粘胶人造丝、人造棉，到合成纤维类的涤纶（的确良）、腈纶（合成羊毛）、锦纶（尼龙）、维纶、丙纶、氨纶（弹性丝），品种齐全，而且都有相当大的工业规模。化纤使用量在全部纺织原料中的比重，已上升到45%左右。1998年，全国化纤总产量又创516万吨的新纪录。

②成衣工业化。以工业方式批量生产梭织衣料的服装，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生产西式衬衫。但直到40年代中后期，服装工业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期。1949年，全国共有服装工厂（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工场）2000家左右，职工5万余人，工业化成衣约4000多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年间，社会购买力不高，服装加工归第二轻工业部手工业局管理，发展相当缓慢。1963年全国服装工业产量仅达2.56亿件，1978年仅6.70亿件。

为促进服装工业的发展，1987年11月国务院作出将服装工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管理的决定。当时全国服装工业年产25亿件左右。其后，国家在政策上多方扶持，再加上社会购买力迅速提高，人们解除了“衣着打扮”的思想禁锢，服装工业很快就出现了超速发展的局面。全国服装工业产量，1990年达到31.7亿件，工业产值500多亿元；服装企业35000多家，职工300多万人。1997年全国服装生产企业已达4.4万家，服装产量达到96亿件左右（这还不包括90亿件的针织服装）。同年，国内市场衣着类商品零售额达到2950多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10倍多）；服装和衣着附件出口创造了317亿美元（其中梭织服装169亿，针织服装117亿）的历史纪录。

1997年服装工业销售收入百强企业中，最高的达38.67亿元，最低的1.2亿元，新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美尔雅、黎明、康富、雅鹿等著名服装大企业。

随着现代服装工业的建立，中国的工业成衣率，由80年代中后期20%~30%的基础上迅速上升，1991年达到40%。90年代后期达到70%左右，已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85%接近了。

③从限制消费到鼓励消费。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就直面人民群众衣被供应的严峻问题。1949年全国生产棉布18.9亿米，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仅3米多。1952年全国生产棉布38.3亿米，创历史最高



水平,人均也仅6米多,只能勉强维持全国城乡市场纺织品供应。1953年全国棉布产量上升为47亿米,比1949年增加了150%,但纺织品供应仍然吃紧。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4年9月15日起,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就这样,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发布票限量供应、限制消费的短缺经济漫长历程。经过“一五”的顺利发展,1957年国内市场棉布零售量为46亿米,同年纺织工业生产棉布50.5亿米,在低水平上保证了供应。但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把纺织工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工厂因缺乏原料停工数年,棉纱、棉布产量锐减,“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更加突出。直到1965年国内市场限量销售的棉布仅47.1亿米,甚至低于1957年的供应水平。“文化大革命”局面稍许稳定后,国家在抓棉花生产的同时,集中资金建设上海石化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等大型化纤基地。纺织生产迅速复苏。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纺织工业生产显著上升。当年棉纱产量达到1162万件,棉布达到94亿米,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布的国内销售总量69.5亿米,比1952年(30.8亿米)增加1.3倍。

1978年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指引下,纺织工业开始进入黄金时期。1981年布的生产量又创153.5亿米的历史纪录。同年国内棉布销售量创96亿米的新水平。这一年,呢绒销售量1.6亿米,绸缎3.8亿米,针棉织品9.5亿米,都创历史纪录。经国务院审议后,1981年12月1日商业部发出通告:“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和絮棉票。”

从1984年到90年代后期的十六七年间,中国最先在纺织业发生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出现了时装工厂、时装公司、时装杂志、时装设计师、时装模特等鼓励消费的事物。“人民衣被甚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已成为过去。

④纺织品出口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仅有少量针、棉织品出口南洋诸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十几年间,中国致力于解决国内市场纺织品供应问题,再加上遭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无力也难以大举进入国际市场。五六十年代,仅有少量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苏联和东欧。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总额1952年仅0.4亿美元。60年代起,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纺织工业把纺织品出口的重点转向欧、美、日本、东南亚市场。1978年出口总

额达23.3亿美元。以后随着纺织工业的大发展,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抓住西方国家纺织工业实行战略转移的有利形势,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额大幅度提高;1990年达到138.5亿美元,几乎是1978年的6倍;1992年又跃升为253.4亿美元,进入世界纺织品、服装主要出口国行列。

1993年后的一些年份,由于中国服装业的产品日趋精良,同时又有服装来料、进料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因素,纺织品、服装出口继续呈现跃进局面。1997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455.8亿美元(其中服装317.8亿),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4.93%。同年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达330亿美元,约占中国全部商品贸易顺差的3/4。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29亿美元的较高水平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稳居纺织产品出口“世界第一”的地位。

⑤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三资企业三足鼎立。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引导下,外资和民间资金成了纺织工业腾飞的新动力。截至1997年底,开业投产的纺织业三资企业已有1.5万家,总共吸纳外资150亿美元;其工业产值、出口额、利税已分别占到纺织工业的22%、27%和24%。

集体经济(主要是乡镇企业)的企业在90年代后期已达3万家左右,职工人数近500万,产值近4000亿元(已相当于国有经济的195%)。私营纺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其热点地区在浙江、江苏、福建,尤以浙江省最为活跃。福建的石狮,浙江的绍兴,江苏的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地,在乡镇企业和私营纺织企业烘托下,到90年代中后期已成了著名的纺织城或服装城。

全国纺织业上市公司,到1998年也已达70多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业史上是空前的。90年代后期,中国纺织工业以其2/3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造成了城乡纺织品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以其1/3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形成了纺织品出口大国的地位。

**问题与展望** 50年中,中国的纺织工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进展,成为世界纺织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力度不够,因而到90年代中后期,出现棉纺织、毛纺织、丝绸等加工生产能力总量过剩的问题;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下滑,不少企业陷于亏损。针对这一新情况,国务院于1997~1998年先后作出压

缩淘汰1000万枚落后棉纺锭、100万枚落后毛纺锭、180万锭缫丝设备的决策。今后中国纺织工业将通过调整结构、改善内涵、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而继续得到发展。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完成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 推荐书目

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

吴文英主编:《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1997。

feichu diguo zhuyi zai Hua tequan  
**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abolition of imperialist privileges in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项重大举措。

近百年来,根据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享有驻军权、内河航行权、司法权、自由传教权、海关管理权、自由经营权等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放弃了在华的某些特权。但是,美国战后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取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在华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这些特权。1951年6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美国、法国和荷兰的在京兵营,三国领事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加以抗拒。中国发表声明,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均坚决取缔之。三国无奈地交出兵营。对在不平等条约下所形成的外国在华资产,中国则根据有关情况,有步骤地加以清理。例如,1951年4月,港英当局非法征用在港的中国“永灏”号油轮,交给英国海军用于朝鲜战争;中国当即征用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中国各地除办公外的财产并征购其石油。1952年7月,英国枢密院宣布将中国中央航空公司所属40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美国民用运输公司”;8月,中国则征用上海英资英联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的全部财产。10月,英国高等法院又将中国航空公司所属31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美国民用运输公司”;11月,中国则征用上海英资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上海、天津和武汉的英资茂洋行的全部资产。对于其他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中国也都全部予以废除。

Fei Xiaotong

**费孝通** (1910— )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五、

六、七届中央主席。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字彝江。江苏吴江人。1910年11月2日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研究社会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撰写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江村经济》（即《农村生活》）。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2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在美国的应用人类学年会上，获得马林诺斯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并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选为荣誉院士。是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第四、五届中央副高，第五、六、七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杰出贡献，尤其重视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民族与社会》、《乡土中国》等。

fenpei zhidu gaige

**分配制度改革** (reforms in distributive system)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和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为特征的收入分配体制，逐步地改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收入分配体制。它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和带动，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是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领域分别进行的。

**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是以实行生产队（或大队）内部集体分配形式为主的分配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生产队内部分配倾向于平均主义，而生产队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平均主义的分配方

式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既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根本变革，也是农村收入分配体制的重大变革。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保证了农民的劳动经营收入与其生产经营成果直接挂钩。在这种分配体制下，农村家庭经营收入除了缴纳国家的税金和集体的提留外，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土地的自主经营也给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有效地配置资源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样，劳动已不再是决定收入的唯一要素，对土地的投资，科学的管理和经营方式，新技术的引进与创新，市场信息的充分利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农民收入的多少。这种分配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后，长时期内保持，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当然，这种分配体制也没有改变传统体制下的村与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城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体制具有更严重的平均主义特征。城市经济成分是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其中的集体所有制工资分配也被计划体制牢牢控制。城市企业职工的收入为单一的工资收入。职工的工资等级，工资标准和工资水平全部由国家统一控制。企事业单位不具有任何分配上的自主权。这样一种分配制度阻碍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1985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的通知》标志着城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开始。从此，城市分配体制的改革分别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管理体制由过去的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地转向由企业自主管理。二是允许城市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与发展。在改革初期，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首先实行了奖金激励机制，将奖金的分配与企业职工的劳动贡献直接挂钩；后来又实行了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成比例浮动的办法。为了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分配自主权，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它明确规定了企业享有工资、奖金的分配权，其中包括企业有权自主使用根据工效挂钩办法提取的工资总额；有权决定工资和奖金的分配档次；有权实行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工资制度和分配形式；有权制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在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效益增长率和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从此，城市国有

和集体企业具有了较为充分的分配自主权，国家有关部门1992年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分配。城市经济中不断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带来了分配体制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这些企业中，除了劳动之外，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土地、管理者才能以及风险意识等生产经营要素都参与收入分配过程。从实践需要出发，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中国的分配制度确定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现在逐步落实。

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再分配体制也在逐步建立。它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内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最低生活费救济，农村内部的一系列扶贫救济政策和措施。这对于抑制中国现有收入差距不合理的过大的趋势会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fensui Sirenbang

**粉碎“四人帮”** (smash of the “Gang of Four”)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果断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措施。江青反革命集团因其核心人物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通称“四人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请示报告。张春桥还暗地对上海的亲信作了许多布置，嘱咐他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示意“上海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江青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吵闹。他们还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并且四处游说，进行煽动，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把攻击矛头对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人。

“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早已使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陈锡联、苏振华、耿飏、杨成武等老同志深感忧虑。他们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也认识到必须消除党内这个祸患。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后，他经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

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个斗争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范围,不可能采取党内生活的正常手段来进行,但应尽量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因此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吴德等人受命进行了安排。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决定。对“四人帮”在北京的其他帮派骨干,也实施了隔离审查。同时,中共中央还派人控制了新华社、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重要舆论机关。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拥护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的果断措施。会议决定了一些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10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又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上海的局势,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划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集会活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粉碎“四人帮”是中共中央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

fengshou jihua

**丰收计划** (Program for Good Harvest) 中国农业部 and 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农业科技综合推广计划。1987年开始实施。其主要任务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大批农牧渔业成熟的科研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大面积、大范围综合运用用于生产,促进农牧渔业丰收,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增产增收,振兴农村经济。其目标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丰收计划项目由农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统一组织,归口管理。财政部给以资金支持。1987~1996年,中央财政支持该项计划专项资金累计达3.35亿元,各地配套资金达40多亿元。

该计划实施的重点是:在项目上,突出抓好粮棉油及畜禽、水产品等优良品种的栽培、养殖新技术的应用,集中力量抓好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为代表的粮棉油糖优良品种,以二元、三元瘦肉型杂交猪为代表的畜禽水产新品种,以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稀植抛秧、化肥深施等一大

批最新良种和先进适用技术,以北方暖棚饲养畜禽和稻田养殖鱼蟹等为代表的栽培新技术。在区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区和粮棉主产区为主,突出中低产田改造,努力提高资源产出率和投入回报率。在工作指导上,突出抓好技术指导、骨干培训和项目管理,全面提高丰收计划的实施效果。

丰收计划实施10多年来,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发展高效农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开始实施到1996年9月的10年间,全国推广面积达13亿亩次,科学饲养畜禽4亿多头(只),科学养殖水产品560万亩。10年间,参加实施该计划的科技人员达90万人次,推广科技项目257类,有5万多名科技人员获奖,共培训农民2亿多人次。与此同时,丰收计划还实现了行政、技术、资金、物资优化组合,为中央投资、地方配套积累了经验,并且推动了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调动和增强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为加速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探索了有效途径。

Fengyun qixiang weixing

**“风云”气象卫星**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Fengyun”) 采用遥感技术对地球大气以及陆面、海洋环境进行监测的一种人造地球卫星。同地面常规气象观测相比较,气象卫星观测不受时间、空间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具有探测资料种类和数量多、范围广、时效快、频次高、全天候观测等特点,成为大气探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风云”是中国气象卫星的名称。中国研制气象卫星始于1969年末。1988年9月7日5时30分(北京夏令时),中国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缩写为FY-1A),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研制并发射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接着,1990年9月3日9时53分(北京夏令时)中国又成功发射了FY-1B气象卫星。这两颗卫星24小时绕地球运行14圈,每天可对全球观测两次,星载探测仪星下点分辨率为1.1千米。卫星具有存贮功能,因此能够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云层和地表特征资料,除卫星云图外,通过加工可生成云层温度、海面温度、长波辐射、植被指数等多种环境参数数据。1999年5月10日9时33分(北京时)中国用1枚“长征”

四号乙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地发射了FY-1C气象卫星和实践五号科学实验卫星。中国又于1997年6月10日20时01分(北京时)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另一种气象卫星——“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缩写为FY-2),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六个拥有静止气象卫星的国家。FY-2号气象卫星定点于东经105度赤道上空36000千米高度上,它能够多时次地提供以中国中部为中心的1/3地球表面的卫星观测资料,填补了中国西部以及印度洋上气象观测资料的空白。

Feng Lanzhou

**冯兰洲** (1903~1972) 生物学家。山东临朐人。1903年8月24日生。1929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1933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利物浦热带病与热带卫生学院。回国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系主任、教授。1948年后,历任协和医院寄生虫学副教授,1958年兼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医科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医学昆虫学奠基人之一。确定了中国疟疾、丝虫和黑热病的主要蚊虫媒介,并对中华白蛉传播黑热病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为防治中国主要的寄生虫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著有《医学昆虫学》、《寄生虫病学》等。1972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Feng Youlan

**冯友兰** (1895~1990) 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895年12月4日生。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读研究生,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8~195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9~1952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46~1947年任美国本薛文尼大学客座教授、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1952年获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

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主要著作有：《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史》、《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精神》（英文）、《中国哲学简史》（英文）、《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1990年11月26日逝世。

Feng Zhi

**冯至** (1905~1993) 诗人、翻译家。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1905年9月17日生。1921~1927年先后在北京大学预科和德文系学习。其间参加过浅草社、沉钟社等文学团体。毕业后在哈尔滨、北京任教师。1930~1935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同济大学附中任教。1939年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1年任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主要诗集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西郊集》、《十年诗抄》等。译作有《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由于他在研究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做出重大成就，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学院颁发的歌德奖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学”奖。他又是研究杜甫的专家，著有《杜甫传》、《白发生黑丝》（历史小说）。还著有《论歌德》、《诗与遗产》（论文集）等。1993年2月22日逝世。

fu pin gong jian

**扶贫攻坚** (key measures in help-the-poor program) 中国政府为在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实施的国家战略，1994年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首次提出。

**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3年，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5年，推行家庭承包经营，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下降了50%，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从30.7%下降到14.8%，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这个阶段贫困缓解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总体发展。70年代末期，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随着农村改革的全面展开，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增长，农村贫困明显缓解。第二阶段从1986年到1993年，主要进行扶贫开发，因而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稳定减少。针对部分地区发展缓慢，相当落后，部分农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开发式扶贫方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并于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中央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物资，制定了有利于贫困地区休养生息的优惠政策，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农民发展种养业。到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从1.25亿减少到8000万，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4.8%下降到8.72%。

**内容** 以1994年3月公布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起点，进入扶贫攻坚阶段。该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时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地区、水库库区和地方病高发区，地处偏远，缺少摆脱贫困的手段，必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贫困人口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扶贫到户。为了加快扶贫攻坚进程，1996年9月召开了中央扶贫工作会议，采取一系列新的更加有力的措施。

**成效**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多年以来，扶贫开发工作从各个方面都加大了力度，努力向西部地区倾斜，向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特别是贫困乡、贫困村延伸，强调扶贫工作进贫困村、入贫困户。各地总结并推广了一系列扶贫到户的成功经验，如党员干部包扶到户、实体带动效益到户、统一规划项目到户、异地开发移民到户、社会各界帮扶到户、小额信贷资金到户。截至1998年底，全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4200万。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力争1999和2000年每年解决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以确保如期完成扶贫攻坚任务。

Fuxin Haizhou Lutian Meikuang

**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Haizhou

open-pit coal mine at Fuxin)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阜新矿区建成的全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煤炭生产以全面恢复为主，少量新建煤矿则以东北地区为重点。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开始建设海州露天煤矿，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海州露天煤矿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3年7月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300万吨，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它的建成不但为东北重工业基地直接提供了大量优质煤炭，而且为“一五”时期在阜新建设全国规模最大的坑口电厂奠定了基础。

Fudan Daxue

**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中国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前身是复旦公学。1905年创建于上海。1917年改为私立复旦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1942年1月改为国立大学。复旦大学具有光荣的传统，广大进步师生积极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1926~1927年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及1946年以后的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护校等一系列革命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1952年院系调整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至1996年复旦大学校园面积1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学校设有技术科学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新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学院6个学院。有34个系、67个本科专业、10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50个博士学位授予点、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教师1751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0人，教授359人，副教授644人。有本专科生8710人，研究生3151人。有16个国家重点学科，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校文、理科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316万册。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与13个国家和地区的77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长期在校任教。许多研究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直接为国家特别是上海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Fu Lei

**傅雷** (1908~1966) 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1908年4月7日生。1927年赴法国留学，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曾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回国后，在

上海美专教授美术史和法文，并致力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人合编《新语》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事文学翻译工作，60年代初，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夫妇二人含冤而死。1979年上海文联为他平反，改正错划右派问题。他全部论著和译著共600多万字。精通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主要有：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等15部小说，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伏尔泰、梅里美等的作品。还译有丹纳《艺术哲学》等美学名著，著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见解独到精辟。去世后全部译著编为《傅雷译文集》出版。《傅雷家书》亦已整理出版。

#### Fu Ying

**傅鹰** (1902~1979) 化学家。福建闽侯人。1902年1月19日生。191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获密执安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研究员。1929年回国后历任北平协和医学院、东北大学、山东大

学、重庆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1945年再度赴美国，在密执安大学从事化学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二、三、四届委员，五届常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致力于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的研究。在1928年有关溶液吸附的博士论文工作中，对著名的特劳贝尔规则进行了研究与修正。在进行液体对固体的润湿热研究中，提出不能完全依靠润湿热大小来判断固体对液体的吸附程度，并于1929年首创了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后又发现了溶液中的多分子层吸附现象，并将BET多层吸附公式由气相中的吸附推广到溶液中的吸附。创建中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并兼任主任。编著出版有较大影响的《大学普通化学》、《化学热力学导论》等书。1979年9月7日在北京逝世。

#### Fu Zuoyi

**傅作义** (1895~1974)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宜生。山西临猗人。1895年6月27日生。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入阎锡山部独立步兵第十团任见习官。以后在山西军队中任营、团、旅、师长。1927年10月，参加对奉系的讨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第四师中将师长。1928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阎锡山部第四路军总指挥、济南行营主任兼第二、四路联合军副总指挥。1931年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日作战。1936年，指挥绥远部队抗战，取得中外闻名的“百灵庙大捷”。1937年8月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初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同年冬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6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升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47年12月，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部长。1972年10月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4月19日逝世。

# G

gaige kaifang

## 改革开放 (Reform and Openness)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其要旨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对外开放。在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

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改革从1978年起步，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前期，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改革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逐步全面铺开。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相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还对军队和国家安全体制的改革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改革开放概括为总方针，提出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对改革原则和方法做了新的概括。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指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做了勾画，并提出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从此以后，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快速向前推进。

从1994年开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1997年以后加强了改革的力度，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制度、行政机构改革都取得了明显进展。1999年，朱镕基总理提出在三年内完成“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医疗制度的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同时实施扩大

对外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55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49年的50多倍。改革开放给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经受住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波和国内洪涝灾害的严峻考验。

gaijin jingji guanli tizhi shiyan

##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试验

(experiments in improving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进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下对企业管理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克服弊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1955年开始酝酿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下放管理权限。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会议明确提出改进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1956年5月和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体制会议，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8月，在薄一波主持下起草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在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权的原则、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工业管理、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民族自治区等13个方面，按照下放权力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作出了具体的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规定。为了加强对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由陈云、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黄克诚组成，陈云任组长。五人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认为改进体制的重点是工业、商业和财政。五人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1月8日，陈云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了改进体制的方针，即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各环节的协调关系，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

的发展。1958年6月2日，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强调尽快更多地下放。于是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业单位中下放885个，下放比例高达76%。但由于企业下放过猛，导致计划失调、工业生产秩序混乱。1959年3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个企业隶属关系的通知》，决定将有关全局性的34个企业由地方交归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4月28日，国务院又批准将原地方管理中的21个企业交归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4个企业改由国务院有关部委与地方双重领导。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指出：“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又把下放地方的大部分企业陆续收归国务院有关部委管理。这样，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的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试验，又以上收企业管理权而告结束。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试验，虽然只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也察觉到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忽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对只局限于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做文章，而没有抓住如何搞活企业，使生产、流通、消费3大领域畅通，使经营单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问题，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成效的。

### 推荐书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

Gan ku

甘苦 (1924~1993)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壮族。1924年1月生于广西扶绥。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1950年，在广西左江龙津游击区任民兵大队指导员，凭祥县工委书记兼政委，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三团政委。1950~1979年，历任桂西壮族自治区办公厅代科长，龙州县委书记，崇左县委书记，河池专署专员，龙江造纸厂革委会主任，河池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电力厂厂长等职。1979~1993年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十三大代表。1993年7月25日在南宁逝世。

ganbu duiwu sihua  
干部队伍“四化” (four -isations of the ranks of cadres) 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是“德才兼备”干部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问题。1979年7月至1982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陈云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即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这个方针先后写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其他文件，成为选用与管理干部的根本依据。

革命化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政治标准，是对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方面的总要求。主要内容包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认识问题，作出决策，在事关全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革命化，就是要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年轻化是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中年龄结构的基本要求，指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中，老、中、青干部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形成梯形的年龄结构，以保证第一线工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多数都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够担负繁重任务。知识化是对干部队伍文化知识结构的要求，主要指干部应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知识、懂科学、会管理的干部，让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专业化是对干部队伍建设中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有其本身的特有规律。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按规律办事，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没有真才实学，业务外行，决不能开创新的工作局面。

“四化”方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革命化是第一位的。邓小平认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3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这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方

向性问题。干部队伍革命化的实质，在于保证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使党的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执行“四化”方针，干部队伍新老合作与交替顺利实现，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构成正在发生新的变化。199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贯彻执行“四化”方针提供了制度保证。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干部制度的改革步伐，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努力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 gangtie gongye

**钢铁工业**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开采和处理(选、烧结)铁矿，生产钢、铁及其成型产品的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

**起步基础**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冶炼、铸造并使用生铁的历史。中国古代发展的冶铁技术、铸铁技术、“炒钢”技术、“灌钢”技术和“苏钢”技术等，在古代世界各国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近代中国，1890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1898年建成投产。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端。1931年日本侵入东北后，为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多处钢铁厂，其中最大的是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所(现鞍山钢铁公司的前身)。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驻军中国东北，将日伪时期在东北建设的较为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大部分拆走，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的钢铁工业。1948年后国民党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更有意识地肆意破坏工业设施，将中国的钢铁工业搞成了陈旧落后、支离破碎的烂摊子。1949年，全国只生产钢15.8万吨。

1947年到1950年间，人民政府陆续接管了山西阳泉铁厂、大连大华矿业株式会社(大连炼钢工厂)、辽宁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山东金岭镇铁矿、辽宁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制钢厂、河北唐山制钢厂、北平石景山钢铁厂、天津炼钢厂、华中矿务局马鞍山分矿、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属7家官僚资本企业、云南钢铁厂、海南铁矿局等30多家钢铁企业。这些企业，就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基

础。1949年底，这些钢铁厂实有的生产能力不足100万吨。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钢铁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恢复生产、大规模基本建设、被动和主动的调整、十年徘徊、稳定持续快速发展五大阶段。

**恢复生产时期(1949~1952)** 1949年12月中央重工业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钢铁会议，提出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以钢铁工业为重点，明确会后的2~3年内华北、华中等地钢铁工业以恢复生产为主，东北则是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1950年到1952年，国家拨付给钢铁工业的建设资金为3.292亿元，占同期全部工业投资的11.6%。全国钢产量1952年达到135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时期(1953~1959)** “一五”计划时期，钢铁工业作为全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中，钢铁工业占了8项。其中包括扩建鞍钢到320万吨规模，新建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两大钢铁基地和北满特殊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扩建本溪钢铁公司、热河钒铁矿。此外，还安排改造、扩建了一批已有企业。到1957年，钢铁工业共完成投资37.93亿元，新增生产能力采矿1388万吨、铁精矿356.6万吨、烧结612.7万吨、炼焦302.6万吨、炼铁306.9万吨、炼钢278.9万吨、开坯257万吨、轧钢171.3万吨。钢产量达到535万吨。

1958年全国出现“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钢铁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高指标。为完成这超过了现有钢铁企业生产能力的高指标，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炼铁、炼钢的群众运动。各地方除组织群众建设了大批简陋的土法炼铁炉、炼钢炉、炼焦炉外，又扩建、新建了一批中小钢铁厂，钢铁工业建设的摊子在全国到处铺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初。

3年“大跃进”期间，钢铁工业完成建设投资115亿元。同大规模建设的铺开相对应，在高指标的压力下，钢铁企业开足马力拼命增产，钢铁产量也很快增长。1958年产钢800万吨，1959年产钢1386万吨，1960年产钢1866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49.5%、73.3%和34.6%。

**大调整时期(1960~1966)** 1959年底，苏联撤走专家、中断援助；1960年中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连续3年“大跃进”使国家物力、财力、人力消

耗达到极限，1960年下半年开始，钢铁工业被迫进行调整。正规企业中，1960年钢铁工业有30多个企业相继下马。到1962年，重点钢铁企业中36%的高炉、57%的平炉、37%的电炉、97%的转炉停产维护。一批地方企业也纷纷停产。这样，钢铁生产大幅度下滑，1961年产钢870万吨，不到上年的一半；1962年再下降到667万吨。

这5年调整期间，钢铁工业在生产建设上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一是将有限的投资向矿山工序倾斜；二是采取措施增产农业生产技术改造和农村生活所需要的金属材料；三是重点解决增产板管类产品，尤其是薄板、硅钢片和无缝钢管所需的装备和技术问题；四是组织了设备大修。

通过调整，1963年产钢762万吨，1964年产钢964万吨，1965年产钢1223万吨，1966年达到1532万吨。

1964年，还开始进行了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主要建设项目有：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长城钢厂，贵州水城钢铁厂，恢复下马的贵阳钢厂、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宁夏石嘴山钢铁厂、陕西略阳钢铁厂、甘肃兰州钢厂及内迁青海西宁特殊钢厂和陕西钢厂、西安精密合金厂等。此外，一些沿海省市辖区内还进行了“小三线”建设。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钢铁工业建设形势又出现转机。

**十年曲折时期（1967~1977）** 1966年下半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钢产量大幅度下滑。1967年产钢1028.7万吨，比上年下降32.9%；1968年又下跌到904.4万吨。1968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了重点钢铁企业的军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经过4个多月耐心的说服、协调，终于使生产逐步恢复。1969年产钢1333万吨。

1970年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钢铁工业又一次提出了生产和建设上的高指标。炼铁能力比上年增加了1.5倍。1970年全年产钢1778.6万吨，1971年产钢2131.7万吨。1972年，冶金部认真抓了企业整顿工作，钢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72年产钢2338.3万吨，1973年上升为2531.9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

1974年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建设，当年钢产量比上年度下降了410万吨，跌到2112万吨。到1975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大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到年底，全国共产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产280万吨。

1975年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冲击了钢铁生产和建设。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唐山钢铁公司遭受严重破坏，华北地区其他一些钢铁企业也受到影响。这些因素使1976年的钢产量下滑到2046万吨。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初步整顿，钢铁企业恢复了正常的运行秩序，生产逐步上升。1977年全国共产钢234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16%。

基本建设方面，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进入全面建设的高峰。10年间完成的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公司1974年第一期工程，水城钢铁厂第一期工程，太钢引进的不锈钢生产线，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河南省舞阳特厚板轧机工程，河北省涉县天津铁厂，做为定型设计在全国各省、市地方企业建设的300立方米高炉、15吨转炉、650毫米开坯机、500/300毫米小型轧机、2300毫米劳特中板轧机和1200毫米迭轧薄板轧机，上海第一钢铁厂1200/2300毫米半连轧机，太原钢铁公司1700/2300毫米炉卷轧机，本溪钢铁公司1700毫米连轧机，以及1977年宝山钢铁公司开始的规模为年产钢300万吨的一期工程。

**稳定、快速、持续发展时期（197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年，全国产钢3178万吨，比上年增产804万吨，增长了33.87%。此后，除1981年由于国民经济进行强力调整钢产量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每年都有较大的增长。从1978年到1997年，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400多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7.91%，标志着钢铁工业步入了稳定、快速、持续发展时期（见表）。

年份	钢产量 (万吨)	比上年增产 (万吨)	增长率 (%)
1977	2374		
1978	3178	804	33.87
1979	3448	270	8.50
1980	3712	264	7.66
1981	3560	-152	
1982	3716	156	4.38
1983	4002	286	7.70
1984	4348	346	8.65
1985	4679	331	7.61
1986	5221	542	11.58
1987	5628	407	7.80
1988	5943	315	5.60
1989	6159	216	3.63
1990	6635	476	7.73
1991	7100	465	7.01

续表

年份	钢产量 (万吨)	比上年增产 (万吨)	增长率 (%)
1992	8093.5	993.5	14.0
1993	8953.9	860.4	10.63
1994	9261.3	307.4	3.43
1995	9536	274.7	3.0
1996	10 123.7	587.7	6.16
1997	10 891.1	767.4	7.58

这一时期，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①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宝钢引进建设工程全面铺开，国家把给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用于宝钢工程建设，老钢铁企业则走上了自筹资金“挖潜、革新、配套、改造”的发展道路。

②1987年前后，冶金部提出把品种质量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七五”期间，全行业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进行技术改造共形成640多条按“双标”（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生产的作业线，双标率从“六五”末期的7.5%提高到1990年的45%。同时，在此期间，鞍钢、武钢、首钢、本钢、攀钢、重钢、唐钢、宣化、邯郸新建扩建的高炉都装备了当代先进技术，全国还新建高速线材轧机作业线20多条，无缝钢管轧机14套，加上宝钢和天津大无缝投产，使钢铁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品种质量得到切实的改善。

③进入90年代中后期，钢铁工业面临着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钢铁产品由长期的供不应求变为总量上和大部分普通品种上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过去卖方市场掩盖着的钢铁工业深层次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突出出来。为此，冶金部提出钢铁工业要上“四个新台阶”：上品种、质量水平的新台阶；上现代化水平的新台阶；上集约化水平的新台阶；上综合经济效益水平的新台阶；把发展的重点转到优化结构上来。1995年以后，钢铁工业在组织结构上推进了兼并破产为主要手段的企业资产重组和企业重组，在产品结构上强化了板材、管材等高附加值品种的开发与生产，在工艺结构上加快了淘汰平炉、发展连铸、发展连轧等的步伐。

**建设成就** 50年来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绩。

建成1亿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 50年来，中国已跻身世界钢铁大国行列。1949年，产钢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1996年产钢10 124万吨，跃居世界



第一位。此后到1998年，中国连续3年钢产量过亿吨，居世界第一位。

以1949年为基数，1950~1998年，中国钢铁工业主要产品中，铁矿石产量由59万吨增加到20554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2.7%；焦炭产量由52.5万吨增加到12806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1.9%；生铁产量由25万吨增加到11863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3.4%；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11435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4.4%；钢材产量由14万吨增加到10508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4.5%。从整体上看，中国钢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的发展速度都是相当快的。

**产品品种质量不断发展** 中国钢铁工业，50年代初期，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规格的钢材。60年代初期，解决了解放牌汽车、东方红拖拉机、南京长江大桥所需的品种钢材，研制生产了原子弹、导弹、超音速飞机所需的关键材料。1979年提出建立合理利用中国资源的合金钢体系和大力发展低合金钢的方针。1987年制订了集中力量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所急需的100个重点钢材品种的发展规划。到1998年，中国钢铁工业可以生产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等各种高级合金钢在内的1000多个钢种，可轧制40000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在质量方面，1982年提出按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水平标准组织生产，制订了一系列国际一般水平标准和国际先进水平标准。到1998年，按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的钢材占钢材总产量的比重达到84.66%。1998年国产钢材的自给率达到88%以上。

**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5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实行大中小相结合、发展沿海又发展内地的方针，建设和改造了一大批钢铁企业，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产业布局。

1949年前，中国的钢铁工业，约有80%~90%集中在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为了从战略上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布局，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华中地区建设武汉钢铁厂和华北地区建设包头钢铁厂。1957年，冶金工业部提出钢铁工业的建设要实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并制定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方案，即在建设好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基地的同时，在北京、山西、安徽、湖南、四川五省市各发展一个中型钢铁厂，再在东北地区的吉林，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西北地区的

甘肃、新疆共18个省区各发展一个小型钢铁厂。1964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新建、扩建了一批钢铁企业。1977年开始，为了扭转中国长期大量进口钢材的被动局面，在上海建设了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宝山钢铁总厂，从而形成了以宝钢为龙头，沿长江的马鞍山钢铁厂、武钢、重钢为龙身，攀钢为龙尾的长江钢铁产业带。

到1997年底，中国各大区域钢产量及其比重演变为：东北地区1581万吨，占14.5%；华北地区2944万吨，占27.1%；华东地区3329万吨，占30.6%；中南地区1710万吨，占15.7%；西南地区948万吨，占8.7%；西北地区365万吨，占3.4%。按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经济地带划分，中国钢产量的分布为：东部地带产钢6561万吨，占60.3%；中部地带产钢3003万吨，占27.6%；西部地带产钢1313万吨，占12.1%。中国钢厂的分布越来越靠近市场，越来越靠近国际资源，布局日趋合理。

**为国家增加了积累** 1949~1997年的48年中，中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为2329.7亿元，而同期为国家创造的利润和税金累计为4421.2亿元，利税与投资的比例为1.89:1。或者说，归还基本建设投资以后，还为国家积累2091.1亿元。如果考虑到同期使上百万的钢铁职工就业，累计支付的工资总额和劳保福利费用大约2500多亿元，则48年间，钢铁工业为国家创造的净国民收入达4600亿元左右。

**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重要结构不断优化** 1949年前，钢铁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十分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1949年后，钢铁工业的设备沿着大型化、连续化、高效率、自动方向不断向现代化迈进。

在炼铁方面，高炉容量已由1952年最大的918立方米发展为上千立方米，如宝钢1号和2号高炉容积为4063立方米，3号高炉容积已达4350立方米等。这些大型高炉都配有自动上料、高风温、高压炉顶、喷吹燃料和长寿等先进技术，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已达到国际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在炼钢方面，平炉炼钢走过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六七十年代拥有一批500吨的平炉，由于技术落后已全部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顶吹转炉。1982年中国开始在转炉上推行顶底复合吹炼技术，宝钢300吨转炉不仅全部实现顶底复合吹炼，而且实现了负能炼钢。电炉已由5吨发展

到90年代普遍推行的50吨以上电炉。在轧钢方面，50年代初中国型材轧机和线材轧机都是单机架、横列式的。现在全国已拥有小型连轧机、高速线材轧机、热连轧机、冷连轧机、热轧无缝钢管连轧机组。

在调整和优化钢铁工业结构方面，中国是从发展连铸开始的。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试验连铸机。但进展缓慢，到1978年全国连铸比仅3.8%。1990年才突破20%。之后增长幅度加快，到1998年达到67.6%。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全连铸企业9个，全连铸车间75个。以连铸为中心，钢铁生产工艺技术结构得到发展。

**科技成果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 1949年后，全国迅速组建了中央到地方的多级钢铁研究院所。一批又一批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中国钢铁工业的综合实力迅速提高。主要成果有：

①采矿技术装备与采矿方法方面。80、90年代，研制出使用胶带运输机的“间断—连续”开采工艺、陡帮开采和横采横扩等新的开矿方式，试制成功190~270毫米、310~380毫米的大型牙轮钻机、10~12立方米电铲、108~154吨电动轮汽车等15种成套的大型矿山装备。加上计算机在矿山开采工艺中的应用，使露天开采技术达到了先进水平。地下铁、锰矿山的采矿采用了振动放矿技术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提高了地下矿的采矿强度，降低了贫化损失。冶金矿山的爆破技术与器材的试制取得了突破。其中，无起爆药导爆管起爆系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②选矿方面。重点开展了包头铁矿、大冶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及其他矿区矿石的选矿研究工作。70年代，包头矿综合利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从重选稀土粗精矿、贫氧化矿石与选厂选铁后的尾矿中浮选出稀土氧化物，获得含量为60%的稀土精矿，并将稀土精矿品位提高到68%。1985年又从包头稀土精矿中分选出纯度为95%的氟碳铈矿和独居石。

③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突破。主要是攀枝花钒钛资源和包头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攀枝花铁矿是一个多金属共生矿。含有五氧化二钒2000多万吨，冶金部组织占全国总储量的58%；含有二氧化钛87000万吨，占全国总储量的90.53%；还有数量可观的钴、镍、铬、镓、铀等十几种贵重金属。

1964年，全国百余名科技人员参加高炉冶炼攀枝花矿攻关试验。首创了高钒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新工艺，解决了渣

中含二氧化钛 24%~30% 时高炉不能顺行的世界性技术难题。

在钒的回收方面,探索出了工艺制备简单的雾化提钒法,并研制成功配套的工业生产装备,使攀钢已成为世界知名的、重要钒制品生产厂。1978年起,又开展了利用钒渣生产高品位五氧化二钒和提高钒的回收率的研究,生产出纯度在 98% 以上的五氧化二钒产品。在钒的回收利用方面,多种提取方法取得了成果。从攀枝花矿石中提取钴、镍、镓、钨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钴的酸化转化率达到 82%,萃取率达到 99.9%;从提钒后的渣中提取出金属镓;攀枝花矿石中获得了纯度 99.5% 的三氧化二钨产品,总回收率达到 60%。90 年代,攀钢已经形成了年产钒渣 11 万吨以上、五氧化二钒 2000 吨、高钒铁 1500 吨、钛精矿 12 万吨、钛白粉 4000 吨,利用五氧化二钒尾渣生产彩色陶瓷板 30 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1997 年出口钒制品 4000 吨,使中国由钒的进口国变为钒的出口国。

包头白云鄂博矿含有 74 种元素、114 种矿物,是世界上罕见的多金属共生矿。它的铁储量 18 亿吨;铌储量 660 万吨,居世界第二位;稀土储量 3600 万吨,占全国储量的 83%,世界储量的 43%,居世界之首。

1950 年在筹建包钢时就注意了稀土稀有元素的综合利用。最早的研究成果是 50 年代试验成功的冶炼稀土硅铁合金。到 1980 年,已能生产稀土低钛、稀土钙铜、稀土钙镁、稀土硅钙、稀土钛镁、稀土硅铝等合金品种。1983 年又研制出稀土铝合金。1984 年,包头冶金研究所研制成功以稀土氧化物电解制取金属钽的新工艺,为发展钽铁硼永磁材料创造了条件。

稀土湿法冶金是包头矿综合利用的另一条道路。单一稀土分离是湿法冶金的核心。1966 年用 P204 萃取剂分离出金属铈,是包头稀土分离的第一个萃取分离工艺。此后,用 P305 萃取剂分离制取到高纯镧,并于 1974 年运用计算理论改进工艺,使镧的收得率达到 99%;用季胺盐络合交换萃取体系和 P350 萃取剂分离出镨和铽,纯度大于 99.9%,收得率为 99%;1973 年,用 P204 萃取剂分离出钆和钷,得到纯度和收得率均为 99% 的氧化钆和氧化钷,并于 1974 年投入工业生产。90 年代已经工业化生产初级稀土产品和氧化钆、氧化铈、氧化钷、氧化铽、氧化钆、氧化钷、钆钷钷富集物等产品 400 多种、1000 多个规格。中国稀土产量跃居世界

第二位。

④ 中国炼铁科技围绕精料、高炉、高炉、高炉长寿和大型化等方面不断攻关。1997 年,重点钢铁企业烧结矿品位达到 53.94%,高炉利用系数 1.815 吨/立方米日,入炉焦比 475 千克/吨铁,风温达到 1046℃,生铁含硅下降到 0.57%,实现了生铁产量、质量的飞跃。

⑤ 炼钢工艺技术和装备方面的科技成果,使中国炼钢科学技术接近和达到了国际水平。1998 年,中国平炉钢比下降到 5%,铁水预处理比达到 21%,钢水精炼比达到 20.2%,钢水吹氩喂丝比超过 65%,连铸比达到 67%,有近 20 个炼钢分厂实现了全连铸。

转炉工艺技术从 60 年代的碱性空气侧吹,70 年代的氧气侧吹到 80 年代的氧气顶吹,90 年代的顶底复合吹炼,走了一条不断革新的道路。长寿技术方面,90 年代以后,发展了溅渣护炉新技术,使转炉炉龄突破性地提高。

70、80 年代以后,中国电炉工艺发展的重点转到电炉装备的大型化、超高功率化和炉外精炼。到 1998 年,中国 30 吨以上的 60 余座,约占电炉总能力的 37%。

⑥ 中国是研究、应用连铸技术较早的国家之一。80 年代末,试制了薄板坯连铸机取得了成功。90 年代后期,中国在引进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上,加以创新,同时进行了小方坯为突破口的高效连铸技术攻关,都取得了一批效益显著的成果。

⑦ 轧钢工艺技术与装备方面。中国 50 年代研制出的 2300 毫米劳特式板轧机、直径 76 毫米无缝钢管轧机和 500/300、400/250 中小型轧机增加了钢材产量。六七十年代,试制出一批以 16 锰为代表的低合金钢材,鞍钢试制出坦克装甲板、装甲车承重轮花扁钢、舰艇用球扁钢、低合金钢重轨、深冲汽车板等,其质量接近当时世界水平。80 年代以后,采用新技术对一批原有轧机进行了技术改造,一些工厂把横列式轧机改成半连续式或连续式轧机,研制出 45 度无扭线材轧机、多辊极薄带钢轧机、热轧和冷轧窄带钢连轧机、高速拉丝机、短应力线轧机等。在轧钢工艺技术方面也陆续推广使用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钢材生产体系。

中国钢铁工业在主体工序工艺技术和装备不断进步的同时,铁合金、炼焦化工、炭素制品生产,及冶金安全环保、分析测试技术和情报、信息、标准工作等方

面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⑧ 随着钢铁冶炼工艺与设备的提高,钢铁新材料的开发研制也取得可喜成果。至 90 年代,中国已经能够冶炼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和低(微)合金钢在内的 1000 多个钢种,轧制与加工板、带、管、型、线、丝等 4 万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和金属制品。

⑨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在金属内耗理论、位错与晶体缺陷理论、金属相变理论、金属氢脆理论、金属强度与断裂理论等方面都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并在钢铁生产中得到切实应用。

⑩ 在工艺技术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在合金钢冶炼、稀土元素合金化、含氧软磁合金冶炼,以及高炉冶炼过程、矿山岩体分类、可钻性分级、边坡加固、浮选理论、粉末冶金成型、烧结处理、金属腐蚀机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成果。

**管理体制沿革** 钢铁工业管理体制建立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

① 1949 年至 1978 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重工业部,管理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化学工业。1956 年设立冶金工业部,专门管理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在内的冶金工业。直到 1958 年,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由中央直接投资和管理。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大中小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和地方还分别投资,陆续建成了一批省(直辖市、自治区)属的骨干企业和地市及县乡管理的小钢铁企业。1970 年为改变“条条”集中管理经济的局面,冶金工业部将全部直接管理的钢铁企业下放到地方,实行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冶金工业部双重领导,以省(市、区)为主的管理体制。只有少数钢厂没有下放。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两个层次的国有钢铁企业的投资主体,国务院授权冶金工业部直接管理由中央投资的钢铁企业,由地方政府授权地方冶金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地方中小钢铁企业。各级政府冶金主管部门对钢铁企业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即钢铁企业的发展规划、基本建设、生产、供应、销售以及人事、劳动、工资、福利等,按照计划经济模式,由冶金主管部门编制计划,逐级审批下达,实行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下面的各钢厂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

② 1979~1998 年改革开放时期。这是钢铁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性的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

1978~1984年，是钢铁企业改革的准备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通过对经济工作（包括冶金工业管理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历史性的大转折，为改革做好思想准备，在企业内部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的整顿。

1984~1993年，是钢铁企业改革的试验、探索阶段。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钢铁企业进行了多种单项改革，主要有：

钢铁企业全面贯彻实施1984年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0条规定，企业逐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实行利润留成或包干的基础上，钢铁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发展，干部人事、劳动用工、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得到改革。

钢铁企业开始冲破封闭经营的格局，普遍开展横向经济的联系，实行横向联合、协作，发展了一批冶金企业集团；少数钢铁企业开始对股份制进行探索试验。198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后，各级冶金主管部门和钢铁企业，围绕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政企职责分开，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落实，促进了企业深化改革。

1993~1998年，是钢铁企业改革创新突破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由单项改革向整体配套改革推进，钢铁企业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的改革是：从1992年开始，连续5年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钢铁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改革的改革。从1994年开始，大中型钢铁企业初步建立了母子公司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一批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组建了37家冶金上市公司，钢铁企业由单一的投资主体向多元化投资主体方向发展。一些大型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为组建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和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创出了新的经验，而一些技术落后的企业被兼并，破产和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困难企业逐渐走出困境。1998年按照国务院决定，撤销冶金工业部，新组建在国家经贸委管理下的国家冶金工业局。按国家规定，原冶金部所办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与国家冶金局“脱钩”，实现了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的新格局。

**发展前景** 5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面对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还有许多不足和问题。主要是：①生产力分散，产业集中程度低。②一些重要产业部门所需的许多关键产品，品种和质量仍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更缺乏国际市场竞争能力。③工艺和技术装备结构、生产技术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然而，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在1.2~1.3亿吨/年的水平上，这就为中国钢铁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中国钢铁企业经过“九五”计划期间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从总体上提高了技术、工艺、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竞争能力正在不断增强。钢铁工业今后改造和挖潜的总目标是把中国从钢铁生产大国向钢铁强国推进。

Gao Chongmin

**高崇民**（1891~1971）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建国，号崇民。辽宁开原人。1891年11月14日生。1909年考入奉天（今辽宁）省立农林学堂。不久，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毕业于农林学堂，即赴日本留学。1919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曾任东北三省民治俱进会黑龙江分会会长。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与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东北爱国人士建立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爱国组织。从1929年起，先后担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1931年9月，与阎宝航、杜重远等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1933年9月，在北平参与创建秘密的抗日组织——复东会，出任该会秘书长。1935年10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去西安促进张、杨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1937年6月20日，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担任主席团成员和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后在北平、济南等地建立“东总”分会，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1月离开重庆，赴东北解放区。1946年3月，任安东省政府主席。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1948年8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第一、二、三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7月29日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gaodeng jiaoyu zixue kaoshi zhidu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examination for self-educators in college courses)

80年代形成的为鼓励自学成才而对自学者施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制度。包括指导自学，进行高等教育程度的考试和对考试合格后的学历、使用、待遇等的统一规定。由国家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考试机构负责实施。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一种高等教育形式。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和社会投入少、效益高的特点，在中国教育制度中起着独特的辅助和补充作用。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并指定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先行试点。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按照专业考试计划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要求，自觉学习，自愿参加国家考试，取得足够的学分，就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1983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请示》，肯定了三市一省进行试点取得的初步经验，要求“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认真准备，逐步建立本地区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此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由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

经过不断加强、完善、提高、发展，截至1997年底，全国开考专业425个，涉及理、工、农、医、经济、法学、教育、文学、历史、外语等学科门类，开课程2000门。累计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达2657.76万人，全国累计获得本科、专科毕业证书的人数为182万人。

gaodeng xuexiao de yuanxi tiaozheng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 (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高等学校的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为了改革不合理的高等学校体制,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951年11月政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决定撤销燕京大学,成立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南京航空工程学院、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及华南工学院,并将一部分大学所属各系进行调整、合并。1952年,以东北、华北、中南为重点,高等学校进行全面的院系调整。撤消了一些大学,将其所属各系并入同一地区的其他院校,同一地区系科重叠设置的院校也予以调整、合并;所有院校在系科设置上适当分工,以利集中力量办好学校;新设12个专门学院,一些大学改为综合大学;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办。至年底,有3/4的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1953年5月,以中南地区为重点,经过继续调整,至年底,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47所,师范院校34所,农林院校33所、医学院校32所,少数民族院校3所,其他院校21所。1955年,高等院校又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高等教育部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院校的同类专业、系,迁至内地,以加强内地的原有院校,或成立新的院校。其中,将上海交通大学大部分专业和师生迁往西安,少部分留在上海与上海造船学校及正在筹建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部分(1959年分别成立为两个交通大学)。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至此基本完成。经过调整,高等院校基本分为综合性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两类。综合性大学分文、理两科,直接设系;高等工科院校基本上形成了重点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方针;师范、农林、医药院校有所增加,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其中也有忽视财经、政法等专业的倾向。

#### 推荐书目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

Gao Gang

**高岗** (1905~1954) 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陕西怀远(今横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组织起义,任

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甘肃特派员。参加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创建陕北红军活动。1932年后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红军第二十六军42师政委、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参加创建陕甘红军根据地。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红军第十五军团副政委。1938年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到东北开辟新根据地,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解放东北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组织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1953年调到北京后,为满足个人野心,攻击刘少奇等人,散布所谓“军党论”,在中共党内制造破坏组织纪律的阴谋分裂活动。1954年2月,在中共第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和批判,仍采取对抗态度,2月17日自杀未遂,8月17日自杀死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Gao Gang Rao Shushi fandang lianmeng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Gao Gang-Rao Shushi Anti-Party League)

中共党内两个高级干部为进行夺权的阴谋活动结成的联盟。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从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开始,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党内纠纷,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他提出分裂党的所谓“军党论”,散布党的干部分两部分: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区党即军队的党;一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党,现在党和国家权力掌握在白区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1953年下半年后,又采取拉拢、利诱等阴谋手段找中央和大行政区负责人谈话,

为自己上台四出活动。饶漱石在此期间积极呼应高岗,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借一份名单事件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高、饶分裂党的活动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惕,1954年2月6日至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高、饶被迫作了检讨,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和饶漱石阴谋活动的事实。高岗在会议期间自杀未遂,2月25日,周恩来根据高岗的态度及自杀未遂的行为,从10个方面作了关于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总结发言。这个发言提纲经过毛泽东批改。3月1日,邓小平根据饶漱石座谈会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小平的报告。随后,于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8月17日,高岗在被审查期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195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 推荐书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Gao Jiancheng

**高建成** (1965~1998)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副指导员,抗洪英雄。湖南省湘阴县人,1965年10月生。1984年9月入伍,198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尉军衔。历任学员、排长、助理工程师、副指导员。1998年7月27日,所在空军某高炮团奉命奔赴湖北咸宁地区执行长江干堤抢险护堤任务。他不顾连续几天高烧,坚持带领连队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8月1日晚,在参加簪洲湾抢险战斗中,连队突遭洪水袭击,他沉着镇定,迅速组织抢救遇险群众和官兵;不顾个人安危,脱下救生衣给战士赵文源穿上。被迫转移时,他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在与洪水搏斗的两个多小时中,他连续不断地进行现场鼓动,奋不顾身,先后救出8名群众和战士,最后因体力不支被洪水卷走,英勇牺牲。1998年8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高建成“抗洪英雄”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奖章。

Gaoju Deng Xiaoping Lilun Weida Qizhi Ba Jianshe You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Shiye Quanmian Tuixiang Ershiye Shi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21st Century”）江泽民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

1996年10月16日，为筹备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长达10个月的起草工作，一直是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江泽民自始至终十分重视起草工作，多次召集起草小组谈话，对报告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对报告稿中确定的跨世纪行动纲领、主要任务、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审议，对一些重要的文字表述进行仔细斟酌。1997年7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把报告稿印发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征求意见。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十五大代表和部分党内老同志共约4000人参加了讨论。同时，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并于8月1日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江泽民到会听取了意见。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九易其稿，反复修改，1997年9月9日，十四届七中全会决定将报告稿提请党的十五大审议。9月18日，报告经中共十五大决议批准。9月22日，新华社全文播发，随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报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报告共分10个部分。第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论述了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3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和产生的3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分析了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确定了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过去五年的工作。总结了十四大以来的5年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绩，指明了在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困难，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第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指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

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第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阐述了在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10年这个关键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为此，从8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与发展的思路：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理解公有制经济的含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种配套改革。③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④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⑤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⑦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第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维护安定团结。第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文化建设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公民。第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报告再次向台湾当局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这个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第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新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第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指出，要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的建设好。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开创的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的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报告最后指出，党的十五大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报告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江泽民的这个报告，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国际、国内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主张、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总览全局，振奋人心，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行动纲领。

Gao Min

**高敏** (1970~ ) 跳水运动员。女。四川省自贡市人。1970 年 9 月 28 日生。1979 年开始练习体操，后进入自贡市业余体校学习跳水。1980 年入选四川省跳水队，1982 年获全国少年组第 4 名，1983 年成为全国跳板冠军。1985 年调入国家跳水队。1986 年 8 月在马德里第 5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首次参加世界比赛，显示出起跳高、动作干脆有力、入水水压水花好的技术特色，以绝对优势，轻松自如地战胜了众多世界名将，一举获得女子跳板金牌。1987 年 4 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 5 届世界跳水锦标赛上再获女子跳板金牌。1988 年 9 月第 24 届汉城

奥运会上，她以 580.23 的高分又登上了女子跳板冠军的宝座，成为世界女子跳水运动员中，第一个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奥运会的三连冠。1989 年 6 月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第 6 届世界跳水锦标赛上，获女子一米跳板、三米跳板两枚金牌。1991 年 1 月在澳大利亚佩斯举行的第 6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再次获得女子一米跳板、三米跳板两项冠军。1992 年 7 月在第 25 届奥运会上蝉联奥运会冠军。至此已获得 6 枚世界冠军金牌。赛后宣布退役。

她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跳水运动员，中国十佳运动员，被誉为“跳水女皇”。1989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退役后，到美国留学。

gaoxin jishu kaifaqu

**高新技术开发区**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s) 中国以发展微电子、原子能、新材料、新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旨的经济区。它借鉴国外高科技园区的成功经验，主要依托国内的科技力量和工农业基础，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致力于中国高新技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为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密集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根据这一《决定》，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1991 年、1992 年又先后在武汉、苏州等城市建立了 51 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997 年建立了杨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划拨了专项基建信贷资金，在税收、进出口管理、商务人员出境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gao zengzhang di tongzhang

**“高增长低通胀”**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with moderate inflation)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既保持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良好态势。

1992 年中共十四大以后的 5 年里，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逐步消除和缓解经济大步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使增长速度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势头，使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抑制。1993~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 11.6%，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实现了“软着陆”。与此同时，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 1994 年 10 月 25.5% 的最高点，回落到 1997 年上半年的 1.8%。在此期间，顺利完成“八五”计划，提前 5 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国家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过快增长，使货币发行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幅度回落；更加注重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指导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加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有力保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与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持稳定。5 年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从 1992 年的 1826 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4400 元左右，年均实际增长 6.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2 年的 748 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1900 元左右，年均实际增长 5.4%。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高增长、低通胀这一良好态势，为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所罕见。它为中国经济体制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创造了条件，为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奠定了基础。

Ge Baoquan

**戈宝权** (1913~ ) 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江苏东台人。1913 年 2 月 15 日生。1932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35 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同时担任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刊物的特约通讯员，经常为国内各报刊撰写通讯稿。1938 年回国，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重庆任《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编辑、编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对外联络委员会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上海生活书店、时代出版社编辑《苏联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以翻译普希金、高尔基等俄国和苏联作家的作品著称，并有大量东欧和亚、非、拉美各国的文学译作，出版 50 多种。对鲁迅与外国文学、苏俄作家与中国文学等研究有素。他的部分论文被译成俄、英、法、德、西、葡、

日等文字。1988年被苏联文学基金会、苏联作家协会授予普希金文学奖，同年又获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伊万·弗兰科文学奖。

#### Gedebahe caixing yanjiu

####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 (research on Goldbach's conjecture)

200多年前，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曾猜想任意一个大偶数均可表为两个素数之和，用简写符号，这一命题可表为 $1+1$ 。这一问题提出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有不少学者通过实验性的计算肯定了这一猜测成立的高度可能性。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展是20世纪的事。在19世纪时，德、法、俄、英等国的数学家们创立了解析数论这一分支，20世纪又引进了针对哥氏猜想以及类似难题行之有效证明方法的各种新方法，如圆法、筛法、三角和法、L级数理论、均值定理理论等；使200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哥氏猜想的研究出现了新进展。在20世纪前半叶，陆续证明了 $9+9$ ， $1+1+1$ ， $1+N$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北京大学闵嗣鹤等，引导一些年轻学者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数学研究所的王元于1956年、1957年相继证明了 $3+4$ 和 $2+3$ ，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于1962年证明了 $1+5$ 。1966年，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取得了 $1+2$ 的成绩，即大偶数可以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当时陈景润只得及写了份简报，直到1973年才发表了 $1+2$ 的详细证明，并获得国际上的公认，外国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是当时在哥德巴赫问题研究中世界上最好的结果。

1978年，潘承洞、王元等又证明了一个较新的均值定理，对陈的 $1+2$ 定理的证明作了较好的简化。

这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geming weiyuanhui

#### 革命委员会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1967~1979年中国各地方、各系统和各单位的权力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曾规定各学校、文化单位要设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未能普遍施行。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张春桥等人策划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的群众造反组织相继夺权，

成立名称不同的类似权力机构。2月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这类机构都通称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按毛泽东的“三结合”方针，由干部、军队和群众代表结合组成。1968年9月5日，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省以下的各级地区和基层单位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6月，经过精简后的国家各部委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倒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取代了原有的各级中共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推行许多极左政策，很难实现所谓“一元化”领导权威和有效的管理职能。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毕竟结束了国家地方权力的真空状态，相对控制了混乱局势，肩负起维持生产的任务。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修改的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同时，各部门、各单位也停止使用革命委员会的名称。

#### Gesa'erwang Zhuan zhengli chuban

#### 《格萨尔王传》整理出版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Life of Geser*)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为蒙古族和藏族人民集体创作，形式为说唱体，已有数千年历史，最早文字版本为公元1716年北京蒙文木刻本。史诗记述格萨尔是天神转世，他为民除害，是威震四方的雄狮大王，表达了蒙、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在中国北部、西部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中亚有很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派专家深入民间发掘整理，“文化大革命”中此项工作中断。1984年国家民委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派专人负责整理格萨尔王史诗。198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齐木道尔吉编纂的蒙文版《格萨尔王传》两卷本，近40万字；1987年9月，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由降边嘉措等编写的《格萨尔王全传》（三册）汉文版。199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整理出了藏文《格萨尔王传》60余部，2000多万字。1994年，国家批准成立了全国整理《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组织北京、西藏、内

蒙、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学者，进一步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到1996年7月，整理出资料4000多万字，录音带5000多盘，录像数百盘。抢救、整理出历史上的格萨尔史诗木刻本、手抄本、口头传承本100余部，出版了40余部史诗部本和10余部研究史诗的专著、期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格萨尔王传》，将由有关省、市新闻出版局指定出版单位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

#### Gezhouba Shuidianchang

#### 葛洲坝水电厂 (Gezhouba Hydropower Station)

中国最大的水电厂。位于宜昌市西北约六千米处的长江干流上，是目前中国在长江干流上自行设计、自行建造与安装的第一座大型径流式水电站。

葛洲坝水电厂由挡水、发电、通航、泄水、冲沙5大部分建筑物组成。水库大坝坝轴线长2606.5米，大坝高程70米，设计最大坝高47米，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千米，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55%。多年平均流量为每秒1.43万立方米，总库容为15.8亿立方米。水库正常高水位为66米。电厂分别布置在二江泄水闸两侧，分为大江电厂和二江电厂两部分，共装机21台，总容量为271.5万千瓦，设计年平均发电量为141亿千瓦时。

电厂全部工程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括三号船闸、三江冲沙闸、二号船闸、二江泄水闸和二江电厂；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大江冲沙闸、一号船闸和大江电厂等。一期工程于1970年12月30日动工兴建，1971年11月主体工程浇筑混凝土。之后，出现了许多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工程质量也发生“蜂窝”、“狗洞”等问题，工程一度停顿，到1974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才开始复工。

1981年1月3日上午7点30分大江开始截流，历时36小时23分，这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

二江电厂安装7台中国首次研制的低水头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容量96.5万千瓦，从1981年至1983年相继建成投产。大江电厂工程安装14台水轮发电机组，总容量175万千瓦，与二江工程交叉进行，从1981年5月动工，到1988年全部建成投产，创造了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新纪录。

#### Gezhouba Shuili Shunju gongcheng

####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Gezhouba

##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angtze)

在建的三峡水利枢纽的反调节工程。其作用为调节三峡工程下泄的不恒定流,抬高水位,减缓比降,扩大过水断面,以利航运,并利用这段河道落差发电。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2.3千米处。坝址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千米。坝址处江面宽2200米,江中原有葛洲坝、西坝两个小岛,将长江自右至左分隔成大江、二江和三江。

枢纽正常蓄水位高程为66米,总库容15.8亿立方米,最大坝高53.8米,坝顶长2606.5米。主要建筑物有:泄水闸、冲沙闸、船闸及水电站厂房。泄水闸布置在二江,以利泄洪排沙。在大江设有1号船闸及大江冲沙闸,在三江设2号、3号船闸及三江冲沙闸,采取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措施,保持航道基本不淤。电站厂房分别布置在大江和二江上。左右岸分别采用土坝、混凝土坝与岸坡联接。

3座船闸均为一级船闸,上下游均设人字闸门。1号、2号船闸闸室的有效尺寸均为长280米、宽34米、深5米,可通行万吨级船队,为中国90年代末已建成的最大的内河船闸。其人字闸门单扇最大尺寸19.7米×34.5米,亦为中国90年代末已建成的最大的人字闸门。3座船闸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近期为2000万吨,远景为5000万吨。

泄水闸共27孔,最大泄量83900每秒立方米,连同大江、三江冲沙闸总泄流能力达11万多每秒立方米。是90年代末世界上已建成的泄水量最大的水利工程。从泄水闸底板至闸顶高33米,设上下双扉闸门,上扉平板门,下扉弧形门,孔口尺寸均为12米×12米,其上为9米高的胸墙,以解决闸孔挡水高度大的问题。此亦为该工程的特点之一。

水电站厂房为河床式,设计水头18.6米,最大水头27米。大江电厂装机容量175万千瓦,二江电厂装机容量96.5万千瓦,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41亿千瓦·时,为中国目前已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

工程于1970年12月开工,分两期施工。一期大江过水,二、三江施工;二期大江施工,利用二、三江已建的建筑物泄流、通航和发电。1972年11月至1974年10月停工2年。1981年1月大江截流成功,6月三江船闸通航,12月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88年12月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989年1月工程宣告全部建成。工程总投资48.48亿元。

geti shougongye shehuizhuyi gaizao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handicrafts industries)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分散的独立的手工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把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国家组织他们从供销合作入手,经过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逐步发展到生产合作社。1949~1952年是重点试办、典型示范阶段;1953~1955年是初步发展阶段;1956年初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国范围内,整个行业、整个地区直接建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6月,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虽然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曾出现了过早、过急、过多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盲目并社和办大社等缺点,给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一些不利和不便,但从整体上说成功的。

Ge Minzhu Dangpai Lianhe Xuanyan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Joint Declaration of All Democratic Parties”)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于1950年11月4日联合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宣言。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是为了自卫。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停止侵略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进犯。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联合宣言为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广大民众和宣传抗美援朝起了积极作用。

Geng Biao

**耿飚** (1909~ )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原名耿俊勇、耿润德。湖南醴陵人。

1909年8月26日生。早年在常宁县水口山当矿工。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浏(阳)醴(陵)游击支队小队长。1930年7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参谋、干部教导队队长、师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副。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赴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后回师陕北,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第三八五旅副旅长,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46年1月至8月,兼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1947年6月兼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参谋长。1948年后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先后任中国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大使。1960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63年后,任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耿飚回忆录》。

Geng Changsuo

**耿长锁** (1900~1985) 农村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河北省饶阳县人。1900年8月生。1943年他带领四户贫苦农民创办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被誉为开放在冀中解放区的社会主义之花。长期以来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被政务院命名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历任饶阳县五公村中共党支部书记、五公人民公社社长,中共饶阳县委副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为中共第八次至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11月26日因病逝世。

gong-nong-bing xueyuan

**工农兵学员** (worker-peasant-soldier students) “文化大革命”期



间,高等学校通过推荐方式从工、农、兵中招收的学生。1966年,全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1970年6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于当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在所谓“教育革命”思想指导下,学校对学制、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及教师队伍等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学制分别为2~3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和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主要从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招收。招生方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当年,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学生41870人。此后,1970~1976年,全国部分恢复招生的高等学校采取推荐方法共招收7届学生。这些学生被通称为“工农兵学员”。这种招生办法,名义上是群众推荐,实际往往是基层干部指定,助长了“走后门”等不良风气,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入学学生没有经过文化考试,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造成高校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不得不对已入学的许多学生进行中学文化补习。江青等人鼓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方针,更使学校难以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困难条件下,也有不少工农兵学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停止招收工农兵学员。

gongren xuanchuandui jinzhu xuexiao jiguan

**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 (workers' propaganda teams stationed in schools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对学校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控制、领导的措施。1968年夏,北京一些高等院校仍在继续武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7月27日,毛泽东派出由首都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很快控制了局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

期进入各学校。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据此,各地陆续向大中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同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文章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后,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又陆续开进科研、文化、教育单位,甚至一些党政机关。在农村,则由贫下中农派出代表或宣传队,管理学校和商店。

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控制局面,实际上是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类似的手段,客观上说明了毛泽东前期提倡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设想的失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科研和文化单位后,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相对结束了前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执行的只能是“左”的政策和路线,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因而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从学校中撤出工人宣传队。

gongxinzhi

**工薪制** (wage system) 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动报酬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49~1956年全国各地实行的工资制度并不统一,有的以粮食等实物为计算基础,有的实行“工薪分”制。1956年全国实行了统一的工资制度,企业工人一般实行8级(或7、6级)工资制;企业职员一般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国家机关事业工作人员一般实行职务工资制,如北京地区的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划分为30个级别,最低一级工资标准为23元,最高一级工资标准为644元。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套工资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1985年开始,又对全国的工资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机关事业工作人员一律废除等级工资制,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度,即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共同构成,企业单位一般自主实行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

gongye xue Daqing yundong

**工业学大庆运动** (Daqing Oilfield

as the model for 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964年开始中国在工业战线开展的以学习大庆油田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运动。

196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的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杰出代表的大庆人,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实践论》、《矛盾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创造了三老四严,干部与群众坚持三同的科学管理方法,只用3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建成大庆油田,1963年底,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并使原油产量保持稳产高产,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1964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学习大庆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科学管理方法,促进全国工业的发展。此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

“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庆运动受到很大冲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大庆的正确经验和大庆典型进行攻击。大庆油田的领导干部顶住压力,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团结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坚持生产,原油产量稳定上升,1976年年产量达5000多万吨水平。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庆油田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倡导工业学大庆运动,1973年,毛泽东又一次赞扬了大庆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指出“大庆搞得很好”。周恩来总结了大庆油田“两论”起家的基本经验,总结了大庆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经验,这对当时振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庆经验主要表现在: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建设;坚持学习铁人王进喜,年年进行总结评比,选模范,树标兵,以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带动整个队伍革命化;坚持科学态度,掌握第一手资料,加强基层建设、基层工作、基本功训练,建立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依靠职工管理企业,重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发扬政治民主,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倡领导机关和后勤部门面向基层,为生产

一线服务。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学大庆问题的报告》指出：过去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有关的上级领导。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必须肯定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

gongzuozu shijian

**工作组事件** (work teams incident) 1966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领导层在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上发生分歧，并被毛泽东不符合事实地指责成是“两个司令部斗争”、造成批判刘少奇的严重后果。

在政治运动中向有关地区和单位派出工作组(或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惯常使用的一种工作方式。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一些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教育、文化单位出现了混乱，那里的中共党组织已无法实行有效的领导。5月30日，在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决定，并报在外地的毛泽东同意，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工作组。6月1日，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公开广播，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党组织普遍受到攻击和批判，秩序混乱。6月3日刘少奇又决定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向北京各学校及其他一些单位派驻工作组，替代或协助党组织领导运动和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都相继向当地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主要是从党政机关和共青团、军队中抽调的干部。

工作组进校后，试图按照传统的作法领导运动，主要原则是：坚持运动应在党组织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妨碍正常的业务工作；服从纪律，内外有别，注意保密；不准打人、侮辱人等。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斗乱斗事件，被工作组及时制止。刘少奇批示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将此情况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要求效仿办理。

当时刘少奇等人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及方式、步骤并不清楚，派工作组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局势。尽管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个

别地方的工作组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但是就总体而言，派工作组的作法是当时条件下一种必要的措施。然而，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成立的、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北京和全国各地普遍派工作组的方式存有不同看法。他们探知了毛泽东认为派工作组过早不好、主张先乱一阵子的态度后，便在中央会议上对派工作组问题提出“质疑”，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驳。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等人公开发表社论文章或暗中煽动“受压”的学生与驻校工作组对立，一些学校发生了批判或驱赶工作组的事件。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听取各方面汇报后，表示赞同陈伯达等人的观点，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作法。他认为工作组“镇压”学生、“阻碍”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应“统统驱逐之”。7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提出由在校“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在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决定》的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会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领导责任。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等人在会上继续就派工作组问题作检讨。8月5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对“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进行更加严厉的指责，并据此提出中央存在一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会之后，刘少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职务都不再提及。10月，派工作组一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又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党内外对刘、邓二人的批判也随之扩大、升级。此后，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失去发言权，并于1967年1月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已撤回原单位的工作组成员多次被批斗。直至1967年1月全国掀起夺权高潮，工作组事件才逐步淡化。

工作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原本正常的工作方法分歧不符合事实地指责为党内“路线斗争”，直接导致批判、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为严重后果，并引出后来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的“群众

运动天然合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等一系列荒谬论点，最终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

gonglu shiye

**公路事业** (roads) 中国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旅客运送、国内外贸易和城乡物资交流提供运输服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部门。

**起步基础** 中国古代在道路、桥梁、隧道修建，车辆制造，以及交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过辉煌成就。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中，对交通工具及设施进行破坏。1949年末，能通车的公路只有8.07万公里，汽车5.1万辆。新中国的公路交通事业，是在薄弱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各地公路交通部门组织人力，迅速修复原有公路，其中包括西安经兰州到塔城等6条主要干线公路。同时开发边疆，修建了以福州为中心的12条华东支前公路和通向“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等。从1950年到1957年的8年中，中央对公路交通的投资为9.27亿元，新建、改建干线公路1.21万公里；各大区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投资9.73亿元，新建和改建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急需的一些经济干线和县乡公路。到1957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4万多公里，使原来没有通公路的185个县通了汽车。全国公路交通部门所属运输企业的营运汽车达4.4万辆，建立了相应的修理网点，成为公路运输的骨干力量。它所完成的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分别比1950年增加9.4倍、2.2倍和5.9倍、4.1倍。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增加到12.6万辆。

1958~1978年，中国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接一个搞政治运动，导致公路建设和运输生产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出现大起大落。公路交通事业在曲折起伏中前进。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增加2.5倍；高级次高级路面增加250倍；桥梁永久化水平提高了55.7%；全国民用汽车增加9.78倍，其中公路交通部门的营运汽车增加3.13倍，厂矿企业的自备汽车增加8.65倍。1978年基本实现“三五”、“四五”期间公路交通的主要任务：改建干线公路上的危险桥梁；完

善提高8万公里的国防、经济干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0万公里；发展汽车运输和民间运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路建设实现了从以国防公路为重点到以经济公路为重点的转轨。扩大公路建设资金来源，开征汽车购置附加费，提高养路费征收率，允许贷款修建的公路和独立大桥等工程征收过路费、过桥费等，制定“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为主”的公路建设方针。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取得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高等级公路建设成就突出。1998年以来，交通系统抓住加快公路建设的机遇，提出快干七条线，建设主骨架，改善公路网，扩大覆盖面的目标，全国公路在总量、质量和管理水平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体制沿革**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成立，负责全国公路建设和管理工作。公路划分为国道和省道，国道由交通部公路总局直接管理，修建任务委托各大行政区办理，经费由中央支付；省道由大行政区交通部督导各省交通部门管理。50年代初期，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巩固国防，一些大行政区交通部临时成立了公路建设指挥机构，如华东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等，专门负责重要的干线公路建设。交通部公路总局和大区交通部按专线设立了少数国道养护机构。1954年，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撤销，在成都、武汉等地成立直属交通部第一至第七公路工程局；在北京成立公路设计院（后改院）；在上海、沈阳、西安等地成立直属第一至第五公路设计分局（后改院）。这些测绘设计、施工单位主要担负中央投资的干线公路建设任务。“一五”时期，各省、自治区交通厅（局）对公路交通事业一般实行垂直（或称条条）领导，人员配备、财务开支、物资供应、计划投资以及技术业务等方面，都归省、自治区交通厅公路局直接管理。1958年，交通部直属7个公路工程局和5个公路设计分局的建制撤销。交通部公路设计院与水运设计院合并改组为交通部交通工程设计院，仅保留60多人担负公路规划设计工作。国家对公路建设的计划投资体制也全部下放到省、自治区。同时，绝大多数省、自治区交通厅（局）也相继下放直属的企事业单位，撤销省级专业管理机构，形成从省到地、县的层层下放，有的甚至把干线公路的养护道班交给公社分段管养。公路交通管理体制开始从垂直领导为主演变为以地、县（即块块）管理为主。1960年12

月，交通部撤销公路总局，另行组建基本建设总局，设公路处主管公路业务，领导力量大为削弱。196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公路养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恢复或重建各级公路交通管理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从下放地、县干部中调回部分技术力量，建立或充实勘测、设计、施工等机构。1963年4月，交通部调整内部机构，撤销基本建设总局，另行组建公路工程管理局，对公路建设工作加强领导。同年末，在北京、西安、福州、成都重新组建第一至第四公路工程局；在西安、武汉重新组建第一、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同时恢复交通部公路设计院。1970年7月，铁道、交通、邮电3部合并为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被撤销，代之以公路组，公路组之下设工程养护组，形成大组套小组的畸形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省、自治区公路交通管理机构被再次裁并、下放，但基层管理单位基本保留。1973年交通部重建公路局。1975年，交通部再次改组，铁道、交通分开，交通部仍设公路局主管公路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公路事业进入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时期。到1985年，全国公路交通管理体制均已健全，除个别省外，各省、自治区交通厅都建立了全能的公路局或公路管理局，按地、市设公路分局或总段（段），县（市）设公路段或站；北京市交通局、天津和上海市市政工程局设全能的公路管理处，县、区设公路管理所。这些专业机构以管理、养护干线公路为主，同时具有一定的公路勘测、设计和施工力量。

许多省、自治区开始探索改革公路交通管理体制。1986年，山西省按照分级管理和简政放权原则，改革干线公路按行政区划设总段，由省、地（市）双重领导的旧体制，按主要干线公路设9个公路分局、91个公路管理段和715个道班，由省直接管理；一般干线设19个县养护段和176个道班，由地、市交通局管理；县、乡公路由县交通局管理，不设专业机构。

1992年交通系统提出交通运输上新台阶的目标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25条政策措施，全国各地大办交通的积极性高涨。

**建设成就** 中国公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状况明显缓解。到1998年，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26万公里，提前两年实现了“九五”计划目标，

其中高等级公路达到2.4万公里左右，等外公路比例下降为22.2万公里。全国所有县通了公路，乡（镇）通公路、行政村通机动车的比例分别达到99%和87%。公路桥梁建设达到国际水平。1998年全国已有桥梁21.6万座，总长725.8万千米。

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较晚，发展很快。“八五”期间，由“七五”期间的522公里发展到2141公里，“九五”期间，以年均1000公里左右的速度延伸，到1998年，总里程达到6258公里。

公路的增长刺激了民用汽车的发展。1998年全国民用汽车达到1326万辆，汽车的动力性、安全性和舒适性明显提高，初步达到大、中、小型相配套，高、中、低档结合的水平，现代化的高档大客车和集装箱、零担、大型物件、冷藏保鲜、危险货物等特种运输车辆越来越多。公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各种运输方式的总运量中，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77.2%、14.5%，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达到91.3%、55.9%。

公路事业逐渐形成符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要求、行之有效的新机制。公路建设筹资渠道多元化，形成“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引进外资”的格局，采取了BOT、转让公路收费权和境外发行H股票等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已利用外资170多亿美元。

法制建设日臻完善，相继颁布《公路法》和一批交通行政法规、规章，初步形成交通法规体系。

#### 推荐书目

王展意主编：《当代中国的公路交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gongsi heyong

**公私合营** (joint state-private ownership)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

在单个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企业中资本家原有的资产经清理核算成为私股，国家的投资作为公股，从而使企业的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为公私共有。国家派人以公股代表身份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原管理企业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由国家任命参加企业管理工作，并按私股在企业全部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从企业的盈余中分得相应数量的股息和红利。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进入企业内部并居于领导地位，这种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全行业公私

合营后，资本家虽在法律上仍保有私有所有权，但除拿定息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全部转归国家统一调配管理，企业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gongyouzhi wei zhuti duozhong suo-youzhi jingji gongtong fazhan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economies in which the public sector plays the central role)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合营企业中的外资成分、混合所有制中的私有成分。

确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才能为广大劳动者共同分享，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才能实行，才能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保证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基本国情决定只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生产力，增加有效供给，扩大社会就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长期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片面强调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不重视其他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限制或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造成了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调整和完善的结构，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不相适应变得比较适应，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gongjizhi

**供给制** (free supply system)

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物资分配制度。从1927年毛泽东建立工农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军队和党政机关在艰苦条件下一律实行供给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供给制的具体办法和供给标准也各有不同。供给制内容大体包括干部和战士伙食中每日的口粮、油盐、副食定量等；衣服包括单衣、棉衣，部分人员的大衣、被褥、鞋袜等；每人每月还可按不同级别领取不同数量的津贴；女工作人员每月还有卫生费，生育小孩有保育费，有些女干部还有保姆费，幼儿可免费入托儿所。随着经济形势好转，1948年12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全国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按等级分为大灶、中灶、小灶；服装按不同级别在质量和式样上也有所区别。供给制在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作风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机关中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人员仍保留过一个时期的供给制。1955年7月，国务院命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见工薪制），供给制从此被废止。

Gong Yuzhi

**龚育之** (1929~ ) 历史学家，哲学家。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52年至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干事，1956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兼任研究工作。1976年10月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任副主任，改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仍任副主任，研究员。1984年起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至八届委员、第九届常务委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论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著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把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后来著作的一个特点，主要代表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主编之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主要作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负责第六、第七

章）、《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研究的新起点》、《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论旗走笔》、《大书小识》、《在旋涡的边缘》等。

Gongtong fuyu

**共同富裕** (general prosperity for all)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标。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在1986年3月28日、4月4日两次谈话中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有完整的内涵。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共同富裕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②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要达到共同富裕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下追求同步富裕只能是共同贫穷。共富是目的，先富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因此要大力提倡先富帮后富、带后富。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动力。③要依法致富、勤劳致富。我们允许、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决不允许非法致富。同时要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方针，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主

要手段。④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只能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我们承认差距，又要控制和逐步缩小差距，不能把共富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允许先富等同于允许搞两极分化。

Gu Mu

**谷牧** (1914~ )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山东荣城人。1914年9月27日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党支部书记。1934年到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北军120师、107师、112师任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54年9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4月任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5年1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仍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维持经济建设的工作。1969年4月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198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3月任国务委员，9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8年3月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gufen hezuo zhi

**股份合作制** (share-based cooperative systems) 股份制在合作经济中具体运用的制度，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

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其主要特点是：①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参加股份合作制的成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志愿和选择，自由入股和自由退股，劳动者之间是自愿、合作、平等、互利的关系。②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实行各种生产要素的联合与生产合作的实体，现阶段入股者一般具有双重性，既是参股者，同时也是劳动者或经营者。③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分配，不单以入股的份额为标准，而是以股份数额和提供的劳动量为标准。④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依照国家法律设立，而是依照入股者的共同协议和企业章程而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同原有的公有制企业相比，其特点在于：①产权主体明确。既保障了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又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按集体经济的性质特征办事。②利益主体明确。在集体经营、共同劳动中，每个职工不仅以劳动者身份按投入的有效劳动量进行分配，还以所有者身份按投入的股份分配收益。不仅明确了当前分配利益，还明确了财产增值的以后归属。③职工主人翁地位明确。企业民主管理有职工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作保障，不致流于形式。④政企关系明确，企业自主经营。企业明确了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必然改变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地位。由于企业财产由本企业劳动群众按股份共有和共同所有，企业经营效益同本企业劳动者密切相关，必然要求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经营，充分行使企业自主权。⑤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入股不仅有助于缓解企业发展投入资金不足的矛盾，还会将社会上分散的财力有效地挖掘出来，将相当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

gufenzhi shidian

**股份制试点** (trial of share ownership)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选择部分地区及企业所开展的按法定程序，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建立法人企业，对生产要素实行联合占有，联合使用，从事生产和经营，并按投资入股的份额参与企业的管理与分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制度的试点工作。始于1984年，止于1993年底。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6)为初步试点阶段。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始进行。1984年7月，北京出现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试点企业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沈阳、重庆、武汉等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也组建了一批股份制企业。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的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第二阶段(1986~1989)为扩大试点阶段。1986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各地可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股份制试点随之扩展到国有大中型企业。1986年，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1987年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上海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天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社会公众和本企业职工发行100万元的股票。在同一时期，山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北、广东、辽宁，甚至广西、云南等地，股份制企业也纷纷建立。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第三阶段(1989年末至1990年中期)为停滞阶段。由于对股份制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各项相关工作难以开展，股份制试点工作处于踏步状态。第四阶段(1992~1993)为规范试点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股份制试点，并要求尽快颁布股份制有关法规，促使股份制尽快加速成长。国务院有关部门从1992年5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股份制方面的15个法规文件。如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联合发布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等。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的特点是：进展快，有突破，效益好，规范化。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使中国的股份制法规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

推荐书目

罗元明主编：《股份制与国有股权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

吴敬琏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4。

Gu Jiegang

**顾颉刚** (1893~1980) 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

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教授，以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1934年发起成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他是“古史辨”派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并与他人合作编成古史论文集《古史辨》七册，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受国务院委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1980年12月25日逝世于北京。著述宏富，已出版的专著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初版名为《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Gu Tinglong

**顾廷龙**（1904～1998） 图书馆学家。江苏苏州人。1904年11月10日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硕士学位。历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主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1939年在上海与张元济等人创办合众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名誉馆长，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他长期从事文献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和图书馆学的研究、组织工作，著述颇丰，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主编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1998年8月22日逝世。

Guanyu Chengli Beifang Ba Sheng Shi Zizhi Nongye Xiaozu de Tongzhi

《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

**农业小组的通知**（“Notice on Establishing Agricultural Teams in 8 Norther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196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文件。文件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为了具体协助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协助各级领导由下而上地制定各省农业规划，逐步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面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有24人组成的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谢富治、余秋里任副组长。

Guanyu Chengshi Renmingongshe Wenti de Pishi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on Problems Concerning Urban People's Communes”）

1960年3月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文件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并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态度，组织试验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文件指出，可以大型国营厂矿为中心，以机关、学校为中心，以街道居民或以城区再加一部分农村为主体，组织各种形式的人民公社。它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文件希望1960年上半年在全国的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文件规定，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应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文件发出后，各地城市纷纷大办人民公社。到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数达5500多万，占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Guanyu Chengxiang Shougongye Ruogan Zhengce Wenti de Guiding Shixing Cao'an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Regulations on Certain Policy Issues of Urban Handicrafts Industries [Provisional Draft]”）

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通过、6月1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又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共6个部分35条。

文件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应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对于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文件指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有些城市也可以以人民公社工业为主要组织形式。不论采取哪种组织形式，原则上都要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经济民主，自负盈亏，反对不讲经济核算的“吃大锅饭”做法，反对依赖国家包下来的思想。文件还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必须对目前手工业的所有制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凡是不利于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不利于恢复和增加产品品种，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不便利群众的，都必须坚决采取适当的步骤，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属于参加这些合作组织的手工业工人集体所有。在农村，它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中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在城市和集镇，可以是人民公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是手工业联社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不作为人民公社经济的组成部分。某些适宜于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应该允许他们在手工业合作组织、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的领导管理下，进行独立劳动，自产自销。允许个体手工业者收徒弟。国家不能强迫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接受计划，只能通过协商调整其生产。

文件的颁布实行，一定程度上使手工业集中过多、限制过死的问题得到解决。

Guanyu Chengzhen Feinongye Geti Jingji Ruogan Zhengchexing Guiding 《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Certain Policy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Urban Non-Agricultural Individual Economy”）

1981年7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文件。规定共18条，主要内容：①从事个体经营的条件和审批手续。凡城镇正式户口的待

业青壮年，退休职工中具有当前社会所急需的技术专长或经营经验、能够包教学徒传授技艺的，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经营申请由街道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②个体经营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允许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允许自由购销；可以同有关方面协商借用、租赁或购置必需的房屋、工具和设备。享有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劳动者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国家保护个体经营者的正当经营、合法收益和资产。③个体经营者的组织。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成立个体经营者协会或联合会。其组织的任务是：向会员提供各种服务、交流经验、传授技术，传达组织学习国家的政策，检查督促会员自觉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该组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领导。

Guanyu Cujin Xiangzhen Qiye Chixu Jiankang Fazhan de Baogao  
《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报告》（“Report on Promoting the Persistent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布的农业部1992年1月2日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强大支柱，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国情作出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根据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为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提出，明确发展目标和指导思想；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大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深化企业改革；继续对发展乡镇企业实行扶持政策；切实加强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

Guanyu Dangqian Wenxue Yishu Gongzuo Ruogan Wenti de Yijian Cao'an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Opinions on a Number of Questions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t the Present

[Draft]”） 1962年4月文化部党组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提出的报告。又称《文艺八条》。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文化部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党组讨论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年来，文学艺术继续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但文学艺术工作也有不少缺点。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双百”方针，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作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有的领导在处理文学艺术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

为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报告提出了八条意见，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体裁、形式的自由发展和自由竞赛，鼓励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及时总结经验，交流经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鼓励香花，反对毒草；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鼓励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群众、熟悉群众生活；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报告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调整一些必须调整的关系，制订出一套同党的文学艺术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办法。报告比较客观，也较为切合实际，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Guanyu Dangnei Zhengzhi Shenghuo de Ruogan Zhunze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Certain Rules for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行动规范的重要文件。《准则》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

验教训，划清了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非界限，恢复和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更加系统化、法规化，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规，也是对党章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

主要内容共12条：①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要做到这一条，一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二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②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③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必须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④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要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⑤要讲真话，言行一致。要努力肃清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造成的假话盛行的歪风邪气。⑥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⑦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⑧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强有力的领导班子。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团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的需要。⑩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党内斗争中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⑪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力。⑫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

Guanyu Dang Zai Guodu Shiqi Zongluxian de xuexi he Xuanchuan Tigang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Study and Propaganda Outline for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3年12月下发的文件。正标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中宣部起草的这个提纲时，对总路线的表述又作了推敲和审定。

宣传提纲共阐述五个问题：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它是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③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农经济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之上。手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④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⑤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党的领导作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彻底胜利的保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

Guanyu Gaibian Nongcun Renmin Gongshe Jiben Hesuan Danwei Wenti de Zhishi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Instructions on Changing the Basic Budgetary U-

nit of Rural People's Communes”)

1962年2月1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1961年10月至11月，中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10月7日的指示，普遍进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所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好处是：能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更适合农民的觉悟程度，能够进一步发扬广大社员对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便于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便于社会监督干部。文件认为，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更适合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于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才能。因此，文件决定，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一般要由原来的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规定，这项制度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文件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生产大队的任务作了规定，指出生产大队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执行经济方面的许多职权，并且要在公社的领导下，进行行政方面的许多工作；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要向生产大队提交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机动粮。文件提出，如何进一步克服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督促生产队的干部，并且具体帮助他们，认真制订劳动定额，健全评工记分办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文件还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干部、土地、耕畜、农具、大队企业、林木、水利、债务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最后，文件要求调整核算单位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力争在春耕前后大体做完。在调整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和充分的准备，并且把对农民的教育工作同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文件的发布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便已存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Guanyu Gaijin Caizheng Guanli Tizhi de Guiding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1957年11月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1次会议通过，11月14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1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自1958年起施行。为了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的支出。文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计算地方正常年度支出的办法、分成的计算方法和分成比例、地方财政结余的处理和地方预算的编制、地方机动财力收入的限度、自治区的财政收入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财政管理体制的改进，进一步发挥了地方财政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Guanyu Gaijin Gongye Guanli Tizhi de Guiding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1957年11月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1次会议通过，11月14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1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自1958年起施行。文件主要针对当时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①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但仍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物资分配、财物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职权太小。②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为此，文件规定，适当扩大省（市）、自治区管理工业的权限，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在计划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在财务方面实行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成。这个文件的通过和施行，调动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Guanyu Gaijin Guojia Xingzheng Tizhi de Jueyi Cao'an

**《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Resolution [Draft] on Improving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s”) 1956年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



制定的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由国务院于1956年5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体制会议上提出，8月28日，经国务院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后，10月30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其发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的。1957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研究落实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国家机关行政管理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逐渐形成各项行政管理权限较多地集中到中央的情况，现在有必要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决议（草案）依据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作了一系列规定。指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首要步骤，是先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并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予以适当扩大，然后再逐步划分省和县、县和乡的行政管理职权；在计划管理方面，应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全面综合平衡和分级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关于财政方面，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都要根据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编造，即预算所列收支必须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相适应；国家的工业企业应该由中央各工业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分工负责经营管理；分管的比例应该按照工业企业的性质确定；关于基本建设方面，中央各部门的设计和施工任务，一般的由中央各部门承担，地方的设计和施工任务，一般的由地方承担；农业、林业带有极大的分散性和地区性，工作主要靠地方；铁路和民用航空运输，由中央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经营国家计划平衡商品的一级批发站，由中央主管，其余的二级批发站以及县和县以下的批发商店，由地方主管；主要为地方建设事业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逐步下放，由地方主管。决议（草案）还就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民族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作了具体规定。

Guanyu Gaijin Shangye Gongzuo de Ruogan Guiding Shixing Cao'an  
**《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Certain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Commerce Work [Provisional Draft]”） 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6月19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又称《商业工作四十条》。共8个部分40条。

文件规定了商业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改进商业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指出，社会主义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商业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商业工作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经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农业同工业、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必须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根据农产品对国计民生重要性的不同，分别采取统购、定购和议购的方法，分期分批适当提高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供应农业的工业品不准随便提级提价。文件强调，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是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文件要求，商业行政部门应该同商业企业分开，商业行政部门主管商业的方针、政策、计划、业务领导等工作，国营商业企业在商业行政部门的领导下，主管具体业务。文件还要求，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买卖公平，实事求是，便利群众，待人和气，勤劳节约，不“开后门”，钻研业务，学习政治。

文件颁布后，对改进商业工作，解决等价交换和物资交流问题，解决商业体制和农村的商业所有制问题，解决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以后的商业工作有很大借鉴作用。

Guanyu Gaijin Shangye Guanli Tizhi de Guiding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1957年11月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1次会议通过，经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1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自1958年起施行。文件规定：地方商业机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行政机构合并设置时，在财务上可以统一核算，但业务方针政策上仍旧分别接受原来所属主管商业部门的指导；中央各商业部门设

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购供应站，实行以中央各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的双重领导；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全部移交给地方管理；商业计划指标，国务院每年只颁发收购计划、销售计划、职工总数、利润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总额的执行中，有5%的机动幅度；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全额分成；商品价格的管理，中央和地方分工，各自设立物价管理机构；实行外汇分成，中央将所得外汇，分别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提成。

Guanyu Huafen Nongcun Jieji Chengfen de Jueding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Resolu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Class Status”）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8月20日公布。这一决定是为了正确地实施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阐述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若干新规定等三个问题。同时具体规定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划分办法；劳动与附带劳动，富裕中农、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反动富农、破产地主、贫农、知识分子、游民、宗教职业者等的内涵和政策；小手工业者、手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商业资本家或商人、开明绅士、恶霸等的划分办法。

Guanyu Jiakuai Gongye Fazhan de Ruogan Wenti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On Certain Issues in Speeding Up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975年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工业整顿的重要文件稿，简称“工业二十条”。1975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务虚会要求国家计委起草一个文件，总结铁路、钢铁的整顿经验，为整个工业整顿提出切实的规定。7月底，文件写成初稿。8月8日，邓小平召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作了重要指示，要他们参与修改。到11月3日，修改过4稿，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对工业整顿和发展问题作出了20条规定：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整顿企业领导班子，调整那些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帽子的“勇

敢分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决不能把搞好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批判；要建立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要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坚持独立自主，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个文件是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以来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方针和政策。文件形成第4稿后，因随即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正式下发，1976年8月，“四人帮”将文件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供批判用，但它的主要精神已经在整顿中贯彻执行，得到广大干部、工人的欢迎。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基础上起草了“工业三十条”，指导工业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

Guanyu Jiakuai Gongye Fazhan Ruogan Wenti de Jueding Cao'an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Decision on Certain Problems in Speeding Up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raft]”)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简称工业三十条。主要内容为：揭批“四人帮”，深入学大庆；整顿企业领导班子；队伍建设；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企业其他几项基本制度；整顿企业的标准；工业企业的任务；工业企业的政治工作；对企业实行“五定”和设立企业基金；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两个积极性和工业管理体制；统一计划；工业指挥系统；大力支援农业；把发展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放在突出地位；能源政策；挖潜、革新、改造；综合利用，保护环境；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增加积累，厉行节约；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加强科学研究，采用先进技术；培训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劳动竞赛和革命比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城市工作要为生产、为职工服务；加强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文件指出，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党委作出决定后，由厂长负责组织执行。企业党委要积极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并且监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企业的经常工作，必须以政治为统帅，以生产为中心，

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加强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必须在巩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分配上，要坚持按劳分配，既反对高低悬殊，又反对平均主义，承认必要的差别。中央各有关部门要和地方一道，制定出各行各业和工业企业的工作条例。这个文件的发布对当时工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Guanyu Jiakuai Nongye Fazhan Ruogan Wenti de Jueding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Decision on Certain Problems in Speeding Up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定。决定明确了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在加快农业发展问题上总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这对当时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统一全党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决定要求：①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②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左”的或右的干扰；③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④持续稳定地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⑤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⑥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⑦从实际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的利益办事。

第二部分就当前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提出了25项政策和措施：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应受到国家法律保护。②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③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④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去批判。⑤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⑥加大农业投资的比重。⑦增加对农业的贷款。⑧提高粮食统购价格。⑨稳定粮食征购指标。⑩因地制宜搞好农、林、

牧、副、渔各业生产。⑪在充分利用现有耕地的同时，有计划地开垦荒地。⑫努力办好国营农场。⑬增加农药化肥的生产。⑭选育、引进和推广良种。⑮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机械化。⑯抓好各项经济作物的生产。⑰大力植树造林。⑱大力发展畜牧业。⑲加速渔业生产。⑳发展社队企业。㉑搞好城乡物资交流。㉒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㉓重点扶植老、少、边、穷地区。㉔继续实行计划生育。㉕保护、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第三部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①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农村工作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教育和研究。②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机械化工作。③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④国家的农业投资必须重点用于建设一批商品粮、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基地。⑤加强农用工业和农村交通运输业的建设。⑥建设现代化的农畜产品加工业。⑦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⑧发展农业现代化要波浪式前进，不要全面铺开。

决定最后再次强调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Guanyu Jiaqiang Dang de Jianshe de Jige Zhongda Wenti de Jueding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Decision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Strengthening Party Construction”)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内的指导地位，认真研究和解决党在自身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分4部分：①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改革开放要求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决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

主、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③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导方针是：第一，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必须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运用已有的成功经验并进行革新和创造，改革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第三，必须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第四，必须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又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④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一是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二是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Guanyu Jiaqiang Dang tong Renmin Qunzhong Lianxi de Jueding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Decis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文件向全党郑重提出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决定分9部分：①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②首要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③深入基层，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疏通、拓宽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⑤加强廉政建设，发扬艰苦奋斗精神。⑥建立和完善党内党外监督制度。⑦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⑧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⑨用整风精神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决定。

Guanyu Jiaqiang he Gaijin Qiye Sixiang Zhengzhi Gongzuo de Tongzhi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的通知》**（“Notice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y and Political Work in Enterprises”）

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主要内容分5部分：①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应从两方面入手：一要继承、恢复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历史上形成而至今仍有的错误观念和不正当的作法。二要根据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从体制、内容、方法等方面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证。②建立在厂长（经理）全面负责下的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新体制。按照《企业法》规定，厂长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负全面责任。为了与企业新的领导体制相配套，厂长必须对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负责。这种体制适应了思想政治工作是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要求。③从实际出发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任务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四有”职工队伍，调动职工从事建设与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内容和要求是：培养富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加强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技能的教育与训练；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职工出现的思想问题；根据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形势教育。④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要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本色。⑤积极稳妥地向新体制过渡，不断总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通知》的发布对保证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Guanyu Jiaqiang Shehuizhuyi Jingshen Wenming Jianshe Ruogan Zhongyao Wenti de Jueyi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n Certain Major Issues in Build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决议》根据全面实现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生活文化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③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④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⑤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⑥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⑦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Guanyu Jiasu Jinxing Dangyuan Ganbu Zhenbie Gongzuo de Tongzhi

**《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Notice On More Quickly Reexamining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1962年4月2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后，各级党委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有一些

地区和部门贯彻不力，甄别工作进度很慢。为此，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文件，要求加强对甄别平反工作的领导，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其中即使有的党员、干部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当场向被错误批判、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道歉。文件还指出，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头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进行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这个文件的发布，使在“反右倾”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大多数人得到了甄别平反，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Guanyu Jiasu Kexue Jishu Jinbu de Jueding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Decision on Speeding Up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1995年5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决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为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

主要内容为：①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工作要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②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把农业科技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全面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科技扶贫；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③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技术创新是企业科技进步的源泉；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继续推动产、学、研三结合；大力推动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的发展。④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创办各种形式的高技术企业。国家重点塑造一批自主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大型高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⑤推动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依靠科学技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⑥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要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瞄准国家目标和世界科学前沿，努力攀登科学高峰。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⑧建设高水平的科技队伍，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⑨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增大财政科技投入；鼓励各类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拓宽科技融资渠道，增加科技贷款规模。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⑪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Guanyu Jianguo Yilai Dang de Ruogan Lishi Wenti de Jueyi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n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但党内外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也提出：“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政治生活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以胡乔木为组长的决议起草小组。此前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基础。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9次同起草小组领导谈话，对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作了阐述，提出三条总的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起草小组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写出讨论稿于1980年10月交中共党内4000人讨论，而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基本内容 决议分八个部分，共38条。第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主要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第二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指出，32年来，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32年的历史，总的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多，中国共产党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有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做了科学的分析。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

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作了基本总结。这条道路的要点是：①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④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⑤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⑥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⑦改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⑧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⑨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⑩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决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件，它既对多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的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为维护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Guanyu Jianli Shehuizhuyi Shichang Jingji Tizhi Ruogan Wenti de Jueding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Decision on Certain Issues 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决定》总结了10多年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提出了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及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方案，是中共中央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战略决策，也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行动纲领。主要内容分10部分：第一，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第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①明晰产权关系，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②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③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④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⑤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第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和信息市场。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个人分配收入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第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不断完善。第七，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补。第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确保教育投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状况，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第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法律，20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第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

#### 推荐书目

刘国光主编：《走向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新华出版社，北京，1993。

Guanyu Jinyibu Jiaqiang he Wanshan Nongye Shenchan Zerenzhi de Jige Wenti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Several Is-

sues i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Perfect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1980年9月27日印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落实中央精神,调整了农业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针对农村出现的这种新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座谈会,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引导农村改革向深入发展。纪要共讲了12个问题:①当前农业工作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②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具有个体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中国农业集体化虽然经历过曲折和失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分为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两类,是一个好的开端。④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不要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⑤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较之其他包产形式有许多优点。⑥包产到户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边远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在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现行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⑦尽力做好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属于中间状态社队的工作。不要限于包产到户一种方法去解决,要对症下药。⑧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继续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繁荣农村经济。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尊重社队自主权统一起来。⑩加强党的领导,改善领导作风,密切同农民的联系。⑪训练干部,培养一大批懂得党的政策、政府法令、通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人才。⑫今冬明春,各省、市、自治区要把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进一步搞好劳动计酬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会议纪要》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政策依据,是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历史文献。

Guanyu Jinyibu Jiaqiang Nongye he Nongcun Gongzuo de Jueding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Decision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Work”) 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文件。

文件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各项基本政策。

决定主要内容分10部分:①8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成绩与90年代的主要任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要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农村改革要有一个新的进展;农村社会面貌要有一个新的变化。总的目标是在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②稳定和完善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完善;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深化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③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妥善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④抓紧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普及适用的先进技术;改革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业科学研究。⑤加快大江大河大湖综合治理,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修一批防洪、发电、蓄水、引水的大型水利骨干工程;加强堤防和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搞好重点水土流失区的综合治理;提高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比重。⑥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发展农用工业。⑦做好扶贫和地区间协调发展工作,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经济开发为主的方针,做好扶贫工作;有计划地扶持西部不发达地区。⑧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自身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⑩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Guanyu Jinyibu Zhizhi Dangzheng Jiguan he Dangzheng Ganbu Jingshang Ban Qiye de Guiding

《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On Further Prevent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and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from Going into Business or Setting Up Enterprises”)

1986年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是在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达后,为刹住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不正之风而作的进一步规定。主要内容有10条:①党政机关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②党政机关干部一律不准在各类企业中担任职务。③党政机关干部须在离退休满两年后才能到非国营企业任职,并不得再享受国家规定的离退休待遇。④凡参与违法经营活动的干部职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⑤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不得离职经商、办企业。⑥党政机关所属企业停办后,亏损倒闭、资不抵债的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审批,坚持原则,依法办事。⑧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等群众组织办非商业性企业必须报批。⑨为安排青年就业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和乡镇街道办的企业另作规定。⑩军队机关和干部办企业按1985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办理。

Guanyu Jinyibu Zhili Zhengdun he Shenhua Gaige de Jueding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Decision on Further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and Deepening Reform”)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曾作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决定,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五中全会强调: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决定》主要内容分8个部分:①统一全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如实估计困难。这些年来,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楚的估计,在

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②治理整顿的时间和目标。用3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状况；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进一步深化完善各项改革措施。③继续控制社会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是进一步治理整顿的首要任务，坚持实行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是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根本性措施。④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⑤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逐步消除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的状况；整顿市场秩序；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坚决制止与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⑥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⑦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要稳定、充实、调整和改善前几年的改革措施；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适当加强集中；要在继续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逐步建立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⑧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根本保证。

### Guanyu Jingji Tizhi Gaige de Jueding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Decision on Economic System Reform”）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突破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主要内容分10部分：①改革是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已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改革打下基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内搞活，对外

开放的需要；世界新科技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②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③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过去国家对企业管理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④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根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⑤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⑥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可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可以扫除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积弊。⑦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⑧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⑨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⑩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 推荐书目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

Guanyu Jundui Yuanxiao Wuchanjieji  
Wenhudageming de Jinji Zhishi

###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Urgent Instruction on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ilitary Colleges”）

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转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文件。《紧急指示》指出，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紧急指示》宣布取消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组撤出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在转发《紧急指示》时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从此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

Guanyu Kaizhan Fanlangfei Fanbaoshou  
Yundong de Zhishi

### 《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Instruction Concerning Launching an Anti-Waste and Anti-Right Conservatism Campaign”）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当时，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但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有不少单位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思想作风上的系统整改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文件决定，以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文件认为，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开展这个运动，可以有力地揭露党政干部思想作风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以期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更多的事情。

为了反对浪费，开展这一运动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反对保守的结果，却使一部分人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发展。

Guanyu Kaizhan yi Baoliang Baogang  
Wei Zhongxin de Zengchan Jieyue Yun-  
dong de Zhishi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  
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Instruc-  
tions for Launching a Campaign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Economize  
Focused on Saving Grain and Steel”)

1960年8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主要针对当时工业生产下降、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农业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等问题，特别是粮、钢增产问题，文件提出：立即发动群众讨论今后5个月的增产节约指标和实现这些指标的具体措施；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建设；干部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大量精简企业、事业单位中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一部分直接生产人员，充实和加强粮食、钢铁生产战线；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群众生活，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原则，反对本位主义；所有工业、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进一步支援农业；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文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粮、钢和其他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Guanyu Lixing Zengchan Jieyue he  
Fandui Tanwudaoqie Fandui Toujidao-  
ba Fandui Puzhanglangfei Fandui  
Fensanzhuyi Fandui Guanliaozhuyi Yun-  
dong de Zhishi

**《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  
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  
指示》** (“Instruction on Cam-  
paign Rewarding Increased Produc-  
tion and Thrift and Opposing Corrup-  
tion, Theft, Profiteering, Waste and  
Padding, Disorganization and Bureau-  
cratism”)

1963年3月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文件指出，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全面好转，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

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中共中央相信，同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一样，这次开展的“五反”运动又是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件对整个运动作了部署，明确要求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这次运动存在着一定范围和某种程度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但由于中共中央强调在运动中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因此对促进国民经济继续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

Guanyu Muqian Nongcun Gongzuo  
zhong Ruogan Wenti de Jueding Cao'an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草案）》** (“Decision on Cer-  
tain Problems at Present in Rural  
Work [Draft]”)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简称《前十条》。文件提出了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①形势问题；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③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④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⑤依靠谁的问题；⑥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⑦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⑧“四清”问题；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文件重申继续贯彻执行《农村公社六十条》，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文件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尤其是对农村的阶级力量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因此认为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文件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中国共产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文件还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文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

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防止修正主义的办法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都是正确的、符合群众愿望的。但这场运动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文件所规定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guanyu nongcun gongzuo de wuge 1  
hao wenjian

**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1号文件**

(five No. 1 documents on rural work) 1982~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的编号为第一号的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有关政策后，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全面持续增长。在这么大而深刻复杂的变革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引起一些争议。五个1号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完善农村改革有关政策的过程。是指导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即1982年1月1日发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强调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并第一次明确肯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即1983年1月2日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主要内容是从理论上肯定了农村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正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第三个中央1号文件,即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是继续贯彻执行第二个1号文件中的各项政策,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文件放宽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决定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3年延长到15年,深得广大农民拥护。

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主要内容是为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扩大市场调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十项政策中最主要的是改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这些政策是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

第五个中央1号文件,即1986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主要内容是在肯定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及取得巨大成效的前提下,针对农村出现的农业情况好转就放松农业基础建设的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 推荐书目

黄道霞:《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文献——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制订经过》,《中共党史研究》,1998(5)。

Guanyu Nongcun Renmin Gongshe Dangqian Zhengce Wenti de Jinji Zhishixin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Urgent Notice Concerning Present Policy Questions of Rural People's Communes”)

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当时,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但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或者在1959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为了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了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方针真正成为全党全民的实际行动,彻底纠正“共产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把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农民群众讲清楚,中共中央发出了这封紧急指示信。

指示信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在此期间,不再新办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试点。现有的试点和已经过渡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队,办得好的、群众拥护的,可以继续办下去;办得不好的、群众要求改变的,就停止试验,重新恢复基本队所有制。指示信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指示信还要求,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应实行少扣多分,努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指示信号召,要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切实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把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稳定下来,使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得到更好、更大的发挥。

这封指示信传达到农村后,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指示信中虽然仍存在着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公共食堂等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纠正“左”倾错误,减少“共产风”带来的危害,稳定农村形势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Guanyu Nongye Hezuo Hua Wenti de Jueyi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n Issue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根据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作出的决议。

决议错误地批评了党内合作化问题上反对过急、过快,主张稳步发展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强调:彻底批判这种主张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条件。决议认为,党内持这种意见的人看不见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和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决议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新的规划:①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先进的地区,到1957年春季以前合作社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70%~80%,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②全国大多数地区,大体上可以在1958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③在互助运动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很少的地区,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时间。决议把党内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Guanyu Qieshi Jiaqiang Yinhang Gongzuo de Jizhong Tongyi Yangde Kongzhi Huobi Faxing de Jueding

《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Decision on Implemen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ized Unification of Banking Work and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Issuing of Currency”) 1962年3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货币发行过多,部分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大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多方面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的同时,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控制货币发行和稳定市场物价方面来。文件作出六条决定:①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②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③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④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⑤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报告货币投放、回笼和流通等重要情况;⑥在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文件发出后,银行工作高度集中统一起来,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Guanyu Quandang Dongshou Daban Nongye Daban Liangshi de Zhishi  
《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Instruction for the Whole Party to Pitch In and Carry Out Agriculture and Grain on a Mass Scale”）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通过的文件。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58年和1959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1960年的夏收已经到手，但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未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

中央认为，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粮食生产。为此，文件要求：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坚决压缩水利、公路、航道、土铁路等基本建设，全力保证粮食生产；鼓足干劲，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 and 必须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

文件强调，要保证搞好粮食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须坚决肃清官僚主义，首先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guanyu rendaozhuyi he yihua wenti de taolun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controversy over humanism and alienation） 指1983年3月至1984年初，围绕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思想理论界开展的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争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人

性、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文章。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异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弊病，甚至根本不属于缺点、弊病而属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必然现象，都塞进“异化”概念之中，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

1983年3月7日，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顾问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讲话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其对中国思想界某些人的影响，却发表了许多关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列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所谓异化，用异化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的依据。

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一方面，决定会议延长，使会议开成有不同观点发表的学术性讨论会。一方面，指出周扬的缺点、不足和错误。但是，《人民日报》于3月16日全文发表了未经修改的周扬讲话。

邓小平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批评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精神污染现象，特别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并且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他们这样讲，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被下发到县团级进行学习。

此后，发表了许多批评错误观点的文章。指出马克思使用“异化”是在揭露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致使工人的“劳动异化”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并没有把异化当成普遍规律来使用。把“异化”概念普遍化、永恒化，是近几十年来流行起来的一种西方社会思潮。11月5日，周扬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拥护中央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决策。有些受到批评的人仍然有抵触情绪。有的领导人利用反对精神污染进程中出现的某些不健康现象，出来紧急刹车，并对反对精神污染进行责难。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到中央党校作《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讲话全文，其他各报也摘要刊登。讲话指出：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其核心和实质是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他批评那种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思潮，并批评了这种思潮的典型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还批评了用“异化”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的说法，对那种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所谓“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和经济领域的异化的观点，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剖析。

胡乔木的讲话被作为教科书发给大学生阅读。邓小平指出：人道主义、异化实际上是搞自由化。至此，这场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Guanyu Renmin Gongshe Ruogan Wenti de Jueyi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n Certain Problems Concerning People's Communes”）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毛泽东主持起草。在1958年九、十月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在这种“热气腾腾”的气氛下，毛泽东最先冷静下来。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迈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第一步。

文件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醒干部保持冷静的头脑，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计划。同时指出，在现阶段，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即使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社会

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轻率地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文件强调，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文件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个人，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一律不要宣布废除。文件还对人民公社的生产方针、生产组织和生活等问题做了规定。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也进行了压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全会通过的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这方面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文件的基调还是赞美和肯定人民公社，但是这个决议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Guanyu Renmin Jiefangjun Jianjue Zhichi Geming Zuopai Qunzhong de Jueding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Decision 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solutely Supporting the Revolutionary Leftist Masses”）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月23日发布的文件。决定根据毛泽东1月21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语精神，作出了5条指示：①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②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③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④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⑤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决定》发布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介入地方的运动，组织“支左”工作，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

想之下，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Guanyu Shehuizhuyi Jingshen Wenming Jianshe Zhidao Fangzhen de Jueyi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Resolution on the Guiding Poli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全面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决议》根据中共十二大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着重解决了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全局性的认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全面概括和理论升华。主要内容包括8部分：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③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④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⑥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⑦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⑧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一是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

别是搞好党风；二是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推荐书目**

江流等著：《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6。

Guanyu Shixing Liangshi de Jihua Shougou yu Jihua Gongying de Jueyi

**《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Resolution on Implementing the Planned Purchase and Planned Supply of Grain”）1953年，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形势紧张，如不设法解决，在粮食供求上必将出现严重脱节，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发布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定。规定：①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②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③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④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决议的颁布与实施，推动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和对私营粮食工商业的改造，从而也带动了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Guanyu Shibao Gongye Jiaotong Tuolasi de Yijian de Baogao

**《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On Opinions Concerning Trial of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Trusts”）1964年7月17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给周恩来总理并书记处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8月17日转发。60年代初，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比较松散，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未能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由于用行政管理经济按行政区域划分经济区域，使同一行业的企业分属中央和地方各级的不同部门领导，造成多头管理、分散经营、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以改善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经过酝酿、试点和研究，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提出了这个报告。

报告认为，组建托拉斯是改进工业、交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带有革命性的重

要措施；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组织形式。报告说明了组建托拉斯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和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的职能，将从管理生产、建设的日常具体业务，逐步转向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检查方针政策的执行，负责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的制订和综合平衡，组织协作，协调各托拉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关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报告认为应当根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和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它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区性的；也可以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的。报告提出，在1964年内先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9个，地区性的3个。全国性的有：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地区性的有：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报告还规定了管理办法：国家以托拉斯为统一的计划单位和经济核算单位，有关计划、财政、物资、劳动等各项经济管理体制均以它为基础；托拉斯向国家承担经济责任；托拉斯内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和安排生产建设，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产销紧密衔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密切结合、大中小工厂相互匹配的生产体系。

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后，托拉斯的试办工作既积极又谨慎，效果是好的。

Guanyu Tongyi Guojia Caizheng  
Jingji Gongzuo de Jueding

###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Unification of State Financial Work”）

1950年3月3日经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文件。决定在分析了当时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后指出，为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规定：①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制订各级编制。②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统一调配库存物资。③厉行节约。④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动使用。⑤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⑥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

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⑦国家所有的企业，分为三种：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⑧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投资。⑩必须严格地完全地执行上述九项规定。决定发布后，推动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统一，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

Guanyu Woguo Minzu Zhengce de  
Jige Wenti

###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On a Number of Issues Concerning Our Country's Minority Policies”）

周恩来1957年8月4日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周恩来在民族问题方面最重要的一篇理论著作。1984年分别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和《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在考察和研究国内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结了新中国头8年民族工作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性质和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讲话共分4个方面：①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是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都不利于民族团结，只能导致民族对立和分裂。但是，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只能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周恩来强调：这个问题是我国的一个根本性的民族政策，是宪法中规定了的。我国不能像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只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完全是由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决定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现象，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极少。这种条件决定了我国只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建立起各

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③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问题。周恩来指出：各民族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我们要使所有的民族都得到发展。由于历史遗留下很多不利条件，为了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各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发展。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彻底解放生产力。当然，经济制度的改革还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革。④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根据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同时，必须重视民族化的问题，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还应该实行干部民族化，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周恩来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Guanyu Xinan Sanxian Jianshe Tizhi  
Wenti de Jueding

### 《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

（“Decision on Constructing the Southwest Third-Front System”）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文件。当时，西南三线建设正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文件决定：①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的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②西南三线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在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如协调地方与建设人员的关系等，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③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撤销原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建小组。李井泉任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

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的进行。

文件发出后，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各省、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大为加强，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Guanyu Yige Dadui de Shehuizhuyi Jiaoyu Yundong de Jingyan Zongjie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Summary of Experiences of a Production Brigad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报告记录。又称《桃园经验》。主要经验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并且采取一种“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后来使不少工作队员谨小慎微，生怕扎错了根子。

王光美还在全国一些地方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当时陈伯达极力主张将这个报告印发各地党委和工作人员。刘少奇也同意报告的内容，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还指出，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这个报告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Guanyu Yinfa Nongcun Shehuizhuyi Jiaoyu Yundong Zhong Yixie Juti Zhengce de Guiding Xiuzheng Cao'an de Tongzhi

《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

（“Notice on Issuing the Revised Draft of Some Specific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Rural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批改的中共中央文件，1964年9月18日发出。又称《后十条》。为了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十条》的相同之处是都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不同之处是，“后十条”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这对于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十分重要。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依靠基层。毛泽东则作出了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这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修正《前十条》势成必然。

《后十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形式。文件认为，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件提出，要按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作为衡量社教运动是否搞好的标准。这六条标准是：看贫下中农是否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干部是否参加劳动；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否建立起来；是否发动群众就地斗争和改造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增产还是减产等。文件规定，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要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并且要蹲两次。文件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提出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和贫下中农，是区分运动彻底与否的根本分界线。文件提出，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文件要求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补课。文件还

指出，整个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文件特别强调，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文件的制订和下发，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倾错误。

Guanyu Zhengfeng Yundong de Zhishi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Notice on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经毛泽东修改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文件明确规定了整风的目的、要求和方法。

文件指出，中国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但中共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中共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增长。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文件要求，以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为思想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整风的主题。文件指出，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不论在座谈会上、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在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的公开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对改进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着积极的意义。实践也证明，文件所规定的整风运动的具体方针和方法，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Guanyu Zhengque Chuli Renmin Neibu Maodun de Wenti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On Correctly Handl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同年 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编入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6 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77 年 4 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86 年 8 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1999 年 6 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56 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日渐突出。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于这年 6 月和 10 月相继发生罢工、游行示威、骚乱的政治事件，也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就成了党和国家工作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讲话分为 12 个部分：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肃反问题；③农业合作化问题；④工商业者问题；⑤知识分子问题；⑥少数民族问题；⑦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⑧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⑨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⑩坏事能否变成好事；⑪关于节

约；⑫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第 1 部分是全篇讲话的核心。

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没有任何矛盾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一般说来，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其特点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后者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讲话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所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讲话还对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具体分析和阐述。

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出于对当时反右斗争形势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

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一些论述。从整体来说，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Guanyu Zhishifenzi Wenti de Baogao

###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Report on the Question of Intellectuals”） 1956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载于《周恩来选集》下卷。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为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而召开的。周恩来在报告中论述了如何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①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提高生产技术。为此，在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必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②“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之下，“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③采取具体措施，以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益的专长；应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应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④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⑤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步伐和国家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篇报告正确地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阐明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对调动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篇报告同周恩来 1951 年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962 年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Guanyu Zhiding Guomin Jingji he Shehui Fazhan Jiuwu Jihua he Erlingyiling Nian Yuanjing Mubiao de Jianyi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Proposals for Drafting the 9. 5 Plan and the 2010 Long-Term Objectiv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1995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文件。这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是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对中国今后 15 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议》主要内容分 6 部分：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以邓小平 1992 年南巡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后 15 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第二，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顺经济关系，推动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对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过 15 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将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

实现现代化开创新的局面。基本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第三，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①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②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重点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逐步实现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③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缩小中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④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四，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和部署。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对外经济体制；加强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第五，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环境保护。第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而奋斗。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抓好党的建设，发挥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的坚强领导和核心作用。

Guanyu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fa Cao'an de Baogao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Report on the Draf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少奇 1954 年 9 月 15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原载 1954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报告的第一、二部分和结论部分收入 1985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3 年底，毛泽东在杭州开始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之后，刘少奇在北京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同时，刘少奇受毛泽

东的委托，主持起草了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 年 9 月 12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报告首先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宪政运动的历史，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接着，报告以主要篇幅，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 4 个方面，详细说明了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同时，报告还对全国人民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必要的说明。报告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中指出，这个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国家根本法。它一定能够在国家生活中起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一定会鼓舞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发展胜利成果而斗争，为粉碎一切企图破坏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敌人的阴谋而斗争，为促进建设事业的健全发展和加速建设的进度而斗争。报告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

报告对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历史意义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同宪法本身一样，是中国宪政运动和法制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

Guanyu Zibenzhuyi Gongshangye Gaizao Wenti de Jueyi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Resolu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此决议先于 1955 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形成草案，1956 年 2 月 24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后成为正式决议。

决议提出了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有必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

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其私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过程中，必须根据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实行鼓励和批评相结合、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决议确定的方针，对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起了重要作用。到1956年底，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Guanyu Ziranhexue Yanjiu Jigou Dangqian Gongzuo de Shisi Tiao Yijian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Fourteen Opinions on the Present Work of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Organs”） 1961年6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订的文件。又称“科研工作十四条”。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试行。

60年代初科学工作的状况、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做好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国家科委党组、中科院党组提出了十四条意见，主要内容有：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加强协作，发展交流；勤俭办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健全领导制度。文件指出，许多研究机构担负着国家交付的重大科学研究课题，其研究工作大都处在攻坚阶段，一定要千方百计战胜困难，把工作做到家，把成果拿到手，力争中国科学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尽快赶上

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文件时，要求在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宣传和贯彻这个文件所规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中共中央还批发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科研工作十四条”和“请示报告”的批转，对推动、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干劲十足，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Guanting Shuiku

**官厅水库**（Guanting Reservoir）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永定河上游修建的第一个大型山谷水库。

永定河有史以来多次泛滥成灾，威胁京津地区的安全。在河北省怀来盆地修建官厅水库，能使永定河流域4.7万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洪水受到控制，并可灌溉农田40余万亩。官厅水库于1951年10月动工修建，有4万多职工和农民参加建设，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苏联水利专家帮助下，于1954年5月上旬汛期到来之前竣工。水库容积22.7亿立方米，面积30平方千米。它的建成对保障首都地区的安全、用水和下游农业生产，对局部改善干燥多风的气候，对下游其他水利开发，都有重要作用。

Guangming Ribao

**《光明日报》**（Guangming Daily）

中国综合性报纸。1949年6月16日在北京创刊，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为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1957年《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光明日报》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出版。

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改版，成为一张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办报方针确定为：以宣传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积极反映国内外科学、教育方面的动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为保持和发扬原有特点，还要兼顾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其他领域的宣传，办好各种专刊和副刊。此后不久，《光明日报》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对推动全国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4年8月，中共中央确定，光明

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紧密联系和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宣传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优秀业绩，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多作贡献，使报纸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

1998年6月8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元旦，《光明日报》再次对周刊、专刊进行改革，形成了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理论、电脑网络、书评七个周刊并立，双周刊、专刊配合的新格局。日刊多时达16版。光明日报社在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及部分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记者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要发展中国家设立26个记者站，派有常驻记者。在上海、广州、西安等10个城市设有发行分印网点，它的读者遍布国内知识界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已经形成了以光明日报为核心，下属光明日报出版社、文摘报社、生活时报社、中华读书报社、《博览群书》杂志社、《书摘》杂志社、《考试》杂志社，并兼有图书出版、广告、印刷、电子、信息、物业管理等相关产业的报业体系。

Guangkai Menlu Gaoquo Jingji Jiejue Chengzhen Jiuye Wenti de Ruogan Jueding

**《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Certain

Decisions on Widening the Road, Enlivening the Economy and Solving Urban Employment”） 1981年10

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主要目的是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和城镇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决定允许城镇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以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主要内容是：①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要贯彻执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②广开就业门路，应该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发展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上进行。③办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大力提倡和指导待



业青年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④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⑤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改变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⑥改革国营企业的经济体制和劳动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果。⑦发挥劳动服务公司的作用。⑧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职工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技术水平。⑨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⑩大力加强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领导。

### Guangzhou Baiyun Guoji Jichang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ngzhou)

始建于30年代。1963年按国际机场标准进行扩建。经过1964~1967年的扩建，白云机场具备了与国外通航的条件。1987年扩建候机楼，现有候机楼面积46346平方米。1989~1991年新建国际航线候机楼，面积28690平方米，有移动式登机桥7座。机场跑道长3380米，宽60米，滑行道长3380米，宽23米。停机坪面积为354700平方米，有48个停机位。机场宾馆建筑面积21700平方米。针对广州亚热带气候，白云机场还修建了76400平方米的绿荫停车场，能停放汽车近千辆。

1997年，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12511995人，居全国民航机场吞吐量第三位；货邮吞吐量351770吨，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三位；起降飞机111739架次，居全国民航机场第四位。

### Guangzhou Choushui Xuneng Dianzhan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Guangzhou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中国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广东流溪河上游、从化市吕田镇境内。为保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经济运行和解决广东电网的填谷调峰需要而立项建设的。1989年5月25日正式开工，1994年竣工。电站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电动机组，总容量120万千瓦。电站4台机组分别于1993年6月、9月、11月和1994年3月建成投产。

电站由上下水库拦河坝、地下引水系统和地下厂房组成，设计水头535米。上水库集水面积5平方千米，设计多年平均进库水量660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816.8米，有效库容1686万立方米。水

库大坝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68米，坝顶长301米，坝顶高程820米。下水库位于九曲水上游的木杉盆地，集水面积13平方千米，设计多年平均进库水量1716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287.4米，有效库容1713万立方米。下库大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43.3米，坝顶长127米，坝顶高程290米。

### Guangzhou Huiyi 广州会议 (Guangzhou Conference)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东广州召开的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此前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前几年农村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的。它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首要任务。会议及其通过的相关文件，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政策产生了很大作用。

### Guo Dali 郭大力 (1905~1976) 经济学家、翻译家。江西南康人。1923年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攻读哲学。曾任广东文理学院和厦门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任教，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介绍、研究和宣传工作。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他先翻译了几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与王亚南合译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还翻译和出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从1928年起，主要致力于《资本论》的翻译，不久王亚南也参加了这一工作。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

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939年，翻译和出版了《〈资本论〉通信集》，从1940年开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1947年在上海出版。1953年，与王亚南一起重新修订出版《资本论》的中译本。1975年重新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出版。1976年翻译完成《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三卷，付印前夕去世。其他主要著作有：《生产建设论》，《西洋经济思想》，《凯恩斯批判》等。1976年4月9日逝世。

Guo Lanying  
郭兰英 (1930~ ) 歌唱艺术家。女。山西平遥人。1930年12月31日生。7岁起在太原演唱山西梆子。1946年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1948年主演新歌剧《白毛女》的喜儿，获得成功。从此改唱歌剧和民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演员。1973年后从事教学活动。主演的著名新歌剧还有《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春雷》、《红霞》、《窦娥冤》等，演唱的《南泥湾》、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怀念周恩来的《绣金匾》等歌曲脍炙人口。她嗓音优美，表演动人，善于把戏剧表演和歌唱艺术相结合，是享有盛誉的民族风格歌唱家。1987年举家南迁，在广东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培养歌剧和声乐人才。

Guo Moruo  
郭沫若 (1892~1978)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文学家。原名郭开贞，曾用名鼎堂。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早年在嘉定小学堂、中学堂，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就学。1914年赴日本留学，1923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6月，和同学共同组织“夏社”，开始进步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引起巨大反响。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回国后，1926年3月，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副主任等职。1927年3月安庆惨案发生后，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抨击蒋介石背叛革命。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在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起，长期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取得开拓性的丰硕成果，出版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任《救亡日报》社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发展壮大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很多工作。同时恢复文艺创作和史学研究，共创作6部历史剧，歌颂民族精神。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屈原》和《虎符》。从1943年夏季起，集中精力从事先秦诸子思想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研究，出版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1944年在《新华日报》上连载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当作整风运动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重庆赴上海，又转赴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48年11月，由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第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从1954年起当选为第一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五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多次率代表团参加国际活动，为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在长期组织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新华颂》、《潮汐集》等诗集，以及历史剧《蔡文姬》等。学术研究专著主要有：《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文史论集》等。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等。

“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冲击，痛失两个爱子。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攻击他对孔子、秦始皇的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甚至逼迫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吕不韦”的文章，为他所拒绝。从此积忿成疾，长期住院。

1978年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讲演《科学的春天》。5月病重中向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作了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一生留下的丰富文化著述，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分为文学篇、历史编、考古篇，总计38卷。

Guo Xiaochuan

**郭小川** (1919~1976) 现代诗人。本名郭恩大，河北丰宁人。1919年9月2日生。1939年9月参加八路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和新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直至“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前夕开始诗歌创作，50年代中期发表以“楼梯式”的形式写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产生较大影响。以后他在诗歌题材和艺术手法上不断探索，诗作更趋成熟。60年代写的《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采用整体象征手法，熔自由体与中国古典辞赋形式于一炉，形成独创的“新辞赋体”。70年代中期写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引起强烈反响。郭小川的诗体现了战士与诗人的统一，时代色彩鲜明，有浓郁的激情，丰富的想象，深邃的哲理。1976年10月18日逝世。

Guojia Tushuguan

###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综合性研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前身是始建于1909年9月9日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开始接受呈缴本，从而确立了国家馆的地位。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1987年7月1日，新馆在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落成。图书馆占地14公顷（其中文津街分馆4公顷），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居世界图书馆第四。馆舍面积与馆藏均居亚洲图书馆之冠。国家图书馆履行搜集、加工、存储、研究、利用和传播知识信息的职责。国家图书馆是全国书目中心、图书馆信息中心、图书馆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着为国家领导机关，重点科研、教育、生产单位，以及社会公众服务的任务。代表国家执行有关对外文化协定，开展与国内外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图书馆设有30多个阅览室，阅览座位3000多个，日均接待读者近8000人次，实行365天开放，在联接的中国公众多媒体信息网和因特网上24小时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截止1998年底，网上

各类书目数据500万条，中文图书全文影像数据500万页，网上用户日均访问量近30万人次。国家图书馆藏书宏富，品类齐全，藏书可以远溯到700多年前南宋时期的皇家缉熙殿藏书。截止1998年底，馆藏文献资料已达2160万册（件），居世界图书馆第五。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遐迩，善本书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册，殷墟甲骨35000片。全面入藏国内正式出版物，现已入藏的中文普通图书达338万余册，少数民族语文图书近12万册，中文期刊4.3万余种，中文报纸5700余种等，是世界典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115种文字的外文文献资料占馆藏的50%，其中外文期刊4万余种，外文报纸1500余种，是国内外文文献的最大藏家。该馆还设有名人手稿、革命历史文献、中国博士论文等专藏。与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的996家图书馆、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也是联合国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的指定收藏馆。近年来，随着信息载体发展变化，还入藏了大量的电子出版物。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量以每年60万~70万册（件）的速度增长。主要的服务方式有阅览、外借、网上服务、专题咨询、馆际互借、国际互借、委托服务、缩微复制、展览、报告会、声像服务等。

guomin jingji chixu kuaisu jiankang fazhan

###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sustained,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是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条重要方针。基本内容指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要争取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做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相统一，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相统一。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是在生产要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的增长，其实质是以数量增长速度为中心。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实现经济效益的较快增长。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

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如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有利于实现集约化增长的宏观调节机制等。

guomin jingji de huifu he fazhan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recovery and growth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1949~1952年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有初步发展。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十多年战争的摧残,到1949年国民经济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1950年1月以后,又大力开展与苏联及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外援,减少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造成的损失。各级政府首先抓紧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恢复,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在各地陆续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帮助农民克服困难的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帮助、维持和发展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监督、限制和改造其不利国计民生的方面,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取缔投机活动;对个体手工业商业采取大力扶助政策;使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从1950年3月起,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并采取紧缩开支、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和工商税收,以及加强市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从1951年起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7.5%,比历史上最高的年产值增长20%。钢、原煤、发电量、水泥、棉纱、粮食、棉花等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超过1949年的产量和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交通通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农民收入一般增加30%以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Guomin Jingji Shinian Guihua

**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1976~1985) (Ten-Year Long-Term National Economic Plan)

1975年制订的10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其前5年规划即“五五”计划。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后,为了实现大会提出的本世纪发展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设想,3月,国家计委发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的通知,随后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和讨论。10月,邓小平先后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拟订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要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12月的国务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形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纲要》指出,今后10年中的主要目标,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实现笨重体力劳动机械化。基本建成6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的大区经济体系。农业方面,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工业方面,要以钢为纲建立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要发展轻工业和石油化工;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准备打仗;要充实和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进一步发挥一、二线作用。具体指标是: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00亿~8900亿元,比1975年翻一番,平均每年递增7.1%~7.2%,其中工业为8%,农业为4.2%~4.7%。这个规划反映了国家和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决心和步骤,但是,11月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讨论《纲要》的全国计划会议受到严重干扰,《纲要》和“五五”计划均未能正式下达,直到1978年3月,才经修改后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上提出并获通过。

Guoying Gongye Qiye Gongzuo Tiaoli Cao'an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Rules for State-Run Industrial Enterprise Work [Draft]”) 1961年9月1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又称《工业企业七十条》。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起草,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

指示》,各地陆续开始试行。

文件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许多企业的领导不善于依靠群众、不善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同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管理工作上的分工负责很好地结合起来,以致责任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在不少企业中,瞎指挥、乱操作的现象严重,许多设备受到损坏;不少企业不计工本,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不坚决维护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独立的经济核算权;许多企业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许多企业的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党委本身的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文件针对以上问题,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系统地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条例草案共10章70条,其主要内容包括:①规定在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的基础上,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五定”是: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②限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干预过多,禁止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引到车间、工段和科室。③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④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载入条例。⑤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⑥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⑦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⑧规定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厂部。

文件的颁发和试行,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随着城市“四清”运动的大规模开展,这个文件实际上被撇在一边。

guoying maoyi qiye jingji hesuanzhi  
**国营贸易企业经济核算制** (business accounting in state-run trading firm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营贸易系统和企业中进行的以实行经济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管理体制。

在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大规

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1952年6月陈云提出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建议。9月召开的全国各大区贸易部长会议决定,1953年6月底以前,国营商业企业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经过试点、试行,积累了初步经验以后,1953年3月,除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外,全国各商贸公司系统陆续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各专业公司按经济区域建立三级批发机构并调整了零售网。将商业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改调拨制为业务合同制,各级经营机构通过签订供应合同组织商品流通。对企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逐级进行核定,核定后由企业自行支配、独立核算,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经营业务,有权对外签订合同、在银行开立帐户、办理贷款和进行结算。企业间的资金往来一律通过银行划拨清算,停止内部转帐。企业的盈亏直接同当地财政部门进行解缴和清算,从而改变了统收统支、不计盈亏的贸易金库制度。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又纠正了由于缺乏经验而作出的一些不适当的规定。经济核算制的实行,使商贸企业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大大发挥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沟通了产销双方,加速了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资金使用更合理、节约,增加了利润,提高了效率。商贸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保证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亿万人民生活所需物资、商品的供应起了积极作用,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 推荐书目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4。

#### guoyou qiye gaige

**国有企业改革** (reform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改变国有企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而进行的改革。

改革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0年,以扩权试点为突破口,着重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主要内容是扩权,减税、让利,使企业拥有

一定的自主财产和经营权利。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初步改变了企业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企业效益的状况,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改革未能配套进行,企业与主管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因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效果有限。第二阶段从1981年到1982年,主要内容是对工业企业实行以利润包干为主的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当时各种经济关系尚未理顺,出现了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资金过于分散的情况。为了确保国家的重点建设,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983年开始进行第三阶段改革:利改税。利改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利改税是把国营企业过去上缴国家的利润改为按55%的比例向国家交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在保证企业留利后分别按固定比例、定额包干、递增包干、调节税等8种不同的办法上缴国家。第二步利改税用税收的形式将国家与企业利益分配上的关系初步固定下来,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效率,但是由于存在税种单一,难以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企业留利悬殊、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等问题。1984年起开始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实践证明,实行利改税对于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提高企业积极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987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为重要特征的第四阶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承包制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它打破了大锅饭,使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在承包制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行为短期化问题,承包人拼设备、拼消耗,而不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部门承包带来的行政干预问题;承包基数确定的不规范问题,等等。在承包制实行了几年后,从1992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第五阶段,其主要内容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这一时期企业改革的特点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要求,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塑造成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2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开始了股份制、公司制的试点和推广,建立法人财产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建立企业内部合理的激励制约机制。从1999年初的情况来看,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一部分企业的效益得到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 推荐书目

黄速建著:《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6。

黄速建、沈志渔著:《公司制度与企业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3。

#### guoyou qiye zhengdun

**国有企业整顿** (re-organ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1月作出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有计划、有步骤、点面结合地、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工作。整顿工作从1982年开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②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奖惩制度;③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④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组织生产;⑤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这项工作进展不平衡,有些企业没有完全达到预定要求,但总的看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很大提高,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亏损额1984年比1981年下降了24.4%,亏损户数下降了31.8%。

# H

haiguan

**海关** (customs) 中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其任务是依照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 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查缉走私, 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海关的权力 主要有: ①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 查验进出货物、物品; 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可以扣留。②查阅进出境人员的证件; 查问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嫌疑人, 调查其违法行为。③查阅、复制与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相制品和其他资料; 对其中与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牵连的, 可以扣留。④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 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 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 对走私嫌疑人, 经关长批准, 可以扣留移送司法机关, 扣留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 48 小时。⑤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个人违抗海关监管逃逸的, 海关可以连续追至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以外, 将其带回处理。⑥海关为履行职责, 可以配备武器。海关工作人员要按国务院批准的规则配带和使用武器。

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向海关总署负责。国务院设立海关总署, 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海关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秉公执法, 忠于职守, 文明服务。海关依法执行职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海关法的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 年 3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77 次政务会议通过, 4 月 18 日公布, 5 月 1 日开始施行。这个《暂行海关法》执行了 36 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暂行海关法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 经过 3 年

的研究、讨论, 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于 1986 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1987 年 1 月 2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 同日由国家主席以第 51 号令公布, 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这个新修订的海关法是海关行使职权最重要的依据。

海关管理体制的变化 50 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管理体制几经变动, 大体分为 4 个时期。

1949 年 10 月至 1952 年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海系统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体制, 海关总署为政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和组成部分, 全国海关统一执行海关总署发布的规章、命令、指示; 各地海关的组织人事、行政、业务等事宜均由海关总署直接领导并受各大行政区或直辖市财委会指导。

1953 年 1 月至 1960 年 10 月。1952 年 12 月 25 日, 政务院发布命令, 海关总署划归对外贸易部领导, 并将对外贸易部的对外贸易管理局与海关总署合并, 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各口岸对外贸易管理局也与当地海关合并, 统称海关。各地海关建制仍属中央, 直属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 同时受海关所在地大行政区或省、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监督指导。1955 年 9 月 5 日, 国务院发布命令, 对各地海关的领导关系再作调整, 将地方海关改为受对外贸易部和所在地省或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 并受该省(市)对外贸易局的指导。

1960 年 11 月至 1979 年底。1960 年 11 月, 经对外贸易部报国务院批准, 海关总署改为海关管理局, 成为外贸部的组成部分。各地海关建制下放到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 受地方党政和外贸部双重领导, 并以地方领导为主, 成为各地外贸局的组成部分。

1980 年至 1999 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国务院根据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 于 1980 年 2 月 9 日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 将全国海关建制收归中央,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人员编制、财务及其业务。各地海关受所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监督指导。1987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 “国务院设立海关总署, 统一管理全国海关”, “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向海关总署负责”。这一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海关的垂直领导体制, 并以法律形

式确立下来。1998 年 3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1998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关于缉私警察队伍设置方案的批复》和 1998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关总署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1998 年 11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建缉私警察队伍实施方案的复函》等文件明确, 海关总署升为正部级, 并增加以下管理职能: ①撤销国家口岸办公室, 其口岸规划、审理等职能交给海关总署承担; ②撤销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 其职能交给海关总署承担, 由海关总署统一负责打击走私工作; ③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出入境卫生检疫局、进出口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合并成立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由海关总署管理; ④组建缉私警察队伍, 由海关与公安双重垂直领导, 以海关领导为主, 设立走私犯罪侦查局, 对走私犯罪案件依法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按照海关对缉私工作的统一部署和指挥, 部署警力, 执行任务。

海关建设 50 年的实践证明, 海关职能作用的发挥及海关的自身建设, 与管理体制直接相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初创时期的 3 年间及 1980 年国务院的决定以来, 海关实行集中的垂直领导体制, 有力地保证了对外一致性和全国统一性, 有效地发挥了海关监督管理的职能, 推动了海关各项改革与建设, 较好地促进和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在其他年代, 特别是 1960~1979 年期间, 海关体制层层下放, 使海关职能受到严重削弱, 海关的自身建设也受到极大影响。

海关机构设置 1951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规定的设立海关的原则是: ①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开放对外贸易港口; ②边境及主要国际联运火车站; ③陆地边境及国界江河上准许货物、旅客进出的地方; ④准许上下客货的国际航空站; ⑤国际邮包邮件交换地点; ⑥经中央人民政府特准办理进出口手续的地方。

按照上述设关原则, 中国海关机构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 基本上是以沿海省市及一些边界孔道为布设重点, 在内陆省区不设海关, 这同当时整个国家发展形势是相适应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50 年代确定的海关机构设置

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有必要调整设关原则。1985年全国关长会议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提出了在对外开放口岸和进出口业务比较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机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8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海关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根据调整后的设关原则,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地陆续设立了海关,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立了海关机构。截至1998年1月,海关总署直属海关单位46个,其中24个局级海关,17个副局级海关,4个海关院校和1个海关分署;隶属海关单位295个,其中副局级海关6个,正处级海关251个,副处级海关10个,科级海关28个,共计341个海关单位。

**新时期海关工作的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1979~1998年的20年间,全国海关工作的巨大成就表现在以下数字:征收关税3567.166亿元;征收进口环节税3666.274亿元;监管进出口货物464 018万吨;监管进出口运输工具12 390万艘(辆架);查获走私案件331 134件;查获走私案值458.6亿元;罚没收入217.029亿元。

从1981年起,国家决定将海关统计数字作为对外发表的数字。在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中正式对外公布。

#### 推荐书目

宿世芳主编:《当代中国海关》,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

#### Haihe zhili

**海河治理** (projec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aihe River) 海河是华北地区重要河流,水系由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五大支流组成,在天津汇流入海。流域面积26.4平方千米,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大部以及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的一部分。流域内雨量集中,多暴雨,下游排水不畅,故多洪涝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发生了1956年、1963年两次特大洪水,其中1963年8月特大洪水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仅河北省受灾耕地就达4756万亩,受灾人口2200万,死亡5030人。自50年代开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即着手对海河水系进行全面治理,兴建了官厅、岗南、密云等20多座大型水库及一

大批中小型水库,开挖了独流减河,修整加固了各河堤防,恢复原有河道泄洪能力,初步形成了全流域的防洪体系。1963年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及时修订了《海河流域防洪规划》,重新安排各河防洪措施。除继续完成山区水库建设外,更着重于中下游河道的治理,开挖了滏阳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和潮白新河,扩大了卫河、漳卫新河、独流减河、滹沱河等排洪河道,使五大支流分流入海,从根本上改变了各河洪水汇集天津的局面。并对滞洪洼淀也进行了整治。通过治理,海河流域基本形成了以保证京津和其他重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广大农田安全为主要目标的蓄滞排相结合的防洪体系。

#### Hainan Dao jiefang zhanyi

#### 海南岛解放战役 (campaign for the liberation of Hainan Island)

海南岛又名琼崖,为中国第二大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10万军队并拥有作战飞机和运输机45架、海军舰艇50艘,企图倚仗11~27海里的海峡和海空优势固守海南岛。为了解放海南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组成10万余人的渡海部队,于1949年12月末集结于雷州半岛,准备强行渡海作战。渡海部队与岛上中共领导的琼崖纵队2万余人,统一由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指挥。1950年2月,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确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主力强渡相结合。毛泽东复电同意并强调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行动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损失。广东省人民政府大力组织民工抢修道路,运送作战物资,保证渡海作战的需要。3月5日至4月1日,渡海部队以8400余人利用夜色及有利风向,分两批偷渡成功。4月16日晚,主力强渡琼州海峡,突破了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海上封锁,于次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登陆。经过10余天的激烈战斗,于4月23日解放海口。30日,攻占榆林、三亚,5月1日海南岛全部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薛岳等逃往台湾。

#### Hainan jian sheng

**海南建省** (founding of Hainan province)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成立。

海南岛为中国第二大岛,原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7年4月开始研究把海南办成全国面积最大的特区。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海南建省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建立海南省;管辖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省会海口。并划定整个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海南建省以后,建立了完善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全面落实国家给海南的各项优惠政策,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得到迅速发展。

#### Hainan Jingji Tequ

#### 海南经济特区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中国在海南岛开辟的经济特区。海南原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海南建省办特区的议案,决定海南建省,并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已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更为特殊的政策。

海南经济特区包括整个海南岛的2个地级市和17个县、市,现有面积3.39万平方千米,环岛海岸线长1500千米,人口740万。海南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是海南省作为有3.39万平方千米的特区省,开放区域大,在这样一个省份实施全面开放,将为中国的开放事业提供新的经验;二是海南省是可与台湾相比的大岛,建设为海南大特区,对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建省之初,海南省提出要尽快形成特区的运行机制、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在海南尽快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自觉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思想明确以后,海南加紧制定优惠的境内外投资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也开始运行,在全国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改革方面先行一步。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经济发展迅速,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4.17亿元,人均5264元。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1552元,城镇职工平均工资4934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

入 4344 元。1997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18 亿元，人均 5816 元。

#### 推荐书目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海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7。

haiwai zhishifenzi guiguo

#### 海外知识分子归国 (intellectuals' return from abroad)

1950~1953 年中国大批海外知识分子归国参加建设的一次行动。1950 年 8 月，教育部统计，仅 1946~1948 年出国工作、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有 5541 人，其中在美国的有 3500 人，在日本的有 1200 人，在英国的有 443 人。中共中央、政务院通过外交途径或亲属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这些人回国效力；而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冲破重重阻挠，以不同方式毅然回到祖国。至 1953 年，以李四光、华罗庚、老舍、钱学森、钱三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及约 2000 名大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已经回国，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haiyang shiye

#### 海洋事业 (marine programs)

对海洋权益、资源、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的一项综合性事业。中国是个沿海大国，1949 年以来高度重视海洋的开发和保护，把发展海洋事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加强海洋综合管理、不断完善海洋法律制度、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和教育、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恢复和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海各级人民政府着手恢复和发展渔业、海洋运输业、海盐业等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渔业产量由 1950 年的 53.6 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 181.5 万吨。1952~1957 年，通航海港从 16 个增加到 39 个，沿海海域运输从 417 万吨增加到 1223 万吨，远洋运输从 8 万吨增加到 60 万吨。海盐产量从 1949 年的 259.1 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 703 万吨。50 年代前中期，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高等院校与海洋相关的系或专业，海军海道测量部门等科研教育机构相继建立，并着手开展海洋科学调查研究。1956 年 10 月，《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被列入发展国家重要科学技术规划。

**初步发展** 从 1958 年起，中国的海洋事业步入发展的道路。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12 月，完成了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口的领海基线测量的外业工作。全国海区基本测量于 1958 年首先在黄渤海区近海展开。1959 年 1 月，全国海洋普查全面展开，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批关于中国近海的系统性资料，改变了中国缺乏基本海洋资料的局面。

1964 年 2 月，国务院成立直属的海洋局，由海军代管。7 月正式成立国家海洋局，统管中国海洋调查科研和监测预报服务工作。

但此时盲目扩大捕捞，使近海渔业资源遭受破坏。1962 年海洋捕捞产量仅为 140 万吨，1965 年增加到 201 万吨。可喜的是推广海带养殖，使海带产量从 1958 年的 6 106 万吨上升到 1962 年的 39 348 万吨，改变了中国海带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盐的产销企业下放地方，调动了沿海地方的积极性，1958 年中国海盐产量猛增，首次突破 900 万吨大关。但到 1964 年，海盐生产发生了特大歉产，1963~1965 年，全国海盐年平均产量降为 762.1 万吨。从 1958 年开始，利用制盐后的苦卤生产氯化钾、溴素、芒硝等，使中国的盐化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船舶运力迅速增长，中国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批海洋运输船舶，开始进入成批造船时代。1965 年，全国海运企业货运量增加到 1 898 万吨，远洋运输货运量增加到 233 万吨。

**曲折前进** 从 1966 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海洋事业既受到严重影响又有所前进。各涉海部门积极开展各种海洋调查船的建造工作，1976 年建造成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 10 号”。海洋调查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第一次进行了中沙、西沙和南沙海域海洋综合调查以及太平洋中部特定海区综合调查，使中国开始进入远洋调查的新阶段。浅海声场理论分析、潮流预报新方法、海洋激光、海水淡化等海洋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中国相继开始发布天气、海浪、海雾、风暴潮、海冰等各种海况预报。

但近海渔业资源遭到破坏，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 1969 年下降到 189 万吨。70 年代，虽然捕捞量逐渐回升，到 1978 年已达到 315 万吨，但近海经济鱼类资源越来越少，大小黄鱼、带鱼等资源的破坏日益严重。

海洋运输业在加速海港建设中前进，70 年代，通过港口整顿，进行了大规模的港口建设，全国沿海港口的吞吐能力由 1972 年的 1 亿吨提高到 1975 年的 1.7 亿吨，基本缓和了自 1967 年开始的港口堵塞、压船压货现象。中国远洋船队总载重吨位 1975 年达 500 万吨。

1966~1970 年，海盐生产遭到破坏，年平均产量仅为 923 万吨。70 年代中期，生产秩序逐步恢复，1978 年创造了年产 1300 余万吨的历史最高记录。

海洋油气业开始起步，1966 年底在渤海开钻了中国第一口海上石油探井，获得了工业油流。70 年代初，在渤海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海上石油生产基地。

**全面发展**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机，海洋工作全面发展。

①加强海洋综合管理。1983 年 3 月，国务院确定了国家海洋局的职能和主要任务：负责组织协调有关海洋工作，组织实施海洋调查、海洋科研、海洋管理和海洋公益服务，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1983 年组建了“中国海监”执法队伍，强化了海上执法力量。与此同时，沿海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了海洋管理机构。1986 年成立了国务院海洋资源研究、开发、保护领导小组，1988 年将其任务和职能转移到国家海洋局。

1991 年 1 月，中国召开了首次全国海洋工作会议，通过了《90 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12 月开展了编制《全国海洋开发规划》的工作，包括 12 个省级规划和 12 个行业规划以及 7 个方面的专题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的编制工作。

由国家海洋局组织领导，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工作，从 1989 年 7 月开始，于 1994 年完成《中国海洋功能区划总报告》。

1993 年 5 月，由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联合颁发了《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1998 年 10 月，国家海洋局制定了《海域使用申报审批管理办法》等 32 项配套制度，逐步扭转了中国海域使用无序、无度、无偿的状况，使中国海域使用初步走上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②建设和发展海洋公益事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由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各海区海洋预报区台及各中心海洋站组成的海洋环境预报服务体系。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负责发布近海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浪预报、沿海的风暴潮预报、沿

海及临近洋区海水表层温度预报和北部沿海海域的海冰预报,各预报区台结合预报海域的特点,开展区域性海洋环境预报和专项预报、监测保障工作。从而形成了点面结合的预报保障体系,初步建成了由海洋观测站、沿海验潮站、雷达测冰站、海洋监测船、海上钻井平台、海上遥测资料浮标、海上航行船舶定期观测、海监飞机和卫星遥感资料接收利用组成的对海洋环境的立体监测网络,对海洋防灾减灾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

1983年以后,逐步建成了由国家海洋资料中心和海区资料处组成的海洋信息服务系统。1991年10月,成立了由国家18个部门参加的全国海洋统计信息网,从1992年开始,每3年编辑出版一期《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发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务院于1983年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与海洋环保相关的法规,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章或实施细则,部分沿海省市也陆续制定了一批地方性海洋环保法规。中国还先后加入了多种海洋环保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中国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近海海域先后进行了100多航次污染基线调查,基本掌握了近海海域污染范围、程度及变化趋势。同时,对沿海地区污染源也进行了普查,基本查明了近海海域主要污染源的来源、分布、入海途径和入海量。1984年国家组织了“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对历年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海洋环境污染状况和污损事故作出评价,分析污染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和建议。

在做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海上污染防治,加强防止船舶和港口污染海洋、防止海上石油开发对海洋环境污染管理的同时,强化了对主要污染物、重点污染源和污染严重海区的监视和管理,把防治陆源性污染作为海洋环保的重点。中国还实行了海洋倾废许可证制度,海洋管理部门还建立了7个国家级和11个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④大规模海洋资源综合调查。1980年开始进行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历时7年,到1986年底完成。编写了综合报告和各专业、专题报告,形成研究报告、调查图集和资料汇编3大系列成果。其中,《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海岸带资源状况的综合性论著。

1988年1月,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和开发实验工作组织实施。经过13000余名科技工作者的艰苦作业,1992年完成了全部外业调查任务,到1994年底,沿海各省(区、市)全面完成了省级海岛调查成果的审查验收。通过这次综合调查,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所拥有的海岛数量和资源底数,为制定中国海岛开发建设以及海岛管理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中国把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列为国家长远发展项目予以专项投资,成立了负责协调、管理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进行勘探开发活动的专门机构,多次进行了大洋矿产资源调查。中国是国际海底区域第五大投资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的专属勘探开发区。

⑤开展了大规模的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海洋科学研究以近海陆架区海洋学为主,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的多学科体系,在物理海洋学、生物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化学等学科取得了显著进展。海洋技术已经形成了海洋环境技术、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海洋通用工程技术3大类,包括20多个技术领域的海洋技术体系。海洋高技术计划、海洋科技攻关计划和“科技兴海”计划顺利实施,海水淡化技术研究和应用、海洋遥感技术开发研究、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研究、水下工程技术以及海水直接利用等领域都有了重大进展。90年代,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中长期海洋科技发展纲要》、《海洋技术政策(蓝皮书)》等和多项海洋科技发展规划。

1979年以来,中国的海洋调查和海洋科学考察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和世界海洋调查的大舞台,调查范围从近海扩展到大洋,调查方式从单纯海面观测发展到航空航天遥感、海面观测、水下调查并行。

1983年,中国加入了《南极条约》,并从1984年开始进行南极及其周围海域调查,到1998年共进行了15次科学考察,先后建立了长城、中山南极科学考察站(见南极科学考察)。1996年中国又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积极参与“北极在全球变化的作用”等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

⑥海洋经济蓬勃发展。1979年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大大高于全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国民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海洋渔业、海盐和盐化工业以及海洋运输业、造船业、油气业和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的总产值1979年为64亿元,1997年达310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

80年代中期以来,海水养殖业迅速发展,产量从1987年的192.6万吨增加

到1997年的791万吨,占海洋渔业产量的比重从27%上升到36%。海洋捕捞业积极开发新资源、新渔场,1997年,总产量为1385.4万吨。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自80年代开始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进行合作勘探开发,到1997年底,有20个油气田投入开发,海洋石油产量超过1629万吨,天然气产量为40亿立方米,形成了海洋石油天然气产业。

到1997年底,中国民用船舶已发展到32万艘,近5000万载重吨,其中从事外贸运输的船队达2300多万载重吨。目前,年吞吐1000万吨以上的海港有15个,1997年底,沿海主要海港货物吞吐量达9.05亿吨。沿海造船业高速发展,1997年造船总吨位位居世界第三。

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了300多个海洋和海岛旅游娱乐区,使海洋旅游业成为迅速发展新兴海洋产业。1997年,中国海洋旅游共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

海水资源开发以盐为主、盐化结合,并形成了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1997年生产原盐2928.1万吨,氯化钾、溴素等总产量超过50万吨。

⑦逐步完善海洋法规。全国人大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海洋和涉海管理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涉外海洋科学调查研究管理规定》、《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和《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也促进了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使海洋综合管理初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⑧海洋国际合作全面开展。中国相继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海洋气象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太平洋科学技术大会等近20个国际组织,并与几十个国家在海洋事务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了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建立工作,中国学者还当选为首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参与了多项保护公海渔业资源和濒危物种的国际活动,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在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方面的合作计划,先后加入了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30



多项国际公约。

**问题和展望**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和经济力量有限,因此海洋开发与保护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中国的海洋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海洋开发技术装备比较落后,许多海洋开发领域尚处在粗放型阶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带来了很大压力。中国已经把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列入跨世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把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国民海洋意识的逐步提高,中国的海洋事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推荐书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1998。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政策》,海洋出版社,北京,1998。

Hangang Jingyan

**邯钢经验** (experience of the Handan Steel and Iron Corporation)

邯钢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创造的是“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营机制。自1991年起开始实施。

**主要内容** ①以市场可以接受的产品价格为基准,考虑国内先进水平、本单位历史最好水平和可以挖掘的潜力,提出目标利润;据此倒算出企业必须要控制住的成本,即目标成本,其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目标成本=该产品的市场价-目标利润-总厂应摊的管理费。②将目标成本和相应的目标利润在全公司的范围内层层分解到分厂、车间、工段、班组直至个人,以此作为各级的奋斗目标,也是公司对各级实行考核奖惩的依据。③实行“成本否决”的奖惩制度,即完不成成本指标,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要否决全部奖金,以成本和效益决定分配和对干部业绩进行考评。

**作用与成效** 邯钢经验促使邯钢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实现了观念的更新。变等、靠、要,为挖掘内部潜力,自我发展;变以能力定生产为以市场定生产;变平均主义“大锅饭”为按劳分配。第二,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管理要效益,靠技术进步面对竞争,通过挖潜改造谋求发展。在进行管理思想、制度创新的同时,利用自我

积累资金进行扩建、改造和推进技术进步,1991~1995年共完成生产性投资24.76亿元,使钢、铁、材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110万吨,而吨钢投资降低到低于2400元,仅相当于新建同类钢厂所需投资的1/3。第三,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得到加强。分解目标成本,带动了诸如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劳动定额、消耗定额、定岗定员、计量标准和手段等基础性工作的加强;控制实际成本,促进了严格管理的实现。自1991年实行成本否决以来,邯钢扭转了以往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局面,利润逐年迅速增加,1991~1995年,实现利税33.9亿元,其中利润21.5亿元。1995年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2.28%,而实现利润占全行业的8.3%。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也在全国名列前茅。1998年,实现利税8.5亿元、利润5.04亿元,继续保持全行业第二位的优异成绩。

邯钢的改革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效,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全国掀起“学邯钢、抓管理”的热潮,引导了一个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工作重点与方向。

**推荐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编:《邯钢管理思想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5。

Han Xianchu

**韩先楚** (1913~1986)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30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区游击队,任独立营、独立团的排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25军,任副连长、连长、营长。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的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344旅副团长、团长、副旅长、代理旅长,新编第三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分区司令员。曾率一个团到冀南敌后开辟以威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4年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解放军40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2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新开岭战役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及辽沈、平津、渡江、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起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6年10月3日逝世。

Han Zhubin

**韩杼滨** (1932~ ) 1998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2月生。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铁路分局站务员、车长,南下干部大队队员,长沙、衡阳、桂林办事处军运股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共青团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地区书记、柳州分局书记,中共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地区工委书记、局党委常委、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后任中共柳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中共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国家铁道部党组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部长、党组书记、纪委书记。1997年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常务副书记,铁道部部长。当选为中共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1998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Hanyu Pinyin Fang'an

**《汉语拼音方案》** (“Chinese pinyin-spelling system”)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提出的请示报告,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经过反复修订,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原则是:①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②音素化的拼音方法,即依据音节里的发音动作,一个动作构成一个音素;③采用拉丁字母的字母形式。方案中规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读音和写法;声母、韵母的拼写方法和规则;声调符号和标记方法以及隔音符号等。《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后,对小学的拼音教学、扫盲、汉字注音、教学普通话,对外汉语教学,对盲人、聋哑人和智力有缺陷者的特殊教育,对书刊、文献的编序和检索,对通讯联络,对产品型号及其他代号,对现代科技领域等很多

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hanzi jianhua

**汉字简化**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中国把汉字加以简化的工作及其成果。1952年2月,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着手进行汉字简化工作。1954年10月, 国务院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 把汉字简化规定为主要任务之一。1954年11月, 文改会拟出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10月, 文改会根据征求意见结果, 提出了修正草案。1956年1月28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分批公布后, 内容有一些调整, 于是文改会又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以作规范。1977年12月, 文改会发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编拟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群众意见并试用。1986年6月,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请示, 决定废除这个草案, 并对《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作了修订。

Hangzhou Huiyi

**杭州会议** (Hangzhou Conference)

1958年1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召集的主要有华东地区省市主要负责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和技术革命等问题。毛泽东对从1957年冬天开始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表示欣赏, 错误地批评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主张和措施, 并点名批评了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在讲话中, 毛泽东提出, 工业、科学文教也要像农业那样搞四十条;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 政治与业务要结合起来; 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这些观点后来写入了由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这次会议为“大跃进”的发动作了准备。

hangkong gongye

**航空工业** (aviation industry)

生产飞机、发动机和导弹等航空产品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国家科研和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要标志。

**发展历程** 中国是发明风筝和火箭的文明古国, 但航空工业的起步却较晚。从1910年清朝政府开始筹办飞机修造厂, 直至1949年, 只有十几个能装配和修理少量飞机的设备简陋的工厂, 所需原材料、成品、设备等都依赖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接收了18个工厂, 职工近万人, 确定主要任务是适应抗美援朝战争需要, 全力保证空军飞机的修理。“一五”计划期间, 航空工业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行业。从1954年起, 相继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初教5, 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 多用途运输机——运5, 自行设计的初教6飞机也制造成功。1959年, 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歼6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修理到制造并走向自行设计的转变, 由生产活塞式发动机飞机到掌握喷气式飞机制造技术, 仅用了七八年时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

在1958年“大跃进”中, 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 造成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再加上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使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1961~1965年, 贯彻调整方针, 切实整顿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 缩短基本建设和型号研制战线, 生产逐步恢复, 新飞机陆续定型投产, 同时开始建设科研设计试验条件, 全行业出现了蓬勃发展新局面。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航空工业的质量管理、科研与生产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航空工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全行业树立了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思想; 实行了科研领先、质量第一、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 进一步提出了产品“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目标; 明确了通过“四个转变”, 实现“三个突破”的任务, 即由单一军品结构转向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 由仿制过渡到自行研制, 产品由供应国内转为内供外销结合, 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转为同时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进行管理。1992年航空工业提前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 1993年人均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 航空工业总公司相应提出了2000年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认真落实“突出主体(即坚持航空为本, 把航空产品的发展摆在首要地位), 加强两翼

(即努力加速民用产品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发展经济, 振兴航空”的总体发展战略,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科技进步为先导, 发挥全行业的整体优势, 着眼于搞活全行业经济, 尽快提高竞争实力, 为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体制沿革** 50年代初期, 中国航空工业学习苏联, 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保证了航空工业从修理到制造转变, 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80年代开始, 航空工业进行改革: ①建立军民结合型管理体制, 改变长期只搞军品、不搞民品的状况, 将“军民结合, 以军为主”的方针调整为“军民结合, 以民为主”。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开发型。原来单一的军工企业, 逐步演变为“以军为主”、“军民兼顾”和“以民为主”3种类型。②从1980年起, 航空工业领导机关对所属企业实行“放水养鱼”政策, 推行以利润包干为内容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大大提高了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到90年代初, 航空系统有36个企业进入国家一、二级企业先进行列, 占企业总数的1/3。③建立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外贸体制, 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和技术引进工作, 开始把中国航空工业推向世界。④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确定以科研经费30%用于预先研究; 促进科研与生产结合, 将沈阳、株洲、成都、西安的飞机工厂、飞机设计研究所、发动机工厂与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分别组建成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飞机工业公司和发动机工业公司。⑤实行集团化改组, 先后组建了金城、庆安、沈飞、成飞、洪都、东安、西飞、贵航、上航、南动和中航技等一批企业集团。

从50年代初到90年代, 航空部门的领导经历了几次变更。1951年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 1963年成立航空工业部; 1988年与航天工业部合并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 1993年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 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1998年,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航空工业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个“军民结合, 以军为主”的特大型企业集团。1999年7月1日, 正式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

**建设成就** 近50年来, 航空工业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专业基础配套、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基础的高新技术工业体系, 拥有大中型企业100多家。累计研制生产各种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直升机、运输机、旅客机、无人驾驶飞机约1.4万架, 战术导弹(空空、海防)约

1.4万枚,以及为多种机型配套的机载设备。其中,有60多种型号的军用飞机10000多架装备了部队。

“八五”计划期间,航空工业自行研制新型号军用飞机成果显著,已有9个型号完成或基本完成设计定型,有的填补了空白,有的主要性能指标达到了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不少已小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国际合作也取得成效,共研制开发了5个型号外贸军机,在歼7M基础上改进的歼7系列外贸机和歼教7P飞机均已交付出口;K-8教练机自90年代初首飞成功后,已有6架交付订货国;歼8IIM型已首飞成功。同时,研制生产了多种军、民用直升机;高性能的新歼击机和地对地、对海攻击的歼击轰炸机及特种飞机、无人驾驶机正展开研制。民用飞机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运7系列已有100余架交付民航和有关部门使用,成为国内支线运输的最大机群;运8除装备部队和出口外,已开始进入民用航邮领域;运12系列也分别取得中国、英国、美国的型号合格证,销售的80多架飞机出口到18个国家和地区;与麦道公司合作生产了35架MD82/83飞机,并正在进行2架MD-90飞机的合作生产。此外,运11B(1)、农5A、运7H-500、运7-200A和运8F100货机也分别取得了型号合格证,并开始提供用户使用。

航空发动机共研制生产了30余种53000多台,基本掌握了新一代涡喷、涡扇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从1981年起,航空发动机企业开始承揽美、英、法、加等国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包括多种发动机的涡轮盘、压气机盘、导向器叶片、环形件、火焰筒等。

机载设备已有3000多种定型生产,形成了为飞行保障、航空电子设备、航空武器、动力装置所用的4大类20个专业,基本满足了国内飞机配套的需要。特别是近10年来,相继突破了一系列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先进机载设备技术,使中国航空机载设备达到一个新水平。

民用产品得到迅速发展。航空发动机改装的工业燃气轮机,现已研制生产了6个系列10个型号,在全国18个省、市销售;还生产了汽车、摩托车、新型建材、纺织机械、环保设备、轻工机械等5000多种产品,年产值达200多亿元。

对外贸易不断扩大。1979年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经营出口军用产品和民用机电产品;承包国外飞机、发动机的零部件生产;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代表机构,同7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与合作关系。到1998年,中国飞机相继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入使用。

国际技术交流合作逐步深入。先后从10多个国家引进了近40项重要的先进技术项目,如:从英国罗·罗公司引进了斯贝发动机制造技术;从法国宇航公司和透博梅卡公司引进了“海豚”直升机及发动机制造技术等。同时,航空工业与10多个国家的航空科研机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开展了300多项科技课题合作研究,取得明显成效。

科技、教育全面发展。航空工业已拥有较强实力的科研机构,专业设计院所30余家,可以进行飞机、发动机、仪表、电气、附件、武器的设计研究以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强度、飞行、救生、光学机械、工艺、材料、计算技术、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近几年,科研试验手段进一步得到充实,改造和新建了先进的飞机试验实时数据管理系统、全机疲劳协调加载系统、发动机部件试验测试系统,以及各种类型的仿真试验设备和大型计算机等,一个专业门类齐全的航空科技体系的构架基本建立起来。在预研方面,对空气动力学、结构强度、飞行、发动机技术、自动控制、武器火力控制、航空电子、机载计算机、材料、制造、测试、航空标准化、计量、科技情报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众多成果,从而为各种军、民用飞机及其配套产品的自行研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航空工业的人才培养,现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还有3所中等专业学校和一大批技工学校,培养了30多万名质量较高的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同时提高了数十万在职职工的文化技术业务水平,基本满足了航空工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 推荐书目

段子俊主编:《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 hangtian shiye

### 航天事业 (aerospace industry)

国家探索、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科学技术事业。其工程体系包括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等各类航天器、航天发射场、地面测控网、卫星地面站和信息处理等几大系统。

发展历程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50年代中期起步的。1956年,国务院制订

《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要在12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当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院长为钱学森。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正式奠基。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成立“581组”和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展空间物理学研究和探空火箭研制工作。以后又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开展航天技术的规划和实践活动。接着,航天工作方针调整,把力量转到重点搞探空火箭上来,进一步研制具有运载人造卫星能力的大型火箭。1962年2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60年代中期,探空火箭进入气象、生物试验的应用阶段。

1962年11月,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事业,航天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火箭发射试验获得成功。国防部五院面临研制中程、中远程乃至洲际火箭,尽快掌握固体火箭技术,在原4个分院的基础上分别组建研究院,各负责一些型号的总设计、分系统的设计、试制和试验,自成体系。

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火箭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事业。8月,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建议。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总负责,卫星本体先由中科院,后转到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运载火箭研究院研制;卫星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网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分散在各部门的卫星研究、设计、试制、试验机构统一组织起来,加速了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具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长征1号”于1970年初达到实用阶段。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应用卫星的国家。这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1971年3月,中国发射科学实验人造卫星“实践1号”,在空间正常工作达8年之久。

与研制第一、二颗人造卫星的同时,中国航天工作者开始研制比其重10倍、技术更复杂的返回型遥感卫星及其大型运载工具。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

颗返回型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新时期，1977年9月国防科委在张爱萍主任主持下，制定了战略火箭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80年代前期的主要目标。1980年5月18日，由中国本土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运载火箭，准确地落于预定海域。1981年9月20日，中国成功地用一枚“风暴1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一组科学实验卫星。“一箭三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欧洲航天局之后，第四个掌握火箭多次分离技术的国家。1982年10月12日，中国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获得成功。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对地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发射成功，16日卫星准确地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轨道技术的国家。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做了重要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包括航天技术在内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之后，“八六三”计划组织实施。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航天技术等高技术成就的巨大意义。1988年，他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88年9月7日，“长征4号”甲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太阳同步轨道“风云1号”气象卫星。1990年第二次发射试验将3颗卫星同时射入预定轨道。1993年1月30日，江泽民在题词“发展空间技术，开发空间资源”中对航天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80年代以后，航天工业机构经历了几次变动。1981年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决定，八机部与七机部合并仍称七机部。1982年4月，七机部改为航天工业部。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撤销航空航天部，5月成立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对外称国家航天局。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保留国家航天局，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作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机构。

**主要成就** 40多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在自力更生为主，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方针指引下，历经了早期探索、艰苦创业，工业研究配套发展和广泛应用，改革发展3个时期，研制成功多种型号运载火箭，基本上形成系列，可以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不同质量的应用卫星，并已进入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开发利用空间、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造福人类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70年4月24日首发“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至1998年3月26日发射美国摩托罗拉两颗铱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成功发射50次。截至1997年底，中国研制并成功发射了40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其中返回型对地观测卫星17颗、气象卫星3颗、通信广播电视卫星8颗、科学试验卫星12颗。

中国“长征”火箭于1990年4月7日将美国制造的“亚星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至1998年7月18日首次发射欧洲通信卫星（此前发射的外星都是美国制造的卫星）“鑫诺1号”成功，共发射成功17颗外国卫星，其中11颗为通信卫星，6颗为铱星。

航天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网及其主要技术装备，是发射运载火箭和航天器必备的重要系统。40多年来，为发射研制了数百项地面机械设备、测试发控设备和飞行测量系统，具有了不同类号的技术状态，满足各类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发射试验的顺利进行。中国早期兴建酒泉航天发射中心，发射了1960年仿制第一枚火箭、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1980年“飞向太平洋”的远程运载火箭。1968年组建的太原航天发射中心，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建的西昌航天发射中心承担了更多发射试验的任务。

中国的卫星测控事业始于1967年6月23日宣告成立的卫星测量部，它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前身。到60年代末，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点、东起胶东半岛、西至拉萨、南迄海南五指山、北到长白山的立足本土的地面测控网。并在国际上首创一网管理多星的独特卫星管理模式，其标准化、自动化程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中国设置卫星通信地面站始于1972年初。不久，开始自行筹建北京和上海的通信地面站。70至80年代，南京、石家庄、昆明、乌鲁木齐、拉萨等通信地面站陆续建成。从国外引进的地面站也参加组网使用。现在，以北京为中央站的卫星电

视地面接收站已覆盖全国各地。

中国航天事业40多年，造就了一支举世公认的航天杰出专家群体，据1994年统计，已拥有航天高级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4万余人，数以十万计的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及一大批行政干部和组织管理、后勤保障人员，有15名航天专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上万项航天科技成果获得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

#### 推荐书目

张钧主编：《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

Hao Jianxiu

**郝建秀**（1935～ ）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女。山东省崂山县（今属青岛市）人。1935年11月生。1949年进青岛国棉六厂当纺织工人。1951年因创造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郝建秀工作法”，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62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历任青岛国棉六厂技术员、国棉八厂副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省妇联主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全国妇联第四届副主席。1977年起先后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1988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Hao Yichun

**郝诒纯**（1920～ ） 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女。湖北武汉人。1920年7月19日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后在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习地层古生物学，毕业后曾任云南省地质调查所技师，云南大学助教，北京大学讲师。1957年赴苏联进修，回国后历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八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六届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59年与杨遵仪共同创办了中国的地质古生物专业。1963～1965年在古巴进行白垩纪、第三纪地层海相微体古生物研究，对地下水勘查和石油普查做

出了贡献。1979年她倡议成立了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80年代研究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微机辅助研究系统,有效地应用于新生代浮游有孔虫的自动化鉴定。多年来结合油田勘探及海洋开发工作,从事中、新生代海、陆相地层及微体古生物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he'er'eryi lun

**“合二而一”论** (theory of “two combines into one”) 对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论点的概括。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有“合二而一”之说。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哲学家杨献珍对这一哲学命题予以赞赏。他认为:“‘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它同‘一分为二’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给学员授课时曾先后两次表述了上述观点。《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刊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了学术界讨论。在最初的四个月内,《光明日报》收到701篇稿件,其中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有210篇。但康生很快插手其间,把正常的学术争鸣升级为政治大批判。8月14日,关锋等人署名“撒仁兴”,在《光明日报》发表《“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基础》一文,批判矛头直指杨献珍。此后各报刊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基本上是一个调子。1965年5月,这一批判告一段落。杨献珍被调离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指使造反派把杨献珍揪回党校进行“批斗”,并于1967年9月23日下令逮捕。一些著文支持“合二而一”论的作者也受株连而遭到种种迫害。1979~1980年初,学术界对“合二而一”论再度展开讨论。“合二而一”论并非一种系统的理论,持此论者在涉及“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以及在如何用它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涵问题上歧见迭出。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讨论,对于活跃学术思想、挖掘和正确评价古代哲人的理论思维贡献、用中国特有的语言和风格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都是有益的。

He Changgong

**何长工** (1902~1987)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华容人。1902年1月27日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

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在洞庭湖西区建立党团组织,办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创办新华中学,任学校董事委员会主任,不久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共华(容)南(县)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1926年秋任华容、南县地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先后任班长、排长、团参谋。同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湘赣边特委委员。1929年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4月,任红八军军长。7月,红军攻占长沙后,任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1933年冬,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任中央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1937年10月,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1946年到吉林通化,创办东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1947年秋,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不久兼任军械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1952年8月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5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2月29日逝世。主要著作有《何长工回忆录》。

He Ganzhi

**何干之** (1906~1969) 历史学家。原名谭毓均,学名谭秀峰。广东台山人。1906年4月11日生。1929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应聘为广州国民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34年初在上海,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开始用笔名“何干之”发表文章,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论证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名《转变期的中国》)、《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和北平大学任教并担任领导职务,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兼历史系主任、教授。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委员。1969年11月16日逝世于北京。撰写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国现代革命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等。其中,《中国现代革命史》被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并译成俄、英、越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He Houhua

**何厚铨** (1955~ ) 银行家。注册会计师及核数师。生于澳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澳门立法会第四、五、六届副主席、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投资委员会召集人,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委员。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副董事长、澳门航空公司股东大会理事会副主席、南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联生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志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担任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同善堂副主席、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理事长、澳门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及多个民间社团名誉会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5月15日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了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9年12月12日就职。

He Luli

**何鲁丽** (1934~ )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女, 山东菏泽人。1934年6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57~1984年历任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医师, 北京市西城区儿童医院住院医师, 北京市第二医院主治医师、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1984年起先后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 北京市副市长, 民革中央副主席, 民革北京市主任委员, 民革中央主席。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He Qifang

**何其芳** (1912~197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原名何永芳, 四川万县人。1912年2月5日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早期诗歌散文表现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小资产阶级的苦闷, 艺术上受唯美主义影响。1938年夏到延安, 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1942年春作《生活是多么宽广》、《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诗篇, 歌颂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1944~1947年在重庆工作, 任西南局文委委员, 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后至西柏坡参加土改、整党, 并在马列学院任教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参加文艺界领导工作, 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1953年筹建文学研究所, 任副所长、所长, 直到1977年7月24日逝世。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事业的发展, 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 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杂记》等, 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He Xiangning

**何香凝** (1878~1972) 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名谏, 又名瑞谏。女。广东南海人。1878年6月27日生。廖仲恺夫人。1902年赴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8年

入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习。1911年2月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1922年9月, 奉孙中山之命, 随廖仲恺赴日本与苏俄特使秘密谈判。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先后发起组织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武汉“分共”后, 毅然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 在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1929年去英、法等国旅居。“九一八”事变后回国, 致力抗日救亡运动。曾变卖书画为十九路军征募军用物品, 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 创办伤兵医院。1935年签名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7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任主席。1938年夏与宋庆龄等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 向海外侨胞募捐, 支援抗日。1946年秋同李济深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1948年1月在香港参加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任中央常委。1949年4月到北平,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 第三届中央副主席, 第四届中央副主席、主席; 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2年9月1日逝世。著有《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何香凝诗画集》等。

heping gongchu wuxiang yuanze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简称“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 印度代表团来中国商谈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印度与西藏地方的问题。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 两国应当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方面表示十分赞赏。1954年6月24日, 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会谈时, 双方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予以了高度评价, 在《联合声明》中说: 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 而且也适用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1954年6月29日, 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 访问缅甸。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又一次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 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以及同年10月与日本访华团的谈话中, 先后把五项原则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文字上的表述就被准确地固定下来。1955年4月,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 提出“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 “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等十项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初是强调用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1954年9月24日至10月12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 周恩来提出“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准则”。10月12日, 中苏两国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强调: “中苏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是两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而进一步密切合作的基础。”1956年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中国协助苏联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建议下, 10月30日, 苏联政府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表示从中吸取教训, 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对此, 中国政府表示支持, 并于11月1日发表声明, 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至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确认, 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确认。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8。

heping yanbian

**和平演变** (peaceful evolution)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

通过非武力手段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在武力和武力威胁都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多地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即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和交往中,运用战争以外的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演变。和平演变战略提出于50年代初期。1951年,“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在《1900~1950年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提出,在对共产主义进行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施加压力的方法“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将“遏制”政策发展为“解放”政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提出7项措施:①美国政府公开声明,要恢复受苏联奴役国家的“真正独立”;②为“受奴役国家”制订“自由计划”;③“鼓励铁幕内那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④使“美国之音”等机构同“自由计划”协调起来;⑤根据“自由计划”,中止或批准同“受奴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往;⑥中止同“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的外交关系,来促进“自由计划”;⑦寻求同其他自由国家共同发表“新的独立宣言”,宣布对“受奴役国家”的政策。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接连发生波兰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政治事件,更促使美国政府决意采取“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备。同年1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研究报告,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即:“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西方生活方式。这些成为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方针,被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59年11月3日,他在杭州召集的小范围会议上,提议印发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讲。11月12日,又在同出席华东协作区会议的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但是他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之计。

#### 推荐书目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4。

hegongye

**核工业**(nuclear industry) 核工业即原子能工业,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的从事核燃料生产和核能、核技术开发利用的新兴工业。中国的核工业创建于1955年,经过40多年的创业发展,现已跻身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成为世界少数拥有核武器和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50至70年代的“以军为主”和80年代以后的“军民结合,转向民用”这样两个阶段。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中,中央都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了重大决策。50年代,中央做出建立核工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为中国进入原子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辟了道路。80、90年代,在走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形势下,中央明确了核工业重点转向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继而又做出大力发展核科技,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决策,将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全面推向新的高度。

1949年以前,中国原子能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钱三强先后任所长。随后,以突破封锁回国的一批科学家为骨干,加上培养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形成了中国核科学研究中坚力量。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实验原子核物理、探测器研制、理论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和反应堆材料研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核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54年,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筹备铀矿开采事业。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后,做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中共中央成立了陈云、聂荣臻、薄一波3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核工业(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同时,加强培养原子能技术人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相关研究室和系,并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出国学习考察。

1955~1960年,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创建给予了技术援助。在核科技和工业领域,中苏两国先后签订了6个协议,包括铀矿普查勘探、核物理研究、原子能工

业建设、核武器研制等方面。在中央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导下,195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改名为原子能所,成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技研究基地,为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长远的人才支持。同时,核燃料厂和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也相继在兰州、酒泉、包头等地进行。1959年,通过“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核工业建设取得了大发展,但也出现了指标过高、战线过长等问题。随后,根据毛泽东“先写正楷,后写草书”的指示,逐步进行了调整。

1960年7月至8月,苏联片面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协议,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中国核工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聂荣臻召集会议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只要坚持下去,完全可能在3年至5年取得突破。二机部据此制定了争取在5年内(1960~1964年)自力更生制成原子弹的任务。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倍努力,加强合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并采取了包括加强技术和领导力量、确定重点院校培养自己的人才、加强设备仪表的研制配套等4项措施。二机部决定,将铀235生产线作为重点工程抢建,钚生产线暂停建设。经过简法生产和原子弹攻关的成功,1962年8月,二机部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获得中央领导赞同。为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贺龙等7名副总理及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等7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调集全国力量支持原子弹的研制。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中国核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1年9月,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两弹一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核燃料生产技术和核动力研制技术,并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以后的核电站发展积累了经验。与先期发展核技术的几个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起点高、速度快、花钱少,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经过60年代至7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国内地陆续建成了核工业后方基地,改变了战略布局,扩大了核工业生产能力。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拉大了中国同世界有核国家的差距,特别是在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利用方面缺乏明确

发展方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核工业建设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主要为军用服务，改为军民结合，保军转民，重点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1979年，二机部提出积极发展核电和推广同位素与其他核技术的应用，积极承担民品和出口产品生产的意见。1981年，进一步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利用上来”的发展方向。这些指导思想后来为中央具体规定为“军民结合，以核为主，发展核电，多种经营”16字方针。1982年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由此，核工业开始了意义深远而任务艰巨的第二次创业，主要部署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压缩军用科研生产、发展和平利用核能源技术、扩大对外科技合作和经济贸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核工业集团、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新时期成就** 新时期核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①核电事业。这是中国核工业新发展的主攻方向。80年代初，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发展核电解决中国能源问题和加快电力工业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做出了自行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和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合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的决策。经过10年努力，两座核电站已相继建成，投入商业运营，年发电量相当于1952年全国发电量的3倍；秦山核电站还完成了首次更换国产核燃料。这一成就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核电站的建造、安全运行、停堆换料的整套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能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1992年以后，国际核电站发展疲软，给中国带来了良好机遇，中央又做出了新的发展决策。“九五”计划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完成4个大核电项目，即：秦山核电站二期、三期工程，广东岭澳核电站，江苏连云港核电站，装机容量为660万千瓦的8个反应堆。到1999年，这4个项目都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②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应用。中国从50年代开始生产应用同位素，到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能够生产和供应的制品约800种，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医学、环境、科研等领域，初步形成了包括同位素及制品、核仪器仪表、辐射加工、核农学、核医学等行业的高科技产业。工业方面，在线控制、无损检验、运行静电消除、微量元素分析、能源资源勘察、材料辐射加工等都取得显著成就。农业方

面，应用辐照与其他技术培养出各种作物新品种约400种，居世界首位，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医学方面，全国每年接受放射免疫检测和体内诊断治疗的约2000万人次，放射性同位素内外照射及加速器辐射已成为常用治疗恶性肿瘤手段。

③民用产品和服务。这是新时期核工业的另一个支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积极兴办了核工业之外的机械、化工、电子、轻纺等工业，生产出钛白粉、金属镁、铝合金、化肥等民品；在找铀矿的同时发展综合找矿，先后找到金、银、钨等20多种矿产，其中一处特大锆矿床，储量达23万吨；还参加了京九铁路、广深珠高速公路等工程项目。到1994年，民品生产已经形成规模。民品产值以每年27%的速度递增，以核电为龙头的民品产值在核工业总产值中的比率已达80%。

④对外合作交流和出口。1984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与10多个国家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协定，同4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和贸易，80年代初期开始向西方国家出口核燃料。1986年与阿尔及利亚签订协议对其出口的研究用重水反应堆已经建成，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1991年与巴基斯坦签订协议为其建造的恰希玛核电站已进入调试阶段，1999年并网发电。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8个能够出口核电站的国家。从1989年起，中国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际核工业展览会，1998年第五届参展的有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80多个公司。

⑤核聚变研究。中国的核聚变研究，在国际上已具有先进水平，真正接近模拟堆芯等离子体的磁约束聚变装置。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所建成了HL-1M和HT-7两套中等规模的托克马克装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起步在国际上也比较早，80年代建成了“神光1号”装置，目前在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正在建造新的“神光2号”装置。同时，氟化氘准分子激光装置也在中子能科学研究所的研制之中。1999年1月，中国新一代受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A在成都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两年完成，将作为21世纪中国核聚变研究的代表性装置，把中国核技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推荐书目**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宋任穷、刘杰、刘西尧、刘伟：《中国核工

业40年的光辉历程》，《人民日报》，1995年1月27日。

heqianting zhicheng

**核潜艇制成** (production of nuclear submarines) 中国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分别于1975年与1981年研制成功。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为推进动力源，能潜入水下活动和作战的舰艇。核潜艇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较，具有航速高、自给力大、攻击力强、续航距离远，能在水下较长时间隐蔽等优点，可完成反潜、反舰和对陆上目标实施攻击等多种任务。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始于1958年。1971年8月15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制成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服役；1981年初，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制成下水，1983年8月正式服役。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舰艇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He Jingzhi

**贺敬之** (1924~ ) 现代诗人。山东峄县人。1924年11月5日生。1940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鲁艺集体创作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白毛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情节富有传奇色彩，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是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改编的同名电影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诗歌创作以新诗为主。《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等抒情短章，艺术上借鉴古典诗词和民歌而有创新。长篇政治抒情诗是代表诗人创作的最高成就。主要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写于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He Lin

**贺麟** (1902~1992) 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02年9月20日生。192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6~1930年先后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



位，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后直至195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教授，1934~1949年曾任中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1941~1949年任中国哲学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曾任研究员、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学科片评审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等翻译和研究及宋明理学研究。认为研究哲学要有历史根据和历史感，要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辩证发展的较高阶段和辩证统一的全体就是理想，这种理想由于有历史根据是一定会实现的。主要著作有：《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主要译著有：开尔德著《黑格尔》、斯宾诺莎著《知行改进论》、马克思著《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批判》、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四卷）、《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1992年9月23日逝世。

He Long

**贺龙**（1896~1969）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896年3月22日生。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率乡邻捣毁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支组织讨袁护国军，不久失败。次年与吴玉霖在湖南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以菜刀再次夺得枪支，建立农民武装，参加援鄂战争，任湘西护法援鄂军民军第一路所属游击司令。1918年后任湘西靖国军团长、巡防军支队司令、四川“讨贼军”旅长、建国川军师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第九军第一师、独立15师师长，20军军长，是当时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周逸群等回湘鄂西地区发动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红军第三军（红二军团改编）军长等职。1934年起领导创建黔东、湘鄂川黔苏区，与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1935年11月，率第二、六军团进行长征，次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所部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任冀中军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军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该区部队作战，挫败日伪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率部重返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后任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曾率部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指挥晋北等战役，后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入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西南广大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1964年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及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建设，提倡群众性练兵活动；关心和指导军工生产、军队屯垦及军事院校等工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起他还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他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He Luting

**贺绿汀**（1903~1999） 音乐家、教育家。原名安卿。湖南邵阳人。1903年7月20日生。1923年入长沙岳云学校学习艺术。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到中共东江特委会宣传部工作，创作《暴动歌》。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理论作曲。这一时期为进步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创作了大批插曲。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赴内地宣传，创作了《游击队歌》、《干一场》等得到广泛流传的抗日歌曲。1943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筹组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和陕北文工团，任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毕生献身于音乐和教育事业，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发表了140多篇论文，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际音乐理事会荣誉会员称号。1999年4月27日逝世。主要著作有：《贺绿汀歌曲集》、《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等。1983年中国音乐界为他举行了从事音乐和教育60周年纪念活动，拍摄了彩色纪录片《音乐家贺绿汀》。

Heluxiaofu fangwen Zhongguo

**赫鲁晓夫访问中国**（Kruschev's visits to China）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赫鲁晓夫率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是因为在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苏联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这就提出了长波电台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只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协定。这实际上拒绝了由苏联在中国建立和管理长波电台的建议。就在中苏关于共建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予以拒绝。22日，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明确告诉苏方，中共中央认为建立联合舰队是一项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因而予以拒绝。7月31日，赫鲁晓夫率团到达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8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彭德怀、彭真、陈毅等与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等进行了会谈。2日和3日继续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提出的。他看到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同意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事，赫鲁晓夫说是因为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由于毛泽东等坚持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的

坚定立场，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先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经4次会谈后，中苏虽然在8月3日签署了会谈公报。但是，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而发生的争执，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Hongloumeng Yanjiu pipan

《红楼梦研究》批判 (criticism of *Studie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

1952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1954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批评俞平伯没有看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和杰出的艺术价值。李希凡、蓝翎曾要求《文艺报》发表他们的文章，被拒绝后，只好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发表，《文艺报》转载此文时，编者按语中也未表示支持。此事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54年12月16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认为李希凡等人的文章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专家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同时强调：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此后，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对俞平伯的围攻，不久又发展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涉及到哲学、史学，以及思想政治领域各个方面，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场批判带有片面性、简单化和态度粗暴的毛病。

Hongqi Qu

红旗渠 (Red Flag Canal) 开凿于太行山腰的一条人工引水渠道。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林州市(原林县)境内。林县总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山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0%，实有耕地面积80.69万亩。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陡峭，地质构造复杂，断层发育，流水漏失，缺乏良好的隔水层，水源匮乏，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民饱尝缺水之苦。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上马，经过10个春秋，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2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1515.82万立方米。1969年7月6日工程全面竣工。

红旗渠以浊漳河水为源，渠首建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总干渠墙高4.3米，宽8米，长70.6千米。在分水岭分为3条干渠，延伸林县腹地。第一干渠长39.7千米，第二干渠长47.6千米，第三干渠长10.9千米。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长304.1千米；支渠51条，长524.2千米；斗渠290条，长697.3千米，合计总长1525.6千米，是全国大型灌区之一。沿渠兴建水库48座，塘堰346座，提水站45座，小型水力发电站45座。

随着红旗渠配套工程的建成，形成以红旗渠为主体，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及其他引、蓄水工程作补充和调节，引、灌、蓄、排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有效灌溉面积达5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52.2万亩，提水灌溉面积1.8万亩，并解决了67万人口和3.7万头大牲畜吃水问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还带动了林牧业、县办工业、乡镇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其他产业、事业的发展。

Hongweibing yundong

红卫兵运动 (Red Guard movement)

“文化大革命”中，以学生为主体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的全国性造反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将一大批满怀冲动激情而又对社会缺少认识的青年学生作为先锋推上了政治舞台。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秘密集会，决定以“造反有理”为行动口号，以“红卫兵”为组织名称进行活动。7月28日，这些红卫兵把论述《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大字报托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复信。认为，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后，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迅速发展起来。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师生和一万多红卫兵，并且佩带上红卫兵袖标。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会以后，通过新闻报导，红卫兵组织迅速蔓延到全国。

8月20日起，由北京一些中学生带头，许多大城市里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

开展“破四旧”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破坏。随后，红卫兵“大串连”运动蓬勃兴起。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来京的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大串连”给铁路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红卫兵是一个自发群众组织。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多由中学的干部子女组成(俗称“老红卫兵”)，主要进行“破四旧”、打击社会上所谓“阶级敌人”的行动。他们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者，对乱打乱杀现象并不赞成，因此成立“纠察队”试图加以控制，但收效甚微。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工作组领导时期曾遭到批判和斗争的一些人，也纷纷在群众中组织起红卫兵(俗称“造反派红卫兵”)，主要进行对“走资派”造反、批判工作组的行动。最著名的有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称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

从9月起，两派红卫兵发生了冲突。老红卫兵不能容忍造反派红卫兵把矛头指向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出面予以干涉。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开始对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予以支持，但又认为这背离了打击“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继而转向支持造反派。老红卫兵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势力逐渐衰落，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1967年，随着“夺权”斗争的开展，红卫兵扩大到工厂、农村、机关甚至军事院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生组织。各地都形成了对立的几大派群众组织、互相攻击，发生武斗。红卫兵运动进入了“全面内战”阶段。为了控制局势，毛泽东在南巡中作出了大联合的指示，跨行业、系统的群众组织逐渐解体，回到原单位。造反派红卫兵中一些骨干成员，进入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岗位。还有一些红卫兵由于所犯错误受到批判清理。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大中学生毕业分配，原来的红卫兵不再存在，红卫兵运动基本结束。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学中虽然还存在以班级为建制的红卫兵组织，小学中建立有红小兵组织，实际上已是类似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形式。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论哪一种红卫兵都是错误的。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共青团十大筹委

会的报告，宣布撤销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

Hongxiannü

**红线女**（1927～ ） 粤剧演员。女。工旦。原名邝健康。广东开平人。13岁从舅母学粤剧。1942年，参加马师曾剧团在两广演出，逐渐成名。1945年后到香港，曾学习京剧、声乐等，在香港、澳门、越南、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一带演出。曾拍摄过《家》、《春》、《秋》等影片。1955年回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广东粤剧院的前身）。艺术上勇于革新，在继承粤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又吸收其他剧种乃至曲艺、西洋声乐的演唱技巧，形成独树一帜的“女腔”，是当代粤剧舞台上流传最广的唱腔流派。表演上以刻画人物细腻见长。代表剧目有：《搜书院》、《关汉卿》、《李香君》、《昭君出塞》、《山乡风云》等。1957年获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音乐比赛金质奖章；曾多次出国访问演出。历任广东粤剧院副院长、广州粤剧团艺术总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等职，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Hong Xuezhi

**洪学智**（1913～ ） 政协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河南商城汤家汇（今属安徽金寨）人。1913年2月生。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商南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后任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围攻作战。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部长，到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副大队长、第四团团长。1940年11月率抗大第三团干部大队赴苏北，后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兼盐城卫戍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参与指挥苏北军民反“扫荡”和阜宁、两淮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随部进军东北。后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43军军长、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三下江南、辽沈、平津、湘赣诸战役。广州解放后，兼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并兼海防司令员。1950年参与指挥海南岛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后，任13兵团副

司令员。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员。1954年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后调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省重工业厅厅长。1977年后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起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委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Hou Baolin

**侯宝林**（1917～1993） 相声演员。北京人，满族。1917年11月29日生。12岁学艺。初学京剧，不久改习相声。曾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摆地”演出。1940年成名于天津，正式进入剧场和电台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志相声革新，参加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纯洁相声语言，提高相声艺术格调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1955年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大量相声节目。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和全国各地演出，对扩大相声影响，提高相声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做出了贡献。1979年退出艺术舞台，专事曲艺理论研究，与其他曲艺工作者合著了《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相声溯源》等著作。1980年出版的《侯宝林相声选》是他演出的作品专集。代表作有：《婚姻与迷信》、《一贯道》、《妙手成患》、《夜行记》、《戏剧杂谈》、《关公战秦琼》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犀利的讽刺锋芒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坚持相声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努力塑造人物形象，发挥讽刺艺术特长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侯宝林的相声风格清新、洒脱、含蓄、优美，追求寓庄于谐、意高味浓的美学境界。他的相声表演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悉与喜爱，也为一些国际友人所赞赏。

侯宝林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并应聘为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1993年2月4日逝世。

Hou Debang

**侯德榜**（1890～1974） 化学家。字致本，福建闽侯人。1890年8月9

日生。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赴美国留学，入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纽约普拉特专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兴办民族化学工业，历任塘沽永利碱厂、南京永利硫酸铵厂总工程师、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突破外国集团的垄断，在中国制造出纯碱，产品获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1941年首先创制了联合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的新工艺，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对中国的制碱和氮肥工业发展有重要意义。1943年被聘为当时世界上只有12位成员的英国化学工业名誉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化学工业的领导和研究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8年创建了碳化法生产碳酸氢铵的工艺，打破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永利化工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国务院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常委。1974年8月26日逝世。著作有《纯碱制造》、《制碱工学》等。

Hou Jingru

**侯镜如**（1902～1994） 政协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河南永城人。1902年10月17日生。1923年，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毕业。1924年郑州大学理科肄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团参谋长，后任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赴上海，参与组织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七一五事变后，离开武汉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教导团团长，并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2年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师参谋长、第三十师第八十九旅旅长。1937年任第九十一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1943年春，升任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8年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后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

总团长。1949年8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是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1994年10月25日逝世。

Hou Jun

**侯隽** (1943~ ) 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女。北京市人，1943年3月30日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市良乡中学。学习期间，因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奖励。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天津市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长期以来，勤恳工作劳动，坚持扎根农村不动摇，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196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64年起，先后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先进生产者、省市标兵、全国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任宝坻县革委会常委，中共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副主任，河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1990年以后一直任中共宝坻县委常委、副县长。当选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Hou Renzhi

**侯仁之** (1911~ ) 历史地理学家。原籍山东恩县。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枣强。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留校任教。1946年赴英国留学，获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地质地理系主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地理联合会专业委员。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沙漠历史演变和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作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燕园问学集》，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

Hou Wailu

**侯外庐** (1903~1987) 历史学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1903年2月6日生。自幼习四书五经。1922年进京求学，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巴黎大学留学。1930年归国，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开展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很深的造诣，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易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当选为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晚年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一版）编辑委员会主任。同时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宋明理学史》（上、下）、回忆录《韧的追求》和《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等。

Hou Xianglin

**侯祥麟** (1912~ ) 化工学家。广东汕头人。1912年4月4日生。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四川、云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重庆炼油厂工程师，光华化学公司精制部主任等职。1945年赴美国留学，获卡内基理工学院化工博士学位，任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研究员，石油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当选为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会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常委，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研究、建设和规划管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意大利马泰依国际科技奖、中国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奖。主编有《中国页岩油工业》。

Hu Feng fangeming jituan cuo'an

**“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 (fabricated case of “Hu Feng's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错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胡风事件。

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界历来就有争论。1954年底前这种争论，甚至批评，一直是在正常范围内进行。1954年7月，作家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报告》（亦称“三十万言书”），就文艺问题提出了系统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的报告。4月，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认定：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批判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胡风于同年5月被捕，与胡风关系密切的人也作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加以逮捕判刑，或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批判胡风文艺思想问题遂变为在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1965年，胡风被判处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刑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重大错案进行了彻底纠正，1978年底撤消对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为胡风和与此有关的人平反。1981年，胡风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1988年6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撤消了有关胡风“宗派活动”及文艺思想的政治性结论。

**推荐书目**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

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1989。

Hu Houxuan

**胡厚宣** (1911~1995) 甲骨学家、历史学家。河北望都人。1911年12月20日生。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升入史学系，1934年毕业。之后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参与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整理。1939年去成都齐鲁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中文系、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1946年始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等。1995年4月16日逝世于北京。主要著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初、二、三、四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甲骨探史录》（与他人合著）等。并总编《甲骨文集》。

Hu Hua

**胡华** (1921~1987) 历史学家。原名胡家骅。浙江奉化人。1921年12月16日生。1937年肄业于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1938年10月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0年4月起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在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院、法政学院和教育学院任教，兼任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和史地系副主任。1948年4月到华北大学任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

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交流协会理事。还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12月14日病逝于上海。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中国历史概要》（合著）、《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南昌起义史话》、《周恩来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合著）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中共党史人物传》。

Hu Jintao

**胡锦涛** (1942~ )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安徽绩溪人，1942年12月25日生。1959年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学习。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毕业后留清华大学工作。1968年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1969年后，任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1974年调到甘肃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任秘书、设计管理处副处长。1980年任甘肃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分别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甘肃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84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8年12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Hu Juwen

**胡厥文** (1895~1989) 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名胡保祥。上海市人。1895年10月7日生。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1921年起，先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

合作五金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任厂长、总经理。曾任上海市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会理事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联合同业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拆厂内迁，在重庆、桂阳、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任总经理，并任中南区机器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1945年12月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后返上海，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创办《中国工业》月刊，参加赴南京请愿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活动，组织团结工商业者护厂保产，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是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主席，第五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会第一届至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常委；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9年4月16日逝世。

Hu Qili

**胡启立** (1929~ )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陕西榆林人。1929年10月生。1947年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会主席。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机械系。历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国际学生联合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共西吉县委副书记，中共固原地委副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办公厅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增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1989年6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职务。1991年6月，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93年3月，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Hu Qiaomu

**胡乔木** (1912~1992) 中共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名胡鼎新, 江苏盐城人。1912年6月1日生。1930年毕业于扬州中学。同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加入共青团, 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曾主编革命小报, 并为革命刊物《北方青年》撰稿人。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秋转学浙江大学外文系, 因在校领导学生运动于1935年初被迫离校, 到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 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奉调赴陕北, 任安吴战时青训班负责人、中央青委委员, 主编《中国青年》。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延安期间, 在毛泽东指导下编辑《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 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并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和新闻。1947年4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 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先后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等职。1948~1961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主管新闻工作, 并参加文字改革的领导工作。曾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许多评论和新闻。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他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 参加了《共同纲领》(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中共八大文件(1956)以及《莫斯科宣言》(1957)的起草。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复出, 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 协助邓小平进行整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遭打击。1977年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为首任院长, 在1978年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曾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主持写作了论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发展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换、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多篇, 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 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在邓小平主持下, 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80年代前期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重要文章。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提议写作并主持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89年赴美访问, 发表《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等学术讲演, 为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系统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他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 为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花费许多心血。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十一届中央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

主要著作汇集出版的有《胡乔木文集》(三卷)、《乔木文丛》(四卷)、《人比月光更美丽》(诗集)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

Hu Sheng

**胡绳** (1918~ ) 政协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哲学家, 历史学家。原姓项, 祖籍浙江钱塘。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193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1935年下半年起在上海一面自学, 一面写作, 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 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到武汉。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年中, 先后在武汉、襄樊、重庆、香港工作, 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 并在这些地方参与中共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机构的工作。1942年又到重庆, 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1948年, 先后在上海、香港工作。1948年10月离开香港, 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政务院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等机构担任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被撤销一切职务, 停止工作。1973年后恢复工作。1982年起任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起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史学会会长, 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1990年被聘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时期, 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 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 还出版了一些在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著述在知识青年中, 在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起了很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38)、《怎样搞通思想方法》(1948)、《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 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1997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全书》(六卷)包括他的全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Hu Shi

**胡适** (1891~1962) 文史哲学家。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 祖籍安徽绩溪。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发表白话文杂谈《地理学》和章回小说《真如岛》。主编该校《竞业旬报》。1910年以公费赴美留学, 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受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很大。1916年《寄陈独秀》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 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之一。同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出版重要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同年6月, 主编《每周评论》,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等文章, 宣扬改良主义, 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董事, 后任该会编译委员会委员, 并任光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大学陆军大学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 在上海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杂志。1930年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为中国的五大仇敌口

号。1931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在北京创办《独立评论》，提倡西化。1938年任驻美国大使。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会议。1946年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出席“行宪国民大会”，当选会议主席。1949年去美国定居。1958年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于台北去世。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国语文法概论》、《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等。

Hu Shi sixiang pian

**胡适思想批判** (criticism of the thought of Hu Shih) 1954~1955

年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展的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

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1月，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必须通过对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才能使有阅读能力的党的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学术、思想、文化、理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形式主义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10月以后，转入同日常思想工作相结合的长期学习研究讨论。这次批判对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影响、确立和巩固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起了好的作用。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有些文章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造成了消极影响。

Hu Yaobang

**胡耀邦** (1915~1989) 1980~

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湖南浏阳人。1915年11月20日生于贫农家庭。1929年冬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1月到位于江西、湖南交界处的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调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宣传部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

大队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后调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解放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1952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的工作得到巨大发展。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集团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人，根据邓小平指示，对科学工作坚决进行整顿，因而从1975年冬起再次遭到错误的批判。

粉碎江青集团后，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心实现转变，对于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制定新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努力。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全面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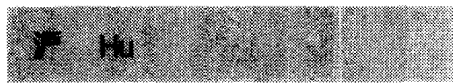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4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Hu Yuzhi

**胡愈之** (1896~1986)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上虞人。1896年9月9日生。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当练习生。1919年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1920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倡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多种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同时编辑翻译《西行漫记》、《鲁迅全集》。1938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后转到桂林，参与创办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1940年秋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与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任副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与陈嘉庚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任社长。在新加坡领导建立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任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1985年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是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五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1月16日逝世。

Hu Ziang

**胡子昂** (1897~1991) 政协第



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用名胡鹤如。重庆人。1897年2月20日生。1923年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处长，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1933年起，先后任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参议会会议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总会西南办事处主任，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1991年11月19日逝世。

### Hu-Ning Gaosu Gonglu Jiangsuduan 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

(Jiangsu sector of Shanghai-Nanjing Expressway) 中国第一条水网地区修建的长里程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建设里程258千米，全封闭、全立交、双向四车道，主线设计行车速度120千米/小时。于1992年6月14日开工建设，1996年9月15日建成通车，比原定建设工期提前27个月。整个工程技术标准高，施工难度大，但仍做到了造价低、工期短，在高速公路设计、施工与管理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路名。

沪宁高速公路贯穿于江苏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连接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六市，对于构筑江苏现代化交通骨架，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确保江苏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Hushi

沪市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又称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经中国国务院批

准，在上海成立的买卖股票、公债、公司债券等证券的市场。1990年11月20日成立，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于12月19日正式营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会员制的事业法人机构，其宗旨是为发展中国证券事业，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地筹集资金和吸引外资，为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它的组织机构分为：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会员大会是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交易所的日常事务决策机构。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

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的业务包括：提供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和设施；管理在沪上市证券的买卖；进行证券交易的清算交割；开展证券的集中保管和股票集中过户；向社会公开发布有关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

截至1998年底，在沪市上市的证券包括：全国各地发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各种基金、企业债券、国债、金融债券。

Huabei junshi yanxi

### 华北军事演习 (military manoeuvre in North China)

1981年9月13日至18日，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在华北地区举行的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烈”，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军事演习的组织者是北京军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演习是在中央军委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由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副政委曲竞济、参谋长周衣冰等导演和组织指挥的。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另29个团、11个营，空军2个航空大队以及3个后勤分部、3个医院，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余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汽车1万多辆。参加演习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初期抗击“蓝军”战备突袭，制止其长驱直入的作战任务，重点演练了4个课题。一是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二是空降、反空降；三是坚固阵地防御；四是集团军首长机关带部分士兵实施战役反突击。这次演习检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化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共中央、

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全军高级干部，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共3.2万余人观看了演习。演习结束后，举行盛大阅兵。邓小平登上敞篷阅兵车，在受阅部队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军指战员排列的53个方队，并且向受阅部队发表了讲话。这次阅兵，生动地显示了人民军队朝气蓬勃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战斗英姿和威武的阵容。

huaxue gongye

### 化学工业 (chemical industry)

利用化学方法生产化学品的工业部门。可分为：无机化工，主要产品有纯碱、烧碱、硫酸、硝酸、盐酸、无机盐、合成氨、化学肥料、硅酸盐、稀有元素、电解化学品等；有机化工，主要产品有乙烯、合成纤维、塑料、树脂、橡胶等高聚物、溶剂等；精细化工，主要产品有染料、油漆、涂料、化学试剂、农药、医药和感光材料等。化学工业门类多，与其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等部门及人民生活关系密切，是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起步基础** 中国的化学工艺历史悠久，曾有着相当高的水平，如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属于化工的范畴。但在近代一度发展缓慢。最早出现的有现代意义的化工厂是1915年上海的开林油漆厂，以后相继在沿海少数城市出现了染料厂、药品厂、橡胶厂、制碱厂、电化工厂。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制碱厂，1924年在侯德榜的努力下生产出了纯碱，1926年生产的优质“红三角”牌纯碱获当年万国博览会金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开办了一批生产合成氨、硫酸、硝酸、纯碱、橡胶、染料、溴素、氯化钾等产品的化工厂。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期间，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主要有生产硫酸、硝酸、盐酸、纯碱、酒精、甘油、火药、炸药等产品的工厂，以及少量制药厂、造纸厂、肥皂厂、皮革厂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化学工业虽有了一定发展，但仍是品种少，产量低。最高产量硫酸不过18万吨，硫酸铵22.6万吨，纯碱10.3万吨，烧碱1.2万吨，轮胎4万条。1949年全国化工总产值为1.77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化学工业得到飞速发展，50年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个历程可粗略分为5个阶段。

恢复时期 (1949~1952) 随着解放



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家陆续没收了各地的官僚资本化工企业，使之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着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当时东北工业基础较好，是恢复工作的重点。经过3年努力，一些工厂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扩建厂房增加产品，主要化工产品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化工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3倍多。

**重点建设时期（1953~1957）** 1953年起，国家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的11个化工厂，在吉林、兰州、太原3地建设化工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国家对私营化工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

吉林化工区由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热电厂组成，是一个以煤、焦和焦化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工基地。工业区从1955年4月动工，1957年10月4个工厂先后建成投产。兰州化工区由兰州肥料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热电厂组成。1956年开始建设，1958年、1960年分别建成肥料厂和橡胶厂。但由于缺少原料，橡胶厂丁苯橡胶装置被迫停产。1961年底兰州化工区又建成国内第一套以炼厂气为原料的乙烯装置。太原化工区由太原肥料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热电厂组成。1956年开工，1961年全部投产。1958年又增建了山西磷肥厂。

期间，还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它包括制药厂、淀粉厂、玻璃厂。这个厂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霉素全部依赖进口的状况。

到“一五”计划完成，化学工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除沿海仍占主要比重外，内地的比重开始上升；主要化工产品成倍增长，农药等一大批化工产品更是从无到有。1957年化学工业总产值达26.53亿元，与1952年相比增长2.4倍。上述重点工程的建设，为化学工业培养了科研、设计、基建、生产方面的力量，积累了经验，为化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面发展时期（1958~1964）** 为发挥地方大办化工的积极性，帮助地方兴办中小化工企业，1958年化工部从机关和国家重点企业抽调上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化学工业相对薄弱的地区，协助地方制订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建设了一大批生产化肥、硫酸、烧碱、聚氯乙烯的中小型企业。为解决农业用肥的短缺问题，1961年国家把加快发展氮肥列为重要发展目

标，这一时期主要建有：中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衢州化工厂，以及吴泾化工厂、广州氮肥厂。1963年后又相继建设了21个中型氮肥厂、11个采用重油气化制合成氨和用天然气制合成氨技术的中型合成氨生产厂。1964年国务院决定试办托拉斯。化工系统1965年1月成立了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下辖上海、天津、广州、重庆、南京、武汉、长沙、杭州、沈阳9个分公司，新华、开封两个制药总厂，12个直属厂，4个研究院所，共176个单位。公司成立后，统筹规划，医药工业分布趋向合理，产品产量、质量得到提高。与1963年相比，1966年产值增加1.8倍，6大类原料药产量增加1倍，利润增加1倍。1965年5月又成立了中国橡胶工业公司，下辖上海、天津、青岛、广州、重庆5个分公司，北京、贵州、广西3个橡胶总厂，10个直属厂和7个研究机构，共124个单位。1966年与1964年相比，公司产值增加25%，生产成本降低9.2%，利润增加20.5%，使用生胶量占全行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86%，产值占77.8%。此后，全国化工系统又先后成立了基本建设总公司，化肥、化工原料、化学矿业总公司等。规模化的生产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公司的成立也制约了地方性联合企业的优越性，影响了地方办化工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大公司全部被撤消。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1958~1960年全国化工基本建设投资是“一五”计划期间的3倍多，但战线长，工程项目长期不能建成投产；加上工厂生产秩序被打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

降，化工总产值一降再降，直到1963年才有所回升。1960年后，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据此，化学工业部在1962年上半年关停并转了一批企业，对一些重大企业进行了调整和生产整顿，基本建设项目减少了1/3，且基建投资的60%集中在支援农业和轻工市场的项目上。全国化工企业从6688个调到2843个。职工人数两年中减少了50万，但充实了技术力量，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6000多人。经过整顿，主要产品产量有所增加。石油化工、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国防化工、染料、涂料、感光材料、化工机械等行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产品新品种成倍增加，但资金利税率未达到“一五”计划时期的水平。

**艰难发展时期（1965~1978）**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化学工业遭到摧残，生产设备被严重破坏，大批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迫害，规章制度被废除，导致10年中有4年生产陡降或停滞。在这种严重干扰下，化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化学工业仍有发展，特别是氮肥和石油化工发展较快。这段时间内一些沿海企业迁到内地，加上内地也兴建了一批化肥厂，小氮肥厂从1966年的150个增加到1983年的1200个，而且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改造力度不断加强，年产合成氨945.7万吨，相当于碳酸氢氨3026万吨，占全国氮肥总产量的57%，全行业净盈利5.16亿元。以后江西、四川、湖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又相继建成一批中型氮肥厂。

70年代随着石油产量的提高，石油

主要化工产品产量比较表

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1952	1965	1978	1997
硫铁矿（35%）	21	336	687	—
磷矿（30%）	3	158	1138	—
硫酸（100%）	19.0	234.0	661.0	2036.87
纯碱	19.2	88.2	132.9	725.76
烧碱	3.8	55.6	164.0	574.40
合成氨	3.8	148.4	1183.5	3000.28
其中化肥（折纯）	3.9	172.6	869.3	2820.96
农药	0.2	19.3	53.3	52.67
纯苯	0.8	11.8	31.9	—
电石	1.1	44.0	123.8	344.70
乙烯	—	0.3	38.0	395
塑料	0.2	9.7	67.9	685.76
橡胶	1.6	6.7	8.3	—
染料	—	1.6	10.2	—
涂料	2.7	16.1	34.3	—
轮胎（万条）	42	232	936	—

化学工业得到飞快发展,从50年代后期从苏联引进第一套乙烯装置,到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上海高桥化工厂小型乙烯生产装置的建成投产,到1976年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从日本引进的年产30万吨乙烯、18万吨高压聚乙烯、8万吨聚丙烯等装置,中国石油化工走上了一条稳步发展的道路(参见石油化学工业)。

现代化建设时期(1979~)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化学工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先后完成了“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1996年提前实现化工总产值到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至1997年,全国化工系统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约5600个,其中国有企业3500个。1997年化工总产值达2780亿元,1998年化工总产值达3000亿元,是1978年的7倍。主要化工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电石、染料、合成氨居世界第一位;化肥、农药、纯碱居世界第二位;硫酸、烧碱居世界第三位;乙烯、轮胎、涂料、合成材料等也名列前茅。化学工业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品种大体配套,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①生产能力稳步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化学工业形成盐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化学矿山、酸碱、林产化工等20多个行业,能够生产化肥、农药、无机盐、基本有机原料及中间体、合成树脂及塑料、合成纤维单体、合成橡胶、涂料及颜料、染料、化学试剂、食品和饲料添加剂、其他精细化产品、国防化工产品、化工机械等40000多个品种和规格的产品,其中用于支农产品的投资超过化工总投资的一半,形成了以煤、油、气为原料的生产体系,已拥有尿素、硝铵、碳酸氢铵、氯化铵、硫酸铵、磷铵、硝酸磷肥、普钙、钙镁磷肥、硫酸钾、氯化钾、复合肥料等几十个品种。1997年化肥产量达2710万吨(折纯),高浓度化肥所占比例为45.8%。农药生产达140多个品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此外,1997年乙烯产量达350万吨、纯碱产量达690万吨、烧碱达530万吨、聚氯乙烯达145万吨、轮胎达7300万套,并为国防、医药卫生、轻纺工业、科教事业提供了各种特殊性能的专用化工产品,如高分子材料、生物化学品、电子化学品、超纯试剂、特种粘接剂等。

②优化工业布局。从70年代起,化学工业在充分发挥老化工基地作用的同

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资金,集中力量陆续兴建了一批新骨干企业,70年代在大庆、辽河、沧州、淄博等地建成13套大化肥装置;80年代建成大庆、齐鲁、扬子等大型乙烯项目,乌鲁木齐、宁夏、镇海、中原、青海等大化肥项目,以及潍坊、唐山、连云港三大碱厂;90年代建成大中项目64个,促进了合成氨、尿素、乙烯、合成橡胶、磷铵、离子膜烧碱、子午线轮胎等产品结构调整,带动了化学工业整体水平提高。

在产业布局方面,实施“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方针,沿海化学工业得到继续发展,内地兴建了一批石油化工基地,初步形成一批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中心,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相互配套,大中小相结合的企业群。“九五”计划期间,将规划好吉林、大连、南京等18个大型化工基地,建好苏州、抚顺、湘潭等15个中小城市精细化工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化工的发展,逐步形成以上海石油和化工大企业为龙头,在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建成烯烃、芳烃为主要原料的石化基地;在环渤海湾地区,以京津塘为中心,重点发展盐化工、石油化工、煤焦化工及橡胶加工;在东北地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及深加工产业;在华南及珠江三角洲区域重点发展加工进口原油为主的石油化工;西南区域重点发展天然气、石油化工;中部区域重点发展煤化工、盐化工及精细化工等。

③科技成果得到较快转化。到1997年化工系统有县属以上各类化工科研院所245个,职工25.5万人。“八五”以来取得科技成果2000多项,并有70%在生产中得到推广。仅“八五”期间化工新增效益中,利用先进技术成果,改造现有企业所占份额为60%左右。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年产50万吨CO<sub>2</sub>气提法尿素生产装备达到国外同类装备水平。千吨级四氟乙烯生产技术、万吨级聚氯乙烯生产技术,以及年产60万吨纯碱、24万吨磷铵、20万吨合成氨、20万吨硫酸和1万吨离子膜烧碱等生产技术装备都在科研成果的支持下,达到较高水平。

④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开放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化学工业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制订了到本世纪末化学工业实现年出口创汇100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100亿美元,培育100家外向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规划。1978年化工出口额不到3亿美元,1997年出口额已达340亿美元,其中出口创汇150亿美元。到1995年底,化工行业的“三资”项目7000多个,累

计总投资150亿美元,形成了一批出口产品生产基地和染料、橡胶制品、无机盐等出口拳头产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使一大批化肥、乙烯、橡胶制品、有机原料、合成材料及精细化工项目得到建设或改造。到1997年底累计利用外资达72亿美元,与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及17个大化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加快了化学工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⑤发展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90年代以来,化工企业开始组建联合紧密、相互配合的化工集团。首批国家试点的化工企业集团有吉化集团公司、天津渤海化工公司、南京化工公司、中国乐凯胶片公司,到1995年4家企业集团资产总额增长314%,销售收入增长131%。随着企业联合力度加快,1996年企业集团发展到29家,销售额居前100家的企业占全系统销售总额的40%,实现利润的50%。增强了整个化工行业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

50年来,各主要发展阶段,我国化学工业各主要产品产量见表。

**体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中,为加速化学工业的发展,领导体制多次变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这是1949年后化学工业第一个国家级领导机构。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重工业部的化学工业管理局、轻工业部的医药工业管理局和橡胶工业管理局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1970年7月国务院决定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燃化部),1975年2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燃料化学工业部分为煤炭工业部和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工部),1978年4月石油化工部撤消,成立了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1998年4月为更好地做到政企分开,强化行业管理职能,促进石油和化学工业协调发展,中央决定撤消化学工业部,将化学工业部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成立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

**发展前景** 为保证化学工业“九五”计划的完成和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1995年原化工部提出以石油化工为突破口,带动全行业发展的结构调整战略;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加快发展有机原料、有机中间体、合成材料及精细化学品;建设好在行业中具有关键作用的7项重点工程:化肥工程、农药工程、石油化工工程、精细化工工程、子午线轮胎工程、离子膜烧碱工

程及化工装备工程。4年来通过7项工程的组织实施, 化学工业的发展已见成效。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 促进中国化学工业的整体水平登上一个新台阶。

**推荐书目**

杨光启、陶涛主编: 《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8。

康纪武主编: 《历史的跨越——中国化学工业改革开放二十年》, 《中国石油和化工》杂志社, 北京, 1998。

**Hua Guofeng**

**华国锋** (1921~ )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主席。山西省交城人。1921年2月16日生。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游击队队长, 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起任交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主任, 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 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9年夏随南下工作团到湖南, 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 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 湖南省副省长。1968年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5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调中央工作, 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1973年5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同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 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2月任国务院代总理。同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0月领导了隔离审查江青集团的重大斗争。此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议, 接受他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82~199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至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Hua Junwu**

**华君武** (1915~ ) 漫画家、美术活动家。笔名华潮、彤哥、端父。江苏无锡人, 1915年4月24日生于浙江杭州。1936年夏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创作漫画, 在上海《论语》、《时代漫画》等杂志上发表。抗日战争时期, 参加救亡活动, 1938年到延安, 任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员、科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漫画作品, 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秋到沈阳《东北日报》当记者。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局文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文艺部主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顾问, 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等职。创作了大批紧扣时代脉搏、富有战斗性和艺术性、深受人民喜爱的漫画作品。艺术风格明快夸张, 构思巧妙, 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 表现鲜明的民族传统。自1948年以来出版漫画集、插图集20余种, 还出版有关创作经验谈《我怎样想和怎样画漫画》。1998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了漫画展。

**Hua Luogeng**

**华罗庚** (1910~1985) 数学家。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苏金坛人。1910年11月12日生。1924年毕业于金坛县初级中学, 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 1929年在金坛县立中学任庶务会计。1930年被清华大学聘用, 先后任管理员、助教、讲师。1936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38年回国, 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春应邀访问苏联, 同年秋赴美国, 先后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副院长、数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 中国数学会协会副主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被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第二、三届中央常委, 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 在解析数论、

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都做出卓越贡献。有许多数学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用他的名字命名。共发表专著论文近300篇。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逝世。

**Huaihe Liuyu shuiwuran fangzhi**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control over the pollution of the Huaihe River)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流域污染治理。80年代以来, 由于淮河流域一些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不适当地发展了一批污染重、社会效益差的工业企业, 加上淮河干流、支流沿岸城市基本没有城市污水处理设施, 全流域每天排放的工业和生活污水约700万吨均直接进入淮河干、支流, 使淮河流域水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水体主要污染指标化学耗氧量超标几十倍到上百倍, 水污染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的发展, 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淮河污染治理高度重视, 199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淮河流域污染防治的目标和任务, 成立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 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 拨出了治理专项资金,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组织二次执法检查, 随时协调治淮工作。流域内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了领导, 采取有力措施, 人大严格监督, 形成了各部门分工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污染防治局面。截至1997年底, 全流域共投入资金44.85亿元, 治理了污染企业2600多家, 关停并转污染企业5800多家, 减少流域污染负荷40%, 实现了1997年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的目标。1997年淮河为平水年, 没有发生大的污染事故, 干流水质有所改善。解决了流域内400多万群众的饮水问题。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初步成绩为其他流域的治理提供了经验。

**huanjing baohu shiye**

**环境保护事业**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保事业, 以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 实行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蓬勃发展, 经过

不懈努力,在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基本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趋势,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环境保护在五十年代开始孕育;70年代,环境保护开始被摆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80年代,环境保护事业迅速发展,90年代,环境保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局部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从总体上看,经济建设的规模不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没有发生大的矛盾。

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国家大办重型工业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962年,国家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通过国民经济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业对环境的压力,但是,一些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在短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动乱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明显加剧。经济建设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经济效益,导致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一些新建项目出现了明显的布局不合理;一些消费性城市不从实际出发,实行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加剧了这些城市业已存在的工业污染;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号召下,毁林毁草、围湖围海造田等问题相当突出。在这期间,发生了大连湾、官厅水库、松花江水系等污染事件。

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并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积极贡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由此揭开了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这次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1974年10月25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陆续建立起相应环境保护机构和环保科研、监测机构,制定了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开展了重点区域的污染源调查,进行以废水、废气、废渣“三废”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的工业污染防治。与此同时,积极探索环境保护的有效制度和措施,如实行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等,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达了第一批污染限期治理项目。这些制度和措施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环境保护局。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国家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198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组织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任务。198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出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设施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排污收费、污染限期治理、污染集中控制等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

1990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1992年6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这次大会的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强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的五点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保护环境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李鹏还阐述了中国环境保护取得的重要进展。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是:①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持续发展道路;②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③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治理城市“四害”;④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⑤推广生态农业,坚持植树造林,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发展环保产业;⑦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⑧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全民族

的环境意识;⑨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⑩制定国家和环境发展行动计划。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将环境保护列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之一;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环境保护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的实质是保护生产力”,强调“环境保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积德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次会议确定了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1998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将原副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升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强化了环境监督执法职能。1997年和1998年,中共中央连续两年在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期间,召开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个基本国策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听取环保工作汇报。江泽民强调:环保工作必须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要求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统一监管和分工负责、环保投入、公众参与四项制度,把环保工作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算大帐,对环境保护工作,不仅本世纪这几年要抓紧抓好,下个世纪也要抓紧抓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抓紧抓好;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一年接一年,一届接一届地把环境保护工作抓紧抓好。

**政策和管理制度建设** 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是中国环境保护立法的起点。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第一次将环境保护列入国家根本大法;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带动了环保立法的全面展开,随后国家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经过多年努力,国家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污染者付费和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环境管理政策,共颁布了6部环境法律和9部相关资源法律;修改后的《刑

法)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国务院发布了29件环境法规;环保部门发布了70余件环境规章,地方性环境法规达900余件;国家制定了375项环境标准;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污染限期治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保目标责任制、排污核定、污染集中控制、落后工艺和设备限期淘汰、危险废物处置行政代执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等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符合国情的环境政策、法律、标准和管理体系。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环境执法不断加强。特别是90年代以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执法检查,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实施行政检查。1993年~1996年连续4年开展全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从总体上加大了环境执法力度,查处了一批环境违法案件,增强了环境执法的实效;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执法实施行政监察。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国家环保局和监察部连续三年对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贯彻《决定》情况进行监察和检查,提高了各级政府环境执法的自觉性和监督力度;三是国家权力机关对环境执法实施监督检查。近几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对省级和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执法进行监督检查,提高环境执法质量,有力地推动了环保工作法治化进程。经过努力,环境执法取得明显成效,如对非法进口“洋垃圾”行为进行了坚决打击,将企图向我国转移“洋垃圾”的200多艘船只拒于国门之外,关停、取缔了65000多家严重污染环境的15类小型企业;1998年,山西运城依法判处了全国第一起环境犯罪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污染防治** 多年来,污染防治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从点源治理向面源和流域、区域治理发展。70至80年代,污染防治以企业治理“三废”为主,只在小范围内开展了区域环境治理。进入90年代以来,在加强企业防治污染的同时,着手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大规模开展重点城市、流域、区域环境治理,全国实施了《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力争使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一些城市和流域、区域的污染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一度被称为卫星上看不见的本溪市已经改变了污染严重的面貌,白洋淀水质获得明显好转。国家确定的“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

湖)水污染防治、“两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和渤海的污染防治全面展开。通过治理,淮河、太湖流域的重点污染源排放的重点污染物已经达标,淮河干流水质有所好转。二是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过渡。近年来,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实行ISO14000认证,推动企业污染防治由末端向前推移;三是从浓度控制向浓度和总量控制相结合发展。在严格控制污染物浓度排放的同时,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遏制全国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将2000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八五”末期的水平,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四是由单纯治理向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和合理布局转变。近年来,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淘汰了一批能源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工艺和设备,关闭了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调整了一批企业的布局,降低了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量由1985年195.9吨下降到1998年的47.7吨(见表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由1990年的5.3吨标准煤下降到1997年的3.55吨。根据统计,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低于“八五”末期的水平(见表2)。1998年全国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87.4%,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65.3%,工业废气消烟除尘率达到88.6%。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全国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呈现下降或持平的趋势,污染物处理率和达标率保持增长的势头,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基本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逐步深化。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97年,城市居民用气普及率已达73.3%,城市供水普及率为9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4.4%,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20%;二是建设烟尘控制区、噪声达标区,加强机动车尾气管理,推广无铅汽油,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一批大中城市实现了车用汽油无铅化,环境质量周报和日报;三是结合产业结构和城市地域结构调整,改善能源结构,优化城市功能区布局;四是通过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创建环保模范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保护向纵深发展。国家对47座重点城市(中央直辖市、各省省会城市和国家旅游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进行考核,并对获得考核的前10名城市予以表彰。在全国668座城市中,实行综合整治和定量考核的城市已达510座,

已有张家港、大连、深圳、厦门、珠海、威海、烟台、荣成、莱州、昆山、中山共11座城市,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并有明显改善,基本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被评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在向建设和保护并重发展。一是在物种特别丰富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二是加强生态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县建设,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三是加强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等;四是长江特大洪灾后,国务院决定,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天然林采伐,对东北等基地的天然林实行限采或禁采,禁止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湖、还林、还草等。经过多年努力,植树造林工作在全国广泛持续开展,“三北”防护林等7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初见成效,有700多个平原县(市)实现了绿化,12个省区消灭了宜林荒山,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3.92%。全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7000多万公顷,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控制,一些破坏严重的生态环境正在恢复。到1997年底,全国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926处,占国土面积的7.6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长白山、西双版纳等10处自然保护区加入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612种国家级珍稀濒危物种列为重点保护对象,6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生态农业试点2000多处,50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取得明显的综合效益,有7处生态农业试点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全球500佳”称号;全国生态示范区试点达2000多处,105个生态示范区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 环境科技、投入和宣传教育

科技对环境保护的支撑能力逐步增强。“八五”期间就获科技成果两千多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7项。环境标志制度正在推行,有55家企业、22个种类、219种产品获得环境标志,有一些企业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标准。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事业单位9807个,职工182万人,年产值510亿元,部分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

国家环保投资的总量逐步增加。80年代初期,全国环保投资总额每年为25~30亿元,约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0.53%;到80年代末,投资总额超过一百亿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0.63%左右;到90年代中期,“八五”全国环保投入又有较大增长,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0.73%。1998年,结合扩大内需,污

染治理和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804.2亿元,环保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

环境宣传教育日益广泛,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已纳入9年义务教育,全国有140所高校、上百所中专及职业高中开设了环保专业,共拥有环境类专业51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23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77个和若干个博士后流动站;各级党校和行政院校增添了环保内容。环境宣传日益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向社会化。80年代初期,创办了全球第一家国家级环境保护专业报《中国环境报》,成立了中国环境出版社,全国现有30多家地方环境报和几百种环境专业期刊。“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促进了一批“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围绕淮河'97达标、太湖'98达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机构队伍建设和环境监测工作** 全国环保队伍逐步壮大。省一级政府基本上都设立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管理机构,绝大多数地市和近2/3的县设立独立的环境管理机构。形成了一支2万多人的现场执法队伍。环保系统建立监测站2200多个,监测人员超过3.5万,先后建立了由200个站组成的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和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的国家环境监测网,还分别组建了长江暨三峡生态环境监测网、淮河流域监测网、太湖流域监测网和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环保系统各级监测站每年上报有效监测数据3000万个,为环境决策和污染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参加全球环境发展领域的活动,签署和加入了《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18项国际环境公约,同24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环境合作协议,积极引进外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

**存在问题** 当前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全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领导干部和一些群众的环境意识不强,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投入不足、技术滞后和地方保护主义

在一些地区比较严重;环境执法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执法不严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

Huan Xiang

**宦乡 (1909~1989)** 政治学家、外交家。贵州省遵义市人。1909年11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1927年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9年后从事新闻工作,任前线日报社总编辑、副社长,《文汇报》副总主笔。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中国驻英国常任代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欧洲共同体大使。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法律学研究,颇有建树。积极主张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著作有《纵横世界》等。1989年2月28日逝世。

Huang Dingchen

**黄鼎臣 (1901~1995)** 中国致公党第七、八届中央主席。广东省海丰县人。1901年8月13日生。1928年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在日本曾参加东京留学生反日大同盟,任组织委员会主任。1928年回国,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分会主任。先后两次被捕。1932年后在澳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行医。1946年加入中国致公党,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部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医疗预防司司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先后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第五、六届中央常委、第七、八届中央主席和第九、十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三届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八届委员和第五、六、七届常委。1995年1月7日逝世。

Huanghe Wanjiashai shuili shuniu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 (Wanjiashai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具有供水、发电为主,兼有防洪、防凌等

多种综合效益的在建水利枢纽工程。国家“八五”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它位于黄河北干流托克托至龙口河段峡谷内,是黄河中游规划开发的8个梯级中的第一个。枢纽由拦河坝、泄水建筑物、电站厂房、开关站及引蓄取水口等组成。枢纽控制流域面积39.5万平方米,水库总库容8.96亿立方米,电站装有6台18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工程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14亿立方米,分别向内蒙准格尔、山西平朔、大同和太原供水。多年平均年发电量为27.5亿千瓦·时,可提供调峰容量,改善华北电网运行条件。

该工程动态总投资达39.5亿元,1994年11月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8年10月1日正式下闸蓄水,计划2001年竣工。

Huanghe Xiaolangdi shuili shuniu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Xiaolangdi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黄河中游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1994年9月12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0月28日实现截流,计划2001年全部建成。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千米的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处,上距三门峡水库130千米,下距郑州花园口128千米。小浪底水利枢纽坝址控制着流域面积69.4万平方千米,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2.2%,控制着黄河天然径流量的91.2%和黄河输沙量的100%。枢纽由拦河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拦河大坝为粘土斜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154米,坝顶长度1667米,坝顶宽15米,坝底最大宽度864米,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泄洪建筑物包括10座进水塔、3条孔板泄洪洞、3条排沙洞、3条明流泄洪洞、1条溢洪道、1条灌溉洞和3个两级出水消力塘;引水发电系统包括6条发电引水洞、地下厂房、主变室、闸门室和3条尾水隧洞,电站厂房计划安装6台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均布置在左岸。工程动态总投资347亿元,其中引进世界银行等外资贷款约11.09亿美元,内资161.42亿元。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是中国第一个全面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建设管理的大型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黄河水利水电开发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对工程主体建设采用了国际招标,以意大利英

波古罗公司为责任方的黄河承包商中大坝标,以德国旭普林公司为责任方的中意德联营体中泄洪洞群标,以法国杜美兹公司为责任方的小浪底联营体中发电系统标,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个人进行分包或提供劳务。小浪底工程坝址处地质构造复杂,工程开工一年后出现导流洞相继塌方,工程迟误有可能推迟截流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第一、三、四、十四工程局组建的“OTFF”小浪底联营体实行了反承包,扭转了工期迟误的被动局面,为实现按期截流奠定了基础,现在主体工程进展顺利。

工程建成后,可使下游防洪能力由现在的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并可拦蓄凌汛水量20亿立方米,基本解除凌汛威胁,同时充分发挥拦河调沙功能,减少下游泥沙淤积,保证下游河床20年内不再抬升。工程建成可为河南省焦作市和洛阳市增加20亿立方米工业和民用供水。在灌溉方面,可每年为下游增加20亿立方米灌溉用水,提高下游引黄灌区用水率和改善灌溉供水条件。发电方面,前十年平均发电量45.99亿千瓦时,后十年为58.51亿千瓦时,增加了保证电量,对河南和华中电网将起到调峰填谷、保证电网安全运行的作用。

#### Huang Hua

**黄华** (1913~ )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原名王汝梅。河北磁县人。1913年1月25日生。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同年到延安,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翻译,曾为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担任翻译。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科长。1945年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秘书、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中共中央青委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1953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政治谈判代表,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发言人。此后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中国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1971年11月作为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后的联合国

大会,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6年起任外交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为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与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届至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1年后担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等职务。

#### Huang-Huai-Hai Pingyuan zhongdichan diqu zonghe zhili de yanjiu yu kaifa

####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

(comprehensive projects for the less productive regions in Huang-Huai-Hai plain)

黄淮海平原又称华北平原,是中国第二大平原和重要农业区,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是国家“六五”和“七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有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水利科学研究所和冀、鲁、豫、苏、皖5省农科院所属有关所(系)的1141名科技人员参加,治理地域范围32万平方千米,耕地2.7亿亩。针对影响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缺水、缺肥、盐碱为害三大问题,为揭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旱、涝、土壤盐渍化及地下咸水共存和交相为害的根本原因,经长期定位研究,提出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浅层地下微咸水开发利用”以及“降水、地表径流、地下水和土壤水调控”等理论。在该区有代表性的主要中、低产类型上建立了12个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试验区,提出了能适应各类型区、治理旱涝盐碱沙薄的综合配套技术。解决了一些重大关键性技术问题,如节水工程及灌溉技术、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技术、经济施肥技术、缺水和低产田快速实现年亩产“吨粮”技术以及不同类型农田综合防护林体系技术等。通过对黄淮海平原农业自然资源潜力、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区域农村发展战略总体模型,以及若干重大决策性建议。其中,有关“小麦南移、棉花北上”的结构调整,商品粮棉基地选建以及进行大规模农业区域开发三项,已被国家采纳并加以实施。本项研究提出的基本原理、思路和做法,在中国北方广大农区都是适用的,并得到国际有关

学术界的承认,对世界广大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项研究成果业已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 Huang Huoqing

**黄火青** (1901~ ) 1978~

1983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湖北省枣阳县人。1901年5月生。早年在河南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枣阳县从事建党和组织农民运动工作。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知识。1930年回国,到江苏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团政委兼参谋长。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支书记、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5军团14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1933年赴福建与第十九路军谈判。1934年任红1方面军9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因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被撤职。1936年参加西路军,失败后到新疆。1938年起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阿克苏行政长官。1940年到延安后,历任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书记、热河军区政委、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第一书记,天津市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起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75年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0年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检察厅厅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 Huang Jiguang

**黄继光** (1931~1952) 中国人

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原名黄际广。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5月生。1949年11月参加家乡清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3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通信员、代班长,1952年7月25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的营奉命夺回上甘岭西侧的597.9高地,连续攻克数处阵地后,被敌军8挺机枪的火力堵住了前进道路。危急时刻,他挺身而

出，带领两名战友连续摧毁几个火力点后，还有一个火力点在扫射。这时两位战友已牺牲或重伤，自己也7处受伤，手雷掷完。于是，他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孔，用生命保证部队夺取高地。1953年3月30日所在部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中央追授他为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他“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并颁发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将他的名字和英勇事迹镌刻在上甘岭北面五圣山石壁上。他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兴发乡更名为继光乡。

### Huang Ju

**黄菊** (1938~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浙江嘉善人。1938年9月生。1956~1963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毕业后任上海人造板机器厂动力车间、铸钢车间技术员、厂长秘书。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任上海中华冶金厂动力车间技术员、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任上海中华冶金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1980年任上海市石化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1982年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工业工作委员会书记，1984年兼任市委秘书长。198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6年任上海市副市长。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1年任上海市市长。1994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并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Huang Kecheng

**黄克诚** (1902~1986) 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永兴人。1902年10月1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初入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后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营、团政治指导员。1928年初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团、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巩固发展湘鄂

赣苏区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长征初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率部担任前卫，参加了抢渡湘江、攻占娄山关等战斗。到陕北后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红一方面军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师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344旅政委，第二、第四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等职。先后转战晋冀豫、冀鲁豫，参与领导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率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1949年1月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因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期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1977年12月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后任中纪委第二书记。1986年12月28日逝世。

### Huang Yanpei

**黄炎培** (1878~1965)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任之，号楚南，别号抱一。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1878年10月1日生。1902年考中举人。1899年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前身）。后回家乡办学。1903年游学日本。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教育司长，江苏省议会议员，曾先后创建、改建和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1913年任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5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9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并任《新教育》月刊社主持人。1924年5

月与陶行知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1925年任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副会长。1927年任上海申报馆设计部部长。1928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先后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并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民主抗日。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与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选为主席。1944年，在重庆创办《宪政》月刊，宣传民主政治。1945年7月访问延安，发表《延安归来》。1945年12月领导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是民建中央第一、二届主任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5年12月2日逝世。著有《中国商战失败史》、《中国教育史要》、《黄炎培教育日记》等。

### Huang Yongsheng

**黄永胜** (1910~1983)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咸宁人。1910年11月17日生。1927年6月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到井冈山。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获中华苏维埃红星奖章。长征初期，任中央红军第1军团第三团团长。遵义会议后，任前敌司令部第1军团第三团团长，第一纵队第三大队大队长。1936年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四师副师长、右路军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后任热辽军区司令员，冀辽热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45军军长、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等战役和广西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华南分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华南军



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1968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196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1970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故。

huifu gaoxiao zhaosheng kaoshi zhidu

###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revival of examinations for college recruitment)

1977年冬，中国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的通过入学考试统一招收高等学校新生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起实行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其间1966~1969年未招生，1970~1976年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和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实际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入学，造成各条战线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尽快改变教育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严重不适应的状况。1977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受“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束缚，会议结束时，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规定。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首先用主要精力抓科学和教育。8月8日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针对“两个估计”，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同意要求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行之有效的普通高校招生办法的意见，明确表态要下决心从当年起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教育部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经过40多天激烈讨论和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会议推翻了“两个估计”，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录取的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文化考试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被关闭了11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新生于1978年春季入学。由于时间紧迫，准备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1978年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并于同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考试。80年代起，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教育部对高考制度不断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重新确立了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亿万青少年的学习热情，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恢复高考20年来，全国高校共培养出高级专门人才1528.53万人。

Huoju Jihua

### 火炬计划 (Torch Program)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指导性计划。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其基本宗旨是：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发挥中国科技力量的优势，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它的主要内容是①创造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②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③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④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⑤培养实行火炬计划的经营管理人才。其计划项目则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两种，实行国

家和地方两级管理。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申报程序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归口管理各部委的直属单位办理，也可以通过部委科技司或其他相关司办理。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聘请各相关技术领域，归口管理部门和金融方面的专家组成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专家认定委员会，对申请认定项目进行审查，提出认定意见，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及部委科技司的立项基数及项目排序，并参照专家委员会的认定意见，提出当年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立项建议，再由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综合平衡，并经科委领导批准后，由国家科委下达国家级火炬项目年度计划。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资金，实行国家、地方和项目承担单位相匹配的原则，同时积极吸引社会及国外资金。其中，国家匹配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的贷款。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统一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的管理渠道，其经常性的跟踪管理、项目验收工作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负责，承担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和监督项目的实施。

Huo Yingdong

霍英东 (1923~ ) 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番禺人。1923年5月10日生于香港。青年时就读于香港皇仁英文书院。长期在香港经商。曾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有荣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霍英东集团主席，国际足球联合会执行委员，亚洲足球协会副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暨南大学教育和科学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热心兴办和资助文化、体育、教育事业。仅1979~1985年就向内地捐款4亿港元，还捐资1亿港元设立霍英东教育基金。

# J

jixie gongye

## 机械工业 (machinery industry)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械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技术装备和为人民生活现代化提供耐用消费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起步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制造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的机械制造曾有出色的成就。中国的近代机械工业出现于1845年,当时英国人在广州开设了船舶修造厂。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机械厂是清朝政府于1861年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其后又陆续兴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等。但直至1949年,中国的机械工业发展缓慢,屡遭战争破坏,除军火业和造船业制造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外,其他部门以修配为主,只能制造简单的产品。到1949年,全国只有机械工业企业3000多家,产值5.7亿元(折合1990年价,下同),生产了金属切削机床近0.16万台、铁路货车257辆以及11.9万千瓦伏安的变压器和0.74万千瓦的内燃机。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机械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从修配到制造,从仿造简单产品到制造大型精密尖端设备,从制造单机到大型成套设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个门类较齐全、规模较大的制造工业体系。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一) 1949年至1957年

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机械工业进行了改组、改建,以修配为主的局面开始改变。1952年,主要产品产量已恢复到194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机械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共完成投资27.44亿元,修建了一批现代化大型骨干企业,包括苏联援助的项目25个、东德设计的项目2个和捷克专家指导设计的3个。其中著名的有交通运输设备行业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同机车厂,农业机械行业的洛阳拖拉机厂,重型矿山设备行业的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洛阳矿山机器厂、沈阳风动工具厂,电力设备行业的哈尔滨

三大动力设备厂(汽轮机、发电机、锅炉)、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汽轮机、发电机、锅炉)、西安4个高压输变电设备厂(开关整流器、电力电容器、高压电瓷、绝缘材料)、沈阳电线电缆厂,机床行业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武汉重型机床厂、郑州第二砂轮厂,石油化工机械行业的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仪表行业的哈尔滨电表厂、西安仪表厂,机械基础件行业的洛阳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等。新厂的建设,加上一批老厂的扩建改造,使中国机械工业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汽车、拖拉机、电力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冶金矿山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部门,扩大和加强了机床工具、通用机械、机车车辆和船舶等传统制造业部门,从而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机械工业构架。

这一时期沿海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得到了提高,并初步形成了哈尔滨、长春、洛阳、西安、兰州等一批新的机械工业基地。生产技术有很大进步,“一五”期间发展了3000多项新产品,如930立方米高炉、3立方米挖掘机、1.2万千瓦火电设备、1万千瓦水电设备、110千伏级高压输变电设备、主轴直径110毫米镗床、1600×450毫米龙门铣床,以及4吨载货汽车、新型铁路机车等。1957年生产总值143亿元,比1952年增长2.6倍,平均年增29.5%;主要产品产量比1952年分别增长几倍到几十倍。这就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装备,设备自给率达到62%。在此其间,还充实和新建了一批机械专科的大专院校,并从1956年开始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

### (二) 1958年至1976年

1958年国民经济出现“大跃进”局面,各地大办机械工业,以年均58%的高速度增长,虽然促进了机械工业在全国各省市的发展,但由于许多做法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给机械行业带来了众多问题。1961年起,随着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机械工业压缩基建规模,在500多个在建项目中,停缓建400多个。同时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见《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整顿企业管理秩序。至1965年,机械工业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机械工业遭受损失。其间,仍然取得一些成就,从1964年开始的机械工业大规模三线建设,此时仍在继续。建设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机械工业基地,以及湘西、鄂西和西北各有特色的机械工业基地。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三

大动力设备厂(汽轮机、发电机、锅炉)、第二汽车制造厂、贵州和甘肃的低压电器厂、西北和西南的机床工具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设的。通过三级建设,中国机械工业的布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内地机械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职工人数等在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占1/4,增至1975年的占1/3,沿海地区生产的关键产品,在内地都有骨干企业进行生产。

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中国所需装备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在这方面也取得进展。如为第二汽车厂提供了年产10万辆载货汽车的冷加工成套设备,为攀枝花钢铁公司提供了年产15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为国家发展尖端工业提供了九套大型成套设备,为核物理试验和国防工业、航天工业提供了反应堆、加速器、导弹及卫星制造设备等。但总的说,机械工业原来正在缩小的同国外的差距此时又拉大了。

### (三) 1977年至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机械工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进入90年代,国家要求机械工业振兴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5年,机械工业部明确提出了以产品质量翻身、组织结构优化、开发能力提高来启动振兴机械工业的方针。这都为机械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长期以来,机械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国家统一分配产品,而从70年代末期开始,机械产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1979年12月,一机部作出决定,在300多类机械产品中,除汽车等17类以外,都可以自行销售。1980年8月一机部还在长沙举办了全国机械产品交易会。从此,机械工业生产流通体制发生了突破性变化。1983年,又试行新的机械产品计划管理办法,实行指令性计划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归市场调节的产品由企业自行销售。此后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数量不断减少,到90年代初,减为只包括部分发电设备和汽车特殊订货。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机械产品价格逐步放开。首先是扩大企业价格自主权,1980年,允许一部分机械产品试行浮动价格,可向下浮动20%。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扩大企业自主定价范围,至90年代后期,只有小轿车、大型发电设备、大型农机具等少数产品按国家指导价管理。

这一时期,机械行业出现股份制企业并实行股票上市。机械行业是中国企业股

份制试点较早的行业，截止1998年4月底，已有600多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138家公司的股票在境内外上市，占全国上市公司的17.71%。

机械工业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发生变化。1978年，机械工业全部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到1997年，据测算，机械工业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下降为占整个机械工业增加值的80%左右，机械工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机械工业对外贸易获得发展，机械产品出口迅速增长。1997年出口创汇363.8亿美元，比1978年的2.1亿美元增长172倍，年均增长29.4%，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2%提高到1997年的19.9%，机械产品已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支柱产品。利用外资发展迅速，截至1996年，机械工业外商直接投资达1.8万多项，协议外资金额280亿美元，实际使用百亿美元，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8907个，销售额3200多亿美元，占行业的22.2%，出口额170多亿美元，占行业的46.83%。1979~1996年的18年中，机械工业共引进技术5000余项，用汇约40亿美元，这些技术对机械工业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机械工业发展迅速。全国机械工业完成的产值，1998年达1.6万多亿元，比1949年增长2800多倍，平均年增长17.2%，比1978年增长11倍，平均年增长13.9%，均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2年机械工业提前8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管理体制** 1949年以来，机械工业的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变。1952年8月重工业部改组，建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分别主管民用和军用机械工业。1954年4月，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管理地方机械工业。以后为了探索对机械工业的现代管理或加快某一行业的发展，曾多次调整，先后于1956年成立电机部，1959年、1979年两度成立农业机械部，1980年成立仪器仪表总局。以后又几次与相关部门合并，成立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工业部、机械工业委员会、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工业实行的是多部门、多层次管理的体制，国务院许多部委和省、地、市、县、区、乡，都直接管理一部分机械企业。1984年以后，机械工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是由直接管理企业逐步转变为进行宏观行业管理。1998年3月，国务

院进行机构改革，将机械工业部改组为国家机械工业局，所有直属生产企业、经营性公司、研究院所及学校都与局脱离关系，国家机械工业主管部门最终成为行业的宏观管理机构。

**建设成就**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逐步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综合实力相当雄厚的制造业，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日益明显。

50年来，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5000多亿元。1996年已拥有大中型企业6600多个，拥有一批标志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机械工业骨干企业。如重型机械行业的第一、第二等重型机器厂，电工行业的哈尔滨、沈阳、上海、德阳、西安等地的电力设备基地，汽车行业的一汽、东风、上海等汽车制造集团，石化通用机械行业的沈阳、上海等地的风机、水泵厂和兰州的石油化工机器厂等。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掌握了一大批重大装备核心技术。在为电力工业服务方面：火电设备中达到国际90年代水平的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亚临界压力机组已成为电力建设的主力机组（见30万千瓦60万千瓦火力发电设备制造成功），并正在研制更先进的超临界压力机组。水电设备发展了一批世界水平的巨型机组，如转轮直径11.3米、达到世界轴流式机组先进水平的葛洲坝机组，30.25万千瓦、转轮直径8.5米的岩滩混流式机组和正在研制的三峡70万千瓦机组。核电设备中，自行研制生产的秦山机组于1991年成功投入运行。输变电设备中，首次成功研制的锦辽线交流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已于80年代初投入运行。矿山采掘设备方面，已提供了2000万吨级单斗——汽车工艺露天矿成套设备。冶金工业设备方面，80年代以来，在宝钢前后三期工程装备的合作生产中，装备的国产化率不断提高：一期工程为12%，二期为61%，三期已达80%。其中轧钢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冶炼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95%。石油工业设备方面，已能生产适应油气开发向海洋大陆架和沙漠拓展的钻采设备，其中包括总体上达到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钻深达6000米的沙漠电传动钻机。石油化学工业设备方面，已具备了年产45万吨合成氨和乙烯的大型成套设备生产能力。此外，还具备了为人民生活提供现代化耐用消费品的能力。机械工业产品的最高年产量和到1998年底的累计产量：矿山设备分别为87万吨和1000万吨，发电设备分别为1690万千瓦和25000万千瓦，

汽车分别为160万辆和1600多万辆，各型拖拉机分别为210多万台和2400多万台，电冰箱分别为1040多万台和14000万台。综合起来看，基础工业部门80%以上的生产能力是由国内生产的设备提供的。

90年代末，机械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中所占比重已达1/4，1952年一年的产值，在1998年不足5个小时即可完成。在世界机械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50年代初的微不足道，到1998年已占5%左右，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与英国基本持平，约居世界第5位。1997年机械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3831亿元，缴纳税金621亿元，分别在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家财政收入中占5.1%和10.2%。

**技术进步与创新** 50年来，机械工业走过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发展之路，制造技术已达较高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机械工业广泛应用微电子技术，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取得很大进步。

高新技术获得重要进展。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已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等10多家机械工业企业推广应用，实现了企业各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企业竞争力。1994年进行了6000米水下机器人测试，使中国在这一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高档数控系统进入产业化，科学院沈阳计算机所的“蓝天”数控系统SS-8510/8520/8530系统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已开始装备中国高水平的数控机床。微电子技术应用得到推广，尤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普遍应用，不少企业甩掉图板，完全实现了CAD绘图。

一批先进的新型、高效、高精度工艺技术在机械工业中大量应用：铸造方面，已大量采用感应电炉双联熔炼、树脂砂铸造、消失模法铸造等技术。锻造，已掌握了精锻、精冲、冷温挤压等少无切削工艺。焊接，掌握了精密切割、气体保护及埋弧自动焊等先进技术。热处理及表面保护，已掌握或推广了可控气氛热处理、真空热处理、阴极电泳涂装、组合电镀等先进工艺。

Ji Pengfei

**姬鹏飞** (1910~ )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山西临猗人。1926年入西北陆军医学院，毕业后到西北军26军任军医。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参加过长征。1936年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后方卫生部部长。1938年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1940年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1942年后，任三旅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1945年任苏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苏北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50年起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大使。1955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任外交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1977年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79年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5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长期领导外交工作，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和1987年分别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Jinan Huanghe gonglu daqiao

###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 (Jinan highway bridge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座落在济南北郊。大桥全长2023.44米，由主桥和引桥组成。主桥共5孔，主孔跨径为220米，是中国当时已建成的跨径最大的桥梁。引桥共51孔，其中河北岸27孔，河南岸24孔。引桥型式是预应力组合箱梁，这是国内同类桥型中跨径最大的。大桥全宽19.5米，其中行车道宽15米，可以并行4辆汽车。两侧各有宽2米的人行道及宽0.25米的栏杆。载重标准为：汽—20，挂—100，还可通过218吨的大型平板拖车。桥下满足四级航道的要求。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的主桥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斜拉桥。它是近20年来在世界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桥梁结构。这种桥型的优点是：结构合理，跨越能力大，节省材料，便于悬臂施工，养护工作少，噪音小等。这种桥型主要由塔柱、斜缆和主梁三部分构成。济南黄河公路大桥的塔

柱高68.4米，为A型门式立体结构；斜缆11对，呈扇形布置；主梁是双重半封闭箱梁，设纵、横、竖三向预应力。大桥基础为直径1.5米的钻孔灌注桩，桩长80余米。大桥两端共有接线10.75千米，其中北接线长6.19千米，南接线长4.56千米。

大桥自1978年12月15日开工，1982年7月14日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使通过山东省的南北国道在济南畅通无阻，大大提高运输效率。

1995年9月26日至11月12日封桥大修，达到一次性换索成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规范标准，创造了中国大桥维护史上的奇迹。

jihua jingji tizhi

### 计划经济体制 (planned economy)

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由国家通过计划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前实行这种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动员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计划经济能够使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基本上保持平衡，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取得最大限度的宏观经济效益；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科技、文教事业，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其他人才，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根据各地区的资源情况和其他条件，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缩小以至消灭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能够在执行过程中，通过信息反馈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及时发现矛盾和调整，避免比例严重失调，能够实现收入分配和大众必需品分配的均匀化，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和稳步提高。

计划经济传统观念有如下特征：计划体制高度集权，国家各级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支配企业的人、财、物各生产要素和产、供、销各运行环节，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状态；计划体制在许多方面违反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关

系，认为市场调节同计划经济不相容，是冲击计划经济的破坏力量；在计划体制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

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生变化。

jihua shengyu shiye

### 计划生育事业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事业的任务是对人类自身生产进行规划并组织实施，使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从而保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促进人民生活改善和家庭幸福，保障人民的生殖健康。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实行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没有计划生育事业。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自5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经过曲折发展的历程，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 提出计划生育与指导思想反复的阶段(1953~19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改善，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事业开展，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增至1953年的23‰，进入建国以后的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6亿，比1949年增加6000万。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的状况，引起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从1953年起，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节制生育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新概念。当时的节制生育工作由卫生部负责，节制生育的群众活动在国内外一些地区初步展开，有些地区还抓了计划生育试点工作。从1956年起，各地卫生部门在妇联、工会等社会团体协作下，广泛进行避孕知识宣传，开展技术指导。卫生部门还加强了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质量检查。这一时期，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左”倾思想泛滥，人口领域的学术讨论被当做政治问题看待，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被当做“马

尔萨斯主义”批判。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又片面强调人多是好，忽视了人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困难。这就导致了人口理论研究和节制生育工作的停顿。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自然更被搁置下来。总观这一阶段，节制生育工作只在部分地区得到开展，而且很快中断，就全国范围来说，广大群众的生育仍处于自发状态。

#### (二) 重提计划生育与受到干扰破坏的阶段(1962~1970)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从1962年起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总数已接近7亿。人口的急剧膨胀再度引起国家的重视，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年1月，正式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直辖市和多数省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国家还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工作，并在国家预算中增列“计划生育支出”专款。这时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但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除个别地区外，尚未开展计划生育，人口继续迅速增长。针对这一情况，1965~1966年，毛泽东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然而，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工作被迫中断，造成1962年开始的人口出生高峰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197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8亿，人口出生率为33.43%，自然增长率为25.83%。

#### (三) 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阶段(1971~1978)

“文化大革命”前期无政府状态下的人口猛烈增长，使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严重。1971年，周恩来借举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机会，指示专门讨论计划生育问题。会后，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得到国务院批转。从此，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新阶段。1973年7月，国务院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由卫生部代管的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一阶段，政府将

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先后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推行计划生育列入197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法律保障。通过较普遍地在城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增长率进入70年代后，显著下降，1978年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8.25%和12.0%。1978年全国总人口为9.6亿。1970~197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5%。中国人口开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这一阶段，人口理论研究开始恢复。1978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重点讨论了人口控制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人口规律等问题。对群众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加强了，部分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晚婚节育课。

#### (四) 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的阶段(1979~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中国的人口政策概括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根据这一政策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而把实行计划生育提到了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的高度。这一阶段还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81年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还规定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国家民委、卫生部、化工部和医药总局、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和团体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职责分工。地方各级直至乡镇、街道、行政村和城区居委会，都设置相应的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干部。一个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网初步形成。

这一阶段，根据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情况，对照愿生两个孩子的条件作了具体规

定。计划生育部门还实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国家又推行了计划生育方面的社会保险，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平安保险、节育手术平安保险等。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的发展，开展了计划生育的国际交往与合作。在80年代，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1990年全国总人口为11.4亿人，出生率为21.0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39%。1979年至199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6%，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已接近更替水平。

9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国家进一步加强领导，稳定并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了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人口规划，并连续8年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召开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步建立并得到完善；进一步建立并日益健全计划生育网络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队伍，科研和技术队伍以及以计划生育协会为主体的群众工作队伍。在此期间，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思路，促进了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综合治理人口的局面初步形成。凡此种种，不但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生育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且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明显改变。1998年，全国总人口12.48亿(不包括香港)，出生率16.03%，自然增长率降至9.53%。

**取得的成就** 自70年代初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全国城市地区已经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多数地区，正在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按照70年代初生育率水平推算，近30年中全国大约少生了3亿人口。人口的有效控制对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的婚育观念正在向晚婚晚育和少生优生方向转变。1970年早于20周岁初婚的妇女占全部初婚妇女的43.05%，1992年下降为12.9%，其中城市由18.93%下降为2.2%，乡村由54.94%下降为16.1%。197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0.8岁，1992年为22.5岁，提高了1.7岁。生育一孩比例和二孩比例分别由1970年的20.73%和17.06%，上升到1992年的63.1%和27.3%；三孩及以上比例则由62.21%下降为9.6%。家庭规模变小，1982年平均家庭规模为

4.41人,1990年为3.96人。至1992年全国累计共有4216万对育龄夫妇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1992年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达到83.4%,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已成为优先采用的方法。

人民的健康与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20%,80年代末下降到7%以下。同期,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69.05岁,其中男性67.30岁,女性70.65岁,成为世界上平均预期寿命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事业得到发展。目前城乡已形成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服务网络,共有各级妇幼保健机构3000多个,专业人员约15万人。1990年婴儿死亡率已下降到35%,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全国新法接生率已达到94%,其中城市为99%;孕产妇平均死亡率为0.947%;以县为单位计划免疫率和1岁以下儿童“四苗”(卡介苗、白百破、脊灰、麻苗)接种率达到85%。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2.8%下降到1990年的15.9%;1990年中国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大学为1422人,高中为8039人,初中为23344人,小学为37057人,分别比1982年增长131.2%,18.6%,30.5%和5.2%。1995年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

妇女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摆脱了频繁生育带来的各种负担,增加了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地位得到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她们生育、节育的权利得到保障,生殖健康得到关心和照料。

到1995年底,全国乡镇、街道以上计划生育专职工作人员总数达到40.6万人;建立计划生育协会100多万个,拥有会员8300多万人。全国64%的地、州、市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中心,86%的县、市、区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站,77%的乡镇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所。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已延伸到村一级,一些城市街道也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还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地方性法规——计划生育条例,其中规定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优待政策,如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减免他们的入托费、学费、医药费,分配住房、招工时在同等条件下照顾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父母加发一定数额的退休金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与扶贫

开发、普及教育、社区发展、妇幼保健、提高妇女地位、完善社会保障等工作结合起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主要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口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①人口基数大,造成“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的人口态势。“九五”期间平均每年人口净增1300万左右,过多的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据测算,中国人口总量还要增加近4亿,几十年后才能稳定下来。②地区之间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基础较好的地区,生育率已降到较低水平;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工作难度还很大,早婚早育、计划外生育还为数不少。③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很艰巨。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较大,工作稍有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反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使得计划生育管理难度加大。④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工作亟待加强。全国每年出生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人,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每年约有150万至200万新生儿发生窒息,其中约有15万至20万例死亡,存活者中有20万至30万例出现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等疾病和缺陷。边远、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一些地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几倍。近亲或近血缘婚配现象仍然存在,遗传病发病率较高。⑤在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之后,有些党政领导干部产生盲目乐观和松劲情绪,工作力度减弱,经费投入不足。一些地方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工作很不稳定。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 推荐书目

张维庆主编:《中国计划生育概念》,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1998。

#### Ji Dengkui

**纪登奎 (1923~1988)**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武乡县人。1923年3月17日生。1937年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中共鲁西区委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冀鲁豫一地委民运部长、区委党校组织教育科科长,中共鲁山县委书记、许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洛阳

矿山机器厂厂长,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1968年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71年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辞去和免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83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88年7月13日逝世。

#### Ji Zheng

**纪政 (1944~ )** 台湾田径运动员。女。台湾新竹人。1944年3月15日生。就读竹南中学时,因体育成绩特优赴美深造。1966年在曼谷第五届亚运会上获女子跳远金牌。1968年在墨西哥第十九届奥运会上夺得女子80米低栏铜牌、女子100米第七名。1970年是她体育成绩最辉煌的一年,获第六届亚运会100米金牌,创造了女子100米、200米、100码、200码及100米栏等5项世界纪录。因此连续几年被评为“亚洲最佳女运动员”,誉为“飞跃的羚羊”、“黄色的闪电”。1971年被美联社评为全球最佳运动员,并成为《田径》杂志选出的第一位最佳女运动员。1973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立综合理工大学,获体育学士学位,一度在美国任教。1977年回台任台湾“田径协会总干事”,后当选为“立法委员”。1989年任台湾“中国台北奥委会田径协会理事长”。

#### jishu gexin he jishu geming yundong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volution campaign)

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交通企业及其他行业开展的提高管理和技术设备水平的群众性运动。技术革新指生产工具、工艺过程、所用原材料等技术上的局部改进;技术革命指手工操作机械化,机械设备自动化、联动化、电子化等重大改革。运动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实施过程中,1959年形成群众运动,1960年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54年4月15日,“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等7人参观了展览之后,联名向中

华全国总工会提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4月21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指出，“技术革新运动必然成为日益发展的客观趋势。我们必须善于引导这种趋势，使之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结合推广先进经验与合理化建议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保证全面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此后，全国工交战线兴起了技术革新的热潮。提高了工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能力，促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的改进，尤其是对完成“一五”计划起了推动作用。运动中，广大工人、技术人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革新创造出一批行之有效的成果，解决了一些生产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5年内，12个工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平均每年降低6.5%。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农用拖拉机的用量由1952年的2006台，发展到1957年的24629台。

Ji Fang

**季方** (1890~1987) 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正成。江苏海门人。1890年4月22日生。早年就学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192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曾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之役。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军事指挥、教导营营长，第四军教导团参谋长。1928年春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新党。1930年8月，参加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部会干事。1931年邓演达被害后，到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蒋反帝斗争。1933年11月参加“福建事变”，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1934年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被保释。1938年参加“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联络和组织江苏地方武装抗日。1939年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南通专区指挥部指挥，组织和推动长江以北各派军队联合抗日。1940年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1947年任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华东军区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团长。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1951年12月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兼中央副秘书长。1958年起，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代理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是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2月17日逝世。

Ji Xianlin

**季羨林** (1911~ ) 语言学家、作家、翻译家。山东清平（今属临清市）人。1911年8月6日生。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1935年赴德国留学，在格廷根大学学习古代东方语言。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长期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印关系史及吐火罗语的研究、翻译、教学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大唐西域记〉校注》等，部分收入《季羨林文集》。译作有印度著名古典文学作品《沙恭达罗》、《五卷书》、《罗摩衍那》等。散文作品有《天竺心影》、《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

jiadianyan

**加碘盐** (iodated salt) 加入适量的碘酸钾和稳定剂而制成的食盐。加碘盐的含碘量为盐的20~50mg/kg。中国是碘缺乏病（包括甲状腺肿病、克汀病等）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最有效、简便的防治措施是经常食用加碘盐。1957年首先在湖北、陕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山区居民中开展食用加碘盐的试点，获得明显效果。为在全国普遍推广，1965年中国盐

业公司实行食盐加碘不加价的政策。1979年，为了加强推广力度，国务院颁发了《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暂行办法》，到1988年供应加碘盐268.79万吨，病区吃加碘盐的人口有3.75亿人，达到基本控制防治标准的有15个省、1219个县、18417个乡镇。1991年3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儿童首脑会议上承诺：到2000年中国要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为实现这一承诺，国务院于1993年9月召开动员会，1994年颁发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管理条例》和《中国2000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规划纲要》，1995年起在29个省改造或新建107个加碘盐生产企业和75个机械小包装点，形成了818万吨的年产加工能力，总投资9.8亿元，其中由世界银行贷款2700万美元，到1998年基本建成，并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和加强食用加碘盐的宣传，保证全国人民都能食用加碘盐。

Jiakuai Gaige Kaifang he Xiandaihua Jianshe Bufa Duoqu You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Shiye de Gengda Shengli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Accelerate our Pa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s, Openness and Modernization; Struggle for Greater Victories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江泽民1992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精神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拟定的，经十四大审议通过，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随后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报告分四部分：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报告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9个方面。这9个方面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较为科学系统完整的概括，标志着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报告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报告还着重谈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这个报告，集中全党的智慧，深刻总结了14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回答了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展望并规划了改革和建设在今后半个世纪的目标进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

jiating lianchan chengbao zerenzhi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household out-put related contracted system of responsibilities) 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生产任务，并联系劳动者最终的产量或产值计算劳动报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之一。它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其一般做法是，集体组织把土地、山林、水面等承包给农户经营，对农户规定明确的经济责任，按农户实际完成的产量或产值进行计酬和分配。农户对所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权仍归集体。集体按照国家规定，统一管理集体的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并规定一定的公共提留，集体同农民家庭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责、权、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许多具体形式，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其主要形式，此外还包括联产到劳，以及承包经营的专业户、重点户、专业工等。

**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形成了不联产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类型。联产承包责任制经由不联产责任制发展、演变而来。在不联产责任制阶段出现过评分记工、定额包工等具体形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则出现了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具体形式。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则构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内容。

包产到户是在坚持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以生产队为主体，实行统一经营、分户承包的一种责任制。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典型形式，在1956年就已经出现在浙江温州、广东顺德和四川江津等地区，它最先发端于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作为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被创造出来，以解决合作化之后经营管理不善、劳动效率低下、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但是，包产到户从一开始就受到误解，被看做是“分田单干”、“拆合作化的台”、“瓦解集体经济”的事物。在此后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中包产到户均受到批判，其发展共经历了三落四起的历史过程。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才真正得到正确认识并由此得以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第一次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形式。至此，这场延续了25年之久的大辩论终于告一段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了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种称为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它与包产到户的区别在于是按劳动力来承包土地。但实质上包产到户属于同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

进入80年代，又发展出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它与包产到户的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实行统一分配，生产队把各户定产以内的农产品收起来，按产记分，加上非交产工分（如干部补贴等），全队按工分统一分配。而包干到户是按年初的包干合同分配，农户只交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剩下全部归自己，不交承包的全部产品，不搞统一分配。就是这种“交

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最受农民群众欢迎。到1983年底，全国589万个生产队中已有97.8%实行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在中国农村普及的局面。

**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同中国农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切合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深入发展。

**作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革了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各种形式的联产计算报酬责任制的总称。其中，联产和承包是不可分开的两方面，构成了不同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共同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往集体经济在经营管理上过分集中、主观主义，劳动上搞“大呼隆”、效率低下，分配上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问题，为农民群众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在坚持生产资料所有权归集体的同时，把经营权交给农民家庭，从而使经营者的利益同生产的效率、个人的利益同整个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且也使农民家庭的分散经营与集体的统一经营结合起来，使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结合起来。这样，既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普遍规律，又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规律；既能适应传统农业的要求，也能容纳现代化的生产力；既继承了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继续得到发挥，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解决了中国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把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物质技术条件充分利用起来，把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尽量动员起来，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财尽其利，物尽其用，推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迅速向前发展。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核心，它在农村引发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仅如此，农村的改革还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改革，促进了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不是只为



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发挥了、而且将进一步发挥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应把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进一步加强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之一。这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位与作用的再一次充分肯定。

#### 推荐书目

陆学艺著：《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

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北京，1991。

#### jiayong dianqi gongye

**家用电器工业** (electrical household appliances industry) 1949~1978年，中国家用电器工业处于初始阶段，只有电风扇、电熨斗之类的小家电生产，大家电产品如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都尚未生产。80年代以来，通过大量成套、系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大家电迅速发展。1979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家用冰箱为3.18万台，家用洗衣机为1.81万台，房间空调器为0.86万台；1997年分别增加到1044.4万台、1254.49万台和974.01万台。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乡居民年均每百户拥有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为：1985年电冰箱城镇为6.58%、农村为0.06%，1997年分别上升到72.98%和8.49%；同期洗衣机分别由48.27%和1.9%上升到89.12%和21.87%，均已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现有国民收入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同时，家电产品出口也增加很快，1980年为2794万美元，1997年上升到30.96亿美元。家电工业成为轻工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 Jia Qinglin

**贾庆林** (1940~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北泊头人。1940年3月生。1956年进入石家庄工业管理学校学习。195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力系。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设备成套总局技术员、团委副书记。1969~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技术员、产品管理局

负责人。1978年起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83年任山西省太原重型机器厂厂长、党委书记。1985年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1986年兼任省委组织部长，1988年兼任省委党校校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1993年1月，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同年1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94年4月，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6年10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代市长，1997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同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他是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 jiage guanli

**价格管理** (price control)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政府依据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价格行为，进行的组织、指导、管理和监督检查活动。政府设有相应的价格管理部门专司其职。所谓价格行为，不仅存在于商品交换中，也包括各类有偿服务的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制定正确的价格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制定和调整重要商品价格，促进价格结构合理化，发挥价格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确定价格总水平的调控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其实现；加强对价格的监督检查，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历史演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系的变化，价格管理的内容和任务在不断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价格管理的侧重点是稳定市场物价。当时国家采取平衡财政收支、掌握重要物资、调节市场供求、打击资本主义投机势力等办法，遏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平息多次物价暴涨，实现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强，政府对主要商品价格开始实行计划管理，制定统一的计划价格。首先在重工业方面，借鉴苏联经验，实行低价政策，制定较低的计划价格；其次在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方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政府规定购销价格。5年内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年平均上涨率仅为1.7%。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设全国物价

委员会管理价格事务，全面实施计划价格管理体制。县级以上各级政府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分别制定和调整大部分商品价格。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1958年至1965年近8年间只上升10.9%。其中60年代初期，因受自然灾害影响和“大跃进”的冲击，物资匮乏，价格暴涨，1960年至1962年涨幅达到20%以上。为平息这次物价上涨，全国物价委员会一方面对18类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限量供应，保持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平衡财政收支。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物价重新趋于稳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价格管理机构被撤并，价格管理工作遭到削弱。为制止出现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8月20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物价管理，将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实际上就是宣布物价基本冻结。这一举措在当时对遏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避免经济混乱加剧，稳定市场物价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后期，价格管理从瘫痪状态中逐步恢复，国家计委设财贸物价组主管物价工作，开始对少数特别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微调，并逐步建章立制，整顿价格秩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价格管理职能得到充实和加强。1977年国务院设国家物价总局统管全国价格工作。1993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物价管理部分并入国家计委，由计委承担全国价格管理任务。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价格管理仍然属于国家计委的工作范围。

**改革进程** 按照是以政府有计划地调整价格为主，还是以让市场形成价格为主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做法来划分，20年来的价格改革大体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9月)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进行改革，基本做法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阶段(1984年10月至1988年9月)是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基本做法是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第三阶段(1988年10月至1992年1月)是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总形势下进行价格改革，基本做法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巩固成果，逐步完善。第四阶段(1992年1月至今)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

改革,基本做法是进一步放开价格,建立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体制,同时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对价格的调控和管理形式。

**改革成效** 20年来历经各个阶段的探索,价格改革深入发展,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通过分阶段放开价格决策权,打破了过去主要由政府定价的格局,建立起经营者自主决策,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新机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形成价格的比重,1978年仅占3%,1997年上升到95%以上。

在价格结构方面,通过政府对重要商品价格的多次调整,价格体系和比价关系逐步趋向合理。1997年同1978年比较,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4.6倍,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1.95倍,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的价格剪刀差大为缩小。同期采掘工业产品价格、原材料产品价格和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分别上涨7.2倍、4.2倍和2.3倍,工业品内部长期存在的加工业产品价格偏高,原材料和采掘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在对价格的调控管理方面,由过去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为主逐步向运用经济手段间接管理为主转变。通过多年探索,找到了对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如采取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建立重要物资的储备制度、筹集价格调节基金、制定市场价格总水平的调控目标等。1988、1989两年和1993~1995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两度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市场零售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通过政府有力的调控措施,很快被抑制。其中1994年的物价上涨率曾高达21.7%,逐步回落后1997年为0.8%,同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8.8%,国民经济出现“高增产、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对价格违纪违法案件的监督检查,也积累了经验,加大了查处力度。

在价格领域的法制建设方面,1997年末,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并规定于1998年5月起生效。《价格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管理的目标模式。而与《价格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也正在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备。

#### 推荐书目

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五十年》,物价出版社,北京,1998。

jiage tixi gaige

## 价格体系改革 (reforms in the structure of prices)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对价格体系实施的改革。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物价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并长期基本不变,使得价格管理体制僵化,价格关系严重扭曲,价格难以起到其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为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行价格体系改革。

**改革进程** 价格体系改革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4年10月,是价格体系改革的准备阶段。它以完善政府定价为特征,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建材、烟酒、鲜蛋、烟草、糖料、纺织品等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和品质差价,以及重工业内部比价及其与加工工业的比价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同时还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路客货运价格,并把单一的国家定价形式变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自由价格3种价格管理形式,从而初步改善了扭曲的价格结构。第二阶段,1984年至1988年9月,是价格体系改革的初始阶段。在该阶段本着“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指导思想,大部分农产品价格被放开,工业生产资料中全面实行价格“双轨制”,通过下放和放开价格管理权,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企业分级管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多种形式并存的价格形成和价格管理格局。第三阶段,1989年至1991年,是价格体系改革的调整阶段。由于1988年和198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连续超过两位数,通货膨胀明显加剧。为此,国务院于1988年8月发出了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紧急通知,采取了严格控制调价项目、实行保值储蓄等措施。在同年9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又决定适当放慢价格改革步伐,着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控制通货膨胀。通过3年治理整顿,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秩序明显好转,物价涨幅逐年回落,初步形成了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价格调控体系。第四阶段,1992年以来,是价格体系改革的深化阶段。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价格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放开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形成,逐步确立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

体地位的同时,加紧对广义价格主要是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劳动力、房地产、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进程。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价格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建立重要商品和物资的储备制度及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的调控体系;建立重要商品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和价格风险基金制度;建立价格宏观调控体制和调控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观(省市一级)调控体系;改进价格调控的行政手段,如建立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制度,对其实行限价、审价和提价申报制度;建立价格预警系统;加强价格信息工作;加强价格法制建设,使价格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主要成就** 中国的价格体系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上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价格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比价差价关系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价格体系的改善,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较为正确的引导信号,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存在问题** 包括健全以市场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继续推进能源、交通等基础产品价格结构的调整;实现国家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完善价格宏观调控体制和调控机制,增强政府调控价格的能力;做好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接轨;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等内容在内的价格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建立和完善市场价格体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Jianchi Sixiang Jiben Yuanze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

讲话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形势和任务;二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讲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和批判。讲话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

运。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第一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我们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这篇讲话发表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Jian Bozan

**翦伯赞** (1898~1968) 历史学家。维吾尔族。原名象时。湖南桃源人。1898年4月14日生。1916年夏考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夏赴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1926年1月回国，先后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1934年5月~12月赴欧美一些国家考察司法。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2月到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著《中国史纲》第一、二卷。1946年5月至上海，参与组织和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主编《大学》月刊，兼任大夏大学教授。

1947年10月去香港任达德大学教授，香港《文汇报》“史地”副刊主编。1949年2月抵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史学》主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含冤去世。主要著作有论文集《中国史论集》(一、二)、《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一、二、三)、《史料与史学》；专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校订本更名为《先秦史》、《秦汉史》)；主编的著作有《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主编的资料有《戊戌变法》、《义和团》、《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一部多卷本的文献集。共20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5月至1998年5月出版。

《选编》收入的重要文献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开卷，时间下迄1965年12月。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最基本的文件及批转的所属部门的一些重要文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具有代表性的讲话和文章；有关部门负责人代表中共中央和政府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体现中央精神的重要报刊的社论；一部分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非正式文件和讲话记录。所收文献大部分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版本刊印；一部分后来被收入领导人选集、文集的，依据选集、文集版本刊印。书中还做了一些题解和注释。所收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这部大型文献集较系统、全面而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实践和所产生的重要思想，是研究和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经验不可

或缺的基本资料。

jianli guoji zhengzhi jingji xinzhiu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确定的基本的对外政策之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对于现有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地区霸权主义而言。发展中国家一直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提出应当用中印总理在1954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是中国两条主要对外政策中的一条。3月12日，李鹏总理在北京召开的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29届年会上致开幕词时，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等会议上，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都明确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原则立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有权参与解决国际事务；各国有权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以各种形式和借口实行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各国在经济交往和全球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应当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而不应当相互排斥，不应当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或歧视政策，更不应动辄采取制裁的做法；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缩小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也要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增强南南合作。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和国际范围内的活动，在国际活动中维护主权、主持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1999年3月27日，江泽民在瑞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讲话，再次阐述中国

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空前深刻的影响。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他提出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点基本主张:第一,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Jianshe Guimo Yao he Guoli Xiang  
Shiyong

###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Scale of Construction Is to B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陈云 1957年1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发表的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1年完成,在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表现为基建规模偏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趋于紧张。针对这种情况,党内一部分领导人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陈云的这篇讲话总结了“一五”建设,特别是1956年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观点。讲话指出: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20年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积累下来。“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和不稳定的界限。”讲话提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一些制约的方法,主要是:①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②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③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④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⑤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约束力。讲话中还提出,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研究国民

经济的比例关系,这些关系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特别是从暴露的矛盾中去寻找。例如,要研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先行部门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关系,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的关系,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的关系,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等。陈云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学中被简称为“国力论”,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与那种不顾比例关系、急于求成的思想相对立。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jianshe you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theory of building sociali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见邓小平理论。

Jiangge'er Zhuan zhengli chuban

### 《江格尔传》整理出版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Hero Jianger*)

《江格尔传》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史诗通过描写唐苏克·宝木巴地方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雄狮(英雄)和6000名勇士们同侵略家乡的各种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社会生活风貌,塑造了江格尔、洪格尔等英雄形象,并赞美了英雄们的坐骑,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气息,长期口头流传,为蒙古人民所喜爱,在中国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中亚有很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部门开始整理有关江格尔的资料。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调派专人搜集、整理江格尔史诗,在民间史料和口头传唱录音基础上整理出了《江格尔传》,共13章200多万字,当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国家民委成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专人重新整理江格尔史诗,对原《江格尔传》作了大量补充,于1993年6月整理出《江格尔传》新版本,当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有汉、蒙两种文本。汉文全译本共计6册300万字。

Jiang Qing

江青 (1914~1991) 原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女,本名李云鹤。山东省诸城县人。1929年入山东省实验剧院。1931年在青岛大学任图书管理员。1933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不久被释放。1935年后加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联华影片公司,以艺名“蓝萍”在上海从事演出活动。1937年到延安,改名江青,在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因病长期休养。从60年代起,以进行“京剧革命”为名,插手文艺界活动。1965年初到上海,与张春桥一起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组织写出“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4月参加起草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进行诬陷、攻击,会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由她代理组长。从此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操纵者,和林彪集团相勾结,肆意攻击诽谤大批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8月,她和康生共同编造名单,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88人诬蔑打倒。又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组,凭空编造伪证,将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4月江青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成为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活动被挫败后,江青又掩饰和林彪集团勾结犯下的罪行,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以她为首的“四人帮”。1974年借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制造新的动乱。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期间,进行阴谋“组阁”活动,遭到毛泽东多次批评,被迫检查。1975年,极力策划反对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活动。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加猖狂地打击邓小平和一大批领导干部,镇压人民要求纠正“文化大革

命”的活动。9月，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加紧策划阴谋夺权活动。10月6日，受到隔离审查。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将她及其他“四人帮”成员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关押中自杀身亡。

Jiang Qing fangeming jituan

**江青反革命集团** (Jiang Qing's counter-revolution clique) “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江青为首，以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前期还包括陈伯达、康生。又称为“四人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1965年，江青为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撰写文章，他们开始密切联系，形成帮派关系。1966年，在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过程中，陈伯达、康生先后加入帮派。“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任副组长（后为代组长），康、张、姚分别任要职的中央文革小组为基础，排挤打击不听命于他们的其他成员，初步形成了江青集团体系。他们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共同制造了打击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群众的大批冤假错案。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进入中央政治局，权力得到加强。陈伯达由于和江青等人发生矛盾，投靠了林彪集团。

1970年，在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过程中，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等人又攻击周恩来领导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阻挠批判林彪的极左，并自诩为一贯与林彪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掩饰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林彪集团勾结犯下的罪行。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后，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帮派骨干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开始结成以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帮”。1974年，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借古讽今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同年，毛泽东再次提议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江青集团又策划了“组

阁”活动，并大力扶植在地方的帮派骨干。毛泽东对他们的宗派活动有所察觉，多次予以批评，明确地提出党内有一个“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和邓小平与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破产。1975年，江青集团又先后策划了“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活动，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破坏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在11月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江青集团重新控制了较多的权力，更加猛烈地攻击邓小平。但是，当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并没有把主要权力交给江青集团。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江青集团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加快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步伐。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隔离审查。其后，江青集团在上海等地的其他成员也被清理。江青集团覆灭（见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经审理，确认林彪、江青集团是以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后改无期徒刑），姚文元、王洪文有期徒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分别被判刑。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Jiang Qing jituan zuge huodong

**江青集团“组阁”活动** (activities of Jiang Qing's Clique to form a "cabinet") 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控制四届人大人事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工作。江青集团也加紧进行宗派活动，企图在四届人大上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力。1974年，他们利用周恩来病重住院，王洪文主持筹备四届人大工作之机，从各地物色亲信，准备将来派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10月4日，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作新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人选，江青集团对此极为不满。这

时，住在医院的周恩来也频繁找人谈话，商议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四人帮”把周恩来、邓小平等视为实现其“组阁”计划的巨大障碍，江青诬陷说：“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经过多方密谋，他们决定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10月中旬，江青等人制造了风庆轮事件污蔑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邓小平，遭到邓的抵制。10月18日，王洪文飞抵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遭到毛泽东的批评。10月20日，毛泽东正式转告周恩来和已回京的王洪文：总理（指周恩来）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来、王洪文一起管。他再次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1月，江青又向毛泽东提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批评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四人帮”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实际上掌握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主动权，“四人帮”的“组阁”计划已难以实现。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四届人大的各项人选。江青集团的“组阁”计划失败。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确立了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为后来的整顿工作和粉碎“四人帮”提供了重要准备。

Jiang Zemin

**江泽民** (1926~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苏扬州人。1926年8月17日生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过继给六叔江上青（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他的中小学时期是在扬州度过的。194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

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护厂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1955年赴莫斯科大林汽车制造厂（后改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担任过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1971年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的专家组总组长。1973年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1980年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参加领导筹建经济特区工作。8月受国务院委托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1982年后相继担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中共电子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和部长、党组书记。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电子工业，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组织领导了电子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改造。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任职期间，他领导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他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维护了上海的稳定。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之后，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制定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战胜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了贯彻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先后举行了六次全会，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江泽民强调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同时，他要求全党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等许多重要著作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系统的阐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指出必须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

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根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总要求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保障有力，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兵之路，努力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江泽民指出，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正确处理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1995年春节他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促进中国两岸和平统一的八点主张。1997年7月1日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香港出席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面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江泽民强调，中国的对外工作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指导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积极推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9年以来，他先后到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许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双边关系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原则。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江泽民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郑重宣告：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月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报告，总结历史，规划未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蓝图和基本纲领作了全面部署和深刻论述。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Jiang Zemin fangwen Meiguo  
江泽民访问美国 (Jiang Zemin

visits the United States) 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在访问期间, 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全球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同美国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 直接向美国民众阐述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实地考察了美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广泛会见了美国工商界人士, 推动了中美经贸和科技的合作与交流; 深入做美国社会各界的工作, 尤其是民间的友好工作。这次访问取得重要成果, 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 这是继中美3个联合公报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

《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 即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美应该加强合作, 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主旨是不搞对抗, 相互友好, 加强合作。这种关系是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 同时不是排他的。这一目标的确定,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双方还确定了两国元首定期互访和高级官员定期磋商的机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元首直接通信联系, 两国内阁和次内阁官员定期互访, 就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进行磋商。这些机制的建立, 有助于双方加强对话, 增进了了解, 处理分歧, 扩大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访美期间, 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江泽民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严格按照中美3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美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遵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克林顿和美国其他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并按照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原则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双方都表示愿意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美方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还同意加强在经济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经双方共同努力, 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得到启动, 并签署了多项大型经贸合同和合作协议。

江泽民访问美国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美, 也是自1979年邓

小平访美以来,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Jiang Chunyun

**姜春云** (1930~ )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山东莱西人。1930年4月28日生。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1949年在山东省莱西县教师训练班学习, 任县土改宣传工作队队员, 莱西县马仁区姜家泊小学教员、区委文书, 莱西县委文书、秘书。1949年后, 历任山东省莱西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莱阳地委生产合作部秘书科负责人,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科长, 山东省青岛市外贸局秘书科副科长。1960年起任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员、一级巡视员、办公室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先后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后任山东省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负责人、省革委会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秘书组组长, 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领导小组副组长, 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 1983年后, 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 代省长、省长, 省委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199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4年后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Jiang Chunfang

**姜椿芳** (1912~1987) 编辑出版家、翻译家。1912年7月28日生于江苏常州。1928年在哈尔滨学习俄文, 任俄语翻译。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 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先后在《满洲青年》、《满洲红旗》、《大北画刊》、《时代》、《时代日报》等杂志和报纸担任编辑与领导工作。参与发起中苏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 上海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 上海俄文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主任,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顾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会长,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

副会长、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和翻译事业的领导工作, 参与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翻译出版,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筹划出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主要翻译作品有《列宁在十月》、《鲍里斯·戈都诺夫》、《小市民》等。

jiang wenming shu xinfeng huodong  
“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 (movement for civility and new habits)

1997年7月中旬至1998年2月, 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倡导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一次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其主要解决文明言行、环境卫生、服务质量、交通秩序等4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整个活动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中旬到国庆节前后, 主要任务是部署动员, 营造氛围, 组织战役。其工作目标是, 形成声势, 把群众发动起来, 治理4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取得初步成效, 以讲礼貌、讲卫生、整洁有序的新气象迎接中共十五大召开和国庆节的来临, 形成第一个活动高潮。第二阶段从10月至1998年2月春节期间, 主要任务是扩大战果, 延伸范围, 把活动引向深入。其工作目标是, 巩固前一阶段成果, 使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4个突出问题的明显成效, 并将活动的范围向农村延伸, 大力倡导移风易俗, 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 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文明祥和、团结喜庆的气氛中欢度元旦、春节, 形成第二个活动高潮。中央文明委要求, 搞好这次活动必须做到: 充分依靠群众; 精心组织活动; 深入进行教育; 切实加强管理; 健全规章制度。全国各地按照中央文明委的部署,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精心组织, 广泛动员, 迅速行动, 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 对解决文明言行、环境卫生、服务质量、交通秩序等4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使“讲文明, 树新风”的良好风尚逐步形成, 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Jiang Jieshi

**蒋介石** (1887~1975) 国民党总裁, 1952~1975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原名瑞元, 学名志清, 后改名中正, 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

31日生。1907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次年去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1910年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高田野炮兵团第十三联队为士官修补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任沪军团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事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奉孙中山之命回上海主持沪宁讨袁军，因遭袁世凯通缉再去日本。1916年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由沪赴广东随侍孙中山，获得信任，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赴苏俄考察。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广州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并攫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等职。

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同年与宋美龄结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和政府主席。期间对内实行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并不断参加新军阀混战，如“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军事“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抗战期间，多次掀起反共高潮。1938年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总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同年11月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一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一面部署内战。1946年命令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操纵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任“总统”。1949年1月，为情势所迫，宣告“引退”；7月再度出山，任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于1949年12月10日去台湾。1950年3月宣布复任“总统”，至1975年逝世。1953年起宣布实行“土地改革”。在台湾实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镇压民主力量，不断鼓吹“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也曾一度派人回大陆商洽国共再度合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对“台独”势力予以镇压。

1975年4月5日在台北逝世。著作有《西安半月记》、《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

### Jiang Jingguo

**蒋经国** (1909~1988) 1975年至1988年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浙江奉化人。1909年5月7日生。蒋介石长子。早年在家乡、上海、北京等地接受中小学教育。1925年赴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并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助理厂长。1935年与苏联人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1937年回国，历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江西赣南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兼赣县县长、“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编练总监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等。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9年12月去台湾，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任“行政院长”。1975年4月起任国民党中央主席。1978年5月起任“总统”。当政期间，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同年11月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1988年1月13日在台湾病逝。

### Jiang Zhenghua

**蒋正华** (1937~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口学家。浙江杭州人。1937年10月4日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在校任助教、讲师、副主任。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获金质奖章。回国后，历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法国、印度等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专家，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技术顾问，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技术人口学

会理事长。199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当选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主席。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人合作完成的“人口系统定量研究及其应用”和中国模型生命表编制、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修正、人口预测模型和软件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开创性的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1世纪杰出贡献奖。著有《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等。

### Jiang Zhuoying

**蒋筑英** (1939~1982) 科技研究人员，劳动模范。浙江省杭州市人。1939年4月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2年考取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生，后任该所副研究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在导师王大珩指导下，他和同伴们奋战700天，于1965年制造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又精心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建立国内第一个光学传递函数测量实验室。他指导和帮助长春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变焦镜头也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他一心为公，出国进修省吃俭用，给所里买回计算器和光学器材，自己却长期带病工作，1982年6月经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肿瘤、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经抢救无效于6月16日逝世。同年，中国科协 and 全国总工会作出决定，号召全国职工向他学习；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吉林省政府追授他为“特等劳动模范”。1983年，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

### jiangdi guanshui shuilü

**降低关税税率** (lowering of the tariff rates) 自1992年起，中国多项自主进行的对关税税率的降低。是中国关税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税税率是关税政策的具体体现，以及关税职能发挥作用的形式。国家可通过提高或降低关税税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调整本国与他的经济关系。自主降低关税税率，是相对于国际经贸关系中多边或双边协议降税而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1年到1999年，共制定过3部关税税则。改革开放前，中国共进行过19次关税税率的局部调整，调整的范围都很小，税率调整幅度也不大。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外



贸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入发展,从1992年1月1日起,中国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7.3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税率为8.8%;自1996年4月1日起,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由35.9%降低至23%,这次降税涉及4900多个税目(现行税则共6633个税号),降幅达到35%;1997年10月1日,中国再次较大幅度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降幅达26%,关税算术平均税率从23%降至17%。

中国自1992年以来多次自主降低关税,是深化外贸企业改革的需要,是国内价格体系进一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接轨的需要,也是协调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中国降低关税税率主要是从改革与开放的实际进程和客观要求出发,同时也考虑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与国际多边经贸体制接轨的承诺问题。为了建立和完善与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对外经贸体制,中国将继续降低关税税率。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关税水平将降至15%以下,即达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

#### 推荐书目

杨圣明、黄胜强编:《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

#### Jiao Yulu

**焦裕禄** (1922~1964) 中共县委书记,模范干部。山东淄博人。1922年8月16日生。家庭贫寒,青少年时做过挖煤工,被日军拉去当劳工、服苦役。国民党统治时期逃荒、当雇工。1945年回到解放了的家乡,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职。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河南省兰考县任中共县委副书记、书记。兰考县地处豫东,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焦裕禄上任后,首先抓县委干部的思想教育。他带领县委委员们来到灾民聚集的火车站,体察成批灾民逃荒的困苦。他说,灾民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离乡背井去逃荒,这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把他们领上战胜灾害之路,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他组织全县干部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

样工作,抱有愚公移山那样的决心去战胜困难,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在焦裕禄领导下,兰考县委制定出了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决定在三、五年内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为了找到根治“三害”的方法,他从调查研究入手,组织了由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参加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工作。他身体力行,查风口、探流沙,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站在洪水中亲手画出洪水流向图。共查出全县大小风口84个,沙丘1600多个,绘出了排涝泄洪图。在摸透兰考三害情况后,他提出了植树固沙、乔(木)灌(木)结合、以淤盖沟等综合治理措施。

焦裕禄一心想着工作,唯独不考虑自己,身患肝癌,仍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直到1964年5月14日逝世。兰考县人民继承焦裕禄的遗志,努力奋斗,到1965年基本完成了焦裕禄制定的改造自然灾害的蓝图。当年兰考县顶住了一场较大的旱涝灾害。焦裕禄舍己为民,带领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事迹受到广泛赞扬。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介绍了他的事迹,同时还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焦裕禄成为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楷模。

#### Jiao-Zhi Tielu

**焦枝铁路** (Jiaozuo-Zhicheng Railway) 中国中部地区铁路干线。北起河南月山站,南至湖北枝城站,北接太焦铁路、南接枝柳铁路,在焦作、宝丰两地通过新焦、孟宝两条铁路与京广铁路相通,在洛阳和襄樊两地与陇海、汉丹、襄渝铁路相交,全长753千米。全线按I级单线铁路标准设计,1969年初开工,11月进入施工高潮,1970年6月18日即铺轨通车至长江北岸。但因工程质量差,遗留问题多,经整治、改造和增补,延至1975年7月才交付运营,正线铺轨772.28千米。1986年8月增建第二线开工,1996年7月18日济源至襄樊446.7千米建成通车,其中包括济源至关林79千米双线电气化工程。襄樊至枝城第二线1993年8月开工,现仍在施工中。

#### jiaofei fanba douzheng

**剿匪反霸斗争** (suppression of bandits and local tyrants)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国民党残余力量发动的一场斗争。

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时,在各地留置下了大批反动武装和特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地主恶霸、反动党团成员和反动会道门骨干等聚集为匪,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暴乱和颠覆活动,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从1950年1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140个师,约150余万人的兵力,在各地人民政府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本着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展开了清剿斗争。剿匪斗争是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抗美援朝运动等中心工作,特别是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的。镇反的对象,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在政治上打击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恶霸地主等反动势力的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剿匪部队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匪患严重地区,按照先内地后边缘,先富裕地区后贫困地区的顺序,逐地逐片地进行大举进剿、重点清剿,歼灭或击溃大股土匪。之后,各剿匪部队又对中、小股土匪进行清剿,在此基础上,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反复清剿残散土匪。至1953年,全国共歼灭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上的土匪约250万人,剿匪反霸斗争结束。

#### Jiaoyubu Zhishu Gaodeng Xuexiao Zanxing Gongzuo Tiaoli Cao'an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Provisional Working Rules for Higher Education School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raft]”) 196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文件。又称《高教六十条》。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在教育部直属26所高等学校试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所属全日制高等学校也要进行讨论,是否试行,如何试行,中央暂不作规定。文件分总则、10章,共60条。

文件认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主要缺点是:①数量发展过快。②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老教师的团结合作,在很多学校被忽视。③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课程的不适当的大合大改,对生活安排、劳逸结合、设备和仪器的管理、学校的总务工作

等注意不够,使有些高等学校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降低了,特别是一部分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降低了。

文件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必须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学校中党的领导权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系的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文件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具有指导作用。

jiayou geming

**“教育革命”**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阶段的一项目标和任务。

从60年代初期起,毛泽东曾针对教育领域的一些弊病多次提出教育要改革。1966年5月7日,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规定了“教育革命”的任务。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编写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为指导思想,“教育革命”正式展开,涉及教育领域的诸多方面。对领导体制和教师队伍、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的“革命”是其中三个主要内容。

关于领导体制,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革命”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自1968年起,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师生和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农村中小学则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这就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中的主导作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纪要》,宣称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完全否定原有教育方针和教育队伍的错误评价成为“教育革命”的前提。

关于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达4年

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恢复招生的试点,并明令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至3年;课程设置以“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所谓“教育革命”,虽然也触及教育领域过去存在的一些脱离实践弊病,进行了所谓改革,但它所提出的否定原有教育方针和体制的前提和结论,及所采用的“革命”手段,压制了广大教师人员,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贻误了人才培养,降低了教学质量,使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jiayou shiye

**教育事业** (educ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且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发展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10月至1956年 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并逐步过渡为社会主义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文化教育政策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并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创建新教育。这期间先后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公立学校,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各级学校,收回教育主权,又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学校;废除陈旧的课程、教材和训导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对师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师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学制改革;教育向工农开门,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大量增办中小学,使更多劳动人民子女入学;对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颁发各级

学校规程,初步改革学校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这一阶段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1966年 中国进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领域总结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大胆而艰难的探索。1957年2月,为纠正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毛泽东针对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于1958年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发展规划、管理权限下放等问题,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正式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这些都是试图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创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1958~1960年开展的教育革命,有积极的探索,也出现了左的错误。1961~1963年,中央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教育部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三个《条例》,对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巩固发展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各级各类学校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试验,取得了一些成绩。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教育事业遭受巨大的破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17年的教育工作作出了荒谬的“两个基本估计”(见教育路线两个基本估计),进而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四人帮”一伙到处煽动师生“造反”,致使各级教育领导部门陷于瘫痪;教师队伍遭到巨大损失;并造成读书无用的不良社会风气。其间,绝大多数的教职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忍辱负重,对教育、教学、科研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在1972年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提出了“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等一系列正确的主张。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教育要整顿,大学不能只办“七二一”(即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一种形式,要尊重教师的地位,学生要认真学习文化

科学知识,等等。“四人帮”把这些又诬蔑为“右倾翻案风”进行反击,并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指示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迫害致死。“十年动乱”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水平严重下降。从1966~1976年至少为国家少培养100万名合格的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造成各条战线人才断档。普通教育的教育质量大大下降。中等教育的结构单一化,职业技术学校和农业中学一扫而光,普通中学畸形发展。成人业余教育也基本上被搞垮。各级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

1976年10月至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十年动乱。在这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亲自抓教育。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1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成就,为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掀起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揭批查运动,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社会新风尚,重新调动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广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迎来了教育的春天。与此同时,教育战线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恢复了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使学校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的局面,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战线以调整为中心,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序幕:加快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分层次、多种形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高等教育;建立学位制度;大规模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派遣和接受留学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中共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出现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发展教育,社会各界积极捐资助学的新局面。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教育改革纳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并明确了“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

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任务。此后,教育战线以改革教育体制为重点,全面推动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并取得重大的进展。

1992年以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教育决策,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这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使教育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绘制了中国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教育战线克服重重困难,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完善新的教育体制。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教育发展跨世纪目标和改革方向。1998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教领导小组,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10月,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讨论通过了教育部拟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

**国家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下设教育部,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2年11月15日,为适应国家大规模有计划建设需要,加强国家教育事业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高等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4年11月10日,根据国务院通知,扫除文盲委员会并入教育部。1958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1963年10月23日,国务院第137次会议决定教育部分设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1964年3月,两部正式分开办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建议,将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对教育部实行军管,成立军事管制小组。1969年10月,教育部及附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继续进行斗、批、改。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对国务院报告批示,同意成立国务院科教组,7月初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教育部撤销。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教育部。国务院科教组撤销。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即予撤销。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1998年6月25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

**主要成就** 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97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计156万所,在校学生3.11亿人,教育职工1574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190万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数亿劳动者和几千万的专门人才,为21世纪经济建设、科学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础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初中学龄少年入学率只有2.7%,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194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积极发展和改革基础教育。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出现了持续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到1997年,全国共有小学63万所,在校学生1.40亿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9%,在90%以上的人口地区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全国共有初级中学64762所,在校学生5167.79万人;初中学龄少年毛入学率达87.1%,大中城市基本普及了初级中等教育,通过“普九”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1882个,人口覆盖率达到67%以上。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97年,全国有幼儿园18.3万所,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519万人,幼儿园学龄幼儿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正在不断扩大,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有1440所,招生4.6万人,在校人数为34.1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学的残疾儿童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的55.7%。

**职业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逐步发展起来。8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阶段,一个层次齐全、行业配合、结构合理又能与基础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①初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小学毕业后初中阶段的

职业教育。1997年,职业初中达1469所,在校生80.9万人。此外,还有“三加一”、“初二分流”、“初中引进职业教育因素”等多种形式的初等职业教育。初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普及义务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②中等职业教育属于高中阶段的教育。80年代,通过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到1997年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7116所,在校生1089.4万人,分别是1978年的3.6倍和8.6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7.6%提高到1997年的56.2%。近20年来,共培养中级技术人才2632.76万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适用人才。③高等职业教育从80年代初开始起步,目前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全国有职业技术学院27所,高等技术专科学校3所,职业大学73所,举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班的中专学校14所。此外,还有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校也正在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的试点工作。据初步统计,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数可达30余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对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而且成为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成功尝试。

**高等教育** 经过近50年的不断调整和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办学规模和效益有了巨大的发展,层次结构趋向合理,专业结构不断优化,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加强,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形成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据统计,1949年,全国只有高等院校206所,在校学生11.7万人,其中成人高等院校1所,在校学员124人。到1997年,全国已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127所,本、专科在校生已达到589.83万人,在校研究生17.64万人(其中:博士3.99万人,硕士13.64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10.3倍和51.9倍。18~21岁人口大学毛入学率达到7.6%。高等院校的招生和毕业生人数,1949年分别为3.1万人和2.1万人,1997年分别达到206.8万人和176.8万人,分别增长了65.7倍和83.2倍。高等院校教职工,1949年仅有4.6万人,1997年增加到124.6万人,增长26.1倍,其中专任教师由1.6万人增加到50.5万人,增长30.5倍。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在国家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1997年,高等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共1716个,社科活动人员20.6万人,发表学术论文92691篇,出版专著5697部,鉴定成果数1504项;高等学校在理、工、农、医学科领域的科研机构1627个,每年从事科研的教师和研究生14万人。高等学校重大科技成果约占全国总数的比重达33.6%。全国高等学校已建成10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0所高校进入“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并同国际互联网连接,开展各级各类科研课题43万项,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涌现出了一批以北大方正为代表的新型校办企业。

**成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的教育。1950年,政务院发布指示,确定把工农教育列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点,并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成人初等教育、中等文化补习教育和干部文化补习教育,使干部、职工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文化业务水平;又采取了一系列大力开展扫盲教育的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78年以来,成人教育范围扩大,形式多样化,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形成以扫盲为起点、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以科学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为内容,以学历教育为辅助、以终身教育为归宿的全方位的、多功能的全民教育体系。1978年至199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7620多万人,1949年以来累计则达到近两亿人。全国有10个省、直辖市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有2078个县(市、区)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5%以上,城镇职工基本扫除了文盲。1984年以来,中国先后有10个单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中共十四大以来,有1.8亿职工和近3亿农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和文化技术教育,全国参加高等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2000多万。目前,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有1107所,教职工21.46万人,举办函授、夜大学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有829所;各类成人中等学校有46万余所,教职工75.36万人;成人初等学校有19万余所,教职工21.1万人。全国已建立广播电视大学45所,广播电视中专152所,教育电视台(站)700多座。

**教师队伍建设**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接管和改造旧学校的同时,对旧学校的教职员除个别反革命分子外,给予继续留用。并通过教师培训、培养新教师等措施,逐步建立起新型人民教师队伍。“文

化大革命”中,教师队伍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数量不足、青黄不接、待遇较差、素质不高、队伍不稳的严重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树立起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通过采取设立教师节、评选特级教师、奖励优秀教师、建立新工资制度、启动“安居工程”,实施教师职务制度、加强培训和推进教师队伍法制化建设等重大举措,对稳定和扩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已有高等师范学校232所,在校生64.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2所,在校生91.1万人。各级师范院校新教师培养量达到48.3万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已达1141.37万人。负责在职教师培养的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中心有35个,教育学院229所,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教师队伍素质和办学效益明显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逐年提高,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由1992年的83%、56%、49%提高到1997年的93%、84%、60%。全国有特级教师1万余人,高级职务教师17.8万人。生师比高中已达到14.05:1;初中达到17.33:1;小学达到24.5:1。高校专任教师达到40.45万人,其中教授3.59万人,副教授11.4万人,从数量上已基本满足了教育教学需要。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占高校教师总数的26.25%。中国科学院院士的36%,中国工程院院士的29.5%为高校教师。

**教育法制建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初,中国没有一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教育法律。1980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学位条例》。此后,又陆续制定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与此同时,国务院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高等学校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16项教育行政法规;原国家教委发布了200多件教育行政规章,已出台的地方性教育法规有80余件。中国教育从无法到有法,到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法规体系基本框架。

**教育投入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建立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经费筹措体制,使教育经费的整体水平持续增长。到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总计已达2531.73亿元,

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 1862.54 亿元, 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为 73.57%, 比 1978 年的 81.24 亿元增长了近 22 倍。学校办学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到 1997 年, 各级各类学校校舍面积总计达到 126 198 万平方米, 比 1992 年增加 33 128 万平方米, 增长 35.6%; 全国普通高校有固定资产 839.42 亿元, 教学仪器设备值 218.68 亿元, 图书 4.83 亿册。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50 年来, 国家一直重视开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五六十年代, 曾聘请上千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 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文化大革命”10 年, 整个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近 20 年来, 中国与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 向 103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近 30 万名留学人员, 留学回国人员达到 9 万人, 接受来自 152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 25 万多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国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与 118 个国家签订了 119 个政府协议, 并参加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组团考察, 派出访问学者, 聘请外国专家、教师来华任教或短期讲学。

**经验与问题** 回顾 50 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 可以看到, 中国为了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迈向 21 世纪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 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第二,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 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第三, 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保证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 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提供关键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是教育的重要作用。第四,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和依法治教, 遵循教育规律办事, 促进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是教育的成功之路。第五, 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政府的统筹和协调职能, 扩大学校面向社会需要的办学自主权, 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拓宽教育机会, 以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

群众的实际需要, 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第六, 确立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互统一的教育发展观, 正确处理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 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为重点,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稳步发展高等教育; 既要普遍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又要培养一批基础性学科及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人才和各行各业的高级管理人才, 以及大量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第七, 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建立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教育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第八, 坚持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系统创新, 重视现代化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建立和完善辐射全国城乡的学校教育和培训结构的一体化网络; 逐步构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并举、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社会化的、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体系适应时代的变革的根本出路。

要继续开,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还必须解决好教育事业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 如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质量还不够高, 数量供给不足的矛盾; 教育扩展规模、提高质量与政府和社会的投入及支持条件不足的矛盾; 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与现行教育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 现有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教育现代化要求的矛盾等问题。

#### 推荐书目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93, 3 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 1995。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下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1996。

教育部编:《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中国教育二十年》, 福建出版社, 福州, 1998。

#### jiayou tizhi gaige

**教育体制改革** (reforms in education system)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实行的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科技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项重大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3 年 10 月 1 日, 邓小平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题词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反映国际新技术革命和国内现代化建设对教育的要求, 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指导方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经济的运行机制由过去单一的计划机制转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机制, 与此深刻的变化相适应, 中共中央在作出关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 又于 1985 年 5 月 27 日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围绕培养掌握现代化知识和技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目的, 针对旧体制的弊端, 提出: 改革管理体制, 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 坚决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调整教育结构, 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 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是: ①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 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②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③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此外, 还要加强教育立法工作,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办学, 鼓励捐资助学, 等等。《决定》的公布标志着教育体制开始向适应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全面改革与发展。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 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993 年 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指出 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初教育工作的重点。其中强调, 在 90 年代,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 加快步伐, 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 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

1998 年 10 月, 中国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拟订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计划》, 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 建立起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 分工负责, 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同时, 继续深化高校招

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 加快实现后勤社会化。

20年来,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突出的表现是: 通过办学体制的改革, 逐步形成政府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的办学新体制; 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法, 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 经过调整, 中等教育结构趋于合理,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迅速扩大; 高等学校按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形式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的, 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自我封闭、服务面单一的状况有所改变; 通过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缴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 改变了多年来由国家“包学费”、“包分配”的局面, 国家配套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 逐步实行建立人才市场、毕业生自主择业; 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 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教育投入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 推荐书目

郭福昌等主编: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简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3。

jiayou zhanxian de liangge jiben guji  
**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 (two basic assessments of the frontline in education) “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以来教育工作和教育工作者的错误评价。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迟群起草, 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称, 17年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同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上述评价当时被称为“两个基本估计”, 是江青一伙全面否定教育工作, 打击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理论依据。1979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这个《纪要》, 否定了“两个基本估计”。

jieshou diguozhuyi zai Hua wenjiao shiye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人文教事业**  
(taking over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un by the foreign

imperialist powers in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帝国主义仍在中国文教领域中有一定的势力。1950年12月, 中国政府授权教育部, 接收辅仁大学。12月, 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根据《决定》, 1951年1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教育机关的指示》, 随后对这些学校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 或接收改为公立学校; 或改组校董事会与学校行政机构, 撤消美籍人员的董事及行政职务, 美籍教师思想言行反动者予以辞退; 或改为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1月, 教育部制定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学校的原则、办法和接收时的政策及措施, 重申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管理学校。至1951年底, 燕京大学、津沽大学(接受罗马天主教会津贴)、协和医学院等12所院校改为中国自办, 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仍维持私立, 政府给予补贴。与此同时, 各地还妥善地处理接收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514所, 初等学校1500余所, 以及幼儿园、孤儿院、育婴堂、慈幼院等。

jiepi Sirenbang  
**揭批“四人帮”**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Gang of Four”) 1976年10月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 在全国开展的一场群众性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政治运动。

指导方针和部署 1976年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分别隔离审查, 粉碎了“四人帮”集团, 结束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随后, 在全国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运动的指导方针是: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公布出来: 揭露“四人帮”搞修正主义, 搞分裂, 搞阴谋诡计, 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具体步骤是: 首先, 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其次, 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最后, 清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 并从理论上把他们批倒, 批臭; 还要按照中央规定的方针和政策, 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同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 审查“四人帮”的反党罪

行。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宣传口”, 协助中央管理全国宣传工作。11月15日至19日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 规定宣传工作的三个要点: 突出宣传华国锋, 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彻底揭批“四人帮”。

运动进程 揭批“四人帮”经历了3个阶段, 也称为“三大战役”。

第一阶段, 以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之一)为标志, 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大量事实揭露“四人帮”拉帮结派、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在同年12月下旬先后发表社论《“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指出: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 是彻底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大搞修正主义, 大搞分裂, 大搞阴谋诡计, 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 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1977年3月6日, 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和罪恶历史。材料证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 江青是叛徒, 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 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运动的直接目的, 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做准备。同年6、7月间, 两报一刊发表《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等批判文章, 驳斥“四人帮”对《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诬陷。5月至7月, 《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10篇评论员文章, 提出了10个“应该不应该”, 分清政治、思想上的是非。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对“四人帮”做出了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组织处理。

1977年9月23日, 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揭露“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向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理论的深层次发展。在这一阶段, 广大干部群众冲破所谓“极右”实质的限制, 揭批了“四人帮”种种极左的表现, 特别是理论界点名批判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

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冲破了禁区，打开了揭批斗争的新局面。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把‘四人帮’批深批透，非联系批林彪不可”，又冲破了只能揭批1974年以后罪行的禁区。这一阶段比较深入地揭批了“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论、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论、全面专政论、黑线专政论，初步分清了被他们搞乱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和政策是非。

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同时，对“四人帮”帮派体系也做了清查。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明确了清查工作的领导和步骤。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连带清查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还与打击阶级敌人的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结合起来，使揭批“四人帮”运动继续深入。到1978年底，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运动结束 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各地的武斗动乱被制止。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基本上分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思想获得了解放，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始得到恢复。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和各项事业恢复正常，国民经济倒退停滞局面逐步扭转，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势力。到1978年8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的主要负责人中，因同“四人帮”有牵连而被撤职的有9人，约占总数的1/3左右。全国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工作重点的转移准备了条件。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提出，应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同年10月，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指出：很明显，林彪、“四人帮”在工人队伍中所散布的流毒和造成的恶果，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去肃清，整顿队伍的工作还要在每个企业中完全落实。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果断地结

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

Jiefangjun Bao  
**《解放军报》** (*Liberation Army Daily*)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编辑出版。1956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初为隔日刊。1958年1月1日改为每周出6期，1967年8月1日起改为日刊。在沈阳、上海、广州、海口、昆明、成都、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拉萨设有无线电传真或航寄纸型代印点。原在军队和地方内部发行，1987年1月1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日发行量80万份(1988)。

《解放军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同时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军工单位职工，以及接受军事训练的大、中学校学生阅读。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中央军委及各总部的命令、指示；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反映军队现代化建设面貌；宣传先进典型，交流工作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宣传国内外形势，传播国内外军事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反映基层的意见和呼声，以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

《解放军报》第一版主要刊登军队重要新闻、评论和国内、国际重大新闻。第二版刊登有关部队各项工作和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典型报道、经验介绍、工作研究。第三版每周各天轮流刊登“思想战线”“学军事”“国际军事”“党团生活”“长征”（文化副刊）“读者来信”和星期日副刊。第四版刊登国内外时事和体育新闻。各版分别开辟各具特点的专栏，有“集思广益”“家乡喜讯”“怎样当好连长指导员”“军事纵横谈”“老兵新传”“寻根问底”等。还经常编发连队时事政策讲话和各种学习辅导材料。

《解放军报》重视评论写作和先进典型的报道。1978年，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中，发表长篇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过重要推动作用。对部队各时期突出的先进典型人物、先进集体，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身居闹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传统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北京军区某部开展协助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

南京军区某部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等经验，都及时、系统地作了报道，在军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解放军报》还编辑出版中共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民兵》月刊，1984年10月创刊，在全国公开发行，每期发行60万份；出版《新闻与成才》月刊，以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的新闻和其他写作人才。解放军报社设长征出版社，主要汇集出版《解放军报》发表过的文章，也出版有关新闻写作和其他书籍。

Jiefang Sixiang Shishi Qiushi Tuanjie  
Yizhi Xiangqian Kan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mancipating Though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United Forward”)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百业待举。然而，刚刚开始的反拨乱反正，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左”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实现党和国家伟大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邓小平在会上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讲话总结了前两年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任务。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讲话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讲话最后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篇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共十五大报告评价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 jiefang Yijiangshan Dao

**解放一江山岛** (liberation of Yijiangshan Island)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后，国民党军队仍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海军经常以位于浙江沿海大陈岛西北10千米的一江山岛为基地，对大陆进行骚扰。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决心拔掉这个据点，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1955年1月，华东军区以4个步兵营、9个炮兵营，配备各种舰艇137艘，空军和海军航空兵22个大队，于1月18日对一江山岛发起登陆作战。陆海空军密切配合，歼灭守军1000余人。台湾当局强迫岛上残余国民党军和居民2万余人外逃。2月13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渔山、披山诸岛，2月26日又进驻南麂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 jiejue lishi yiliu wenti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resolving of issues left over by history) 最初指粉碎“四人帮”后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和深入，又实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通常又把后者称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方针和原则** 1979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初步确定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老案的方针和原则。会议提出：“文化

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同年8月4日，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明确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

**主要内容** 全面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为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人进行摘帽和改正。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约55万多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5批摘掉约30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78年大约还有右派分子10万人。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9月17日又批发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贯彻这一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978年11月中旬，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1979年2月，中组部和统战部召开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随后，改正工作在全国展开。到1981年上半年基本结束。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同时，给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重新恢复或安排了工作、安置了生活，对一部分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人，重新作了调整。

第二，为地主、富农摘帽子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对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不得歧视。根据这一决定，全国先后有大约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

第三，为1959年以来被错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1979年7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给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错误的人平反、改正。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档案中，有关反右倾斗

争的材料一律销毁。

第四，为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落实政策。1979年11月1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之间正常的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预；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遭到林彪、“四人帮”政治陷害的，一律平反，迫害致死的，应予昭雪。

第五，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1979年11月12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个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是不妥当的，应该把他们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到1981年11月，共有70多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成分。

**意义** 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调整了社会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 推荐书目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北京，1998。

#### Jin Chongji

**金冲及** (1930~ ) 历史学家。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1930年12月13日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团委书记、教学科科长、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1965年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1973年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81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研究员、室务委员、常务副主任，从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和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七、八、九届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专长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的研究。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书。著有《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合著《邓小平传略》、《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



jinrong tizhi gaige

**金融体制改革** (reforms in the finance system)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全部过程和一系列改革措施。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①初步建立了一个金融机构系统。

中国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改革的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恢复国有专业银行和建立中央银行体制。1979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把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作为国家的外汇专业银行,承办外贸和外汇信贷业务。1979年4月,又分设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使其自成系统、独立经营。1983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出了《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使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担了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储蓄和工商信贷业务。1985年11月,国务院又决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全部资金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综合信贷计划内,在业务上受人民银行的管理和领导。至此,中国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央银行体制正式建立起来。此后,中国又于1987年分别恢复和成立了中国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随后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商业银行也相继成立,此外,在许多城市还批准了一些城市信用合作社(90年代中期一些城市信用社改制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另外,中国还批准成立了许多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和保险代理经纪公司。经过20年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②逐步建立了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改革后,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随着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展,逐步发生了变化。货币政策从以行政计划直接调节为主,逐渐变化为以间接调控手段为主。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再贷款、公开市场业务、对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调整存款准备率,以及调整利率水平等间接的经济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1993年中央银行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开始第一次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向各地

金融机构发行融资债券,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迈出的重要一步。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法律方面明确和保障了货币政策的转轨。随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1997年决定取消信贷计划管理并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则从机构和具体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

③建立和发展了各种金融市场。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萌芽和建立始于80年代初期。1981年2月出现了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业务,票据市场开始萌芽;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国债发行市场开始产生;1984年北京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发行市场开始出现;1985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1986年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明文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相互拆借的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之后,中国内地银行间的拆借市场开始出现;1985年上海开始为公开发行的股票提供柜台转让服务,1987年上海和深圳开始筹备成立证券交易所,使中国内地的股票交易市场开始产生;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在7个改革试点城市开放国债流通转让市场的试点,中国国债的交易市场开始建立。199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金融市场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后,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框架已基本形成。

④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1980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中国银行制定了试办外汇调剂工作的办法,到1988年,外汇调剂工作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从1988年3月开始,又将外汇调剂工作引向外汇调剂市场,取消了外汇调剂的限价,从而形成了外汇计划管理和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也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二种价格。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汇率并轨,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开始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同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此后,从1996年4月起,中国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⑤逐步对外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中国自1979年中国即开始了对外开放金融服务的改革。1979年日本输出银行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到1997年12月底,已批准设立外贸金融机构代表处543家,其中营业性机构173家。在营业性机构中,外资银行分行、总行及合资银行共154家。除银行外,已批准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投资银行等多种形式。目前中国有13个沿海开放城市和11个内陆中心城市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服务。在上海浦东,已批准了9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目前,中国对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持积极慎重的态度。随着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今后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将更加开放。

⑥初步建立了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进入90年代以来,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此外,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等也颁布了许多有关金融改革和管理的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对保障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jinrongye

**金融业** (banking) 中国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体,通过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等)的业务活动来实现货币、资金的筹集和融通,以及有关货币流通和信用往来的各种活动的服务性行业。它是中国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

· **历史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民的金融事业已经产生和发展起来。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就于1926年10月在湖南省衡山县成立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并发行了用白布印制的货币。此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主要根据地或解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为了统一和发展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共中央决定于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随即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迁入北平,当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就自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货币发行银行、金融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和国家对金融业的主管机构。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融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可分为4个阶段。

**1949到1952年的初创阶段**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迅速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开始办理人民银行的各项业务。同时接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改造成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外汇专业银行和工矿交通业长期信用专业银行。对私营银钱业则在整顿的基础上，规定其业务范围，够条件的批准继续营业，并于1952年底完成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改造，建立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银行。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保护其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建立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东北当时单设银行），40个省、市、自治区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初步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业的基础。

在建立分支机构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收兑原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和限期收兑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金圆券，迅速统一了全国流通的货币，并采取收存款、建国库灵活调拨资金等措施，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业务，支持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1953到1957年建立金融体制阶段

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1954年6月随着大区行政机构的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的区行也同时予以撤销，所有的分行由总行直接领导。1956年7月，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同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纳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 1958到1965年曲折前进阶段

1958年开始，金融业中出现瞎指挥、浮夸风，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破坏，正常的会计核算秩序被打乱，错帐错款严重；发放贷款“大撒手”，信贷失控，货币发行过多，助长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了纠正上述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1962年3月10日作出的《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信贷管理；不许

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开支；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通过这些措施，使银行的管理体制达到高度集中统一，信贷资金的计划性达到最严格的程度。

**1966到1977年不正常阶段**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金融业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之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业务活动不能正常进行，贷款掌握放任自流，信贷资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机构削弱，人员大量减少，人民银行总行一度并入财政部，各地人民银行机构除少数单设外，其他有的同财政合并，有的被并入财政部门，有的变为财政部门的一个附属机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金融业才恢复正常。197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分出单独设立。

**1978到1987年大发展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融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一阶段，改变了过去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的状况。1979年2月23日，农业银行作为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专业银行，恢复了机构和业务活动；同年3月13日，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出，成为统一集中管理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83年9月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5年11月国务院决定建设银行由财政系列进入金融系统。在这一阶段先后还新恢复和成立了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一批股份制或现代化商业银行。加上原有农村信用社和新成立的城市信用社，就初步建成了金融系统。这一阶段还打破了银行只能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老框框，开始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科技贷款等。又改变了所有资金只能按照国家计划运行的体制，初步放开了金融市场，财政部、国有大银行、少数大企业开始发行债券；个别企业还发行了股票。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也开始试办。

**1988到1993年巩固提高阶段** 由于前一阶段改革进度较快，某些改革措施脱离当时经济基础，致使经济秩序出现了紊乱现象，助长了当时的通货膨胀，对已实行的改革措施不得不进行整顿和巩固，适当放慢改革进度。整顿的主要内容为，停办违规的同业拆借，制止乱用拆借资金扩大基本建设；实行限额管理，在信贷资金运用上进一步强化计划管理，以克服对信贷发放和货币投放掌握太松的现象，治理通货膨胀。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先后开放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使中

国的金融市场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1994到1999年深化改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向深化方向迅速前进，采取了许多突破性措施：①实现了汇价并轨。即把原来存在的国家外汇牌价、外汇调剂价和外汇市场价3种汇价，以市场价为基础合并为一种汇价；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②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3家政策性银行，专办原由几家国有大银行办理的政策性银行业务，既保证了这些政策性业务的顺利进行，又给几家国有大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打好了基础。③中央银行对财政部停止透支，财政赤字由财政部增发债券弥补，切断了直接用发行货币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通道。④为加强信用社的信用地位，按一个城市的信用社合并为一家银行的原则，已先后把大中城市的信用社改组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正改组为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⑤在信贷资金管理方面，取消了限额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基本上脱离指令性计划的约束。⑥为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从1998年11月起，改革中央银行机构，主要为撤销原省、市、自治区分行，设立上海、天津等9个区分行。⑦实行分业管理，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国家已成立证券监管委员会和保险监管委员会，分别监督管理证券业和保险业，从而使人民银行可以集中精力，加强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近年来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已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制止中小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和处理国有大银行不良资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金融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50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现如下：

①已建立起一个比较系统、完善，基本能适应经济发展各种需要的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银行、金融业的主管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政策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4家国有大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11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为银行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等其他金融机构，为金融业务的补充性经营者。到1997年底，整个金融系统（不包括保险业和证券业）共有总分支机构217 728个，职工2 846 991人。

②建立了统一的比较稳定的货币市

场。50年来, 人民银行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 向市场供应了大量货币, 除已回笼部分, 到1998年底尚有11 204.2亿元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基本上满足了社会活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各方面对货币的需求。在50年中, 曾5次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现象。这就是1960到1961年的一次, 1961年全国零售物价较上年上涨16.2%; 1980年一次, 物价上涨6%; 1985年一次, 物价上涨8.8%; 1988到1989年一次, 物价分别上涨18.5%和17.8%; 1993到1996年又一次, 1994年物价上涨21.7%, 1995年上涨14.8%, 1996年上涨6.1%。对这些通货膨胀, 国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 主要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 适当紧缩社会总需求; 支持和促进主要农副产品和其他市场上需要的紧俏商品增加生产, 增加社会总供给; 加强商品市场价格管理等, 都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治理。从总体上看, 通过这些措施为国民经济发展 and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

③大量吸收存款,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放贷款, 支持国民经济迅速发展。50年来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办法吸收了大量存款, 都已或正在通过银行贷款为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这些存款的大部分已被存款人提取, 但尚未被提取的部分即余额, 到1998年底就达95 697.9亿元,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53 407.5亿元。同期各金融机构对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商业企业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放了大量贷款。改革开放以前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改革开放后突破老框框, 除继续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外, 还开始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科技贷款、私营企业贷款等。同样, 这些贷款对经济发展发挥过作用后大部分已经收回, 仅尚未收回部分即余额, 到1998年底就达86 524.1亿元。

此外, 金融机构还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办理转帐结算、货币收付和其他金融服务。早期银行的转帐结算主要为企业商品交换和单位货币收付服务, 随着改革的深化, 现在居民个人也可通过信用卡等工具进行转帐结算。这就保证了国民经济顺畅运转和居民生活的方便进行。

金融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①金融秩序不够好。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现象较多, 个别地方性小金融机构支付发生困难, 国有大银行不良资产多, 且还在增加。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还有待于深化,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还没有建立起自我防止

和消化经营损失的机制, 信用观念很弱。国有企业亏损仍比较严重, 有了亏损, 财务发生困难, 就想拖欠甚至赖掉对国有银行的欠债。同时也反映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还不够强, 法制监管和社会监督也比较弱。解决的办法除中央银行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外, 主要应为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经营机制, 改善经营管理, 彻底消除新发生的亏损。已形成的亏损, 如无法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解决, 则应通过倒闭等形式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 绝不能把这些损失再转嫁给贷款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建立能自身防范和解决经营损失的机制。

②几家国有大银行的改革较慢。把国有大银行改革为社会主义商业银行, 一直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在这方面已采取了不少措施, 例如试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成立监事会; 充实资本金; 试行贷款质量按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划分办法等。然而, 同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改革目标相比, 国有大银行的改革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例如, 在管理体制上政企尚未分开, 国有大银行还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有时还要发放一部分政策性贷款; 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尚未解决; 来自出资人的压力不大, 经营管理改善慢, 业务活力和创新能力不够强等。解决的办法可以试行规范的由国家控股的股份制。这当然要稳步前进, 不能一哄而起。应找一家条件适当的银行, 先试行1年或2年, 经认真总结确认利大于弊, 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再考虑第二家、第三家进行。

Jin Shanbao

**金善宝** (1895~1997) 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主席, 农业科学家。浙江省诸暨县人。1895年7月2日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 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艺系, 1930年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历任浙江大学农艺系副教授,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教授, 江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 南京市副市长, 南京农学院院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先后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 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副会长、名誉会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毕生致力于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 是中国小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率先应用一年三代的作物育种法。1939年选育的“南大2419”冬小麦品种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种植达30年。60年代育成京红7、8、9号和“中7402”春小麦新品种,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主持编写的《中国小麦之种类及其分布》,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所著《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对指导小麦育种有重要意义, 获1986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7年6月26日逝世。

Jin Yong

**金庸** (1924~ ) 香港小说家。本名查良镛, 金庸为笔名。浙江省海宁县人。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自幼受书香门第熏陶, 涉猎的书籍十分广泛。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语系学习, 抗战胜利后转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1946年应聘担任《大公报》翻译, 于1948年被调派赴港, 此后一直居住在香港。后曾任长城、凤凰等电影公司编剧、导演, 香港《明报》社社长、董事长。是新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 以“金庸”为笔名,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在《新晚报》连载一年, 奠定其武侠文学基业。从1955年到1972年间, 共写了12部长篇武侠小说, 按发表次序依次为: 《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以及两部中篇《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 一部短篇《越女剑》。他将自己的14部长篇小说题名的第一个字联成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自《鹿鼎记》之后, 金庸决定就此封笔, 不再写武侠小说。1981年获英国政府O. B. E勋衔。1994年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获香港政府市政局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9年应聘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Jin Yuelin

**金岳霖** (1895~1984) 哲学家, 逻辑学家。字龙荪, 湖南长沙人。1895年7月14日生。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后赴美国留学, 1917年获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学士学位, 1918年和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 1926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 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逻辑研究室主任,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名誉校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四、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 应用逻辑分析方法于哲学研究, 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主要著作有: 《逻辑》、《论道》、《知识论》、《逻辑通俗读本》、《形式逻辑》。《论道》与《知识论》代表其主要哲学体系。1984年10月19日逝世。

jinchang douzheng

**禁娼斗争** (banning of prostitution) 1949~1952年, 为封闭妓院、解放和改造妓女而进行的一场斗争。

1949年11月21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当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计划, 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196家妓院, 没收妓院财产, 收容1200多名妓女。接着, 上海、石家庄、哈尔滨、长春、大连、武汉等地也都以不同方式, 取缔了当地所有妓院, 严禁私娼活动。所有妓女被分期分批地送至教养所, 学习生产技能, 改造思想, 治疗疾病, 并分配工作。

与此同时, 对于把妇女推入火坑的流氓头子、封建恶霸和民愤极大的妓院老板集中审查, 按罪行大小依法惩处, 直至处以死刑; 对一般的妓院老板、领家, 则根据其问题的轻重处以劳动改造或有期徒刑; 对妓院其他人员, 则处以劳动改造或令其改事正当职业; 对嫖客则进行教育、罚款直至收审。娼妓活动从此绝迹。

jindu douzheng

**禁毒斗争** (banning of drugs)

1950~1952年, 在全国开展的大规模禁毒斗争。

1950年2月24日, 政务院发布《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要求各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查禁毒品办法及规定禁绝种毒吸毒的期限, 经政务院批准施行。1952年7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随后, 大规模的禁毒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 仅至1952年11月, 全国共收到群众检举信1312535件, 检举毒犯220806名。同期, 全国共逮捕了情节严重的毒犯82056名, 枪毙了罪大恶极者880名。与此同时, 又大力开展宣传攻势, 并采取强制措施勒令戒毒, 大批吸毒者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悔过, 总数达34万多人。延续一百多年的贩毒吸毒痼疾, 在短短的二年内便被根除。

Jing-Jin-Tang Gaosu Gonglu

**京津塘高速公路** (Beijing-Tianjin-Tanggu Expressway) 中国“七五”至“八五”期间重点交通建设项目, 也是中国第一条经国务院批准并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跨省、市高速公路。

京津塘高速公路位于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华北平原的东北部, 起于北京市四环路朝阳区十八里店, 途经北京市大兴县、通县, 河北省廊坊市, 天津市武清县、北辰区、东丽区, 止于天津市塘沽区河北路。全长142.69千米, 其中北京段35千米, 河北段6.84千米, 天津段100.85千米。设计行车速度120千米/小时; 路基总宽26米, 为双向四车道全部控制出入的收费高速公路。该路于1987年12月23日开工, 1993年9月25日全线建成通车, 工程总投资22.53亿元。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公路建设和管理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Jing-Jiu Tielu

**京九铁路** (Beijing-Kowloon Railway)

贯通中国南北的主要铁路干线。位于京沪、京广两大铁路干线之间, 北起北京西站, 南至香港九龙站, 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 全长2536千米(含天津至霸州联络线75千米, 麻城至武汉联络线80千米), 总投资近400亿元, 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I级铁路干线。

京九铁路在全国铁路路网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北与京山、京通、京原、京包、京秦、大秦、丰沙等铁路相

接, 中与石德、新兖、陇海、阜淮、合九、武九等铁路交会, 南与浙赣、广东梅汕铁路相交。并通过津霸、麻武联络线与京沪、京广两大干线连通。开辟了一条新的纵贯南北的运输大通道, 对缓解南北运输紧张状况, 带动沿线地方资源开发, 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港澳地区稳定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60年代开始酝酿建设京九铁路, 70年代分段开始前期工作, 1973年底九江大桥开工, 1991年9月确定全线建设总体立项。全线主要技术标准: 北京至向塘、天津至霸州一次建成双线; 向塘至龙川为双线施工, 先单线铺轨; 龙川至常平为单线, 预留复线; 常平至深圳增建第三线; 麻城至武汉为单线。设计年输送能力: 北京至阜阳7000万吨, 阜阳至向塘5000万吨, 向塘至龙川近期为2000万吨, 龙川至常平1500万吨, 常平至深圳3600万吨。到发线有效长: 阜阳以北为1050米, 阜阳以南为850米, 预留1050米, 向塘至深圳为850米。最小曲线半径: 北京至阜阳一般地段1000米, 困难地段400米; 阜阳至向塘西一般地段800米, 困难地段600米; 向塘西至深圳一般地段800米, 困难地段400米。阜阳以北限坡4%, 牵引4000吨; 阜阳以南限坡6%, 牵引3500吨。内火炉牵引预留电化条件。

京九铁路所经喀斯特地区分布有多层溶洞, 最大溶洞深18.5米, 还有许多地段路基以膨胀土为主, 施工十分艰巨。工程总量为: 路基土石方2.6亿立方米, 正线、站线铺轨4517千米; 隧道150座, 总延长56.1千米, 其中1500米以上长大隧道8座, 五指山隧道长4455米, 是全线第一长大隧道; 桥梁1110座, 总延长207千米, 其中特大桥65座、84千米, 大中桥735座、92千米。九江大桥长7675米, 最大跨度216米, 是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双层公铁两用大桥, 具有大跨、高强、轻质、美观的特点。黄河大桥长6685米, 共151个墩台, 双线, 是目前黄河上最长的铁路桥, 南北桥墩相距3576米。吉安赣江大桥长2656米, 在大面积、大深度的溶洞层上修建双线特大桥在中国还属首次。卫运河大桥为中国首座斜拉式预应力混凝土桁架桥。

主要重点控制工程14个, 包括: 武穴一孔垄一小池口软土路基, 阜阳、向塘两个枢纽站, 穿越岐岭、雷公山、五指山、矮岭头的4座隧道, 卫运河、黄河、颍河、淮滨淮河、九江长江、吉安赣江、泰和赣江上的7座大桥。共采用新技术

40多项。工程于1993年全面开工，1995年11月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1998年8月31日，向塘至龙川段第二线工程在吉安举行开工典礼。

#### 推荐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新华通讯社编：《走向新世纪——中国铁路建设“八五”重点工程概览》，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6。

## Jingju gaige

### 京剧改革 (reform of Peking Opera)

以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标志的京剧界的一次革新运动。这是继1951年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1958年大力提倡编演现代戏、1960年确定“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以后的一次规模更大、更为深入的京剧改革。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了京剧演现代戏的大讨论。主要探讨京剧艺术怎样从生活出发，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怎样利用传统程式创造新程式，以及既提倡演现代戏，又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问题。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姊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周恩来亲自主持这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剧组全体人员。这是京剧编演现代戏成绩的一次大检阅。

## jingji

**经济 (economy)**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基本内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前30年，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原来的市场经济；后20年，通过改革开放，使计划经济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49~1978年的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了曲折和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经济 近百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残酷掠夺下，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境地，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异常低下。解放前夕，旧中国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1949年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减少80%；煤3243万吨，减少48%；粮食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44.4万吨，减少约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十分困难的，人民政府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塞，民生匮乏，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法币发行额在抗战结束时为1.5亿元，到1947年底已达40万亿元。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质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掠夺。烂摊子要收拾，同时，革命胜利也带来了新的财政经济困难。这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支援战争开支浩大，1949年军费开支高达财政收入的一半；随着全国解放和对文化教育等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人员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急剧增加，1950年达到900万人。加上救济灾民和失业工人，以及恢复交通事业等方面的需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增长很快。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加上旧社会留下来的投机资本趁机兴风作浪，导致市场动荡不安，物价急剧上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曾出现4次全国性的涨价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新的严峻的考验。

**恢复时期的经济** 为了恢复和稳定国民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第一件事是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现在叫国有经济）。到1950年初，接管工矿企业2800多家、金融企业2400多家。官僚资本被没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国家把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不仅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稳定市场，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种种特权。

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在老解放区农民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

的经济措施和行政手段。这包括：加强金融管理，严禁金银外币流通；加强市场管理，严禁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通过国营贸易机构，调集和掌握大量物资，统一调度和适时抛售，以稳定市场和打击投机资本。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措施。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3月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财经工作包括：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财经工作加上其他一些措施，见效很快。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尽管这一年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际开支有所增加，财政收支仍然保持基本平衡。

但这时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尚未根本好转，土地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工商业由于物价稳定后虚假购买力消失所造成的困难没有得到合理的调整，失业的现象还严重存在，社会秩序也不安定。针对此种情况，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为获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创造3个条件：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②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③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七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胜利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年递增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 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定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当时，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国营经济本身的迅速发展，国营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依靠力量。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在稳定物价，“三反”、“五反”，合理调整工商业等工作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形式，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外部和内部的联系，有可能通过这些形式使它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发展起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开始发展，并出现了高级社。为了防止农村向两极分化，认为应当“趁热打铁”，加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就把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看成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1955年下半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原计划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7年就完成了。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也奔腾而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手工业合作化的步子也大大加快。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也实现了合作化。

1955年夏季以后，尽管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在这样短的时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变革，不能不说是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样一来，加上原来的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这一探索的开始。中共八大郑重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会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

1957年上半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1957年秋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 1958年到1978年经济的曲折发展

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结果，使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失调。1960年，粮食、棉花产量跌到1951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许多地方的农民因食物营养不良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经过5年的调整，从1962年到

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在1964年到1965年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经过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63年到1965年间，在城乡基层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进行了10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运动。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当时由于中央主要负责人继续“左”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使拨乱反正受到阻碍。在经济工作中由于对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又重蹈了急于求成的覆辙。在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1985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钢达到6000万吨的高指标，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的设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8年下半年，不断强调加快建设速度，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国外引进规模，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20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20年。

1982年，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新时期的前进方向。同时，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会后，改革开放便全面展开。

**农村改革** 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就是1978年底出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放宽了农村政策，包产到户、“大包干”发展很快。1981年下半年，包产到户、“大包干”遍及全国。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93%，其中绝大多数是包干到户。农民之所以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主要是因为它冲破了由“大呼隆”、“大锅饭”所导致的严重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旧经营管理体制，建立了农民拥有经营管理自主权，体现按劳分配，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1983年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解决了一系列新问题。由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结束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的局面，1984年的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超过8000亿斤。由于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农村非农业经济开始发展，出现了各类个体户、专业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

**国有企业改革** 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曾采用过多种形式向企业放权让利。最早的是利润留成，接着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润包干），但经济责任制也有一些弊病。从1985年开始试行利改税。1984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把增强企业活力确定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的法人”，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但利改税没有达到预期愿望。从1987年5月开始，又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经营

承包责任制。同时，实行了租赁制、利税分流、股份制等新的资产经营方式。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以此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现在，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攻坚的重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目标是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所有制改革**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及时采取支持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中共十二大把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列为促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此期间，个体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公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雇工和私营经济，政府开始是有限制的。但雇工数量很快冲破了限制，到处都出现了经营大户和承包大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因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和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外资企业也有了迅速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彻底打破了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的所有制结构。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适合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

**价格改革** 坚持市场取向，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为核心。价格改革经过两个阶段：1985年以前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1985年以后是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经过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市场机制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形成中已起主导作用。1997年与1978年相比，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97%减少到5.5%，市场价格的

比重由3%上升到93.2%，其余1.3%实行国家指导价。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92.6%减少到16.1%，市场价格的比重由5.6%上升到80.5%，其余3.4%实行国家指导价。在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几乎100%减少到13.6%，市场价格的比重达81.6%，其余4.8%实行国家指导价。

除上述改革以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新的成效，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出台。

**设立经济特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对外开放，是从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立出口特区开始的。1979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1988年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的浦东，开放东北口岸和沿海、沿江、边疆、内陆的一大批城市，很快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由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设立经济特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成就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的实践，加深了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概括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说：“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2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

力, 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近20年来,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并开始为在下个世纪用30年时间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积极工作。

第一, 1997年和1978年相比,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4772亿元, 扩大近20倍,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9倍, 1997年,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7位。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79553亿元, 又比上年增长7.8%。

第二, 中国与世界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相比, 是增长最快的。1979~1997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9.8%, 高于世界平均3.3%的增长速度, 也高于发达国家2.5%的速度。1997年, 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1979~1997年, 中国煤炭和布匹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首位; 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钢、水泥和电视机等8种产品分别由第2位到第16位上升到第1位; 发电量和化肥产量分别由第7位和第4位上升到第2位; 原油产量由第8位升到第5位。

第三, 1997年, 中国对外贸易由1978年的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10位。出口1827亿美元, 比1978年扩大17.7倍, 年均增长16.7%; 进口1424亿美元, 比1978年扩大12.1倍, 年均增长14.5%。1998年末, 外汇储备达1450亿美元, 居世界第2位。

第四, 中国居民生活已接近小康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 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3.4倍, 平均每年增长8.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 提高到1997年的5160元,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2.1倍, 平均每年增长6.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11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46280亿元, 人均储蓄存款由22元增加到3744元。在住房方面, 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从1978年的3.5平方米扩大到1997年的8.8平方米, 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1平方米提高到22.5平方米。目前, 中国消费市场已基本消除了短缺现象, 初步形成“买方市场”, 居民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从多年限量供应转为敞开供应。在生活质量方面, 整体上已由量的满足阶段转向质的提高阶段。

20年的伟大成就, 为今后继续前进, 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jingji guanli tizhi da biandong 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 (major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1969~1972年, 以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文化大革命”前夕, 毛泽东多次主张改变这种状况。1966年3月12日, 他提出: 一切统一于中央, 卡得死死的, 不是好办法。20日, 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 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 只管政策方针, 不管实, 或少管点实。他还批评中央部门收上来的企业多了, 要求连人带马都下放到地方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一部署未能得到贯彻。

1969年, 全国进入“斗批改”运动, 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推动下, 以下放为主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开始实施, 主要内容有精简国家机构、下放企业管理权; 下放财政、物资、基建投资权; 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制度等三方面。

**下放企业、精简机构** 1969年2月, 全国计划会议提出, 企业要以地方管理为主, 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下放给地方, 中央直接抓, 下放后中央、地方双重管理三种形式。经毛泽东亲自决定, 1969年5月1日全国最大的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放辽宁省鞍山市管理。以此为开端, 掀起了全国的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的高潮。1970年3月5日, 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 要求各部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绝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 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等2600多个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经过1970年的下放, 中央各部属企业、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家, 比1965年减少86.5%, 工业产值只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8%。一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的企业被继续下放到地区, 甚至县、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这次经济管理体制的大变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 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一些重点大型企业下放后, 地方无法解决生产计划、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等, 名义上的多头领导, 实际上是无人领导。下放过快、过深又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 使经济效益下降。

**下放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基建投资权力, 实行地方大包干** 1971年3月财政部决定, 从本年起实行财政收支包干。

主要内容是: 定收定支, 收支包干, 保证上缴, 结余留用, 一年一定。包干以后, 虽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但又产生了收入指标难以符合实际, 各地苦乐不均; 地方机动财力不稳定, 各年差异较大; 短收地区不能保证上缴, 仍要国家补贴等矛盾。1972年3月又作了部分改变, 采取各省、市、区分成办法, 不满1亿元的超收归地方, 超过部分上交中央一半。但是仍没有解决问题。1973年华北、东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的办法, 然而在执行中收支脱钩, 又把地方的压力转嫁到中央。这些办法, 基本上是为解决当时下放问题的临时过渡措施, 缺乏整体安排, 因而助长了地方资金分散, 建设项目盲目上马的现象。

1971年4月, 国家计委提出关于物资分配大包干的报告, 当年在华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主要内容: 一是减少国家集中管理的物资种类; 二是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权, 对部分重要物资试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办法。在当时物资紧缺情况下, 层层下放物资分配权实际上难以实行。因物资调配困难, 影响了重点企业和项目的建设, 1973年以后不得不逐步恢复原状。

1970年在拟订“四五”计划的同时, 还提出了基建投资大包干, 即按国家规定的项目, 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 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 结余归地方。基本折旧资金也下放用于地方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革等。这一办法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促进地方小工业又一次大发展。但因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监督, 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

**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体制** 1957年以前, 中国实行与多种经济成分适应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1958年曾加以简化。“文化大革命”中, 私营经济严重萎缩, 集体企业也有一部分被强行转变为国营企业。1970年提出改变国营企业的工商税收制度, 一个行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1972年3月, 国务院颁发新的《工商税条例》, 把多个税种合并为工商税, 简化税目、税率。简化信贷制度的做法是合并机构、下放权力, 改变信贷方式、调低利率等。简化劳动工资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是在1971年将全国临时工中的一半转为固定工; 二是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 取消了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简化税收、信贷制度削弱了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简化工资制度使得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 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场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一些措施违反经济规律,贯彻中又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以及当时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这场大变动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原有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反而又增加了乱与散的新问题。

jingji ruanzhuolu

**经济软着陆** (soft landing of the economy) 对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形象比喻。是对政府干预和实现经济微调的结果的一种别称。

**主要内涵** 经济软着陆具体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轨道的现象。国民经济的运行轨迹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形成扩张与回落相交替的一条曲线。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由于经济机制内在因素的变化(特别是不灵活的经济体制原因),或是客观环境的变化,使其超出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于是强迫经济增长率回落。“硬着陆”和“软着陆”都是宏观调控经济回落的方式。“硬着陆”或“大起大落”的诱因在于经济过度扩张。经济过度的扩张会超越其潜在增长能力,导致资源的极度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扭曲,严重时还造成经济生活的紊乱,破坏各种均衡关系。于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降落。为避免“硬着陆”带来的损失,就需用“软着陆”的办法促使经济降温。但是,有时迫于各种放松的压力,顶不住经济“滑坡”,“软着陆”还没有站稳就强行再起飞,最终会导致大的调整。

**措施与经验** “大起大落”根源在于“大起”,及时削峰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关键和先导。适度从紧,把握调控力度,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政策保证。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 and 预测,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在加强宏观调控中,要自始至终抓住治理通货膨胀和在“降温”中保持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这条主线。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峰顶时的14.2%,逐年平稳地落回到1996年的9.75%左右,每年平均回落1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由1994年的21.75%,回落到1996年的6%左右,

共回落了15.7个百分点。到1996年底,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软着陆”成功的标志是,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软着陆”成功的经验是:①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这是具有中长期战略意义的发展政策,是彻底摆脱传统的“大起大落”方式、使国民经济走上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轨道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②在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这是从世界各国和中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的结论。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要为合理的、适度的价格结构调整留出必要的空间,努力消除超发货币和“超分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促进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医治“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 推荐书目

刘国光、刘树成著:《论“软着陆”》,《人民日报》,北京,1997年1月7日。

樊纲、张曙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1990。

厉以宁著:《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

jingji tequ

**经济特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 经济建设过程中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灵活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地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创立过程**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优势,邓小平对此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经研究,派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共同研究办特区的问题。考察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确认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优越条件。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并决定在4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方式。198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是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

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这4个经济特区。会议还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而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随即相继投入施工开发建设,厦门经济特区也参照广东经济特区的办法开始投入兴建。这4个特区的特点是:①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②特区的经济结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体;③特区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④特区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以供出口外销为主;⑤对于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土地使用费、出入境等方面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对海南岛实行某些特殊政策,给予海南行政区以更大的自主权,促进海南的开放与开发。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提出的议案,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全岛为海南经济特区,确定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建成工、农、贸、旅并举,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外向型综合性经济特区。同时,对海南实行比深圳等4个特区更加开放的政策。这些政策是:①国家授予海南更大的经济自主管理权;②允许外商成片承包开发土地和经营房地产业,允许外商合作开发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鼓励外商投资港口、码头、机场、电站、水利等基础设施并给予优惠;③外商投资方式更加灵活,除兴办“三资”企业外,外商还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进行投资,并通过国际上通行方式进行投资,并允许在海南设立外资银行和建立合资银行;④对人员、货物、资金进出境采取更便利的措施,并可在海口和三亚两个口岸实行“落地签证”。

**性质及意义** 中国的经济特区,既不同于外国的单一出口加工区,也不同于社会制度不同的特别行政区,而是以加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并举的综合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区域。特区给予外商种种优惠政策,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外商到特区办厂投资和从事其他各项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外商投资的方向、规模、地址,必须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要求,并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经济特区的举办,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伟

大创造和实践,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形式。

### jingji tizhi gaige

## 经济体制改革

(reforms in economic system)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制度及方式、方法。最早开始于50年代中期,但当时大多属于单一局部的改革。全面、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截至1999年3月底,大体经历3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1978~1984)。**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安徽省凤阳县的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一些生产队先后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的生产责任制。甘肃、四川、贵州、河南、山东等地的许多社队也相继实行了“双包”生产责任制。在经历了从非法、局部合法到普遍推广的过程之后,“包干到户”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城市的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试点。其主旨是,通过权力的下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1980年将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增加了企业利润留用,逐步扩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经过充分酝酿和选点,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市划出一块地方以及海南全岛试办经济特区,其目的就是引进外资、管理经验和作为改革的试验基地。

**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1)**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改革是其关键。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形成和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首先从价格改革开始。在这一时期的改革实践中,采取价格的双轨制,突破了过去单一的价格制度,且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双轨制”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在双重经济体制并存所形成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化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陷入一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

社会需求增加过快,供求总量失衡,加工工业盲目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形成“瓶颈”;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进展不大,不能适应已经二元化的微观基础,信贷和货币投放大大超出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市场物价涨幅超出了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官倒”盛行和腐败行为乘虚而入。因此,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特殊措施。经过3年的治理整顿,于1991年经济过热与需求膨胀的趋势迅速扭转,物价上升的势头逐步得到控制,市场商品由供不应求变成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经济秩序有所好转。

**迈向新阶段(1992年开始)。**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制度创新。确定这一目标的主要依据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规定了判断改革是非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邓小平的谈话鼓舞下,全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高潮。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一精神,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从1994年起,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要在2000年前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目标。

经过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新的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其主要表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根本转变;生产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基本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实现了从单纯的一大二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转变;在经济调控方式上,实现了从政府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方式的基本转变;分配体制上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经济秩序和法制建设方面,初步建立起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

系框架;在对外关系上,实现了从单一、局部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根本转变。

### jingji xiaoyi zongshenxing huodong

## 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ver real economic benefits) 促进中国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的全国性大型调研宣传活动。1993年4月,由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新闻机构共同发起。旨在通过新闻记者深入企业,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对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进行深度报道。通过对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成功经验和妨碍经济效益的实际问题的报道,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经济效益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由薄一波担任,主任由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担任。参加这项活动的各大新闻机构都派出专业记者,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式的采访,就带有某些共性的问题写出综合性稿件,由新闻媒体在显著版面或重要时段编发。人民日报社记者采写的《老字号缘何不如新字号》,为“经济效益纵深行”的开篇之作。关于经济效益问题的深度报道自此开始陆续刊发,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企业和社会的广泛重视。

集中力量对中国的经济效益进行广泛深入报道的“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在每年的4~6月开展。这一活动为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国策提供了舆论和理论上的准备。这项活动与质量万里行活动相互呼应,交叉进行,分别从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两个方面,抓住了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要害问题,为企业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 Jing Shuping

经叔平 (1918~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浙江上虞人。1918年7月17日生。193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上海市新中实业厂副经理。1942~1956年任上海华明烟厂副经理、经理,上海华成烟厂经理,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常委、副主席。1979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部总经理、公司副总

理, 国家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1993年后, 任全国工商联主席,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证券交易研究设计中心理事长,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政协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Jingjiang fenhong gongcheng

**荆江分洪工程** (Jingjiang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长江的荆江段修筑的防洪工程。

历史上, 长江平均 10 年就有一次较大的水灾, 湖北枝城至城陵矶的荆江段又是长江水灾最严重的地区。为分蓄荆江河段部分超额洪水, 保障荆江大堤安全, 提高荆江两岸平原防洪标准, 于 1952 年 4 月动工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整个工程包括: 培修加固长江北岸原有的 182 千米荆江大堤, 确定长江南岸 921 平方千米的可容 62 亿立方米洪水的低洼地为分洪区, 修建 54 孔、长 1054 米的进洪闸和 32 孔、长 336 米的节制闸。1953 年 4 月 25 日全部建成。这项工程在 1954 年特大洪水及此后十几次大水中, 对保障长江中下游安全起了巨大作用。

### jingjian jigou

**精简机构**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of government) 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的框架, 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在法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确立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从 1949~1998 年, 中国政府进行多次机构改革, 大的调整有 7 次。

1952~1953 年的第一次机构调整是增加机构, 以后历次机构调整都是为了精简机构, 但都出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反弹现象。1980 年 8 月 18 日, 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提出要解决机构重叠、兼职副职过多、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等问题。此后, 中国几次精简机构在改革中实现。1982 年 2 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 月, 国务院作出相应规定。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要精简

机构。这次机构改革主要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抓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 实现政企分开, 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 使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 从审批、拨款、调配转为规划、协调、监督和管理, 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 从以经济生活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同时, 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翌年开始实行。

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后进一步精简机构。中共十四大以后, 开始试行招考、试用、考核公务员制度。中共十五大以后, 1998 年 3 月 10 日,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目的是: 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 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是: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企分开;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权责一致的原则, 调整政府组织结构, 实行精兵简政;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 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 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 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改革的重点是: 调整和撤销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 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

改革的成果是: 1998 年国务院机构通过改革, 组成部门从 40 个减少到 29 个, 部门内设机构精简 1/4, 移交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 200 多项, 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定岗定编, 精简分流或再培训。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一半, 机关建设和工作作风出现了新的气象。省级和省以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将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积极稳妥地推进。

### jingjian zhigong he xiafang chengshi renkou

**精减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 (reduction of staff and sending urban population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工农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发动后, 农村劳动力迅速地向工业生产和城市转移, 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丰产不能丰收的局面。于是在 1959 年上半年, 中共中央提出减少职工 1000 万人, 充实农业

第一线, 但实际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从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后才开始的。陈云在会上就精减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规定了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 本年度减少 1000 万。此后,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开展了精减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的工作, 精减的主要对象是 1958 年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至 1961 年底, 共减少城镇人口 1000 多万, 其中精减职工 873 万人。

1962 年 2 月 23 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针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困难提出了六项主要解决措施。他认为: 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 应在 1961 年已压缩城市人口 1000 万的基础上, 继续压缩。5 月,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 进一步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当时必须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之一, 决定在 1962 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 1000 万人, 并提出了精减的方案, 规定了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 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到 1962 年底, 又减少城镇人口 1048 万人, 其中精减职工 850 万人。1963 年, 又继续进行精减, 7 月, 中共中央决定基本结束精减工作。

精减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 有力地加强了农业生产, 大量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 减轻了城市的压力和国家的财政负担, 对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 Jiu San Xueshe

#### 九三学社 (Jiu San Society)

由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界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具有政治联盟特点, 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九三学社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 由一批爱国忧时的学术界人士在重庆成立。1945 年 9 月 3 日, 为纪念抗战胜利, 把这个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 年 5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九三学社。解放战争期间, 九三学社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地, 积极参加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1949 年 1 月发表宣言, 响应中共 8 项和平主张, 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 月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政治纲领。“文化大革命”前，九三学社团结、推动社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科学文教战线出成果、出人才做出了成绩。1952年九三学社召开第二届全国工作扩大会议；1956、1958年，分别召开第一、二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九三学社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九三学社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并于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第三、四、五、六、七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协助中共各级政府落实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开门办学、提供科技咨询服务、参政议政、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九三学社历届中央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

Jiushi Niandai Zhongguo Nongye Fazhan Gangyao

### 《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1990s”)

1993年8月20日颁发的国务院文件。文件根据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加强了对农业宏观上的指导和协调，明确了90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农业上新台阶的可行措施。主要内容分10个部分：①90年代农业发展目标 and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是全面发展农业经济、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农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确保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指导思想是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各地实际出发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农业基础，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农业再上新台阶，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②90年代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发挥各地自然资源和经济技术的优势；鼓励扶持发展粮食生产；调整经济作物布局；加强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生产。③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土地和各种农业资源的单位产出率。④加强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建设。⑤加强农业综合开发。⑥大力发展乡镇企

业。发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90年代在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要把乡镇企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要继续贯彻“积极扶持，统筹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⑦加强农业发展支撑体系建设。⑧广辟农业投资渠道，增加农业建设资金。⑨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⑩加强领导，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jiu yi san shijian

**九一三事件** (September 13 Incident)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少数主要成员叛国投敌事件。又称“林彪事件”。

1970年8月，林彪集团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分裂活动，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陈伯达被审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被迫作检讨。此后，林彪集团开始策划改变阴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一些心腹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提出了种种谋害毛泽东的方案。8月15日，毛泽东出发南巡，沿途揭露了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见毛泽东南巡）。9月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得到密报，知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意识到毛泽东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十分惊恐，决定实施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的计划。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林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在北京的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分别向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林彪死党江腾蛟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的手令，部署谋害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同时，林彪、叶群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9月12日傍晚，毛泽东突然提前回到北京，打乱了林彪集团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使他们陷入慌乱之中。林彪集团紧急部署南逃，并私调256号专机到山海关机场。这时，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发现林立果、叶群的异常情况，当即报告中央。晚10时半，周恩来在电话中追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命令该机立即返京。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向，感到南

逃广州已不可能，决定北逃，企图飞往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遂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驱车驶往山海关机场。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等人乘坐256号飞机，在机组人员不齐和未加满油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周恩来通过无线电向飞机呼叫，要林彪等回来，没有得到回答。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凌晨1时50分，256号飞机飞越中蒙边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东北60千米处，油料将尽，强行迫降，机身擦地而爆炸起火，机上8人全部摔出机舱焚烧致死。

9月13日3时，周宇驰等劫持一架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共中央迅速派出飞机拦劫，该机在怀柔县境内降落。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自杀身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李伟信被活捉。其他林彪集团骨干分子也先后被捕。9月18日，中共中央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10月3日，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随后，中共中央将林彪事件逐级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

“九一三”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野心急剧膨胀而产生的恶果，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juanxian feiji dapao

**捐献飞机大炮** (donation of fighter planes and cannons) 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一项活动。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展捐献武器的号召。6月7日，又颁布了捐献武器具体办法的通知，强调这一工作必须在充分深入的宣传和细密的组织，以及在生产中增加收入并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为认捐方便，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的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

捐献武器活动开始后，很多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一工作列入爱国公约，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施工工程、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甘肃省玉门油田的职工，将8天内的增产所得捐

献一架“石油工人”号战斗机；豫剧著名女演员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在一些省市义演170多场，用收入捐献一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四川省简阳县棉农们发起1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至此，捐献武器活动胜利结束。

junshi

**军事** (military affair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事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巩固国家政权、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沿革**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共划分为6个大军区：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中南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50年4、5月间，相继撤销野战军番号，所属部队并入所在军区序列。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了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1950年和1952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精简整编，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1949年至1966年，相继成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领导机关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第二炮兵、基建工程兵等领导机关及部队，初步建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1951年以后，相继建立了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各级种类院校120多所，培养全军各级指挥员和各种专业人员，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

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任务，讨论了加强中共领导，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1954年9月，重新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国务院设国防部，彭德怀任部长。1955年起，人民解放军

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颁发勋章奖章。同年9月，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对全军干部均授予大致与军职相应的军衔。1955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6个大军区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尔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内蒙古军区和西藏军区改为省军区，新疆军区改为乌鲁木齐军区）。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精简部队，将员额减少三分之一，并将原来5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1958年、1959年又先后成立了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委员会。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初具规模。

1959年9月，林彪任国防部长。同年，组成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副主席。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林彪主管军队工作期间，推行了一套“左”的做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军队的建设。但是，军队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广大指战员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和“左”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及军队建设中取得一定的成就。1971年林彪外逃后，叶剑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8月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华国锋任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任副主席。1978年3月，徐向前任国防部长。1981年3月，耿飊任国防部长。同年6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1月，张爱萍任国防部长。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1988年4月，秦基伟任国防部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军事思想，重新确立、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提出一系列军队建设战略决策，发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清除“左”的思想影响，领导军队建

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移，裁军100万，改革和整编军队体制编制，裁减合并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撤销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11个大军区调整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个大军区，重新实行军衔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些措施使军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迈上精兵、质量建军之路。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刘华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2年10月，张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3年3月，迟浩田任国防部长。1995年9月，张万年、迟浩田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确定了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继续深化军队改革，精简整编，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了新的进步。

**建设成就** 50年来，军事工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引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的坚强柱石。

**编制体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根据国防建设和作战任务的需要，军队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重新划分了战区，完善了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实行了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军队发展的需要，还多次进行了精简整编，统一了全军的编制体制。主要包括：第一步，在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第二步，进一步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按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的原则，控制规模，理顺关系，改革调整编制体制，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兵员编制，组建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加强新的技术部队和后备力量建设，使军队的编制体制更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第三步，按照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进一步深化编制体制改革，减少数

量,优化结构,对部队编成、领导指挥体制、装备管理体制、后勤保障体制、院校体制等方面,进行较大调整改革,使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合理,向“精兵、合成、高效”的现代化编制体制迈出了新的步伐。

**武器装备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从敌人手里缴获而来,品种繁杂,性能落后。50年代,得到苏联大力支援,进口一批武器装备,改造和新建一批军工企业,武器装备进入仿制阶段,陆续装备了自己生产的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舰艇、雷达等武器装备以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成为增强国防力量的一个良好开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时,受阅部队展示了大量中国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6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中止合同,撤走专家,给国防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国防工业进入自行研制阶段。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导下,先后研制出一批新式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车、飞机、舰艇及相应配套的装备器材,逐步装备部队。特别是原子弹、导弹核武器、氢弹的实验成功,填补了战略武器的重要空白。“文化大革命”使国防工业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但是在加强战备和“三线建设”中,仍然研制成功核潜艇等新的武器装备,建成一批内地国防工业和科技新基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防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军队武器装备继续得到大幅度改善和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一大批新型先进的火炮、坦克、步兵战车、飞机、舰艇、各种类型的导弹和一些新型电子、通信、工程、防化等装备器材,陆续装备部队。部队的火力、突击力、机动性、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以至战略核反击能力等,都有很大加强。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拥有中、远程导弹武器,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具有了战略核反应能力。同时,掌握了卫星发射和回收技术。1984年4月,成功发射了通信卫星。1985年,用机动发射装置发射了地对地固体战略导弹。1988年,在南海海域成功地进行了核潜艇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中国在核武器、导弹、卫星、运载工具方面,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和空间发射技术国家之一。海湾战争之后,国防科研和武器生产部门集中力量,研制和生产了一批性能先进、质量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高技术下作战能力显著增强。目前,从轻武器到重武器,从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数量到质量均有很大提高。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增

大,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达到新的水平。同时,还积极开展军事装备、物资的援外工作,支援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对霸权主义斗争。50年来,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在自力更生、科研先行的方针指导下,吸取外国先进技术,跟踪世界最新技术,突出重点,注重效能,搞好配套,提高国防科研和生产能力,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

**军事院校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军事干部的培养由主要靠战争实践锻炼,逐步改为主要通过院校培训,中央军委着手筹建了各种正规军事院校,抽调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将领去办院校,各级种类院校蓬勃发展起来。先后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一大批陆、海、空指挥、政治、后勤专业技术院校。到50年代末,全军院校已发展到160多所,形成为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院校遭到严重破坏,被大批解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办好院校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召开全军院校会议,进一步规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院校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军队院校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地位得到明显提高,担负起训练干部、选拔干部和推荐干部的职能。在学制和招收制度改革方面,实行了技术职称制度的学位制度。目前,全军院校共有博士授予单位21个,博士授权点138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14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54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点523个,适应了培育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方面,建立教员培训体系,培养造就跨世纪人才的学科带头人群体,使教员层次和素质发生显著变化。在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突出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高科技军事知识与技术,增加科学文化,扩大知识领域,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加现代化,广泛开展电化教学和模拟训练,提高了教学质量。全军院校成为培养各级各类干部、输送建军骨干的重要基地,为部队和机关培训干部累计达100万余人。

**军事训练** 50年代起,随着各军兵种的相继建立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事训练成为当时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央军委提出“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掌握现代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学会组织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颁发训练大纲,统一训练思想,全军开始正规统一的训练。1955年冬,在辽东地区组织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演习,检验了训练成

果,提高了干部组织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力地推动全军训练的蓬勃发展。几年内,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60年代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新的战略战术和新的技术,成为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1964年,在叶剑英倡导下,全军展开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同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军事训练遭到破坏,毛泽东曾批评林彪说:军队只搞文不搞武。1972年,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恢复正规军事训练工作,全军开办了900个教导队,采用师长当连长、团长当排长、营长当战士的训练方法,干部训练和管理教育能力得到普遍提高。1973年,专门组织了打敌坦克集群实兵演习,推动了全军打坦克的普及训练。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根据现代战争要求,针对军队的现状,重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方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工作。80年代,根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的需要,实行训练改革,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训练的指导思想。针对现代战争特点,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为主要内容,增强训练的针对性,进一步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颁发战役学和各种战斗条令,借鉴国外局部战争经验,探讨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战术,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加强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训练,多次组织不同规模、不同课题现代条件下近似实战的陆上、海上和空中演习以及核反击作战演习。1981年秋在华北地区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显示了合成军队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观看演习,检阅部队,大大促进了军事训练战略地位的落实。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表明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有了新的突破。90年代,全军军事训练围绕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采用先进的训练手段,开展对抗演练,贴近实战训练精兵,坚持战训一致的练兵原则,突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法研究和训练。1996年3月,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在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获得圆满成功。参加的兵种之多、规模之大、武器装备之先进、发射

实弹之多、演练难度之大、协同之复杂，都是近年来少有的，展示了军队良好的军事素质、指挥技能和高科技装备的威力。反映诸兵种联合整体作战能力，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电子对抗、后勤保障和野战生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军事素质和防卫能力达到新的水平。

**正规化建设** 从50年代起，全军开始采用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干部薪金制等重大制度，颁发各种条令条例，开展正规训练，初步走上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正规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确立用法制化带动和促进正规化的新思路，为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大大加快了军队法规制度建设。20年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军队法律有20多个，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布的单行法律有40多个，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制定的军事规章有1000多件，成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依据。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使国防和军队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战斗作风和组织纪律性明显加强，军队的各项工作、行动高度统一，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全军正规化建设出现了新气象。

**武装警察部队建设**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随即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各地（市、州、盟）公安处（局）、各县（市、旗）公安局的武警总队、支队、大队也相继成立。其职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安全和建设，保卫重要领导机关和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武警部队执行兵役法，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其编制由公安部武警总部统一管理。武警部队的建立，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主要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强民兵建设，完善预备役制度，建立战时快速动员体制。民兵和预备役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后备力量。民兵制度是为长期革命战争实践证明了的的一种优良的军事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民兵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一系列

指示，建立了民兵领导机构，配备人民武装干部，颁发民兵条例，统一民兵组织，确定民兵的任务，全国从农村到城市，普遍地建立民兵组织，为一旦遭受外敌侵略，实现全民皆兵做了准备。“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兵建设虽然一度受到干扰，但由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民兵工作的方针、政策，深深扎根广大干部和民兵之中，仍然取得一定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总结了民兵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有计划地调整民兵组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民兵组织得到落实；同时，改革民兵训练，减少训练人数，缩短训练时间，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整顿民兵武器装备，使武器的配备和布局更加合理，装备管理得到加强。

1984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同时，还对公民的服兵役义务、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士兵服兵役期限、预备役人员和学生的军事训练等作出明确规定。为提高战时快速动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兵役法关于平时做好战时动员准备的规定，决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预备役部队。1986年8月，军委三总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预备役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师、团级单位授予番号、军旗，预备役师、团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按照现役部队编制，以少数军人为骨干，以预备役军官和士兵为基础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师、团和空军、海军部分专业技术兵种在内的国防新旅，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1991年2月，总参谋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训练大纲》，预备役部队的教育训练走上正规化道路。1995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进一步完善中国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和军队干部制度。1996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为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进一步理顺预备役军官管理工作。平战结合的预备役部队，成为适合中国国情军情，加强国防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

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广大民兵积极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充分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布

下天罗地网，保卫海陆边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得力助手。60年代后，参加中印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等作战的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护路队，出色地完成了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的任务。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支骨干力量，积极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进行抢险救灾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建设文明村镇等。在1998年的特大抗洪救灾中，500多万民兵和预备役官兵，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之中，成为各地抗洪抢险的突击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军事斗争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在统一祖国大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国家安全、支援友邻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统一祖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祖国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但盘踞在西南地区和中南、西北少数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仍在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对其展开了战略追击和围歼战。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8月，先后解放云南、四川、西康、广东、广西、福建、新疆等省区和海南、舟山万山等岛屿，共歼敌200余万人。1951年1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等西藏地区。除台湾及东南沿海少数岛屿外的全部国土获得解放，祖国大陆得到统一。1950年到1953年，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共歼匪特武装27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1953年至1955年，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向东山岛的进攻，解放一江山、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从1958年起，福建前线部队对国民党驻守金门的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在军事上、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驻藏解放军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的协助下，迅速平息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50年来，解放军空军在担负护航、护渔和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击伤敌机488架，击沉击伤和俘获敌舰船404艘，保卫了祖国边防的安全。

**反对外来入侵的自卫还击作战**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歼灭印军8700余人，保卫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宁。随后，中国部队主动停火和后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

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7月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武装冲突。在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奋起还击，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捍卫了民族尊严，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军舰入侵历来属于中国领土的西沙群岛海域，武装侵占甘泉、珊瑚、金银等岛，打死打伤中国渔民、民兵多人。中国军民进行了自卫还击，收复了这些岛屿。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领导人在苏联支持下，进行反华排华活动，谋求地区霸权主义，不顾中国政府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不断在中越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地区安全。1979年2月至3月，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惩罚性的自卫还击作战，使越南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1981年5月，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一举将不断入侵中国广西法卡山、云南扣林山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越军全部歼灭。1984年4月至1989年10月，针对越军在云南老山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入侵和蚕食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又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支援邻国反侵略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动大批军队插手朝鲜内战，把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同时派兵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5次战役、2年多的战斗，共击毙、击伤、俘虏敌军109万余人，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50年代，在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军，取得了边界、宁平、奠边府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对越南北方的解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0年代，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中国陆续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32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通信设施、国防工程以及沿海扫雷等任务，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了运输线的畅通。有1100多人牺牲在越南的国土上。中国为越南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还为越南培训了军事、政治和技术人员6000余人。中国对越援助总价值达200亿美元，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老挝人民进行抗美战争期间，根据中老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从1968年9月起，先后派出防空、工程、地面警卫、后勤等部队和民工10万余人，开赴老挝进行筑路施工和防空作战。对老挝人民的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援。

依据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国军队还进行了培训外国军事人员和援助武器装备的工作。几十年来，先后为50多个国家培训军事人员，向70多个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医疗等方面的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受援国的国防、军事建设和维护国家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国际维护和平行动** 中国军队认真执行中国政府的对外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维护和平活动。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先后参加了6项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32批437人次。1992年中国分两批共派遣800名官兵，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在18个月内完成了机场、公路、桥梁等多项工程建设和维和任务，修复和扩建机场4个，修复公路4条，新架设或修复桥梁47座，并完成了其他大量的勤务工程，为保障联柬维和部队行动的顺利实施做出了贡献。1998年12月，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首次联合举行了搜索与救援演习。目前，中国军队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在90多个驻外使馆中设立了武官处。在中国设立武官处的国家已有60多个。

5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军事努力对于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 推荐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5。



# K

kaichu Kang Sheng Xie Fuzhi dangji  
**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 (expulsion of Kang Sheng and Xie Fuzhi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的审查报告，将康生、谢富治开除党籍。

康生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十届中央副主席，1975年病死。谢富治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病死。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集团，直接参与制造和策划了包括刘少奇冤案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许多人士提出要重新对他们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kaiguo dadian

**开国大典** (Inaugu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典礼。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即日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②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③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署检察长。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齐集天安门城楼，与在广场集会的首都30万群众同庆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军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54门礼炮齐鸣。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回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宣读《公告》完毕后，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朱德检阅各兵种，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典礼结束后，群众举行了游行和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

Kang Keqing

**康克清** (1911~1992) 政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女。江西万安人。1911年9月7日生。1925年开始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1928年9月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轄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1937年后，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部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曾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儿童福利部部长、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1992年4月22日逝世。著有《康克清回忆录》。

Kang Sheng

**康生** (1898~1975) 原中共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本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入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1926年后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书记，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职工部长。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王明的副手。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导致大批干部被打击。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后留山东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7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组织撰写“九评”苏共文章的工作，曾率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运会议。

1966年开始伙同林彪、江青积极策划动乱。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攻击诬陷彭真等人。会后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策划支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制造了“二月兵变”、“61人集团”、“云南特务集团”等大批冤假错案。直接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诬陷和斗争刘少奇、贺龙、薄一波等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击迫害广大群众。1968年7月至8月，由他开列或指使人编造的名单，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259人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予以诬陷打击。据统计，由他批准定案审查遭到迫害的干部达839人，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家副部

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以上的领导干部 360 多人。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 年 8 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5 年 1 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病死。

1978 年 11 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揭露了康生的问题。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11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 Kang Shi'en

**康世恩 (1915~1995)** 1978~1982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河北怀安人。1915 年 4 月 20 日生。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上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清华大学地质系上学时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晋绥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边区建设，先后担任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委组织部部长，晋西北第八分区行政公署专员。1947 年参加保卫延安，以后进军西北，先后担任晋绥雁门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1949 年 9 月率部队接管玉门油矿，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油工业部部长和中共石油工业委员会党委书记，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78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和党组书记、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国务委员。长期领导中国的石油和石化工业，使玉门油矿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石油基地，在全国石油工业中起了表率作用。50 年代中后期，与余秋里一起，先后组织开发大庆油田等 10 次石油会战，使中国石油实现自给，到 1978 年原油产量突破 1 亿吨，进入世界主要产油国行列。1981 年组织实施 1 亿吨原油包干，积极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速石油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1982 年领导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对外招标工作。1983 年负责组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具体指导了油、化、纤、肥一体化发展的战略。1980 年 8 月因渤海 2 号翻船事故，接受国务院记大过处分。1982 年 6 月撤销处分。退居二线后仍关心石油工业

的发展，向中央提出 90 年代石油发展战略。当选为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5 年 4 月 21 日逝世。著有《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

### kanghong qiangxian

**抗洪抢险 (1998)** (anti-flood relief effort, 1998) 中国人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抵御 1998 年特大洪水、抢险救灾的胜利斗争。

1998 年入汛以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雨量成倍增加，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长江发生 1954 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先后 8 次出现洪峰，宜昌以下 360 千米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嫩江、松花江发生创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先后出现 3 次洪峰。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沿湖众多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洪水严重威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特别是受灾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抗洪抢险斗争一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揽全局，确定了“严防死守”和“三个确保”（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基本方针。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江泽民每天都给在抗洪前线指挥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打电话，详细了解水情、汛情、险情、灾情，指挥、部署抗洪抢险。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亲赴抗洪前线。指挥抗洪斗争，慰问抗洪军民。

依照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军委紧急部署，组织、指挥部队火速开赴灾区，在南北两大战场与自然灾害打了一场特殊的战争。广州、南京、济南、沈阳、北京军区 and 空军、海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及四总部直属单位，先后投入 30 余万兵力，出动飞机 2200 多架次，车辆 12 500 余台，舟艇 1170 余艘。各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前往一线指挥。抗洪部队始终承担着最艰巨的任务，战斗在最艰险的地方，出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成为抗洪抢险的中坚力量。广大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许多干部立了“生死牌”、“军令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灾区人民与军队官兵一起

同洪水英勇搏斗，表现出了舍小家、保大家，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纷纷向灾区捐款捐物，支援抗洪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高建成、李向群、关良珠、胡继成、王占成、李长志、杨晓飞、陈申桃、包石头、宋波、董光琳、罗典芬、马殿圣、谢峰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表现出中国人民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使天地为之动容，世人为之赞叹。

全国军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斗，抵御了这次特大洪涝灾害。到 9 月初，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工作重点逐渐转到救灾工作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上来。

1998 年 9 月 28 日，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这次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伟大抗洪精神。一批抗洪英模和先进集体在会上受到了表彰。10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先后给参加抗洪抢险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授予荣誉称号和记功，各地也表彰了一批抗洪先进集体和个人。

### kang Mei yuan Chao yundong

**抗美援朝运动** (resistanc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sistance to Korea) 1950~1953 年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一场全民性的斗争。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 27 日美国总统 H.S. 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并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 月 7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并纠集 15 个国家的军队拼凑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紧急入朝支援南朝鲜李承晚政府。9 月 15 日，美军大部队从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朝鲜北部，以至鸭绿江畔，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应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家卫国，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经过五次战役，迫使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设备的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1951 年 7 月 10 日，美方被迫与中

朝方面举行谈判。然而，由于美方坚持蛮横立场，谈判在边打边谈中进行。

为了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中国从1950年10月起，在各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起，国内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至1953年，这些运动都先后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许多地方的生产计划提前完成，如东北1950年工业生产总产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原矿产增幅度达982.4%。

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国内各界联合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后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该委员会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界代表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三次赴朝慰问。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集会、游行。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近3亿人。全国人民广泛推行爱国公约，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各族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军，工人、机关干部无偿地加班加点工作，广大农民也以极大热忱参战，仅东北地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农民就有60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的就有21万人。

这场全民性的抗美援朝运动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它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战争，也使美国侵略者看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Ke Qingshi

**柯庆施**（1902~1965）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原名柯尚惠。安徽省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回国，在上海、安庆、南京等地从事青年团的发展工作。1924年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苏联。1926年回国，参加国共合作，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村武装起义。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到湖北，组织大冶兵暴。此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团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到张家口，任中共抗日前线委员会书记，参加领导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去天津等地，历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

行局军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华北抗日工作。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7年后，历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石家庄市副市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

ke jiao xing guo zhanlüe

**科教兴国战略** (general program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主要内容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历史选择**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科教兴国战略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经济建设逐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广大干部群众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的认识不断提高。当今世界的竞争激烈，欲使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焦点在科技，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而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为确保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顺利实现，跻身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科教兴国成为历史必由之路。

**发展过程**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起源于形成全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的巨大动力。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于5月26日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动员全党全国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起新的进军。这一文件成为继1956年中共中央发

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12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之后，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为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在大会上号召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李鹏指出，要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牢固树立起科教兴国的意识；朱镕基提出3点要求：①要把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真正落到实处。②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③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建立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1995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重要环节，是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

**确立跨世纪目标**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今后1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确定了具体目标：①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统筹规划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一是适应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二是积极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重点开发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方面的高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有重大突破。②优先发展教育。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初中入学率达到85%左右。各级政府要依法治教，增加教育投入。为加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组织领导，同年3月18日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解决关键问题** 1999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实施科教兴国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具体要求：一是推动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二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三是抓紧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产业技术政策。四是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并

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振兴教育事业。“科教兴国战略”在给中华民族带来一个繁荣兴旺的新世纪。

ke jiao xing nong

**科教兴农** (reviving agri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90年代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通过发展科学、教育振兴农业的总战略。

1991年11月29日, 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 振兴农村经济, 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 号召全党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把适用的先进技术送到乡村, 普及到千家万户; 国家和各地区要加强科学研究, 增加科技储备, 提高农业整体科学技术水平; 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 and 经济效益。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通过发展科学、教育振兴农业作为总战略提出的标志。中共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了科教兴农战略的内涵, 指出: 要“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 多形式、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坚持不懈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农的概念。报告指出: 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农,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此后,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 于1998年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更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是: ①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 ②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 ③抓好农民技术培训; ④加快乡镇企业技术改造; ⑤搞好科技扶贫; ⑥发挥科技在农村经济一体化经营中的先导作用; 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⑧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⑨重视农村科技宣传和普及; ⑩加强对农村科技工作的领导。至此, 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的完整内涵。

科教兴农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邓小平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过农村科技改革和农业机械化的主张。邓小平在1982年1月提出了农业问题要靠生物工程、尖端技术来解决的思路。正是在前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90年代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提出科教兴农的总战略, 并在实践中丰富了这一总战略的内容。

kexue jishu

**科学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使科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 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推广应用科技成果, 改进改造传统产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并应用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建立时期** 1949年11月1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 成立中国科学院。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始。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国科学院是在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改组而建成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共设有22个研究机构, 自然科学方面的有18个, 社会科学方面的4个; 有研究人员212人, 技术人员79人。

除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外, 高等学校和工农业部门的科学研究和调查、试验等方面的机构共有190个, 其中工程类32个, 农业类112个, 地质类17个, 医药卫生类11个, 其他18个。全国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约800多人, 其中约20%在国外。

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决定成立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团体——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分别由李四光、梁希任主席。当时有16个学会, 主办学术刊物18种。

**发展时期** 1956~1966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过几年的恢复、调整和发展, 1956年全国共有独立的研究机构410个, 研究人员共有19603人。其中, 中国科学院有66个研究机构, 研究技术人员5115人; 国务院各部门有研究机构105个, 研究技术人员10307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研究机构239个, 研究技术人员4181人; 高等学校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有17084人, 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有4515人。已初步形成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队伍。

1956年1月,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 周恩来提出要制订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3月, 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 具体组织领导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陈毅任规划委员会主任。经全国600多位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专家的

努力, 完成了规划的编制。规划贯彻了“重点发展, 迎头赶上”的方针, 共列出57项国家的重点科学技术任务, 包括发展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调查研究中国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 配合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农业发展和人民保健事业的重大科研项目, 以及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为使对整个科学技术起带动作用的新技术能尽快得到发展, 又对发展计算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和远距离操纵技术采取了紧急措施, 包括集结力量、建立研究基地、培养人才等。中国科学院当年就着力筹建这4个方面的研究机构。1962年又着手制订《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但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规划未能很好执行。

经过10年的努力,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65年底, 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达245.8万, 其中大学毕业以上的有113万。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 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除中国科学院外,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先后成立; 国务院各工业部门相继建立了本系统的科学研究院; 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防科学技术形成了自己的系统。1958年11月, 国家技术委员会与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由聂荣臻任主任, 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聂荣臻任主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设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 完善了政府管理科学技术的体制。特别是原来空白、薄弱的科学技术领域, 如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控制、激光、红外、海洋技术等, 已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科学技术体系。

这个时期, 在历经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之后, 逐步完善和形成了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和道路。1961年7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订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制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 纠正了“左”的错误, 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停滞时期**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 使全国科学技术事业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1970年,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均并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大批研究机构被下放到地方或被取消,到1975年研究机构已从“文化大革命”前的106个减至36个,科学研究技术人员从2.17万降至1.3万。中国农业科学院几乎被拆散。工业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大部分下放到地方。全国有30多万学有专长的科学技术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工厂、农村。300多种科学技术刊物几乎全部停刊。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基本中断。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对教育工作的破坏,使中国在这10年中少培养了约100万大学生。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委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他们首先着手整顿领导班子,初步恢复了科研工作的秩序。1975年9月,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胡耀邦等人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汇报提纲》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对整顿和加强研究所的领导、恢复所长职权、解决科学技术人员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11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整顿工作未能继续下去。

**改革和发展新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时作了重要讲话,澄清了10年来两个被颠倒是非的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一是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二是承认中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次会议还讨论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规划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8个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与带头学科,放在重点发展的突出位置。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整顿,到1978年底,科学研究机构已基本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并有新的发展。科技人员在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科研秩序和制度逐步恢复和建立,学术刊物纷纷复刊。恢复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方毅任主任。

1985年3月,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中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科学研究与生产的结合;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协调。因而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改变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在组织结构方面,改变研究机构与厂矿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与生产脱节,军民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加强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与联合。在人事制度方面,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的状况。到1995年,全国有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5463个,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员达77.56万。这些机构的经费来源,横向收入已占50%左右,而政府拨款减至36%。研究开发机构与企业签订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增加到53.8亿元,有536个研究开发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有592个参加或成为行业技术开发中心。企业的科学技术活动有很大发展,在全国2.2万个大中型企业中,有技术开发人员123万多,并有9000多家企业设立了技术开发机构。全国还出现了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和把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

**组织与体制** 中国科学技术的组织和体制,50年代时已初步形成,在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政府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与管理。1996年3月,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有国务院各主要部门领导人参加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就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1998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改名为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朱镕基总理任组长。政府管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部门是国务院科学技术部(其前身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除作为政府的综合计划部门

外,同时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也作出安排,并资助国家重点实验的建设。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企业的科学技术工作,包括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进行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项目提供经费资助。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一直到县)均设有科学技术局(委、司),管理本部门、本地区的科学技术活动。

科学技术研究部门 主要有3个方面。

①政府部门所属研究开发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据1995年统计,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政府所属研究开发机构5421个,职工98万多人。其中,中央部门所属的研究开发机构有1060个(包括中国科学院124个)。它们承担着政府科学技术项目的主要部分,也是政府科学技术经费支持最多的部分。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是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水平科学技术人才的基地、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主要从事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提供科学技术咨询与服务。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前身为设立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截至1996年底有院士554名,外籍院士23名。现任院长路甬祥。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现有院士437名。现任院长宋健。

②高等学校。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高等学校有766所,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有59.8万人。承担着全国约1/3的基础研究和约1/5的应用研究。

③企业科研机构。企业是科学技术试验发展工作的主要执行场所(占全国50%左右),近年来发展很快。在1991~1995年,技术开发人员增加50%以上,技术开发经费增加一倍以上。大中型企业是技术开发的骨干力量。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民营科技企业,1997年已达7万家,它们在技术创新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科学技术社会团体 中国自然科学界最大的学术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它于1958年由原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合并组

成。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现共有 165 个。它在开展学术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以及科技咨询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3 万个,企业科协 1 万多个。

**国家科学技术计划**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已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而形成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等多种形式的体制。同时,除国家科技发展 5 年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外,按不同的目标和内容还分为若干个专门的计划。

①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始于 1982 年,每 5 年编制一次,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主要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和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技术,向工农业生产提供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撑。

②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始于 1986 年,为期 15 年,是高新技术研究发展的中长期计划。目前集中于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和海洋技术 8 个领域。

③攀登计划。是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1991 年开始实施。它选择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前景的项目,组织精干队伍,给予一定的投资强度和持续稳定的支持,力争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带动作用。

④“火炬计划”。是 1988 年开始实施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主要任务是创造并形成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建设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全国现已建立了 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⑤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是 1990 年开始实施的指导性计划,目的是把先进的、成熟的、适用的科技成果和高新技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向工农业生产部门。

⑥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始于 1984 年。对一些在国民经济中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经中间试验后,通过工业生产的扩大试验,保证科技成果在生产应用中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它包括工业性示范项目的推广和工业性试验基地的建设。

⑦“星火计划”。1986 年开始实施,主要面向农村,以先进适用的集成配套科技措施,促进乡镇企业的科技进步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

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从 1984 年开始,国家选择优先发展的学科和新兴的交叉学科,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到 1995 年,已建设 155 个。

**科学技术的投入与产出** 中国科学技术经费(包括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科技服务等)逐年有较大增长。1995 年为 884.54 亿元,按可比价计,比 1991 年增加 1.3 倍。其中,政府拨款约占 26%,企业投入约占 46%,银行科技贷款约占 13%,其他 15%。作为执行部门,政府所居研究开发机构约占支出的 46%,企业占 48%,高等学校占 5.5%。

作为科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与发展经费,1995 年为 286 亿多元,比 1991 年增加 1 倍,按可比价计则增长 20%。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近几年来均为 0.5% 左右。来自政府的拨款约占 50%,来自企业的投入占 35%,其他为 15%。作为执行部门,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占支出的 44%,企业占 31.9%,高等学校占 13.7%,其他部门占 10.4%。在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基础研究约占 6%,应用研究约占 40%,试验发展占 54%。

**科技人力。**全国科技活动人员 1995 年为 258.2 万,比 1990 年增长 23%。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很快,而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减少较多。大中型企业、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分别占 47.8%、23.7% 和 23.2%。

**研究与发展人员,**1995 年比 1990 年增长 7.9%。大中型企业、政府研究开发机构以及高等学校和其他组织分别约占 40%、30% 和 30%。

**科技成果。**全国每年有经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管理机构登记的重大科技成果约 3 万项。其中,计划内项目与计划外项目约各占一半。每年约有 700 项成果获得国家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

**科技论文。**全国每年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约 10 万篇,平均每年增长约 4%。据国际 3 种主要检索工具的统计,近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有较大增长,1995 年为 26 395 篇,居世界第 11 位。

**专利。**中国自 1985 年起实施专利法。1995 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83 045 件,比 1990 年增长 1 倍多;授权量为 45 064 件。现已被列为世界五大专利国之一。

技术贸易和高技术产品进出口。1995

年技术进出口总额为 155 亿多美元,比 1990 年增长 2 倍;其中进口与出口之比约为 5:1。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 年达 319 亿美元,比 1991 年增长 1.6 倍,其中出口额 100.9 亿美元,比 1991 年增长 3.5 倍。

#### 推荐书目

武衡、杨浚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

kexue jishu shi diyi shengchanli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生产力的重要思想。1975 年 9 月 26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插话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此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的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 年 9 月 5 日、12 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都强调:“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他强调:“这个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来说的。”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技在生产力的基本结构和位置与功能,进而全面认识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动力和趋势。过去关于生产力的概念,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把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放在次要的地位。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是按照现代生产力性质及发展动力和趋势,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首要的决定因素,把智力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就使人们对生产力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科学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思想,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6 年 3 月 17 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重要内容,要求加快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

kexue jiaoyu wenyi zhengce tiaozheng

**科学教育文艺政策调整** (adjus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policies)

6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为协调科学、教育、文艺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对科学、教育、文艺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

**科学调整** 196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农村工作十二条》后,科技工作者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类似的文件。为此,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领导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到一些研究所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搜集美、苏、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1961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大跃进”中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各项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在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②整顿科学技术工作中的规章制度,保证科学技术工作的正常秩序。③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聂荣臻还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红与专、“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等七个问题的政策界线进行了全面阐述,与《科研十四条》同时上报中央。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聂荣臻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适用。各高等学校、大中型厂矿、医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科研十四条》和中央指示很好地调动了各部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教育调整** 教育调整的要求是把缩小教育事业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文教事业的建设和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关

系,以及数量和质量、政治和业务等关系,解决好教育事业过快、战线过长、占用劳动力过多的问题。会后,文教小组向中共中央呈送报告,提出了文教工作贯彻“八字方针”的几项措施。教育部先后召开几次会议,研究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和具体落实的计划。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3个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其主要内容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继续加强中共党的领导等。另有《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3个条例分别于1961年9月15日和1963年3月23日批发试行。经过3年调整,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稳健的发展,教育质量也有所提高。

**文艺调整** 1961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文艺十条》,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8月1日,把《文艺十条》印发各地征求意见。随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周恩来的意见以及各地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压缩成8条。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将《文艺八条》批转全国执行。《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①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③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④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⑤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⑥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⑦加强团结,继续改造;⑧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Kexueyuan Gongzuo Huibao Tigang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Academy's Work”)

1975年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整顿的重要文件稿,简称“汇报提纲”。197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提出整顿意见。胡耀邦等人经过调查研究,于8月17日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经胡乔木修改后,定名为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共分3个部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工作,要求系统、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科技思想,进行科学院的整顿工作。9月26日,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走在前面,就要拖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为他们创造科研条件: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在科学院的领导班子里。把知识分子当做专政对象,使广大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是不正常的。不能把理论研究说成是“脱离实践”,要鼓励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争鸣,改变用粗暴手段处理学术问题的做法。他鼓励领导干部要大胆地站出来整顿,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再次修改了“汇报提纲”,形成第五稿,于9月28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说法。1976年8月,“四人帮”将这个文件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供批判用。但是,文件所反映的整顿与发展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以后被历史证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

ke chixu fazhan zhanlue

**可持续发展战略** (general progra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指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实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早出现在60年代联合国的讲坛上,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各国政府从其实际情况出发,寻求具有可持续性特征的发展方式,称为新型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该发展方式集中体现在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将经济增长与资源及环境保护相结合,将当代资源开发与未来对资源的持久利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具有长远效益的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系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实施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兼顾、相统一的发展方法、对策和模式,使社会经济同资源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共识。中国对联合国等世界组织作出了承诺。1992年6

月，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次环境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并签署几个单项环境保护公约。同年7月，中国开始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99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任务，指出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要加强对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克服靠浪费资源求发展的短期行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切实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强化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继续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加强对重点城市、区域、流域、海域的污染治理；加强城乡规划工作，严格实施规划，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坚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深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步伐，开展社区卫生服务；重视人口老龄化趋势，认真做好老龄人口的工作；关心和加强残疾人事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努力提高竞技运动水平，逐步改善国民营养水平和健康素质。

Kelindun fangwen Zhongguo

**克林顿访问中国** (W. Clinton visits China) 美国总统克林顿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克林顿此次访华是对江泽民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访美的回访，也是1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在历时9天的访问中，克林顿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桂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克林顿同江泽民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双方决定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双方还就保持亚洲地区稳定，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防止武器扩散，以及打击国际犯罪、毒品走私、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3个联合声明。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首脑会谈中的重要议题。江泽民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公开重

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克林顿访华还为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一批美国企业家、工商界人士随同克林顿来华访问。在此前后，中美两国有关公司和机构共签署了总金额约30亿美元的12个重要经贸合作项目。中美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还决定在环保、科学、教育、法律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中美国家元首在北京的正式会晤，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增进了友谊，扩大了共识，进一步发展了双方的合作，为建立面向21世纪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Kong Fansen

**孔繁森** (1944~1994) 中共地委书记，优秀领导干部。山东省聊城人，1944年7月生。1961年8月参加工作，196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山东聊城地委常委，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西藏自治区岗巴县委副书记兼县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山东省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林业局长、副专员，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1979年和1988年，两次到西藏工作。任职期间，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使拉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3年任阿里地委书记以后，他对阿里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乡，总行程达7万千米。率领全地区干部群众努力改变贫困面貌，使1994年全地区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他常常把自己的工资分给贫困的藏族群众，还收养了3个失去父母的藏族儿童，自己甘于清贫。1994年11月29日，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1995年4月，国务院批准追认他为全国先进工作者。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介绍他的模范事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向他学习。同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

kongsu Meiguo wuzhang qinlüe Taiwan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denoun-

cing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aggression in Taiwan)

1950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声明，扬言“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命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针对美国的军事挑衅，中国外长周恩来于6月28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8月24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强调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尊严，安理会必须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8月31日，安理会把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列入议程。9月10日，周恩来又向联合国提出，安理会讨论中国提案时必须要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参加。9月2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10月23日，中国政府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别代表率团出席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在会上发言，严正驳斥杜鲁门编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强调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台湾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1943年和1945年有美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加以承认。接着指出，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既已侵占台湾，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因此，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提议：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朝鲜；安理会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武装力量，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12月7日，美国操纵安理会否决了中国的建议，并将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12月15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决定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以拖延手法阻止中国对其侵略台湾行径的控诉。12月16日，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美国阴谋，并散发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和有关资料。随后，又将拟在联大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稿正式提交联合国秘书处，要求列为大会文件。12月19日，伍修权一行完成使命后回国。



# L

Lasa saoluan

## 拉萨骚乱 (Unrest in Lhasa)

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由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制造的3次旨在分裂中国、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骚乱活动。

1987年9月27日至10月1日，拉萨市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蓄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骚乱中有6人死亡，19名公安人员受重伤。同年9月28日、10月7日、10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和国家民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先后发表谈话，严厉谴责这次骚乱事件及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在广大西藏人民支持和拥护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很快平息了骚乱。

1988年3月5日，拉萨市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大昭寺再次制造了骚乱事件。他们演讲、起哄，围攻佛教分会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冲击传昭办公室，砸、烧电视台的采访车和佛协小轿车，打伤执勤人员。骚乱中5人死亡，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人受伤。当天，武警队伍和公安人员开进大昭寺，驱散骚乱分子，平息了这次骚乱。

1989年3月5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制造了较前两次更为严重的骚乱事件。当天，有13名喇嘛、尼姑打着“雪山狮子旗”游行，呼喊反动口号。15时左右，他们纠集数百人游行，砸、抢、打、烧，并4次冲、砸城关区委和区政府机关，捣毁交警岗亭，砸坏公安、武警、消防汽车20多辆，然后向公安、武警部队开枪射击。公安、武警战士被迫开枪还击。骚乱中，1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公安、武警战士受伤。骚乱延续至6日和7日，又有一些商店和饭馆被烧、抢、砸，2名公安、武警战士受伤。公安、武警部队在制止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击毙骚乱分子1人，击伤6人。3月6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厅、局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和上层爱国人士会议，通报骚乱情况。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西藏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决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

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戒严地段、戒严期间的各种聚会活动、枪支管理、交通管制等作出严格规定，坚决执行。7日和8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出1、2、3、4、5、6号令，对戒严作出具体规定。随后，拉萨市区秩序逐渐恢复正常。1990年4月30日，国务院宣布解除在拉萨市的戒严。

Lai Ning

赖宁 (1974~1988) 中学生，英雄少年。四川省石棉县人，1974年10月23日生。自上小学起多次被评为优秀少年和三好学生。小学毕业后入石棉县中学学习。曾3次上山灭火。1988年3月13日，他居住附近的海子山发生大火，他闻讯奔向火场，奋力扑火。脸和手都被烧伤，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在火场，时年仅14岁。1989年5月31日，他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国家教委追授为“英雄少年”称号，并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先后写信、题词、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中小学生向他学习。是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学赖宁、学‘十佳’，争做优秀少先队员”活动的通知》。

Lanzhou-Xining-Lasa guanglan gongcheng

## 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

(Lanzhou-Xining-Lhasa cable project) 中国光缆通信干线之一。东起甘肃兰州，经青海西宁、格尔木，南抵西藏拉萨，全长2754千米。是国家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和支援西藏的重要建设项目，也是中国通信建设史上最为艰巨的工程。工程需要穿越柴达木盆地，横跨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沿线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最高处达5260米。沿线地形复杂，多为冻土、沙漠、戈壁和悬崖峭壁，高山缺氧，无水无电，给施工带来极大困难。1997年6月25日，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的千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兰州军区、成都军区的3万余名官兵分南北两路全线施工。施工中，职工和官兵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先后有3名解放军战士牺牲。经过努力，当年9月17日光缆敷设任务全部完成，工程于1998年5月装机，7月开通，比原计划提前半年投产。

Lang Ping

郎平 (1960~ ) 排球运动员。

女。满族。北京市人。1960年12月10日生。1976年入北京市业余体校进行排球训练，同年入北京市排球队。1978年被选入国家排球集训队，成为国家女排的主力。她网上技术突出，快攻变化多，以4号位高点强攻著称，被称为“铁榔头”，是80年代初世界女子三大著名攻击手之一。其所在队获1978年第8届亚洲运动会亚军；1979年第2届亚洲排球锦标赛中冠军；1981年联邦德国不来梅国际邀请赛冠军（她获“最佳攻球手奖”），同年11月日本第3届世界杯排球赛世界冠军（她获“优秀运动员奖”）；1982年9月秘鲁利马第9届世界排球锦标赛获冠军（她获“最佳运动员”、“最佳阵容”、“最佳扣手”奖），11月第9届亚洲运动会冠军；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冠军；1985年11月日本第4届女子排球世界杯赛冠军（她获“最佳选手”、“优秀选手”奖）。1986年退役，出任中国女排教练，率队参加1986年9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并蝉联冠军，使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获得“五连冠”的队。她在中国女排夺取一次次的世界冠军的艰苦比赛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祖国争得了巨大的荣誉，建立了卓著的功勋。1986年卸去教练职位。去美国留学。1989年获建国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1990年8月第11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她又被召回中国女排参赛，获得亚军。1995年2月她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她的带领下，中国女排走出低谷，同年获世界杯赛第3名；1996年获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998年获第13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亚军。1999年因病辞去中国女排主教练职务。

Laoshan Zheyinshan dui Yue ziwei huanjizhan

## 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还击战

(self-defensive battles against Vietnam at Mount Laoshan and Mount Zheyinshan) 1984年4月至198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为收复和保卫被越南军队非法侵占的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老山、者阴山而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还击战历时5年多。其作战行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炮击作战，有力地打击了越军，为收复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为收复老山和者阴山作战，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老山、者阴山等被越军侵占的骑线据点，

改善了防御态势；第三阶段为打击越军反扑和出击作战，参战的中国边防部队主要是配合政治外交斗争，实施坚守阵地，打击越军反扑，适时组织部队进行阵前出击和集中炮击；第四阶段为收缩防御阵地缩小作战规模，适时减少参战兵力，从而逐渐转入正常守备。

Laoshe

**老舍**（1899～1966）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899年2月3日生。1918年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师等。1924～1930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并创作出《老张的哲学》等三部长篇小说。回国后历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期间写有《骆驼祥子》等四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组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坚持创作，写有20多部作品。1946年去美国讲学，写有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及《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1949年底回国。1950～1966年，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二、三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及中国剧协理事，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他创作勤奋，1950年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过新年》（大鼓书）。以后陆续创作出《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等20多部剧本，小说《正红旗》（未完），以及几百万字的曲艺、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被誉为“作家劳动模范”。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他先以长篇小说著称，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后来，又以剧作闻名，是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作品题材丰富，手法多样，具有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善于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的生活细节描绘中下层市民的世态人情；以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性主题，讽刺与幽默兼备；语言简练明净、朴素准确。作品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多国文字，并被

改编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话剧《茶馆》曾获国内戏剧创作荣誉奖，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Lei Feng

**雷锋**（1940～1962）解放军战士，英雄模范。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毒打成疾致死，母亲不堪地主凌辱，悬梁自尽。他7岁成了孤儿，依靠穷乡亲们照料度日。1949年8月家乡解放，被人民政府收养，到学校读书。1956年高小毕业后，在乡人民政府当通信员。后调中共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同年11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把毛泽东著作看做“粮食”、“武器”、“方向盘”，以“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习。写了大量的学习日记和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认定：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车站、码头、工地上帮忙。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他谦虚谨慎，做了好事不留姓名，受到赞誉不骄傲。群众赞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生活上艰苦朴素，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灾区，帮助有困难战友。他带病参加抗洪抢险，坚持奋战7昼夜。他关心少年一代的成长，担任校外辅导员时，经常给学生们讲革命故事，作忆苦报告，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少年们的知心朋友。1961年5月16日，当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6月，担任运输连四班班长。9月19日，出席了沈阳部队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成长的过程。1962年8月15日，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因公殉职。他在部队两年零八个月，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五好战士”，所带领的四班一直是先进集体。

雷锋殉职后，共青团中央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的光荣称号。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等都发出向雷锋学习的号召。1963年3月5日，首都各报发表毛

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手迹。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从此，每年3月5日成为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的纪念日。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以来，学习雷锋活动已成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措施。

Lei Jieqiong

**雷洁琼**（1905～）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女。广东台山人。1905年9月12日生。1925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学习，1931年在南加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任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1938年后任江西省伤兵管理处慰劳课课长、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督导室主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1941年后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教授。1945年参加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后任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新政治学会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教务长、教授。1973年后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社会学系教授。1977年后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司法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重点为应用社会学。1994年出版《雷洁琼文集》（上、下卷），1992年翻译出版纳·卡拉维吉（印度）著：《1783年孟加拉的农民起义》。

Li Ao

**李敖**（1935～）台湾作家。吉林扶余人。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曾在北平、上海等地读书。1949年到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2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曾任《文星》杂志主编。1965年10月发表

《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台湾当局，《文星》杂志因此被查封。由于他常撰文对台湾政治现实表示不满，1971年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1976年获释。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后为《中国时报》专栏撰写文章。1981年因批评台湾当局再度被捕入狱半年。曾发表《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揭露台湾监狱黑幕。主要著有《传统下的独白》、《胡适评传》、《上下古今谈》、《李敖文存》、《李敖全集》等。

Li Changchun

**李长春** (1944~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辽宁大连人。1944年2月生。1961~196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学习。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任沈阳开关厂技术员。1975年后，历任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沈阳市电器控制设备工业公司副经理、经理、党委副书记。1980年任辽宁省沈阳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1982年任沈阳市副市长兼经委主任。1983年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市市长。1985年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1986年6月起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辽宁省代省长、省长。1990年6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代省长、省长。同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93年3月，兼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后补委员，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2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Li Da

**李达** (1890~1966)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教育家，哲学家。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10月2日生。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1918年5月与许德珩等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发动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学生示威运动；失败后于同年再赴日本钻研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2年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辞去宣传主任职务。1923年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杂志，任主编。同年因与陈

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见解不一而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此后，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活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至1949年，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分别任教于上海法政学校、北平大学商学院、中国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在此期间，多次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到冯玉祥处讲学，说服冯玉祥抗日，他不顾反动派的种种迫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1935年发表的专著《社会学大纲》，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4卷。

Li Delun

**李德伦** (1917~ ) 音乐指挥家。回族。1917年6月6日生于北京。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救亡歌咏活动。1940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大提琴和作曲。学生时代参加进步文化运动，组织中国青年交响乐团。1946年到延安，任中央管弦乐团指挥，指挥演出歌剧《兰花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乐队指挥，指挥首演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打击侵略者》。1953年赴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指挥系研究生。1956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演出。1957年回国，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1985年后，先后指挥卢森堡国家广播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出，并多次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活动，任评委。被文化部授予指挥荣誉奖。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交响乐爱好者学会会长。为中国交响乐队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交响音乐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Li Dequan

**李德全** (1896~1972)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女。北京通县

人。蒙古族。1896年8月10日生。早年参加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1924年与冯玉祥将军结婚。1926年随同冯玉祥出访苏联。1928年在北平创办求知学校，后在山东泰安等地创办十余所学校，培养人才。1936年在南京发起组织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从事妇女和社会问题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妇女，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任副理事长。1945年后，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任该会主席。1946年1月，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军事考察成员和陪都各界协进会理事。2月10日，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殴伤，9月，随冯玉祥赴美国。10月，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1948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1月，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3月，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后改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2年4月23日逝世。

Li Desheng

**李德生** (1916~ ) 中共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河南新县人。1916年5月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交通队员、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进军川陕，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129师排长、连长、营长，1943年任太行分区团长，参加夜袭阳明堡、响堂铺战斗和百团大战，在马坊战役中亲率突击队全歼马坊日伪守军，消灭对晋中抗日根据地危害最大的日寇据点。1946年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团长、旅长。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了上党、邯郸、定陶、淮海、渡江等战役和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在襄樊战役中，指挥第17旅“刀劈三关”攻破襄阳城，同友邻部队一起生俘国民党军第15“绥靖区”

中将司令康泽。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参加第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任前线指挥，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取得胜利。1954年回国，1955年任军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1960年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1年在军事训练中发现、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全军推广。1968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70年4月任总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1971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林彪事件发生后，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控制局势的工作。同年10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江青诬为“大党阀”、“大军阀”，受到打击。1975年2月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至1985年兼任中央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和东北电网领导小组组长。1985年起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5年11月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李德生回忆录》。

Li Denghui

**李登辉**（1923~ ） 1988年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台湾省台北县人，祖籍福建永定县胡坑乡楼下村。1923年1月15日生。1946年日本东京大学肄业，1948年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1952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政治大学教授，台湾省合作金库研究员。1952年任台湾省“农林厅”经济分析股股长。1957年至1964年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技佐、技正、农业经济组组长。李早期深得其老师徐庆钟的赏识，并经蒋彦士引荐，受到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重用，1972年被延揽入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务委员”。1976年当选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

员。1978年任“台北市市长”。1979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81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当选为第七任“副总统”。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继任“总统”、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同年7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1990年3月当选第八任“总统”，同年10月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1996年3月当选“总统”。1997年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主席。执掌党政大权后，极力推行“本土化”政策，进行“宪政改革”。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总统直选”、冻结“省长”和“省座谈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政府功能等。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以致抛出“两国论”。在国际上推行“实务外交”，鼓吹“参与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著有《台湾农业对经济成长之贡献》等。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图书出版社，北京，1996。

Li Fuchun

**李富春**（1900~1975）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湖南长沙人。1900年5月22日生于贫穷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春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9月进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留法预备班学生代表，到北京参加请愿斗争。同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旅法青年进步组织工学励进会（后改称工学世界社），积极投入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5年初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之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进军江西，曾任中共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1930年1月调离中共江苏省委，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领导江西省的中共组织取得较大的发展。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长征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后

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长、陕甘省委书记。对巩固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支持红军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兼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长，在延安的大生产中显示了领导经济工作的才干。1940年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1942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分管行政、财政、教育、科技、卫生、出版方面的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结束后，率大批干部赴东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参与领导了东北解放战争。1946年后，主持东北的财经工作，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积极组织东北工业基地的恢复与建设，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的领导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协助陈云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53年9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6月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兼任国务院工交办公室主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一起，主持全国的计划和财经工作，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以反对所谓“二月逆流”为借口，对他进行迫害。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论著收入《李富春选集》。

Li Furong

**李富荣**（1942~ ） 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上海市人。1942年8月17日生。1957年入上海体育宫业余体校进行乒乓球训练。1958年入选上海乒乓球队，同年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集训队。直

拍快攻打法，发球多变，攻势凌厉，步法灵活。从1961年起，曾5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第26届、第27届、第28届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并获第26至28届单打亚军、男子双打第3名（分别与庄则栋和王家声合作），以及第26届锦标赛混合双打亚军（与韩玉珍合作）。从1961年起曾7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2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74~1983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以他为主训练指导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连续获得第33届、第34届、第36届、第37届团体冠军。他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79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同年起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并担任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分级分组委员会委员。1978年、1983年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局长。1994年任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现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教练员称号。著有《现代乒乓球理论、技术、战术及其训练的研究》（与他人合著）。

Li Guixian

**李贵鲜**（1937~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辽宁盖州人。1937年8月生。1959~1960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门氏化工学院工程物理化学系电真空化学专业。回国后，历任国营七七七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辽宁省锦州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辽宁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党组副书记，辽宁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1988年后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94~199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是中共第十二至十五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Li Jishen

**李济深**（1885~1959）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生。1914年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19年参加孙中山

领导的军政府。参加护法运动，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1925年8月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出任军长。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省长，第八路军总指挥。1931年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但拒不受任。1932年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州组织建立起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脱离国民党。失败后赴香港。1935年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7年七七事变后，恢复国民党党籍，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6年春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主席。5月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9月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10月9日逝世。

Li Jiacheng

**李嘉诚**（1928~ ） 香港实业家。广东潮州人。1928年7月29日生。1940年日军进犯潮州，随家人逃到香港。因生活所迫，少年时代即开始经商，由玩具推销员逐步升为经理。1950年开始独自经营塑料厂。1958年资产已达一百余万元。同年开始经营房地产。1971年组建长江实业公司。1979年收购香港老牌英资公司——“和记黄埔”，成为收购英资商行的第一位华人。1986年上市公司总产值达342.8亿余元，名列当年香港10大家庭财团之首。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基金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国际城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等职。1985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

员。近年来，热情支持内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共计捐款达27亿港元以上。

Li Jingquan

**李井泉**（1909~1989）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江西临川人。1909年9月19日生。1926年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南昌起义时，动员民众支援起义部队，后参加起义部队。曾任丰顺县黄金铺区团区委书记，团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到中央苏区，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第四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支部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九军政治协理员，中央军委总司令部侦察科长。1936年春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教员。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大青山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西北军区三分区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1945年后，任晋绥野战军政委、晋绥军区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书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委、第二十兵团政委。1949年后，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行政公署主任。1952年起，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西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政协四川省委员会主席。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9年4月24日逝世。

Li Keran

**李可染**（1907~1989）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徐州人。1907年3月26日生。幼年即学绘画，1923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徐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29年入西湖艺术学院学习油画。1937年随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

第三厅在各地宣传抗日。1943年后,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和教学,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作品以江南山水题材见长,借助写生,塑造浓重的意象,既继承了明清以来的风格,又有新的突破,自成一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代表作有《蕉荫鸣琴》、《无锡梅园》、《漓江胜览》、《井冈山》等。写意人物和牧牛等题材的作品也佳作颇丰。艺术论著有《谈学山水画》等,部分作品收录入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美术教育片《李可染的山水艺术》、《李可染画牛》等。1989年12月5日逝世。

Li Kuchan

**李苦禅** (1899~1983)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英杰。山东高唐人。1899年1月11日生。自幼喜好绘画。1919年到北京大学勤工俭学,学习素描和旁听中文系课程。1922年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次年拜齐白石为师。毕业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师范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教师、教授。1940年因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捕,表现坚贞不屈。1946年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届委员。擅长中国画,尤以花鸟中的松竹、苍鹰著称。代表作有《秋阿之声》、《芭蕉禽戏》、《墨竹图》、《盛夏图》等。其作品风格浑厚凝练,豪放脱逸,注重形象塑造。1983年6月11日逝世。

Li Lanqing

**李岚清** (1932~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江苏镇江人。1932年5月22日生。1949年入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学习,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大学毕业,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计划员、副科长。1956年赴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实习。1957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处科长兼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59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秘书。1961年在国家经委任秘书、企业管理局局长科长。1969年下放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后,任第二汽

车制造厂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后,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1981年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1982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1983年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委书记。1986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7年在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0年后,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Li Moran

**李默然** (1927~ ) 中国话剧、电影演员。黑龙江尚志县人,回族。1927年11月28日生。1945年参加牡丹江邮政业余剧团,同年参加青文剧社,开始演剧生涯。1947年考入哈尔滨东北文协文工团。1951年随团并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1954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他继续做演员并任副院长、院长。1953年以后,他创造了数十个舞台形象,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尤利乌斯·伏契克》中的伏契克、《日出》中的李石清、《李闯王》中的李岩、《第一次打击》中的季米特洛夫、《第二个春天》中的冯涛、《报春花》中的李健(该剧参加国庆30周年演出获表演一等奖)等。此外,还在多部电影和电视片中担任过主角,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饰演邓世昌,赢得广泛声誉。李默然的表演富于激情,台词铿锵悦耳,气度恢宏,善于将外在的形体动作与内在的心理体验融为一体,使人物个性鲜明。是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主席。

Li Ning

**李宁** (1963~ ) 体操运动员。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1963年3月10日生。8岁开始练习体操。1973年作为广西队成员参加全国少年体操锦标赛,获得自由体操冠军和双杠第4名。1977年在全国体操比赛中获自由体

操亚军。1980年获全国体操分区赛(成都)鞍马冠军、全国体操锦标赛全能第3名,年底被选入国家体操集训队,进步很快。他技术全面,身体素质好,力量大,动作优美,轻、飘、稳,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1981年在第1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自由体操和鞍马冠军、全能第5名,同年获第2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全能第6名和单杠第5名。1982年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一举获得单杠、自由体操、跳马、鞍马、吊环和全能6项冠军,成为世界杯比赛举办以来第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男子体操运动员。被誉为“体操王子”。11月在第9届亚洲运动会体操比赛中,为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队员之一,并获个人全能、鞍马、吊环3项冠军及双杠亚军。这一年李宁被国际体操联合会和国际体育报刊联合会主办的《世界体操》杂志评为1982年度世界最佳体操运动员之一,名列男子最佳冠军。1983年他以115.85的总分获得了第5届全国运动会男子体操全能冠军。是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队员。1984年在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获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项冠军。1986年第7届世界杯体操赛获并列个人全能冠军。他在世界三大赛中,除团体一块金牌外,总计获得金牌13块、银牌4块、铜牌6块。占中国体操运动员在同期同类比赛中夺得金牌总数的65%,创造了中国体操运动员获世界冠军的最高纪录。自1982年起,先后被国内外新闻界评为“最佳”、“十佳”、“杰出”、“优秀”运动员荣誉称号14次。1989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5次获得国家体育荣誉奖章。198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代表。是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退役后,任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宁体育用品集团董事长。

Li Peiyao

**李沛瑶** (1933~1996)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苍梧人。李济深之子。1933年6月1日生于香港。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曾任江西省南昌航空学校教师,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多次获得优秀科技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称号。198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任民革江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政协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劳动

部副部长，民革中央副主席，1992年当选为民革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6年2月2日在北京住所与歹徒搏斗遇害。出版有《锻造、冲压工作技术问答》等著作。

Li Peng

**李鹏** (1928~ ) 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四川成都人，1928年10月20日生。3岁时，父亲李硕勋(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被国民党政府杀害。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照顾和培养下成长的。1941年3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延安，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读中学。1944年春入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化学系学习。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秋，被分配到晋察冀电业公司工作，任技术员。1947年7月到黑龙江任哈尔滨油脂厂办理、党支部书记。1948年8月前往苏联，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1954年12月毕业。曾任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中国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中国留学生总会主席。1955年3月回国，9月被分配到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吉林丰满发电厂工作，任副厂长、总工程师。1958年起，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调度局局长，辽宁阜新发电厂党委副书记、厂长。1967年任北京供电局代理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起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兼局长。1979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1981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3月，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6月兼任新设立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同月任国务院代总理。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他参加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为扩大中国人民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

的友好往来，增进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科学交流和合作，做出了贡献。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Li Ruihuan

**李瑞环** (1934~ ) 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天津宝坻人。1934年8月9日生。1951年7月参加工作，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人。1958年进入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共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书记。1966~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1年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1972年任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1973年后，任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指挥、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1979~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81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1982年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理市长、市长。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4~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3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提出人民政协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多做贡献。在他的主持下，人民政协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在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一次会议

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Li Shunda

**李顺达** (1915~1983) 农村干部、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人，1915年7月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春，他带头办起农村劳动互助组。1944年被选为太行山区第一届英雄大会的甲等劳动英雄。1946年获太行山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大会的一等劳动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1年3月6日，他领导的劳动互助组，首先提出开展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的号召，引起全国强烈反响，纷纷应战，形成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热潮。1952年3月16日，被农业部授予互助组爱国丰产奖章。历任西沟村金星合作社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山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7月1日因病逝世。

Li Siguang

**李四光** (1889~1971) 地质学家，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李仲揆，字福生。蒙古族。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入武昌高等小学学习。后留学日本。1910年回国。曾在上海一家兵工厂任工程师，后到武昌工业学校教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委员，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1912年辞职。1913年赴英国留学，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1年采矿，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图书馆第一副馆长。1927年8月赴南京，协助蔡元培等筹建中央研究院，后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抗日战争时期，率地质研究所先后迁徙到庐山、桂林、贵阳、重庆等地，始终致力于中国地质、地貌和地质理论的研究工作。1946年在上海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48年2月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后留在英国进行考察。1950年4月回国。任地质部部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主席，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曾当选为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被聘为苏联科学院国外院士、苏联全苏古生物学会名誉委员，获苏联科学院卡尔平斯基金质奖章。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倡导和创建的地质力学形成有世界影响的独立学派。提出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50年代根据这一概念指出新华夏体系有广阔的找油远景，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他的科学论断。60至70年代又将地应力分析用于地震预报研究，取得重大成效。对地质学的基础学科，如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冰川学、岩石学、矿物学等，都有精湛的研究和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论地震》等。1971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

Li Suwen

**李素文** (1931~ )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女。辽宁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起在沈阳市商业部门从事售货员工作。1958年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1963年后，任沈阳市和平副食商店副指导员、副经理。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被树为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8年后，任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来京工作，曾任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到墨西哥参加国际妇女节大会。1978年后，回沈阳工作。1983年任沈阳糖果厂副厂长。1986年10月任沈阳市轻工业局供销处副处长、供销公司副经理。

Li Tieying

**李铁映** (1936~ ) 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湖南长沙人。1936年9月生。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1961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理士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回国后，历任国防部十院十三所四室技术员、副主任，五室副主任，四机部一四一三所五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2年恢复工作，任四机部一四二四所一室主任。1978~1981年任

四机部一四四七所总工程师、副所长兼辽宁省沈阳市科委副主任、省科协副主席。1981~1983年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83~1985年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85年后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起任国务委员。1988~1993年兼国家教委主任。1993~1997年再次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Li Weihai

**李维汉** (1896~1984) 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896年6月2日生。1912年进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翻砂，后当铸工。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任组织委员。同年回国，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湖南。1923年1月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年底与何叔衡等创办《湘江》半月刊。1924年又创办《新民周报》，任主笔。1925年1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秘书长(未到职)。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9日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底，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书记。6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2月赴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机关梯队队长、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党校代理校长。1938年4月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1939年后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整风运动开始时，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

究室主任。1939年9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48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51年4月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1953年11月任政务院中财委副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1979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8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是政协第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84年8月11日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李维汉文集》，著有《回忆与研究》。

Li Ximing

**李锡铭** (1926~ )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6年2月28日生于河北束鹿。1946~1949年在清华大学先修班、建筑系、土木系学习。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1952年受中共北京市委青年委员会委派到石景山发电厂从事建团工作，同时兼任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宣传委员。1952~1957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副书记、代理书记。1957~1966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1975年先在石景山发电厂生产组协助工作，后任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5~1981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1~1982年在国务院国民经济调整办公室工作。1982~1984年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1984~199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曾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Li Xiannian

**李先念** (1909~1992)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湖北红安人。1909年6月23日生。早年当过木工。1926年参加革命，从事农会工作。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参加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参加长征。1936年10月，奉命率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在甘肃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西征，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征失败后，率西路军余部转战新疆。年底，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冬，调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部长。1939年1月，进入豫鄂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3年1月，兼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1944年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指挥部队分路突出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圈，粉碎蒋介石消灭中原解放军的阴谋。1946年9月，奉命回延安。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5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工作。1949年5月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至1980年9月，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还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

席。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92年6月21日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李先念文选》。

Li Xiangqun

**李向群** (1978~1998)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某部战士，新时期英雄战士。海南省琼山市人。1978年9月生。1996年12月参军，199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等兵军衔。在学校读书时，品学兼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在家庭拥有百万资产的情况下，不图一家富裕，毅然参军报国。入伍后，刻苦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写了近10万字的心得笔记，参加法律函授学习被评为“优秀学员”；苦练军事技术，20个训练科目，获得17个优秀，被评为“训练尖子”；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把省下的1030元津贴费捐给生活困难的战友和群众。在关键时刻多次挺身而出，先后从水、火中和爆破现场救出5名老人、儿童和战友。曾荣获团、营、连三次嘉奖，被评为“优秀士兵”，荣立三等功。1998年抗洪抢险中，他随部队坚守荆州长江大堤，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管上堤继续战斗。8月28日上午，他带病坚持扛沙包，因劳累过度引发肺部大面积出血而牺牲。8月29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9月17日广州军区授予他“抗洪勇士”荣誉称号。199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他“新时期英雄战士”荣誉称号，并题词：“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李向群式的英雄战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追授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4月4日，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从雷锋到李向群》，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学习李向群的活动。

Li Xin

**李新** (1918~ ) 历史学家。原名李忠慎。四川荣昌人。1918年9月15日生。1934年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1938年入陕北公学。后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组和中国通史组长、中华

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及副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等领域。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中国革命史的几个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话》等，与人合作并担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四卷本)。此外还主编大型史书《中国革命史》(十二卷本)和《中华民国史》(十三卷本)。

Li Xuefeng

**李雪峰** (1907~ )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山西永济人。1907年1月19日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直中特委书记，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冀豫省委组织部部长，晋冀豫区委委员、书记，太行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太行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1954年和1959年分别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李雪峰回忆录》。

Li Yuanzhe

**李远哲** (1936~ ) 化学家。台湾新竹县人。1936年11月19日生。1959年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1961年获

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深造,196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196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参与赫希巴赫教授有关分子束的研究,设计出“分子线碰撞仪器”。1968年至1974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设计出“离子线与分子线交叉仪器”。197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2年获美国劳伦斯奖金。1986年3月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4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0年被聘为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1995年2月“国统会”改组后被解聘。1994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多次来大陆讲学、访问。先后被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聘为名誉教授。

Li Zhuchen

**李烛尘** (1882~1968)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李华楮。土家族。湖南永顺人。1882年9月15日生。清末秀才。1909年毕业于常德湘西优级师范学校,曾任中学教员。1912年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学习。1918年回国,任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技师,负责安装第一部发动机。后任该公司厂长。1920年任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后与范旭东等创立久(大)永(利)黄(海)化工集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久大华西分厂厂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中国工业协进会常务理事。并被聘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参加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的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开展团结工商界的工作。1945年12月,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常务理事。同时,在天津恢复久大、永利两厂,任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分处处长。1946年1月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任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理事长、天津市工业协会理事长。1949年9月,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被选为民建中央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10月7日逝世。

Li Zongren

**李宗仁** (1891~1969) 爱国人士。原中华民国代总统。字德邻。广西临桂人。1891年8月13日生。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学习。1910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于广西陆军速成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任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同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在粤军李济深部协助下统一广西,与黄绍竑、白崇禧等组成新桂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7月参加北伐。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蒋桂战争时,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一方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主席。指挥台儿庄战役,毙伤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约2万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以来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个大胜利。1945年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任中华民国副总统。1948年12月与程潜等倡导与中国共产党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1949年1月任中华民国代总统,4月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隔江分治”的阴谋,导致和谈失败。李宗仁5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后去美国。1955年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反对美国搞“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1965年7月在周恩来安排下,回到北京,表示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举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李宗仁回忆录》。

Li Zongren gui guo

**李宗仁归国** (Li Zongren's return to China)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完全失败后,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12月去美国长期定居。在此期间,他一直关注中国大陆的变化,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

度和谈。同时数次表达希望能“叶落归根”,回祖国的心愿。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居住在香港的李宗仁的前政治秘书程思远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秘密邀请多次到北京,直接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李宗仁归国做准备。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于1965年6月持旅游护照只身飞赴欧洲,在瑞士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阻挠,借夫人郭德洁于7月18日飞抵广州、上海,并于20日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7月底,毛泽东会见李宗仁夫妇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的归国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Li Zuopeng

**李作鹏** (1914~ )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西省吉安人。1914年4月24日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谋、二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曾指挥收复山东临沂等城市。1946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3军军长。参加了三下江南等东北作战及辽沈、平津、渡江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等人。1967年6月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理论工作务虚会 (Conference on General Principles for Ideological Work)

为在思想理论战线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而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至2月16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名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160多人,主要是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还有20多位老同志。第二阶段从3月28日至4月3日,由中共中央召开,名为“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400多人,除第一阶段与会者外,增加了地方和军队主管宣传工作的干部。

中宣部长胡耀邦在会议第一天发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说明会议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总的说来会议第一阶段开得有成绩的。一是联系两年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深入揭发批评了三中全会前负责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央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二是提出和讨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与会者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年来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三是联系“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初步讨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功绩也是伟大的,但从1957年以后,特别是搞“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指出对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的一些错误要实事求是评价,不能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

但是,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讨论中,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会上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面对当时社会上错误思潮的泛滥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会上出现了思想上的摇摆以至右的偏差。会上的一些不慎重的言论,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作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借

口和护身符。

在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于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潮,主要是从右面来的那股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从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高度,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今天之所以特别加以强调,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相结合,破坏安定团结,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邓小平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充分说理的批驳,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与这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构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lirun guashuai lun

### “利润挂帅”论 (theory of “having profits in command”)

“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批判孙冶方经济理论观点时的用语。孙冶方认为,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体制中,抓利润指标,就如同让牛前进时,不是去拍牛腿,而是去牵牛鼻子,牛会很驯服地往前走。他的这一主张被陈伯达定为修正主义观点而加以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视为经济学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红旗》杂志1966年第6期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中说:“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

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的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利润挂帅一词首次在此提出,以后逐渐流传开来。

利润是价值范畴,是剩余产品的价值形态。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根本区别。但由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只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不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同时还反对使用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经济范畴。所以,1952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后,中国理论界对利润的性质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许多人认为利润是资本主义范畴,强调利润是修正主义观点。“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所操纵的舆论工具批判利润挂帅,是把社会主义利润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立起来,抹杀社会主义利润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混淆社会主义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的根本区别,反对社会主义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利润。粉碎“四人帮”后,利润被恢复了名誉。在经济范畴中及日常用语中“利润挂帅”一词消失了。

## liren liucheng zhidu

### 利润留成制度 (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tention of profits)

自1979年始,国务院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主要有全额留成、超额留成、基数留成加超额留成3种。全额留成是指全部利润都按一定的比例留成;超额留成,即计划内的利润不留成,超过计划的利润按一定比例留成;基数留成加超额留成,即以固定利润(当年计划利润额或上年实际完成利润额)为基数,本年利润中的基数部分按核定的较低的比例留成,超过部分按另定的较高的比例留成。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后,企业可以用所留成的利润建立3种基金: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这样将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对于提高企业的效率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 推荐书目

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86。

## Lian Zhan

连战 (1936~ ) 1993年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字永平,台湾省台南市人。祖籍福建省龙海县,1936年8月27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



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与外交硕士、政治学博士。1966~1967年分别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1968年返台，任台湾大学教授、政治系暨研究所所长，历时7年。1975年任驻萨尔瓦多“大使”。1976年初任国民党青年工作会主任。1979年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1979~1981年，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任“交通部长”。1987年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香港小组召集人。1988年任“外交部长”。1990~1993年任台湾省“主席”。1993年起任“行政院院长”，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1996年3月与李登辉一起竞选“总统”、“副总统”，当选“副总统”。1996年6月受李登辉指定兼任“行政院院长”，不久后辞去该职。是国民党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出身台南市望族，台湾已故政要连震东之子，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连战、宋楚瑜、陈履安、钱复）之一。1993年连家以300亿新台币资产，名列台湾富豪榜第12位。对政治学有研究，著有《民主政治基石》、《西洋政治思想》、《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1983~1984）》等书。

Liang Shuming

**梁漱溟** (1893~1988) 哲学家，教育学家。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8日生。早年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等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和著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长期从事文化学术研究，对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在哲学上杂糅中西，融通华梵，自成体系。早年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以后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

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主张知识分子与乡村人民打成一片，以合作的方式在经济上发展乡村生产，并以此奠定乡村政治及全国政治的基础，同时发展乡村教育，达成全中国的新文明。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1988年6月23日逝世。

Liang Sicheng

**梁思成** (1901~1972) 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1931年后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总部设计委员会成员，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中国建筑科学院研究室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常委和第三届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有开创性的贡献，发表《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首次作出系统论述。重视在现代建筑中汲取融合古代精华和民族风格，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1972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著作还有《中国雕塑史》、《中国建筑史图释》等，部分论著收入《梁思成文集》。

liang mian you tonggou tongxiao

**粮棉油统购统销** (state monopoly of the purchase and distribution of cereals, cotton and edible oi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粮食、棉花及棉制品、油料及食用油等实行的有计划的统一收购、供应的政策和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粮食连年丰收，1952年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

高水平，但由于人均粮食基数只有500多市斤，且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加，1953年夏季以后，国家出现了购少销多的局面。在自由交易的粮食市场上，投机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余粮农民则持粮观望，待价而沽。粮食市场面临极大困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按照陈云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发出了一系列对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的命令。从1953年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陆续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给；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私营粮食工商业，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管理粮食。1955年8月以后，又对农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在市镇实行按人定量、发放粮票、保证供应的办法。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棉花、棉纱、棉布和油料、食用油等也实行统购统销。由于国家开始就严格防止购过头粮，并根据当时市场价格确定购销价格，还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上进行交易，所以统购统销得到了城乡人民的支持与合作，使国家能在粮棉油紧缺的条件下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市场和物价，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促进作用。但统购统销终究是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缺乏自主权，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也得不到及时调整。1983年以后，随着粮棉油等生产供应情况的改善，国家开始逐步改变了统购统销政策。

liangshi liutong tizhi gaige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reforms in the circulation of grain)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对粮食流通体制所实施的改革。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对粮食价格体制、粮食购销体制、粮食储备体制、粮食补贴体制和粮食进出口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

1953~1978年，中国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流通体制和经济政策，

简称“粮食统购统销”。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陆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加快。改革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对统购统销体制实行部分改革。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逐步减少粮食统购数量，恢复集市贸易，开展议购议销，发展多渠道经营。第二阶段，1985～1992年，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双轨制”。即粮价“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定购价和市场价并存，用合同定购取代统购统销，农户合同定购以外的余粮自由上市。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1992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粮食“购销同价”，以往“购销倒挂”、财政补贴现象开始扭转。1993年底，各地陆续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粮食供应票证，98%的县放开了粮食价格和购销。在此基础上，国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例如建立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企业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离；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粮食内外贸协调统一体制；等等。为确保粮农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从1998年夏，特别是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管住粮源、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配套改革。

liangcan yigai sanjiehe

**“两参一改三结合”** (“Two Participations, One Reform and Three Combinations”)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和技术等方面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简称。是1958年中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职工群众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创造的企业管理经验，也是工业企业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重要制度和办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在总结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以及第一汽车制造厂创造的“两参一改”和“三结合”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后在毛泽东批示的“鞍钢宪法”中被确定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推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利于正确解决企业生产和管理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使干部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发挥职工群众管理和监督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合

理的规章制度，促进企业管理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企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Liangge fanshi

**“两个凡是”** (“Two Whatever’s”)

粉碎“四人帮”初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的错误政治主张和方针。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凡是毛泽东讲述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1月，他又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方针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复出和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影响了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阻碍了拨乱反正，延缓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而遭到不少干部群众的公开反对。同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随后在同中央办公厅两个负责人谈话时指明：“‘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5月24日，邓小平又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邓小平阐述了必须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针对“两个凡是”，分别写了以实事求是为主题的文章。1977年冬，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开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学习讨论。在1978年5月以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展开激烈争论，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批判了“两个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彻底否定了

“两个凡是”。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lianghang qiyi

**“两航”起义** (“two aviation corporations” uprising) 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脱离国民党政府的起义。

1949年6月，为彻底打垮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决定策动“两航”起义。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有关方面贯彻执行周恩来关于组织“两航”集体起义的各项指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11月9日“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联名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两公司4000名员工宣布起义，并驾驶12架飞机飞到北京和天津。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表示欢迎和慰问。事后留港的70多架飞机和其他财产也陆续回归祖国。“两航”起义的爱国壮举，直接带动了香港其他27个单位相继起义，为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建设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业务骨干力量。

liangzhong jiaoyu zhidu liangzhong laodong zhidu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du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dual labor system) 刘少奇提出的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的主张。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1964年，刘少奇在认真总结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次提出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阐明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含义、任务与长远目标、以及具体实施办法。1964年中共中央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定（草案）》中肯定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天津国营第一棉纺织厂首先创办半工半读学校之后，全国各地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相继创办了农业中学、劳动大学、工业大学，形成两种教育制度并存的局面。但由于受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半工（农）半读教育也出现了不顾客

观条件，急躁冒进，一哄而起的偏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种类型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大多停办，只有少数坚持下来。1964年，在刘少奇的再次倡导下，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成立了专管半工(农)半读教育的机构，领导和推进半工(农)半读教育的试验工作。此后，半工(农)半读教育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半工(农)半读教育体系。据统计，到1965年全国农村办起了耕读小学，在校学生达1360万人；农业中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在校学生达113万人；全国城市共办起半工半读中等学校4000余所，在校学生达80多万人；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办起半工(农)半读的高等学校109年，共有学生2.8万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这一主张受到错误批判，半工(农)半读学校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此后，刘少奇的这一主张及其试验得到重新肯定，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贯彻实施党的教育方针，改革原有教育体制，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有益尝试。

#### Liao Chengzhi

**廖承志** (1908~1983)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东惠阳人。1908年9月25日生于东京。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子。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脱离)。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德国，并转入德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支委、书记。1930年夏赴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中共川陕苏区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7年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1月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后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后，

任外交部顾问、党组第二副书记。1978年3月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曾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华侨大学校长。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6月10日逝世。出版有《廖承志文集》。

#### Liao Hansheng

**廖汉生** (1911~ )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湖南省桑植县人，土家族。1911年11月14日生。1928年春参加工农武装斗争，1929年参加县农民协会和苏维埃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副大队长，红三军书记员、秘书、7师党委书记、9师政委，红二军团组织部部长、6师政委，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716团政委，独立2旅、358旅副政委，中共中央党校组织教育科科长，新四军5师3军分区政委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参加了雁门关伏击战、百团大战和晋西北、冀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江汉军区政委、晋北野战军副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一军政委，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和中共西北局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任军事学院院长、中共华东局委员。1961年任北京军区政委、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达五年半之久。1973年后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8年连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被选为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

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廖汉生回忆录》。

#### Lin Biao

**林彪** (1907~1971) 原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副主席，原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生。曾就读于武昌共进中学。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改编为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随军转战到井冈山，任红军第四军28团营长、团长。后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任红一军(红一军团改称)军长、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到陕北后，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委。红大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后，继任校长兼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坂垣师团，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至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指挥了四平、新开岭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东北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了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Lin Biao di-yi hao mingling

**林彪一号命令** (Lin Biao's number one order)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下达的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见全国战备高潮。

Lin Biao fangeming jituan

**林彪反革命集团** (Lin Biao's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林彪为首，以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一度称为“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或“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林彪、叶群、林立果、江腾蛟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1965年冬至1966年春，在林彪诬告打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为其积极编造假材料、作伪证。“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等人一度受到冲击。1967年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机会，利用北京军事院校等单位两派的矛盾，制造武斗事件。林彪表态支持吴、李、邱等人。此后他们便紧跟林彪。这次事件称为五一三事件。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邱会作、叶群等为成员。至此，初步形成林彪集团。1968年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杨余傅事件”（见

杨、余、傅冤案），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掌握了中央军委的很大权力。他们和江青集团互相勾结，打击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群众，共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同时，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由于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江青等人排挤，也投靠了林彪集团。

1970年，在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过程中，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制造分裂，企图攫取更多权力，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其后，中共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由此，林彪集团开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具体指挥空军内的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等人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组成“联合舰队”和“战斗小分队”等。1971年9月，林彪获悉毛泽东在南巡中对他们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计划失败以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遂于9月13日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等人并没有停止阴谋活动。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吴、李、邱等人离职接受审查。10月3日，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林彪集团宣告覆灭。中共中央陆续将林彪事件通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经过审理后，确认林彪、江青集团都是以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叶群、林立果、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分别判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有期徒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分别被判刑。

推荐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1981年1月25日。

Lin Boqu

**林伯渠** (1886~1960) 中共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3月20日生。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就读。1904年赴日本，考入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曾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20年到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兼中央干部会议书记。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1925年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农民部部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科入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办事处主席，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1949年参与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逝世。著有《林伯渠日记》。

Lin Feng

**林枫** (1906~1977) 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名郑永孝，又名郑伯桥、郑凌风，曾用名罗衡。黑龙江望奎人。1906年9月30日生。192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创办平民夜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曾

任中共北平工学院支部书记。1932年任河北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全国反帝大同盟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冬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书记。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1935年冬复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3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年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中共山西省工委（后改为省委）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山西省委书记。1938年5月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1939年晋西事变后，任晋西区党委书记。1942年秋起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晋绥军区副政委、政委。1945年8月去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满分局书记，东满军区（后改称吉林军区）政委。1946年8月主持召开东北各省联席会议，成立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同年10月联合办事处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49年8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统战部代部长、监察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7年9月29日逝世。

Lin Mohan

**林默涵**（1913～ ）文艺理论家。原名林烈。福建武平人。1913年1月10日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福建、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新闻学院，次年回国，先后任《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民国周刊》编辑，并开始撰写文章。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参与编辑《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1944年冬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香港参与编辑《群众》、《大众文艺丛刊》。撰写了大量杂文和文艺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兼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江

青集团残酷迫害。他长期担负文艺事业的领导工作，撰写了大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的论文。1960年发表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一文影响最大。他的文艺论文和杂文都具有观点鲜明、风格明快的特点。主要著作有：论文集《在激变中》、《浪花》；杂文集《狮和龙》、《林默涵劫后文集》等。他的《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等文，曾引起相当的争论和评论。

Lin Qiaozhi

**林巧稚**（1901～1983）医学家。女。福建厦门人。1901年12月23日生。192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于，获医学博士学位，受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第一位女医师。1932～1940年先后在英国、美国等从事考察研究工作，期间曾在英国曼彻斯特与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在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并从事研究。回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教授，北京妇产医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妇产科杂志》总编辑。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常委，全国妇联联合会副主席。一生从事妇产科科研、医疗和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解决了大量疑难病症。早年对胎儿宫内呼吸曾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滋养细胞肿瘤发生及发展规律、女性盆腔结核的发生及其治疗有很高造诣。进行了大量科普宣传和妇幼保健工作，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优良的医德。是中国现代妇产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主编的《妇科肿瘤》获1982年全国优秀图书奖。1983年4月22日逝世。

Liu Baiyu

**刘白羽**（1916～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北京人。1916年9月2日生。1934年考取民国大学中文系。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1938年春赴延安。1944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出版散文集《延安生活》、短篇小说集《金英》等。解放战争时期，任随军记者，创作了大量作品。《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等短篇小说是其代表作。抗美援朝期间，两度赴朝，出版了通讯报告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和

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等。1955年后，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同时坚持散文创作，主要散文集有：《火炬与太阳》、《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青春的闪光》、《红玛瑙集》、《晨光集》、《红色的十月》、《芳草集》等。他的散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气息，笔触雄健，意境高远，行文富于政论色彩以及独特的抒情风格。

Liu Bocheng

**刘伯承**（1892～1986）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元帅。原名明昭。四川开县人。1892年12月4日生。1911年在万县参加学生军，响应辛亥革命。次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5年起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任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曾被誉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领导泸顺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后任暂编15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留学，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被降职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后任先遣队司令，率部为全军开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指挥所部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长生口和响堂铺、长乐村、磁武涉林等战役战斗，在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以129师为骨干，领导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抗日根据地，连同冀鲁豫根据地，统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与政委邓小平一起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1945年9月和10月相继指挥了上党、邯郸战役。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率部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1947年夏率所部主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兄弟部队一起大量歼敌，对



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巨大作用。后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1949年11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以大迂回、大包围和远距离追击动作向西南进军,解放四川、云南、贵州3省和西康省大部地区。同年12月,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训练总监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作出巨大努力。他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逝世。

Liu Danian

**刘大年** (1915~ ) 历史学家。湖南华容人。1915年8月1日生。1936年毕业于湖南长沙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1948年,先后任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连续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中美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美国侵华简史》、《美国侵华史》、《台湾历史概述》(合著)、

《中国近代史问题》、《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主编《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中国史稿》(第四册),编辑《范文澜论文集》、《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等。

Liu Dehai

**刘德海** (1937~ ) 琵琶演奏家。1937年8月13日生于上海。1957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琵琶,毕业后留校。196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70年任中央乐团独奏演员。1983年后再度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八届委员。演奏继承传统技法并有所创新,在30多个国家演出获得较高声誉。主要演奏作品有《狼牙山五壮士》、《浏阳河》、《彝族舞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创作琵琶曲有《草原英雄小妹妹》等。

Liu Fei

**刘斐** (1898~1983)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为章。湖南醴陵人。1898年10月25日生。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学堂。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主任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留学日本。1933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少将高参、广西民团干校教育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国防专门委员会委员,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后任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第五战区临时参谋团成员、参谋处处长,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军政部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1949年4月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赴香港。同年8月与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9月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被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二届中央委

员,第三、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3年4月8日逝世。

Liu Fuzhi

**刘复之** (1917~ ) 1988~1993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广东省梅县人。1937年在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一二九师师长和师政委秘书、师政治部锄奸科科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科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兼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Liu Guoguang

**刘国光** (1923~ ) 经济学家。江苏南京人。1923年11月23日生。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经济学。1946年毕业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助教。1948~1949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49~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并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1955年在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55~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组长、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1980~1982年兼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果的研究。较早地提出从宏观经济和综合平衡角度研究固定资产再生产问题;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方面,把综合平衡同经济效益、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研究;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新旧体制并存和双轨制、所有制的改革及经济发展战略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刘国光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

理论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

Liu Haisu

**刘海粟** (1896~1994) 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槃。1896年3月16日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受到良好的美术教育。1912年在上海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在办学宗旨中提出研究西方艺术,复兴和发展中华艺术。1915年突破封建束缚,在学校设置人体模特写生课程,并开办学生习作展览,引起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被斥为“艺术叛徒”。1919年举办人体油画展览,并在教学中雇佣女模特,再次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地方封建顽固人物和军阀孙传芳的责难,仍坚持斗争10年之久,终得胜利。1919年以后曾多次赴日本、欧洲、东南亚讲学、参观、举办画展和交流艺术。抗日战争时期,将在国外办展筹得的所得全部捐赠国内抗日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当选为第三、四、五、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任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开拓工作,取得杰出成就,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美术人才。他是最早介绍和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文章和讲话丰富了中国美术理论,在中外美术交流史上有独特贡献。代表作有中国画《荷花》、《九溪十八洞》,油画《前门》等,尤以黄山题材绘画气势宏阔、力感充沛,闻名于世。曾获得世界文化奖、美国世界会议金焰奖、欧洲棕榈金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一级勋章等。主要著作有《海粟黄山谈艺录》、《刘海粟艺术文选》等。1994年8月7日逝世。

Liu Huaqing

**刘华清** (1916~ )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黄安(今红安)花桥乡刘家院子(今属大悟)人。1916年10月21日生。1929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刘家院子村共青团支部书记。1930年5月起,先后任黄安县少共二程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兼少先队总队长和游击中队中队

长,陂安南县塔尔岗少共区委书记、八里湾区委书记。同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陂安南县军区指挥部少共书记、红安中心县军区指挥部团委书记兼少共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交通队政治指导员、参谋、秘书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后,任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科长,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1934年重建红军25军后,在军政治部先后任组织科、宣传科、文印科科长,参加了红25军的长征和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长征到陕北后,调任红15军团政治部敌工部宣传科科长、红7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31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机要科科长,红31军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秘书长、机要科科长,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后任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师供给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冀南区1939年春季反“扫荡”和百团大战。1941年起任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平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军区第六分区副政委,冀南军区第七支队政委。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6旅政委,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等战役。1947年随军进军大别山,在进攻羊山集作战中所部第六旅荣立大功一次。并受到通令嘉奖。1948年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次年1月任第二野战军11军政治部主任,参加渡江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校党委书记,负责学校政治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10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4年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后,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1961年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1965年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第七研究院院长。1966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协助聂荣臻统筹海军和全军的装备科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出任海军副参谋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国防科委副主任。197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1982年任海军司令员。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次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

主席,翌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92年10月至1997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是中共第十二、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Liujiaxia Shuidianzhan

**刘家峡水电站** (Liujiia Gorge Hydropower Station) 中国第一个装机容量超百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永靖县,兰州市西南100千米处。1958年9月开工,1961年因国民经济困难暂时停工,1964年复工。1969年3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4年建成,1978年完成收尾工程。

修建水电站共投资6.15亿元。电站由拦河坝、溢洪道、泄洪隧洞、发电厂房、变电站组成。大坝总长998.25米,坝顶高程1739米。河床部分主坝最大坝高147米,坝顶长204米。发电厂安装5台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2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5.8亿千瓦时。所发电能向兰州、西宁以及陕西关中地区输送。刘家峡水电站是西北电力系统的骨干电站,同时具备灌溉、防洪、防凌、航运和养殖等综合效益。

Liu Jingji

**刘靖基** (1902~1997) 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苏常州人。1902年9月15日生。1917年于江苏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肄业。1919~1930年任苏纶纱厂、宝成纱厂业务员、业务部主任。1930年任常州大成纺织染厂经理。1936~1949年任南京江南水泥厂常务董事、副董事长,安达纺织厂董事、总经理。1949年后任安达纱厂总经理,华东区原棉联购处总经理,上海大隆机器厂董事长,上海市棉纺工业公司经理。1956年后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爱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爱建金融公司董事长,被选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顾问。1997年2月15日逝世。

Liu Kaiqu

**刘开渠** (1904~1993) 雕塑家、美术教育家。安徽萧县人。1904年10月1日生。1920年入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赴法国留学，发起组织中国留法艺术研究会，向国内介绍欧洲绘画、雕塑艺术。193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回国后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主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流离于湖南、四川等地，创作了一批弘扬民族抗争精神的雕塑作品《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等。1946年在上海参加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文联主席、杭州市副市长。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调到北京，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设计和建造，完成主体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等。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家协会会长，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当选为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毕生致力于雕塑创作和教学。艺术风格写实、细腻、简练。编撰著作有《刘开渠雕塑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等。1993年6月25日逝世。

Liu Lantao

**刘澜涛** (1910~1997) 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又名刘华甫。陕西米脂人。1910年11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米脂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定边县工委书记、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委员。1936年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绥德警备区特委书记。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先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北岳区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晋

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1945年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顾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12月31日逝世。

Liu Ningyi

**刘宁一** (1907~1994)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名史连甲。

河北满城人。1907年12月生。1924年入直隶第四师范学堂，任校学生会主席。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任中共满城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唐山煤矿林西区书记。1931年在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4月在天津被捕。1932年1月取保释放后赴唐山，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7月第二次被捕。1933年5月，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1937年8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工运部部长、保卫部部长。1944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时筹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1948年8月参与主持筹备和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并任中共全总党组副书记。同年兼任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书记处书记，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世界工人联合会副主席、理事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代部长。1965年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6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

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政协第一、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94年2月15日逝世。著有《历史回忆》。

Liu Qingshan Zhang Zishan'an

**刘青山、张子善案** (corruption case of Liu Qingshan and Zhang Zishan) 在1951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期间揭发出来的全国首例干部贪污大案。

刘青山，河北省安国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下没有屈服。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斗争中，带头卧轨，1934年被捕入狱，又进行绝食斗争。二人均为革命做过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青山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先任天津专区专员，后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二人在天津地委任职期间，仅筹集所谓“机关生产费用”一项，直接盗用的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数额达171亿元（合新币171万元）左右。刘青山、张子善勾结蜕化干部、不法私商倒卖木材、马口铁，破坏国家法令，中饱私囊。有账可查的二人私用、送礼、销毁票据共约19亿元（合新币19万元）。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案发，举国震惊。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开除二人党籍，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将二人逮捕法办，并上报中共中央。当时有人说情，希望对他们从轻发落。毛泽东坚决表示不姑息养奸，为“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亲自下令处决了二人。

Liu Shaoqi

**刘少奇** (1898~1969)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湖南宁乡人。1898年11月24日生。少年时期在家乡上过私塾和小学，1919年中学毕业。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工作。不久，受党的委派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主任。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春赴华北，任中共中央代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过去中共党的秘密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提出了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的理论和策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坚持党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同陈毅等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精辟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朱德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了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领导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4月、5月间，受毛泽东的委托，赴天津调查研究，扭转天津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混乱局面。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商谈两党关系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问题。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他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成为建国初期指导全国各地土地改革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提出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规定了方向。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他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并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注重实效的政策措施，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长期主持中央一线的工作，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施行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党的建设方面有突出的重要建树，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等，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1960年、1963年和1964年他先后出访苏联、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

（今孟加拉国）等国，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对党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充满信心，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作出专门的决定。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上下两卷）。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Liu Shaoqi Deng Xiaoping fangwen Sulian

刘少奇、邓小平访问苏联 (Liu Shaoqi's and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1960年11月5日至12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典礼，并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在此期间，参加了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在苏联期间，刘、邓参加了莫斯科市召开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祝大会，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并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11月至12月初，刘、邓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2月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由于出席会议的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都希望团结，会议没有接受苏联的一些观点。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中苏双方各自都作了一些让步。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随后，刘、邓率代表团到苏联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访问，所到之处，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12月6

日，代表团回到莫斯科。12月7日，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馆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并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欢送宴会。12月8日，刘、邓率代表团回国，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Liu Shaoqi fangwen Yazhou si guo  
**刘少奇访问亚洲四国** (Liu Shaoqi's visits to four Asian countries)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4月12日，刘少奇率代表团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受到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热烈欢迎。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在苏加诺总统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茂物、万隆、日惹、巴塘等地，并同苏加诺总统进行了会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4月20日，刘少奇率代表团开始访问缅甸，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并同奈温进行了友好会谈。4月26日，离开缅甸回到中国昆明。5月1日，刘少奇率代表团到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欢迎。参加金边市民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的群众集会，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了友好的会谈。两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联合王国联合声明》。5月6日，回到昆明。5月10日，刘少奇同陈毅等离开昆明前往河内，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欢迎。11~15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第一书记黎笋、政治局委员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等举行会谈，主要交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在访问期间，刘少奇等还出席了河内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举行的20万人群众集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观了越南阮爱国党校等。5月16日，刘少奇主席与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刘少奇对以上亚洲4国的访问，加深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友谊。

Liu Shaoqi pingfan

**刘少奇平反** (rehabilitation of Liu Shaoqi)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平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本人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由此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多次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的冤案进行复查。但中央内部有一些人对平反问题持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内外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呼声更加强烈。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3月，中组部对与刘少奇一案直接相关的王光美的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3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派专人将刘少奇的骨灰盒从开封运回郑州。同时，将刘少奇在开封病逝前后的情况及骨灰寻找的情况，向中央和中纪委作了书面报告。11月，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利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和中纪委也抓紧做统一党内思想的工作，克服来自政治局内部的阻力。

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刘少奇冤案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为全党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做了必要的准备。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①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②在适当的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会。③过去因刘少奇

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④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提出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等人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5月17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等在北京为刘少奇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彻底推倒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刘少奇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受这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都获得了彻底的平反。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

#### 推荐书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Liu Shaoqi xuanji

**《刘少奇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Liu Shaoqi)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重要著作集，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81年12月和198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种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日、俄、西班牙文本。选集收入刘少奇从1926年到1965年的重要著作共76篇，约32万字。

上卷收入了刘少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重要著作，主要反映了刘少奇在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建树。刘少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中国工人运动方策略的阐述，构成了他在这一时期著作的主要内容。上卷开卷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是刘少奇1926年5月作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在大会上报告《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结论部分。文章分析了

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阐明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方针，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提出了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正确主张。1936年长征结束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平津指导华北党的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当时仍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全面阐述了党的新政策。在《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文章中，他批评了要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用官僚主义和空谈的态度对待党的决议等错误主张和行为；强调党和群众工作在新形势下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要接近群众，争取群众，进行长期耐心的艰苦工作，以壮大革命队伍，打击主要的敌人；号召全党同志进行艰苦的工作和学习来完成这个转变。刘少奇关于白区党的工作的这些文章，是对党在白区工作中犯了长期的“左”倾错误路线之后的经验总结，是使党的白区工作路线开始实行转变的重要文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受命于危难之际，先后在华北和华中地区领导敌后抗日斗争，对游击战争的战略策略、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党的建设等问题写下了大量的著述。《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论抗日民主政权》、《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等文章，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民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等正确主张，有力地指导了华北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这期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提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延安整风期间被列入干部必读文件之一，成为广大党员进行学习的有力思想武器。1943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1945年5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对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为彻底打败蒋介石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是他1945年9月在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时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在这里，刘少奇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1947年9月他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的《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是一篇对全国土改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献。刘少奇还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精心的准备，他在1949年6月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都应鼓励它们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组织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下卷收入了刘少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重要著作，主要反映了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的建树。这时期，刘少奇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全面工作，有不少中央的重大决策是通过他的报告来阐述和发表的，下卷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1950年6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1954年9月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从国家的性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基本内容。1956年9月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1962年1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他在这次会上口头所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并代表党中央承担了责任，要求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

同时，刘少奇作为党的理论家，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写下了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文章。《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确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大发展轻工业，并实现农业机械化。《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述了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通过商品流通这个环节，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思想。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国营工厂中已经不存在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但仍然存在着工厂管理机构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1957年4月所作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刘少奇年初南下五省调查后的总结讲话，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同时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上，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并具体阐述了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后作了《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等重要讲话，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当前的严重局面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充分论述。经济形势好转后，刘少奇又为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试办托拉斯》一文中，他提出了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合人民的需要的思想。

《刘少奇选集》集中反映了刘少奇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集中反映了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想理论成果。

Liu Shaoqi yuan'an

**刘少奇冤案** (fabricated charge against Liu Shaoqi)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重大冤案。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之一。60年代初以来，由于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上的分歧，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体现党对运动的领导，采取了向北京各学校和其他一些单位派工作组的方式，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见工作组事件）。为此，毛泽东断言党内存在一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制定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受到批判并被迫检讨。全会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选，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至第8位，其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不再提及。这时，刘少奇的问题仍被说成是党内问题，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然而，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诬陷、煽动下，党内和社会上对刘少奇的批判逐步扩大升级。同年12月，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任组长、目标间接对着刘少奇的“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进行审查。

1967年1月，刘少奇被取消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同年3月，经毛泽东和部分中央常委同意，又成立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集中审查刘少奇历史上的所谓“叛变”问题。同年4月起，全国报刊舆论掀起批判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浪潮，刘少奇被不点名地指斥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遭到批斗和迫害。这时，江青等人又指示专案组“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企图将历史上“一贯反动”乃至“叛徒”、“内奸”的罪名强加给刘少奇。在江青等人操纵下，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专案组采用种种非法手段捏造、拼凑了大量伪证材料，于1968年8月上报中央；而调查过程中得出的那些证明刘少奇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都一概遭到扣压。

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对刘少奇作出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刘少奇不仅不允许参加全会，而且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会后，全国报刊对刘少奇公开点名批判。1969年10月，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押往河南开封，同年11月12日，在开封囚禁处含冤去世。此后，对他的批判仍在继续进行。全国由此受株连而错判案件多达26 000余件，涉及28 000多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当年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及其处理决定，刘少奇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 推荐书目

黄峥著：《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Liu Sizhi

**刘思职** (1904~1983) 生物化学家，免疫化学家。福建仙游人。1904年3月15日生。192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25年留学美国，1926年毕业于美国西南大学，192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北平协和医院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中国生理科学会主席，《中国生理学杂志》主编，中国生物化学会常务理事。195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蛋白质生物化学及免疫化学的研究，是用定量方法研究免疫化学的创始人之一。30年代他就创造性地用化学定量方法研究抗原抗体的沉淀反应，分析了免疫沉淀物中的抗原抗体比例，并定量回收抗体，还证明了抗原抗体的结合反应遵守化学平衡原则，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协助吴宪教授，用实验证明吴宪的“蛋白质变性学说”（即蛋白质的

变性是由于蛋白质分子内折叠变为舒展），这一学说迄今仍为国际生物化学界所公认。50年代初由他主持首次制定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统一了全国的生物化学名词。1954年他自编的《生物化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中文生物化学教科书。1983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

Liu Xianzhou

**刘仙洲** (1890~1975) 机械工程师。河北完县人。1890年1月27日生。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程科，后在保定育德中学任教。1924年后，历任北洋大学校长，东北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对中国农业机械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贡献，试制过新式水车等。对中国机械史的研究也有很深造诣。长期从事机械工程教育工作，编写了多种教材，培养出一批科技人才。1975年10月16日逝世。著作有《机械学》、《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

Liuqing

**柳青** (1916~1978) 现代作家。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1916年7月2日生。中学时代开始练习写作，“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任学校《救亡线》编辑，后又主编《学生呼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1943~1945年在米脂县农村担任基层工作。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是解放区一部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1949年调北京参与《中国青年报》创办工作。1952年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长期落户，兼任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1978年6月13日逝世。主要代表作《创业史》（1960年出版第一部，1979年柳青逝世后出版第二部下卷）通过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细腻地描写了中国农民在互助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和心理变化。小说人物众多，结构宏大，凝结着作者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体现了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和美学理想。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赢得很多赞扬，也有激烈的争议。曾被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Liu Yazhi

**柳亚子** (1887~1958) 民主人士, 诗人。原名慰高, 字安如; 后改名弃疾, 字亚子。江苏吴江人。1887年5月28日生。青年时期即献身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1902年加入中国教育会。次年入上海爱国学社求学, 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 进一步确立了反清革命思想。在从事诗文创作的同时, 开始在《国民日报》、《江苏》等杂志上发表反清诗文, 成为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积极分子。1906年加入同盟会, 同年加入光复会。1907年冬在上海和友人陈去病、高旭等发起组织南社。1909年正式成立南社, 任书记员、编辑员、主任等职。辛亥革命后, 任上海《天铎报》主笔, 以文学鼓吹革命, 反对袁世凯。五四运动后,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 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月刊, 提倡新文化, 宣传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同年, 与叶楚伦、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组织新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他积极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 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6年春, 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在广州配合宋庆龄、何香凝等批判蒋介石反共的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 逃往日本。次年归国, 与鲁迅、何香凝往来, 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声援左翼文化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协助何香凝等组织国难救护队, 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 积极参加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曾撰文谴责汪精卫等汉奸。1941年, 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反对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宣言, 拒绝参加中央全会, 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5年11月, 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 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主要著作有《柳亚子诗词选》。

232

Long Yun

**龙云** (1884~1962) 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人。1884年11月27日生。1913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 曾任云南军阀唐继尧部第五军军长、昆明镇守使。1927年发动倒唐(继尧)政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代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至1929秋, 先后打败各派势力, 统一云南。1931年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1935年、1936年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黔、滇时, 他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黔滇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 陆军副总司令等职。1945年, 因同情和支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众运动, 被免职, 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8年潜往香港,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当选为中央委员, 积极推动在云南任省主席的卢汉起义。同年8月与其他民主派人士联名通电, 脱离国民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时, 他被列为特邀代表,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由香港回到北京。曾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Lou Shiyl

**楼适夷** (1905~ ) 翻译家、作家。浙江余姚人。1905年1月3日生。1925年参加革命, 并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 并加入太阳社。次年留学日本, 专修俄罗斯文学。1931年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任《前哨》(第二期改名《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编辑。后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7年任武汉《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编辑, 《文艺阵地》代主编。1944年后任浙东根据地文教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上海《时代月刊》编辑, 创办香港《小说》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编审局二处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

副社长、副总编辑、《译文》编委等职。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名誉副主席等。重要译作有: 高尔基的《在人间》、赫尔岑《谁之罪》等, 日本作家井上靖、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等的小说。另有散文集《话雨录》、《适夷散文集》等。早期文学创作有多方面成就, 对文学编辑出版做出卓著贡献。

Lu Jiayi

**卢嘉锡** (1915~ )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政协第七、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物理化学家。福建厦门人(原籍台湾台南)。1915年10月26日生。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和美国国防研究会玛州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1946~1960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部长、校长助理。1960~1980年任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华东、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当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4年11月被欧洲科学院选为院士, 1985年7月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常务理事。198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华侨委员会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七、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 第九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 第十、十一届中央主席, 第十二届名誉主席。在物理化学, 特别是结构化学的研究方面, 取得一系列成就。提出的分子结构定理和理论分析, 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所著《结构化学研究中若干辩证法问题》论文, 获得好评。

Lushan Huiyi

**庐山会议** (Lushan Conference)

1959年7月至8月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举行。会议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统



一全党认识，调整部分计划指标，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与会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讨论中，与会者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时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远远不够，应当进一步深入进行。也有不少与会者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彭德怀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写信的举动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讨论中，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也有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甚至认为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绩。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否定。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7月26日，毛泽东又在的一封信上批示，认为党内外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起来。会议的主题由纠“左”转为反右，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形成一边倒的局面。7月26日以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升级，许多人指责彭德怀等人要在庐山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泽东，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为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作了准备。

1959年8月2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庐山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修改指标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将钢铁、粮、棉等指标压低；第二是路线问题。他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现在基本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

全会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许多与会者不但抓住他们的信或发言中的一些提法任意引申、无限上纲，还从历史上彭德怀、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大做文章，说他们一贯反对毛主席，是党内的一大隐患，给他们扣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帽子。有些人还捕风捉影，给他们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彭德怀、张闻天在会前访问过东欧一些国家，他们的信和发言便被怀疑有国际背景；仅凭有人发现周小舟等人7月23日晚上去过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就诬指他们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特别是追查出他们议论过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那样会犯错误的问题后，批判斗争达到高潮。彭德怀等人被毫无根据地指责为“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反党集团”，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反对“政治挂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

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全会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威信考虑，彭德怀等人承认和检讨了“错误”。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使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扩大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延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危害。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4。

#### Lu Dingyi

**陆定一**（1906～1996）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苏无锡人。1906年6月9日生。192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曾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干事。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长，同年出席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1928年底赴莫斯科任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年实话》主编，团中央组织部干事。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

治部副主任。1942年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兼任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1979年9月被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96年5月9日逝世。出版有《陆定一文集》。

Lu Yongxiang

**路甬祥** (1942~ ) 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浙江慈溪人。1942年4月28日生。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赴德国留学，1981年获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工程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事流体传动和控制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他领导的研究室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之一。他为中国电液比例控制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负责的“电液比例控制新技术”获1993年机械工业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79年在联邦德国学习期间，在欧美等专利局登记了“二通插装式电液比例调速装置”等五项发明专利。与人合作在德国和中国登记了“耐高压极化式双向极化式比例电磁铁”等四项专利。1997年由于流体传动与机械电子控制自动化方面的贡献，获德国鲁道夫·狄塞尔奖。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04~1998) 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1904年12月24日生。

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考取江苏省公费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成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当选为第三至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对于汉语文字规范化、文字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外语教学等学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中国人学英语》、《汉语语法论文集》。1998年4月9日逝世。

Lü Zhenyu

**吕振羽** (1900~1980) 历史学家。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湖南武冈(今邵阳市)人。1900年1月30日生。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攻电机工程，1926年毕业。1927年赴北平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中国实际，撰文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点。1932年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后任中国大学专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兼任民国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朝阳大学的殖民地问题等课程。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6月到1937年6月，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面从事抗日活动，一面继续历史研究。1942年出版了《中国社会诸问题》。1948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和《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

员、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此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兼职教授和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此期间，写了大量史学论文，部分收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1963年突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达十多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在逆境中写下了二十万言的《史学评论》，吟成三千余首诗词诗集《学吟集初草》。1980年7月17日病逝于北京。

Lü Zhengcao

**吕正操** (1905~ )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辽宁海城人。1905年1月生。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647团、691团团团长。1933年参加热河抗战。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参加西安事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长期领导铁路部门工作，为中国的铁路交通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吕正操回忆录》。

lüyou ye

**旅游业** (tourism) 为旅游者在旅行游览中提供各种服务的第三产业。

**起步基础**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 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国际市场上都有着许多独特的垄断优势, 这是旅游业起步的客观基础和重要前提。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中国旅游工作才在各类旅游设施缺乏、几乎没有旅游经营意识的基础上起步, 对旅游和旅游业的认识逐步深化。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国际威望也与日俱增, 不仅有许多外国人想来看看中国的新面貌, 而且广大海外侨胞、外籍华人也想回国探亲访友, 因此, 创办旅行社、开展旅行业务, 很快就被提到国家对外事务的议事日程上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1954年4月15日成立了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第一家全国性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 负责接待访华外宾的食、住、行、游等事务。1957年4月24日成立了中国华侨旅行服务总社, 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华侨、港、澳同胞探亲旅游接待服务。为了加强对全国旅游工作的统一领导, 1964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并确定了发展旅游事业的方针政策是“扩大对外政治影响”、“为国家吸取自由外汇”。1965年, 全国接待外国旅游者达1.2877万人次, 创历史最高记录。然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使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接待人数急剧下降。70年代初期, 旅游事业逐步恢复。1976年全国接待外国旅游者近5万人。粉碎“四人帮”后, 旅游业有所发展。1978年, 来华旅游入境人数180.9万人次, 其中外国人23万人次, 旅游创汇2.63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41位。

在50年代初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二十多年间, 我国旅游工作一直属于民间友好往来的范畴, 旅游设施总体规模很小, 结构单一, 旅游接待主要从政治影响考虑, 旅游业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 我国旅游业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冬至1979年间, 邓小平多次指示: “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 要突出地搞, 加快地搞”、“房子要快盖起来, 下决心要快, 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 然后自己发展”, 1979年5月, 国务院批准北京等4个城市利用侨、外资建造6座旅

游饭店; 同年9月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提出旅游工作要从“政治接待型”转变为“经济经营型”, 会议并就旅游住宿和旅行社外联权等作了重要决定。为了加强领导, 国务院还成立了以主管副总理为首的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各地政府的领导小组也相继成立。国务院还相继批复了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 全国旅游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1986年, 国务院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旅游的产业地位首次得到了明确, 标志着旅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1988年底, 全国旅游涉外饭店总数已达1496座、拥有客房22万间, 较1980年增加了5倍以上。住宿设施的短线制约有了根本性缓解, 旅游交通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入境旅游人次连年持续快速增长, 旅游目的国形象日渐鲜明, 产业地位开始由产业业绩支撑。到1988年, 来华入境旅游者达到3169万人, 为1978年的17.5倍, 其中外国人184万人, 为1978年的8倍; 旅游外汇收入22.47亿美元, 为1978年的8.6倍; 十年间旅游创汇累计达119亿美元, 对弥补贸易逆差和平衡国际收支起了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 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旅游业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大旅游的市场观念已深入到全社会和相关部门, 走出了一条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路子。1992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点, 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相继把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明确提出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产业或先导产业来发展。

**体制沿革**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 提出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直属国务院的管理总局, 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成立旅游局, 成立旅游事业领导小组等意见。7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些意见。1982年, 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指导思想, 国家旅游局与国旅总社实现政企分开, 进一步强化了统一管理全国国际国内旅游业的职能。1982~1985年, 通过下放外联权、推行政企分开和各种经济责任制, 我国旅游业成功地实现了从“事业型”向“产业型”的历史性转轨。1984年7月, 中央提出了加快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要坚持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一起上,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同年12月, 国务院把发展方针进一步明确为“四个转变”, 即: 从过去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 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变为国际旅游、国内旅游一起抓; 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一起上,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 旅游经营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化经营。1986~1992年, 以定点管理、星级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全行业管理体制开始建立, 旅游企业集团陆续成立, 有力推动了旅游经营的网络化和规模化。1992年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以市场为运作基础与目标取向的旅游经济体制改革有了重大进展, 旅游经营、管理和服务进一步加快了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步伐。根据《旅行社管理条例》, 1997年顺利实现了由一、二、三类旅行社向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的转变。1998年,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部署, 按时完成了国家旅游局的机构改革, 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水平和工作效率, 国家旅游局如期完成了与经济实体脱钩工作。

**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20年来, 旅游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产业基础有了实质性提高** 从旅游住宿到旅游交通, 短缺“制约点”逐一消除, 旅游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到1997年底, 我国共有旅游涉外饭店5201座, 客房70.17万间, 较1980年可涉外饭店203座、客房3.2万间, 分别增长24.6倍和20.9倍, 其中星级饭店总量达到2724座; 共有旅行社5496家, 比1988年的1573家增长2.49倍, 中国国际社1163家。国内社4333家。旅游交通条件有了根本性好转, 基本形成了网络辐射面广、便民设施较全、以熨平需求季节波动为目标游客动量统筹与流向调配能力增强的旅游交能服务系统, 在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各旅游景区(点)联点成片、大景区内串点成线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特别是旅游交通的总运量科学预警和调配, 地区流向布局趋向合理, 民航客运能力持续增长, 国际国内航线大幅度增加, 机场建设步伐加快, 铁路、公路和水运均有明显改观。餐饮、旅游娱乐、旅游购物环境改善, 质量进一步提高, 不仅满足了旅游的基本需要和高层次需要, 旅游活动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

市场结构逐渐完善 经过 20 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逐步实现由入境旅游单点支撑到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相互融合、互补互促。坚持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国旅游的总方针,国际旅游市场发育已趋成熟;起于 80 年代前期、兴于 90 年代后期的国内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一个坚实基础;边境旅游和公民出国(境)旅游也在稳步发展。1998 年来华旅游人次达 6347.84 万人次,继续居世界前列,是 1978 年的 35.27 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26.02 亿美元,世界排名从 1978 年的 41 位跃居到第 7 位,是 1978 年的 47.92 倍;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达 6.94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 2391.18 亿人民币,1997 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 532.39 万人次,更是 20 年前所无法比拟的。1998 年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 3438.6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5%,继续高于 7.8% 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三个市场的互促互补,有效防范、抵御和化解了市场风险,维持了市场稳定性,是中国旅游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旅游大国”形象不可或缺的促成因素;不仅是我国旅游业大发展的直接结果和体现,也是推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济贡献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全面显现

旅游业综合经济功能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显现。旅游外汇收入已成为国家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1997 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已相当于当年外贸出口额的 6.6%;旅游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攀升,1997 年已达到 4.16%,一些旅游重点省市已达 10% 之上;旅游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数,至 1997 年底,国际旅游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达到 134 万人,间接就业人数约为 670 万人;旅游业还有力地牵动了交通、建筑、通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衍生出一些新的产业;全国通过旅游扶贫致富的人口达 300 多万,占 7000 万贫困人口 4.29%。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和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旅游业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显著的作用,吸引和消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数量在增多、质量在提高,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功能在外界推力和内在张力的“双力”作用下,日渐强大而显著;199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旅游业大发展迎来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政策环境,更高的定位需要更高的业绩来支撑和巩固。此外,旅游业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在弘扬民族文化、

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Lun Quandang Quanguo Gexiang  
Gongzuo de Zonggang

###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General Program for the Work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Whole Party”) 1975 年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各项工作整顿的重要文稿,简称“论总纲”。9 月 18 日,胡乔木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提出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重要文章。邓小平听了后很赞成,说: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经过研究讨论和两次召开座谈会,10 月 7 日,由邓力群主持写成了“论总纲”初稿。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依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整顿的文件,集中宣传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当前和今后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策略和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法西斯专政”,必须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文章鲜明地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坚决抵制“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帽子”的作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由于随即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稿没有能够发表。1976 年 8 月,“四人帮”将文稿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供批判用。但是,文章所反映的加强整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纲的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决策,进行了舆论准备。

Lun Renmin Minzhu Zhuangzheng

### 《论人民民主专政》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而写的文章。发表在 1949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上。以后出版了多种单行本,收入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9 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 1986 年 8 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以后,从 1949 年 6 月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为了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和建国纲领,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思想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这篇文章。它同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政治基础。

文章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破产。新中国的性质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文章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人民共和国的巩固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在现阶段,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城市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文章论证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和辩证关系,指出只有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也只有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很好地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文中指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文章还向全党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学习建设的本领。

这篇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贡献，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Lun Shi Da Guanxi

《论十大关系》（“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毛泽东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并出版单行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1999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高潮；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因此，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逐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并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篇讲话以“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基本方针，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归纳为十大关系，并分别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①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要防止片面发展重工业，应当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应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为了发展内地工业，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必须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尽快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④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⑦党和非党的关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⑧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按照不同情况，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杀、关、管、放等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应当给他们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⑨是非关系。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⑩中国和外国关系。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是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

在十大关系中，前5个实际上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新方针和改进经济体制的一些思想和原则。后面几个，涉及民主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包含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些新方针。在讨论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表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思想和原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其中的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Luo Gan

罗干（1935～）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山东济南人。1935年7月生。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入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系学习。1954年赴民主德国留学。1962年毕业于民主德国富莱堡矿业学院机械铸造专业。1962～1969年任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所稀土不锈钢课题组组长、技术员。1969～1970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0～1980年任一机部机械研究所漯河筹备处主任、一机部郑州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1年任河南省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省科委主任。为高级工程师。1981～1983年任河南省副省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83～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88～1993年先后任劳动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1993年起任国务委员，并历任国务院秘书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书记，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Luo Guangxie

罗光燮（1941～196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四川省乐至县人，1941年3月生。1958年11月加入中国共青团，1960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2年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主动要求参战，两次带伤参加战斗。11月18日，他所在的工兵排奉命清除侵华印军一个重要据点。在前进中，受到印军地雷的严重威胁。当两名战友排雷受伤后，他挺身而出，冲进地雷区，右脚被地雷炸掉，爆破筒滚下山坡，他毅然向地雷区纵身滚去，用自己的身躯引爆地雷，为前进部队开辟通道。左臂被炸断后，仍忍着剧痛继续用身躯滚动排雷，直至牺牲。所在团党委为他记一等功，并根据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3年3月9日，国防部追授他为战斗英雄称号。

Luo Haocai

罗豪才（1934～）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法学家。福建安溪人。1934年3月生。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新加坡被英殖民地当局监禁。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2年加入中国致公党。1960～1984年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系副主任。1984～198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85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被选为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侨联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主席。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Luo Jianfu

罗健夫（1935～1982）工程师，劳动模范。湖南湘乡人，1935年9月26日生。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9月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195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9年调到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从事科研工作。同年底，他接受研究图形发生器的项目。经过3年的努力，于197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微电子领域空白。他带领全组奋战3年，研制出的Ⅱ型图形发生器，1978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励。又为北京大学在国内最早研制出大规模集成电路h沟MOS4096随机存储器的中间板。1981年10月，发现身患癌症，仍忍病痛坚持研究工作，住院期间仍不放弃，直到1982年6月16日逝世。同年，被中共陕西省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政府追授为“特等劳动模

范”，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

Luo Peilin

**罗沛霖**（1913～）电子学家。天津市人。1913年12月30日生。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机电系。1938年任延安通信材料厂工程师。1948年赴美国留学，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二机部电信工业局副总工程师，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四机部科技司副司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计量与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筹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多门类电子元件制造厂，为中国雷达及计算机系列化的设计和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Luo Ronghuan

**罗荣桓**（1902～1963）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元帅。湖南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今属衡东县）人。1902年11月26日生。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在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军到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曾任连、营、支队党代表，在部队基层建立中共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1929年参加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后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代理军政委、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武装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沙、吉安、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先后任红三军团代理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委。曾在晋西参与指挥了午城井沟等战斗和汾离公路3次伏击战。1939年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参与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领导山东军民挫败日伪军5万余人在沂蒙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起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日伪军对根据地

进行频繁、残酷“扫荡”和“蚕食”的过程中，针对其战法提出“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即当敌人“扫荡”时，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不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时，选择空隙打到敌人的后方去），领导实行主力地方化，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迅速扭转了山东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随后指挥山东八路军向日伪军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收复了山东大部县城和广大农村，境内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余人。抗战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第四野战军政委。参与指挥了东北1947年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0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2年领导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1954年6月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任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9月因病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1961年复任总政治部主任。1963年12月16日逝世。他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Luo Ruiqing

**罗瑞卿**（1906～1978）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四川南充人。1906年5月31日生。1926年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5月参加了反击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作战。1928年10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29年2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闽西组建和训练地方武装。后任闽西红军59团参谋长，指挥所部配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作战，开辟闽西苏区。同年6月，闽西红军59团和永定地方武装组成红四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参谋主任，后任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党代表、第四纵队参谋长，参加了闽西苏区两次反“会剿”。12月出席在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

田会议），会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在所部加强政治工作建设。1930年后，历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1师政委、军政治宣传部部长、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漳州等战役。长征中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同年起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在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办学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越过日伪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措施，并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百团大战以及华北敌后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19兵团）政委。参与指挥了正太、石家庄、太原、清风店、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为公安政法建设进行了开创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被陆续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75年8月恢复工作，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复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等领导军队整顿工作。1978年8月3日病逝。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增选）。

Luo Shengjiao

**罗盛教**（1931～1952）中国人民志愿军国际主义战士，爱民模范。湖南省新化县人，1931年8月生。1949年11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湘西军政干部学校。1951年4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任志愿军47军141师侦察队文书。同年8月，他冒着侵朝美军飞机扫射轰炸，从烈火中救出一名朝鲜妇女和一名儿童。1952年1月2日，他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栢沼河上发现一名朝鲜少年落入冰窟，迅速跑去跳入冰窟中，两次把少年托出水面，因冰层薄而再次陷落。他第三次潜入水中，竭尽全力把少年托出水面后，少年得救，他却因力不从心，被冰水吞没而牺牲。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同年4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称号。朝鲜人民还把他牺牲的地方石田里更名为“罗盛教村”，栢沼河更名为“罗盛教河”，安葬他的佛体洞山更名为“罗盛教山”。在山上还建立了纪念亭和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Luo Gengmo

**骆耕漠**（1908～） 经济学家。原名李百蒙。浙江临安人。1908年10月18日生。青年时期只受过中学四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获得学识。1927年参加北伐革命。1934～1937年间在上海为进步报刊撰写文章，揭露官僚、地主、买办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并在苏、浙、鲁、豫、皖解放区参加负责地方财经和军队补给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起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在学术研究中，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生产力要素、按劳分配的阶级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与货币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个过渡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Luo Yusheng

**骆玉笙**（1914～） 京韵大鼓演员。女。艺名小彩舞。天津人。1914年8月31日生于上海，1岁被卖到河北。9岁开始学唱京剧，17岁正式改唱京韵大鼓。后拜“三弦圣手”韩永禄为师，学习“刘（宝全）派”大鼓曲目。在天津、北平一带演出。她嗓音甜美，音域宽阔，韵味醇厚，被誉为“金嗓歌王”。在艺术实践中，她又在刘派唱腔的基础上，兼融“白（云鹏）派”、“少白（凤鸣）派”之长，并从京剧、评弹等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结合自身嗓音条件，形成声情激越，华丽委婉的“骆派”京韵大鼓。早期以演唱悲曲见长。1951年参加天津市曲艺团，锐意创新，编演了不少现代曲目，如《英雄黄继光》、《珠峰红旗》、《光荣的航行》、《正气歌》等。1971年开始担任教学工作，为培养曲艺人才，作出贡献。1976年重登曲坛。为电影《四世同堂》配唱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轰动海内外，成为“骆派”艺术最有代表性的曲目。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文联名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 M

Ma Dayou

**马大猷** (1915~ ) 物理学家。广东潮阳人。1915年3月1日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学习、研究声学,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理工学院教授、院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声学会理事长,中国环境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标准化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声学学报》、《中国声学杂志》主编。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五、六届委员和第七、八届常委。他对中国电子学和声学研究的开创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房间声学中简正波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在语言声学和噪声研究方面都有独创的见解。著作有:《声学手册》、《声学术语》等。

Ma Hengchang

**马恒昌** (1907~1986) 机械工人,劳动模范。辽宁省沈阳市人,1907年11月生。1948年到沈阳第五机器厂当车工。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小组工人积极开展各项生产竞赛运动,在全国起带头作用,被誉为“马恒昌小组”。创造了钻研技术、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帮助新工友的经验。1950年,他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1年他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工作,后任厂总机械师。三十多年来,马恒昌小组实现技术革新八百四十多项,每年每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成为工业战线的先进集体和“永不退色的红旗”。他被选为第一、二、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7月18日因病逝世。

Ma Hong

**马洪** (1920~ ) 经济学家、经济管理专家。原名牛仁权,后名牛黄,笔名牛中黄。山西定襄人。1920年5月13日生。1936年参加山西牺盟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毕业于延安马列学院。后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平泉县县长,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同时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和管理的工作。对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管理、工业经济管理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探索经济建设之路》、《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主持和撰写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参与主编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丛书。

Ma Lianliang

**马连良** (1901~1966) 京剧演员,工老生。字温如。北京人。回族。1901年2月28日生。9岁入喜连成科班,先习武生,后改老生,10岁登台。艺术上吸取老师们所长,结合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发展为独树一帜、风格卓异的马派艺术,是30年代“四大须生”之一。对艺术认真严肃,刻意求精,不但唱、念、做全面发展,而且武功根底深厚。重视角色间相互合作,做派潇洒飘逸,念白韵味醇厚,唱腔甜润酣畅。晚年排演新戏,在唱腔艺术上又有创造和发展。擅演剧目较多,主要有:《群英会》、《借东风》、《甘

露寺》、《将相和》、《赤壁之战》、《海瑞罢官》、《赵氏孤儿》以及现代戏《杜鹃山》等。

马连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1951年由香港返回北京,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曾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慰问演出。历任北京京剧团团长、北京市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12月16日去世。其代表剧目编有《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所演《借东风》、《铡美案》已摄制成影片发行。

Ma Wanqi

**马万祺** (1919~ ) 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南海人。1919年12月12日生。1938年避居香港,任泰生行永裕昌经理。1941年移居澳门,先后与友人组织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恒记公司,任总监督、总经理等职。1944年后,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946年与柯平、何贤等组织新中行。1947年组织大华行,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年后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1950年起任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等职。1952年任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1950年后在澳门曾任篮排球总会、乒乓总会、象棋总会等会长,游泳总会、武术总会等名誉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等校董事会主席,在国内曾任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和副董事长等职。后又任暨南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韶关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董事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会长,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委员,澳门大华行、新中行、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或股东大会主席等职。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出版有《马万祺诗词选》。

Mawangdui Hanmu

### 马王堆汉墓 (Mawang Mound Han

Dynasty Tomb)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了三座墓。根据出土的2号墓“轪侯之印”、“长沙丞相”和“利仓”三枚印章,1号墓年约50岁的女尸,1、3号墓的封泥,判定三座汉墓的墓主为轪侯利仓及其家属。三座墓的年代均属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2号墓主为轪侯利仓,死于公元前193年,3号墓主葬于公元前168年,1号墓则晚于3号墓。三墓以1号墓规模最大,椁室用整块厚木板构成,中央放置装饰华丽的四层套棺,周围的边箱装有各种随葬物品。椁室外面,填塞以大量木炭和白膏泥。由于深埋、密封所造成的恒温、恒湿、缺氧和无菌条件,此墓保存得异常完好。特别是出土女尸保存程度之好,在有关历史资料中是罕见的。3号墓的形制与1号墓相同,但规模较小,套棺三层,保存情况也较差,男尸仅存枯骨。2号墓早期被盗,骨骼已散乱。3号墓内出土许多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各方面,计20余种、12万余字。另外,还有3幅地图。1号和3号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丝织品、乐器、漆器,以及详细记载随葬物品名称和数量的“遣策”竹简,都有重要价值。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轰动,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礼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Ma Wenrui

**马文瑞** (1912~ ) 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陕西子洲人。1912年11月4日生。大革命时期,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1930年后,任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陕甘边区东部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曾被派往安塞县做东北军驻军的工作,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

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北西部地区党委书记、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政治委员。1944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西北局常务委员,西北局党校校长,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3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7年6月起,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988年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Ma Xulun

**马叙伦** (1884~1970) 教育家。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彝初,号石翁、寒香。浙江余杭人。1884年4月27日生。早年在杭州“养正书塾”读书。1901年去上海办报,后在杭州、江山、广州等地任教,并参加柳亚子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夏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主编。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书记、北京大中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1921年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2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两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1926年遭段祺瑞通缉而回杭州。1927年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民政厅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1930年回北大任教。1935年华北事变后,与杨秀峰、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任主席。抗日战争期间隐居上海。1945年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5月,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同年6月被上海各界群众推为上海人民赴南京和平请愿代表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打伤。1947年底赴香港,从事民主活动。1948年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民进第一、二届中央常务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主席。1970年5月4日逝世。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庄子义证》、《老子叢诂》、《石屋余沈》、《石屋继沈》等。

Ma Yinchu

**马寅初** (1882~1982) 经济学家、教育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1882年6月24日生。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获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协助校长蔡元培,对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后任中华民国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起先后兼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他提出的“新人口论”是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一正确的论断当时受到错误的批判。1959年离开北京大学。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同时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他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至第四届委员及第二、四、五届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82年5月10日在北京逝世。马寅初一生中著有大量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的改造》、《战时经济论文集》、《中国经济之路》、《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

Mazhenfu Gongshe Zhongxue shijian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Mazhenfu  
Commune Middle School incident)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制造的一起冤案。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安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进行期末英语考试，初二年级女生张玉勤因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等语，受到班主任和学校领导的批评。由于思想压力很大，加之其他原因，张玉勤于12日投水库自杀。当地有关部门对此作了适当处理。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江青得知此事，即指示其亲信迟群、谢敬宜到河南进行重新“调查”。迟、谢二人置当地有关部门结论于不顾，开了两次座谈会，编制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把该校诬为“复辟、回潮”典型，说这个女学生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是迫害学生的“凶手”等。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情况简报，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各地也检查有无类似情况。此后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骂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复辟，声称“要向全国控诉”，“要判重刑”，蓄意掀起“反复辟”的恶浪，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领导人。河南省政府被迫将马振扶公社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逮捕入狱，判处两年徒刑。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斗280余人。全国其他地区也受此影响，制造了一些冤案，不少教师和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学校必要的教学制度和秩序再次遭到破坏。

1977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决定，重新处理此事，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当年转发简报的文件，使各地类似冤案陆续得到平反。

Manasi zhengli chuban

《玛纳斯》整理出版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Manas*)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巨型英雄史诗，与《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史诗歌颂柯尔克孜族古代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的英雄业绩，气势恢宏，语言优美，民族特色浓郁。《玛纳斯》最早形成于新疆天山北部的特克斯草原。千百年来，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在新疆柯尔克孜族群众中至今仍广为传唱，在中亚各国也有传播。从1961年开始，中国就组织学者广泛收集《玛纳斯》的各种唱本，整理出80多位史诗演唱者的资料。著名史诗歌唱家居素甫·玛玛依花了一年多才唱完整部《玛纳斯》。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从1984年开始组织出版居素甫的唱本。到1995年底柯尔克孜文版的《玛

纳斯》出齐，共18卷，23万多行，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长14倍。以居素甫唱本为主要依据的《玛纳斯》的汉文译本，初稿在1996年基本完成，不久将出版。

Mao Zedong

毛泽东 (1893~1976)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

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

国内和平的愿望。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

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

## Mao Zedong gei Jiang Qing de xin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Mao Zedong's letter to Jiang Qing)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在上海的江青的一封信。1972年5月，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信的部分内容。这封信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极端错误判断。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对转发林彪5月18日鼓吹个人崇拜和宣染“政变”危险的讲话感到不安。但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他最终仍同意了中央转发林彪的讲话。

## Mao Zedong guanyu wenyi wenti de liangge pishi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Mao Zedong's two instru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 毛泽东 1963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和1964年6月27日《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 Mao Zedong huafen sange shijie de zhanlue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Mao Zedong's strategic deline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70年代毛泽东在“三个世界”提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划分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战略。

“三个世界”的提法，一般认为是

1952年法国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提出“第三世界”说法后逐渐形成的。最初“第三世界”的含义是“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地区,指新兴的不结盟的民族国家。196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霍罗维茨(Horowitz)提出,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不结盟国家是第三世界。这种提法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有两个中间地带和两个第三世界的观点。70年代初期,他又逐步对国际社会“三个世界”提法加以改造,提出了新的划分范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从而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这个新划分方法的特点在于,把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解开来,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到处争夺霸权、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划为“第一世界”,是主要反对对象;而将受美国控制、与之存在矛盾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称为“第二世界”,是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争取、利用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期受超级大国欺负的发展中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力量。这样,就极大地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建立不分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还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此后,依靠“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集中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在70年代的主要外交战略。

#### 推荐书目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4。

Mao Zedong nanxun

**毛泽东南巡** (Mao Zedongs inspection in the South)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巡视南方的活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毛泽东逐步了解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与陈伯达共同进行的一些阴谋活动,对参与阴谋活动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迟迟不做深刻检讨,并且扣压有关文件下发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有必要同各地领导人,尤其是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防止那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盲从林彪的现象再度发生,同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1971年8月15日至9月3日,毛泽东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途径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到达上海。沿途毛泽东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几个大军区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王洪文、王维国等进行了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点名批评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件是林彪“急于夺权”。他历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认为这次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重新强调“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要求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他们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战士,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9月6日,林彪获悉毛泽东谈话内容,十分紧张。9月7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翌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他们密谋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9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敏锐地警觉到一些异常现象,遂改行程,于10日中午突然离开杭州去上海。11日中午在上海与许世友、王洪文谈话后,立刻北返。12日中午,毛泽东到达北京丰台站,召集北京军区、北京市负责人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谈话,不点名的把林彪说成是“黑手”,并对北京的防务作了安排。下午4时,毛泽东从北京站回到中南海。

毛泽东这次南巡,为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他在南巡途中突然返回北京,打乱了林彪

的政变计划,使他们仓皇出逃(见九一三事件)。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重要文件。

#### 推荐书目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Mao Zedong piping Sirenbang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Mao Zedong criticizes the “Gang of Four”)

1974年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等人搞宗派活动的批评。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结成一个宗派集团,进行活动。在1974年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叶剑英、周恩来先后向毛泽东汇报。2月15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批评了江青等人。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对江青阻挠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以及伸手要官等活动进行了批评。7月1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严厉批评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的一些做法,警告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说:“你们(指“四人帮”)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指出党内有一个“四人帮”,并加以批评。

1974年下半年,在筹备四届人大过程中,“四人帮”再次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发难。制造风庆轮事件,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企图达到“组阁”目的。在毛泽东的连续批评制止和周恩来、邓小平的有力反击下,“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四人帮”又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继续进行宗派活动。同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四人帮”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他还要求其他人不要跟着“四人帮”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几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一年多来进行的大量宗派活动进行揭露和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出检讨。

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虽然只限定在宗派活动的性质,认

为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确实起到了遏制“四人帮”阴谋活动，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为后来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以及中央最终粉碎“四人帮”集团，准备了有利的舆论条件。

Mao Zedong Shiciji

《毛泽东诗词集》(Collected Poems of Mao Zedong)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共收入毛泽东的旧体诗词67首，是历年来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收诗词最多的版本。

诗词集按照1986年由胡乔木主持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收诗词50首)的体例，分正编和副编。正编42首诗词，均经作者校订定稿，其中《贺新郎·别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3首原来未曾公开发表过，是在作者逝世后由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决定发表的。这些诗词一般地说是作者的上乘之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副编25首诗词，各首情况不尽相同，其中《诗词选》所收8首，是当时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新收的17首，多数是经作者校订定稿和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诗词集基本上沿用了《诗词选》50首诗词的注释，但对这些注释进行了认真而慎重的修订，特别是订正了一些史实讹误，并增补了一些新注。新收的17首诗词，依据《诗词选》的体例，作了简要注释。同《诗词选》一样，许多重要注释是作者自己做的，分别标为“作者原注”或“作者自注”。诗词集在附录中，还收入了毛泽东关于自己诗词的一些书信、批语和谈话等，这对准确理解毛泽东诗词很有助益。

Mao Zedong shicha Huabei Zhongnan he Huadong diqu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 (Mao Zedong's inspection in the northern, central-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为控制当时国内“全国内战”的混乱局面而进行的一次巡视。他在沿途所作的谈话发表后对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7年夏季，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以后，全国进入了夺权、武斗、分裂的混乱状态。为了控制局面，毛泽东决定赴南方巡视，亲自抓试点，用支持“左派”，分化、团结其他群众组织的方式，实现这

些地区的大联合，为全国做出表率。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南，于7月14日到达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进行谈话，要他们支持“左派”，分化对立面。周恩来也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对两派群众组织多做工作。然而，7月18日晚，在武汉的谢富治、王力四处活动，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发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讲话，激起了部分群众和军队干部战士的强烈愤慨。7月20日，一些军队干部战士和群众涌入谢富治、王力住地，进行质问和批判。这一事件被称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当日，在林彪制造的“武汉军事政变”谎言气氛下，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9月上旬，他从上海出发，继续视察了江西、浙江、湖南等地，于9月24日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次巡视。

毛泽东在沿途发表的谈话中，改变了原先提倡的一些极端错误做法。他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要求克服派性，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现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指出，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和变相武斗；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他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指示要制止和处理林彪、江青等人煽动的一些极左行动。他听取周恩来通过杨成武汇报的北京严重局势后，指出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否定了林彪、江青等人在报刊上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他还要求对刘少奇“背对背”斗争，不能搞批斗。经毛泽东批准，8月底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这些措施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传达了他的部分谈话内容。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发出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要按照系统、行业、班级实现大联合。此后，又发布了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以及开展拥军爱民、复课闹革命活动等一系列命令和通知，对于缓解群众组织

之间的矛盾，制止全面武斗和打砸抢现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在这次视察中，虽然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极端错误做法，使形势有所转变，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建立在完全肯定的基础上，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因此，只能使全国的动乱持续下去。

Mao Zedong shuaituan fang su

毛泽东率团访苏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by a Chinese delegation led by Mao Zedong)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等于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启程，16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在车站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指出，“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当天下午，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晤。12月21日，出席苏联政府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后又经过几次磋商，双方就讨论两国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毛泽东遂电告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谈判。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一行抵莫斯科。22日晚，中苏谈判正式开始。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等。毛泽东同斯大林先交换意见，商定各项谈判的原则和工作方法。自23日起，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就关于中苏两国签订新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中国旅顺口和大连、关于苏联向中国贷款等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后，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

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等出席。2月14日，双方发表《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称，谈判是在恳切、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经签署下列文件而告结束：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②《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苏联军队则自旅顺口撤出；③《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并称，“由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与维辛斯基互换照会，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沿途参观访问，于3月4日回到北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于1950年4月11日分别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生效。

#### 推荐书目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1994。

## Mao Zedong Sixiang

**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坚持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思想诞生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中国。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尖锐。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没有遇到过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达到成熟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的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主要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因而毛泽东思想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

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由于敌人的强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中国又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不是在反革命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而是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农民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还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经济纲领是，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城市实行节制资本主义、并尽可能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各种合作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文化纲领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文化，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

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

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的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关于农民问题 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贫农和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农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关于统一战线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

的基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则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部分。他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在特殊条件下也争取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参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在统一战线内部，要保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政治领导权，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 创建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首要条件。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人民军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和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兵民是胜利之本。要建成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适时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组织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

1949年后，毛泽东提出国防现代化的思想。他要求建设多军种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国防建设必须和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国防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要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领土完

整。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毛泽东指出，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主张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克服一切违反党和人民利益思想和作风。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还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

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

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他强调，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

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各个组成部分中，始终贯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曾反复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的工作方法。调

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创造性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提出，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一贯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国际条件，努力争取外援，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要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毛泽东思想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恰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既不能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对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同任何科学一样，毛泽东思想也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 Mao Zedong Wenji

《毛泽东文集》（*Works of Mao Zedon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综合性著作集，共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卷于1993年出版，第3~5卷于1996年出版，第6~8卷于1999年出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4卷以外的毛泽东重要著作803篇，约200余万字。

第一卷收入1921年1月至1937年6月的著作67篇。主要内容有：《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表明选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道路；《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等文，提出“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重要论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讲话》等文，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城市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提出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人民军队和党的建设的一整套原则、方针和办法；《寻邬调查》等农村调查报告，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给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信，分析了日本入侵中国后的形势，提出实行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中国独立后在外交、外贸、外资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分析了建党以来党的路线和传统，着重剖析了历史上“左”的错误，提出要在干部中普及和深入进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教育。

第二卷收入1937年8月至1942年12



月的著作 111 篇。主要内容有：《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等文，论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基本原则、战略部署和基本战术；《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等文中，提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文，提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纲领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文，倡导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和干部理论教育，把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和学习理论联系起来；提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化”；《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等文中，对自然科学、中共党史、文艺工作等提出指导性的重要见解。

第三卷收入 1943 年 1 月至 1945 年 8 月的著作 77 篇。主要内容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等著作，提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及审干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等著作，论述了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规定了政权建设、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的各项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等著作，提出加强城市工作，学习经济和技术，准备迎接抗战胜利和工作重心转移；《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给秦邦宪的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指出新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别。这一卷集中收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的重要讲话，多方面阐明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从思想理论上回答了党内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和实践提出的政策问题。

第四卷收入 1945 年 9 月至 1947 年 12 月的著作 133 篇。主要内容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等著作，阐明党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号召为避免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而斗争，准备和部署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

《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等著作，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和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确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之策略方针，对东北和各个战场的工作进行战略部署；《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适时地作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等著作，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各个战场的作战经验，提出一整套作战方针和军事原则；《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工业与工运问题的方针》、《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等著作，对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土地改革等进行方针政策性的指导。

第五卷收入 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的著作 116 篇。主要内容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等著作，提出大约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论述新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主要矛盾、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部署战略决战，制定辽沈、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和渡江作战的方针、部署以及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方法；《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策略》、《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等著作，提出新形势下关于土改、工商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民族工作、旧人员以及城市接管、工会工作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等著作，强调要加强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纠正各种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左”的倾向；《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等著作，提出筹备并主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开国方略和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

第六卷收入 1949 年 10 月至 1955 年 12 月的著作 137 篇。主要内容有：关于新中国外交和外贸工作的政策和原则；关于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势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关于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关于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问题；关于新解放区对待富农的策略和全国土改的总体部署；关于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关于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策及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部署和西藏工作的方针；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关于开展文艺整风和《武训传》、《红楼梦》

问题的讨论，批判历史唯心论问题；关于开展“三反”“五反”斗争，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腐败变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密切党群关系；关于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关于加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关于制订农业发展纲要，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关于制定和推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大汉族主义。

第七卷收入 1956 年至 1958 年的著作 72 篇，主要内容有：以苏联为鉴，总结经验，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斯大林和认识社会主义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适时作出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决策；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学说，指出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问题》等著作，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提出要战略上藐视和从战术上重视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 3 次《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炮击金门，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维护祖国统一；《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明确表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等，论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提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任务、方针和政策；《关于读书的建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等著作，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批评企图在现阶段废除商品的错误观点。

第八卷收入 1959 年至 1975 年的著作 90 篇。主要内容有：提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没有改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要把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录）、《郑州会议纪要》、《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彻底纠正“五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等著作，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指出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反对“共产”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强调要实行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不能剥夺农民，无偿占有农民的财物和产品要坚决退赔；提出制止浮夸风和高指标，提倡说真话、办实事；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群众意愿制定政策、决定问题；提出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制订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部署，确定平叛后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录）、《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等著作，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总结建设经验，认识客观规律，争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著作，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教育干部，转变思想作风，使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等著作，提出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文艺政策、教育改革、卫生运动、宗教研究等提出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和重要的学术见解；强调要改革对外宣传工作，“不要强加于人”；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构想，以及打开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决策。

为了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在收入毛泽东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著作中，有一些含有不正确的论断或者带有“左”的错误的历史痕迹。

Mao Zedong Xuanji

《毛泽东选集》（*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主要著作集，共 4 卷，收入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 158 篇。毛泽东对收入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和个别内容的修改，写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题解和注释。人民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出版第一卷，1952 年 3 月出版第二卷，1953 年 2 月出

版第三卷，1960 年 9 月出版第四卷。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文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法、德、西班牙、俄、日等多种外国文版。

1990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党 70 周年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修订工作按照毛泽东 1962 年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的意见进行，保持了原有的篇目，仅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正文，只校订少量有误的史实、不准确的词语和错漏字。注释主要是核订史实和修改不准确的提法，并增加了一些新注。邓小平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题写书名。

第一卷，收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5 年 12 月至 1937 年 8 月）的著作 18 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斗争的责难而写的，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阐明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论述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包含着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占农村后占城市的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是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纠正的方法，奠定了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我们的经济政策》提出了红色区域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阐述了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构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两篇最重要的包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军事著作之一，是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写成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批判了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

“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是毛泽东在 1937 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和结论，提出争取民主和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指出中国革命是两篇文章——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才好。《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作了哲学概括，阐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也阐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及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法则的各个方面，从哲学上批评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二卷收入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 5 月）的著作 40 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在抗战刚开始就分析了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两条基本不同的路线，即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路线，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文中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自由主义》对涣散革命队伍、取消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种种表现，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任务之一。《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的、大规模的、有根据地并要向运动战发展的情况，提出必须将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并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另一篇最重要的包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军事著作，它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预见中国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进一步明确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第一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说明共产党人应当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历

史责任，对党的组织路线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阐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指导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主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中互相联结的两个主要问题，两篇著作对党内的争论作了基本总结。《青年运动的方向》指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作了分析和论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纪念白求恩》号召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理论，区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历史范畴，解决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与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重要策略，明确地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提出对顽固势力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论政策》指出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强调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反动命令，提出严正的强烈抗议；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阐明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式。

第三卷收入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的著作31篇。《〈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揭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员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并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纯洁性的要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指

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提出整风必须注意的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着力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争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和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指出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是错误的，号召用合作社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系统阐述了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学习和时局》提出中国共产党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党在抗日时期七年的工作作了基本总结，号召党的干部为了争取胜利必须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为人民服务》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论联合政府》是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衡量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实践的好坏归根到底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阐明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总结了整风运动与生产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抓住这两个环子革命斗争才能继续前进，并为夺取胜利准备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四卷收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的著作70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和《关于重庆谈判》，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指出谈判中准备作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换取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内和平局面，同时对谈判的另一种结果提出了对策，指出中国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规定了保卫和巩固解放区，动员人民打败反动派进攻的根本方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是针对一些人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而写的，指出只要世界民主力量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出这个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出当时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前夜，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军40至50个旅。《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即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过程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第4节，提出在革命形势已有极大进展，全国胜利在望的情况下，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任务，要求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提出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但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和《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提出土地改革必须分地区、分阶段、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着重纠正土地改革问题上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

士问题上“左”的偏向，强调实行正确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应当团结他们。《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是3篇杰出的军事文献。《将革命进行到底》及时揭露在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美蒋反动派搞的新的和平欺骗，强调必须将伟大的人民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斗争的经验，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和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是就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存在于一部分人中对于美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驳斥了对中国革命所作唯心历史观的解释，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代表，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最主要的文献，它的出版，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人民中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Mao Zhiyong

**毛致用**（1929～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岳阳人。1929年11月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岳阳县委组织部党训班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岳阳地委副书

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8年后历任湖南省岳阳县革委会主任，中共麻阳县县委副书记，常德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是中共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 Maozhuxi Huijian Meiguo Youhao Renshi Sinuo de Tanhua Jiyao

###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

（“Summary of Chairman Mao's Talk When Meeting Edgar Snow, an American Friend of China”）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部分内容1994年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谈话中，毛泽东主要谈到“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中美关系”3个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表示了他长期以来对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不满，转达了欢迎尼克松访华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意愿。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Maozhuxi Jiniantang

### 毛主席纪念馆（Mausoleum of Chairman Mao）

为安放毛泽东的遗体 and 开展纪念活动而建的场所。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城楼之间。1976年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9月9日举行落成典礼。纪念堂为正方形，坐南朝北。占地5.72公顷，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外观为2层，高33.6米。南、北大门上方嵌有“毛主席纪念馆”金字匾额，顶部是金色琉璃瓦重檐，四周环以44根花岗石八角廊柱。南、北大门两侧各有两组大型群雕。纪念堂内分北大厅、瞻仰厅和南大厅。北大厅是举行纪念活动的场所，厅中有毛泽东石雕坐像。瞻仰厅正中的水晶棺内安放着毛泽东的遗体。南大厅为出口大厅。东西大厅设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4个纪念室。

## Maozhuxi Shicha Huabei、Zhongnan he Huadong Diqū Shi de Zhongyao Zhishi

###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Chairman Mao'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While Inspecting the North, Central-South and East of China”） 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转发的毛泽东指示。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10月7日，中共中央将他沿途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毛泽东指示的主要内容有：①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②强调要贯彻一些政策。他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

候。”关于干部问题，他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虽继续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若干问题上也纠正了“左”的错误做法，因而在当时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使各地群众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开始实现“大联合”，陆续“解放”了一批干部。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性转折。

#### Maozhuxi Zhongyao Zhishi

#### 《毛主席重要指示》（“Chairman Mao'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要点汇编。由毛远新整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3月3日作为中央文件印发。

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政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二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

知有汉，何论魏晋。”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及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邓小平主持进行的整顿工作错误。

#### Mao Yisheng

**茅以升**（1896～1989）桥梁工程专家。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以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896年1月9日生。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后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1933年后，任杭州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自行设计和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1938年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院长。1942年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土木系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评议员，中国工程学会会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指派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在短暂任职中，为保护上海工厂设备、释放政治犯做了有益工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中国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科学技术联合会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国家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获得了重大成就。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工程教育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桥梁工程专门人才。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土力学的开

拓者，杰出的科普工作者。发表论著200余篇，主要论著有《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茅以升科普文选》等。1989年11月12日逝世。

#### Mei Lanfang

**梅兰芳**（1894～1961）京剧演员，工旦。名梅澜，字畹华、浣华。祖籍江苏泰州，1894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二十四）生于北京。出身于梨园世家。8岁开始学京剧，10岁登台演出。1913年、1914年两次到上海演出，艺术思想受到积极的影响和新的启示，奠定了他在表演艺术上独树一帜的基础。开始了大量新剧目的排演和艺术上的革新。与老师王瑶卿一起，创融青衣、花旦、武旦为一体的“花衫”行当。1927年起，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代表作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游园惊梦》、《天女散花》、《穆桂英挂帅》等。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对京剧巨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各方面均有所创造发展，形成了一个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深受国内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年代至50年代曾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进行文化交流，结识了卓别林、高尔基、A. 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萧伯纳、布莱希特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他们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推崇备至，认为给了他们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居沦陷区，不为敌伪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毅然蓄须明志，拒绝演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1949年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先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院长。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贵妃醉酒》，获荣誉奖。同年冬，到维也纳参加第三届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赴朝鲜前线，向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慰问演出。1955年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涯5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纪念演出，授予荣誉奖状，并为他摄制戏曲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游园惊梦》等。1957年7月，获国际舞蹈协会颁发的荣誉奖章。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排演了新戏《穆桂英挂帅》。1961年8月8日在北京病逝。出

版了《梅兰芳论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自述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所演的《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生死恨》等均摄成影片。

Mei Yi

**梅益** (1914~ ) 新闻事业家、翻译家。原名陈少卿。广东潮安人。1914年1月2日生。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闻处长,新华通讯社总社副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党组第一书记。1986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五届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届委员。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和翻译事业的领导、研究工作,做出很大贡献。主要论著收入《梅益论广播电视》和《梅益论百科全书》,翻译作品有《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meitan gongye

**煤炭工业** (coal industry) 以开采煤炭资源为主的国家最大矿业采掘工业,是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一次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

**起步基础** 中国煤炭资源丰富,1992年第15届世界能源会议公布的按世界各国同口径计算的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居世界第三位。中国采煤有悠久历史,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知加工和利用煤炭。1876、1877年清朝官员筹办兴建的台湾基隆煤矿和直隶(今河北省)开平煤矿是最早的近代煤矿。到1949年,中国的近代煤炭工业经过缓慢发展,共建有130处煤矿。它们大多数规模小,技术落后,效益低下,而且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1949年全国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燃料工业部,主管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首先对原有煤矿进行恢复、改造,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到1952年底,国营煤矿已有83%恢复生产,扩建了32处矿井,全国煤炭年产量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从1953年起,煤炭工业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1955年成立煤炭工业部,加强了对煤炭工业的领导。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完成建设投资35.55亿元。开工建设的新矿井共194处,设计年生产能力7537万吨;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年生产能力6376万吨;恢复矿井38处,设计年生产能力1134万吨;改扩建矿井103处,净增年生产能力2536万吨。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鹤岗、阜新、辽源、阳泉、淮南、峰峰、萍乡、枣庄、新汶、鸡西、通化、贾汪15个老矿区,开始建设平顶山、包头、潞安、鹤壁、中梁山、兴隆、轩岗、汾西、山丹、石嘴山10个新矿区。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9%。生产技术有较大进步,国营煤矿新采煤方法比重达到95.3%,开始采用联合采煤机和截煤机等采煤机械,人工手镐刨煤由原来的50.09%降低到3.7%。

1958年至1976年期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煤炭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为此进行了两次大调整。1961年开始的第一次大调整,主要是缩小建设规模,包括停建矿井456处,停建洗煤厂、化工厂100多处,重点调整生产矿井的采掘关系,推行质量标准化,端正技术政策,提高经济效益。1980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调整,主要是扩大建设规模,补偿安全技术设施欠账,调整部分矿井的采掘关系。60年代至80年代,煤炭工业基本建设还施行了三项大的战略部署:第1项从1964年至1973年,在全国三线建设的高潮中,重点建设了西南的六盘水和西北的贺兰山、渭北等新煤炭基地。共建成矿井69处,设计年生产能力3982万吨,同时建成相应的机修厂、火工厂、建材厂等。第2项从1966年至1975年,积极建设江南煤矿,力图扭转“北煤南运”状况,10年间统配煤矿建成矿井295处,设计年生产能力3936万吨。第3项从1973年至1985年,建设重点逐步回到北方,新建、扩建淮南、淮北、兖州、邯邢、霍林河、开滦、平顶山等矿区,建成大型矿井和露天矿13处,设计年生产能力1940万吨,增强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工业较发达地区的煤炭生产能力。这三项大的战略部署,使中国煤炭工业的布局得到改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煤炭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80年代的煤炭工业,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统配煤矿基本建设项目承包制,吨煤工资浮动包干制,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结合的用工制,煤炭产品产销

统一制等。从1985年至1995年,又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改革,国家给予煤炭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和经济优惠政策,煤炭企业对国家包产量、包亏损、包基本建设投资和规模。地方煤矿从办矿体制、资源划分、产品运销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试验。这期间,煤炭行业开始改变生产单一煤炭产品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实行以煤为主,包括电力、建材、建筑、机械、服装、餐饮服务等多种行业的多种经营,产品达4000多种,1997年产值达到538亿元。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从1993年起,煤价逐步放开,生产面向市场。大型矿务局改变体制,逐步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条件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发行股票。到1997年,先后建成兖州、平顶山、郑州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有的已改组为国家控股、多种经济成分结合的大型企业。煤炭工业进一步向着现代化建设发展。

**体制沿革** 在所有制方面,从50年代到1978年,煤炭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主要部分,到1978年按产量计占84.6%。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又分国有重点煤矿(不同时期又称国营煤矿、统配煤矿)和国有地方煤矿。国有重点煤矿由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不同时期分别是燃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统配煤矿总公司)管理,产品由国家纳入计划,统一分配供应全国。国有地方煤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产品由地方分配,供应地方需求,部分纳入计划由国家调拨。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乡镇煤矿(又称社队煤矿),实行自主经营方式,产品自销,在市场流通。90年代以来,在国家扶持下得到较快发展,产量大幅度增长,到1997年已占全国产量的36.7%。在煤炭企业从原来的所有制形式向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私营煤炭企业开始出现,但为数不多,到1997年年产量占全国的6.4%。1998年11月,国务院为了进一步合理开发煤炭资源,调整优化煤炭工业结构,规范煤炭生产经营秩序,实现煤炭产销平衡,决定关闭非法开采和布局不合理的煤矿,这一措施,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

在管理体制方面,从50年代起,煤炭工业一直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煤炭工业部掌握大中型煤矿、洗煤厂、煤矿

机械制造厂、火工厂等生产企业和煤田地地质勘探、设计施工、科研院所和高等专科学校的管理。1958年,为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煤炭工业部下放了100多个企业、事业单位,改由地方管理。由于下放过多、过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1960年又陆续收回。1964年起,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煤炭工业先后试办了华东、贺兰山、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三个“托拉斯”,这是将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负有不同经济责任的关系,以进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尝试。同时,还进行了设立企业和行政合一的“特区”的实验,在河南平顶山和贵州六盘水按照矿区特点设置市政机构,进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建设。这些改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1970年煤炭工业部撤销,与石油、化工部门一起组建了燃料化学工业部。1975年恢复煤炭工业部。1988年,国务院撤销煤炭工业部,设立能源部,煤炭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分别由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公司和地方煤矿公司管理。1993年又恢复煤炭工业部。1998年3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销煤炭工业部,成立国家煤炭工业局,中央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全部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经营管理权。

在企业体制方面,80年代创办了中美合作经营的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美方退出后成为多方共同投资的国有企业)。90年代起,创办了由多方共同经营管理、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国有大型联合企业,主要有国家计委管理的跨地区(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跨行业(包括煤炭、电力、建筑、建材、化工、运输、港口)的企业集团——神华集团,中央和地方(煤炭工业部、山西省)合办的华晋焦煤公司,中央两个部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合办的伊敏河煤电公司。

**建设成就** 近50年来,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取得巨大成果。在煤炭资源勘探方面,除台湾省外,全国预测储量达55700亿吨。1997年累计探明储量8054亿吨。在煤矿建设方面,到1997年共建成年产煤炭3万吨以上的矿井和露天矿2494处,设计年生产能力7.5755亿吨,其中有年产500万吨以上的矿井和年产1500万吨的露天矿。现在全国有年产500万吨以上的煤炭基地29处,其中大同、开滦、平顶山、淮南、淮北、平朔、峰峰、阳泉、西山、路安、晋城、徐州、新汶、兖州、阜新、铁法、鹤岗、双鸭山等矿区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此外,还有

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煤矿。除上海市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煤矿;全国2100多个县(旗)中,有1264个县(旗)有煤矿,从而初步改变了原来煤炭基地偏集东北、华北和沿海省区的不合理布局。在煤炭生产方面,产量逐年增加,从1949年占世界第九位到1989年突破10亿吨,1997年达到13.3亿吨,连续9年居于世界第一位。全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分别为75%和76%,始终处于中国第一能源的地位。1998年,煤炭出口达到3200万吨,是国家外贸创汇重要来源。

生产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建设、装备年产煤炭600万吨的矿井和1000万吨的露天矿、洗煤厂。掌握了冻结、钻井、注浆、沉井、帷幕等穿过冲积地层和特殊地质条件的凿井技术。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煤矿专业设备的研究、设计、制造、测试、维修能力,以及综采、高档普采、普采、炮采等多层次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综采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接近或达到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国有重点煤矿的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73.27%,其中综采机械化程度1997年达到48.38%。初步掌握了煤矿多种灾害发生的原因和防灾抗灾的综合技术措施。

科研、教育也得到全面发展:到1997年全国已有独立的为煤炭工业服务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等三线科研机构31个,重点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二线研究所,全国煤炭工业科研人员共有7800人,形成各学科协同发展的技术体系和队伍。到1997年,全国有中国矿业大学等煤炭高等学校15所、煤炭中等专业学校25所、煤炭技工学校120所,累计培养了29.8万名各类专门技术管理人材。

Meng Tai

**孟泰** (1898~1967) 钢铁工人,劳动模范。河北省丰润县人,1898年10月生。1926年进入日本办的鞍山制铁所炼铁厂当配管工。1948年东北地区解放,鞍山钢铁公司进入恢复生产时期。他带动工人刨冰雪、扒废料,收集材料和零件,建立起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利用这些捡回来的材料,先后修复了第二和一、三号高炉,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炼铁厂副厂长。建立“孟泰储槽”,一年为国家节约上万吨焦炭;成功地改造了热风炉底部双属燃烧筒,使炉底使用寿命延长近百倍。于1950年、1956年、1959年连

续三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被选为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1989年9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祝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上讲话,再次号召发扬孟泰精神。

mi mian zhi zhan

**“米棉之战”** (“rice and cotton war”)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一场打击国内米棉投机活动的统一行动。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投机资本集中在“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和煤炭上,接连掀起3次涨价风。

特别是第二次涨价风,来势最猛,持续时间最长。1949年11月,上海物价比10月份上涨了326%,其中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大米上涨3.3倍,人心惶惶。上海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领导下,从11月15日起,开始从各地调配了大量物资,储备待售。11月25日,当各地物价又上涨到新的高峰时,大量粮食、棉纱等物资猛烈流入市场,物价急剧下降,投机商措手不及。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又采取了紧缩银根、不准对外贷款、加强税收、私营企业不得停业等措施,使得投机商囤积的物资很难脱手,许多人不得不宣告破产。不少私营钱庄借钱给投机商人,也因收不回贷款而被迫宣告倒闭。

人民政府在用经济手段打击米棉投机活动的同时,还严惩了一批情节严重的不法商人。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国内市场形势大为好转。

Mianxiang 21 Shiji Jiaoyu Zhenxing Xingdong Jihua qidong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启动** (launch of “Plan for Revival of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部署。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正式启动。计划共50条。

计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城乡新增劳动

力和在职人员能够普遍接受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与培训；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并使高校高新技术产业为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做贡献；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为实现上述目标，行动计划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续并加快进行211工程建设，大力提高高等学校的知识创新能力；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工程”，带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做贡献；贯彻《高等教育法》，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力度；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依法保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切实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Miao Yuntai

**缪云台** (1894~1988) 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缪嘉铭。云南昆明人。1894年3月23日生。1913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堪萨斯州西南大学、伊利诺大学。1919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矿冶系。1920年回国后，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经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富滇新银行行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倡议并组建“云南人民

企业公司”，任总经理。1946年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美援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去香港，1950年转赴美国。1979年6月回国定居。曾任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9月3日逝世。出版有《缪云台回忆录》。

minyong hangkong shiye

### 民用航空事业 (civil airlines)

包括社会公共的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是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全国公共航空企业经营的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方面的飞行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维护国家的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权益；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和有秩序地进行，以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

**体制沿革** 1949年11月2日，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民用航空局（简称军委民航局）。此后，民航的领导体制以及组织机构有过6次改变。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在香港光荣起义后，军委民航局为妥善处理起义人员复员和设备器材内迁等工作，于1950年上半年在广州、天津、重庆分别组建了办事处和部分航站，作为军委民航局的派出机构，以就近办理有关事宜。1952年5月，原军委民航局机构整编，其建制改属空军司令部，各项工作均由空军领导，并将民航局的行政管理与业务经营分开。同年7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航空公司，主要承办原军委民航局直接经营的全部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业务。该公司于1953年撤销。1954年11月，民航局改为国务院直属局，但其党、政、人事和计划、财务等业务工作，分别由空军和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分工领导。1958年2月，民航局改为交通部部属总局，其工作改由空军和交通部分工领导。1962年2月，交通部部属民航总局又改为国务院直属总局，由空军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领导。1969年11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务院直属民航总局又被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均按军队执行。1980年3月，为适应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民航总局再次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各项工作均与空军脱钩，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这是民航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为民航走向企业化道路开辟了光明前景。

**发展历程** 中国民航经过初创、调整和曲折发展的历程，已初具规模，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日益著的贡献。

**初到时期** 从1949年到1957年，此时民航是在摸索中前进。1949年，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部署下，成功地组织策动了由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率领“两航”员工2000多人在香港的起义（见“两航”起义）。11月9日，有12架“两航”飞机分别飞抵北京、天津。随后，陆续有1700多名技术业务人员、上万吨器材设备等物资内迁回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办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到1951年底，原“两航”员工又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修复解放前被遗弃各地机场的C-46型、C-47型和PB4Y型飞机共17架，使初创时期的民航运力增加了一倍，担负了华北至西南各地，以及支援解放西藏的空投等运输飞行任务。

1950年7月成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开辟了从北京通往苏联的赤塔、伊尔库茨克和阿拉木图的3条国际航线。同年8月1日又开辟了由天津、北京至重庆和广州两条国内航线，以及从重庆至成都、贵阳、昆明等地的航线，较快改变了西南各省交通闭塞的状况。与此同时，中国民航还逐步开拓了通用航空业务。

1952年5月，中央军委、政务院作出《关于整编民用航空的决定》，据此，民航局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整编，被精简的人员占69%，被精简的运力与设备约一半多，给后来民航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1952年7月成立中国人民航空公司，是中国民航事业进行企业化的有益尝试；主要是增辟了航线和航班。到1953年已有国内航线9条和3021个航班；总周转量为712万吨公里，比1952年增长64%；加强了经营管理，各航线平均载运率达69%以上，并取得40万元的盈利。但因受苏联民航“政企合一”的影响，该公司11个月后被撤销。

中国民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航线网建设、机型更新、经营管理和机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55年1月1日，中苏航空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中国，同年起实行的“分区管理”，在北京、



重庆和乌鲁木齐成立3个管理处，中国民航实现了统一领导和单独经济核算的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了扭亏为盈。特别是首都机场的建设，使中国民航有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发展基地。

**调整时期** 从1958年到1965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经受“大跃进”的挫折和相继的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二个八年。期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忽视客观经济法律，搞高指标、大计划，造成比例失调。民航盲目开辟地方航线47条，通航里程1.6万公里；承担大量非正常的航空运输，浪费了大量运力；并造成连续三年亏损。随后，在执行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后，民航事业才重新走上正轨。到1965年底，国内航线增加到46条，通航里程为3.5万公里，总周转量达4662万吨公里，比1957年增长2倍多；特别在发展国际航线方面，局部开放了国内航空市场，为打破霸权主义的北线封锁，于1964年4月让巴基斯坦先通航广州、上海，并积极准备“飞出去”；通用航空作业飞行的稳步上升，作业项目与范围逐步扩大；更新机型方面，继1959年引进伊尔-18型飞机外，1963年又引进“子爵号”，标志着从使用活塞式螺旋桨飞机过渡到使用涡轮螺旋桨飞机的新阶段。此外，在机场建设与改善经营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1963~1964年，迅速扩建了广州白云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等。

**曲折前进时期** 1966年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民航事业经受了时间长、范围广的破坏，损失极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组织体制的大改变，干部队伍和技术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运输生产连续下降，企业亏损大量增加；以及机场建设中的很大浪费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民航事业在各方面又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通航方面和实行经济核算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71~1973年先后从苏联和美国购买了5架伊尔-62型飞机和10架B-707型飞机，为实现“飞出去”创造了重要的技术物质条件。同时，还同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土耳其、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15个国家签订了通航协定。中国民航终于于1974年初步实现了“飞出去”的战略目标。先后从北京开辟了至莫斯科、东京、巴黎和地拉那的4条远程国际航线。到1976年底，中国民航的远程国际航线已有8条，通航里程为4万多公里，其运量也增长23倍。

由于经济核算制度的恢复，民航企业

从1975年开始扭亏为盈，至1976年底共获利3500万元，结束了民航长期依靠国家补贴的被动局面。此外，1971年11月，国际民航组织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从1974年9月起，中国民航积极参加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各项活动。

**新时期的成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加强政府职能和体制改革方面，1980年民航从原属空军代管，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7年开始在原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6个地区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民航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6个地区管理局；将原6个地区管理局的企业部分，组建了中国国际、东方、南方等6个骨干航空公司和北京首都、上海虹桥、广州白云等3个国际机场；有些省市还组建了厦门、上海、四川、海南省等10多家地方航空公司。改革后的政府部门增强了管理职能，航空公司、机场走向企业经营、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

运输生产方面，1998年实现运输总周转量9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5755万人次、货邮运输量140万吨，分别为1978年31倍、24.9倍、21.9倍，年均增长幅度20%左右。到1998年底，航线网络共有航线1122条，比1978年增加960条。其中国内航线983条，通航全国136个城市；国际和地区航线139条，比1978年增加127条，通航五大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64个城市。国际、国内通航总里程达2182600公里，比1978年增加了1945940公里。基本形成了以北京、广州、上海、成都、西安、沈阳、乌鲁木齐7个大、中城市为中心的辐射航线网络。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和地方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积极地支持了旅游事业的发展。

发展通用航空业务方面，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科研服务的通用航空作业项目也有增加，尤其是为海上石油开发服务的飞行作业小时迅速增长。1998年，全行业通用航空作业飞行达到42962小时，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机队实力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直接购买、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等多种方式不断扩大基地规模，从国外引进的大中型先进飞机，不仅改善了运力结构，提高了航班的正常性，而且完成了由中小型飞机向先进的大中型飞机的过渡，使中国民

航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1978年，民航有中、小型运输飞机约80架，1998年中国民航已拥有先进的运输机523架，其中100座以上飞机已达443架。1998年的运输飞机（可用）的平均日利用率，已从1978年的1.3小时提高到1998年的7.7小时，其中远程飞机日利用率最高已达13小时，中短程飞机最高达9.6小时。广州、上海、成都维修基地也进行了扩建，增添了设备，加强了维修能力，使在册飞机得到充分使用。在加强机务维修的同时，民航总局还对航空器设计、制造使用和维修实施全面的适航管理。

机场设施建设方面，1978年民航使用的机场共有81个，多数是中小型机场。1991年以后，通过国家拨款和地方投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加快机场建设。到1998年，中国民航有航班运行的机场已达143个。其中，能起降B-747型飞机的有19个。航路和基础设施也日臻完善，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航路改造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北京、上海、广州之间的航路空中交通管制体制已顺利交接，并实现二次雷达覆盖，在84个机场配置了95套着陆系统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加强了飞行安全和运营管理的保障能力。

保证飞行安全方面，创造了较好的飞行安全纪录。1994年以来，全民航创造了两个运输安全年，连续1023天的运输安全纪录，安全飞行270万小时，安全起降200万架次。这是自1982年以来运输飞行安全周期最长的成绩。1995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总队创造安全飞行40周年时，国际民航组织曾授予国际民航荣誉奖。民航安全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受到中外旅客的好评。

经济效益方面，长期以来，由于领导体制等原因，加上经济管理薄弱，导致民航系统连年亏损，特别是从1968年到1974年，加上政策性补贴后，仍连续7年亏损。1978年以后，民航改革核算体制，加强经营管理，努力增收节支，收入和利润逐年增加。1993~1996年，全行业企业累计向国家上交各种税金188亿元，实现利润110亿元。这是在税制改革和主要依靠国外融资租赁飞机，每年高额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取得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较大提高。1996年达到5.3万吨公里/人，比1992年提高17.5%。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事业衰退，除少数航空公司外，中国民航全行业亏损较大。

此外，教育科研方面也取得进展。民航大力加强院校建设，成立了中国民航学

院、民航飞行学院，组建了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还成立了4所中专和9所技校，形成了培养民航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民航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科研工作为生产服务也卓有成效。

#### 推荐书目

王乃天主编：《当代中国的民航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minzhu jizhong zhi

**民主集中制** (democratic centralism) 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整体利益与部分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有可能充分发扬民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也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可按一定程序予以罢免或撤换。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权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的一个重要区别。③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minzhu jiandu

**民主监督** (democratic supervision) 把执政党、国家机关和干部置于人民的民主监督和公开监督之下的准则。这一准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对执政党、国家机关和各级干部进行监督，是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是人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环节。民主监督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有：法律监督、党纪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要把法律监督、党

纪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要运用各种传媒，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实施监督的主要方面是：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对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以保证政令畅通；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以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民主监督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它的全部实现有赖于全社会民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发展。

minzhu yu fazhi

**民主与法制** (democracy and law)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定的主要任务。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道，都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共同纲领》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奠定了基础。50年代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民主与法制建设重视不够。“文化大革命”则严重地破坏了民主与法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与法制问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坚决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历次会议，都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出明确要求和切实措施。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保证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健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和完善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把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部分职权交由常委会行使（如基本法律以外的国家立法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审批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可以决定国务院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人选），加强了它的组织（增设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设委员长会议处理重要日常工作，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为专职）；健全了地方各级人大的组织体系，赋予省级以及省会市、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制定会议制度、审议通过议案的程序等工作制度，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机制；制定代表法，保证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

第二，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制度得到全面恢复并完善发展。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这一重要政治制度。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1982年宪法序言中关于这一制度论述的基础上，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协作为这一制度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逐渐形成制度。

第三，建立健全基层直接民主制度。1982年宪法修改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同时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委员由居民选举。这是发展基层直接民主的重大措施。此后，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中普遍建立起来。截至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05804个村委会。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试行的该法作了修改，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强化了村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创举。城市居民自治制度，早在50年代就已建立。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全国各城市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委会逐步恢复和发展。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

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截至到1996年底，全国共有113 690个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在推进社区服务，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还广泛推行了企业民主管理。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上述规定。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对集体企业的民主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四，切实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做出了广泛的、明确的规定。1982年宪法赋予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还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基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立法工作摆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程。适应新时期加强立法工作的需要，改革和完善了立法制度，建立健全了立法程序，先后通过了现行宪法和一大批基本的、重要的法律和法规。从1979年到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审议通过法律案246件（除去修订、废止和失效的以外，现行有效的法律为178件。此外，1979年以前制定并继续有效的法律有16件，总计现行法律194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5件。构成中国法律体系的7个法律门类（即：宪法和国家机构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及劳动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已初具规模。另据1998年10月的统计，国务院制定了818件行政法规（其中现行有效的646件）；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由于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执法工作逐步得到改善和加强。一是改革行政执法制度，坚持依法行政。1979年以来制定了许多有关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审计、行政监察、国家赔偿等），对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改进执法，起了积极作用；二是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公正。1978年5月，检察机关开始重建，法院和公安机关也进行整顿、充实和加强。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机构、职权等作出了全面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和人民警察法，标志着中国司法队伍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20年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由原来的刑事、民事审判，扩展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审判。人民法院通过审判依法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依法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检察院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积极参加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工作。1979年到1984年6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平反冤假错案402 000多件。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保证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大力加强执法监督工作。多年来，检察机关坚决查办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促进了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从1979年起，中国恢复重建了律师制度；199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律师法。总之，司法改革正在全面推进，重点是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健全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广泛深入地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使中国人民逐步掌握法律知识，学会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国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由此开始了在全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宏伟工程。从1986年至1999年，全国7.5亿普法对象中，有近7亿人参加了学习。绝大多数中小学开设了法制课，约有90%以上的大学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法制教育。各级各类干部学校、电视大学也普遍设置了法制教育

课程。在普法的基础上，各种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展开，使学法和用法紧密结合起来。全民普法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两个文明建设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绩。但是，中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尚待扩大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中共十五大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minzu

**民族** (ethnic affairs)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有56个，总称中华民族。

**基本状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杂居交错，相互影响，形成了支系纷繁、族称复杂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真正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族体、族称和民族成分混乱的状况，从1953年起，国家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考察识别工作。经过三个阶段的甄别，至1979年，最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共计有56个单一民族。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为113 368万人，其中，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104 24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96%。相对于人口众多的汉族，人口较少的55个民族被统称为“少数民族”，计有912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名列第一，超过1500万；人口在1000万以下，100万以上的民族有回、维吾尔、彝、苗、满、藏、蒙古、土家、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等14个；人口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民族有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羌等14个；人口在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民族有景颇、达斡尔、仫佬、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鄂温克、德昂、裕固、京、基诺等18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有保安、塔塔尔、独龙、鄂伦春、门巴、珞巴、俄罗斯、赫哲等8个。

由于长期的交往和迁徙，中国各民族在分布上呈大分散小聚居的交错居住状态。汉族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内地等省市，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东北、华北、中南、西南等陆地边疆各省区，在华东地区分布极少。中国2万多千米的陆地边境线大部分在民族地区（专指5个自治区和滇、黔、青3个省，下同），在边境线两侧，汉、朝鲜、赫哲、鄂温克、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俄罗斯、塔塔尔、维吾尔、回、藏、门巴、傣、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佤、德昂、怒、布朗、独龙、苗、壮、布依、瑶、京等30多个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被称为跨界民族。少数民族生存地域辽阔，人口密度不高，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于全国平均数以外，其他民族地区都较低，尤其西藏自治区最低，每平方千米不足2人。

从总体来看，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少人多，自然资源相对较少，而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虽少，但物产资源丰富，是发展农业、工业、林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耕地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22%，土地肥沃，盛产水稻、小麦、玉米、青稞等谷物和蔗糖、棉花、烟草、茶叶及各种水果。牧业经济优势突出，全国5大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草原面积占全国总量的90%，盛产肉类、皮革、毛绒等产品。少数民族地区有全国4大林区中的3个，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0%强，木材蓄积量大约达到52亿立方米。江河湖泊广布，水产品丰富，水力资源蕴藏量大，占全国水能资源蕴藏量的50%以上。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富集，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贵州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新疆、内蒙古、宁夏、贵州的煤炭储量达数万亿吨，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区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非常巨大；少数民族地区非金属矿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如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盐达600亿吨，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新疆的玉石、云南的大理石闻名中外。少数民族地区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能等资源的利用前景也十分可观。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秀美的湖光山色以及神奇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国内外游客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得天独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一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汉语文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汉语主要包括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现代汉族

共同语言是经过规范的普通话。汉文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属象形表意文字，迄今已为大多数民族所通用。55个少数民族使用的民族语言计有60种，分属5个语系、10个语族、16个语支。属汉藏语系的有壮、傣、布依、侗、仫佬、水、毛南、黎、藏、门巴、彝、傈僳、纳西、哈尼、拉祜、基诺、白、羌、普米、珞巴、怒、阿昌、景颇、独龙、苗、畲、瑶、土家、仡佬等29个民族的语言；属南亚语系的有佤、德昂、布朗3个民族的语言；属南岛语系的有高山族的语言。京族的语言所属语系尚待研究确定。属阿尔泰语系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撒拉、柯尔克孜、裕固、乌孜别克、塔塔尔、蒙古、土、东乡、达斡尔、保安、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朝鲜18个民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的有塔吉克、俄罗斯等2个民族的语言；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6个民族中有22个拥有自己的文字。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于1957年12月批准了《关于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方案》，帮助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族等11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同时还帮助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文字改革的尝试。

宗教在中国各民族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在汉族中有一部分人信奉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傣、布朗、德昂、佤等民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彝族、苗族的一部分及云南西部的部分民族中的一些人信仰基督教，俄罗斯族和鄂温克族的一部分信仰东正教。此外，鄂伦春、独龙、怒、佤、景颇等一些民族中，还保留着一定的原始宗教色彩。

中国各民族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长期以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汉民族的汉式服装、饮食、建筑、礼仪等具有广泛影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多姿多彩，如服饰有绚丽的旗袍、蒙古袍、裕祥（维吾尔族男子长袍）、擦尔瓦（彝族男子披衫）、百褶裙、筒裙等，近现代以来，服装样式受汉族影响变化很大，出现了学生装、中山装等短式衣着，进入80年代后，西装、夹克衫、运动服、休闲服等得到广泛的普及。饮食方面有风味独特的维吾尔族的烤馕、抓饭，蒙古族的手把肉、奶酪，哈萨克族的马奶酒，藏族的糌粑、酥油茶，朝鲜族的冷面、辣白

菜，侗族的腌酸鱼、腌肉，布依族的“狗肉汤锅”等。在饮食习俗方面，各民族大都有禁食规制，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食猪肉，部分壮族不食牛肉，部分满族和彝族不食狗肉，等等。住宅有蒙古包、干栏式建筑等。少数民族节日众多，据有关人士统计，中国56个民族从古至今约有民间节日1700多个，其中少数民族民间节日约有1200多个。除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外，还有本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诸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塔尔寺节等宗教性节日，火把节（彝族）、望果节（藏族）、祭山林（怒族）等农事节日，颁金节（满族）、包公祭（高山族）、中元报本节（白族）、泼水节（傣族）等纪念性节日，骡马会（纳西族）、三月街（白族）等商贸性节日，那达慕大会（蒙古族）、花炮节（侗族）、芦笙会（苗族）、歌会（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等娱乐性节日，等等。节日期间，除有划龙舟、摔跤、赛马、荡秋千、叼羊、姑娘追、唱歌、跳舞等文体活动外，还开展物资交流等多种商贸活动。丧葬习俗也形式多样，有土葬、火葬、天葬、水葬、塔葬等。

**新型的民族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举措，开创了中华民族关系的新局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和政策。从1949年9月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以后历次颁布施行的宪法中，都贯彻了这一精神。政务院（今国务院）还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发出《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和《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对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定。此外，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诸如向少数民族地区选派工作队、民族贸易队和医疗卫生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多次组织大批少数民族参观团到首都和内地参观考察；开展了争取、团结、教育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先后于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等，极大地促进了各民

族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为了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当家作主，行使自己管理本民族和民族地方内部事务的权力，彻底解决民族问题，1952年8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和自治机关民族化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达到30%的民族聚居地区先后建立了行政地位与省、地区、县相一致，又拥有一定自治权力的三级自治地方行政建制（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为了尽快使各族人民一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汉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在1950年至1954年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1956年又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藏族、傣族等封建农奴制地区以及彝族中的奴隶制地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此之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少数民族牧业地区，采取了较农业地区更为和缓的方式，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只废除牧主和封建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对牧主实行赎买政策，不没收、不分配其所有的牲畜，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实行牧场共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帮助生活贫困的牧工发展生产，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或组建公私合营牧场、加入国有牧场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尚处于原始公社制残余阶段的部分民族地区，不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造，而是帮助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在迅速提高其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实现合作化，最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与此同时，对宗教信仰领域中存在着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以及各民族风俗习惯中的陈规陋俗，采取团结宗教界一切爱国守法人士，不干涉其正当的宗教活动，通过改革废除宗教特权和剥削制度的办法，坚持在各民族自愿的基础上，革除不利于生产、不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旧风俗旧习惯；对于那些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良好风尚，则予以发扬光大。

从1957年年底开始，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右派、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宗教界坏人坏事的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加之“民族融合风”和“大跃进”思潮的冲击，使民族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严重地影响

了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各种权利的行使，他们的实际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民族政策遭到彻底破坏，给民族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上下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时期。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根据中国民族的具体状况，明确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之间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民族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为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行的新宪法，明确地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并具体规定了各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和自治县（旗）的县长（旗长）一律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自此之后，又新建立了2个自治州和49个自治县。截至1997年底，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共有155个，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有44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4%，人口达16407.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6%。其中少数民族7451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70%多，占自治地方总人口的45.4%。此外，还根据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有关规定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的精神，在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建立了包含52个少数民族成分的1000多个民族乡，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补充形式。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自治地方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以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法律规章。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富强，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少数民族发展的经济文化政策及措施。诸如：减免税收，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和比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帮助扶持政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政策倾斜，等等。

在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成就。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统计，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333.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412.8亿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自治地方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农业总产值完成3175.1亿元，是1949年的近42倍，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畜牧业产品都有数十倍的增长。不仅基本满足了民族自治地方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还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建设。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已成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199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237.6多亿元。食糖、卷烟、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些优势资源性产品的产量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日趋改善，相关投资逐年扩大，社会固定资产1997年达2100多亿元。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初步形成了沿边、沿海、沿线和内地同时开放、东西互补的新格局，并逐步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前沿阵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9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4800多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00多元。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近2000万少数民族人口摆脱了贫困，海南省的黎族、苗族同胞基本告别了茅草房，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和云南省的基诺族从原始社会走进了现代社会生活，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分牧民已经结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到综合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建立了一支各类人才齐全的师资队伍，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在内地大中城市开办民族班和民族院校。1996年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校、中学和小学的拥有量分别为105所、1万余所和10万余所。全国有民族出版社37家，民族文字的报纸杂志200多家。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广播电台247家，电视中心台206家，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5365座，用75种语言对国内外广播。各民族自治区都建有自己的科学院和多种研究所，一部分自治州、县也拥有相应的研究机构，科学研究活动日趋

活跃,为本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少数民族的文艺事业空前繁荣,截至1998年,全国已举办了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颁奖大会,形成了56个民族都有作家获奖的好局面。全国性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已经制度化,成为各民族切磋演技,促进文化交流的盛会。少数民族体育事业受到重视,全国已举办了五届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截至1996年底,已建立2.9万个医疗机构,民族自治地方的医疗床位比1957年增加了14.6倍,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寿命延长。

#### 推荐书目

黄光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

杨候第等:《新时期民族工作概览》,华文出版社,北京,1993。

江平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

minzu quyue zizhi zhidu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regions for minorities)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精神。

**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见民族),由于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原因,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保持有自己的特殊性。为了体现国家充分尊重,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已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194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了第一个相当于省级的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经过各民族代表充分讨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定了在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次确定了这项制度,并设专节对这项制度作出规定。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

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成立。1984年5月31日,在总结30多年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在1954年宪法颁布以前一律称作“民族自治区”。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根据宪法的规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相当于省和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县,撤销了县以下区、乡(村)级民族自治地方。截至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总面积约为600多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总人口约1.6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7500万。

**民族区域自治的类型** 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的形式,根据当地民族成分、民族关系、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分为以下几种:①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建立的自治地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②以2个或2个以上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例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由侗、壮、苗、瑶等族聚居区联合建立)。③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己的自治地方,即双重民族自治地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内有鄂伦春自治旗。也有三重民族自治地方,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主要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还可以在别的一些小聚居区实行自治,建立自治州、自治县,例如藏族除有西藏自治区外,还在四川、甘肃、青海、云南分别建立了10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等。

**民族区域制度的内容**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一般遵循以下原则和要求:①各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权的实施,必须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进行。②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名称的确定、区域界线的划分,都要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依法定程序报请批准。③区域界线要保持相对稳定,一经确定,不得轻易变动。若需变动,由上级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报国务院批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会和人民政府。自治机关是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既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又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可以对某些法律条文做一些变通或补充。自治机关的工作除根据宪法和法律,还根据本地方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开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还应有适当名额的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的代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此外,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权力,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安排、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的权力,管理本地教、科、文、卫事业的权力。还可以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组织维持本地治安的公安部队。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是: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国家指导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保障各民族公

民宗教信仰的自由。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

moshou guanliao ziben

**没收官僚资本** (expropriation of bureaucratic capital)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国民党政府和大官僚所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收归人民国家所有的重要措施。

官僚资本是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使整个国家经

济陷于畸形发展、混乱和危机之中。没收官僚资本既属于民主主义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采取接收和没收的办法，把官僚资本转为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没收官僚资本企业2858个，包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系统和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全部交通运输业。1951年初，又把私营企业中官僚资本的股份和财产收归国有，从而消灭了官僚资本。这些企业后来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Mu Qing

**穆青** (1921~ ) 新闻事业家。河南杞县人。回族。1921年3月15日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新华社记者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农村组组长、国内部主任、副社长、社长。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工作，撰写过一批有影响的通讯报导，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等。出版有《穆青散文选》等。

# N

Nanji kexue kaocha

## 南极科学考察 (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s)

中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始于 80 年代初。1980 年 1 月, 选派科学家赴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考察。1984 年 11 月, 中国首次组织了南极考察队赴南极考察。至 1985 年 2 月 28 日撤离南极, 历时 142 天, 航程 48 000 千米, 并在西南极乔治王岛上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1989 年 2 月 26 日, 又在东南极大陆上建成了中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这两个站, 均是当年建站当年开始越冬的常年科学考察站, 成为中国开展南极多学科考察与研究的良好基地, 也成为中国对外开展科学研究合作与开放的窗口。至 1998 年, 中国共组织了 15 次南极科学考察。从 1990 年开始, 在完成建设长城站和中山站的基础上, 中国将南极工作的重点转到以科学研究为中心上来, 编制了中国南极科学考察“八五”计划和 10 年规划, 实施了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中国南极科学考察与研究”, 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 其中不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使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Nanjiang Tielu

## 南疆铁路 (Southern Xinjiang Railway)

新疆境内第二条干线。北起兰新线吐鲁番车站, 南至喀什, 途经托克逊、鱼儿沟、巴仑台、轮台、库车、阿克苏、阿图什, 全长 1450.4 千米。其中吐(鲁番)库(尔勒西)段 475.4 千米为 I 级单线铁路干线。沿线地形复杂, 22% 的大坡达 182 千米; 隧道 30 座, 总延长 33.7 千米; 桥梁 461 座, 总延长 17.7 千米。线路穿越吐鲁番盆地西缘 100 千米的戈壁滩, 夏季平均气温 32℃, 绝对最高气温高达 48.8℃, 是中国最热的地方。1974 年开工, 1979 年 11 月完成铺轨, 1984 年 8 月正式运营。库尔勒西至喀什段 975 千米, 为国家 II 级单线。1996 年 9 月 6 日动工, 1998 年 11 月铺轨至巴楚, 计划 1999 年建成。沿线地形平坦,

无隧道, 大桥 30 座、总延长 5898 米。

Nanjing Changjiang Daqiao

## 南京长江大桥 (Nanjing bridg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跨越长江的公路、铁路两用大型桥梁, 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桥梁。在南京下关宝塔桥和浦镇林场之间跨越长江, 是联接津浦和沪宁铁路、南京和浦口市区的交通干道。1960 年 1 月动工兴建, 1968 年 10 月 1 日铁路桥建成通车, 12 月 29 日公路桥建成通车。大桥正桥长 1576 米, 为双层结构。上层为公路桥, 面宽 15 米, 全长 4588 米; 下层为双线铁路桥, 全长 6772 米。正桥两端建有红旗塔楼式桥头建筑, 桥头之外为引桥。建桥总工程师为梅旸春。

Nanjinglu Shang Haobalian

## 南京路上好八连 (Good Eight Company stationed in Nanjing Road)

长年守护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1949 年 6 月, 这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 连续 14 年身居闹市, 一尘不染, 勤俭节约, 克己奉公, 热爱人民, 助人为乐。1963 年 4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1963 年 8 月 1 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6 周年时, 毛泽东为八连题写一首《八连颂》杂言诗。诗中写道: “好八连, 天下传。为什么? 意志坚。为人民, 几十年。拒腐蚀, 永不沾。因此叫, 好八连。”八连的事迹多次被搬上舞台、银幕颂扬。

Nan-Kun Tielu

## 南昆铁路 (Nanning-Kunming Railway)

联接西南地区与沿海的铁路干线。东起广西南宁, 西至云南昆明, 北接贵州红果, 全长 898 千米, 为国家 I 级单线电气化铁路, 这条线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增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线路从北部湾海滨爬上云贵高原, 相对高差达 2010 米。沿线膨胀岩(土)、软土、岩溶、瓦斯、断层、滑坡等不良地质区段广为分布, 工程艰巨。路基土石方工程 8600 万立方米, 路基加固防护圪工 500 万立方米, 正线铺轨 863 千米。桥梁 476 座, 总延长 79.8 千米, 184 米高的清水河大桥是目前中国跨谷最深的桥梁。隧道 258 座, 总延长 194.6 千米, 9.38 千米长的米花隧道是目前中国最长的单线隧道。工程于 1990 年 12 月起分段开工, 1997 年底建成开通。

Nanning Huiyi

## 南宁会议 (Nanning Conference)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草案及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多次讲话, 再次错误地严厉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 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 是方针性错误。他指出, 反冒进吹掉了三个东西: 一是多快好省, 二是四十条纲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三是促进委员会; 并说这些都是政治问题, 不是业务问题。毛泽东认为, 我们的事业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 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 而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给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 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他甚至说反冒进使右派钻了我们的空子, 右派一进攻, 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 离右派只剩 50 米。并再次点名批评曾经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 周恩来在会上作检讨, 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还联系批评反冒进, 谈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毛泽东说: 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 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 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 只有把原来的平衡不断打破, 事业才能前进; 平衡是革命的平衡, 是积极的平衡, 不是消极的平衡, 不是保守的平衡。关于“红”与“专”, 毛泽东说: 搞“实业”的, 要搞点政治; 搞“虚业”的, 要研究点“实业”。搞“实业”的人不同政治结合, 脱离了政治, 那就会成为灰色的或白色的, 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或文艺家。思想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关于集中, 毛泽东说: 集中只能集中到党委, 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 只能有一个核心。为此他重申: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办也有决, 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 党委有责。”

南宁会议初步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 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 1958 年计划草案, 并议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对“大跃进”运动作了初步发动。

Napu Daqiao

## 南浦大桥 (Nanpu Bridge)

全悬浮体系双塔双索面斜拉桥。位于中国上



海市南码头，跨黄浦江。1988年12月至1991年11月建。桥总长8346米。主桥长846米，主跨423米，采用钢梁与钢筋混凝土板相结合的结合梁，梁的横断面两侧设有导风板，具有良好的结构刚度和抗风能力；引桥长7500米，为预应力混凝土梁式桥。主墩采用钢管桩基础，两座桥塔各高150米，其上铆着180根（总重1500吨）斜拉索，将主桥拉起悬挂于黄浦江通航水位上46米处，桥下可通行5.5万吨级巨轮。桥宽30.5米，设6车道，日交通量5.5万辆汽车；两侧人行道各宽2米。高耸的桥塔，双索面扇形的斜拉索，轻巧的结合梁，螺旋状的浦西引桥和半环形的浦东引桥，为上海市的新标志、新景观。

Nansha Qundao Ziweizhan

**南沙群岛自卫战** (defensive battle for the Nansha Islands) 198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入侵中国南沙群岛的越南海军进行的自卫战。3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船前往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海域对部分岛礁进行考察，并登上赤瓜礁建立观察点。3月14日6时25分，越南海军604、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突然窜入赤瓜礁海区挑衅，他们派出43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赤瓜礁。中国考察人员当即向登礁越军严正声明该地是中国领土，令其离开，但入侵者拒不离礁，反而在14日8时47分首先使用冲锋枪向礁上中国人员射击，打伤考察人员杨志亮。与此同时，越南海军604运输船上的多挺机枪一齐向中国礁上和舰船上人员射击，越南海军其他舰船也使用舰炮向停泊在赤瓜礁附近海区的中国海军舰船开炮。在此情况下，中国海军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28分钟，击沉击伤越方舰船3艘，保卫了中国领土。

Nikesong fangwen Zhongguo

**尼克松访问中国** (R. Nixon visits China)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见中美关系缓和。

Ni Zhengyu

**倪征燠** (1906~ ) 法学家。江苏吴江人。1906年7月生。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回国后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46~1948年

受国民政府派遣，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广泛搜集材料，为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定罪提出了有力的证据，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吴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教务长。1956年后调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顾问，外交部专员、法律顾问。当选为政协第三屆至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1985年由中国政府派遣，任驻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1994年回国。

对国际法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主要论著有：《法律的进化》、《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领海宽度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法问题》、《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理论和实践》、《东京审判亲历回忆》等。

Ni Zhifu

**倪志福** (1933~ ) 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33年5月22日生。1950年进上海德泰模型厂当学徒。后入上海青工政治文化学习班、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1953~1961年在国营六一八厂（北京永定机械厂）5车间当钳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毕业于厂工业学校大专班。1964~1965年任厂技术科工程师。1965~1973年任厂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3~1977年任六一八厂党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1987年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当选为中共第九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3年倪志福创造发明三尖七刃麻花钻头，被称为“倪志福钻头”。1959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64年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倪志福钻头”发明证书。同年在北京召开的四大洲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倪志福钻头》论文。1986年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和

证书。著有：《倪志福钻头》、《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群钻》。

Nie Rongzhen

**聂荣臻** (1899~1992) 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元帅。四川江津人。1899年12月29日生。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1923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7月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11军党代表。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5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与林彪率部参加了漳州、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代理政委、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委，参与指挥抢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战斗。到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委，与师长林彪率部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坂垣师团，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115师主力一部和党政干部共约3000人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曾指挥主力部队在八路军第120师配合下，取得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和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等作战的胜利，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初期，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率部转战华北。1947年指挥正太、清风店战役后，接着指挥了石家庄战役，创造了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1948年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先后组织进行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保北、绥远等战役，随后参与指挥

平津战役。1949年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兼任北平市市长和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他领导组织研制成功了中远程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1983年6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7年11月辞去党内一切职务。1992年5月14日逝世。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有《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回忆录》出版。

## nongcun gaige

### 农村改革 (reforms in rural area)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背景** 从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到80年代初的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由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超越了大多数农村仍然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国家给农业以大量投入，农村集体组织也组织农民对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了大量的活劳动，但总体看收效不大，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缓慢。截至1978年，全国仍有1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变农村政策，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出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为农村干部从实际出发，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农村政策提供了外部条件。

**改革过程** 农村改革以渐进方式向纵深推进，大致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突破阶段（1978~1984）。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1978年秋，在安徽、四川省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试行土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了两省省委的支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多进口粮棉以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产品统派购品种和数量，恢复农贸市场，从而纠正了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重工轻农的政策，初步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农民的所得，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从而废除了实施20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

**第二阶段，市场化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1）。**主要是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村农业结构。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决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以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此政策推行不久，现实经济环境发生了不利的变化。经济开始过热和重工轻农战略复归而实行的不利于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投入政策和工农产品比价政策，导致工农业发展速度失衡和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在1985~1988年发生大的波动。为保障城市居民的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在实践中修改为分品种渐进改革方式，即对粮食实行国家定购和市场购销的“双轨制”，对棉花和蚕茧实行统一收购经营制度，对烟草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对畜产品、水产品及水果、蔬菜等则实行自由购销制度，从而形成不均衡的市场制度。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国民经济，在粮棉油等农产品生产、流通调控方面一定程度上恢复指令性计划管理。针对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逐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股份合作制、专业技术协会等组织制度开始发育。这一时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改革全面展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城镇化也随之兴起。

**第三阶段，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1992年至今）。**主要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体制。进入90年代，农村改革的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这一重大变化中，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消了粮食统销制度，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也开始启动和发育。围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农业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起储备体系、风险基金及保护价收购余粮制度。在农村微观主体方面，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股份合作制逐步兴起和发展。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

**意义** 农村改革20余年间，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民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农村改革的成就，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基本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农村改革任重道远。

## nongcun hezuo yiliao zhidu

###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中国农民群众在自愿互利、互助互济的基础上，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而举办的集体医疗福利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农村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对卫生保健服务的需求量大，国家没有力量承担全体农民的医疗费用；而农民个人承担各自家庭的全部医疗费用亦有困难；集体经济组织把本单位成员的医疗费用全部包下来也不可能。农民自愿创造的合作医疗制度首先于1955年在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出现。1960年2月，中共中央对合作医疗制度予以肯定。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推广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好合作医疗的经验。此后，全国农村多数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以人民公社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也开始解体，并逐渐被其他医疗保健制度所代替。

合作医疗一般分为队办、队办社管、社队联办、社办、社办县管5种类型。凡是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认合

作医疗章程，交纳合作医疗基金，均可领取合作医疗证，参加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制度规定的待遇。合作医疗采取的具体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一致的，主要有：合作医疗站的财产是集体财产；医生和其他卫生人员的劳动报酬由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医疗费用由农民和集体公益金共同负担，具体比例由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合作医疗制度体现了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发展卫生事业的精神，对解决广大农民防病治病和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起过重要作用。

Nongcun Renmingongshe Gongzuo  
Tiaoli Cao'an

###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Rules for Rural People's Communes Work [Draft]”）由毛泽东主持起草，1961年3月22日经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文件。又称《农村公社六十条》。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分配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为了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解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公社六十条》，并发出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都来讨论这个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条例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公社、大队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大牲畜、农具；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可以由社员民主决定等。条例草案的制定和试行，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克服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村公社六十条》经试行和征求意见，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该草案又进行了讨论、修改，制定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于1961年6月15日由毛泽东审定签发。修正草案对原草案的一些规定作了重要修改，主要有：取消了原草案中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规

定，认为办不办食堂，应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改为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实行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无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Nongcun Shehuizhuyi Jiaoyu Yundong  
Zhong Muqian Tichu de Yixie Wenti

###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Some Problems Raised during the Rural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又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分别是：①形势；②运动的性质；③统一提法；④搞好运动的标准；⑤工作方法；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⑦蹲点；⑧抓面的工作；⑨干部问题；⑩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⑪时间；⑫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⑬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⑭工作队的成员；⑮给出路；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⑰生产队规模；⑱基层干部任期；⑲监督问题；⑳“四大民主”；㉑工作态度；㉒思想方法；㉓上述各条，原则上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纪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倾向。强调“四清”要落在生产建设上，规定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验收运动的标准之一。纪要认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纪要还要求做到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搞好运动，反对搞神秘化，防止搞逼供信。纪要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解脱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纪要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领导权被篡夺。因此，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纪要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纪要断言，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

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些论断后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之一。

在纪要形成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中共高层领导中发生这样的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从此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nong qing zhong wei xu

### 农、轻、重为序

（agriculture first, light industry next, heavy industry last）中国制订国民经济计划遵循的原则。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基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次序，只有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才能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安排好轻工业生产，才能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只有科学地确定农、轻、重的比例，避免盲目、孤立地发展重工业，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中国一贯重视农业，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先后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多次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强调了农业的基础作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把这一思想体现在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之中。以后的“大跃进”及其“左”倾错误，在安排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上，出现了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错误倾向，加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问题更加突出，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毛泽东总结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说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后，中共中央为发展农

业曾三次作出决定。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发展经济以农、轻、重为序体现了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的内在联系。

## nongye

**农业** (agriculture) 培育动植物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起步基础**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的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具有辉煌的历史，农业技术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受到国外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压榨，加上战争的严重破坏，中国的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阶段。1949年，中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仅为1.13亿吨，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棉花总产量仅为44.1万吨。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农业机械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况。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农业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 恢复与发展时期（1949~1957年）

在这一时期，土地改革运动使旧中国被压抑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激情迸发出来，加上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免除了农民原来每年向地主缴纳的大量粮食地租。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互助组迅速发展。50年代初，中央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从1953年开始，合作化运动不断升温。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促使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仅在1955年下半年，初级社数量就比上半年增加了1.93倍，入社农户增加了3.44倍。到1957年末，96%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也在1957年基本实现了高级化形式。至此，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中央政府还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1953年11月，为了对付粮食供应紧张和粮价高涨。国家首先对粮食和食油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关闭粮食市场。从1954年秋季新棉上市起，全国又实行棉花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2月，开始实行生猪的派购制度，到1956年10月，派购制度扩大到烤烟、黄麻等重要农产品和中药材。至此，农业流通领域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一时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加强农业基本建设，增加农业贷款，推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如革新与改良农具、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防止病虫害等。国家还通过减免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办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

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产量等都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总产值三年平均递增14.1%，农作物产值平均年递增15.6%。从1952年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增长平均为4.5%。农林牧副渔各业都出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 波动与停滞时期（1958~1977年）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农业生产波动严重。

从1958年开始，农业生产“大跃进”声势愈益浩大，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在1958年1~5月三度调整增高。不切实际的设想、政治动员等使农业生产高指标一再升级，各地纷纷放“卫星”，虚报浮夸数字充斥于世。1959年公布的1958年粮棉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粮食只增长2.5%，棉花增长20%，林、牧、渔等产业的产量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中共中央在1958年3月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办大社，中国农村随后迅速掀起并社高潮。1958年8月，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的决议》，把建立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方针和具体途径。到11月，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农村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196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都大幅度降低。粮食生产水平倒退了9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普遍出现了粮荒。

面对严重的粮食供求矛盾等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人民公社体制。1959年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等具体制度，开始整顿人民公社。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强调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各地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在广大农村开始整风整社运动和退赔运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明确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但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推行“农业学大寨”，将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大队为核算单位。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1977年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仍强化学大寨运动，坚持“一大二公”。

在这一时期，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主要措施包括：调减粮食征购任务和农业税负担；提高粮食、生猪、油料等农副产品价格，对统购粮食实行加价奖励、奖售工业品等办法，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1965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统购价格平均提高35%，并缩小了派购范围；采取奖售粮食的方式，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鼓励各地发展农民家庭副业，开放城乡集市贸易，供销社可以开展粮食议购议销业务。1971年，国家还提高了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的收购价格。同时，国家增加了农业投资份额，增加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

总体来看，在1958~1977年这一时期，“左”倾思想在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体制等方面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的农业发展步伐较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

“文化大革命”十年为例，1966~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增2.8%，低于其他时期的增长速度。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6%，其他主要经济作物都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林、牧、渔等业的发展更是迟缓，农业生产结构非常不合理。

#### 迅速发展时期（1979~1997年）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开始的。1977年春，安徽省的个别生产队搞了有限的包产到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推向高潮。1983年1月，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提出人民公社体制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二是政社分设，并在同年10月发出了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3年底，全国农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占生产队总数的比例为97.8%。1985年春，全国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也基本结束。在大包干的基础上，一些需要统一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农业机械、水利灌溉等仍由集体统一安排，从而形成了既有统一经营、又有分散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至此，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放弃。

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务院从1979年3月起，陆续提高了粮食、油脂油料、棉花、一些畜牧产品和经济作物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24.8%，其中粮食平均提价幅度为20%，油脂油料为25%，棉花为15%。同时规定超过统购计划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油脂油料再加价50%，棉花加30%或超售1公斤皮棉奖售1公斤商品粮。并从1979年开始，恢复了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的议价收购。通过这些措施，到1982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78年提高了41.6%。第二，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79年开始，逐步缩小了统购派购的范围和数量。到1984年底，属于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从过

去最多时的180多种减少到38种。1985年1月，国家决定全面改革农产品收购派购制度，规定实行合同订购或市场收购，其中粮食和棉花实行合同订购，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等逐步实行市场调节、议价购销（销）。至此，实行达30多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宣告取消。以此为基础，长期存在的农产品通过国营单位单一渠道流通的体制也逐渐被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所取代。城乡集市贸易、农民长途贩运活动等发展迅速。

所有这些改革和发展措施，都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投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历史记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年均增长4.95%，棉花产量比1978年增长1.89倍，油料增长1.28倍，糖料增长1.01倍。

但是，主要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农业生产在1985~1988年出现了波动。1985年，粮食和棉花大幅度减产，分别比上年减产6.9%和33.7%，1987年甚至重新出现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国内粮食、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出现上扬，1987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大中城市对已经开放的猪肉、鲜蛋、食糖等商品又陆续恢复了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制度。为此，从1988年11月开始，国家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和领导。1992年4月，粮食购销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现了购销同价。到1993年，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经营和购销价格已基本放开，沿袭近40年的粮票被取消，大中城市的肉、蛋等副食品也改变了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做法，实行市场自由购销。与此同时，中央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3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土地承包期在到期后再延长30年，并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入股。

从1989年开始，中国农业重新恢复了活力。此后，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1989~1997年粮食产量连续6年超过40000万吨，1996年和1997年分别达到50493.5万吨和49417.1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65.5%和62.1%。从1978年到1997年，油料、水果、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一直在增长，1997年比1978年分别增长4.1倍、7.7倍、4.8倍和7.7倍。农业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日益增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农业发展中，科技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据专家测算，

“八五”计划时期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34%，比“七五”计划时期提高了7个百分点。1996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比“八五”计划时期提高了5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推广成效显著，各地以“丰收计划”为龙头，普遍加大了科技推广力度。其中在种植业方面，重点推广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高产优质小麦良种，以及水稻旱育稀植与抛种、种子包衣、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地膜覆盖和节水灌溉等增产增收技术。同时，农业教育培训事业迅速发展。1997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为52所，其中部属院校12所，招收本科生60639人（部属院校17438人），是改革前1977年的3.5倍；在校的本专科生184053人（部属院校53055人）是1977年43793人的4.2倍。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事业也发展很快，已建立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600多所，设立基层教学班2万个。从1992年到1996年间，全国有460万人参加了“绿色证书”培训，70万人获得了证书，农民科技素质显著提高。

**建设成就** 50年来，中国的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已经恢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业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199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3.0倍，棉花、油料和猪牛羊肉分别增长3.5倍、5.1倍和12.1倍，人均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应用程度、农业技术创新能力，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在1952年仅为18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1307台，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几乎处于空白，到1997年底，农业机械总动力为42015.6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671846台，小型拖拉机为10484813台，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 推荐书目

朱荣、郑重等：《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

#### nongye hezuohua

**农业合作化**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通过各种合作形式，使小农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土地改革运动以后，个体劳动农民以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以简单的共同劳动形式组织起来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

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起来。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决议》，肯定了这条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集体化道路。此后，互助组有了更快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802.6万个，参加农户达4536.4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9.9%。

少数地方还成立了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和政府因势利导，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鼓励互助组向初级社转化。至1955年6月，全国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5万个，参加农户有17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4.2%。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各地初级社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至12月底，全国初级社达190.5万个，入社农户有754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3.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已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化，这样，以前的初级社甚至是1955年下半年建立的初级社，至1956年3月底，绝大部分都转入了高级社。至1956年底，全国农村高级生产合作社总数达73.5万个，入社农户有11945万户，占农户总数96%以上。

由于高级社发展过急过快，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从整个农业生产合作化来说，还是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社会主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nongye shengchan hezuoshe

**农业生产合作社**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为初级社和高级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社员仍保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以入股的形式交合作社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分配以劳动报酬为主，入社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也有相应的报酬。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从1954年开始大量出现。在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初级社迅速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土地从私有转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则作价归集体所有，分配则完全按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1958年，高级社

全部转为人民公社。

Nongye Shengchan Hezuoshe Shifan Zhangcheng Cao'an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Draft Model Rul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1955

年1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共12章82条。草案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统一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组织社员进行共同的劳动，统一分配社员共同劳动的成果。草案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准备生产开支，收买社员的生产资料，需要向社员征集股份基金。股份基金一般由社员按照入社的土地分摊；农业生产合作社应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了进行有组织的共同劳动，必须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条件，实行劳动分工，并且建立一定的劳动组织，逐步实行生产中的责任制；对于社员劳动的报酬，应该根据“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逐步实行按件计酬制，并且无条件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为了避免资金的浪费和损失，应该建立必要的财务制度；对于全年劳动所得，应在交纳农业税、完成国家统购任务，扣除生产费、公积金和公益金等之后，按照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和社务工作的全部劳动日，分配社员的劳动报酬。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和文化福利事业、管理机构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nongye shengchan huzhuzu

**农业生产互助组**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tual-Aid Teams)

50年代初期广泛存在的个体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进行互助合作的组织。

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但严重缺乏其他生产资料。根据历史上农村换工互助的传统，国家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独立经营的基础上，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建立临时性、季节性或常年的互助组，通过劳动力和耕畜、农具等交换使用或共同使用，实行集体劳动，克服困难，发展生产。1951年以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大量发展，并于1954年至1956年间陆续转为农

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与单干农民相比，生产效率提高10%~30%，深受农民欢迎。它包含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农民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

nongye xue Dazhai yundong

**农业学大寨运动** (Dazhai village as the model for all agrarian areas)

1964年中国在全国农业系统开展的以学习大寨大队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运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地处太行山区，自然条件很差，全村802亩耕地，大小4760多块，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大寨的农业生产经常遭受旱涝灾害，产量很低。1952~1953年，陈永贵担任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兼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开始按照集体制定的《大寨十年发展规划》，治理原有的沟沟岔岔，并根据本村土地夹沙带石和活土层薄的特点，先后总结出“合理施肥、使用良种”，以及“四不专种”（豆、麻、瓜、菜不占地专种），“三不空”（地边、地角、地墙不空），三深法（深耕、深种、深刨）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全村粮食总产由1949年的7万公斤增长到10万公斤。1958年，大寨党支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20.5万公斤。1959~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大寨大队3年总售粮36万公斤，户均4500公斤，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1962年昔阳县委总结大寨连续13年增产的经验，并在全县加以推广。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700多亩粮田大部分被冲毁和淤没。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惨重损失，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村党支部不为困难所吓倒，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和积累不少、向国家售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的口号，带领社员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12万公斤，户均售粮1500公斤，人均售粮300公斤，并在留足社员口粮的情况下，集体储备粮食2.5万公斤。1963年11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和全省人民向大寨人民学习。1964年1月，大寨被晋中地委、行署树为全区农业系统8面红旗之一，并在春节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大寨宣传月”活动。同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举办“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节目。5月，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大寨进行考查，总结出了学习

大寨的“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以及“冲天的干劲同严肃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等6条经验，并就大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全面汇报。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此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寨大队继续坚持生产，并将原来的单一的粮食生产扩展到山、水、林、路综合治理的新阶段。1967年4月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正式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口号。1970年8月，国务院在昔阳召开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演变成了“学大寨、赶昔阳”运动。1975年和1976年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分别在昔阳县和北京召开第一、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全国普及大寨县和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等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大寨成为农业系统上推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表现在实践中就是：①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使相当多的干部遭到迫害；②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③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抑制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④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1980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了批语。批语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确是农业系统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也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为农业发展做过贡献。批语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倾路线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后来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大寨由一个先进生产典型变成农业系统推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因而破坏了各项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挫伤了

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的路子越走越窄。

#### 推荐书目

陶鲁笈：《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3。

nongyong suliao bomo

农用塑料薄膜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中国最早使用农膜是在1961年。那年广东省沿江的一些农村，以进口的聚乙烯薄膜用于水稻育秧，为提前栽插创造了农时条件，取得增产10%~30%的效果，引起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重视。从此，开展生产技术交流，制订农膜技术标准，组织生产。1965年全国有10多个省份推广薄膜育秧，并从水稻扩大到红薯、玉米、棉花、烟草、甘蔗、药材等品种，都有较好的增产效果。为了全面推广农用薄膜的使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国家对农膜实行定期免征工商税、统一降低销售价格等政策。目前，农用塑料薄膜年产量已逾30万吨，推广到80多种作物，覆盖面积在1.5亿亩以上，为农业增加经济效益80多亿元。为了防治废弃地膜对环境的污染，国家把可控光/生物降解塑料地膜的研究列入“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已初步建成光/生物降解塑料母料生产线35条。

# O

Ouyang Hai

**欧阳海**（1940~1963） 中国人民解放军爱民模范。湖南省桂阳县人，1940年8月生。195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班长。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一贯积极努力，立功3次，被评为工作标兵多次。1963年11月18日，部队野营训练行至湖南省衡山火车站南峡谷时，火车急驶而来，一匹驮着炮架的军马受惊窜上铁道，与列车就要相撞。他为避免列车脱轨事故，保护旅客生命安全，

跑上铁道拼全力推开驮着炮架的军马，壮烈牺牲。中共广州军区党委追授他“爱民模范”称号。1964年1月22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欧阳海班”。

Ouyang Qin

**欧阳钦**（1900~1978）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号惟亮。湖南宁乡人。1900年8月3日生。早年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后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中国旅法学生爱国请愿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到苏联入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年回国，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9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秘书兼武汉《国民日报》编辑。1927年初，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科长，兼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

军委秘书长。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组织部科长，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工委书记，中共陕西省西北军工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旅大区委书记、旅大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东北协作区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8年5月15日逝世。



# P

Pabala Gelielangjie

**帕巴拉·格列朗杰** (1940~ )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三至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藏历金龙年(1941)12月11日出生。藏族。四川理塘人。1942年被认定为昌都寺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2年入色拉寺学经。1956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1959年后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兼昌都专署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第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分会名誉会长。1993年后先后当选为第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第六届政协主席。

Pan Hannian Yang Fan fangeming jituantuan yuanan

**“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

(fabricated case of “Pan Hannian and Yang Fan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错定错判高级干部为“内奸”、“反革命”的案件。潘汉年原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解放前长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杨帆原为上海市公安局长。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后，12月，长期受饶漱石直接领导的杨帆被定为受饶“重用、包庇和掩护的敌特分子”关押审查，不久又以“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罪名被正式逮捕。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有历史问题的人或与高、饶有牵连的人要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组织交代清楚，潘汉年遂以书面形式向中央交代了自己曾于1943年被挟持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了长期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不料于4月3日以“内奸”

罪被捕，并被定为杨帆一案首犯，定名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1963年1月，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终身，1970年7月又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病故。1982年8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彻底平反。次年，也同样对杨帆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Pan Shu

**潘菽** (1897~1988) 心理学家。江苏宜兴人。1897年7月13日生。早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1921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心理学，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系主任。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九三学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心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委。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九三学社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发表有多种论著，对建立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主任。1988年3月26日在北京病逝。编著有：《心理学概论》、《人类的智能》、《教育心理学》等。

Pan Tianshou

**潘天寿** (1897~1971)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天授。浙江宁海人。1897年3月14日生。幼年开始学画。1913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3年后在上海国民女子工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任教。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艺术教育系主任。1928年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教授，次年与林风眠等人赴日本考察。1930年后，往返沪、杭之间任教。抗日战争时期，随学校迁往重庆等地，在流离中坚持教学、作画。1944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1962年在北京、上海、杭州举办画展，获得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于1971年9月5日去世。潘天寿长期从事美术和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绘画、书法、治印、诗文俱佳，尤以中国画闻名于世。代表作品有《雨后千山铁铸成》、《雁荡山花》等。作品讲究骨气、骨力，追求气势和阳刚之美，反映了动荡时代的抗争精神。晚年以指画体现自然拙朴，在绘画史上独具一格。艺术理论强调在继承中国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革新。著作有《中国绘画史》、《潘天寿画集》、《潘天寿谈艺录》等。

Pang Xianzhi

**逢先知** (1929~ ) 历史学家、文学家。山东胶州市人。1929年10月31日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1966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其间，曾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的编辑工作和中央关于农业问题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1978~1979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79年底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毛泽东著作和生平、邓小平著作及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室务委员、副主任、主任。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专长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先后参加主持编辑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邓小平文选》1至3卷等书，并担任《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主编。合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Pao Da Silingbu Wo de Yizhang Dazibao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My Big-Character Poster”) 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一段文字。

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这份《北京日报》边空上写下了一段文字，无标题。后来，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并加上“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件。《炮打司令部》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炮打司令部》把中央内部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错误地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认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表明毛泽东对国内党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发展到了极端。从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锋芒开始指向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pao ji Jinmen

### 炮击金门 (bombardment of Jinmen Islands)

1958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的封锁和惩罚性炮击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不断派遣陆、海、空军，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前哨据点，长期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和武装窜犯。为打击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从1953年起即不断对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炮击。1954年9月3日和22日，为抗议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策划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表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奉命对金门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惩罚性炮击。1958年7月，在美国、英国先后出兵入侵黎巴嫩、约旦之际，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针对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的对面敌情，中国人民解放军从7月下旬开始至8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迅速调整部署调集部队，在福建前线部署火炮450余门、各种舰艇80余艘、飞机200余架，于8月23日至10月5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炮击4次，中小规模炮击83次，零炮射击千余次，共发射炮弹10余万发，同时配合进

行了适当规模的海、空军作战，予敌沉重打击，击毁岛上大量军事设施，击落、击沉一批飞机和舰艇，并达到对金门的全面封锁，使台湾对金门的物资补给陷入严重困境。面对此种情况，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插手策划制造“两个中国”，主张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为反对美国政府这一阴谋，稳住金门国民党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于10月5日决定对金门采取“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是月6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暂停炮击7天。13日，再次宣布停止炮击两星期。但在19日，美国军舰竟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继续为国民党军护航，为打击这一嚣张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随于20日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达8800余发。自21日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继续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为配合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军委于31日又进一步决定实行双日不打单日打。此后，大规模炮击行动逐渐减少，直至196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坚持既定炮击原则下仅进行了两次惩罚性炮击和两次示威性炮击。1961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为了保持台湾海峡的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从此，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对金门的实弹炮击，只在单日打一些宣传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炮击活动遂告完全停止。

Pei Wenzhong

**裴文中** (1904~1982) 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字明华。河北滦县人。1904年3月5日生。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员兼该室周口店办事处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中法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政务院文化部文物事业局博物馆处处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1982年9月18日于北京

逝世。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和广西其它山洞的探查》等。与他人合著有：《中国原人史要》、《资阳人》、《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

peiweichang lilun ji fenzi guidao tu-xing lilun fangfa de yanjiu

### 配位场理论及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方法的研究 (research in the methods in the ligand field theory and the molecular orbital graph theory)

配位场理论与分子轨道理论均为理论化学的重要分支，它们与价键理论一起构成了研究分子结构的理论基础。

配位场理论对于解释无机络合物、金属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激光物质工作原理，以及晶体物理性质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吉林大学唐敖庆及其研究集体，经过近20年的研究，针对配位场理论的发展需要，克服了不少概念上和数学上的困难，使配位场理论系统化、标准化和更便于实际应用，为有关学者所采用，对配位场理论研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一成果用来系统分析无机络合物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光、电、磁等性质的实验数据及结构与性能间的关系，可进一步揭示络合催化本质和激光物质的工作原理，特别是可以用来研究中国丰富的稀土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为发展稀土化合物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是以分子的近邻拓扑作用为基础，借助数学图论中的不变量概念，寻求分子的整体与局域关系的理论体系，总结碳氢化合物性质与结构变化的规律。自1975年起，唐敖庆与江元生经过10多年系统研究，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数学系统和模型方法，使这一量子化学形式体系，不论在计算结果还是在有关实验对象的解释上，均可表述为分子图形的推理形式，概括性高、含义直观、简单易行，深化了化学拓扑规律的认识。这项成果为化学家提供一种理论模式，根据分子图形作简单代数运算，就可推得分子性质与结构的关系，总结和预测共轭分子的稳定性和反应活性及探讨饱和分子的物理性质等方面的规律，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以上两项成果均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Peng Chong

**彭冲** (1915~ )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福建漳州人。1915年3月生。1933年3月加入共青团。1934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 曾任中共漳州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新四军宣传队队长, 战地服务团大队党代表, 中共安徽当涂县委书记, 新四军第二支队民运科长。1941年后, 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三、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独立团政委兼中共江苏泰州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 任苏中军区独立旅团政委, 华东野战军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政委, 第六纵队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 省委统战部部长兼龙溪地委书记, 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 江苏省委常委, 南京市市长, 南京市委第一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1974年后, 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1978年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 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后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后兼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Peng Dehuai

**彭德怀** (1898~1974)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原国务院副总理, 元帅。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1898年10月24日生。1916年入湘军, 由士兵逐级升为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 参加北伐战争, 次年10月升任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任军长兼13师师长。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后任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团军团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 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长征中任陕甘支队

司令员, 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 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2月和5月, 先后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率部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后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 参与指挥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协助总司令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在敌后领导发动群众, 扩大抗日武装, 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在华北发动和指挥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即“百团大战”), 歼日伪军4万余人。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统一领导华北敌后斗争。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伪军的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 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继而指挥部队收复延安, 解放西北5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 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率志愿军20余万人跨过鸭绿江, 在技术装备处于劣势, 后勤补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与朝鲜人民军协同配合, 迎战拥有制空权, 并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在7个月内连续组织5次战役, 将侵略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南。1952年4月因病回国就医, 愈后留在中央, 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参与领导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期间, 因批评1958年“大跃进”以“左”的错误遭到错误批判, 后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严重迫害, 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病逝。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Peng-Huang-Zhang-Zhou fandang  
jitian yuan'an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 (fab-

ricated case of “Peng Huang Zhang Zhou Anti-Party League”) 1959年8月,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定: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反党集团”,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造成冤案。见庐山会议。

Peng Peiyun

**彭佩云** (1929~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女, 湖南浏阳人。1929年12月25日生。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1947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社会系、南京金陵大学外文系学习, 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7~1949年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 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地下党总支部委员。1949~1950年任清华大学党总支支部书记。1950~1953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干事。1953~1966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 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大学组组长、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66~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后下放劳动。1975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化工学院党委常委, 革委会副主任, 国家科委一局负责人, 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 是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Peng Zhen

**彭真** (1902~1997)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原名傅懋恭。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曲沃县侯马镇。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山西的中共组织创始人之一。1924~1929年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 历任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华北地区的中共秘密工作)代理书记。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 在狱中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35年获释后, 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他支持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方针, 推动

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同聂荣臻一起提出了一系列晋察冀根据地建设政策。1941年到延安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整风运动。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被派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1947年回中央后，任中央工委常委。1948年1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参加了制定第一部宪法的工作，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1954年起，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1966年以前一直连连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1年起当选北京市市长。为首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多次率中央代表团赴国外参加国际会议，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立场。

1966年2月，主持制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江青等人策划的批判《海瑞罢官》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5月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迫害。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1979年起，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委员会主任。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提出了加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许多重要思想。主持修改宪法和制定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经济、涉外等一系列基本法律，为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89年发表《用宪法和法律统一思想》的讲话，对稳定局势起到重要作用。

1997年4月26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论著收入《彭真文选》，著作还有《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等。

pi Chen zhengfeng yundong  
**批陈整风运动**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o criticize Chen Boda)

“文化大革命”中期中共中央在党内进行的揭发批判陈伯达问题的运动。

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经过事先布置和统一口径，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在大、小会议上宣讲“天才”问题，要求修改宪法时设“国家主席”，并假意拥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想借此机会攫取更多更高的国家权力。同时打击和他们争夺权力的江青集团的势力。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等人的用意，在全会期间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点名揭露、批判陈伯达，沉重打击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气焰。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为了挽救林彪等人，初期还没有触动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北京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华北会议，进一步揭批陈伯达的问题。之后，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鉴于林彪等人一直抵制“批陈”，采取假检讨、真包庇的态度，毛泽东又决定继续加大“批陈”力度，以教育、挽救林彪等人。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深入“批陈”的同时，印发了林彪集团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被迫写出的“检讨”。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指出黄永胜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这一时期，毛泽东还采取了派人参加被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措施。

批陈整风运动对于搞清楚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问题、揭露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后来粉碎林彪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见九一三事件）作了思想准备。但运动中也作出了一些不符合事

实的判断，株连了一些并未参与林彪、陈伯达等人宗派活动的领导干部。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以后，“批陈整风”运动逐步转为批林整风运动。

pi Lin pi Kong yundong  
**批林批孔运动** (campaign of criticizing Lin Biao and Confucius)

1974年，由毛泽东发动、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批判林彪联系历史人物孔子的全国运动。

1973年5月至8月，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联系起来。同年下半年，报刊开始登载批判儒家及孔子的文章。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等人组织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通知称：林彪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份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和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会有很大帮助。随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

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击周恩来及一批复出的老干部。1974年1月24、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和中直、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提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还以“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由，举出种种所谓“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例证”横加指责，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著名学者郭沫若也被认为是一贯“尊孔”、“宣扬儒家思想”而受到点名批评。为了整倒一批党、政、军部门的老干部，江青等人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敢于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作斗争。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反映，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两次讲话材料的下发，并批评了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阴谋。

在随后的运动中，江青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大批用“影射史学”手法编写的文章，到处讲话，借批孔子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是“现代的大儒”、“搞复辟”，掀起所谓的评法批儒活动。他们还先后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白卷”事件等光怪陆离的事件，否定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在文化、教育界的纠“左”努力。

军队干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企图打击的重点对象，江青等人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多次向军队领

导机关和基层连队发送“批判”材料，并到处作报告，扬言要在军内“揭盖子”，“搞问题”，企图搞乱军队。

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1972年以后全国刚相对稳定的形势再度陷于混乱。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重新拉起“队伍”，树立“山头”，派性纷争迅速蔓延，工业生产明显下降。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有关批林批孔政策方面的文件，对运动加以控制和约束。1974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运动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另成立群众组织，不搞串连，运动的重点主要是各级领导机关。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强调要严格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队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等。针对4月份以来全国工业生产一再下降的状况，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准借运动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此后，尽管在宣传方面仍强调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但这场运动到1974年下半年时随着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已渐趋衰落，实际上只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 pi Lin zhengfeng yundong

### 批林整风运动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o criticize Lin Biao)

“文化大革命”中期中共中央进行的揭发批判林彪等人反党叛国罪行的运动。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见林彪反革命集团)发生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向党内外陆续颁发一系列文件和林彪集团的三批罪证材料，说明林彪等人阴谋进行武装政变活动和叛逃过程，揭露和批判长期以来林彪集团的反动言行。由此，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运动前期主要是结合揭批林彪等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直接参与阴谋活动者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运动中期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党政军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同林彪等人划清界限。1972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学习毛泽东近年来批评林彪等人的批示和讲话，听取周恩来作的关于民主革命

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的报告，引导与会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反党叛国罪行，同时联系实际，开展思想斗争，肃清林彪等人的流毒。运动后期主要是通过相应的组织处理程序。197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对林彪集团作出了正式结论。至此，批林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历时两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深入揭露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清理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稳定全国的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广大群众在这场运动中，对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和企图谋害毛泽东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主持批林整风运动中，进行了各个领域纠正“左”的错误而努力，促使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得以解放，重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认识局限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仍然控制着相当多的权力，这场运动在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没有能够真正揭示林彪事件的极左实质，没有分析造成林彪集团上台的真正原因——“文化大革命”，更没有揭露他们与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犯下的罪行，反而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清查中，对一些人的处理和一些历史问题的说明也出现了不符合事实的偏差。

## pipan Hairui Baguan

### 批判《海瑞罢官》 (criticism of Hai Rui Dismissed from Office)

1965~1966年由江青等人秘密策划、毛泽东支持的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撰写的一部新编历史京剧剧本。1959年4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经提倡学习明朝清官海瑞敢于讲真话的精神。根据胡乔木的建议，6月，吴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1961年1月，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又约吴晗写成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并公开上演。剧中描写了海瑞任巡抚时，为民作主，处死作恶多端的大臣徐阶之子，不怕被嘉靖皇帝罢官下狱的故事。1962年，江青和康生极力想在文化领域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海瑞罢官》便被他们选为突破口。

江青先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但是没有被毛泽东接受。随后，康生又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罢官有关，改变了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北京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要他们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遭到拒绝。1965年2月，她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织撰写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是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和有关部门秘密进行的。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了，让江青拿回上海发表。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中一些历史故事与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措施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国内的反动派“翻案”，是鼓吹“退田单干”。文章引起了不少史学家和读者的不满。由于擅自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违反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要经过批准的规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彭真也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于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指示全国报刊马上转载。在半个多月里，只有华东地区的几家报纸因为得到内部示意予以转载。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要求上海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11月下旬，周恩来、彭真了解到一些内幕情况，指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先后转载姚文元文章，在编者按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段话。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彭真在抵制这场批判，“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海瑞罢官》的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1959年彭德怀被罢了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于是，《海瑞罢官》被认为有为彭德怀等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的严重政治问题。批判运动迅速扩大。在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时，田家英、胡绳认为毛泽东这段话所说并非事实，没有整理进去，彭真也没有传达这些内容。1966年2月，彭真主持会议制定了“二月提纲”，试图限制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全国过火政治批判运动，中宣部还扣押了戚本禹等人批判“罢官要害”的文章。这些都引起毛泽东的更加不满，多次发表严厉讲话，认为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是独立王国，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全国报刊批判《海瑞罢官》运动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而且把实际矛头指向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终

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晗和马连良都遭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1979年，他们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也重新公开上演。

pipan hei'anfeng danganfeng fan-anfeng

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criticism of the “black wind”, “individual farming” and the “wind to overturn verdicts”)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批判。“黑暗风”是指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1962年，对当时国内严重的经济形势所作的充分估计，被说成是“只讲一片黑暗”、“不讲一片光明”。对于1958年以来3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存在不同看法。在1962年召开的中南海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要认清当前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把困难估计够。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就把这两次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单干风”是指1961~1962年，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的作法，被说成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子恢等由于提倡包产到户受到批评。“翻案风”一是指彭德怀对于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提出的正当申诉，被说成是为自己翻案；二是指小说《刘志丹》的创作，被说成是刁仲勋为高岗翻案；三是一些人要求复查甄别平反工作，被说成是“闹翻案”。在1962年夏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多少光明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指出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想复辟的。因此强调要搞阶级斗争，严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使“左”倾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发展。

pipan yougui wuhai lun

批判“有鬼无害”论 (criticism of the argument for tolerance for the belief in ghosts) 1963年3月，江

青等人在上海发动的对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文章的批判。昆曲《李慧娘》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改编，作者孟超，发表于《剧本》1961年第七、八期。剧作讲述的是太学生裴禹和李慧娘之间的悲壮离奇、高尚纯洁的生死恋情故事，突出地描写了他们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和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此剧写前曾得到康生的支持，演出后康生大加赞扬。繁星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发表《有鬼无害论》肯定此戏。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报告》认为新编剧本《李慧娘》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却加以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问题严重。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当年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批判《李慧娘》和繁星的文章，说是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全国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1964年夏京剧现代戏汇演闭幕会上，康生把《李慧娘》作为“坏戏”典型，号召大家批判，并说孟超、廖沫沙是想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1979年，此案得到平反昭雪，《李慧娘》重新公演。

piping Kulian

批评《苦恋》 (criticism of *Bitter Love*)

指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评。《苦恋》的作者是白桦、彭宁。最早发表在《十月》杂志1979年第3期，后拍成电影《太阳和人》。主要内容是写一个知识分子在十年内乱中受到迫害和屈辱，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认为光明和自由只存在于美国，那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要对《苦恋》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7月1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中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他要求

《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8月，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作家刘白羽、姚雪垠、林默涵、李伯钊等在会上发言，对《苦恋》进行了批评。8月8日，胡乔木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和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唐因、唐达成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指出《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缺陷。剧本的思想错误，是存在于当时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人民日报》随即在10月7日予以转载。12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白桦《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白桦在信中说，“由于我的立足点不对，就创作出像《苦恋》这样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解放军报》、《文艺报》的文章，对《苦恋》从思想到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给予了诚恳的批评帮助。”“对《苦恋》批评的全过程，表明我们正在努力把文艺批评和自我批评纳入正常的轨道，表明党和广大群众很重视一个作家的道路，不是打击我，而是满腔热情地扶持我继续前进。”“我的认识还有待于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而逐步加深，进一步接受社会实践，深刻记取教训，求得在新的创作中改正错误。”

pingpang waijiao

“乒乓外交” (ping-pong diplomacy)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见中美关系缓和。

pingfan yuan jia cuo'an

平反冤假错案 (overturning of unjust, false and wrong verdicts)

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依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的大规模的平反。

平反进程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标志。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展开。针对“两个凡是”，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两个“不管”的原则：“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中组部1978年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部长和副省长以上的干部的大案和要案。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陶铸冤案错案平反。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12月19日，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办公室专案材料决定移交给中组部。专案材料有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669人。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3人，包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任穷接任中组部长，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地全面深入地进行。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善始善终地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继续搞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6项措施和3个要求。为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组部等部门还通过了一系列文件：1979年8月4日，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11月30日，中组部发出通知：把“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材料全部销毁。1980年4月22日，中组部发出《关于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到底的几点意见》；9月22日，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1981年2月19日，中组部发出《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

平反内容 冤、假、错案的平反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

①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部门的领导人的冤、假、错案。1978年12月16日，中央批准中组部

《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薄一波及“六十一人案件”平反；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隆重举行，为他们恢复名誉。1979年1月17日，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刘仁平反的决定；1月24日，中央为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等8人举行追悼会；1月25日，中央为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5人举行追悼会；2月17日，中央发出为彭真平反的通知；3月5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为肖劲光平反的报告；3月28日，中央发出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平反的通知；5月30日，中央批准为周小舟举行追悼会；6月8日，中央为陆定一平反；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8月27日，中央为徐冰、张经武等5人举行追悼会；9月19日，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为赖若愚、董昕平反的报告；12月29日，中央为马明方、王维舟举行追悼会。1980年1月10日，中央发出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2月25日，中央发出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平反的通知；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平反；3月20日，中央为李立三、贾拓夫举行追悼会；5月20日，中央发出为罗瑞卿平反的通知；7月24日，中央发出为肖华同志平反的通知；7月28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为黄克诚平反；8月26日，中央和军委批转总政治部报告为李德生平反；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委复查报告为瞿秋白平反；10月23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为中办和杨尚昆等平反的报告；11月5日，中央书记处批转湖北省委为李达平反的决定；11月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彻底平反；1981年3月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报告为邓子恢平反；1982年8月23日，中央发出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等等。

②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或诬陷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部门的冤、假、错案。1979年1月，中央为“中宣部阎王殿”问题平反；2月12日，国家体委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宣布，推翻强加给体育系统的“独立王国”的罪名；2月28日，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对“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错案彻底平反；3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3月9日，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3月19日，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推倒否定教育战线17年成绩的“两个估计”等；5月3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请示报告，撤销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受批判、处理的人员和作品平反；8月18日，文化部发出通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10月9日，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等等。

③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地方性事件中的重大的冤、假、错案。1978年11月26日，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1979年1月4日，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2月15日，中央同意为云南沙甸事件平反；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杂志平反；3月2日，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平反；3月9日，中央批准为“乌兰夫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平反；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上海地下党案件”平反；6月14日，中央批转中组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平反的报告》。1980年9月20日，中央办公厅批准西藏自治区为“小班禅集团案”、“复叛组织案”、“地下寺庙和地下经堂案”、“回族叛国集团案”、“七星党案”、“中华民主党案”平反，等等。

④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涉及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22日，中央批准为历史学家翦伯赞举行追悼会；4月25日，中央为戏剧家田汉举行追悼会；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翻译家傅雷举行追悼会；6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为美术家丰子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9月14日，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宣布，为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平反；10月18日，作家赵树理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1980年7月8日，西藏自治区在拉萨为詹东·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顿吉·索朗多吉等3位爱国上层人士举行追悼会；9月29日，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为胡风案件平反；10月27日，文化部、中国文联为电影艺

术家赵丹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等等。

⑤复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中涉及的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全国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达10402人，冤杀错杀的情况非常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全面复查，对属于冤、假、错案的，都予以纠正，给予平反。其中包括在全国有比较大影响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等人的冤案的平反。

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 推荐书目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北京，1998。

ping Shuihu huodong

### 评《水浒》活动 (campaign to criticize *Outlaws of the Marsh*)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8月，“四人帮”借毛泽东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即兴评论而制造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运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对为他诵读古诗文的身边工作人员谈到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姚文元闻讯后，当天即给毛泽东写信，对评论《水浒》的意义大加发挥。他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建议印发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并组织评论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和姚文元的信。同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此后，“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活动。8月下旬，江青召集其亲信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

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四人帮”所谓的“架空晁盖”，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所谓“投降派”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在四届人大后经毛泽东同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领导岗位工作。江青还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这个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记录，被毛泽东制止。

Pu Fuzhou

**蒲辅周** (1888~1975) 中医学家。号启宇，四川梓潼人。家传医术，1903年随父行医，后独立行医于乡间，嗣后迁居成都，仍执医业。曾组织同济医药社，又倡办平民教养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南铁路医院医师，北京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中央委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常委。在内科、妇科和儿科方面有很高造诣，临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治疗急性病。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医学文化遗产做出重要贡献。因毕生忙于诊务，无暇著作，其临床经验由其学生整理，编纂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辩证论治》。1975年4月29日逝世。

Pudong Xinqu

**浦东新区**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中国为把上海尽快建成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进而带动长江三角洲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起飞而在上海黄浦江以东开发的一个新的开放区域。

上海浦东新区是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扬河以北的紧靠上海市区的一块三角形地区，面积522平方千米，人口153万(1997)。浦东新区濒临东海，北依长江，地势平坦，有65千米长的沿江岸线，航运方便。1990年4月，国务院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使之成为继沿海开放地区之后，中国经济的又一重要发展地带。同年9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有关开发浦东新区的法规、规章。1992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扩大浦东权限和优惠政策。按照浦东新区的开发规划，浦东新区共建设5个综合区，即外高桥-高

桥综合区(保税区)、庆宁寺-金桥综合区(出口加工区)、北蔡-张江综合区(高科技园区)、周家渡-六里综合区(工业加工区)和陆家嘴-花木综合区(金融贸易区)。浦东开发的目的是使浦东成为21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性城市，成为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21世纪西太平洋的经济、贸易、金融、信息中心。

中国对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集中体现如下：允许外国企业在浦东新区开办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第三产业。允许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为浦东开发自行审批发行人民币A种股票和B种股票。在浦东新区外高桥设立中国开放度最大的保税区，也就是自由贸易区，在这个区域里，实行免关税、免许可证、允许设立内资、外资国际贸易机构，企业外汇全额留成，各国货币自由流通等特别优惠政策。允许外资在整个上海范围内开办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浦东新区兴办生产性项目、非生产性项目及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等方面，中央给予上海更大的自主审批权。此外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关税、增值税及所得税，以及在保税区内实行“最惠制”政策等方面。

浦东开发区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各项事业长足进步。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608亿元，年均增长22%。提前两年建成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外高桥港区、外高桥电厂、内环线等十大基础设施及20多条区内城市快速干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现代工业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已初具规模，张江高科技园区被确定为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国家级和地区级要素市场也已相继迁入浦东。优惠的政策加上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到1997年底，浦东已累计引进外资项目4918个，总投资238亿美元协议引进外资150亿美元。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钢铁、现代家用电器、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以及现代生物医药等六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迅速崛起，出口市场已经扩展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 推荐书目

张耀伦主编：《浦东综合经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7。

pufa jiaoyu

**普法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pro-



gram on law) 向全体公民进行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这是根据中国宪法第24条有关普及法制教育的规定,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向全体有接受教育能力的中国公民开展的教育工作。

**目的和过程** 开展这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把法律交给人民”,增强全体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逐步养成依法办事的观念和习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事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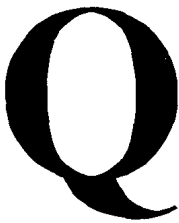
普及法律常识的工作从1986年正式开始,经历了“一五”(1986~1990)、“二五”(1991~1995)普法阶段,目前正在实施全民普法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每个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发出文件批转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决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此项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教育工程的高度重视,确保了普法教育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开展。

“一五”普法主要是向全体公民进行包括宪法、经济合同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森林法、兵役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十法一条例”中基本法律常识的普及宣传教育,是一次法律的启蒙教育。“二五”普法的特点是以宪法为核心,以学习专业法知识为重点,强调学用结合,促进各项事业的依法管理。在党和国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学习宣传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成了普法工作的重点,200多个法律法规被列入各地方、各部门的学习规划。“三五”普法是站在依法治国的高度,要求在学法、用法的基础上,转变思想观念,全面开展依法治理工作,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之

后,在中央领导法制讲座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全体公民对依法治理热情高涨。

**效果** 通过十多年的全民普法教育,初步填补了中国公民法律知识的空白。到目前为止,全国8.2亿各类普法对象中有7亿多人不同程度地学习了法律,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都有所增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经济、依法办社会和文化各项事业、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都有了一定提高。随着普法教育的逐步深化,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有机结合,全国的依法治理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的地级市和70%的县(市、区),60%以上的农村、厂矿、学校、商店等基层单位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地方、行业、基层三条线的依法治理呈现出整体发展的格局。



Qi-Er-Yi Zhishi

## “七二一”指示 (July 21 Instruction)

1968年7月21日公布的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重要指示。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谈到大学教学改革的问题。7月20日，陈伯达、姚文元给毛泽东送上新华社、文汇报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谈话，经毛泽东修改后，《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公开发表。因7月21日晚已广播，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指示”对以后的“教育革命”和大学招生产生了重要影响。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这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此后，各地也相继仿效。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Qiqianren Dahui

## 七千人大会 (Conference of 7000 Cadres)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地、市、县委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并作讲话。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列举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党

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讲话还进一步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和讲话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办法。中央副主席朱德、陈云也在小组会上讲了党内民主生活问题。

大会发扬民主，就几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充分讨论，指出几年来工作中的种种错误，深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畅所欲言，展开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大会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党所要解决的问题。大会对待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还存在分歧；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原则上还被肯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民主空气还没有完全恢复，民主集中制仍然很难充分执行，思想上和政策上还隐藏和酝酿着一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

Qi Baishi

齐白石 (1863~1957) 中国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璜。湖南湘潭

人。1863年11月22日生。青年时做木匠为业。初自学绘画、雕花，后拜民间画家为师，成为画匠，卖画为生，同时苦学诗文，逐渐闻名于世。1902年起远游西安、北京、上海、汉口、南昌、广州、香港等地，与名士、艺术家为师友，写生、交流艺术，观摩历代艺术珍品，画法渐由工笔转入大写意。1916年定居北京，为出新意，决心“衰年变法”，1922年作品传入日本，引起世人重视。1927年受聘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日军占领北京后，辞职闭门谢客，宁可挨饿而不卖画给日、伪人员。1946年到南京、上海举办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1951年在抗美援朝义卖画展中创作《百花与和平鸽》。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与14位画家集体创作《和平颂》巨画，献给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齐白石在绘画、篆刻艺术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就。他的以花鸟鱼虫为题材的工笔、写意中国画造诣最为精湛。山水、人物画也享有盛誉。艺术风格继承了明清以来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的革新传统，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开创自家风范，晚年达到高峰。诗、书法亦佳。1957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绘画代表作有《借山图卷》、《题群鼠图》、《虾》等。出版有大批画集。著述有《白石诗草》、《白石老人自述》等。

qiye minzhu gaige yu shengchan gaige

## 企业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

(democratic reforms and productive reforms in the enterprises)

官僚资本企业和外国在华企业在收归国家所有并恢复正常生产后，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企业机构和管理制度等进行的改革。

国家没收官僚资本，采取了不打乱企业原有技术组织和生产系统，先完整接收下来监督生产，后逐步改革的办法。这固然对保护、恢复、发展生产有利，但企业中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职员与工人对立、机构腐朽和制度混乱等现象没有得到完全改变。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些改革是结合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进行的。从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

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开始，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民主改革一般经过民主斗争、民主团结和民主建设三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改革企业领导机构，从派军代表进行监督和间接管理，改为由国家委派厂长经理等直接管理企业；领导和发动工人群众彻底废除残留的搜身制、把头制、包工头制等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并清除隐藏在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用批评、自我批评方式改善职员与工人关系，增强工人之间的团结；树立依靠工人群众进行管理的思想，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并选择、培养和提拔优秀工人当干部，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调整工资，改善职工福利，使分配制度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等。生产改革是民主改革的继续。主要做法是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建立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责任制，对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制定合理的生产定额、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清核资产资金、健全经济核算制度等。

qixiang shiye  
**气象事业** ( meteorological service) 以天气监测、气象预报、气候利用和人工影响局部天气为主要手段的公益性科技服务事业。由国家气象事业、地方气象事业和专业部门气象事业三部分组成。

**起步基础** 中国气象科学源远流长。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了关于风、云、雨、雪、虹和雷电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并有占卜天气的记录。清康熙十六年（1677），下令直隶（今河北）等地记录逐日晴雨，观测雨、雪、风、雷等现象。这是我国最早的观测网。1912年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气象台——中央观象台，1916年正式发布当地天气预报。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了解放区的第一个气象台。1949年以前，中国气象事业缺乏整体性，业务技术规范不统一，发展缓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气象台站仅有101个（包括老解放区的29个，新解放区接管的72个）。

**发展历程** 可分为四个时期。  
**初创时期** 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简称军委气象局）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事业的诞生。随后，陆续在东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各大军区设立气象处，在各省军区设立气象科。各级气象管理机构建立后即着手培训技术

人员，建立仪器制造工厂，进行气象台站网的建设，统一业务规章制度、技术规范、仪器装备，建立起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按照“建设、统一、服务”的方针，各级气象部门在进行气象台站网的建设、统一业务规章的同时，还为解放西南边疆、沿海岛屿，抗美援朝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迅速开展了气象服务。

1953年8月1日，为配合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气象工作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合发布命令，决定气象部门从军队建制转为政府建制，并将军委气象局改名为中央气象局。各大军区气象处相应撤销，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气象科，1954年11月改称气象局，属当地政府领导。1954年6月，中央气象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气象工作会议，确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气象工作的方针：气象工作必须为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交通运输业及农业生产、渔业生产等服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满足各方面对气象工作日益增长的要求，以防止或减轻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财的损失。从1956年6月1日起，在报纸、电台上公开向人民群众发布天气预报。

**大力建设和调整巩固时期** 1958年2月，国务院批准中央气象局《1958年全国气象工作提要》，指出：“今后气象工作的建设重点应放在农业气象方面。”同年7月，中央气象局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气象工作会议，提出“依靠全党全民办气象，提高服务质量，以农业服务为重点，组成全国气象服务网”的方针。同时根据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精神，决定全国气象工作管理体制下放，省、市、自治区以下气象部门归当地政府领导，中央气象局与各级气象部门为业务技术指导关系。按照“专专有台，县县有站，社社有哨，队队有组”的服务网建设原则，组建了气象服务网。为了支援农业抗旱，1958年9月，中央气象局发出了《关于开展人工控制局部天气试验研究工作的指示》。此后，全国先后有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陕西、云南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过人工增雨、人工防雹等试验作业。这一时期气象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除北京、成都气象学校扩大招生外，1958年又新建了湛江气象学校，1960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气象高等院校——南京气象学院。这一时期台站网的建设发展较快，基本建成了高空探测网和气象服务网。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

的10年，气象业务、科研、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气象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广大气象人员坚持日常业务工作，基本上保持了气象资料的完整连续。绝大部分气象台站的日常天气预报业务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一些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还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个时期逐步采用电子计算机、卫星云图接收等新技术。北京气象通信枢纽、卫星气象中心开始筹建。天气雷达、气象卫星等较先进的探测业务发展也比较快。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恢复了我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4年，我国开始筹建第一组气象传真广播——北京气象传真广播。1975年12月15日开通了广州—香港气象电路。

**改革开放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气象事业的各项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通过全面认真的总结，写成《建国以来气象工作基本经验总结》。《总结》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气象事业发展的历程和主要成就，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总结了基本经验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

198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气象部门实行新时期的气象工作方针：“积极推进气象科学技术现代化，提高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能力，准确及时地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农业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服务的经济效益。”

1983年制定了《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气象事业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力争建成适合我国特点、布局合理、协调发展、比较现代化的气象业务技术体系，把经济发达国家气象部门在70年代或80年代初已经普遍采用了的先进技术在我国各级气象部门广泛采用。”

1982年4月，中央气象局改名为国家气象局，继续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93年，国家气象局更名为中国气象局，由国务院直属机构改为国务院直属事业机构，并赋予政府管理职能。

根据改革开放的方针，1980年5月，国务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批转了《中央气象局关于改革气象部门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全国气象部门实行“气象部门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气象部门领导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到1984年底，全国气象部门自上而下全部实行了以气象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在继续做好公益服务的同时，开展有偿专业服务和综合经营。国务院于1992年和1997年先后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地方气象事业的意见》，提出建立双重计划体制和相应的财务渠道，在发展国家气象事业的同时，加快发展地方气象事业。从1992年开始，实施以气象事业结构调整和建立完善相应运行机制为重点的改革，逐步形成由基本气象系统、科技服务和综合经营构成的新型事业结构。

**建设成就**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气象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初步建成了比较现代化的气象业务技术体系 遍布全国的2600多个台站组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的气象台站网，部分气象灾害多发省份还建立了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系统。新建了100多个特种观测站。1988年以来，先后成功地发射了4颗气象卫星，建立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制并使用了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各地已建有180套卫星地面接收系统。

国家气象中心、7个区域气象中心和31个省级气象台实现了计算机广域网络的远程联网。到1997年末，全国有98%以上的地（市）级气象局域网与省级气象台实现远程联网，建立了地到县的微机远程终端1600多个，占全国有预报服务任务县站的80%以上。

90年代末建成的中国新一代气象信息网络——卫星通信系统，使气象信息传输能力大幅度提高。到1997年底，已拥有包括12台大中型计算机、63台小型机在内的各类计算机15182台，最高运算速度已达到85亿次/秒。目前，全国气象部门每天收集、加工和分发处理的气象资料及信息产品的总量，是20年前的几百倍。

基本建立了由国家、区域、省、地、县五级自上而下指导、分工协作、以数值天气预报为基础的基本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系统。1982年初，短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投入业务；进入90年代，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投入运行，开发了先进的预报模式和新一代天气预报人机交互处理系统。

从80年代初以来，气候业务建设得到较快发展，全国上下普遍加强了短期气候预测、气候影响评价、气候资源应用等业务工作。1995年国家气候中心成立，标志着中国气候业务和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气象服务水平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已逐步建立

了天气预报、天气警报、气候分析应用、农业气象和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等多种现代化手段的气象信息技术服务系统。各级气象部门广泛开展了决策服务、公众服务、专业专项服务及技术服务等多种服务。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气象服务投入与产出效益之比已接近1:40，经济发达地区可达1:100以上。

与改革开放前比较，气象部门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灾害性天气（如台风、暴雨、寒潮、大风）的预报准确率有了明显提高。据1995年统计，全国短期天气预报中的一般降水预报准确率比80年代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时效已由80年代中期的2~3天，提高到了现在的6~7天，并建立了滚动的逐日天气要素预报业务。

改革开放以来，为领导决策服务已成为气象服务的首要任务。各级气象部门积极主动地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指挥防灾减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服务，开展了包括灾害性、关键性和转折性天气预报及情报服务，短期气候预测、农业产量预报等各项服务，同时还为政府和经济部门研究发展战略、安排生产，提供了气象依据。截至1997年底，全国气象部门为地方政府建立气象服务终端560多个。

改革开放20年来，气象为农业的服务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新进展。据初步统计，目前气象为农业服务的效益已占到气象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服务总效益的40%以上。新建了国家和省级气候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立了到乡镇一级的农村气象科技服务网，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80年代初开始，各地建立了农业产量预报业务。在林区还开展了森林火险等级预报。1991年以后，全国平均每年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面积达200万平方千米左右，防雹作业保护面积约10万~20万平方千米。自1987年以来，国家气象部门共下达科技扶贫项目400多个。1993~1995年，全国气象部门在722个县建立了科技扶贫基地或联络点，实施扶贫项目926项，举办技术培训班872次，培训数万人次，社会经济效益超过17亿元。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以及232个地（市）和507个县都开展了电视天气预报制作业务，其中有20多个省级电视台有气象节目主持人。全国有16个省级城市和642个地、县安装了“121”气象咨询电话，建立了天气警报发射台1800多

个，用户达10万多个。在一些城市中，开展了大气污染气象潜势预报、紫外线预报、人体舒适度预报、可能中暑预报、花粉预报等新的有关城市环境气象预报的服务项目。

如今，气象服务的领域扩展到为工业、商业、能源、水利、交通、建筑、环保、海洋、保险、卫生、体育、旅游等100多个行业和部门，气象科技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开展了电视天气预报制作服务、避雷检测服务、大气环境评价、气象寻呼服务等多种新的服务项目，还为100多项国家及地方重点工程开展了气象保障服务。

气象科研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 全国已建立了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为中心、各区域气象中心专业研究所为骨干和各省级气象研究所为基础，包括气象院校科研机构和各气象业务单位中的开发研究实体在内的气象科研体系。建立了一支2000多专职人员和1500多名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气象科研队伍，其中高、中级科研人员分别约占16%和42%。据不完全统计，1980~1997年，全国气象部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40项，其中一等奖7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00余项。

到1998年，全国有部级直属气象院校3所，中专10所。1981~1997年，气象院校和科研单位分别培养了7769名本科大学生和610名研究生，培养中专生25653人，约有15万人次接受了在职培训。据统计，全国气象部门在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已由1980年的15.8%上升到1997年的36.1%，中专学历的由23%上升到38.6%。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气象部门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科技交流，与2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象科技合作关系，其中约有14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10多个发达国家的气象局局长及高级官员来华考察、访问。已向亚、非、拉、欧地区近60个国家提供了仪器装备和技术。南京气象学院被世界气象组织指定为区域培训中心，自1994年以来，为几十个国家培训了200多名气象人员。在1987年世界气象组织第十届大会和1991年第十一届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连续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气象法制建设和科学管理工作得到加强 1994年，建国以来的第一部气象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到1998年，全国已有16个省（区、市）制定了地方性气象法规，17个

省(区、市)气象部门的约1500人获得行政执法监督证书。先后制定了200个重要的部门规章。

全国已建成了连接各省(区、市)气象部门及部分地(市)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建立健全了政务信息工作系统。

#### 推荐书目

薛伟民、章基嘉主编:《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

温克刚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记录·气象卷》,红旗出版社,北京,1999。

qiche gongye

## 汽车工业 (automobile industry)

生产货运、乘用、专用汽车及其零部件和配件的行走机械制造业,是技术装备也是家庭耐用消费品制造业。

**发展历程** 民国时期有过制造汽车、建立汽车工业的构想和行动,终因战乱等多种因素没有实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尚没有汽车制造业,只有一些基础薄弱的汽车维修业和零件生产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开辟了道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产品种类比较齐全,基本满足国内需求的汽车工业体系。

**初创阶段(1949~196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和扩展汽车维修业,为恢复和发展汽车运输业和抗美援朝前线供应汽车配件,同时筹建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在长春市动工兴建。1956年7月一个能生产3万辆解放4吨载货车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从此,中国有了汽车制造业。之后,一汽发展越野车、红旗轿车,改进解放牌,实现汽车用钢国产化,并将生产能力向6万辆扩充。

自1957年始,尤其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地方试制汽车,限于资金、技术条件,到“二五”末期,初步形成南京、上海、北京、济南等4个小型汽车制造厂和一批具有地方配套特色的小型汽车零部件生产厂。16年间汽车工业共投资11亿元,生产能力近6万辆,生产汽车品种达9个。1966年生产汽车5.6万辆,其中,轿车300辆,吉普车770辆,越野车8千辆,载货车4.8万辆,有1.4万辆汽车底盘供改装客车和专用车。同期,建了4个专业研究机构,有8所高等学校设汽车专业教育。

**成长阶段(1966~1980)** 这一阶段跨越3个五年计划,中央抓三线汽车厂建设,发展矿用自卸车和重型车,5个老厂

扩充实力,地方建汽车制造厂,共用投资约51亿元,新增生产能力逾16万辆。

1966年前后,按中央方针,先后兴建二汽、湖北(十堰)、四川(大足)、陕西(岐山)等主要生产军用越野车的三线汽车制造厂。自行开发产品,国内供应设备,又是山区建厂,难度很大,加上“文化大革命”干扰,这3个厂大体到1977年才步入稳定投产阶段。

为了适应冶金工业“大打矿山之仗”和基础工业的需要,从1969年上海试制32吨矿用自卸车开始,相继发展了15吨、20吨、60吨矿用自卸车生产,并扩大了黄河8吨、上海15吨和邢台长征10吨车生产能力。

5个老汽车生产基地,承担了支援、包建三线厂的任务并通过技术改造扩充自身实力。

自1958年出现运输紧张,运力不足,汽车产品供不应求,各方面发展汽车工业的积极性很高。60年代后期,中央提出调动地方积极性,建设地方工业体系的方针,大体从1969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除西藏)均建起汽车制造厂,主要生产已有产品,当时称“重复生产”。此期间,较有影响的新产品有北京130型2吨货车和天津620型10座旅行客车等。同时兴起一批基本为当地配套的汽车零部件厂。实力相对较强的新点有北京、天津、沈阳、武汉等地。

随社会需求和汽车制造厂提供底盘数量的增加,客车及专用车的改装能力已超过4万吨辆。

到1980年,全国有汽车制造厂56家,改装车厂192家,汽车零部件厂近1900家,汽车生产分散的局面已经形成,成为以后调整汽车企业结构的难题之一。

#### 全面发展阶段(1981年至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交通运输依然紧张。1980年下半年却出现汽车滞销,汽车工业老化、不适应客观需求的落后局面逐步显现。汽车行业针对这种情况,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汽车工业步入产品更新换代,在提高质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变革、改造,1992年汽车总产量突破100万辆,汽车工业在许多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①产品结构全面调整。1987年和1988年间,以生产时间最长的3个老产品——解放、跃进和黄河实现换型转产为起点,到90年代初,老产品全面实现换型,改变了汽车产品30年一贯制的落后

局面。新产品均实现系列化多品种。这一时期,引进了一大批汽车和关键总成,零部件产品技术、制造技术及关键设备,据不完全统计,汽车行业共引进技术580项。引进的主要产品有8种轻型客、货车、4种重型车、7种矿用自卸车、8种大客车,加上自行开发的适用新产品和生产能力建设,特别是一汽、东风(二汽)两集团相继形成了轻型、重型汽车生产能力。从而,极大地壮大了轻、重型商用(除轿车)车生产实力;引进3种微型车并形成了5个骨干生产厂轿车;建成7个合资厂,2个内资厂,主要品牌10种,轿车生产能力已达80万辆。

通过上述一系列作法,改变了汽车生产以中型载货车为主,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传统格局。特别是1992年之后,变化尤为明显。

1980年商用车产量轻(包括微)、中、重型车的比例为29.7:66.2:4.1,1990年比例为47.9:47.2:4.9,1997年变为78.1:18.4:3.5。1980年载货车产量轻(包括微)、中、重型车的比例为64.4:32.0:3.6,1990年比例为55.3:39.8:4.9,1997年变为67.1:28.2:4.7。1980年柴油车为汽车总产量的10%,1997年上升到24.4%。1980年货车与乘用(轿车与客车)车产量的比例为81.6:18.4,1990年此比例为69.1:30.9,1997年变为41.7:58.3。1980年轿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为2.4%,1990年所占比例8.3%,1997年所占比例上升到30.8%。

②利用外资。到1997年底,共建三资企业529家,协议外商投资额达55亿美元。

此期间,汽车工业总投资超过1100亿元。后期,投资力求集中,以形成几个大型企业集团。1985年汽车制造厂增加到114个,1992年最多达124个,1997年有115家,是1980年的205%。由于汽车总产量不大,已形成的大型企业,规模也不算大,年产15万辆以上的只有4家。改变汽车生产的分散局面,还要加大改革力度,走相当一段路程。

进入80年代,汽车需求日趋多样化,原有大型厂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局面,加之生产汽车利润可观,许多地方和正转向民品生产的军工企业及乡镇企业,选择生产解放、东风中型载货车以外的车种和零部件,形成的轻型客、货车厂最多,各有几十家。建成的较大型生产厂有农业系统的柳州五菱,航空工业的昌河、哈飞,兵器系统的长安等4家微型车厂,生产零部件的乡镇企业浙江万向钱潮集团等。

近20年来汽车从紧俏商品、卖方市场、高额利润逐步转向买方市场、以销定产、微利经营。汽车工业在理念上发生重大变革,从传统的计划、产值、向上要投资,转变为逐步树立起竞争、效益、品牌意识。

**管理体制沿革** 汽车工业曾多次作为管理体制试点,变化较频繁。1949年10月中央重工业部成立,设机器工业局筹备组,1950年3月单设汽车工业筹备组筹建、管理汽车工业。1952年8月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1953年1月汽车工业筹备组改组为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1958年11个局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1963年收回。1964年试办“托拉斯”,当年10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下设长春、北京、南京、重庆汽车分公司,武汉和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汽车、工艺和轴承研究所,工厂设计院、供应、销售、建设及配件等公司,共辖64个厂。“文化大革命”开始,托拉斯被批判,汽车工业公司解体。以后,逐渐形成一机部汽车局和交通、建设、农机等中央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分管一部分汽车工业的局面。1979年2月成立汽车工业总局,管理全国汽车工业。同年12月国家机械工业委着手研究和制订汽车工业改组调整方案。1982年5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简称中汽公司)公司成立,公司是从事生产经营业务和核算的经济实体。公司下设解放、东风、重型、上海、京津冀、零部件等6个联营公司,进出口、销售服务和汽车配件公司及研究所、设计院与高校。1987年5月根据不要搞高度集中的经济实体,给骨干企业更大的自主经营权的精神,成立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撤消中汽公司。联合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在企业和政府间起桥梁纽带作用,根据国家授权,对全国汽车行业行使必要的行业管理职能,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户。1990年2月改组成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公司受机械部委托行使全国汽车工业管理职能的经济实体,实行计划单列。1994年9月确定组建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管理全国汽车行业。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家机械局,下设行业发展司,综合行使全国汽车行业宏观管理职能。

各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内,逐步出现产销人物六统一的紧密联营形式。1987年国家确定东风、解放、重型3个联营公司实行企业集团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进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1992年成立一汽、东风、

重型汽车集团。

80年代初开始,中央非汽车工业部门和地方对汽车工业由行政管理,改为行政性公司,再变为经济实体,继之发展为企业集团或股份制公司,如成立了交通、建设、兵器、航空、航天等部的下属的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或地方所属的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北京、上海、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等。

目前,中国的汽车工业企业有的属于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三大集团,还有汽车及非汽车工业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委厅局办分管的,是条块多层次管理体系。如何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还在探索。

**建设成就** 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汽车工业逐步建成近20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门类较齐全,产品品种较丰富的汽车工业体系,形成了几个比较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建成一批科研院、所和人才培养体系。1997年生产汽车158.3万辆,销售率99%,汽车工业总产值2121.3亿元,销售收入2128.2亿元,资产总计3842.1亿元,利税总额177.2亿元。出口汽车1.49万辆,出口创汇8.5亿美元。汽车总产量居世界第十一位,轿车产量48.8万辆,居世界第十三位。

Qian Changzhao

**钱昌照** (1899~1988) 政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乙藜。江苏常熟人。1899年11月2日生。192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经济。1923年参加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到英国、美国、日本考察。回国后在工商界任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1929年任国民政府秘书。1930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2~1947年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代理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参与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新路》周刊。1948年秋赴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工业。后在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政协全国委员会财政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是第一屆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

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1988年10月14日逝世。

Qian Duansheng

**钱端升** (1900~1990) 法学家、政治学家。上海市人。1900年2月25日生。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后获得改正。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第二、五届常委;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对法学研究和教育有精湛的造诣,注意借鉴中国古代和法国的法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曾参加1954年、1982年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政治学方面也多有建树。主要著作有:《中国政府与政治》、《民国政治史》,及合著《比较宪法》、《民国制度史》等。译著有:《法国政府》、《英国史》等。1990年1月21日逝世。

Qian Junrui

**钱俊瑞** (1908~1988) 经济学家。曾用名笔名钱泽夫、周彬、陶直夫。江苏无锡人。1927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1929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筹办了《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现世界》等杂志。1933年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宣传委员、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1938年后,历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1946年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赴延安,先后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论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

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中心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秘书长，《世界经济导报》名誉社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至第六届委员、第三届至第六届常委。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土地问题、地租问题、农村社会性质问题都有深入研究。30年代明确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村生产关系，中心问题是土地，论证了中国农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提出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的经济基础。在世界经济方面，把世界经济的发展划分为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过渡以及统一的共产主义世界经济三个历史时期，并以这种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作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著作有：《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中国》。1988年5月25日逝世。

#### Qian Linzhao

**钱临照** (1906~ ) 物理学家。江苏无锡人。1906年8月28日生。192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先后到东北大学、北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37年回国，随中央研究院前往昆明，从事应用光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物理学报》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第一届理事长。长期从事晶体研究。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

#### Qian Mu

**钱穆** (1895~1990) 史学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895年7月30日生。曾就读于常州中学、南京钟英中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任小学教师多年。1918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论语年解》。1921年后执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因发表著作《国学概论》、《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等受到教育

界、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起，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移居香港，后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任院长。1955年创办新亚研究所。1960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1967年赴台湾定居。196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任台湾中华研究院教授。1987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90年8月30日在台湾去世。钱穆一生潜心学术，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教育与文化》、《中国思想史》、《朱子新学案》、《国史大纲》、《孔子传》等。

#### Qian Qichen

**钱其琛** (1928~ )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嘉定人。1928年1月生。1942~19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1945~1949年任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1949~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5~1963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63~1966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1966~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1982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曾担任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1982年起任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两国的政治磋商。1982~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1988~1998年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曾出访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加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1~1993年任国务委员。1993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四、十五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Qian Sanqiang

**钱三强** (1913~1992) 物理学家。浙江吴兴县人。1913年10月16日生。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

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原子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1949年9月在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受聘为学部委员。曾兼任近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60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杜布纳城参加了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十二成员国政府全权代表委员会会议。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副主席。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985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他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铀和钍产生的稀土放射性同位素辐射的比较、Ac和Ack的 $\gamma$ 射线以及 $\alpha$ 能谱的精细结构、核能级、内转换、放射性物质的反冲扩散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1948年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才，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6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Qian Weichang

**钱伟长** (1912~ ) 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物理学家、数学家。

江苏无锡人。1912年9月10日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2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工程师，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波兰科学院院士，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

学月刊》编委，中国科学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发明家协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上海大学校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名誉主席。是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至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力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Qian Xuesen

**钱学森** (1911~ ) 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科学家。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6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毕业，获博士学位。后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助理教授(1940~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副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回国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宇航学会名誉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任。在力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作出开创性工作。提出空气动力学中的跨声速流动相似律，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的公式被命名为卡门-钱学森公式。是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系统学等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1991年10月16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是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Qian Zhengying

**钱正英** (1923~ ) 水利专家。政协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女，浙江嘉兴人。1923年7月4日生。1939年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参加新四军。任淮北区党委机关文化教员，淮北泗五灵凤县中学浚南分校教员、训导员、教导员、党支部书记，淮北行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1945~1948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华东军区兵站部前方工程处处长。1948~1950年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1950~1952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局副局长，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华东水利工程学院院长。1953年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0年任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1975年后任水利电力部部长，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1988年后，任中央防汛总指挥部顾问，政协全国委员会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妇青和法制委员会主任。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她曾领导和参加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工程，负责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在治理淮河和密云水库、刘家峡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中，处理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

Qian Zhongshu

**钱钟书** (1910~1998) 学者、作家。江苏无锡人。1910年11月21日生。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获副博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归国后，先后任西南联大(昆明)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任特邀顾问。是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他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博学多能，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均有卓越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过散文集、小说、文艺评论集。长篇小说《围城》风格独特，被译成多种外文。《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篇》、《七缀集》、《槐聚诗存》等。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管锥篇》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的学术巨著，涉及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极富创见，并将中西文化做了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1998年12月19日逝世。

Qian-Gui Tielu

**黔桂铁路** (Guiyang-Guilin Railway) 中国西南铁路网中的重要干线。自柳州站经金城江、南丹入黔而至贵阳站，单线，全长607千米，联接湘桂、川黔、贵昆、湘黔诸路。1944年黔桂铁路柳州至都匀段461千米勉强通车，日军入侵时被破坏殆尽。1949年以前只修通柳州至金城江161千米；金城江至都匀300千米1956年底修复，1958年元旦交付运营。都匀至贵阳146千米1949年以前完成了少量土方和桥涵工程，1949年以后重新勘测，按I级铁路标准设计，1956年6月动工。主要工程量有：土石方1555万立方米；隧道33座，总延长10.3千米；桥梁28座，总延长2.5千米。1958年12月30日该段新建工程竣工，1959年3月交付运营。黔桂全线畅通，成为入黔的第一条铁路通道。

Qiao Shi

**乔石** (1924~ ) 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籍浙江定海。1924年12月21日生于上海。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南方中学、光华附中党支部委员、书记，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中学区委干事。先后在华东联合大学文学系、淮南华中局城工部调训班学习。1945年后，任上海中共秘密组织



学委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中学分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上海同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学委总交通、新市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北区学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杭州市委青年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市委青年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委员会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后，任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酒泉钢铁公司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1962~1963年在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习。1963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员、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3年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4年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5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月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党组书记。

#### Qinhuangdao Gang Meiyun Matou

**秦皇岛港煤运码头** (Qinhuangdao coal wharf) 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国家重点建设和发展的港口。秦皇岛港现拥有码头泊位49个，其中，生产泊位28个，1万~10万吨级的深水泊位26个。港区陆域面积8.56平方千米，水域面积115平方千米。有先进的装卸机械、机车车辆、自营铁路、港作船舶及配套服务设施等。京山、沈山、京秦和大秦4条铁路干线直达港口。港口吞吐量已由解放初期的80多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2218万吨，又提高到1997年的8300多万吨。煤炭通过能力超过1亿吨，港口设计年通过能力达到1.24亿吨，跻身亿吨大港行列。

秦皇岛港初为渔港，1899年英商开平煤矿公司开始建造木码头，主要供出口煤炭用，30年代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皇岛港务

局于1959~1962年新建8号、9号泊位。70年代中期，在东区建成原油出口泊位，并另建杂货码头。80年代决定大规模兴建煤运码头。港口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先后4次建港。1983年7月1日，秦皇岛港煤码头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5万吨级和2万吨级泊位各1个；1985年7月，煤码头二期工程竣工投产，建成5万吨级泊位2个，二期工程结束，形成吞吐煤炭能力3000万吨；1990年7月1日，煤码头三期工程10万吨级、5万吨级泊位各1个，2.5万吨级2个交付使用，年出口煤炭能力3000万吨；1998年1月，秦皇岛港煤码头四期工程竣工，建成国内最大的煤炭码头。这些大型机械化码头的兴建，提高了港口的通过能力，形成了一条晋煤外运、北煤南运的海上通道，秦皇岛港成为这条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港。1980年，8号杂货泊位改造成煤炭专用码头；1982年，进行第二次技术改造；1987年，对煤码头一期工程进行改造，通过能力达到设计水平；1993年，又同9号泊位一道，进行了第三次改造，年通过能力大大提高。1978~1997年港口共运输煤炭8亿多万吨。

#### Qin Jiwei

**秦基伟** (1914~1997)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4年11月16日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次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中共四川红江县委委员和军事指挥长，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31军274团团团长，参加了鄂豫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长征中，任补充师师长。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参谋，10月随部西渡黄河作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新编11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参加了磁武涉林战役和百团大战。抗战胜利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开辟豫西根据地的斗争和邯郸、洛阳、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西南等战役。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任军长，参与指挥了上甘岭战役。1953年回国后，任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7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后历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司令

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2月2日逝世。

#### Qinshan Hedianzhan

**秦山核电站**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营运的原型堆核电站。位于中国浙江省海盐县秦山山麓北侧，杭州湾之畔，距上海市和杭州市的公路距离分别为126千米和92千米。

70年代，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审查批准了核电站的建设方案，1984年核电站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从1985年3月21日电站核岛主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到1991年12月15日第一次并网发电，其建造工期为81个月。核电站于1993年3月12日开始试运行，1994年4月1日正式商业运行。

秦山核电站是压水堆核电站，反应堆额定热功率为96.6万千瓦，额定发电功率为30千瓦。它是带基本负荷的电站，设计寿命为30年。

掌握核电技术是原型堆电站的重要任务，为此，秦山核电站先后进行了400多项科研试验项目。核电站的大部分设备由国内自行研制生产，少量设备为国外进口。

秦山核电站严格按照中国核安全法规和辐射防护规定以及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作为设计、建造、运行的准则，核反应堆具有负反应性温度系数，运行时具有良好的自稳调节性能。电站设置了多重和多样的安全保护措施，以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保障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秦山核电站具有完整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从选址到运行各个阶段均经过严格的安全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并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咨询和评审。

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对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己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之一。

#### Qinshihuangling Bingmayong

**秦始皇陵兵马俑** (Qin Shihuang Tomb's Terre-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秦始皇陵随葬的陶制兵马俑。位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西南。1974年3月当地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了1号兵马俑坑。7月开始有组织地发掘。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1号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通过复探和试掘,摸清了俑坑四周边界的准确位置和坑内陶俑分布情况。1978年4月,1号兵马俑坑展览大厅主体工程竣工,5月1号兵马俑坑开始正式发掘。1976年4月至5月又相继发现了2、3号坑。1989年初,开始对3号坑进行发掘。1994年10月起4号坑边发掘,边开放。秦俑1、2、3号坑大约修建于公元前221年至前209年,规模宏伟,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埋葬文物丰富。1号坑面积为14260平方米,内有兵马俑6000件,战车40余乘,是一个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2号坑呈曲尺形,面积6000多平方米,内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匹,骑兵的鞍马116匹,各类武士俑900余件,是一个车、骑、步兵混合编组的军阵;3号坑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内有卫士俑68件,骠马髹漆彩绘战车1乘,义卫兵器30件,似为指挥1、2号坑军阵的指挥部,古称“军墓”。3号坑内的陶俑、陶马是按当时的军阵来编组。车马和俑的制作,形象逼真,是秦国军队的缩影,对研究秦的军事装备、编制和军阵的编列,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秦俑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其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8000多件兵马俑以其卓越非凡的雕塑艺术,制作精良的青铜兵器,逼真形象的军阵排列,设施完整的指挥系统风靡中国和世界。秦兵马俑这一古代文明伟大奇观的发现,引起世人的瞩目,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qingnian zhiyuanzhe xingdong

**青年志愿者行动** (youth volunteer operation)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造的,由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志愿为社会、为他人提供服务 and 帮助的一种活动。这项活动是1993年开始的。其主要内容是围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开展活动,如义务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下岗职工、残疾人等提供服务,开展义教、义诊、义演等公益性活动,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这项活动自开展以来,发展迅速,遍布全国各地,不仅成为共青团组织的一项支柱性工作,而

且成为青年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有效载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特有的、重要的作用。截至1998年底,全国已建立省级青年志愿者协会29家,服务站1300多个。

Qingzanggaoyuan longqi de zonghe yanjiu

**青藏高原隆起的综合研究** (synthesized research on the ris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一个独特的地质、地理单元,素有“世界屋脊之称。1966~1968年和1973~198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自然综合考察委员会、地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地质学、生物学科学工作者,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填补了地区研究的空白。有许多新发现、新记录,编写了59本专著,全面阐述了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高原隆起、自然环境变迁、生物区系形成与演变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中国对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研究陆壳动力学最理想的地区。通过考察研究,描写了30多个门类、3800多种古生物化石,建立了西藏地区区域地层序列和地层分区,查明了西藏地区各类岩石的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经综合研究,首次对本区提出了高原形成的板块构造模型。

从高原隆起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演变和分异规律,发现了高原上的多次冰期。查明由于高原隆起、印度洋季风受阻,对高原自然地域分异起决定性影响,并首先将高原划分为7个各具特色的自然地带,为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业提供了依据。

通过考查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动植物新科属,仅高等植物就有新种300多个。发现珍稀鸟类30多种。查明西藏高寒地带草场占全国草场面积13%,森林面积占全国5.1%,云杉林蓄积量之多世界罕见。发现700多种药用植物。查明西藏水能蕴藏量近2亿千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通过考察提出了西藏自然资源评价基础和农业发展方向与增产途经。

此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

Qing-Zang Gonglu

**青藏公路** (Qinghai-Tibet high-

way)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修建的从青海西宁市到西藏拉萨市的干线公路。全长1943千米。

青藏公路西宁市至格尔木市段原有782千米线路因年久失修已部分湮没,1950年开始整修,1953年完工通车。格尔木市至拉萨市段1951年5月开始勘察,因自然条件复杂恶劣和国家经费困难,到1954年才开工兴建。这段公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要穿越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口和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筑路者克服了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土地冰冻等困难,在原有旧路和驼道的基础上修桥铺路,分段改善,只用了198天就修通了全长1161千米的公路。1954年12月25日正式通车。

青藏公路原建标准较低,并穿行在青藏高原上,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地质条件特殊不良。因而这条公路通车后病害严重,曾不断进行整治和改建。1974年开始全面改建,并将公路标准提高为二级,并加铺沥青路面。改建后的路段,运营情况良好。

青藏公路承担着80%以上入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藏族同胞视为“生命线”,对开发青藏地区、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有重大作用。

qinggongye

**轻工业** (light industries) 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加工工业群体的总称,是制造产业结构中的一大分类,它是部门经济分类管理的产物。

**起步基础** 中国日用品和食品的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4500年已有陶器生产和海水制盐,公元前2240年已能生产低度发酵酒,公元25~220年间发明了制瓷术和造纸术,公元1088年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装有擒纵器的自鸣钟。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出现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主要包括印刷、造纸、皮革、火柴、陶瓷、钉、肥皂、制糖、葡萄酒、缝纫机、金笔、自行车等近代工业企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近代轻工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发展缓慢,行业门类很不齐全,只有三十几个;主要技术装备依赖国外进口;企业规模也很小,比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落后了半个多世纪。

**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轻工业部,主管除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以外的消费品工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轻工业厅(局),分级管理轻工业的生产建设。1951年食

品工业部撤销, 1956年第二次成立, 1958年再次撤销, 有关食品工业行业随之并入轻工业或从中分出。1965年, 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第二轻工业部, 原轻工业部改称第一轻工业部。1970年, 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1978年纺织工业从轻工业分出, 单独设部。1993年, 轻工业部改为中国轻工总会, 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1998年, 中国轻工总会改为国家轻工业局, 恢复政府机构性质。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轻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 轻工业的造纸、制盐和制糖三大行业的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见表1)。其他如自行车、日用搪瓷、保温瓶、铅笔、灯泡、火柴、电池、卷烟、饮料酒、绘图仪器等行业也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表1 纸、盐、糖三种产品产量比较表

产品 年产量	纸和纸板	原盐	糖
	1949年(万吨)	10.8	298.5
历史最高年(万吨)	16.5	391.8	41.4
	(1943)	(1943)	(1936)
1952年(万吨)	37.2	494.5	45.1
比1949年(%)	+244.4	+65.6	+126.6
比历史最高年(%)	+125.5	+26.2	+8.9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国家对轻工业的投资不多, 为6.9亿元, 占国家对整个工业投资的2.6%。由于当时轻工业中私营企业比重大, 占80%左右, 国家对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从资金信贷、原料和动力供应、产品收购包销等方面加以扶持, 使这部分生产潜力得到发挥。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3%。

从1958年到1978年的21年里, 先是“大跃进”期间让轻工业停车让路, 后一段时间又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使轻工业得不到协调发展;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轻工业蒙受严重损失。这21年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7.9%, 造成市场上轻工业品供需脱节严重, 许多生活日用品凭证限量供应, 不能满足人民需求。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过拨乱反正, 实行改革开放, 轻工业得以持续、快速、协调发展。1998年轻工业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6670亿元, 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的1177.88亿元增长13倍, 1978~199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4.16%, 涌现出一

批产量多年位居世界前列的产品, 轻工市场也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建设成就** 50年来, 轻工业生产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原有的30多个传统行业日益壮大, 一些缺门行业诞生。自行车行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只有3家工厂能生产整车, 并且规模很小, 全行业年产量不到3万辆。1985年以来, 自行车的年产量达3000万~4000万辆, 连年位居世界之首, 成为自行车生产大国。陶瓷、皮革和家具行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还基本上处于手工业作坊阶段, 现在都实现了机械化, 不少企业采用了电子技术, 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行业。钟表行业过去只能生产钟, 不能生产表, 从50年代后期起, 中国有了自己的手表工业。其他一些缺门行业也陆续诞生。1958年开始形成的感光材料工业, 进入80年代, 已经能够同时生产照相、医疗、电影、印刷、缩微、科技、国防等各方面使用的系列产品。1959年, 中国开始生产合成洗涤剂, 逐步形成了新兴的合成洗涤剂工业。塑料制品工业从1956年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后便迅速发展起来, 其产品用途极其广泛, 成为轻工历史久弥新的增长点。家用电器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只能生产一些小家电, 80年代以来, 不仅小家电继续快速发展, 原先缺门的家用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等大家电也飞速发展, 成为轻工的新兴工业门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划分, 截至1999年4月底, 中国轻工业的行业已拥有19个大类、62个中类、181个小类, 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 轻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较大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轻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 中西部地区比重很小, 有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不仅是沿海地区加快发展, 中西部地区也有了长足进展。中部地区轻工业总产值超过200亿元的有河南、湖北、安徽三省, 超过100亿元的有湖南、黑龙江、吉林和江西四省。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轻工业总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原先近乎空白的内蒙古、新疆和贵州, 1998年轻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41.8亿元、30.8亿元和22.0亿元, 明显地改变了地区的经济面貌。

第三, 轻工业的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没有专门从事轻工业的科研机构, 只是在上海、重庆、兰州三个工业试验所里有几个研究食

品、造纸、陶瓷的实验室, 研究人员为数寥寥, 试验设备和仪器都很简陋。1956年, 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轻工业开始陆续建立起228个科研院所。据对1991~1995年的测算, 在轻工业新增产值中, 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已有30%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轻工业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 手工作业比重大, 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 轻工业有重点地兴建了一批现代化企业。1961年正式形成轻工机械行业, 为轻工业的现代化服务。但当时国家建设的重点在重工业, 对轻工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入很少, 轻工业的技术装备落后面貌改变得很小很慢。实行改革开放后, 国家要求轻工业尽快搞上去, 使农轻重能够协调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轨道。1979年11月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 ①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 ②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 ③基本建设安排优先; ④银行贷款优先; ⑤外汇和引进先进技术安排优先; ⑥交通运输优先)。从1979~1983年轻工业完成基建投资达103.36亿元。在1981~1995年的15年里, 轻工业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共计74.13亿美元。政策的倾斜促使轻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大为改观, 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1985年全国轻工业大中型企业的主要专业设备中达到国际水平的有18.1%, 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1.9%。

第四, 轻工业的教育事业, 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技工教育和职工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全国没有轻工业高等院校, 也没有中等专业学校, 只有少数大学和中等职业学校里附设有轻工科系, 培养的人才很少。1952年在校的轻工专业学生只有1034人, 教师38人。1956年有了第一所轻工业高等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8年以后轻工业教育事业进入发展时期, 全国形成13所轻工业普通高校、41所成人高校、94所普通中等专科学校, 以及众多的职工学校、干部学校和一些培训中心等, 为轻工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据统计, 1978年时, 轻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已有6.98万人, 占轻工业职工队伍总数的0.7%; 改革开放的20年, 轻工业普通高校毕业生13万人, 普通中专毕业生30万人, 职工大学毕业生4万人, 职工中专毕业生6万人。培育出的大批人才成为轻工业发展的骨干。

第五, 轻工业成为出口换汇的重要产业。1952年轻工业品出口额只有0.54亿

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6.56%；到1978年增加到24.59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25.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技术水平和水平的提高，新产品开发不断增多，自营出口比重加大，增强了轻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据1995年工业普查，出口总额达402.26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15倍多。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轻工业品的出口额仍达54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9.39%。

**体制改革** 1979年起，轻工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断探索前进。首先改革产品完全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的制度，在商业选购后由工业自销，进而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产品由企业直接投放市场。其次是改革产品定价权，1982年9月，国务院批准对6类160种小商品实行企业自主定价，之后逐步扩大到绝大多数轻工产品都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定价。第三是原材料供应的改革，从1985年起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的范围和数量，市场调节的部分逐步扩大。到1998年，轻工业的生产基本上实现了市场配置。第四是企业制度的改革，1979年四川省轻工业率先从14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主要在产品自销、利润留成、折旧提留、企业内部奖励及中层干部任免等方面，实行企业自主决定。之后各地轻工业企业改革试点形式相继出台了以税代利、经营承包、转让、变卖、抵押、租赁、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等。轻工业企业终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生产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型与资本经营型。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轻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下放企业，组建行业协会，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主要通过经济和法规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行业协会也不再按部门进行行政管理，而是通过发布信息、制定标准等方式对全行业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服务。在国家政策允许下，轻工业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较快的一个产业部门。从1980年最早出现中外合营食品工业企业开始，到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据全国轻工业系统1997年的统计资料，它的各项经济指标见表2。

表2 中外合营食品企业经济指标

经济类型 经济 指标	总计	国有 经济	集体 经济	非公有 经济
企业数 (个)	52 415	8061	40 106	4248

续表

经济类型 经济 指标	总计	国有 经济	集体 经济	非公有 经济
工业增加 值(亿元)	1 693.71	577.48	579.62	536.61
利税总额 (亿元)	379.12	179.17	61.51	138.44
固定资 产投 资(亿元)	377.81	161.19	52.65	163.97
固定资 产原 值(亿元)	4139.98	2310.15	1 044.99	784.84

**推荐书目**

王毅之、王中编：《当代中国的轻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qingdan baozha chenggong

**氢弹爆炸成功** (successful explosion of a hydrogen bomb)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的第一次氢弹空中爆炸试验获得成功。试验采用轰-6甲型飞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核航空炸弹，爆炸威力为330吨梯恩梯当量。这次试验是中国在1966年12月2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全威力空投爆炸试验。通过试验进一步研究了在大威力核爆炸条件下，大范围环境因素对冲击波、光、热等效应物的杀伤和破坏效能。为确保核试验成功，有关方面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参加试验的军内外单位有28个，各类技术保障人员6100余人；设置测试项目38个，并安排效应试验项目53个，投入各种测量仪器设备493台(套)。此外，试验取样工作除使用飞机挂载取样器穿入蘑菇云收取放射性微粒样品外，还第一次使用发射固体火箭收取样品。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飞机携带氢弹飞临靶标上空实施投弹。氢弹脱离飞机后，自带降落伞按程序正常打开，8时20分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空爆炸。氢弹爆炸后，运载飞机安全返航着陆，固体火箭和取样飞机获得大量数据，试验场区内人员安全，通过对水、土壤、粮食、蔬菜、牧草等取样检验，没有发现污染。此次氢弹试验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战略导弹热核弹头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

qingcha wuyaoliu yundong

**清查“五一六”运动** (investigation of “5.16ers”) “文化大革命”

期间发生的一场严重曲解并扩大化的揭露打击“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67年5月间，北京个别单位的极少数人组成“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利用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在北京街头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攻击和污蔑周恩来。同年9月，经毛泽东审定的一篇文章里揭露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并将其定性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清查初期，也处理了一批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头目。但到1968年，结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共中央又成立了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开展揭露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清查不断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造成清查工作严重扩大化的后果。中共中央虽多次发文，周恩来等人作出批示，试图制止清查工作中的偏差，但问题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直到1970年毛泽东指出“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清查活动才逐渐降温，最后不了了之。

qingchan hezi

**清产核资** (checking up of assets and capitals) 1951~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项重要措施。

1951年4月，政务院发布《关于1951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规定》，要求国营工业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为给经济核算制的实施打下基础，6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具体规定全国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都要重新登记，并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以达到用最少的物资和资金来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1951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加速经济发展，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国营企业用经济核算的办法，降低成本，增加生产。清产核资成为增产节约运动中的重要环节。1952年底，清产核资工作基本结束。

Qinghua Daxue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以工科为主体，兼有理科、经济管理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占地面积329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121 万平方米。创建于 1911 年，前身为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1928 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 年抗战爆发后南迁湖南长沙，翌年又西迁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迁回北平清华园原址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

1998 年，清华大学共有 6 个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理学院、建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32 个系、41 个研究院、1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管理机构。全校有 34 个本科专业、8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108 个硕士专业、85 个博士专业、29 个国家重点学科、16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一座藏书 306 万册的图书馆。全校有教学和科研人员 3754 人，其中教授 892 人，副教授 1603 人，讲师 2028 人，助教 821 人；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8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 人，是全国高等院校中院士人数最多的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达 1.7 万人，其中本科生为 1.1 万多人，研究生 6000 多人，外国留学生 401 人，分别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区。1949 年 10 月以来，清华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近 10 万名高级专门人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科学家、工程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

截至 1998 年底，清华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星火计划奖 252 项。清华大学科研经费、科技项目获奖数及专利数居全国高校首位。1989 年 11 月，由清华大学设计研制的世界第一座 5 兆瓦、一体化壳式低温核供热反应堆投入运行，这是中国在核能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领域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1993 年，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主持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工程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1994 年 10 月，建在清华大学的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工程研究中心获得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国际大奖——大学领先奖；微电子学研究所完成的 1~1.5 微米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成套工艺研究和由此工艺线研制的专用集成电路 1 兆位汉字 ROM（只读存储器），缩小了中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网络中

心建在清华大学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于 1995 年年底提前一年通过国家验收，已经连通全国 400 多所高校，并与国际互连网通；1995 年 6 月，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之一、中国第一座 10 兆瓦高温气冷反应堆在清华大学奠基，将于 1999 年底之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中国将成为继美、英、德、日四国之后第五个拥有这种反应堆的国家。

qingli jieji duiwu

**“清理阶级队伍”** (Cleansing of Class Ranks)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理群众当中“阶级敌人”的阶段性运动。1967 年 3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提出要对“混入”各地各单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由于当时主要打击对象是“走资派”，这个运动没有即时开展。1968 年 5 月，在全国多数地区已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姚文元向毛泽东呈报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关于“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材料，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再次提出要在群众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并将它作为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主要“清理”对象是“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主要手段是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和专案调查，对揭露出的“坏人”予以批判斗争，并对其中一些人实行刑事处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中央总结推广了由中央警卫部队作为试点产生的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提出对“阶级敌人”进行“不停顿的进攻”、“给出路”等政策，指导全国。有些政策对前期的无政府主义造反活动有所限制。但由于指导思想贯彻的是错误路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违反政策法律的情况普遍发生，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采用逼、供、信和捏造事实等方式办案，造成广大群众遭受打击迫害的严重后果。1971 年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一起中断。

qingli waiguo zai Hua qiye

**清理外国在华企业** (cleaning up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国在华企业“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了清理。

1950 年 12 月 16 日，针对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并对中国实行封锁的决定，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1951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进一步指出：美资企业中凡牵涉到中国主权以及同中国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可予征用，其他可分别情况予以代管、征购或管制。至 1952 年底，美资企业大体清理完毕。

对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企业，根据其对华的态度和做法，采取相应措施。对于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在华企业，允许其在中国继续营业。后来，由于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这些外资企业逐渐收缩或转让。至 1956 年底，外国在华企业基本清理完毕。

qingli zhengdun gongsi

**清理整顿公司** (general scrutinization over the corporations)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89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理整顿公司工作。

起因 1986 年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再次出现举办“公司热”的现象，截至 1988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公司 294 946 户，从业人员 4088 万人。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共有 43 956 名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任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并且干扰和阻碍了改革。

采取措施 198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要求当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底，全国各地、各部门自查；11 月底至 1989 年 1 月中旬，重点抽查公司总数的 30%~50%；1989 年 1 月中旬开始处理案件，进行公司的制度、法规建设。同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2 月 20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通知》，主要解决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违法经营、业务脱节、经营紊乱问题。上半年，清理公司有一些进展，

但尚存在许多问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把进一步清理整顿好公司作为要做的头一件事。8月1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了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的审计结果。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好公司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决定》还规定了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指导方针、基本要求等15方面的问题。9月上旬，中央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10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听取汇报时指出：清理整顿公司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需要，是廉政建设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需要。清理公司，一要决心大，二要加强组织领导，三要处理好撤并后的善后工作，四是中央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要带头。

**取得成效** 清理整顿公司取得明显成效。据统计，截至1990年2月底，全国查出公司中的案件91960件，其中大案要案17791件。案件涉及地厅、司局级干部237人，其中受党纪、政纪、法纪处分的66人。同年7月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司撤并后有关事项的公告》。同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宣布，中国党政机关办公司和党政干部经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据统计，到1990年底，全国已撤并公司10万多个，占原有各类各级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者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的问题基本解决，市场秩序得到整顿，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础。

Qiu Huizuo

**邱会作** (1914~ )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西兴国人。1914年4月15日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出席了中共七大。1946年后历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热中地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党委副书记，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

45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衡宝等战役和广西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后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一伙。196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常规兵器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Qiu Shaoyun

**邱少云** (1931~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四川省铜梁县人，1931年7月生。1949年12月25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秋，在四川省内江地区剿匪中，活捉匪首，受到部队嘉奖。1951年3月25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任志愿军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曾冒着美军飞机扫射轰炸，从燃烧的房屋里救出一名朝鲜儿童。1952年10月11日，在对金化以西391高地美军前哨阵地的反击战中，他和全排战友奉命于夜间在距美军阵地前沿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向391高地的美军发起进攻。12日11时，美军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引起烈火蔓延到他身边，焚烧其衣服和身躯，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他忍着剧痛始终不动。任烈火焚烧了30多分钟而壮烈牺牲。由于他的行动保证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当晚攻占了391高地，歼灭了美军一个加强连。战斗结束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于1952年11月6日给他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1日又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将他的名字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石壁之上。1953年，四川省铜梁县建立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树立纪念碑。

Qiushi

**《求是》** (*Seeking Truth*) 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它的前身是《红旗》杂志。1988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红旗》，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中央理论刊物《求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求是》杂志改由中共中央主办，委托中宣部代管。《求是》杂志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历任总编辑为苏星、有林、邢贲思、戴舟。

《求是》杂志担负着正确全面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地宣传和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每期都刊发具有理论性、指导性、权威性的重点文章。遇有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重大部署或重大事件，都要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除此以外，还设立了一系列重点栏目，主要有：思想评论、探索与争鸣、中心组学习园地、工作研究、领导干部短论、党的生活、调查报告、学点辩证法、读书、绿野等。所发文章，在广大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求是》杂志为半月刊。除汉文版外，还有6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向国内外发行。1999年发行量达100万份。

Qu Wu

**屈武** (1898~1992) 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898年7月16日生。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曾作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陕西学生代表赴京请愿。后赴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期间，参与创办《贡献》杂志。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并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任常务主席。1923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后在莫斯科任铁道站站长。1928年因未及时奉命回国，被苏联当局逮捕，判刑流放。1938年回国后，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1941

年皖南事变后，在重庆参与创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10月，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初，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赴北平进行谈判。9月，参加新疆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乌鲁木齐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是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1992年6月13日逝世。

**Quanguo Caijing Gongzuo Huiyi**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All-China Conference on Finance and Economy)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专门的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和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见的报告。

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对1953年上半年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开展了批评，其中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认为，1953年1月开始执行的修正税制，从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看是必要的，达到了保税的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在党已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在宣传上简单地把新税制概括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不适当和不合时宜的。在会上，高岗利用与会人员批评财经工作缺点错误的机会，抓住新税制问题，以批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为由，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使会议难以正常进行。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状况，毛泽东要周恩来把当时不在北京的陈云、邓小平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针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明确反对说中央财经委员会有两条路线的说法。邓小平说，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他不赞成。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

8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报

告。他传达了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概括，指出：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他指出，4年来的财经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也存在严重错误，但还未构成一个系统，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进而总结了经济建设中应该引起注意的5条经验。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批评年初实行的新税制规定“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指出，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强调必须在全党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Quanguo Disici Wendaihui**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Fourth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简称。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3200人。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茅盾致开幕词。

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基本估价，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针、政策。《祝辞》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的猖狂作乱，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在论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时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创作出优秀作品和表演艺术。他还就坚持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贯彻双百方针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原则性的说明。《祝辞》要求文艺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

路”。《祝辞》是这次大会具有重大意义的主要标志。周扬向大会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文艺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提出要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文艺的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同时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用最大的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鼓舞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团结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大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议期间，文联所属各协会都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修改了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了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大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等为副主席。这次大会是中国文艺发展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Quanguo Gongjiao Jihua Huiyi**  
**全国工交计划会议** (All-China Forum on Industry and Transport)

1966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参加者有国务院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部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7个大城市及各大区的负责人。围绕工业交通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对陈伯达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工厂的生产不能中断。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谷牧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十五条”的基本意见。但是，他同时又肯定了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制造的上海“工总司”拦车卧轨的“安亭事件”。陈伯达在“十二条”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一些条文照顾到了工交企业生

产建设的连续性。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谷牧汇报了全国工交计划会议的情况,提出大家担心厂矿群众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对学生做好工作,不能让工厂的党组织中断工作,要鼓励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谷牧根据周恩来指示所写的《汇报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判,江青攻击《汇报提纲》“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张春桥、康生、王力也相继发言进行批判。谷牧、陶铸等人被迫作了检查。周恩来对与会的各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只能因势利导。12月6日,林彪在会议最后做总结时,针对周恩来的态度说: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交计划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原定会期5天,结果开到12月6日。会议结束后,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以此为转折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蔓延到工业交通企业。

## Quanguo Kexue Dahui

### 全国科学大会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5586名代表,其中有优秀科技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科学种田模范、从事科学事业的干部,还包括全部健在的117名科学院学部委员。邓小平、华国锋在会上讲了话,方毅作了发展科学技术规划的措施的报告。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指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要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的讲话,澄清了科技事业中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华国锋着重讲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带病出席了会议,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长篇书面发言。大会交流了经验,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

案)》,表彰了科学技术战线上826个先进集体和1192名先进个人,奖励了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quanguo renkou pucha

### 全国人口普查 (nation-wide census)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进行了4次全国人口普查。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1953年7月1日零时。同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普查结果:1953年全国人口总数为60 193万人;男性人口30 082万人;女性人口27 978万人;汉族54 528万人;各少数民族3532万人。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1964年7月1日零时。普查结果为:1964年全国人口总数为72 307万人;男性人口35 652万人;女性人口33 806万人。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1982年7月1日零时。同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1982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 031 882 511人;男性519 433 369人;女性488 741 919人;汉族936 703 824人;各少数民族人口67 233 254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90年7月1日零时。同年10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公报。199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 160 017 381人;男性为584 949 922人;女性为548 732 579人;汉族人口为1 042 482 187人;少数民族为91 200 314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6 124 67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91 131 53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64 648 676人。

##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简称“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也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

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①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②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③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罢免上述人员。④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⑤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议案的一般程序为:提案人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



说明；各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主席团可以将议案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由主席团决定。经表决，议案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宪法的修改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 1/5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采取投票方式表决，由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机关应当派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 30 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3 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 1/10 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Changwu Weiyuanhui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届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委员长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下列职权：①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

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解释法律。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③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④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⑦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决定特赦。⑧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并主持。委员长可以委托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10 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先由提案人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然后由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委员长会议可以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案一般要经过初次审议和再次审议，才能提请常务委员会全

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议案采取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③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有关机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10 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Quanguo Xuanchuan Gongzuo Huiyi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All-China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Work)

中共中央为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而召开的工作会议。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与会者 800 多人，有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同宣传、文艺、教育、新闻出版、高教、科学等各方面人士座谈，交换意见。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整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他指出，我国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不同意见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需要几年才能巩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毛泽东对我国 500 万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分析，指出：他们当中 90% 以上是爱国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可能 1% 到 2%，或者更少一点。他宣布：全党整风将在今年开始进行，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整风方法，像在延安那样整风方法，像和风细雨打死。他说：我光荣的党，正确但是我们还缺点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一种自由批评的环境，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

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文化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会后，毛泽东即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一路上发表讲话，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双百”方针，推动会议精神的贯彻。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推荐书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

quanguo zhanbei gaochao

**全国战备高潮** (nation-wide enthusiasm for war preparations)

1969~1970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全面战备高潮。

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霸权主义日益扩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部署了大批军队。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迅速掀起战备高潮。4月，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号召全国人民：“我们绝不可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全国的备战工作开始由常备性质转入临战状态。随后，苏联军队8月13日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新的流血冲突，苏联领导人还通过各种媒介有意散布向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也相继成立起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并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强调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保证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畅通；要求各行各业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通过亲自增加的一条口号发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

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御苏联核威胁的姿态。

在全国战备时期，由于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一度估计得过于严重，也造成了不利后果。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进一步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彪“第一号令”下达全军。要求全军立即进行紧急疏散，各部队组织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进行伪装和隐蔽；并要求国防工业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第二炮兵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第一号令”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极大震动，许多大中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并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安等队伍；许多重要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地区搬迁转移或准备搬迁转移。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20日前紧急疏散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在职领导人及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人离开了北京。刘少奇、陶铸在疏散地被迫害致死。全国战备期间，军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69年下半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1969年10月下旬，中苏两国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立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减少。1971年后中国的战备工作逐渐转入正常。

Quanguo Zhandou Yingxiong he Laodong Mofan Daibiao Dahui

**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War Heroes and Model Workers)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同时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两个代表大会。

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第42次政务会议决定，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目的是表扬人民革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鼓励部队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匪帮，解放全部国土，并鼓励部队减轻人民负担，开展生产运动。同时决定召开全国工

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目的是表彰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鼓励全国工人发扬新的劳动态度、克服困难、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全国农民实行生产互助、改进技术、深耕细作、扩大耕地、增加生产；鼓励全国人民共同效力于解放全部国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1950年9月25日，两个会议同时在北京一个会场举行。350名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和464名劳动模范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词，强调“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可靠的支柱和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两件事有赖于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会上，代表们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参加了国庆活动，应邀到各单位宣讲模范事迹，最后通过了《告全国军队和劳动人民书》。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彻底解放祖国大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quanjun dabiwu huodong

**全军大比武活动** (all-PLA competition in military skills)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0年代中期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练兵活动。1959年以后，人民解放军总结了在训练中实行按级任教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发扬传统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在群众性练兵的基础上，总结推广了南京军区步兵一〇〇团二连副连长郭兴福创造的教学方法，并在全军加以推广。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此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迅即开展创造郭兴福式教练员的活动，先后召开现场观摩评比大会，兴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高潮。为了检查训练结果，1964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三个月，比武活动掀起了高潮，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有3318个单位、3.3万人、3766个项目。通过比武，共评选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名尖子个人。全军大比武活动，交流了经验，检阅了成绩，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对部队的军事训练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偏重技术基础训练，忽视战役战术训练；有一些

部队在大比武中有拼凑尖子和搞花架子的现象，影响了训练质量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

Quanmian Jinzhi Heshiyan Tiaoyue  
de qianshu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

(signing by China of “Tot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1996年9月24日中国代表签署了在第50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瑞士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从1994年开始谈判

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努力，1996年8月20日形成条约草案文本。同年8月底提交联合国大会，126个国家成为共同提案国。9月10日第50届联大全体会议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条约》包括序言、17项条文、两个附件及议定书。《条约》规定：缔约国将作出有步骤、渐进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裁减核武器，以求实现消除核武器，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核裁军

的最终目标。9月24日上午，联合国在托管理事会大厅举行《条约》的开放签署仪式，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代表中国签了字。中国政府还就此事发表五点声明：呼吁核大国放弃核威慑政策；撤回在国外的核武器；尊重无核区的地位；不发展，不部署外空武器；谈判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标志国际社会40年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是走向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里程碑。

# R

Rao Zongyi

**饶宗颐** (1917~ )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字选堂,号固庵。广东潮州人。1917年8月9日生。幼承家学。后入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纂修,成《楚辞地理考》。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作《词籍考》。香港沦陷后奔广西桂林,任教无锡国立专科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继赴汕头,总纂《潮州志》,共成二十册。又兼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起,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名誉教授、系主任暨艺术系与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国务院全国古籍整理小组顾问,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教授,法国巴黎实验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著述宏富,以敦煌学最为知名。主要著作还有:《敦煌曲》、《敦煌白画》、《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国史上的正统论》、《选堂集林·史林》(三册)、《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二册)、《古史新辨》、《远古丝绸之路》等。此外还主编《甲骨文通检》。

rengong quanhecheng niuyidaosu yanjiu

**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 (research in total synthetic bovine insulin)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而胰岛素的分子具有蛋白质所特有的结构特征,被公认为典型的蛋白质。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方面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196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的科学工作者经过6年多的努力,获得了人工全合成的牛胰岛素结晶。经鉴定,人工合成的胰岛素的结构、生物活性、物理化学性质、结构形状,与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胰岛素的分子量接近6000,其分子由A、B两条链组成,A链有21个氨基酸,B链有30个氨基酸,两条链通过两个二硫键连在一起。具有空间结构的胰岛素分子还可以整齐地排列起来形成肉眼可见的结晶体。

研究工作首先是成功地将天然胰岛素的A、B两条链拆开,再重新连接而得到了合成的天然胰岛素结晶。随后将人工合成的B链和A链分别与天然的A链和B链连接而得到了半合成的胰岛素。最后将人工合成的A链和B链连接而获得了全合成的结晶胰岛素。在这项工作完成后,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继续改进合成方法,并合成了许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多肽激素,同时进行了更大蛋白质分子的人工合成,均获成功。

胰岛素人工全合成的成功,为中国蛋白质的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蛋白质和多肽的研究人才。这项研究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renminbi

**人民币** (Renminbi)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区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并定为本位币。主币单位是10000元,辅币单位是100元。至1950年8月,共有12种面额。即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

195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的折合比率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1个票种,其面额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5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

1963年,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分币与3元票种不再印制。

1984年,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增加50元、100元两个票种。后三套人民币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renminbi jingchang xiangmu xia de ziyou duihuan

**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free exchange of RMB for ordinary items) 人民币在国际收支中经常发生的交易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日

元等其他国使用的货币。国际收支中经常发生的项目,按国际贸易基金组织的定义包括贸易收支、劳务收支和一些单方面转移。中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的政策是由国务院在1996年1月8日批准通过,1月20日发布,并于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它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继1994年汇率并轨后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国际贸易,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务院于1996年1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93号)包括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基本内容。主要是:①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必须调回国内,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外汇擅自存放在境外;②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应按有关规定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或者经批准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帐户;③境内机构的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应当按规定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和进口付汇核销;④属于个人所有的外汇,可以自行持有,也可以存入银行或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个人因私出国用汇,在规定限额内购汇;境内中国公民未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不得将外汇资产携带或者邮寄出境;⑤境内机构工作的外籍专家的人民币合法收入在依法纳税后,可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汇出或携带出境;⑥外国驻华外交机构、领事机构收取的以人民币支付的签证费、认证费等,可持有关证明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并汇出境外;⑦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指定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和规定的浮动范围,确定对客户的外汇买卖价格,办理外汇买卖业务。外汇指定银行通过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调剂外汇余缺,并使用自有资金办理结汇业务所需的人民币资金。

renmin daibiao dahui zhidu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构筑起来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议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根据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原则选举产生的。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一选民在选举中只有一票，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单独或者联合推荐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也可以联名推荐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必须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实行差额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国家为选举活动提供经费、宣传工具和必需的设施，对妨害选举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

**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构成与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它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设有民族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等8个专门委员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自治州、设区的市）、县级（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级（乡、民族乡、镇）4个层次都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1人、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1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乡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主席、副主席。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产生，履行各自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

督。

**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职权**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职权：负责制定和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负责批准省级行政区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选举、决定任命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撤销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中央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罢免由其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要职权：负责制定和修改非基本法律，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解释宪法和法律；负责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规定衔级制度，决定特赦，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个别地区的戒严，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任命的人员包括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除人民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和驻外全权代表；负责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中央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作的部分调整，批准中央决算，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罢免由其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要职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负责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决定授予地方级荣誉称号；负责选举本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的领导人、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选举本级人民政府的个别副职领导人，决定任命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除人民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负责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决议和命令，审查和批准地方计划、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罢免由其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程序**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和工作惯例，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会议举行前，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召开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主席、副主席主持。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可分为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代表团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大会代表团都可以提出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0名以上代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10名以上代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5名以上代表联名，也可以提出议案。对于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首先由提案人向全体会议作出说明，然后在代表团全体会议和代表小组会议上进行审议，还可以在大会主席团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审议，最后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运行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和工作惯例，常务委员会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会议由委员长或者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举行一周前，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提出会议议程，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常务委员会会议可分为全体会议、分组会议、联组会议。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3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议案。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首先由提案人向全体会议作出说明，然后在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上进行审议。根据惯例，法律案或者地方性法规案一般要经过两次审议后，才能进行表决。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renmin gongshe

**人民公社** (People's Communes)

中国农村在1958~1984年间建立的一种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同时又是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中国农村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需要联合治水，并投入大量劳动力和资金。这种情况使一些人以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适应

不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因而提出并小社、建大社、联社的要求。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同年3月，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成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4月间，河南省遂平县嵛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一个有9369户的大社，并草拟了一个“试行简章”。这个社后来成为中央推广小社并大社经验的典型。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首次提出了“人民公社”这一概念。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这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不会太长，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决议》还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于9月10日正式公布后，中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截至1958年10月，参加公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1962年，又进一步把所有制调整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大队管理生产队，并可经营队办企业；公社领导生产大队，并可举办工业和商业，管理教育和民兵，执行基层政权的职能。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1979年。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的体制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

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二是要实行政社分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在农村完成政社分开工作。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renmin minzhu zhuanzheng

**人民民主专政**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政权建设相结合而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文件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在1949年9月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上，都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家制度为人民民主国家的规定。1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这个专政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起领导作用，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标志。其次，这个专政执行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它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

建成共产主义。再次，这个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最后，这个专政不仅要镇压国内极少数敌人的破坏活动，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等职能。所有这些，特别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和这个政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除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外，还创造性地解决了广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特别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保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社会基础和广泛民主的性质。在中国，人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并依照法律享受广泛的公民权利。国家政权在实行广泛民主的同时，对一切敌视、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阶级和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还会表现得相当尖锐和激烈，因此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国内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制裁犯罪活动，保障人民民主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抵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巩固国防的职能没有削弱。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People's Daily)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创刊，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3月15日迁至北平（今北京），同年8月1日起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北京出版。

人民日报现为12版（节假日除外），到1999年1月，包括海外版、华东版和华南版在内，发行量达300万份，分别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印刷，是中国发行量和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报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报纸之一。1985年7月1日创办海外版，在北京出版，并由卫星系统传送版面，同时在香港、东京、旧金山、纽约、多伦多、巴黎和墨尔本印刷出版；1995年1月1日

和1997年7月1日分别创办华东版、华南版；1997年1月，人民日报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网站，读者每天可在网上读到中文、英文和日文的人民日报，目前人民日报网站的日页面访问量已达70万，日点击量达600万。人民日报还出版《市场报》、《讽刺与幽默》、《环球时报》和《新闻战线》、《大地》、《时代潮》、《人民论坛》、《中国质量万里行》等报刊。

人民日报业务机构设置总编室、记者部、经济部、国内政治部、教科文部、文艺部、国际部、评论部、理论部、群众工作部及海外版、华东分社、华南分社、市场报、网络版、新闻战线、出版社等编辑部，国内除台湾省外，在3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设有记者站，在33个国家设记者站或常驻记者。人民日报社历任社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是：张磐石、胡乔木、范长江、邓拓、胡绩伟、秦川、钱李仁、高狄、邵华泽；历任总编辑（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是：邓拓、吴冷西、胡绩伟、秦川、李庄、谭文瑞、邵华泽、范敬宜、许中田。

### Renmin Shengli Zheshi Gongzhai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People's Victory” inflation proof bonds)

1950年1月5日开始在全国发行的以实物为计算单位的公债。在金融物价还不稳定的形势下，国家为了维护认购者的利益，对公债的本息采取以实物计算的方法。标准单位称“分”。每分的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6市的1.3公斤大米（天津为小米），0.75公斤面粉，0.3公尺白细布，8公斤煤炭的平均批发价总和计算。中国人民银行每周公布一次牌价。公债为5年期，年息5%。5年内还清本息，第一年偿还总额的10%，以后每年递增5%。原计划全国发行总额2亿分。第一期发行1亿分。第二期因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不再发行。第一期公债于1956年11月30日全部还清。

### Renmin Yingxiong Jinianbei 人民英雄纪念碑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为缅怀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而建立的纪念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建碑的决定。1949年9月30日举行建碑奠基典礼。由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

委员会负责落实建碑事宜。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1958年5月1日建成揭幕。1961年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碑通高37.94米，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纪念碑由碑身、台座和月台三部分组成。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鎏金大字，背面镌刻着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台座分两层，上层为方形，下层为海棠形。下层“束腰”处四面镶嵌着10块大型汉白玉浮雕，总长40.68米。内容依次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队和胜利渡长江，展示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革命历程。

### renzao diqiu weixing Dongfanghong Yihao

###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East Is Red” No. 1 satellite)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千米，最远点2384千米，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千克，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工程遥测参数和科学探测数据。这颗卫星的设计、研制和发射，完全是由中国独立完成的。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抽调技术人员组建卫星设计院，开始拟定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1967年12月，国防科委召开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正式命名这颗卫星为“东方红”一号，确定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必要的设计参数。最后审定的技术方案是：卫星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入轨道，以自旋稳定方式在空间运行。卫星与运载火箭分离入轨后，末级火箭也跟着卫星在空间运行。从1965年起，各研制单位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群策群力，排除“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干扰，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1970年，2颗发射卫星的总装工作完成，经检查达到设计要求。2颗卫星和1

枚运载火箭由专门列车运达位于甘肃的酒泉卫星发射场，完成了卫星与火箭对接和总检查测试等技术阵地的全部工作。4月24日21时35分，运载火箭准时发射上天。21时48分，现场指挥所宣布“星箭分离，卫星入轨”。4月25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消息，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卫星在环绕地球的运行中，各种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1970年5月14日停止发送信号。

### 推荐书目

张钧主编：《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

### Ren Bishi

### 任弼时 (1904~1950)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乡村教师家庭。曾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初回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继任团中央总书记。同陈独秀有倾错误作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任主持国内工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起草《城乡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为纠正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

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7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会合，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1950年5月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

Ren Bishi Xuanji

《任弼时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Ren Bishi)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

员会编辑的任弼时重要著作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主要内容包括青年运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和土地改革等方面，以1925年论共青团《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为开篇，以1950年10月《为纪念〈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终卷，共47篇32万字。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的名言是：革命者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土地革命初期，一度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8年1月，任弼时发表《对于暴动的意见》，指出“暴动是一种阶级斗争达于最高度的斗争方式”，“必须有广大的阶级及群众做基础”，那种只凭主观意愿，不顾条件的“无动不暴”是“冒险主义”。主张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对纠正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是任弼时在1937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指出“蒋并未脱离中间的立场”，提出要通过斗争促使国民党向国共合作的方向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等文稿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主张。他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理解和支持，为开好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奠定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任弼时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指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工业化，一切其他工作“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他还提出实现工业化，工农业互相促进，巩固工农联盟的论断，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中国条件下运用和发展。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地注重经济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讲演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立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

收入《任弼时选集》的军事著作有《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以及《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6篇。前4篇总结了二、六军团在长距离转移中以运动战逐步转进，保持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后2篇是在运动中打击强敌的实战经验中提出的以持久战克敌的战略思想和若干措施。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者“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一度扩大打击面，混淆阶级阵线，社会情绪动荡时，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阐明划分阶级的标准，坚定地团结全体中农的政策及区别对待新、旧富农，对在民主政权下经济上升的新富农“应照富裕中农待遇”；消灭地主的剥削制度；“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保护工商业等主张。在《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中，批评了土改中把自发运动当作群众路线、完全抛开党支部和打击基层干部的“搬石头”的错误做法，对端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Ren Jiyu

任继愈 (1916~ ) 哲学史家，佛教史家。山东平原人。1916年4月生。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次年起到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年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历任该所研究员、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哲学学科学学位委员会召集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图书馆馆长。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与教学。提出哲学起源于宗教，但宗教立足于信仰和虔诚，而哲学则是人们通过实践产生的理性思维。研究中国哲学史要把研究的问题放到一定的具体历史范围内分析，努力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中国佛教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在密切配合社会需要中充实发展自己，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和传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哲学通史。主要著作有：《墨子》、《老子全



译)、《汉唐佛教思想论文集》、《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四册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宗教辞典》、《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中国道教史》等。

Ren Jianxin

**任建新** (1925~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山西襄汾人。1925年8月生。1946年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中央政法委员会办公厅、中央法制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任秘书。1959~1966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科长、处长。1966~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处长、法律部部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 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 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兼秘书长, 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Ren Mei'e

**任美锬** (1913~ ) 地理学家。浙江鄞县人。1913年9月8日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6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留学, 获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 历任浙江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教授、史地系主任, 中央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 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副主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海洋地质专业委员。长期从事地貌学、海洋地质学、岩溶学和建设地理学的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奖。著作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海岸及近岸带的现代沉积作用》等。

Ren Xinmin

**任新民** (1915~ ) 火箭专家。安徽宁国人。1915年12月5日生。1934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 1937年在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学习, 后任兵工署21厂技术员。1945年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 获得工程力学博士, 后任巴福洛大学讲师。1949年回国, 历任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部主

任、分院副院长, 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副部长, 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85年起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理事会理事。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液体火箭和发动机的研究工作, 主持制订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规划, 领导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1970年作为运载火箭总负责人参加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组织领导, 以后又作为部门负责人参加各种卫星的发射和回收工作。1990年作为技术总指挥, 领导了“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工作。是中国卫星通讯工程总设计师, 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求是科技基金奖等, 199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称号。是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Rong Yiren

**荣毅仁** (1916~ ) 1993~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专业, 获学士学位。1937~1949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厂经理, 1947~1950年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第二、三、五厂总管理处总经理, 1950~1955年任上海申新印染公司总经理。

1954年4月, 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号召, 率先提出申请将自己的全部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接见。毛泽东在1955年12月8日的讲话中以他为例, 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1957年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前夕, 毛泽东提议选他当上海市副市长, 后得到会议代表的赞同, 于1957~1966年任上海市副市长。1959~1966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人大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曾多次提出过重要意见和建议, 得到共产党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 但仍矢志不渝地坚信社会主义, 坚信中国共产党, 表示“受再大的委屈, 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79年10月创办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先后发表过《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几个问题》、《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等文章, 宣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有关政策和思想。

1954~1982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委员, 1978~1982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4~1978年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8~1993年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0~1966年任上海市工商联会副主任委员, 1953~1993年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主席, 1983年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4年后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 1985~1994年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1985年后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名誉主席、江南大学名誉董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 1987年后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名誉会长, 1988~1994年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1~1993年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名誉会长。

Rong Guotuan

**容国团** (1937~1968) 乒乓球运动员。广东中山人。1937年8月10日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即喜爱乒乓球运动, 15岁时曾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回到内地, 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入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获男子单打冠军, 获运动健将称号。随后被选为国家乒乓球队队员。他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 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 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战术灵活多变, 很有特色, 代表了“快、准、狠、变”的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技术风格。1959年, 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 先后战胜了美国的R. 迈克尔、匈牙利的Z. 别尔切克和F. 西多等世界乒坛名将, 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也是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1961年, 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又为中国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64年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员, 指导女队获得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国家体委曾两次给他记特等功, 多次授予他荣誉奖章和奖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68年

6月20日含冤去世。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

Rui Xingwen

**芮杏文**（1927～ ） 中共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江苏涟水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滨海中学青年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

组织部干事、锦西炼油厂机电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化工部吉林总公司副经理、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第一副经理、第七化学工业建设公司经理、北京市国防工业一办副主任、城市规划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79年起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城乡环境建设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85

年6月任上海市委书记，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免去其书记处书记职务。1991年5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 S

Saifuding Aizezi

赛福鼎·艾则孜 (1915~ )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至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维吾尔族。1915年3月出生于新疆阿图什。1935年赴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学习，1937年毕业于新疆后，继续在盛世才举办的乌鲁木齐政治训练班学习。1938~1943年在塔城工作，担任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创办的《前进报》编辑、主编等职，其间积极参与反帝联合会工作，并任塔城专区反帝联合会组织干事。1944年参加著名的三区革命，先后任临时政府委员，教育厅副厅长、厅长，三区民族军团长。1946年7月组建新疆民主联合政府后，转赴乌鲁木齐就任联合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1947年，因国民党政府撕毁和平协议，回伊宁继续担任三区临时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1948年加入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任宣传部长、机关刊物《前进报》总编辑，后任该同盟主席。1949年10月，以新疆特区特邀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相继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常委、民族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新疆省干部学校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等职，并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巴（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分别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是第一至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九至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八届副主席。

San-Bei fanghulin tixi

“三北”防护林体系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ests in northern,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China)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8年决定在中国西北北部、华北北部、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简称“三北”地区）建设的大型防护林体系。根据国家计委《关于〈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计划任务书〉的复文》的精神，确定工程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省的宾县，西至新疆的乌孜别里山口，北抵国界线，南沿天津、汾河、渭河、洮河下游、不尔汗达山、喀喇昆仑山，东西长4480千米，南北宽560~1460千米，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1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1个县、市、旗、区，总土地面积406.9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42.4%。工程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共需完成造林3560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2688万公顷，封沙封山育林760万公顷，飞机播种造林112万公顷，从而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4.95%，届时将从根本上改善三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的生产建设条件。工程被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1988年邓小平为工程题名“绿色长城”。

Sanbuzou zhanlüe bushu

“三步走”战略部署 (program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ree steps)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战略目标的简称。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同年12月2日，陈云提出四化建设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4年10月6日进一步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人均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三步走”战略，国民经济发展要以重点带动全局。战略重点有3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确保这3个战略重点的发展，才能达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sanfan yundong

“三反”运动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waste and bureaucratism)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全国党政军机关内开展的反腐败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限期在全国党政军机关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1月中旬，各地广大群众揭发出大量问题：江苏省常州市税务局有85人集体贪污，占全局干部的37%强；中央政府的27个直属单位中，揭发或自首的贪污人数达1670人；军委后勤系统有250人自动坦白；有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百分之百的有贪污行为。有的人情节严重，如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贪污64000万元（合新币6.4万元），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合新币23万元）。

1月19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三反”斗争进入“打虎”阶段，并规定：贪污额在1亿元（旧币，下同）以上者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在中央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很快地掀起了“打虎”高潮，取得明显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针对上述情况，3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决定，强调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对于贪污分子的处理，各地应尽可能地在各级贪污分子总人数中，使摘掉贪污分子帽子、免于行政处分者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判死刑者，应占极少数”。12日，发布“若干决定的修改通则”，再次放宽政策。31日，又作出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决定。4月21日，政务院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规定和条例，使得“三反”斗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经运动后期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者有10余万人，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被处决案犯51人。

同年5月，“三反”运动结束。

san gai yi jiaqiang

**“三改一加强”** (“Three Reforms and One Strengthening”) 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而提出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的缩略语。

1995年，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由此从分别抓单项工作转向全方位入手、综合治理。改革，就是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微观经济基础，把原来经营机制不完善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改组，就是调整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优化重组存量资产。部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除了企业制度方面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战略重点不突出。因此，为了从总体上搞活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必须对存量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改组，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改造，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推进技术进步。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企业应成为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科技资源引进、吸收和消化的主体。因此要把建立企业技术进步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鼓励企业根据产业政策加快技术改造，推进技术进步，使之成为科技进步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还必须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科学和完善的内部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加强、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有利于为企业各项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可以使企业改革所形成的新机制得到良好的运行，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发展。

#### 推荐书目

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7。

sange youliyu biaoqun

**“三个有利于”标准** (criteria of “three benefits”) 邓小平提出的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段话，后来被理论界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个判断标准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标准的性质、目的也非常明确。三个有利于标准实际上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sanhe yishao

**“三和一少”** (“Three Pieces and One Less”) “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物质援助要少”的简称。196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中联部讲话，并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康生把这些建议及王稼祥领导中联部期间的工作歪曲概括，给王稼祥扣上“三和一少”的帽子。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1963~1965年，毛泽东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反复地谈中国党内的所谓“三和一少”，将此作为修正主义的路线加以批判，并指出王稼祥主张“三和一少”，“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对“三和一少”的严厉批判，把党内的思想推向了日益“左”倾的方向，对国际反修、国内防修斗争的加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诬陷刘少奇在国内鼓吹“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后，“三和一少”即被作为刘少奇“执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名。

Sanjiacun yuan'an

**“三家村”冤案** (fabricated case of “Village of Three Families”) “文化大革命”前夕《三家村札记》的作者被当作“反党集团”受到批判打击的一起冤案。《三家村札记》是60年代初期中共北京市委杂志《前线》的一个札记专栏，主要作者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

作的书记邓拓。1961年至1962年，他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作，三人用“吴南星”的笔名，在这个专栏，连续发表杂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文史知识，进行思想评论。这完全是正常的文化活动。在此之前，邓拓还为《北京晚报》撰写了类似的专栏文章《燕山夜话》。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以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中的文章被以极端牵强附会的手法，扣上种种政治罪名，大张挞伐。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头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的”。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将“三家村”的三个作者诬为“反党集团”，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批判“三家村”很快在全国引起反响，不仅报纸上发表许多针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批判文章，而且各地区都开始了揪当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活动。邓拓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而死；吴晗夫妇在残酷打击迫害下，于1969年10月11日离开人世；廖沫沙则长期受到监禁关押，受尽摧残。1979年8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以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分别集结重新出版。

sanmian hongqi

**三面红旗** (Three Red Banners)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称。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sannian yanzhong jingji kunnan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three years of severe economic hardship) 1959~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大批建设合同，造成了中国3年严重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1960年，基本

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基本建设投资达1007.4亿元，比“一五”时期总额588.4亿元还多419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使1958~1960年的积累率平均达到39.1%，高积累率直接导致消费基金的短缺，经济循环不断恶化。其次，工农业比例失调。1957~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了1.3倍，而农业生产价值却由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下降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4.3变为8:2。工业建设发展过急，严重地挤压了农业。再次，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主要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由于钢产量、重工业投资在工业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9%。与此相反，轻工业总产值连续下降，1960年比1959年下降了9.8%。②财政收支失衡，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上涨。由于经济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1958~1960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81.8亿元。这样，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1961年在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7.8%的情况下，年末货币流通量仍然比上年增加了31%。因此，物价不断上涨。1961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上涨16.2%，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上涨2.6倍。③人民生活困难。据统计，1960年全国人均年的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23千克，降为163.5千克；食油的人均年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0.4千克，降为1.85千克；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比上年减少了1.45千克，降为1.55千克。由于粮油等食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地区出现了浮肿病甚至病饿而死等严重现象，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为了摆脱全国性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开始纠正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3年严重经济困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治国与管理，关系到人民的幸福与安危，必须慎重决策、科学决策、遵从经济建设规律。

#### 推荐书目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sanxian jianshe

**三线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Front)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以战备为中心在内

地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沿革 60年代中期，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苏关系紧张。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加强战备，迁移沿海重要工业到内地，建设内地工业基地的战略决定。决定要求各地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由原定解决“吃穿用”问题向以战备为中心转移。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

到1966年初，三线建设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各地还进行小三线建设安排。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原定1970年完成的大多数主要项目预计在1968年就可以提前完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这个建设计划，从1967年到1969年初的两年多时间中，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许多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1973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缓和，三线建设进入了后期阶段，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重点放在搞好收尾和配套工程的建设。从1979年到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原三线地区的建设进行调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将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对极少数选址不当，难以维持生产，或者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工厂和科研院所，实行关、停、并、转、迁。经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原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元，占当年军工企业总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同时开发生产了国民经济需要的一批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批高中档耐用消费品。

成绩 三线建设从1965年到1980年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涵盖13个省、自治区，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

万人力，安排数千个建设项目。它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到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的1/3。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较雄厚的生产基地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

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1千米，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公路建设新增22.78万千米，占全国同期的55%。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其中，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葛洲坝水电站，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田、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原材料工业方面，冶金工业除建成西南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以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四川西昌、甘肃兰州等地的铜、铝工业基地。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

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已建成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

**问题** (1)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2)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3)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律。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建设“小而全”的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

#### 推荐书目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 sanxiang zhishi wei gang

**“三项指示为纲”** (“take the three instructions as the key link”)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条指示,作为指导一个时期的工作的纲领,带动各项经济建设的意见。当时被简称为“以三项指示为纲”。见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

#### sanzhi liangjun

**三支两军** (Three Supports and Two Militaries)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简称。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中共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活动,地方各级中共组织和政府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

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控制局面,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的一项主要任务,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从组织上确保大批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到1970年底,全军共有干部战士近280万人次参加。

“支左”工作从1967年1月至1972年,进行了6年。基本任务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首先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夺权。1967年,为了扭转全国混乱局面,军队支左人员积极进行了促进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支左人员在革命委员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约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

“支工”即指支援工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扭转工业生产不断下降的趋势,人民解放军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工矿企业和铁路交通行业中,担负起组织和直接参加工业生产的任务,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支农”即指支援农业生产。1967年,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参加夺权斗争和武斗,社队干部被打倒,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军队奉命派出大批人员组成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人民公社,组织农村春耕、秋收等生产,为减少农业损失做出了贡献。

“军管”即指对一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边防沿海、交通要道、公安机关、机密单位、电台报社、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些单位和部门有必要的工作秩序,军队奉命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管小组,对其实行军事管制。在一些省、市、自治区和国家部门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前,也成立了军管会控制局面。对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安全,保证生产等,起了重要作用。

“军训”即指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政训练,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军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中学生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一般15~20天;一种是派出干部战士,组成“军训团”和“军宣队”长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训”对稳定学校的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撤回了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工作的大部分军队人员。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在非常混乱和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势,维持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总体上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所以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 sanzi fandi aiguo yundong

**“三自”反帝爱国运动** (“three selves”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基督教开展的“自传、自治、自养”运动。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40名代表人物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主张清除教会中的外国势力,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推行“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方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基督教界1527名代表人物支持“三自”运动的宣言,并发表《基督教爱国运动》的社论。随后,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至1952年底,在宣言上签名的人达37万,占中国基督教徒总数的60%。1954年7月,基督教在北京成立中国“三自”爱国运动会,并制订《“三自”爱国运动章程》,各地随即纷纷成立分会。“三自”运动开展后,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也根据广大教徒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并有步骤地进行宗教制度的改革。

#### sanzi yibao

**“三自一包”** (“Three Selves and One Contract”)

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农民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调整时期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部分社队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措施。但不久就被认为是鼓吹单干。“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些正确政策,诬陷为刘少奇“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队的多

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自负盈亏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劳动分配形式。

saochu wenmang yundong

**扫除文盲运动** (campaign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简称扫盲运动。建国初期在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成年人中开展的识字教育运动。1950年9月18日至29日中央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首次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目标，并提出举办职工业余教育、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三个实施办法。1952年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次联合召开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5~10年内基本扫除文盲。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1953年2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在全国广大城市和农村普遍开展扫盲运动。1954年8月5日~16日，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195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进一步强调扫盲工作的重要性。为了落实这一目标，1956年3月15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委员会，陈毅任主任，吴玉章任副主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成立扫除文盲协会，扎实开展工作。至1958年7月，全国已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基本扫除文盲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放松了扫盲工作，又发生复盲现象。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国家又将扫盲工作提上日程，首先解决农村1亿2千万青壮年文盲的脱盲问题。仅从1992年到1996年，5年就扫除文盲2441万人，文盲率从15.8%降到12%。

sao huang da fei

**“扫黄”、“打非”** (crackdown on pornography and illegal publications)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持续开展打

击制作贩卖黄色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和侵权盗版的活动。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扫黄”工作电话会议。此后，中央专门成立了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并设立了“扫黄”办公室。各地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全国扫黄工作小组会同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等部门，每年都召集“扫黄”工作电话会议，部署和督促全国各地的“扫黄”、“打非”行动。1990年12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扫黄”、“打非”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国务院从1995年起连续5年把“扫黄”、“打非”工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1994年10月第三次全国“扫黄”工作会议以后，国家在加强出版物市场管理的同时，连续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声势、有力度的“扫黄”、“打非”集中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前四次集中行动共收缴非法书刊2932.4万册，违禁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3582.72万张（其中淫秽色情出版物275.5万件，政治性非法出版物32.6万件），取缔非法出版物集散地1996个，查处案件9635起。1998年成绩突出，收缴非法书刊1507.3万册、非法音像制品5123万张，查获非法光盘生产线23条，至此，全国查获的非法光盘生产线总数达到79条。1999年上半年开始的“扫黄”、“打非”的集中行动，以严厉打击走私，整顿印刷企业，检查清理市场，查处大案要案为四大任务，成效也比较显著。在70天的时间内，据16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收缴非法书刊237万余册，非法音像制品480多万件，端掉黑窝点990多个，查获非法光盘生产线2条。在集中行动的许多地区还举办公开销毁非法出版物活动，其中1月13日在广州一次就销毁非法光盘300万张，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销毁活动。

“扫黄”、“打非”工作，为服务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净化社会风气，保护知识产权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由于“制黄”、“贩黄”、非法出版和侵权盗版活动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有敌对势力颠覆破坏的政治背景和有暴利可图的经济诱因，“扫黄”、“打非”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斗争。

Sha Jiansun

**沙健孙** (1934~ ) 历史学家。

回族。江苏宜兴人。1934年2月27日生。1950年参加工作，在国家贸易部干部学校、人事局等部门任职。1955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随后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班深造。历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副校长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五届北京市委委员。现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党史党建学科组组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独著《中国革命史论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论》、《中国革命问题散论》，合著《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上、中、下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另外主编有《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二、三卷，与人共同主编《中国革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

Sha Qianli

**沙千里** (1901~1982)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仲渊。上海市人。1901年6月12日生。早年在大丰洋布号任跑街。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上海三区党部执行委员。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并参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编。1930年青年之友社扩组为蚁社，任执行委员。1934年集合蚁社核心力量，组建苏联之友社，主编《生活知识》月刊。1931年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编《救亡周刊》，11月与沈钧儒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曾任《工业合作月刊》编辑，工业合作协会推进组组长。1939年后，开办建国机器厂、建成实业公司、中美汽水厂、南洋公司等，任厂长、总经理。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后，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947年底赴香港参与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任常务委员。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后转赴解放区。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副秘书长。

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4月26日逝世。著有《七人之狱》。

#### Shanxi meitan jidi

**山西煤炭基地** (Shanxi Coal Field Base) 山西是中国最大的产煤省，煤炭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开采历史悠久，素有“煤炭之乡”的称号。1949年前有大同、阳泉两处较大的煤矿，但技术落后，1948年全省年产量只有200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近50年的勘探开发，山西煤炭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基地。

近50年来，山西建设了大同、阳泉、西山、潞安、晋城、平朔等年产1000万吨以上的现代化大型矿区。各类中小型煤矿遍布全省。1987年仅用26个月建成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设计年生产能力1500万吨，采用了世界80年代的先进技术装备。山西煤炭探明储量已有2633亿吨，占全国的1/4以上。1997年生产原煤3.3亿吨，占全国的1/4。潞安、西山的炼焦煤，阳泉、晋城的优质无烟煤，大同、平朔的动力煤，是驰誉全国的冶金、化学工业重要原料和动力燃料。山西煤炭除少部分供本省需要外，大部分供应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口至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东南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山西共调出煤炭2.37亿吨，占全国各调出省总调出量的一半以上，其中60%左右供给包括京、津、沪在内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华北、华东、东北地区。同时，以煤发电，向省外输送电量达100亿度。

为了方便山西煤炭的调出，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铁路、公路、港口建设。中国第一条现代化运煤专线，大同至秦皇岛铁路于1992年开始营运，现年运量已达8000万吨。侯月线亦于90年代建成。另

外几条以运煤为主的铁路——丰沙大、石太、太焦、京原等线，不断进行了技术改造。4条以运煤为主的公路于80年代建成。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使晋煤外运的能力逐步提高。山西煤炭从省内集散、外运，到调入地区接收、使用，经多年运转基本形成系统。山西作为全国煤炭基地的条件日趋完善。

山西现有煤矿的后备资源丰富，吕梁等新矿区正在开发，山西煤炭工业具有强大的持续发展能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山西将保持中国最大煤炭基地的地位。

#### Shantou Jingji Tequ

**汕头经济特区** (Shantou Special Economic Zone) 中国在广东省汕头市开辟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开始动工建设。根据中央关于建设经济特区的方针政策，汕头特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应当是建成一个以出口为导向，以先进工业、技艺为主，工农贸相结合，具有潮汕侨乡特色的外向型综合经济特区，实现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外汇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汕头经济特区开始创办时，面积仅为1.6平方千米。1984年中央批准汕头特区面积扩大52.6平方千米。1991年11月，又扩大为234平方千米，包括整个汕头市区（仅把濠江以南11.5平方千米划在特区管理线以外）。汕头办经济特区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具有海港城市、华侨众多和经济腹地广阔等三大优势。汕头港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突出部分，位于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处于东北亚至东南亚的海上国际航道线上，是沟通国内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粤东、赣南、闽西南一带商品集散地、交通枢纽和进出口口岸，自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汕头及原来所管辖的潮汕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拥有雄厚的侨资。汕头市的直接经济腹地是潮汕平原，有10346平方千米，1062万人，是全国著名农业高产区。沿韩江直上，又可沟通粤东、赣南、闽西南一带更广阔的经济腹地。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汕头经济特区从商品基地建设到销售渠道开拓已经建立起全方位的外向型格局。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特区的优惠政策，汕头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汕头市从1994年起就成为全国55

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万元的城市之一。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79亿元，比1980年翻了三番多，平均年递增20%，是全国综合实力五十强城市之一。这些年来，特区的能源、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原来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已经解除。特区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正在逐步向现代化的城市迈进。

#### shangye

**商业** (commerce) 从事商品贸易和服务性消费的流通行业，是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经过近50年的发展，中国的商品市场繁荣稳定，已形成以国有商业、供销社商业为主体，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和中外合资商业协同发展，多种商业形式并存的商业经营体系。

**起点** 当代中国商业是通过继承中国传统商业，没收国民党统治区官僚资本主义商业，在各革命根据地商业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个体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商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业格局。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公有商业机构有2000多个，职工8万余人，合作社商业有基层社228000个，社员1380万人。到1952年，个体、私营商业户有537万个，832万人，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7亿元。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市场不稳，物价飞涨。为了给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良好条件，当时在全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国营商业管理体制，通过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建立贸易金库、统一商品调拨，以及公私兼顾、城乡互助等措施和政策，实现了市场稳定。这一时期国营商业得到初步发展，到1951年全国有国营专业公司7137个，人员251893人。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也有了发展，1952年批发商业网点有7837个，零售商业网点有5708个。国营商品批发额已占全国批发额的60%，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额的34.4%。国营商业沟通了城乡经济，据统计，仅1950年，国营商业就从农村收购粮食50亿千克、棉花600余万担、鲜蛋457万千克、茶叶51万担，以及数额巨大的其他农副产品，同时，把大批工业品不断送到农村。国营商业掌握着全国粮食、棉花、煤炭、棉布、食油、食盐以及其他重



要商品的供应，确定了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合作社商业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5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在全国成立各级联社。1952年全国基层供销社有35 096个，职工100万人，拥有股金2.39亿元，社员达14 796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9.4%。供销零售额达50亿元，占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23.18%，收购农副产品总值达38亿元。合作社商业已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

这一时期，国家还通过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帮助私营商业度过困难。在打击非法商业行为的同时，调动私营商业的经营积极性。

1953年至1977年，中国商业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时期，在曲折道路上发展前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营商业推行了经济核算制，要求按经济区划建立批发站，改变按行政区调拨商品的制度。企业核定资金取消金库回笼制。国家对计划管理和物价管理办法做了改进，增强计划的科学性，扩大地方的物价管理权限。在全国范围内对重要的工业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派购等政策，包括对棉布的统购统销，对粮食、食油、棉花的统购统销，以及对生猪、茶叶、烤烟、大麻、苧麻的派购或统购。1956年，国家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则大多通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形式组织起来，成为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的补充和助手。

“大跃进”时期，商业工作遭到很大损失。农业大幅度减产，轻工业上不去，造成市场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商业部门只能全面实行工业品统购统销，扩大农副产品派购，对商品扩大凭票供应范围。全国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四五十种，粮食供应实行“低标准”。同时，在商业所有制方面急于过渡，将供销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小商小贩升级过渡，农村集市贸易也被关闭。以支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由，提出了商业“大购大销”的方针，造成了国家财产的大量损失。据统计，到1958年底，商业系统未收回的各种款项达33.9亿元。1959年这种做法才被制止。“大跃进”期间还撤店并点，抽调大批青壮年职工去支援大办工业、大炼钢铁，从而削弱了商业战线的力量。

1961年至1965年，商业工作进行调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①调整和疏通

商品流通渠道。恢复供销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开放集市贸易。②调整农产品收购政策，适当减少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奖售换购政策，有计划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进农副产品收购办法。③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具体是做好对城乡人民粮食的基本供应，稳定18种商品价格，实行高价商品的供应。④改进三类日用工业品收购方式，改进工业品分配办法，面向农村，组织工业品下乡。到1965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商业的调整，市场情况好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1亿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商业理论被搞得混乱不堪，正确的商业政策遭到破坏，市场供应长期紧张，每年都有较大的缺口，造成人民生活水准降低。商业经营管理的正常秩序被打乱，经济效益差，服务质量下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商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改革措施有：①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1991年推广重庆的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的经验，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有了较大突破。②1985年国家决定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统购和生猪等鲜活商品派购的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议价收购。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计划。③改革商品管理体制，基本上取消指令性计划收购的商品，国家只对粮食、棉花、化肥、农药、农膜等商品实行计划管理。日用工业品取消统购包销后，采取多种购销形式。④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小型企业实行多种改革办法：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直接转为集体所有制，租赁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出售给个人。⑤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恢复和发展城乡集市贸易。⑥绝大多数商品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取消票证供应。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形成，农副产品除粮食、棉花外，其他全部放开。

这一时期，国内市场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商品资源日益充足，社会商品零售额迅猛增长，商品消费结构开始变化。在吃的商品中，副食和营养品的比重上升，主食比重下降；穿的商品中，花色款式新颖、质地优良的服装的销售大大增加；用的商品方面，新兴耐用消费品大幅度上升。80年代以来，高档家用电器的销售迅速。进入9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逐渐成为热销商品，私人小轿车、住房和有形文化商品也逐渐进入市场。

长期以来，商业政策、理论和商业科技的研究受到忽视，在这一时期有所加强。1980年成立了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80年代商业系统各主要行业都有了科研机构。商业教育也较前有很大发展，商业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

体制改革 在管理体制方面，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贸易部，统一管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1952年分别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国内贸易由商业部管理。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商业管理部门曾进一步划细。1970年，将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组成新的商业部，撤销了专业公司和专业司局，又将直属的34个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地方管理，各省也相应进行了撤并。1975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重新从商业部分出。1978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将以前下放的一级站收回，以部管理为主。1979年，粮食部从商业部划出。1982年再次将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设立商业部，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仍保留其名称，便于对外开展活动。同时把专业局改为公司，设置全国性公司18个。1984年撤销商业部所辖公司，把石油公司划归中国石化总公司领导，部所属一级站重新下放地方管理。1993年，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恢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建的国内贸易部第一次打破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流通长期分割的局面，为建立统一的、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大流通格局打下了基础。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消国内贸易部，成立在国家经贸委管辖下的国家国内贸易局。原部所属的公司与局脱钩，交由地方管理，从而在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

发展成就 近50年来，中国商业取得了巨大成绩。①基本改变了长期以来商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实现了全社会商品供需总量的大体平衡，保证了商品市场繁荣稳定。商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都已形成买方市场，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得到了较好的满足。199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 155多亿元，同1978年相比增长20多倍，同1952年相比增长100倍。②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流通体系。1998年全国各种类型的商业网点已有1600万个，从业人员4600万人。各类批发市场10万多

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 7100 多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3000 多个、城乡集贸市场 8000 多个。1996 年市场交易额已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2.8%,年成交额超过 1 亿元的市场有近千家。各种要素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不仅现货交易活跃,期货交易的方式也已出现。③商品流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流通格局,从而为商品流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到 1998 年 10 月底,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经济占 21%,集体商业经济占 16.6%,个体商业经济占 36.7%,私营商业经济占 4.7%,其他经济成分占 21%。已有 80 多家流通企业股票上市,一批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流通企业集团已经出现。④商品流通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现已批准 19 家中外合资、合作零售的试点企业,已经开业的有 14 家。美国的沃尔玛、德国的麦德龙、法国的家乐福、荷兰的万客隆、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国外零售商不仅带进了资金,而且也带来了现代经营管理经验。截至 1998 年 6 月,商业领域已建立三资企业 1813 家,有利用外资项目 22 800 个,实际利用外资 200.8 亿美元。⑤经营业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为单一的传统百货业态,通过引进,出现了多种业态竞相发展的格局。已形成的基本业态有百货店、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方便店)、专业店、精品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电子商务、网络购物、邮购等,它们已成为商品市场中的增长点。连锁经营、代理配送、租赁业等新型营销方式得到较大发展,其中作为一种现代营销方式的连锁店,从 90 年代起在中国有了突破性进展,据统计,到 1997 年底全国已有连锁企业 1000 家,连锁店铺 15 000 多个,连锁企业实现的销售总额达 420 亿元。

**存在的问题** 近 50 年中,中国商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作为流通行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商业现代化、产业化的水平还比较低,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是,商品市场发展条块分割、部门垄断的问题依然存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工商关系不够稳定,国家管理调控商品市场的能力比较薄弱,国有商业出现行业亏损,以及商品流通设施建设不够平衡,整个流通领域的科技水平不高,等等。

#### 推荐书目

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98。

郭今吾主编:《当代中国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 shangye yinhang

### 商业银行 (commercial banks)

一种从事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和信用创造的金融企业。在银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商业银行最基本的职能是通过其负债业务集中社会上闲散的货币资本,再通过信贷和其他资产业务将货币资本贷给货币的需求者。

中国 1995 年 5 月 10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是吸收大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是兼顾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由国有专业银行通过改革转化而来,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它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另一类商业银行主要是一些股份制银行,建立于 80 年代中后期,有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等 9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二类商业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机构。

## Shangganling zhanyi

### 上甘岭战役 (Battle of Shangganling)

朝鲜战争期间的一次著名战役。1952 年 10 月 14 日,正值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方为在谈判中向中朝方面施加压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一次大的攻势,“金化攻势”。其主攻方向是五圣山的前沿阵地,即不足 4 平方千米的小村庄上甘岭。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装备的美军,动用 3 个师共 6 万余人,集中 300 余门大炮、3000 余架次飞机和 170 辆坦克,对上甘岭发动猛烈进攻。志愿军相继投入 4 万兵力、180 余门炮,以坑道

为依托,抗击着美军每天几十次的进攻,战役历时 43 天,歼敌 2.5 万余人,巩固了阵地。

这次战役以兵力、炮火密集,战斗残酷激烈,争夺反复频繁而著称于世界战史。

## Shanghai Baoshan Gangtie Zongchang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Baoshan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 Shanghai)

中国第一个新型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位于上海宝山县。1988 年 8 月组建为宝钢集团公司。

1978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钢铁厂一期工程国家投资 128 亿元(其中外汇 28 亿美元),从日本、德国成套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1978 年 12 月 23 日动工,1985 年 9 月全面投产。二期工程国家投资 172 亿元(其中外汇 20 亿美元)。热轧厂、冷轧厂和连铸厂 1990 年 4 月投产。高炉、烧结和焦化厂于 1991 年 6 月投产。二期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65%。宝钢设计能力为年产生铁 650 万吨,钢 671 万吨,热轧钢板 400 万吨,冷轧钢板 210 万吨,无缝钢管 50 万吨(其中油井管 21.3 万吨,锅炉管 6 万吨),钢坯 122 万吨。产品全部按国际先进水平组织生产。宝钢一期工程 1985 年 9 月投产后的第一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即全面达到设计水平。以后每年递增 40 万吨钢,1990 年达到 402 万吨钢,超设计能力 30%。二期工程全面投产后,钢铁产品中的板管比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优质钢材,如高级轿车专用的超深冲性能钢板、石油钻杆、抗硫化氢石油管、耐大气耐海水腐蚀钢板、大型电站超高压锅炉用钢管、重型矿山汽车专用钢板、轻工用高级搪瓷钢板、航空钢丝绳专用钢、飞机轮船钢帘线专用钢,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有些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

宝钢投产以来,钢铁产品的物耗、能耗和劳动生产率均进入国际先进水平。1985 年以来,连续 4 年实现利税翻一番。到 1990 年已累计实现利税达 35 亿元。一期工程的贷款投资部分已全部还清。据测算,到本世纪末宝钢可累计向国家上交利税 200 多亿元,并可还清二期工程 106 亿元的贷款本息,并自筹 150 亿元左右的资金,进行宝钢三期工程的建设。届时年产钢达 1000 万吨的水平,进入世界特大型

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行列。

Shanghai Hongqiao Guoji Jichang

###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hanghai)

始建于1921年。1963年10月决定扩建为民航国际航线机场。第一期工程于1964年4月底完工。1965年7月,包括候机室、指挥调度楼等在内的第二期扩建工程竣工。1984年、1988年和1992年,分别再次扩建虹桥机场候机楼、停机坪等项目。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占地面积4.47平方千米。跑道长3400米,宽57.6米,停机坪面积为48.6万平方米,有66个停机位。国际、国内两座候机楼相连,共有15个候机大厅,18个贵宾室,13座登机桥,15条行李传送系统。国内候机楼面积46600平方米,国际候机楼面积28000平方米。机场内有先进的通信导航、消防援助、储油供油设施,可保证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客机起降。

1997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3274305人,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二位;货邮吞吐量476011吨,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一位;飞机起降112737架次,居全国民航机场第三位。

Shanghai Huiyi

### 上海会议 (Shanghai Conference)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补充计划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概略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来经济建设走过的道路,试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建国头8年是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认为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但是也承认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乱子出得不少,他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包括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1959年产钢3000万吨的计划。对于这次会议规定的后三年指标,他表示“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希望从7月份起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完全主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

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这些总结,对于促进全党重新冷静下来认清形势,有着积极的作用。

Shang Xiaoyun

### 尚小云 (1900~1976) 京剧演员

“四大名旦”之一。名德泉,字绮霞。祖隶八旗汉军,河北南宫人。1900年1月7日生。幼入三乐科班学艺,艺名三锡,初习武生,后改正旦,从孙怡云学戏,改名小云,以演青衣戏为主。1914年曾被评为“第一童伶”。他功底深厚、嗓音宏亮,唱法以刚劲见长。做功身段刚健婀娜,由于武功根底深厚,更擅演刀马旦戏。在艺术上既潜心于继承,又致力于革新。擅演剧目有:《二进宫》、《祭塔》、《昭君出塞》、《梁红玉》等。中年以后,编演了很多新戏,还致力于戏曲人材的培育,1937年开办“荣春社”科班,培养学生二百余人。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任陕西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校艺术顾问等职。1976年4月19日逝世。

shaoshu minzu diqu minzhu gaige

###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democratic reform of minorities regions)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废除剥削压迫制度、实现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各民族发展进步创造条件的社会改革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从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与和平协商的方法,在各少数民族地区陆续进行民主改革。在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相同或基本相同、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约23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时间、方法和步骤大体与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相同。在仍残存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约1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说服、协商、赎买,不进行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等慎重、温和、曲折的阶级斗争形式和方法进行和平改革,于1955年至1960年间先后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底结合平息反动农奴主叛乱完成。在处于原始公

社末期的约7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不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而是采取建立生产文化站的形式,通过示范和说服教育,逐步改造原始落后的生产关系,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在有35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牧业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时,实行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和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等保护牧业生产的政策。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了阶级、民族和宗教的关系。在改革时,首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坚持以本民族干部领导为主、本民族群众为主、兄弟民族干部群众支持的原则。充分尊重民族意愿、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本民族大多数人包括上层人士同意之后再行民主改革。在废除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制度、清除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坚持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文物、团结宗教界一切爱国守法人士、不干涉宗教职业者正当的宗教活动。在征收分配土地财产时,对寺庙、宗教职业者、接受改革的民族上层人士和中小地主等,实行各种宽大和照顾的政策。这些具体的特殊政策和办法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生产的破坏和社会的动荡。经过民主改革,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被彻底废除,千百万贫苦农牧民、农奴和奴隶不但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而且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土地财产和国家政权的主人。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各民族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基础。民主改革的完成对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也有重大意义。

shaoshu minzu shehui lishi diaocha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soci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of minorities)

中国历史上首次进行的有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调查活动始于1956年春。目的是为了弄清各主要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必需的资料,为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参考。调查最初由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协助,组织8个调查组,先后对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藏、维吾尔、壮、苗、布依、瑶、傣、彝、黎、景颇、怒、傈僳、独龙、佤等20个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自1958年

起, 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 调查组增至 16 个, 分赴 16 个省、自治区调查, 未派调查组的省, 由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调查。至 1964 年, 调查基本结束。1979 年 1 月, 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规划, 在整理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相继公开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种丛书。

shaoshu minzu wenzi chuangzhi he  
gajin

**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进** (cre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riting systems of minorities languages)

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地为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对不完备的民族文字作科学改进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我国共有 21 个民族 (含汉族) 使用 24 种文字。为了便于各民族相互学习和交流, 国家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 组织有关力量, 遵照国务院于 1957 年通过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精神, 相继为壮、布依、苗 (4 种)、侗、景颇 (载佤文)、哈尼 (2 种)、傣、佯、黎、纳西、白、土族等 12 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在创制文字的同时, 还帮助改进了德宏傣文、西双版纳傣文、景颇文、拉祜文等部分不够完备的民族文字, 帮助改革了维吾尔、哈萨克两个民族的文字, 推行新文字。上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进等工作, 都是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推行和实验过程中, 一部分民族改变了当初的选择,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恢复了原有的阿拉伯字母文字, 黎族选择了汉文字, 彝族使用改进的“凉山规范彝文”, 哈尼族废弃了碧卡哈尼文, 保留哈雅哈尼文, 西双版纳傣族恢复老傣文, 与改进的新傣文并用。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进工作是中国民族工作的重大举措, 对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落实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Shao Quanlin

**邵荃麟** (1906~1971) 文学评论家。原名邵骏运。浙江慈溪人。1926 年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1934 年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 同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6 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抗日战争期间, 在浙江、桂林、重庆等地领导文化工作, 历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重庆局文委委员, 并主编《东南战线》、《文艺杂志》等刊物。抗战胜利后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 主编《大众文艺丛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党委委员、中宣部副秘书长。1953 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主编《人民文学》。发表《党与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文学十年历程》等论文。1962 年在大连主持“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讲话中强调“现实主义深化”, 提倡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 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中间人物”论, 列入“黑八论”遭批判。1971 年被捕, 6 月 19 日死于狱中。1979 年 9 月 21 日为他举行追悼会, 恢复名誉, 平反昭雪。《邵荃麟评论选集》于 1981 年出版。

Shao Yifu

**邵逸夫** (1907~ ) 香港电影实业家。原名铿仁, 字逸夫。浙江宁波人。曾先后获得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伦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历任邵氏兄弟 (香港) 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红十字会会长、香港电影广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电视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艺术中心董事会主席、香港制片人协会主席等职。30 年代赴新加坡及东南亚开创电影市场, 成立上海天一公司, 拍摄有声电影《歌场春色》。1955 年在香港建立邵氏影城, 拍摄《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电影, 打破外国电影在香港的垄断地位, 后事业得到发展, 在香港和东南亚拥有多家影院。热心文化教育慈善事业, 从 1985 年至 1999 年 1 月已向内地捐赠 17 亿多港元。

shehui baozhang zhidu gaige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reforms in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相应措施, 于 80 年代中期, 特别是 90 年代初以来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中央政府就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摆上议事日程。50 年代中期,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

整套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城市以劳动保险和企业福利为核心、在农村以集体保障和政府救济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日趋成型。这个制度同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给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经济福利和安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 90 年代中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目标以来, 原制度越来越显示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为此, 80 年代中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到 1998 年底, 在社会保险方面, 打破原来企业保险的框框, 养老和医疗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制度, 新建立的失业保险在解决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社会救助方面, 80 年代以来农村在扶贫和救灾救济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93 年以来城市逐渐普及了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特点的新型救助制度。在社会福利方面, 原来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正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旗帜下向社会转移, 以社区和社会团体为骨干力量的新的社会福利体制正在逐渐形成。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稳定社会和深化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shehuizhuyi anlaofenpei zhidu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 (socialist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labor)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消费资料的制度, 是中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主体。

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劳动者的劳动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 劳动者创造的产品是社会的产物。劳动者向社会提供所需的某一部分劳动以后, 可以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与其劳动量 (减去必要的社会扣除) 相当的产品。这种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的分配制度, 便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前提是劳动, 只有参加劳动 (不具有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除外) 才能参加分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 目的是把劳动者物质利益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 鼓励劳动者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种分配制度只能在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和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实行。不可能

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如当前存在的个体、私营等企业）中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实行供给制，1955年改为工资制，此后，国家干部和工人都实行各种级差的工资制度，农村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实行以工分制形式的按劳分配原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企图过早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之后，农村人民公社恢复工分制，工厂中的计时工资制也逐步有所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制度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邓小平在1975年就批驳了他们的极左谬论，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拨乱反正，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江泽民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shehuizhuyi chuji jieduan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中国共产党对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定。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基本国情以后作出的论断。这个论断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办一切事情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长期的。这个历史阶段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相当长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提供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依据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同各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的基准，从而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 推荐书目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

shehuizhuyi chuji jieduan de jiben

luxian he jiben gangling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basic line and basic program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部工作确立方向、目标和道路的行动纲领。

**基本路线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主要内涵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抓紧时机，加快发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科学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做到效益好、质量高、速度

快，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包括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更多更好地利用外来资金、资源和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

**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在1979年把工作重点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9月，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总任务，为后来关于基本路线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提法奠定了基础。

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开始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连在一起：“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1987年1月底，中共中央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提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出在一个中心之下的这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1987年6月和7月，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阐述：“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是把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搞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概括。这个概括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完全形成。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条基本路线首次正式载入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其要点是：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

享经济繁荣成果。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个基本纲领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行动纲领。

#### 推荐书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

#### shehuizhuyi de benzhi

### 社会主义的本质 (essential nature of socialism)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按劳分配原则，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性的定义。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共产党宣言》中这句话的原意，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1992年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新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表述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方面，指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个方面，指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被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落后，更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必须实行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先富的帮后富的，先发展起来的带动后发展起来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同时，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起适合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其他体制，使之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

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共同富裕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达到。

#### 推荐书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

#### shehuizhuyi de genben renwu

###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fundamental tasks of socialism)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尤其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放在首要位置。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虽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矛盾贯穿整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大大发展生产力，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把对外开放定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经济安全；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贯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Shehuizhuyi Gaizao Jiben Wancheng  
Yihou de Xinwenti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New Problems That Have Cropped Up after the Essential”）

陈云 1956 年 9 月 20 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 1956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收入《陈云文选》第 3 卷。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建立起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也由此产生出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新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陈云的这篇讲话，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进措施，同时精辟地阐述了改进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他指出：要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商业部门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继续统购包销，但对品种繁多

的日用百货，则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的办法。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盲目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使产品适应人民消费的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需要。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除粮食、经济作物、重要农副产品必须统一收购之外，对其他农副产品，如小土产，允许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要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改变把价格稳定简单地看成“必须统一价格”或“冻结物价”，实行优质优价，允许新产品提价和一部分小土产随供求变动而变动价格。要对某些产品只制定参考性的上缴利润等指标，让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按照市场情况进行生产。总之，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从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提出，这种经济将是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陈云的这篇讲话首次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的途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Shehuizhuyi gongyouzhi

社会主义公有制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产生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剥夺资本家的资本和其他剥削者的财产才能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引导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等途径实现的。中国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公有制经济的纯收入已

占国民收入的 90% 以上。这标志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相适应的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和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经济。这两种公有制经济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劳动者是全部和部分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彼此之间结成互助合作关系，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尊卑贵贱差别；社会生产的劳动成果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实行按劳分配、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保证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并先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shehuizhuyi guodushiqi zongluxian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general

line of the period o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中共中央制定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指导全国各项工作的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认。

这条总路线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1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具体构

想，意在先完成国家工业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作了重要调整，即从先建设后改造变为建设和改造并举，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统战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毛泽东又作了准确、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shehuizhuyi jianshe daolu de tansuo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缺乏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世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又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肯于支援中国，于是中国的经济工作便参照乃至套用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更是如此。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揭露了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偏颇和失误，诸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为积累资金强制实行余粮征集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极大地束缚了地方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等。为了“以苏

联为鉴戒”，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着手总结建国以来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力求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用近3个月的时间，先后听取国家34个部、委（包括直属局）和部分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归纳成10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否，中国和外国等10种关系，分别在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目的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强调，“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因为它们涉及到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重工业内部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根据《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国务院从当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会议，邀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体制工作负责人讨论改进体制问题。经过充分讨论，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就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则，以及具体划分计划、财政、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作了规定。8月28日，国务院第36次全体会议对这一决议（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正确构想，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目前国家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强调，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这些主张均被中共八大有关决议采纳。中共八大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修改后的《关于改进国

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下发各地和各级有关部门征求意见。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着手研究落实这个决议（草案）。1957年下半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研究落实关于改进体制的决议（草案），并原则通过了陈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上述3个规定（草案）经当年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并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自1958年开始实行。在实施改进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且无先例可循，加之管理无序，造成微观经济活动失控，从统而死走向了放而乱。毛泽东等发现后，于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制定一系列条例确保为期5年的调整，引导国民经济再度步入正确轨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当时过分集权、政企不分的国家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和改进，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可惜，这次探索不久便为“文化大革命”所中止。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 shehuizhuyi jianshe zongluxian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general lin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年中逐步形成的。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此，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提出中国钢产量15年内赶超英



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此后,国内出现了大跃进形势,这就要求制定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最早提出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讲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后来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加了一个“省”字。1956年1月《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讲到:“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在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首次提出。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一致通过。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概括总路线的核心是“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力争高速度》社论,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向全国发出号召,在经济建设上“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与此同时,已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片面强调多、

快,忽视好、省;脱离实际,过分夸大主观作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对农、轻、重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正确处理。其缺点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在具体实施中,只讲力争上游,不提稳步前进;过分强调多快,不提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严格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

#### 推荐书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

#### shehuizhuyi jiaoyu yundong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socialist education campaign)

1957年下半年在全国各地农村、工矿企业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中心内容的教育运动。

1955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过于迅猛,在工作中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强迫命令;又由于一律以高级社作为核算单位,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富裕中农感到入社后,手里的粮食少了,生活不如从前了,对合作社及统购统销政策产生不满。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区发生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闹事,请愿,闹缺粮。鉴于上述情况,1957年7月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锋芒主要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问题等。就全国来讲,其过程大致包括:大鸣大放、大辩论、整风整社、整党整团几个阶段。中央认为,这场运动的收效如何,决定于群众意见放得够不够、辩论得深入不深入。中央要求,各地农村要在工作队(组)和当地党组织直接领导下,采用各种形式动员全体农民参加运动;在充分“鸣放”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开展自由争论,达到辨明是非的目的。根据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颁发

的《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和工矿企业普遍开展整风的形势下,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直至城镇街道居民中也都开展了大辩论,把对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全国。

这场运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几亿人口中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偏差。

#### shehuizhuyi jingshen wenming jianshe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building socialist moral civilization)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提出和内涵 1979年9月28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指明它的重要地位。讲话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致祝辞重申了上述论断。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讨论。邓小平在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新论断,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

件,又互为目的。”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得到基本确定和全面阐述。

两个决议 中共十二大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存在着同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很不相称的问题。邓小平在1985年9月指出,其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要求全党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一次把民主、法制、纪律观念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还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实现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

中共十三大根据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由于中央个别主要领导严重忽视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九”政治风波。中共中央及时予以纠正。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在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和1994年1月24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邓小平“两手抓”的战略思想,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求围绕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加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开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基本国情的教育和普及法律基本知识教育。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第二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今后15年(1996~2010)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指出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今后15年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要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要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于人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要形成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形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的新观念。

措施和成绩 中共中央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把建设落到实处。198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后又加上“三热爱”),成为新时期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开篇。此后,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又先后推出青年志愿者活动、希望工程、“巾帼建功”、“办实事、送温暖”、“一帮一、手拉手”等群众性创建活动。开展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文明村镇、五好家庭以及百城万店无假货、光彩事业等社会精神文明活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211工程、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1999年初《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启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建“五个一工程”,设立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的各种奖励,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制止非法、淫秽出版物占领文化市场。1996年底,中央十部委联合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7年5月26日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在全国组织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集中解决环境卫生、交通秩序、文明言行、服务质量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hehuizhuyi shichang jingji tizhi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郑重提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提出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发现传统经济体制的弱点 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现被称为传统经济体制或旧体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缔造者在肯定它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发现指令性计划部分过大过死,对市场机制利用不足的问题,并试图解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格局。并且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试图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适当改变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适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改进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探索被1957年以后的“反‘反冒进’”和“大跃进”中断了。

重视市场作用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予恢复发展;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经验,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改革,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1月26日,邓小平从社会制度性质的角度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改革模式。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尤其是骨干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一些产品和企业则实行运用经济杠杆保证其

实行的指导性计划；对各种产值小、品种多、不可能用计划管起来的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无论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遵守价值规律。

**突破传统观念**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实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决定”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改革模式。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把价格体系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活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供应关系的变化”。把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作为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强调计划和市场的统一**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作用的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广泛性；“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要把计划管理的重点转向制定产业政策、建立中央银行制、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等等。中国对计划和市场的新的概括加快和深化了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新旧体制并存所出现的市场约束未形成，计划约束跟不上的状况，制定“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加强宏观管理的作用，进一步探索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结合起来的改革途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国有经济推向更广阔

的市场运行领域。

**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看作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第一次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使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结晶。

**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使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大胆利用

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由国家 and 集体控股的股份形式——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第二，搞好国民经济支柱——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一方面，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完善代理制，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形成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加强引导和监管。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发挥经济特区等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实施与效果**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于1992年，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1978年至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比改革前（1953~1978年）年均增长速度高3.4个百分点，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3%高近7个百分点。到1995年，中国提前实现本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不断加强,能源、原材料、交通等落后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显著增加。从 1978 年到 1997 年,中国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0%,钢铁、煤炭、电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产品逐年上升,在世界上占的位次不断提前。近 20 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年均 15.5% 的速度增长,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从 32 位上升到第 10 位;累计利用外资 3600 亿美元,从 1993 年起中国连续 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际收支状况连年改善,国家外汇储备由 1979 年的 8.40 亿美元增加到 1997 年近 1400 亿美元。城乡人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7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09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 年间年均实际增长 7.0%;199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160 元,19 年间年均实际增长 6.2%,均比改革开放前 30 年有较快增长。

#### 推荐书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1995。

Shen Jilan

**申纪兰** (1931~ ) 农村领导干部,劳动模范。女。山西省平顺县人,1931 年 6 月生。1943 年春,她和李顺达带头办起农村劳动互助组。1953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以后,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带领全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彻底改变了西沟村过去“树叶半年粮”的贫困面貌。40 多年来外出开会,办公事,从不向村里报差旅费,不向公家要补助。在改革开放年代,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为村办企业采购原材料和推销产品时,克己奉公,从不收“好处费”。历任平顺县西沟村金星经济合作社党支部副书记、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合作社社长、铁合金厂厂长、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等职。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Shenshi

**深市**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在深圳成立的买卖股

票、公债、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市场。又称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于 1989 年 11 月 1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于 1991 年 7 月正式营业。

深圳交易所是会员制、非盈利的事业法人,1998 年 10 月以前,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稽核。11 月以后,国务院将其划归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它的宗旨是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促进中国证券事业的发展,维护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在证券发行、交易、清算、信息披露、市场监管等与证券事务有关的合法权益。其组织机构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会员大会是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为日常事务决策机构。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的业务包括:提供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和设施;管理在深市上市证券的买卖;办理在深市上市证券的清算交割;提供证券市场的信息服务;主管机关许可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截至 1998 年底,在深市上市的证券有:全国各地发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各种基金、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国债、金融债券。

Shenzhen Jingji Tequ

**深圳经济特区**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中国在广东省深圳市开辟的经济特区。1980 年 8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深圳经济特区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是深圳市的一部分。该区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南与香港新界接壤,北与宝安县相连,东西长 49 千米,南北宽约 7 千米,总面积 327.5 平方千米,约占深圳市总面积的 1/6。深圳经济特区地理位置优越,适合综合开发。深圳特区内原有罗湖、上步、沙头角、南头、蛇口 5 个管理区,1990 年改为罗湖、福田、南山 3 个区。特区与非特区通过一条长 84.6 千米的管理线隔开。

1987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深圳经济特区要“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型特区”。根据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和指导思想,深圳特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建立以先进工业为主、工贸并举、技工贸结

合,以发展高科技为重点的高层次、外向型、综合性的经济。

深圳经济特区是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起步的。兴办特区以前工业基础薄弱,仅有 20 多家支农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企业,且经营水平低,需要财政补贴。建立特区之后,在中央的优惠政策和各省、市的支持下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十多年来陆续建起了罗湖商业城和蛇口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八卦岭工业区、沙头角工业区、华侨城工业区、南油工业区、水贝工业区、南头工业区等 8 个工业区一个深圳科学工业园区。1997 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 1130.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0%。其中,工业增加值 557.16 亿元,增长 16.2%;农业增加值 15.81 亿元,增长 0.6%;第三产业增加值 557.04 亿元,增长 15.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06 万元,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42 945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0.6% 和 10.3%。

#### 推荐书目

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6。

Shenfu Dongsheng Meitian

**神府东胜煤田** (Shenfu-Dongsheng Coal Mine) 中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境内。已探明煤田含煤面积达 3.12 万平方千米,地质储量达 2236 亿吨,被列入中国能源战略后备基地。

1984 年开始开发的神府东胜矿区为神府东胜煤田的一部分,规划面积 3481 平方千米,地质储量达 354 亿吨。矿区煤层贮存条件好,倾角小(一般在 0°~3°),煤层厚(3.5~6.5 米),地质构造简单,低瓦斯。煤质为低灰(8%以下)、特低硫(0.5%左右)、特低磷、中高发热量(5600 大卡以上),是优质动力煤、洁净煤和冶金化工用煤。神东矿区的资源条件,有利于实行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有利于开拓环保用煤市场。

80 年代中期,鉴于当时中国能源严重短缺,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国家决定开发神府东胜矿区。1985 年神华工程开始建设,1995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华能精煤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神华集团公司。

神华工程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煤、电、路一体化经营格局。截至 1998 年底,建成并投产 5 对矿井及其配套工程,年设计生产能力 840 万吨;在建矿井

4对(含停缓建),年设计生产能力1130万吨;建成矿区一期、二期电厂装机容量22.4万千瓦;铁路建成并运营包神线(运营里程172千米,设计年运输能力1000万吨),建成并即将正式运营神朔线(运营里程269千米,设计年运输能力近期2500万吨,远期5000万吨),在建铁路朔黄线(运营里程589千米,设计年运输能力近期6800万吨,远期10000万吨),已完成投资59.0亿元,占概算投资166.3亿元的35.5%,将于2002年全部建成并运营;黄骅港一期设计能力达3000万吨,已完成投资6.8亿元,占概算投资51.16亿元的13.3%,计划于2002年全部建成并投产。

Shen-Da gaosu gonglu

**沈大高速公路** (Shenyang-Dalian Expressway) 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之一。1984年6月27日开工,1990年9月1日建成通车。工程总投资人民币22亿元。该路北起沈阳市铁西区建设大路西端,终止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全长375千米,连接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五大工业城市,沟通大连港、营口港、鲅鱼圈港,是东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运输大动脉。

沈大高速公路沈阳到鞍山段98千米是在原路基础上改建的,鞍山至大连段277千米全部开辟新线,比原路缩短47千米。全路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厚15厘米,路基平均厚度2.8米,宽26米。中央分隔带宽3米,双向4车道。两侧各有紧急停车带。陡坡均小于3%。平曲线半径大于1000米。主要设施有:大桥15座,互通式立交桥26座,公铁立交桥8座,跨线桥90座。全线设有7个管理处,26个收费站,13个通信站,6个服务区和6个停车场,按照高速公路的标准,合理地设置了可变情报板、可变限速板、紧急电话、图像监视等交通工作设施。全路全封闭、全立交,设计行车时速120千米,通行能力每昼夜50000辆。

沈大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束了中国大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开创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新纪元。它的建成改善了辽宁省投资环境,加快了沿线城市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了县乡经济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

Shen Hong

**沈鸿** (1906~1998) 机械工程师。浙江海宁人。1906年5月19日

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当学徒。1931年在上海开办利用五金厂。1938年携带工厂设备到延安,任陕甘宁机械厂工程师、晋察冀龙烟铁矿公司代经理、华北企业部工程师。三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国家计委第一机械计划局副局长,三机部部长助理,电机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机部、一机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六届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至1962年,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中国第一套火车轮箍轧机等,主持编写中国第一部大型《机械工程手册》,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1998年5月20日在北京逝世。著作有:《沈鸿论机械科技》。

Shen Junru

**沈钧儒** (1875~1963) 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清光绪进士。1905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学习。1907年回国。1909年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和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员,省教育厅长,国会浙江省候补议员,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1918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护法军政府议员,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后曾任直系北京政府参议院秘书长。1926年北伐军攻克浙江后,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26年冬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1935年12月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主席。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各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任主席,并办《全民》周刊,后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任编委。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参加发起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参与倡议、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常委。

1945年冬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49年12月任民盟中央副主席,1956年2月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是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3年6月11日逝世。著有《宪法要览》、《家庭新论》等。

Shen Yanbing

**沈雁冰** (1896~1981) 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第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常用笔名茅盾、玄珠等。浙江桐乡人。1896年7月4日生。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辍学。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17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参加了党的筹备工作。1920年10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接编并全面革新《小说月报》,1921年1月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左派国民党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1926年底到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汉口《民国日报》主笔。早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文艺评论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20年1月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初步表达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新文艺的性质、特点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思想一度比较苦闷和悲观。这时期写的《幻灭》、《动摇》、《追求》(即《蚀》三部曲)等小说反映了这种思想状况。1928年7月去日本,与党失去组织联系,但仍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创作了长篇小说《虹》等。1930年春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从1932年到1937年,是沈雁冰创作力最旺盛、成绩最突出的时期。他先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即《农村》三部曲),长篇小说《子夜》等,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收获。抗日战争时期,他转辗于新

疆、延安、重庆、香港等地。先后主编过《烽火》周刊（《文学》、《中流》、《文季》、《译文》的联合刊物）、《文艺阵地》等刊物。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期间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剧本《清明前后》，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等。解放战争期间，投入了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1946年12月赴苏联访问，1947年4月回国后，写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等书，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年底去香港。任《小说月报》编委，并创作长篇小说《锻炼》。1949年2月，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文化部长，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政协常委和第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职。曾主编《人民文学》、《译文》。热情扶植新人，撰写大量文艺评论。著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等。“文化大革命”后，抱病写成《我走过的路》，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81年3月27日逝世。临终前要求中共中央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还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他一生著作丰硕，编有《茅盾文集》（10卷本），《茅盾全集》也在陆续出版。

shenpan Lin Biao Jiang Qing fangeming jitian zhufan

###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trial of the main culprits of the Lin Biao and Jiang Q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肆意践踏民主和法制，阴谋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的公开审判。

1979年，中共中央成立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同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的座谈会。9月3日，

邓小平指示：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9月11日，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专人起草黄、吴、李、邱的单人起诉书。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办公室组织人起草王、张、江、姚的单人起诉书。1980年3月19日，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提出初步审判方案，并成立“两案”审判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任正副主任。同年9月4日，中央书记处重新制定出新的“两案”审理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核。是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两案”审理的通知。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喻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为副厅长。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曾汉周、伍修权分别为第一、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正式开庭。黄火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起诉的10名被告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法庭11月10日将起诉书副本送给10名被告，并告知他们有辩护权，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到1981年1月25日正式判决为止，共两个月零五天。期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开庭，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共进行33次法庭调查，审查各类证据共873件次，当庭向被告出示和宣读的证据、证词共651件，通知和传唤证人和受害人49人出庭作证，共进行9次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3日，特别法庭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月25日上午，公开宣判：以

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推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有共谋的犯罪行为，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是：策划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共谋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迫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军干部；煽动“打砸抢”；挑动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各条，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黄永胜、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吴法宪、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确定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结束后，3月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江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情况报告》。3月6日，“两案”审理机构撤销，审理工作基本结束。

Shengli Youtian

### 胜利油田 (Victory Oil Field)

位于渤海湾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带的大型油田，是中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1960年开始石油勘探，1961年4月16日钻遇油层，发现工业油流。1964年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报告，由副部长康世恩任总指挥，开始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到1965年5月探明了胜坨油田，1966年开始开发，当年原油产量达到134万吨。从1967年到1978年，会战指挥部扩大勘探范围，又发现一批新油田，建成了东辛油田、孤岛油田，以及胜利炼油厂。1974年9月29日，新华社报道了胜利油田建成的消息。1967年~1978年，胜利油田连续12年超额完成原油生产计划，年增长速度达到27.9%。1985年产原油达270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到1992年，一共查明62个油田，2个气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达33.8亿吨，天然气储量299.87亿立方米。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型石油工业基地，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经过改革，胜利油田得到进一步发展。“八五”计划期间，胜利油田在渤海湾浅海海域展开大规模海上开发，截至1997年底，海上油田共生产原油150.01

万吨。整个油田 1997 年共生产原油 2801 万吨，超额 51 万吨完成国家计划，上缴利税 3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28%。当年还新增加可采储量 2917 万吨，实现采储平衡。

Shi Guangnan

**施光南** (1940~1990) 作曲家。浙江金华人。1940 年 8 月 22 日生于重庆。1957 年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59 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64 年毕业于，到天津歌舞剧院工作。后任中央乐团创作室创作员。当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大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优秀歌曲，被誉为人民音乐家。代表作有《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第十一届亚运会会歌《高举起亚运会的旗帜》等。还作有歌剧《伤逝》、《屈原》，芭蕾舞剧《白蛇传》，小提琴曲《瑞丽江边》等。1990 年 5 月 2 日在北京病逝。部分作品收入《施光南歌曲选》。1995 年为他举行了纪念音乐会。

shiyou huaxue gongye

**石油化学工业**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石油炼制工业和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化学工业。石油炼制工业是将原油经过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加氢精制、冷冻脱蜡、催化重整等炼制过程，生产出汽油、煤油、柴油和润滑油等燃料油品，以及石油气体、苯类、石油焦和沥青等产品。石油化工则以轻质油品、天然气、石油气为主要原料，经过裂解、分离、合成等工艺过程，生产出甲烷、乙烯、丙烯、丁烯、异戊烯、苯、甲苯、二甲苯以及合成气等多种有机化工原料，利用这些原料生产合成树脂和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氨，以及合成染料、合成胶粘剂、涂料等产品，然后再进一步加工成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起步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有天然石油资源，而且有油母页岩等人造石油资源。但是在旧中国，石油化工基本上是空白。当时原油产量很低，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几乎全部为“洋油”所垄断。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39 年间，进口的石油产品总值约 30 亿美元。到 1949 年，全国炼油厂的原油加工量只有 11.6 万吨；石油产品只有 12 种，产量不过 8 万吨，其中

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四大类油品的产量，只有 3.5 万吨。

**体制沿革** 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了燃料工业部和重工业部，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分别由这两个部主管。1955 年 10 月，成立石油工业部，次年 5 月成立化学工业部。1970 年 7 月，石油部、煤炭部、化工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1975 年将燃料化学工业部分为石油化学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1978 年 4 月撤销石油化学工业部，成立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1983 年 2 月，成立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对全国重要的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历程分为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两大部分。石油炼制工业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恢复和发展 (1949~1959)** 根据原油生产状况和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对石油产品的迫切需要，石油炼制部门采取了两个步骤。(1) 修复、改造和扩建原有工厂。例如：玉门炼油厂是建国初期全国较大的天然原油炼油厂，年加工能力为 14 万吨。经过扩建改造，1959 年加工能力达到 42.6 万吨，相当于 1949 年的 3 倍；产品品种既有汽油、煤油、柴油、重油和几个牌号的润滑油，还有石蜡及其制品，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再如独山子炼油厂，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年加工能力仅有几千吨，改造以后，至 1959 年，原油加工量达 80.6 万吨，产品品种也增加到十几种。(2) 依靠国内力量和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设备，建设了几个新的炼油厂。例如，1950 年 4 月建成投产的上海炼油厂采用新的技术设备，至 1959 年原油实际加工量达 24.2 万吨，对缓和上海地区石油产品的供需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兰州炼油厂是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自 1956 年 4 月正式破土动工之后，第一期工程于 1959 年 3 月正式投产，当年原油实际加工量达 73 万吨。兰州炼油厂和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石油炼制工业的建设水平和生产水平进入了新的阶段。

**炼制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1960~1965)** 1960 年，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大庆石油勘探开发会战，这是石油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到 1965 年达到 1131.5 万吨，相当于 1959 年的 3.3 倍，平均每年递增 100 多万吨。原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要求石油炼制工业同步发展。经过 6 年艰苦奋斗，到 1965 年底，全国原油产

量达到 1131.5 万吨，石油炼制加工能力则达到 1423 万吨，相当于 1959 年原油加工能力的 2.5 倍；在炼油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石油产品品种达到 494 种，比 1959 年增加了 185 种；石油产品的自给率由 1959 年的 40.6% 提高到全部自给，不仅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而且开始有少量出口。

**排除困难，不断前进 (1966~1978)**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石油炼制工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同时，由于石油炼制部门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加上大庆油田持续增产，胜利、大港、辽河、任丘等一批新油田相继投入开发，全国原油产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石油炼制工业仍保持增长的势头。

**石油炼制工业发展新时期 (1979~)**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石油炼制工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79 年 5 月，石油部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石油工业的具体方针是大力加强后备资源，调整储量与开采的比例，原油产量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在 1 亿吨或多一点的水平上；石油炼制工业的调整任务是，在原油加工量基本不增加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革新工艺，节约能源，增加二次加工能力，搞好环境保护，并增强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1983 年 7 月，对全国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炼油、化工、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这是石油炼制工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石油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石油炼制工业的新发展。以节约能源为例：全国 33 个大中型炼油厂平均加工每吨原油的综合能耗，已由 1978 年的 105.45 万吨大卡降低到 1985 年的 70.09 万吨大卡，降低幅度达 30.53%，累计节约的能源相当于节约燃料油约 900 万吨。

总的来看，1979 年以后，由国内原油生产后续储量不够充足，在调整中减缓了增长速度，国内原油加工能力和实际加工量的增长都不大，1985 年比 1978 年只分别增加 1000 多万吨。后来石油炼制工业部门集中力量改进工艺，提高质量，搞好节能与环保，充分利用石油资源，开发深度加工，综合利用新技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和石油产品出口量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1980 年原油产量为 10 594.6 万吨，1985 年 12 489.5 万吨，1990 年 13 830.6 万吨，1994 年 14 608.2 万吨，1995 年达

到14 974.9万吨,当年的出口量也达到了2454.5万吨。从1990年到1996年,我国的原油产量均位居当年世界各国原油产量排名的第五位。天然气产量也从1980年的142.70亿立方米增加到1995年的179.47亿立方米。

石油化工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崛起时期(1956~1963年)** 中国的石油化工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步,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不算太晚,但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旧中国对石油资源没有很好地进行勘探和开采,限制了炼油工业的发展;而炼油工业的落后,又使中国的石油化工缺乏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原油、天然气开采量的迅速增长和炼油能力的逐年增加,使炼油过程中伴随产生的石油加工气越来越多,为石油化工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最早的石油化工就是以炼厂气为原料,生产乙烯、丙烯、丁二烯以及各种中间体,并以此为原料,生产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三大合成材料,及其他石油化工产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决定将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中的一座化肥厂和一座合成橡胶厂建在兰州地区,后决定将两厂合并,成立兰州化工厂。由于生产装置日渐增加,生产规模日益扩大,1960年10月,中央又决定在兰州化工厂的基础上扩大编制,成立兰州化学工业公司。1962年5月和8月,聚苯乙烯装置和丁腈橡胶装置分别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本体法聚苯乙烯和国际上需要的丁腈橡胶,由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化工生产的帷幕。

**石油化工的发展(1964~1972年)**

1964年,国务院决定从英国引进5套石油化工、化纤装置,建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以便配套成龙,加速石油化工的发展。1968年全部建成投产。从此,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按照石油化工的流程安排生产,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1972年乙烯产量为3.66万吨,比1969年增长319.2%;合成树脂和塑料、合成橡胶、晴纶比1979年分别增长193.1%、10.9%、1377.8%。此外,合成氨产量也比1969年增长73.5%。

至此,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以综合利用原油为特点,生产合成材料、化学肥料和有机化工产品的石油化工基地已经全面形成。成为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为中国石油化工的诞生、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石油化工现代化迈进(1973~ )**

乙烯是发展石油化工具有代表性的有机原料,在石油化工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乙烷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973年8月,从日本引进的年产30万吨乙烯工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正式开工,同时开工的还有年产18万吨规模的聚乙烯、年产8万吨规模的聚丙烯、年产4.5万吨规模的丁二烯抽提等4套装置,统称为“四烯工程”。1976年陆续建成投产。它使中国石油化工向世界先进行列跃进了一大步,对实现石油化工现代化具有现实的意义。

随着石油化工的不断发展,给合成纤维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为国内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根据中央的决定,在上海金山建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辽宁辽阳建立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在四川长寿建设四川维尼纶厂,在天津大港建设天津石油化纤总厂。这4个化纤基地的建成投产,共增加合成纤维生产能力30万吨,使全国合成纤维产量由原来只占世界总产量的不足万分之一提高到80年代初的4%以上。它的迅猛发展,使国内市场上传统的棉织物为主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对于改善人民的衣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和探索,主要的石油化工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改变了中国石油化工的生产结构和落后面貌。到1995年,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达58.56万吨,居当年世界排名的第五位,1996年又增至59.97万吨;乙烯产量1995年为240.05万吨,1996年增至303.96万吨;合成氨产量1995年为2765.90万吨,1996年也增至3094.18万吨。1995年的化肥总产量为2548万吨,居当年世界排名的第二位。

#### 推荐书目

张万欣主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化学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杨光启、陶涛主编:《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Shi Chuanxiang

**时传祥(1915~1975)** 掏粪工人,劳动模范。山东省菏泽市人,1915年9月20日生。1929年到北京当掏粪工人。1949年后,为北京崇文区清洁队工人。在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勤恳地为人们服务。从1954年起历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被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当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出席全国

群英会,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和鼓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污蔑为“工贼”,惨遭迫害,于1971年被赶回山东老家。1973年8月,周恩来获悉他的境况后,当即派人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终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医治无效,于1975年5月19日逝世。1978年6月文化得到平反。

shidai jingshen huihelun

**“时代精神汇合”论** (theory of “comb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对历史学家周谷城提出的一个学术观点的概括。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文中论及时代精神与创作关系问题时,认为时代精神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包括着不同阶级互相对立的各种思想,即奴隶与奴隶主思想,农民与封建地主的思想,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整体,然而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的,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

1962年至1964年间,《文艺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新建设》、《红旗》、《文学评论》均刊载讨论文章。多数文章认为周文的论点模糊了各种思想意识之间主导与从属的区别,从而也就否定了“时代精神”应是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思想的观点。周撰文多篇作了论争。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批判的发展,大量批驳周谷城观点的文章言辞愈来愈激烈。1964年第20期《红旗》杂志刊登的《文艺理论阵地上的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驳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一文,认为抹煞革命与反动的区别是周谷城提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这个论点的真正目的。表面上主张各阶级意识“不分轩轻”、“平分秋色”,实质上是使反革命精神渗透进来,最后溶合掉革命精神。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完全是为反革命争地盘、打江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说它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论”。“文化大革命”中,周谷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新时期以来,对“时代精神汇



合”论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

Shijian Shi Jianyan Zhenli de Weiyi  
Biaozhun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光明日报》

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各项工作在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摆脱“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思想束缚。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在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讨论到真理标准问题。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接受委托，起草真理标准的文章。此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寄到《光明日报》，引起总编辑杨西光的重视，决定对文章进行较大修改后发表，以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随即由有关方面成立文章修改班子。文章前后进行10次较大修改，最后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胡耀邦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于《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①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③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④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文章提出，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共产党员必须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长时间的讨论。它对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推动各条战线的整顿，实现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作用。

#### 推荐书目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7。

Shi Laihe

**史来贺** (1930~ ) 农村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村党总支书记、农工商总经理。河南省新乡县人，1930年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起当选为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村党支部书记。1957年，带领群众获得皮棉高产纪录，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1980年引进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生物工程项目，使全村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1990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和公共积累分别比1978年增长38倍和17倍；人均集体分配比1978年增长7.6倍，个人存款720万元，户均2.5万元；每户有一幢两层楼房，子女入学全部免费，养老病葬全部由集体包干，农民全部免费医疗；全村实现机械化，还拥有一架轻型喷农药飞机；村里建起科技大楼、学校、电视差转台，提前进入“小康”。刘庄党总支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组织，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Shi Liang

**史良** (1900~1985) 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存初。女。江苏常州人。1900年3月27日生。1915年考入常州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参加领导全市学生罢课。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1927年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1931年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年底与沈钧儒等参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38年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并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退出国民参政会。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在重庆谈判中，担任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1946年后，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48年后，在上海创建民盟华东执行部，并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

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民盟第一、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5年9月6日在北京逝世。

shouhui haiguan zhuquan

### 收回海关主权 (regain sovereign rights over the customs)

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并重新建立海关。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对外国在当地设立的税务司予以撤消并接收海关。1949年10月25日，海关总署成立，孔原任署长。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强调海关工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意义，明确海关职能，并对确定海关税则、税率的原则等作出了具体规定。4月18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对中国海关组织、任务和职权，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报验、征税、保管和放行，对走私和违章案件处理，以及海关保护国家生产和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竞争的有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5月1日起施行。5月16日，政务院又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同时宣布，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至此，中国完全收回并行使海关主权。

shou la shou huo dong

### “手拉手”活动 (“Hand-in-hand” project)

1990年由共青团中央和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健康的和有残疾的以及各民族的少年儿童之间互相通信往来，互助互学，奉献爱心，共受教育的一项活动。

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城市的少年儿童将自己不再使用的图书、文具、书包、衣物捐献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克服学习、生活上的困难。这项活动最初在少年儿童之间开展，后来发展成为少年儿童与成人、少先队辅导员之间以及队与队、校与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助服务、联谊和协作，建立起了“手拉手”希望小学、“手拉手”书屋等，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少先队组织的一项富有特色的教育活动和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形式。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出版局和全

国少工委、中国少年报社联合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开展“手拉手读书交友”活动，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和迎接香港回归为主题，组织全国少年儿童赠送、阅读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动员城市少年儿童用自己的压岁钱和零花钱为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赠送爱国主义图书一本，动员城市学校向农村、贫困地区联谊学校赠送爱国主义图书一套，共同参加阅读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活动，发展了“手拉手”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手拉手”活动自开展以来，少先队员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和少数民族小朋友捐献图书、文具、书包、生活用品等已达数百万件，既减轻了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困难，也大大增强了少年儿童的团结互助、勤俭节约意识。

shumai zhengce

**赎买政策 (Policy of redemption)**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通过和平方式有偿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逐步国有化的政策。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思想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对民族资本没有采取无偿没收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赎买不是购买，也不是支付单独的补偿基金，资本家从公私合营的企业里获得一部分利润。在单个合营企业中可得全部盈余的25%左右；在全行业合营后按核定的私股数额发给年息5%的固定股息10年，同时对资方人员在生活上、工作上和政治上予以安排，并保持其原有的高薪。赎买减轻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防止了生产力的破坏，有利于团结资方人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shuzhi tianqi yubao

**数值天气预报 (digital weather forecast)**

根据表示现在天气情况的已知初始条件，数值求解流体力学-热力学方程组，算出未来一段时间内大范围的天气形势或有关气象要素的一种客观定量的天气预报方法。中国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早，1954年开始理论研究。1980年1月，首先建立了短期(1~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从而改变了几十年来以主观经验预报为传统的程

序，向天气预报的客观化、量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86年，中期(3~10天)数值天气预报研究被列为“七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1991年6月，中国第一代具有中等分辨率的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使用，在大型计算机CYBER上运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9个能制作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之一。1992年8月，研制了第二代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随后在银河-II巨型计算机上运行，使可用预报时效延长了近一天半，即延长到了5天左右。随着20亿次/秒的克雷巨型机的引进，1997年，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模式分辨率又进一步提高，使可用预报时效提高到6~7天。中国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水平的不断提高，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shuili shiye

**水利事业 (water conservancy)**

水利就是采取各种人工措施对自然界的水进行控制、调节、治导、开发、管理和保护，以减轻和免除水旱灾害，并利用水资源，适应人类生产、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活动。从事水利活动的事业称为水利事业，主要包括防洪、排水、灌溉、供水、水力发电、航运、水土保持、水产、水利旅游和改善生态环境等。

**起步基础** 我国水资源缺乏，按人口和按国土面积平均占有的水资源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加上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旱灾害频繁，这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水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水利有过辉煌的成就。近代水利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水利基础十分薄弱，只有堤防2万公里，水库20多座，小水电站39座，低标准的灌溉面积2.4亿亩，江河水系紊乱，水旱灾害频仍。这样的水利状况，使治理江河、防治水旱灾害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机构体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兴修水利和治理江河十分重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设置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当水利与电力分开时，称为水利部；当水利与电力合并时，称为水利电力部。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史沿革见表1。

由于大江、大河、大湖影响重大，先后建立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河、太湖等流域管理机构，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部或水利电

力部)的派出机构，行使所在流域的水行政主管职责。各流域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见表2。

表1 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沿革表

时间	机构名称	部长
1949.10~1958.2	水利部	傅作义
1958.2~1967.7	水利电力部	傅作义
1967.7~1970.1	水利电力部军事管制委员会	陈德三(主任)
1970.6~1975.1	水利电力部革命委员会	张文碧(主任)
1975.1~1979.2	水利电力部	钱正英
1979.2~1982.3	水利部	钱正英
1982.3~1988.3	水利电力部	钱正英
1988.3~1993.3	水利部	杨振怀
1993.3~1998.11	水利部	钮茂生
1998.11~	水利部	汪恕诚

表2 流域机构沿革表

流域名称	机构沿革
长江	1949年5月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原有流域机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 1950年12月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 1956年10月改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1990年12月改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黄河	1949年6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是华北、华东、中原三解放区联合性的治黄机构 1949年11月改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淮河	1950年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 1990年2月改名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海河	1979年11月成立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珠江	1956年12月成立珠江水利委员会(治理珠江的协商组织) 1979年8月成立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松辽河	1982年10月成立水利电力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太湖	1984年6月成立太湖流域管理局

在几十年的水利建设过程中,水利科研、教育、勘测设计、学术团体、出版机构也得到逐步发展和完善。目前水利系统拥有研究开发机构 100 余所,其中水利部直属的科研单位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 10 个院所。全国设有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 56 所,中等专业学校 73 所,其中水利部直属的高等水利院校有河海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南昌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北京水利水电管理干部学院等。水利部直属的勘测设计单位有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上海勘测设计院、天津勘测设计院、东北勘测设计院等,各省、市、区水利厅(局)都设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部分流域机构也设有勘测设计院。全国性的水利水电社团有中国水利学会、水利经济研究会等 18 个。水利部直属的出版机构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种水利机构的组织运行原则和职能都在变革。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利部,要特别加强方针政策、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等工作,为适应加强宏观管理的需要,在 1998 年国务院批准的水利部内设机构中,增设了政策法规司和水资源水文司。各类水利事业机构也在根据各自的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勘测设计单位要逐步实行企业化。水利院校要实行产学研结合,专业设置要更多地考虑市场的需要。科研单位要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又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水利科技体制,实行国家支持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在搞好重大课题研究的同时,也要搞好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

**发展历程** 水利建设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正确确定方针与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即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9~1957年),提出的水利方针和任务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依照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财力及技术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各项水利事业;统筹规划,相互配合,统一领导,统一治水;对各河的治本工作,首先研究各重要水系原有的治本计划,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的计划;积极充实水利机构,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提高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这一方针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促进了各项水利事业的全面发展。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三主”的水利方针。这个方针,推动了兴修水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不少地方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这个方针存在严重的片面性,没有正确处理小型与大型、蓄水与排水、群众自办与国家指导的辩证关系,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大跃进”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6年),及时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偏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发扬大寨精神,大搞小型,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使水利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水利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后(1976年以后),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强调水利一定要办,办法一定要改,要以法治水。水利改革的方向是:“转轨变型,全面服务”,即从以农业为主转到为社会经济全面服务的思想;从不讲投入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从单一生产型转到综合经营型。在水利管理中,推行“两个支柱,一把钥匙”,即以水费收入和综合经营为两个支柱,以加强经济责任制为一把钥匙,使水利工程管理逐步转入良性运行机制。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引导水利事业开始步入改革开放之路,使水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水利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水利的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投入机制等,都必须进行调整和改造,为此,1993年提出了新的水利方针,即“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除害与兴利、服务与经营结合,巩固与发展、治理与开发、建设与管理并重”。要求加快水利发展步伐,强调要建立水利五大体系,即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水利投资体系;科学的、完善的水利资产经营管理体系;合理的水利价格和收费体系;完善的水利法制体系;优质高效的水利服务体系。这个方针,必将进一步促进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建设成就** 我国已建成较为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和非工程体系。截至 1998 年底,全国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 8.5 万座,蓄水总库容达到 4924 亿立方米,堤防 25.6 万多公里。排灌动力装机容量 7503

万千瓦,配套机电井 372 万眼,百分之七八十的易涝盐碱耕地得到初步治理,农田灌溉面积达到 8 亿亩。水电装机容量 6506.5 万千瓦,年发电 2042.95 亿千瓦时,其中水利系统管理的水电及小火电装机容量 2812 万千瓦,年发电 893 千瓦时。为农村解决了 2 亿人和 1.3 亿头牲畜饮水困难,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74.9 万平方公里。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防洪减灾** 我国的主要江河已经初步形成防洪体系。这个体系保护着 4.2 亿多人口,5.4 亿亩耕地,639 座大中城市和主要铁路、交通干线的防洪安全。正是由于这个体系,使我国战胜了历次洪水,大大减轻了灾害损失。仅 1998 年全国防洪减灾效益就达 4270 亿元。

**农业增产** 灌溉、排涝、治碱工程的发展,为我国的农业持续增长提供了条件。全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40%,而灌溉面积上所生产的粮食占全国总产量的 75%,经济作物占总产量的 80%。我国能以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使 12 亿多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这是为世界所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其中,水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力发电** 在我国的能源建设中,水电占有重要地位。截至 1998 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达 6506.5 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 2.77 亿千瓦的 23%。全国 2400 多个县(市)中,以中小水电供电为主并由水利系统自供自管的县近 800 个,近 3 亿人口靠小水电供电,供电范围覆盖了我国 40% 的国土面积。已有 318 个县利用小水电供电实现了初级电气化。

**城镇供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修建了不少城镇供水工程,对城镇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20 多年来,由于干旱以及城镇工业和生活用水的飞速增长,水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沿海城市和北方地区出现了“水荒”。为此,一批大型供水工程相继建成,缓解了北京等重要城市的近期用水困难。目前我国城镇供水能力已有很大提高,1998 年水利设施向城镇供水总量达到 553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水 353 亿立方米,为 1950 年 50 亿立方米的 7 倍。

**水土保持** 到 1998 年底,我国已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4.9 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0%。经过治理的地区,有效地保护了国土资源,减轻了河道和水库的淤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兴修梯田、坝地和治沙造

田 2.7 亿亩, 种植水保林和各类经济林果等 6 亿亩, 促进了农业生产, 增加了农民收入。

**水法制建设** 198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实施条例》、《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规相继出台。省级人大和政府制定了配套的地方性水法规 600 余种。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水法》实施办法或水资源管理条例。省、地、县、乡四级水利执法网络初步形成。我国水利事业开始步入以法治水的新时期。

**科技教育** 科研机构对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关键技术问题, 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 1990 年到 1998 年完成的重点科研课题中, 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40 项, 部级科技进步奖 605 项。科技对水利发展的贡献率逐步提高, 目前已达到 32%。

50 年代以来, 水利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已初步形成包括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 具有综合培养能力的水利教育体系, 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 20 余万名大学和中专毕业生, 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资源。

在水利建设过程中, 水利人才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到 1998 年底, 全国职工人数达 162 万人。目前, 水利学科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18 人, 有 9 位院士获得资深院士称号。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在水运、水利渔业、水利综合经营等方面, 也进行了大量的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水利的前期工作和各项基础工作, 都有很大的发展。

**问题和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水利事业, 是我国水利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效益最显著、成果最辉煌的时期, 为华夏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但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 水利建设不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问题, 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江大河大湖防洪标准偏低, 中小河流灾害损失日趋严重, 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目前黄河下游防洪标准最高, 也只能防御 60 年一遇的洪水; 长江中下游只能防御 10~20 年一遇洪水; 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一般也只能

防御 10~20 年一遇洪水。中小河流防洪标准更低。城市防洪问题, 也很突出, 在全国 639 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 80% 的防洪标准低于 50 年一遇, 一些城市还达不到 10 年一遇标准。我国沿海风暴潮灾害也很严重, 抗御风暴潮的能力, 也亟待提高。

北方和沿海一些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 已成为制约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的瓶颈。全国 670 多座城市中, 有 400 多座城市缺水, 其中严重缺水的 110 座, 城市日缺水约 1600 万立方米, 每年因缺水影响产值约 3000 亿元。因地表水不足, 有的地区过量开采地下水, 造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 局部地区出现了地面沉降。沿海地区, 有的因过量开采地下水, 造成海水入侵, 严重恶化了水环境。

农业抗御水旱灾害能力不强, 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平均每年受旱面积 2 亿多亩, 成灾面积 1 亿多亩, 年减收粮食 150~200 亿斤。进入 90 年代, 由于水源不足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 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呈上升趋势, 1997 年受灾面积达到 5 亿多亩, 成灾面积达到 3 亿多亩。

水土流失治理进展缓慢, 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仍然存在, 水土流失仍呈发展趋势。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67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 38%, 且每年仍以 1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土地的生产力, 加剧了洪涝灾害, 影响了生态的平衡。

水污染严重, 并有日渐恶化趋势。全国年排放废污水已达 584 亿吨, 其中 77% 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 污染河流、湖泊和水库。七大江河流域中, 有近 50% 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75% 的城市河段已不适宜作为饮用水的水源。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利发展良性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水利自身造血功能低下, 以致工程日益老化, 效益日益减少, 包袱越背越重。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水利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根据当前水利的实际情况, 必须加快发展步伐, 才能适应社会 and 经济发展对水利的要求。今后的任务主要有:

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 提高防洪抗灾能力。到 20 世纪末, 要求七大江河干流能防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生过的最大洪水, 遇超标准洪水, 能有效地分蓄滞洪水, 确保重要城市和重要区域的安全。到 2010 年, 大江大河的防洪能力进

一步得到提高。

大力增加灌溉面积和发展节水灌溉。到 20 世纪末, 要求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8 亿亩, 其中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2.5 亿亩。到 2010 年, 使农田灌排面积有较大改观, 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力发展供水, 优化水资源配置。兴建一批大型骨干水利枢纽和必要的调水工程, 厉行节水。到 20 世纪末, 初步缓解北方及沿海地区的供水不足问题。到 2010 年, 进一步改善全国重点缺水地区和城市的供水状况。

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水资源, 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水土流失治理进度, 到 20 世纪末, 力求取得较大进展。到 2010 年, 水土流失恶化的状况得到有效控制。控制江河水污染, “九五”期间, 重点抓好淮河污染治理和重要水源地的保护, 做到达标排放。到 2010 年, 要求全国饮用水源普遍划定保护区, 重要水源地及大江大河干流和大型湖泊, 力求达到国家规定的地表水二、三类标准, 并控制超采地下水。

积极发展水电和乡镇供水设施。“九五”期间, 要求新增水电装机容量 1000 万千瓦, 新建乡镇供水工程 6000 处, 改变农村贫困地区缺水缺电状况, 为实现小康提供用水用电条件。到 2010 年, 要求本世纪已建成的 600 个农村初级电气化县继续提高标准, 新建 600 个农村初级电气化县。乡镇供水设施有较大的发展。

加强水利部门的自身建设, 深化水利改革。要深化水利改革, 逐步实现水利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加强水文、科教、前期等基础工作, 大力培养管理和科技人才, 提高水利职工队伍素质, 以便适应水利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要求。

当前, 我国的水利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效益, 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 灌溉面积逐年增长。城乡供水、中小水电、水土流失治理、人畜饮水、水法制建设、水利的前期和基础工作,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规模巨大的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正在顺利建设, 标志着我国的水利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实现水利的目标和任务,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对此, 国内的专家学者十分关注。他们提出的主要建议有: 加强依法治水, 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研究建立长期稳定的水利投资体系。研究建立有利于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水利管理体制。要加强水利科技

工作, 加大水利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提高治水的科技含量。建立一支适应水利事业发展的队伍, 使水利职工队伍从人员素质、技术能力、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装备条件上, 都能满足水利建设和管理的要求。

#### 推荐书目

钱正英主编: 《中国水利》, 水利电力出版社, 北京, 1991。

## shuiyun shiye

### 水运事业 (water transport)

中国交通运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旅客运送、国内外贸易和城乡物资交流提供运输服务,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部门。

**起步基础** 中国河湖众多, 海域辽阔, 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 有着发展水运的优越条件。

中国古代在水运史上曾创造世界壮举。近代航权丧失, 民族航运业步履艰难。解放战争期间, 航运设施遭到破坏, 70%以上船舶被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炸沉。1949年, 全国只有运输轮驳船 37 万载吨, 水路货运量 2543 万吨, 内河通航里程 7.36 万公里, 沿海和长江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910 万吨。中国水运事业百废待兴。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交通部, 主管全国水路、公路交通运输。水运业迅速恢复, 在 3 年经济恢复期间, 全国水路货运量年均递增 26.4%, 货物周转量年均递增 32.2%, 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年均递增 36.4%。

“一五”期间, 新建了湛江港(第一期工程)和裕溪口煤码头, 扩建了一批码头和修造船厂, 开发整治了内河航道。1957年底, 部直属水运企业轮驳船队平均每吨船年货运量由 1952 年的 2.91 万吨公里增长到 4.67 万吨公里; 地方水运企业的拖船平均每千瓦功率的产量达 5.16 万吨公里, 创历史最高记录。

“二五”期间,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1961 年成立了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及广州分公司, 扩大国家远洋运输船队, 1965 年船队运力超过 60 万载重吨, 为 1957 年的 6 倍多。新建了金陵船厂、青山船厂和文冲船厂以及改建了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等, 1965 年交通部直属水运工业总产值达 12597 万元。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影响, 投资效果及水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年递增率均低于“一五”时期。

1966 年至 1976 年, 中国水运业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曲折前进: 1968 年开通了“南北航线”; 1975 年远洋船队运力达 500 万载重吨; 1973 年建设了一批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大型专业化码头; 完成了大中型修造船厂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13 个, 并使它们之间纳入专业化、协作化的生产轨道; 分别在上海、广州、山海关、武汉、重庆、宜昌新建、扩建和改建港口机械制造基地。到 1976 年, 全国水运工业完成工业总值 86 251 万元。同时还进行了国际航运合作和援建发展中国家水运工程项目。但是, 在这 10 年间, 全国水运部门运输船舶平均每吨船的货运量递减 7.8%, 沿海主要港口平均每万元建设资金所增加的吞吐能力仅为“二五”时期的 58.8%,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处于低谷。

1977 年至 1985 年, 中国水运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六五”期间, 新增远洋运输船舶 426 万载重吨, 沿海运输船舶 150 万载重吨, 长江运输轮驳船 67 万载重吨、6.1 万客位。1978 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开辟了中国至澳大利亚第一条国际集装箱航线; 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54 个, 5000 吨中级泊位 25 个, 共新增港口货物吞吐能力 1 亿吨以上, 相当于过去 10 年新增能力的总和。1985 年, 中国经营国际贸易海运企业 66 家, 船舶运力 1680 万载重吨; 在新增加 1 亿吨港口货物吞吐能力中, 国际集装箱泊位 13 个年设计吞吐能力达 85 万标准箱; 长江轮船总公司拥有分节驳船 67.8 万载重吨, 成为长江下游主要运输力量。

到 1997 年, 从事国际航运的公司达 310 多家, 船舶运力 2380 万载重吨,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3 倍。船队抵达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个港口, 完成货运量 21 793 万吨,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近 6 倍; 全国从事沿海运输的企业达 1300 多家, 运力达 907 万吨,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217%; 从事内河航运企业 5100 多家, 内河航运个体户和个体联户万家以上。改革开放以来, 改善和提高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8500 多公里, 通航里程达到 11.1 万公里; 中国拥有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近 500 个, 港口货物吞吐量 13 多亿吨, 分别比 1978 年增长近 4 倍和近 5 倍; 建成一批现代化专用码头, 其中拥有万吨级集装箱专用泊位的港口 16 个, 集装箱专用泊位 65 个, 设计年吞吐能力 1003 万标准箱。水运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得到了加强。

**管理体制沿革** 1950 年, 全国水运业统一由各级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实施行业

行政管理。1951 年, 调整管理体制, 实行专业分工, 海洋和内河航运分别管理。1953 年, 建立和加强以计划生产管理为中心的“政企合一”, 分级管理水运体制; 1958 年和 1970 年, 曾两次将中央管理的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地方政府管理, 但仍是“政企合一”的模式。从 1979 年开始, 实行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责、权、利分明的水运管理体制: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种经济成分参加客货运输, 提倡和保护合理竞争;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国外开放中国水运市场, 逐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转变水运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企业职能; 完善水运法规体系, 加强对航运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

**经营体制** 建国初期, 水运企业的经济核算在统一费率、统一货源和统一调度的计划经济下进行。1953 年至 1957 年, 由多种经营向单一国营过渡。1961 年在远洋运输上, 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与外轮代理总公司、香港招商局和中波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等一起, 形成了以自营船队为主导、跨国合营船队相协调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1983 年, 各水运企业均成为经济实体, 进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各合营企业实行董事会制, 从而出现了多种形式联合体、合作船队、联合运输组织和产、运、销联合经营组织以及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来, 在航运市场上主要是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集团经营战略, 以提高国有航运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1993 年组建的中远集团、长航集团、广州海运集团和 1997 年组建的中海集团等, 实行集团经营。1996 年, 上海航运交易所正式成立。中国航运市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允许外国航运公司经营中国开放港口至国内港口间的海上运输; 经批准允许在中国境内组建中外合资的船公司, 经营沿海和内河运输; 经批准外国船公司可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航公司, 经营有关运输业务。

**建设成就** 中国从事国际航运的船公司已 310 多家, 沿海运输的船公司 1300 家, 内河运输的船公司 5100 家, 从事国际船舶代理的代理公司达 190 多家。民用船舶 36 万艘, 5000 多万载重吨。从事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船舶 2300 多万载重吨。从事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船公司 150 家, 拥有船舶 1080 艘 30 万多箱位。其中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拥有船箱运力居世界第五位。中国国际班轮航线已发展到 145 条, 基本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际

班轮运输网络。经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水路运输企业 120 多家, 境外航运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 350 多家, 外商独立船务公司 18 家、分公司 54 家。中国已同 52 个国家签订了海运协定。中国已跻身世界航运大国的行列, 连续 5 届当选联合国海事组织 A 类理事国。

1997 年, 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 13 多亿吨, 其中上海港吞吐量达 1.6 多亿吨, 为世界超亿吨的大港之一。秦皇岛港煤炭年装船能力 1 亿多吨,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力源输出港。到 1998 年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 10 多个, 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600 万吨, 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门类齐全、配套设施比较完整、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港口运输体系。

中国建立了较完善的水运支持保障体系: 水上安全管理覆盖全国水域, 海上救助打捞力量比较雄厚, 已成为世界上可数的海上专业打捞力量; 船检服务网络遍及全球各主要港口, 成为具有实力的国际型船级社; 交通专用卫星长途通信网可覆盖水路系统主要部门和单位; 通信导航系统可为海上航行的船舶提供高效可靠的通信保障; 修造船基地拥有修理 15 万吨级的浮船坞和 15 万吨级修船码头的的能力; 建立有港机制造基地, 其中上海振华港机公司为国际同类制造商的前三名, 已建立和完善水运法律规章体系。

中国水运科研工作主要围绕水上运输、港口和航道建设、安全管理等关键技术, 取得了一批高科技成果, 水运系统的信息化、网络化的“国际集装箱运输 EDI 示范工程项目”和正在实施的“金交”工程, 造就了一支技术结构比较合理的科研队伍和技术带头人。

中国已初步建立以港口为枢纽, 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远洋运输、沿海运输、内河运输、江海直达、江海联运, 干支直达、干支联运、水运陆联运、多式联运系统以及船舶种类齐全和较完善的水运支持保障系统的水运体系。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由于在内河上拦河筑坝、架设跨河桥梁等原因, 内河资源没有综合利用, 使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由 1962 年的 16 万公里缩短到目前的 11.1 万公里。

#### 推荐书目

王展意主编:《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9。

shuishou zhidu gaige

税收制度改革 (reforms in taxation system)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的税制变动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0~1982 年), 涉外税制建立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除关税之外, 涉外税收体系几乎是零。1980 年 9 月 10 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9 月 16 日公布施行, 1981 年 12 月 13 日, 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段时间, 对一些原有税法中的有关涉外问题也作了相应规定。这就初步建立起中国的涉外税收体系, 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第二阶段 (1983~1984 年), 主要是为了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 变革旧的单一税制, 建立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征收的复合税制。改革是通过两步利改税实现的: 1983 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 建立了国有企业所得税制; 1984 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 全面变革了工商税制, 建立起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辅之以资源税等税种的、调节功能较为全面的新工商税制体系。第三阶段 (1994 年起), 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再次全面变革了工商税制, 推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工商税制新体系。经过这次改革, 中国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

#### 推荐书目

张忠诚主编:《中国税收制度改革》,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京, 1994。

Shuo-Huang Tielu

朔黄铁路 (Shuozhou-Huanghua Railway)

联结西北与华北地区的铁路干线。朔黄铁路是一条以国家投资为主, 由地方政府部分筹资修建的地方铁路, 是中国跨世纪特大工程——神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起山西朔州 (神池南站), 东至河北黄骅市 (黄骅港), 总长 588 千米, 为国家 I 级双线电气化干线铁路。总投资 166 亿元。与包神铁路、神朔铁路相连, 构成全长 1029 千米的神华铁路, 把陕西、内蒙古南部大型能源基地和渤海湾海口联结起来, 成为西煤东运的第二条大通道。近期运输能力 6000 万吨, 远期可达 1 亿吨。一期工程山西神池至河北肃宁段 (双线) 预计到 2000 年上半年建成, 在肃宁县境内与京九铁路接轨。二期工程肃宁至黄骅港段 (单线, 预留双线) 将于 2003 年建成。

Simayi Aimaiti

司马义·艾买提 (1935~ ) 政

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委员。维吾尔族。新疆策勒人。1935 年 9 月生。1952 年在新疆和田土改训练班学习。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在新疆策勒县开展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1954~1963 年, 任共青团新疆策勒县四区工委书记、县工委书记, 中共策勒县委副书记, 策勒县县长。1960~1962 年,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学习。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66 年~1972 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教政治部副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文教卫生组组长。1972 年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长,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1985 年 10 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 年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族委员会副主任。1993 年 3 月, 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siying gongshangye shehuizhuyi gaizao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把民族资产阶级私有的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比个体经济先进, 但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 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没有实行没收的办法, 而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用和平赎买的办法, 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 逐步进行改造 (见赎买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在与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条件下, 通过说服教育和必要的适当斗争, 使他们从剥削者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49~1953 年是节制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阶段。在国家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形成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1955年是对私营工商业逐个进行公私合营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阶段。到1955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已经公私合营,余下的也是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1956年3月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质上是一个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过程。由于这一改变过于急促,工作中出现了公私合营面过宽,改组过多、对原工商业者使用处理不当的缺点和偏差。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 Sixiang Zhanxian Wenti Zuotanhui 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Forum on the Ideological Front)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在北京召开的解决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领导涣散软弱问题的座谈会。会前,邓小平于1981年7月17日同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指出了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等涣散软弱问题,指出了思想战线上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及其核心。

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宣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宣传部长和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及部队有关机构共320多人参加了会议。王任重主持会议,胡耀邦、胡乔木、习仲勋等到会讲话,会议采取分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的方法,学习、讨论邓小平1981年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

8月3日,胡耀邦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邓小平7月17日谈话的基本点、核心是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对于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必须理直气壮地进行严肃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要按照四项基本原则清理一下最近以来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发表、出版的言论和作品,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错误的东西加以批评。

8月8日,胡乔木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自由化思潮的特征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竞选制,资产阶级的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思想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胡乔木还就自由化思潮怎样影响着党内,形成党内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怎样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怎样对待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进行了分析阐述。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统一了党内对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对于批评思想战线上的不良倾向,解决党组织的涣散软弱状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 Si Xia

**斯霞** (1910~ ) 教育家。女。浙江诸暨人。1910年12月生。1922年入杭州横河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历任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嘉兴县集贤小学、萧山县湘湖师范学校、南京东区实验小学、中央大学实验小学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献身教育事业,积极参加小学学制改革试验,自编教材,总结和创造出一系列有成效的语文教学方法。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和1979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保卫儿童委员会理事等职。教学经验收入《斯霞教育经验选编》。著作有《我的教学生涯》、《斯霞文选》。

### Sichuan Ertan Shuidianzhan

### 四川二滩水电站 (Ertan Hydropower Station, Sichuan)

中国20世纪建成投产的最大的水电工程。位于金沙江和雅砻江的汇合处。1982年,当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向中央建议把二滩水电站列为全国能源建设的重点,列入“六五”计划,还提出了工程建设改革

开放的思路:采取国际合作的方针,聘请国外技术顾问,采用投标方式,引进先进施工技术,争取利用外资等。1989年二滩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由于建设资金供应不足和在与国际施工管理方式接轨中遇到的问题,工程建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在国家计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正式组建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把原来工程建设指挥部式的项目管理体制变成了以公司董事会为法人的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1991年8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二滩水电站工程土建国际招标合同的签字仪式。

二滩水电站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四川省投资公司、四川省电力局三方合资,并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兴建,由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院设计,总投资285亿元。主要土建工程实行国际竞争招标。1998年8月12日下午,首台55万千瓦发电机组正式并网试运行,1998年10月第一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水电站将于2000年6月工程全部竣工。

二滩水电站是引进世行单项贷款额度最大并在全国第一个全面采用国际招、投标制的工程,是中国在建基本建设项目中仅次于三峡工程的巨型项目。总装机容量达330万千瓦,安装6台55万千瓦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170亿千瓦时,多项技术指标居世界前列。高240米的溢流式双曲拱坝是目前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坝。投资巨大,静态投资104亿元,比原来概算减少1亿多元人民币,动态投资285.5亿元,比1995年核查时减少了58.6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9.3亿美元,是世界银行自成立以来对单一项目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二滩水电站工程引来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工程承包商、制造商和供货商,其坝工技术、施工难度及其管理水平,均代表着目前世界水电界的最高水平。亚洲最大的地下厂房,在电站左右的山体中开挖有宽大的主机室、高压器室和交通洞通风洞、导流洞、尾水洞、排水洞、过木机洞等,共同组成了庞大洞室群。电站的单机容量、电站总容量及年发电量,均居全国水电站首位。

二滩水电站对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四川地区的电力紧张问题;能够滚动开发雅砻江丰富的水力资源,二滩水电站是建在雅砻江上的首座电站,雅砻江仅下游412千米的河段上,可规划5个梯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可达1235万千瓦。二滩水电站建成投产以后,除正常还贷

外, 平均每年至少可上缴税利 7 亿元, 每年可积累滚动开发基金 5 亿元以上, 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很强的后续开发能力。

sige xiandaihua

**四个现代化** (Four Modernizations)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远奋斗目标。1954 年 9 月,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 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首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上再次提出了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交通运输的目标。到 1963 年 1 月 28 日,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上, 把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确定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 年 12 月 21 日,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 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设想。1975 年 1 月 13 日,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

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工业现代化是指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手段装备工业, 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管理工业。它是实现其他三个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农业现代化指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手段装备农业, 用现代先进科学方法管理农业。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防现代化是用现代最先进的技术、军事装备武装部队, 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人民军队和国防设施。它的发展是以其他三个现代化为条件, 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 又为其他三个现代化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科学技术现代化是要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接近并在多数领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受到了严重干扰。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作出了把中共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此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 把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并把它载入同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 又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提出了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siqing yundong

**四清运动** (Four Cleans campaign)

1963~1966 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并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 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 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 开始以清理帐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为主, 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都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 统称为“四清”。“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 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 党内广大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特别是 1965 年初又错误地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 1965 年 12 月, 全国约有 1/3 的县、社进行了“四清”。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Sirenbang

**“四人帮”** (“Gang of Four”)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4 人结成的反革命联盟。见江青反革命集团。

Si San Fang'an

**“四三方案”** (“Four Three Plan”)

1973 年国家计委制定的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计划。因总预算金额为 43 亿美元而得名。

70 年代初, 世界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和中国重返联合国, 许多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 开始批判“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1 年国际市场上工业设备价格便宜, 而中国还没有自己制造大批化纤设备的能力,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有利契机, 组织筹划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化纤技术设备。1972 年 1 月 22 日, 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 4 套、化肥设备 2 套, 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 约需 4 亿美元。2 月 5 日, 周恩来批准了报告, 并强调对国外先进技术要在消化、吸收后, 再创新、改造。8 月 6 日, 国家计委又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 月 21 日, 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 月 7 日, 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 建议进口 23 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圈阅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 又要求将总额 33 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 准备安排一个大规模引进方案。

经过李先念、余秋里等人的组织筹划, 1973 年 1 月 5 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报告建议, 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 引进设备对中国有利的时机, 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预计金额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10 个烷基苯工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 个大电站、武汉钢铁公司 1.7 米轧机, 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以后, 在此方案基础上, 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 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51.4 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 中国先后兴建了 26 个大型工业项目, 总投资额约 200 亿元。到 1982 年, 26 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有: 武钢 1.7 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



期工程、辽阳石化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是中国继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工程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它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经济工作的全面开展，使外贸、金融及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开展对外交流的高潮。

siwu yundong

**四五运动** (April Five movement)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正确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人民群众无限悲痛，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四人帮”却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借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紧对邓小平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攻击。人民心中积蓄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同年3月5日，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竟把稿中原有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删去。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句子，人们感觉到这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忍无可忍地行动起来。从3月下旬起，北京、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先人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广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在北京，人民群众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4月4日是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当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决定：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再去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结果发现所有的花圈、诗词均无踪影，

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也布上了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对此，人们异常气愤，于是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另一部分民兵、警察和军人发生严重冲突。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亦着火，群众、民兵和警察中均有人受伤。造成这种过激行动的责任完全在“四人帮”。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当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声言“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命令群众“立即离开广场”。11时左右，一万多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滞留在广场的群众。

4月6日凌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次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以后，全国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清查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许多人由此被拘捕或判刑。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决策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及同时期的其他抗议“四人帮”活动彻底平反。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sixiang jiben yuanze

**四项基本原则**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回答和解决了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何种国体，由谁领导，用什么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等立国治国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是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政治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以此为题所作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981

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四大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是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摆脱剥削和贫穷，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坚持我国的国体，是不可动摇的一项政治原则。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大多数人实现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新型的民主和专政，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坚强的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在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能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坚持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谈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十五大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项基本原则有了新的

四项基本原则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项都不能动摇。

siyou xinren

**四有新人** (new people with the four qualities)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简称。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发展过程** 邓小平在1982年7月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这个要求后来写入了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要求“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的重要内容，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江泽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

**主要内涵** 有理想，就是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道德，就是要树立和发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文化，就是要自觉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发扬依靠科学、追求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有纪律，就是要增

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养成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

Song Jian

**宋健** (1931~ ) 中国控制论专家。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山东荣成人。1931年12月29日生。1945~1948年任山东威海卫市政府通讯员、收发员、农村工作队队员。1948~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1953~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学习，获副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控制论研究室副主任，七机部二十六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1966~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以后历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七机部总工程师，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Song Ping

**宋平** (1917~ )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山东莒县人。1917年4月24日生。1934年起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学习。1936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曾任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科长、教育处处长，中央党务研究室秘书，中共南方局宣传部助理秘书，重庆新华日报社资料室主任、编辑部秘书长、秘书长，新华社重庆、南京总分社负责人，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1946年在哈尔滨市任中共区委副书记兼警备大队政治委员，市总工会公营企业部主任、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195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计划局局长，同年9月兼任劳动部副部长。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196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兰州

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7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同年12月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6月后任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1年后，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6月，任国务委员。后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98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0年11月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92年10月后，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Song Qingling

**宋庆龄** (1893~1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1893年1月27日生。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留学，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于，获文学学士学位。她了解到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及国内政局的变化，毅然决定去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0月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1916年孙中山回国领导革命，她陪同孙中山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进行反袁、护法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她按照孙中山的授意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热烈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爆发后，她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支持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孙中山决定统一两广、出兵平定广西，她在广州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梧州前线慰问出征的战士。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她掩护孙中山离开险地，表明了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之后，她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多次会晤、商谈，并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

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她毅然随行。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她强忍悲痛，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他的遗嘱，并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

1926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历任国民党第三、四、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1月，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她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多次发表通电、声明和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八一南昌起义时，被推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她毅然同蒋介石决裂，积极支持共产党人的斗争。

1927年8月底至1931年，先后到达苏联和欧洲，积极从事国际反帝和保卫和平的工作，曾多次当选为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1931年回国后，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34年带头签名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与何香凝等率先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6年5月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937年6月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西安事变时，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在广州、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与儿童保育工作，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后，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谴责国民党到倒行逆施、破坏团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转移至重庆继续抗日工作，联络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

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任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资帮助。

1948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7月1日，应邀出席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集会，并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演讲。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后任会长。1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以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0年11月在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将10万卢布奖金全部献出，用于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11月，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52年10月又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获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2月，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3月，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吸收她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宋庆龄选集》。

#### 推荐书目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1987。

#### Song Qingling Xuanji

《宋庆龄选集》（*Selected Works of Song Qingling*）宋庆龄重要著作集。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出版，共两卷。《选集》是为纪念宋庆龄诞生100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宋庆龄基金会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的。胡绳担任总校阅，爱泼斯坦任顾问。编者从宋庆龄基金会多年收集到的600多件文稿中，选

录了宋庆龄在1912年至1981年间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讲演、文电、书信等358篇。

《选集》忠实地记录了宋庆龄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她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反映了她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反映了她在发展同各国人民友好的关系，保卫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了她对社会福利、儿童教育、海外侨胞联系及妇女工作等方面的深切关心和卓越贡献。此书收录的主要文献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论中国女权运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实现孙中山的遗嘱》、《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性质及其任务》、《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保卫儿童》、《在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上的演说》、《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纪念伟大的列宁》、《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和平、进步、正义》、《解放十六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等。

#### Song Renqiong

宋任穷（1909～）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湖南浏阳人。1909年7月11日生。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区特支书记、中共区委委员、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浏阳工农义勇队中队党代表。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连支书、营文书、营士兵委员会主席，红四军32团连党代表，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出击途中，他同部队失去联系。后到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2月率部分士兵起义参加红军，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103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38师、45师、13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政治委员兼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曾与陈赓指挥该团一部抢先控制金沙江绞平渡口，使红军顺利渡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

截。后参加强渡大渡河等战斗。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随部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对日军作战。1938年3月率骑兵团到冀南，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2年任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参与领导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1944年后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又称平原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组织工作。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1949年底赴西南地区。1950年任解放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第三、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参加了中国核工业的创建和原子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4年底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被解除领导职务。1977年恢复工作，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78年2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了平反大批冤假错案的工作。1980年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宋任穷回忆录》。

Song Tao

**宋涛** (1914~ ) 经济学家。原名侯锡九。安徽利辛人。1914年12月15日生。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后，先后在晋察

冀边区中学和华北联合大学任教。1948年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先后担任华北大学一部区队长、天津分校主任。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后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1983年起任该系名誉主任，校学术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经济研究》编委、副主编，1980年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还被选为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多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主编有：《政治经济学教程》、《政治经济学》（上、下卷）。

Su Buqing

**苏步青** (1902~ ) 数学家，教育家。政协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平阳人。1902年9月23日生。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0年至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系学习。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学训导长。1941年后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首届院士兼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数学学报》总主编。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教务长，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教务长。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数学年刊》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委员，全国人大六届常委会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197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获国家科学进步奖。199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章。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方面的科研、教授及教育领导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早期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40~50年代是中国K展空间研究的开拓者和古典微分几何研究的浙江大学学派创始人。

60年代研究高维空间共轭理论，获得成就。70年代开创了计算几何的研究方向。发表研究论文约170篇，有专著和教材20多种，主要著作收入《苏步青数学选集》。

Sulian yijiao Zhongguo Changchun Tielu he Lüshun Haijun Jidi

**苏联移交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海军基地** (Soviet Union handing over the China Changchun railroads and Lüshun naval base to China) 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于1952年底将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和共同使用的旅顺口全部移交中国。

中国长春铁路包括两条干线，一条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一条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全路通车线路长3000多千米。原为沙皇俄国侵略者强行修建，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至大连段为日本侵略者占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依照《雅尔塔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由中苏共管。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确定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口移交中国。1952年12月31日，中苏双方代表在哈尔滨签署了完成移交中国长春铁路的最后议定书，并将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移交后这条铁路分别称“滨洲铁路”、“滨绥铁路”、“哈大铁路”。关于旅顺口，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战争尚在进行，苏方同意中方要求，延长撤出旅顺口的期限。1954年10月，鉴于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国防力量增强和国际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趋于缓和，苏方提出将旅顺口移交中国。经双方商定，此项工作于1955年5月31日完成。关于大连，双方原定在中苏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后经中方提议，双方于1950年末签署议定书，苏联于1951年初提前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移交中国。

Su Xing

**苏星** (1926~ ) 经济学家。原籍山东莱阳，1926年2月15日生于热河省建平县（今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1946年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政治系，1948年毕业后在华北联大和北京大学作研究和思想工作。1950~1958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1959年后历任《前线》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红旗》杂志社经济组副组长、组长、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此外还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副理事长，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价格改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城市住宅及住宅商品化等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1954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曾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1957年撰文提出城市住宅具有商品属性，主张改革住房制度和房租政策。1980年发表的《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一些》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主要著作有：《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薛暮桥合著），《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主编之一），《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城市住宅问题》。

#### Su Zhenhua

**苏振华**（1912~1979） 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七生。湖南平江人。1912年6月2日生。1930年11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连政委、团政委，参加了长沙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兼鲁西军区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委。后任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后新的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参与领导冀鲁豫边区挫败日伪军“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犯的斗争，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后兼任司令员）、第五兵团政委。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渡江、进军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委、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54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海军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解除一切职务。恢复工作后，于1973年1月任海军第一政委，后任中央军委常委，曾参与指挥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76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2月7日逝世。他是

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Suzhou Gongye Yuanqu

**苏州工业园区**（Suzhou Industrial Park） 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联合在苏州市城东金鸡湖地区开辟的一个工业园区。工业园区享受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其目标是在苏州建设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相配套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1994年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首期开发8平方千米。园区内设立外资、中外合资的金融机构和中外合资、合作商业零售企业，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吸收新加坡发展经济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1994年2月26日，由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国务院和江苏省政府积极支持园区的开发与建设，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和物质帮助。国务院批准了工业园区首期8平方千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国家计委将园区内水、电、气、污水处理4项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家计划，提供3亿元贷款规模；中国银行向园区提供1亿元动迁安置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海关总署确定在园区内进行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试点，并颁布海关监管条例。江苏省政府把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重点，赋予园区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以及有关特殊政策。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方面，苏州工业园区真正实现了“两先两后”的原则，即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为了确保规划的实施，园区先后编制了十余项管理办法，并建立了依法治园的规划管理体制和以法律为准绳的监督机制，严格按照规划组织各项建设，既确保了规划的切实实施，又保证了园区基础设施的高水平和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在管理模式方面，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借鉴新加坡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建立了一套新型的政企分开、行政管理和开发主体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府与企业建立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初步形成了与国际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投资环境。园区内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增加企业负担；企业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不要求政府担负其他责任。园区对外商需要解决

的问题，尽可能地按国际惯例办事，基本做到办事程序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手续简便。宽松有序的投资软环境有利于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速度。截至1998年底，苏州工业园区已基本完成首期开发区的开发建设，累计实现协议外资4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4.69亿美元，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27家。一个高水平、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兴城市型综合开发区已初具规模。

#### Su Ziheng

**苏子衡**（1905~） 化学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台湾省彰化县人。1905年10月生。1927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同年回到台湾，任工厂工程师。1941年到祖国大陆，任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1945年到解放区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研究所主任兼研究员，在解放区开创化学实验工作。1949年任大连大学化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旅大特别支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数理化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感光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在菲那西汀的合成，羰基化合物的催化加氢，照像胶片用增感剂、稳定剂、防灰剂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1979年后历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届总部理事会副主席，第三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名誉主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和第四、五、六、七届常委。

#### suqing fangeming yundong

**肃清反革命运动**（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1955~1957年进行的肃清暗藏在党政军和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1955年4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后，5月12日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批示：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目的不仅是要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而且主要地是借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肃反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为了领导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陆定一为组长、罗瑞卿为副组长的“中央五人小

组”，不久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党政军机关、工矿企业也一律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专门机构。肃反运动历时两年，运动之初，工作重点主要是消除各级领导的右倾麻痹思想，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当肃反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后，为了防止出现“左”的偏向，10月23日毛泽东指出，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倾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健康地发展。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肃反，从党政军内部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通过运动审查了一批干部，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但是，肃反过程中也出现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向。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总结肃反运动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因而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Su Yu

**粟裕**（1907～1984）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会同人。侗族。1907年8月10日生。曾就读于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5月参加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24师，同年6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随军转战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和历次反“围剿”。1934年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转战闽浙赣皖边。后与刘英率余部500余人挺进浙南，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后任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协助陈毅领导开辟了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黄桥等战役战斗。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中区委书记，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频繁“扫荡”和“清乡”，建成巩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率部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指挥车桥战役，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同年12月率所部主力南渡长江，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兼苏浙区委书记，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

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曾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还参与指挥了宿北、鲁南等战役，后在陈毅统一领导下，又指挥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1948年指挥了豫东、济南战役。11月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翌年的渡江战役，后又组织指挥了上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4年2月5日逝世。

Sun Daolin

**孙道临**（1921～）电影演员、导演。北京人。1921年12月18日生。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中间辍学，参加一些剧团的演出，1945年回燕京大学，1947年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近20部影片中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主要有：《渡江侦察记》、《家》、《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早春二月》、《李四光》等。1984年改编、导演《雷雨》，并饰演周朴园。1986年编导并主演影片《非常大总统》。还为20多部译制片配音。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在电影表演中，善于从生活出发，体验角色思想感情，着力刻画人物性格，表演质朴深沉，真实自然。

Sun Fuling

**孙孚凌**（1921～）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浙江绍兴人。1921年9月生。1938～1940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学习。1940～1941年任滇缅公路局昆明西站职员。1945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经济系。后任重庆天府煤矿营运处办事员，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办事员、科员、专员，淮南煤矿矿路公司下关煤厂课员，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8年后，任中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北京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是政协第二届至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名誉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

Sun Jiadong

**孙家栋**（1929～）火箭和卫星专家。1929年4月7日生于辽宁复县。1948年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业学院飞机设计专业，获金质奖章。回国后从事火箭导弹总体研究设计工作。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航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副部长。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首批中国院士。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战略导弹、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系统工程的技术领导工作。担任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领导完成导弹总体设计；主持完成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并领导了多种卫星的研制和发射的技术管理工作，在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上发挥了指导的决策作用，为中国突破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关键技术做出重大贡献。他担任中国第二代主要应用卫星航天工程大系统的总设计师，负责整个工程大系统的技术决策、技术指挥和技术协调。是中国人造卫星技术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是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主要获奖者之一。1985年后还任中国对外发射服务商务代表团团长，领导开发国际航天市场工作。是政协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Sun Jian

**孙健**（1936～）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河北定兴人。1951年入天津内燃机厂作学徒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天津内燃机厂生产组长、车间主任、保卫科长、厂团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劳动标兵、红旗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称号。1967年后，历任天津市机械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

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被免去职务，回天津工作。1985年后任天津机械厂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机械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经营经理。

#### Sun Junren

**孙俊人** (1915~ ) 电子学家。江苏松江人。1915年11月15日生。1934年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8年赴延安，任通信学校教员、通信器材厂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张家口工程学校一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副院长、通讯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四机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电子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在培养中国电子科技人才，开创和发展电子工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主持编写有《中国电子工业生产技术手册》。

#### Sun Li

**孙犁** (1913~ )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13年4月6日生。在中小学读书时，爱好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冀中从事抗日宣传、教育、文化工作。3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1941年参加编辑《冀中一日》。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研究与教学，发表《荷花淀》等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参加土改，写出《嘱咐》等一批小说、散文。1949年1月随军到天津，负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50年代创作《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小说。1958年出版的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其中《荷花淀》等作品，以清新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引起强烈反响，带动了当时文坛的一股潮流，称之为“荷花淀派”。1977年以后主要写作散文和评论，有《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耕堂杂录》等。《孙犁散文选》于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1982年，作者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作品辑成《孙犁文集》出版。是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历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 Sun Qimeng

**孙起孟** (1911~ )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安徽怀宁

人。1911年3月生。1927年入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1930年后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教员。1934年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秘书。1935年后任上海《申报》周刊编辑，广州《星粤日报》副总编辑。1938年后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1942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主任。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6年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比乐中学校长，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校长。致力职教事业，支持和平民主。1949年代表民建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兼总干事、理事长，《教育与职业》杂志社社长，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1987年12月任民建中央主席。1988年12月被推举为全国工商联顾问。是民建第四、五、六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Sun Xiaocun

**孙晓村** (1906~1991)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浙江余杭人。1906年11月11日生。192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史地系。1933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兼《中国农村》月刊发行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1935年后投身抗日民主运动，为南京救国会负责人之一。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务理事。11月，因救国会“七君子”案被捕入狱。1937年9月出狱，任职于经济部农本局。1938年任江西调整米谷联合办事处协理。1939年起在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从事二线屯粮工作，先后任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专员、粮食管理处副处长、军粮巡回督察团主任、省际贸易联合办事处总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上

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副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常委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秘书长，第三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主编有《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1991年5月4日逝世。

#### Sun Yefang

**孙冶方** (1908~1983) 经济学家。原名薛萼果，字勉之，曾用名宋亮、孙宝山。江苏无锡人。1908年10月24日生。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毕业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回国后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他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主要学术贡献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以独具特色的产品价值理论为基础，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高准则；计划应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流通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生产关系也应进入流通领域，纳入商品轨道；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应按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来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关系；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用平均利润率来考核企业。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制定产品价格；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加速企业设备更新。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1983年2月22日逝世。

# T

## Taiwan Minzhu Zizhi Tongmeng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简称台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台盟 1947 年 11 月于香港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切阴谋活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要求实行人民民主制度。1948 年 5 月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 年 1 月发表声明，拥护中共 8 项和平主张。9 月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盟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政治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前，台盟团结、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和反对外国分裂祖国的活动贡献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台盟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台盟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并于 1979、1983、1987、1992、1997 年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全盟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接待台胞、为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台盟总部（后为中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历届主席为谢雪红、蔡啸、苏子衡、林盛中、蔡子民、张克辉。

Taihu zonghe zhili  
太湖综合治理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the Taihu Lake) 治理太湖流域水系的一系列工程的总称。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部，以太湖为中心、黄浦江为主要泄水道的太湖流域总面积为

3.7 万平方千米，跨苏、浙、沪三省市。流域内春夏梅雨面大量广，夏秋台风雨强度集中，由于河流比较小，长江口潮位顶托，缺少天然骨干河道，极易形成流域洪涝灾害。1991 年 9 月，国务院召开的治理太湖工作会议决定“八五”计划期间进行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太湖综合治理上游区以防洪为主兼治涝，下游区以除涝为主兼流域排洪。治理规划包括太浦河治理、望虞河治理、杭嘉湖南排工程、环湖大堤修筑、湖西引排工程、红旗塘、东西苕溪防洪工程、武澄锡引排工程、拦路港扩大工程、泖河及斜塘和杭嘉湖北排通道 10 项骨干工程，同时加强平原河网和圩区建设。太湖综合治理工程于 1991 年底开工。综合治理完成将使太湖流域形成具有防洪、除涝、供水、航运、水资源保护和改善水环境等综合效益的流域工程体系。

Tan Jiazhen  
谈家桢 (1909~ ) 遗传学家。

浙江宁波人。1909 年 9 月 19 日生。1930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0~1932 年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异色瓢虫鞘翅色斑遗传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23~1934 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34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于 1936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 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生物系，继续从事果蝇和瓢虫方面的研究。1952 年起在复旦大学工作，历任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和校长顾问。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中美技术合作公司 (CTC) 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第 15 届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自然博物馆馆长，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性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未利用植物开发委员会委员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 年被美国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称号。1934 年他在多布然斯基教授指导下从事果蝇进化遗传研究，利用当时研究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最新方法，分析了果蝇近缘种之间的染色体差异和染色体的遗传图，促进了“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在美国工作期间，先后单独或与美、德等国科学家合作发表论文 10 余篇。1946 年在亚洲异色瓢虫中发现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现象，受到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著有《谈家桢文选》。

Tan Qixiang  
谭其骧 (1911~1992) 历史地理学家。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 年 2 月 25 日生于奉天府 (今辽宁沈阳)。1930 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2 年起历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兼职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34 年协助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刊。1940 年起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一版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任《历史地理》主编，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1992 年 8 月 28 日逝世于上海。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代疆域、政区、都市、河流湖泊的变迁，海陆变迁，人口、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历史地理古籍注释，地理学史等方面。发表的百余篇具有独到见解和新鲜结论的论文，多收入《长水集》中。

Tan Shaowen  
谭绍文 (1929~1993)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成都人。1929 年 7 月生。1948~1952 年先后在成都铭贤学院纺织工程系、西北工学院纺织工业系学习。毕业后到天津国棉 3 厂、天津纺织工业学校任技术员、教师、机织科副主任。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以后历任河北纺织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天津纺织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1 年后任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1988 年任天津市第八届政协主席。1989 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1992 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 年 2 月 3 日病逝。

Tan Zhenlin  
谭震林 (1902~1983) 中共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湖南攸县人。1902 年 4 月 24 日生。早年当过印刷工人、书店学徒。1925 年



在茶陵县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后历任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第四纵队政委，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1932年调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组建地方武装配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受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错误打击。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政委，创建皖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调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兼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1943年调任新四军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等职，参与领导华东地区解放战争。曾先后协同粟裕取得苏中七战七捷、济南战役的胜利，与许世友指挥部队配合外线兵团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他是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五位成员之一。1949年4月兼任第七兵团政委，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皖浙赣广大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二办主任。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当选为书记处书记，五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坚决抵制林彪、江青等“打倒一切”。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当面斥责张春桥等，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遭到迫害。1974年恢复工作。1975年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中共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3年8月30日病逝于北京。

#### Tan Zheng

**谭政** (1906~1988) 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世名，号举安。湖南湘乡人。1906年6月14日生。曾先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9连任文书、书记。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

一团政治部分队长，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军）第四军31团秘书，红4军军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1930年8月起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红22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和军团政治组织部部长，参加了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指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平津及进军中南诸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委、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年因受林彪陷害，被撤销军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后调任福建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75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79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予以平反。1988年11月6日逝世。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 Tang Aoqing

**唐敖庆** (1915~ ) 物理化学家。江苏宜兴人。1915年11月18日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吉林大学教授、理论化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校长、名誉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1981年后当选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特别是量子化学的研究。50年代起进行有关分

子内旋转的阻碍势函数及高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统计理论研究。60年代后系统地开展配位场理论的研究，得到了从连续群到点群的群分解链；扩大了维格纳—卡特定理的应用范围，建立了一种计算旋轨耦合作用的新方案。70年代，配合化学模拟生物固氮作用的研究，开展了分子氮络合作用的化学键理论研究。在分子轨道形理论的研究中，利用分子图的拓扑性质得到了共轭分子的本征多项式和分子轨道的一般表达式。80年代主要进行分子固化理论与标度研究和原子簇化学的研究工作。多次组织全国性专题研讨班并亲自任课，培养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与其科研集体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次，二等奖一次。主要学术著作有《配位场理论方法》、《分子轨道形理论》、《量子化学》、《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等，发表论文近300篇。

#### Tangshan dadizhen

#### 唐山大地震 (Tangshan earthquake)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地区的强烈地震。

地震震中位于唐山市路南区，震级7.8级，震中烈度高达11度，唐山地区10余个县市遭到7度或以上破坏，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地震袭击后，这座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冀东中心城市化作一片废墟，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伤或致残。整个市区民用建筑破坏率高达96%，工业建筑倒塌或严重破坏的约70%~80%。50%~860%的城市生命线工程也遭到严重破坏，道路开裂，铁轨变形，桥梁倒塌。在地震铁路行驶的28列火车，有7列脱轨颠覆。全市供水、供通讯、交通中断。出现长达8千米、宽30米的地裂缝，伴有喷水冒砂。地震使北京、天津两市也受到严重影响，波及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1/3的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4亿人露宿户外，躲避再次地震。

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立即开始自救，从废墟中扒挖被埋人员，抢救伤员。早晨，唐山驻军发出的电报传到北京，8时，驾车前来的开滦煤矿工人李玉林等人和从唐山驾飞机前来的空军某团干部进入中南海，直接向国务院报告灾情。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了向唐山派出救灾部队和其他抢险队伍的决策，并紧急部署了全国的抗震救灾工作。上午10时，北京军区负责人乘飞机抵达唐山，随后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基建

工程兵和各军(兵)种、大军区所属医院的10万名指战员参加了唐山抗震救灾。北京军区某部一营当天上午就赶到灾区进入抢救工作。当日,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并召开了有铁道部、邮电部、卫生部等参加的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30日,中央慰问团到达唐山,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铁道兵顽强奋战,仅用10天时间,就使京山线恢复通车。截至8月25日,共计有159列(次)火车,470架(次)飞机,将10万多名伤员运往各地。各地的救援物资也源源不断运到唐山。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和军用防化车、喷药飞机、大批药品器械投入防疫工作,使唐山传染病发病率比常年还低。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1个月后,灾区人民的生活已得到了妥善安排,铁路、公路全部通车,农业生产也转入正常。抗震救灾工作结束后,唐山人民又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迅速恢复了生产。现在,一座新唐山又矗立在河北平原上。

#### 推荐书目

卫一清、丁国瑜主编:《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

迟浩田:《“7·28”唐山抗震追忆》,《人民日报》,北京,1994年7月28日。

#### Tang Tao

**唐弢** (1913~1992) 鲁迅研究家、文学史家、散文家。原名唐端毅。浙江镇海人。1913年3月3日生。1933年开始写作散文和杂文,风格近似鲁迅。曾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编辑过《文艺界丛刊》、《周报》、《文汇报》副刊《笔会》。主要成就是杂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9年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92年1月4日去世。曾当选为中国作协第二至四届理事,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作品有:《椎背集》、《海天集》、《繁弦集》、《海山论集》、《晦庵书话》、《鲁迅论集》、《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还发表了一些现代文学论文,受到推崇。

#### Tangu Xingang

**塘沽新港** (Tangu New Harbor)

中国北方第一大海港,全国最大的人工海港之一。

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后,在市区海河沿岸形成港区,是为老港。1939年日本为了侵华需要在距市区50千米的塘沽海河口建设新港,始称塘沽新港。当时可停靠3000吨级轮船,国民党统治时期日益淤塞。1951年8月政务院决定恢复和扩建塘沽新港并随即开工。1952年10月完工并正式开港。新港能通行和靠泊万吨巨轮,3000吨海轮可经港内船闸直抵天津市区。当时,全国近半数进出口货物在此集散,为中国第一大商港。它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海上封锁、开展国际交往和支持华北及京津地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 Taoyuan jingyan

**“桃园经验”** (“Taoyuan Experience”) 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见《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Tao Dayong

**陶大镛** (1918~ ) 经济学家。曾用名卡奇、大古、石清心等。上海人。1918年3月12日生。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0~1941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1943年任中山大学讲师,1943~1944年任广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44~1945年任重庆交通大学管理系副教授,1945~1946年任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1948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研究。1949年任香港达德学院商经系教授、《文汇报》经济周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新建设》月刊主编,国务院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当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学术研究中,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当代帝国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新民主国家论》、《社会主义

思想史》、《世界经济讲话》、《马克思经济理论探索》。

#### Tao Shiyue

**陶峙岳** (1892~1988)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名陶纪常,字岷毓。湖南宁乡人。1892年9月18日生。1911年赴武汉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堂,参加武昌起义,入同盟会。1914年秋,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北苑陆军第八师受入伍训练,充任军官递补生。1915年春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秋毕业后,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团长、副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任国民党军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第七十七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任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1940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1年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2年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秋调任酒泉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1946年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总司令。同年夏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25日率部在新疆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79年任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是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逝世。

#### Tao Zhu

**陶铸** (1908~1969)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湖南祁阳人,1908年1月16日生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入黄埔军官学校,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辗转回到湖南做兵运工作。1929年后,在福建从事中共党的秘密工作,担任中共福建省军委秘书,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0

年冬，奉命到漳州重建中共闽南特委，任特委书记，主持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后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领导建立了闽东地区人民革命武装力量。1933年3月奉令到上海工作。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和南京中央监狱，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10月，被派往中共湖北省委，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对鄂中各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鄂中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后，参加创建鄂中游击区，任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3月赴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到达沈阳，就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同年12月建立了辽西省委，出任辽西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积极配合部队抗击国民党军队。1947年4月，组成西满军区野战军（后改为第七纵队），任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与彰武攻坚战。同年11月，率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沈阳，与友邻部队乘胜解放沈阳。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辽沈战役后随军南下，参加平津战役。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后又担负改编起义部队和组织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6月，奉调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积极保护干部和群众，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与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于1967年1月遭到江青等人诬陷迫害。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逝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

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teshe zaiya zhanfan

### 特赦在押战犯 (amnesty of war criminals)

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原属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伪政权的确已改恶从善的在押战争罪犯。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建议：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19日，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令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名，其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30名，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2名，原属于“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1名。此后，1960年11月、1961年12月、1963年3月、1964年12月，又分别特赦了第二批50名、第三批68名、第四批35名、第五批53名战争罪犯，并对他们的生活出路作了妥当的安排。1975年3月，特赦释放了293名在押全部战争罪犯。

Teng Daiyuan

滕代远 (1904~1974)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湖南麻阳人。苗族。1904年11月2日生。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沙近郊区区委书记、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28年7月，与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党代表兼第十三师党代表，参与领导开辟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红五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后，任红四军副党代表。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1933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部长。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夏，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回到新疆。1938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0年5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1942年8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

务委员。1945年12月，参与北平军调处工作。不久赴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谈判。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同年11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后兼任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铁道部部长。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2月1日逝世。

Tiba Peiyang Zhongqingnian Ganbu Shi Dangwuzhiji

###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Selecting and Nurturing Middle-Aged and Young Cadres is a Pressing Task at Present”) 陈云 1981年5月8日撰写的一篇文章，曾印发于同年6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收入《陈云文选》。本文分12点，阐述了抓紧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当务之急的问题。文中指出：①现在省委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不少还是70岁以上，政府各部委领导大体也一样。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我国繁重的领导工作。②中央书记处成立后减轻了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这样下去，断难为继。③自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后，虽然做了若干工作，但总的说，认识不一致，收效不大。④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最后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这对党的事业很不利；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并由老干部传帮带，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⑤许多老干部对中青年干部不放心，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我们要提拔的绝对不是这种人，而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⑥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⑦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的经验丰富，但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只要三年五载，至多十年，一定能锻炼成才。⑧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但也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⑨要提拔的干部，多数应该是40岁左右和40岁以内的人。中央组织部要

成立青年干部局。⑩为了避免提错人，有利于在工作中考察他们，各级组织都应该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助理、帮办等，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凡属向党提的问题，先由他们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这应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制度。⑪十年内乱时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的观点虽受到批判，但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没实现。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常被拒之门外，党应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⑫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退居二、三线后，要在政治、物质待遇上给予保证。老干部应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这篇文章对于克服中国共产党内妨碍大量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错误思想，解决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连续贯彻，发挥了重要作用。

## tiyu shiye

**体育事业** (sports)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增进国民身心健康、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文化事业，属于第三产业。

**起步基础** 中国体育历史悠久，古代已有养生、武勇、游戏等概念。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体育”一词。20世纪初，体育列入学校课程，竞赛活动逐步发展到社会，体育开始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文化事业。1949年以前，中国体育发展十分缓慢。相当一部分学校体育教学形同虚设，社会体育主要局限于大中城市的少数富人中，体育设施简陋，国民体质羸弱，运动水平低下，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50年是曲折发展的50年。

**50年代的体育** 1952年2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全国体总）成立，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和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1956年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成立。到1958年，除台湾省外，全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全都设置了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所属的各单项运动协会、20多个全国产业体协和25300多个基层体协也先后建立起来。

国家体委采取多种形式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先后发布《关于改善各级学

校学生健康情况的决定》（1951）和《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956），制定《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1954），开播广播体操节目（1951）和实行“工间操”制度（1954），分别公布成人、少年和儿童广播体操。到1957年底，全国组织了近18000个职工锻炼小组，22万余人参加“劳卫制”锻炼，14万人达标，参加工间操人数平均达到机关总人数的70%以上，职工中成立了77000余个业余运动队，队员825900人，参加1955年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选拔赛的职工达125万人。

1951年成立“中央体训班”，篮、排球比赛选拔出来的58名男女运动员成为首批国家队成员。接着又在田径（1953）、乒乓球、游泳、羽毛球（1954）、体操（1955）等项目组建国家队。1956年，国家体委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田径、游泳等16个单项的运动员等级标准和《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到1957年，青少年业余体校发展到157所，在校生17920人。1953~1956年，有38000多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49人成为第一批运动健将。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全部刷新并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的全国记录，在举重、女子跳高、男子蛙泳、男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等18个项目中，有39人31次打破世界记录。

1952年中国排除干扰参加了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1954年5月14日，国际奥委会第49届大会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1955年为抗议国际奥委会个别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企图，中国抵制了第16届夏季奥运会；1958年，国际奥委会和一些国际单项运动组织坚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顽固立志，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及某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作与联系。不过，在此期间仍与40多个国家进行了289次、5135人次国际体育活动交往。

50年代，先后恢复和新建一批体育学院、体育系科、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和一批省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创建《新体育》杂志（1950）、《体育文丛》杂志（1956）、《中国体育》（英文版）杂志（1957）和《体育报》（1958）。

**60年代的体育** 50年代末，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不切实际地提出体育事业

发展过高指标，盲目地推广突击开展“双红、四红”运动的所谓经验，给体育事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其后，国家体委对开展群众体育进行适当的控制，集中力量加强重点项目的发展。登山、乒乓球等运动项目获得长足进步。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和四个项目的亚军。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体育工作逐步全面恢复，提倡开展游泳、登山、太极拳等，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射击、通信、航空、航海模型、跳伞、滑翔等国防体育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仅1964~1965年就有2467万人参加射击和通信训练，为空军、海军和民航部门输送飞行学员上万人。60年代，初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形成业余体校、运动技术学校或重点业余体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进一步完善运动员、教练员等级制度，提出“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确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到1965年，有147万少年儿童经过业余体校训练，1000多万人成为等级运动员。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有24名选手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331名运动员496次打破130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选手打破各省市区纪录。同时，积极拓展国际体育活动空间，与50多个国家进行体育交往1000多起，13000多人次；成功地促成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诞生，使国际奥委会认识到第三世界的力量，不得不作出一些改革，推进国际奥委会民主化运动的进程。

**十年挫折时的体育** “文化大革命”使体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1968年发布的“5.12命令”全盘否定了17年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使体育事业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到70年代才得以逐步恢复。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行动打开了中国与美国之间关闭了20多年的大门，成为中美两国复交的起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也先后恢复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国际体育交往增多。但1974年在所谓“反回潮”、“反复辟”，以及“体育革命”的干扰下，复苏不久的体育工作又一次陷入困境。

**80年代的体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79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体育交往更为广泛，作出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的战略调整。1984年提出在本世纪内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确定省级以上的体委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集中力量解决运动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1986年作出《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围绕奥运战略进行领导、竞赛、训练等方面的改革，重点是克服过分集中由国家、体委系统办体育的弊端，以社会化为导向，建立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新体制。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囊括全部7项冠军奖杯；1982年体操运动员李宁在世界杯赛中一人独得6枚金牌；1983年朱建华分别以2.37米、2.38米、2.39米三破世界跳高纪录；1981年、1982年、1984年中国女排先后夺得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的冠军，实现“三连冠”；1990年游泳已有5人5项成绩位列世界第一；1993年辽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5人13次破3项世界纪录；1982~199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连续5届获得金牌总数第一；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从1979~1993年，乒乓球、女排、体操、田径、羽毛球、跳水、游泳、举重、射箭、射击等奥运会项目和技巧、航空模式、航海模式、跳伞、围棋、潜水等非奥运会项目获得世界冠军745个，创造和超过世界纪录548次，有62个优秀小项达到世界前三名水平，有68个潜在优势小项进入世界前8名，竞技体育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全面提高。中国还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

群众体育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79年和1985年两次进行的大规模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表明，自197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发育迅速，并有提前的趋势。经1991年的小样本监测，较1985年调查结果：城市男女生身高分别增长1.80厘米和1.15厘米，乡村男女生身高分别增长2.09厘米和1.58厘米；城市男女体重分别增长2.04千克和1.15千克，乡村男女体重分别增长1.34千克和0.8千克；其他反映身体素质的各项指标也有明显的增长。各行业体育协会及其基层协会也先后恢复。1985年开始的争创体育先进县，推动了农村体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挖掘、整理和发展，有900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推广，四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更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大汇演。

同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相比，80年代群众体育也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

局面，引起了理论界对“竞技体育为先导”的发展战略方针的质疑，先后进行了几次理论大讨论，虽然未能取得认识上的统一，但总体上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

90年代的体育大发展 90年代，体育事业开始进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1993年国家体委制定《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6大类29项改革措施，将足球作为推行协会制、俱乐部制的改革突破口，实现项目协会实体化试点。1994年和1997年分两次设立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对项目实行集约式全面管理，初步形成体委宏观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协会实施专项管理的新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1993年制定《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确定“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改革思路，以转变运行机制为核心，实现体育由“搭台”的配角向经营的主体转化，由有形资产的简单利用向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开发转化，由外部输血性赞助向增强体育自身造血功能的经营转化。1997年，体育产业收入已相当国家拨款的47%。竞技体育社会化、职业化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足球、篮球、排球职业俱乐部联赛激活了体育竞赛市场，行业、企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打破了体委独家垄断，形成了多强竞争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压力。随着体育产业化、职业化的推进，出现个人出资举办小型比赛，体育场馆个人承包，私人经营等情况。一批私营的体育俱乐部、武术学校、单项运动学校的产生，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的局面。1997年，体育场馆国有占75.4%，集体占12.4%，个体占5.1%，外资（含中外合资）占4.7%，其他占2.4%。其中，公益型为37.3%，事业型为38.8%，营利型为23.9%。各类体育场馆总计达61.6万个，是1949年的145倍，总面积为7.8亿平方米，人均0.65平方米。

深化改革带动了体育事业的飞跃发展。1992年和1996年中国在第25、26届奥运会上连续位居金牌、奖牌第4位；冬奥会奖牌也实现零的突破。“八五”期间，共获得世界冠军466个，比“七五”期间增长63.5%，共367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比“七五”期间增长150.7%。全国有3亿多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青少年累计近10亿人次，人均期望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岁，人民群众的体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体育教育、科研、宣传在90年代也得到较快地发展。

## 体制沿革

机构 1952年11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即国家体委。它及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机构中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体育的行政管理部门。国家体委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体育运动。

1949年10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1952年6月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全国体总。它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市、县（自治县）建立的地方体育分会及其基层组织是全国、地域、基层的群众体育组织。全国体总的任务是协同各有关部门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举办全国性体育竞赛和运动会，开展国际体育交流，参加、举办国际性体育活动。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代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全国性群众体育组织，会址设在北京，1986年前，全国体总与中国奥委会合为一体。

体制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期间，实际工作是由当时的青年团中央负责。1952年2月团中央组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在组织上与同年6月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为一体，11月一并由团中央划归国家体委管理领导。国家体委实行委员制，任命有关部门领导和地方体委负责人担任委员，并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体委；全国体总（中国奥委会）实行会员制，省市自治区体委分会、行业体育协会是它的团体会员；国防体育俱乐部实行俱乐部制，在部分城市建立国防体育的单项俱乐部，1956年改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并设立单独的办事机构，受国防部和国家体委的双重领导。1958年12月，办事机构与国家体委合并，保留国防体育协会名义，但双重领导体制未变。60年代初调整中，大部分行业体协被撤销，国家体委委员制也名存实亡，体育工作基本集中由国家体委管理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体委曾一度被接管，归中央军委总参训练部领导，1971年恢复，回归国务院领导。改革开放后，行业体育协会逐步恢复。1986年，全国体总与中国奥委会一分为二，但仍由国家体委统一管理领导。1994年与1997年，先后两次按照政事分开、管理结合的原则，改革了国家体委的管理体制，成立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分别实行专项管理。1998年3月10日全国人大会议决定撤销国家体委；3月24日国务院设置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全国体育工作。

50年来,中国的体育事业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实施宏观管理,职业体育专项管理与大众体育社区管理相结合,面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体育发展新模式已初现端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育强国。

Tian'anmen shijian pingfan

**天安门事件平反** (overturning of Tian An Men case)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4月5日前后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首都百万群众因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而遭到镇压的事件进行的平反。

1976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多次呼吁: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他们的坚持和斗争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是,由于中央个别人的阻挠,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迟迟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直到1978年下半年,中央个别人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于1978年9月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天安门诗抄和赞扬这场群众运动的文章,也遭到中央个别人的指责。但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在党内和社会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一直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愿望,有的写大字报,有的收集整理天安门诗词,有的通过诗歌、小说、话剧等文学艺术形式,谴责“四人帮”的罪行,歌颂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邓小平复出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思想和行动更加公开化。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即同年11月16日起上海工人创作和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应邀在北京公演,12月《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

为弄清事件真相,北京市公安部门从1978年5月开始,组织专门班子,对案件进行全面复查。经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在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无一人是反革命分子。同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并经中央批准,通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议。11月15日《北京日报》公布这一决定: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

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16日,《人民日报》等报转载《北京日报》的消息,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26日、27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对外公开宣布“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必须纠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胜利。

#### 推荐书目

徐达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吉林,1994。

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Tianjin Jingji Jishu Kaifaqu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Tianj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 1984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天津市开辟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的开发区域。位于天津市区东南,距市中心50千米,规划面积33平方千米。自1984年开始,国家先后批准建立包括天津开发区在内的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目的在于在划定的区域范围内,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完善涉外经济法规,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创造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引进先进的工业项目,加速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天津开发区成立以来,吸收利用外资成效显著,从1984年底到1994年底,累计批准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项目2196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28.5亿美元,占全市同期协议外商投资总额的20%以上。外资到位率60%。已经投产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1000余家,85%是工业生产项目。1994年,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产值占区内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8.5%。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工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收入都迅速增长,一个现代化、外向型

的工业经济新区已经初具规模。全区工业产值,1986年3872万元,1989年4.7亿元,1993年70.3亿元,1994年达到149.1亿元,成为全市工业生产新的增长点。1994年,区内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5%。区内一些工业项目通过生产协作、技术转让和管理经验的传播,对全市工业发挥着日益显著的带动作用。全区外贸出口,1986年202万美元,1989年4604万美元,1993年2.9亿美元,1994年达到5.4亿美元,成为全市拓展外贸出口的新的生力军。全区财政收入,1986年143万元,1989年2.3亿元,1993年4.3亿元,1994年达到8亿元。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已具备每年自我滚动开发4平方千米新区的能力。开发区正在朝着建设“以国际贸易为先导,以现代工业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经济中心”的方向努力。

Tian Han

**田汉** (1898~1968) 戏剧家。

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1898年3月12日生。1916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同年赴日留学。1919年6月在日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与郭沫若等筹组创造社,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在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任教,创办南国社,编行各种南国期刊,组建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等,从事以话剧、电影创作为主的民众戏剧运动。同时又积极探讨旧剧(戏曲)改革问题,倡导“新国剧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与聂耳合作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日战争时期,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处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抗战戏剧》等。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1968年12月14日屈死狱中。1979年4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工作,是戏剧运动和戏曲改革的先驱,也是文艺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共创话剧60多部,戏曲

剧本 20 多部，电影剧本 10 多部；还有大量的诗、歌词、散文、文艺评论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率先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改编，先后写了《情探》、《白蛇传》、《西厢记》等京剧剧本，发表了新编历史京剧《谢瑶环》。话剧作品中，《文成公主》、《关汉卿》受到高度赞扬。《关汉卿》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剧作。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浓郁的诗情画意，富有传奇性的剧情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他剧作独特的艺术风格。

Tian Jiyun

**田纪云** (1929~ ) 中共第十三至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山东肥城人。1929 年 6 月生。1941 年秋参加八路军。1943 年 6 月进抗属学校学习。194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从事战勤工作。后任冀鲁豫朝城县一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兼区长，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总会计，赣东北行署财政处总会计。1949 年后，任贵阳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贵阳人民革命大学班主任，贵州省财政干部培训班主任。1953 年后，任贵州省财政厅秘书科副科长、科长，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计划科科长，预算处处长，副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财金处副处长。1969 年后，任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经营管理组副组长，省财政局副局长、局长，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81 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1983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副组长。1985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 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tiaozheng gaige zhengdun tigao de fangzhen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guiding policy of “Adjustment, Reform, Re-organization and Improvement”) 1979 年 4 月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关于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和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简称“新八字方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的一些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和掌握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1979 年 1 月 6 日，邓小平在国民经济计划的批示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对 1979 年的计划指标要做一些调整，减少一些大项目，不然不踏实、不可靠。3 月 14 日，李先念、陈云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经济发展的步子要稳，要比例协调。3 月 21 日，陈云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指标高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现在比例失调状况前所未有的，必须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邓小平也强调，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央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当时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检查了 1977 年、1978 年两年由于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步子迈得不够稳，在基建规模、生产速度、外资利用、计划编制等方面存在的冒进。他在讲话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凡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计划留有余地，不搞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在生产组织上不搞瞎指挥的时候，发展就快；否则，发展就慢，甚至下降倒退”。会议提出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四个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比例严重失

调的情况下，调整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只有及时调整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才能使中国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调整是中心环节，改革、整顿、提高则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并直接为它服务。制定并提出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 1977 年以来经济恢复的成就，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清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健康轨道。

为完成调整任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 12 项政策措施：①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②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的增长相适应；③在重工业中突出加强煤、电、油、运和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建设；④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⑤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钢材、水泥、木材和资金的供应可能相适应；⑥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⑦要扩大出口，要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⑧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适当调整；⑨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⑩必须确实控制人口的增长；⑪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⑫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

1979 年 6 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八字方针，并同意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由于“新八字方针”和十二项政策的贯彻执行，1979~1980 年国民经济虚假膨胀和盲目发展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成效渐现：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农业、轻工业发展加快，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走向协调，消费基金增加，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所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生活得以改善；城乡市场商品供应有所好转，对外贸易出现较大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进步，特别是大专院校在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这些成效的取得对于国民经济调整的目标来说，只是初步的。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在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不甚得力，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大量严重问题。一方面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开支大幅度增加，而另一方面基

本建设的总规模并没有真正压缩, 基建投资并没有降下来, 加上行政费用的增加, 致使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 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项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 造成财政出现赤字, 市场物价上涨。同时, 在调整和改革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如财政收入下降、预算外投资增长过快、企业滥发奖金等。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其近期目标为: ①尽快消灭赤字,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②消除财政性货币发行, 实现信贷收支平衡; ③基本稳定市场物价。根据会议重申的“该退的坚决退够、该进的坚决前进”的调整方针,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 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作为进一步调整的中心环节; 缩短工业生产战线, 关、停、并、转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 继续促进农业发展; 继续采取特殊措施, 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 缩短非生产性开支, 尽快消灭财政赤字; 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

通过1979~1982年“调整、改革、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制定与执行, 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况, 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调整, 扭转了过去三年财政收入连续下降的状况, 财政赤字降低, 市场物价上涨势头有所缓解, 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工业消费品日益丰富。1982年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33.5%, 平均每年增长7.5%;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56.5%, 平均每年增长11.8%; 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放慢, 平均每年增长1.3%, 其中1981年还比上年下降4.7%。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比较合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7.5%。城乡市场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 对外贸易有了新的的发展。实践证明, 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经济效益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填平补齐、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新“八字方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 推荐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 红旗出版社, 北京, 1987。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86。

### tiaozheng gongshangye 调整工商业 (adjustments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50~1952年, 为促进国民经济尽快恢复,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两次调整。

1950年春, 经过打击投机资本, 物价趋于平稳, 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 出现了停工减产、倒闭歇业等现象, 社会失业人员增多, 市场一时萧条。国家为了发挥私营工商业的作用, 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得其所, 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第一次调整。

在工业方面, 国家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扶助。如棉纱、棉布、面粉、重要日用工业品等商品, 尽量委托私营工厂加工或向私营工厂计划订货。在商业方面, 国营商业企业的数量限制在能够稳定物价的程度, 并且在国营企业能够稳定市场价格、控制主要农产品和部分重要副产品及出口物资、保护农民的正常利益等前提下, 在购销范围、批零差价、运销手续、税收等问题上, 对私营工商业给予适当的照顾。经过调整, 市场繁荣, 私营工商业很快活跃起来。1951年与1950年比较, 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

第二次调整是在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进行的。当时私营商业又呈萎缩。为了不让过多的店员失业, 并使私营商业保持一定的营业额, 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央规定, 全国公私商业的零售比重, 公营占25%, 私营占75%。为了贯彻这一指示, 各地采取调整价格, 扩大批零差价, 收缩国营商业, 扩大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 取消各地对于私商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等措施。第二次调整商业的措施落实后, 缓和了公私关系, 私营商业再次活跃起来。

### tiaozheng gonggu chongshi tigao bazi fangzhen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guiding policy of “Adjustment, Consolidation, Enforcement and Improvement”)

1961年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提出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其基本内容是: 以调整为中心, 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 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 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 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1958年开始的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 以粮为纲, 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 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 党和人民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 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在研究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 建议应按“整顿、巩固、提高”的精神安排计划。周恩来表示赞同, 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 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确定安排1961年计划的具体方针是: ①以农业为基础, 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②工业的发展, 着重注意增加品种, 提高质量, 填平补齐、设备维修和产品配套; ③在全面安排劳动力和人民生活的条件下, 安排国家生产和建设, 保证群众过好日子, 保证灾区群众休养生息; ④基本建设以中小为主, 继续缩短战线,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⑤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力量。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62年2月,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点意见。5月,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加强农业战线,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②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压缩重工业生产; ③坚决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精减职工, 精减城市人口; ④消灭财政赤字, 稳定市场。在调整过程中, 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反对分散主义, 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

到1962年, 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效果。农业生产改变了前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 开始回升, 产量达到3200亿斤; 工业生产在压缩重工业的前提下, 加大对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的投入, 开始出现转机; 国家财政扭转了前4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 不仅收支平衡, 1962年还结余8.3亿元; 城市精减人口2000多万, 城乡人民生活开始有所好转。3年经济困难时期至此结束。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从当年起, 再用3年时间, 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是, 除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 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 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



高经济效益,搞好一批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加强对原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等等。同时,针对经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除了继续实施配合调整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外,还要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改革。经过3年努力,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完成,国民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

#### 推荐书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

## tiedao shiye

**铁道事业** (railroad sector)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大型运输企业,既属于产业部门,又属于服务行业,是以运输为中心,由运输、工业、工程三大部门和科技、教育以及后勤保障等系统构成的多部门、细分工,庞大、复杂的综合体。

**起步基础** 自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诞生,到1949年共73年间,中国共修建26200千米铁路,除去战争破坏或拆去的3600千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大陆仅有铁路干支线22600千米。铁路数量少,完全由中国自力修建或基本自力修建的仅占36%;布局不合理,大多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标准杂乱,质量较低。

**发展历程** 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成立,开始统一领导全国铁路的修建和运输工作。在“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口号鼓舞下,当年1~4月,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增加1000千米,至10月,通车里程又增加4400千米。10月1日,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继续组织抢修被战争破坏的铁路的同时,于1950年动工新建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和湘桂铁路来睦段,并于1952年内完成铺轨通车。至1952年底,大陆原有铁路干支线除个别路段外,全部修复通车,营业里程增加到22876千米;可能修复的机客货车全部“复活”,机车保有量达4180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旧线改造、修复和新建第二线1337千米,新建自动闭塞302千米,加强和改造铁路枢纽14个,新建干、支线4879千米,修理机车689台、客车892辆、货车6977辆,新造蒸汽机车531台、客车1984辆、货车40780辆。1957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26708千米。从1958年至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建完并正式交付运营包兰、兰新、兰青、干武等铁路干

线9698千米。1966年后的10年中共建铁路5669千米,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前开工,调整时期停工后又复工的,主要有贵昆、成昆、湘黔、京原、焦枝等线。这一时期国家对铁路建设总投资比重较大,特别是新线建设所占比重超过其他任何时期。1976年,由于“左”的思想,铁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分散,一些重点项目被拖延工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改革时期,铁路把建设重点放在提高晋煤、豫煤外运和加强沿海港口后方的铁路运输能力,特别是运输“卡脖子”区段通过能力。“六五”期间,建成京秦、兖石、皖赣等路网干线。“七五”期间,建成大秦、衡广等干线。“八五”期间以“强攻京九、兰新,速战侯月、宝中,再取华东、西南,配套完善大秦”为重点,取得重大胜利。“九五”总体部署和目标是:决战西南,强攻煤运,建设高速,扩展路网,突破7万。重点加快建设西安安康线、朔州黄骅港线、南疆线、内昆线(安边至梅花山段)、宝成复线(阳平关至成都段)、株洲至六盘水复线、秦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西安至南京线、洛阳至湛江通道、东北至长江三角洲陆海通道等重大工程,并力争开工建设京沪高速。计划5年建成新线5340千米,既有线复线2580千米,既有线电气化4400千米,地方铁路1000千米。到2000年,铁路营业里程将达6.8万千米;到2002年则会突破7万千米。其中复线里程2.1万千米,电气化里程1.5万千米。

**体制沿革** 1983年以前全国共设20个铁路局。由于设置过多,不利于运输的指挥,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务院、铁道部决定把撤并铁路局作为运输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1983年起先后撤消8个铁路局。1986年1月全国有北京、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郑州、济南、上海、广州、柳州、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12个铁路局。1981年,对上海铁路局等11个部属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82年4月,对全路所有企业下放计划、财务、物资、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等17种权限。1984年6月,又下放36种管理权限,并试行厂长负责制,同企业内部的机构体制、分层分权负责制、厂长任期目标制、分配制度等改革配套进行。部属单位也层层下放经营管理自主权。全路运输部门先后进行扩大旅客列车编组和调整编组结构,改革机车运用、检修制度,试验开行重载、组合列车,改革零担运输制度,延长站线,发展直达运输和集装化运输等改

革措施。全路基建部门实行投资包干责任制,积极推行招标投标制等试点。铁路工业打破封闭型结构,发展横向联合,走依靠专业大协作发展机车车辆工业的新路子。1983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1984年12月15日,全路运输部门第一个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打破铁路单一搞运输的状态。铁路基本建设逐步改变由铁道部独家修路,靠国家投资的单一渠道,采用利用外资、国内合资、扶植和发展地方铁路等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以弥补国家财力不足,加快铁路建设步伐。1991年2月,由7家企业共同投资1.7亿元组建的铁路首家股份制公司——平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至1998年全路共有26个合资铁路公司。1993年2月6日,铁路首家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成立。1995年12月18日,全路首家国有独资公司——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运作。1997年,全路主体部分有运输、基建和工业三大系统。下设14个铁路局(集团公司)、50多个铁路分局(总公司)和5000多个大小车站;基建系统有铁路工程和铁道建筑两个总公司,下设19个工程局、5个勘测设计院,承担全国铁路的新线建设、营业线改造和工业建设的设计、施工任务。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下属35个机车车辆工厂,4个机车车辆研究所,承担铁路机车车辆的制造、修理和配件生产任务。铁路物资总公司下属9个铁路物资办事处,负责铁路系统的物资供应;通信信号总公司下属10个通信信号工厂。此外,还有1个铁道科学研究所和10所高等铁路院校。

**建设成就** 50年来,铁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其主要表现:

第一,路网布局得到改善。截至1998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57583.5千米,线路总延长121067.9千米。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通了铁路,形成“九纵十横”为主体的路网结构:“九纵”即京沪、沪杭线,京九线,京广线,南北同蒲、太焦、焦柳线,宝中、宝成、成昆线,湘渝、川黔、黔桂线,淮南、皖赣、鹰厦线,哈大、沈山、京山线,平齐、通让、京通线;“十横”即滨洲、滨绥线、大郑、集通线,大包、包兰线,大秦线,丰沙大、京秦线,石太、石德、胶济线,侯西、侯月、新菏、兖石线,兰新、陇海线,浙赣、湘黔、贵昆线,广梅汕、三茂、黎湛、南昆线,长

图、长白线。

第二,电气化铁路建设迈上新台阶。从1961年8月第一段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宝鸡至凤州段建成运营起,1996年全国电气化铁路已经突破1万千米,为11 637.7千米。1998年底,电气化营业里程(不含合资和地方铁路)12 984.3千米,电气化铁路比重达22.5%。27条(段)铁路干线实现电气化。1998年5月28日,中国第一条时速200千米的广深电气化铁路改造工程竣工。

第三,合资铁路和地方铁路蓬勃发展。从1958年始建地方铁路,至1998年底,地方铁路正线里程4926.69千米,延展里程6225.31千米。随着铁路建设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合资铁路得到较快发展,至1998年底,合资铁路营业里程3918.3千米,延展里程4999.1千米。建成和在建的合资铁路项目共29个,总长达8399千米。

第四,铁道建设科技进步硕果累累。  
①建成第一条准高速铁路。1994年广(州)至深(圳)准高速铁路建成。客车时速160千米;1998年5月电气化铁路改造工程竣工,客车时速200千米。  
②货物重载运输取得突破性进展。1992年12月,中国第一条重载运煤双线电气化铁路——大同至秦皇岛铁路开通运营。该线全长653千米,正常开行5000~6000吨重载列车。  
③用高新技术装备铁路。通信、信号技术向自动化、综合化、智能化、高度集成化方向发展。如京九铁路采用一点多址微机通信、多信息移频自动闭塞、列车超速防护装置、内燃机车驾驶模拟操纵台、车辆安全监测系统以及新型驼峰自动、半自动化等多项新技术成果。  
④桥梁技术不断突破。50年代建成武汉长江大桥,60年代建成南京长江大桥,80年代建成的长东黄河大桥长度超过10千米,90年代建成的九江大桥采用十几项国内首创或首次的新技术,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钢梁桥。钱塘江二桥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型梁连续长度居世界同类桥梁之首。八渡盘江特大桥V形支撑、板其二号桥平弯梁等新结构为国内首创。清水河大桥墩高桥高为目前中国铁路桥梁之最。  
⑤隧道技术提高。全路有隧道及明洞5581座,总延长2 767 051.4千米。西安康线18.47千米隧道,在长度及设计、施工技术上有新突破;米花岭、家竹箐隧道的建成,表明中国在高瓦斯、大涌水和高地应力岩体隧道设计、施工上的能力有新的提高。  
⑥铁路大型客站向综合式建筑发展。建成了上海、天津、深圳、沈

阳北、汉口、郑州、长春、济南、呼和浩特、北京西站等一大批将铁路客站业务用房和商业、餐饮、旅馆及文化娱乐用房为一体,候车厅跨越站台、站线的高架站房,并广泛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据传输技术。  
⑦编组站自动化控制技术不断发展。郑州北、丰台西、徐州等编组站大量采用驼峰溜放自动化、驼峰溜放进路自动控制、运营信息管理自动化、编组计划编制及传输计算机化、列车预确报计算机联网技术,达到少占地、节约投资和提高编组率的目的。

第五,铁路勘测设计和施工水平提高。  
①勘测设计手段明显改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勘测装备投入运用,航测、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地形测绘技术、综合勘探技术提高,勘测速度加快。  
②铁路工程建设水平大幅度提高。京九铁路全长2536千米,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它以一流的速度和一流的质量开创了铁路建设史上新纪元。南昆铁路工程沿线膨胀(岩)土、软土、岩溶、瓦斯、断层、滑坡、泥石流、高裂度地震区等不良地质广为分布,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山区铁路建设达到一个新水平。

第六,铁路建设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打破长期以来按计划投资直接下达施工任务的旧模式,形成由部组派建设管理机构、铁路局(集团公司)承担建设管理职责和合资铁路公司负责建设管理三种模式,实行投资包干责任制、招标承包制、多种形式的总承包试点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推行建设监理制度,为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有效实施“工期、质量、投资”三大控制。

#### 推荐书目

《中国铁路建设》编辑办公室编:《中国铁路建设》,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1990。

《中国铁路运输》编写组编:《中国铁路运输》,中国铁道出版社,1994。

Tiemu'er Dawamaiti

#### 铁木尔·达瓦买提 (1927~ )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维吾尔族。1927年6月生于新疆托克逊。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1950~1964年,任新疆托克逊县二区三乡乡长、副区长,县长、县委第一书记、书记,吐鲁番中心县委副书记(其间于1955~195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读书)。1964~1996年,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革

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自治区革委会常委,自治区农牧办公室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自治区主席等职。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Tong Dizhou

#### 童第周 (1902~1979) 政协第

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生物学家。浙江鄞县人。1902年5月28日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南京大学助教。1930年赴比利时留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还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山东大学任教,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学部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卵子发育能力方面有独特发现。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30年代曾对海鞘卵子的分裂球进行多种的配合研究。50至60年代对文昌鱼发育的研究,证明了文昌鱼在无脊椎动物向有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60年代对金鱼细胞核移植研究,为动物育种提出新的途径。70年代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核质关系,也取得了多项成果。从教多年,培养了大批学生,有不少学生成为中外知名的学者。发表了《发育的分析》、《无脊椎动物胚胎学》等专著及《两栖类动物纤毛诱导之研究》、《文昌鱼卵子分裂球的发育能力的研究》、《细胞核的移植》、《从胚胎发育看细胞核和细胞质的功能》等学术论文数十篇。1979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

tongji shiye

#### 统计事业 (statistics service)

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理论的统称。统计工作是对经济、社会、科技现象的数

量方面进行调查、整理、分析和预测的过程。统计资料是统计工作活动的成果,即统计信息。统计理论是统计实践的理论概括,它系统论述统计工作的方法论和规律性。

#### 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统计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计工作支离破碎,统计资料零星分散,虽然进行了不少典型调查,但缺乏统一,无法综合成系统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致力于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设立统计处(后称统计总处),筹划全国统一的财经统计工作。1950年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统计处,推动文教卫生各部门建立统计工作。1950年3月,中财委布置了全国国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工矿企业的普查,即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并制定了某些专业的统计年报和定期报表,在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以及有关的管理机构逐步推行。在以个体农业为主的农村,则主要依靠农村干部,采用典型调查等办法,取得接近实际的统计资料。1951年,中财委布置了农业生产年度总结基本报表,由省、市农村部门填报。

1951年7月,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工作统计会议,确定了统计工作的方针。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学习并大量引进苏联社会经济统计学派的理论;一是全力批判英美数理统计学派的理论。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统计学派的理论成为指导理论。

1952年8月,统计工作的全国领导机关国家统计局成立,集中统一的统计工作迅速在全国建立起来。首先是各级地方和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门设立统计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其次是清理统计报表,克服重复混乱现象,并制定了统计报表审批办法。三是建立一套系统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逐步建立了包括工业、运输、邮电、物资、基本建设、贸易、农业、劳动、文教、卫生、物价等在内的专业统计报表制度;还进行了统一的专项调查和普查,如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私营商业等普查,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调查等。四是制定了部分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分类目录,包括基本建设事业种类目录、私营企业统计分类、国内贸易统一商品目录、城乡划分标准、农业产品目录、工业部门分类目录、工农业产品不变价格等。五是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试算国民收入,编制社

会产品生产、积累、消费平衡表和国民经济联系平衡表等,还初步开展了综合分析研究工作。

1953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1952年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情况的公报》。此后至1960年,每年都发表统计公报,并更名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通过从1953~1957年的统计工作,掌握了大量适合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需要的统计资料,适应了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统计事业基本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的缺点与不足,主要是过多利用全面调查,很少利用抽样调查,对典型调查也重视不够;对调查结果的统计资料,分析研究不够,不能很好地说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企业和农村仍然存在着报表多而混乱现象。

**两次遭受挫折及其缓慢发展** 第一次挫折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将业已肯定的集中统一的统计工作,尤其是全国统一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视为教条主义。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推行河北省改革农村统计工作经验,强调按照地方领导的需要进行统计和提供统计资料,致使集中统一的统计工作受到破坏。这个时期,部分统计数字严重不实,夸大生产成绩,掩盖比例失调;一些地方和部门任意篡改统一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使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受到损害;拒绝学习外国先进的统计科学和统计工作经验,走上固步自封的道路。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大大削弱,给国家了解真实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

1963年3月,国务院发布《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对统计工作的性质、任务、基本要求和基本做法,各级统计组织机构和各级统计部门、统计干部的职责,都做了明确的规定。196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统计部门原则上由国家统计局系统统一管理;要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及时性;各级统计部门按照上级统计部门规定搜集和整理的统计资料,必须直接报送上级统计部门,同时报送当地领导机关,当地领导部门如对上报的统计数字有不同意见,可将意见另报上级,但不允许干预这些统计数字的直接上报,甚至篡改这些上报的统计数字;统计数字是否确实,应由各单位的统计负责人负责。由此,统计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基本上纠正了混乱现象。

第二次挫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计事业又受到严重破坏。首先是统计机构被冲击和下放。全国县级以上统计部门,到1976年底只有7800人,比1965年减少了63%,国家统计局只列为国家计委业务组内的一个小组。其次,重要统计数字严重不实,情况不明,大量统计历史资料被销毁。从1966~1969年,国家一级的统计工作中断了3年,其余7年也只能进行少量基本数字的统计。但有些部门,如银行、财政、税收系统,铁道、交通、邮电系统,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仍基本上坚持了统计工作;不少地区也有自己的统计报表。

**统计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3月,国务院决定恢复设立国家统计局,直属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局也陆续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以上各级政府的统计机构普遍恢复,国务院各部委成立了分管统计的司(局)或处,城乡基层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统计组或配备专人,全国成立了农村和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各项基本统计全部恢复,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系统和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统计培训和教育事业也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1979年,中国统计学会成立,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学会以及部分专业统计学会也相应成立。1981年3月,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成立,不少省、市统计局也成立了统计科学研究机构。统计理论研究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1979年6月,国家统计局恢复发表《关于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以后按年发表,更名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公报》。1982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统计年鉴》和专业统计年鉴,还出版了工业、农业、贸易、农民生活、人口、社会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汇编。随后,定期举行统计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统计资料。

**新时期的改革与成就** 198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公布,它总结了统计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提供了保证。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统计系统,并提出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的6个目标:统计指标体系完整化,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化,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现代化,统计服务优质化。此后,统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搜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料,有效地促进了统计事业的现代化建设;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全国农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科技普查,以及全国投入产出调查都取得了全面、系统、完整的数据。从1992年起全国逐步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并吸收了世界上SNA和MPS两大核算体系的优点;建立城市和农村住户调查;建立宏观经济动态监测预警统计指标体系;制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职业分类和代码国家标准,全国工业产品(商品、物资)分类和代码国家标准等。统计改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从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初步转向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济、社会、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已逐步发展为既各自独立,又互为条件、互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统计指标体系。统计分类,由分散、不完整开始转变为统一、标准化分类标准,并逐步建立包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分类、国民经济结构分类、社会结构分类在内的标准体系。调查方法,从过去主要依靠全面定期报表的方法,逐步转变为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全面定期报表、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体系。统计基础工作,由过去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相互脱节,开始转变为三者协调,可以相互兼容或转换。企业统计,由过去主要为上级服务逐步转变为企业本身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从依靠手工机械计算技术,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自动化体系,并向网络化发展。统计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扩大,提供了大量统计信息和有价值的咨询建议、监测意见;统计分析围绕经济社会的现状、评价、预测和决策等问题,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这些,都使统计工作在宏观决策和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统计的中心任务是全面推进统计改革,到20世纪末或更长一些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统计体系。

**问题与不足** 从总体看,现行统计还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主要表现在:统计指标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反映两个根本性转变进程的统计指标不够健全,与新的国民经济体系相配套的统计指标存在较大缺口;统计调查方法依赖全面统计报表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难以反映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统计标准体系不健全、不配套,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与国际化标准接轨。

### 推荐书目

岳巍主编,莫日达、李恢宏副主编:《当代中国的统计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

李惠村、莫日达:《中国统计史》,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3。

tongyi caijing

### 统一财经 (centralized control over finance and economic affairs)

1950年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

为稳定金融、物价,平衡国家财政收支,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的基本内容是:①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统一财政收入。当时主要收入是公粮和城市税收。以往公粮收入是由地方掌握,中央无法控制。统一财政收入后公粮的征收任务分配、收支、调度,以及公粮的税则、税率,均统一于中央。城市税收,除中央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税收均归中央,由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中央建立各级金库,由中国人民银行代为保管。对于支出,政务院也作出了制定编制、严格财务制度等决定。②统一物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均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全面清仓查库。国家所有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全部集中,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使用。③统一现金管理。政务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总机构,所有党政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银行,由银行集中调度使用。外汇的调度及其牌价,也由银行统一管理。中共中央还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对贯彻上述三项统一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过各级党政部门的努力,到当年6月底,全国顺利完成统一财经工作。

tushuguan shiye

### 图书馆事业 (libraries)

图书馆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重要作用,图书馆事业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图书馆出现于19世纪末。辛亥革命后图书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后经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破坏,1937~1949年间趋向于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发展概况**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原有的各级图书馆进行了大力改造:补充马列主义经典和进步书刊,剔除反动、淫

秽、荒诞书刊;开展图书流通工作,完善工作环节,使藏书更好地为读者所用;还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培养人才。1955年后,文化部、高教部、全国总工会等分别发布了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和工会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条例和规定,对加速图书馆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至60年代,图书馆数量有了很大增长,其中县级以上图书馆由1949年的55所,增加到1960年的1093所,高校图书馆,由1949年的132所,发展到1965年的434所,工会图书馆由1949年的44所,增加到1963年的43546所。

“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大批书刊被封存,图书馆数量减少,大量书刊散失。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图书馆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7和1978年,当时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教育部和中科院,下达了一系列文件,明确各系统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了关于图书馆问题的汇报,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决定在文化部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1982年在国家“六五”计划中,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1985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回顾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讨论了文化部提出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1987年,此报告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和中科院印发全国执行。上述文件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前进,各类型图书馆迅速发展。80年代以来,图书馆舍得到改善,不少图书馆兴建了新馆舍。开始采用新技术,许多图书馆有了静电复印机、缩微摄影机、拷贝机、阅读机、计算机、视听设备和防火防盗设备,一些图书馆建了数据库,提供网上服务,有的还设了国际联机终端,开展国际联机检索服务。各系统图书馆在基础工作、服务方式、服务质量等方面有了改进。如公共图书馆整顿了藏书和目录,普遍实行部分开架阅览,延长了开馆时间;高校图书馆重视藏书质量,剔除陈旧书刊;科学和专业图书馆重视文献资源开发,为科研工作提供情报服务等。各类图书馆还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80年代中期以后,在书刊价格上涨、经费不足情况下,又加强馆际协调合作,更加注重地区、系统和全国的整体化文献资源建设。

**管理体制** 中国的图书馆因隶属部门不同而分为几个系统,分别由相应部门领

导和管理。公共图书馆由文化部及各级文化行政机关管理；高等学校图书馆由教育部、有关部（委、局）和各省（市）教育厅（局）以及所在学校分别管理；专门图书馆由各部（委、院）和各地有关部门管理；工会图书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各级工会管理；中小学图书馆由各地教育机构及所在学校管理等。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协作，1966年以前由国家科委下属的图书组负责，1987年以后，由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

**各类图书馆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分为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等。

**公共图书馆** 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省、直辖市、自治区图书馆，地（盟）、市图书馆，县（旗、区）图书馆，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图书馆（室）等。到1997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已达2661所，工作人员47882人，藏书37548万册（件），年流通人数16132万人次。在县以下，城市街道和农牧区乡镇普遍建立的文化站和文化中心内，一般都设有一个图书馆（室），藏书从几百册到数万册不等，这是为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室）网点。为了使边远地区的居民能享受到图书馆的服务，从1985年开始，文化部在各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图书馆发展了汽车图书馆（即图书巡回车），到1996年已达150余辆。此外，全国有专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71所，以及县级图书馆附设的少年儿童阅览室1000多个。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筹建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总馆设在北京西郊白石桥路39号紫竹院公园北侧，分馆位于天津街北海公园西侧。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馆内阅览、外借、馆际互借、开展咨询服务、复制文献、举办书刊展览和学术报告，以及进行声相服务、网上服务等方式，为读者提供服务。主要对象是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重点科学研究、生产建设单位，同时也包括一般读者。到1997年底，馆藏图书已达2101万册（件），馆舍面积17万余平方米，阅览座位3300个，工作人员1480人。

**高等学校图书馆** 中国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包括大学、学院及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它们是高等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担负着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任务。到1994年底，全国高校图书馆已有1080所，藏书41800万册，工作人员38162人。其

中藏书较多的图书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四川联合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书都在300万册以上。

表1 中国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图书馆发展情况表

年份	馆数(所)	年份	馆数(所)
1949	55	1978	1256
1950	63	1983	2038
1957	400	1990	2527
1960	1093	1997	2661

表2 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情况表

年度	馆数(所)	馆藏册数(万册)	工作人员
1949	132	794	
1956	225	3729	
1980	675	19362	17297
1990	1075	38170	35180
1994	1080	41800	38162

**专门图书馆** 包括研究机构、厂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图书馆。主要为本单位的人员服务。它们通常只收藏本专业或与本单位业务有关的文献，专业性较强。据《中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名录大全》（1994年），全国有专门图书馆9000余所，收藏文献10.6亿册（件），工作人员88900人。专门图书馆分下列几种类型：（1）研究机构图书馆。因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图书馆情报职能的加强，其中有些图书馆改名为“文献情报中心或文献信息中心”。这类图书馆发展很快，有些已在本系统内形成具有全国规模的图书馆网，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图书馆。（2）厂矿图书馆。著名的如鞍山钢铁公司技术图书馆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图书馆等。（3）机关图书馆。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和外交部图书馆等。（4）社会团体图书馆。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图书馆和中国医学会图书馆等。（5）企事业单位图书馆。如中华书局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

**工会图书馆** 包括全国总工会、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和基层工会设的图书馆（室）。主要服务对象为所属地区或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基本任务是利用馆藏文献，帮助职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到1997年底，全国有工会图书馆（室）94316所，藏书45935万册，工作人员61798人。工会图书馆中藏书比较丰富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图书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等。

**中小学图书馆** 中小学图书馆为学校

师生完成教学任务服务，也是学生开展课外阅读，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学陆续建立了图书馆（室）。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图书馆比边远地区普及，藏书数量也较多。全国藏书较多的中小学图书馆有天津南开中学图书馆、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大附中图书馆、上海大同中学图书馆等。

**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中国各类图书馆都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1949年后，各图书馆首先向广大人民群众敞开大门，主动以馆藏文献为读者服务，并以举办展览、报告会、编印推荐书目等方式，配合各种政治活动和中心工作。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加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许多图书馆设立了科技阅览室，扩大了科研人员的借书范围和册数，延长了借书期限，加强了书目索引编制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服务质量的要求愈来愈高。因此，图书馆除传统的服务项目外，又普遍加强了情报服务工作。主要方式有：（1）定题服务。即根据科研和经济建设的项目需要，不断地为读者进行文献检索服务和提供文献，直到项目完成。（2）文献检索服务。即从各种形式的文献载体中，代读者检索出所需要的资料。（3）代译服务。接受读者委托，为读者翻译外文资料。（4）情报调研服务。即为读者制定规划、进行技术改造或产品开发等而进行的文献调查、分析、述评或论证。（5）信息开发服务。即从各种文献中筛选出适用的文献信息，经过加工整理，供读者利用。多年来，各类图书馆为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配合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 and 重要技术攻关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两弹”的研制，武钢、首钢、宝钢等大型企业的建设，大庆、胜利、克拉玛依等油田的开发，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等都利用了有关图书馆提供的科学文献。

**国际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图书馆界就与国外一些图书馆和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但联系的范围和数量有限。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界的国际交流在方式和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97年，对外联系的国家 and 地区已达一百三十多个，交流的人员也日渐增多。联系的主要方式有：参加国际上图书馆组织的年会，与国外图书馆联合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班，互派专家讲学，交换馆

员, 人员互访, 交流与互借书刊和举办国际展览等。通过交流, 增进了友谊, 加强了合作。

**图书馆学教育** 50年代初, 中国只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设有图书馆学专修科。到1996年,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开设图书馆学院、系、专修科的学校已达五十多所, 开设的中专和职业高中班有五十余个。已形成可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和中专生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在职教育也发展很快, 1979年以后, 各系统图书馆普遍对在职人员进行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业务培训, 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于1979年7月, 它是全国图书馆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其会员遍及全国各系统图书馆和有关院校。自成立以来, 在开展图书馆学研究, 普及图书馆学知识, 培训图书馆干部, 交流办馆经验, 推动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等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它是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FLA)的正式国家协会会员。1996年在北京举办了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 有来自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人参加。

#### 推荐书目

杜克主编:《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1995。

tudi gaige yundong

### 土地改革运动 (land reform)

中国在1950~1953年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国民党统治时期, 中国的地权相当集中, 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 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中农及其他人口仅占有20%~30%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强调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 使农民获得土地;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要求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至1949年9月, 全国已有12000多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

**土改的法规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在以上两个文件的基础上, 于1950年6月28日公布指导全国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简称《土地改革法》)。该法分6章40条, 对总则、土地的没收

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等作了规定: ①保护富农, “保护富农所有制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 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 亦予“保留不动”, 只是对于“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 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 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②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 只要不超过当地每人土地的两倍, 均保留不动; ③对地主, 除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多余的房屋外, 其他浮财和底财, 不予没收。同时,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 团结中农, 中立富农,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规定(草案)》、《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关于划定富农成份的指示》、《关于如何划定小土地出租者的指示》、《中央对划定中农和富农成份的指示》、《关于土改中退押与债务问题的处理给各地指示电》、《关于土地改革地区典当土地房产问题的处理意见(草案)》、《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等具体操作性文件。这些文件规定, 对地主富农中经营的工商业, 要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剥削有所区别; 对开明士绅、华侨所有的土地房屋, 对革命军人、革命家属中属于地主成份者予以谨慎处理, 适当照顾。另外, 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人民法院组织通则》, 各级政府据此设立人民法庭, 按照法律程序整治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土地改革法的罪犯。

**土改的实施**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会, 在各级农民协会的配合下, 有计划、有秩序地在新解放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运动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①调查研究, 摸清情况, 调整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向广大农民宣传土地政策, 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 逐步地把农民组织起来。②划分阶级, 分清农村阶级阵营。组织农民协会, 为分配土地铺平道路。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 以及征收半地主富农的出租土地, 从经济上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消灭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④在核实田亩和产量的基础上, 制定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方案, 进行合理分配。⑤在打击地主阶级反

攻倒算的同时, 纠正漏划、错划的阶级成份及分配不公等问题, 然后颁发土地证, 确定地权, 动员生产。

各地军政委员会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7月, 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华东土地改革实施方法的规定》, 根据华东地区很多地方土改条件尚未成熟, 提出应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生产等运动中发动群众, 积极准备条件, 以便在1951年秋后进行土改。1950年9月,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本地区的《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 决定在进行土改、加强土改工作中具体指导的同时, 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总结,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进一步改造农村基层政权, 清理和整理农协组织, 以预防和纠正可能发生的“夹生饭”和强迫命令等偏向。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 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谨慎稳进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其土地改革工作必须在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照顾民族特点适应民族的迫切需要。西北土地改革分两批进行, 每批都经历了典型实验、重点突破和全面开展3个阶段。西南地区是各民族混合居住的地方, 有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彝族、封建农奴制阶段的傣族和藏族, 也有封建地主经济为主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以, 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 在少数民族杂居地区, 原则上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 不退租。在少数民族中, 只提反匪首, 不提反霸口号。只有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开展起来, 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 争取在1951年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其余地区可在1952年春及其以后完成。

**成果** 到1953年春, 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 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全国有3亿多无田少地的农民, 不仅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大约3500万吨的粮食地租, 而且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占人口52.2%的贫雇农占有47.1%的耕地; 占人口39.9%的中农占有44.3%的耕地; 占人口5.3%的富农占有6.4%的耕地; 占人口2.6%的地主占有2.2%的耕地, 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的状况。土地改革后的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农业生产连年增产。1949年全国的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棉花44.4万吨、油料256.4万吨; 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棉花130.4万吨、油料419.3万吨。

####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经

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

tuiguang putonghua

**推广普通话**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Mandarin]) 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各省市相继成立相应的委员会。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1957年7月，教育部提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方针。至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3次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并于1963年辑录成

《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表初稿》，在各地推广。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出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随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及建设部、商业部等单位又多次对学校、对社会各界发出加强推广普通话的通知，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各地有了更大的进展。

# W

waihui binggui

**外汇并轨** (simplified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又称人民币汇率并轨。指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决定体制和政策。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人民币汇率经过多次调整,外汇管理体制也经过多次改革和调整,并由此形成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体制。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这一体制已不太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此,1993年12月28日,为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由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状况,使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因而,此项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被人们称为“外汇并轨”或“汇率并轨”。

“外汇并轨”的改革实际上涉及外汇管理体制上许多重要的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①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各外汇指定银行以此为依据,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挂牌公布对客户买卖外汇的价格。②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取消原来的各种外汇留成、额度管理和缴纳制度。境内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类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调回境内,并按银行挂牌汇率,全部售给外汇指定银行。企业一般贸易用汇取消对外支付用汇的计划审批,只要有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就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用人民币购汇,也即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③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后,建立由人民银行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督管理的全国统一的银行间

外汇交易市场。在该市场中,外汇指定银行是市场交易的主体。市场为各外汇指定银行提供相互调剂余缺和清算服务的职能。④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

“外汇并轨”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中的重大改革,它的顺利进行为中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创造了条件。它对于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骤也起了促进作用。

waijiao

**外交** (foreign relations)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路线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创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外交上受尽帝国主义的欺凌。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控制权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立起来”。同时,他提出“另起炉灶”,即彻底割断同国民党政府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即清除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让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等方针,彻底埋葬屈辱的外交,清除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为创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之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经过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周恩来于1949年6~9月领导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对中国外交政策作了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卫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又载明:“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

力。”1978年以来,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充实、完善了外交政策,在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中,更为明确地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50~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兴起。美国从扼杀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出发,不甘心其扶蒋反共政策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扼杀人民中国于摇篮之中。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为实现“一边倒”战略,中国首先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访问苏联,经过商谈,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了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对加强两国友好合作,保障两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此后中苏友好合作得到全面发展。两国政治上互相支持配合,经济上互相支援合作,文化上进行广泛交流,关系发展相当密切。同时,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了全面发展。但中国实行“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同苏联只进行战略上的联合。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明确指出,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丢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时,一面积极加强同苏联合作,一面警惕和抵制苏联的大国主义,始终坚定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为联合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巩固和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5~28日和28~29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分别同印度



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共同倡导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1955年4月18~24日,中国又高举团结反帝旗帜,在亚非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挫败美国破坏亚非会议,分裂亚非国家的图谋,为亚非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中国大力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伊拉克人民推翻反动王朝以及阿尔及利亚等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尽到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团结,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不甘心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竭力执行敌对的政策。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不畏强暴,毅然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经过谈判,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同时,在越南和印支人民进行的抗法斗争中,美国加紧插手干预,其目的是借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支人民之机,侵入越南,从南面威胁中国。1950年1月,中国应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要求,派出一批顾问和提供大量物资援助越南进行边界、奠边府等战役,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1954年4月24日至7月23日,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与会国一起,揭露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破坏阴谋,使美国在政治上遭到惨败;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排除美国干扰,恢复了印支和平,从而稳定了中国南北边境的局势。美国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入侵中国台湾,中国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控诉和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朝鲜停战后,美国又加紧对台湾的控制,于1954年12月8日,签订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其侵台合法化并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为反击美蒋“防御条约”及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为防止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被迫帮助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岛,浙江沿海岛屿随之全部解放。1955年4月18~24日,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美国被迫同意同中国于1955年8月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但毫无诚意,并多次企图中断会议,使这一会谈一直拖延至70年代初中美关系大门打开的前夕。

总的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巩固了独立,中国外交已逐步建立起一条较为完整的路线和独具特色的风格。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25个,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50年代后期起,世界局势发生激烈动荡,各种力量经过分化与改组发生巨大变化,美苏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其盟国独立自主倾向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军仍赖在朝鲜不走,侵占台湾作为反华基地,并破坏日内瓦协议,发动侵越战争,从东南威胁中国的安全。苏联的大国主义此时也迅速膨胀,对外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力图控制中国,使中国服从其战略需要,从而导致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到60年代,苏联领导集团极力推行霸权主义,甚至不惜以战争威胁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从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到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同,直至挑起珍宝岛事件。面对苏美两国夹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决定采取“反对美苏两霸,侧重反美”的战略。毛泽东经过对当时主要矛盾和战争可能性的分析,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确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方针,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对付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

为实现这一战略,中国先从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出发,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领导人改弦易辙。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上台后,再次拒绝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不断挑起包括珍宝岛在内的边境武装冲突,甚至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这时苏联已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中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败苏联的多次挑衅,打开了中苏会谈的大门。1969年9月1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举行边界谈判的谅解。同年10月20日,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停止了武装冲突。

对美国,中国也坚决顶住其压力。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台湾海军盘踞的金门、马祖,挫败美国在台湾海峡两岸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

支援当时黎巴嫩人民进行的反美斗争,迫使美国同意恢复它借故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侵入越南,进行“特种战争”,同时在老挝策动内战,加剧亚洲紧张局势。中国大力支持越南和老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派陈毅外长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同与会国一道,于1962年7月达成恢复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1964年中国大力支持越南击败美国的“特种战争”。1965年美国又直接出兵南越,并对北越进行海空袭击,同时轰炸中国边境地区,扩大侵越战争。中国不惜作出巨大牺牲,支持越南人民取得了抗美斗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中国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在同许多邻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问题的同时,继续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59年古巴革命,1964年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1967年阿拉伯人民抗御以色列的武装侵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反霸、反帝、反殖斗争,都得到中国的大量援助。特别是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对亚非13国的访问,提出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增进了解和加强团结合作起了巨大作用。

中国还以“民促官”的方针,同日本、西欧开展民间外交,发展民间往来,对日本通过渐进、积累的方式于1964年4月达成互设联络处和互派记者的协议,促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对西欧各国也采取民间开道,逐步前进的方针,积极发展友好交往。1963年10月,法国总统戴高乐授权前总理富尔来华商谈建交问题,经过双方谈判,于1964年1月实现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大门。同年11月和12月,分别同意意大利和奥地利建立贸易机构,从而打开美国长期封锁中国的缺口。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不仅顶住美苏两国的压力,而且突破美国长期遏制中国的局面,掀起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在60年代中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比50年代中期增加一倍多。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动乱和极左思潮,一度严重干扰了中国外交的顺利开展,造成约与30个已建交国家发生外交纠纷。好在为时较短,在1968年初,中国及时纠正了偏差,使中国外交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70年代 美国因侵越战争拖累,国力削弱;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机,加速发展军事力量,积极向外扩张。

美苏争霸态势由美攻苏守变为苏攻美守。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争霸，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而苏联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也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因而成为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集中力量着重抵抗苏联的威胁。

中国首先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采取积极行动，调整对美政策，从乒乓外交到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访华。经过双方领导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3年1月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建立直接联系；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

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对中国的威胁更加严峻。中苏边界谈判历时9年，毫无进展；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军事部署在加强；越南全国解放后，苏联积极支持和鼓励越南侵柬反华，1979年苏联又侵入阿富汗，形成北西南三面威胁中国的态势。有鉴于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束同盟关系，摆脱同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转而同美苏霸权主义。同时，经过自卫还击，打退了越南的侵略。

中美关系的改善，还在国际上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同许多国家相继建交。1972年同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建立或升格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发展彼此友好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又同一些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加强彼此的团结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霸斗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中国外交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80~90年代 80年代前半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因争夺世界霸权，不断向外扩张，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国内外矛盾深化，国力削弱。美国自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国力增强。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日益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世界和平可能维护的

科学论断，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据此，他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中国外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国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坚持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和态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为此，中国决定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国家关系的亲疏，纠正过去一度“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的偏向，进一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中美1979年1月建交不久，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违反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原则，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经过17个月的交涉和谈判，于1982年签订中美《八一七公报》。以后中美关系在《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确定的原则指导下，两国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使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都得到稳定的发展。

经过多次磋商，中苏关系逐步缓和。随着影响两国关系的苏联支持越南侵柬、武装占领阿富汗和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等三大障碍的消除，两国决定举行高层会晤。1989年5月15~1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16日邓小平与他会晤，并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双方商定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坚持三尊重的方针下也分别实现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也全面恢复。

同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加强，同邻国关系普遍改善。中国始终把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外交工作的立足点，积极推进南南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

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积极参与

了国际裁军活动，并决定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中国还积极参加了国际和地区的多边外交活动。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还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构想。后经中英、中葡谈判，达成协议，决定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但到8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1989年东欧剧变，随后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平息这场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中国进行“制裁”，施加压力，干涉内政，使中国外交面临建国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中国遵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顶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冲击，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这不仅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而且更快地发展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90年代，中国继续执行积极务实、逐步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的方针，高举和平进步的旗帜，在多边外交领域积极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认真负责地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为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独特作用；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发展与合作；在人权斗争上七次挫败西方反华提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邻国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苏联解体后，1992年12月，中国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俄罗斯联邦和原苏联地区的各独立国家先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经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多次会晤，中俄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边界除东段遗留的个别问题外，基本获得解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也相继划定。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先后签订了关于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等协定。中蒙关系也恢复正常，交往增多。中国西北的边境得到了稳定。在东北亚，中国同韩国建交，发展同朝鲜南北两方的友好合作，并参与

中、美、朝、韩四方会谈，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在东南亚，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建交，同越南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为稳定周边大局，中国在坚持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就此同有关国家达成共识。在南亚，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1996年江泽民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中国与印度也建立了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东盟国家，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后，1997年2月又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定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同年12月，江泽民出席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发表《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立双方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南太平洋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90年代也逐步得到改善和发展。1989年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致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倒退，双方利益蒙受损失。1990年下半年，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因而调整政策，逐步恢复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91年后，经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互访，这些国家逐步取消对中国的制裁。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主张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水平，并提出一系列的提议。同年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席亚欧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同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欧愿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建立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中-欧关系正迈向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日益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中日关系自正常化以来，两国的友好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历史上的和台湾等敏感问题。中国从中日友好

的大局出发，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确认“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出现反复。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先后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中国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期间向台湾海峡水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经过多次斗争和严正交涉，促使美方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继续恪守中美三个公报确定的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随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实现互访，两国宣布，相互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公开承诺“三不”政策，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为落实“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迈出新的步伐。自1979年末，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以来，经过外交谈判，中英、中葡分别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分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中英双方已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成功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澳门也将在1999年按时回归祖国。

香港、澳门的收复，给台湾回归祖国作出范例。但自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竭力推行台独路线，不惜以金钱为手段，谋求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立“邦交”，并不遗余力地企图重返联合国，以所谓“务实外交”，分裂祖国，制造台独。中国加强了涉台外交工作，先后同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等国建交，缩小台湾的“活动空间”；并自1993年以后，连续5年挫败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同时，通过对李登辉访美作出强烈反应，迫使美国政府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访华又公开承诺并宣布：不支持“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台湾加入联合国。中国涉台外交取得阶段性胜利。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加快中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逐步完善，风格独具特色，在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取得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截至1998年底，中国已同16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了崭新的外交局面，为捍卫独立主权、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中国还将认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政策，不断开展外交工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waimao tizhi gaige

**外贸体制改革** (reforms in foreign trade system)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外贸宏观管理体制和外贸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中国的外贸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外贸体制的模式在计划经济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和高度集中制。

**改革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贸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主要分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调整国家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明确政府部门对经贸的管理关系。简政放权，政企责任分开，实行中央和省市外贸两级管理；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开展了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多种外贸经营方式；兴办经济特区，开办“三资”企业；探索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途径并逐步推行代理制；大幅度缩小对进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取消外贸出口收购和调拨计划；开始运用汇率、外汇留成、奖励政策等经济杠杆的手段，调动各方面发展出口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1988～1990），根据财政实行地方包干的体制，下放省以下大部分外贸公司的财务关系，与地方财政挂钩。限制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通过出口退税制度，对外贸企业全面实行出口财政补贴、出口收汇和上缴外汇包干的承包责任制，承包指标一定3年不变；对轻工、工艺和服装3个行业的外贸企业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改革；取消原有的使用外汇控制指标，扩大外汇留成比例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设立了食品、土、

畜等6个进出口商会；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分类经营的管理办法。

第三阶段（1991～1993），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逐年核定承包指标。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的外汇留成；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始，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改革关税制度；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对外经济贸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的精神，使外贸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

第四阶段（1994～），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坚持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改革方向，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了汇率并轨，取消了外贸企业承担的上缴外汇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统一的结售汇制，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1994年7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将对外贸易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1994年全国实行分税制后，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1994年成立国家进出口银行；设立出口商品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商业物资企业外贸经营权，同时最大限度地放开进出口商品经营；取消进出口贸易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按照效益、公正、公开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加快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外贸企业，积极推行股份制试点；1997年初，进行生产企业外贸自营权依法登记试点；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形成全国健全的信息服务网络。

通过上述改革，中国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外贸体制，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经济的通行规则方向发展，即形成一个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宏观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外贸体制。

#### 推荐书目

李岚清主编：《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北京，1994。

wandun shuiyaji zhicheng

**万吨水压机制成**（building of 10 000-ton hydropress）水压机是以水作为工作介质传递压强以产生巨大工作力的锻压机械。大型水压机是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和国防工业等部门所需的重要机械设备。为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生产出2台万吨级水压机。

1958年5月，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致信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上海应有一台自己制造的万吨级水压机。毛泽东和国务院批准了这项建议。当时在上海组成设计班子，由沈鸿任总设计师，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进行制造，组织全国协作。这台水压机为1.2万吨全焊接结构自由锻造水压机，当时上海不具备制造它所需要的特重型的铸钢、锻造、机械加工、热处理和起重运输能力，因而在设备结构和制造工艺上采用了一些特殊办法：先制造了一台试验用样机，取得大量试验数据后，才确定总体设计方案。水压机的立柱直径近1米，长17.69米，净重80吨，用8节铸钢件经电渣焊焊接而成。上、下横梁等关键零件，在缺乏大型加工设备的情况下，用多台移动式机床进行加工。没有大型起重设备，就用几百根枕木和几十个油压千斤顶，硬把300多吨重的下横梁顶起6米高，使横梁平稳地作了360度大翻身。1962年6月，这台水压机投入使用，安装在上海重机厂。经过多年运行，证明其设计制造是成功的。

同年，以沈阳重机厂和第一重机厂为主，组织全国大协作，设计制造1.25万吨水压机。根据东北地区机械制造能力，采用常规方式生产。1962年这台水压机制成，1964年12月在第一重机厂投产使用，技术性能接近当时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Wan Guoquan

**万国权**（1919～）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吉林农安人。1919年3月26日生。1945年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1947年后，任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1954年公私合营后任天津利中酸厂副厂长。1956～1957年任天津市染化工业公司副经理。1957～1963年任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

区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64年后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1978年后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副主任委员。1983年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执行局局长，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顾问。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Wan Li

**万里**（1916～）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16年12月1日出生于山东东平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33年入曲阜师范学校学习。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第二地委、第七地委书记，第八地委（运西地委）书记兼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参加了开创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撰写的《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文章在全边区的民主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1949年3月任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支队参谋长，率队过长江南下。4月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经济部副部长、建设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3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后调北京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长期领导城市建设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了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北京十大建筑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1年复出，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亲自率领工作组到徐州、郑州等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迅速扭转了运输长期阻塞的局面。同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遭到江青一伙的批判攻击，离开了领导岗位。

1977年4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6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

区第一政委。在安徽积极支持和推行农村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大包干”等实验，取得了显著成绩，揭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2月调中央工作，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2年和1987年分别当选为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1984年获得世界最佳桥牌手奖所罗门奖，1986年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金质奖章。主要论著收入《万里文选》。

### Wang Dexi

**汪德熙** (1913~ ) 核化学家、化工专家。原籍江苏灌云。1913年9月27日生于北京。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1937年就读清华大学研究生。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大学化学系、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任教，1947年后历任南开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系主任，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研究生部主任，中国核工业学会常务理事及下属的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副理事长，《核化学与放射化学》杂志主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早期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50年代研制不饱合聚酯玻璃钢，60年代后从事核化学与核化工的研究。提出解决核燃料后处理萃取流程乳化问题的论点，并组织热试予以证实，使新流程在工业上采用。在发展核工业方面，他担负指导和组织核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核燃料产品的分析方法，以及核武器研制、核试验中化学制品的研制和化学测定方法、核电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在其他放射源的研制、氡的提取生产工艺研究，核爆炸当量的测定、核燃料的分析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的“辐照核燃料后处理的萃取工艺”科研项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 Wang Dezhao

**汪德昭** (1905~1998) 物理学

家。江苏灌云人。1905年12月20日生。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33年先后赴比利时、法国留学，1940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进行了声纳的研究，因大气电学研究获得法国科学院虞格大奖，创立的大小离子平衡态理论被称为“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6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无线电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名科学家小组成员。对中国水声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西欧法语区声学家协会奖章和法国巴黎市银质奖章。论著有：《气体中大小离子的平衡态》、《超声波色散和吸收》等。1998年12月28日逝世。

### Wang Dongxing

**汪东兴** (1916~ )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江西弋阳人。1916年1月3日生。1929年秋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乡支部书记、区委副书记。1932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84团营共青团干事。参加第四、五次反“围剿”，在作战中负伤，伤愈后任总兵站第四中站政治处青年干事，入中央苏区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指导员。1934年参加长征，任干部团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特干团骑兵大队副教导员。1935年后任总政直属队机关政治指导员，永坪医院二所政治指导员、院党总支副书记，野战医院政委，沿黄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中央卫生部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政委。1938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29班党支部书记。1939年1月入延安马列学院，5月任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政委，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1942年2月在保卫训练班三期学习，后任西北公学三班班主任、科长，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1947年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任支队副参谋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

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1960年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5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办警卫局局长。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0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任中央军委常委。1976年10月积极参加隔离审查江青集团的行动。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辞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职务。1982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10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Wang Feng

**汪锋** (1910~1998)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王钧治。陕西蓝田人。1910年12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蓝田县学联主席、团委书记。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后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代政治委员，中共汉中特委书记。1934年冬，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做敌军工作。1936年春，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1945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兼鄂豫陕军区政治委员，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乌鲁木齐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兼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被增

补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年12月12日逝世。

### Wang-Gu hui tan

#### 汪辜会谈 (discussions between Wang Daohan and Ku Chen-fu)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的民间的、经济的事务性功能性会谈。出席会谈的双方代表各有10位，海协会有会长汪道涵、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等，海基会有董事长辜振甫、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等。

**产生背景**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随之日趋密切，涉及两岸人的纠纷和犯罪活动等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使得两岸有必要就这些具体问题从事务性商谈。1990年11月21日，台湾当局推动成立海基会，由台湾和信集团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任董事长。海基会是台湾当局授权与大陆联系、协商、“处理涉台公权力的两岸事务的唯一机构”，是台湾当局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工具。为便于与海基会联系、商谈，1991年12月16日海协会成立。协会理事会选举汪道涵为会长。该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

**筹备过程** 海协会成立不久，即于1992年1月8日发函邀请辜振甫等来访，海基会回复“将于方便之时专程拜访”。同年8月4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提出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晤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共利两岸”。辜振甫22日复函表示接受邀请，并提出在新加坡会谈。海协会考虑到辜振甫历受台湾当局有关规定的限制不能来大陆的情况，同意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1993年3月25日至27日，两会举行工作性商谈，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进行准备，并且就“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两项协议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同年4月8日至11日唐树备与邱进益在北京进行“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就会谈时间、地点、人员、议题及有关问题达成8项共识，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依据预备性磋商的共识，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的海皇大

厦正式开始。

**会谈内容** 汪辜会谈的议题有3类：海协会和海基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两岸科技与文化交流。关于两会会务，汪提出了6项建议：加强两会联系与合作；建立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两会各自组成专业小组；互相提供两会人员工作往来方便；继续推动海峡两岸事务性会谈；加强两岸司法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关于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汪提出了8项意见：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迫切性与必然性；两岸经济合作应和衷共济、互补互利、共同繁荣、振兴中华；直接三通应当摆到议事日程；两会应共同筹开民间经济交流会议；台商在大陆投资和大陆经贸界人士访台问题；两岸劳务合作的问题；台湾参与开发浦东、三峡、图们江问题；合作开发能源、资源的问题。关于海峡两岸科技与文化交流，汪提出4点意见：两岸产业科技合作与交流；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两岸青少年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辜在会议中就台湾方面的意见发表了看法，其中包括：建立两会联系与协商制度；非法入侵人员的遣送；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活动；海上渔事纠纷的处理；保障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促成开放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

**取得成果** 经过会谈，双方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4个具体协议文件。此次会谈受到中外的普遍关注。它是1949年以来，两岸人士以民间名义首次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这次会谈的成功，对扩大两岸贸易、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Wang Juqian

**汪菊潜 (1906~1975)** 铁路桥梁工程学家。上海市人。1906年12月29日生。192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赴美国留学，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铁道部工务司技士、技正，中国桥梁公司副总工程师、协理、上海分公司经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工务处处长，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武汉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铁道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职。当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了修复钱塘江大桥、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

大会堂等重要工程，主持全国铁路新线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50年、1951年被评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和全国铁路劳动模范。1975年2月26日逝世。

### Wang You

**汪猷 (1910~1997)** 化学家。浙江杭州人。1910年6月7日生。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后在北平协和医院生物化学科从事有关男性激素的生物化学研究，先为研究生，后任研究员。1935年赴德国留学，193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至1939年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会医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英国伦敦密瑟斯医学院生化研究所担任客籍研究员。1939年回国后，历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讲师、助理教授，上海丙康药厂厂长，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兼上海医学院有机化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化学学报》主编，国际《核酸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国院士。1988年，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早期从事十四乙酰藏红素的全合成和性激素、抗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化学等研究。是中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系统研究了链霉素和金霉素的分离、提纯以及结构和合成化学。参加领导并直接从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淀粉化学方面，创制了新型血浆代用品。所建立的石油发酵研究组，当时在国际上居于前列。参加并参与领导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全合成工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还参加和领导了天花粉蛋白化学结构和应用研究、模拟酶的研究和青蒿素的生物合成化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1997年5月6日逝世。

### Wang Bingqian

**王丙乾 (1925~ )**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河北蠡县人。1925年6月26日生。1939年参加工作。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后，任中共河北蠡县县委机关刻写员，冀中九地委机关收发员、研究员，冀中九分区白洋县委秘书。1945年后，任冀中九分区审计委员会秘书，冀中区审计委员会审计

干事，冀中区财经办事处审计干事，冀中行署财政厅审计科员，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1949年后，任财政部预算司处长，预算司副司长、司长、部党组成员。1970年后，任财政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0~1983年，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3~1992年9月，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92年10月，任国务委员。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 Wang Daheng

**王大珩** (1915~ ) 物理学家。江苏吴县人，1915年2月26日生。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38年后到英国留学，专攻应用光学，是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应用光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光学玻璃制造研究生。1942年后在英国伯明翰公司玻璃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的研究工作。1948年5月回国后，先后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任科学技术部副主任、主任。还当选为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绘学会理事长，国际米制公约计量委员会(中国)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0年代领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80年代由他领导的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和测量技术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光学技术、光学计量、激光技术、光学玻璃、光学工程等领域的工作，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 Wang Enmao

**王恩茂** (1913~ ) 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西永新人。1913年5月19日生。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部长，中共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干事、秘书，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

长、旅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3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11月任第三五九旅副政治委员。1944年11月任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副政治委员，转战湘粤边地区。后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副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吕梁军区政治部主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南疆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8年后，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77年后，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1年后，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有《王恩茂日记》。

### Wang Fang

**王芳** (1920~ ) 1988年任国务委员。山东省新泰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纵队组织部部长、兵团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浙江省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员会书记、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198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Wang Fuzhou

**王富洲** (1935~ ) 登山运动员。河南省西华人。1935年4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同年参加中国登山队。先后登上苏联境内的列宁峰(7134米)、中国境内的慕士塔格山(7546米)和希夏邦马峰(8012米)。1960年中国登

山队首次从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时，他担任突击队长，与贡布、屈银华一起，于5月24日上午9时30分从85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突击顶峰。到达8800米附近，已天黑。为了争取时机，赶在坏天气到来之前登上峰顶，王富洲等3人坚持夜间行军，终于在25日凌晨4时20分登上了峰顶，首创从东北山脊登上海拔8848.1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世界纪录。1959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60年、1964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5年被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1979年任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1992~1995年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1981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1984年、1989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

### Wang Ganchang

**王淦昌** (1907~1998) 核物理学家。江苏常熟人。1907年5月28日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和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及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在莫斯科联合核子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所长。1961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研究员。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后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40年代他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所产生的反冲探测中微子。1964年他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 Wang Guangying

**王光英** (1919~ )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人。

1919年8月26日生。1942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助教。1943~1956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从1949年起兼任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1956年后，历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河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80年后，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是全国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名誉主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 Wang Guofan

**王国藩**（1919~）农村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河北省遵化县人。1919年7月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家务农，1952年冬天，他组织23户贫农靠“三条驴腿”（只拥有一条驴的3/4所有权），办起建明农业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穷人社），成为全国合作化中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给予他高度评价。历任河北遵化县建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建明人民公社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河北省遵化县革委会主任，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唐山地委第二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当选为中共第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任遵化县水利局顾问。

#### Wang Hanbin

**王汉斌**（1925~）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福建惠安人。1925年8月28日生。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学习，并任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1942~1946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任民青第一支部委员、中共第一支部委员。1946年在北平《平明日报》社任编辑，负责领导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中共地下党工作。1948年任中共

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1949~1958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政治秘书，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秘书长、副主任，市委第二办公室主任，市委候补委员。1958~1966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66~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劳动。1975~1977年任北京市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7~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9~1983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83~1988年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1998年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起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Wang Heshou

**王鹤寿**（1909~1999）1985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河北唐县人。1901年4月19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京汉铁路石家庄工会秘书，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南满特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秘书，天津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北安军区政委，中共龙江省委书记，龙江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重工业部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领导了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工作。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5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7~199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9年3月2日逝世。

#### Wang Hongwen

**王洪文**（1934~1992）原中共第十届中央副主席。吉林省长春市人。1934年12月生。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后被安排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当过工人、保卫科干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洪文率先贴出大字报，造厂领导的反。1966年11月，串联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制造了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切断沪宁铁路交通达30多个小时。12月28日，参与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91人。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参与组织批斗上海市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全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同年2月，任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8月4日，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事件，关押和伤残650人。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72年9月，由上海调到中央，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负责筹备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从此，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积极参与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他曾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负责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在江青等密谋下，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王洪文指使人到一些省，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还伙同张春桥等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并直接控制“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毛泽东逝世后，他背着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的办公室汇报，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将其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



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病死。

#### Wang Jiexiang

**王稼祥** (1906~1974) 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徽泾县人。1906年8月15日生。1925年5月，在芜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同年8月进上海大学附中，加入共青团，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考入红色教授学院，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3月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先后主编《红旗》、《实话》。1931年2月任苏区中央局常委，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抵达中央苏区，犯有“左”倾错误。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0月带伤参加长征，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行军，促成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讲话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批评错误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指挥红军，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成为军事3人小组成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长征。1937年初赴苏联治伤，伤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9月回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确定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主任兼八路军总政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华北华中工委主任。1941年9月中央成立学习研究组和中央研究组，任副组长。在延安整风中，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系统高级干部整风学习。1943年7月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提出并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49年6月随刘少奇访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1951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1962年2月，提出对外采取缓和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建议，被指责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文化大革命”中进而被诬蔑为“三降一灭”的卖国投降外交路线，受到迫害。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河南信

阳。1973年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病逝于北京。

#### Wang Jie

**王杰** (1942~1965) 革命烈士。山东省金乡县人。1942年5月生。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战士、班长。1962年2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在执行训练施工、抗洪救灾等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曾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1965年7月14日，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当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时刻，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生命安全，用身体扑在炸药包上，光荣牺牲。被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命名他所在班为“王杰班”。1965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他学习。1989年4月5日，他的家乡山东省金乡县为他建造了花岗岩全身雕像。

#### Wang Jinxi

**王进喜** (1923~1970) 油田工人，劳动模范。甘肃玉门人，1923年9月生。1938年在甘肃玉门油矿当徒工。1949年起在玉门油田当钻井工，1956年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率钻井队创造月进尺5000米的全国钻井纪录。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1960年率钻井队奔赴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参加大会战，在艰苦条件下，自己带头并发动群众，以创业精神和人拉肩扛、砸冰端水的办法，只用6天就打出第一口井，取得油井开采的成功。1966年率钻井队奋战11个月，突破钻井进尺10万米大关，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钻井最高纪录。他被誉为工业战线上的“铁人”。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1月15日病逝。

#### Wang Junxia

**王军霞** (1973~ ) 田径运动员。女。辽宁省大连市人。1973年1月9日生。1992年在第4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中，获女子10000米冠军，成绩32分29秒90。1993年4月跑出了2小时24分7秒的当年世界马拉松最好成绩。8月获

第4届世界田径锦标赛10000米冠军，成绩30分49秒30。9月在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分别以8分06秒11和29分31秒78的成绩创女子3000米和10000米的世界纪录，并获两项冠军。10月在第5届世界杯马拉松赛中，取得个人和团体两项冠军。11月被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授予1993年世界田径最佳运动员的称号。1994年2月1日在纽约荣获第14届杰西·欧文斯国际奖，成为第一位获此国际荣誉的中国人和亚洲人。1994年第12届亚运会获10000米冠军，成绩30分50秒34，排当年世界第一位。1996年第26届奥运会获女子5000米金牌，并以14分59秒88创奥运会纪录，10000米获银牌，并以31分02秒58破奥运会纪录。1993年和1994年入选全国田径“十佳”运动员。1994年、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1998年去美国留学。

#### Wang Kunlun

**王昆仑** (1902~1985) 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笔名太愚。1902年8月1日生。江苏无锡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后随军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王炳南、屈武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3年又与谭平山、陈铭枢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内部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活动。1948年赴美国考察，协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49年进入解放区，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和代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1985年8月23日逝世。著有《红楼梦人物论》等。

#### Wang Li

**王力** (1900~1986) 语言学家。

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00年8月10日生。14岁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得亲友资助考入上海南方大学，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学者。192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实验语音学，1931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54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直到去世，曾任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长期致力于中文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汉语语言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重要贡献。在汉语语法体系、汉语语法理论、汉语音韵、古代汉语韵部的分部和语音的构拟、汉语发展史、汉语教学体系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博白方言实验录》（法文）、《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册）、《中国语法纲要》、《字的形音义》、《虚字的用法》、《汉语的共同语和标准音》、《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字》、《诗词格律》、《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常识》、《龙虫并雕斋文集》、《楚辞韵读》、《中国语言学史》等。发表论文120余篇，译著20多种。1986年5月3日逝世。

#### Wang Luobin

**王洛宾**（1913～1996）作曲家。曾用名艾依希丁。1913年1月7日生于北京。1931年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声乐和钢琴。1937年参加敌后抗日演出队，1941～194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入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1960～1975年蒙冤入狱，1979年获平反。毕生挖掘、改编和配译介绍了十几个民族的大批民歌，如《达坂城》、《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汗》、《玛依拉》等，创作了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优秀歌曲《洗衣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高高的白杨树底下》、《亚克西》及歌剧《两代人》、《带血的项链》等，深受群众喜爱，在国内外

广泛流传。有“西北歌王”之誉。1996年3月14日病逝。出版8部歌曲集，部分作品收入《洛宾歌曲选》、自选作品集《纯情的梦》。以他的音乐人生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往事歌谣》。

#### Wang Meng

**王蒙**（1934～）作家。祖籍河南北平皮县，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平。中学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担任青年团干部。1953年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胆、尖锐地触及基层领导机构和干部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作风，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下放劳动。1962年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3年调新疆文联工作，曾在伊犁农村劳动锻炼7年。后回自治区文化局、文联从事翻译、创作等工作。1978年调回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创作了大量小说、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作品曾多次获奖。《风筝飘带》和《蝴蝶》分别获北京市和全国最佳小说奖，《相见时难》获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奖。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哲理。既描写了中国人民艰难曲折的前进历程，又浓缩着自己的人生体验。艺术上既广泛借鉴，又善于创新，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关注。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 Wang Qimin

**王启民**（1937～）科技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浙江湖州人，1937年9月16日生。历任地质师、副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1961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自愿到大庆油田参加石油会战。36年来，以大庆“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克服各种困难，全身心投入油田地质开发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油田8项重大开发试验任务，参加40项科研攻关课题，打破“表外储层”的禁区，为油田建设特别是油田开发进入中晚期后的高产稳产做出了贡献，给国家增加2000多亿元的财富。1997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石油行业最高科技成果奖——“铁人科技成

就奖”金奖，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授予“新时期铁人”荣誉称号，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当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 Wang Renzhong

**王任重**（1917～1992）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国务院副总理。河北景县人。1917年1月15日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景县乡村师范学校支部书记、县委委员、泊镇区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兼任政治教员。1938年起，先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区党委常委、行署专员、党组书记。抗战胜利后，任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49年5月随军南下。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兼代市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政协湖北省委员会主席。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华中协作区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任，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陕西建设委员会主任。1978年底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1992年3月16日逝世。著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 Wang Shoudao

**王首道**（1906～1996）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湖南浏阳人。1906年4月13日生。早年曾就学于长沙农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家乡从事农民革命运动，任中共浏东特别支部书记、中共浏阳县委书记。1928年任

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31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参加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后又任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后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席。1979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6年9月13日逝世。著有《王首道回忆录》，出版有《王首道文集》。

#### Wang Shouguan

**王绶琯** (1923~ ) 天文学家。福建福州人。1923年1月15日生。1943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950年攻读天文并被聘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1953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及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授时工作主持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射电天文研究室主任、台长，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天文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务委员及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天体物理学报》主编等职。主要从事射电天文学的观测研究，开创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领域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进。50年代曾先后在紫金山天文台参加恢复天体物理观测工作，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提高授时精确度的任务。1958年参加筹建北京天文台。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主持提高中国授时精确度、开拓并推动

天体测量学发展、创建北京天文台及组织射电天文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领导建立了太阳厘米波常规观测，建成了太阳米波多天线干涉仪，并主持领导了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研制。著述内容包括射电天文方法、大型射电望远镜、多天线干涉仪及复合干涉仪等方面。

#### Wang Shuwen

**王叔文** (1927~ ) 法学家。四川青神人。1927年4月3日生。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51年到苏联留学，在喀山法学院、喀山大学法律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1979年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9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家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起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专长国家法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编著有《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宪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法学40年》(副主编)、《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等。

#### Wang Shusheng

**王树声** (1905~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宏信。湖北麻城人。1905年5月26日生。早年当过私塾教师、小学校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6月指挥本县农民自卫军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大战破寨岗，击退地主武装万余人的进攻。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分队长，工农红军大队党代表、团长、师长等职，参加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和反“围剿”作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平汉路西转移时，率部担任后卫，奋战新集、土桥铺，迭挫围追堵截之敌。而后指挥所部鏖战漫川关，越过大巴山，进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与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

挥兼31军军长，参与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1936年长征到陕北后，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九军军长)，西路军失败后，孤身一人历尽危难辗转到达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2月，率豫西第三、四支队到豫西组建河南军区，任司令员。抗战胜利后，率部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946年在中原突围中，指挥所部和15旅组成的左路军，由广水越过平汉路进入武当山区，创建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任中共鄂西北区委书记、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任鄂豫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翌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11月起，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他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月7日逝世。

#### Wang Wenyuan

**王文元** (1931~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用名王秀纯。湖北黄陂人，1931年2月生于河南舞阳。1950~1953年任湖北黄陂县乾顺油厂、大冶钢厂会计。1953~1956年在东北会计统计专门学校会计系、东北财经学院财经系学习。1956~1958年任东北财经学院财政系助教。1958~1982年任辽宁大学经济系助教、讲师。1982~1988年历任辽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九三学社沈阳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沈阳市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1992年任辽宁省副省长、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92年至今，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成本会计学》等。

#### Wang Xuan

**王选** (1937~ ) 计算机专家。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5日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历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方正集团总顾问、董事长，北京大学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文字

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748”工程总负责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香港方正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王选为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共获得9项中国和欧洲专利，主持研制和开发的中文计算机照排系统引起了中国出版业的一场革命，在海外也得到广泛使用。他被誉为中国现代电子出版系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获得首届毕升奖和首届森泽幸夫奖，1990年获得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4年获得美洲工程师协会奖，1995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3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八届委员。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届委员，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 Wang Yanan

**王亚南** (1901~1969) 经济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字渔邨，又名直淮。湖北黄冈人。1901年9月生。1927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1年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赴武汉任国民政府军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1940~1949年，先后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大学校长、《经济研究》、《新建设》编委，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学术贡献：一是翻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主张把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原理，研究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提出它是由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民族经济与殖民地经济交错在一起的一种经济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强调只有通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经济才能得到根本改造。1935~1938年，共同完成马克思《资本论》全书三卷的翻译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资本论〉研究》、《王亚南文集》1~3卷。主要译著还有：《人类婚姻史》、《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1969年11月13日逝世。

#### Wang Yongqing

**王永庆** (1917~ ) 台湾实业家。台湾台北人。祖籍福建省安溪。1917年1月8日生。嘉义商工专业学校毕业。1975年获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早年当过茶园杂工、料店徒工等，经营过米店、碾米厂和砖厂。1946年转而经营木材业。1954年创办台湾塑胶公司，1957年发展为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后又创办南亚塑胶公司、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台旭纤维公司、台湾化纤公司、朝阳木业公司、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私立长庚纪念医院等。1972年任联合文化事业公司和台湾《经济日报》公司董事长。1974年任台美“技术合作研究会理事长”。1983年任与日本丰田公司合资创建的国丰汽车公司董事长。现任世界通商公司董事长、亚洲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等职。拥有的台塑集团下辖台湾塑胶、南亚塑胶等15家子公司，主要生产塑胶及塑胶制品，同时经营人造纤维、合板工业、机械、制衣、水泥、碳纤维和集成电路等业务。在台湾百家大富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王永庆于1990年和1998年来大陆考察，在福建漳州投资兴建火力发电厂。著有《论经营与管理》一书。

#### Wang Zhaoguo

**王兆国** (1941~ ) 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河北丰润人。1941年7月生。1961年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涡轮机专业学习，在校期间曾任系学生会副主席，校学生会常务委员、文化部部长。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后，历任第二汽车制造厂车桥厂技术员、车桥厂团委副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厂党委常委、厂政治部副主任兼车桥厂党委第一书记。1979~1982年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82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84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85年在中共第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代省长、省长。1990年调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91年后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秘书长、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Wang Zhen

**王震** (1908~1993) 1988年至199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湖南浏阳人。1908年4月11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长沙工人暴动，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和兵运工作。1929年参加和组建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区委和游击队，担任特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1930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率部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他同任弼时、肖克率部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与贺龙领导的三军团会师。随后，参与指挥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部继续长征，次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作为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之一，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参与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并挺进晋察冀边区，指挥所部多次重创日本侵略军。1941年率部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和卫戍区司令员。1944年10月奉命组成南下支队，任司令员，与政委王首道率部挺进华南，先后创建了湘鄂赣游击根据地和湘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中共晋绥吕梁区委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中原突围，率部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1949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新疆，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领导驻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建军垦农场，为开发建设西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修建黎湛、鹰厦铁路。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带领部分转业官兵，在黑龙江北大荒建立了第一个军垦农场。与广大军垦战士一道艰苦创业，创立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主力军。1956年5月任农垦部部长。同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973年、1977年分别在中共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李先念抓经济工作，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他对重新恢复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及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贡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年3月1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

#### 推荐书目

《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9。

#### Wang Zhongyu

**王忠禹**（1933～） 国务院国务委员。吉林长春人。1933年2月生。1950年入吉林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历任吉林造纸厂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工程师、副科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80年后任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局副局长。1981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培训班学习。1982年后任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厅厅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吉林省副省长、省长。1992年后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后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1998年任国务院国务委员。

#### Wang Zhuxi

**王竹溪**（1911～1983） 物理学家、教育家。湖北公安人。1911年6月7日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年8月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物理学报》主编，教育部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等职。在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长期从事物理教学，培养出杨振宁等一大批人才。1983年1月30日逝世。著作有《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导论》等。

#### Wei Guoqing

**韦国清**（1913～1989） 中共第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邦宽。壮族。广西东兰人。1913年9月2日生。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军。翌年参加百色起义编入红军第七军，任排长、连长。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军转战到中央苏区，先后在瑞金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工作，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中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到陕北后任红军教导师特科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大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1940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第五纵队3支队政委，参加开辟苏北和恢复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后任新四军第三师9旅政委、第四师9旅旅长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第四师副师长等职，曾率部担负山子头战役的主攻任务，参与指挥了西进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政委等职。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1950年应邀率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参与指挥了奠边府等战役。1956年回国后，历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区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1977

～198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9年6月14日逝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Wei Lihuang

**卫立煌**（1897～1960） 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897年2月16日生。1917年任孙中山的卫队士兵，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升至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第四十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1930～1937年参加蒋介石国民政府消灭共产党武装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抗战。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和南路军总司令，在山西指挥了忻口战役。1939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山西抗日前线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签订驻军防区的协议，与八路军建立过合作关系。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他配合八路军与日军作战。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同日军作战。1945年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并连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任东北行辕代理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因消极避战，被蒋介石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获释后去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祝贺，并参加香港的民主战斗同盟，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55年回到北京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6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病逝。

#### weisheng shiye

**卫生事业**（health service）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事业，是以中国传统医学、西医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基础，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保护和增进人民身心健康，促进人民智力、体力、品德全面发展的事业。

**起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卫生工作队伍、机构及药品、器械供应的基础十分薄弱。据1949年统计，全国中西医结合卫生技术人员共有505 040

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仅有 38 875 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大城市里工作。药品供应不足,许多化学药品必须依靠进口,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进口,致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恶劣,传染病、地方病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与健康。1949 年前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 3670 个、病床 8 万张,其中医院和卫生院 2600 所。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 25%左右,婴儿死亡率为 200%左右,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 35 岁。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卫生事业,从奠基到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奠定基础时期(1949~1954)** 1949 年 11 月 1 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当时工作的目标是:推广医药卫生事业,防治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以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主要工作;建立、恢复与扩充各级新旧卫生医药机关;团结、改造与提高新老卫生医药人员,为人民服务;培养大批公共卫生、医、药、产、护等人员,从事保健、防疫与医疗工作;逐渐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与发展医药生产,逐步达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自给自足;指导有关医药卫生学术的研究及其普及工作。1950 年 8 月,在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把“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全国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1952 年 12 月,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发动群众同疾病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并要求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一时期,卫生防疫的重点是预防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为保护母婴健康,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同时加强卫生宣传,成立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各类医院和卫生院数量有较大增长,全国新培养出 6 万多名高、中级卫生人员和 60 多万名初级卫生人员,少数民族卫生干部也开始成长。

**全面发展时期(1954~1965)** 首先在防治流行病和保护母婴健康方面开展工作。1956 年后,各地先后建立起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建立了定期的卫生检查制度,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到 60 年代初,天花在中国已告灭绝,白喉和百日咳经过积极推行预防接种,发病率也逐年减少。60 年代,国内成功研制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麻疹活疫苗,小儿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得到扼制。霍乱、鼠疫、疟疾、黑热病、结核病等的预防和治疗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于全国各地先后采取行政手段关闭了全部妓院(见禁娼斗争),消除了性病的社会根源,并对所有性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到 1959 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已基本消灭。为了切实保障母婴的健康,国家加强对接生婆的改造和助产人员的培养,到 1965 年经过培训的接生员队伍已达到 685 740 人。这使一直威胁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病明显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其次,建立医疗保健制度和城乡卫生医疗网。1956 年,农村联合诊所发展到 51 000 个以上,到 1958 年,大部分转为公社卫生院。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 1965 年,全国省地县级的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都已建立,全国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发展到 42 711 所,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发展到 6275 所,大部分公社都已建起卫生院,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已基本形成。第三,开展医学科研工作。1955 年和 1956 年,先后成立了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医学科研机构。第四,兴办医疗卫生教育,培养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到 1964 年,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已发展到 87 所,在校学生达 85 195 人,当年毕业生有 25 079 人。中级卫生学校发展到 242 所,在校学生达 67 524 人,当年毕业生有 23 926 人。第五,发展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到 1965 年,中国已有医疗器械厂 138 个,一般的手术器械和显微镜、中小型 X 光机等都能自给,基本上保证了各级医院的需要。此外,还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1954 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到 1965 年,全国中医医院已发展到 330 所,病床 14 119 张,不少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设立了中医科。

**遭受挫折时期(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卫生工作遭到破坏,各级卫生部门出现了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很多工作陷于停顿。一些卫生机构被取消,各种保障人民健康的卫生防疫条例、法规失去作用,正常的医学教育不能开展,科研工作无法继续。一些中、西医专家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已得到控制的疾病重又抬头,人民健康受到了危害。这一时期的卫生工作仍有一定的进展,如农村的基层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有较大发展,合作医疗普遍开展起来,中草药采集量有所增加,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获得新进展,农村的环境卫生有所改善,对五大水系、6

个海湾的水质和 221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作了系统调查等。

**新的发展时期(1977~ )**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是:贯彻预防为主,发展传统医学,搞好农村卫生,抓好计划生育,加强科学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技术。大批卫生机构得以恢复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相继重新建立。在防治和消灭流行性疾病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如取得预防克山病的重大研究成果。到 1983 年,全国已有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疗养、研究机构 120 余所。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各项卫生制度和法规进一步完善。控制流行性疾病、改善城市和工矿区卫生状况、加强妇幼保健的工作有较大进展。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医学的国际交往日渐增多。医学教育获得大发展。

**体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卫生工作的组织和制度是根据三方面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一是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老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二是汲取了旧中国原有的经验,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为了适应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医疗工作的开展,卫生部还建立了专门的卫生宣传机构。同时对医学基础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当时根据实际需要,将医学教育分为 3 级:高级是四年制,培养医师和药剂师;中级是二年制,培养护士、助产士、医士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初级为三个月,培养乡村卫生员、妇幼保健员和助理护士。还有计划地发展了化学制药工业,各级卫生部门都建立了药品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机构。但由于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置主要是参照苏联的作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为此曾对行政机构进行了几次调整。从 80 年代起,把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划归专门成立的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经营由新成立的国家医药管理局承担。

**建设成就** 50 年来,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截至 1997 年底,全国共有卫生机构 315 033 个、床位 3 134 516 张,其中医院 16 376 个,卫生院 51 535 个,疗养院 506 个,门诊部 3984 个,卫生防疫机构 4012 个,妇幼保健所、站 2748 个,药品检验机构 2014 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426 个。病床数约为 1949 年前的 39 倍,医院和卫生院约为 1949 年前的 26 倍。有卫生人员 5 516 176 人,其中高级

卫生技术人员 2 674 118 人, 占卫生人员总数的 48.5%, 中级卫生技术人员 1 259 766 人, 占 22.8%, 约分别相当于 1949 年的 68.74 倍和 12.2 倍。共培养医药院校毕业生 3 647 352 人, 相当于 1949 年前的 72 倍。许多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急性和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的控制, 防病治病取得很大成绩。以寄生虫病的防治为例, 1955 年中共中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 将流行最为严重、危害性最强的血吸虫病作为防治的重点, 同时对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进行防治。1958 年, 首先基本上消灭了黑热病。到 1997 年底, 在 404 个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区中, 累计达到消灭标准的县、市、区有 234 个。山东、贵州和广西等 12 个省、自治区境内基本上消灭了丝虫病。经过 50 年的努力, 寄生虫病的流行区域已大大缩小, 患病率和病死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960 年, 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重点防治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等。农村改水、改厕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截至 1997 年底, 因改水受益人口达到 84 843 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 88.9%。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也不断加强,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得到很大发展。截至 1997 年底, 全国人口死亡率由 1949 年的 20% 下降为 6.51%。

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 使国家职工有病就医得到经济保证。但在医药费开支上的浪费很大。因而对公费医疗制度进行了改革, 使医疗保障制度朝着保障行为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医疗保险目标前进。对医疗机构则实施“总量控制, 结构调整”改革, 对现有的不合理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同时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见医疗体制改革), 1997 年卫生事业费实际支出 2 470 571.6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2 092 043.15 万元。

#### 推荐书目

钱信忠著:《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北京, 1992。

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6。

#### Wei Jianxing

**尉健行** (1931~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浙江新昌人。1931 年 1 月 2 日生。1947 年在上海

光华大学附中学习。1949 年 3 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同年入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1952 年毕业后, 在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抚顺俄语训练班学习。1953 年赴苏联乌拉尔卡明斯克铝加工厂学习企业管理。1955 年回国后至 1966 年, 历任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一〇三车间主任、厂长办公室主任、厂生产总指挥、厂党委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下放到车间劳动。1970 年后, 任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生产部部长、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厂党委常委、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厂党委书记。1980 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81 年后, 任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市长。1982 年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3 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1984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5 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 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2 年 10 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书记。1993 年 10 月任全国总工会主席。1995 年 4 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97 年 9 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书记。

#### Wei Wei

**魏巍** (1920~ ) 现代散文家、小说家。原名魏鸿杰。河南郑州人。1920 年 3 月 6 日生。1937 年参加八路军, 后到延安,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长期在部队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1939 年至 1949 年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三次赴朝, 先后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 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前进吧, 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热情洋溢, 格调高昂的作品。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更是广为传颂的名作。他的散文、报告文学被誉为“火热的诗篇”。此后, 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东方》以宏伟的规模、细腻的笔触, 把朝鲜

战场的战斗生活和祖国内地的革命和建设交织在一起, 艺术地再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 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历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等职。

#### Wen Jiabao

**温家宝** (1942~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天津市人。1942 年 9 月生。196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1965 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学习, 1968 年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研究生毕业, 后历任甘肃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副队长。1979 年任甘肃地质局副局长、副局长。1982 年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党组成员。1983 年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85 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6 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7 年 11 月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8 年起, 兼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十四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五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97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98 年 6 月, 兼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委员。

#### wenhua dageming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间, 中国进行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和卷入其中, 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 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对中国的阶级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状况等方面的错误判断, 从防止“和平演变”的目标出发, 他认为: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

路线, 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 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 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集中地反映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 这些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过程 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 1969 年 4 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其前期。在这一时期里,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全面发动、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以及建立革命委员会和部分恢复中共党组织生活等阶段。在发动阶段,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机构普遍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瘫痪, 中央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 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部。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 在各地煽动“打倒一切”。1967 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引发了对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以至企事业单位的“夺权”。导致了 1967 年下半年的“全面内战”, 使全国的动乱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但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却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 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央的地位。并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并正在通过“斗批改”运动胜利地走向结束。从 1969 年 4 月至 1976 年 10 月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这场运动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走向全面的胜利, 而是因其全局的错误而继续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1970~1971 年, 在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 为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 阴谋败露后叛国外逃, 机坠人亡。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 年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 以及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各种方针政策。虽然这两次整顿在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 1975~1976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 被当成“复旧”和“右倾翻案”压

制下去, 但却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为最终结束这场动乱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加紧篡党, 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同年 10 月, 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中,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 但却一直没有停止。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发动初期, 由彭真主持起草、经刘少奇、邓小平批准的《二月提纲》, 以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派出的工作组, 都力图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缩小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对知识、文化和教育界的冲击。在 1966 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 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激烈地反驳了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搞乱全国的主张。1967 年 2 月前后,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 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972 年, 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 周恩来领导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调整,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着手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和军队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并产生了一些改革的思想萌芽。这两次整顿是 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整顿虽然都被压制下去, 但却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多数人参与和被卷入运动, 是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他们并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 许多人因此遭到程度不同的打击, 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怀疑、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地下到公开、由自发到自觉, 在 1976 年 4 月汇集成强大的抗议“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为最终结束动乱、打倒“四人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评价 “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被当做修

正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 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被打倒的“走资派”, 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数计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迫害, 民主与法制被肆意践踏。它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誉, 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严重地禁锢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 5000 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破坏, 加大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距离, 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实践证明,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而是一场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 年 6 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等问题作了总结。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85。

wenhua keji weisheng sanxiaxiang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campaign to bring the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ine to the rural area) 1996 年 12 月 26 日开始由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卫生部、国家科委等 10 个部委组织的, 包括图书报刊下乡、戏剧影视下乡、科学技术科技信息下乡、卫生知识医疗技术下乡以及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卫生工作者下乡的活动。这是在农村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 “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 组织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鼓励和支持农民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文化下乡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 科技下乡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 卫生下乡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对于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缩小城乡差别,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各项工作, 都有重要作用。截至 1999 年 4 月底, 共送下乡图书 1.5 亿多册, 送戏 340 多万场, 电影下乡



1300 余万场；下乡科技人员 200 多万人次，办科技培训班 49 万多人次，有近 1 亿农民参加了培训；12 600 多支医疗队下乡，给 1720 多万农民治了病，培训乡村医务人员 50 多万人次。

中宣部等部门提出“三下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各地各部门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收到良好效果。主要有：①政策引导。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文化科技卫生工作者服务农民，鼓励城市单位支援农村。②设施建设。在农村新建一批文化活动场所，一批乡村医疗网点。③队伍培训。培训基层文艺骨干，培训农民科技带头人，培训乡村医务人员，在农村中初步形成一支不走的“三下乡”队伍。“三下乡”是一件利国利民之事，各地各有关部门都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行认真研究，有总体计划，具体安排，将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 wenwu shiye

### 文物事业 (protec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代世界各国无不重视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中国早在商周时代便已保存前代遗物，汉唐以降，皇室收藏十分丰富。宋、清两代随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加强了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在明代，《大明律》中已明确规定地下文物归于国有。1840 年后，中国文物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目标；西方近代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的结合，则推动了文物研究的发展。1930 年，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护法》，并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但直至 1949 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文物管理实体，地方上缺少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各地文物仍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还在 30~40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建立过保护机构，公布过保护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即在中央和地方建立文物保护单位，颁布一系列文物保护法令法规，成立专门研究单位。近 50 年来，中国已形成完整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并在文物的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

**体制沿革**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在文化部内设立文物事业管理局。1965 年 8 月，改为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随文化部一起陷于瘫痪。1970 年，发现长沙马王堆汉墓，以此为契机，1971 年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归当时的国务院图博口领导。1973 年 2 月，

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直属国务院。1982 年 4 月，国家文物管理职能再次归属于文化部，设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1987 年 6 月，恢复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属国务院，由文化部代管，对外独立行使职权，计划单列。1988 年 6 月，改名为国家文物局。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仍为国家文物局，归口由文化部管理。

各省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为文化局内的文物处或社会文化处。“文化大革命”后，陆续成立了一些文物局、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基层，则有文物科、文物工作站、文物保管所等，或由一些文物事业单位代行行政管理职能。

国家文物局直接管理若干文物单位，其中有：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国际友谊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中国物物流通协调中心、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些省以下行政区内也分别设文物考古研究单位和文物保管所等。1985 年 5 月，为适应文物鉴定、审核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成立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其后，各地相继成立了文物鉴定组。截至 1997 年年底，全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文物、博物馆从业人员共有 6 万余人。

**文物法规** 50 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条例》及与之相关的文物保护措施，对避免和减少文物的损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诸多文化事业中，文物事业率先走上了加强法制的道路。1982 年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1982 年 11 月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2 年，又颁布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另外，还先后产生了《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考古发掘管理办法》、《文物复

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专项法规。在一些相关的国家大法和行业法规中也都订立了保护文物的条款。保护文物的法规体系已基本上形成，并不断地完善、周详和具体化。

**人才培养** 为适应文化遗产丰富的国情，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始终抓紧人才培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作为应急措施，从 1952 年至 1955 年，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连续举办了 4 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先后培训 300 余人。1952 年、1953 年还举办了两期古建筑维修保护训练班，每期 10 余人。这些被培训的人员，以后大都成为文物事业的骨干。

在正规的院校教育方面，北京大学于 1952 年设立了考古专业，1983 年发展为考古系，1998 年又扩大为文博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南开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考古系、考古专业或博物馆专业。此外，一些理工科大学的毕业生陆续进入文物建筑维修和文物保护的行列，成为文物战线的重要科技力量。

**文物保护经费** 1952 年，中央政府按当时币制设立了 120 亿元（相当于后来的 120 万元）的年度文物专项资金，用于补助重要文物建筑的维修、重点考古遗迹的发掘和珍贵流散文物的收购。直至“文化大革命”前，这项资金一直保持在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之间。“文化大革命”中直至 1992 年以前，这项资金逐步增加到 5600 万元。1992 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之后，每年的经费以 5000 万元为基数，增加 8000 万元。1996 年以后，在 1.3 亿元的基础上，又逐年略有增加。对一些临时出现的文物抢救项目或非文物主管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维修项目，则另有不定期或定期的补助。这一专项经费的设立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保障和示范作用。各省、市、自治区依例也都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方面作了相应安排，总数大致与中央经费相等。

**保护系列** 据文物普查，已核实全国有不可轻易移动的文物点 35 万余处。依据法规，它们被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或指定保护对象。其中，共公布了 4 批 75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已达 7000 余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约有 5 万余处。共公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批 99 座，各地还评定了一些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遗迹和遗物。在所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中,便包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个时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建筑物。例如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遗址、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北京大学红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雨花台烈士陵园、天安门等。

中国于1985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自1987年始,中国先后有21处古城、古建筑、古园林、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文化景观和风景名胜被列世界遗产。其中属于文化遗产或兼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有: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黄山、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拉萨布达拉宫、武当山古建筑群、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庐山、苏州古典园林、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颐和园、天坛等。

可轻易移动的文物大多收藏和保存在各级博物馆和其他一些文物保管单位。截至1997年底,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全国有各级各类博物馆1274座、文物商店123个、各类文物藏品近1200万件。

**文物维修** 中国的文物维修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与国际通行的尽可能保持文物的真实性及相关历史环境的原则相一致。针对中国文物数量多而经费相对短缺的状况,199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1995年又提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1949年以来,每年都有重大的文物维修工程进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都得到加固维修。山西永乐宫搬迁,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加固,长城维修,布达拉宫重点抢险加固,新疆阿巴和加麻扎(清代伊斯兰教首领陵墓)加固维修等一系列成功的保护工程受到世人瞩目和称赞。

**文物发现** 1949年以来,通过文物调查发现了大量地上文物,著名的如甘肃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山西平遥镇国寺、浙江余姚保国寺大雄宝殿、山西永济永乐宫等。地下文物的出土依靠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发掘的方针是以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保护性发掘为主,适当进行少量服务于重大科研课题的主动发掘。1949年以来,振奋人心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巫山遗址、元谋人遗址、蓝田人遗址、汤山猿人遗址、金牛山人遗址、仙人洞遗址、玉蟾岩遗址、河姆渡遗

址、大地湾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汶口遗址、牛河梁遗址、反山墓地、柳湾墓地、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干商墓、三星堆遗址、上村岭虢国墓地、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南越王墓、长沙简牍、法门寺地宫、辽陈国公主墓等一系列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文物大国地位。考古发掘的经费来自于国家拨款及基建单位的支付。考古发掘的规划、发掘项目的审批、发掘质量的监控和发掘成果的管理,由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革命文物的收集、保护和整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这方面的工作,突破了对文物概念的传统认识,扩大了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范围。

**文物科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物科技工作仅限于文物修复、测绘、摄影、装裱等。60年代起,逐渐引入了碳14、热释光等年代测定技术。现代技术还被运用于文物的保护。纸质文物、漆木器、土质文物的保护水平已位于世界前列。自1978年以来,文物保护科技界共有“乙二醛脱水加固型古代饱水漆木器”、“应用PS-C加固风化砂岩石雕的研究”、“潮湿环境下石窟围岩裂隙灌浆补强材料的研究”、“出土铁器文物脱盐缓蚀保护研究”、“青铜文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等10余项成果获国家级奖励,近百项成果获省、部、局级奖励。此外,遥感探测技术被用于对长城和一些大型遗址的考察,水下考古、航空考古也已得到开展。科技成果的推广大大提高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水平。到1997年,全国的文物科研机构已有51个,从业人员近2400人,高、中级科技人员有313人。

**流散文物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开的珍贵文物出口被有效地制止。1951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即批准以重金从香港购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著名法书。此后,又陆续从海外购回韩滉《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司马光《通鉴》手稿等书画珍品和善本图书。流散文物的收集和收购受到重视。散存于社会上的流散文物的经营活动,由文物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商店专营。盗掘古遗址、古墓葬,走私文物,非法买卖文物等行为都在禁止、打击之列。

**宣传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先后出版了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刊物《文物》和《考古》。1957年,又成立

了专业性出版机构文物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专辑数量大,学术水平高。创刊于1987年的《中国文物报》,最初为每周一刊,1998年改为每周两刊,每刊的发行量达2万余份。此报在业内受到重视和欢迎,并成为国外一些文物考古机构、博物馆和图书馆必备的报刊。为了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普查的成果,按省、市、自治区分编的《文物地图集》陆续结集出版,受到普遍关注。

通过文物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科普教育是中国文物工作的内容之一。在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展业和展示中,丰富多彩的文物在进行上述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国际交流** 70年代以前,中国出土文物有少数几次出国小型展览。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起,由赴法、赴日展出开始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的出国展览。通过文物的出国展出,向世界介绍了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国人民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友谊。改革开放以后,出国文物展年年不断,文物的展示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国家的元首和各界人士对中国的文物赞赏不已。

80年代以来,国内外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以敦煌莫高窟治沙和窟内环境监测、尼雅考古、交河故城保护、秦兵马俑和彬县大佛保护、唐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代表的中外合作项目在有序地进行。

中国于1993年参加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并成立了本国的委员会。中国与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UM)的合作也日益密切。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外,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自1986年以来,中国每年都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其他重要国际文物保护组织的会议及相关的重大活动。

wen yi zheng ce tiao zheng

**文艺政策调整** (adjustment of policy toward literature and art)

1975年,在毛泽东指示下,由邓小平领导的对文艺工作政策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中,文艺领域一片萧条,充斥舞台的只有“样板戏”,广大文艺工作者及作品都遭到打击压制。1975年7月,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对文艺

现状表示强烈不满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上针对被定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审查和关押的周扬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写了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中旬，因“周扬一案”而被关押、监护的人员除12人病故外，陆续得到释放。7月14日，毛泽东又同江青谈到文艺调整问题，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他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在他的支持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了调查，揭露“四人帮”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引述毛泽东文艺方针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公然砍掉了“百花齐放”这一句；还向毛泽东转呈了一批文艺界人士的申诉信件和材料，反映“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等问题。经毛泽东批示和中央政治局批准，一批被禁演的电影，如《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陆续开禁，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一批作品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隆重举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文艺界的形势开始好转。

## wending wujia

### 稳定物价 (stabilizing prices)

1949~1950年经济战线上一场严重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财经形势严峻。投机资本，特别是金融和商业投机资本，乘机大肆抢购、囤积社会急需物资，哄抬物价，出现4次涨价风。第一次是在1949年4月，华北地区物价普遍上涨，以1948年12月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5月上涨为380。为了平抑物价，人民政府曾采取禁止黄金、白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等行政手段，但见效

不大。第二次是1949年6月，华东一带物价产生大的波动，从6月27日到7月30日，上海的批发物价上涨了1.53倍，其他地区也随之上涨。人民政府以上海为中心向金融投机资本发起“银元之战”，禁止黄金、白银、外币在市场流通，依法制裁金融投机；通过国营商业吞吐物资迫使物价下跌。第三次是1949年10月，投机资本掀起势头最大的一次物价波动。至11月25日，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比10月中旬上涨了2.26倍，其他城市的物价上涨了3至4倍。在这种形势下，人民政府向投机资本发起了“米棉之战”，从东北地区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同时拨出大量公粮给贸易公司，调整上海、武汉棉花存量，加速华中棉花东运。同时采取有力的金融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投机资本。第四次是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投机资本又乘机活动，物价出现波动。这次由于人民政府已掌握了市场领导权，投机资本元气大伤，涨价风很快就被遏止。经过反复较量，市场物价终于稳定下来。

## Wo de Yidian Yijian

### 《我的一点意见》(“My Opinion”)

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在陈伯达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材料上写下的批语，抄清时又加了题目。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天才论”，借口设国家主席问题，制造了一系列分裂党的活动，搜集整理了这两份材料。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发了这个批

语。其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精神，在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为了挽救林彪，印发时删去了有关林彪的一句话。

## Wulanfu

**乌兰夫** (1906~1988)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蒙古族。曾用名云泽、陈云章、乌云达赉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改用现名。

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人，1906年12月23日生于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冬，参加由中共北京地区党组织举办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并于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与多松年等创办蒙古族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6月，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回归绥，领导归绥地区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运动。9月，经多松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以在京蒙古族学生身份，出席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6月，取道外蒙古回国期间，在第三国际驻蒙古代表帮助下，组建中国共产党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领导小组，任组织委员。1931年8月，在包头地区发动群众，选送蒙古族进步青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校学习。1936年2月21日，组织百灵庙军事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1937年冬，协助傅作义组建蒙旗保安旅，任旅政治处代理主任兼三科科长。七七事变后，挥师南下伊克昭盟，抗击日军。1938年5月，赴延安汇报工作。同月，根据中央指示，蒙旗独立旅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任政治部代理主任。1941年，奉调赴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4月，当选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出任绥蒙政府主席，晋察冀边区中央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等职。1945年10月，奉中央指示，率工作队前往苏尼特旗开展斗争，揭穿了少数人成立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分裂祖国企图。1946年初，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与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团在承德谈判，通过“四三会议”决议，实现了东西蒙地区的统一。1947年成功主持“五一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1947~1949

年期间，相继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后改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内蒙古党校校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还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北局副局长，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健全民主和法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

#### 推荐书目

王树盛等：《乌兰夫年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

wuchan jieji zhuanzheng xia jixu geming lilun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theory of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并写进中国共产党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

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同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将这一提法发展成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又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1月6日《人民日

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篇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文章把这个理论归纳为6个“要点”：①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③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④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提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经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及60年代上半期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领域里的批判运动，他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越来越严重，并在实践上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提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发动广大群众”向走资派夺权，认为它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系统形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还存在着一个在全社会范围内与无产阶级对抗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党内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工作，都应该而且可能通过阶级斗争得到完满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也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文化

大革命”中造成了全国性的长时间的严重破坏和动乱。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wudangpai minzhu renshi

### 无党派民主人士（nonparty democratic personage）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的一部分人士。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要形成一个组织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只好孤军奋斗，如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符定一、吴耀宗等。他们虽然没有组织成政党或政治团体，却代表着一批人，联系他们共同奋斗，迫使国民党在1946年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时，不得不承认和允许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社会贤达”身分参加。由于在参加旧政协的人士中也有王云五、傅斯年这样的“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加了“国民大会”，参加了“国民政府”，因此“社会贤达”这个名称使不少民主人士很为反感。1948年5月5日，郭沫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号召时，首先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名称。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时，经过中共与各个方面磋商，最后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列为新政协的一个参加单位。在分类时，考虑到无党派民主人士是长期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党派性的活动，他们实质上是没有党派组织、但具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因此，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划分到党派代表类。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政协第一至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第五届叫无党派爱国人士）。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当选为政协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思远当选为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缪云台当选为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Wu Bangguo

吴邦国（1941～）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理。安徽肥东人。1941年7月生。1960~1966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67年后,先后任上海电子管三厂工人、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1976年后,任上海电子管三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厂长。1978年任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1979年任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1981年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市科技工作委员会委员党委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91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9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书记。

#### Wu Dayou

**吴大猷** (1907~ ) 物理学家。广东高要人。1907年9月29日生。1929年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1931年赴美国留学,获密执安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南开大学讲师,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3年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7~1949年任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1978年曾任纽约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理论物理组主任、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瑞士洛桑大学客座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美国布鲁克林工艺学院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等职。1967年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兼“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1978年回台定居。1983~1993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91年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委员。1994、1996年连续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92年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在海内外科技界有一定声望。主要研究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核子散射、大气物理、统计物理、相对论等。著有《多原子振动光谱及结构》、《量子力学散射论》、《气体及电离体方程式》、《狭义及广义相对论》、《近代物理学的基础》、《古典动力学》等。

#### Wu De

**吴德** (1913~1995) 第四、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河北省丰润人。1913年2月5日生。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河北省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冀东武装起义,发动开滦煤矿工人起义。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后历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唐山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7月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3年9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5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6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1973年5月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粉碎林彪、江青集团过程中,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任务。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80年2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0年4月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起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11月29日逝世。

#### Wu Faxian

**吴法宪** (1915~ )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西永丰人。1915年8月25日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广昌独立师10团青年干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2师警通连指导员、2师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685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八路军苏鲁

豫支队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任,八路军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3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率八路军115师685团开辟了湖西地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6年后历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治委员、第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辽沈、平津、进军中南和解放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空军干部部部长、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1967年8月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68年3月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Wu Guanzheng

**吴官正** (1938~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西余干人。1938年8月生。1959年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学习。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入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读研究生。1968年后,历任武汉市葛店化工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后,历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市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工程科技中心主任、党委书记。1982年11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1983年3月,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1986年调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代省长,同年11月,当选为省长。1995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97年4月,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 Wu Guixian

**吴桂贤** (1938~ ) 中共第十

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女。河南巩县人。1952年入陕西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当纺织工人，多次被选为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后，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5月任省委书记。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被免去职务，回陕西工作。1980年后任中共西北国棉一厂副书记，厂工会主席。

Wu Han

**吴晗** (1909~1969) 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09年9月24日生。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8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到该校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经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举荐，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为工读生，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应聘为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此期间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主任委员。1948年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进入解放区。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以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11月，因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文革大革命”中被迫入狱，横遭迫害。1969年10月11日与夫人含冤弃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重要著作有：《朱元璋传》、《读史札记》、《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吴晗史学论文选集》、《吴晗文集》，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主持改绘《历代舆地

图》，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Wu Jichang

**吴吉昌** (1910~1992) 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山西省闻喜县人，1910年5月生。历任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涑阳大队大队长、山西省棉花科研所副所长。他长期致力于探索棉花丰产规律，先后创造和应用了“冷床育苗”、“一窝双杆”、“青芽结桃”、“多杆两层”等15项棉花丰产技术，取得亩产将近150千克皮棉的试验成果。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7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先后当选为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中共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992年12月24日因病逝世。

Wu Jikang

**吴几康** (1918~ ) 计算机专家。上海市人。1918年1月9日生。194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电系。1949年赴丹麦留学，1953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陕西微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组织和承担了我国计算机开创试制的大型项目工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最高荣誉奖。

Wu Jieping

**吴阶平** (1917~ )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医学家。江苏常州人。1917年1月22日生。1933年9月起先后入北平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后，任北平中和医院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院讲师。1947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48~1960年任北京医学院副教授、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1971年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院长、教授。1970年8月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教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泌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之一，对该学科的应用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后获印度尼西亚“伟大的公民”二级勋章、巴黎市政府最高荣誉奖章。主持编写中国第一部泌尿外科专著《泌尿外科学》。著作还有《外科学》、《肾脏病学》等。

Wu Lengxi

**吴冷西** (1920~ ) 新闻事业家。广东新会人。1920年12月14日生。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马列学院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解放日报》编辑、国际部主任，新华社通讯大队政委、编辑部主任、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成员、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国家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三、四届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四、五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七届常委、第八届委员。长期从事新闻事业的领导和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著作有《忆毛主席》、《十年论战》。

Wu Renbao

**吴仁宝** (1928~ ) 农村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江苏江阴人，1928年11月生。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61年起任江阴县华子镇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艰苦奋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78年全村开始有了公共积累和余粮，初步实现了“家家有余钱，户户住新房”的愿望，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之一。以后，他继续走农工副全面发展的道路，1990年粮食产量超过了100万斤，多种经营项目发展到50多个，村办企业达到40多个，农工副业总产值1991年达到3亿元，1997年高达23.2亿元，创利税2.6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近万元，名列全国村级经济前列。如今，华西

村民家家住楼房、用管道煤气，户户安装电话，置有小汽车。由于他的突出贡献，连续多届被选为村党委书记，华西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选为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和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 Wu Shuqing

**吴树青** (1932~ ) 经济学家。江苏江阴人。1932年1月生。1949年就学于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研究生班，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副主任，当选为北京市经济总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资本论》学会理事，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运行机制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有独到的研究与见解。80年代撰文，主张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经济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而搞活企业、完善市场体系和建立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则是构成新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是一种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并考察和探索了间接的调控体系，即各种经济控制机制和宏观政策。主要著作有：《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副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编)、《模式、运行、控制》(主编之一)。另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1988~1995年中国经济改革规划》(课题负责人)获1989年孙冶方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获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优秀论文奖。

#### Wu Xueqian

**吴学谦** (1921~ ) 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人。1921年12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1938年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学生界救亡协会格致公学小组负责人，上海地下党格致公学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淮南交通站负责人、城工部干事。1944

年后，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委书记。参加领导了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驻世界青联代表。后改任团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委员、常委。1958年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处处长。1966~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1978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组组长、三局局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2~1988年任外交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曾多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1988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在中共十二、十三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Wu Yi

**吴仪** (1938~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女，湖北武汉人。1938年11月生。1956~1962年在西北工学院国防系、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炼油工程专业学习。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1965年任兰州炼油厂车间主任、政治部办公室干事。1965~1967年任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生产处技术员。1967~1983年任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1983~1988年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为高级工程师。1988~1991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91~1993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3~1997年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Wu Youxun

**吴有训** (1897~1977) 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1897年4月2日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中，验证和丰富了康普顿效应，为这一效应被国际公认做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回国，历任江西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

授、校长，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1950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四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届常委。在近代物理学实验特别是X射线散射研究方面有国际公认的突出贡献，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和组织者。长期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管理和物理教学，培养出大批科学研究人才。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 Wu Yuzhang

**吴玉章** (1878~1966) 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原名吴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生于四川省荣县。1903年赴日本求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创办《四川》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回国，旋即到香港，与黄兴策划广州起义。次年回四川发动荣县、内江反清起义。1912年1月到南京，任总统府秘书。1913~1917年赴法国组织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1925年到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秘书长，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代理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部秘书。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起义失败后，1928~1930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政府代表在欧洲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代表团成员。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届至第三届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

届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逝世。著作有《吴玉章文集》。

Wu Zuoren

**吴作人** (1908~1997) 画家、美术教育家。安徽泾县人, 1908年10月1日生于苏州。1921年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学习, 1927年到1929年, 先后入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 师从徐悲鸿。1930年到法国留学, 后转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因作品优异获金奖, 留校工作。1935年回国, 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教授, 在各地组织抗日宣传作品的创作, 并赴西北写生。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油画系教授, 北平美术家协会理事长。1947年赴英、法等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长期从事中国画、油画的创作和教学, 有突出的贡献, 并培养出大批美术人才。多次赴国外举办画展和讲学, 在国际上享誉极高。先后获得法国“艺术文学最高勋章”、比利时“王冠级荣誉勋章”。其油画作品结合中国地理特色, 表现出明快、醇厚的风格, 尤以西北风情题材为擅长。代表作有《戈壁神水》、《三门峡》、《镜泊飞瀑》等。中国画将中西文化融为一体, 独具特色。代表作有《天湖泻瀑》、《牧驼图》、《藏原放牧》等。部分作品收藏在苏州吴作人艺术馆。1997年4月11日逝世。

wufan yundong

**“五反”运动** (campaign against bribery, tax evasion, theft of state property, cheating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stealing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的打退不法资本家进攻的斗争。

**背景** 1951年, 政府继续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方式, 对私营工商业加以扶助, 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 一些资本家见利忘义, 开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 军需激增, 一些私营工商业者, 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努力支援战争, 而是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

毒”)等手段牟取暴利。

**运动情况**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 揭发出来的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 1952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五反”斗争的指示。

各地在斗争中揭发出许多严重问题。例如: 武汉福华药棉厂经理李寅廷, 用垃圾箱中甚至是死人衣服里的烂棉花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 上海肉贩子张新根、徐苗新用坏肉充作好肉为志愿军制作罐头; 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厂长安景远在承制志愿军的食品中掺入了大量臭蛋; 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在承制志愿军定货时, 偷工减料严重, 做出的铁锹、铁镐运到前线不能使用。

群众出于激愤, 产生了“打倒资产阶级”的情绪, 致使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者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一些私营企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 工人因此失业或半失业, 城市市民生活受到影响。

有鉴于此, 中共中央于2月27日发出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3月5日, 毛泽东指示上海, “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同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知说: 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 在划类时, 要“过去从宽, 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到1951年的); 多数从宽, 少数从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工业从宽, 商业从严; 普通商业从宽, 投机商业从严”。就大城市来说, “前三类约占95%左右, 后二类约占5%左右。”根据中央指示, 各地运动步入正轨。

**成果** 6月13日, 政务院发出结束“五反”运动的指示, 并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 要求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 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对违法工商户, 一般只令其退财补税, 少数才予以罚款”。据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重庆、西安8个城市统计, 涉及“五毒”的私营工商户467776户, 其中严重违法户为11433户, 占总违法户数的2.45%; 完全违法户为2189户, 占总违法户数的0.45%, 合计占总违法户数的2.9%。

wugeyi gongcheng

**“五个一工程”** (“Five Ones Project”) 在中共中央倡导下, 中宣部从1991年起组织实施的精神产品生产的重点工程。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

选活动, 评选上一年度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分部委, 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中5个方面的精品佳作; 并对组织这些精神产品生产有突出成就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部委与部队的宣传领导部门, 授予组织奖。列入评选的五个方面是: 一部好的戏剧作品, 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 一部好的电影作品, 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 一篇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从1995年度起, 将一部好的歌曲作品和一部好的广播剧作品也列入评选范围, “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五个一工程”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优秀作品的评选, 激励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推出更多的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回答现实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作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截至1999年4月底, 评选活动共举办6届。入选作品有728部, 其中电影58部, 电视剧(片)142部, 戏剧120台, 图书167种, 文章148篇, 歌曲51首, 广播剧42部。

wujiang simei sanrai huodong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campaign of 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and Three Enthusiasms) 1981年开展起来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981年2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倡议: 在全国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通称为“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及全国人民的拥护。同年2月28日, 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 and 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 要求把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当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抓好。1982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 提出自1982年3月起, 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重点是抓3件事: 搞好环境卫生, 整顿公共秩序, 提高服务质量, 即治理“脏、乱、差”。1983年的“文明礼貌月”, 进一步开展了搞好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的竞赛, 还增加



了“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并且同学雷锋的活动结合起来，使整个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年2月4日，中宣部等24个单位发出《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3月30日，中央成立了以万里为主任，邓力群、黄玉昆为副主任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机构，指导、监督、协调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开展。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经过两年的实践和两个“文明礼貌月”的普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助人为乐，争做好事蔚然成风，以困难户、五保户、烈军属、残废人为对象的包户、助耕活动以各种形式开展起来，并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出现了不少舍生忘死、见义勇为、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英雄事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有好转，交通事故减少，刑事犯罪率继续下降；植树造林有很大发展，城市净化、绿化、美化工作有进步，社会上形成了大搞清洁卫生，美化环境的风气；文明礼貌用语开始普及；乘车让座、扶老携幼、邻里和睦等现象增多；文明生产、文明服务风气在许多单位逐渐形成；和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部门和行业，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1986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但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一直持续和发展。

#### wu qi ganxiao

**“五七”干校**（“May Seven” cadre schools）“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政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创办“五七”干校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关于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的批示（即“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介绍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农场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同时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办起“五七”干校，采取轮换方式，把大批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送到农村，以军事编制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在“五七”干校中，大批干

部、职工、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农村增加了了解。但是，这种下放干部运动是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进行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惩罚性质。在下放中又裁减、撤消了大批文化、科研单位，使干部和知识分子长时期脱离业务工作和文化、科研事业，从事不分专业的农业劳动，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知识、人才以及物质的浪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全部停办。

#### Wu Qi Zhishi

**“五七”指示**（“May Seven” Instruction）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总后勤部5月2日的报告说：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按语指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加以阐述，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这个批示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超越阶段的构想，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 Wuhan Changjiang Daqiao

**武汉长江大桥**（Yangtze bridge at Wuhan）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位于武汉市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之间。1955年9月正桥工程开始动工，1957年9月25日竣工，同年10月15日通车。

大桥全长1670.4米，其中正桥长1155.5米，计两台八墩九孔。汉阳引桥长303.45米，计17孔；武昌引桥长211.45米，计12孔。正桥钢梁为3联等跨连续钢桁梁，桁梁高16米每孔跨度128米。大桥上层为6车道18米宽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上、下层两侧均设有2.25米宽的人行道。桥下净空高度按通航水位以上18米设计。

武汉长江大桥实现了京广铁路大干线的南北贯通，而且创造了用新型管柱基础替代气压沉箱基础施工的新工艺，为桥梁深水基础建设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是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创举。

#### Wuhan qi'erling shijian

**武汉“七二〇事件”**（Wuhan July 20 Incident）1967年7月20日前后，武汉部分军民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谢富治制造分裂混乱的抗争活动。这次活动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反革命事件”，借此打击群众，制造出一系列新的动乱。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当时，武汉地区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斗争日趋激烈，武斗时有发生。毛泽东亲自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谈话，要他们为“左派”平反，对两派群众组织多做工作。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公开去一派的驻地，发表支持演讲，并严厉指责武汉军区犯有严重错误，激起部分群众和军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7月20日，一些群众和指战员涌入谢富治、王力驻地，将王力拉走，对他进行质问和批判。数十万军民还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责令将王力转移。当天，在林彪制造的“武汉军事政变”谎言气氛下，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林彪、江青等人抓住“七二〇事件”，制造了一批新的动乱事件。他们诬蔑“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兵变”；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是事件的主使者，徐向前等人是后

台。7月22日，江青在讲话中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由《文汇报》发表。这个讲话为各地进行武斗提供了依据。25日，林彪、江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返京，林彪、江青等亲自出席，公开表示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七二〇事件”。同日，在新华社新闻稿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审定，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职务，受到批斗迫害。湖北省掀起大规模的清查批斗活动，广大群众遭到打击。各地造反派纷纷揪斗本地区的“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形势急剧恶化。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凡因“七二〇事件”被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受迫害者一律平反昭雪。

#### Wu Xun Zhuan pipan

**《武训传》批判** (criticism of *The Life of Wu Xun*) 1951年2月，由上海昆仑电影公司制作的《武训传》在全国各地上映，这部影片歌颂了清末山东省堂邑县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影片上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不少文章加以肯定和赞扬。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

传〉的讨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以及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6月，《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织武训历史考察团，赴山东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以武训历史考察团名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全国各地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一些文章片面粗暴、无限上纲。《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发表过赞扬文章的人被迫作了检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把对文艺作品中的思想认识问题，错误地变成政治批判运动。

# X

Xidanqiang

**“西单墙”** (wall for spontaneous posters at Xidan) 1978年10月至1979年,北京西单街头人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开始一段时间,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大字报主要是批评“两个凡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内容。从1979年元旦起,一些中“四人帮”思想体系流毒很深的人,如魏京生等,打着“民主”的旗号,利用“西单墙”贴大字报、传播非法刊物、发表煽动性讲演,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利用这个地方闹事,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邓小平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尖锐地予以批判。指出不能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那就必然会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1979年3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魏京生。1979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期间举行座谈会,委员们一致认为,“西单墙”的问题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解决。12月6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规定自1979年12月8日起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

Xisha Qundao ziwei fanji zuozhan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 (defensive counter-attack for the Xisha Islands) 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南民兵反击南越军队入侵西沙群岛的战斗。西沙群岛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千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74年1月15日至18日,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先后派出军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轮挑衅,向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月17日上午,南越军队侵占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又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中国国旗。

中国海南渔民和民兵不畏强暴,同南越侵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但南越军队的侵犯活动毫无收敛。1月17日至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南民兵奉命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反击作战,击沉南越护卫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敌数百人,俘敌49人,收复了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打击了南越当局的侵略野心,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Xizang heping jiefang

**西藏和平解放**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达成的协议,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拉萨等地,西藏实现全境解放。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省区解放以后,广大藏族同胞和上层爱国人士热切盼望西藏回到祖国怀抱。羁留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949年10月1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而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分子,却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极力抗拒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5月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1952年划入四川)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致电朱德,主动请命入藏劝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格达活佛于7月24日到达昌都,不幸被敌对分子毒杀。达扎为阻止解放军进藏,将西藏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军队调集到昌都一带,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顽抗。中央人民政府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军从10月16日开始出击,经过18昼夜战斗,消灭了藏军主力,德格·格桑旺堆率领藏军第九代本(藏军建制单位,相当于小团)全体官兵起义,昌都解放,为和平进驻西藏奠定了基础。

1950年11月14日,达扎下台,达赖亲政。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再号召和西藏广大爱国僧俗的敦促下,达赖于1951年2月28日作出决定,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京后,中央人民政府指派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团于4月29日开始与之谈判。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于5月21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各地,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的西藏》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Xizang pingfan

**西藏平叛**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 in Tibet) 1959~196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平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作战。

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后,进驻西藏的中央代表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认真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发展生产,进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国外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企图继续维持农奴制度,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1958年起,他们在山南等地建立了叛乱组织和武装,进而疯狂地进行了一系列背叛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曾数次袭击人民解放军的车队和执勤人员,杀死杀伤大量官兵,并围攻中共地方组织,残酷迫害爱国僧侣。1959年3月10日,他们经过阴谋策划和准备,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同中央决裂”,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并集结叛乱武装7000余人对中央政府驻藏代表机构和西藏军区机关实施包围和进攻。在此前后,西藏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武装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劳动人民,驻藏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于3月20日上午开始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在当地爱国上层人士、僧侣和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叛匪据守的拉萨市制高点药王山和他们的指挥部所在地罗布林卡,消灭了叛乱武装主力,并对拉萨其余叛乱武装达成包围。至3月22日9时,被围叛乱武装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缴械投降,拉萨叛乱遂告平息。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分多路向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展开进攻。经过10天奔袭作战,一举荡平了叛匪的老巢,歼敌2000余人,迅速控制了山南地区,

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随后，又组织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与此同时，平叛部队还组织了昌都东北、盐井和昌都东南两次战役，控制了金沙江、澜沧江之间的广大地区。1960年3月以后，驻藏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及总部在成都召开的平叛斗争和边防工作会议精神，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恩达、丁青、嘉黎、札木之间地区，黑河、巴青之间地区，申札、萨噶、定日之间地区，昌都东南宁静、三岩地区和阿里地区，先后组织了6次进剿战役，歼灭叛乱武装2万余人。到1960年7月，西藏全区范围内大股叛乱武装均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后，平叛部队组织小分队，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并相机进行军事打击。到1961年底，基本肃清了在西藏地区公开活动的叛乱武装，平叛作战胜利结束。

#### xiwang gongcheng

**希望工程** (Project Hope) 全称“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遵循政府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以求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启动背景** 1989年，河北省涞源县有377名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该县桃木疙瘩村小学13名学生中竟有11名辍学，在小学仅有一间简陋的教室里上课的只有两名学生。共青团中央派调查组查实情况后首先予以救助，并决定：根据全国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状况，发起实施救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千百万人献爱心行动。救助的方式是，海内外的单位、团体、基金组织可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地方实施机构定向资助，为县、乡、村建立希望小学；个人捐款者每捐20元即为一儿童复学资助一学期的学费，每捐200元可在5年内结对救助1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1995年，因社会物价上涨等原因调整为40元和400元）。同年10月17日，张胜利等11名失学儿童接到“资助就读证”，重返校园上课，成为希望工程第一批受益儿童。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诞生，救助500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1992年11月2日，国家教委发出

《关于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的通知》，指出中国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实施“希望工程”，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少年重返校园接受教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动员人民参与办教育的一种好形式。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支持，严密组织实施，并率先于教委机关和在京单位开展“献爱心”的捐助活动。

**组织管理及活动** 1993年以来，逐步加强对希望工程的管理和监督，一是组织开发“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并运用此项技术开展百万受助儿童的调查复核工作，落实了资助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二是制订并颁布以救助管理、基金管理、档案管理、机构设置等为内容的《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各地也制订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三是成立全国希望工程监察委员会和省、自治区希望工程监察委员会，并在希望工程实施的地、县、乡成立监察工作组，对希望工程资金管理和希望小学建设情况进行检查管理。1995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又推出为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建立“希望书库”的活动。1997年4月，第七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世纪最后一轮“希望工程”劝募行动，为扶贫开发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挥积极作用。在本轮募捐活动中，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开展“希望工程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开展“全国青少年献爱心储蓄活动”。

**成果**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支持，对推动该工程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1990年曾为“希望工程”亲笔题名，1992年先后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邓颖超等都分别捐资并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这项工程。社会各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与友好人士纷纷解囊相助，使受惠地区和受惠儿童少年逐年增加。截至1997年底，累计接受海内外各界捐款逾13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185万余人，援建希望小学5256所。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公布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显示，希望工程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它的实施，保障了儿童的受教育权，改变了受助儿童的命运，促进了各级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扩大了共青团的影响，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中国民间公益机构和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成功的

范例。

#### Xi Zhongxun

**习仲勋** (1913~ ) 第五、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陕西富平人。1913年10月15日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在甘肃两当发动暴动，失败后到陕北组织地方革命武装。1933年后历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后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地委书记，关中军分区和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47年后任陕甘宁野战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取得胜利。1949年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在中共第八届中全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遭到批判审查，撤销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被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中共中央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同年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Xia Nai

**夏鼐** (1910~1985) 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10年2月7日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1936~1939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85年在中国科

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1985年先后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1985年6月19日逝世于北京。他在考古学研究和考古事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研究》(日文)、《中国文明の起源》(日文)、*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英文)等。主编和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此外还主编有:《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和研究》等。主持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撰工作。

#### Xia-Shang-Zhou duandai gongcheng 夏商周断代工程

(project to date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解决中国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的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这项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目标是建立夏代和商代前期比较可靠的年代框架,复原商代后期和公元前841年前西周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工程定于1999年编制出夏、商、周年表,为中国古代文明建立时间标尺。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大古代文明之一。中华民族素以五千年文明独立起源、绵延流传、从未中断而自豪。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古史年表在文献中可依据的绝对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历史尚有二千多年没有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勃兴到繁盛的重要时期,因而,这项工程对探求中国悠久历史文化源流和展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前期对安阳小屯村发现的甲骨的研究和1928年以来殷墟的大规模发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遗址和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等的相继发掘,为解决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和纪年问题提供了依据,创造了条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邓楠、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任正副组长,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任顾问,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任首席专家,并成立由李学勤任组长、国内2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工程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科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进行,有近170位学者参加。工程启动以来,陆续开展了9个课题40个专题的研究,到1998年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专家们对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作了进一步发掘和论证,取得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共识。通过对这一遗址范围内的采样进行测年工作,夏代基本年代框架即可建立。经研究,已经确认偃师商城是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城内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两代分界的界标;已经判定商王武丁在位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之间。经对陕西长安丰镐遗址样品进行碳14测定推定,作为商周分界界标的武王伐纣之年应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

#### Xia Yan

夏衍 (1900~1995) 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本名沈乃熙,字端轩、端先。浙江杭州人。1900年10月30日生。学生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双十》(后更名为《浙江新潮》)。1920年赴日本留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927年5月被迫回国,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并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1929年翻译、出版高尔基名著《母亲》。同年,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随后又发起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进入电影界,组织领导左翼电影运动。同时开始电影创作、电影评论。1935年开始话剧创作。《上海屋檐下》是主要代表作。1936年6月发表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抗战爆发后,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领导和组织进步文化活动,同时进行话剧创作。1942年赴重庆,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新华日报》代总编辑。还创作多部话剧作品。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在新加坡、香港等地负责文化、统战工作。1947年到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工作。1949年至

1953年,先后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职。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直到1965年被免职。期间创作话剧《考验》,改编电影《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合编)等,同时撰写大量文艺理论专著。《祝福》1957年获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林家铺子》1984年获葡萄牙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评委奖;《革命家庭》于1962年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四人帮”垮台后,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文化部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夏衍一生著译丰富,出版过多部作品集。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夏衍杂文随笔录》、《夏衍剧作集》、《懒寻旧梦录》等。剧作风格深沉、凝练、清馨淡远,擅写平凡的小人物;杂文、随笔题材丰富,手法多样,短小精悍。1995年2月6日逝世。

#### Xiamen Jingji Tequ

厦门经济特区(Xiam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中国在福建省厦门市开辟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福建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开始破土动工。特区最早位于厦门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面积为2.5平方千米。198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为厦门全岛和鼓浪屿,总面积131平方千米。根据国务院批复,厦门应办成一个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多功能、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中国,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基地,成为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桥梁和通道。厦门特区港口条件优越,水深道宽,海岸线总长234千米,其中深水线40千米,历史上是“五省通商口岸”之一。厦门经济特区还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文化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且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气候条件优越,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厦门经济特区创办以来,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1980~1983年为初创起步阶段。1984~1987年为形成发展格局阶段,这个阶段外商投资出现高潮,经济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特区的发展格局。1988~1991年为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

展阶段。这一时期，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间交往不断扩大，厦门成为台商来大陆投资贸易、旅游、探亲的热点。1991年以后进入增创特区新优势阶段。自建立特区以来，厦门经济特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厦门特区创建之前的1980年，厦门市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476亿元，工业总产值9.43亿元，农业总产值2.6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1.8亿元，进出口贸易总值1.41亿美元。到1997年，厦门市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1.82亿元，地方财政及中央两税收入48.09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77.6亿美元。

**推荐书目**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厦门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6。

xianxing zaijiao shuidao

**籼型杂交水稻** (hybrid indica rice)

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等自1970年起，利用中国普通野生稻雄性不育株作母本，以中国矮秆籼稻品种为父本，经过连续多代回交，育成了二九南1号、威20、珍籼97、二九矮4号等一批不育率和不育度达100%的不育系和相应的保持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广泛测交筛选，从东南亚籼稻品种中选育出IR24、IR661、泰引1号、IR26等优良恢复系，于1973年10月完成了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并配制出南优2号、3号，汕优2号、3号，威优6号等强优杂交组合。这些组合与高产亲本和同类型常规良种比较，具有光合效率高、根系活力强等生理功能上的优势，表现根系发达、分蘖力强、穗大粒多、产量高。与此同时，还研究出了一整套有关杂交水稻繁殖育种和杂种一代的高产栽培技术，使杂交水稻很快用于生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据统计，1976~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稻谷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亿公斤。

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给英国。

此项成果获国家发明特等奖。

xian ji zhijie xuanju

**县级直接选举** (county-level direct elections)

中国县级以上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从1979年起由选民按选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议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投票站或者选举大会由选举委员会主持；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1983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对县级直接选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

县级直接选举是中国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自1979年以来，中国已进行了7次县级直接选举，选举采用差额和无记名投票方式，广大选民积极参加，收到了较好效果。采取县级直接选举的方式，有利于密切选民与人民代表的联系，有利于选民对人民代表进行监督，它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xiandai qiye zhidu

**现代企业制度**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所要建立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现代”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中国原有的产品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企业制度而言；二是相对于企业组织发展历程而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到公司制企业的过程，公司制企业是进入现代社会才大量发展起来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

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国务院有关部门为落实《决定》精神，于1994年底开始组织百户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对百户国有企业分别以下列4种形式进行改制：一是由工厂制直接改为多元股东持股公司。二是由工厂制改为国有独资公司。三是由原行

业主管厅局“转体”改制为纯粹控股型国有独资公司。四是按照先改组后改制的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实行资产重组改组。通过公司化改造，百户试点企业建立起了以产权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设立全资子公司721个、控股子公司411个、参股公司570个，使改制后二级子公司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比例达到75.77%。与此同时，地区、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也全面展开。到1997年底，在各地区、各部门确定的2500户企业中，已有1989户改制为公司，其中有1080户改制成了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占54.3%。

通过试点，加深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公司制框架初步形成；企业产权关系逐步明确，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有了明显进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明显增强，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企业改革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试点中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改制企业中国有独资公司的数目偏多；国有股、法人股所占比重过大；过分强调了股份公司的融资功能，甚至把股票融资等同于“圈钱”，相对忽视公司制度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中的作用；低估国有资产价值，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等，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推进加以解决。

**推荐书目**

王洛林、陈佳贵主编：《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7。

xiangzhen qiye

**乡镇企业**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中国农村各类企业的总称，包括乡、镇和村举办的企业，部分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在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时称社队企业，1984年起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从产业来分，涵盖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即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诸业企业都包括在内，其中工业是主体；按经济类型分，有乡办、村办、队（组）办、联户合办和个体户办企业，通常称为“五轮齐转”。乡镇企业在发展横向联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与城市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营的合作合资企业；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村中与国际工商企业合作兴办的“三资企业”（即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

制、股份制企业，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形式。

**发展历史** 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非集体所有制企业两大类。乡（镇）、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共中央鼓励和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各地兴办了一大批以农机具修造、食品加工、土化肥、土水泥以及棉织、针织、缝纫等加工业。据全国统计，到1959年6月底，共有公社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71亿元，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在纠正“共产风”过程中，凡平调原来高级社资金和生产资料办起的公社工业企业，基本上退回去成为生产大队办工业企业。从这时起，公社工业转变为社队工业，加上社队办的种植、养殖场等企业，统称为社队企业。国民经济调整中，在对人民公社普遍进行整顿的同时，对社队企业也进行了整顿。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队企业萎缩的局面。1963年，全国社办工业产值只有4.2亿元。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回升，各地又开始自发地发展社队企业。196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公社“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城市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商品极度匮乏，大批干部、城市居民、知识青年下乡，为社队企业的重新兴起创造了机遇和条件。1970年后，尽管社队企业因兴办非农产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不断地受到批判，但各地仍以“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发展农机修理业，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等为理由，以“地下”和半公开的形式创办粮油加工、砖瓦加工、农机修理等社队企业。到1976年，社队工业已有了较大发展，全国社队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243.5亿元。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农民被压抑的发展社队企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全国范围内出现办社队企业的高潮。但是社会各方面对社队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意义的认识很不一致。由此，围绕江苏省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实行农副工综合经营的经验引发了一场关于社队企业的大讨论，其焦点是农村要不要发展非农产业？农民能不能办工商业？社队企业在与农业的关系上，是“以工伤

农”还是“以工养农”？在与城市工业的关系上，是“以小挤大，以劣挤优”，还是“以小补大”？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上，是“冲击了国家计划”，还是“拾遗补缺，弥补了国家计划的不足”？通过讨论和争论，对社队企业的认识逐渐得到统一。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1962年以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要发展社队企业。

乡镇企业中的乡（镇）、村（组）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其所有权属于举办该企业的全乡（镇）或全村劳动农民共同所有。80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的乡（镇）、村集体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其中尤以江苏省的苏南地区最为典型，形成“以集体为主，以工业为主，供销两头在外，农副工协调发展”的区域特色，被誉为“苏南模式”。与此同时，浙江省、福建省的一些地区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出现快速发展势头，其中尤以浙江省温州市最为典型。80年代中期温州市有10万家庭工业户，形成“以商带工，家庭经营”的区域特色，被誉为“温州模式”。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3万个，职工8805.2万人，总产值4764.3亿元。总产值中，乡（镇）办企业占38.3%，村办企业占29.6%，联户合办企业占8.9%，户办企业占23.1%。6月，邓小平赞扬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中“最大的收获”。

**方针、政策**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通知中，同意将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并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这是对乡镇企业地位作用的最具权威性的肯定。这个文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统一认识，结束争论，促进乡镇企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贯彻中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乡镇企业进入加快发展加快提高的新阶段。企业布局由“乡乡点火，村村冒烟”逐步向小城镇、向开发区集中，由小规模落后技术向应用先进技术、现代技术的骨干企业、集团公司发展；生产要素和产品销售由主要依靠国内

市场逐步向国际市场开拓，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形式逐步由单一所有制形式向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1997年，全国共有各种经济形式的乡镇企业2015万个，职工人数1.31亿人，创造增加值20740亿元，拥有的总资产达32718亿元。

**重要意义** 乡镇企业是在中国农村社会分工与协作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促进了工农业的分离，使农村中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相继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只是单纯出卖原料的不利地位，充分开发利用农村中的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走贸工农一体经营的产业化发展路子。乡镇企业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农村由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的产物，是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重要途径。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乡镇企业的发展，突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单一的产业经济结构变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取代农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突破了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扩大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规模；突破了农村传统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新结构；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为广大农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收入，成为农民脱贫致富迈向富裕生活的重要途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村经济的传统产业。乡镇企业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增加农业要素供给，转移、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使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联系的纽带。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向小城镇集中，改变了小城镇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为小城镇建设提供资金保证，成为小城镇繁荣的直接动力；打破了农村行政建制和经济区划的框架，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乡交流在内容、功能和作用方面都有新的扩充和发展。

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农村中从未有过的—种全新的商品生产因素，不仅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出路，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乡镇企业已

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为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发展和繁荣城乡市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相结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比翼齐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工业化之路。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90年代以来，全国乡镇企业上缴的国家税金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达30%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每年都要拿出数十亿元资金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及行政费用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政支出的不足。

乡镇企业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从产生以来就受计划外的市场调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市场的运行机制。因此，乡镇企业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加速了中国体制的转换，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原始推动力。

#### Xianggang Guoji Jichang

**香港国际机场**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香港自1925年有飞机飞行，73年以来一直使用启德机场。1998年7月6日，开始使用赤鱘角机场，即香港国际机场。该机场于1992年动工兴建，是在赤鱘角和梳洲岛填海形成1248公顷的机场岛上建造而成的。从香港岛通向新机场有一条连接青马大桥和汲水门大桥的高架路组成的青屿干线，全长2.5千米；从中环到新机场还修了一条34千米长的机场铁路，是世界上首条专为机场建造的铁路专线。

机场面积12.48平方千米，机场南北各有一条长3800米、宽60米的跑道。拥有世界上室内公众空间最宽敞的候机楼，总面积49万平方米，分三层，进出港各占一层，内有旅客座椅9446个，航班动态显示牌2000多块。共有48个登机桥，另有27个远停机位。出港大厅有9处旅客登记处，288个登记柜台。每个柜台均装有行李输送带和保证空防安全的X光检查设备。有12个行李认领转盘，每小时可输送行李19200件。

候机楼内设有全自动旅客列车，贯通750米的客运廊可将旅客从主要流通区送抵最远的登机桥登机，还有一部2000米长的自动人行道，贯通候机楼东西大厅。

赤鱘角机场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有最高安全着陆类别(3A级)跑道，因此可全天候使用。

赤鱘角机场每小时可起降飞机80架次，年客运量达8700万人次，货运量900万吨。

#### Xianggang huigui zuguo

**香港回归祖国** (return of Hong Kong to the motherland)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结束100多年被英国统治的屈辱历史，回到祖国怀抱。

**事件的起因**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本土及离岛)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南部，珠江出海口东侧，与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相毗邻。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直置于中国历代王朝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1842年8月，“在炮口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三款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56年，英法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随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英国又强行割走香港地区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即南九龙)，扩大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范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施瓜分的狂潮下，英国趁火打劫，又通过于1898年6月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即后来被称作“新界”的香港地区)及附近岛屿。至此，英国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未放弃过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围绕着要求战后英国归还“新界”租借地问题，中英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和谈判。中国国民政府虽与英国政府于1943年1月达成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但其中没有涉及“新界”租借地和香港的任何内容。1944年，欧洲战局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变化，英国政府即着手重占香港的准备工作。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急于同共产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向英国争回香港主权问题上表现得迟钝而被动。同年8月底，英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开赴香港，重新占领香港。

**选择谈判时机** 1949年，随着中国内战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广州也得到解放，这使得港英当局为能不能继续

保持对香港的统治而忧心忡忡。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固守在深圳河以北的地区而按兵不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审视。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中英之间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但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严峻形势，基于英国政府以务实的态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使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络的一个通道。在打破禁运、封锁和孤立的同时，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争取外汇。毛泽东、周恩来等在50年代和60年代，都多次提出要保持香港的现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进入70年代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趋于缓和。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香港问题遂成为中英双边关系中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英建交前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的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不属于通常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香港问题“国际共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谈判。”这意味着英国对香港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中国仍可以进行必要的等待，但最迟在租约届满的1997年要解决香港问题。

1979年初，邓小平开始考虑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台、港、澳问题。同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香港总督麦里浩时，郑重地提出：“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77年，香港问题无论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



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发表关于统一祖国的“九条”声明，正式提出了“特别行政区”和“高度的自治权”的概念。1982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王宽诚等人时，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即“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此时，因“新界”租借的年限1997年临近，而“新界”占整个香港总面积的92%，英国面临着日渐紧迫的归还香港的压力，也急需就香港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这样，中英双方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政府正式向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发出了访华邀请。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中英两国政府就此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谈判进程**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4月撒切尔访华至1983年6月，在这一阶段中英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谈，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并同她作了重要谈话，同时中国外交代表也与英国驻华大使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的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在这一阶段中英双方通过多轮会谈，解决了香港的主权归属、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后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承诺，以及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移交等一系列问题。

**过渡时期**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过渡时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一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1990年4月，经过4年多的起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将中英联合声明的基本原则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从法律上作了规定。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长达12年的过渡时期内，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和英国国内一些不甘心放弃在香港殖民统治权的人不甘寂寞，为了重温昔日大英帝国

从殖民地“光荣撤退”时炮制一个“独立政权”的旧梦，在关于香港未来政制的发展、过渡期政府的财政安排、香港立法局和区域组织的选举安排以及对法律的单方面修改等问题上给中方制造麻烦，企图挑战基本法，破坏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及回归后香港社会的稳定繁荣。在英方不愿意合作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以我为主”、“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方针，严格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要求，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安排。1993年7月2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1996年1月26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同年11月2日，筹委会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随后，又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并顺利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筹建，奠定了香港平稳过渡的大局。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顺利地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祖国是20世纪举世瞩目的中华民族的盛事，是国与国之间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争端的范例，是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chengli**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后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成立。随后即于1点30分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了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原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立的。按照预定的程序，1996年1月26日，在北京成立了以钱其琛为主任委员，王汉斌、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王英凡、李福善、董建华、梁振英为副主任委员，由150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事宜。同年12月11日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给董建华颁发了任

命书。21日产生了临时立法会。1997年1月25日，临时立法会以互选方式选举范徐丽泰为临时立法会主席。1997年2月20日，董建华公布了由他提名并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23名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名单。依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香港居民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只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Xianggang Zhaoshangju qiyi**  
**香港招商局起义** (Hong Kong Merchants Bureau upris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香港招商局全体职工脱离国民党政府控制、回归祖国的起义。

1949年5月，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海洋运输企业招商总局。1949年10月24日，招商局的“海辽”轮在由香港赴汕头的途中，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驶向大连港。船长方枕流率全体船员向毛泽东发出致敬电，毛泽东当即复电慰勉。1950年1月13日，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在经理汤传箴和陈天俊率领下宣布起义，7月13日至10月21日先后把13艘轮船开回祖国。这批起义的轮船，为中国海洋运输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Xiang-Qian Tielu**  
**湘黔铁路** (Hunan-Guizhou Railway)

中国南方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东起湖南株洲田心站，西至贵州贵定站，东连京广、浙赣两线，西接黔桂线与川黔、贵昆两线相通，在怀化与枝柳铁路交叉，全长820千米。1937~1939年修建的湘潭至蓝田170千米线路，因湘江大桥未能建成而未曾贯通，日军入侵时即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仅剩10千米。湘黔铁路于1953年起按I级单线铁路标准分段陆续复建、修建，1972年10月13日全线接轨通车，1975年1月交付运营。1984年11月贵定至凯里间进行电气化改造工程，以后其他段陆续投入建设，至1997年12月全部建成。其中娄底至株洲段为双线电气化，娄底至怀化段为局部双线电气化。1998年5月25日，娄底至贵定段增建第二线电气化工程开工，计划在2002年完成。

Xiang-Yu Tielu

### 襄渝铁路 (Xiangfan-Chongqing Railway)

中国西南地区的铁路干线。起自湖北襄樊，经莫家营、十堰、安康、紫阳、达县抵重庆，全长 895.3 千米，单线。东接汉丹、焦枝铁路，中连阳安铁路，西通成渝、川黔铁路，构成西南地区铁路网骨架，便利了鄂、陕、川三省的交通，促进了沿线经济的发展。路基土石方工程 10 964 万立方米，挡护圻工 230 万立方米。隧道 405 座，总延长 287.1 千米；桥梁 716 座，总延长 113.2 千米。桥隧长度为正线长度的 46%。车站 90 个，其中 36 个车站股道建在桥梁上或隧道里。东、西段分别于 1968 年、1969 年相继施工，1973 年 10 月接轨通车，1978 年 6 月 1 日正式交付运营。电气化工程襄樊至安康段 1975 年 9 月开工，1980 年 10 月建成通车；安康至达县段 1979 年 10 月开工，1983 年 12 月建成通车；达县至重庆段 1993 年开工，1998 年年底竣工。

Xiang Xiuli

**向秀丽** (1933~1959) 工人，青年英雄。女。广东省广州市人，1933 年 5 月生。1948 年参加工作，历任广州市河济公制药厂包装工、工会组织委员和女工委员。1954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青团，1956 年被选为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委员。先后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1958 年 10 月 31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 13 日夜晚，她所在的化工车间因酒精瓶破裂引起烈火，眼看将蔓延到遇火即炸的金属钠。危急时刻，她用身驱堵住向金属钠蔓延的火苗，保护了国家财产，自己被严重烧伤，经抢救无效，于 1959 年 1 月 15 日逝世。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习她的高贵品质。

Xiao Yang

**肖扬** (1938~ ) 1998 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广东河源人。1938 年 8 月生。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员，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干部、中共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中共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副书记、清远地委书记。1983 年后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党组书记，1990 年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93 年后任司法部部长、党组

书记。1997 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8 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Xiao Hua

**萧华** (1916~1985)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江西兴国人。1916 年 1 月 21 日生。曾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 年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红二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40 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率先遣部队进入东北辽东地区，开辟南满根据地。后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48 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特种兵司令员。先后指挥了本溪、鞍海、新开岭作战，率部参加了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 年起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政委、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1985 年 8 月 12 日逝世。是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长征组歌》等。

Xiao Jinguang

**萧劲光** (1903~1989)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长沙人。1903 年 1 月 4 日生。1920 年参加俄罗斯研究会，翌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 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回国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 年毕业于回国。同年 12 月被派往闽西苏区，先后任闽粤赣特区军委参谋长、闽粤军区参

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参谋长。1931 年 11 月到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2 月任由宁都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团政委。后任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十一军政委、红七军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赣州、漳州、乐安宜黄等战役和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1935 年 1 月调任红三军团参谋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领导军民开展大生产，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率部剿灭土匪、打击日伪军对黄河河防的进攻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侵犯，保卫陕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后改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了四保临江战役，率部参加了东北 1947 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等战役。1949 年率四野先遣兵团参加渡江战役，后参加湘赣、衡宝等战役。同年 8 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兼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1954 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 年 3 月 29 日逝世。著有《萧劲光回忆录》。

Xiao Ke

**萧克** (1908~ )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嘉禾人。1908 年 10 月 20 日生。1926 年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1927 年到叶挺部任连指导员，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参加南昌起义。次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反“围剿”中屡立战功，曾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 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参与领导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翌年率部参加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三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晋西北、平西、平北、冀东、热南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

期，兼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后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参与指挥了保南、正太、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1950年起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职务，1959年被调任农垦部副部长。1972年后任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中共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浴血云霄》及诗集、论文集等出版。

Xiao Qian

**萧乾** (1910~1999) 记者、作家、翻译家。蒙古族。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入《大公报》任编辑兼记者。1939年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任教、学习，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报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1946年后任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撰写人兼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杂志副总编辑、《译文》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主要从事外文翻译工作。1978年获得改正。多次去国外讲学，历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馆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届中央常委和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和第七、八届常委。在新闻报导、小说、散文、文学翻译、文史笔记等方面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小说《梦之谷》，散文集《珍珠米》，翻译作品《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等，晚年与夫人文洁若翻译了爱尔兰著名文学作品《尤利西斯》。主编大型文史笔记丛书《新编文史笔记》。出版有《萧乾选集》、《萧乾文集》。1999年2月11日逝世。

Xie Fei

**谢非** (1932~ )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东陆河人。1932年11月2日生。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省陆丰县河田镇民运组组长、镇政府指导员，区委委员、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

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5~1960年任中共广东省陆丰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县委书记（1959至1960年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级班学习）。1960~1973年任广东《上游》杂志社编辑，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政工办公室副主任。1973~1979年任广东省科教政治部副主任、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79~198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83~198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党校校长（1983~1984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起，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Xie Fuzhi

**谢富治** (1909~1972) 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1909年8月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军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在华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陈赓率部参加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947年8月，任新组成的陈谢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陈赓率部进军豫西，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1月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1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陈锡联率部参加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等职。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江青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1966年12月与人合谋制定《公安六条》，借此打击广大群众。参与制造刘少奇冤案。1967年8月在全国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大搞刑讯逼供，诬陷、迫害、镇压广大公安干部和群众，制造大量冤假错案。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病故。

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问题。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Xie Jin

**谢晋** (1921~ ) 电影导演。浙江上虞人。1921年11月21日生。1941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间辍学，从事话剧活动。1946年回校攻读导演专业。1948年开始导演工作。1950年3~12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文联第五届副主席。当选为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共执导影片20多部。其中《女篮5号》（兼编剧）是成名作，获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银奖；《红色娘子军》获1962年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4项奖，并在第3届亚非电影节上获“万隆奖”第3名；《舞台姐妹》在1980年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上获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均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有的还获金鸡奖、百花奖。《芙蓉镇》获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奖。他重视继承“五四”以来，中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又注意吸收国外电影艺术的新发展，探索中国影片的民族风格。执导的影片有强烈的思想性和广泛的社会性。他还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演员。1983年，应邀担任第2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评委，被授予金鹰荣誉奖——亚洲电影导演贡献奖。法国、美国等国的几个城市都曾举行他的影片回顾展。

Xie Juezai

**谢觉哉** (1884~1971) 政协第

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焕南，别号觉斋。湖南宁乡人。1884年4月27日生。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参加五四运动，并创办《宁乡旬刊》。1920年8月任《湖南通俗报》主编。1921年1月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党的刊物《湖南半月刊》主编，《湖南日报》编辑，并主编《湖南民报》。在1926年举行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党代表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1927年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筹办党校，任校长。1928年3月，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30年负责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报》的组织领导工作。1931年秋，进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主编《工农日报》。后调任省委党校教育长。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秘书。1934年1月，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并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并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历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部长。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6年5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是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收入《谢觉哉文集》。

Xie Tian

**谢添** (1914~ ) 电影演员、导演。原名谢洪坤。祖籍广东番禺，1914年6月18日生于天津。1935年到上海，参加狮吼剧社。1936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1937年加入电影界工作人协会，进行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46年

以后，在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主演了《圣城记》、《追》等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六号门》等多部影片中饰演角色。1959年主演《林家铺子》，是其代表作。以后导演了《水上春秋》、《洪湖赤卫队》、《甜蜜的事业》、《七品芝麻官》、《丹心谱》、《茶馆》等影片。《甜蜜的事业》获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本人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当选为第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表演戏路宽阔，表现力强，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所导演的影片，人物性格鲜明，格调明快。

Xie Tieli

**谢铁骊** (1925~ ) 电影导演。江苏淮阴人。1925年12月27日生。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三师淮海剧团当演员。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教员兼表演系副主任。1956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导演。1959年开始独立导演影片。1985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98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改编、导演）、《包氏父子》（改编、导演）、《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后期执导电影《海霞》，和江青集团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了斗争。他的导演艺术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优美的抒情色彩和浓郁的诗的意境融汇在一起。

Xie Xide

**谢希德** (1921~ ) 物理学家。女。福建晋江人。1921年3月19日生。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史密斯学院硕士和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美研究半导体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兼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八、九届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对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著作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

Xie Xuehong

**谢雪红** (1901~197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女。台湾省彰化县人。幼年曾为童养媳。早年参加台湾进步团体“文化协会”。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入上海大学学习，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在上海参加组建台湾共产党，任中央候补委员。同年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被日本占领军逮捕，1939年出狱。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民主活动，发起组织台湾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任中央委员。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台中地区起义。起义失败后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9年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70年11月逝世。1980年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对她的错划右派作出改正。1986年骨灰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Xin Fengxia

**新风霞** (1928~1998) 评剧演员。女。工青衣、花旦。本名杨淑敏。天津人。1928年2月3日生。6岁学京剧，13岁改学评剧，一年后即在《点秋香》、《杜十娘》等剧中担任主角。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1953年入中国评剧院。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演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戏。50年代初主演《刘巧儿》，奠定了她的艺术地位。《祥林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等也是其代表作。《刘巧儿》、《花为媒》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摄制成影片。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新风霞在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很多新的唱腔和板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的演唱清新甜润，玲珑婉转，富有华彩，将传统评剧女声悲腔化为

喜腔，塑造了新一代的妇女形象，为丰富和发展评剧女腔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身体致残。“文化大革命”后仍以极大精力培养年轻一代演员，同时撰写回忆录，出版了《新风霞回忆文丛》。1998年4月12日逝世。

Xinhua Tongxunshe

**新华通讯社** (Xinhua News Agency)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建。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在延安改名为新华通讯社。1948年10月，随中共中央迁至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社成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集中统一发布国家重大新闻的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现有工作人员7000多人。总社除总编辑室外，还设有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体育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音像新闻编辑部、新闻信息中心等主体业务部门；在国内，除台湾以外，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香港、澳门设有分社；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设有支社或记者站；在国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社；并在香港、开罗、内罗华、墨西哥城、巴黎设立了5个可以直接向国外播发稿件的总分社，在纽约建立了欧美编辑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成了一个广泛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形成了多文种、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日24小时不间断对外播发新闻。新华社每天的文字发稿总量保持在150万左右。其中：每天用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等7种文字向国外发稿50多万字；通过专用线路分类别向国内的中央级、省市级、地县级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和其他用户发稿40多万字；用中文和英文向国内外（主要是厂、矿、企业和经济部门）发布各类经济信息（包括全国各大期货交易市场和证券交易所最新行情）约60万字；向国内外播发新闻图片100底左右；此外，还向近300家电视台提供以专题新闻为主的各类音像制品；根据用户的特别需要，向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提供大量中英文特稿和专稿。

新华社还创办了40多种报刊，主要有：《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体育快报》、

《瞭望》周刊、《半月谈》杂志（半月刊）、《中国记者》（月刊）、《环球》（半月刊）、《农村大世界》（月刊）、《中国年鉴》等，形成了一个包括日报、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鉴在内的新闻报刊系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参考消息》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半月谈》是亚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时事性期刊。

新华社已建立起以卫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为主干的现代化的通信技术体系，卫星广播已覆盖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过国内外数百个供稿点直接与用户联通的新闻信息发布网。同时，还建立了向国内外电子信息用户提供证券期货实时信息的卫星广播网络。新华社的新闻、经济信息、综合信息数据库以及主要报刊均已全面进入国际互联网络。

新华社已成为许多国际新闻组织的成员，并同世界上100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或新闻机构签署了新闻交换、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新华社的历届负责人或社长有：王观澜、周以粟、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向仲华、李初梨、博古、余光生、廖承志、胡乔木、陈克寒、吴冷西、朱穆之、曾涛、穆青，现任社长郭超人。

Xinjiang heping jiefang

**新疆和平解放** (peaceful liberation of Xinjiang) 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执行解放西北与新疆的任务。防守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马步芳、马鸿逵部。一野于1949年6月解放西安后，向甘肃、青海及新疆进军。7月歼灭胡宗南4个军，解放陕中，向甘肃追击，连克平凉、固原、海原及天水、武山等地。8月，毛泽东指示，对马步芳防守的兰州，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26日，一野解放兰州，马步芳主力被歼。此前，一兵团已切断马步芳逃往新疆的去路，马只得逃往河西走廊。9月，一、二兵团进军青海，在河西走廊歼敌4万余人，马步芳部被歼。同时十九兵团进军宁夏，23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被全歼。12月，陕西、陇南、青海、甘肃全部解放。

解放军胜利进军西北，促使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警备司令陶峙岳等人产生起义意图，但又疑虑苏联支持的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领导人是否支持。7月，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致电中共中

央，要求中央派人去做新疆三区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新疆。时值刘少奇秘密访苏，遂与苏方就尽早解放新疆问题交换意见，即派随员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秘密从莫斯科赴新疆，8月14日抵达伊犁。9月10日，毛泽东就与新疆当局谈判致电邓力群：新疆解决方案各方均可提出，但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邓应于近日进驻迪化，设电台与中央通报。同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张按毛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劝其尽早宣布起义。15日，邓力群至迪化，向陶峙岳、包尔汉传达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商讨举行起义诸问题。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告中央准备在新疆和平解放后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除中共参加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机关，彭德怀兼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及新疆各族人员并吸收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参加。邓力群按毛泽东指示将此意向包尔汉等人透露并征求意见。1949年9月25、26日，陶峙岳与包尔汉相继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xinwen shiye

**新闻事业** (journalism) 包括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新闻传播媒介的运作，以及新闻教育、新闻研究和政府对新闻工作的管理等诸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媒介和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新闻媒介整顿、改造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发展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形成阶段** (1949~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报刊、广播、通讯社等新闻传播媒介分别进行了改组、改造和创办。

报纸的改组、创办与改造。1949年8月，中共中央将1948年6月15日创刊于河北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将其迁往北京出版。1949年7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在北京创刊。1951年4月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创刊。

其他行业的机关报也陆续创刊。在大量创办各类新型报纸的同时，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私营报纸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3月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同年下半年起民营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到1953年初所有私营报纸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来，又全部成为国营报纸。到1955年，全国共有专区级以上报纸265种，每期平均发行量为936万份。

通讯社的调整。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新华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进一步明确了新华社的性质和任务。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同年4月，新闻总署公布《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两个文件，新华社从中共中央的宣传机构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讯社，受权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公告和外交新闻，并负责向全国报纸、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提供国内外重要新闻。

广播电台的改称与改造。1940年12月30日开始播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9年3月迁入北京，同年12月5日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2年先后完成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广播电台全部由国家经营，其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电视台的创建。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7日改称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随后，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也先后建起了电视台。

至此，以各级党委机关报为核心，包括广播、电视、通讯社等门类齐全、结构多样的新型新闻事业已形成。

建设阶段（1958~1976）在曲折中发展。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在发展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各种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犯了“左”的错误。随后，新闻界提倡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一些新闻报道从提出的问题到文风，都使读者耳目一新。60年代初期，报刊上开始盛行针对时弊的杂文，鼓舞人们前进向上，并有丰富的知识性、趣味性。60年代上半叶，新闻媒介成功地报道一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鼓

舞人民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建设国家。新闻事业有了发展：1961年，全国已有26座电视台（包括试验台、转播台）；广播电台从1957年的61座增加到135座（1962年调整为94座）。新华社的国外通讯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66年初国外分社发展到51个。1961年，许多大城市办起了晚报。到1965年，全国通过邮局发行的报纸共413家。

在摧残中复苏。“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窃取了新闻宣传的领导权，给新闻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有的晚报都被迫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省一级的党委机关报。许多电视台停播、停建。1967年，全国只有43家面目雷同的报纸。许多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被迫害致死。为此新闻界进行了抗争。

新闻事业从1968年开始复苏。1971年，报纸恢复到195家，电视台32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达80座。1973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彩色节目。农村有线广播发展较快，1976年，全国建成县有线广播站2503座，全国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

发展阶段（1978~1999）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媒介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闻事业自身有了全新发展，表现在：改进报道，增大新闻信息量；发动群众参与新闻报道，讨论问题增多；新闻批评有新发展；报业结构层次多样化；声、像、影新闻媒介各自扬独家优势，在竞争中推出自己的特色节目；新闻科研工作加强；新闻单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打破了关门办业务的习惯；新闻媒介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技术上逐步实现了现代化。

建设成就 分以下几个方面。  
报刊业 报刊数量有了巨大增长。1998年，中国正式出版的报纸总数2202种，是1978年的10.8倍（表1）；1997年底，全国共出版各类期刊7918种，总印数24.38亿册。

表1 中国报业发展一览表

年代	报纸种数	平均期发行量（万份）	年总发行量（亿份）
1950	382	301.2	7.97
1955	285	1051.0	19.53
1960	396	2366.4	50.88
1965	343	2476.6	47.41
1971	195	2602.3	83.97
1976	182	3573.3	124.28

续表

年代	报纸种数	平均期发行量（万份）	年总发行量（亿份）
1978	186	4280.1	127.76
1981	476	6021.0	159.17
1985	1710	15187.0	230.99
1990	1442	13986.0	187.30
1995	2089	17230.14	264.06
1998	2202		

报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党委机关报转变为功能多样、门类齐全、满足读者多种需要的比较合理的报业结构。目前，共有综合大报、机关报、群体报、行业报、企业报、晚报、文摘报、生活报和军队报等九大类。

报纸功能由过去的单一宣传功能向宣传政策、报道新闻、舆论监督、传递信息、传播知识、引导消费、提供娱乐等多种功能转变。

报纸制作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继告别“铅与火”、采用激光照排之后，正向全自动化信息处理系统发展。截至1998年7月，已有45家新闻机构进入因特网。

报社在经营管理上有了重大突破，改变了过去依赖国家拨款、不计成本的经营方法，逐步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从事多种经营，走集团化发展道路（表2）。

表2 现有报业集团

名称	成立时间	下设子报刊数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1996年5月29日	十报二刊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1998年5月18日	五报一刊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1998年5月18日	三报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	1998年6月8日	三报三刊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	1998年6月8日	三报三刊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1998年7月25日	六报四刊

广播电视业 广播电视业发展迅速（表3）。1998年，中国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各1000余座，电视机社会拥有量为3.17亿台。电视人口覆盖率超过90%，有近11亿经常观众。城乡居民平均可以收看到8套电视节目，其中城市居民平均可收看到15套节目。全国30余家省市级电视台已通过卫星播出。卫星通讯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被广泛

应用于广播、电视。中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数字高清晰度电视(HDTV)功能样机系统1998年9月试验成功。电视机年生产能力近4000万台。电视及相关行业产值占中国电子产业总产值40%以上。

表3 广播、电视发展表

年代	广播电台(座)	收音机拥有量(万台)	电视台(座)	电视机拥有量(万台)
1950	65		0	
1958	135		3	
1966	78		13	
1978	100		38	250
1980	106	11 910	38	902
1985	213	24 181	202	6 965
1990	635	25 123	509	18 546
1992	812	21 595	586	22 843
1997	1363		923	

**通讯社事业** 目前,中国共有2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和中国新闻社。新华社是中国国家通讯社,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信息中心,也是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之一。它平均每天向全国播发各类新闻稿件900条,约45万字;以中、英、法、西、阿、俄、葡7种文字向全球用户提供新闻1000多条;目前,接收新华社新闻稿件的用户已达4400多家,其中国内用户3068家。新华社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社。新华社还编辑出版40多种报刊,如《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半月谈》等。另一家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综合性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其新闻稿已被200多家新闻机构采用。

**新闻教育**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中国现有5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其中有4所院校招收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研究** 1978年,中国第一所新闻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称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新闻研究机构在各地陆续建立。新闻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研究机构为数众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刊物大量涌现,学术著作大量出版。我国新闻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各新闻单位系统。影响较大的新闻学术刊物主要有:《新闻学刊》(现停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战

线》、《中国记者》、《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国际新闻界》等。新闻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新闻学会(现停止活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史学会等。

**新闻工作机构** 主要有以下机构。

**新闻发布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是国家集中统一的新闻发布机构,采集和发布有关中国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一切能引起共同兴趣的新闻,每天主要向国内各新闻媒介播发不同需要的稿,同时用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对外播发稿件。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通讯社,国家集中统一的新闻发布机构。主要对外,特别是对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播发新闻。

**主要新闻机构**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报纸之一。现有2000多员工,拥有国内先进的印刷设备、激光照排系统、卫星传版系统、新闻资料数据处理系统、记者采编通讯系统。日出12版,还创办了海外版、华东版、华南版、网络版和出版社,另出版近10种报刊。国内设有38个记者站,国外设有33个记者站。报纸发行覆盖全国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台。自1950年起,先后开办藏、蒙、朝、维等少数民族语言节目;用英、日、朝、越等7种语言对外国广播。自1954年8月起开办对台湾广播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有7套广播节目,每天平均播出近130小时,听众有8亿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用多种语言对世界各地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1978年在北京成立,用43种语言对全球广播,每天平均播出189小时,可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收到国外听众来信60多万封。

中央电视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有近5000名工作人员,拥有接近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技术装备,播出系统已由模拟改为数字,播出方式由半自动转为全自动。播出8套节目,每天平均播出160多个小时,节目可以覆盖全球98%的国家和地区。

**新闻工作主管机构** 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事业的机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87年成立,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949年1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52

年撤销),任务是管理全国新闻事业和国家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后改称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及教学机构北京新闻学校等。1982年5月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1998年改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要职责是管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宣传工作,指导地方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管理全国电影事业和全国广播电视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87年1月成立,负责对报刊行政管理。

另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1949年7月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57年3月正式成立。是中国新闻界社团组织。

#### 推荐书目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北京,1992。

张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6。

Xinxing Gongsì feifa jizi an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 (illegal funding case of the Xinxing Corporation) 发生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的江苏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简称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案。1989年8月至1994年7月担任新兴公司经理、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邓斌,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李明和韩万隆等人的支持下,用新兴公司等企业名称,借合作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医用乳胶手套”之名,以月息5%~10%的高利为诱饵,在无锡等地大肆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集资总额达人民币32亿元,涉及12个省、市的368个出资单位和38名个人,造成经济损失12亿多元。案发后经有关部门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清退、追讨,仍造成1.8亿多元的经济损失。邓斌在非法集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投资单位或个人贿赂款物计人民币94.2万元、港币101万多元、美元5400元;侵吞公款人民币28万多元;挪用公款人民币12万多元;以牟取非法利益,向李敏、李明、韩万隆等人行贿人民币6.44万元、港币25万元、美元6400元。

根据上述罪行, 1995年11月13日,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邓斌犯受贿、行贿、贪污、投机倒把、挪用公款等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的姚静漪、黄桂芬、韩万隆、金惠珍、戴宝珍分别判处死刑、死缓和有期徒刑(李明已死亡, 不追究)。邓斌等人不服, 均提出上诉。是月24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并对邓斌、姚静漪的死刑判决, 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 一、二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 核准邓斌、姚静漪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涉及该案的38名被告人, 也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xinxing daodan quzhujian

**新型导弹驱逐舰** (new-type missile-launching destroyer)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首舰于1989年9月开工, 1991年8月下水, 1992年12月开始进行海上航行试验, 1994年5月交付中国海军。该舰配套装备复杂, 技术要求高, 在中低空防御、反潜、电子对抗和作战指挥与自动控制等方面较第一代驱逐舰有较大提高。舰上大部分设备和电子武器系统是国内新研制的。它的成功建造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装备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X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Choubenhui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New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简称“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134人参加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为与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相区别, 这次会议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新政协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于6月15日至19日举行。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选出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负责策划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重大事宜。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 进行如下工作: ①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

②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 ③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 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 ⑤起草大会宣言; ⑥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于9月17日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将起草大会宣言草案及拟定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歌词议案两项工作, 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办理。会议还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Xinghuo Jihua

**星火计划** (“Spark-Fire” Program)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 1985年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的面向农村经济主战场的指导性科技开发计划。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农的一个重大措施, 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和科技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任务是把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引向农村, 促进农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建设一批以科技为先导的星火技术密集区和区域性支柱产业; 推动乡镇企业重点行业的科技进步; 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培养农村适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主要内容包括支持一大批利用农村资源、投资少、见效快、先进适用的技术项目, 建立一批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 为农村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作出示范; 开发一批适用于农村和乡镇企业的成套设备, 并组织批量生产; 培养一批农村技术、管理人才和农民企业家。星火计划按类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县级, 其实施重点是星火技术密集区和星火区域性支柱产业。

1985~1997年, 星火计划共立项目84 875项, 其中国家级7128项, 省级28 859项, 地县级48 888项, 总投资357.5亿元。完成项目43 307项, 占历年累计立项总数的51.4%。滚动计划的项目完成率保持在50%以上。它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0多个县, 技术开发领域涉及种植、养殖、食品、机械、化工、轻纺、建材、采矿、电子、五金等行业, 已在全国形成了166个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和105个国家区域性支柱产业。共培训农村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达4773.4万人次。1997年全国星火计划已

实现产值2895亿元, 利税664.2亿元, 创、节汇81.9亿美元。其中当年完成项目和至年底尚未完成项目共新增产值562.1亿元, 新增利税107亿元, 新增创、节汇13亿美元。星火计划实施十多年来, 创造出的一系列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 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Xingtai dizhen

**邢台地震** (Xingtai earthquake)

1966年3月8日、22日发生在河北邢台地区的强烈地震。8日5时29分隆尧县发生第一次地震, 震级6.8级, 烈度9度; 22日16时11分宁晋县发生第二次地震, 震级7.2级, 烈度10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东部人口密集地区发生、造成严重危害的地震,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惊。两次地震受灾面积达10余万平方千米, 有80个县市、1639个乡镇遭到损失, 死亡8064人, 38 451人受伤, 损坏房屋508万间。3月8日地震发生后, 国务院立即调集部队和医护人员、科技队伍赶赴灾区救援。周恩来召集紧急会议, 部署救灾工作, 并于3月9日亲临邢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提出“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的号召。3月22日地震发生后, 他再次来到灾区视察, 并对在场的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 希望在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此后, 中国科学工作者加强了地震预报研究。

Xiong Qinglai

**熊庆来** (1893~1969) 数学家。

云南弥勒人。1893年10月20日生。1909年入云南高等学堂本科。1913年赴比利时留学, 翌年转赴法国, 先后就读于格伦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彼里埃大学及马赛大学, 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 先后任云南工业学校教师, 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31年再度赴法深造, 专攻函数论, 1933年获法国理科博士。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至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 留法国巴黎研究数学。1957年回国后, 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数学研究, 是最早将



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致力于开展整函数、亚纯函数、代数体函数及正规族的研究。著有《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高等算学分析》等10多种书籍、讲义及60余篇论文。他的重要论文多次为国内外同行学者所引用，对中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和数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中国及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196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Xu Beihong

**徐悲鸿** (1895~1953) 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1895年7月19日生。幼年即随父亲学画，1912年任师范学校图画教师。1916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次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潜心研究古代绘画。1919年赴法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期间曾赴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观摩艺术名作。1927年回国，历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赴欧洲各国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蜚声海外。1934年回国后，创办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40年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在海外举办多次画展，将卖画所得捐献祖国抗日活动。1946年到北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49年作为新中国代表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画、油画、素描作品的创作，形成明朗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提出中国画改良主张，提倡写实和融合西方画技，反对模仿古人。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建立独特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出吴作人、艾中信等大批有成就的美术家。绘画代表作品有中国画《风雨鸡鸣》、《奔马》、《九方皋》、《愚公移山》，油画《田横五百壮士》、《战斗英雄》，素描《裸体少年》、《毛主席在人民中》等，表现出浓厚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主要作品收藏在徐悲鸿纪念馆。论著有《中国画改良论》、《画范·序》等。1953年9月26日病逝于北京。

Xu Bing

**徐冰** (1903~1972) 政协第四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1903年2月17日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赴德国留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曾任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共党团书记，并在中共中央职工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32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春，经营救出狱。后从事《世界论坛》、《中外论坛》的编辑工作，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5年，在太原、北平组织华北救亡会、北平文化救亡会、华北民众救亡会，参加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和营救北平草岚子监狱中共干部的工作。1937年初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曾与成仿吾合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9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秘书、文化组组长。1944年11月，任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1948年，任中共山东潍坊市委书记，济南市副市长。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工作，后任北平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1964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3月22日逝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Xu Chi

**徐迟** (1914~1996) 现代散文家、诗人。浙江吴兴人。1914年10月15日生。曾就读于东吴大学，193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同时进行创作，50年代，写出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60年代后，主要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祁连山下》受到好评。1976年以后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刑天舞干戚》三篇刻画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的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的报告文学熔政

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此外，还出版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论》等。1996年12月12日逝世。

Xu Haidong

**徐海东** (1900~1970)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元清。湖北黄陂徐家桥(今属大悟)人。1900年6月17日生。曾读过私塾，当过11年窑工。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同留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后任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军长，率部在鄂东北、皖西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1月，改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协助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部进行长征，在鄂豫陕边创建苏区，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期间，在打破国民党军围攻的作战中，向省委提出“先(拖)疲后打”的方针，并多次指挥部队出奇制胜。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8月吴焕先牺牲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后任军长。同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任军团长，指挥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安事变时，曾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町店等战斗。1939年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做出贡献。1940年起因战争中多次负伤，积劳成疾，病情严重，仍随军指挥作战，后长期治疗、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0年3月25日于郑州逝世。

Xu Teli

**徐特立**（1877~1968）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初作私塾教师，1905年入宁乡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新式教育活动，创办平民夜校。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创办长沙师范学校。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任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农村师范、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曾加入国民党，任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创办一系列普及教育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驻湖南代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教育事业的普及、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1968年11月28日逝世。著作收入《徐特立教育文集》、《徐特立文集》。

Xu Xiangqian

**徐向前**（1901~1990） 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元帅。

原名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人。1901年11月8日生。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围副等职。次年11月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起义受挫后，随军转往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10团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6月，

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发动的3次“会剿”，扩大了鄂豫边割据区域。1930年起历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指挥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进攻战役。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率部撤离苏区转往川陕边，随后参与领导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至10月，先后指挥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后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余万兵力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进行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1936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1938年4月率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次年6月奉调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1940年底到延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组织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在太原战役中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中共第六届（1935年增补）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和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逝世。主要著作有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和《徐向前军事文选》。

Xu Yinsheng

**徐寅生**（1938~ ） 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江苏苏州人。1938年6月18日生。1955年在上海大光中学读书时，入选上海市学生乒乓球代表队。1956年进上海市乒乓球队。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并进入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成为主力队员。使用右手直拍近台快攻打法，技术全面，战术灵活，球路变化多，被乒乓球界誉为“智多星”。曾四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并获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3名、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亚军（与庄则栋合作）、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冠军（与庄则栋合作）。1961~1965年曾三次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他向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发表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被毛泽东赞扬为“全文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处处反对任何一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1971年开始，以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和总教练的名义多次率队出征世界锦标赛，夺得多枚金牌。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亚洲副主席兼议事通则委员会委员。1977年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管运动训练竞赛。多次担任世界大型综合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1979年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至今。1998年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现任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著有《现代乒乓球理论、技术、战术及其训练的研究》（与他人合著）。

Xu Deheng

**许德珩**（1890~1990） 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第七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字楚生（楚僧）。江西九江人。1890年10月17日生。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运动。1918年参与发起成立学生爱国会，创办《国民》杂志。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任《全国学联日刊》总编辑。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归国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

后，曾任大陆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3年1月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1935年参与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宣传抗日民主。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络部副部长。1944年在重庆参与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被选为理事，主持社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爱国民主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九三学社第一届至第七届中央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2月8日逝世。

许德珩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将法国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同时，他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学的先驱。著有《社会学讲话》、《中日关系及其现状》、《为了民主与科学》等。

Xu Dixin

**许涤新** (1906~1988) 经济学家。广东揭西人。1906年10月25日生。1926~1931年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后，任《重庆日报》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等职。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第一、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学术研究中，运用对比研究方法，以中国的资料为据，阐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经济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进程及特点。十分重视部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倡议建立生态经济学，并积极从事人口学等新学科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1988年2月8日逝世。

Xu Guangda

**许光达** (1908~19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德华。湖南长沙人。1908年11月19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入黄埔军校，攻习炮兵。1927年8月在江西宁都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7月奉派到洪湖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红二军团师政委、师长等职，率部参加巩固洪湖苏区的斗争和红二军团的南征作战。1932年作战负重伤赴苏联就医，曾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中国班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办的汽车训练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1941年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二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率部在山西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任雁门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10月奉命组成许光达、孙志远纵队，协同晋察冀野战军进行绥远战役。后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转战晋中、晋北地区，保卫晋绥解放区。1947年8月第三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改第一野战军）建制。率部转战陕北，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瓦（子街）、荔北等战役。1949年2月起任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扶眉、兰州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任司令员，后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9年6月3日逝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收入《许光达论装甲兵》出版。

Xu Haifeng

**许海峰** (1957~ ) 射击运动员。安徽和县人。1957年8月1日生。孩提时代，特别喜欢打弹弓，得“弹弓王”的绰号。曾任安徽和县新桥区供销社营业员。1982年11月入选安徽省射击队。3个月后，初露锋芒，在华东区射击赛上夺得气手枪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1983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射击决赛中，又摘取了气手枪和手枪慢射两枚银牌。1984年入选国家射击队，7月29日在第23届奥运会上，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60发气手枪慢射冠军，成为该届奥运会第一个冠军，也是中国第

一枚奥运会金牌获得者。1986年在第10届亚运会上，以660环的成绩获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并超过世界纪录。同年在全国射击分项赛上以662环成绩，超过男子小口径自选手枪慢射世界纪录。曾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4年、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退役后，担任中国射击队教练，在他的指导训练下，李对红获第27届奥运会冠军。

Xu Jialu

**许嘉璐** (1937~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语言学家。江苏淮安人。1937年6月3日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和副校长。1987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任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1994年起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97年当选民进中央主席。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解字》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参加主编中国学前教育、小学、中学教育百科全书。

Xu Shiyou

**许世友** (1906~1985) 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北麻城许家洼（今属河南新县）人。1906年2月2日生。早年入少林寺习武，后到吴佩孚部队当兵。1926年在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1927年回乡，8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黄麻起义。后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历次反“围剿”和反围攻。作战勇猛顽强，曾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中，多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屡挫强敌。长征中曾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1938年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指挥香城固伏击战。1940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旅长、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参加莱芜、孟良崮战役后，参与指挥了胶东保卫战和济南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华

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中顾委副主任。1985年10月22日逝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Xue Muqiao

**薛暮桥**（1904～）经济学家。原名薛雨林。江苏无锡人。1904年10月25日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在监狱中刻苦学习。出狱后参加中国农村经济学会，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后主编《中国农村》月刊。1938年在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任训练处长。1941年任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训练部长。1943～1947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政府工商局局长、秘书长、实业厅厅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财经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1952年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1980年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和名誉总干事等职。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计划学会、统计学会、物价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计、计划工作，特别是对物价的稳定和调整颇有建树。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等问题，在理论上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积极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认为计划管理过分集中，不仅破坏了商品经济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且割断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以致产销脱节，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主张打破计划包揽一切、排除市场调节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开放市场，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打破条块分割，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的观点。主要著作有：《旧中国的农村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农村论文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经济区的经济工作》、《薛暮桥经济论文集》。

xuewei zhidu

**学位制度**（system of academic degrees）

由国家授权的或根据某种公认的办法认可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或其他学术机构授予，或由国家的有关考试、审定机构授予个人的一种终身称号，以表明称号获得者曾受教育水平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1957年、1961～1964年、1965～1966年曾3次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并草拟有关条例。但出于种种原因，均未能付诸实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1980年2月1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学位制度正式建立。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委据此制定了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学位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工作实行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学位授予单位三级管理。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省级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和委托开展有关工作。学士学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暂行实施办法规定，中国学位按下列10个学科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983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增设“军事学”门类。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增设“管理学”门类。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决定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建筑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法律硕士学位、教育专业学位、医学专业学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据1997年统计，全国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共594所；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单位633个（含科研机构），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共9799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共277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共2604个。

**推荐书目**

国家教委外事司编：《中国教育概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

xuexi jiefangjun yundong

**学习解放军运动**（campaign to

learn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工业部门率先提出，后发展为全国范围内学习解放军的运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重视。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培养好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等问题。林彪主持在军队工作中无限突出政治，创造了以“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为内容的“四个第一”和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内容的“三八作风”等政治工作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赏识。1963年12月15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和肖华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有人提议，国家工业部门从上至下（即从部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奋起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按照这封信的精神，会议决定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指出一个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并指出“四个第一”的原则对全国各项工作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学习。社论发表后，全国掀起学习解放军运动的高潮。1964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三八作风传到全国去》，提出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三八作风”的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1965年6月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认为全国学习解放军，已经形成一个促进各行各业革命化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并提出要进一步学习解放军。

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对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等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左”的错误盛行中进行的，大搞阶级斗争和形式主义，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

xuexi wuchananjieji zhuanzheng lilun yundong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study the theor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1975年根据毛泽

东一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而掀起的学习和批判运动。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中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这些谈话内容称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同年3月和4月，姚文元、张春桥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先后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全面专政论”，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为“四人帮”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错误认识。他认为：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把商品制度与“变修正主义”、“产生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在他的谈话中，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有着明显误解。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指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所包含的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却将按劳分配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将此误解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认识，是他在政治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的思想理论根源。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Xun Huisheng

**荀慧生**（1900～1968）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原名词，字慧声，艺名白牡丹，后用慧生。河北东光人。1900年1月5日生。幼年在义顺和梆子班学艺，习花旦，后附学于“三乐社”，出科后改习京剧，演闺门旦、花旦、刀马旦。他吸收河北梆子的唱腔、唱法，对京剧的传统技法有所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格。擅演天真、活泼、热情的少女角色，世称“荀派”。流行较广并表现了荀派艺术特色的代表作有：《玉堂春》、《大英杰烈》、《红楼二尤》、《红娘》、《荀灌娘》、《杜十娘》、《金玉奴》、《霍小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热心于戏曲改革，移植、修改传统剧。他的艺术论述和代表剧目，编成《荀慧生演剧散论》、《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出版。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1968年12月26日逝世。

# Y

Yaluzangbu Daxiagu kexue tanxian kaocha

## 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the Great Canyon on the Yalu Tsangpo River)

1998年中国科学家对世界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的科学探险考察。此次考察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等单位主办，考察队成员57人，由科学家、记者和登山队员组成，徒步穿越大峡谷，考察从10月29日至12月3日，历时37天，行程近600千米。这是人类对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的首次全程徒步穿越和多学科科学考察。

考察中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大峡谷的特征地理河段进行了精密测量，最后考察论证雅鲁藏布大峡谷无论长度和深度都为世界之最。峡谷全长504千米，最深6009米，核心河段平均深度2673米，河床最窄处35米，最大坡降75.35%，两岸最高峰南迦巴瓦峰海拔7787米，加拉白垒峰7257米。通过考察，证实和发现峡谷核心无人区河段有4处大瀑布群，其中藏布巴东瀑布、绒扎瀑布落差都在30~35米之间，在水力和旅游开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考察取得了地学、生物学以及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Yazhou Aozhou Gonghui Huiyi

## 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Asia and Australia Trade Union Conference)

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又称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在北京举行。召开这次代表会的建议是在1945年10月举行的世界工联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1949年6月，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联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提出这次代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世界工联接受了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建议。这次会议由世界工联执行局直接领导。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印度、马来亚、暹罗(即泰国)、缅甸、越南、锡兰(即斯里兰卡)、巴基斯

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塞浦路斯和苏联亚洲部分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等6个加盟共和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的工会代表。由于美国阻挠，日本工会代表未能出席。世界工联副主席、会议主席团主席刘少奇致开幕词，指出这次会议“将使中国工人阶级能够自由地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斗争”，强调“为了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反对资本进攻，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塞扬作题为《世界工联在亚洲、澳洲国家的活动和它的任务》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作题为《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亚澳工会代表会致美、英、法、荷男女工人呼吁书》、《亚澳工会代表会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亚澳工会代表会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亚澳工会代表会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

Yazhou Funü Daibiao Dahui

## 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Asia Women's Congress)

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197名代表来自23个国家，其中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印度、以色列、越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即马来西亚)、暹罗(即泰国)和苏联在亚洲的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加盟共和国。捷克、阿尔及利亚、荷兰、古巴、英国、美国、法国、西非、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主持，国际民主妇女联总书记古久里夫人作《国际民主妇联为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报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作《亚洲妇女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报告，伊朗代表玛辛·法洛琪作《保护亚洲妇女权利》的报告，印度代表阿尔塔·台维作《保护儿童权利》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告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妇女书》、《关于争取妇女权利的决议》、《关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援助亚洲国家的妇女团体之活动的决议》、《关于亚洲各国儿童情况的决议》等文件。这次大会确定的亚洲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是，不分民族、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反

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而斗争。

Yazhou ji Taipingyang Quyu Heping Huiyi

##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Conference for Pea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会议。

1951年，美国签订对日“和约”，阻挠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使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团结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粉碎新的战争阴谋，1952年3月21日，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11人，联名电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著名的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士，倡议共同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有关人士热烈响应。6月3日，中国、印度、日本、美国等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商定有关事宜。10月2日，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344人，代表37个国家，列席代表34人。另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派来的代表，以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来宾和特邀人士。与会者共计463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给会议发了贺电。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致开幕词，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副团长郭沫若作报告，题为《团结一心，保卫和平》。同日和随后几日，日本、朝鲜、印度、智利、美国等国的代表团长作其他报告，与会的各国代表相继发言。10月12日至13日，会议举行闭幕式，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交流问题的决议》、《关于加紧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运动的决议》和《关于拥护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决议》等文献。会后，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作为常设联络机构。宋庆龄任主席，文幼章、郭沫若等12人任副主席。

Yan Jici

严济慈 (1900~1996) 第六、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物理学家。字慕光。浙江东阳人。1900年12月4日生。1923年东南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7月回国，先后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并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1928年再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1931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后，任中国科学社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秘书长、理事长，《物理学报》主编。1935年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5年应美方邀请，以访问教授名义在美国各地讲学。1946年获国家抗战胜利勋章。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和副校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80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有杰出的研究贡献，1988年被密特朗总统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十分注重科学教育，编写的《几何证题法》、《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受到广泛欢迎。是九三学社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6年11月2日逝世。

#### yanhai fanghulin tixi

### 沿海防护林体系 (coastal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ests)

中国在沿海地区建设的大型防护林体系。中国沿海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长年战乱、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的影响，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几乎破坏殆尽，次生林也在周而复始地重采滥樵之下残缺不全，各地都有不少荒山和没有屏蔽的荒滩，旱、涝、风暴、潮等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群众生产、生活都十分困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为了增加沿海地区的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减灾防灾的能力，沿海各省（市）开始成立专门的沿海防护林建设管理和技术机构，组织技术、科研人员对海防林进行调查或规划设计，引种、造林试验等。1955年以后，北方沙滩引种黑松、南方沙滩引种木麻黄，造林陆续取得成功，从此掀起了中国沿海地区植树造林的热潮，取得明显成果。

1987年2月，国家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局）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了首次全国沿海防护林建设经验交流会，全面总结了5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造林经验，并提出了以沿海县为单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的新思路。同年4月，林业部组织编制了《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总体规划》。规划包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5个县（市、区）。规划造林总任务355.8万公顷，其中2000年前为一期工程，规划造林249.1万公顷，为总任务的70%；二期工程从2001~2010年，造林106.7万公顷。1988年7月，国家计委批复了一期工程规划。1991年5月，林业部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了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从此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在195个县全面展开。截止1995年底，沿海防护林工程完成造林187万公顷，营造海岸基干防护林带7063千米，大陆海岸基干林带基本合拢。

#### yanhai kaifang chengshi

### 沿海开放城市 (opening of coastal cities)

继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的建议，于1984年4月决定进一步开放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土地面积14.3万平方千米，交通方便，工业基础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科教文化事业比较发达，既有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经验，又有对内地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的网络，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为重点，加速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更新换代，增加出口创汇。国家要求这些城市在对外开放中认真抓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和其他轻加工工业，并利

用丰富的旅游资源，相应地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开放的内容：一是扩大这些城市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权限；二是对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或客商）给以优惠待遇。为了扶持这些城市充分发挥原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港口运输、科教事业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国际经济技术联系，加快经济发展，国家在对外经贸活动的自主权、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老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对这些城市给予政策倾斜。特别是为了尽快创造吸收外商投资的“小气候”，不失时机地引进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的外资项目，批准除北海和温州以外的其他12个有条件的沿海开放城市，参照经济特区的某些做法，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由于采取了这一重大步骤，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沿海从南到北形成了主干线。

#### yanhai kaifang diqu

### 沿海开放地区 (opening of coastal development zones)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国务院又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若干沿海市、县。至此，中国东部由北到南连接成近万里的一大片狭长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这一沿海开放地带横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1个地级以上市、43个县级市、180多个县，总面积达42万平方千米，人口2.2亿。这样，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便形成了由“点”到“线”和“片”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以及老企业技术改造方面，实施沿海开放城市已经实行的某些政策。同时，经济开放区的市区和县的城关区以及安排在经济开放区范围，以发展出口为目标、利用外资的农业技术引进项目，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经过批准可以实行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①适当扩大经济开放区内省辖市人民政府及某些县人民政府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②国家和地方对这些地区发展出口创汇的重点行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在资金安排、设备供应、技术指导等方

面,积极支持,优先安排。③在这些城市的市区、县的城关区举办“三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可按现行税法规定的税率打八折征收等。这些地区工业加工能力较强,农业商品率较高,城乡经济较为活跃。规定这些市、县的城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工业卫星镇基本上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目的在于增强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的能力,以便借助国际市场的牵动,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更好地利用外资,提高经济技术水平,加快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沿海开放地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成效显著,外向经济发展迅猛,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yan Jiang he shenghui chengshi de kaifang

**沿江和省会城市的开放** (opening of the cities on the Yangtze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港口城市,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的有关政策;批准合肥、南昌、南宁、长沙、郑州、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自治区首府)为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沿江和省会城市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利用外资、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步伐明显加快。

Yan Mingfu

**阎明复** (1931~ )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11日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定稿员。1978年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7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年6月在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90年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是中共第

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Yanzhou Meitan Kuangqu

**兖州煤炭矿区** (Yanzhou Coal Field) 中国大型煤炭基地。位于山东省邹城市,京沪和兖石铁路的交会点。可采储量20亿吨。1976年组建了兖州矿务局。1973~1997年,陆续投产矿井7对,年设计总生产能力1775万吨,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技术装备水平先进的大型矿区。

矿区地质条件复杂,冲积层厚,涌水量大,岩性松软,在井巷施工中采用世界先进的预注浆和冻结的特殊凿井工艺技术,在科技研究应用方面取得突出成绩。1993年兖州矿区建设施工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煤炭生产实现了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落煤、装煤、运煤、支护和顶板管理等工序实现了连续、联动的机械化作业。1997年产煤1924万吨,其中4处特大型矿井都是一个矿只有一个综采队。4处特大矿井中南屯矿391万吨,兴隆庄矿411万吨,鲍店矿397万吨,东滩矿489万吨,综采队的年产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矿区交通便利,京沪铁路贯通上海、南京等工业城市,兖石铁路直达日照港,便于煤炭外运,保证了华东地区用煤,也便于煤炭出口。1997年煤炭出口为497万吨,主要销往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部分销往欧洲。矿区建设了先进技术装备的4座大型洗煤厂,年入洗原煤能力1200万吨,保证了宝山钢铁公司等炼焦用煤。

兖州矿务局不断深化改革。90年代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煤炭生产及深加工已经形成高度的专业分工格局,还拥有电力、建材、机械制修、化工、铁路、勘探、设计、电子、服装以及食品加工等多种产业。1996年3月兖州矿务局改制为兖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7月兖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又将所属4处特大型矿井、洗煤厂及生产辅助单位组建成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股票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上市的大型现代企业。

Yang Baibing

**杨白冰** (1920~ )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尚正。四川潼南人。1920年9月9日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起任八路军一二九

师组织部、民运部干事,民运工作队队长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行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后任一二九师延安留守处政治协理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经扶县(后改新县)委组织部部长、经东县工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组织部科长、第二野战军后勤部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进军大别山和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组织部部长,第二政治干部学校组织部部长兼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青年部副部长,成都军区组织部部长。1960年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政委。1987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次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增补),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Yang Chengwu

**杨成武** (1914~ )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福建长汀人。1914年10月27日生。1929年参加闽西红军。1930年编入红一方面军,同年5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教导大队、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二师第四团政委,多次率部担任前卫,曾指挥第四团强渡乌江、抢占娄山关、夺占泸定桥、攻占腊子口。到陕北后任红一师政委、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团长、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司令员。1939年冬曾指挥所部在涞源县黄土岭地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野战军第二政委,率部参加保北、正太战役,并指挥了青沧、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后,回师参加平津战役。后任二十兵团司令员,参加太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副



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杨成武回忆录》。

Yang Dezhi

**杨得志** (1911~1994)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人。1911年1月3日生。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部队，随军到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一军团任排长、连长、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师第一团团长，率部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曾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长、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率部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率部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军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曾率部参加邯郸、正太战役，指挥了青沧、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指挥攻克新保安。后率部参加太原、兰州等战役。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次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上甘岭等战役。1954年回国后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4年10月25日逝世。著有《杨得志回忆录》。

Yang Gensi

**杨根思** (1922~1950)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江苏省泰兴县人，1922年11月生。1944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第1纵队1师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58师

172团副连长、连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立1次大功、5次小功，两次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英雄称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和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奖章。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任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在第二次战役中，奉命率领一个排坚守咸镜南道长津郡下隅里外围1071高地小高岭阵地。带领全排战士连续打退美军8次进攻。当美军发起第9次进攻时，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人，40多名美军蜂拥而至，他抱起仅有的1包炸药冲入美军。与美军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阵地。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称号。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朝鲜政府还在长津湖畔为他建立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他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Yang Jingren

**杨静仁** (1918~ ) 原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回族。甘肃兰州人。1918年9月17日生。1936年在兰州中学读书时，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41年在兰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任中共甘肃省委直属回民特别支部委员、书记，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常委、伊斯兰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回民青年救亡会常务干事。1941年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西北局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委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国家民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60~1977年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

央委员；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至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Yang Mingxuan

**杨明轩** (1891~1967)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原名杨荃骏。陕西户县人。1891年6月13日生。1907年入西安中学堂，后转入陕西政法学堂、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1915年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秋回陕西，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去三原渭北中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5月起，先后任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教务主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上海大学任讲师并兼任附中部主任。1924年7月返陕任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9月任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常委兼陕北特派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国民党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1928年被捕，次年保释出狱后去上海。1931年回西安省立师范和中山学校任教。1933年到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36年7月回到西安，不久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交际部部长，农民训练班主任。1937年1月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1942年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筹备工作。194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组织委员。同年8月去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民盟西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是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主席；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67年8月22日逝世。

Yang Mo

**杨沫** (1914~1995) 现代小说家。女。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定县、北平等地教书、做书店店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冀中参加游击战争，从事妇女、宣传工作，历

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河北）的编辑、副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63年起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兼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沫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是她的代表作。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第一部），散文、报告文学等。1995年12月11日逝世。

### Yangpu Daqiao

#### 杨浦大桥 (Yangpu Bridge)

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截至1993年底）。位于中国上海市，跨黄浦江，与南浦大桥构成上海市内环线越江的两个交通枢纽。建于1991年5月~1993年9月。1993年10月23日举行通车典礼。桥总长7553.2米，主桥长1172米，主跨602米。两岸引桥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式桥。主桥采用悬浮体系、箱形钢梁与钢筋混凝土桥面板组成的叠合梁、双塔、扇形双索面，钢管桩基础。主塔高208米，为斜拉桥中之最，其中下部为菱形，造型美观，桥身从中穿过；上部为独柱直插蓝天，每塔两侧各铆有32对斜拉钢索，将桥身悬挂于通航水位之上50米处。1993年7月邓小平题写杨浦大桥桥名。

### Yang Rudai

**杨汝岱** (1926~ )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仁寿人。1926年12月生，1950年1月参加工作，任四川省仁寿县富家区工作员，县土改工作队组织干事、副组长、组长、队长。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仁寿县方家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中共仁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乐山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后任四川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Yang Shangkun

**杨尚昆** (1907~1998) 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

199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四川潼南人，1907年7月5日生。1920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社会科学读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底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等职，参与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在中央苏区指挥所部反“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率红三军长征。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建树。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中央委派，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参与领导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任北方局书记，推动了华北地区群众抗日运动的高涨。1941年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在中央华北委员会工作。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1947年任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组织中央机关安全撤离延安，并参与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积极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党中央掌握全局，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领导调整和健全了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11月被调离职务，后受到错误处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长期迫害，被长期监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12月至1980年底，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他协助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对新时期军队现代化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主持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及改革军队体制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取得显著成就。1982年和1987年，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和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3月后，不再担任领导职务。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 Yang Shixian

**杨石先** (1897~1985) 化学家，教育家。蒙古族。原籍安徽怀宁。1897年1月8日生于浙江杭州。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授。1929年至193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杂环化合物合成的研究，1931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再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主任及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兼任西南联大教务长。1945年第三度赴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大学从事药物化学的研究。1948年回国后，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开

大学校长兼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民进中央第六届常委。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研究与化学教育事业。专长于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是这两个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在有机磷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高效农药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在他的指导下研制成功了杀虫剂久效磷和螟蛉畏、除草剂燕麦敌和胺草磷、杀菌剂叶枯净等十几种新农药。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创建分子生物研究所，在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点上开始新领域的探索。1985年2月19日在天津逝世。

#### Yang Tingbao

**杨廷宝** (1901~1982) 建筑学家。河南南阳人。1901年10月2日生。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到美国宾夕福尼亚大学留学，多次获得学生设计奖。1927年回国，历任基泰工程司建筑设计负责人，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副院长、建筑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届代表。主持和参加了北京和平宾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北京图书馆、毛主席纪念堂等著名建筑物的设计。在设计中注重运用传统建筑经验和手法，发扬中国现代建筑风格。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大批建筑人才。1982年12月23日在南京逝世。主要著作有《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 Yang Xianzhen

**杨献珍** (1896~1992) 哲学家、教育家。原名杨奎廷，湖北郧县人。1896年7月24日生。1920年国立武昌商科专门学校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监狱达7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决死三纵队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中共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延安中央党校

教务处第一副主任、二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五届常委，第四届委员。60年代前期以“合二而一”论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杨献珍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提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方针。在经济方面、理论方面，他认为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发展资本主义成分逐渐缩小以至最终消灭，社会主义成分逐渐壮大，最后成为单一成分，建成社会主义。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杨献珍文集》。

#### Yang Xiufeng

**杨秀峰** (1897~1983)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又名杨峰、杨秀林。河北迁安人。1897年2月27日生。1916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起，先后在江西、河北、北京等地中学任教。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法国华侨反帝同盟并做党的工作。1932年到苏联学习，后去德国、英国从事党的工作。1934年回国后，在河北法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以大学教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参加发起组织华北各界救国会，是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西抗日游击队司令员，河北抗战学院院长，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边区行政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党组书记。1952年后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

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11月10日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杨秀峰文集》。

#### Yang Yichen

**杨易辰** (1914~1997) 1983年至1988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原名杨振九。辽宁省法库县人。1914年3月31日生。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任中国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组织学生剧团，南下宣传抗日。1938年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后，历任中共冀南区第三地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第七地委副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铁岭中心县委书记、辽吉省第一地委书记、辽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1988年，任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7年6月28日逝世。

#### Yang Yong

**杨勇** (1913~1983)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世峻。湖南浏阳人。1913年9月29日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第四师连长、第二师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第四师十团政委，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参加了平型关、午城井沟等战斗。1939年率部随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山东，领导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后任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三四三旅、教导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鲁西专署专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先后率部参加了邯郸、定陶、巨金鱼、鲁西南、淮海、渡江等战役并进军西南。1950年1月兼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和

省人民政府主席，后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1977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1月6日逝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Yang-Yu-Fu yuan'an

**杨余傅冤案** (fabricated charge against Yang Shangkun, Yu Lijin and Fu Chongbi) 1968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同制造的一起打倒军队一些领导人的冤案。“杨”、“余”、“傅”分别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1967年曾随从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没有把视察途中毛泽东的一些言论向林彪汇报，因而引起林彪的忌恨。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也曾于1967年随从毛泽东出巡，以同样原因被林彪等人列入打击对象。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曾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保护了一批领导干部，因而被江青等人视为眼中钉。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等人共同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要“夺权”、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驻地”的谎言。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命令，撤销杨、余、傅的一切职务，将三人关押审查，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从而制造出一起“杨余傅事件”。林彪、江青趁机又诬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此后，由叶群、吴法宪等人于1967年夏季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检查，提出：过去打倒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等一大批解放军将领都是错误的，要翻案。此后，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三人先后恢复了工作，但由于当时江青集团还掌握着较多权力，“杨余傅”冤案未能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属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冤案，应彻底推倒一切污蔑之词，予以平反昭雪。

Yangbanxi

**样板戏** (modal operas) “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在全国树立的作为文艺创作样板的现代题材戏剧。其中，1967年5月在北京会演的8个戏剧统称为“八个样板戏”。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1968年以后，江青还推出了第二批“样板戏”，比较著名的有：京剧《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芭蕾舞剧《红嫂》（后改名《沂蒙颂》）等。其中有些戏剧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创作上演，并获得观众好评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为之付出了心血。如北京京剧院的《红灯记》和北京京剧团后来改名为《沙家浜》的《芦荡火种》，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就已经在全国得到广泛称赞。这些现代题材的戏剧作品继承了传统的形式和风格，结合现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从表现题材到形式，都得到了拓展。这些艺术创新是在长期戏曲改革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却把这些成果据为己有，一方面标榜自己是“京剧革命”的旗手，总结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所谓“三突出”的教条主义创作原则；一方面用“样板戏”打击压制其他文艺创作。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全国只能上演和移植“样板戏”，并且不准改动一句唱腔或一个道具。文艺领域出现了荒芜景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样板戏”才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Yao Lianwei

**姚连蔚** (1934~ )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陕西长安人。“文化大革命”前为陕西西安874厂工人、车间组长。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造反，任874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总工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7月被免除职务回西安。1979年2月被隔离审查。1981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确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武斗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考虑到历史条件免于起诉。1984年中共陕西省纪委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职务，

回原工厂工作。

Yao Wen Yuan

**姚文元** (1931~ ) 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浙江省诸暨县人。1931年12月11日生，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由于批判胡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1958年调到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编辑部，任文教组组长。此后，积极进行批判作家冯雪峰、艾青、丁玲等人的“文艺评论”活动。1962年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任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1965年2月起，和张春桥一起协助江青秘密组织批判文章。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由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姚文元又发表《评“三家村”》文章，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1966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1月，姚文元伙同张春桥诬陷打倒上海市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获秋等人，组织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一月夺权”活动，成为中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7年5月，在济南参与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全国理论宣传工作。1970年任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1971年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密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3月，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际关系进行歪曲的描述。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直接控制舆论宣传工具，指挥“梁效”、“池恒”、“罗思鼎”等写作班子，污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煽动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还指使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编造材料，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同年3月至5月，姚文元捏造罪名，诬陷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是“反革命”，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煽动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将其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判处其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1996 年出狱。

Yao Xueyin

**姚雪垠** (1910~1999) 现代小说家。原名姚冠三。河南邓县人。1910 年 10 月 10 日生。1929 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1931 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开封、武汉等地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曾发表《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小说。1947 年到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长夜》。1951 年调河南省文联专事创作。1953 年调中国作协武汉分会。1957 年错划为“极右分子”。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75 年迁居北京。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第四、五届中国文联委员。1999 年 4 月 29 日逝世。主要代表作《李自成》是他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又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一卷于 1963 年出版；第二卷出版于 1976 年，1983 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卷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文化奖。第三卷出版于 1981 年，最后两卷也即将出版。

Yao Yilin

**姚依林** (1917~1994)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安徽贵池人，1917 年 9 月 6 日生于香港。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在上海读书时，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参加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作为北平抗日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坚持在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干事，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宣传部长。1938 年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 年 2 月，任中共冀热察区委宣传部长。1939 年 7 月起，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参与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决策和政策的制定。1946 年起，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为保证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致力于国家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参加对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他坚持原则，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77 年 3 月，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 年 8 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79 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协助陈云和李先念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9 年 7 月后，连续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编制并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主持编制了第八个五年计划。积极参与了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决策和实施工作。

他是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 年 2 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 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 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92 年 10 月后，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1994 年 12 月 11 日在北京逝世。

Ye Duzheng

**叶笃正** (1916~ ) 气象学家。原籍安徽安庆。1916 年 2 月 21 日生于天津。194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3 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1945 年留学美国，1948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1950 年至 1963 年间先后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77 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中国气象学会第十九、二十届理事会理事长。1981 年当选

为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1982 年任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气象学会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届委员。早期从事大气环流和长波动力学研究，继罗斯贝之后，提出了长波的能量频散理论，对动力气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0 年代，他和弗罗恩 (Flohn) 分别独立地提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热源的见解，由此开拓了对大地形热作用的研究。1958 年与陶诗言等提出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季节突变性。60 年代对大气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自 70 年代后期起，从事地气关系和全球变化的研究，是“八五”国家重大基础项目《我国未来 (20~50) 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发表有关论著和论文 70 余篇。198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Ye Fei

**叶飞** (1914~1999)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叶启亨。原籍福建南安。1914 年 5 月 7 日生于菲律宾。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厦门第十三中学支部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团省委书记，共青团福州市中心市委书记。1932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后，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1938 年后，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团长、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中三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第一师师长。1945 年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参加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 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福建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职。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 年 1 月，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 年 2 月，任海军第一政委、司令员。1983 年后，兼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 年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

席。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递补）、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99年4月18日逝世。著有《叶飞回忆录》。

Ye Jianying

**叶剑英**（1897~1986） 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原名宜伟，字沧白。广东梅县人。1897年4月28日生。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参加驱逐桂系军阀之役。后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同年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量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反“围剿”作战。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参谋长。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后任右路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到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参与指挥东征战役，后赴安塞、西安等地联络爱国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军事学院副院长。1945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次年2月返回延安，仍任中央军委副总参

长兼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兼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次年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6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7年后实际上被解除了领导工作。1971年林彪事件后，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任国防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积极支持和参与周恩来的纠“左”和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收入《叶剑英军事文选》和《叶剑英文集》出版。

#### 推荐书目

范朔等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5。

Ye Qun

**叶群**（1920~1971）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江青集团主要成员。原名叶宜静。原籍福建闽侯，1920年12月1日生于北京。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年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夏入天津师范学院继续高中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经南京、武汉到达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抗日战争后期与林彪结婚。1945年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作参谋、秘书、编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上海教育局副局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59年后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伙同林彪等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1967年8月任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9月与林彪合谋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9月13日与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身亡。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叶群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Ye Shengtao

**叶圣陶**（1894~1988）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1894年10月28日生。1911年中学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1921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年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长期从事编辑与文学工作，主编有《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等杂志和多种中小学教科书。积极参加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曾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1949年到北平，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毕生从事文学、语言文字教育和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和组织编写了几十种学生教科书，并发现和培养了大批优秀文学和编辑人才，在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和改革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代表作品有童话集《稻草人》、小说《倪焕之》等。部分著作收入《叶圣陶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Ye Xuanping

**叶选平**（1924~ ） 政协第七、

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广东梅县人。1924年11月生。1941年1月参加工作。同年进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机械专业学习。1944年后在延安军委工业局工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工作。1948~1949年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学习。1949~1960年任沈阳第一机床厂车间主任、副厂长,在此期间1952~1953年赴苏联机床厂实习。1960年后历任辽宁省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北京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常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三局局长,广东省副省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市长,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Ye Zhupei

**叶渚沛** (1902~1971) 冶金学家。福建厦门人。1902年10月6日生于菲律宾。192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任职于多家美国公司。1933年回国,历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冶金室主任、重庆炼铜厂厂长、电化冶炼厂总经理。1944年赴欧美考察后到联合国任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等职。资助过赴延安参加抗战的白求恩大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回国,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顾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学术秘书,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是中国化工冶金事业的创始人,对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基地的建设和综合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71年11月24日逝世。1978年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成果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 yida sanfan yundong

**“一打三反”运动** (“One Strike Three Antis” Campaign)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部署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先后发出三个文件,要求各地各单位开展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铺张

浪费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由此,“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持续达一年之久。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为推进“斗、批、改”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虽然惩治了某些经济犯罪分子,整顿了社会秩序,但由于指导思想贯彻的是“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存在严重偏差,打击了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还限制和打击了一些正当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 yi ge zhongxin liang ge jibendian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one key point and two basis points”)

即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 yiguo liangzhi

**一国两制**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与大陆分离问题,为恢复行使香港、澳门地区主权,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而确定的方针。全称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方针的提出** 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对香港、澳门这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留待时机成熟时和平解决。5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确定,对香港“暂不收回、为我所用”,今后收回也保持那里的制度不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1月5日,邓小平明确表示:台湾回归祖国后,社会制度可以不动。此后他多次阐述要用这一方针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具体方针,进一步明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际上就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2

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同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一国两制”的构想确定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点主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方针的实施**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取得了很大进展。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该文件确定,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后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过渡期内双方共同努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交接仪式,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1987年4月13日,中国和葡萄牙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为在收回澳门后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1998年5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1999年4月10日又在北京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为解决台湾问题,1993年8月3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对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作了具体阐述。1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江泽民提出的八点主张,积极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 yiyue duoquan

**“一月夺权”** (January Seizure of Power)

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策划的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的事件,因得到毛泽东肯定而迅速扩展为全国性的夺取各地党政领导权的运动。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动乱扩大到工矿企业,上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12月3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指示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1967年1月4日,《文汇报》的造反派组织夺了《文汇报》的权。1月5日由陈丕显签字批准,有十几个群众组织联署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发表,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1月5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1

月4日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到达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对稳定局势恢复生产的态度十分冷淡，1月6日却策划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等几百名领导干部。1月8日起又成立“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1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张春桥等得知毛泽东的态度后，连夜组织开会，宣读给中央贺电。王洪文更将此称为是中央对“工总司”的关怀。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肯定上海“一月夺权”，公布了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都被迫停止工作。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成立了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上海人民公社”。2月25日根据毛泽东指示改称革命委员会。

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幕后策划，夺权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召开“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红色造反派革命委员会”，接管全省一切大权。2月3日、2月14日、3月8日，山东、贵州，山西的造反派组织分别经过夺权，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中央报刊发表社论，对5个省市的夺权表示了公开支持。其他省、市、自治区也同样发生了夺权活动。从内地到边疆，各派群众组织强占报社、电台，绑架党政领导人，争夺机关印章，抢劫秘密档案，游行绝食示威，武斗流血事件屡有发生。有的省份一个月被夺权数次，甚至中央和国务院机关也发生了夺权斗争。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全部陷入瘫痪。

“一月夺权”运动是毛泽东根据权力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的错误判断，及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设想而号召发动的。实践证明，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继续采用这种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只能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动乱。“一月夺权”成为全国局势恶化，走向“全面内战”的开端。

Yili Tacheng shijian

### 伊犁塔城事件 (Ili and Qoqek Incident)

1962年3月至5月间苏联策划的中国新疆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为了逼迫中国屈服，在中国边境地区制造事端。从1962年初开始，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利用新疆北部粮食严重减产、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暂时困难，煽动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居民前去苏联。他们通过控制的“苏侨协会”向中国居民突击发放了大量的苏侨证，一大批苏联“克格勃”分子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境内，进行策反活动。最初只有少数居民前往，3月中旬至5月，塔城、裕民和霍城等边境县的6万多居民在“克格勃”分子的诱骗和裹胁下，带着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和大批财物，不顾中国边境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通过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等边防站，进入苏联。苏联方面为了接应中国公民外逃，特意把苏方沿边界线设置的铁丝网开了许多口子，并且在边境准备大量汽车迎接外逃的中国公民，把他们送到已准备好的安置地点。与此同时，5月下旬，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策动和组织下，数百人冲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冲进州政府抢劫档案和秘密文件。

中国政府就此事件向苏联提出抗议和外交交涉。要求苏联方面恢复边境正常状态，交回中方外逃人员。苏联方面不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且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称苏方接受中国居民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中国政府鉴于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次事件是苏联“侨民协会”和领事馆煽动的，采取了几项相应的措施：查封了苏联在中国新疆、黑龙江等地的“侨民协会”；关闭了苏联驻中国新疆、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总领事馆；中方和苏方经过协商，撤销了一些口岸的商务机构。

yiliao tizhi gaige

### 医疗体制改革 (reforms in the medical service)

从1997年夏季开始，中国国务院确定的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改革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对城镇职工实行以国家和企业出资将职工医疗费用全包下来为主要特征的福利性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些老国有企业，职工的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省市自90年代初以来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改革探索，积累了经验，也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措施 1997年夏季以来，国务院领导多次指示，要有关部门提出指导全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明确意见。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医疗体制改革列为新一届政府“五项改革”之一。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障制度领导小组提出的改革目标是：从1998年开始，用3至5年时间，在中国初步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主要政策是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医疗体制改革着力于机制转换。改革工作的重点是：①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②建立医疗费用支出的制约机制。③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管机制。在改革医疗体制的同时，对中国医疗机构也进行改革。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大病”进医院，“常见病”在社区，“小病”去药店。对医、药实行分业管理。医疗机构和医生主要通过医疗服务收入取得补偿，药房、药店则按商业原则经营管理。医院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业务上自主经营，彼此竞争。改革的具体步骤是：1999年全国20%的城市实行医疗体制改革；2000年达到50%；2001年达到80%；2003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实行新的医疗体制。

yiliao weisheng geming

### “医疗卫生革命” (“Revolution in Health and Medicine”)

“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中，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的一场“革命”。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改变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的医疗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组织过“保健站”，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人民公社时期，又有10多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办起了“合作医疗”或“集体保健站”。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卫生部根据这一指示，提出了培养“半农半医”人员的要求和具体培训内容，并在农村若干县开展试点工作。这些人员在公社医院或城镇医院接受6个月左右的教育培训之后，又回到原来的乡村去，和普通农民一样以工分计酬，既从事医疗工作又干农活，很受群众欢迎。农民称呼他们是“赤脚医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卫生部被指责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7年医疗卫生领域也被认定为“资产阶级黑线专了政”。从1968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开始，医疗卫生领域也进行了所谓“革命”。主要内容：①是推广“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是由集体和农民个人集资，分担农民部分医疗费用的办法。和“赤脚医生”一样，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出现。②是把农村的“赤脚医生”与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流换岗”，让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一举措当时被当作改变“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根本方法。③是全国的卫生保健体系由城市向农村扩展的步伐加快。城市医院和医学院校大多数在农村人民公社设立了医疗所和教学点，人民解放军则把更多的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去。

这一时期，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奋斗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改善了农村卫生事业面貌。但这场“医疗卫生领域革命”，片面强调改变医疗卫生制度，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把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把普及和提高医疗水平对立起来，并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则阻碍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提高和发展。

## yi yao shi ye

### 医药事业 (medical service)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药事业为人民的医疗保健提供医药物资保障，包括进行中药、西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制药机械、药用包装材料、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等的研制生产和供应。1949年以前的中国医药事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近50年的发展，已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医药行业体系。

**起步基础**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沿用中药治病保健。由于近代西方化学药品的传入和一些人对中医药的歧视，中药生产曾受到严重摧残，日益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独立的中成药厂寥寥无几，而且均为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当时的化学药品工业基础也十分薄弱，除了解放区因陋就简兴办的少量制药厂外，只

在沿海城市有一些私人开办的小型制药厂，设备简陋，产量有限，只能生产40多个品种的原料药，国内所用药品大多依靠进口。医疗器械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全国只有近70家小修造厂，资产微薄，从业人员不足1200人，仅生产一些简单的手术器械和仿制的辅助性医疗器具，国内所需医疗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发展历程** 近50年来，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①1949至1957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首先根据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地方病、疟疾、结核病的防治和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用药的需要，抓有关原料药的研究与试制。重点是抗生素、磺胺、解热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抗结核药的生产。其次，对分散经营的中药企业实行统一管理和统一经营。第三，加强了对医疗器械生产的统一管理，发展手术器械生产，试制电子器械新产品。第四，统一医药商品流通中的计划、制度和政策。第五，发展药学教育，加快人才的培养。第六，学习苏联经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造旧企业，建立新企业。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5年的医药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3倍。到1957年，全国有药厂181个，生产原料药194种，产量2196吨，总产值15.33亿元（1952年不变价），年均增长率为25%。进口药品逐年减少，1952年药品进口为销售总额的39.15%，1955年则降为17.8%，原来依赖进口的抗生素、磺胺、解热药、维生素、地方病用药、抗结核药六大类原料药，国内已基本都能生产。中药行业发生了显著变化，改变了分散经营局面。

医疗器械工业也迅速发展。1957年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20多倍，品种达500多种。除能生产一般医疗器械外，还能生产医用X线机、医用电冰箱、电催眠机、荧光屏、增感屏、不锈钢无缝针头、膀胱镜等医疗器械产品。

②1958至1978年。这20年间，经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医药事业虽然受到冲击和破坏，但仍然获得发展。

1958年出现了乱办药厂、滥制药品的混乱局面。1960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扭转了局面。1958~1965年，国家在改造老企业的同时，新建了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厂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1960~1967年，又先后在内地建立了20多个技术比较先进的化学制药厂，初步改变了药品生产不

合理的布局。1966年，原料药的品种增加到375个，产量突破万吨，1970年达到2.1万吨，从此改变了原料药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1978年，化学药品工业总产值达47.4亿元，主要原料药产量增至4.06万吨。与此同时，中药业快速发展，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中成药和饮片生产从手工作坊开始走上工业化生产的道路。到1978年，已能生产中成药30多种剂型3000多个品种，产值8.29亿元。医疗器械工业也调整了地区布局，基础较好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逐步向专业化生产发展。1973~1978年，全国医疗器材新产品达400余项，其中有应用电子、激光、超声、核子、同位素、深低温和光导纤维等新门类的现代技术产品。这一时期医药科研有所进步，1958~1965年建立了上海医药研究院、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等一批科研单位。药学教育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③1979至199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家加强了对中西药品、医疗器材生产的统一管理，提出了抢救民族医药遗产、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和实现医药事业现代化的目标。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医药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95年，医药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65亿元；固定资产原值突破500亿元（包括评估升值），是1990年的3.3倍；医药工业实现利税110亿元，是1990年的2倍。

**体制沿革** 在所有制方面，从50年代到70年代，医药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医药企业逐步由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并基本上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

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的制药工业、医疗器械工业、医药商业，曾先后由中央军委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1952年起，按生产、经营区分，分别由卫生部和化工、商业等部门管理。以后管理体制经过多次变化，领导关系仍然多头、杂乱。直到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建立医药管理机构，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管理体制形成。1982年5月，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改为国家医药局，同年9月又改为国家医药管理局。1988年5月，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中药管理职能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划出。1998年3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销国家医药管理局，将国家医

药管理局的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职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药监督管理职能、卫生部的药政管理部分统一起来,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而将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管理职能移归国家经贸委,中药行业管理职能仍归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建设成就** 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医药大国。医药行业已形成一个工商结合,设计、生产、科研、教育配套的完整体系。医药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企业规模**。1952 年,全国医药工业企业只有 538 家,到 1996 年增至 3528 家,增长了 6.6 倍。根据 1994 年的统计,国家特大型企业有 4 家(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公司、山东新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和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型企业有 177 家,中型企业有 548 家。有 8 家医药企业进入全国 500 强工业企业行列,14 家医药“三资”企业进入全国 500 家外商投资最大工业企业行列。国有(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实现的产值分别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60% 和 71%。

②**工业产值**。化学药品工业产值,1952 年只有 2.78 亿元,而 1997 年发展为 972 亿元,增长了 349.64 倍。医疗器械工业产值,1949 年只有 192 万元,而 1997 年达 99.9 亿元,增长了 5203.13 倍。整个医药工业产值到 1998 年达 163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24.7 倍。

③**药品产量**。化学原料药的产量在 50 年代初期只有 8 吨,而 1995 年达 432 241 吨,增长了 5400 多倍。80 年代末,化学原料药的产量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 1 位,而其中抗生素和磺胺药产量早在 70 年代已居世界首位。1995 年,青霉素产量超过 900 吨,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维生素 C 产量突破 2 万吨,为世界第二大生产国。

④**生产品种**。化学药品工业已能生产 24 大类 1300 多种原料药、3000 多种制剂产品。中药剂型由过去以生产丸、散、膏、丹为主,发展为以颗粒、片剂、胶囊剂、口服液为主,而且还有粉针、输液用药、水针、气雾剂、滴丸等现代剂型,品种达 5000 种。医疗器械已能生产 3000 多个品种、11 000 多种规格的产品。“八五”期间,一大批生物技术药物,如促红细胞生长素、集落细胞刺激因子、白细胞介素 2、 $\gamma$ -干扰素、乙肝疫苗、胰岛素等开发成功,并开始投产。药物制剂向新剂型、复方剂型、新辅料、新品种等方向发展。

医疗器械有 600 多种(2000 多个规格)新产品投入使用。医疗器械工业中机电一体化中高档产品、一次性用品发展加快,如 X 线断层扫描装置、磁共振扫描装置、直线加速器、大型 X 线机组等。

⑤**经销状况**。医药商品销售额 1998 年达到 1080 亿元,与 1953 年相比,增长了 244.9 倍。医药商业有批发企业 14 907 家、零售网点 53 862 个。全国医药商业固定资产达 124 亿元,经营 6 大类医药商品、2 万多个规格品种。

⑥**对外贸易与合作**。改革开放后,医药出口逐年增长。1978~1988 年的 10 年间,共出口创汇 66 亿美元。“八五”期间,医药商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1995 年出口达 30 亿美元。1994 年 310 个品种的原料药出口量第一次超过国内耗用量,药品制剂出口达 1 亿美元,医疗器械出口额首次大于进口额,从而初步实现了向外向型医药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医药产品进口关税进一步降低,非关税措施减少,对 20 个国外专利药品实施了药品行政保护,国内市场也进一步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到 1995 年已有 1500 家(1990 年为 50 家)。世界销售额排名前 20 位的国外著名制药公司中已有 15 家来华投资。医疗器械领域中,美国的 GE、惠普和德国的西门子等国外大型公司已来华合资建厂。医药“三资”企业产品的销售额已占全行业的 13% 以上,成为医药经济中最快的增长点。

⑦**科研教育**。已拥有科研院所 130 多个、科技开发人员 16 万多人。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系)56 个,中等医药、卫生学校 130 多所,医药职工学校(或办学点)300 多个。全行业有国家级和局级药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25 个,省级检测站 37 个;还拥有医药设计院(所)42 个,其中甲级设计院 5 个。

#### 推荐书目

齐谋甲主编:《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 yi fa zhi guo

**依法治国** (government by law) 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时期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遵守和实施法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涵义 ①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有超于法律之上的

特权,维护统一的法制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准则。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前提下,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军事组织和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在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责、在行使公共权力的一切活动中,必须严格“依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于造成一种普遍服从法律、忠于法律,自觉运用法律正当行使权力,克尽职守的法治秩序之中。②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普遍养成,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③执政党领导方式的转变,即由过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的转变,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形成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法制曾经一度滞后,给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混乱,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状态转向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加大了对法律和法治的需求,推动国家从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转向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法治体制。198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实施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第一次出现“依法治国”的提法,要求做好这项工作,“创造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气氛”。1996 年 2 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把“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结成一体,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1999 年 3 月 9 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优点和特点 依法治国是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上,以强化国家权力为中心,找到了适应于变动着的商品社会中能够凝聚人民统一意志,维护社会稳定,并足以调节和化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法治途径,尤其是能够合理地规范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控制公共权力,扼制权力运行中的一切消极因素,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期保证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

坚持依法治国的过程，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孕育生长的过程，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过程。

### Yizheng Huaxian Lianhe Gongsi 仪征化纤联合公司 (Yizheng Chemical Fibre Joint Corporation)

中国最大的涤纶短纤维生产企业。位于江苏仪征市。1978年由纺织工业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利用外资筹建。1982年1月正式动工，1984年12月第一期工程的涤纶一厂及配套工程建成投产，设计年产涤纶短纤维12万吨，聚脂切片6.3万吨。二期工程1985年开始分阶段建设，1987年涤纶二厂投料试产，可年产聚脂切片和涤纶短纤维50万吨，相当于66.67万公顷高产棉田产量的总和。

### yi jingji jianshe wei zhongxin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hav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on the central task)

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要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据是：第一，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处于社会主义尚不发达的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第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决定了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这个阶段。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至“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由此概括和发展为所谓“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灾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将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纳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内容。中共十三大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共十四大重申了这条基本路线，并将它正式载入党章。中共十五大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本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

### yi nongye wei jichu yi gongye wei zhudao

###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basis and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force)

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这一方针，反映了农业和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两大经济部门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客观经济规律。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农业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独立化的基础，农业发展使一部分劳动者脱离农业劳动从事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从而使社会分工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才得以从农业中逐步独立化出来；农业为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等基本生产资料，成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能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工业品提供市场；能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能为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不断输送劳动力，促进他们的发展。以工业为主导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工业能为农业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经济提

供物质条件；能生产装备轻工业的成套机器并提供原料，促进轻工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为运输业、通讯传播事业、建筑业等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能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部门提供科学实验的先进仪器设备和各种实验手段；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

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大国，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是发展其他事业的前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更有特殊意义。

### yishi xingtai lingyu de zhengzhi pipan 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political criticism in the realm of ideology)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1965年间，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的一系列过火的、错误的政治批判。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的反动小说，并借此把一些人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宣布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从此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了一系列的批判。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批评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有严重问题。1963年4月，全国文联召开第五届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要求加强文艺的战斗性，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文艺界领导人在会上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动员文艺界开展政治批判运动。5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1963年夏季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各大报刊先后受到批判的作品主要有：昆剧《李慧娘》、京剧《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许多作者和有关人员同时受到批判。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如：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等。以后，这种批判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所谓文艺“黑八论”的批判。

1963年9月至12月，毛泽东对文化部和文艺领域连续提出严厉批评。9月，他批评戏曲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11月，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写下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他又在中宣部1964年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写下批语：“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批示下达后，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对文化部五位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剧协主席以及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1964年夏季，批判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在报刊上和有关文化团体、学校、机关内广泛进行。哲学界主要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主要批判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主要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并以学术观点定罪，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康生、江青等人在这次大批判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Yinhe juxing jisuanji

**“银河”巨型计算机**（“Milky Way” super computer）中国自行设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到1985年“我国超高速巨

型计算机将投入使用”的目标。随后国防科技大学在全国20多个科研、生产、使用单位大力协作和支持下开始了这一项目的研制。1983年12月，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通过了国务院电子计算机与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组织的“银河计算机国家技术鉴定组”的严格鉴定。这是中国当时运算速度最快、存贮容量最大、功能最强的电子计算机，是石油、地质勘探、中长期天气数值预报、卫星图像处理、计算大型科研题目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手段。“银河”机的研制成功，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的目标，标志着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跨进了世界研制巨型机的行列。1986年2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3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建议研制“银河—II”巨型计算机，立即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工委的大力支持。1992年11月19日，“银河—10 II”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并顺利通过国家鉴定。“银河—II”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通用10亿次并行巨型机，综合处理能力10倍于“银河—I”，填补了中国通用并行巨型机空白。1997年6月19日，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III”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又在北京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银河—III”巨型机采用了当时国际最新的可扩展多处理机并行体系结构，成功设计了由硬件支持的全系统共享访存机制，是“银河”系列第一台实现全局共享分布存贮结构的巨型计算机。它的运算速度为每秒130亿次，综合处理能力是“银河—II”巨型机的10倍以上，而体积仅为“银河—II”巨型机的1/6。它还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可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小可组装成数亿次级的计算机系统，大可组装成比实际运算能力更强的超高性能巨型机系统，而且无论大小系统，都十分高效实用。“银河—III”巨型机系统综合技术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和掌握了更高量级计算机的关键技术，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高性能巨型机研制技术取得新突破，使中国在这个领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yinyuan zhi zhan

**“银元之战”**（“silver dollar war”）

1949年夏季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物价所采取的统一行动。

1948年12月，解放区开始发行人民币。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造成的人们不信任纸币的心理原因，在一个时期内，银元仍是市场上计价

流通的主要货币。社会上形成了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在这股势力的活动下，银元充斥流通领域，人民币一度很难占领市场。

从1949年6月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举办折实存款，挂牌收兑金、银、外币。然而，金融投机分子置若罔闻，并再次掀起银元涨价风，江苏、浙江一带以上海为中心，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指挥全市各个据点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根据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的建议，上海市军管会经过周密策划，于6月10日上午，突然查封证券大楼，扣押不法商人数百名。第二天，银元价格大幅度下降。随后，上海市展开拒用银元运动，各地纷纷效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币已基本占领了所有的城乡市场。

Ying-Xia Tielu

**鹰厦铁路**（Yingtian-Xiamen Railway）

华东地区出海的铁路干线之一。北起浙赣铁路的鹰潭站，南越杏林海湾和集美—高崎海峡达厦门站，单线，全长694千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打开皖、赣等东南各省与福建沿海的通道，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海防，给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创造条件决定修筑鹰厦铁路。1953年1月开始勘测设计，1955年初动工，1956年12月9日全线铺通，1958年元旦交付运营。线路采用II级铁路标准。主要工程量有：土石方5650万立方米；隧道47座，总延长约12.7千米；桥梁159座，总延长9.2千米。为了缩短线路长度，用150多万立方米的石料，修建了杏林到集美，以及集美到高崎两座共长5千米、宽19米的海堤，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上修堤筑路。1986年5月26日电气化工程动工，1993年12月28日全线建成通车，为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youdian shiye

**邮电事业**（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以国家经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公用邮电通信事业，是国民经济中信息产业的基础和骨干。

**起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电事业是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创建的邮政和电信通信为基础，接管改造国民党政府的邮政、电信企业而组成。1949年中国近四

分之一的县没有邮政局,大部分县没有电信局,电信网路支离破碎,全国仅有31万门市内电话,2000多路长途电路,400多辆邮运汽车,通信设备十分落后。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邮电部,主管全国的邮政和通信事业。从1949到1957年,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首先改造原有邮电企业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邮电合一”和集中领导的管理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始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邮电干线通信网。从北京到各大行政区中心和各省中心建立了直达明线载波电路,各省省会到专区、专区到县实现了有线通信;建成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两条国际长途电信线路。新建了国际电台和25个主要城市的自动电话,2000多个县城有了人工电话,每个市县都设立了邮电局。全国邮路和农村投递线路增长了2.15倍,先后开辟了经昌都和西宁到拉萨的两条各1000多千米的长途自办汽车邮路。通信网路的恢复建设,保证了各级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通信需要。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邮电部门开始自力更生建立邮电科研机构、邮电工厂、邮电院校、邮电器材供应、邮电设计施工等系统,研制生产了一批急需的通信设备器材和维修零配件,既保证了通信建设的需要,又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人才技术基础。

1958到1976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邮电事业受到干扰,在曲折中有所前进。邮电管理体制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变动。1958年“大跃进”时曾将邮电企业层层下放到地方管理,冲击了正常的通信秩序。1961年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了以邮电系统为主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撤销了邮电部和部直属科研、院校、设计、施工等单位,自上而下实行邮电分开,分别设立各级邮政局和电信局,电信归各级军事部门管理,邮政划归交通部邮政总局和各省革委会管理。1973年6月又恢复了邮电部和各级邮电局。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化大革命”前研制生产的60路和600路载波、微波通信系统的基础上,研制生产了960路微波和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通信系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联通23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通信网和京沪杭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干线,并建成北京、上海的卫星通信地球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

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邮政事业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邮电工作的重点转向以通信建设为中心,决定实施通信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调整了全国邮电管理体制,实行以邮电系统为主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单靠国家投资进行通信建设的状况,广开集资渠道,积极采用世界先进的光缆、数字微波、卫星通信等技术装备建设现代化通信网,充分运用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收取市话初装费和业务附加费等特殊政策,大大加快了邮电通信的发展。从1984年开始,邮电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92年以后,是邮电事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40%以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和其管理下的国家邮政局。到同年底,已实行政企分开、邮政电信分营的重要改革,以有利于按照两个专业自身规律加强科学管理和专业运营。

**主要成就** 中国邮电事业经过近50年的发展建设,已形成以邮政电信通信为中心,包括邮电科研、教育、工业、物资、设计、施工等部门紧密结合的邮电产业系统,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邮电部和各地方政府领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地、州、市、县、旗都设立了邮电机构,全国邮电局所已达7.2万多处,为社会提供广泛的邮电通信服务。邮电科研系统建立了部直属的3个邮电科学研究所和下属的13个专业研究所,研究开发现代通信技术,为邮电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邮电教育系统组建了7所邮电高等院校,32所邮电中专,55所技工学校,以及5所职工大学和12所职工中专,为邮电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现中国各级邮电领导干部大都是邮电院校培养的。邮电工业系统有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及其下属的16个工厂和27个合资企业,以及各省邮电管理局的邮电工厂,为通信产品生产、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有部分产品销往国外。邮电物资供应系统有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及其所属的16个分公司和各省邮电管理局的器材公司,多层次、多渠道地保证邮电生产建设的器材供应。邮电设计、施工系统有邮电部直属的2个邮电设计院和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及其所属的6个工程局,省邮电管理部门也设立了相应的勘察设计院和工程公司,对全国邮电通信的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邮电通信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完整、统一、先进的国家公用通信网已逐步形成。

**综合通信能力** 已建成覆盖全国以光缆为主、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集数字传输、程控交换为一体的现代化通信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敷设的城乡光缆总长度达100万千米,其中干线光缆20万千米。长途业务电路达到153万路。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1.3亿门,网络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全国城乡电话用户总数1.15亿户,其中移动电话2498万户,居世界第三位。邮政通信网已覆盖广大城乡,形成了铁路、航路、汽车等多种运输手段综合利用的邮运网络,干线邮路总长度达70万千米。

**技术装备水平** 全国公用电信网完成了由人工网向自动网、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局用电话程控化的比重达到99.7%,长途通信传输数字化的比重达到98.9%。一批世界先进的通信技术在中国电信网上普遍应用。在长途干线网上,大容量、高速率的2.5Gb/sSDH光纤传输系统已广泛采用;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ATM宽带交换系统等高新技术也在网上铺开。邮政通信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省会城市和部分城市实现了信函分拣自动化,大部分支局建成了电子化支局。

**通信服务** 不断拓宽新的技术业务,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邮电服务。公用数字数据网和分组交换网已覆盖到县以上城市和部分发达的乡镇;初步建成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和公用多媒体网;因特网用户已达150万户,网上的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等业务正迅速发展。此外,电话信息服务业务,200号、800号业务,会议电视、图文电视等业务,以及商业信函、特快专递等邮政业务都不断扩大。

邮电通信业经过近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从制约国民经济的“瓶颈”一跃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

#### 推荐书目

杨泰芳主编:《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

吴基传主编:《中国通信发展之路》,新华出版社,北京,1997。

youse jinshu gongye

**有色金属工业**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有色金属工业以矿山采掘业为基础,通过冶炼生产有色金属产品的

工业部门,是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重要原材料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

**起步基础** 中国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钨、锑和稀土等矿的储藏量居世界第1位。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和使用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有色金属冶炼业不仅技术先进,产量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起步较晚,并受战乱等影响,基础十分薄弱。至1949年,全国仅有几十家企业,产品不到10个品种,而且多以矿砂原料等初级产品形式供应欧美、日本。1949年,全国有色金属产量仅1.33万吨。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色金属工业首先从恢复工作开始。先后恢复了乌拉嘎金矿、陀螺子金矿、漠河金矿、夹皮沟金矿、石嘴子铜矿、华铜铜矿、青城子铅锌矿、天宝山铅锌矿、杨家杖子钼矿、铜官山铜矿,江西、广东、湖南各钨矿,沈阳冶炼厂、葫芦岛锌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选矿药剂厂、上海冶炼厂、水口山矿务局、锡矿山矿务局、平桂矿务局等厂矿的生产。到1952年,10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7.4万吨,是1949年的5.5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始于“一五”计划时期,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属于有色金属工业的有抚顺铝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吉林碳素厂、洛阳铜加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大青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岢美山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共13个。同时,还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东川、易门、铜陵、寿王坟、中条山等铜矿。到“一五”末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已初具规模,产量于1957年上升到21.45万吨,并逐步建设起地质勘探队伍、勘察设计队伍、建设施工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还形成了有色金属工业中等、高等正规化教育和多层次、多渠道职工培训的教育体系。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受到严重破坏,产量起伏不定。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在1959年达到40.05万吨,1961年降为21.5万吨,1965年增至46.2万吨,1968年又降为34万吨。直到1978年,产量仅为99.6万吨,难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认真贯彻执行了“优先发展铝,积极发展铅锌,创造条件发展铜,有选择地发展其他金属的方针”。10种有色金属

产量,1988年为204.5万吨,1992年为299.2万吨,1994年达到394.5万吨,1995年增至496.6万吨,产量每增加百万吨分别仅用了10年、4年、2年和1年时间。1997年,10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581万吨,跃居世界第2位。有色金属产量的快速增长,改变了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除铜受资源限制仍需进口铜精矿外,铝、铜供需基本平衡,铅、锌、镁、锑、钨、钼、锡等在国内已供大于求,大量出口。

**体制沿革** 解放战争时期,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机构首先在东北建立。最早的管理机构是在黑龙江解放区恢复乌拉嘎等三个金矿时,分别设立的金矿局。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成立了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统一组织管理东北全境有色金属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重工业部,在部内设立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以后又成立了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和西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加快了有色金属工业恢复和发展的步伐。

“一五”期间,为了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部门,把干部中的技术骨干充实到中央各工业部门,加强了重工业部,在重工业部内设立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4个工业管理局。1956年6月,重工业部改组为冶金工业部,负责管理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1958年1月,冶金部将部内的有色金属管理局改为有色金属司。

1981年5月,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成立,由冶金部代管。1983年4月,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由国家机关改组为产、供、销、人、财、物六统一的经济实体——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并在有色金属集中产区,设立了12个地区公司,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

1998年4月,国务院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负责管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领导。

**建设成就** 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

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和生产基地,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主要有:①江西铜业公司。经过德兴铜矿、永平铜矿、武山铜矿和贵溪冶炼厂的建设,已形成年产铜15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其中德兴铜矿日采选规模达9万吨,成为有色金属工

业第一个3000万吨级的矿山。②贵州铝厂。已建成年产电解铝23万吨、氧化铝40万吨生产规模。③山西铝厂。已建成年产氧化铝120万吨生产能力,为亚洲第一大氧化铝厂。④青海铝厂。具有年产20万吨电解铝生产规模。⑤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已建成年产4万吨镍、2万吨铜的综合生产能力。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已形成年产18万吨铅锌、5万吨铜、5万吨铝、40万吨硫酸、5万吨加工材生产能力的大型综合生产基地。⑦广西平果铝业公司。一期工程规模为年产氧化铝30万吨、电解铝10万吨,已于1995年全面投产。⑧西南铝加工厂。已建成铝加工材生产能力21.3万吨,是中国最大的铝加工厂。

技术装备提高到新水平。在矿山采掘业中,已建成了3000万吨级的德兴铜矿特大型露天矿山,又拥有安庆铜矿、凡口铅锌矿、大厂铜铅锌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龙首矿、中条山铜矿峪铜矿等100万吨至400万吨级的坑内无轨或采用先进采矿方法的地下矿山。在冶炼技术方面,已有贵州铝厂、青海铝厂、平果铝业公司引进或翻版的16万安培大型预焙阳极电解铝技术,江西铜业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闪速炼铜、炼镍技术,又有在引进基础上研制成功的18万和28万安培电解铝技术。在加工业中,既对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老厂普遍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技术改造,又集中力量改造和建设了拥有世界一流技术装备水平的西南铝加工厂和洛阳铜加工厂。

依靠科学进步,增加了品种,提高了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有色金属工业科技工作贯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组织了以金川资源综合利用为代表的科技攻关和技术开发活动,取得大批科技成果。12英寸直拉硅单晶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德国、日本、美国之后,第四个拥有大直径硅单晶研制技术的国家。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后,产品种类迅速增多,尤其是许多深加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如30万千瓦发电机组需要的长冷凝管,汽车行业需要的超薄水箱带,食品行业需要的饮料罐板,印刷行业需要的PS板,电子工业需要的电子铜带等。

科研、教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到1998年,全国已有独立为有色金属工业服务的科研院所21个,拥有科技人员7867人,其中科学院院士1人,工程院院士6人。有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9个,国家级分析测试中心1个,国家质检中心4个和国家商检认可实

验室5个,国家级工业试验基地2个。设立了12个部门重点实验室。有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有色金属工业科研院所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专业已经涵盖了地采、选冶、加工、新材料及分析检测、信息等专业领域,11个学科,71个专业,形成了支撑有色金属工业的专业体系。到1998年,全国有色金属高等专科学校并有12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中南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以有色金属专业为主专业的院校,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75个,并有科学院院士1名,工程院院士6人。这些院校培养了大批科研、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

#### 推荐书目

刘学新主编:《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

马福康主编:《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三届学术会议论文集》(战略研究综述部分),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长沙,1997。

#### Yu Guangyuan

**于光远** (1915~ ) 经济学家,哲学家。原名郁钟正。上海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在上海与艾思奇等一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1941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研究,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到北平,从事《解放》刊物的编辑工作。《解放》被迫停刊后,在下花园、延庆等地做地下工作,后又回延安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学习》杂志创刊时任总编辑。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1987年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哲学等学科研究。对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经济建设目标、经济计划问题、国民经济经营与管理、经济效益及实际经济政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先后提出建立生产力经济学、经济效果学、国土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科的建议,还致力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的问题。主要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二、三、四)、《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论社会科学研究》、《论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学》、《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等。

#### Yu Qiuli

**余秋里** (1914~1999) 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江西吉安人。1914年11月15日生。1929年10月参加农民暴动和赤卫大队,任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1935年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在长征中率部担任红二军团前卫,负重伤仍坚持北上,中途截去左臂。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一二〇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和旅政治部主任。率部在冀中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参与创建晋绥军区第六分区抗日根据地,总结和推广“官兵互教互学”的部队练兵方法。1946年后参加了保卫延安、进军西北等重要战役。历任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委员、常委,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年2月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开发大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油田的工作,为中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协助周恩来为维持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69年4月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参加制订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工作。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77年和1982年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后领导了引进宝山钢铁厂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工作。1980年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1982年任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87年

10月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年2月3日逝世。著有《余秋里回忆录》。

#### Yumen Youtian

#### 玉门油田 (Yumen Oil Field)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重点恢复并大规模扩建的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位于甘肃省酒泉西部的酒西盆地。始建于1939年的老君庙油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玉门油田被定为恢复和发展的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被列为156项工程之一。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援、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玉门油田开展了大规模的油区勘察和建设,陆续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等油田,生产中率先采用一系列新技术,形成了一支由4万多人组成的工种齐备、专业配套、政治技术素质良好的职工队伍。1957年产量达75.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87.8%,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它不但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建设,而且为以后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和经验。

#### Yuanmou Ren

#### 元谋人 (Yuanmou Neanderthal)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也称“元谋猿人”、“元谋直立人”。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又称大那乌村)的下更新统上部的地层中发现。据考证,元谋人的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是在中国发现的较早的直立人化石。化石包括上下内门齿两枚,属于同一成年男性个体。其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的门齿相近,但具有一些近似猿类和南方古猿的原始特征。在元谋人化石产地还发现少量石器和可能是用火的遗迹,表明元谋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器,可能已会用火。元谋人化石及其遗物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说明中国西南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 推荐书目

周国兴等:《元谋人》,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84。

#### Yuan Longping

**袁隆平** (1930~ ) 水稻专家。祖籍江西德安。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后任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教员。1971年后任湖南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湖南农学院、西南农学院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届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长期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杂交水稻之父”的盛誉。先后研究培育出南优2号等水稻品种和制种技术，比常规良种增产20%左右，在中国和国外推广后，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中国转让美国的第一项农业技术专利。主持“863”计划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推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1981年荣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5年被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金质奖章。198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1996年获日本日经亚洲技术开发奖。1997年获国际杂交先驱科学家奖。被授予功勋科学家称号。著作有《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简明教程》等。

Yuan Weimin

**袁伟民** (1939~ ) 排球教练员。江苏省苏州市人。1939年7月8日生。1958年高中毕业后，入选江苏省男子排球队，1962年入选国家排球集训队。任主力二传，组织战术灵活多变，防守顽强，拼劲足，球场作风大胆泼辣。他参加的中国男排获1966年第6届世界男排锦标赛第9名（他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和同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男排比赛冠军，1974年第7届亚洲运动会男排比赛第3名。1976年任中国女排教练，1981年11月带领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届世界杯排球赛，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他获“最佳教练奖”。1982年9月率中国女排参加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并获冠军。1984年7月率中国女排参加第23届奥运会，战胜美国女排，获得冠军，成为中国排球史上第一个荣获“三连冠”的主教练。他执教期间，在继承中国传统快攻打法和国际排坛上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出了“全攻全守”技战术发展道路，为推动中国及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排球技战术指导思想、训练方针、思想工作、队伍管理及科学地解决新老交替队伍更新问题及临场指导的经验成为中国排球运动发展的宝贵财富，并对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评为高级教练员。1984年10月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是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席和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多次获国家体育

运动荣誉奖章，198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教练员称号。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Yuan Xuefen

**袁雪芬** (1922~ ) 越剧演员。女。浙江嵊县人。1922年3月26日生。11岁入四季春科班学正旦，14岁开始在杭州演出，后到上海。受话剧影响，倡导越剧改革，逐步建立正规的排演制度，使越剧较早地形成编、导、演、音、美相配合的综合艺术。其他剧团纷纷仿效，经过改革后的新越剧得到迅速发展。袁雪芬在表演、唱腔上善于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与琴师合作创造的“尺调”唱腔，促进了越剧音乐的丰富和发展。她的唱腔旋律淳朴，节奏多变，委婉缠绵，声情并茂。表演真实、细腻。曾整理、编演了许多表现爱国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传统和现代剧目。1946年，演出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影响很大。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1953年演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越剧《祥林嫂》摄制成彩色影片。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上海越剧院院长、名誉院长。

yuanzidan baozha chengong

**原子弹爆炸成功** (successful explosion of an atomic bomb)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成功。这颗原子弹装置从正式开始研制到爆炸成功，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的核工业战略决策，研制原子弹是其最主要的项目。根据1957年中苏两国签定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苏方一直拖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资料。7月，中共中央作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定。第二机械工业部据此提出了在5年之

内制成原子弹，并拟订爆炸试验的计划。在全国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科学家为骨干，加速铀235生产建设和原子弹研制攻关。到1962年，铀235生产和原子弹的理论、结构、工艺设计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完成了一种理论设计和爆炸物理、飞行弹道和自动控制台架三大关键试验。二机部提出了在1965年以前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中央予以批准，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从1963年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动工兴建，同时成功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1964年8月，原子弹试验装置加工、装配、验收完毕，运往基地。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按预定时间爆炸成功。这颗装置以高浓缩铀为装料，采用“内爆法”和塔爆方式。试验结果证明，在理论、结构设计，各种零部件、组件和引爆控制的设计和制造，以及测试方法和设备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和1966年10月27日，中国又分别成功地进行了核航弹空投和核导弹试验，掌握了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弹。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进入了国防现代化的新阶段，为保卫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yuan Yue kang Fa

**援越抗法** (assistance to Vietnam against France) 1950~1954年，中国援助越南进行的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斗争。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946年12月，法国军队大举进攻越南。越南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法斗争。1950年1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请求，中国政府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

1950年7月，中国政府派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赴越协助指挥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扫除了中越边境一带的法军据点。从此，越南部队不断来华休整，中国也不断地向越南人民军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汽车、医药等物资。1953年10月，中国政府任命罗贯波为援越政治总顾问，负责帮助越南党政建设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任命韦国清为援越军事总顾问，负责帮助越南人民军对法作战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在中国等国的援助



下,越南人民军越战越强,取得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战役的胜利。1954年3月中旬,越南人民军发动了对西北重镇奠边府的进攻。中国为这个战役提供了大量物资。战役中,韦国清等亲临前线,协助指挥。5月7日,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法军精锐部队16000余人,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被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处在有利的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1954年7月,越南抗法战争结束。

Yuan Yue kang Mei

**援越抗美** (assistance to Vietna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援助越南进行的抗击美国侵略军的斗争。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协议》,逐步取代法国渗入越南南方,阻挠南北统一。从1961年5月起,美国出钱、出武器,并派遣军事顾问训练南越军队,发动了对付越南人民游击战的所谓“特种战争”。1964年8月又借口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派出大批飞机轰炸越南北方,进而于1965年3月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直接参战,将“特种战争”升级为以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局部战争。

面对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对越南人民予以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并不惜为此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庄严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的声援迫使美国对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有所顾虑。同时,在物质、人力方面对越南给予了巨大的支持。1965年春,越南领导人黎笋、武元甲访华,受越共主席胡志明委托向中国要求扩大援助并派出支援部队。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根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多次协议,到1978年止,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并派出大批人员到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海上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对于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胡志明主席称之“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曾多次表示:“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

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Yuanwang hao yuanyang celiangchuan  
**“远望”号远洋测量船** (ocean-going surveying ship “Yuanwang”)

由中国船舶总公司七院七零八所主持设计,江南造船厂建造总装。1976年9月开工建设,1979年12月建成。研制中采用很多新技术,船上分为船舶动力、导航定位、通信、测控、气象和打捞六大设备系统,共有各类设备2000多台(套),其中电子设备1000多台(套)。装备了精良的导航定位系统,具有远距离全天候通信和数据传输能力,并能在10~12米/秒海况下,在规定时间内打捞回收数据舱和弹头残骸。代表了中国船舶工业和电子工业70年代的先进水平。能航行于除南北极区外的世界三大洋。80年代初,参加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航行9000多海里,在南太平洋赤道附近高温、高湿、盐雾大的条件下,胜利完成洲际导弹再入段的海上跟踪、测量和打捞数据舱的任务,准确预报了弹头落点位置和落水时刻,并仅用30分钟打捞回收了数据舱,取得了主要技术数据。1987年,该船完成更新改装,技术性能和测控距离明显提高,达到国际上80年代中期水平,能适应发射多种通信卫星和满足发射国际商用卫星远洋测控要求。1988年,中国先后发射“东方红2”号实用通信卫星和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遥测弹,该船又顺利执行了海上测控任务。

Yue Meizhong

**岳美中** (1900~1982) 中医学家。原名钟秀,号勉云。1900年4月7日生于河北滦南。17岁任小学教员,25岁因患肺病,自学中医服药痊愈。由此开始钻研中医,为乡里治病,并开设药铺。1935年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后到唐山行医,获中医师文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唐山中医公会主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医务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门诊部副主任、西苑医院内科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从事中医工作近60年,倡议开设了中医研究生班。学术观点推崇古代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三家的中医著作,为中国经方派中医代表。主要成就有:从内科角度对泌尿结石总结了一整套经验;长于治疗肾炎;

对肝病、脾胃病、热性病、老年病也有独特的治疗经验。曾多次出国访问治疗,参加为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崔庸健等外国领导人的治疗,获得好评。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先后获得全国和卫生部奖。1982年5月12日逝世。

Yuejin hao wandun yuanyang lunchuan

**“跃进”号万吨远洋轮船**

(10 000-ton ocean-going freighter “Yueji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引进苏联技术和成套设备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57年8月,中苏第六届技术合作会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正在试造的567型万吨级船的技术资料,并供应成套设备协助中国建造。1958年7月,大连造船厂开工建设,1961年5月进行航海实验,1962年11月通过国家鉴定,同年12月交船。船体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材,航速18节,续航力1.2万海里,载重量1.34万吨,可航行于世界任何航区,为当时国际上同类船舶中的先进产品。跃进号船的建造成功,为中国建造万吨级以上远洋船舶积累了经验。1963年5月1日,在开辟中日海上航线首航日本途中,不幸触礁沉没。此后,又按同样方式,建造了同型远洋轮船“红旗”号。

Yunnan xinan dizhen

**云南西南地震** (Southwest Yunnan earthquake)

1988年11月6日晚9时零3分和9时16分,云南省西南边界澜沧、耿马地区发生里氏7.6级和7.2级两次强地震。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和西双版纳5个地区(州)的19个县受灾,受灾总人口516.83万余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85.28万余人,占35.9%。死亡722人,伤3364人。震中地区城乡通信、供电和交通一度全部中断,村寨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地震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连夜制定出抗震救灾方案。国务院总理李鹏于7日主持国务院办公厅会议,听取关于地震情况的汇报,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慰问团,前往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还委派地震专家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并安

排专人组织后方支援，解决救灾物资供应等问题。到 12 日，死难者的遗体全部处理完毕，绝大多数重伤员得到治疗，火灾

被扑灭，交通和通信全部恢复，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救灾物资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调运及时，灾区群众生活初步得到

安排。此后，在国家支援和地方政府组织下，受灾地区重建了家园。

# Z

zaijiuye gongcheng

**再就业工程** (reemployment projects)

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再就业问题而创办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是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依靠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的共同努力,帮助企业妥善安置和分流富余职工,促进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尽可能实现再就业。

再就业工程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隐性失业逐步公开化、失业下岗职工迅速增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为促进以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为主的劳动力的再就业,国务院劳动部门在1993年提出“再就业工程”试行办法。主要扶持政策包括:①鼓励、扶持企业和社会对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进行开发性安置。②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③大力支持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④支持企业主管部门对富余职工进行行业、企业间的调剂工作,协调办理有关手续,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指导、信息和咨询服务。⑤大力兴办劳动服务企业和生产自救基地。

从1994年初开始,再就业工程在上海、山东青岛、辽宁沈阳等30多个城市试行。1995年4月起在全国推广实施。自1993年初到1996年10月,全国有500多万失业下岗职工参加了再就业工程,其中有300多万人接受过职业指导,有110万人参加过转业转岗培训,有近百万人参加生产自救活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已有243万人实现了再就业。

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随后下发《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1998年要使下岗职工和当年下岗职工50%以上实现再就业。《通知》指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促进再就业的有效措施,各地要自下而上地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组织体系,再就业服务

中心资金来源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各负担1/3的“三三制”。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用。组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和帮助他实现再就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一般不超过3年。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或组织起来就业。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609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比例为50%。

由于国有、集体企业继续有大批职工下岗分流,加上我国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目前宏观经济需求不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显型与隐型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对再就业工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下一步再就业工程的开展,要明确目标,抓住重点,统筹兼顾,配套进行,强化管理,提高运行效率,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Zai Kuoda de Zhongyang Gongzuo Huiyi shang de Baogao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Report to the Expanded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

刘少奇 1962年1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1985年12月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收入时有删节)。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1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翌年1月召开有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市委、县委以及全国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共70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受中央委托,负责起草中央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报告经过起草和反复修改,在1962年1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于27日提交大会。同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大会上作了对报告的补充讲话。大会闭幕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又对报告和讲话作了修改补充,2月25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

报告共分3部分:①形势和任务;②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③党的问题。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造成这种经济困难局面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

是工业、农业等主要方面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承担了责任,要求全党下大力气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作风,严肃批评了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报告在最后要求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思想统一到经济调整中来,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调整措施,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对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在如何看待1958年以来的缺点错误、纠正和清理这几年中央和地方提出来的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党内思想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作了更为透彻的分析。

报告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时刻集中全党智慧形成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它对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Zai Kuoda de Zhongyang Gongzuo Huiyi shang de Jianghua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Speech to the Expanded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

毛泽东 1962年1月30日在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讲话于1978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主要部分编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在克服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过程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级以上主要负责人等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其目的是要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纠正错误,增强团结,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较快地克服困难。

讲话共分6个部分:①会议的开法;②民主集中制问题;③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④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⑤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⑥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这些问题的中心，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讲话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讲话在阐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时指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讲话还提出了让人讲话的原则界限：“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

讲话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批评。对“大跃进”期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责任，说：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讲话提出要从实践出发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讲话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从总体来说，这篇讲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60年代前半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思想，对加快调整国民经济的步伐起了重要作用。讲话提出的一些思想原则，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Zai Qingzhu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engli Qishi Zhounian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Speech at the Meeting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江泽民1991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次日的《人民日报》，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讲话》分3部分。第一部分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党70年的奋斗历程概括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二是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在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三件大事，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前进道路和战略策略。第二部分提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使命。《讲话》在分析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讲话》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强调指出：在经济领域，要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领域，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在文化领域，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继承和吸收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繁荣和发

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第三部分论述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并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

这篇讲话是在东欧、苏联相继发生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发表的，对于澄清理论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

Zai Qingzhu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li Sanshi Zhounian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Speech at the Meeting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叶剑英于1979年9月29日发表的讲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人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同时极少数人利用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认为，对新中国建国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有必要在国庆30周年的时候进行初步的基本估计，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叶剑英受委托作此讲话。这篇讲话是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是：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不朽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用适当的方法作了表述。②肯定了30年的光辉成就，并对30年来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前17年虽然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这些“左”的错误，但从全过程来看，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③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方面分析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并总结出四点深刻教训。④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要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⑤明确指出当时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要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认真解决好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这篇讲话对于拨乱反正，统一思想，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Zai Wuchang Shenzhen Zhuhai Shanghai Dengdi de Tanhua Yaodian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Summary of Talks at Wuchang, Shenzhen, Zhuhai and Shanghai”）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的重要谈话。这个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外国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逐步解放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改革开放有不同意见不搞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

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接班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主义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在谈话中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这篇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话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Zai Ya-Fei Huiyi Quanti Huiyi shang de Fayan

###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Speech on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周恩来 1955 年 4 月 19 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分为主要发言（即书面发言）和补充发言。原载 1955 年 4 月 20 日、21 日《人民日报》。1984 年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1990 年收入《周恩来外交文选》。

发言对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近代以来亚非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的历史原因和它们现今的奋斗目标等作了深入分析与论述。明确指出：亚非两洲这么多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非两洲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近代以来，亚非两洲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虽然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但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

统治，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亚非国家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它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完全独立，是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针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周恩来在临时起草的补充发言中提出并详细地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补充发言还以有力的论据说明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威胁”、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是不存在的。指出：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革命斗争经历了近 30 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最后才取得成功，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现在的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我们容许不明真相的人怀疑。但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周恩来的主要发言和补充发言，对与会各国了解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愿望，对亚非会议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ba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shang de Zhengzhi baogao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Political Report on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刘少奇 1956 年 9 月 15 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这篇报告已收入 1957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1985 年 12 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

报告共分 6 部分：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②社会主义改造；③社会主义建设；④国家的政治生活；⑤国际关系；

⑥党的领导。报告阐述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国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向全党提出了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其基本点是:①在正确地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同时,还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③为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健全国家的法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④指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建设方向,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康的领导”。为了做到这一点,要全党特别是各级干部一致努力,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等。八大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Zang Kejia

**臧克家** (1905~ ) 现代诗人。山东诸城人。1905年10月8日生。1926年秋,到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国民革命军讨伐反动军阀。30年代初就读于山东大学时开始发表诗作,陆续出版了《烙印》、《罪恶的手》、《自己的写照》、《运河》等诗集,多反映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苦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前方,从事进步文化工作近5年。出版了《从军行》、《泥淖集》、《淮上行》等诗集。1942年秋抵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有《泥土的歌》等诗集出版。这些诗热情歌颂了民

族解放战争,对抗战胜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写出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政治讽刺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诗集有:《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凯旋》和长诗《李大钊》等,内容大多是歌颂新社会。他的诗感情真挚,追求一种明朗、流畅、不事雕琢的风格。此外,还有散文、小说、文艺论文、随笔集作品。曾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曾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顾问、《诗刊》顾问兼编委。

Zeng Qinghong

**曾庆红** (1939~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江西吉安人。1939年7月生。1958年入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毕业后到解放军743部队任技术员。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1973年任七机部二院二部技术员。1969~1970年下放到广州部队赤坎基地、湖南西湖生产基地劳动。1973~1979年任北京市国防工业办公室生产处、科技处技术员。1979年后历任国家计委办公厅秘书、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厅副处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中共南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1986年后任中共上海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1989~1993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3~1999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1997年受聘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9年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Zeng Xianzi

**曾宪梓** (1934~ ) 香港实业家。广东省梅县人。1934年2月22日生。1961年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1963~1967年赴泰国侨居,期间曾跟随叔父学制领带。1968年全家移居香港,以6000元港币作资金开始创业,生产“金狮牌”领带,后改名为“金利来”。70年代初,通过赞助电视台播放中国乒乓球队表演赛、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节目,使“金利来”领带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名牌。80年代以后,“金利来”不断在东南亚和

欧洲拓展市场,并推出多元化的系列产品。1992年“金利来”获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总督工业奖”。1992年捐资1亿港币与国家教委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励内地优秀教师。1993年12月成立“曾宪梓慈善基金会”,资助贫困地区。1985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1981年发现的3388号小行星命名为“曾宪梓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九届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Zeng Zhaolun

**曾昭抡** (1899~1967) 化学家。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899年5月25日生。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1948年当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国家教育部和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化学学会会长。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早期从事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分析、有机理论方面的计算,以及分子结构和炸药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并任总编辑达20余年。晚年从事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后,创办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名与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逝世。

Zhang Aiping

**张爱萍** (1910~ ) 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四川达县人。1910年1月9日生。1928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在14军任排长、政治指导员、营长、大队政委。后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局秘书长,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任红三军团的团政委,率部参加夺取娄山关、攻克遵义城等战斗。到陕北后任军委骑兵团政委。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豫皖省委书记、新四军第六支队总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五纵队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参与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作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先后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了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等研制与试验工作。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主要著作收入《张爱萍军事文选》出版。

#### Zhang Binggui

**张秉贵**（1919～1987） 售货员，劳动模范。北京市人，1919年12月生。17岁开始学徒，1955年到北京市百货大楼当售货员。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商业服务50多年，退休以后仍到柜台售货。在工作中全神贯注地为顾客服务，像一团火那样去接待各式各样的顾客。在百货大楼30多年中，接待过230多万顾客，没有和顾客发生过一次矛盾。练出“一抓准”、“一口清”绝技，创造整套服务经验和艺术，成为全国广大商业服务行业职工的学习榜样。1977年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被中共北京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9月18日逝世。1988年9月17日，他的铜像在北京百货大楼前落成。

#### Zhang Chong

**张冲**（1901～1980）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云鹏。彝族。云南泸西人。1901年1月25日生。曾任滇军旅长、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师长。1938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后升任第六十军副军长兼第一八四师师长、新三军军长。1940年任第一集团军总部第二路军指挥，后因接近共产党被撤职。1946年到延安。1947年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前往东北战场，任东北民主联军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参加策动滇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后，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民委主任，国家民委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一屆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10月30日逝世。

#### Zhang Chunqiao

**张春桥**（1917～） 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东巨野人。1917年2月生。1931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学习。1933年参与组织华蒂文学社。1934年毕业后从事文学活动，曾任上海杂志公司校对，参加左联和社会科学家联盟。期间与鲁迅发生文章论争。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后前往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公学校刊秘书、《晋察冀日报》编辑、副总编辑，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51年起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因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得到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同年与江青共同策划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1966年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参与起草修改江青组织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批判彭真等人。会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对刘少奇频繁进行攻击诬陷，1966年底指使造反派头目发动公开打倒刘少奇的活动。1967年1月，回上海组织了打倒上海市委的“一月夺权”活动，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主任。伙同江青制造了大批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1969年参与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在中共九大和九届

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生争斗，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陈伯达等人的攻击。会后任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1971年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林彪事件发生后，与江青等人竭力阻挠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组织“反右倾回潮”活动，提出教育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1973年在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积极策划攻击诬陷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的活动。1975年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一书记。同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策划“反经验主义”活动，攻击复出的老干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同年秋天，积极组织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口号。1976年伙同江青镇压四五运动，诬陷邓小平。毛泽东逝世后，与江青等人大肆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临终嘱托”，加快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10月6日被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隔离审查。

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曾出版文集《今朝集》、《龙华集》。

#### Zhang Daqian

**张大千**（1899～1983） 中国画家。名权，后改为爰，字季爰，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1899年5月10日生。自幼随母习画，有“神童”之称。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1917年赴日本京都学习绘画和染织艺术。1919年回国，后一度为僧，法号“大千”。1925年在上海首次举办画展。1928年任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干事委员。1933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军软禁北平，1938年逃离，经上海、香港返回四川。1940年前往甘肃考察研究敦煌艺术，撰写《莫高石窟记》一书，完成壁画摹本276幅。1944年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二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现代画展。1946年返回北平。1949年后旅居香

港、印度、阿根廷。1954年迁居巴西。1956年会见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1957年被美国纽约世界美术家协会推为当代第一画家。1969年迁居美国旧金山。1976年初到台湾定居。1983年4月2日在台北病逝。其作品融会前贤精微，又不为所拘。擅绘山水、鸟虫、花卉、飞禽走兽。熔工笔意于一炉，笔画淋漓，气势磅礴。善作诗，隽逸奔放。工书法，于篆刻亦有深邃造诣。名画作有《青城山胜景》、《蜀中四大名山图》、《黄山前后》卷、《长江万里图》、《庐山图》长卷等。

Zhang Dainian

**张岱年** (1909~ ) 哲学家。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1909年5月23日生。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33~1936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1944年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1946~195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0年以来，连续被选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顾问。1986年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尤为注重中国古代唯物论及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曾提出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英国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古典哲学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观点，主张中西唯物论思想、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的结合。1934~1936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是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影响较大。他注重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方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发凡》。

Zhang Dingcheng

**张鼎丞** (1898~1981) 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福建永定人。1898年12月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了福建西部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曾任中共永定县委委员、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红军营长、团长等职，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1929年5月率部配合红四军解放永定城，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红四

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党委书记。1930年后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赣边红军学校政委，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土地人民委员。1932年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任闽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1939年5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3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1945年10月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参与组织苏中战役。1947年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12月16日逝世。

Zhang Guangdou

**张光斗** (1912~ ) 水利水电专家。江苏常熟人。1912年5月1日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35年赴美国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同年转往哈佛大学工学院再获硕士学位后作博士研究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弃学回国，任龙溪河水电工程处设计工程师。1943年再度赴美，先后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内政部垦务局任工程师。1945年回国，任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助理、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技术顾问，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水利学报》主编，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协作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委。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了《水工建筑物》教材及专著，写出了新安江水电站、丰满水电站等水力学试验研究报告和响洪甸拱坝、流溪河拱坝等结构试验报告，以及新坝型腹拱坝、拱坝坝肩地质力学模型、拱坝抗

震研究等论文。负责设计密云水库、青石岭水电站、渔子溪水电站等。参加了黄河和长江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如葛洲坝工程、丹江口工程、三门峡工程、小浪底工程、二滩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三峡工程以及红水河上龙滩水电站，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为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Zhang Haidi

**张海迪** (1955~ ) 优秀共青团员。女。山东省文登县人，1955年6月生。1960年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她克服病痛和种种困难，自学小学、中学基础课和医学知识及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万余人次。自修英、日、德语和世界语，先后创作和翻译出版了《小米勒旅行记》、《轮椅上的梦》等多部作品，发表译文、诗歌、散文、小说等约100万余字。1972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75年后，先后在莘县城关医院、广播局修理部、聊城文联工作。1991年任山东省济南市文联创作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获山东省“劳动模范”和中国共青团“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共青团中央作出“向张海迪学习”的决定。1993年，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是年4月2日，她在吉林大学正式通过《文化哲学视野的残疾人问题》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Zhangjiakou diqu dizhen

**张家口地区地震** (earthquake in Zhangjiakou) 1998年1月10日上午11时50分，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和张北县交界处发生的里氏6.2级地震。当天余震123次，其中4级以上3次。震中区13个乡镇约7万余间房屋倒塌，死亡47人，受伤2000余人，其中重伤250余人。时值严冬，震区有数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发生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打电话亲切慰问灾区群众，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立即率工作团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省政府拨款50万元，并组织医疗队、救护队前往灾区。河北省军区领导率领工作组于当日晚10时赶赴灾区，指挥1万多名解放军和武警战士参加抢险救灾工作。当地政府也向灾民运送了大量棉被、棉衣等过夜应急御寒物资，帮助灾民安全过冬。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慰问驻河北省张家口地震灾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勉励广大官兵不畏艰难困苦，团结奋斗，夺取



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灾区群众和解放军官兵一起，团结奋斗，抗震救灾。全国各地各界也向灾区捐赠了大量救灾物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受江泽民、李鹏委托，于11日到河北省张家口地震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区军民。至1月底，受灾群众普遍得到妥善安置，生产、生活转入正常。

Zhang Jinfu

**张劲夫** (1914~ ) 国务委员。安徽肥东人。1934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国难教育社党团委员，中共安徽工委宣传部长，鄂豫皖区委民运部部长，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旅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委宣传部长，鲁南二地委书记，鲁南、鲁中南行署副主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后，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1982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后为中顾委常委，也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Zhang Junqiu

**张君秋** (1920~1997) 京剧演员，工青衣。原名滕家鸣。江苏丹徒人。1920年10月14日生。14岁开始学演青衣，师从王瑶卿，并得到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等名家指点，早年即声誉甚著，被列为“四小名旦”之一。他的扮相雍容华贵，气度大方，嗓音“娇、媚、脆、水”，甜润动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剧本、音乐、表演及舞台美术等方面的革新，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华丽柔美、刚健清新的风格而自成一派。他主演的《打渔杀家》、《玉堂春》、《美龙镇》、《望江亭》、《秦香莲》等剧已先后摄制成舞台艺术影片。著有《张君秋戏剧散论》。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顾问。1997

年5月27日逝世。

Zhang Kehui

**张克辉** (1928~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台湾彰化人。1928年2月生。1942~1947年在台湾彰化高级商业学校学习。1947年~1948年在台湾师范学院学习。1948~1949年先在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后任闽粤赣纵队四团十四独立连连长、副指导员。1949~1951年任福建省安溪县公安局指导员、县公安局股长。1951~1952年在福建省委干校学习，后任省委土改工作队组长，后又到省委党校学习。1952年后长期在福建省工作，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侨务办公室、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省台盟主委，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省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91~1997年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海峡两岸交流协会顾问、台盟中央副主席。1997年后任台盟中央主席，全国台联名誉会长。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五、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Zhang Lan

**张澜** (1872~1955)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872年4月2日生。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1906年后回南充先后创办小学和女校、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赴北京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7年任四川省省长。五四运动后，支持新文化运动和青年出国勤工俭学。1920年回四川办中等教育，并创办《民治日报》。1925年7月起，创办成都大学，自任校长。1935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支持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参与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被推

选为民盟中央主席。抗战胜利后，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反对独裁、内战、分裂。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1月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民盟第一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2月9日逝世。著有《四勉一戒》、《墨子贵义》等。

Zhang Ruifang

**张瑞芳** (1918~ ) 电影、话剧演员。女。河北保定人。1918年6月15日生。早年在北平读书，积极参加演剧活动。“一二·九”运动中，主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引起强烈反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重庆，出演《棠棣之花》、《屈原》等话剧中重要角色。与白杨、舒绣文、秦怡并称话剧界“四大名旦”。同时开始进入电影界。1951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南征北战》、《家》、《聂耳》、《李双双》、《大河奔流》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所塑造的李双双角色，获得巨大成功，使她获第2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她戏路宽广，表演朴实真挚，形象鲜明而富有个性。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及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

Zhang Siqing

**张思卿** (1932~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河南洛阳人。1932年8月生。1949~1952年先后任河南省新郑县支前司令部谢庄供应站、华中支前司令部通城供应站南襄办事处工作员，中南土改工作队广西平乐县分队副队长、工作组组长。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科员、东北工作团副组长、长江水上运输检察院检察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秘书科长。1966~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69~1973年在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工作。1973年后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武警湖北总队第一政委，省委常委兼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1985年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93~1998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Zhang Tingfa

**张廷发** (1918~ ) 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福建沙县人。1918年4月9日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排长、团通信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通信科、作战科科长，358旅作战股股长，129师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参谋处处长、第七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处处长，曾参与拟制出击陇海路、定陶等战役计划。后任桐柏军区分区司令员、中共汉南工委书记、汉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襄樊地委书记和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开辟桐柏解放区和宛东、宛西、襄樊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副军长，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政委。1977~1985年任空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Zhang Wannian

**张万年** (1928~ )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山东龙口人。1928年8月生。1944年8月参加八路军，次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胶东北海独立第3营7连战士。后在东北第12旅35团3营任通信班副班长、班长，东北第四纵队12师36团警卫员，参加了新开岭等战役。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12师36团5连副排长、排长、连副指导员，参加了营盘战斗和鞍山辽阳战役。1948年后，历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2师36团司令部通信股参谋、副股长、股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并在塔山阻击战中荣立大功，随后参加了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1950~1956年，任陆军第41军123师369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南澎岛和东山岛战斗。1955年获三级解放勋章。1956年任陆军第41军123师368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8~

1961年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预科系、基本系学习。毕业后任陆军第41军123师367团副团长、团长。1966年起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作战科长、副部长。1968年任陆军第43军127师师长。1978~1981年，任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期间曾入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任第43军军长。1982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起任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1990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92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书记。1993年3月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同年5月晋升上将军衔。1995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12月起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Zhang Wenyou

**张文佑** (1909~1985) 地质学家。河北唐山人。1909年8月31日生。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45年赴美、英等国考察研究，回国后先后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能源委员会顾问，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地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毕生从事地质事业，在能源、资源、地震预测预防、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0年代张文佑在李四光指导下，编制了《广西地质图(1:20万)》及《广西地层表》，著有《广西山字型构造的雏形》一文。他于50年代提出了油气勘探基地由西部东移的战略决策，特别是由他提出的“定洼探边”、“定洼探隆”的建议为大庆和其他油田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把地质历史与地质力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断裂体系和断块大地构造学说，对断块理论和地质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主编的中国第一幅《中国大地构造图》和《中国大地构造纲要》一文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集体)，主编的《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图(1:500万)》和《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一书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集体)。1985年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Zhang Wenyu

**张文裕** (1910~1992) 物理学家。福建省惠安县人，1910年1月9日生。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3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5年赴英，在剑桥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核物理。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四川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度大学物理学教授，在此期间参与发起并成立“全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曾任主席。1956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和室主任。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1年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中国组长，并领导一个研究组。1964年回国，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72年倡议创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曾兼任高能物理实验室中心筹备处主任。1984年任该所名誉所长。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文裕长期从事核物理、宇宙线和高能物理的研究，有很多重要发明和发现。40年代后期发现 $\mu$ 子系弱作用粒子和 $\mu^-$ 子原子。50年代初系统研究了大气贯穿簇射 $\Delta^+$ 粒子。70年代领导发现了大于质子质量10倍的粒子。对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992年11月5日卒于北京。

Zhang Wentian

**张闻天** (1900~1976) 中共第六届、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1900年8月30日生于农民家庭。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赴日本、美国留学。1924年初回国，到中华书局任编辑，发表长篇小说《旅途》等。同年11月到重庆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传播新文化，被军阀驱逐。20年代出版译作多种。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1年2月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斗争》。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之一。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中共六

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开始同毛泽东合作。10月参加长征。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作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遵义会议决议，被推举在党内负总责，协同毛泽东实现历史转折，并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长征到达陕北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定“逼蒋抗日”方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立，为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主持洛川会议，确定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原则和敌后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继续主编《解放》周刊，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自觉清算过去“左”倾错误。1942年1月赴陕北、晋西北作农村调查。1943年3月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参与起草历史问题决议。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历任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辽东省委书记等职。1948年8月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同年9月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由5种经济成分构成，提出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方针。

195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提出重要意见。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强调克服主观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同彭德怀一起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1960年11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等大量文稿。1962年到苏浙沪湘调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建议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1963年作论文《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提出生产关系“具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的理论创见。

“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面对康生

等制造的“61人案”，独自承担责任。1969年10月遣送广东肇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稿近10万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1975年8月迁居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心脏病猝发逝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主要著作集为《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四卷本）等出版。

### Zhang Xiaolian

**张孝骞**（1897～1987） 医学家。1897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长沙。1915中学毕业后考入湘雅医学院，毕业后留校。1924年到北京协和医院任医师。1926年起曾三次到美国学习进修。1935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到湘雅医学院，历任教授、教务主任、院长。1948年再回协和医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医药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名誉主任，《中华内科杂志》总编辑。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委。主要贡献有：在基础医学方面，对甲亢病、肾脏病人的血容量做出创见性的测定和研究，使治疗方法得到确定；对消化系统的胃分泌功能研究，提出了新观点，首先在中国采取组织胺法分析胃液。是中国肠胃病学的创始人。发表论文上百篇。在医学教育方面，倡议和参加创办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198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他举行行医60周年庆祝大会。1987年8月8日逝世。

### Zhang Xueliang

**张学良**（1901～） 爱国人士。字汉卿。辽宁省海城县人，1901年6月3日生。奉天讲武堂毕业。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的奉军中服役，1919年任校官，1920年升任旅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兼奉天讲武堂校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三军司令。1925年任北京军事学院院长。1928年4月任太原汉方奉军指挥。同年其父被日本军炸死于皇姑屯后，继任东三省保安司令。30年代曾任哈尔滨工业

大学理事会主席。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由于协助蒋介石，被委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1年赴意大利考察。1934年任鄂豫皖“剿共”副司令、西北“剿共”副司令，率东北军进驻陕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向蒋面谏，要求联共抗日，遭到训斥，于12日晨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抗日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事变和平解决后，陪蒋介石回南京，被软禁，遭军法审判，处以10年徒刑。1937年1月被赦后仍交由军事委员会“管束”。1946年移送台湾继续监禁。在关押中研究明史。1961年由台湾当局宣布“恢复自由”。1964年与前妻于凤至解除婚约，同年与赵一荻结婚。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网络独家访问，“打破了半个世纪沉默”。后到美国会见亲属。1992年9月在家中接受祖国大陆记者访问，此后多次会见赴台参观访问的大陆艺术界等方面人士。1993年4月22日，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同年5月31日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与夫人赵一荻定居美国夏威夷。

### Zhang Yimou

**张艺谋**（1951～） 电影导演、摄影师、演员。陕西西安人。1951年11月14日生。中学毕业后在陕西农村插队，后当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7月毕业，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黄土地》、《大阅兵》等影片的摄影师。《黄土地》摄影构思独特，获第5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85年法国第7届三大洲电影节摄影奖。1986年借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任导演。1987年主演影片《老井》，表演质朴、准确，在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男演员奖，1988年获第8届电影金鸡奖和第1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先后导演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红高粱》获第8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1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秋菊打官司》获199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之一。1998年，导演有国外著名指挥、歌剧演员参加的世界著名歌剧《图兰朵》，在故宫演出，引起强烈反响。拍摄“希望工程”题材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大胆革新，不用专业演员。执导的影片，对电影语言技巧、叙事结构方式、银幕形态风格多有所创新。

Zhang Youyu

**张友渔** (1898~1992) 法学家、新闻学家。原名象鼎。山西灵石人。1898年12月4日生。1923年入国立政法大学法律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日本留学,因参加反对日本侵华活动被驱逐回国,任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后到济南、开封等地从事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任中共山东、豫鲁联络局书记。1939年到重庆领导中国救国会的民主活动。1943年后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会秘书长,《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第三至第五届常委。对法学,尤其是宪法学有精深的研究,参加了多项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委员长,参与起草1982年宪法的工作。1986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法学理论建设和研究,同时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法学遗产,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学》、《政治学》卷编委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宪政论》、《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新闻之理论与现实》等。1992年2月26日逝世。

Zhang Yuzhe

**张钰哲** (1902~1987) 天文学家。福建闽侯人。1902年2月16日生于福州。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学系,1929年获得叶凯士天文台天文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1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1946~1948年再度去美国从事交食双星光谱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理事、理事长。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创者之一。1928年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30多年来拍摄和领导拍摄到7000多次小行星和彗星的精确位置,发现数以百计的小行星和3颗命名

为“紫金山”的新彗星。1957年初应用天体力学基础理论对人造卫星轨道问题作了开创性研究。开创并领导了多个领域天文学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在天文学史研究、天文仪器研制、天文科普、推进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毕生发表论文、报告近60篇,并出版多部天文学科普著作。为了纪念他在天文学上的新贡献,1978年8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把哈佛天文台1976年发现的编号为2051号的小行星定名为Chang(张)。1987年7月21日在南京逝世。

Zhang Yunyi

**张云逸** (1892~19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运镨,又名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1892年8月10日生。1914年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在粤军中任过排长、连长、营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4军25师参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29年12月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开辟右江苏区。后率部转战桂、黔、湘边,进入湘赣苏区,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参谋长。1931年9月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到陕北后兼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并当选中央军委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巩固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淮南军区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43年秋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曾组织胶东、鲁中部队发起平安战役。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就地坚持斗争。后兼任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74年11月19日逝世。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国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Zhang Zhen

**张震** (1914~ ) 国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见生,别名祖寿,又名中天。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5日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连政委、团通信主任、营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12团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科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1939年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兼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参与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第六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曾参与指挥山子头战役和西进战役。1944年11月起兼任第四师11旅旅长和淮北军区路西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职,率部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胶东等战役,参与指挥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4军代军长兼代政委,率部参加金城战役,同年底回国。1957年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70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曾负责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筹建工作,任工程指挥部政委。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5年12月起任国防大学校长、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四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Zhang Zhixin

**张志新** (1930~1975) 中共党

务工作者，革命烈士。女。天津市人，1930年12月5日生。1950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在抗美援朝中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选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12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任文艺处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盘锦干校监督劳动。她因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尖锐批评“文化大革命”而遭迫害。1969年9月26日被捕入狱。在狱中她仍继续学习，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坚持斗争，1975年4月4日惨遭江青集团杀害。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报导《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事迹震动全国。

Zhang Zhizhong

**张治中** (1890~1969)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生。1912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到广州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1920年后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第四师参谋长、桂军军官学校大队长。1924年起，先后任黄埔军校军事研究会委员、学生总队副队长、总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学生军官团团长。北伐战争开始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部主任、教育长，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京沪区警备司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0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几次上书蒋介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任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6年4月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留居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9年4月6日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

Zhang Bojun

**章伯钧** (1895~1969)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安徽桐城人。1895年11月17日生。早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曾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活动。1926年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秘书长。1927年3月任国民政府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从事农民运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创建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负责宣传工作。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受聘为第一、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被选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总联络人。1939年参与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及重庆支部主任委员。1945年1月，任《中华论坛》主编，7月，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2月，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当选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1969年5月17日逝世。1978年后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六届中央主

席；民盟第一、三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届中央副主席。

Zhang Shizhao

**章士钊** (1881~1973) 民主人士，教育家。字行严。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1902年入南京陆军师范学堂。1903年赴上海参加蔡元培、邹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任《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17年在北京办《甲寅》杂志。1922年直奉战争后，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为甲寅派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拒绝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拉拢，由香港到重庆，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做律师。1949年2月与江庸、颜惠庆等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到解放区石家庄拜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年4月，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谈判破裂后，与邵力子致信李宗仁，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骗局，并同张治中等留驻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历任国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1973年5月赴香港探亲。7月1日在香港病逝。著作有《柳文旨要》等。

Zhao Dan

**赵丹** (1915~1980) 电影演员。原名赵凤翱。山东肥城人。1915年6月27日生。中学时代参与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进步话剧。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活动。演出过《娜拉》等名剧，稍后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出演《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30多部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演剧队，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和昆仑影业公司主演《幸福狂想曲》、《两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揭露和抨击黑暗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为了和平》、《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中扮演主角。所塑造的李时珍、聂耳、林则徐、许云峰等形象，代表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文化大革

命”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继续积极热情地从事电影艺术工作。完成《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等著作。他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1980年10月10日逝世。

Zhao Jiuzhang

**赵九章** (1907~1968) 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浙江吴兴人。1907年10月15日生于河南开封。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主攻气象学，1937年完成论文《关于信风带的热力学研究》，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气象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等职。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届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三届常委，九三学社第三至第五届中央委员。长期从事气象科学和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和组织工作，他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创建了中国的动力气象学、大气环流和云雾物理等大气学科分支，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海浪观测台。参加并参与组织了核武器、导弹试验中的大气物理和高空物理研究工作，他十分注意观测工作在地球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引用新技术，先后在中国创设了气球探空、臭氧观测、海浪观测、云雾物理观测以及探空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高空探测等，为中国的地球物理学的观测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空间科学及其探测技术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68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

Zhao Mengtao

**赵梦桃** (1935~1963) 纺织工人，先进生产者。河南省洛阳市人，1935年11月生。1951年参加工作，在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当工人。工作中带领所在班组忘我地劳动，创造性地工作，自觉遵守纪律，曾连续11年、42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出席全国纺织工业劳模会议；1955年出席陕西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所在小组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同年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创造连续7年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纪录；1962年，又创造清洁检查操作法。1963年6月23日因病逝世。

Zhao Nanqi

**赵南起** (1927~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吉林永吉人。朝鲜族。1927年4月生。1945年12月入伍。后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延边地委总务科副科长、地委秘书。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运输科副科长、科长。1955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系学习，后任志愿军后勤部计划科科长，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分区副政委、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3年4月起先后任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兼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延边自治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会主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吉林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吉林省军区政委，1985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院长。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Zhao Puchu

**赵朴初** (1907~ ) 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安徽太湖人。1907年11月5日生。早年从事佛教和社会救济工作。1936年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主任。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至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三届中央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常务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央名誉主席，民进第一、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1982年获日本佛教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和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传道功劳奖。1985年获日本第三届庭野和平奖。著有《滴水集》、《片石集》、《佛教知识问答》等。

Zhao Shuli

**赵树理** (1906~1970) 现代小说家、戏曲作家。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1906年9月24日生。1925年入山西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捕入狱，次年获释。此后长年流浪奔波。1937年加入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做过乡干部，区长、剧团团长，报刊主编等。1931年开始发表通俗文艺作品，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驰名文坛。被誉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崛起的新型作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表了《登记》、《锻炼锻炼》、《三里湾》、《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张来兴》等小说和特写。另著有文艺论集《三复集》，长篇评书体小说《灵泉洞》(上)，戏曲剧本《三关排宴》、《十里店》等。其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日常生活题材、农村普通人物，展示这一历史时期农民的种种心态。形式上较多地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和古代话本、拟话本的写法。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洗练。为创造、发展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1970年9月23日逝世。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并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已出版《赵树理文集》、《赵树理文集续编》。

Zhao Zhongyao

**赵忠尧** (1902~1998) 物理学家。浙江诸暨人。1902年6月27日生。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学部，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留学，193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他早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森两年在研究中发现原子核引起的反常吸收，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1931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在中国首次开创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试验室。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赴美国参观原子弹试验，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原子核反应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冲破阻挠回国，带回重要资料和器材。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加速器，为中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开创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四、五、六届委员。1998年5月28日逝世。

Zhao Ziyang

**赵紫阳** (1919 ~ ) 1987 ~ 1989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0 ~ 1987年任国务院总理。河南滑县人。1919年10月17日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一带从事党的工作，先后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1947年任河南、湖北交界的桐柏区党委副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度受到冲击，被撤销一切职务。1971年重新出任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5年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是中共第十至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他在1977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87年1月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同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Zhenbaodao ziwei fanjizhan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defensive counter-attack on Zhenbao Island)

196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反击苏联军队武装侵犯珍宝岛的战斗。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千米。珍宝岛原与中国大陆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在岛上捕鱼和生产。但自60年代开始，随着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两国边界紧张局势日趋加剧，苏联边防军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多次侵入这一地区进行挑衅。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即达16次之多。他们无理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并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中国边防部队则一再克制忍让。面对苏联边防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多次与苏联政府进行交涉并发表声明，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武装入侵。苏联方面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置若罔闻，并视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为软弱可欺，在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入侵珍宝岛，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进行突然袭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联军人歼灭和逐出珍宝岛。3月2日战斗后，苏联迅速向边界地区增兵，企图以武力强占珍宝岛。为了保卫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也抓紧时间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3月15日，苏联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和纵深大口径火炮及其他火炮支援下侵入珍宝岛，并向中国守岛分队轮番发动猛烈进攻。中国

边防部队英勇抗击，激战9个小时，顶住6次炮火袭击，挫败3次进攻，迫使苏军撤出珍宝岛。3月17日，苏军又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予以炮火还击，将其再次击退。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保卫了国家领土的完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1991年5月，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两国国界东段勘界协定，确认珍宝岛属于中国领土。

zhenli biao zhun wenti dataolun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general debate on the criterion for truth)

1978年5月年1979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紧接着扩展到政治界展开的一场关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的大讨论。

提出与开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初稿为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撰写，后经多人修改，由胡耀邦审定，于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登载。该文从根本上对“两个凡是”予以否定。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更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号召人们敢于冲破禁区。

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四省省报转载，接着各地方报纸相继转载。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批评“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更多的人对文章表示支持。5月中旬，《光明日报》组织自然科学界座谈真理标准问题，方毅主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的联席会议进行讨论，表示支持。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和谈话，有力地支持《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胡耀邦鼓励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勇敢地真理而斗争。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经罗瑞卿主持修改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列数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论述实践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对实践标准的责难，进一步澄清有关真理、实践的理论问题。

6月以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进入高潮。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纷纷召开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地方领导人也关注和参加了这场讨论。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在全省理论座谈会上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砸碎精神枷锁，敢于探索，破除清规戒律。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公开表态支持，并联系实际，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对黑龙江省委的结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发表文章，指出坚持实践标准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越出理论界的范围，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从8~11月，全国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干部会上的讲话，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在这个政治问题上表明了态度。10~11月，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和11个大军区、5个军兵种的领导干部，也都公开表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立场和态度。一直以“不表态”、“不卷入”抵制这场讨论的《红旗》杂志，也不得不改变态度，终于在1978年第12期上刊登了谭震林论证实践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意义** 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场大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这场讨论以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zhengyan fangeming yundong

### 镇压反革命运动 (suppression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1950~1953年全国性的镇压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势力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政治运动。简称镇反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局将朝着有利

于他们的方向变化，于是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气焰又嚣张起来。一时，全国各地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及其交界地区匪情严重，农村许多地主富农乘机反攻倒算，城市中原来一些已经归顺的反革命分子也伺机反扑。国内的阶级斗争由此激化。

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特别是对于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根据这一指示，东北、济南、福建、南京、苏南等地区相继处理了一批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

10月初，中国出兵朝鲜，为了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强调：“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宽大处理后仍然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10月16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大规模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会后，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控诉会、公审会、广播大会，很快掀起了揭发、检举和公审反革命分子的高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提出打击对象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由于当时阶级敌人的身份是公开的，镇反的目标也很明确，打击范围基本上没有扩大化。但是，由于战争期间的特殊要求，根据惩治条例第7条第3款，“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组织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表现者”，亦列入判死刑和有期徒刑之列，使一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成了打击对象。从1951年3月下旬开始，运动开始收缩。4月30日，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除特殊情况外，自6月1日至9月30日4个月内，“一律停止捕人”，“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

1952年，镇反运动更加有序地进行。一方面，运动有秩序地转入重点打击“中层”、“内层”(即清理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从陆地逃到江湖上的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另一方面，公安机关采取种种措施，

对以往的积案进行了认真处理。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错捕、错押、错判、错杀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各地有组织地对以往案件进行多次审查，使偏差减少到最小程度。

1953年上半年，历时3年的镇反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国内外敌人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阴谋活动被粉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从此国内平静，治安状况大为好转。

#### 推荐书目

孙宇亭等编：《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略》，《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群众出版社，北京，1992。

## zhengdang

### 整党 (organizational consolidation of the Party)

1983年冬至1985年中共中央领导全党进行的以清理“三种人”、纠正不正之风为重点的大规模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的活动。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阐明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规定这次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3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并对整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要求“整党不能走过场”，指出最危险的是“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如果不在整党中清除，就会留下祸根。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至1985年2月为整党一期，主要是学习整党文件，调整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纠正不正之风，进行整改和党员登记。1985年3月至6月为二期，重点解决增强党员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1985年六七月起，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部署，从5个方面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促进改革：①抓好理想和纪律教育；②下大决心切实纠正不正之风；③核查“三种人”的工作还要加紧进行；④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⑤把党的建设方面经常性工作认真管起来。

## zhengdang jiandang yundong

### 整党建党运动 (campaign to rectify)



fy and build the Party) “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中，整顿和重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各级的中共党组织都陷于瘫痪。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系统外）也停止了组织生活。从1967年起，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整党建党问题，考虑通过整顿和重建，恢复党组织。1967年10月27日，他在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报告上批示：“党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经过修饰后公开发表，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其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发出征询召开九大和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的文件。但因当时局势混乱，除个别单位进行了试点外，整党建党根本无法普遍进行。直到各地革命委员会建立和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整党建党运动才按照中共九大的决定和要求，普遍开展起来。1970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把“抓紧整党建党”作为当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议决定，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两个指示，一是“五十字建党纲领”，二是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即“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197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准备召开地方各级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党委。其后，以11月的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开端，至1971年8月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都建立了新的中共党委。

这次整党建党运动的指导思想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只规定为“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只字不提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而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又主要指“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吐故纳新”的整党方法，主要是指处理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党员，把一大批造反分子视为“新鲜血液”接纳入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整党建党走入歧途。尽管如此，整党建党运动毕竟使中共党组织在各级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和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人民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创造了重要条件。

zhengfeng yundong

**整风运动** (rectification campaign)  
中国共产党1957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

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中央针对党内一些人经不住执政党地位的考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特权思想以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作风的情况，决定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作了部署：①整风目的。通过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②整风内容。各级党委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总结和改进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象。③整风方法。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批评者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抹杀一切，不搞过火批判；被批评者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对原则性批评可能时作出必要结论，但必须容许保留不同意见。对犯了错误的人，进行耐心帮助，一概不给组织处分，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④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逐步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以加强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⑤整风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院校的党组织开始，首先是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试点，以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同时，应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又先后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

风》阐述《指示》内容。《指示》和社论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为了让大家敢讲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别从北京南下，沿途作报告，解释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问题，为整风运动作思想上的准备。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说明整风的必要性和意义，征求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开展整风的意见。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时，国内民主空气高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批评、建议。中共中央表示衷心欢迎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党内不良倾向。整风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发生，并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Zhengque Chuli Shehuizhuyi Xiandaihua  
Jianshe zhong de Ruogan Zhongda  
Guanxi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Correctly Handle a Number of Major Problems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or Modernization”) 江泽民1995年9月28日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1993年，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始制定我国跨世纪的远景发展规划，用2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和酝酿讨论，对中共十四大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对涉及长远战略目标的诸多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江泽民的这次讲话中。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这个讲话，随后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讲话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总结和

吸收我国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17 年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宏观上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 12 个重大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应坚持的指导原则和方针。①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指出,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③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指出,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④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指出,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合理的产业结构。⑤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⑦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⑧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指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⑨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指出,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⑪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国防

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指出,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个讲话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和新成果,是我国实现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性文献。

#### zhengquan shichang shidian

**证券市场试点** (experimental stock exchanges)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中国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的起步发展和尝试阶段。

中国股票市场的试点始于 1984 年,主要包括股票发行的试验阶段和股票转让市场的试验阶段。1984 年 7 月 26 日北京市天桥百货商场组建股份公司,并由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发行第一批 300 万元的股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发行股票,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试点工作的开始。此后上海、沈阳、武汉等地的一些企业也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并向社会发行股票。但当时发行的这些股票很不规范,许多股票实质上是企业长期债券。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深圳为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城市。1987 年 5 月,深圳发展银行按股份制原则组建并以标准化的形式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9.5 万股。随后深圳的其他 4 家公司也相继发行股票。中国股票转让市场的试点,稍滞后于发行市场的尝试。它经历了柜台交易阶段、正式成立证券交易所阶段和全国“并网开通”三个阶段。1985 年 1 月,上海市工商银行对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进行柜台转让服务。1986 年深圳各证券公司也开始进行股票交易业务,1987 年上海和深圳开始筹备成立证券交易所并开始对股票交易进行试营业。1990 年 12 月 19 日及 1991 年 7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上市交易的试点阶段。1990 年全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正式开通,并于 1992 年 7 月开始办理公司法人股的交易。1992 年 8 月 14 日武汉证券公司开始正式办理上海上市股票的代理买卖业务,这标志着全国“并网开通”的股票交易的尝试工作开始进行。1992 年下半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证券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一起制定有关股份制企业、股票发行和交易等方面的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对于股票市场的规

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中国企业债券上市和交易试点起步于 80 年代初。1983 年企业债券发行工作开始试点。试点开始后企业债券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除国家重点企业债券外,当时的企业债券并不规范,对债券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也不尽完善。1987 年 3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对企业债券的利率水平、发债规模作出规定。80 年代末,因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进行控制。进入 90 年代后,企业债券的发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发债规模有所扩大,债券的品种有所增加。同时,一些重点企业也开始在柜台和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993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在京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试点阶段的基本结束,中国证券市场开始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 Zheng Fengrong

**郑凤荣** (1937~ ) 田径运动员。女。山东省济南市人。1937 年 3 月 2 日生。是中国第一个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的选手。1953 年代表山东省参加华东区第一届田径运动会,跳高 1.38 米,获得第 2 名,跳远 4.76 米,获得冠军。1954 年全国田径运动会上以 1.45 米的成绩打破全国女子跳高纪录。在中央体育学院学习期间,跳高成绩由 1.48 米提高到 1.61 米。1957 年,在柏林的一次国际田径比赛中,以 1.72 米的成绩获得女子跳高冠军,跨入当年的女子跳高世界先进行列。在接连跳过 1.73 米、1.74 米、1.75 米之后,1957 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京田径运动会上以 1.77 米的成绩,打破了美国运动员 M. 麦克丹尼尔保持的 1.76 米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选手和田径选手。1963 年又以 1.78 米的成绩创全国女子跳高纪录。1956 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 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79 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 年、1989 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杰出运动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

Zheng Tianxiang

**郑天翔** (1914 ~ ) 1983 ~

198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内蒙古凉城人。1914年11月28日生。早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北平清华大学学习。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历任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委宣传部科长、阜平县委副书记。1943年调任聂荣臻秘书。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后任绥南专署专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包头市市长。1952~1966年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对北京市的工业生产和城市规划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79年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航天工业部顾问。在七机部任职期间,他组织实施了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试验。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1983~198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坚持一手抓审判、一手抓建设的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司法队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Zheng Zhenduo

**郑振铎** (1898~1958) 作家、文史学家、藏书家。笔名西谛等。福建长乐人。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杂志,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后主编《小说月报》,发表大量文学评论。1927年游历欧洲,1928年回国。1931年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在上海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工作,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到北京,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从事文学史、文献古籍和图书版本目录的研究、整理和收藏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西谛书话》、《中国古代版画史略》

等。1958年10月18日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Zhengzhou Liangshi Pifa Shichang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Zhengzhou Grain Wholesale Market)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10月12日正式开业。它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内贸易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开办,共同管理,面向全国组织省际间议价粮油调剂的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它是粮食现货市场,但引进部分期货机制(如会员制、保证金制、远期合同转让等),并逐步向期货过渡。市场本身不从事经营活动,收取少量交易手续费(合同成交额的1%~1.5%),是一个为交易双方以及全社会服务的非盈利性组织。

市场由国家组建的专门领导机构管理,主要分为3个层次:①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国家协调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委托国内贸易部等11个部委组成,负责协调郑州市场运行中涉及部门、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②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咨询研究小组,侧重研究论证郑州市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提供咨询指导。③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对郑州市场实行领导、管理和监督职能。

市场实行资格会员制,凡符合法定资格的粮油生产、经营、加工、消费者,经过审查并经国内贸易部批准,均可成为会员进场交易。它实行保证金制度,除资格保证金外,合同双方各按成交额的5%交纳基础保证金,在合同履行后归还。它的上市品种以小麦为主,同时开办所有粮油品种及其副产品、饲料和饲料原料交易,该市场还具有交易时间灵活、交易方式多样、代办运输计划、提供信息服务、实行代理业务、调解商务纠纷等多种特点。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试点而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它对于调节供求,搞活流通,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打破传统的粮食流通计划体制,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典型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流通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志。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完善,市场的期货交易也获得了很大发展。郑州商品交易所是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确定的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交易发展的目标而挂牌开业的第一个从事粮油产品期货交易的场所。它与批发市场实行一套管理机构,期货、现货两种机制同时运行。交易所实行的基本规则是吸收借鉴了国外期货交易所的成功

范例,结合中国的实际而制定的。郑州交易所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对于发挥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与价格发现功能,指导生产、流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zheng qi fenkai

**政企分开** (sepa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措施。在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改变过去那种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的做法,把各级国家政权机构对经济进行管理的职能和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职能分开,把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确立国家同企业的正确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改革前,中国基本上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国家既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又作为经济直接管理者,行使管理者职能。企业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国家直接经营,政企职责不分,企业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附属单位,严重地束缚了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致使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同时,国家包揽了许多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管理业务,加重了财政负担,削弱了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控机能。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政企分开,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得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依法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经营单位,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依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强化审计和经济监督,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其基本职责和做法是: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要产品中需要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和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向企业下达指令性产品计划，并保证其所需的计划物资供应，审查批准企业提出的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的重大技术改造计划。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到1998年，政企分开的实施取得很大进展。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解除了与所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地方政府也正按同样原则进行改革。

Zhengxie Quanguo Weiyuanhui Guanyu Zhengzhi Xieshang Minzhu Jiandu Canzheng Yizheng de Guiding 《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Decisio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for Political Consultati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ion over State Affairs”） 人民政协履行主要职能的规范性文件。在1989年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995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共15条。对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内容、形式进行了阐述和规范，对政协履行主要职能的有关程序和制度作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文件，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各级党委必须充分重视人民政协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要在决策之前与政协进行协商。不是同级党委常委的地方政协的党员主席或党组书记，可请他们列席党委常委会议和其他有关重要会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时，可视需要邀请政协有关领导列席。各级党委要为政协开展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对政协

干部编制、活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困难，要切实帮助解决。

《规定》的制定和实施，对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zhengzhi tizhi gaige

**政治体制改革** (reforms i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的改革。

**改革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优越性，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这些弊端有了清醒认识，主要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政领导机构重叠臃肿，干部队伍老化，民主集中制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等。

**改革进程和主要内容**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政治体制存在上述问题的总根子是权力过分集中。他在讲话中阐述了推进领导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的和解决的重点等问题。此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集中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实行党政分工、逐步建立政府独立的工作系统；实行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调整、精简国家行政机构。

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继续进行。邓小平在1986年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的总目标是消除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政治体制改革要有领导地逐步进行。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着重于实行党政分工，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国家政权组织的内部关系，实行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互相制约；实行广泛的人民自治，发挥社会本身的功能作用；理顺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活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并提出了改革的主要任务。为贯彻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方针，各地各级党政组织重点实施十三大所提出的实行党政职能分离的要求；以扩大中心城市和企业权力为重点，逐步下放权力；推进以重新配置职能、合理划分权限、调整政府机构、完善运行程序、加速行政立法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手确定建立社会协商对话的具体规定和办法，明确对话范围、形式，沟通对话渠道；同时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监督和社会监督，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国突出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推进了90年代初的政治体制改革。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同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搞好社会治安。十四大以后，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重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立法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逐步完善监督机制。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进一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维护安定团结。为落实上述任务，在继续加强各项民主制度建设的同时，推进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形式、加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的民主建设，进一步建立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为重点的民主建设；推进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协调发展的法制建设，完善并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为重点的民主监督制度。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了政府机构改革具体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



zhishifenzi jieshou zaijiaoyu

##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re-education of intellectuals)

“文化大革命”中歧视、改造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方针。1968年9月《红旗》杂志刊载了毛泽东为《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所写的编者按。毛泽东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月12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解释说：因为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后毕业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都需要接受改变资产阶级思想的再一次教育。此后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级干部去五七干校，文教科技人员到基层劳动等各项接受“再教育”的运动。这种方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否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工作，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歧视，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被作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

zhishifenzi sixiang gaizao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ideological remoulding of the intellectuals)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自我改造思想的一次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高涨，主动学习新知识，以求适应新生活，为社会服务。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热烈拥护。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名著名教授发起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得到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决定把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地区的其他高等院校，取得经验后推向全国。9月底周恩来应邀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阐明要通过学习分清敌我，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使自己从民族的立场上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还要力争更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随后，这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界知识分子当中。在运动中，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革命

理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要求，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混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到1952年秋天，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运动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和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为国家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重要条件。由于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在后期与“三反”运动、组织清理等政治运动相结合，出现了一些缺点，主要是在思想批判中一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一些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

Zhishifenzi Wenti Huiyi

##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s)

中共中央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而召开的会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共1279人参加。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报告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处在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报告还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出“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水平”。报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报告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指出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

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奋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邀请近百名苏联专家，编制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另外，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远景规划。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这两个规划已经初步完成。科技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要科技研究任务57项，研究课题616个，重点项目12个。这个规划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科学规划的制定，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宽慰和激励，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zhishifenzi zhengce tiaozheng

##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adjustment of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政策所作的调整。1956年1月14日，为迎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会上，周恩来全面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然而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科研、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资产阶级”帽子，沉重地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为了克服这些领域的混乱现象，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起草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起草和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些条例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改善了中共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在1962年3月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陈毅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中共中央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以下两方面采取了措施：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知

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的一些“左”倾观点、错误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强调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许多成果被否定,原先制定的政策和条例被搁置。

zhishi qingnian shangshan xiexiang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ducated urban youth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mountain areas) 50年代中期

至80年代初,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和边疆落户参加农业劳动的潮流。知识青年,一般指城镇中学毕业生,也包括少数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中国独特的就业安排道路,也是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1962~1980年,共有1791.98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边疆,对中国城镇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又长久的影响。

过程 20多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3年至1961年。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提出组织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意见,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此揭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但这一阶段尚处于倡导和试点过程,主要是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安排知识青年回乡或下乡,重点是动员农村籍毕业生回乡生产。“一五”计划期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家也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有将近1.5万人。

第二阶段是1962年至1966年。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城镇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都发生了困难。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建设的决定,成为第一个指导上山下乡的文件。1962年至1966年,全国共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安置方式主要是个人安插到生产队落户,称为插队。经济形势好转后,上山下乡仍被作为缩小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长远事业进行下去。

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头3年,大学、中专停止招生,经济停滞倒退使企业基本不招工。积压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累计400万人(称为“老三届”),成为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毕业的学生又被称为应当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必须参加体力劳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立即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热潮,毕业生几乎是整班、整年级地安排下去。1969年共有267万人到农村,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多的一年。安置方式主要有插队(包括集体和单独落户)、到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及“五七干校”。陕西、山西、安徽等地区及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地方。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一项固定制度,每年都进行计划安排。从1967年到1976年,共有164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占20多年来上山下乡总数的92.3%。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特点是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气氛和压力,成为一场运动,被宣传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思想改造”和“屯垦戍边”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当做判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缓解就业压力的考虑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被提及。上山下乡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

第四阶段是1977年至198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被否定,使国家和人民能够公开地正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种种弊病。1978年3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办法。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1977年起,被安排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虽然还有24万人下乡,但前期下乡知识青年的90%以上,已经通过学校招生、参军、招工、照顾疾病困难等途径离开了农村。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经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发出文件明确指示今后安排毕业生能够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实际上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评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殊的、复杂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因而其性质也是复杂的。

广大知识青年来到农村、边疆,用自己的宝贵年华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农村做出了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起到了传播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且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正如胡耀邦在1979年所指出: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大批的知识青年失去继续升学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断层,使“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少培养100多万大专业毕业生和200万以上的中专毕业生。另一方面,在上山下乡高潮阶段,由于缺乏系统、具体的安排,在农村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地方本来人多地少,经济不发达,缺少接受知识青年的经济环境,致使知识青年长年劳动后仍然生活困难,甚至不能解决口粮,社队和农场也亏损严重,加重了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的负担,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批资金来补贴。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并不适于大批人口垦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把知识青年集中在一起,以致长年亏损,改造自然也见效甚小,“文化大革命”后不得不予以解散。据统计,不包括木材、建房等物资及各企业提供资金,1962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付知识青年经费多达75.4亿元,大多数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平均每人450元以上。还有的地方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知识青年照顾管理不善,甚至因坏人掌权,发生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对福建一个小学教员反映这些问题的来信作出复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订一些政策和规划。周恩来就云南发生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多次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国家经济状况未能改善,上山下乡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路越走越窄。直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

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开辟多种形式的就业渠道,上山下乡的产生原因和带来的弊病才得到根本消除。

#### 推荐书目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1996。

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

zhiliang wanlixing huodong

### “质量万里行”活动 (“Long March for Quality” campaign)

中国新闻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1992年2月,由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发起,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首都46家新闻单位共同主办。其主旨是配合“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总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质量问题大检阅。这次活动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的重视和支持。他对活动方案作了批示,建议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为主;严格防止向企业摊派活动经费,由财政部补助30万元作为专项活动经费。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参加了这次“质量万里行活动”的系列新闻宣传活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担任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艾丰担任组委会主任。活动在全国范围展开,首都各新闻单位派出的记者主要分为4路,分别从华南、华东、西南和东北基层采访报道开始,最后汇集北京,进行集中报道。这次活动对企业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性报道,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那些家用电器、燃气热水器等不合格产品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引起各方面极大的震惊。

质量万里行活动以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而声震全国,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和消费者质量意识的提高,也使得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增强。国务院领导对该活动在群众中的反映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1993年以后,配合“3.15”消费者权益日,质量万里行活动每年集中进行数月,坚持“打假树优,两翼推进”的策略,既打击了假冒伪劣产品制造者的猖獗活动,又惊醒了质量意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名牌产品,保护名牌企业,促进

国产品质量提高的作用。

Zhi Huai Gongcheng

### 治淮工程 (projec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uaihe River)

综合治理淮河水系的各项水利工程的总称。淮河流域由淮河与沂沭泗河两大水系组成,流域面积27万平方千米,跨越豫、皖、苏、鲁四省。淮河流域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又长期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水系混乱,河道不畅,容易出现洪涝旱灾。1921年、1931年、1954年曾3次发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1950年,政府决定治理淮河,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开始大规模治理淮河。到1954年第一次治淮工程基本完工。淮河经过这次系统治理,不但免除了水灾的经常威胁,而且初步开发了水利。梅山、佛子岭、南湾、薄山、白沙、板桥等大型水库在蓄水、养殖、灌溉、航运、发电、生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仅苏北灌溉总渠一项工程就增加了2500万亩旱涝保收田。淮河航运也有了一定发展。这次治淮成功,为淮河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初步保障,也为日后全国各地的水灾治理和水利开发提供了经验。1991年江淮大水后,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规划治淮工程包括:淮河干流上中游河道整治及堤防加固;行蓄洪区安全建设;怀洪新河;入江水道巩固;分淮入沂续建;洪泽湖大堤加固;大型水库复建新建;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大型水库防汛加固;入海水道;汾泉河治理;包淝河治理;涡河近期治理;奎濉河治理;洪汝河治理;湖洼地区及支流治理;临淮岗控制工程和沙颍河工程等。该工程于1991年9月正式开工。这些工程完成后,将提高流域防洪标准,改善航运条件,提高提水保证率。

Zhong-A guanxi polie

### 中阿关系破裂 (break between China and Albania)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两党之间原来长期存在的友好关系在70年代完全破裂。自中国1972年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阿尔巴尼亚开始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影射和攻击。1975年,当中国不能完全满足阿方过高的援助要求时,中阿关系恶化。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奉行反华的方针。在1976年11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领导人将中阿分歧公诸于众。1978年6月,中国外交部照会阿驻华大使馆,

建议通过交换意见,解决两国的分歧,阿方竟拒绝接收照会,关闭了协商解决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978年7月通知阿方,终止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接回在阿工作的中国专家。1979年,阿尔巴尼亚中断同中国的一切往来,仅保留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至此,中阿关系完全破裂。1983年,中阿关系得到改善,1985年恢复正常。

Zhong-Fa jianjiao

### 中法建交 (establishment of Sino-French diplomatic relations)

1964年1月27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建交过程 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当选法国总统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法国有人希望中国先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中国方面表示,中法建交可以等待。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为中法建交扫清了障碍。

1963年10月,戴高乐派遣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到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两国关系。富尔表示,戴高乐认为像中法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因而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周恩来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共同点,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富尔同意这一看法。在建交的具体做法上,富尔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周恩来指出,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那会引导到“两个中国”的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集团和法国互设有使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这不是个大问题。富尔肯定法国的属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考虑到同法国建交对改善同西欧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富尔回国后,向戴高乐汇报了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不久,戴高乐派出代表到

瑞士同中国代表就建交事宜进行谈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同年1月28日，根据中法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撤走其驻法国的所谓“大使”。随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到达巴黎。

**意义** 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这对打破美国对华孤立和封锁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为中国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积累了经验，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 推荐书目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 Zhonggong Bada Erci Huiyi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Second Sess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全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977人，列席代表共387人。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并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通过邓小平所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谭震林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确定了其基本点，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会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强调建设速度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央主席毛泽东多次讲话，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大会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

“马鞍形”，并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和“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大会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大大超过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大会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上，一些省、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被宣布为所谓“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大会增选25人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各个领域全面发动起来。

### Zhonggong Bajie Jiuzhong Quanhui

####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Ni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富春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问题及发生的原因后，提出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报告强调，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转折点。

### Zhonggong Bajie Kuoda de Shi'erzhong Quanhui

####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Twelfth Plenary Session [expanded]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为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作各项具体准备而召开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全会应出席的87名（不含去世的10名）八届中央委员，到会的仅40人；有半数以上（占52.7%）的人因遭诬陷，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原98名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到会的仅为19人，将10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使中央委员到会名额达到50人，勉强过半数。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占与会人员总数的55%以上。

毛泽东主持全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要求全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全会期间，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发言中借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对所谓“二月逆流”横加批判，诬蔑和围攻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时，会议还攻击所谓“杨余傅事件”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是“一贯右倾”。林彪在会上发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提出：“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还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义，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题，是通过决议，批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供的充斥着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会议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对他作出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全部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完全是错误的，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一起最大冤案。

全会通过的公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还对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全面肯定，同时称赞实际为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



东发表讲话，提出九大应该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制止了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Zhonggong Bajie Liuzhong Quanhui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决议特别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决议还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降低了原定的基本建设投资 and 钢产量指标，其他指标仍大体维持原定计划。全会还决定同意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全会在此前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基础上，取得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最初成果。

Zhonggong Bajie Qizhong Quanhui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S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肯定此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再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其他过高的指标未作改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了

长篇讲话，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讲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等问题；强调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全会还通过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的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

Zhonggong Ba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为总结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解决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而召开的全体会议。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共416人参加了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前一段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对今后的任务作了布置。报告要求整风运动按照4个阶段进行：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会议确定整风运动要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扩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并决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重点的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会议还听取了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请大家讨论。在小组讨论中，一些人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有一些同志则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意见，肯定了后一种意见。10月7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八大文件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

决，并不是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10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阶级斗争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但毛泽东的新论断为全会所接受，从而导致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

zhonggong Bajie Shiyizhong Quanhui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El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全会。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46人列席了会议。全会原定会期为5天，议程有4项：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通过会议公报，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但是会议开始后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8月1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主要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过程中不断插话，严厉批评刘少奇及其派工作组的“错误”，使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同日，会议印发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复信。毛泽东认为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地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从派工作组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

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大字报还针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此后，全会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同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讲话，提出“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他的讲话向全会作了传达。

8月12日，全会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此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被提及。

8月12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这回中央机构的调整，保证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实行。会后，“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在全国猛然开展起来。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 Zhonggong Bajie Shizhong Quanhui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T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共中央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初见成效的关键时刻，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中央候补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人员33人列席会议。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于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又于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为这次会议作了准备。

中共中央原定北戴河工作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和解决中南海西楼会议以

来贯彻进一步大幅度调整决策过程中提出的农村工作、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方面的问题并通过有关文件。当时就上述4个方面，曾提出45个具体问题供会议深入讨论。会议开始后不久，毛泽东认为只抓具体问题，讨论展不开。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和以后多次讲话中，他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讲得非常严重，并严厉指责西楼会议以来对严峻困难形势的冷静估计是鼓黑暗之劲，刮“黑暗风”，指责当时党内邓子恢等人对各地“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刮“单干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由此，北戴河工作会议主题转向讨论阶级斗争并大批所谓“黑暗风”和“单干风”，中共中央并于8月中旬正式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在随后召开的十中全会预备会上，除继续上述批判外，又就彭德怀给中央写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以及小说《刘志丹》等问题，开展了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写申诉信是配合国际上帝修反反华，利用国内暂时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断言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支持《刘志丹》写作的原陕北根据地负责人习仲勋、贾拓夫等打成“反党集团”。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论述。陈伯达、李先念、薄一波和李富春先后作有关农业、商业、工业和计划等方面问题的说明。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和会议公报等文件。会议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各21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黄克诚、谭政书记处书记职务。会议决定组织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所谓“反党”问题进行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强调当时全党全国的迫切任务是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并据此对农业、工业、商业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无疑对继续推进全面调整有积极意义。但全会肯定并接受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理论。由毛泽东修改的全会公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

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这就发展了毛泽东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并为尔后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

### Zhonggong Jiujie Erzhong Quanhui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原定议程为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问题。

8月23日下午全会正式开幕。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后，林彪首先发表讲话。他“大赞大颂”毛泽东的个人地位，间接表达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鼓吹“天才论”，并批评有人讲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

8月24日，全会又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当天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各组发言，宣讲事先搜集的关于“称天才”的领袖语录，同时，集中攻击“有人”（指张春桥等人）反对写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的“三个副词”（即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见，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与会者也发言附和。

25日上午，载有陈伯达等人态度激烈的发言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后，立即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有的组也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揪人，气氛十分紧张。在巨大的压力下，江青、张春桥等到毛泽东那里反映会议的情况和六号简报引起的反响。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等人不顾他的一再反对，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当天下午，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曾多次明确表态，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坚决表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的态度和措施，扭转

了会议前期受林彪等人操纵的形势。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评。

9月6日上午，全会回到原定的议程，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下午，全会闭幕。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党内外团结等问题讲了话。会上，宣布了中央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九届二中全会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以及“三个副词”的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表面上是陈伯达、吴法宪出面与张春桥等人的斗争，实际上，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大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这场斗争实际上已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gong Qijie Erzhong Quanhui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于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12人。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向全会作了报告，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并向全党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决议》。

全会肯定了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明确规定禁止给中共领导人祝寿，禁止用中共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报告，着重指出了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为党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

Zhonggong Qijie Liuzhong Quanhui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为进一步批判所谓右倾保守，促使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更快发展而召开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有关负责同志等388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的重点是彻底地扫除党内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保守观点，以使党有可能在今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目标。

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80人作了发言，还有167人作了书面发言。发言大都根据毛泽东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和《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集中地批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在会上，刘少奇、邓子恢等就过去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估计不足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

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将党内关于合作化问题的辩论实质，归结为是“关于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辩论，并要求把这场辩论扩大为“全党性的大辩论”。

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全会同意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基本通过了试行中经过多次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七届六中全会对所谓右倾保守的批判，不仅损害了党内民主、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而且助长了党内业已存在的“左”倾思潮，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原来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方针，也离开了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所作的若干正确的论述和部署。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超常发展的阶段。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

Zhonggong Qi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委、若干主要省市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共105人。

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提出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创造3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并提出为此必须做好的8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同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

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针对党内有些同志误以为当前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讲话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会议期间，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另外还有3个专题报告：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几个大行政区的负责人也发了言。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共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

Zhonggong Shi'erjie Liuzhong Quanhui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而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前举行了5天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26人；列席会议的有中顾委委员161人，中纪委委员122人，有关负责同志25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了这次会议。

全会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全党同志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

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会认为，这个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他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三大。

Zhonggong Shi'er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举行了6天预备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地方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共297人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叶剑英因病未出席。

全会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前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改革是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全会一致通过于1985年9月召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Zhonggong Shi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enth Central Committee) 中共中央为召开党的十一大做准备而举行的全体会议，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是: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讨论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基本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3个文件: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但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的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倡导,有效地抵制和削弱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 Zhonggong Shisanjie Qizhong Quanhui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 (S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规划蓝图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1人,候补中央委员107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6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7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78人。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提出了1991年至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12条原则。①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

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②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③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④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⑤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⑨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⑩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⑪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⑫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12条原则,有些是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充实了新的内容;有些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凝结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12条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全会认为,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

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全会指出:从1991年到2000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基本要求一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不变价格计算,使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二是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三是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下个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四是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全会提出,今后十年和“八五”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加工业;加强教育和科技事业。

江泽民在全会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作好。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编辑组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7。

### Zhonggong Shisanjie Sizhong Quanhui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为解决组织问题,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而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

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84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68 人，有关方面负责人 29 人。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19 日至 21 日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了这场风波的性质，批评了赵紫阳的错误，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对部分领导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强调，要继续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说：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

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编辑组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7。

Zhonggong Shisi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93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是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并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82 人、候补中央委员 128 人，有关负责人 54 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江泽民作重要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当前要紧紧抓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财税、计划、投资、外贸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制定具体方案，采取实际步骤，取得新的突破。《决定》指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们在 90 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Zhonggong Shiwujie Erzhong Quanhui  
**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98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行。是中国共产党为九届人大的人事调整和机构改革作准备的重要会议。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92 人，候补中央委员 149 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经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决定将上述两个名单分别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全会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继续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团结社会各界群众中的重要作用。

全会强调，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搞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全会认为，面对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国内的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要全党同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

基本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突出问题，就一定能够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全会指出，实现今年的各项任务和十五大制定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关键在于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要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Zhonggong Shiwu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而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185人，中央候补委员148人。中纪委常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全会高度评价农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创造的丰富经验，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大变化。这场伟大变革带动和促进了国家的全面改革，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村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牢牢掌握邓小平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总体部署，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

必须坚持的方针。全会强调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一切政策都要有利于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依靠农民运用现代科技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要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

全会认为，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这项工作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并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全会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贯彻十五大精神，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部署，特别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是正确的和富有成效的。全会高度评价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军民团结奋战所取得的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gong Shiyijie Liuzhong Quanhui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国共产党认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正确总结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一次中央全会。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会议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总结和评价。《决议》认为：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议》作出了判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还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且指出，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概述了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内容，指明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指出对毛泽东思想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决议》指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华国锋的功过作出了评价。《决议》肯定了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gong Shiyijie Sanzhong Quanhui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中央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共290人,其中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会前,召开了为期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11.10~12.15),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华国锋在三中全会的开幕会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

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成果和决定为:①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③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最重要的成果。④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指出当前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⑤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会议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⑥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建国以来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强调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⑦全会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⑧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提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并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⑨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提出了一系列当前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全会通过的经过重大修改的农业决议,虽然还有“左”的思想的遗留,甚至还写上了“不许包产到户”,但是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是搞活经济,是公报所说的对于几亿农民“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为了保障党的工作中心转移这一根本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纪委常委和委员100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全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 推荐书目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1998年10月),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gong Shiyijie Wuzhong Quanhui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后,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全体会议。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各地方、各部门的负责人3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成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题。2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达全会的决议，消除过去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中共中央党校**（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的简称，是培养党和国家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学校。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的文件中就提出如何通过办学形式培养党的干部的设想。中共北方局曾创办了党校。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苏区中央局也设立了党校。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中共中央局也成立了党校。1933年3月13日，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创办于江西瑞金，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改称中央党校。1937年2月迁入延安。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1955年改称中央高级党校，1977年复校后定名中共中央党校。现任校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中央党校从建校起，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央党校在办学方针、办学规模、教学体系、科研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化，并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党校工作条例继续发展，全国各级党校事业蒸蒸日上。

Zhonggong Zhongyang Gongzuo Hui-yi 1964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4）**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64）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主管计划、工业、农业、财贸工作的书记以及天津、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共236人。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初步设想、工交系统政治工作条例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问题、财贸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防修反修、培养接班人等问题。谭震林、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在会上分别就上述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作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肯定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把过去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这是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进展。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他还从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把全国划分一二三线，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会议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防修反修问题。毛泽东作出我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据此，会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社教运动要分期分批搞四五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前，不要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会议还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决定印发试行。这次会后，城乡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问题，阐述了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他还肯定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意见。

Zhonggong Zhongyang Gongzuo Hui-yi 1978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78）

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工作会议。在党内外普遍要求拨乱反正、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召开。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在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宣布会议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指出，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他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比较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①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案问题。②在“文化大革命”中错划为叛徒的一批干部的问题。③陶铸、王鹤寿的冤案问题。④彭德怀的问题。⑤天安门事件问题。⑥康生罪行问题。陈云的发言冲破了华国锋对会议原定的框框，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拥护和响应，引发了各组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华国锋原来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冤案的平反决

定。其中包括：①天安门事件等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见天安门事件平反）。②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是一起重大错案，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③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④彭德怀曾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⑤陶铸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将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⑥把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⑦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⑧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在12月14日印发的华国锋这次讲话的修订稿中，增加了“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中央在1975年到1976年连续下发的12个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的内容。

会议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进行了热烈讨论。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在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时，与会者揭露和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某些“左”倾错误，对这两个文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关于发展农业方针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不少人赞成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方针：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益、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时对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也提出了批评。陈云在发言中还提醒大家：

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对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根据这些意见，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使两年来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倾向开始得到制止。

在讨论李先念的国务院务虚会讲话时，很多人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不少人提议，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

会议还讨论了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提出应当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的建设；尽快制定各种法律，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落实。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着重讲了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意见，提出人大常委会要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职责。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对半年内在党内外热烈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并从四个方面深刻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意义。①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②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

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③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更是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需要。④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对我国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关心发扬经济民主，强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创造精神。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打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做准备的会议。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1998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Zhonggong Zhongyang Guwen Weiyuanhui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PC)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十二大开始设立。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中央一级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这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

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在完成新老交替任务后,将不再设立。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号召全党向老同志学习,把老一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至此,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Jianchi he Wanshan Zhongguo Gongchandang Lingdao de Duodang Hezuo he Zhengzhi Xieshang Zhidu de Yijian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Opin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bout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89年12月制定,1990年2月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89年初,邓小平提议要专门拟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共中央在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此《意见》,由前言和正文一至五章共24条组成。

《意见》前言阐明了中国多党合作的

一系列重要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意见》正文分五章,分别就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意见》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意见》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的纲领性文件和共同行动准则。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Wuchanjiuji Wenhua dageming de Jueding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ecision on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决定,简称“十六条”,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作出一个正式决定。从7月起,陈伯达等人开始起草《决定》稿,毛泽东做了多次修改和补充。根据周恩来、陶铸等人的意见,删去了“黑帮”、“黑线”的提法,写进了“抓革命,促生产”等内容。《决定》共16条:①“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②“主流和曲折”;③“‘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④“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⑤“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⑦“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⑧“干部问题”;⑨“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⑩“教学改革”;⑪“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⑫“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⑬“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⑭“抓革命,促生产”;⑮“部队”;⑯“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这个《决定》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文艺和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肯定“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是“勇敢的闯将”;强调发动的方法是“自己解放自己”,开展“四大”;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文革小组”等。《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正式开展。《决定》中也有一些在当时起到限制性作用的规定,如指出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报刊上点名要经过批准,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但是,《决定》的主导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号召斗争党和国家各级权力机构的“走资派”,“自己解放自己”,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动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决定》的许多规定很快就被突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正起指导作用的是“五一六通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Zhonggong Zhongyang Jilü Jiancha weiyuanhui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PC)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由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决定，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和  
要求，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成立中共中央和  
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  
监察机关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文化大革命”期间，  
纪律检查机构被取消。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恢复了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的内容。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各级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党内法规，协助党的委员会  
加强党风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  
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报上级党的  
委员会批准。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产生。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  
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纪律检查组组长或纪律检查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  
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他们的工作必须受到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支持。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发现中央委员会成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检举，  
中央委员会应即受理。

Zhonggong Zhongyang Jiancha Weiyuanhui

###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Centr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of the CPC)

中国共产党内监督党员有无违反党的纲领、纪律与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并执行纪律的最高职能机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决议案，较具体地对监察机构的设置及纪律处分做出规定，但监察委员会当时并未真正开展工作。中共六大、七大

均未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1955年3月，鉴于党内部分党员蜕化变质，违纪现象不断滋生等情况，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和县、自治县、市委员会都设立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批准。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监察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各级监察委员会分别在其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监察下级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察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下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向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并且忠实地报告党员违反纪律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各级监察委员会遭受严重破坏，以至在1969年被撤销。

Zhonggong Zhongyang Junshi Weiyuanhui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PC)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构，简称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10月，初名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曾先后易名为：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军事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1949年初，改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1954年9月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先后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重新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先后任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主席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产生。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再次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继续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

Zhonggong Zhongyang Junwei Kuoda Huiyi

###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Expanded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CPC)

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的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参加会议的除军队的93名高级将领外，还有被邀请的国务院若干部门负责人。会议由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主题报告。

彭德怀在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战略方针问题。他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要不断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局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决的企图，迫使敌人进行持久作战，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会议还就贯彻战略方针应采取的作战形式、军队员额、作战指导上的要求作出规定，对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等作了具体部署。1956年3月23日，中央军委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全军贯彻执行。

Zhonggong Zhongyang Shujichu

### 中共中央书记处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早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就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此后，在中共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均有设立中央书记处的规定，其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党章，却取消了这一规定。直到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才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又作出新的规定，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将“中央书记

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一句，改为：“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十四大、十五大继续沿用这一规定，未作改动。

### Zhonggong Zhongyang Weiyuanhui 中共中央委员会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简称。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五大以前，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大开始使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名称。中共十二大前历届党章，对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数额、任期、职权等的规定有所不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地改变。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党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现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领导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对此规定未作实质性改动。

### Zhonggong Zhongyang Zhengzhiju 中共中央政治局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中共五大开始设立，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并选正式中央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大以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均有设立中央政治局的条文。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

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五大开始设立，当时规定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实质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对此均未改动。

### Zhonggong Zhongyang Zhengzhiju Kuoda Huiyi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Expanded Conference of the CPC Politburea)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与会者共76人，其中包括陈伯达负责的“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当时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揭发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会议召开前，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先后被加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篡军反党”、“修正主义”等罪名，受到诬陷、批判。这次会上，林彪毫无根据地提出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5月16日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同年2月彭真主持拟定的“二月提纲”作了全面批判。《通知》不顾事实地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通知》中写进了一段话，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罗列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的讲话对会议和会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见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其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实际上只接受毛泽东一人领导，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 Zhonggong Zhongyang Zhengzhiju Quanguo Gongzuo Huiyi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 (National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PC Politbureau)

中共中央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先后由刘少奇、毛泽东主持。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制定相关的文件。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有关方面负责人228人。

会议初期，由刘少奇讲话提出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有关问题，各中央局书记在大会汇报社教运动情况，同时草拟会议文件。但在深入讨论中，领导人在当前运动主要矛盾、社教运动性质以及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刘少奇在讨论时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

“四不清”的矛盾，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不是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下旬，会议形成一个“讨论纪要”，共17条，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批示下发。由于讨论中仍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乃于12月底、1月初又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提法，并严厉指责前段运动搞扎根串连等做法。于是，“十七条”停发，由毛泽东主持对其作重大修改，扩充为“二十三条”，把批评刘少奇的话都写入文件，于1月14日正式发出。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实际是指责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工作的不满。“二十三条”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尽快地解脱他们；提出运动要逐步做到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搞“人海战术”；还提出“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这些规定有利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运动中的若干错误做法，起了积极作用。但“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发展了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理论，不但片面地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把它上升为是十几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而且它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理论的重大升级。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Zhongguo Baoxian Jiandu Guanli Weiyuanhui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China Supervisory and Control Commission for the Insurance Services) 1998年11月1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保险市场。主要任务是：拟定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划，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秩序，培育和发展保险

市场，完善保险市场体系；推进保险改革，促进保险企业公平竞争；建立保险业风险的评价和预警系统交流，防范和化解保险行业风险，促进保险企业稳健经营和业务的健康发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商业保险的监管趋于成熟和专业化，对中国保险业的深入发展，以及与国际保险市场接轨，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Zhongguo canjia Rineiwa Huiyi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China's presence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老挝、英国、美国、苏联以及越南南北双方。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关于朝鲜问题，因为与会各国间存在严重分歧，未能达成协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中国代表团于5月27日首先就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提出了6点建议，6月16日又针对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提出6点建议。中国的建议受到了与会国家的好评，美国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值得考虑。与此同时，中国反复对英、法两国进行说理，晓以利害。周恩来于7月3日从日内瓦飞往中国广西的柳州，同在那里休假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及赶到那里的越南领导人武元甲、黄文欢进行了8次会谈。最后使法、越双方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7月20日，除美国以外，所有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就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达成3个军事协定、6个单方面声明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次日，公布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协定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协定强调了尊重和维护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驻在三国境内的所有外国军队一律撤出。7月22日，印度支那交战各方下令停火，从而印度支那问题初步得以解决。

Zhongguo Chukou Shangpin Jiaoyihui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China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始于50年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方式。50年代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期，随着外交局面的展开，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

中国家，对台、港、澳地区的贸易也有所扩大。于是，把全国各专业外贸公司组织起来，集中各地的商品，举办大型的、综合的、以销为主的交易会，使海外客商以较少的费用和时间，选购所需商品的方式应运而生。最早的一次是1956年11月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7年春季，广州正式举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以后，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行一次。1984年，由于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等原因而停办，至此共举办了64届。

30多年中，广交会展销的商品由1万多种增加到5万多种。业务范围从单一的商品贸易逐步扩大到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外合资经营项目，国际信托投资，技术出口，远洋运输，国际金融、保险，商品检验，广告，咨询等。成交额由首届的1800万美元增至第64届的54.24亿美元，累计成交额为87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出口现汇贸易累计成交总额的25%左右。几十年来，广交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地区性的国际市场。为了表彰广交会在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984年4月，广交会获联合国授予“国际墨丘利和平金奖”。

Zhongguo Dabaike Quanshu  
**《中国大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China*)

中国第一部大型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是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和知识门类，计74卷(含索引卷1卷)，共收条目77 859个，图片49 765幅(含彩图15 103幅)，总字数达12 568万字。1978年启动，1993年出齐，历时15年。

百科全书是知识的总汇，是扼要概述人类的知识和历史，并着重反映现代科学文化成就的工具书。它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化积累的重要手段。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和“平面的图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以学科或知识门类设卷。每卷以概观性文章为先导，概括地叙述学科的理论、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随之之后的学科分类目录，准确地反映了每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以及条目的层次关系。《全书》中所设立的概观性文章和学科分类目录已成为不同于世界各国百科全书的一大特点。《全书》正文部分全部由条目组成，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

列。《全书》利用参见系统，将学科知识体系中相关的条目或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纵向和横向的知识层面。

《全书》有以下特色。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全书》的编纂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国情赋予它重要的历史职责，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科学、文化、政治、道德素质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②实事求是。是《全书》的精髓。条目内容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合乎实际，恰如其分。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③涵盖世界，侧重中国。《全书》在介绍人类全部知识的同时，注重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当代的成就等方面的知识，并设有8卷专门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戏曲和传统医学等。④建有完备的检索系统。《全书》设计了一套科学的检索系统，给读者提供查找知识的钥匙。检索系统除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外，还有条目分类目录、彩图目录、条目汉字笔画索引、条目外文索引、内容索引（包括隐含主题）、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大事年表。条目内还设参见和参考书目。

#### Zhongguo de Guofang

#### 《中国的国防》 (National Defense of China)

1998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主要内容有：①国际安全形势。②国防政策。③国防建设，包括国防体制；军事法制建设；国防费；裁减军队员额；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驻军香港。④国际安全合作，包括对外军事交往；建立信任措施；地区安全合作；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⑤军控与裁军，包括核武器问题；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问题；外空非武器化问题；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敏感物资和军事装备出口控制。白皮书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需要并十分珍惜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白皮书还以大量事实向世界公众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坚定力量。

#### Zhongguo de Renquan Zhuangkuang 《中国的人权状况》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199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①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②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③公民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④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⑤劳动权利的保障。⑥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⑦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⑧计划生育与人权保护。⑨残疾人的人权保障。⑩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白皮书以大量事实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阐述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指出，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没有人权可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具有广泛性、公平性、真实性三个显著特点。国家为人权的实现，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人权问题虽有国际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脱离该国的历史和国情。中国主张的人权，不只是生存权和公民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为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充分人权，中国人民和政府仍在做着长期不懈的努力。白皮书还强调，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与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 Zhongguo de Zongjiao Xinyang Ziyou Zhuangkuang

####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in China)

1997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主要内容：①中国的宗教现状。②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③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行政保障和监督。④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的支持。⑤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白皮书指出，中国是个多宗教国家，中国公民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与此同时，公民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政府倡导宗教要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相适应，要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尊重国际社会在宗教信仰领域公认的原则。坚决反对利用宗教来分裂人民、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利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白皮书列举大量事实向国内国际社会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 Zhongguo Ershiyi Shiji Yicheng

####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Agenda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又称《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是和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相呼应的文件。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在环境与发展合作方面达成全球共识。《二十一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以确保议程得以实施。中国政府认真履行联合国会议决议，不久就由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部署，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并于1994年3月25日在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白皮书共分20章。广泛吸纳、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组织进行和将要实施的各类计划，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三大特点。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第二部分涉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内容。第三部分涉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白皮书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战略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政策和措施方案。这份白皮书将成为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并在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的制定中作为重要目标和内容，得到具体体现。白皮书的发布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认真履行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实际行动和原则立场。

#### Zhongguo Funü de Xianzhuang

#### 《中国妇女的现状》 (Situ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9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

皮书。这份白皮书是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5 年在中国北京召开，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妇女状况而发布的。白皮书有八章。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妇女的历史性解放。②平等的法律地位。③在经济领域中的平等权利与重要作用。④广泛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⑤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充分发展。⑥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地位。⑦中国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⑧积极参与国际妇女活动。白皮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占全世界妇女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并向国际社会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妇女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和立场，表示愿为推动世界各国妇女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动全世界妇女的进步而努力。

### Zhongguo Geming Bowuguan

#### 中国革命博物馆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国家近现代革命史博物馆。1959 年 9 月建成，1961 年 7 月开放。前身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0 年 3 月先在北京市北海团城，后迁故宫武英殿。1959 年 9 月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现址。馆藏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物 12 万余件，历史照片 10 万余张，各种图书、报刊 24 万余册。藏品中较多的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老革命家早期活动的文物资料，革命烈士的遗书遗物，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献、报刊、手稿、实物。

基本陈列为《中国革命史陈列》。陈列面积 4000 平方米。展品 4500 余件。展示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

陈列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工业的产生，边疆危机、民族危机加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捍卫共和国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土地革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全民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战争，民主革命的胜利共 10 个单元。展出虎门炮台抗英大炮，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挥旗、武器、战利品，太平天国武器、工商执照、结婚证书，义和团传单和武器、旗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手书的誓词，清末皇帝宣告下台的诏书等。还有五四运动的照片和传单，新民学会、觉悟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早期革命社团的活动照片和出版

物，五卅惨案的资料，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上海总工会时的会议记录，各地农民运动的文物，四一二政变时广州街头的反共标语，杀害李大钊用的绞刑架，一二九运动照片，西安事变的资料，以及抗日战争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照片、战利品和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签到本、投票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 Zhongguo Gongchengyuan

#### 中国工程院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中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1982 年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师昌绪 4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1992 年 4 月，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 6 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1994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工程院。以宋健为首的 45 位工程技术专家组成了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1994 年 6 月 3 日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中国工程院的职能和任务是：团结全国工程技术界，推动工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工程技术队伍建设，激励优秀人才成长；接受政府委托，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决策、发展规划、计划、方案及其实施提供咨询；研究、讨论重要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目标，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对工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出报告和建议；组织开展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代表中国工程技术界，参加对口的国际组织和有关国际学术活动。根据工程技术的类别，下设机械和运载工程学部，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院士按其专业，参加一个学部的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现有院士 437 名，分布在机械、电子、航空、航天、能源、纺织、轻工等领域。院士大会是院最高权力机关，每两年举行一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的院主席团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日常工作。第一任院长为朱光亚，现任院长为宋健。

对中国工程技术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声誉的外国学者，可被提名并当选为外籍院士。外籍院士如取得中国国籍，可转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Zhongguo Gongchandang

#### 中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创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执政党。

**创建和发展** 1919 年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从 1920 年 8 月起，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和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侨民中，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有关建党问题的讨论，使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21 年 7 月，各地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 13 名代表于 23 日至 31 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探索，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独特革命道路，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到 1956 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随后领导全国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指导思想发生失误，后来犯了反右派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等“左”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随后，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率领全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正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性质和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表明立党的基本性质和奋斗目标，并陆续发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用以号召群众，集合队伍，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的运用和发展，是对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性继承，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组织制度** 党的组织制度是以党规党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是发挥党的战斗力和实现党的任务的组织保证。党的组织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核心内容，按照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章程而制定的一系列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组织规程。党的组织制度包括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制和任期制，中央领导机构间报告工作制，党委的集体领导和表决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干部管理制度，党员管理制度及缴纳党费制度，党内状况调查统计制度，党的工作检查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向

上级请示报告制度，向党员及代表报告工作制度，表决制度等。

①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制和任期制。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条件许可时，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实行选举制。只有在秘密工作和战争条件下，或其他特殊条件下，党的领导机构才采取委任制，由上级党组织指定人选组成。各级党的组织在一般条件下都要按党章规定的期限，举行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选举人有了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实行差额选举。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作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党的领导机构实行任期制。每届领导机构有一定的任期，任期届满，要重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改选。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了各级党的委员会任期时间，任期制可以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成员得以进行合理的更换，启用后起之秀，使领导机构保持取之不竭的活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产生的，还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②党的各级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表决制。党的各级委员会凡属决策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如对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双方人数接近，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多数意见执行外，应当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下次再表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将争论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请求裁决。

③党的报告工作制度。报告工作体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中央专门下达指标，规定各级组织对涉及重要方针政策性问题，都要事先向上级党委请示，实在来不及事先请示的，事后一定要向上级党委报告；特别是各中央局、分局、战略地区党委、军区党委、野战军党委都要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除了规定一事一请示、一报告之外，

还规定每隔一段时间（例如两个月）向中央、向上级党委作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从中央做起，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同时地方各级党组织也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议事规则。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的下级组织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

④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底，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党的生活极不正常、组织瘫痪、思想涣散的状况，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非常强调一定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还特别强调县以上领导干部过好组织生活会，认为这对于端正思想，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增强领导核心的团结，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纠正不正之风，都能起到好的作用。并规定，县以上市委常委，除了在同级委员会参加组织生活外，还必须编入党的一个具体组织参加组织生活，而且党的各级委员会组织生活会的每次会议情况要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并使之形成制度。

⑤党的工作检查制度和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党的工作检查制度，是党的工作中的自动调节系统，它可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预想和规定的轨道运行，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这一制度，曾经采用过巡视员、调查组等做法。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教育、组织、纪律检查、群众等工作。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重视的制度，是党的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规定各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和工作日程上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纪律检查问题作出规定，明确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纪律检查机关的权限，使之制度化、法规化。

⑥党的干部管理制度。这一制度是指党在选拔干部、培养干部、使用干部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定。如干部选举和聘用制度、干部奖励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培训

制度、交流制度、任免制度等。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Sanshi Nian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Thirt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而写的一部简明党史著作。人民出版社1951年6月出第1版,11月出第2版。本书概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30年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直至打败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书共分四部分: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后在30年基本总结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没有中国共产党来担任领导,是不可能的;要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达到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可能的;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又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分不开的;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始终一贯的伟大援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本书虽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局限,但它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完整地叙述中共党史的专著,在较长时期中对中共党史教育和研究具有积极影响。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ba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确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性盛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这次大会是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1956年8月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明确提出八大议程应突出经济建设的主题,并就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领导核心的人选问题作了反复酝酿。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八大

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8月30日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出了大会的目标和宗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大会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68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45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代表们就上述主要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一些重要的被八大决议所吸纳。

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和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党的八大路线的核心。

八大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作出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决策:第一,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

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指出,在适当范围内,要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由需要者自行选购的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的思想。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决议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第五,重视执政党建设。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缺点,八大把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9月26日、27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大会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73人

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党的八大继承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并有新的成分加入，为以后的新老交替做了准备。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的思想原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做的巨大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历史证明，八大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ba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Guanyu Zhengzhi Baogao de Jueyi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Resolut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Political Report”）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这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

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正确路线的政治基础。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jiu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和浓重的备战气氛中召开的。大会代表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逐级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的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在九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了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整个会议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报告强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报告说：“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报告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九大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系统化、合法化。

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去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这个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共的组织原则，是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根本不

相容的。

大会选举产生了九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21人，候补委员4人。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

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它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九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T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这次大会提前一年召开。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800万。

大会的议程有三项：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的政治报告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报告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再次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指出，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认为林彪集团的活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所谓基本路线的正确。因此，“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报告强调：国内主要任务仍然是搞

好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运动”，“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报告没有正确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却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只能使“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破坏性后果越发严重。

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强调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报告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再次号召全党“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会通过的新党章，除了把九大党章中颂扬林彪、肯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亲密友和接班人”之类的话删掉外，基本上沿袭了九大党章的“左”倾错误内容。

8月28日，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廖承志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973年8月30日，举行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朱德、董必武、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共21人，候补委员4人。

中共十大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结成“四人帮”（见江青反革命集团）。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 er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Twel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在基本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后，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21世纪而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

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

大会的议程是：审议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阐述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他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我们要抓紧4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4件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宣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这次代

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5年间，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报告强调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说明，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大会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报告还提出，要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6日，大会通过《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胡耀邦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应当成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同日，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这个章程的决议，决定新党章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十二大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便从第一线退下来的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发挥参谋作用。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大

会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并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风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陈云也先后在大会上就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等问题发表了讲话。9月11日,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日,李先念在全体会议上致闭幕词。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候补委员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了中顾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顾委主任、副主任和常委,批准了中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和常委。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sanq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大会代表1936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特邀代表61人。这次大会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大会,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听取和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着重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

要特征就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因此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报告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报告提出了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报告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④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⑨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⑩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⑪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这个报告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理论观点是邓小平提出的或是在邓小平指导和支持下形成的。

11月1日,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和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110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9名。

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通过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候补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了中顾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顾委主任、副主任和常委人选,批准了中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人选,中顾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中纪委书记乔石。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编辑组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7。

###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s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Fou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在邓小平1992年春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为加快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举行的一次大会。大会应到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2000位代表出席了开幕式,代表着全国5100万党员。

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

江泽民代表党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14年的实践称为“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指出: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14年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报告概括和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

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报告明确提出并深入论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宏观调控上,要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报告还提出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

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89人,候补中央委员13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人。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20名: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姜春云、钱其琛、尉健行、谢非、谭绍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名:温家宝、王汉斌。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通过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为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全会批

准中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人选,尉健行为书记。中共十四大和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wu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是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的大会。大会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还有436位有关来宾列席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书面);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共十个部分:①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②过去五年的工作;③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⑤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⑧推进祖国和平统一;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⑩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近20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实践经验,指出邓小平理论

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中央建议大会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报告还明确提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报告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规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报告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我国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战略部署。指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对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与以前相比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对统一认识、促进我国经济上新台阶将产生重要作用。报告强调,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9月18日,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通过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

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大会。

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 22 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尉健行、温家宝、谢非;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曾庆红、吴仪。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名,通过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人选,尉健行为书记。

##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shiy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形势,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而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1510 名,全国当时有党员 3500 多万。

代表大会于 8 月 11 日举行预备会议,选举 223 名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任主席团秘书长。

按照预备会议确定的 3 项主要议程,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报告依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大会听取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 201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2 人。

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

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 响,这次大会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也未能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邓小平致闭幕词,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上述五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23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 3 人。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 Zhongguo Gongchandang lingdao de duodang hezuo he zhengzhi xieshang zhidu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形成历史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关系。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产生了具有民主联合政府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多党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6年,毛泽东肯定多党合作比只有一个党好,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写入八大决议,使多党合作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确定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各民

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多党合作遭到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党合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完善这一制度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82年10月,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长期存在和发展”。

**主要内容** 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 ①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 ②中国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充分发挥和加强它们的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
- ③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确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执行。
- ④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 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受宪法保护;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
- ⑥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 ⑦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帮助它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它们开展各项活动和维护合法利益,提出合理要求。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具体方式除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协商会和座谈会。在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包括经过协商联合提名代表候选人,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正副委员长(主任)中占有一定名额。双方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合作,这些机构中都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在科教文卫部门、工商企业、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中,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单位,共产党的组织都同民主党派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搞好本单位的工作。民主党派领导人还参与出国访问,进行国际友好活动。

**重要作用** 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其作用表现为:有利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好地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多方面地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总之,既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

## Zhongguo Gongchandang Quanguo Daibiao Dahui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自1921年成立至1999年,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举行过15次。

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有4项:①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②决定党纲;③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决议案;④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此后,七大、八大党章的有关规定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增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规定。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则删除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领导机关的原则,并恢复和充实了有关代表大会职权的条文,具体规定是:①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②听取和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③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④修改党的章程;⑤选举中央委员会;⑥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章还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1/3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继续十二大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同时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即: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各自总数的1/5。十四大、十五大党章继续上述规定,未作实质性改动。

## Zhongguo Gongchandang Quanguo Daibiao Huiyi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93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了会议。

胡耀邦致《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开幕词,并就这次会议主要议题的准备情况作了说明。赵紫阳作《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会前于9月16日举行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在9月22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宣读并通过了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和高尚风格。经无记名投票,新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另有27位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9月23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文件是根据党的十二



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原则，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和讨论制定出来的，着重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建议》共分7个部分：①基本指导原则和主要奋斗目标。②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主要方针。③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④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⑤经济体制和调节手段。⑥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⑦团结起来，为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在2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陈云相继发表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肯定一批老同志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的作用，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的保证。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陈云谈了6点意见：①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这样，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②抓紧抓好粮食生产。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③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这样，才能稳步前进，才是最快的速度。④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⑤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⑥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9月24日举行了十二届五中全会。按照进一步实现新老交替原则，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局部调整。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ongyang Weiyuanhui Tongzhi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No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16日通过，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的主要

内容：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二是从10个方面对“二月提纲”进行批判，提出一整套“左”的方针和理论。

《通知》提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最后警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系统化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

Zhongguo Gongchanzhuyi Qingnian tuan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简称共青团。成立于1922年5月，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元旦，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4月，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章程并选举中央委员会。1957年5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历次代表大会衔接起来，将下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定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4年6月，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共青团的任务是：把

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共青团工作被迫停止。1978年10月，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面恢复工作。1982年12月，共青团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的团章，提出共青团的主要任务是：为着四个现代化建设而英勇劳动，依据四个现代化需要而勤奋学习，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而开创新风。1998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号召共青团各级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中共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实现中共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受同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上级团组织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共产党委员会领导为主。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是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五年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再选举第一书记一人、书记若干人，组成书记处。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共青团的机关报是《中国青年报》，机关刊物是《中国青年》。

Zhongguo Guomindang Geming Weiyuanhui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KMT)

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统一事业的政党。简称民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抗日战争期间，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拥护国共合作，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抗战胜利后，民联和民促先后正式成立。1948年1月，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1948年5月，民革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民革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11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1956、1958年分别召开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于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了第五、六、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和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在协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落实政策、为四化服务、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参政议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革中央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现任主席何鲁丽。

#### Zhongguo Huanjing Baohu

#### 《中国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199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是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要文件之一。主要内容包括：①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②逐步完善法律体系与管理体制。③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④国土整治与农村环境保护。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⑥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宣传教育。⑦积极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白皮书从这7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重申了中国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将继续贯彻执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和方针政策。并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为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和共同繁荣而奋斗。

#### Zhongguo huifu zai Lianheguo de hefa quanli

####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China restores legitimate righ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历史进程**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自1950年起，美国即操纵联合国一些国家，以“中国侵略朝鲜”，应“延期审议”为名，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问题。从1961年起，美国及其盟国每年都要提出一项提案，利用它们暂时控制的多数，强行把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原来只需简单多数即可决定的程序性问题，列为必须由联合国大会2/3多数票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案”，借以进一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支持美国“重要问题案”的国家越来越少，而支持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权利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1970年，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第一次以51比49获得多数票。美国等国的阻挠即将失败。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中美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这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斗争中的力量对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1年10月18日起，联合国第26届大会开始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提案参加国也由18个增加到23个）；而美国等国的“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席位，台湾继续留在联合国内）越来越失去人心。同年10月25日，大会进行表决，面对不利形势，美国又操纵某些国家出面提议推迟表决，但这个提议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被大会拒绝。接着，表决美国等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包括台湾当局一票）、15票弃权予以否决。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而长期设置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摧毁。

当电子计票牌出现表决结果时，会议大厅沸腾起来，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许多国家的代表高声欢呼，热烈拥抱，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美国首席代表又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时删去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一节文字，当即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经过大会主

席马利克的裁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仍按原样付诸表决。接着，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实际上已不需获得2/3多数）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意义**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中国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美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排斥中国的错误政策的最终失败。1971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历届会议，并与其他会员国一道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做出了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 推荐书目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 Zhongguo Kexue Jishu Daxue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理工结合、兼有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1958年9月创办于北京，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1970年初迁至安徽省合肥市。1977年在北京成立研究生院。1978年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少年班，招收15岁以下的优秀少年提前进大学学习。

学校现有7个学院，24个系和少年班，2个公共教学部，36个本科专业，57个硕士学位授予专业，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博士学位授予专业，8个博士后流动站，28个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专业，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有数学、物理学、力学等3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4个国家和中科院重点学科，是中科院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已建成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个中科院开放研究实验室等一批重点科研机构。

学校现有教职工3360多人，其中教师1650余人，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教授36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9人），副教授825人。在校学生8000多人，其中博士生550余人，硕士生1300多人，本科生5800多人，专科生340人。此外，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学学生近4800人。本科生入学成绩和学生综合素质一直在全

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学校校园总面积 11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1 万余平方米，拥有资产总值达 2.7 亿元的先进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馆藏书 120 多万册，已建成国内高校一流水平的校园计算机网络。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共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800 多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 250 余项，获得国家级奖励 40 项，院省部级奖励 400 多项。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及被引用情况一直居国内高校前列，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全国科研业绩最佳的四所大学之一；在美国《科学》和法国《研究》杂志评出的中国 13 所杰出大学中，均名列第三，是中国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国家在大学中建设的唯一大型科学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近年来，学校又承担和参与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二期工程、HT-7U 超导托卡马克等“九五”期间国家首批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

1978 年以来，先后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签定了合作交流协议，常年有 200 多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合作研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被聘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许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被聘为兼职教授。学校先后派出教师 2000 多人次赴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访问学习及进行合作研究，许多学成回国的教师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岗位上担当了重任。

是“七五”、“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和“九五”期间国家首批批准进行“211 工程”建设的大学之一，已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基地。

### Zhongguo Kexue Jishu Xiehui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简称中国科协。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是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沿革 20 世纪初，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综合的或单科的科学技术团体。综合的科学技术团体如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单学科的团体如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1949 年 5 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共同发

起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1950 年 8 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科普），选举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著名林学家梁希为两个组织的主席，吴玉章担任了两个团体的名誉主席。1958 年 9 月 23 日，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联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批准两个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中国科协，选举了以李四光为主席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980 年 3 月中国科协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为主席的第二届全国委员会；1986 年 6 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著名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为主席的第三届全国委员会；1991 年 5 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为主席的第四届全国委员会；1996 年 5 月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为主席的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宗旨和任务** 宗旨是团结和动员科技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任务是：①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②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推广先进技术，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活动。③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国家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工作。④表彰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举荐人才。⑤开展科学论证，提出政策建议，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鉴定、咨询服务、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等任务。⑥开展民间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交往。⑦开展继续教育 and 培训工作。⑧兴办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宗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全国领导机构** 中国科协每 5 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它选举产生的全国委员会是中国科协全国领导机构，全国委员会选举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组成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下设书记处，书记处主持中国科协的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设置若干工作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协助审议有关事项。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设有 17 个专门委员会开展工作。

中国科协由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学技术协会组成。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学科组建。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市（地）、县（市）均建有科协组织。

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

类别	名称	会址	成立日期
理 科 学 会	中国数学会	北京	1935.7
	中国物理学会	北京	1932.8
	中国力学学会	北京	1957.2
	中国光学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声学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化学会	北京	1932.8
	中国天文学会	南京	1922.10
	中国气象学会	北京	1924.10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北京	1980.9
	中国地质学会	北京	1922.2
	中国地理学会	北京	1909.9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北京	1947
	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贵阳	1978.10
	中国古生物学会	南京	1929.8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青岛	1950.1
	中国海洋学会	北京	1979.7
	中国地震学会	北京	1979.11
	中国动物学会	北京	1934.8
	中国植物学会	北京	1933.8
	中国昆虫学会	北京	1944.10
	中国微生物学会	北京	1952.12
	中国生物化学会	上海	1979.5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上海	1980.7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	上海	1963.10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北京	1980.5
	中国遗传学会	北京	1978.10
	中国心理学会	北京	1921.8
	中国生态学会	北京	1979.1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北京	1979.3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北京	1983.10
	中国感光学会	北京	1981.8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	北京	1981.3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北京	1985.6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北京	1983.12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北京	1980.11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北京	1986.8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北京	1990.3	
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	北京	1988.10	
中国运筹学会	北京	1991.1	

续表

类别	名称	会址	成立日期
工 科 学 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	195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北京	1963.8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北京	1963.3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北京	1934.10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北京	1981.7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北京	1980.6
	中国水利学会	北京	1957.4
	中国内燃机学会	北京	1981.3
		上海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北京	1978.11
	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	北京	1980.6
	中国制冷学会	北京	1977.4
	中国真空学会	北京	1979.10
	中国自动化学会	北京	1961.11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北京	1979.4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北京	1978.11
	中国标准化协会	北京	1979.6
	中国工程图学学会	北京	1980.5
	中国电子学会	北京	1962.4
	中国计算机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通信学会	北京	1980.12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北京	1981.6
中国测绘学会	北京	1959.2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北京	1943.2	
中国航海学会	北京	1979.4	
中国铁道学会	北京	1979.11	
中国公路学会	北京	1978.8	
中国航空学会	北京	1964.2	
中国宇航学会	北京	1979.10	
中国兵工学会	北京	1964.4	
中国金属学会	北京	1956.11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北京	1984.12	
中国稀土学会	北京	1980.1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北京	1979.11	
中国化学学会	北京	1922.4	
中国核学会	北京	1980.2	
中国石油学会	北京	1979.4	
中国煤炭学会	北京	1979.8	
中国太阳能学会	北京	1979.9	
中国能源研究会	北京	1981.1	
中国硅酸盐学会	北京	1959.12	
中国建筑学会	北京	1953.10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北京	1953.9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北京	1930.4	
中国造纸学会	北京	1964.8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北京	1980.12	
中国印刷技术学会	北京	1980.3	
中国包装技术学会	北京	1980.12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	1985.9	
中国粮油学会	北京	1986.1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	1983.9	
中国烟草学会	北京	1985.5	
中国消防协会	北京	1984.9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北京	1982.3	

续表

类别	名称	会址	成立日期	
工 科 学 会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南京	1986.10	
	中国颗粒学会	北京	1986.11	
	中国照明学会	北京	1987.6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上海	1988.12	
	中国惯性技术学会	北京	1987.2	
	中国黄金学会	北京	1990.2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北京	1988.12	
	农 学 科 学 会	中国农学会	北京	1917.1
		中国林学会	北京	1951.2
		中国土壤学会	南京	1945.12
中国水产学会		北京	1963.12	
中国园艺学会		北京	1930	
中国畜牧兽医学学会		北京	1936.7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北京	1929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北京	1962.8	
中国作物学会		北京	1961.11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海南	1978.12	
医 科 学 会	中国蚕学会	镇江	1963.3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茶叶学会	杭州	1964.8	
	中华医学会	北京	1915.2	
	中国中医药学会	北京	1979.5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北京	1981.11	
	中国药学会	北京	1907	
	中华护理学会	北京	1909	
	中国生理学会	北京	1926.2	
	中国解剖学会	北京	1947.7	
医 科 学 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北京	1980.11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北京	1985.10	
	中国营养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药理学学会	北京	1985.3	
	中国针灸学会	北京	1979.5	
	中国防痨学会	北京	1933.11	
	中国麻风防治学会	北京	1985.8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北京	1985.3	
	中国抗癌协会	天津	1985.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北京	1980.12	
科 普 与 交 叉 学 科 学 会	中国康复医学学会	北京	1983.4	
	中国免疫学会	北京	1989.12	
	中国法医学学会	北京	1985.10	
	中国预防医学会	北京	1987.11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北京	1981.10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北京	1978.11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北京	1978.11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北京	1978.8	
	中国未来研究会	北京	1979.1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北京	1980.10	
科 普 与 交 叉 学 科 学 会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北京	1978.8	
	中国图书馆学会	北京	1979.7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北京	1984.1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北京	1982.6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	北京	1979.8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北京	1979.8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北京	1979.8	
	中国珠算学会	北京	1979.10	

续表

类别	名称	会址	成立日期
科 普 与 交 叉 学 科 学 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北京	1979.8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北京	1980.11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会	北京	1980.3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北京	1981.6
	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学会	北京	1986.7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北京	1986.10
	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	北京	1984.11
	中国流行色协会	上海	1982.2
	中国档案学会	北京	1981.11
	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	北京	1981
	中国土地学会	北京	1986.11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北京	1985.3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北京	1988.1
	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北京	1989.11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北京	1989.1

Zhongguo Kexue Jishu Zhengce Zhinan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  
(Guide to the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1986年8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白皮书。全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6篇26章：①历史性的转变。②政策与立法。③研究与开发。④技术成果商品化。⑤环境与资源。⑥统计指标。白皮书对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各项配套政策作了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论证，国家领导人的几篇重要讲话和国家有关重要文献也收录在内。其中国务院关于能源、交通运输、通信、农业、消费品工业等12个领域的技术政策要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由国家主管部门向世界公众发布白皮书，在中国也是一种尝试。

Zhongguo Kexueyuan

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它是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以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所为基础，于1949年11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由学部和一批国家科研机构两大部分构成。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1日，包括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五个学部。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将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并完善了院士制度。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

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科学院现有院士 584 名。1994 年起有外籍院士 29 名。

中国科学院有 12 个分院、21 个研究所(院)所(见表)、3 所大学和若干文献信息、图书出版、仪器研制单位及近 3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全院现有职工 6 万余人,其中科技专业人员近 5 万人。高级科技人员 1.6 万人。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 230 多人,占院士总数的 40%。中国科学院历任院长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发展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基础科学研究** 建立和发展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和技术科学等学科,形成了一支近万人的队伍,陆续成立了向国内外开放的实验室 117 个(其中 5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 个开放研究所)。建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托卡马克和激光聚变、2.16 米光学天文望远镜等大型科学装置。50 年来取得了诸如数学定理机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轻子质量精确测量等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新核素合成、超新星观测、高温超导、碳纳米管阵列、非线性光学晶体、过渡金属原子簇结构和性质以及金属有机化学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为我国信息材料、能源、资源、农业、医药、空间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形成科技战略储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 重点研究领域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科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心理学等。现有近 6000 名研究人员。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谱并进行了第 4 号染色体 DNA 测序。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动物志和孢子植物志编研,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在东亚飞蝗根治、海洋水产养殖业发展关键技术、棉属种间杂交育种体系的创立等项研究,为国家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源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有 40 个研究所,近万名科技人员。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建立了 80 多个资源、环境、生态研究领域的野外观测试验站。利用空间和航空遥感技术初步形成了资源、环境立体的多时相监测研究体系。该领域的研究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和学科较为齐全的资源、生态、环境、空间与遥感应用技术以及大农业等科学领域的综合研

究体系。几十年来,先后组织一系列陆地、海洋的综合科学考察和实验研究,取得了诸如陆相生油理论、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东亚大气环流、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综合研究、沙坡头流沙固定的原理与措施、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研究、生态系统的退化与恢复的研究等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 此方面工作涉及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光学机械、材料、能源、交通、化学工程和空间及遥感技术等领域,曾为我国计算机、原子能、激光、两弹一星等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近几年来,为了强化研究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工业配套能力,正在建设一批工程中心。“CR-01”6000 米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风云二号”地球同步气象卫星多通道扫描辐射计、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主干网、曙光 2000 型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与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共同研制的“阿尔法”磁谱仪永磁系统、超短脉冲高功率激光发展中的系列创新技术等研究成果的取得,为国家信息化建设、自动化、激光、能源等领域的科学发展打开了新的篇章。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的建立** 全院现有近 300 家科技企业,组成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中科实业集团(控股)公司、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科工贸集团、中国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投资公司、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6 个院直接投资企业,形成了许多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研究所办公司,如上海尼赛拉、成都地奥、长春热缩材料等。全院大力推进与工业部门、行业归口部门以及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还与国家经贸委、教育部联合倡导组织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已同 3000 多家企业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并积极探索同大中型企业共建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合作盘活双方的存量资源,增强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已同上海、辽宁、江苏、浙江、云南、内蒙、青海等省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 1955 年起即建立起研究生制度。累计至今已经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31 300 余名,博士研究生 12 700 余名,现有在学研究生 11 000 余名。全院现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23 个,硕士点 415 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04 个,博士点 276 个,在岗博士生导师近 2000 名。1978 年以来,共派出 14 000 多名访问学者、研究生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和访问进修,已有 8000 多人回国工作。全院与国际科技

界建立了长期、广泛的合作关系,已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科技交往,每年请进和派出科技人员约 7000 人次。已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组织签署了 70 余个院级协议,700 余个所级协议。有 200 多位科学家在各类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有 140 位外籍专家学者,在科学院、所担任名誉职务或客座教授。

1998 年 6 月,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提交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前后,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瞄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与国际科技前沿、具有强大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日期
数学研究所	北京	1952
应用数学研究所	北京	1979
力学研究所	北京	1956
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50
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73
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78
声学研究所	北京	1964
化学研究所	北京	1956
化工冶金研究所	北京	1958
感光化学研究所	北京	1975
生态环境中心	北京	1975
北京天文台	北京	1958
地理研究所	北京	1953
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66
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50
地质研究所	北京	1951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	北京	1956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957
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58
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958
遗传研究所	北京	1959
心理研究所	北京	1956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1979
动物研究所	北京	1962
植物研究所	北京	1950
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958
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	北京	1995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80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	1979
遥感卫星地面站	北京	1987

续表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日期
电子学研究所	北京	1956
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1960
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956
电工研究所	北京	1963
系统科学研究所	北京	1979
遥感应用研究所	北京	1980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975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985
软件研究所	北京	1984
微电子中心	北京	1958
低温技术实验中心	北京	1980
北京软件工程研制中心	北京	1986
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	北京	1958
上海冶金研究所	上海	1928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	1958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1964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1960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950
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上海	1950
上海天文台	上海	1962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上海	1958
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上海	1950
上海生理研究所	上海	1958
上海脑研究所	上海	1980
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932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上海	1953
上海昆虫研究所	上海	1959
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	1984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1951
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1953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1958
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南京	1960
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	1934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武汉	1962
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	武汉	1962
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	1960
武汉物理数学研究所	武汉	1996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武汉	1958
水生生物学研究所	武汉	1950
武汉植物研究所	武汉	1972
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合肥	1970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合肥	1978
固体物理研究所	合肥	1982
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合肥	1979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	1966
成都生物研究所	成都	1958
光电技术研究所	成都	1973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成都	1958
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成都	1958
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	1958
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1958
云南天文台	昆明	1972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昆明	1996
新疆物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1961
新疆化学研究所	乌鲁木齐	1962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1997

续表

机构名称	地点	成立日期
乌鲁木齐天文站	乌鲁木齐	1958
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	1962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	1958
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兰州	1965
兰州沙漠研究所	兰州	1978
兰州地质研究所	兰州	1960
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兰州	1974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西安	1962
陕西天文台	西安	1966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咸阳	1956
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1959
华南植物研究所	广州	1928
广州化学研究所	广州	1958
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广州	1970
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州	1978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1977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长春	1960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	1948
长春物理研究所	长春	1958
长春地理研究所	长春	1958
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	长春	1958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	1949
金属研究所	沈阳	195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	1954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沈阳	1958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沈阳	1962
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	沈阳	1982
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	长沙	1975
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长沙	1978
青海盐湖研究所	西宁	1965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1962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州	1960
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1966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太原	1961
海洋研究所	青岛	1957
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石家庄	1978
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哈尔滨	1978

Zhongguo Lishi Bowuguan

中国历史博物馆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建成于1959年9月，开放于1961年7月。前身是1912年7月筹建，1926年10月开放，名为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初建在前清国子监旧址，后迁入清故宫端门至午门间的建筑内。1933年改名为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现址，改为现名，隶属国家文物局领导。馆藏文物32万余件。其中有考古发掘文物、传世文物、近代少数民族文物，以及历代钱币、文献档案、珍本图书等。

基本陈列为《中国通史陈列》。陈列

面积8000平方米。陈列文物近万件。展示约170万年前到1840年止的中国古代历史。分3个部分：①原始社会。反映约170万年前到约4000年前的历史。展出早更新晚期的云南元谋人、中更新世早期的陕西蓝田人，以及北京人、广东马坝人、山西丁村人、湖北长阳人、广西柳江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化石或资料和他们的采集、狩猎、磨制工具、石制、骨制生活用具及陶器。②奴隶社会。反映自公元前21世纪~前476年的历史。展出铭刻甲骨文的龟甲、兽骨，商代铸造的重达875千克的司母戊鼎和造型精美的龙虎尊、四羊尊、猪尊，西汉青铜器孟鼎、召鼎以及秦公簋、吴王光鉴和蔡侯铸等。③封建社会。反映自公元前475~1840年的历史。展出战国时期的铁券、铁工具、精美漆品、金属器物 and 丝麻织品，诸侯国的金属货币、度量衡器、砖瓦、下水道，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秦琅邪刻石、阳陵虎符、“海内皆臣”砖、半两钱、权、量，汉“齐铁官印”封泥、五铢钱、画像石、铜奔马、铜长信宫灯、金缕玉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绘画、雕刻艺术品，隋唐的纺织品、瓷器、唐三彩，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珍贵古书画和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明清的清花瓷器和五彩、斗彩瓷器，描绘明代北京和南京繁荣情景的《皇都积胜图》和《南都繁会图》，明末李自成农民政权的“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铜印及“永昌通宝”等。

Zhongguo Minzhu Cujinhui

中国民主促进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Democracy)

简称民进。由从事教育、文化、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简称民进。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民进于1945年12月成立于上海。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成员大多是文化、教育和出版界的知识分子。1946年初，民进向旧政协会议呼吁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民进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展保障人权，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等斗争。民进坚决反对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1948年5月，民进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

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民进派代表参加了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进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1950、1956、1958年，民进分别召开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进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并分别于1979、1983、1988、1992、1997年召开第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参政议政、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参与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改革、参与出版工作改革、开门办学、咨询服务、智力支边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民进中央的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许嘉璐。

#### Zhongguo Minzhu Jianguohui

**中国民主建国会** (China Democratic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简称民建。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民建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成员主要是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成立后，积极参加爱国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1946年1月，向旧政协会议呼吁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和平统一。对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声明不予承认。1948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派代表参加新政协与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建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确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前，民建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进行学习 and 自我教育，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起了配合作用。1955、1959年，分别召开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第三、四、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在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开展对“三胞”中的工商界及有关人士的联络工作、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智力支边、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历任领导人是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成思危。

#### Zhongguo Minzhu Tongmeng

**中国民主同盟**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简称民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民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成立于重庆。其政治纲领主要是贯彻抗日、实现民主、结束党治和实施宪政。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发展个人参加。1945年10月，民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和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等政治主张。其后，积极参加和平民主运动，领导成员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惨遭杀害，国民党当局也于1947年10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广大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举行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宣告同中共密切合作，为摧毁国民党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5月，民盟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民盟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1956、1958年，分别召开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于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第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开门办学、咨询服务、智力支边、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民盟中央历届主席为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代主席）、楚图南、费孝通、丁石孙。

#### Zhongguo Nonggong Minzhudang

**中国农工民主党**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 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简称农工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农工党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成立于上海。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龙举行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张全国团结，对日作战，实行土地革命和实行民主。1941年3月，农工党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2月，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呼吁全国同胞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1948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派代表参加了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党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作为政治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共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1949、1951、1958年，分别召开了第五、六次全国干部会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于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协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政策、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振兴中药事业、面向社会搞医疗保健咨询服务、智力支边、参政议政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农工党的历届中央负责人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周谷城、卢嘉锡、蒋正华。

#### Zhongguo Qixiang VSAT Xinxi Wangluo Xitong

**中国气象 VSAT 信息网络系统** (China Meteorological VSAT Information Network) 又名气象卫星综

合应用业务系统。1992年10月，国家正式批准它为“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88年中期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这个系统利用卫星通信方式覆盖面广、不受地理条件限制、通信容量大、采用广播方式等特点，很好地解决了气象信息量大、时效要求高以及气象观测站高度分散等问题。这个系统实质上是新一代气象通信系统，它采用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分布式数据库、程控交换等技术，是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相结合、以卫星通信为主的现代化气象信息系统，旨在实现气象信息的中高速传输、计算机网络化和气象信息的共享。它的业务布点是全国性的，即北京一个主站，30多个省级站和300多个地（市）级站，并将向县级延伸。通过通信卫星把遍布全国的地（市）级以上（以后将扩展到县级）气象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连成一个大型网络互连系统。该系统除昼夜不间断地承担国内外各类气象信息的收集、分发和交换，同时还可进行其他信息传输和话音通信。这个系统于1999年投入业务运行，标志着中国气象通信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Zhongguo Renmin Baoxian Gongsi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Chines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一任总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翼兼任，副总经理为孙继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为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改革旧的保险条款、降低保险费率、试办农业保险、拓展新的保险领域，努力实现“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增进人民福利”的业务方针。使中国的保险业在50年代初有了积极发展。但由于缺乏办保险经验，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保险业经历多次挫折和磨难。60年代保险业处于瘫痪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重新恢复，保险业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1995年10月23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体制改革方案，分别成立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1998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解散，改由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予以冠名。

Zhongguo Renmin Fu Chao Weiwen-tuan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Chinese

People's Solidarity Delegation to the Volunteers in Korea) 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各界代表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一个团体。

1951年1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后易名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慰问团成员由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知名人士，以及人民解放军代表和文艺工作者组成。

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共有575人，由总团团长廖承志带领。于1951年4月初抵达朝鲜，5月底回到北京。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是刘景范，成员有1097人，慰问日期是1952年10月至12月初。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以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一行5448人，于10月抵达朝鲜，12月18日回到北京。

三届赴朝慰问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带去了全国各地献赠的大量锦旗、慰问品、慰问信及慰问金，圆满地完成了中国人民的重托。慰问团在朝期间，深入前沿阵地，慰问了许多英雄连队和战斗英雄，吊唁了杨根思、罗盛教、姚庆祥等烈士。文艺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一线进行演出，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坤等人不幸殉职。中国人民慰问团的三次赴朝慰问，不仅加深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情，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中国人民解放军**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称八路军和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时期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人民政权、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维护祖国统一、防止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的光荣任务，致力于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50年代，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

提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从此，人民解放军步入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时期。为了对全国武装力量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新中国成立时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2年秋起，由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之下曾设立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与此同时，全国陆续取消了野战军和兵团的番号及其领导机关，统一建立了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在组织上保证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行。50年代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全军总人数减少到240万左右。减少了数量，提高了质量；减少了步兵，加强了军兵种建设。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海军领导机关、炮兵领导机关、装甲兵领导机关、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工程兵领导机关、铁道兵领导机关、化学兵部、通信兵部。军兵种领导机构成立后，相继组建了军兵种部队，完成了以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与此同时，抓紧组建军事院校。到50年代末，全军各类院校已发展到120多所，基本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中、高级院校衔接的军官培训体系。1958年3月15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8年10月16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又建立健全军队的基本法规和制度，中央军委先后颁发了《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和《政治工作条例》。建立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和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这些基本法规和制度的建立，对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还开展了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改善了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由“小米加步枪”阶段，进入“步枪加飞机大炮”的新阶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保证了作战及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作战、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50年代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蓬勃发展，社会



主义时期的建军思想初步形成，军队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和新面貌。

从1959年至1978年，人民解放军在曲折中前进。军队建设受到党内“左”的指导方针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方向发生严重偏差。军队员额由200多万增加到600多万，军队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军队一直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完成了保卫祖国安全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军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动乱的年代，军队仍然是国家稳定、安全、统一的重要支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20多年来，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指挥下，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的总目标不断迈进。这一时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把部队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逐步增强。高度重视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使军队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积极推进后勤建设和改革，综合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坚持依法治军，部队正规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军事科学理论繁荣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忠实履行神圣使命，在维护祖国统一、安全和稳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军队的目标奋进。

Zhongguo Renmin Wuzhuang Jingcha Budui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内安全保卫任务的武装组织。简称武警部队。1982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武警部队。1983年4月组建完成，成立总部、总队、支队三级领导机关。

这支部队由内卫部队和属武警序列的公安边防、消防部队、公安警卫系统，以及交通、水电、黄金、森林警察部队组成。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武警总部设在北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总队，地

区(州、盟)设支队，县(旗、市)设中队或大队、站、所，有的总队还编有直属支队。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领导；武警森林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受武警总部的指导。

武警部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并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条令、条例。这支部队平时的基本任务是，警卫党和国家机关和部分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及大型集会的安全，警戒和看押监狱、劳改管教场所，配合公安机关逮捕、追捕及押解罪犯，守卫国家要害部门和重要目标，进行边防守卫和火灾消防等。战时，协同人民解放军保卫边防和海防，抗击敌人的入侵等。这支部队在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简称中国人民政协，或人民政协，或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共同创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后改为北京)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政协的一切活动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并据此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继续做贡献。1982年12月11

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组织参加政协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改进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实现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体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国人民政协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在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民政协历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李瑞环。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fang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通常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省(区、市、州、县)委员会，简称政协××省(区、市、州、县)委员会，或××省(区、市、州、县)政协。是地方各党派及人民团体进行政治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地方委员会职权。1954年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必要设立的地方设中国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从此，政协地方委员会发展起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和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1982年12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地方委员会的设立、职权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凡有条件的地方，均可设立各该地方的地方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1993年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作出决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为5年（1994年3月写入政协章程）。各级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常务委员会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议通过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的重要建议案；组织实现政协章程规定的任务和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全国性的决议及上级地方委员会所作的全地区性的决议。据统计，1997年底，地方委员会总数已发展到3057个，委员总数为512619人。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ba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 (Eigh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1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第八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2093名。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杨静仁、周培源、邓兆祥、赵朴初、巴金、刘靖基、钱学森、钱伟长、胡绳、钱正英、苏步青、侯镜如、丁光训、董寅初、孙孚凌、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为副主席，宋德敏为秘书长，丁石孙等288人为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朱光亚、万国权为副主席，改选朱训为秘书长，增选王蒙等7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增选杨成哲等5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增选何鲁丽为副主席，增选艾知生等8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5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分别

列席了全国人大有关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重要报告，讨论了宪法修改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并就某些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和意见。特别在宪法序言中写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23次，学习讨论了中共十四届几次全会精神 and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分别作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学习贯彻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等决议；就国家经济形势、反腐倡廉、农业和农用土地、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如何加快改革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等，进行了专题协商讨论，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会议加强对专门委员会重要调研成果的审议，并以建议案形式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其中，关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几点建议，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参与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和建议，加快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建议，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建议等，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有些意见还被直接吸收到中央有关文件中。

此外，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还举办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首次会议，邀请国际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学者对人们关注的未来世纪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宗教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平祈祷活动等。

在这五年里，全国政协还修订了政协章程和《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政协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共中央于1995年对以上“规定”专门发了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等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应在政协进行协商。这些都将是有力推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更好地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

员会的工作机构有办公厅（即机关）和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法制、民族、宗教、妇女青年、华侨、祖国统一联谊、外事14个专门委员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1994年机构改革，14个专门委员会调整为8个。即：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妇青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er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Secon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559名。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邢西萍为秘书长，王芸生等65人为常务委员。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了许多工作。诸如：协助人民政府宣传宪法；动员人民群众遵守宪法并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引导他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扬人民民主，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对地方政协共同性问题的调研，指导地方统一战线工作等。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取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有关报告；协商讨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任务和作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增产节约、肃清反革命分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的使命以及如何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和条件为祖国建设服

务等重要问题，发表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适应新形势，制定了规范人民政协性质、地位、组织和活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了 55 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于时局的报告以及其他有关重要报告。对制定兵役法、发行新人民币、文字改革、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农业发展纲要、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建立政协委员视察制度、建立僮族自治区和回族自治区、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诸如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同时召开并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撤销某些右派分子在全国政协担任的职务等）作出决定。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秘书处（机关）、地方工作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国际问题组、工商组、文化组、教育组、科学技术组、社会福利组、华侨组、宗教组、医药卫生组、民族组、妇女组。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jiuji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Nin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98 年 3 月 3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第九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2196 名。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巴金、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丁光训、孙孚凌、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周铁农、王文元为副主席，郑万通为秘书长，并选出丁衡高等 290 人为常务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截至 1999 年 1 月，举行 1 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列席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讨论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就某些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已举行 3 次会议（至 1999 年 1 月）。学习了中共中央十

五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对科教兴国和农业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就农村改革 20 年来的基本经验，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针，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等重要问题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若干问题的建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办公厅和提案、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教科文卫体、社会和法制、民族和宗教、文史资料、港澳台侨、外事 9 个专门委员会。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liuji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 (Six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83 年 6 月 4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2039 名。其中非中共委员占 60%，中共委员占 40%；知识分子委员大幅度增加，台湾和港澳爱国同胞委员多于以往历届。会议选举邓颖超为主席，杨静仁、刘澜涛、陆定一、程子华、康克清、季方、庄希泉、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周叔弢、杨成武、萧华、陈再道、吕正操、周建人、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叶圣陶、屈武、巴金等 29 人为副主席，彭友今为秘书长，丁玲等 266 人为常务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五次会议分别增选马文瑞、茅以升、刘靖基、华罗庚、王恩茂、钱学森、雷洁琼、汪锋、钱伟长为副主席；马文瑞等 41 人为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改选周绍铮为秘书长。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了 5 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列席了同期举行的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协商讨论了国家经济形势和农业、粮食生产，贯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加快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生态环境，积极团结“三胞”和推进“一国两制”方针等重要问题，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相应的重要决议。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了 17 次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十二届三、四、五、六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有关部委领导的有关报告；协商讨论了国际形势、社会治安情况、学习《邓小平文选》、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三峡工程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迎接新的技术革命、解决香港问题、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推进民主和法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作出了相应的重要决议。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机构为办公厅（机关）、提案审查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组、文化组、教育组、医药卫生组、华侨组、科学技术组、宗教组、妇女组、法制组、体育组、农业组、祖国统一组、经济建设组。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qi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 (Seven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88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2081 名。会议选举李先念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赵朴初、屈武、巴金、马文瑞、刘靖基、王恩茂、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卢嘉锡、钱正英、苏步青、司马义·艾买提为副主席，周绍铮为秘书长，丁铎宇等 280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侯镜如、丁光训为副主席，李开信等 6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增选洪学智为副主席，杨植霖等 4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增选叶选平为副主席，改选宋德敏为秘书长，增选王文元等 10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了 5 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分别列席了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讨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

多重大问题，并就某些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 22 次会议，学习讨论中共十三届几次全会精神 and 十四大政治报告，并分别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关于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等；召开了 7 次常委专题座谈会议，分别就高等院校教育经费、教师待遇、北京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科技兴国、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对音像工作管理、加强农村卫生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1989 年全国政协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目的、内容、形式以及程序等作了规范。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等发出通知，指出：这个规定符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有利于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各地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在开展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中参照执行。

1989 年国际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1990 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国政协组织委员并号召各级地方政协紧跟中共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讨论，动员委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为维护国家局势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办公厅和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法制、民族、宗教、妇女青年、华侨、祖国统一联谊、外事 14 个专门委员会。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san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 (Third National Committee

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9 年 4 月 17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1071 名。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王从吾等 143 人为常务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何香凝为副主席。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与全国人大联合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观、视察、访问、座谈，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加强政策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劳动锻炼。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了 34 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分别列席了同期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副总理的有关报告；协商讨论了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发展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了 46 次会议，其中许多次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举行。常委们听取陈毅等国务院领导人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的工作报告，讨论了我国教育、农业、交通、邮电、林业、商业、卫生、轻工业、文化、冶金等各项工作。对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秘书处（机关）和地方工作委员会、学习委员会、联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际问题组、工商组、文化教育组、科学技术组、华侨组、宗教组、医药卫生组、民族组、妇女组。还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会刊编辑委员会。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si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

委员会 (Four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64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5 年 1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1199 名。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陈叔通、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蔡廷锴、韦国清、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谢觉哉、沈雁冰、李烛尘、帕巴拉·格列朗杰、许德珩、李德全、马叙伦为副主席，平杰三为秘书长，于树德等 135 人为常务委员。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实际工作时间仅 1 年左右。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只举行了 1 次全体会议和 6 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便中止了正常活动。1966 年 8 月 30 日机关停止办公。只有周恩来主席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对各界爱国人士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保护了一大批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各界爱国人士。到 70 年代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始有一些组织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时事政策，参观了解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状况，参加重要纪念活动和组织部分在京常务委员参加协商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活动。

1977 年 12 月和 1978 年 2 月，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举行第七、第八次会议，讨论协商并决定了召开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政协工作长达十多年的停顿状态结束。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wu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Fif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8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1988 名。其中非中共委员占委员总数的 51%，中共委员占委员总数的 49%。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郭沫若、宋任穷、沈雁冰、许德珩、欧阳钦、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

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董第周为副主席，齐燕铭为秘书长，丁光训等 244 人为常务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五次会议增选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刘斐、董其武为副主席，马辉之等 85 人为常务委员；因 1978 年 10 月齐燕铭秘书长病逝，第二次会议补选刘澜涛为秘书长。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 5 次全体会议和 24 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邓小平主席领导下学习和贯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列席了同期举行的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重要报告。协商讨论了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任务和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修订宪法和政协章程、政治制度改革、纠正不正之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国家经济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方针、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等重要问题。五届全国政协修改了人民政协章程，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如为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 1966 年的“二月提纲”平反，为吴晗及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平反的建议等）。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为办公厅（机关）、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国际问题组、文化组、教育组、工商组、医药卫生组、华侨组、民族组、科学技术组、宗教组、妇女组、法制组、对台宣传组、经济建设组、城市建设组、体育组和农业组，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983 年恢复）。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yijie Quanguo Weiyuanhu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First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49 年 10 月 9 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有委员 198 名。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毛泽东等 28 人为常务委员。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协助人民政府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动员人民发展经济、维护国家政局稳定，反对侵略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举行 4 次全体会议。全体委员分别听取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其他副总理的有关工作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就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国家经济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等事项，以及土地改革法、调整工商业和税收、财政、文化、教育等工作进行协商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国徽审查组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就“10 月 1 日为国庆日”、国徽图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土地改革法等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专项建议。

常务委员会共举行 64 次会议，听取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外交、预算、人事等报告和其他副总理的重要报告，就农工部组织条例、人民法院组织条例、人民检察院组织条例、人民法庭组织条例、农业税条例、劳动保险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公私合营企业条例、婚姻法、合作社法以及制定宪法、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人民政协任务和组织形式，“三反”、“五反”运动，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等进行协商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或提出建议。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还举行了专门会议，研究指导地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并提出了《关于各省市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关于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建议》、《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等，制定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通则》，作出了《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宗教事务共 8 个工作组和秘书处（机关）。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Diyijie Quantu Huiy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First Ful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议。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北平

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共中央主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对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对党派及反动分子不许参加。根据这个原则，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包括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国民党及拥护与赞成中共 1948 年“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 46 个单位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 662 人。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并确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根本大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产生了由 180 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由 63 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决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9 月 27 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 1949 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由于国徽仍需选择图样，大会主席团决定，会后继续邀请专家设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人民政府将遵照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将加强人民军队建设，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

家、民族与人民，首先是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会议还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文，并于30日下午6时，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 推荐书目

《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Gongtong Gangling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委托中国共产党起草，经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施政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在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和实施之前，起了临时宪法作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正文7章60条，它确认了中国人民百年来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斗争经验，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制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和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

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部队，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起国家动员的基础，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

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前提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提倡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全体国民的公德。提倡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要按照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国家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建立各自治机关。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各少数民族有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則，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Quanguo Weiyuanhui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  
ference)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或爱国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1954年12月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为最高组织形式)。简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全国政协。政协全国委员会不同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它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于1949年9月30日由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1954年12月以前,其职权是:①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②协商并提出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③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④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⑤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⑥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中国人民政协取消了全体会议的组织形式,各区域代表和人民解放军不再作为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政协全国委员会主要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其参加单位、名额和委员人选改由上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截至“文化大革命”,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①就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事项,进行协商和工作;②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③推举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④听取和审查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⑤指导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政协停止活动。

1978年政协全国委员会重新恢复工作。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78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982年12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再次修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994年3月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政协章程又作了部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是:①修改政协章

程,监督章程的实施;②选举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③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④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重大工作方针、任务并作出决议;⑤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政协全国委员会按照章程规定的职权,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而奋斗。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组织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任期,第一届时,组织法规定为3年;第二届至第四届时,章程规定为4年;从第五届起,章程规定为5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每年1次。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名额和委员人选,由上一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政协全国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若干人,秘书长1人和相当数量的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中国人民政协历届全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第一届主席毛泽东;第二、三、四届名誉主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第五届主席邓小平;第六届主席邓颖超;第七届主席李先念;第八、九届主席李瑞环。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Quanguo Weiyuanhui Changwu  
Weiyuanhui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  
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持会务的机构。  
简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或全国政协常  
委会。常务委员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  
候选人由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  
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  
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与全国  
委员会相同。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职权和任务是:①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②决定召集并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会议选出主席团主持)。③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④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⑤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的重要建议案。⑥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⑦决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各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组成人员。⑧每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上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由本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⑨遇到非常情况时,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2/3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全国委员会得延长任期。

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七届之前是不定期举行。1988年6月9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后,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个季度举行一次,其日期和议程由主席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也可由主席委托副主席主持。在常委会会议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其他会议上,委员的民主权利受到保护,各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如果需要就讨论的问题作出决议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

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通过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后,又规定了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这一新的会议形式。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Quantu Huiyi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Ful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  
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初期的最高组织形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共同纲领》;制定或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予它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就国家的根本大计或重要举措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人民政协组织法规定,全体会议每3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

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只召开过第一次全体会议,且延长任期2年。故只存在于第一届。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一、六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将第二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性的组织,由第一届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3个层次,改变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2层。自第二届政协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设全体会议这一层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则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

###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Zhangchen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规范人民政协性质、地位、组织和活动的纲领性文件。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是参加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是各级政协设立组织、开展工作的根本依据。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履行章程的义务。1954年、1978年和1982年先后制定过3部政协章程。

现行章程是1982年制定、1994年修订的。它包括总纲、工作总则、组织总则、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附则六章。“总纲”论述了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共同政治基础、根本任务和主要职能,以及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根本准则。“工作总则”着重对政协3项主要职能的内容和方式作了规定,并从15个方面阐述了政协工作的范围和要求。“组织总则”主要规定了人民政协的组织构成、参加政协的条件、各级组织间的关系、政协各参加单位与政协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全国委员会”主要规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单位和人员的产生、变更、任期及职权,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的产生及职权,主席会议的组成及职权,副秘书长及工作机构的设立。“地方委员会”主要规定了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设立原则和地方委员会组织与工作内容。

###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Zuzhifa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 (*Organization Law of the CPPCC*)

用于规范人民政协性质、地位、任务、组织和工作的法律文件。1949年9月27日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该法共分六章。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章,参加单位及代表。第二条规定:“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亦得参加。第三条对政协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的产生作了规定。第四条规定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全会或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义务,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得违反;如根本不同意,有申请退出的自由。第五条是对违反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的参加单位或代表、委员进行处分的规定。第三章,全体会议。第六条规定了会议期限和会议的召集。第七条规定了全体会议的职权。其中有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职权;在普选的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和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决议案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对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选举、机构设置和组织办法也作了规定。第四章,全国委员会。第十三条规定:“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主要是: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协

商并提出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和政协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国家建设的工作;协商并决定下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协商并处理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对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全国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工作条例也作了规定。第五章,地方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设立、组织条例作了规定。第六章是附则。此项法规为中国人民政协组织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 Zhongguo Renmin Zhiyuanjun 中国人民志愿军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军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27日美军入侵朝鲜。为了防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7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抽调原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辖38、39、40、42军及炮兵3个师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9月15日,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美军在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并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轰炸。1950年10月初,应朝鲜政府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第13兵团入朝作战。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13兵团领导机关与彭德怀的指挥所合并组成志愿军领导机关,并任命邓华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志愿军领导成员后来曾作过部分调整,1951年6月至8月,先后任命陈赓、宋时轮为第二、第三副司令员。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暂由陈赓副司令员代理。5月底,邓华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11日,陈赓调回国内,又任命杨得志为副司令员。1953年4月,由李达接替解方为参谋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共进行5次大的战役。①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入朝伊始,即向龟城、泰川、五老里一线进军。1950年10月25日与敌军交战,一举歼灭美军和李承晚军两个师大部。11月14日,战役结束,共歼灭敌军15000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②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4日敌军发动总攻势,志愿军拟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批准并



调第9兵团入朝作战，志愿军兵力已达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敌军发动总攻势后，志愿军将敌诱至预定地区，各军主力即发起反击，经过8昼夜激战，歼灭敌军第7、第8两师大部，迫使敌军从陆地和海上实施总退却。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共歼灭敌军36000余人。收复了包括平壤在内的全部土地。③第三次战役。二次战役后，美国提出“先停火，后谈判”。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电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南进到离汉城不远一带地区寻歼敌人。据此，志愿军第38、39、40、42和第50、66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于12月31日17时，在“三八线”上向敌军发起全线进攻，1951年1月3日，转入追击。1月4日，志愿军和第39、第50军进入汉城。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此役，志愿军向南推进100多千米，歼敌19000余人。④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敌军又开始了攻势。志愿军以第38、第50军在汉江南岸实行防御作战，不断阻击敌军，此役至4月21日结束，共歼灭78000余人。⑤第五次战役。敌军进入三八线附近地区后想继续北进。志愿军决定实施反击战。此时新入朝的志愿军第19兵团、第3兵团已在前线集结，与第13兵团共8个军，使志愿军在进攻兵力上占有优势，1952年12月31日，志愿军在三八线上向敌军发动全线攻击，于1953年4月29日推进到汉城附近，战役于6月10日结束，共歼敌82000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大批战斗英雄和模范，如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杨育才、王海、张积慧等。战争中共歼灭美、李军109万余人（包括朝鲜人民军单独歼敌13万人）。志愿军也付出重大代价，战斗减员36万余人（牺牲13万余人），战费开支62亿元人民币。

Zhongguo Shaonian Xianfengdui  
**中国少年先锋队** (China Young Pioneers) 中国共产党委托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建立和领导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群众组织。简称少先队。1949年10月13日，团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少年儿童团。1953年8月21日，决定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名称一度被取消，改称红小兵。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少先队吸收7~14岁少年儿童参加。少先队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并委托

共青团直接带领的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少先队的任务是：团结教育儿童，继承中国革命传统，立志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勤奋学习，锻炼身体，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好品德，使少年儿童成长为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方面得到发展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国少先队有自己的队章、标志、队旗、呼号、队礼。红领巾是该组织的标志之一，代表红旗的一角，象征革命者的鲜血染成。少先队组织结构按队章规定，在学校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由5人~13人组成。中队由两个以上小队组成，大队由两个以上中队组成。少先队队歌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

历史沿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第二任院长马洪，第三任院长胡绳，现任院长李铁映。建院前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等14个研究单位，总人数2200多人。

从1977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1年以后成立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和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所31个，实体性研究中心2个，半实体性和非实体院属研究中心50个，含二三级学科近260个，其中重点和重点扶持学科131个。全院总人数3767人，有科研业务人员2975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1538人，中级专业人员1437人。有71名科研人员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有200多名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全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后备力量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1978~1998年培养并向院内外输送了有专长的博士研究生890多人、硕士研究生2000多人。他们中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学术造诣高深的专家学者和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科研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科学院发展规划，是与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同步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除组织各研究所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外，还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和各学科的特点及其发展，确定院重点项目和所重点项目。同时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或委托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重点研究项目通常是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接受院、研究所的委托或自愿选择研究任务。许多重大课题，由多学科的学者参加，利用多学科综合优势，进行研究。也有一部分科研业务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兴趣，独立地进行研究。

文献资料的积累和利用，是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综合性的图书馆，绝大部分研究所设有专业性的图书馆，拥有古今中外的基本文献资料，1998年馆藏图书已达530.5万余册，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善本典籍、珍本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和各研究所，分别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建立了图书资料交换关系，并通过各种动态性、资料性刊物和文献题录、论文索引等信息载体，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学术信息。

学术交流 广泛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坚持的方针。近些年来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在交流规模上，从1978年10多批数十人次发展到1998年1398批、4100多人次；在地区分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交流已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约200多

个社科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交流关系，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交流协议。交流对象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总理、内阁长官及政界、学界著名人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访问、讲演，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机构代表以及海外记者也经常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学术访谈。频繁的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外交流，有互派学者考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互派长期留学进修生、举办双边或多边学术研讨会、互邀学者讲学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各个学科，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传统学科，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和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在对外学术交流中都得到了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

日益发展的对外学术交流，对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事业、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对外学术交流与课题重点科研项目和学科发展。一批研究人员通过留学进修和访问交流，拓宽了学术视野，业务上得到了培养和提高，许多人已成为科研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科研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著作、科学论文、调查报告、资料翻译和文献整理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提供科研产品。建院以来，共出版学术著作4975本，科学论文63477篇，调查报告、研究报告8383份，翻译著作2046本，翻译论文16108篇，以及相当数量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各种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年平均出版学术著作300本、科学论文3890多种、研究报告510多篇。

这些科研成果阐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为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整理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科学文化，推动学科建设。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

古》、《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文学评论》、《世界经济》等82种学术刊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和学术信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Zhongguo Wenxue Yishujie Lianhehui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Circles)

是由全国性文学艺术家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全国性的产业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成的人民团体（简称中国文联）。1949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中国文联实行团体会员制。有团体会员49个，即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联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中国煤炭文联、中国铁路文联、中国石油文联、中国电力文联和中国水利文协等。中国文联对各团体会员的工作有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责，并承办团体会员需要统筹安排的事宜。

中国文联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它选举产生的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下设书记处，主持日常会务工作，并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中国文联成立以来，共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届主席、名誉主席、执行主席为郭沫若、茅盾、周扬、曹禺、周巍峙。

中国文联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致力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50年来，在中国文联的指导下，各文艺家协会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如组织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各种学习和探讨；组织各类文艺演出的观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

召开各类文学艺术研讨会、座谈会；举办文艺评奖活动，设有全国性、专家性的文艺奖项13个，涵盖各个艺术门类；举办旨在培养文艺新人的讲座、讲习班，开展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等。为了使作家和艺术家与广大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创作出更生动有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联还鼓励并组织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工矿、农村、部队、边疆，进行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

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办有40余种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和报纸。中国文联拥有自己的报社和出版社。各地文联也出版、发行地方性的文艺刊物。

中国文联广泛开展对外文学艺术的交流活动，并积极组织和推动各个团体会员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每年接待数以百计的外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同时组织越来越多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出国访问，与国外文艺界进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交流，增强了中外文艺界的友谊和合作。

Zhongguo Xiehe Yike Daxue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China Union Medical College) 中国唯一的一所实行8年制教育、以培养医学博士为重点的医科大学。

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1906年，英、美等国的6个教会在北京合办协和医学堂。191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世界一流医学院为样板，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并附设一所高级护校和一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80多年来历经变迁，三次停办，三次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5年改为中国医科大学。1979年改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1985年改称现名。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综合研究中心。1957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由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双重领导。经过多年建设，现拥有18个研究所、6所医院、5所分院，设有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等3个教育学院，1个研究生院和1个成人学院。大学还设有3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级药物生产基地及工程中心，54个国家学术机构和9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拥有近50万册藏书和中国最大的医学文献分析及检索系统的

图书馆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制为8年,实行医预科和两段式教学的办学模式。前两年半(医预科)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后五年半(医本科)在校本部学习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完成临床实习、科研训练和毕业论文。成绩优秀者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95年起设立了医学博士和理学博士双博士学位教育项目,创建了“七转八”和五年一贯直博生制度。1999年在校学生3000多人,其中本科生596人,专科生278人,硕博研究生1190人,成人学历教育1175人。建校以来,造就了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黄家驷、吴阶平等一批蜚声中外的杰出的医学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向国家输送了数千名高级医学人才,仅博士学位获得者就达1046人。现有职工12000人,其中教授621人,副教授949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博士生导师286人,硕士生导师446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评议组成员8人,国家科技部公布的首席科学家1人。1956年至1998年共取得科研成果1382项,其中国家级成果177项。已同20多个国家的医学院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关系,170名外籍专家应聘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相继与国际著名医学院互换高年级临床实习生。

Zhongguo Zhishi Chanquan Baohu  
Zhuangkuang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 199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主要内容:①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立场和态度。②中国具有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③中国具有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体系。白皮书系统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情况,阐明中国政府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逐步向国际规范靠拢,走上国际化道路。并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白皮书的发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全面了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状况、了解中国所奉行的原则立场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广大社会公众中树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从而对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Zhongguo Zhigongdang

中国致公党 (China Zhi Gong Party)

以归侨、侨眷及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简称致公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

致公党前身是美洲洪门致公堂。洪门是中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美洲洪门致公堂是当时最大的海外洪门组织,它曾追随和资助孙中山,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做出了贡献。1925年10月,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洪门团体的恳亲大会,决定成立致公党,这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香港设立致公党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洪门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致公党总部的活动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陈其尤、黄鼎臣等人于1946年初在香港恢复致公党总部的工作。在中共的政治影响下,主张整顿党务、进行改组,并于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公开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和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的罪行。1948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1949年,应中共之邀,派代表参加新政协和新中国的创建工作。

1950年初,致公党总部由香港迁至广州。1953年,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由广州迁至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致公党召开了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改革开放后,致公党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活动。1979、1983、1988、1992、1997年,分别召开第七、八、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致公党历届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董寅初、罗豪才。

Zhonghua Quanguo Funü Lianhehui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简称“全国妇联”。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确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各民族

各阶层妇女大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并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和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1957年9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会名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规定全国妇联工作的根本方针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妇联中止工作。1978年9月召开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面恢复工作,并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88年9月,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国妇联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参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增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全面提高素质,促进妇女人才成长;代表妇女参加社会协商对话,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法律、法规、条例的修订,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系,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巩固和扩大各族各界妇女团结,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1998年8月底至9月初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以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对跨世纪中国妇女运动作了全面部署,动员全国各族各界妇女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而努力奋斗。

全国妇联实行代表联系群众和团体会员的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全国妇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妇女工作的重大问题,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在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全国妇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为领导机构,由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执委会下设书记处,开展日常工作。全国妇联的机关报是《中国妇女报》,机关刊物是《中国妇女》。

Zhonghua Quanguo Gongshangye  
Lianhehui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简称全国工商

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1951年开始筹备，于1953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

全国工商联成立之初，主要由国营、私营、公私合营工商企业，合作社，手工业者、行商、摊贩和对工商界有特殊贡献的人士联合组成。工商联在代表和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沟通会员与政府的联系，协助政府组织生产和流通，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协商税收，团结和教育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行动纲领，结合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沟通政企联系，协调各方面关系，传递市场信息，促进横向联合，培训专业人才，协助政府引进外资，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在组织建设方面，截至1988年11月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时，已在全国建立1495个县级以上组织，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由多种经济成分的工商企业、团体和经营者联合组成的工商社团组织的新格局。全国工商联“六大”通过的新章程，明确规定工商联既是人民团体，又是民间商会的性质，是统战性、民间性、经济性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历届主任委员（或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经叔平。

Zhonghua Quanguo Guiguo Huaqiao Lianhehui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归侨、侨眷和华侨的人民团体。简称全国侨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此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历届全国委员会都有华侨代表人士参加。一届全体会议和一届全国委员会时使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名称；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时使用华侨的名称；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时使用归国华侨的名称。

1939年，在延安的归侨青年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1946年改名为延安华侨联合会。它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作为人民政府的侨务机关，不久又成立了北京市归国华侨联谊会作为归侨的人民团体。1956年10月，中华全

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全国侨联的基本方针与任务是：根据宪法，保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号召各级侨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统一、繁荣、昌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全国侨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地方各级侨联承认全国侨联《章程》，经批准，可成为全国侨联会员。最高权力机构为全国归侨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选举全国侨联委员会。全国侨联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开1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侨联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决议，讨论并决定侨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国侨联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领导会务。驻会主席、副主席、顾问、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办公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处理日常工作。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会址设在北京。历届主席为陈嘉庚、庄希泉、张国基、庄炎林。

Zhonghua Quanguo Qingnian Lianhehui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All-China Youth Federation) 简称全国青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于1949年5月4日成立，全国青联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鼓励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最广泛地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青年的合法权益；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努力为各族各界青年健康成长、奋发成才服务；积极发展同台湾青年、港澳青年及国外侨胞青年的联系和友谊；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全国青联实行团体会员制，1999年有团体会员46个。其中全国性团体会员12个，即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事业发展促进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年研究会、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首都青

年编辑记者协会。地方性团体会员34个，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青联和中央直属机关青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和全国民航青联。全国青联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全国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若干人。全国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全国青联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秘书处设协调工作部、民族宗教工作部、文体部、科技部、教育部、社团工作部、人力资源开发部、港澳台联谊部、国际部、旅游部等机构。全国青联的机关刊物有《中华儿女》，另有工作刊物《全国青联通讯》。全国青联成立至1999年已历经八届，其沿革由代表大会制改为委员会制。历届主席是廖承志、刘西元、王伟、胡启立、胡锦涛、刘延东、张宝顺、刘鹏，第八届主席是巴音朝鲁。

Zhonghua Quanguo Taiwan Tongbao Lianyihui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aiwan Compatriots) 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简称台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至九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1981年12月29日在北京成立。台联的宗旨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联络国内外台湾同胞，增进乡亲情谊，同心同德，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为振兴中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增进台湾人民的福祉而贡献力量。台联成立以来，积极联络、团结海内外台胞，为大量从台湾和海外前来祖国大陆的台湾乡亲寻根访祖、探亲旅游、经商投资、求学定居，以及从事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等提供了帮助。同时，还在为居住在大陆的台胞落实政策，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帮助他们与台湾岛内的亲人建立联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先后任全国台联理事会会长的有林丽韞、张克辉、杨国庆。

Zhonghua Quanguo Tiyu Zonghui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Sports)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群众体育组织。1949年10月由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它的任务是：①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②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体育爱好者并协同各有关部门，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而努力。

③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开展与各国的体育交流,举办和参加国际体育竞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市、县建立各级地方分会;在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建立体育协会。此外,各项全国性运动协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委员会,各产业、各系统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4年举行一次,现已召开了六届。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全体委员会是其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委员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宣传部、国际部、竞赛部、群体部、科教部、财务设备部。

Zhonghua Quanguo Xuesheng Lianhehui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All-China Students Federation)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中国大中学生的群众组织。简称全国学联。1919年6月16日正式成立。全国学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任务是:团结全国学生,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使广大学生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学习科学文化,增长才干,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全国学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凡承认全国学联章程的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会、科研教育机构的研究生会、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的统一组织均为全国学联的团体会员。全国学联代表和联系6000万大中学生。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学联委员会,作为决定全国学联重要工作的权力机关。全国学联委员会的职权是:选举产生主席单位和副主席单位,根据全国学联主席团提名,决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人选;召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期间,执行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决议,决定全国学联重大问题,审查和批准全国学联主席团和秘书处的工作。全国学联主席团是全国学联日常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机关。主席团由全国学联委员会选举主

席单位和副主席单位。主席团的职权是:召集全国学联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执行全委会的决议;检查、监督秘书处的工作。历届学联主席是:田德民、胡启立、伍绍祖、刘能元、杨岳、张菁(女)。

Zhonghua Quanguo Zonggonghui  
**中华全国总工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简称“全总”。前身为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中华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定筹备全国性工会组织。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工会活动转入地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分别成立总工会,解放战争时期联合为解放区总工会。1948年8月1日,解放区总工会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会在哈尔滨联合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总”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改善和丰富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总”中止活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总”又组织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和推动改革,并代表职工参政议政,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参与制订国家和地方法律以及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技术交流、技术协作、技术培训活动,努力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工作上建立了新的业绩。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更好地发挥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职工,为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中国工会实行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各产业建立全国的和地方的工会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市、县的地方总工会,是当地产业工会和地方

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国工会受同级共产党委员会和上级工会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共产党委员会领导为主。中国工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五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团。主席团下设书记处。书记处在主席团的领导下主持全总的日常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是《工人日报》,机关刊物为《中国工运》。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简称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中部的社会主义国家,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面积与方位** 中国幅员辽阔,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占世界土地面积6.5%,相当整个欧洲面积,居世界第三位。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中国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自东、北而西、南,依次为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东、南隔黄海、东海、南海与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相望。

**人口、民族、宗教**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9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4810万人(未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地区)。其中,城镇人口37942万人,占30.4%;乡村人口86868万人,占69.6%。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均有贡献,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平等权利。中国现有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共56个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最多,计104900万人,占91.96%;其余55个民族共9120万人,占8.04%。在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最多,计1548万人;珞巴族人口最少,只有2312人。汉族聚居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东南沿海地区最为密集。少数民族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和

中南地区,有的散居在全国各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汉族使用汉语文。少数民族除回、满、畚三族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汉文是全国通用的文字。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20多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同时也使用汉文。宪法保障各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的主要宗教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疆域** 中国陆域宽广,海岸线漫长。疆域北起黑龙江省漠河市区内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约在北纬 $53^{\circ}31'$ ;南到海南省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约在北纬 $4^{\circ}15'$ 。南北相距约5500千米,75%以上的国土处于适合农、林、牧业发展的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东起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汇合处,约在东经 $135^{\circ}15'$ ;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境内的帕米尔高原,约在东经 $73^{\circ}40'$ 。东西相距约5200千米,跨东5区至东9区共5个时区。陆地疆界长约20000多千米。中国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海岸线北起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仑河口,全长18000多千米,加上沿海6000多个岛屿和岛礁的14000多千米的海岸线,共计有32000多千米。在众多的岛群中,台湾岛的面积最大,约35700平方千米。

**地形**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其中山地占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2%。西南部青藏高原是第一级阶梯,平均海拔在4000~5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则在7000米以上,雄踞其上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自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以北、以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平均海拔降到2000~1000米左右,这一地区为第二阶梯,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构成。其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第一大盆地,面积53万平方千米,同时也是世界最低的盆地,其最低点比海平面还低155米。自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向东至海滨,平均海拔为500~200米,这一地区为第三阶梯,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沿海丘陵、胶辽丘陵构成。

**河流湖泊** 由于地形因素,中国的主要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如黑龙

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等。其中,长江长6300千米,为亚洲和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黄河长5464千米,为亚洲和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南部的一些河流则因横断山阻隔而折向南流,如澜沧江经老挝、柬埔寨流入太平洋,雅鲁藏布江、怒江分别经孟加拉国、缅甸流入印度洋。只有发源于新疆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由南向北流,在俄罗斯境内汇入鄂毕河后注入北冰洋。中国内流河主要有注入湖泊或消失在沙漠的塔里木河、伊犁河、黑河、疏勒河等,其中塔里木河全长2179千米,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中国的湖泊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约2800多个。在淡水湖中,以鄱阳湖最大,面积3583平方千米。在咸水湖中,青海湖最大,面积4583平方千米。

**气候** 中国大部位于北半球中纬度的北温带和亚热带。由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又有青藏高原阻隔,海陆热力差造成了季风的进退:夏半年盛行风和气流主要源于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洋面,全国天气比较温暖湿润;冬半年盛行风和气流主要源于高纬度的西伯利亚高寒地带,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变得寒冷干燥。处于欧亚大陆腹地的青藏高原尤甚。夏季普遍温暖炎热,7月平均气温大多在 $20\sim 28^{\circ}\text{C}$ 之间。冬季普遍降温,1月平均气温,秦岭、淮河以北、以西地区低于 $0^{\circ}\text{C}$ ,大兴安岭北部低于 $-30^{\circ}\text{C}$ ;秦岭、淮河以南地区高于 $0^{\circ}\text{C}$ ,南海诸岛可高达 $22\sim 26^{\circ}\text{C}$ 。7~8月为多雨季节,各地年平均降水量差异很大,东南沿海多达1500毫米以上,逐渐向内陆减少,西北地区仅在50毫米以下。

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属种丰富的国家之一。仅种子植物就有2700多属,约30000余种。在8000多种木本植物中,仅乔木就有2800多种,其中包括水杉、银杏、金钱松、银杉、福建柏、珙桐等珍稀植物。在种类繁多的动物中,陆栖脊椎动物2070种,其中包括东北虎、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白唇鹿、丹顶鹤等珍稀动物;海水鱼1500多种,淡水鱼500多种。

中国还是世界上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截止到1993年底,全国已发现矿床和矿点20多万个,探明储量的矿区16000多处;发现矿产163种,探明储量的149种。其中铀、钨、锡、钼、稀土、钛、锑、汞、铅、锌、铁、金、银、硫、磷、石墨、萤石、菱镁矿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铜、铝、锰、硼、滑石、高岭土等储量亦居世界重要地位。能源资源也很充足,水能资源的蕴藏

量居世界第一,煤炭、石油蕴藏量也居世界前列。1992年底,探明的煤炭储量已达9833亿吨;据1988年评估,预测石油资源为787亿吨,天然气资源为33.6万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的理论藏量为6.8亿千瓦,可开发藏量为3.7亿千瓦。

**历史** 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四千多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做出过独特的贡献。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有日食和月食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直到目前还以多国文字在世界流传。战国时期开始修建的长城,经过后世扩建,其工程规模迄今也是举世无双的。汉代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演示日月星辰的浑天仪。南北朝时期,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已经精确到 $3.1415926\sim 3.1415927$ 。始建于隋代的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1801千米,是世界最长的运河。明代朱载堉首创的十二平均律,后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标准音律。中国的丝织、制瓷、冶金、造船技术很早就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不仅推动了欧洲的产业革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前仆后继的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又为这种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28年的苦战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

**政治**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家主席，决定任命国务院总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中国重视法制建设，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完备。根据宪法，全国行政区域划分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共 23 个省，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个自治区，香港、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成立）。

**外交**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经济文化往来。至 1998 年底，已同 16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

**成就与远景** 中国在 1949 年以后，特别是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后，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 12 亿人的温饱问题，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不断提高，靠自力更生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国之初，只用 3 年时间，就把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到 1952 年末，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679 亿元。到 1998 年末，又增至 79 553 亿元。按可变价格计算，从 1952 年到 1998 年的 4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9 倍，每年平均增长 7.7%，1978 年以后的 20 年，则每年平均增长 9%~10%。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名列世界前茅。工业方面：钢由 1949 年的 16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11 518 万吨，原煤由 1949 年的 0.32 亿吨增至 1998 年的 12.5 亿吨，均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由 1949 年的 43 亿千瓦小时增至 1998 年的 11 670 亿千瓦小时，居世界第二位；原油由 1949 年的 12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1610 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农业方面：

粮食由 1949 年的 11 318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49 000 万吨以上，棉花由 1949 年的 44.4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440 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用 7% 的世界耕地（15 亿亩），解决了 21% 的世界人口（12 亿 5 千万）的衣食问题。在原子能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不仅长足发展，而且有些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内市场商品销售平衡增长，199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9 153 亿元。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增加，1998 年达 1450 亿美元。中国到 21 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0 年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 推荐书目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Aomen  
Tebie Xingzhengqu Jibe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Basic Law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 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简称澳门基本法。

1986 年 6 月，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开始谈判。1987 年 3 月 13 日，中葡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及其 3 个附件，宣布中国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关于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将以澳门基本法规定之，并在 50 年内不变。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9 月 5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任命了 48 名起草委员会委员，其中内地 26 名，澳门 22 名。1989 年 5 月 28 日，澳门的 22 位委员受起草委员会委托共同发起和筹组由 90 人组成的民间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澳门成立。1992 年 3 月 16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澳门基本法草案后，决定将草案公布，同时在澳门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求意见。1993 年 3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主席令第三号公布，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实施。

澳门基本法由序言、9 章共 145 条和 3 个附件组成。主要内容是：①序言。叙述澳门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规定国家对

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②第一章总则。规定澳门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的基本原则，即澳门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回归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外，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澳门原有法律基本不变；澳门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澳门可以使用区旗、区徽，等等。③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国防、外交事务；依照本法规定任命澳门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澳门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处理澳门的行政事务；享有立法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除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不属于澳门自治范围的法律，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列于本法附件三外，其他全国性法律不在澳门实施，等等。④第三章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澳门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居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在澳门境内有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⑤第四章政治体制。规定了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产生、职权范围和相互关系；市政组织的性质和职责；公务员的条件和要求，等等。⑥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文化和公共服务，第七章对外事务，第八章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附则。⑦三个附件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Bao-shou Guojia Mim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State Secrets*) 规范国家保密制度的专门法律。1988 年 9 月 5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1 年 6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施行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保守国家秘密法共 5 章 35 条，具体规定：保守国家秘密的工作，实行积极防

范、突出重点、既确保国家秘密又便利各项工作的方针。国家秘密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包括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究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3级。“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保守国家秘密法对于国家秘密密级的确定、变更和解除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990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保密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Baoxi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Insurance Law of the PRC)

调整境内保险活动中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之间关系,规范国家对保险企业、保险市场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律。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共8章152条。在此之前,198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3年修订)、198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199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财产保险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转让,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保险方的赔偿责任等,都作了规定。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管理和偿付能力以及保险准备金、再保险等,也作了规定。

该法的主要内容是:①本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的保险活动。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的规定。②本法规范的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给予保险赔偿,或者当被保险人死

亡、伤残、疾病等情况发生时给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③对保险合同作出一般规定,包括合同的当事人、种类、订立程序、必备条款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对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还分别作了规定。④设立保险公司,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⑤保险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同一保险公司不得同时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⑥保险公司应当建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公积金、保障基金等,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⑦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管部门制订。金融监管部门有权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及资金运用状况进行检查。保险公司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决定对其进行整顿或者接管。⑧对保险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Biaozhunhua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Standardization Law of the PRC)

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因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而产生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9年4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62年国务院发布了《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标准化法共5章26条,内容包括: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实施、法律责任等。确立的主要法律制度是:①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体制。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②标准体制。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行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地方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抵触;企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抵触。③制定标准的原则。各项标准的制定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④标准的实施制度。企业必须执行强制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

采取推荐性标准。⑤标准实施的监督制度。标准的监督采取两种方式,即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按照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的要求,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质量保证体系经标准化部门检查合格,符合标准规定的,该产品方可使用国家规定的认证标志。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Bingy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Military Service Law of the PRC)

规范兵役工作的基本法律。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共12章65条。主要内容是: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有严重生理缺陷或者严重残疾不适合服兵役的人免服兵役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服兵役外,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④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现役的称现役军人;编入民兵组织或者经过登记服预备役的称预备役人员。⑤现役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履行公民的义务,同时享有公民的权利。⑥现役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建立功勋的,得授予勋章、奖章或者荣誉称号。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⑧全国的兵役工作,在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由国防部负责。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预备役人员,在参加军事训练期间,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和奖金,原有的福利待遇不变;农村的预备役人员,在参加军事训练期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按照同等劳力的收入给予误工补贴。⑩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给予优待;家居城镇的义务兵家属,生活困难的,由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⑪义务兵退出现役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由原征集的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接收安置。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anjiren Baozhang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ng the Disabled*) 维护残疾人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法律。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1991年5月15日起施行。共9章54条。

立法宗旨: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明成果。

主要内容:对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环境等方面作出规定。国家和社会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残疾人教育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着重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实行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对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各种途径、多种形式,为残疾人劳动就业创造条件,并对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优惠政策,给予扶持保护。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采取扶助、救济和其他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改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

立法意义:中国共有5000多万残疾人,他们的状况如何,不仅涉及他们自身,而且关系到他们的亲属,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国家制定专门的残疾人保障法,对于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发挥残疾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ao-yuan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Grassland Law of the PRC*)

保护和管理草原,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法律。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共23条。主要内容是:明确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除外;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草原由政府核发使用权证书,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由政府核发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全民所有的草原或者集体所有的草原以及集体长期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

者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时,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政府处理;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草原的,按照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规办理;对违反草原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要给予处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an-pin Zhilia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duct Quality*) 保证产品质量、维护用户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3年9月1日起施行。共6章51条。在此之前,国务院曾先后颁发过《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等有关产品质量管理的行政法规。

该法内容包括: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损害赔偿,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确立的主要制度是:①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规定国家为保证产品质量进行宏观管理,实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以激励和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能力;进行监督管理方面,实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打击假冒伪劣活动,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②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不得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③损害赔偿制度。对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产品质量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作了规定。明确了承担产品质量民事责任的主体、条件、承担责任的方式等内容。此外,产品质量法还对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作了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shi Fangdichan Guanl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Law of the PRC on Urban Real Estate*)

调整城市房地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共7章72条。在此之前,经国务院批准,1983年6月4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1983年12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经国务院批准,1984年8月25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外国人私有房

屋管理的若干规定》;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该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和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该法确定的主要制度是:①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制度。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②房地产开发制度。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③房地产转让制度。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④房地产抵押制度。⑤房屋租赁制度。⑥房地产中介服务制度。⑦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shi Guihua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Urban Planning Law of the PRC*)

调整城市规划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0年4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6年国家建委颁发了《城市规划编制办法》,1980年10月召开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基本方针。同年12月国家建委颁发了《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和《城市规定额指标暂行规定》。1984年1月5日,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

城市规划法共6章46条。确立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为:①城市规划必须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②城市规

划必须符合中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③在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主要制度有：①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制度。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基础上，编制城市详细规划。②城市规划分级审批制度。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城市分区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③城市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制度。④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制度。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制度。⑥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制度。设计任务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shi Jumin Weiyuanhui Zuzh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Organic Law of the Urban Residential Committees of the PRC)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宪法规定，城市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制定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为了贯彻实施宪法，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部法律共23条，围绕城市居民实行基层自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居民委员会的任务、规模设置、活动原则，居民会议，居民公约

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zhi Fangeming Tiaol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Rules of the PRC for Punish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前，用于惩治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制定，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同月21日公布施行。共21条。

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都依照本条例定罪处刑。该条例规定的反革命犯罪有11种：①背叛祖国罪。②策动叛变罪。③持械聚众叛乱罪。④间谍或资敌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的，为敌机、敌舰指示轰击目标的，为国内外敌人供给武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的。⑤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受国内外敌人派遣从事潜伏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立功赎罪表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⑥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⑦反革命破坏、杀害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况：抢劫或破坏军事设施、工厂、矿场、森林、农场、堤坝、交通设施、银行、仓库、防险设备或者其他重要公私财物的；投放毒物、散播病菌或以其他方式引起人、畜或农作物重大灾害的；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的；袭击或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的；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⑧反革命挑拨、煽惑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者其他政令实施的；挑拨离间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的。⑨反革命偷越国境罪。⑩聚众劫狱或暴动越

狱罪。⑪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条例还规定对上述各种犯罪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于处刑的四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后，该条例废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hengzhi Tanwu Tiaol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Rules of the PRC for Punishing Corruption)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制定，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同月21日公布施行。共18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前，用于严惩贪污罪犯的条例。

条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的行为，均为贪污罪。对个人贪污和集体贪污，依其罪行轻重，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个人贪污1亿元（指旧人民币，下同）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贪污5000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贪污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或1至4年劳役，或1至2年管制。贪污数额不满1000万元的，处1年以下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刑予以行政处分。集体贪污，按各人所得数额及情节，分别惩治。条例规定对下列11种情形从重或加重处刑：①犯贪污罪对国家和社会事业及人民安全有严重危害的；②出卖或坐探国家经济情报的；③贪赃枉法的；④敲诈勒索的；⑤组织集体贪污的；⑥屡犯不改的；⑦拒不坦白或阻止他人坦白的；⑧为消灭罪迹而损坏公共财物的；⑨为掩饰贪污罪行嫁祸于人的；⑩坦白不彻底，判处后又被人检举出严重情节的；⑪犯罪行为有其他特殊恶劣情节的。条例还对从轻、减轻、缓刑或免于刑罚予以行政处分的情况作了规定。为了不使贪污分子经济上占便宜并补偿国家损失，条例规定应追缴贪污财物或其他违法所得。

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贪污罪构成条件和处罚作了明确规定，该条例废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ujin Keji Chengguo Zhuanhua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 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旨在促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法律。1996年5月15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共6章37条。主要内容是:①立法宗旨。推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的开发、应用、推广,发展新产业,提高生产力水平。②组织实施。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协调实施有关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成果转化可以采用公开招标、委托技术交易中中介机构征寻合作者、研究单位与企业联合等多种方式依法实施。③保障措施。国家财政经费应有一定比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增加贷款以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并鼓励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者风险基金。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Cunmin Weiyuanhui Zuzh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s of the PRC)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87年11月24日通过。其主要内容有:①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任务主要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乡级人民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村委会协助乡级人民政府开展工作。②民主选举。凡是年满18周岁的村民,只要享有政治权利,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设立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村民委员会候选人由本村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选举村民委员会,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选举实行无记名投

票、公开计票的方法,选举结果当场公布。选举时设立秘密写票处。③民主决策。对于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乡统筹办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兴办公益事业的方案等八项内容,必须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同时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召开村民会议有困难的,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④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受村民监督,本村1/5以上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对于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应当及时公布。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6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监督。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有义务接受村民的查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aqi Wuran Fangzh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Law of the PRC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规范大气污染防治的环境保护法律。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88年6月1日起施行。在此前后,1956年5月25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1979年9月13日公布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作了原则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后的该法同日起施行。

大气污染防治法共6章41条。体现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由防治烟尘污染向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转变、由重末端治理向源削减(即在生产过程中削减污染)和污染集中控制转变。主要制度是: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污染防治设施检验制度。包括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大气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

措施,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过环境保护部门检验。②排污申报。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按规定申报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并提供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③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进行整治,并缴纳超标准排污费。④限期治理。⑤强制性应急措施。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当地人民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⑥现场检查。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⑦大气污染监测。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大气污染监测制度,组织监测网络,制定统一的监测方法。

该法还对违法行为明确规定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anbao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Guaranty Law of the PRC) 调整担保活动中当事人之间担保关系的法律。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共7章96条。在此之前,1951年1月23日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质押放款办法》等规定。1979年以后相继制定的一些民、商事法律对担保作了若干规定,如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经济合同法》、1985年3月21日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法通则》、1992年11月17日颁布的《海商法》。

该法主要内容是:①保证。可以作保证人的是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但是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都不得为保证人。保证的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②抵押。可以作为抵押的财产是: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以及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以及国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使用权;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

产。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③质押。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也可以将下列权利质押：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的财产权等。④留置。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享有留置权。⑤定金。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ang'an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Archives Law of the PRC) 规范档案管理、收集和保护利用方面的法律。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8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决定》修正。共6章27条，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利用的原则。以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为前提，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人员在档案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对档案的利用和公布，档案的寄存、出卖、转让作了规定。对档案法规定的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ifang Geji Renmin Daibiao Dahui he Difang Geji Renmin Zhengfu Zuzh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Organic Law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of the PRC) 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颁布过两部地方组织法。第一部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二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

地方组织法共5章69条。主要内容是：①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按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以上各级人大每届任期五年，乡、镇人大每届任期三年。地方各级人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召集，由预备会议推选主席团主持会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大根据需要，可以设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的职权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重大事项，包括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选举和罢免本级地方国家机关负责人，包括选举和罢免本级政府正副职领导人，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实行差额选举；监督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包括听取和审查本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撤销本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是本级人大的常设机关。常委会组成人员由本级人大在代表中选举产生，不得兼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常委会会议由主任召集，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其他工作机构，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地区设立派出工作机构。常委会的主要职权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监督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④地方各级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是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行机关，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受其监督，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重大问题应由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政府行使的主要职权是：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发布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规定行政措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

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工作，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法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具体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ifang geji renmin zhengfu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loc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包括省、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等各级人民政府。从广义上说，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也是地方人民政府。

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国务院。

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权是：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乡、民族乡、

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职权主要是：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政府工作的重大问题，由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可以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和机构。省、自治区、县、自治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在必要时经批准可以分别设立地区行政公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作为其派出机关。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uiwai  
Maoy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Foreign Trade Law of the PRC*)

规范对外贸易活动的法律。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对外贸易法共8章44条，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对外贸易的范围、主管机关和对外贸易的原则。该法所称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对外贸易工作。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依法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中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②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法律地位、设立条件及相应的权利义务。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原则。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国家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该法还规定了国家限制和禁止货物、技术与国际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的情形。④对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和国家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对发生进口产品的倾销或者补贴、过量进口给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消除或者减轻损害等内容作了规定。⑤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

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机构，设立对外贸易发展基金、风险基金，采取进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及其他对外贸易促进措施。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和参加进出口商会，进出口商会依照章程对会员进行协调指导，提供咨询服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建议，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对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采取扶持和促进政策。⑥对走私行为，伪造、变造进出口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证行为，使用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进出口许可证的行为，进口或出口法律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技术的行为，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及利用职务便利索贿、受贿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⑦对边境贸易及边民互市贸易的管理原则作了规定，并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Fa-  
guan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Law*

*of the PRC on Judges*) 规范人民法院法官条件、资格、教育和管理的法律。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共17章49条。该法规定：①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②法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条件。③确立了法官的任免、任职回避、等级、考核、培训、奖励、惩戒、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以及申诉控告等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Fan  
Buzhengdang Jingzhe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Law of the PRC on Unfair Competition*) 规范经营者的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共5章33条。

该法要求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不得有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法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以下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①在市场交易中，以假

冒注册商标及其他违反商标法规定的行为，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标示。②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③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④以贿赂手段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本法所定的“贿赂”是指，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个人回扣，或者对方单位、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行为。⑤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⑥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⑦为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⑧销售商品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⑨采用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或者采用最高奖的金额超过五千元的抽奖式有奖销售。⑩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⑪投标者串通投标，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结，排挤竞争对手。该法还规定，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除依法赔偿被侵害的经营者损害外，还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除民事责任外，监督检查部门有权责令违法的经营者停止违法行为，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违法情节处以罚款。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Funü  
Quanyi Baozha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共9章54条。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的程度。在旧中国，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多重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有了提高。但是，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影响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的限制以及其他原因,妇女与男子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某些不平等,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需要时间和条件,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妇女权益保障法即在总结新中国40多年妇女工作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作了规定,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益,并根据妇女的生理特点,规定保护她们的某些特殊权益,以促进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该法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现实条件下可以解决、包括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规定得比较具体、详细;对那些应当解决,但现实条件还不具备、尚难解决的问题,规定得比较原则。既着眼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又从时空上保留了很大的余地,以便随着国家改革和建设的发展,增加更多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措施。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eren  
Suodeshu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Law of the PRC on Individual Income Tax*)

规范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个人所得税法共14条。主要内容是:①纳税义务人的范围。在中国取得应税所得的中国公民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从中国境外取得应税所得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②应税所得的范围。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财产租赁、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③对上述各项应税所得实行分项税制,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及费用扣除标准。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

费用后的余额,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余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余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其中,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稿酬所得按应纳税额减征30%。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的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④免纳个人所得税的项目。包括国家颁发的奖金,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利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保险赔款,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外交和领事人员所得等。⑤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事项作出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ong-  
hu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Law of the PRC on Trade Unions*) 关于工会组织的法律。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共6章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制定、施行了第一部工会法。对于建立新中国的工会组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教育广大职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起了重要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根据新时期对工会工作的要求,总结40多年来,特别是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工作的经验,对1950年制定的工会法进行了适当修改,制定了1992年工会法。

特点:①明确宪法是工会活动的根本准则。②把中国共产党对工会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做到了坚持共产党对工会的统一领导与工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③明确工会的任务,坚持工作任务与工会权利义务的统一。④明确工会工作的原则是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⑤明确工会与政府、企事业单位行政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关系。⑥规定工会的组织原

则,保证了工会的团结统一。⑦扩大基层工会的权利,把工会工作重点放到了基层。

主要内容:对工会的性质、任务、根本活动准则、工会组织、工会的权利义务、工会的经费和财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组织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维护国家政权;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教育职工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技术、业务水平,使职工成为“四有”劳动者。工会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事项有权进行调查;维护职工的劳动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工会应当会同企业行政方面维护好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做好工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工作。工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监督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的权力。建立工会组织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交经费。建立工会组织的三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本企业工会拨交经费。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ong-  
min Chujing Rujing Guanl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Law of the PRC on the Control of Chinese Citizens Leaving and Entering China*)

保护中国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促进国际交往,规范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的法律。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86年2月1日起施行。共6章20条。

该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自由往来原则,接受边防检查原则,禁止危害祖国行为原则。该法规定:①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

请。②公民因公务出境由派遣部门向外交部申请办领出境证件。③中国公民在国外申请护照、证件的程序。④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申请回国定居的程序。⑤对于违法者阻止出境、入境和对于护照、出入境证件予以吊销或者宣布作废的制度。“中国公民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经国务院 1986 年 12 月 3 日批准，同年 12 月 26 日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和《中国公民因私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1991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ongs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Company Law of the PRC) 以规范公司的设立、组织和行为，公司解散清算以及公司其他对内对外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1993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历史沿革和制定经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恢复经济、保障供给，政务院于 1950 年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公司形式，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于有利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1954 年，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实行股份制。50 年代末，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虽然“公司”的称谓被保留下来，但是公司制企业已基本被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所取代。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 年 7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研究起草公司法。1983 年由国家经委牵头，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起草。1986 年改为分别起草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于缺乏公司法的统一规范，在组建公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资本不实，组织机构不健全，政企不分，甚至非法经营的公司。1985 年和 1988 年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对各类公司进行

全面清理整顿。其后，1990 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以及 1991 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抓紧制定公司法。1992 年 5 月原国家体改委发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7 月，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百零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8 月，将该草案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制定一部覆盖面更广，内容比较全面的公司法。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在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拟订的有关条例、规范性意见和法律草案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公司法。1993 年 1 月完成公司法草案(第四稿)起草工作，2 月将草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6 月向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对公司法(草案)的意见的汇报。会后，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以及地方、部门、专家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1993 年 12 月下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12 月 29 日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布主席令公布。

主要内容 公司法共 11 章 230 条。主要内容包括：①关于公司的形式和适用范围。规定公司不按所有制划分，按责任形式划分；公司法调整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或者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外商投资的公司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②关于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规定公司的出资人或发起人必须符合法定人数，出资人或发起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可以单独出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在采取募集设立的情况下，可以仅有一个发起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股东实缴资本总额，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设立公司必须由出资人或发起人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外，可以直接申请登记为公司；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为公司成立日。③关于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规定公司实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股东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资本增减、合并、分立、解散、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问题；董事会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执行日常管理任务；公司设立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决定。④关于公司的运作。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必须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的利益；公司的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⑤关于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规定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按照会计年度制作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等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在分配利润时，必须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及职工集体福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将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公司住所，供股东和债权人查阅。⑥关于公司的合并、分立。规定公司在合并或分立时，原有公司法人被注销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必须先依法通知和公告债权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或者与债权人达成偿债协议，否则不得合并或分立。⑦关于公司的解散和清算。规定公司解散时，必须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依法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申报债权；在清算期间，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未支付清算费用和清偿公司债务前不得分配公司财产；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经公司权力机构确认后报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登记。⑧关于违反公司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了违法主体和违法行为，及其应

当承担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⑨其他有关规定。

公司作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能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从产权关系和财产组织方式上实现政企分开。公司法的制定和实施对改变传统按所有制确定企业类型的做法，促进企业间联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法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anggao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Law of the PRC on Advertisement)

规范广告活动，明确广告活动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1994年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1日起施行。共6章49条。确立的主要制度是：①广告在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是必须坚持诚实信用的原则，保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二是广告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职业道德。②对某些特殊商品（如药品、烟草、食品等商品）的广告内容的特别要求。对某些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特殊商品，其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除了应当遵循广告的基本准则以外，还应当符合一些特别的要求。③规定了广告活动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广告合同制度、广告证明制度、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资质标准、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对广告的自律审查制度。禁止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广告活动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禁止设计、制作，发布法律、行政法规。④广告的审查制度。凡是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刊以及其他媒介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等商品的广告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必须在发布前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广告法还规定了对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du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 (National Capit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并发布公告，宣布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都是北京。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fa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Defense Law of the PRC)

有关国防建设的基本法律。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共12章70条。主要内容是：①适用范围。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适用本法。②国防思想。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坚持全民自卫原则。③国防体制。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等；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和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④武装力量。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由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民兵组成。解放军现役部队是国家的常备军，主要担负防卫作战任务，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预备役部队平时按照规定进行训练，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战时根据国家发布的动员令转为现役部队。武装警察部队在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指挥下，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维护社会秩序。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备勤务、防卫作战任务，协助维护社会秩序。⑤该法还对边防、海防和空防，国防科研生产和军事订货，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战争状态，公民、组织的国防义务和权利，军人的义务和权益，对外军事关系等

问题作出了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fang Weiyuanhui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9月至1975年1月设立的军事机构。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据此，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1958年2月1日免去副主席职务）任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委员。国防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直接领导、指挥国家武装力量。1959年4月成立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刘少奇任主席，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任副主席，有委员100人。1962年4月增补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成立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刘少奇任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任副主席，方强等107人为委员。1975年1月起，根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再设立国防委员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曲。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体现中国人民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原曲，由集体填写新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通过决议，撤销



上述关于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词，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hui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尊严的正式标志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由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集体设计，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50年9月20日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象征中国人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诞生。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j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Nationality Law of the PRC) 处理国籍问题的基本法律，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国籍是指一个人具有某一国家公民的资格。具有某一国籍的人，即在这个国家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并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主要内容是：①关于确定国籍的原则。中国确定国籍采取出生地主义和血统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即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或者父母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本人出生在中国，就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也具有中国国籍；但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②关于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外国人加入或者恢复中国国籍后，都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③关于加入或者退出中国国籍的条件和手续。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本人是中国人的近亲属，或者定居在中国，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中国公民是外国人的近亲属，或者定居在外国，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以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jia Anquan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State Security Law of the PRC)

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同日起施行。

安全法共5章34条。所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构成犯罪的为下述犯罪行为：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一是依法行使职权的原则。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二是依靠群众的原则。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和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三是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的义务。规定的主要制度：一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应出示相应证件的制度。二是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的制度。三是禁止任何个人和组织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制度。四是对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和奖励的制度。五是对于犯间谍罪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的制度。六是由于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敌对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及时如实说明情况的，不予追究的制度。

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则经1994年5月10日国务院第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同年6月4日以国务院令157号发布。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jia Peicha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Law of the PRC on State Compensation) 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法律。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共6章35条。国家赔偿的内容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方面。

行政赔偿。主要内容是：①关于侵犯人身权的有：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②关于侵犯财产权的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刑事赔偿。主要内容是：①关于侵犯人身权的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②关于侵犯财产权的有：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对于已经确认的违法行为，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决定，必须执行。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即造成公民身体伤害、丧失

部分或者全部劳动能力、死亡的，其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倍数计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造成损害的，以返还财产、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为原则。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qi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尊严的正式标志之一。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旗图案的设计者是曾联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团结。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wuyua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其前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组成。1982年宪法又规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国务委员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由总理提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名，经常务委员会以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通过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各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国务院的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相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行政法规、暂行条例以及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和任免人员，均由总理签署。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国务委员可以兼任或不兼任部长或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受总理的委托，负责某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可以代表国务院进行外事活动。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人员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工作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1982年宪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的职权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规定各部、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的工作，并领导不属于各部、各委员会的全国性行政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具体划分；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与城乡建设；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权利和利益；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国务院下设各部、各委员会，分别管理各项国家行政事务。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与主持部务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和部、委员会的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同时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

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和监督。国务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的原则，设立若干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wuyuan Zuz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Organic Law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关于国务院组织和活动原则的基本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颁布过两部国务院组织法。第一部由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二部由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国务院组织法共11条。主要内容是：①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任免人员，由总理签署。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国务委员受总理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工作，并可以代表国务院进行外事活动。②国务院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③国务院按照宪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行使行政管理权。④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大决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部长、主任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签署请示、报告、命令、指示。副部长、副主任协助部长、主任工作。各部委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决定，主管部、委可以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⑤国务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的原则，设立若干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ai-gu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Customs Law of the PRC) 关于海关

管理和关税征收的法律。1987年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同年7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1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共7章61条,规定了海关的设立及其职责、权力,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监督管理制度,关税,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主要内容是: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②国务院设立海关总署,统一管理全国海关。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总署负责。③海关可以行使下列权力: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查验进出境货物、物品,对违法的可以扣留;查阅进出境人员的证件,查阅违法嫌疑人,调查其违法行为;查阅和复制有关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等资料,违法的可以扣留;检查有藏匿走私货物嫌疑的运输工具、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对走私罪嫌疑人依法予以扣留;依法追捕走私违法当事人,并可以佩带和使用武器等。④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必须通过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出境。除另有规定外,进出境货物由海关准予注册的报关企业或者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负责办理报关纳税手续。⑤准许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境的物品,由海关依照进出口税则征收关税。⑥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aishang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Maritime Code of the PRC)

以调整海上旅客和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与海上运输活动有关的合同关系,以及有关船舶的所有权、抵押权、优先权等船舶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就着手研究并推动有关部门组织起草海商法。1952年起,由

交通部会同有关部委、院校组成的海商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进行起草工作,于1963年拟出海商法草案(第九稿),上报国务院审议。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起草工作中断了近20年。1981年,由交通部牵头,有关部门和院校参加,组成新的海商法起草委员会,恢复起草工作。1985年1月,交通部将海商法(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形成海商法草案。1992年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国务院总理李鹏于6月7日签署议案,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2年6月下旬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初步审议了海商法草案。会后,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人大常委会和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以及地方、部门、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199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11月7日,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同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布主席令公布。

海商法共15章278条,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对有关海上运输当事人和船舶当事人之间的横向财产、经济关系作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①关于船舶的所有权和抵押权的规定。②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规定,包括船舶优先权的定义,以船舶为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范围及各项优先权之间的受偿顺序,以及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和消灭等方面的规定。③关于船长和船员的资格和船长基本职责的规定。④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根据海上运输的特点,着重对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免责事项及赔偿责任限制作了具体规定。鉴于较长时期以来中国沿海货物运输在责任制度等方面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有较大的不同,海商法规定,本法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国港口之间的沿海运输。⑤关于定期租船合同与光船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各自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规定。⑥关于海上拖航合同承拖方与被拖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规定。⑦关于船舶碰撞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⑧关于对海上遇险船舶及其他财产进行救助的救助报酬的规定。⑨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⑩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⑪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aiyang Huanjing Baoh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of the PRC)

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的法律。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83年3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74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共8章48条。规定了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和法律责任等。为有效地实施,1983年12月29日至1990年8月1日,国务院相继发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ehuo Qiye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 (Partnership Law of the PRC)

调整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规范合伙企业行为,保护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97年8月1日起施行。共9章78条。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该法为适应这一要求而制定。该法内容包括: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合伙企业的解散、清算以及法律责任等。规定的主要法律制度是:①合伙企业依照法定条件设立,并须经依法登记方能成立。②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享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③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依法享有对合伙企业经营管理事务的决策、执

行和监督权。④合伙企业对其债务，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⑤入伙的条件、效力及退伙的形式、条件和效力。⑥合伙企业清算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eto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Contract Law of the PRC)

规范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1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共23章428条。

制定合同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目标，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为基础，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和完善。注重可操作性，将已在实践中有效的有关合同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吸收进来。对需要增加的内容，尽可能地作出具体规定。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平等、自愿。“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二是公平、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三是守法。“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合同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如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贸易合同关系，包括自然人之间的买卖、租赁、借贷、赠予等合同关系。

合同法分总则、分则、附则3部分。总则8章129条，有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其他规定。分则15章298条，对实际工作中的各种合同作了明确规定，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提供了具体规范，也

为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审理或者仲裁案件提供了依据。这些合同是：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附则1条，规定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e Mianbian Lianbang Zhengfu Guanyu Liangguo Bianjie Wenti de Xied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ederal Government of Burma Agreement on Border Issue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

为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56年初，中缅两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中方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提出以下互谅互让的方案：

①北段未定界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一直是中国领土。1911年，英国派兵侵占上述地区，遭到当地军民的强烈反抗。当时英国政府照会清政府，也承认这三处地区是中国领土，因此，理应归还中国。至于北段直到底富山口的其他未定界，可以按传统习惯线划界。②南段即阿佷山区一段。1941年，英国逼迫国民党政府以换文的形式同意其在南段划定的边界，这就是“1941年线”，该线将阿佷山区72%的土地及所属居民划给了英属缅甸。根据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中方拟以勐卯三角地与缅方交换。③中段即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1897年，中英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权。中方考虑，中缅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如再保持“永租”关系，是与时代不相称的；再则如果收回该地，也会给缅甸北部交通带来严重困难。所以中方愿把该地留给缅方，并换回南段“1941年线”以西原属中国的地区。缅方认为中方的方案是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双方遂于1960年1月28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中缅边界条约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外

交文献。中国以这一良好的范例为开端，先后同尼泊尔（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境问题。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uanjing Baoh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the PRC)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在此之前，1973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82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环境保护法共6章47条。主要内容是：①确立的基本原则：一是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二是综合治理的原则。三是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四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排放污染物超过标准的，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限期治理。五是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②确立的基本制度：一是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规划，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二是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制定城市规划，应当确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和任务。城乡建设应当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保护植被、水域和自然景观，加强城市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三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四是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五是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制度。六是排污收费制度。凡是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事业单位，都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Hunyi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Marriage Law of the PRC) 关于婚姻制度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共5章37条。在此之前，1950年5月1日，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由中央人民政府颁行。

婚姻法规定，中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推行计划生育，特别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权益。主要内容是：①结婚。一是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二是符合法定婚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三是要符合一夫一妻制，不得重婚。四是男女双方不是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五是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婚姻法禁止重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②家庭关系。一是夫妻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二是父母子女关系。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为止。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子女不履行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三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关系。有负担能力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四是兄弟姐妹关系。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婚姻法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③离婚。夫妻双方按照法定的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hui Youxing Shiwe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Law of the PRC on Assemblies, Processions and Demonstrations)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和权利，是中国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作了明确系统的规定。主要内容有：主管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决定许可或者不许可。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此外，还有一些保障性条文，如组织人不服主管机关不许可的决定时，有申请复议的权利；主管机关应当负责维持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同时，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内容也依法作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lia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Metrology Law of the PRC) 调整计量法律关系，确立国家计量监督管理制度的法律。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86年7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计量局，统一管理全国的计量工作；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1977年5月27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1980年2月29日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家计量局联合颁布了《全国厂矿企业计量管理办法》；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在采用国际单位制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及《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

计量法共6章35条。确立的主要制度是：①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②国家对全国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③国家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各种计量基准器具，作为统一全国量值的最高依据。④国家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计量检定工作应就地就近进行。⑤对计量器具的新产品定型，计量器具的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实行许可证制度、审批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⑥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che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Inheritance Law of the PRC)

有关公民死亡后遗产如何转移，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继承权的法律。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

继承法共5章37条。主要内容是：①遗产范围。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②遗产转移方式。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扶养协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处理。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没有遗赠扶养协议又没有遗嘱，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或者所在的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继承法突出中国特色，一是体现血缘关系，强调对老人的赡养。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的继承权，继承份额，丧失继承权等问题，都作出了有利于保护老人的规定，体现了我国人民尊敬、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二是强调保护妇女的继承权。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不因性别不同而权利不同。在配偶继承权、寡妇改嫁带产等方面，也作了保护性规定。三是注重协商处理遗产问题。总结了民间的良好习惯，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

由继承人协商确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ge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Price Law of the PRC) 调整价格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是规范价格行为、管理和监督价格活动的依据。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1998年5月1日起施行。共7章48条。在此之前,80年代初价格改革起步后,国务院于1982年8月曾发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随着价格改革不断深入,国务院对暂行条例进行了修改,于1987年9月11日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

该法的主要内容是: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各类有形产品和无形资产的价格行为,以及各类有偿服务的收费(即服务价格)行为,应当遵守价格法的规定。②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制定应当符合价值规律,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③确立经营者定价在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规定凡是适宜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均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经营者的定价权利受法律保护。④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仅适用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和公益性服务价格等。制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必须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建立价格听证会制度,听取人民群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⑤国家确定市场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综合运用货币、财政、投资、进出口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实现。国家建立重要商品储备、风险基金、调节基金、主要农产品保护价格等制度,对价格总水平实施有效调控。⑥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干预措施和紧急措施的,有价格垄断、低价倾销、价格歧视、变相提价或者压价以及牟取暴利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要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和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ny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Prison Law of the PRC)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监狱及其执行刑罚的活动的法律。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该法共7章78条。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主要内容有:①关于监狱及监狱的人民警察。②刑罚的执行。规定了收监,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监外执行,减刑,假释,释放和安置等程序。③狱政管理。规定了罪犯的分押分管,监狱的警戒及戒具和武器的使用,在押犯的通信、会见、生活、卫生、奖惩和对罪犯服刑期间犯罪的处理等内容。④对罪犯的教育改造。⑤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nchagu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curators) 规范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条件、资格、教育和管理的法律。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共17章52条。该法所指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该法明确了检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条件,确立了检察官的任免、任职回避、等级、考核、培训、奖励、惩戒、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以及申诉控告等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nchazhidu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 (procuratori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监督机关的组织体系、职权、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总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检察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又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或批准任命。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每届任期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同。

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由检察长、副检察长、部分检察员等人员组成,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问题。

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是: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进行检察;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免于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打击敌人,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遵循如下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s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Law of the PRC on Teachers) 关于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的资格和任用,教

师的培养、培训和考核,教师的待遇的法律。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教师法共9章43条。主要内容是:①立法宗旨。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建设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修养和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②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依法享有进行教学活动、从事科研、指导学生的学习并评定其品行和成绩、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参加培训6项权利。同时,履行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完成教学任务、对学生进行思想及全面教育、关心和爱护学生并促进其全面发展、制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及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教学水平6项义务。③教师的资格和任用。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取得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成人教育的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相应学历。各级教师资格,由不同的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④教师的培养、培训和考核。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对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业务培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思想政治、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考核应当客观、公正、准确。教师考核结果是受聘任教、晋升工资和实施奖惩的依据。⑤教师的待遇。教师的平均工资应当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医疗同当地公务员享受同等待遇。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教师享受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教师应当予以补贴。国家对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惠,教师退休或者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民办教师的待遇由举办者自行确定并予以保障。⑥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Law of the PRC on Education) 关于教育的基本法律。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5年9月1日起施行。共84条。主要内容是:①教育的地位。教育是促进公民

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③教育的基本原则。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等等。④教育基本制度。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实行学位制度;实行扫除文盲制度;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该法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教育与社会、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还对违反教育法规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ey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Martial Law of the PRC) 1996年3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本法共5章32条,规定了戒严的决定、戒严的实施、实施戒严的措施、戒严执勤人员的职责等。本法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戒严期间,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作出特别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Kexue Jishu Jinb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Law of the PRC for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确定国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基本制度的法律。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共10章62条。主要内容是:①基本方针和管理体制。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国家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保护知识产权。科学技术的管理由国务院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重大项目、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科学技术进步。②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国家鼓励企业科技进步活动,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速科技成果在生产领域中的推广应用,建立和发展技术市场,推动科技商品化。国家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各领域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③高新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国家推进高新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研究、推广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优惠政策。④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国家保障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国务院科技行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实施重大基础性科研课题,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⑤研究开发机构。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的需要,统筹规划和指导科研开发机构的布局,建立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体系。国家对承担特定项目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多方面给予支持。研究开发机构实行院长或所长负责制。⑥科学技术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实行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⑦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国家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全国研究开发经费应当占国民生产总值适当的比例,并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国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国家建立科学技术保密制度。⑧科学技术奖励。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奖励。国家对为

科技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依法授予国家荣誉称号。国务院设立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此外，还对违法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Kuaij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Accounting Law of the PRC) 规范会计工作的法律。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85年5月1日起施行。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正、重新公布施行。

会计法共6章30条。主要内容是：①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办理会计事务，必须遵守会计法。②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办理会计事务，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③有关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等事项，必须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并妥善保管。④各单位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对本单位实行会计监督，对原始凭证是否真实合法、帐簿记录与实物和款项是否相符、本单位的各项收支是否合法等有权进行会计监督，对违法的收支不予办理。⑤各单位必须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税务机关的监督，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情况，不得拒绝、隐瞒、谎报。⑥各单位会计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内部稽核制度、会计人员的管理等。⑦单位领导人、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反会计法的行为，要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Kuangchan Ziyu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Mineral Resources Law of the PRC)

用来调整和规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关系的法律。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此前后，1951年4月26日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1965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

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共7章53条。

矿产资源法规定的主要制度是：①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申请人、采矿权申请人按照面积缴纳国家规定的费用后，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②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③探矿权、采矿权依法转让制度。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④矿产资源勘查的统一登记制度。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按照标准区块进行统一登记，并颁发勘查许可证。⑤矿产储量审批制度。国家对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勘探报告进行审查批准。⑥地质资料汇交制度。矿产资源勘查成果档案资料 and 各类矿产储量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统一汇交或者填报。⑦矿产资源开采的统一登记制度。国家对开采矿产资源进行统一审批登记，并颁发采矿许可证。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Lao-do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Labor Law of the PRC)

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共13章，分别为总则、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计107条。

该法确立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制度。主要内容有：①规定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义务。②明确劳动就业的方针和国家、地方各级

政府对促进就业的责任。③确立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内容、种类、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程序，以及劳动合同的履行、终止、变更、解除和无效等。规定了集体合同的内容和订立程序。④确立工时制度。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⑤确立休息和休假制度。⑥确立按劳分配的工资分配原则和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⑦确立劳动安全卫生制度。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⑧确立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的制度。⑨确立职业培训制度。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发展职业培训事业，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并规定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的责任。⑩确立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⑪确立解决劳动争议的制度。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并规定了解决劳动争议的原则和程序。⑫确立劳动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力，以及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Linghai ji Pilianq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Law of the PRC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领海及毗连区范围和管理的法律。1992年2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法共17条，不分章节。主要内容是：中国领海为邻接中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12海里。中国毗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12海里。中国对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底及底土。外国非军用船舶，享有依法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权利。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中国有权



在毗连区内,为防止和惩处在其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行使管制权。中国有关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时,可以对该外国船舶行使紧追权。此外,还规定国际组织、外国组织和个人在中国领海内的活动要求,外国航空器飞越中国领海上空的要求。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Lüs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Law of the PRC on Lawyers) 规范中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律。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

律师法共8章53条。主要内容是:①律师的性质。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②律师执业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国家实行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经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授予律师资格。律师执业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③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应当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有1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包括国办、合伙、合作律师事务所3种形式。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④律师可以依法从事各项律师业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不受侵犯。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⑤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违法执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fa Tongze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of the PRC) 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

章15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民法通则是民法的纲要。民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在法律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分。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分关系。民法调整的范围主要包括总则、物权、知识产权、债权、人身权、继承权、民事责任、法律适用8部分。民法通过调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民法通则共9章。包括基本原则、公民、法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所有权、知识产权、债权、人格、婚姻、亲属、继承、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期间、诉讼时效、冲突规范、适用范围等内容,涉及民法的各个领域,但它的规定多是提纲挈领的,既比民法总则的内容多,又比民法典的内容少,近似一部民法纲要。与民法通则相配套的民事单行法有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等,这些单行法与民法通则共同构成90年代中国的民法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中国特色。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shi Suso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 规范民事诉讼活动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保障民事实体法贯彻实施的程序法。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分4编、29章,共270条。

该法是在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总结实践中的经验,补充、修改形成的。该法规定,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诉讼是民事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

人代为诉讼。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②有明确的被告;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它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地域管辖是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民事诉讼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法律规定特殊的管辖地点的,或者法律规定专属管辖的,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管辖。

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或者提出反诉,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回避,提供证据,申请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进行辩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请求调解,自行和解,撤回诉讼,提起上诉和申诉,申请强制执行等权利。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法庭秩序和诉讼期限,交纳诉讼费用,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的法律制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般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除诉讼案件外,民事诉讼法对非讼案件,如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规定了特别程序。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提出再审。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调解以及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的裁判结果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中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编的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yong Hangko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Civil Aviation Law of the PRC)

规范和管理民用航空活动的法律。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日起施行。共16章214条。在此之前，1950年11月1日，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规范航空器的飞行活动。该规则曾于1964年、1977年作过两次修订。自1985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布或批准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过一系列行政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和《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等。

该法确立的主要法律制度是：①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制度。凡具备法定登记条件的民用航空器均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籍登记，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②民用航空器权利人依法享有民用航空器权利。主要包括民用航空器的所有权、抵押权、优先权，以及因租赁合同产生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及其他权利。③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民用航空器的设计型号审查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维修许可制度、进口型号认可制度等。④航空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航空人员执照制度，航空人员检查、考核制度，机组人员飞行中的行为规范等。⑤民用机场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民用机场建设管理制度、机场使用许可制度、净空保护制度等。⑥空中航行基本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空域管理的基本原则、飞行管理的基本规则和飞行保障制度等。⑦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有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许可证制度、企业经营中的行为规范等。⑧公共航空运输中的民事法律制度。规定了承运人与托运人、旅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了承运人的严格责任制度和责任限制制度。⑨通用航空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经营性通用航空业务的许可制度、非经营性通用航空业务的登记制度、对地面第三人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等。⑩民用航空器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搜寻援救制度和失事民用航空器的事故调查制度。⑪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制度。确立了民用航空经营人的严格责任制和责任限制制度。⑫对外国民用航空器的管理制

度。主要规定了外国民用航空器进出中国的批准制度、外国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责任的强制保险或担保制度、外国民用航空器经营涉华航班运输的许可证制度和不定期运输的批准制度，以及国内载运权的保留制度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zu Quyu Zizh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Law of the PRC on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根据宪法的规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主要内容有：①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治机关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权限行使自治权。②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可以建立以一个或者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或者民族乡。同时，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包括一部分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居民和城镇。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和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③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

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自治地方在经济建设、计划安排、财政预算、教育、文化等方面享有自治权。④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国家设立各项专用资金，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商业、供销、医药企业给予照顾；在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在投资、贷款、税收以及生产、供应、运输、销售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发展交通、能源，发展和改进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组织和支助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和技术协作；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采取多种形式调派适当数量的教师、医生、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参加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加速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事业，提高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zu zizhi difang de zizhi jigua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local organs of the autonomous mino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由本行政区域内的各族人民依法选举的代表组成。自治区、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本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自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州州长、副州长，自治县县长、副县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他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根据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和自治县县长的提名决定，每届任期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同。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国务院的统一领导。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包括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政策;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地管理地方财政;依照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自主地管理本地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各项事业,保护和管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在执行职务时,可以依照有关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Nongye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Agriculture Law of the PRC) 规范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生产经营活动,调整由此产生的各种关系的基本法律。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共9章66条。

1982年1月1日、1983年1月2日、1984年1月1日、1985年1月1日、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5个1号文件,逐步废除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新体制。1979~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先后通过、发布了约20部农业单项法律、行政法规,分别对农业某个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

规范、引导。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要抓紧制定农业基本法律法规,确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据此,在总结农业单项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农业法。

农业法的指导思想是:以法律形式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把行之有效的农业基本政策法律化,为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主要内容是:①明确了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权属和农业基本经济制度。②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③推广先进实用技术,靠科技进步发展、振兴农业。④保护扶持农业发展,实行动植物检疫制度,建立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宏观调控制度、重要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设立风险基金,规范农业投资渠道,建立农业专项基金。⑤建立完善农业综合服务体系。⑥保护生产者合法财产,保证生产者依法缴纳税款、提留和统筹费并承担劳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⑦保护农业环境与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Paima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Auction Law of the PRC) 调整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和买受人之间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共6章69条。在此之前,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体改委《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在若干中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物的拍卖业务。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这些文件对拍卖业的管理,拍卖企业的行为,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的权利义务等作了一些规定。

该法规定的主要制度是:①拍卖标的的附带的第三人权利的制度。即被拍卖标的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是独立的,不存在第三人对其主张权利的条件。②公物拍卖制度。规定有关公物拍卖的对象、主体等内容。③拍卖人审核登记制度。即拍卖企业的设立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规范。④拍卖师制度。主持拍卖

的人员应当具备的从业资格。⑤公告与展示制度。在拍卖前对有关拍卖活动的事项向社会公布,并对拍卖标的进行展览。⑥有底价拍卖制度。拍卖标的被确定了最低出让价格,竞买人的竞价达不到该价格时不得出让。⑦佣金制度。拍卖人向委托人、买受人收取服务费用。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Piaoj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Negotiable Instrument Law of the PRC)

调整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及追索等票据活动的法律。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96年1月1日起施行。共7章、111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①适用范围。在中国境内的票据活动,适用本法。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③汇票。规定了汇票的种类,出票的概念,出票时的资金要求,汇票必须记载的事项,背书、承兑、保证、付款、追索权等。④本票(本法所称本票是指银行本票)。本票出票人的资格由中国人民银行审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除本票有特别规定外,本票的票据行为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⑤支票。开立支票账户,申请人必须使用其本名,并提交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证件。开立支票存款账户和领用支票,应当有可靠的资信,并存入一定的资金。禁止签发空头支票。⑥规定了涉外票据的概念和涉外票据的特别法律适用。⑦规定了7种票据欺诈行为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行政处罚,并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he Difang Geji Renmin Daibiao Dahui Xuanj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Electoral Law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of the PRC) 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的基本法律,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五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28日进行了修改。它的主要内容有：①选举的基本原则。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以及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除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县、乡两级实行直接选举，设区的市、自治州、省一级和全国，实行间接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②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采用按基数加权人口数增加代表名额的办法确定，并有最高名额的限制。全国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大代表名额，原则上按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对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分配，实行适当照顾的原则。③直接选举。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民登记实行一次登记，长期有效的办法。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④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人的名额，实行差额选举。⑤投票选举。直接选举的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选民凭选民证或者身份证领取选票，在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在选举大会上投票。间接选举的投票选举，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在另行选举时，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间接选举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Zuz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Organic Law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 全国人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颁布过两部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一部由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本法执行中断。第二部由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大组织法共4章46条。主要内容是：①全国人大会议。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全国人大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全国人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全国人大会议由主席团主持。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可以提出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全国人大会议进行选举和通过议案，由主席团决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或者举手表决方式或者其他方式。全国人大举行会议的时候，应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译。全国人大会议公开举行；在必要的时候，经主席团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决定，可以举行秘密会议。②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从代表中选出。委员长主持常委会会议和常委会的工作，副委员长、秘书长协助委员长工作。常委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常委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常委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派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常委会审议法律案和其他议案，由常委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

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认为需要设立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④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接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Quanguo Renmin Suoyouzhi Gongye Qiye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Law of the PRC on Publicly-Owned Enterprises) 调整国有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规范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与义务的法律。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1988年8月1日起施行。从80年代初开始，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共8章69条。主要包括：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厂长，企业的职工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法律责任等。规定的法律制度是：①国有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②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③国有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④国有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自行销售本企业产品的权利；自行选择供货单位的权利；自行确定产品价格和劳务价格的权利；有权支配使用流动资金；有权出租或者有偿转让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固定资产；有权确定工资形式和奖金分配办法；有权录用、辞退职工；有权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摊派。同时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的相应义务。⑤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目标，为企业提供服务，并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企业实行管理和监督。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Renmin Jingcha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Police Law of the PRC*) 规范人民警察队伍建设,保障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7年6月25日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

该法共8章52条。主要内容有:①人民警察的范围。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②人民警察的任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③人民警察的职责。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管理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管理户籍、国籍、入境出境业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④人民警察的权限。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并可采取其他法定措施;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依照法定条件,可以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可以依法使用武器和警械;可以依法执行拘留、搜查、逮捕等强制措施以及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依法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依法实行人群聚集的现场管制,采取必要手段强制驱散,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因履行职责的紧急需要,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优先通行;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⑤人民警察的督察制度。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⑥人民警察的警衔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enli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Fo-

*resty Law of the PRC*) 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法律。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85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此前,1950年5月16日政务院曾颁布《政务院关于全国林业工作指示》,1951年公布《政务院关于适当地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1953年公布《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1961年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1963年公布《国务院森林保护条例》,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

森林法共7章49条。主要内容是:①规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的流转。②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③加强对征用、占用林地的管理,国家对征用、占用林地建立了严格的审批制度。④严格控制珍贵木材的出口。首先是限制出口量,其次经批准出口的珍贵木材,须办理允许出口证明书。⑤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angbiao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Trademark Law of the PRC*) 规范商标注册、使用、管理以及保护商标专用权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属于知识产权法的范畴。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83年3月1日起施行。1993年2月22日根据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进行了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商标立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和1963年国务院颁布的《商标管理条例》。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结合国情并借鉴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制定了商标法,并有商标法实施细则及有关规章与之配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商标法律体系。

商标法共8章43条。主要内容是:①规定对商标权的取得实行注册原则,即对注册商标实行法律保护。未注册商标可

以使用,但没有专用权,不受法律保护。②规定了商标的构成要素及商标禁用内容。③规定了商标的申请、审查和核准。包括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资格,对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和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相结合的原则,对商标局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的异议程序和对商标的复审程序等。④规定了商标注册的有效期和续展期。⑤规定了注册商标所有人有权将其注册商标进行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⑥规定对不符合商标法有关规定的已注册商标进行撤销的程序。⑦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包括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及应当承担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angye Yinha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Law of the PRC on Commercial Banks*) 规范和管理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法律。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共9章91条。在此之前,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对国家专业银行的地位和职能作了规定;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和原则。

该法主要内容是:①商业银行是依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由其章程规定,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②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③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守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商业银行应当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④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商业银行的贷款,应当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⑤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需要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⑥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

商业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包括依法审批商业银行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依法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账等情况随时进行稽核、检查监督,要求商业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报表和资料,对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的商业银行实行接管等。⑦对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enj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Audit Law of the PRC) 调整与国家审计监督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85年8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1988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

审计法共7章51条。主要内容是:①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②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审计机关负责人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的,不得随意撤换。③国家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的财务收支,国有企业、国家建设项目的财务收支,社会公益资金的财务收支以及国外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等,都必须接受审计监督。④审计机关有权要求被审计单位报送有关资料,检查被审计单位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通知暂停拨付、暂停使用与违反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直接有关的款项,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作出处理等。⑤健全审计程序,包括组成审计组,送达审计通知书,进行审计调查,提出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等。⑥对有关审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enpan zhidu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制度** (judi-

ci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职权、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总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的审判权。

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各级人民法院每届任期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向它报告工作,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领导审判活动,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人民法院通过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活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惩治犯罪分子,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遵循如下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依法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公开审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合议制审理;回避制度;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ipin Weisheng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Food Hygiene Law of the PRC)

确定食品卫生监督制度的法律。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95年10月30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

食品卫生法共9章57条。主要内容是:①适用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都必须遵守本法。本法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也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②食品的卫生。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卫生标准。法律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的卫生要求,并对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作了规定。③食品卫生管理。各级人民政府的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并对执行本法情况进行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加强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具有特定功能的食品,其产品和说明书必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不得有害于人体健康;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等等。④食品卫生监督。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铁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确定具备条件的单位为食品卫生检验单位,进行食品卫生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法律还规定了食物中毒事故的控制措施及报告制度。此外,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u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Water Law of the PRC)

调整水资源(不含海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水害防治关系的法律。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88年7月1日起施行。共7章53条。在此之前,198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防御特大洪水的紧急指示》;1984年6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开展城市节约用水的通知》;1985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1987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清除行洪障碍保障防洪安全的紧急通知》。

水法所称水资源指地表水和地下水。

水法的指导原则是：对水资源实行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开发利用水资源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实行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主要内容是：①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②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③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进行统一规划，开发利用水资源必须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应当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实行兴利和除害相结合的原则。④国家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并依法征收水资源费和水费。还明确了生活、农业、工业和航运等用水顺序，规定水事纠纷的处理原则与程序。⑤禁止围湖造田、围垦河流，划定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对水、水域和水工程予以保护。⑥规定了防汛抗洪中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公民的义务、防汛指挥机构的职责、蓄滞洪区的划定、安全保障和有关补偿、防御洪水方案的制订等。⑦规定了违法取水、截水、阻水、排水，违法设障，违法修建水工程，毁坏水工程，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水工程器材的行为及处罚办法。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uitu Baoc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Law of the PRC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法律。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在此之前，国务院于195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82年制定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水土保持法共6章42条，主要内容是：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明确了各级政府在水土保持方面的职责；加大了监督处罚力度，以保证法律的实施；依靠群众和国家扶持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水土流失加以治理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ui Wuran Fangz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Law of the PRC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规范陆地水污染防治的环境保护法律。1984年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

经修正，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同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79年9月13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水污染防治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共7章46条。主要规定：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水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建设项目中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②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③排污收费制度。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排污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并负责治理。④限期治理制度。⑤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排放标准，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并对有排污量削减任务的企业实施该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核定制度。⑥加强水污染防治的流域管理。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区域进行统一规划。⑦城市污水集中处理。⑧现场检查。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⑨水污染监测。⑩严格保护饮用水源。⑪严格控制小造纸、小制革等小型重污染企业的发展。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ui shou Zhengshou Guanl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on of Tax Collection*) 规范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法律。1992年9月4日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通过，1993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决定》，修订后重新公布施行。

该法共6章62条。主要内容是：①统一各类税收的征收管理制度，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②健全税收的基础管理，包括税务登记制度、账簿及凭证管理、纳税申报三个环节。③强化税务机关的依法征收税款的权力。④明确税务机关检查的范围，包括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账簿、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纳税人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纳税人托运、邮寄应税商品、货物的单据、凭证的有关资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帐户等。⑤完善税务机关的执法制约制度和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对税务机关行使权力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如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不当给纳税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等。⑥对税收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统一了加收滞纳金的标准，加大了处罚的力度，并明确了税收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iy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Law of the PRC on Sports*) 规范体育活动的法律。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共8章56条。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态度；体育工作的方针、任务、基本原则和重大措施；群众体育的基础地位；学校体育的内容和保障；竞技体育的原则以及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管理；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企业事业组织、群众性体育团体和公民个人在参与体育活动和开展体育事业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iel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Railway Law of the PRC*) 调整国家、铁路运输企业、旅客、托运人之间在铁路运输、铁路建设和铁路安全与保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1990年9月7日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1991年5月1日起施行。共6章74条。在此之前，1985年12月，铁道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了《铁路工程勘测设计实施办法》；1986

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发布了《铁路运输合同实施细则》；1987年7月，铁道部发布了《快运货物运输办法》，同年9月，又发布了《危险货物运输规则》；1989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铁路法所称铁路，包括国家铁路、地方铁路、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铁路法的主要法律制度是：①国家铁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运输管理体制。②铁路运输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制度；③铁路运输企业具有公用性的制度；④保护铁路设施和运行安全的制度；⑤铁路运价实行国家定价的制度；⑥铁路运输实行合同制的制度。⑦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ongj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Statistics Law of the PRC*) 调整与统计有关的社会关系，明确统计工作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的法律。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4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施行。

统计法共6章28条。主要内容是：①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法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③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修改；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或者编造虚假数据。④统计调查必须按照经过批准的计划进行。统计调查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收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严格限制发往基层单位的全面定期统计报表。⑤统计资料由统计机构统一管

理。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统计资料，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负有保密的义务。统计机构依法定期或者不定期公布统计资料。⑥对有关统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udi Gaige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Land Reform Law of the PRC*)

为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而制定的法律。该法草案由中共中央提出，经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审查同意，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施行。同年6月2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6月30日公布施行。该法共6章40条，对土地改革的目的、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该法的适用范围等问题作了规定。该法总结了中共以往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策，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Tudi Guanl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of the PRC*) 调整土地管理关系的法律。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0年6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铁路留用土地办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3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并由国务院于1957年10月18日予以修正。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通过了《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要求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订土地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的利用和保护、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建设用地等作了明确规定；1988年12月29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并确立了“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同时决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共8章86条。包括：总则、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基本原则是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主要内容：①将土地管理方式由以往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改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效力，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加强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②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上收审批权，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权、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审批权和征地审批权。③充实和完善法律责任，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Wai-guoren Rujing Chujing Guanl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Law of the PRC on Control of Aliens Entering and Leaving China*)

规范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及在我国境内居留、旅行的专门法律。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86年2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51年5月24日政务院发布了《进出口列车、车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及《进出口飞机、机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196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65年4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边防检查条例》。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共8章35条。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有：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外国对中国公民入境、过境有专门规定的，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该法还规定了签证和其他证件制度，口岸查验制度，违法惩处制度等。经国务院1986年12月3日批准，同年12月27日公安部、外交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1994年7月重新修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Wai-shang Touzi Qiye he Waiguo Qiye Suodeshu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Income Tax Law of the PRC for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规范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即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1年7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法律对外商实行按不同的投资合作方式分别立法征税。

该法共30条。主要内容为：①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的所得额；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为3%。③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④为了体现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方向，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包括按优惠税率征税、在一定期间给予免税减税、实行再投资退税等。⑤外商投资企业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发生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⑥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事项。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Waizi Qiye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Law of the PRC o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保护和管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法律。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共24条。规定了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基本政策，外资企业的设立条件、审批机关、法人资格、劳动管理、税收待遇、外汇管理、经营期限、监督管理等。它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②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③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④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⑤外资企业雇佣中国职工应当依法签订合同。外资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⑥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进行独立核算，并接受财政税务机关的监督。⑦外资企业依法纳税并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其税后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的，再投资部分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申请退税。⑧外资企业应当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其外汇事宜，依照国家外汇管理规定办理。⑨外国投资者从外资企业获得的合法利润，可以汇往国外。⑩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外国投资者申报，由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期满需要延长的，应当在期满180天以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Weichengnianren Baoh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Minors*)

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法

律。1991年9月4日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1992年1月1日起施行。共7章56条。

为未成年人立法是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权利的迫切需要。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护未成年人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方面。对此，该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该法分别设立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等。为了保证法律得到严格实施，该法还规定了“法律责任”一章。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Wenwu Baoh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Relics*)

确定国家对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法律。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同日起施行。

文物保护法共8章33条，主要内容：①受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②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等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③考古发掘和文物的调

用。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发掘。考古挖掘文物和出土文物及馆藏文物的调用，须由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部审核、批准。<sup>④</sup>私人收藏文物与文物出境。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指定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禁止倒卖牟利或私自卖给外国人。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必须向海关申报，经有关部门鉴定并取得许可出口凭证。重要文物出国举办展览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此外，对奖励与惩罚也作了规定。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和职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4部宪法，即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的宪法草案全文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又对草案进行修改，提交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954年宪法除序言外，分四章：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共106条。宪法贯穿着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有权解释法律，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任免国

家工作人员。宪法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的职权作了规定。并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宪法还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宪法的规定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

宪法序言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国家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并鼓励个体农民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合作社；国家保护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供销合作；国家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造成严重破坏。1975年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这部宪法于1975年1月17日由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它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观点和做法。它的内容也过于简单，虽体例与1954年宪法相同，但一共仅30条，删去了1954年宪法中的许多应当在宪法中规定的内容。关于公民权利一章，由原来的19条并成4条，并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关于国家机构，取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制；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实际上取消了检察机关。

####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制定的。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这部宪法内容作了修订，比1975年宪法有明显改进。体例仍与1975年宪法相同，条文增至60条，公民权利一章由4条增至16条，恢复设立人民检察院。但是，这部宪法的内容中仍有明显的“左”的思想影响，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对1978年宪法作了下述修改：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1980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又对1978年宪法的第四十五条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1982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宪法修改草案公布，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这部宪法。

1982年宪法除序言外，有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共138条。这部宪法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部宪法主要有以下特点和新发展：<sup>①</sup>进一步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对保护人权作了全面规定，既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又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

权利,还包括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利的保护。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训,增加了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以及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

②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全面规定,充实了关于发展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的内容,并充实了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关思想建设方面的内容。

④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作了一系列进一步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规定。主要是: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原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了加强全国人大的工作,增设一些专门委员会。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以健全国家体制。第三,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四,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为了加强对财政、财务活动的监督,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审计机关。第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第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充实了新内容,更好地体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第七,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权。第八,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第九,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了过去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第十,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⑤关于国家统一。宪法序言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规定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

1982年宪法通过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又相应地对宪法进行了适当的修改。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条和第二条宪法修正案,决定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并将宪法中关于不得出租土地的规定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三条至第十一条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序言和条文主要作了下述修改:①在序言中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内容。②在序言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规定。③将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④将宪法中“国营经济”、“国营企业”的用语相应修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⑤删去宪法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定,增加“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内容。⑥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6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序言和条文主要作了下述修改:将序言第七自然段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

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六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宪法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g-zhen Qiye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Law of the PRC o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法律。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共43条。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创举。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法通过法律形式把中共中央、国务院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乡镇企业支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义务、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等稳定下来,并对乡镇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和制约。该法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乡镇企业的主要任务;明确国家发展乡镇企业的原则和方针;国家保护

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从政策、税收方面给予扶持；规范乡镇企业的行为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Jibe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 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简称香港基本法。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宣布中国政府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将以香港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任命了59名起草委员会委员，其中内地委员34名，香港委员25名。1985年12月18日，香港的25位委员受起草委员会委托共同发起和筹组由180人组成的民间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成立。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香港基本法草案后，决定将草案公布，同时在香港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求意见。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基本法，同日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第26号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

香港基本法由序言、9章共160条和3个附件组成。主要内容是：①序言。叙述香港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规定国家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②第一章总则。规定香港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的基本原则，即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土地和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香港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香港可以使用区旗、区徽，等等。③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国防、外交事务；依照本法规定任命香港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等等。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处理香港的行政事务；享有立法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除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法律，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列于本法附件三外，其他全国性法律不在香港实

施，等等。④第三章居民的权利和义务。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居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在香港境内有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⑤第四章政治体制。规定了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产生、职权范围和相互关系；区域组织的性质和职责；公务员的条件和要求，等等。⑥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第七章对外事务，第八章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附则。⑦三个附件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 推荐书目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7。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ofeizhe Quanyi Baohu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调整消费者与经营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共8章55条。

该法所称的消费者，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要规定是：①消费者的权利。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公平交易的权利；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等。②经营者的主要义务。保障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真实信息；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保证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依法承担包修、包

换、包退等责任；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③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争议时，消费者可以选择5种解决争议的方式：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④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死亡的，应当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Criminal Code of the PRC) 规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对犯罪如何处罚的基本法律。属于实体法。

刑法的立法情况 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三十几稿。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指示精神，刑法草案的修改工作又重新开始。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0年1月1日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刑法典。它对巩固政权，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犯罪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1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新形势下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采取较灵活的立法方式，先后制定了22个有关刑法的决定和补充规定，针对新出现的犯罪情况对刑法作了及时的补充、修改。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共有23个单行刑事法律。在此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根据需要在若干行政、经济、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刑法规范。逐步形成了以刑法典为主，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规范为辅的刑法体系。

为了使刑事法律进一步统一、规范，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刑法。新刑法对 1979 年刑法作了比较全面的修订,修改吸收了单行的有关刑法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以及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有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将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经过修改后编入刑法。1997 年刑法由 1979 年刑法的 192 条增加为 452 条,是一部统一的、较完备的刑法典。

1997 年刑法的主要内容 分总则、分则两编。总则共 5 章 101 条。规定了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和刑事责任,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单位犯罪,刑罚的种类,刑罚的具体运用等。分则共 10 章 350 条。对以下 10 个方面的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它们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附则 1 条。

在总则中,1997 年刑法进一步明确了刑法的基本原则。首先,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个原则的确立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三,明确规定了罪刑相当原则。就是重罪的刑罚要重,轻罪的刑罚要轻。同时,还对刑法的一些重要制度作了修改、完善。如对正当防卫制度,1979 年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于这一规定较为笼统,实际执行中容易造成不利于制止犯罪、保护受害人的情况,1997 年刑法修订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增加规定一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对犯罪后自首立功的,为了体现我国的刑事政策,作了进一步宽大的规定。并对自首作了明确的界定,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完善了减刑和假释制度。对减刑假释的条件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的程序,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假释。并增加了“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

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累犯从严惩处的精神。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针对一些法人组织和单位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违法犯罪较为突出的情况,对什么是单位犯罪以及对单位犯罪如何处罚作了具体规定。

原刑法分则为 8 章 103 条,修订后的刑法增为 10 章 350 条,对原刑法分则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如第一章将原来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考虑到中国目前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从保卫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把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称作危害国家安全罪比称作反革命罪更为合适,故做了修订。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三章将原刑法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犯罪作了规定。具体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方面的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共 8 节,77 条。为了加大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保护力度,1997 年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增加规定了强迫职工劳动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并将原刑法规定的破坏婚姻家庭罪纳入本章加以规定。根据社会管理秩序所涉及的不同方面,1997 年刑法第六章具体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妨害文物管理罪,危害公共卫生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罪,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共 9 节,91 条。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犯罪,如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扰乱法庭秩序罪,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和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非法行医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重大污染事故罪等。同时,将原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具体规定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为了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将贪污贿赂犯罪单独规定为一章,并针对实践中新出现的一些犯罪现象作了补充。如

增加了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考虑到原刑法对渎职罪规定得过于笼统,有的处刑也偏轻,修订后的刑法将十几年来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增加规定了具体的渎职行为,由原刑法规定的 8 条增加至 23 条。这些规定为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有利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洁。为维护国防利益,保护国家安全,根据打击这类犯罪的实际需要,1997 年刑法增加了危害国防利益罪一章,共 14 条。修订后的刑法将原军职罪暂行条例中规定的有关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单独规定为一章,共 32 条。

这部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中国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步骤,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重要体现。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shi  
Suso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

规范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1979 年 7 月 1 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 198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1996 年 3 月 17 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又对该法作了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共 4 编、17 章、225 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程序、相互关系、证据制度,以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体现了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宗旨和方针。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①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负责批准逮捕、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负责审判。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

权行使这些权力。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⑤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⑥审判公开原则。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满18周岁的少年人犯罪外，其他案件一律公开审理。⑦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⑧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⑨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如下：①立案。决定开始侦查或审理。②侦查。目的是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侦查，其他案件则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③提起公诉。案件侦查终结后，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④第一审程序。即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初次审判的程序。包括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开庭审判，对决定审判的案件进行审理前准备和法庭审理、判决等。⑤第二审程序。即上诉程序。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判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⑥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必须由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判处，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目前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因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而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在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⑦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可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⑧执行。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由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对裁判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zheng Chufa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的法律。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1979年以来，中国的大量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了行政处罚；在公安、财政、工商管理领域，还制定了有关行政处罚的专门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关于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等。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行政处罚法》，共8章64条。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①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才受处罚，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处罚的，不受处罚。②处罚公正、公开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实施行政处罚要公开。③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④保障当事人权利原则。主要制度有：①行政处罚设定权制度。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的罚款，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规定。②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制度。可以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有：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具备法定条件的事业组织。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④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应当遵循法定程序。⑤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根据

《行政处罚法》的授权，1997年11月17日国务院制定了《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⑥政府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zheng Fuy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专门监督和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法律。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共7章43条。在此之前，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曾颁布《行政复议条例》，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对条例作过修正。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同级或其上级行政机关复议，给予重新裁定，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从事的行政管理行为，包括基层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情所从事的一次性具体行政行为及上层行政机关作出的、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在实际工作中要经常反复地适用，大多为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机关来说，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制度，即基层监督；对公民来说，是行政救济制度；对司法机关来说，是行政司法制度。

行政复议法为公民权利提供了方便、快捷、全面的救济。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行政复议法在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的职责后，对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以及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责任，都作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附则一章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期间的计算和文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期间、送达的规定执行”；

宣布本法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990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1994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同时废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  
zheng Jiancha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规范行政监察制度的法律。1997 年 5 月 9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 年 5 月 9 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7 月, 政务院连续发布了 4 个规范行政监察组织建设的法规。1955 年 11 月, 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组织简则》。1959 年以后, 中国的行政监察制度遭到破坏。1986 年 12 月恢复设立监察部。1990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共 7 章 48 条。主要内容是: ① 监察对象。指监察机关依法进行监察的机关和人员, 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② 双重领导体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 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③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的措施: 查阅、复制有关材料; 要求监察对象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责令监察对象停止违法违纪行为。④ 监察机关调查违反政纪行为时可以采取的措施: 暂予扣留、封存可证明违反政纪行为的有关材料; 责令违反政纪的嫌疑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作出解释和说明; 查阅涉嫌单位、人员在银行的存款, 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存款等。⑤ 监察建议。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监察对象或者有关部门就有关监察事项提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意见。⑥ 监察决定。监察机关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对监察对象作出处理决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ng-  
zheng Suso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 调整行政诉讼活动和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程序法。1989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共 11 章 75 条。

该法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是行政诉讼。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 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② 有明确的被告; ③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④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包括: ① 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②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③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④ 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 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⑤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⑥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⑦ 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⑧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此外人民法院还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一审行政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但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 海关处理的案件, 对国务院各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 依法进行审理,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并可参照规章对案件作出判决。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效力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必须履行, 拒绝履行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 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 实行对等原则。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uewei  
Tiaol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Rules of the PRC on Academic Degrees*) 确定学位制度的法律。1980 年 2 月 12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过, 1981 年 1 月 1 日施行。条例共 20 条。主要内容: ① 学位的划分和授予的条件。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或者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的人员, 达到不同学位要求的学术水平, 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 授予学位。② 学位的授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 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 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 组织有关学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 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条例还规定了学位可以被撤销。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Yaopin  
Guanli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Law of the PRC on Pharmaceuticals Control*) 确定药品管理制度的法律。1984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8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药品管理法共 11 章 60 条。其主要内容是: ① 药品生产企业的管理。开办药品生产企业必须经过审批, 取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生产药品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厂房、设施和卫生环境以及能够进行质量检验的机构、人员、仪器设备。药品生产必须按工艺规程进行生产, 所需原料等必须符合药用要求, 必须符合卫生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制定和执行保证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和卫生要求。② 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必须经过审批, 取得《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药品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与经营药品相适应的技术人员、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和卫生环境。法律对药品的收购、销售以及仓储作了严格要求, 并对中药材以及其他药品在城乡集市贸易市场的销售作了限制性规定。③ 医疗单位的药剂管理。医疗单位必须配备技术人员, 配制制剂必须经过审批, 取得《制剂许可证》, 具有保证制剂质量的技术人员、设施、检验仪器和卫生条件, 医疗单位配制的制剂, 不得在市场销售。④ 药品的管理。国家鼓励研究、创制新药, 研制新药应当符合有关规定。生产除中药饮片外的

新药必须符合药品标准, 必须经过批准, 取得批准文号。禁止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对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 必须每年进行健康检查。⑤药品监督。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药品监督职权, 可以设置药政机构和药品检验机构, 并规定了设在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监督员的职责。根据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原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行使的药品监督管理职权, 移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使。⑥法律责任。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 未取得有关许可证生产、经营药品或者配制制剂的; 违反规定造成药品中毒事故等行为,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Yiwu Jiaoyu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Law of the PRC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确定义务教育制度的法律。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义务教育法共有 18 条。主要内容是: ①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事业,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 实行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创造条件, 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不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对其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批评教育, 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对招用适龄儿童、少年就业的组织或者个人, 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停止招用; 情节严重的可予以行政处罚并处罚。②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和规定年限。凡年满 6 周岁的儿童, 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 可以推迟到 7 周岁入学。国家实行 9 年制义务教育。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③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义务教育所需经费, 由国家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 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 并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 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设立助学金, 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 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 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 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各类学校。④与义务教育

有关的法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Youzhe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Post Law of the PRC*)

调整邮政关系, 规范邮政工作, 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法律。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共 8 章 44 条。规定的法律制度是: ①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法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②用户交寄的邮件、交汇的汇款和储蓄的存款受法律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检查、扣留。③邮政企业应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邮政企业和邮政工作人员不得向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用户使用邮政业务的情况。④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或者冒用邮政专用标志、邮政标志服和邮政专用品。⑥用户交寄邮件, 须遵守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关于禁止寄递物品、限量寄递物品的规定。用户交寄除信件外的其他邮件, 应交邮政企业或其分支机构当面验视内件。拒绝验视的, 不予收寄。⑦用户对交寄的给据邮件和交汇的汇款, 可持据查询。查复期满无结果的, 邮政企业应予赔偿或采取补偿措施。用户因损失赔偿与邮政企业发生争议的, 可要求邮政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⑧邮政企业经营下列业务: 一是国内和国际邮件寄递; 二是国内报刊发行; 三是邮政储蓄、邮政汇兑; 四是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擅自停办规定的必须办理的邮政业务。⑨邮政业务的基本资费, 由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制定, 报国务院批准, 非基本资费由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单位均负有承运邮件的责任, 保证邮件优先运出, 并在运费上予以优惠。邮政法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Yuye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Fisheries Law of the PRC*)

保护渔业资源、保障渔业发展的法律。1986 年 1 月 20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共 6 章 35 条。在此之前, 1979 年国务院颁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该法的主要内容是: 确定国家渔业生产的方针; 大力发展养殖业; 鼓励、扶持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 合理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 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为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 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 规定禁渔区和禁渔期制度; 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产种苗; 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以保证法律的施行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i'an Guanli Chufa Tiaoli

###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Rules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for Public Security*) 公安机关实施社会治安管理,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法律。1986 年 9 月 5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1994 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决定》修正。共 5 章 45 条。

主要内容: ①治安管理处罚的原则。凡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情节轻微的, 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等等。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警告: 1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1 日以上 15 日以下的拘留。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他人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违反消防管理、违反交通管理、违反户口或居民身份证管理、卖淫嫖娼、种植毒品原植物、赌博行为以及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④治安管理处罚的裁决与执行。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 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 警告、50 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 在没有派出所的农村, 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裁决; 警告、50 元以下的罚款以及被处罚人没有异议



的其他处罚,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其他处罚适用传唤一讯问(不超过24小时)一取证一裁决的程序,制作裁决书并向本人宣布;对拒交罚款的,除强制缴纳罚款外,可另处15日以下拘留;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诉,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诉、起诉期间,原处罚不停止执行,有担保人或者缴纳了保证金的,原处罚暂缓执行。⑤对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要求。公安人员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权时,应严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严禁打骂、虐待、侮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对违反规定的公安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治安管理处罚有误的,公安人员应向受处罚人认错,退回罚款或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guo Renmin Yinhang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Law of the PRC o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的法律。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共8章51条。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长期行使中央银行和一般银行的职能。1979年后,中国恢复和设立了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般银行业务逐渐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去。自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的中央银行。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中央银行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后,根据改革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该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货币政策目标、职责、组织机构、人民币、业务、金融监督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②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按照规定审

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等。中国人民银行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工作报告。重大货币政策问题由国务院决策,其他事项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④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下列货币政策工具:要求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款准备金,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及外汇等。⑤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⑥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⑦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wai Hezi Jingying Qiye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Law of the PRC Sino-Foreign Join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保护和管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法律。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同年7月8日公布施行。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1990年4月4日起施行。

该法共15条。主要内容是: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经批准在中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②中国依法保护外国

合营者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③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营业。④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营各方可以现金、实物、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⑤合营企业设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由中外双方分别担任。董事会有权讨论决定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收支预算、利润分配、劳动工资计划、停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聘请等一切重大问题。⑥合营企业的合营期限,按不同行业、不同情况,作不同的约定。⑦对合营企业的管理,包括合营企业的设立程序、外汇、税收、财务、纠纷解决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wai Hezuo Jingying Qiye 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Law of the PRC on Sino-Foreign Joint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保护和管理中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法律。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

该法共28条,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地位、设立程序、组织机构、经营管理方式及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外合作者举办中外合作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中外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中外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中外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企业的重大问题。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聘请总经理负责中外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方式由中外合作者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协商确定。③中外合作者依照中外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益或者产品,承担风险和亏损。中外合作者在中外合作企业

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中外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可以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中外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合作者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外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对中外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yang Junshi Weiyuanhui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构。简称国家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根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

中央军委由主席和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其他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或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军委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据此，1983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并根据邓小平的提名，于6月20日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委员。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4月9日，根据邓小平的提名，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为委员。1989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1990年3月1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4月3日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4月4日决定刘华清为副主席。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任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委员。1995年1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委员。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并根据江泽民的提名，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委员。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增补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委员。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yang Renmin Zhengfu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它是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成立的。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由它任命并受其领导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52年11月15日又增设计划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另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1人，共同组成。它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其职权是：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执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批准或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批准或修改国家预算决算；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和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依法任免政府有关工作人员、驻外代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成员；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召集并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须有过半数委员同意始得开会，须经出席委员的过半数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1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1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闭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但国务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在性质、组织、职权、作用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等有很大差别。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yang Renmin Zhengfu Gonggao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Proclama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公告。公告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标志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caifa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Ar-

bitration Law of the PRC) 以仲裁的方式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程序法。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5年9月1日起实施。共8章80条。

仲裁法确定的仲裁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该法确立的仲裁基本制度有:①协议仲裁制度。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②或裁或审制度。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③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法对仲裁协议、仲裁程序、申请撤销裁决、仲裁执行、涉外仲裁等作了规定。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xi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根据1954年宪法规定设立,每届任期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空缺。1982年宪法恢复设立。

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的职权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可受主席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国家主席缺位时,由副主席继任;副主席缺位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正、副主席均缺位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至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ce  
Kuaijis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Law of the PRC on Certified Accountants) 管理和规范注册会计师、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

鉴证和服务作用的法律。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共7章46条。此前,1986年7月3日,国务院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对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活动进行规范。后又制定了本法。

该法的主要内容是:①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性质和职能。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会计师事务所是依法设立并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机构。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应当加入会计师事务所。②国家实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中国公民依法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从事审计业务工作2年以上,可以申请注册;准予注册的申请人,领取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发给国务院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注册会计师证书。③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承办审计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并出具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有关文件。注册会计师执业,可以查阅委托人的有关会计资料、文件、业务现场和设施。④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合伙设立,也可以是负有限责任的法人,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应当符合法定条件,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公正执行业务,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⑤注册会计师应当加入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是由注册会计师组成的社会团体,依法拟定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则,支持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业务,对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资格和执业情况进行年检。⑥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有应当拒绝出具报告的情形而未拒绝、未按照执业准则和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隐瞒委托人非法的财务会计处理等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  
zuoquan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Law of the PRC on Copyright)

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的法律。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1991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主要内容:①作品。著作权法调整的作品种类繁多,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

品、戏剧作品、舞蹈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摄制电影方式摄制的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和说明、地图、示意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②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著作权法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③著作权的内容,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是署名权。表明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二是修改权。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三是发表权。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以及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公之于众。四是使用权。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五是收益权。因行使使用权、转让权而获取报酬的权利。六是转让权。以赠予、出卖等方式处分著作财产权。七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④著作权的保护期。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时效的限制。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电影、电视、录像、摄影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著作权法不再保护。⑤法律责任。规定了侵权行为及应当受到的处罚,承担的法律后果。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l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Patent Law of the PRC) 规范授予发明创造专利权以及利用和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属于知识产权法的范畴。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5年4月1日起施行。1992年9月4日根据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对该法进行了修改。

为保护发明创造，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采用同时保护发明权和专利权的双轨制。从1963~1984年，我国只实行单一的发明奖励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在结合国情并借鉴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制定并施行了专利法，实行国际通行的对发明创造给予专利保护的制度，并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及有关规章，形成比较完整的专利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发明奖励制度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该法共8章69条。主要内容是：①关于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规定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予专利权。②关于授予专利权的条件。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是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对专利权的授予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并规定了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③关于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规定了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专利权的所有和持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转让。④关于专利的申请、审查和批准。规定了专利申请文件和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制度，规定了对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开和实质审查制度，以及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制度，规定了专利的复审程序和发明专利的诉讼程序。⑤关于专利权的期限，专利权的撤销、无效程序及其效力。⑥关于专利实施许可。规定了专利权人的自愿许可以及对专利的强制许可、计划推广。⑦关于专利权的保护。规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专利权人的权利，规定了专利侵权行为及违反专利法的其他行为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专利法的实施，调动了全社会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专利申请量逐年呈上升趋势。同时，促进了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uigao Guowu Huiyi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

(Supreme State Confer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4年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时召开的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由国家主席召集并担任主席。参加会议的一般有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员长、国务院总理和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国家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政议政的一种民主形式，对于提高国务活动的开放程度，促进最高决策的民主化起过一定作用。后来由于国家政治生活不够正常，最高国务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很少召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完全停止。1975年以后制定或修改的几部宪法，没再设立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条款。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uigao Renmin Fayua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Supreme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制度。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uigao Renmin Jianchayua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upreme Procuratora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家最高检察机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

Zhongjiwei Diyici Quanhui

### 中纪委第一次全会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CPC)

1979年1月4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建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到会的委员共97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列席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

陈云讲话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会议提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前要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抓好三个方面工作：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

的作风教育；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尽快建立和健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关于如何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通告》确定了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①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④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⑤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⑥敢于斗争，刚直不阿；⑦认真走群众路线；⑧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会议还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中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作了总结讲话。

#### 推荐书目

《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人民日报》1979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1998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Mei dashiji huitan

### 中美大使级会谈 (Sino-United States ambassadorial talks) 1955

~1970年中美两国大使断断续续举行的136次会谈。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开始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会谈。会谈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经过14次会谈，于9月10日达成协议，并发表声明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9月14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进行第二个议程，讨论双方有争议的其他实质问题，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国无权介入。美方表示，中美之间不使用武力的前提是，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地区“单独和集体的自卫”(实际上是阻挠解放台湾)。第二个议程由此搁浅。

1956年8月，中方陆续提出讨论美

国对中国禁运、中美人民之间的来往、新闻记者互访、司法协助等其他问题，均被美方以“双方放弃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会谈从此陷入僵局。1957年12月12日，中美会谈中断。1958年9月15日，中美会谈在波兰首都华沙复会。美方谈判首席代表改由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担任。由于双方仍坚持各自原来的立场，会谈没有进展，长期拖而不断。至1970年2月，双方举行会谈136次，在其他问题上未取得任何结果。

## Zhong-Mei guanxi huanhe

### 中美关系缓和 (relax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一系列外交接触和决策，使两国之间长期敌对的关系得到缓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敌视态度，造成两国20余年的隔绝。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表示“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中国方面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外交领域的极左错误的同时，面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的直接威胁，也考虑改变腹背受敌的不利状况。中美缓和的条件逐渐成熟。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多次表现出改善关系的意向，放宽了中美之间人员和贸易往来的限制。中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方面的这一变化，并及时采取对应措施。1969年2月，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召开座谈会，研究国际新形势。陈毅等人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陈毅还提出了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建议。

1969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向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转达了尼克松希望对话的意愿。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采取积极的措施。中美两国在波兰华沙恢复了长期中断的大使级会谈。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会见斯诺，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谈不成都行。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加快了谋求同中国接近的步伐，分别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带口信，向中国表达希望派秘密使节访问中国。中国方面对此作出

积极的答复。1971年4月6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期间，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大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在世界上引起巨大震动，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重大突破。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于当日会见了他们，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这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和发展定下基调。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同年2月28日，经过艰苦的谈判，在上海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后来又称作《中美上海公报》）。虽然因台湾问题，当时中美两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双方经过交往，毕竟恢复了两国历史性的联系，并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新的方向。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标志着美国以往企图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结束，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得了重大突破，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

## Zhong-Mei jian jiao

### 中美建交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曲折历程 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曲折的历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但因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中美未能建交。1973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然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势头，在进入1974年后，出现了波折。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出现的水门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尼克松的政治地位，使其无法兑现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在此前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此外，由于美国热衷于对苏实行缓和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增加了。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与曲折

的复杂局面。

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这主要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波折，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美国成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谈判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3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与他就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进行了讨论，建议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有关武器问题留待双方建交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

由于邓小平和卡特的决断，中美双方于1978年12月达成以下协议：①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③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获得成果 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Zhong-Mei Lianhe Gongbao

《中美联合公报》（“Joint Communiqué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两国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

统尼克松一行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会晤。经过艰苦、激烈的谈判后，双方签订了这个公报。上海公报列举了中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明确双方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双方强调指出，愿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关于台湾问题，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上海公报还表示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并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原则性文件，为中美正式建交打下了基础。

### Zhong-Meng-Su tielu lianyun 中蒙苏铁路联运 (Sino-Mongol-Soviet railway through transport)

中国、蒙古、苏联三国通过修通集宁—乌兰巴托—乌兰乌德铁路实现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铁路联运。

为了适应中蒙、中苏的贸易发展，1952年9月三国签订了关于实现铁路联运的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从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到中蒙边境二连之间331千米铁路。1953年开工，1954年末全线修通并交付临时运营。1956年1月4日这条国际联运铁路正式通车。中蒙苏三国政府发布了实现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铁路联运的联合公报。这条铁路促进了中国境内沿线地区的开发，为发展中国与蒙古、苏联及欧洲各国的关系，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开辟了一条方便快捷的通道。

### Zhong-Nan guanxi huifu zhengchang 中南关系恢复正常 (normalization of Sino-Yugoslav relations)

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结束不正常状态而恢复正常。50年代后期，中南关系因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严重分歧的影响，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1958年后，双方实际上仅维持代办级的外交关系。60年代末，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南两国开始寻求改善双边关系。

1969年，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新的贸易支付协定。1970年两国互派大使。1975年，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访华，中国方面对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1977年8月末至9月初，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正式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的不愉快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至此，中南关系恢复正常。

### Zhong-Pu Aomen Wenti Lianhe Shengming

《中葡澳门问题联合声明》(“Joint Sino-Portugal Declaration on the Macao Issue”) 1987年4月13日中国与葡萄牙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问题的由来 中国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始被葡萄牙人占据，但从明清到民国的历代中国政府，都从未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作出过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79年2月，中葡两国建交，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谅解，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现在由葡萄牙人管理，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选择适当的时机，两国可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及香港、澳门问题的构想。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决定于1986年6月开始在北京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会谈。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经过四轮会谈和磋商达成协议。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8年1月15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从此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时期。

主要内容 联合声明除正文还包括两个附件及在签署联合声明时中葡双方交换的备忘录。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阐明了澳门回归后中国政府对澳门实行的基本政策，包括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国防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权；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以及“澳人治澳”等。中国政府并声明

上述政策50年不变。两个附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

意义 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是中葡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继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后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又一成功范例。联合声明的签署，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及政权的顺利交接以及澳门回归祖国后保持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基础。1993年3月31日，根据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依据宪法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将中葡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及中国对澳门的方针政策具体化和法律化。

### Zhong-Ri bangjiao zhengchang hua 中日邦交正常化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972年日本首相访问中国，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屡次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只保持着民间文化和贸易往来。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对日本政府造成极大的冲击。同年7月，因在中国问题上未能打开局面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被迫下台，田中角荣继起出任新首相，他在内阁首次会议上坚决地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积极反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双方经过接触，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关于田中角荣访华的公告。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由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陪同来中国访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并与之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同田中角荣进行了多次会谈。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当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对由于战

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双方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由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 推荐书目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 Zhong-Ri guanxi de fazhan

**中日关系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Sino-Japan relationships) 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日两国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顽固追随美国，敌视和封锁中国，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特别是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执政后，一味采取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两国关系受到严重伤害。

**发展进程** 1958年7月，日本社会党代表佐多忠隆和田崎末松，为探讨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途径访问中国。廖承志与之会谈时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3项条件和3项措施。3项条件是：①岸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②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③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3项措施是：①日本政府必须派遣正式代表到出事地点，把中国国旗重新悬挂起来；②扯下国旗的罪犯应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尊严论罪，给予应有的处分；③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歉，派代表到北京陈述歉意。中国方面还提出，岸内阁必须声明“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关系，并愿为此而努力”。岸信介内阁拒绝了这一要求，致使中日关系一度中断。

为尽早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决定先从发展两国民间关系入手。日本各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谋求打开中日僵局。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政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相继来访。同年3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举行会谈，共同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的声明。周恩来会见浅沼一行时重申1958年7月廖承志向日本方面提出的三项条件，并提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这三项政治原则，即使不立即改变现存的日美、日台关系，中日关系仍可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来往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

也可以进行。

1960年6月23日，岸信介内阁下台；7月，池田勇人内阁组成。池田勇人和他的主要助手大平正芳等人都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池田内阁组成10天后，刘宁一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达日本，其他几个在岸内阁时期被中止的代表团也相继恢复对日本的访问。同年8月，周恩来会见中日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①政府协定。由于日本政府不保证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今后双方之间的协定要由两国政府来签订，其前提是实现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②民间合同。在签订政府协定之前，两国企业互相表示友好，可以签订个别民间合同，如果执行得好，还可以签订较长时间的合同，日本有关团体和人士可向中国介绍日本友好商社。③个别照顾。对日本中小企业的困难可以按照贸易中断时的作法，继续给予照顾。这三项贸易原则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1962年9月，松村谦三来中国，主要谈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同年11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也来中国，着重谈具体的贸易安排。周恩来在会见时详细谈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道理，重申中日两国关系应建立在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中日贸易三原则以及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会谈双方就以渐进的积累方式发展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1月9日，高崎达之助与廖承志在北京签署《中日长期综合备忘录》。这种民间协定实际代表双方政府，目的在于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促进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结果** 长期备忘录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双方互设办事处，实际成为中日之间一条半官方联系的渠道，对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一贸易体制一直实行至1973年，即中日恢复邦交以后的第二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Zhong-Ri Heping Youhao Tiaoyue**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在北京共同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过程**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为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自1975年起，中

日双方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正式谈判，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条约草案。但是，当中方主张应该把已经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时，日方提出不同意见，致使谈判长时间止步不前。1976年12月，福田纠夫就任日本首相后，表示愿意遵守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精神发展日中关系，并表示要尽早缔结日中友好条约。从1978年7月21日起，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重开谈判。同年8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圆田直访华。经谈判，日方同意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至此，中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圆田直在北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签字仪式。

**意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它为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基本内容** 《条约》共5章，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条约有效期为10年。

#### 推荐书目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3。

**Zhong-Su bianjie tanpan**  
**中苏边界谈判** (Sino-Soviet negotiation on border issues) 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和苏联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的长期的谈判。

中国和苏联有7300多千米的共同边界。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虑到历史情况和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出发，仍准备以那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

全部走向。但苏联却要求中国承认苏联超过那些条约又侵占的3万多平方千米的  
中国领土，同时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许多  
争议区。因此，中苏两国虽曾于1964年  
举行过边界谈判，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969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黑龙江  
省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局势严重恶化。  
同年9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  
场举行会谈。周恩来明确指出，争议地  
区就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交  
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柯西金也承认双方边界存在争议地区。  
根据会谈中达成的谅解，中苏双方于  
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边界谈  
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先后由外交部副  
部长乔冠华、韩念龙和余湛担任。苏  
联代表团团长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库  
兹涅佐夫和伊利切夫担任。

在谈判中，中方依据中苏政府首脑  
北京机场达成的谅解提出，中苏边界  
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  
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  
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进而谈判  
解决边界问题。但苏方先是反对讨论  
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后来又  
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中  
方强调，承认存在着争议地区，只是  
承认中苏双方对这些地区的领土归属  
有争议，关于这些争议地区究竟应  
归属谁所有，需要留待将来讨论边  
界走向时解决。但苏方完全否认中  
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并且说，中  
方提出争议地区的概念是对苏联领  
土提出要求，是企图不经划界就事  
先解决领土问题。事实上，苏联不  
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才是  
企图不经过谈判就要中国承认那些  
地区都是苏联的领土。

由于苏方坚持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  
争议地区这一起码的客观事实，致使  
中苏谈判始终未能取得进展。中苏  
边界谈判在延续了将近9年之后，  
于1978年7月起，一直处于休会  
状态。但两国边界没有再发生武装  
冲突，且双方互派了大使，恢复了  
贸易谈判。苏联解体后，1991年5  
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签订协定，进  
行两国国界东段勘界。1997年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  
统叶利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东  
段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边  
界西段勘界工作正在继续进行。

#### 推荐书目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8。

Zhong-Su guanxi polie

中苏关系破裂 (break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两党两国之间原来长期存在的友好合  
作关系在60年代完全破裂。

**破裂缘由** 50年代中后期，中苏分  
歧日渐明显，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  
后，中国本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在“莫  
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求同存异，继  
续得到发展。但苏联领导人却公然违  
反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处理各国党的关  
系的准则，推行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  
义的政策，甚至利用“长波电台”和  
“联合舰队”事件染指中国主权、干  
涉中国内政，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控  
制中国，这使中苏关系受到严重伤  
害。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  
马利诺夫斯基致信中国国防部长彭德  
怀，建议中苏共建一座长波电台，所  
需费用大部分由苏联负担，小部分由  
中国负担。对于这个涉及中国主权的  
问题，中国方面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同年6月12日彭德怀复信马利诺夫  
斯基，表示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但坚  
持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主权  
是中国的。但苏方仍坚持在中国领土  
上由中苏共建和管理长波电台。在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苏联驻华大  
使尤金提醒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  
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中苏在长波电台问题上的纠葛还未  
了结，苏联方面又进一步向中国提出  
了另一项无理的要求。1958年7月  
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会见毛  
泽东时，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  
义提出建议：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  
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  
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  
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  
的潜艇舰队。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  
权的政治问题。同年7月22日，毛  
泽东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  
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  
“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可以说你们  
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  
海岸”。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  
京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关于中苏共建长波电台问题，赫鲁  
晓夫推说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  
未经苏共中央讨论，关于建立共同  
舰队问题，赫鲁晓夫说是尤金大使  
没有准确地传达他的意思，因而造  
成了误会。但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  
信服的。

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中  
苏1957年签订的有关为中国建立核  
工业提供核技术的协定。随后，中  
印之间发生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  
当时正值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赫  
鲁晓夫担心此事对他的美国之行

不利，不顾中方一再劝阻，于1959  
年9月9日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了一个  
表面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的“塔  
斯社声明”。声称这一事件“令人  
痛心”，并表示“遗憾”。这样就  
把中苏在重大对外事件中的不同立  
场暴露在世界面前，实际上是向美  
国送上了见面礼。赫鲁晓夫在访美  
结束后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10周年庆祝活动。在10月2日  
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内部会谈  
中，他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  
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并对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  
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  
至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  
独立。苏联为了本国的外交利益，  
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力图压中国服从苏联的全球战  
略，这给中苏关系投下了不祥的  
阴影。

1960年6月，苏共利用罗马尼亚  
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  
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召开了一次社会  
主义各国党代表的会晤，借机对中  
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进行围攻，  
指责中国共产党“要发动战争”，  
“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  
拿起来”，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搞  
“纯粹民族主义”等。还指责中共  
是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  
假革命”。当中国共产党据理相  
争之后，苏联开始进一步在国家关  
系方面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同  
年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  
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月刊  
和《苏中友好》杂志，7、8月  
间，苏联开始在中国新疆挑起边  
境纠纷。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  
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并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于7月  
25日通知中方，在中国工作的苏  
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  
全部离开中国。苏联还单方面中  
止按协定应该派遣来中国工作的  
900多名专家。中国政府复照希  
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  
决定，但苏联政府一意孤行，在  
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  
1390名专家，撕毁中苏两国政府  
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  
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0多份  
专家合同，废除200多个科技合  
作项目。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  
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个  
严重步骤。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1960年夏  
天开始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  
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  
正常生产和通行，阻挠中国边防  
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尤其严重  
的是，1962年5月，苏联竟在  
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策动大规模  
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6万多  
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与



此同时，苏联还迅速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军事援助，偏袒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防范苏联铤而走险，对华发动战争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先后在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等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要准备”。在此之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继续增兵，并与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对中国形成了战争威胁。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同年11月，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希望苏共新领导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能够改弦更张，放弃大党、大国主义的错误立场。但苏共新领导在对待国际共运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那一套，并且在1965年3月召开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国际共运中的分裂会议，终于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从此不复存在。

**产生后果** 中苏关系破裂，是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坚决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成为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苏、美、中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由此促进了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 推荐书目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 Zhong-Su guanxi zhengchanghua

### 中苏关系正常化 (normalization of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破裂了二十多年的中苏两国关系，在消除三大障碍取得重大进展后，于1989年5月通过发表中苏《联合公报》实现的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向。在这之后，中国为敦促苏联消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苏方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苏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进行

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10月邓小平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递口信表示，如果能消除三大障碍，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1989年，在消除三大障碍取得重要进展的情况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谈。访问结束时，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Zhong-Su liangdang lunzhan

**中苏两党论战** (Polemic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大论战。

**论战背景**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以及在苏共影响、控制下的一些共产党发表许多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反驳受苏共影响而对中国加以指责的一些共产党。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出苏共领导人的姓名，同时对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有相当的限制。

1963年3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中共中央对此于同年6月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3月来信的答复。复信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主要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反对个人崇拜等重大问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看法。在双方相互争论的气氛中，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但在会议期间，苏共违反双方协议，于7月14日公开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进行全面的反驳和攻击，使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和扩大化。苏联出现一片反华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

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中苏这场激烈的大论战，直接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评价** 关于中苏两党论战的历史是非，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 Zhong-Su Youhao Tongmeng Huzhu Tiaoyue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签订的同盟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宗旨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条约自当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之”。

鉴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均发生变化的原因,197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并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30年后不再顺延。

### Zhongyang Dianshitai

**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英文简称 CCTV。创建于1958年5月1日,初名北京电视台。同年9月2日,由试播转为正式播出。1973年开始播出彩色节目。1978年5月1日改为现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电视传媒,收视率居全国之首。该台目前开办八套节目。第一套节目是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第二套节目是以经济节目为主的综合频道;第三套节目是戏曲、音乐综艺频道;第四套节目是国际频道;第五套节目是体育频道;第六套节目是电影频道;第七套节目是少儿、军事、科技、农业频道;第八套节目是电视剧频道。全台固定栏目200多个,八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160多个小时,使用中、英、法、俄、西等多种语言和粤语方言向国内外播出,年播出量达59000小时,自制节目量约占总播出量的60%以上。八套节目均上星覆盖全国,国内人口覆盖率达87.4%,观众超过10亿人。其中第四套节目基本实现全球覆盖。全台拥有相当规模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和设施,包括25个演播室、2个录音棚、8辆转播车、5套箱载式电视制作系统、5套移动卫星地面站、100多个制作机房及大批采录设备。其中最先进的移动上行地球站,使随时随地现场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成为可能。最大的演播室面积近2000平方米。全台技术和设备系统的整体格局日趋数字化。1999年,数字设备生产能力已占全部节目生产能力的40%以上。全台还建立了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初步形成了办公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管理体系。中央电视台现有职工4163人(包括直属单位职工),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769人。台内设有15个中心(室)。台直属单位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视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电视报社和以电视产业为主体的集团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在江苏无锡、河北涿州、广东南海、山东威海、北京大兴等地建设有规模不等的影视节目制作基地,在世界

一些大城市建立了中国电视节目销售网,还具有电影故事片的摄制出品权等,中央电视台同全国各级地方电视台和影视文化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与世界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电视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在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日本、比利时、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设有记者站,还定期地派记者赴世界各地采访。在全台每年播出的节目中,引进的外国节目约占6%。中央电视台在宣传教育、传播信息、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电视台,成为中国观众了解世界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中央电视台历届主要负责人有:罗东、孟启予、任继胜、戴临风、王枫、黄慧群、杨伟光,现任台长赵化勇。

### Zhongyang Junwei batiao mingling

####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eight orders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发布的文件。1967年1月,为了稳定军队,徐向前提议发布一个有关命令,经林彪口授形成7条,1月25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准,并作了修改,增加管教干部子女的一条。

“命令”规定:①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②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③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④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和军事单位职工,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⑤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⑥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⑦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⑧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命令”发布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当时频繁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浪潮、稳定军队内部的作用,但由于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很快就不能继续贯彻,失

去了效用。

###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antai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China Central Radio) 中国国家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成立,名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共有7套节目,1997年起每天播音129个小时。这七套节目各有重点、各具特色,第一套是以新闻为主的对全国广播的综合性节目;第二套是以经济科技内容为主的对全国广播的普通话综合性节目;第三套是调频立体声文艺节目;第四套是民族语言广播节目,使用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播出;第五套、第六套是对台湾广播节目;第七套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播节目,覆盖香港及澳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已全部上了卫星,信号在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经过1998年的调整,在第一套节目里设置了早、中、晚三大新闻版块,增加了“非公有经济之窗”,确立了对非公有经济的宣传阵地;第二套节目增加了服务性节目,强化了广播的服务功能;第三套节目增加了“音乐早餐”、“汽车CD”、“中国民歌榜”等新栏目,其他频道也相应作了调整,初步达到七套节目系列化、服务对象化各具特色和风格的新格局。据1997年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中心抽样调查,全国12周岁至79周岁城乡居民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有6.59亿人,加上包括20%的被动听众,听众规模达7.91亿人,是当今听众最多的国家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各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香港、澳门地区)设有39个记者站,目前已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机构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随着事业的发展,新业务大楼于1998年6月开始启用,实现了广播技术由模拟向数字化的转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经办广播节目为主,同时创办了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中国广播报》(周刊)、《中国广播》杂志(月刊)、《国际音乐交流》月刊、《广播歌选》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台领导和台长有:廖承志、李强、梅益、温济泽、金照、胡若木、顾文华,(以下为台长)杨祚铭、左漠野、杨兆麟、杨正泉、同向荣。现任台长安景林。

## Zhongyang Renmin Zhengfu he Xizang Difang Zhengfu Guanyu Heping Jiefang Xizang Banfa de xieyi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Agreement for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简称《十七条协议》。1951年5月23日由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签署。该协议由前言和17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为：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回到祖国大家庭；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人民有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

## Zhongyang Renmin Zhengfu Renmin Geming Junshi Weiyuanhui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People's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高军事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管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等22人为委员。徐向前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聂荣

臻任副总参谋长。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撤销。

## Zhongyang Wenge Xiaozu

### 中央文革小组 (Team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66~1969年期间，中共中央设置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全名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7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小组下设办事组、宣传组、文艺组、快报组、来信组、记者站等机构。8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组长陈伯达病假或外出工作期间，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到1967年，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先后受到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离开这个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权力实际掌握在江青手中。他们打击诬陷大批干部和群众，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成为“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策源地。1967年2月，“二月逆流”冤案发生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8月底，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隔离审查了制造严重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次年1月又隔离审查了另一成员戚本禹。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尚存

的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年底，中央文革小组不复存在。

## zhongyang yinhang

### 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

一国金融体制中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机构。它基本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是发行银行；它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帐户，对这些机构提供贷款，是银行的银行；它制定和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金融行政监管，是有政府职能的银行。

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在1978年以前，它既行使金融行政管理和货币发行的职能，又从事信贷、结算、储蓄、外汇等业务活动，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1979年以后，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仍办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决定》，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储蓄和工商信贷业务。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开始形成。1986年1月和同年4月，在国务院分别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反复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地位。1995年3月18日，在中共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该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机构。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它履行下列职能：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货币政策目标应是在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的流通；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与规章；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履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它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由国务院总理提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为履行职能需要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1998年中国人民银

行作出的重大体制改革是将原按行政区分级设立的分支机构进行归并和改革，设立了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成都、济南、沈阳 9 个大区分行履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职能。

Zhong-Yin bianjie zhengduan

**中印边界争端**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中印边界历史上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长约 2000 千米，分为西、中、东三段。西段指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中段指从西段的东南端起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止的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喜马拉雅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东段指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的一段中印边界。中印边界争端由来已久。印度独立后，不仅全面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继续扩大其占领范围。在 1951 年前后，印度方面在东段向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境内推进，侵占了中国 9 万平方千米领土。1952 年又在中段侵占中国领土 2000 平方千米。在西段，印度军队于 1955 年侵占了中国的巴里加斯地区。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深入中国领土，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接着，中国政府要求同印度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和平谈判，提出保持中印双方边界现状；印度政府拒绝中国建议，继续贯彻它的“前进政策”。在西段，截至 1962 年 10 月 20 日止，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 43 个据点；在东段，仅 1962 年上半年就沿所谓“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 24 个新哨所，与此同时，不断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从 1962 年 8 月到 10 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讨论边界问题，印度反而正式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并在中印边境集结 2.2 万余人的军队。10 月 12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下令要把守卫中国领土的中国军队“清除掉”。18 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开始全面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 10 月 20 日被迫在东、西两段自卫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中国边防部队粉碎了印军的多次进攻，全面拔除设立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印军侵略据点，收复了失地。11 月 2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必须通过

谈判解决。同时宣布：从 22 日零时起，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从 12 月 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千米。随后，中国政府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印军被俘的全部军事人员，并归还还在冲突中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在这次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不仅捍卫了尊严、保卫了领土的完整，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为谋求和平解决国与国边界问题的先例。

**推荐书目**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Zhong-Yin bianjing ziwai fanjizhan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China's counter-attack in self-defence along the Sino-Indian borders)

1962 年 10~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击退印度军队入侵和收复失地的一次自卫反击作战。见中印边界争端。

Zhong-Ying liangguo zhengfu Xiang-gang zhengquan jiaojie yishi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ceremony of the transfer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power from Great Britain to China) 按照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所确认的时间，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至 7 月 1 日凌晨举行。仪式会场设在位于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五楼的大会堂。交接仪式主席台上的蓝色玻璃幕墙中央并列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央观礼团全体成员出席了交接仪式。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90 多个国家驻香港的领事机构及国际和地区机构驻港办事处的代表，一些国家民间组织的代表，香港各界人士，澳门和台湾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共 4000 余位嘉宾应邀参加。

6 月 30 日午夜 23 点 42 分，交接仪式开始，中英仪仗队入场，双方礼号手吹响礼号。23 点 46 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英国方面同时入场并登上主席台主礼台就座的为王子查尔斯、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及英国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23 点 47 分，双方仪仗队同时施举枪礼。48 分，王子查尔斯在位于英方一侧的讲台致词。他说，此次仪式标志着香港在英国管制 150 多年后，根据 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23 点 56 分，中英双方护旗队进场，象征着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59 分，英国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中缓缓降落，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 月 1 日凌晨零点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绘有紫荆花图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神圣时刻终于来临。此时全场沸腾，雷鸣般掌声经久不息。零点 3 分，江泽民主席走上讲台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他向中英两国所有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出贡献的人士、向世界上所有关心和支持香港回归的人士表示感谢，向回到祖国怀抱的 600 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江泽民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江泽民讲话后，中英两国领导人走到主席台前握手合影。零点 9 分，中国外长钱其琛礼送查尔斯王子一行步出仪式大厅，零点 12 分，交接仪式结束。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中华民族永载史册的盛事，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从此，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来自世界各国 700 多家新闻媒体的 8000 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zhoubian diqu kaifang

**周边地区开放** (opening of border regions)

199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 14 个边境城市，在东北，有黑河、绥芬河、珲春、丹东；在西南，有广西的凭祥市、东兴镇和云南的河口县、畹町市、瑞丽县；在西北，有新疆的伊宁市、塔城市、博乐市和内蒙古的满洲里、

二连浩特市。同时，对靠近边境的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南宁等城市也实行沿边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逐步形成东北、西北、西南三大沿边开放带。其共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边贸为先导、以内地为依托、以高层次经济技术合作为重点、以开拓周边国家市场为目标，促进双边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之后，又逐步开放内陆沿边城市，形成了周边对外开放新格局。

Zhou Enlai

**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

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

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 推荐书目：

金冲及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Zhou Enlai chuxi Wanlong Huiyi

###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Zhou Enlai participating Bandung Conference)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5国的倡议下，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各国代表发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表示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也有少数国家的代表对社会主义和中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针对少数代表的恶意攻击，4月19日下午，周恩来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并亲自起草了一篇补充发言稿，发表了如下著名演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当将这些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周恩来的发言态度诚恳，尤其是“求同而存异”的提法使与会者感到亲切而又入情入理，会场上原来那种令人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一扫而光。

会议的第二阶段，有的国家代表仍公开干涉中国内政，主张台湾要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建立独立国家。周恩来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上述主张；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外交灵活性。他在会下分别同

许多国家的代表接触，耐心的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还主动向他们介绍台湾的历史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经过诚恳坦率的交谈，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这些代表对中国的看法。

针对个别国家代表诬蔑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从而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周恩来表示，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种社会制度，但是违反事实的说法中国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中国决不因此而放弃支持这些国家要求有关宗主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独立给予支持的主张。中国代表团的立场获得了各国代表的赞扬。经过各国代表的努力，会议依据中国和印度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间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努力，使得很多亚非国家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和平外交因此取得了新的进展。

#### 推荐书目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4。

Zhou Enlai de jiuzuo nuli

###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 (Zhou Enlai's efforts to overcome leftism)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领导的批判和纠正各方面极左思潮的斗争。

纠正极左思潮，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贯努力。1971年林彪事件（见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抓住历史契机，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亲自领导部署各个领域的斗争。

1971年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斗争全面展开，集中表现在恢复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在工业方面，1971年12月在周恩来指导下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散布的空头政治等荒谬论点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工业企业的若干措施，指出纠正“左”倾错误是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思想前提。会上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严厉批评并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破坏企业管理，废除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农业方面，周恩来强调要调整农村的经济政策，从实际出

发，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保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的指示，体现了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落实干部政策，是纠“左”的一项重要内容。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门对老干部在押情况作全面检查，并亲自审批检查情况的报告，批评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做法，要求切实加以改正。与此同时，在毛泽东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干部或公开参加活动，或及时安排治疗与改善生活条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文，以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对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为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入深入发展阶段，主要是落实党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政策。由于江青势力的一再干扰，这项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和阻力。周恩来身体力行，逐个帮助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他要求教育部门排除障碍，把已近荒废的基础理论研究抓起来。他关注人才培养，提倡应“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并首次提出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一版集中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否定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进行深入剖析。同年11月，周恩来又批示同意召开主题是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力反对，他们组织文章对周恩来进行攻击。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批“左”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1972年12月，担心批判极左思潮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发表不赞成批极左、主张应批判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使形势发生逆转。此后，周恩来仍然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极左思潮”词句）坚持进行斗争。1973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以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纠“左”的努力被迫中断。

Zhou Enlai fangwen Sulian Bolan Xiongyali

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Zhou Enlai's visits to Soviet Union, Poland and Hungary)

1957年1月7日至19日, 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苏联赫鲁晓夫急切地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是因为苏共二十大后, 在东欧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 使苏联陷入十分被动的处境。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等国, 赫鲁晓夫是想请中国帮助缓解一下矛盾, “促进一下社会主义的团结”。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一到机场, 就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导人的迎接。从1月7日至10日和1月17日至19日, 访苏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访苏期间, 周恩来大部分时间用于同苏共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谢皮洛夫就世界战略方针、对民族主义国家、波兰等问题进行了3次会谈。1月11日, 周恩来抵达波兰访问, 访问波兰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 并帮助波兰党处理同苏联党的关系。周恩来在波兰访问期间, 受到波兰人民热烈的欢迎。1月16日上午, 周恩来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对匈牙利进行访问。本来由于匈牙利当时局势比较混乱。中国方面没有安排去匈牙利, 但到苏联后,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去匈牙利, 帮助缓和一下苏匈关系。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访问了匈牙利, 并在匈牙利整整紧张工作了24个小时。周恩来在匈牙利遭到严重破坏, 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布达佩斯, 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使匈牙利人深受感动。1月17日, 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 他不顾疲劳, 立即开始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18日发表中苏联合声明。周恩来这次访问, 对中共中央了解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情况, 特别是了解苏共等领导层的思想状况, 做好下一步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帮助。经过十几天的访问, 基本达到预期目的。

#### 推荐书目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1997。

Zhou Enlai fangwen Ya-Fei shisan guo

周恩来访问亚非十三国 (Zhou Enlai's visits to thirteen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1963年12月13

日至1964年2月5日, 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陪同下, 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 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而成)、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非洲10国。1964年2月14日至3月1日, 周恩来一行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3国。共历时72天, 行程10.8万千米。这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这次访问的重点是非洲, 在访问阿联时, 周恩来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①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②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③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 ④支持他们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⑤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 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在访问马里时, 周恩来又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宣告: 中国政府, ①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成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②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何特权。③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④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⑤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 力求投资少、收效快, 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⑥提供自己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 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商定的规格和质量, 中国政府保证退换。⑦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⑧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周恩来还宣布, 这八项原则也适用于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的援助。

周恩来的这次访问, 举世瞩目, 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 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里程碑。

#### 推荐书目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上海, 199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

社, 北京, 1998。

Zhou Enlai fangwen Yazhou ba guo  
周恩来访问亚洲八国 (Zhou

Enlai's visits to eight Asian countries) 1956年11月7日至1957年2月5日, 应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的邀请, 中国政府决定, 由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亚洲8国的目的, 周恩来把它概括成3句话: “寻求友谊, 寻求和平, 寻求知识。”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总理周恩来, 副团长是副总理贺龙。11月18日代表团到越南访问, 在访问期间, 周恩来受到越南人民和胡志明主席的热烈欢迎, 并同越共政治局以及范文同总理举行了多次会谈, 周恩来的访问加深了中越两党的友好关系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22日, 代表团访问柬埔寨, 受到柬埔寨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28日, 代表团访问印度, 同样受到印度人民的盛大欢迎。在访问期间, 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在印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周恩来沉着冷静, 对答如流, 博得各国记者的高度赞扬, 印度官员也称赞周恩来是从未见过的如此智慧的政治家。在印度期间, 周恩来还为争取滞留印度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回国, 三次同达赖谈话,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 以及在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爱国人士的协助下, 班禅和达赖先后返回西藏, 避免了分裂事件的发生。12月10日, 代表团访问缅甸, 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 并同缅甸领导人进行了友好会谈, 双方同意树立和平共处的榜样。20日, 代表团开始访问巴基斯坦。按照预定计划, 代表团应该前往阿富汗进行访问, 但在周恩来访问亚洲5国时, 接到了中共中央的两封电报, 说苏联、波兰邀请周恩来访问。中国政府代表团只好推迟对阿富汗等国的访问。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之后, 1957年1月19日至23日周恩来访问阿富汗, 25日至29日访问尼泊尔, 31日至2月5日访问了锡兰。周恩来在访问期间, 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与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取得了预期成果。对亚洲8国的访问, 是继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后, 新中国的又一次成功的重大外交活动。

#### 推荐书目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7。

### Zhou Enlai fangwen Yazhou liu guo 周恩来访问亚洲六国 (Zhou Enlai's visits to six Asian countries)

1960年4月至6月，周恩来对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等亚洲6国的访问。陈毅副总理随同前往。4月15日至19日，在访缅期间，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努总理就中缅边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为和平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19日，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离开仰光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由于从1959年8月起，印度在中印边境连续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次访问又是为了谋求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所以对印度的访问实际上是一次艰难的较量。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进行7次艰难的会谈，由于印方采取僵硬的立场，这次访问成果似乎不太显著。但是，中国政府积极、合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受到印度和全世界舆论的热烈欢迎。1960年4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结束对印度的访问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周恩来等到尼泊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同尼泊尔领导人协商解决中尼之间长期未解决的边界问题。经过友好、充分的协商，28日，周恩来总理和尼泊尔柯伊拉腊首相签订了中国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同时交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批准书。同样是边界问题，同样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在中缅和中尼之间比较顺利地取得合理解决，而在中印之间却陷入僵局，这就使世界了解了问题的真相。5月5日至14日，周恩来又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对柬埔寨和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受到柬埔寨和越南人民及领导人的热烈欢迎。5月27日至6月1日，对蒙古进行友好访问，同样受到蒙古人民及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对三国进行访问期间，周恩来分别与三国领导人就世界局势和互相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如何进一步友好合作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访问达到了预期目的。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对亚洲六国进行了访问，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实践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也使中印边界冲突事件以来的紧张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 推荐书目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上

海，199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 Zhou Enlai fangwen Yindu he Mian-dian

#### 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 (Zhou Enlai's visit to India and Burma)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邀请访问了上述两国。

在6月25日至28日访印期间，中印两国总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有关事项，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和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交换了意见。6月28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同时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如果能接受上述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有助于创造和平气氛。在6月28日至29日访缅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6月29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宣布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各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相信任所代替。两国政府重申，各国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不是输出的，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容许外来干涉。上述两个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此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准则正式公布于世。

#### Zhou Enlai Xuanji

#### 《周恩来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重要著作选集，收入周恩来1926年到1975年间最主要的著作158篇，约68万字，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80年、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种中国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俄、日、西班牙文本。

上卷收入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著作70篇，涵盖国共合作的大革

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阶段。开卷篇《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应不失其独立性质和主张，无产阶级要“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斗争，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向中共中央提出“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否则“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坚决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中共六大后周恩来撰写的从思想上建党的名篇，提出当时“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下，党内要坚决地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等许多小资产阶级意识。继后几篇是他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健全党的组织的重要论述。如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中指出，“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都是大革命失败后有关恢复党组织和建立红军的正确指示。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是红军建设工作的重要文献，指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文中对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均有所规定。《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反映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4次“围剿”中，反对了“左”倾路线一味进攻城市的指导思想。《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反映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谈判情况和方针。《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是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时指出的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原则是“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论统一战线》阐述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斗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目前紧急要求》，是抗战胜利后要求全国各抗日党派共同团



结,保证国内和平,在民主基础上建设新中国。《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概述了日本投降后的国共谈判情况,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内战反对和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不久将形成民主的新高潮。《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一文,发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等文,反映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文,是周恩来对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原则的设想。《学习毛泽东》是对全国青年代表们的报告节录,说明“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有其“历史的发展”的,不能“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卷终篇《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摘要,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下卷收入周恩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26年间最主要的著作。首篇《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文,反映了周恩来在建国后不久提出的“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等重要思想。针对美军侵入朝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一文发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文,提出“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并最初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论知识分子问题》,是经过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重申上述的看法。《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阐明了外交方针、外交阵线和外交工作中的思想领导等问题,是外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这些原则的最早提出。《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促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与会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使会议取得成功。《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提出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文,反映了周恩来既积极又稳进的建设

思想。《加强调查研究》和《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等文,是周恩来下乡实地调查后,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再次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文章。《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论述了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完整地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一文,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向世界各国的郑重宣告。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周恩来以亲身感受叙述了这方面的历史情况。该文和上卷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共党史的珍贵谈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和《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是关于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是周恩来一直关怀水利事业的代表作。《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等文,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维护工农业生产和恢复文教科技事业,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是两篇祝酒词,反映了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和中日建交这两件大事。本卷最后一篇是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节录,再次提出要使中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Zhou Erfu

**周而复** (1914~ ) 现代小说家。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县人。1914年1月3日生于南京。1933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写作小说。1938年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1944年到重庆,任《群众》月刊编辑。1946年任《新华日报》、新华社特派员,赴东北等地采访。同年去香港,主编《北方文丛》,介绍解放区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创作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燕宿崖》、《西流水的孩子们》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统一战线、宣

传部门的领导工作。1959年到北京,曾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精神面貌和变化。80年代后创作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系列小说《长城万里图》共计6部,以及歌颂周恩来的长诗《伟人周恩来》。他长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有书法作品《周而复书琵琶行》等。

Zhou Gucheng

**周谷城** (1898~1996)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哲学家。

湖南益阳人。1898年9月13日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后,到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后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并到湖南自修大学、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民锋杂志》、《东方杂志》撰稿,并在中国公学兼课。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42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兼历史学系主任、校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83年6月后,兼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农工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主席团委员,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达数百万字,涉及历史学、哲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观点,主张从整体研究世界史,反对欧洲中心论。1996年11月10日逝世。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史学之进化》、《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

Zhou Guangzhao

**周光召** (1929~ )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物理学家。1929年5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市。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留校在物理学系任教。1957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1961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学部副主任,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1997年任院长。1997年后任中国科协主席。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及理学院院长。198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至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在理论物理学各个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粒子自旋的螺旋态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60年代为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做了大量工作。60年代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奠基者之一。70年代领导的规范场反常和闭路格林函数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重视。1987年他关于“量子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著有《极化核子的相对理论》等论文70余篇。

Zhou Jianren

**周建人** (1888~1984) 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字松寿,又字乔峰。浙江绍兴人。1888年11月12日生。鲁迅胞弟。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1年10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并任《东方》、《妇女》、《自然》杂志编辑。1923年后在上海大学、神州女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12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时期,与上海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秘密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撰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卖国、独裁和内战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任编辑。1945年12月与马叙伦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当选为理事。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4年7月29日逝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科学杂谈》、《回忆鲁迅》等。

Zhou Libo

**周立波** (1908~1979) 现代小说家。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1908年8月9日生。1928年入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并开始翻译苏联小说。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编辑左联内部刊物。经常发表文学作品。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秘密的中国》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任战地记者。1939年底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并兼编译处处长。1945年任中原军区机关报《七七日报》编辑和《中原日报》、《民声报》副社长。1946年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开始酝酿和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于1948年完成。这是一部最早反映中国农村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同年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955年)。1955年回故乡落户。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期间创作了短篇小说《山那边人家》、《禾场上》等,以及《暴风骤雨》的姊妹篇《山乡巨变》。1978年发表《湘江一夜》,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周立波的作品多以自己熟悉的故乡农村为背景,于风情习俗的描绘中透露出生活、时代的变化。笔调轻松幽默,生活气息浓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中国文联委员,第一、二届中国作协理事。1979年9月25日逝世。

Zhou Peiyuan

**周培源** (1902~1993) 政协第

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物理学家。江苏宜兴人。1902年8月28日生。1919年就读于清华学堂。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28~1929年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瑞士居里舒高等工业学校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工作。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1946年出席国防科学协会理事会和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选为理事会理事。1947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党委副书记。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他对物理学理论研究有很大贡献。对湍流理论的研究成果,被国际上誉为“现代湍流数值的奠基性工作”。1980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是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至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八届中央主席,第九届中央名誉主席。1993年11月24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理论力学》等。

Zhou Ren

**周仁** (1892~1973) 冶金学家、陶瓷学家。字子竞。江苏江宁人。1892年8月5日生。1910年于江南高等学校毕业,同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系学习,获得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最早把电炉引进中国,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和中国电力制钢所,炼出多种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馆长、冶金陶瓷所所长、冶金所所长、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参与中国首次试制球墨铸铁的工作,对铁矿的冶炼和古代陶瓷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多次获得重大科学奖。1973年12月3日逝世。著作有《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等。

Zhou Shutao

**周叔弼** (1891~1984)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名暹。安徽东至人。1891年7月13日生于江苏扬州。1919年随叔父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以后历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协理、总经理、董事长,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董事。是中国北方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1936年冬,拒绝与日本方面合作,愤然离职。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启新洋灰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一屆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精于图书和文物收藏鉴定,晚年多次将自己的藏品捐献国家。1984年2月14日逝世。

Zhou Tienong

**周铁农** (1938~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辽宁沈阳人。1938年11月生。1955年9月至1960年9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60~1983年,先后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系见习助教,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助教、讲师、教学研究科副科长、副教授。1983~1991年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被选为黑龙江力学学会常务理事。1991年后担任黑龙江省省长助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主委,黑龙江省力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副省长,民革黑龙江省主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Zhou Xiaoyan

**周小燕** (1918~ ) 歌唱艺术家、声乐教育家。女。湖北武昌人。1918年8月17日生。1935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抗日战争爆发,组织合唱团演唱《长城谣》等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赴法国学习声乐,1945年在巴黎登台演唱,引起注目,被誉为“中国之

莺”。此后在英国、卢森堡、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演出,获得好评。1947年回国,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员、声乐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多次赴国外演出和考察。60年代起专任教学,培养出一大批声乐人才。著作有《当代世界声乐发展趋势给我们的启示》等论文。

Zhou Xinfang

**周信芳** (1895~1975) 京剧表演艺术家,工老生。字士楚,艺名麒麟童。浙江慈溪人。1895年1月14日生。6岁从艺,7岁登台。后长期在上海演出,擅演老生,艺术上勇于创新,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创“麒派”,享誉海内。代表剧目有:《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义责王魁》等。一生追求进步,曾积极投身左翼戏剧运动、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1953年冬,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副总团长。1955年及1961年,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先后在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及“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出活动,文化部向周信芳颁发奖状。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因曾编演《海瑞上疏》一剧而受迫害,1975年3月8日去世。他的论著汇编为《周信芳戏剧散论》。常演剧目编为《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摄制戏曲影片有《宋士杰》和《周信芳舞台艺术》。

Zhou Yang

**周扬** (1908~1989) 文艺理论家,文艺工作领导者。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中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追求进步。后赴上海读大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的文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留学日本,与中共组

织失去联系。1930年回上海,从事文化工作,1932年重新入党。历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参与领导进行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参与倡导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等职。编选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倡导新秧歌运动,热情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即率领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

1949年7月,参与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文艺黑线”代表,受到批判和监禁。1978年恢复工作,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委员。1989年逝世。他长期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和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理论文章,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50年代在领导宣传思想和文艺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一些“左”的方针政策,晚年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89年7月31日逝世。主要著作在逝世后结集为《周扬文集》(五卷本)。

Zhou Yiliang

**周一良** (1913~ ) 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日出生于山东青岛。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一版编辑委员会委员、常务副主任。还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宽广，主要论著有：《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东学党一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及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史》。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共同主编《世界通史》（四卷本）。另有回忆录《毕竟是书生》。

Zhu De

**朱德**（1886～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四川仪陇人，1886年12月1日生于佃农家庭。1909年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返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即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

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涛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

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

Zhu De Xuanji

《朱德选集》（*Selected Works of Zhu De*）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重要著作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民族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多种少数民族文本和英、法、日、俄、西班牙文本。收入朱德1931～1962年的重要著作共65篇，约31万字，其中军事方面的著作居多。

选集收入朱德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有6篇，其中，《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是1931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前夕写的。文中根据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及人民军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强调红军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发表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要求红军军人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必须根据“时常变换”的任务、敌情、地形来指挥作战，运用战术，“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积小胜为大胜，“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等等，是对红军作战经验较为全面的总结。这些文章对推动红军建设、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选集收入朱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17篇，其中，《论抗日游击战争》是1938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一部军事著作。这部著作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敌人占领区普遍兴起的必然性和它的伟大意义，阐述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及各种战术、战法等问题，对当时坚定抗战的必胜信心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是1943年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的节录。他根据军事科学原理和亲身实践经验，通俗地阐明了练兵和带兵的基本原则，指出：不论练兵与带兵，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战士。练兵必先练心，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同时还要练技术，练体力。《论解放区战场》是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报告阐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和发展的历程，总结了解放区抗战的经验，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建军的原则以及怎样养兵、带兵、练兵、用兵等，作了深刻的论述，全文贯穿着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篇杰作。

选集收入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16篇。其中，《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是1947年10月至12月期间写的，反映了朱德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阶段对重大战役的指导，他通过指导攻打石家庄战役和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来摸索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指出学会打大城

市是摆在全军面前的新课题，对加快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是1948年8月至11月讲的。当时正处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阶段，朱德同毛泽东等一起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通盘部署，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形势、战争进程和战略战术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擘画战争、驾驭战争的杰出才能。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朱德一直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经常下去视察工作，对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提出指导意见。选集收入他这个时期的著作有26篇。《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他建国初期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时的一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在取得政权后加强纪律性的重大意义，对某些党员干部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行为给予深刻批评，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统一训练计划，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并提出具体的要求。选集还收入他对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各军兵种以及军事院校的讲话，也谈到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是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在讲到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时指出：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反对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专断；坚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外出视察的报告》、《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等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资源，同时要注意克服价格、税收等政策上的缺点。工业方面，要把兵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结合好，要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料，发挥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中央对地方的工业

不宜统得太死。他从发展国民经济和满足人民需要出发，多次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是对1958年后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批评，他指出：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农村保留家庭副业，社员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训。《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朱德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尖锐地指出：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指出：“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

选集中《辛亥革命回忆》、《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军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朱德选集》记录了朱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反映了他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和崇高的品德作风。

Zhu Guangqian

**朱光潜** (1897~1986) 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安徽桐城人。1897年9月19日生。1917年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次年入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上海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参与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又名《中学生》)。1925~1931年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193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等职。1986年3月6日逝世。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主要论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美学批判文集》、《西方美学史》等。后者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西方美学史专著,很受美学界重视。另译有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维柯《新科学》等西方美学名著。

Zhu Guangya

**朱光亚** (1924~ ) 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核物理学家。湖北武汉人。1924年12月25日生。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1942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5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赴美国,进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研究员、二室副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后,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党委常委。1986年任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8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1年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党委常委。1993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早期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有《符合测量方法:(I)  $\beta$ 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 内变换》、《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60年代后,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Zhu Muzhi

**朱穆之** (1916~ ) 新闻事业

家。原名朱仲龙。江苏江阴人。1916年12月25日生。1933年入北京大学学习,组织和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太行军区六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秘书。1946年到新华通讯社任记者、组长、解放区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长期在新华通讯社担任领导工作,历任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197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中韩友协会长等职。当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五届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作有《论新闻报导》等。

Zhu Rongji

**朱镕基** (1928~ )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湖南长沙人。1928年10月23日生。1947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加入新民主主义联盟。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动力局、综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后,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后,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79~1982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后,任国家经委委员、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1985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1989年8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他多次考察上海浦东区,提出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的设想。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他领导实施这一重大决策。1991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1992年后改组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3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常务工作)。同年7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致力于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财政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Zhu Xuefan

**朱学范** (1905~1996) 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上海金山人。1905年6月生。1923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上海邮局工人纠察队小队长。1928年任任上海邮务工会执行委员,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参与组织中国劳动协会,任常务理事。1936~1945年曾八次以中国劳方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1938年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人民抗战总会筹备会。1939年起,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理事。1945年被选为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8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进入解放区,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部长,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第七、八、九届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名誉会长。是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6年1月7日逝世。著有《国际劳工组织与援华运动》。

Zhu Yunshan

**朱蕴山** (1887~1981)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字锡蕃,又名朱汶山。安徽六安人。1887年11月9日生。早年考入安徽巡警

学堂，加入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陪斩。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回六安，筹建安徽省立第三农业甲种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脱离中共后，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国民党新军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反蒋抗日，参加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组织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任总务部长、组织部长，开展民众抗日运动。在西南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宣传联共抗日。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常委，同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长。1949年9月以民革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是民革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4月30日逝世。其诗文部分收入《纪念朱蕴山文集》。

### Zhuhai Jingji Tequ

**珠海经济特区**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中国在广东省珠海市开辟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10月，珠海经济特区开始动工建设。根据历史、现状及外商投资的意向分为5个功能区：拱北区、夏湾区、吉大区、北岭区、石花山区和银坑区。特区位于珠海市的南部沿海，南与澳门陆地相连，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198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珠海经济特区从6.7平方千米扩大到15.16平方千米，1988年又扩大到121平方千米。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珠海经济特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一样，也要“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型特区。”其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是：经济结构以“三资”企业

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流向以外贸出口为主，目标模式是外向型、综合型、现代化、花园式的经济特区和国际性的海滨城市。

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5年）为初创阶段，主要是探索总结经验，明确“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兴建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培养人才，积累资金。第二阶段（1986~1990），是以建立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从初创阶段的“打基础，铺摊子”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进入90年代，珠海特区的发展跨入第三阶段。其目标是要用15年时间，努力创造新优势，迅速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把引进的重点转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项目上，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致力于建设大港口，创办大工业，发展大经济，实现大繁荣，把珠海建设成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文明富裕的国际性现代化城市。珠海经济特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利用外资稳步增长，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绩。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5亿元，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

### 推荐书目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珠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6。

### Zhu Kezhen

**竺可桢** (1890~1974) 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生。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3年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研究气象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三届委员。20年代开创中国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了气象研究所并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测及天气预报等业务。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精辟指出台风眼中有下沉气

流存在，西太平洋台风路径之变化受远东4个大气活动中心所控制。在中国首先提出季风系统这一概念，首创区域气候研究，提出划分亚热带的指标。他确定的中国8大气候区，确立了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划的基本轮廓。长期搜集整理古代有关物候和天气的关系，其有关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对气候变化研究有重要价值。他主持并参加中国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部南水北调、华南热带生物、云南热带资源等综合考察，做出了重大贡献。发表论著270余篇。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 zhufang zhidu gaige

#### 住房制度改革 (housing reform)

自80年代初开始，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改变中国的住房制度采用行政配置体制，建房资金以行政方式按行政条块分配，住房以行政方式按等级分配，由政府房管部门直接或由各个单位按行政方式管理的模式。

**改革进程** 1980年初，中国政府允许各单位自筹资金解决本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企事业单位逐渐成为中国住宅投资的主要力量。这使得政府和单位不堪重负。为此，1980~1985年，在一些地区开始向居住者出售公有住宅的试点，目的是收回一些资金，减少维修支出。但由于售价过低，这种廉价售房的试点，到1985年底停止。1985年国务院成立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论证住房改革的思路和方案。从1986年到1988年上半年，以提高房租、增加工资、鼓励买房等为内容的“提租增资”试点，先后在山东烟台、河北唐山、安徽蚌埠市进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88年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一方面提高公房租金，一方面按标准价向职工出售住宅，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1年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确定住房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共同分担；提租、售房、广开渠道建房并举；全国统一政策下各地方可因地制宜、分散决策；转换机制。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对推进租金改革和出售公有住房作出了具体、详细、操作性较强的规定，期望通过出售公有住房来带动公有住房租金的提高。1998年国务院又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住房分配货币化和稳步放开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交易市场的规定。

**改革实效** 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改变了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的城镇住宅开发格局和单一国家所有的住房产权制度,扭转了不合理的住房低租金局面,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以货币化分房为中心的改革正在积极推进。在住房运营机制转换、住房金融发展与创新、住房价格构成、住房市场结构等方面也正在改革。

zhuā dà fàng xiǎo

**抓大放小** (seizing large firms and releasing small ones)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制定的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批小型企业的指导方针的概括简称。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搞好大的,放活小的”的方针,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的重大突破。“抓大”反映的是工作重点,政策倾斜的方向,是指国家集中力量抓好全国1000户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发展。1995年,中共中央主抓的1000户大型企业中的800户工业企业,占全国国有工业总资产的63%,占全部销售收入的70%,利税的74%。“放小”并不是对小企业放任不管,而是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对大多数中小企业实行以资产重组、产权转移为主要特征的产权制度改革,把大量的小企业培育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抓大放小,对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发展规模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推荐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8)》,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8。

zhuā gāng zhì guó

**抓纲治国** (government by grasping on the key link)

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作出的战略决策。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首次公开提出。得到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提出抓纲治国的根据。结合当时形势,华国锋指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从而把揭批“四人帮”作为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的中心任务,这是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群众性揭批查运动的开展,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了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部分开始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是,由于华国锋等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把揭批“四人帮”限制在批极右实质而不是批极左错误,这就影响了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延缓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进程,“左”倾错误因而得以继续存在以至蔓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抓纲治国”即告中止。

zhuānyì hētāngshuān de réngōng quānhéchéng

**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 (total synthetic ribonucleic acid)

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要了解生命现象的本质,必须弄清楚这三种生物大分子的性质、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用人工方法合成这些化合物是人类合成生命的前提,也是验证这些化合物结构的最好方法。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对揭示核酸在生物体内的作用,进一步了解遗传和其他生命现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王德宝及其合作者(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的科学工作者)自1968年起,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制备了所有11种核苷酸(或核苷),包括4种普通核苷酸和7种稀有核苷酸,近10种核酸工具酶,以及各种化学试剂,于1981年成功地实现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这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合成的核糖核酸与天然样品含有同样的化学结构,并具有完全的生物活性,既能接受丙氨酸,又能将所携带的丙氨酸掺入到蛋白质中去。

本项研究中建立的超微量测活方法,只需样品7微微克分子( $7 \times 10^{-12}$ 克分

子),这在世界上是首创。

人工合成核糖核酸还带动了核酸类试剂和工具酶的研究,带动了多种核酸类药物,包括抗肿瘤药物、抗病毒药物的研制和应用。

此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Zhuāng Xiquān

**庄希泉** (1888~1988) 政协第

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福建厦门人。1888年9月9日生。早年就读于厦门东亚书院和前清举人办的学馆。1906年起在上海经商。1912年任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同年在马来亚参加革命同盟会。1916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1917年创办南洋女校。1922年回厦门创办厦南女子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福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厦门组织外交后援会,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27年后,在菲律宾主持《前驱日报》。1938年到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香港台湾革命同盟会。1941~1945年在桂林和重庆组织闽台协会、闽台建设协进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代理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侨大学董事长,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5月14日逝世。

zìchānjiējī fāndòng lùxiàn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bourgeois reactionary line”)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以刘少奇派工作组问题为直接依据,对党内分歧作出的错误论断。这个论断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批判运动。

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指责这个措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次抨击刘



少奇在派工作组的50多天里实行“白色恐怖”和“资产阶级专政”，并把这件事和1962、1964年他与刘少奇的一些分歧联系起来。

为了给刘少奇的“错误”确定一个批判名义，经中央文革小组策划起草，10月1日林彪在庆祝建国17周年天安门广场集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10月3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又有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他后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没有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周恩来无力再坚持。

10月6日，北京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推向高潮。遭到批判的不仅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而且包括派工作组的各级党委、被派出的工作组成员，以及在工作组领导期间得到支持的革委会、红卫兵。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把刘少奇等人加强党的领导的作法说成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责广大干部是“怕字派”。林彪在讲话中点名说：这条反动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把这个所谓“反动路线”视为敌对性质。他在讲话中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啊？但是，他已经把这个“路线错误”发生的原因扩大到50年代以后中央设立一、二线领导。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标志，被批判对象由所谓的“中央两个司令部”扩大到各级党政领导人和一般群众，造成了全社会的严重分裂。被批判内容包括“压制群众”、“血统论”，以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等。这场运动伴随着“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一直持续到1968年。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刘少奇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和毛泽东之间

确实存在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采取什么方法领导的分歧。但这并没有形成一条路线，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zongjiao

**宗教** (relig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新教)。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历史沿革** 佛教于公元元年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汉语系佛教(汉传佛教)、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南传佛教，俗称小乘佛教)。道教产生于中国，形成于公元2世纪，元代以后正式形成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教派。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逐渐为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10个民族中的大多数群众所信仰。天主教在公元13世纪曾一度传入中国，后中断，16世纪末随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再度传入，被西方10多个国家的几十个修会所控制。基督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至1949年，教派约有70个，分属于121个外国差会。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100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儒家思想始终居于统治地位，5种宗教都没有取得国教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对中国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过重大和积极的影响，但也都曾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

**宗教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政策，对宗教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妥善处理宗教问题。1951年1月政务院在文教委员会内设宗教事务处，1954年11月设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主管宗教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宗教工作任务重的地、市、县也相继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宗教工作虽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误，但总的说来，正确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是：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

业；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摆脱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了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支持和帮助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活动，增进了同一些国家宗教界的了解和友谊。但是，自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滋长，60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强行禁止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某些一般信徒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逐步得到恢复。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提出了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端正了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此后的10多年间，国家在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开放寺观教堂，恢复爱国宗教组织活动，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加强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开展宗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活动，抵制外国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进入90年代后，在继续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针对宗教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明确提出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制定了地方性宗教

法规或规章，通过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有效地处理了宗教领域里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正确的宗教政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民族之间、各宗教组织之间、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共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奋斗。新的实践和经验也丰富了宗教理论宝库，充实完善了宗教法律政策。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正确的，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处理宗教问题是成功的。

**基督教自传、自治、自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界的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开展了使基督教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由中国信徒自传、自治、自养的反帝爱国运动。1950年9月，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提出以肃清教徒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实现“三自”（自传、自治、自养）为基督教和团体的基本方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其辖区内的中国财产，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公私存款，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针对美国这一措施，中国政府于12月28日发布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同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决定。1951年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鼓励中国基督教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帮助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转变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团体。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还提出了筹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建议。会后，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广泛开展了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的控诉活动，并按照政务院公布的《接受外资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进行了登记。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自中国基督教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以来4年的工作，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正式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这次会议是中国基督教徒为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建设自治、自养、自传

的教会而召集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也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空前广泛的一次团结的大会。会后，全国不少地方成立了当地的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1958年以后，全国各地基督教会打破教派或地区界限，在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照顾特点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礼拜，消除了外国差会留给中国基督教教派林立的弊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督教的三自事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恢复全国和地方三自爱国组织、开放教堂、出版圣经、恢复神学院校。1980年10月6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三次全国会议，总结了自三自爱国运动30年来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三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鼓励全国教徒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努力办好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性的教务机构，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它的任务是：做好各项教务工作，栽培合格的传教人员，出版圣经及宗教书刊，加强与各地教会的联络。大会选举丁光训等141人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丁光训任主席和会长。这次会后，又先后于1986年8月、1991年12月、1996年1月召开了自中国基督教第四、五、六届全国会议，基督教三自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传好、治好、养好已成为新时期基督教“三自”事业的着重点，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坚持“三自”，发扬“三自”，加强神学思想建设，走与新的时代相适应的道路。

**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教会学校的爱国进步势力同控制教会学校实权的外国势力开展了斗争，收回了教会学校的主权，拉开了独立自主自办运动的序幕。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天主教众在王良佐神甫的带领下，冲破外国势力的禁令，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堂区500多人在宣言上签名。12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宣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天主教界纷纷响应，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自立革新爱国组织。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贯彻，促进了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1951年4月7日，天津正式成立了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以保护教产为重点，同教区内以文贵宾为首的外国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后经人民政府调查取证，依法将文贵宾驱逐出境，收回了天津教会的主权。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应各地天主教界爱国人士的要求，根据梵蒂冈原驻中华民国公使黎培里仍以“教廷代表”身份行事，继续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破坏天主教界的独立自主自办的活动的犯罪事实，将其驱逐出境，反帝爱国运动取得又一重大胜利。一些地方还先后破获了天主教内的间谍案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案，取缔了反动组织“圣母军”，天主教内的爱国进步势力与被国外控制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5年，上海市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清除了上海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运动的发展，打破了由外国传教修会划地而治、各自为政、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教会体制，终于形成了全国天主教徒团结一致的新局面。1957年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与会代表241人，讨论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选出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150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宣告成立。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领导机构，皮漱石主教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会后，一些地方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爱国组织。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大多数教区没有正权主教的局面，1957年12月18日，四川成都教区自选李熙亭为主教，罗马教廷竟以“超级绝罚”相威胁，很多教区不顾罗马教廷的干涉，自选自圣了主教，执掌本教区教务，初步改变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殖民地教会组织体制。1962年1月6日至18日，在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上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1980年5月31日至6月3日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正式建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教团（1992年9月五届代表会议上将教务委员会调整为主教团内主管教务的一个机构），使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日臻完善。罗马教廷从未放弃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企图，口头上声称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在中国培植自己的势力，策划和支持建立非法组织。1981年6月6日，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无视中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主权，擅自任命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并策动邓以明到罗马接受委任。1991年5月29日公布了它12年前（1979年）秘密任命的因叛国罪正在服刑的原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红衣主教。这都充分说明了罗马教廷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企图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立场。激起

中国天主教界的强烈反对，也为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了新的障碍。在此前后，中国政府、中国天主教会反复申明关于改善同梵蒂冈关系的两条原则，即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中国同梵蒂冈的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只有在国家关系改善后才能谈宗教问题。中国天主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正确方针，无论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是否改善，都要坚持下去。从1958年至1998年底，中国自选自圣的主教共135名，现115个教区均由自选自圣主教或教区长主持教务，各项教务活动、自养和社会服务事业都得到发展，独立自主自办得到实现。

**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在宗教领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1950年6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该法还规定，所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除归国有者外，均由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地分给贫苦农民。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能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也要分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土地改革法公布后，在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教堂、寺院、宫观和宗教学校、团体在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宁夏、青海、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土地改革，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民族团结出发，采取了比汉族地区更为慎重稳妥的措施和步骤。对清真寺、拱北（墓亭）、道堂的土地，同当地穆斯林群众协商，酌予必要的保留，多余的土地只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穆斯林群众。伊斯兰教、藏语系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实际是在1958年年底开始的。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伊斯兰教、喇嘛教工作的文件中，提出了改革的内容和政策界限。被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有：废除宗教中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寺庙私设法庭、监牢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

干涉文化教育事业等；废除喇嘛庙和清真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取缔非法商业；禁止寺庙敲诈勒索群众财物，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生产和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寺庙不得强迫群众当喇嘛、当满拉；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寺庙间的隶属关系等。1960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经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清真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基本被废除。改革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西藏地区的社会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的。1956年9月，国家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决定6年内不改。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协议，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坚决平息叛乱。平叛取得胜利后，国家及时决定，在西藏实行“边平边改”的方针，按照“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缓改”的原则，有步骤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民主改革的组成部分。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在寺庙中开展了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清查叛乱分子，揭露叛乱分子的罪行。在改革中，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同时坚持“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寺庙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建立寺庙民主管理组织，搞好寺庙的民主管理。西藏平叛斗争的胜利，社会民主改革包括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的胜利，使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自由权利，又是中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中国实行宗教与政权、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国家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国家保护宗教组织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教务的权利。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和按宗教习惯在教徒家里进行的正常宗教活动，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公民享有充分的真实的宗教

信仰自由，在信教与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之间，造成了一种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宽松政治局面。据1997年底统计，全国5个宗教有各级宗教组织（协会等）3400多个，宗教活动场所86000多处，宗教教职人员近30万人，宗教信众约有上亿人。信仰藏语系佛教的藏、蒙古、土、裕固、纳西、普米、门巴等民族总人口约700万。信仰巴利语系佛教的傣、布朗、德昂、佤、阿昌等民族总人口约150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10个民族的总人口约2000万。天主教教徒约有400万。基督教教徒约有1000万。信仰汉语系佛教和道教因无严格入教仪式，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国家在保障人们信教自由的同时，也保障人们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人们更加理解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意义，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宗教教职人员** 宗教教职人员包括僧尼、喇嘛，道士、道姑，阿訇、毛拉，主教、神甫，牧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宗教界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界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国守法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宗教界的吴耀宗等7人作为正式代表、刘良模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宗教界有喜饶嘉措等14人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代表，他们同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参与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审议，参与了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以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代表和委员。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也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员。从50年代开始，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相

继建立了全国性的宗教组织以及地区性的宗教组织。它们是各教宗教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学习，办理教务，组织正常宗教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和团结宗教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宗教教职人员的传承也都如法如律地进行，受到国家的尊重，他们办理教务、组织正常宗教活动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规范了佛教收徒传戒活动。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活佛特有的传承方式。从1989年至1997年底，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西藏5个省区经政府批准已转世活佛200多名。经中央批准的有两名，即噶玛噶举派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伍金赤列、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班禅逝世后，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遗体灵塔和享殿，按藏传佛教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转世灵童寻访、认定等事宜。此后成立了以班禅经师嘉雅活佛为首的灵童寻访班子。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于1995年11月29日在西藏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举行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六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真身，并于当天由西藏自治区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1995年1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坐床仪式在扎什伦布寺举行，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主持了坐床典礼。

中国道教协会为了规范传戒收徒活动，先后于1986年、1992年作出了《关于道教全真派传戒规定》和《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试行办法》。1989年11月，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传戒受戒典礼。1995年又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上清宫举行了第二次传戒活动。1995年道教正一派在江西天师府举行授箓传度法会，授箓200多名箓生。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累计135名。伊斯兰教、基督教教职人员的传承也都按各教的规章制度正常进行。据1997年底统计，5个宗教的教职人员总数近30万人，其中佛教187400多人，道教4900多人，伊斯兰教75100多人，天主教4800多人，基督教19000多人。宗教教职人员

在履行宗教职务的形式下，还进行着许多服务性劳动和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受到人们的尊重。全国、省、市、县四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员共17000多人。担任各级宗教组织的委员和理事的宗教界人士就更多。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这既是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团结合作的基础，也是在信仰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国家机关十分重视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重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涉及宗教方面的重大政策和问题，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宗教界人士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立场，努力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爱国宗教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界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给各宗教的弊端，开展教务活动的需要，由各宗教知名人士发起，陆续建立了全国性的爱国宗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于1953年5月，已开过6届会议，历任会长为圆瑛、喜饶嘉措、赵朴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于1953年5月，已开过6届会议，历任主任（会长）为包尔汉、张杰、沈遐熙、安士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7月，已开过6届会议，历任主席为吴耀宗、丁光训、罗冠宗。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于1980年10月，已开过4届会议，历任会长为丁光训、韩文藻。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于1957年4月，已开过6届会议，历任会长为岳崇岱、陈撷宁、黎遇航、傅元天、闵智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7年7月，已开过6届会议，历任主席为皮漱石、宗怀德、傅铁山。中国天主教教团成立于1980年6月，已开过4届会议，历任（团长）主席为张家树、宗怀德、刘元仁。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于1980年6月，1992年9月第五届代表会议决定将教务委员会隶属于主教团作为一个主管教务的专门委员会。随全国性宗教组织的建立，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了地区性的爱国宗教组织。至1997年底，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共7个，省一级的宗教组织174个，地市一级的宗教组织762个，县一级的宗教组织2490个，以上共计3343个。其中佛教607个，道教119个，伊斯兰教516个，天主教620个，基

督教1462个。这些爱国宗教组织在五十年代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它们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反映宗教界的意见和要求，及时组织学习国家大政方针和宗教政策，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动员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团结宗教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它们积极发展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国外宗教组织的交往活动，参加国际宗教会议和某些国际宗教组织，成为发展中外民间友好交往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宗教活动场所** 寺院、宫观、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是宗教的重要标志和实际体现，是联系信教群众的纽带，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宗教教职人员修学的道场，是宗教界服务人群、造福社会的立足点。许多名山大寺还是具有重大历史文物价值的文化设施、陶冶人们性情的风景名胜，是增强民族团结、开展海外联谊、发展国际友好往来的场所。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历来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规定不论其自住、出租或作生产福利事业之用，准其维持现状并负保管维修之责任，天主教、基督教原属外国教会所有的教堂及房地产转为中国教会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职业者自住的房屋免征房地产税。明令保护宗教名山大寺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寺庙教堂。一些年久失修或受战争破坏的寺庙官观教堂得到维修。宗教活动场所普遍建立了民主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据1997年底统计，5个宗教共有宗教活动场所86000多处，其中佛教寺院13000多座（汉语系佛教8400座、藏语系佛教3000座、巴利语系佛教1600座），道教宫观1500多座，伊斯兰教清真寺30000多座，天主教的教堂、会所4600多座，基督教教堂12000多座，简易活动场所25000处。这些宗教活动场所经过维修，面貌一新，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宗教活动场所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负责管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

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任何人不得到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无神论宣传。

**宗教文化事业**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以及宗教组织都重视宗教文化事业,除保护名山圣地和文物古迹外,还成立研究机构,出版宗教经典书刊,召开宗教学术研讨会,弘扬宗教优秀文化。各全国性宗教组织设有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设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也设宗教研究机构,有的大专院校也有人从事宗教研究工作。中共统战部门和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设有政策研究机构。印刷出版的宗教经典书刊成就可观,有各宗教内部传教用的书刊,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有介绍政府宗教政策法律的读物。在宗教典籍方面有:《中华大藏经》(汉、藏文),《乾隆版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古兰经》,《新约》,《旧约》,《圣经》等。中国基督教出版发行的圣经除汉文版外,还有苗、朝、傣等少数民族文版及盲文版,到1998年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是一个稀有的巨大的佛教文化宝藏,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力量从1956年对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于1959年完成,共拓印经版14270余块,出拓片7份。为妥善保护这一稀世文物,北京市政府已于1998年将石经版回埋地下。在宗教学理论、方法、文化等研究中,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宗教学通论》(吕大吉主编),《宗教学概论》(罗竹风主编),《宗教学原理》(陈麟书主编),《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主编),《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基督教史》(唐逸主编),《中国宗教史》(王友三主编),《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杨怀中、余振贵),《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道教文化丛书》(中国道教协会),《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王明),《宗教辞典》(任继愈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宛耀宾总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胡孚琛主编),《道教大辞典》(闵智亭、李养正主编),《基督教辞典》,《佛学辞典》(宽忍主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等,琳琅满目。主要宗教刊物有:《法音》(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道教》(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穆斯林》(中国伊

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天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宗教》(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这些宗教书刊的出版发行,对传播宗教文化,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宗教,团结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综合的还是专题的,都进行过许多次,对宗教学术研究和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199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中国佛教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收录1000座香火犹存的寺院,编纂了一部《中国佛教二千年》画册,大四开本,厚20公分,重80余斤;10月21日至22日在江苏无锡祥符寺灵山大佛脚下召开“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学术研讨会”,有近百名国内外法师、专家学者出席;11月6日在灵山大佛脚下举办了大型佛教音乐舞蹈演出;拍摄了《中华佛教二千年朝圣之旅》电视文献纪录片;11月22日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举办了“纪念佛教东传二千年法会”和“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法会”。这既是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也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文化活动,展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佛教的真实风貌。

**宗教教育事业** 中国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在国民教育中,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除宗教活动场所沿用传统办法培养人才外,经政府批准,各宗教组织开办宗教院校,根据各教教务需要进行宗教专业教育,培养年轻的教职人员。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年开办了中国佛学院,设本科班、研究部、藏语班,为佛教培训了一批人才。中国道教协会于1961年开办了道教徒进修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55年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天主教有北京教区神哲学院。基督教有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化大革命”中宗教院校全部停办。从1980年起陆续恢复了中国佛学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中国基督教金陵协和神学院,开办了中国道教知识专修班、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南京栖霞山僧伽人员培训班。同时,一些地方开办了地方性宗教院校。至1995年底,全国共有宗教院校50所,其中佛教14所,道教1所,伊斯兰教9所,天主教11所,基督教15所。1995年以后,一些地方又陆续开办了一些地方性宗教院校,使院校总数达到74所,在校学员4000多人。这些院校已为各教培养了近万名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较高宗教造诣的年轻宗教教职人员,他们

已经走上教务工作岗位,适应了各教教务活动的需要。

**宗教国际交往** 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的5种宗教与国外有着历史的广泛的联系,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六十年代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国宗教界虽也与一些国家的宗教界有些联系,但这种联系有很大局限。1973年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积极开展了一些对外交往活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也日益发展。中国各宗教已与世界上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界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往来,参加了一些世界性的宗教组织和国际宗教会议。成功地举办了鉴真像回国巡展(1980)、佛牙赴缅甸供奉(1955、1994)、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1994)、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1995)、罗天大醮(1993)等大型活动。通过旅游、经贸、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渠道到中国来的有各种宗教信仰的外国人更不计其数。通过这些友好往来,使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人民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中国的宗教政策,增进了中国宗教界同世界各国宗教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为发展中外文化、经贸等合作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境外敌对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渗透活动,培植它们的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宗教事务,企图重新控制中国的宗教组织,以实现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针对这种情况,在积极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中国宗教组织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抵制渗透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宗教走过的历程,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50年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已逐步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在政治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进行斗争。围绕拉萨事件和班禅转世问题同达赖集团和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经济方面,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发挥各宗教的优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努力。一些宗教活动场所从实际出发,兴办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改善

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位于风景名胜区的佛道教寺观，为保护好文物古迹，建设风景区，发展当地经济和旅游事业做出了贡献。在思想信仰方面，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既充分发扬各宗教的优良传统，又努力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一些宗教界人士还明确提出，应该淡化信与不信的矛盾，创立与新的社会相适应的神学思想，建设道德型、服务型的宗教。在宗教活动方面，除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外，各宗教都已注意逐步改变那些与新的时代、科学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旧的仪式。在文化方面，继承和弘扬优秀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宗教活动中，注意纠正那些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群众身心健康，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的活动。在道德方面，注意弘扬宗教道德中那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弃恶扬善、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优良传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中国宗教工作的一

条正确方针，也是中国各宗教今后前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1997。

《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8。

Zou Jiahua

**邹家华**（1926～ ）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人。1926年10月生。194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参加新四军，后在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曾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建设科干事，松江省哈东地委秘书，宾县常安区委书记。1948～1955年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补习俄文，后入苏联

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1955年起先后任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人民友谊厂）工艺科工艺师、副主任工程师、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代厂长、厂长，一机部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劳动。1972年任一机部机械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3～1982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1985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85～1988年任兵器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1991年任国务委员兼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1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56 xiang gongcheng

**156 项工程** (156 construction projects)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到“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重点建设项目。

1949年底至1950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两项协定。双方约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援助中国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当年援助大型工程项目50项。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访苏,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及其《协议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拖拉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炼油厂、机械制造厂、电力站等9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中苏双方于北京签订《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苏联援华的重点建设工程共达156项。

苏联援华的这些项目大多完成得较快。如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3年7月开工,到1956年10月验收,只用了3年时间;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锅炉厂等项目也只用2年左右的时间;哈尔滨量具刀具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不到4年。为了完成这些项目,苏联每年派遣数百名专家来中国帮助工作,并接受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到苏联实习。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援华。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实际完成或基本完成的为154项。

1956~1967 Nian Kexue Jishu Fazhan Yuanjing Guihua Gangyao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Summary of the 1956-1967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56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文件。中共中央于1956年12月22日作出批示并转发各地征求意见。

规划纲要共分9节。指出,进行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为着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能够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作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依据发展科学必须执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纲要就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这13个方面是: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矿冶;燃料和动力;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建筑;运输和通讯;新技术;国防;农、林、牧;医药卫生;仪器、计量和国家标准;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和科学情报。57项任务共包括616个研究课题。纲要还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纲要是当时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在它的指导下,全国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1956 Nian dao 1957 Nian Quanguo Nongye Fazhan Gangyao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Outline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1956-1967”) 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有关农业合作化及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长期规划的草案。纲要草案是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起草的《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各方面在京人士进行讨论,又经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给各地征求意见。1957年10月及1958年初,中共中央对纲要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相继产生了第一、第二次修正草案。1958年5月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基本通过纲要的第二次修正草案。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由纲要草案修订而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纲要共40条。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对农民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项要求做了规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同时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他地区则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纲要规定:全国各地地区在从1956年开始的12年内粮食应达到的每亩平均年产量为: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在12年内应达到的每亩平均年产量,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还提出发展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多种经营;坚持勤俭办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粮食储备;发展山区经济;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办好国营农场等措施。此外,还制定了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纲要草案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形势下提出的,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规划出远景,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上来的意向及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对于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纲要拟定的计划要求过急,指标过高,也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 推荐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

1986 nian xuechao

**1986年学潮** (student movement in 1986) 1986年底合肥、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的高等院校学生游行的活动。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1 nian honglao zaihai

**1991年洪涝灾害** (flood disaster in 1991) 1991年中国江淮地区由洪水和涝渍造成的局部性严重自然灾害,其中,淮河、太湖流域灾害最为严重。

1991年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气候异常,降雨偏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长时间滞留在长江以南,江淮流域提前35天进入梅雨期,从5月中旬到7月上旬,连降暴雨,5月份淮河水系平均雨量176毫米,是常年的2.1倍;局部地区最大60天降雨量分别为800、1000毫米,安徽金寨高达1606毫米;太湖流域降雨量790毫米,是1949年以后42年中梅雨期最长、雨量最大的一次。7月中旬以后,东北松花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出现连续多雨天气,并多次发生大雨和暴雨,全流域6、7两

个月降雨总量在 200 毫米以上, 超过常年同期 0.5~1 倍, 暴雨中心区雨量超过 500 毫米。

受降雨影响, 淮河发生了自 1949 年以来的第二位大洪水, 淮河干流正阳关、蚌埠站最高水位达 26.52 米、21.98 米, 略低于 1954 年; 太湖流域出现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7 月 14 日达到 4.79 米, 比 1954 年洪水水位还高 0.14 米, 最高水位持续时间比 1954 年还长 14 天, 超警戒水位时间长达 80 天; 长江支流滁河、澧水和乌江部分支流及鄂东地区中小河流举水等相继出现建国 42 年来最大洪水; 嫩江、牡丹江和松花江干流发生 15~20 年一遇洪水, 哈尔滨站最大流量 10 700 立方米/秒, 佳木斯站最大流量 15 300 立方米/秒, 分别为 1949 年以来的第三位和第二位。

洪涝灾害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是 1949~1991 年期间受灾面积、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程度遭受水灾, 农田受灾 2459.6 万公顷, 成灾 1461.4 万公顷, 倒塌房屋 497.9 万间, 死亡 5113 人, 直接经济损失 779.08 亿元。其中江淮地区的苏、皖两省灾情最重, 农田受灾 966.5 万公顷, 成灾 672.8 万公顷, 倒塌房屋 349.3 万间, 死亡 1163 人, 直接经济损失 484 万元, 各占全国总数的 39%、46%、70%、23% 和 62%。

在抗洪抢险过程中, 江泽民、李鹏、田纪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到一线视察指导, 动员、部属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果断决策, 统一调度。各地行政首长直接负责防汛。有关部门密切协作, 提供汛情服务, 组织救灾款 200 多亿元, 调运物资 270 万吨。解放军、武警部队出动 53 万人次参加抢险。水利工程调蓄洪水 38 亿立方米, 分蓄洪水 40 亿立方米, 加快排水入江。确保了江河干堤, 大中型水库, 上海、蚌埠等重要城市, 铁路干线、重要工矿企业的安全, 取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

### 1998 nian nan-bei honglao zaihai 1998 年南北洪涝灾害 (floods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in 1998)

1998 年南方长江和东北嫩江、松花江等流域因发生大洪水而造成严重自然灾害。长江发生 1954 年以后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 先后出现 8 次洪峰; 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 先后出现 3 次洪峰; 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发生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据国家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统计, 全国共有 29 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受灾面积 2578 万公顷, 成灾面积 1585 万公顷, 受灾人口 2.3 亿人, 死亡 3656 人, 房屋倒塌 566 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 2484 亿元。其中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受到的灾害最重。

1998 年中国气候异常, 雨水过大, 特别是长江以南和东北北部地区, 降雨多, 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自 6 月份起, 长江流域出现 4 次持续大范围降雨过程: 第一次是 6 月 12 日至 26 日, 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多 1 倍以上, 江西北部多 2 倍以上。第二次是 6 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 四川、重庆、长江三峡地区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5 成至 1 倍。第三次是 7 月 20 日至 31 日, 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 and 安徽南部等地区, 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3 倍以上。7 月 21 日至 22 日, 武汉降特大暴雨, 汉阳、汉口、武昌 24 小时降雨量分别为 532 毫米、434 毫米、375 毫米。第四次是 8 月 1 日至 27 日, 四川、重庆、三峡地区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7 成至 2 倍。东北地区嫩江流域 8 月上半月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2~5 倍。

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的赣江、信江、饶河、抚河和修水 5 条河流, 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 4 条河流, 长江上游以及中游的汉江、清江等支流, 嫩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和松花江干流都相继发生洪水, 水位居高不下。从 6 月 24 日至 9 月 25 日, 长江中下游大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 历时 3 个月, 有的江段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时间长达 40 多天。长江干流湖北宜昌以下河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 湖北沙市至螺山、湖北武穴至江西九江 360 千米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 都大幅度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超过幅度达 0.55~1.85 米, 沙市最高水位达到 45.22 米, 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0.55 米。松花江干流和嫩江也全线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超过幅度最高达 1.61 米, 超警戒水位历时一个多月。哈尔滨水文站维持 120.89 米高水位长达 31 个小时, 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达 15 天之久。

面对大洪水,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指挥下, 全国军民团结奋战, 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 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 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伟大胜利。

20 wandunji zaochuanwu de jianzao  
20 万吨级造船坞的建造 (building of 200 000 ton dock) 大连造船新厂 20 万吨级造船坞是目前中国国内建成的最大造船坞。船坞建造工程投资 5 亿元。1989 年 3 月工程正式开工, 1994 年 9 月船坞主体工程完工, 1995 年 1 月投入试生产, 1997 年 3 月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验收。该船坞由中国船舶总公司第九设计研究院设计。船坞长 365 米, 宽 80 米, 深 12.7 米, 可供建造 20~30 万吨级 VL-CC 船舶或同时并列半串联建造两艘 6 万吨级船舶, 也可供建造大型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年造船能力 50 万吨, 是一座多功能大型船坞。这一船坞的兴建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可以建造 30 万吨超大型船舶的国家行列。

### 211 gongcheng

211 工程 (Project "211") 由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于 1991 年 12 月在《关于落实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实施方案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教育建设项目。

建设目标 面向 21 世纪, 重点建设 100 所高等学校以及一批重点学科, 使其总体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其中一部分重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 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平, 大部分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管理水平、办学效益上取得较大成绩, 以适应国家、地区和行业发展需要, 起到骨干和示范作用。同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基地, 以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主要内容 包括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部分。1993 年 7 月, 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提出了 211 工程前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对工程的定义、建设目标、实施办法、立项程序等作了明确的阐述。该文件及随后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建设 100 所重点大学”调整为“重点建设 100 所大学”, 这标志着工程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同年 10 月, 211 工程部门预审陆续展开。1995 年 11 月,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



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该工程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第九个五年计划，并由规划设计阶段转入全面实施阶段。1996年3月，为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统筹规划和领导，成立了由国务院和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协调小组发布了一系列管理文件，逐步建立起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管理体系，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截至1999年3月，全国已按预定计划完成了约100所高校的211工程部门预审任务，工程建设转入具体实施阶段。经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部署，“九五”期间正式立项建设的学校有61所。1998年5月，已有58所学校经国家计委批复完成了立项工作并开工建设。其余3所学校的立项工作将在1999年上半年完成。国家计委还批复了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个项目建议书，立项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另外，有300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点被列入重点建设的学科点。据初步测算，上述61所大学和2个公共服务体系项目总投资约13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27.55亿元，主管部门配套投资53亿元，地方政府投资17亿元，211工程院校自筹资金33亿元，其他渠道投资4亿元。已到位的中央专项资金达16.4亿元，大部分学校的配套资金也已按计划到位。“九五”期间工程总体建设目标的实现，将为21世纪211工程的继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0 wan qianwa 60 wan qianwa  
huoli fadian shebei zhizao chenggong  
**30万千瓦 60万千瓦火力发电设备制造成功**  
(building of 30 000kw and 60 000kw thermal power equipment)  
30万千瓦、60万千瓦火力发电设备，是80年代中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成功生产的大型成套火电设备。它们的制造成功，标志着中国大容量火电机组的科研、设计和制造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1年初，中国从美国西屋、燃烧工程公司等引进了亚临界压力30万千瓦、60万千瓦火电设备的设计制造技术，从美国依巴斯公司引进了相应的电站工程设计技术，还分别从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日本、瑞士、意大利、芬兰等10个国家引进了300万千瓦、600万千瓦火电机组工艺流程的10大系

统240项配套设备中的128项制造技术。为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中共派出近千名技术人员分别到美国等8个国家38家厂商接受培训。经过近万名技术人员参加科研工艺试验，共转化了4万张图纸、上千个计算程序，攻克了上万个工艺难点。配合引进工作，同步对发电设备制造业进行了相应的技术改造，为此，仅“七五”期间国家即投资近1亿美元和30亿元人民币。经过300多家主机承制企业七八年的努力，引进型第一套30万千瓦、60万千瓦考核机组制造成功，分别于1987年6月和1989年11月在山东石横电厂和安徽平圩电厂投产发电。“八五”时期，通过优化研制，又提高了机组的国产化率和工作效率。1996年初，专家鉴定认为，国内生产的机组已达到90年代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至1997年底，中国已生产96台引进型30万千瓦机组，3台60万千瓦机组。国产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机组已成为中国电力建设的主力机组。机组的国产化率由最初的50%提高到95%以上。中国大型火电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已基本立足于国内。

61 Ren Jituan yuan'an  
**“61人集团”冤案** (fabricated case of the 61 Cadres)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等人借历史事件制造的一起迫害领导干部的冤案。

1931年前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中共领导干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他们在狱中建立党支部，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为了拯救这些干部，不使他们落入图谋进攻北平的日军之手，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他们采取特殊方式履行手续出狱。接到柯庆施代表中央的通知后，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出狱的有52人（“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进9人），他们出狱后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10人牺牲。中共中央曾经肯定过他们的表现。1966年9月16日，对当年这一历史过程十分清楚的康生却别有用心地重提这件事，写信给毛泽东，歪曲事实，诬陷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续出狱是“叛党行为”，说刘少奇经中央同意作出的决定是“反共的决定”。周恩来当即指出中央知道出狱这件事，并经毛泽东同意代表中央发出电报，制止各地红卫兵揪斗这些领导干部。1967年2月，早年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不畏康生的威胁，坚持说

明，这是中央知道的，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但是，随着江青、康生在中央控制的权力越来越大，终于煽动红卫兵制造出一个“61人叛徒集团”重大冤案。江青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要是没有红卫兵，怎能揪出那个叛徒集团啊！9月以后，全国掀起“抓叛徒”之风，这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受到残酷迫害，许多人被长期监禁，受到刑讯逼供，甚至被迫害致死。在白区工作过的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也遭到诬陷和迫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曾指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978年6月，他再次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此事予以处理。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所谓“61人集团”案是错案。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彻底平反。

863 Jihua

**863计划** (“863” Plan)  
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于1986年底启动。1986年3月，邓小平肯定了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家骥、陈芳允联名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指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据此，有关部门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命名为“863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宗旨是：在20世纪末，集中组织国家精干的科技力量，瞄准国际高技术发展的前沿，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力争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缩小中国在这些方面与国际前沿的科技差距，通过伞状辐射带动相关方面的科技进步，为加速形成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并同时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结合国情，这一计划起初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等7个领域的15个主题，作为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995年，又将海洋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其中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海洋技术等6个领域是民口发展高技术的重点。

在组织实施中，该计划按照“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紧紧跟踪”的原则向前推进。在实施管理上，民口6个领域由国家科委负责实施，军口2个领域由国防科工委负责实施，新概念、新构思探索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实施。在管理方式上，采取“专家决策和管理”的机制。仅在民口研究领域，国家有关部门即组织

了6个领域专家委员会、12个主题专家组,约120人。在项目实施上,采取“择优委托和招标制选择项目承担单位”的办法。在队伍组织上,强调发挥中青年科技人员的作用,中青年科技人员占90%以上。在经费分配上,将相当一部分经费用于“新概念、新构思探索研究”,以为计划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理论和新技术途径。在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上,实行“课题评审”制度。

仅“八五”期间,为实施该计划,全时承担该计划研究开发任务的科研人员即达15000人,投入资金23亿元(含贷款

1400多万元)。其中,国家拨款15亿元,部门地方配置5亿元,科研机构自筹3亿元。

实施该计划10年间,共推动完成了1200个高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其中567项获国家、部门奖励,获国内外专利244项。仅“八五”期间,该计划即推动完成了36项关键技术研究,突破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完成的36项关键技术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占11%,接近国际水平的占60%,保持国内领先水平的占29%。

在取得重大技术进展的同时,该计划

的实施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的高科技队伍,建立起了一批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10年间,培养博士后207人,博士1490人,硕士3868人,有数十人入选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围绕实施该计划,组建技术中心15个,组建中试实验室和中试线7个。

90年代初以来,863计划注重了计划的外延扩大,一批成熟的科技成果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目前已有10%的实验室成果形成产品进入市场,38%的成果不同程度地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 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 第一批 (44处)

名 称	位 置	名 称	位 置
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	八达岭在北京市延庆县, 十三陵在北京市昌平区	鸡公山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信阳市
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风景名胜区	河北省承德市	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洛阳市
秦皇岛北戴河风景名胜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	嵩山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登封市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山西省五台县	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武汉市
恒山风景名胜区	山西省浑源县	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丹江口市
鞍山千山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鞍山市	衡山风景名胜区	湖南省衡阳市
镜泊湖风景名胜区	黑龙江省宁安县	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	广东省肇庆市
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太湖风景名胜区	江苏省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峨眉山市
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	江苏省南京市	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	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 东迄湖北省宜昌县南津关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杭州市	黄龙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松潘、南坪县
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	重庆缙云山风景名胜区	重庆市
雁荡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乐清市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都江堰市
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舟山市	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广元市、绵阳市
黄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黄山市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镇宁、关岭县
九华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青阳县	石林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
天柱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潜山县	大理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武夷山市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庐山风景名胜区	江西省九江市	华山风景名胜区	陕西省华阴市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	江西省和湖南省边境罗霄山脉中段	临潼骊山风景名胜区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泰山风景名胜区	山东省泰安市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天水市
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	山东省青岛市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

### 第二批 (40处)

名 称	位 置	名 称	位 置
野三坡风景名胜区	河北省涞水县	胶东半岛海滨风景名胜区	山东省胶东半岛
苍岩山风景名胜区	河北省井陘县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随州市、钟祥县、京山县
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	山西省吉县、陕西省宜川县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桑植县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丹东市	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	湖南省岳阳市
金石滩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大连市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	广东省南海县
兴城海滨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兴城市	丹霞山风景名胜区	广东省仁化、曲江县

续表

名称	位置	名称	位置
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大连市	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
松花湖风景名胜区	吉林省吉林市	花山风景名胜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龙州县
“八大部”——净月潭风景名胜区	吉林省长春市	贡嘎山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江苏省连云港市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南川县
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江苏省扬州市	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长宁、江安县
天台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天台县	织金洞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织金县
嵊泗列岛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舟山市	湄阳河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镇远、施秉、黄平县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永嘉县	红枫湖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清镇、平坝县
琅琊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滁州市	龙宫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安顺市
清源山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泉州市	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横断山脉纵谷地区
鼓浪屿——万石岩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厦门市	昆明滇池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昆明市
太姥山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福鼎县	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丽江、宁蒗、中甸县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江西省玉山、德兴县	雅砻河风景名胜区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	江西省鹰潭市	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平原

## 第三批 (35处)

名称	位置	名称	位置
盘山风景名胜区	天津市蓟县	九宫山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通山县
嶂石岩风景名胜区	河北省赞皇县	韶山风景名胜区	海南省韶山市
北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山西省方山县	三亚热带海滨风景名胜区	湖南省三亚市
五老峰风景名胜区	山西省永济市	西岭雪山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大邑县
凤凰山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凤城市	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	四川省小金县
本溪水洞风景名胜区	辽宁省本溪市	四面山风景名胜区	重庆市江津市
莫干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德清县	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荔波县
雪窦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奉化市	赤水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赤水市
双龙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金华市	马岭河峡谷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兴义市
仙都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缙云县	腾冲地热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腾冲县
齐云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休宁县	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潞西市
桃源洞——鳞隐石林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永安市	九乡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宜良县
金湖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泰宁县	建水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建水县
鸳鸯溪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屏南县	宝鸡天台山风景名胜区	陕西省宝鸡市
海坛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平潭县	崆峒山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平凉市
冠豸山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连城县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敦煌市
王屋山——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济源市、修武县	青海湖风景名胜区	青海省
隆中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襄樊市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览表

### 第一批 [1982年] (24处)

北京	承德	大同	南京	泉州	景德镇	曲阜
洛阳	开封	苏州	扬州	杭州	绍兴	江陵
长沙	广州	桂林	成都	遵义	昆明	大理
拉萨	西安	延安				

### 第二批 [1986年] (38处)

天津	保定	平遥	呼和浩特	沈阳	上海	镇江
常熟	徐州	淮安	宁波	歙县	寿县	亳州
福州	漳州	南昌	济南	安阳	南阳	商丘
武汉	襄樊	潮州	镇远	重庆	阆中	宜宾
自贡	武威	丽江	日喀则	韩城	榆林	张掖
敦煌	银川	喀什				

### 第三批 [1994年] (37处)

正定	邯郸	新绛	代县	祁县	哈尔滨	吉林
集安	衢州	临海	长汀	赣州	青岛	聊城
邹城	临淄	郑州	浚县	随州	钟祥	岳阳
肇庆	佛山	梅州	海康	柳州	琼山	乐山
都江堰	泸州	建水	巍山	江孜	咸阳	汉中
天水	同仁					

##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量指标 (一)

指 标	单 位	1949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8 年
<b>一、人口和劳动力</b>								
年底总人口	万人	54 167	57 482	96 259	105 851	114 333	121 121	124 810
从业人员数	万人		20 729	40 152	49 873	63 909	67 947	69 957
# 职工人数	万人		1603	9499	12 358	14 059	14 908	12 377
<b>二、国民核算</b>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79	3624	8964	18 548	58 478	79 553
第一产业	亿元		343	1018	2542	5017	11 993	14299
第二产业	亿元		142	1745	3867	7717	28 538	39 150
工业	亿元		120	1607	3449	6858	24 718	33 541
建筑业	亿元		22	138	418	859	3820	5609
第三产业	亿元		194	861	2556	5814	17 947	26 104
#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亿元		29	173	407	1148	3055	5029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亿元		80	266	878	1420	4932	661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119	379	853	1634	4854	6404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92	3606	8792	18 320	59 405	81 004
# 最终消费	亿元		546	2239	5773	11 365	34 529	47 922
资本形成总额	亿元		154	1378	3386	6444	23 877	30 088
<b>三、投资</b>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2543.2	4517.0	20 019.3	28 457.5
# 国有经济投资	亿元	11.3 *	43.6	668.7	1680.5	2986.3	10 898.2	15 662.0
个体经济投资	亿元				535.2	1001.2	2560.2	3637.8
<b>四、财政</b>								
国家财政收入	亿元	65.2 *	183.7	1132.3	2004.8	2937.1	6242.2	9853.0
国家财政支出	亿元	68.1 *	176.0	1122.1	2004.3	3083.6	6823.7	10 771.0
<b>五、主要农产品产量</b>								
粮    食	万吨	11 318	16 392	30 477	37 911	44 624	46 662	49 000
棉    花	万吨	44.4	130.4	216.7	414.7	450.8	476.5	450.1
油    料	万吨	256.4	419.3	521.8	1578.4	1613.2	2250.3	2313.9
水 产 品	万吨	45	167	466	705	1237	2517	3906
<b>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b>								
布	亿米	18.9	38.3	110.3	146.7	188.8	260.2	241.0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11	37	439	911	1372	2812	2126
原    煤	亿吨	0.3	0.7	6.2	8.7	10.8	13.6	12.5
原    油	万吨	12	44	10 405	12 490	13 831	15 005	16 100
发 电 量	亿千瓦小时	43	73	2566	4107	6212	10 070	11 670
钢	万吨	16	135	3178	4679	6635	9536	11 559
水    泥	万吨	66	286	6524	14 595	20 971	47 561	53 600
<b>七、建筑业</b>								
国有建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19 295.8	20 303.2	44 562.9	51 500.6
国有建筑企业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8563.1	9361.7	15 182.4	17 977.0
<b>八、运输邮电业</b>								
化运量	亿吨	1.6	3.2	24.9	74.6	97.1	123.5	127.2
货运周转量	亿吨公里	255	762	9829	18 365	26 207	35 730	37 855
客运量	亿人	1.4	2.5	25.4	62.0	77.3	117.3	137.7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155	248	1743	4437	5628	9002	10 559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1440	19 834	31 154	48 321	80 166	92 237

##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量指标 (二)

指 标	单 位	1949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8 年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1	2	12	30	82	989	2431
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门		47	406	613	1232	7204	13 824
电话机	万部	39	369	626	1233	5762	13 123	
九、国内外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262.7	1264.9	3801.4	7250.3	20 620.0	29 152.5
市	亿元				1874.5	3888.6	12376.7	17 825.2
县	亿元				737.2	1337.4	2919.6	3681.9
县以下	亿元				1189.7	2024.3	5323.7	7645.4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1.3 *	19.4	206.4	696.0	1154.4	2808.6	3239.3
进口额	亿美元	5.8 *	11.2	108.9	422.5	533.5	1320.8	1401.7
出口额	亿美元	5.5 *	8.2	97.5	273.5	620.9	1487.8	1837.6
十、利用外资								
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	亿美元				98.7	120.9	1032.1	632.0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46.5	102.9	481.3	585.6
十一、金融								
金融机构银行各项存款	亿元		93	1135	4265	11 645	53 882	95 698
金融机构银行各项贷款	亿元		108	1850	5906	15 166	50 544	86 524
十二、教育								
学校数	所	352 190	533 224	1 115 026	938 173	867 924	764 955	702 719
# 高等学校	所	205	201	598	1016	1075	1054	1022
专任教师数	万人	93.5	159.2	871.3	868.8	946.9	994.8	1053.7
在校学生数	万人	2577.6	5443.6	21 346.8	18 633.1	17 553.1	19 677.3	21 635.4
高等学校	万人	11.7	19.1	85.6	170.3	206.3	290.6	340.9
中等学校	万人	126.8	314.5	6637.2	5092.6	5105.4	6191.5	7340.7
小学	万人	2439.1	5110.0	14 624.0	13 370.2	12 241.4	13 195.2	13 953.8
十三、科技								
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	万人		42.5	434.5	781.7	1080.9	1913.4	2091.4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亿元					125.4	349.0	525.9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75.1	268.3	430.0
十四、文化、卫生								
图书出版	亿册(张)		7.9	37.7	66.7	56.4	63.2	72.4
杂志出版	亿册		2.0	7.6	25.6	17.9	23.4	25.4
报纸出版	亿份		16.1	127.8	199.8	160.5	178.9	196.0
医院、卫生院	个	2600	3540	64 421	59 614	62 454	67 807	67 081
医生	万人	36.3	42.5	103.3	141.3	176.3	191.8	200.0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万张	8.0	16.0	185.6	222.9	262.4	283.6	291.4
十五、生活								
城镇居民每人可支配收入	元			343.4	739.1	1510.2	4283	5425.1
农村居民每人纯收入	元			133.6	397.6	686.3	1577.7	2162.0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3.6	5.2	6.7	8.1	9.3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8.1	14.7	17.8	21	23.7

注：1. 由于计算误差的影响，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不等于按生产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2. 本表价值量指标除邮电业务总量外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3. 1995 年工业产品产量为普查数。

4. \* 为 1950 年数据 (下表同)。

5. 银行存贷款指标 1990 年及以前为国家银行数据。

6. 本资料 1998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

##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指标 (一)

指 标	1998 年比以下各年增长率 %					平均发展速度 %	
	1949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85 年	1995 年	1953~ 1998 年	1979~ 1998 年
一、人口和劳动力							
年底总人口	130.4	117.1	29.7	17.9	3.0	1.7	1.3
从业人员数		237.5	74.2	40.3	3.0	2.7	2.8
# 职工人数		669.9	29.9	-0.2	-17.2	4.5	1.3
二、国民核算							
国内生产总值		2907.5	538.0	230.8	28.5	7.7	9.7
第一产业		347.7	163.2	69.3	12.6	3.3	5.0
第二产业		13 923.1	819.4	364.6	35.7	11.3	11.7
工业		15 769.9	836.8	377.5	36.1	11.6	11.8
建筑业		4673.0	683.2	258.2	31.1	8.8	10.8
第三产业		2826.2	632.8	216.0	25.6	7.6	10.5
#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4256.9	570.9	260.8	33.3	8.6	10.0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722.1	512.7	121.4	23.1	6.5	9.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275.8	390.5	179.5	24.5	5.9	8.3
三、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19.0	530.0		
# 国有经济投资	138 501.8 *	35 822.0	2242.2	832.0	43.7	13.6	17.1
个体经济投资				579.7	42.1		
四、财政							
国家财政收入	15 012.0 *	5263.6	770.2	391.5	57.8	9.0	11.4
国家财政支出	15 716.4 *	6019.9	859.9	437.4	57.8	9.4	12.0
五、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 食	332.9	198.9	60.8	29.3	5.0	2.4	2.4
棉 花	913.7	245.2	107.7	8.5	-5.5	2.7	3.7
油 料	802.5	451.8	343.4	46.6	2.8	3.8	7.7
水 产 品	8580.0	2238.9	738.2	454.0	55.2	7.1	11.2
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1175.1	529.2	118.5	64.3	-7.4	4.1	4.0
机制纸及纸板	19 227.3	5645.9	384.3	133.4	-24.4	9.2	8.2
原 煤	3806.3	1793.9	102.3	43.7	-8.1	6.6	3.6
原 油	134 066.7	36 490.9	54.7	28.9	7.3	13.7	2.2
发 电 量	27 039.5	15 886.3	354.8	184.1	15.9	11.7	7.9
钢	73 058.2	8462.2	263.7	147.0	21.2	10.2	6.7
水 泥	81 112.1	18 641.3	721.6	267.6	12.7	12.0	11.1
七、建筑业							
国有建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166.9	15.6		
国有建筑企业房屋竣工面积				109.9	18.4		
八、运输邮电业							
货运量	7850.0	3875.0	410.8	70.5	3.0	8.3	8.5
货运周转量	14 745.1	4867.8	285.1	106.1	5.9	8.9	7.0
客运量	9735.7	5408.0	442.1	122.1	17.4	9.1	8.8
旅客周转量	6712.3	4157.7	505.8	138.0	17.3	8.5	9.4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6305.3	365.0	196.1	15.1	9.5	8.0



##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指标 (二)

指 标	1998年比以下各年增长率%					平均发展速度%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85年	1995年	1953~1998年	1979~1998年
邮电业务总量	94 132.6	55 661.7	7768.0	4211.4	145.9	14.7	24.4
电话交换机容量		29 250.3	3304.9	2155.1	91.9	13.1	19.3
电话机		33 548.7	3456.4	1996.3	127.8	13.5	19.6
九、国内外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60.2	521.4	164.8	35.8	7.2	9.6
市				228.4	38.3		
县				72.5	21.1		
县以下				121.9	38.0		
进出口总额	28 566.4 *	16 597.4	1469.4	365.4	15.3	11.8	14.8
进口额	24 067.2 *	12 415.2	1187.1	231.8	6.1	11.1	13.6
出口额	33 310.9 *	22 309.8	1784.7	571.9	23.5	12.5	15.8
十、利用外资							
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				540.3	-38.8		
实际利用外资额				1159.4	21.7		
十一、金融							
金融机构银行各项存款		102 470.1	8335.2	2139.6	77.6	16.3	24.8
金融机构银行各项贷款		80 014.9	4577.0	1365.1	71.2	15.6	21.2
十二、教育							
学校数	99.5	31.8	-37.0	-25.1	-8.1	0.6	-2.3
#高等学校	398.5	408.5	70.9	0.6	-3.0	3.6	2.7
专任教师数	1027.0	561.9	20.9	21.3	5.9	4.2	1.0
在校学生数	739.4	297.4	1.4	16.1	10.0	3.0	0.1
高等学校	2813.7	1684.8	298.2	100.2	17.3	6.5	7.2
中等学校	5689.2	2234.1	10.6	44.1	18.6	7.1	0.5
小学	472.1	173.1	-4.6	4.4	5.7	2.2	-0.2
十三、科技							
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		4820.9	381.3	167.5	9.3	8.8	8.2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50.7		
技术市场成交额					60.3		
十四、文化、卫生							
图书出版		816.5	92.0	8.5	14.6	4.9	3.3
杂志出版		1170.0	234.2	-0.8	8.5	5.7	6.2
报纸出版		1117.4	53.4	-1.9	9.6	5.6	2.2
医院、卫生院	2480.0	1794.9	4.1	12.5	-1.1	6.6	0.2
医生	451.0	370.6	93.6	41.5	4.3	3.4	3.4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3542.5	1721.3	57.0	30.7	2.8	6.5	2.3
十五、生活							
城镇居民每人可支配收入			229.9	105.7	13.6		6.2
农村居民每人纯收入			356.8	69.8	19.1		7.9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158.3	78.8	14.8		4.9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192.6	61.2	12.9		5.5

注：本表国内生产总值、邮电业务总量、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每人收入，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地 区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1952 年	1978 年	1998 年	1952 年	1978 年	1998 年
北 京	7.9	108.8	2009.9	170	1290	18 423
天 津	12.8	82.7	1340.7	299	1160	14 041
河 北	40.5	183.1	4238.1	125	364	6473
山 西	16.0	88.0	1606.7	116	365	5090
内 蒙 古	12.2	58.0	1192.0	173	317	5104
辽 宁	41.4	229.2	3805.6	218	680	9176
吉 林	16.6	82.0	1564.4	153	381	5935
黑 龙 江	26.0	174.8	2830.0	234	564	7532
上 海	36.7	272.8	3688.2	436	2498	28 236
江 苏	48.4	249.2	7200.8	131	430	10 050
浙 江	24.5	123.7	4980.0	112	331	11 202
安 徽	22.9	114.0	2828.3	78	244	4595
福 建	12.7	66.4	3330.2	102	273	10 121
江 西	18.9	87.0	1850.2	114	276	4436
山 东	43.8	225.5	7162.2	91	316	8128
河 南	36.1	162.9	4339.0	83	232	4676
湖 北	24.5	151.0	3704.2	90	332	6289
湖 南	27.8	147.0	3211.4	86	286	4953
广 东	29.5	184.7	7937.2	101	367	11 184
广 西	12.8	75.9	2181.9	67	225	4688
海 南			438.9			5869
重 庆			1434.5			4702
四 川	42.1	244.8	3580.5	67	253	4231
贵 州	8.6	46.6	843.5	58	175	2322
云 南	11.8	69.1	1793.1	70	226	4353
西 藏						
陕 西	12.9	81.1	1410.5	85	294	3937
甘 肃	13.3	64.7	869.8	125	348	3470
青 海	1.6	15.5	218.6	101	428	4377
宁 夏	1.7	13.0	227.3	126	370	4258
新 疆	7.9	39.1	1115	166	313	6435

注：1. 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2.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项相加不完全等于总计。

3. 全国与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系分别计算，故各地相加不等于全国数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

## 1949年

6月15日至19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7月1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中国唯一的道路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27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决议案；规定国都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红地五星旗。29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选举产生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0月3日 中国和苏联建交。

10月4日 中国和保加利亚建交。

10月5日 中国和罗马尼亚建交。

10月6日 中国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建交。

10月7日 中国和波兰建交。

10月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主席。

10月16日 中国和蒙古建交。

10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10月中旬至年底 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国土进军，华东、华南和西南解放，云南和平解放。除西藏外，祖国大陆全部解放。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

10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10月23日 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8月21日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0月27日 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

10月 人民解放军开始全国剿匪斗争。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成立。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空军。

同日 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

11月15日 周恩来致电联合国，要求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1月21日 北京封闭全市妓院。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全国开始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

11月23日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决议：宣布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任命东北人民政府，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广东、新疆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广州、上海、西安、重庆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

12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决定，自1950年起发行人民币折实公债。

12月16日至翌年3月4日 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25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

## 1950年

1月2日 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全线恢复通车。

1月13日 香港招商局起义。

1月14日 北京市军管会收回美国等国兵营地产，废除外国在华特权。

1月18日 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

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全国新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

2月28日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国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翌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进行工矿交通企业民主改革的指示。工厂民主改革开始。

3月3日 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4月1日 中国和印度建交。

4月13日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

4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海军。

4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经过修订的《婚姻法》于1980年9月10日公布。

5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同日 海南岛全境解放。

5月9日 中国和瑞典建交。

5月11日 中国和丹麦建交。

5月19日 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6月6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举行。

6月8日 中国和缅甸建交。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6月28日，中国政府声明谴责美国侵略台湾。

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

同日 中财委发出稳定金融物价的指示。

7月28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

7月30日 电影《中华儿女》等在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奖。

8月1日 中国国内民航正式开航。

9月14日 中国和瑞士、列支敦士登建交。

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公布。

9月25日至10月2日 全国战斗英雄和工农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

10月6日 向西藏进军，昌都解放。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0月至12月，发动两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至1951年6月，又进行三次反击战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10月28日 中国和芬兰建交。

12月7日 万山群岛解放。

## 1951年

1月17日 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2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3月6日 山西李顺达劳动互助组向全国农民提出生产挑战。

4月6日 宋庆龄、郭沫若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动批判《武训传》运动。

5月21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签字。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全国大陆实现统一。

6月1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运动。

7月20日 根治淮河一期工程完成。

9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院组织通则》公布。

9月9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15日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全国开始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

9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1952年4月和1953年3月出版第二、第三卷，1960年9月出版第四卷。

10月1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11月3日至9日 教育部召开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翌年6月起，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工作。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以后扩大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2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 1952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城市中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2月10日 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3月13日 丁玲、周立波等人获斯大林文学艺术奖。

6月20日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

6月27日 政务院决定自7月1日起实行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制度。

7月1日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8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9月29日 天兰铁路建成通车。

10月17日 塘沽新港一期工程完工开港。

## 1953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1月23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月27日，西北行政委员会成立；2月9日，华北行政委员会成立；2月28日，西南行政委员会成立。

3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对总路线作了详细说明。

6月14日至8月12日 中共中央财经会议召开，提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其中包括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7月1日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投产。

7月15日 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工兴建。

8月9日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布加勒斯特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际体育比赛冠军。

10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1月15日和翌年9月15日又对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12月9日 政务院决定翌年1月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2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全面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12月26日 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7号炼铁炉三大重点工程竣工投产。

##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揭露批判高岗、饶漱石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3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4月20日至6月24日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5月13日 官厅水库竣工。

6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

6月28日和29日 中印两国总理、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月至10月 武汉军民战胜长江特大洪水。

7月26日 中国第一批飞机制造成功，举行试飞典礼。

8月20日至22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9月15日至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决

定设立国防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

10月5日 中国和挪威建交。

10月16日 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文艺界学术界对俞平伯在学术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开展批判，后发展为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

11月1日 国家统计局发表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公报，全国人口总数为601 938 035人。

12月21日至25日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确定政协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12月25日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 1955年

1月2日 中国和南斯拉夫建交。

1月18日 一江山岛解放；至2月26日，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1月20日 中国和阿富汗建交。

3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取代旧人民币，按新币1元折合旧币1万元比率收兑。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4月3日 潘汉年、扬帆错案发生。

4月18日至24日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5月13日至6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语，全国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胡风等人遭到错误处理。

5月25日 中苏两国发表联合公报，中国收回旅顺港。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

同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落成通车。

7月30日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一五”计划和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

7月31日 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评。

8月1日 中国和尼泊尔建交。

同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9月2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元帅将军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举行。

10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0月8日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阻挠从美国归国。

11月1日 城镇开始实行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供应粮食。

11月16日至24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要求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

## 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热潮。

1月15日 北京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社会主义

改造胜利。

1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翌年10月25日公布。

2月6日 国务院指示在全国推广普通话。

2月9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这一方案。

2月14日至25日 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

3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全国开展扫盲运动。

4月5日、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

4月25日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从宽处理和审判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至1964年3月6日，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获得释放。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5月30日 中国和埃及建交。

6月7日 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挺举133千克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以后又8次打破世界纪录。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6月28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政府表示：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7月13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成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

8月1日 中国和叙利亚建交。

9月15日至27日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

9月24日 中国和阿拉伯也门建交。

10月 波匈事件发生。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

11月17日至翌年2月5日 周恩来访问亚洲欧洲11国。

至年底 全国基本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

## 1957年

2月7日 中国和锡兰（1972年改名斯里兰卡）建交。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4月11日 《白毛女》、《董存瑞》等27部故事片、艺术片获建国以来优秀影片奖。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进行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建议，也有极少数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5月15日 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内部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出过于严重估计。

5月15日至2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决定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7月20日至8月6日 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举行，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8月8日 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举行通车典礼。

11月2日至21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11月13日 《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口号。

12月 鹰厦铁路竣工。

本年底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取得巨大成就。

## 1958年

1月1日 宝成铁路建成通车。

1月1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3月5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3月至10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出意见、指示和规定，进行工商税收制度、物资分配制度、企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等改革，大规模下放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

4月 北京大学开始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

5月1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揭幕。

5月5日至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5月至7月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

5月30日 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

6月30日 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

6月至7月 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相继提出严重背离实际的粮食增产目标；6月22日，毛泽东批发冶金部提出各大协作区严重背离实际的钢产量指标报告。工农业浮夸风开始泛滥。

7月19日 中国和柬埔寨建交。

7月31日至8月3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提出建立中苏潜艇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遭到毛泽东拒绝。

8月1日 包兰铁路建成通车。

同日 中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制成。

同日 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牌轿车制成。

8月4日至13日 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

8月17日至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二五”计划的决定，确定一批工农业高指标。全国掀

起“大跃进”热潮。

8月20日 中国和伊拉克建交。

8月23日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岛。

8月29日 中共中央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国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到9月底，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197个，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8月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求推广民兵建设，全民皆兵。

9月2日 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播。

10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10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11月1日 中国和摩洛哥建交。

11月2日至1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一些“左”的错误；在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上压低了一批高指标。

11月27日 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11月28日至12月10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应“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

12月20日 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建交。

## 1959年

2月4日 中国和苏丹建交。

2月27日至3月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要求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错误。

3月10日 西藏发生少数分裂分子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平叛作战。28日，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

4月5日 容国团在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4月18日至28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7月2日至8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前期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后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会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

9月13日至10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举行。

9月1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作出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9月底 发现大庆油田。翌年2月20日，大庆勘探会战开始。

9月30日至10月4日 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中苏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

10月4日 中国和几内亚建交。

10月 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北京“十大建筑”建成。

11月1日 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

11月21日 重庆长江大桥建成。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 毛泽东组织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1960年

1月7日至17日 中共中央举行上海会议，决定继续为“大跃进”创造条件。

3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报告，要求巩固公共食堂。

3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批示，要求大办城市人民公社。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钢、太原的两个文件，要求开展以“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经验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4月16日 《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4月23日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船“东风”号下水。

5月25日 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6月24日至26日 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领导人对中共组织了全面攻击。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专家，停止援助。中苏两党关系破裂。

7月5日 中国和加纳建交。

7月30日 继全国各地之后，北京市对粮食实行凭粮票供应。

9月10日 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9月14日至10月24日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表鼓吹个人崇拜讲话。

9月28日 中国和古巴建交。

10月25日 中国和马里建交。

11月3日、28日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和重要批示，纠正“一平二调”风。12月至次年1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举行，毛泽东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2月14日 中国和索马里建交。

本年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 1961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对河南信阳事件作出批示。

1月14日至18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举行，批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

2月20日 中国和扎伊尔建交。

3月至9月 中共中央先后制订和发出“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文艺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对各个领域进行调整。

3月11日 毛泽东批发《关于调查工作》文章，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

4月25日 中国和老挝建交。

6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3年内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

7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7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央提出报告，实行农村“责任田”试验。

8月23日至9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决定大幅度降低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

10月9日 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

至年底 全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出现国民经济严峻困难局面。

##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总结了“大跃进”经验教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2月21日至23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确定实行国民经济全面调整，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

2月27日 王稼祥针对对外方针问题写出书面建议，提出争取和平的策略。这个建议后来被错误地批判为“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

3月2日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

3月中旬至5月底 在苏联方面插手煽动下，新疆伊犁、塔城发生大批居民外逃事件。

5月7日 李维汉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认为今后要调整关系，加强团结。这个意见后来遭到错误的批判。

5月23日 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举行，《革命家庭》、《红色娘子军》、《红旗谱》等获奖。

5月24日 邓子恢提出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建议允许社员发展自由经营。这个意见后来被错误地批判为“四大自由”。

8月6日至8月下旬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决定对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

10月18日 中国和乌干达建交。

10月至1965年10月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多次挫败台湾特务武装骚扰大陆活动。

10月20日至11月1日 人民解放军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 1963年

3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城市“五反”运动。

3月5日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全国开展学习雷锋运动。

3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6日，江青、康生借此发动批判“有鬼无害论”。文艺界开始过火的政治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 刘少奇访问印度、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5国。

4月25日 国防部授予驻上海某部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

5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翌年9月又发出“桃园经验”和“后十条”。“四清”运动开始。

7月6日至20日 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共。从9月6日到次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9篇评论文章(“九评”)予以反击。中苏大论战展开。

8月5日 上海第六医院断手再植手术成功。

9月6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决定继续进行3年调整,从1966年起开始执行“三五”计划。

9月 经济学家孙冶方写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研究报告,被批判为“利润挂帅”。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关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

12月12日和翌年6月27日 毛泽东作出批评文艺界的两个批示。

12月14日 中国和肯尼亚建交。

12月21日 中国和布隆迪建交。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石油产品基本实现自给。

12月14日至翌年3月15日 周恩来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14国,提出中国对外援助8原则。

## 1964年

1月10日 中国和突尼斯建交。

1月27日 中国和法国建交。

2月1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学习“铁人”王进喜。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报导,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2月13日 毛泽东召开教育座谈会,提出学制要缩短,考试方法要改革。

2月22日 中国和刚果(布)建交。

4月26日 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

5月15日至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意见,开始进行三线建设。

5月22日 蓝田猿人化石在陕西发现。

6月5日至7月31日 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6月15日至16日 毛泽东、刘少奇等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大比武”表演。

7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

7月18日 中国第一枚生物试验火箭发射成功。

8月6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轰炸北越,全国举行示威游行。援越抗美斗争全面展开。

8月1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全国12个工交企业试办托拉斯。

8月 中共中央批转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的报告。

9月26日 1.2万吨压力巨型水压机宣布制成。

9月29日 中国和中非建交。

10月2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

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试爆成功。

10月29日 中国和赞比亚建交。

11月12日 中国和贝宁建交。

12月1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开展“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就一些提法发生争执。

12月21日至翌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 1965年

1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条”)。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的指示,号召进行抗美援朝斗争。

4月28日 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制成。

5月1日 元谋猿人化石在云南发现。

5月22日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7月19日 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建交。

7月20日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归国。

8月6日 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广东沿海海战中击沉台湾国民党海军军舰“剑门”号、“章江”号;11月14日,在福建沿海海战中击沉击伤其“永昌”号、“永泰”号。

9月9日 西藏自治区成立。

9月17日 中国宣布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成功。

11月10日 江青等人组织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调离职务,以后又遭到错误批判处理。

12月8日至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上海会议。由于林彪等人的诬陷,对罗瑞卿进行错误批判处理。

## 1966年

2月2日至20日 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纪要》中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

2月3日 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制订“二月提纲”。

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国开展学习焦裕禄活动。

3月4日 贵(阳)昆(明)铁路建成通车。

3月8日和22日 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3月26日至4月19日 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

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严厉指责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全国开展批判“三家村”运动。

4月20日 河南红旗渠建成通水。

5月7日 毛泽东作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的“五七指示”。

5月9日 中国成功进行含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五一六通知”,对所谓“彭罗陆杨集团”作出处理,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5月25日 聂元梓等人贴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公开广播。教育领域开始发生混乱。

5月29日 清华大学附中等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6月3日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出工作组，后遭到毛泽东严厉指责。7月28日中央决定撤回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受到批判。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12日，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8月18日至11月26日 毛泽东8次共接见1100万学校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开展“破四旧”、“大串联”运动。

9月16日 康生写信诬陷制造“61人集团”冤案。

10月1日 林彪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使各级党政机构受到严重冲击。

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邓小平受到批判。

10月27日 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

11月10日至13日 上海王洪文等人聚众闹事、截断火车，制造“安亭事件”，得到张春桥支持。

11月17日至12月24日 全国计划、工交会议举行，陶铸、谷牧等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文革”与生产的关系发生激烈争论。

12月18日至25日 张春桥煽动清华大学造反派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开推向社会。

## 1967年

1月2日 天津改为直辖市。

1月4日 江青等人点名诬陷打倒陶铸。

1月6日至11日 张春桥等在上海策划发动“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全国掀起向党政机关夺权浪潮。

1月23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布决定，军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2月11日、16日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在中央会议上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进行坚决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

4月1日 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全国掀起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高潮。7月18日，刘少奇夫妇遭到批斗。

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装置试爆成功。

7月1日起 “样板戏”公演。

7月13日至9月24日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沿途讲话中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求实现大联合。

7月20日 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8月7日 王力、谢富治在谈话中分别鼓吹“夺外交权”和“砸烂公检法”。8月22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恶性事件。8月底至翌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

11月6日 “两报一刊”发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文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1968年

1月31日 中国和民主也门建交。

3月22日 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5月25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经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7月21日 毛泽东作出肯定上海机床厂办大学道路的“七二一指示”。

7月27日 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7月至8月 康生、江青等人编造报告诬陷中共中央、中央监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大批成员。

8月23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9月5日 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进入“斗、批、改”运动阶段。

10月13日至31日 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根据江青一伙指使编造的伪证，对刘少奇作出错误处理。

12月23日 根据毛泽东发表的指示，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7年和1968年 国民经济出现停滞和倒退。

## 1969年

3月2日至15日 人民解放军进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4月1日至24日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

5月1日 以大规模下放企业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开始。

8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命令，全国掀起战备高潮。

9月11日 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9月23日 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9月26日 12.5万千瓦双水蒸汽轮发电机制成。

10月1日 北京地下铁道建成通车。

10月17日 根据毛泽东的估计，林彪作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第一个号令”，引起全国极大震动。

11月12日 刘少奇含冤去世。

## 1970年

1月31日和2月5日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

3月7日 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林彪、江青集团开始争夺权力斗争。

3月23日 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后到达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北京成立柬埔寨爱国民族统一阵线。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清查“五一六”运

动。

4月24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6月22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报告，将90个国家部、委、直属机构精简合并为27个，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

6月27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陈伯达一伙进行夺权分裂活动，被毛泽东揭露。全会决定审查陈伯达，并通过“四五”计划纲要。

10月13日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

10月15日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建交。

10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11月24日至翌年8月1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新的中共党委。

11月6日 中国和意大利建交。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传达陈伯达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开始。

11月24日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建交。

12月15日 中国和智利建交。

12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2月26日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制成下水。

## 1971年

2月10日 中国和尼日利亚建交。

3月22日 中国和科威特建交。

同日 林彪集团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阴谋策划武装政变。

3月26日 中国和喀麦隆建交。

4月6日 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4月15日至7月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张春桥等在纪要中提出否定教育领域成就的“两个基本估计”。

5月6日 中国和圣马力诺建交。

5月28日 中国和奥地利建交。

7月7日至9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7月29日 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

8月4日 中国和土耳其建交。

8月15日至9月12日 毛泽东巡视南方，在沿途讲话中揭露林彪阴谋分裂活动。

8月16日 中国和伊朗建交。

9月13日 林彪等人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为“九一三”事件。

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11月11日至12月18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10月25日 中国和比利时建交。

11月2日 中国和秘鲁建交。

11月9日 中国和黎巴嫩建交。

11月12日 中国和卢旺达建交。

12月7日 中国和塞内加尔建交。

12月8日 中国和冰岛建交。

12月14日 中国和塞浦路斯建交。

## 1972年

1月31日 中国和马耳他建交。

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翌年1月2日又批准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

2月14日 中国和墨西哥建交。

2月19日 中国和阿根廷建交。

2月21日至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3月13日 中国和英国正式建交。

4月15日 中国和毛里求斯建交。

5月18日 中国和荷兰建交。

5月21日至6月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6月5日 中国和希腊建交。

6月27日 中国和圭亚那建交。

7月30日 新华社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9月19日 中国和多哥建交。

9月25日至29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建交。

10月11日 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

10月14日 中国和马尔代夫建交。

11月6日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建交。

11月16日 中国和卢森堡建交。

11月21日 中国和牙买加建交。

11月28日 中国和乍得建交。

12月17日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是极右”。此后全国报刊不再提批判极左。

12月21日 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

12月22日 中国和新西兰建交。

## 1973年

1月至3月 全国计划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三个突破”问题。

2月12日至7月17日 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成立团的机构。共青团恢复活动。

3月9日 中国和西班牙建交。

3月10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16日至9月25日 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工会代表大会，成立总工会。工会恢复活动。

6月30日至9月29日 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妇联。妇女联合会恢复活动。

8月20日 中共中央批准对林彪集团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等人党籍。

8月24日至28日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8月26日 中国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制成。

9月15日 中国 and 上沃尔特（1984年改名布基纳法索）

建交。

10月 江青集团在教育界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

12月22日 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 1974年

1月18日 毛泽东批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集团先后制造“马振抚中学事件”、“白卷事件”，鼓吹“放火烧荒”和“批儒评法”。

1月19日至20日 人民解放军和南海民兵进行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2月15日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活动。

2月22日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提出新的“三个世界”划分战略。

3月15日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建交。

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对外政策。

4月20日 中国和加蓬建交。

5月15日 大港油田宣布建成。

5月31日 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

6月20日 中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交。

6月28日 中国和委内瑞拉建交。

7月17日 毛泽东第一次指出党内有“四人帮”，江青等人被迫检查。

7月20日 中国和尼日尔建交。

7月 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临潼出土。

8月15日 中国和巴西建交。

9月1日至16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亚运会。

9月29日 胜利油田宣布建成。

10月至12月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挫败江青集团组阁活动。

10月至12月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

12月14日 中国和冈比亚建交。

## 1975年

1月6日 中国和博茨瓦纳建交。

1月8日至10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举行，选举邓小平为中共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目标；通过第二部宪法；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2月4日 辽宁海城发生地震。

同日 刘家峡水电站宣布建成。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以铁路为突破口开始各个领域的整顿。

3月至4月 江青集团进行“反经验主义”活动，受到毛泽东批评。

3月19日 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293名。

4月5日 蒋介石病故。

5月12日至18日 邓小平访问法国。

5月 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

6月9日 中国和菲律宾建交。

6月25日 中国和莫桑比克建交。

7月1日 中国和泰国建交。

7月12日 中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

7月 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批评江青集团围剿电影《创业》和《海霞》事件。

8月14日 毛泽东对《水浒》发表意见，江青集团借此发动“评《水浒》”运动。

8月至10月 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胡乔木等人起草“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总纲”等关于整顿的三个文件。

10月4日 中国和孟加拉建交。

10月20日 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

11月2日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指示开会批评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

11月5日 中国和斐济建交。

11月6日 中国和西萨摩亚建交。

11月13日 中国和科摩罗建交。

11月29日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返回。

##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2月 中央举行“打招呼”会议，点名批判邓小平。

3月下旬至4月5日 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5日遭到镇压，被称为“四五运动”。

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

4月25日 中国和佛得角建交。

5月28日 中国和苏里南建交。

6月30日 中国和塞舌尔建交。

7月6日 朱德逝世。

7月14日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建成。

7月28日 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波及京津地区。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隔离审查“四人帮”措施。随后平息上海“四人帮”党羽武装叛乱阴谋。10月中旬起，全国举行游行集会，欢庆伟大胜利。

10月8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立毛主席纪念馆。

10月12日 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交。

## 1977年

1月11日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宣布建成。

2月7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

2月17日 中国和利比里亚建交。

3月10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陈云、王震

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4月7日 中国和约旦建交。

4月10日 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5月30日 中国和巴巴多斯建交。

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

7月16日至21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提前召开中共十一大的决议。

8月12日至18日 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院校招生会议举行，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8月30日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中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11月8日 中国第一个数字控制卫星地面站开通。

12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 1978年

1月26日至2月6日 邓小平访问缅甸、尼泊尔。

2月24日至3月8日 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举行，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通过第三部宪法和华国锋提出的建设120个大项目的经济发展十年规划（1976~1985）；安排“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 全国科学大会举行，邓小平在讲话中阐述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实施方案时指出，对错划的要做好改正工作。

4月22日至5月16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举行，邓小平作重要讲话。

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5月25日 中国和阿曼建交。

5月27日至6月5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宣布文联和五个文艺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7月6日至9月9日 国务院务虚会召开，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8月9日 中国和利比亚建交。

11月10日至12月15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陈云提出要解决“文革”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1月14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2月18日至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口号，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工作重点转移；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选举产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

12月24日 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举行。

12月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承包到户协定。

## 1979

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同日 中国和美国建交。

1月8日 中国和吉布提建交。

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

1月18日至4月3日 党的理论务虚会举行。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

2月8日 中国和葡萄牙建交。

2月17日至3月16日 人民解放军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4月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国民经济新八字方针。

6月18日至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法律，决定各级革命委员会改称人民政府。

6月22日 中国和爱尔兰建交。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10月1日 叶剑英在国庆3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0月30日至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致祝辞。

11月25日 “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翻沉，死72人。

11月26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 1980年

1月2日 中国和厄瓜多尔建交。

2月7日 中国和哥伦比亚建交。

2月22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学位制度，分学士、硕士、博士3级。

2月23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举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

4月1日 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

4月18日 中国和津巴布韦建交。

5月18日 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6月25日 中国和基里巴斯建交。

8月30日至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报告。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江青等10名主犯进行判决。

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 1981年

- 1月4日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钱堤合龙。
- 1月16日 国务院决定开始发行国库券。
- 2月9日 中国第一座高通量原子反应堆建成。
- 5月29日 宋庆龄逝世。
- 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7月7日 国务院发布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 9月19日 邓小平等检阅华北军事大演习。
- 9月30日 叶剑英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
- 10月22日 赵紫阳出席墨西哥坎昆会议，提出中国关于国际合作的五项原则。
- 11月16日 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 12月3日 中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在陕西建成。

## 1982年

-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由此连续5年发出关于农业的5个1号文件，逐步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 4月22日至5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举行，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将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由98个裁减合并为41个，设立国务委员。
- 2月30日 中共中央作出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 3月26日 中国和瓦努阿图建交。
-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公布。
- 7月24日 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希望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商祖国统一大业。
- 7月29日 邓小平指示，要批驳日本少数人篡改侵华历史的行为。
- 7月 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第一家股票。
- 9月1日至11日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
- 9月24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指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
- 10月7日至16日 中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 11月26日至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通过第四部宪法，规定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委，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设立乡政府；批准“六五”计划。

## 1983年

- 1月1日 中国和安提瓜和巴布达建交。
- 1月12日 中国和安哥拉建交。
- 3月2日 中国和科特迪瓦建交。
- 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 4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成立。
- 4月30日 中国和莱索托建交。
- 6月4日至22日 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举行，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 6月6日至21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 6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6点设想。
- 7月1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
- 7月29日 引滦入津工程全线竣工。
-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决定，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 10月1日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四个面向”要求。
- 11月21日 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通过鉴定。1992年11月19日和1997年6月19日又先后研制成功10亿次“银河—II”和100亿次“银河—III”。
- 10月11日至12日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随后，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活动。

## 1984年

- 1月24日至2月10日 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5月4日，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 3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报告，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
- 4月6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
- 5月10日 国务院发出规定，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
- 5月15日至31日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决定设立海南省。
- 6月22日、23日 邓小平会见香港人士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政策。
- 7月28日至8月13日 中国代表团参加23届奥运会，获得15枚金牌，打破旧中国零的记录。
- 9月26日 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确认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 10月1日 首都举行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 11月1日 中国和阿联首建交。

## 1985年

-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 2月15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实验基地——长城站建成。
-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 3月2日至7日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13日，中共中央

央发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3月4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现在世界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

3月27日至4月10日 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5月15日至20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5月23日至6月6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决定裁军100万。

6月1日 国务院批转报告，批准进行价格改革，放开肉、蛋、水产品等价格。

6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的决定。

7月9日 中国和玻利维亚建交。

9月18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举行，通过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

9月24日 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举行，调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10月1日 中国和格林纳达建交。

11月26日 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投产。

11月28日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开业。

12月7日 中国和尼加拉瓜建交。

## 1986年

1月8日 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

2月1日 中国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

2月28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

3月10日 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

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规定，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发展高技术研究的“863计划”纲要。

12月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规定，积极试行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租赁承包经营等方式。

12月25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运十二”飞机获得国家生产许可证，并对外出口。

12月中下旬 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学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闹事。30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1987年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2月6日 中国和伯利兹建交。

2月9日 中苏边界谈判在莫斯科恢复举行。

3月26日 中葡联合声明草签，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5月6日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6月2日被扑灭。死亡193人，受伤170人。

5月22日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中国自然环境保护纲要》。

7月15日 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当局1949年5月20日颁布的《戒严令》。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日 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拉萨骚乱。

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

至本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9年来，已基本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

## 1988年

1月13日 蒋经国病故。

2月3日 中国和乌拉圭建交。

2月25日 国务院发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3月18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

3月24日至4月10日 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李选念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25日至4月13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通过宪法修正案和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4月26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5月30日 《求是》杂志创刊。《红旗》杂志于6月16日停刊。

7月9日 中国和卡塔尔建交。

8月8日 开发高科技、新技术产业产品的“火炬”计划开始实施。

9月7日 中国发射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9月14日 中央军委授予17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

9月14日至27日 中国在东南沿海成功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9月26日至30日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今后两年实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

10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10月16日 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12月21日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出要建设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 1989年

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

3月5日 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在拉萨制造严重骚乱事年。

3月7日 国务院宣布在拉萨戒严。

4月15日 胡耀邦逝世。极少数人趁机制造事端，引发北京地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5月20日，国务院命令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4日，暴乱被平息。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正常化。

6月9日 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6月23日至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中央书记处书记。

7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通知。

8月20日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

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9月11日 中国和密克罗尼西亚建交。

9月29日 首都举行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大会，江泽民作重要讲话。

10月30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设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这项活动被命名为“希望工程”。至1999年3月，已资助了200万孩子入学。

11月6日至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 1990年

1月6日 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进行清产核资工作。

1月10日 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解除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

3月9日至12日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3月20日至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通过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3月22日 中国和纳米比亚建交。

4月7日 中国用长征3号火箭发射美国卫星成功。

4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浦东地区加快开发步伐。

7月1日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行，本日中国总人口为1 160 017 381人。

7月21日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建交。

9月22日至10月7日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0月3日 中国和新加坡建交。

10月12日 中国第一家规范化省际粮食议价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1993年3月推出期货交易。

11月16日 中国和马绍尔群岛建交。

12月19日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翌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

12月25日至30日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八五”计划的建议。

至本年底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地区已经提前实现小康。

## 1991年

1月28日至2月18日 邓小平视察上海，希望思想更解

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3月6日 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关规定。

3月25日至4月9日 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5月15日至19日 江泽民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中苏边界东段划界协定。

5月至8月，淮河、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水灾。

6月26日 国务院决定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7月1日 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共成立70周年大会，江泽民作重要讲话。

同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发行。

9月11日 中国和爱沙尼亚建交。

9月12日 中国和拉脱维亚建交。

9月14日 中国和立陶宛建交。

9月23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决定采取12条措施，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9月30日 中国和文莱建交。

10月18日 扬子30万吨乙烯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11月5日至10日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中越关系正常化。

11月25日至29日 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要求长期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

11月27日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二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12月15日 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 1992年

1月2日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

1月3日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建交。

1月4日 中国和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建交。

1月5日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建交。

1月6日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建交。

1月14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

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和强调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计划还是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重要理论。

1月20日 中国和白俄罗斯建交。

1月24日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

1月30日 中国和摩尔多瓦建交。

3月9日至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

4月2日 中国和阿塞拜疆建交。

4月3日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4月6日 中国和亚美尼亚建交。

5月12日 中国和斯洛文尼亚建交。

5月13日 中国和克罗地亚建交。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快改革，

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

6月9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重要讲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

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同日 中国和格鲁吉亚建交。

6月30日 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7月30日 国务院决定开放内地省会城市和长江沿岸5个内陆城市。

8月24日 中国和韩国建交。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

10月12日至18日 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江泽民在报告中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纪委书记。

## 1993年

2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月14日 国务院决定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

3月5日至7日 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举行，通过调整“八五”计划指标的建议和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

3月14日至27日 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15日至31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通过宪法修正案，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4月24日 国务院会议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4月27日至29日 海峡两岸在新加坡举行汪（道涵）辜（振甫）会谈。

5月24日 中国和厄里特里亚建交。

6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针对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问题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

7月1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成立。

7月21日 全国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国务院7个部，新建6个部。

8月20日 国务院制定9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解决贫困问题。

8月20日至25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反腐败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8月27日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10月8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部出齐，当日在北京举行庆祝大会。

10月12日 中国和马其顿建交。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求联系实际认真学习。

11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政

策措施。

11月11日至14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1月20日 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2月1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12月2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12月26日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 1994年

1月11日 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决定。

1月24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江泽民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

2月1日 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建造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开始运行。

2月28日至3月3日 国务院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3月25日 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和《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4月11日 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以贪污行贿罪被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以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6月3日 中国工程院成立。

6月29日 中国和安道尔建交。

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7月18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将福利分配方式逐渐改变为货币分配方式。

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11月8日至22日 江泽民访问东南亚四国，出席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2月14日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1995年

1月30日 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8点主张。

2月16日 国家安居工程开始启动。

3月11日 中国和美国签订关于知识产权的协定。

3月18日 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教育法》、《银行法》。

4月3日 中国和波黑建交。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报道《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14日，中宣部、中组部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学习孔繁森活动。

4月10日 陈云逝世。

4月27日 中共中央宣布，批准陈希同引咎辞职。199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

5月1日 全国职工开始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

5月22日、6月26日 江泽民在上海、长春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要求积极推行和搞好国有企业改革。

9月4日至15日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

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通过中共中央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0月24日 江泽民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发表讲话。

11月16日 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全线通车。

11月29日 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举行。

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造成经济损失12亿元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判决结果，判处邓斌、姚静漪死刑。

## 1996年

1月12日 中国首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成立。

3月5日至17日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

3月8日至25日 人民解放军进行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联合军事演习。

4月24日至26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中俄两国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4月26日 江泽民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元首在上海签署5国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

7月29日 中国政府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

10月7日至10日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2月11日 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至本年 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居世界第一位。

## 1997年

1月6日至9日 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会议，要求对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推行再就业工程。

2月19日 邓小平逝世。

3月1日至14日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订的《刑法》；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3月18日 南（宁）昆（明）铁路全线铺通。

4月22日至26日 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声明。

5月23日 中国和巴哈马建交。

5月29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作重要讲话，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6月30日至7月1日 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举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回归祖国。

7月25日 中国和库克群岛建交。

9月1日 中国和圣卢西亚建交。

9月12日至18日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江

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纪委书记。

10月26日至11月3日 江泽民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宣布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0月28日 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成功截流。

11月8日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

11月25日 跨世纪的国家重点能源工程——神华工程三期工程开工。

## 1998年

1月1日 中国和南非建交。

2月23日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3月5日至19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3月24日 朱镕基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设置方案。国务院部委由40个减少到29个。

4月27日至29日 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举行。

5月5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5月14日至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6月15日至17日 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6月25日至7月3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

6月中旬至9月上旬，长江流域及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全国800多万军民进行抗洪救灾斗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前往抗洪抢险第一线视察、慰问。

7月10日 国家经贸委发出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的通知。

7月13日至15日 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举行，部署开展全国反走私斗争。

8月7日 兰州—西宁—拉萨通信光缆全线开通。

同日 全国最大的国有甜菜原料糖厂——阿城糖厂宣告破产。

8月8日 北京—郑州电气化铁路正式运营。

9月18日 首条高架铁路在上海兴建。

10月6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不能偿还债务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翌年1月1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破产。

10月12日至14日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1月2日 中国和汤加建交。

11月4日 建国以来最大税案——浙江金华县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案受到查处。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1月17日至18日 江泽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主张。

11月20日 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11月22日至30日 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日本。

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工商行政管理体制。

同日 中国最大水电工程二滩水电站机组暨送变电工程投产。

12月12日 沪杭甬高速公路通车。

12月18日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举行，江泽民作重要讲话。

12月19日 中国“长二丙”火箭以“一箭双星”形式成功发射美国卫星。

本年 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 1999年

1月20日 中国科学家用体细胞克隆山羊成功。

2月15日 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1998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自70年代以来首次降至千分之十以下。

3月5日至15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中增加有关“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重要内容。

3月18日至21日、6月28日至29日 全国第一、二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举行。中共中央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4月3日 造成40人死亡的重庆綦江县虹桥垮塌案判决，林世元等罪犯被判刑。

4月6日至20日 朱镕基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发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声明。

4月27日、6月14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负责人就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决不允许借练功之名宣传迷信、扰乱社会秩序。7月22日，民政部决定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

5月1日 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园仪式举行。

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3人死亡，29人受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最强烈抗议，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谴责这一暴行。

5月12日 部分中国驻南使馆人员和死难者骨灰回到北京。5月13日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5月15日 何厚铨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6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6名主犯被处决。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6月15日至18日，第三次全国教育的工作会议举行。本年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

6月30日 《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举行，江泽民指出这是全国国史研究和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件喜事。

7月9日 台湾“总统”李登辉发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

7月10日，中国女子足球队获第三届女子世界杯亚军，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江泽民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她们的顽强拼搏精神。

#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 说 明

一、本索引供读者按条目标题的汉字笔画查检条目。

二、条目标题按第一字的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一(折,包括丿、㇇、㇏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依次按后面各字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顺序排列。

### 一 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 415(317)  
“一月夺权” ..... 415  
“一打三反”运动 ..... 415  
一国两制 ..... 415

### 二 画

“二月逆流” ..... 78  
“二月提纲” ..... 78  
丁石孙 ..... 72  
丁光训 ..... 72  
丁关根 ..... 72  
丁玲 ..... 72  
“七二一”指示 ..... 282  
七千人大会 ..... 282  
“八九”政治风波 ..... 4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 4  
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 ..... 300  
《人民日报》 ..... 302  
人民币 ..... 300  
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 300  
人民公社 ..... 30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300  
人民民主专政 ..... 302  
人民英雄纪念碑 ..... 303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 303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 303  
九一三事件 ..... 196  
《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 196  
九三学社 ..... 195

### 三 画

“三个有利于”标准 ..... 308

三支两军 ..... 310  
“三反”运动 ..... 307  
“三北”防护林体系 ..... 307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 308  
三自一包” ..... 310  
“三自”反帝爱国运动 ..... 310  
“三步走”战略布署 ..... 307  
“三改一加强” ..... 308  
“三和一少” ..... 308  
三线建设 ..... 309  
“三项指示为纲”(见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 ..... 310(50)  
三面红旗(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308(320、43、301)  
“三家村”冤案 ..... 308  
干部队伍“四化” ..... 94  
于光远 ..... 423  
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 ..... 105  
工业学大庆运动 ..... 105  
工农兵学员 ..... 104  
工作组事件 ..... 106  
工薪制 ..... 105  
土地改革运动 ..... 358  
“大包干” ..... 40  
大亚湾核电站 ..... 42  
大行政区制度 ..... 42  
大庆油田 ..... 40  
大庆油田的发现 ..... 41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 41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41  
大邱庄案 ..... 41  
大型企业集团 ..... 42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42  
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 43  
大秦铁路 ..... 40

“大跃进”	43	王启民	370
大港油田	40	王杰	369
万里	364	王叔文	371
万吨水压机制成	364	王昆仑	369
万国权	364	王国藩	368
上甘岭战役	314	王忠禹	373
上海会议	315	王树声	371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314	王选	371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315	王首道	370
山西煤炭基地	312	王洪文	368
川藏公路	36	王洛宾	370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104	王恩茂	367
《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128	王淦昌	36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129	王绶琯	371
广州会议	129	王富洲	367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129	王蒙	370
卫生事业	373	王震	372
卫立煌	373	王稼祥	369
习仲勋	388	王鹤寿	368
马大猷	240	开国大典	201
马万祺	240	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	201
马王堆汉墓	241	天安门事件平反	350
马文瑞	24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350
马连良	240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380
马叙伦	241	无党派民主人士	380
马恒昌	240	元谋人	423
马洪	240	韦国清	373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241	云南西南地震	425
马寅初	241	“五七”干校	385
乡镇企业	390	“五七”指示	385
		“五个一工程”	384
		“五反”运动	384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384
		太湖综合治理	344
		戈宝权	102
		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进	316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315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315
		中日邦交正常化	534
		中日关系的发展	535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5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38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539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39
		中央文革小组	539
		中央电视台	538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538
丰收计划	91		
王力	369		
王大珩	367		
王文元	371		
王丙乾	366		
王汉斌	368		
王永庆	372		
王亚南	372		
王光英	367		
王竹溪	373		
王任重	370		
王兆国	372		
王军霞	369		
王进喜	369		
王芳	367		

#### 四 画

中央银行 .....	53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502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见中印边界争端) .....	540(5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	504
中印边界争端 .....	540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	52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	523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	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531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	45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530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	45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	530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	45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	530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 .....	45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	529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	45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529
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 .....	45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	529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 .....	4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	501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	4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503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	4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	502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	4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521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	45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	509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	4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519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	4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519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	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518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4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521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	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	520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	4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	521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	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 税法》 .....	521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	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531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	4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	514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	4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513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4) .....	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513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 .....	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	514
中共中央书记处 .....	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	514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 .....	4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	50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意见》 .....	4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525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	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524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	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	500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4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	500
中共中央委员会 .....	46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	530
中共中央政治局 .....	46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	510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46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	526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 .....	46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	527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	458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	526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	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	527
中共中央党校 .....	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 企业法》 .....	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 .....	4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 .....	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	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组织法》 .....	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	50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	5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5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5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5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	4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5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5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4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501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5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4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507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5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5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49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5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5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4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	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5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	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5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5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判制度)	532(5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检察制度)	532(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	5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5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 题的协定》	508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5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4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5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5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4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527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4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518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4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制度	518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4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497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4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97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4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498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49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497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493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527	中华全国总工会	4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496	中纪委第一次全会	5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496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5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511	中苏边界谈判	535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524	中苏关系正常化	537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495	中苏关系破裂	53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496	中苏两党论战	537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498	中阿关系破裂	4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513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54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518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4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22		

中国人民志愿军 .....	488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7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	48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471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	4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	4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481	中国农工民主党 .....	47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 .....	481	《中国妇女的现状》 .....	4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486	中国社会科学院 .....	4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	487	《中国环境保护》 .....	4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	487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47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	487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	4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	488	《中国的人权状况》 .....	4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485	《中国的国防》 .....	4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	485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	4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	482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	4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 .....	483	中国革命博物馆 .....	46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 .....	48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4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	48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47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 .....	484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 .....	47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	484	中国科学院 .....	47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 .....	483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	4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	484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 .....	4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	488	中国致公党 .....	491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	480	中法建交 .....	447
中国人民解放军 .....	480	中南关系恢复正常 .....	534
中国工程院 .....	464	中美大使级会谈 .....	532
《中国大百科全书》 .....	462	中美关系缓和 .....	533
中国历史博物馆 .....	478	中美建交 .....	533
中国少年先锋队 .....	489	《中美联合公报》 .....	533
中国气象 VSAT 信息网络系统 .....	479	《中葡澳门问题联合声明》 .....	534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490	中蒙苏铁路联运 .....	534
中国民主同盟 .....	479	贝时璋 .....	11
中国民主建国会 .....	479	“手拉手”活动 .....	329
中国民主促进会 .....	478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 .....	252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	462	毛主席纪念堂 .....	25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473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	252
中国共产党 .....	464	《毛主席重要指示》 .....	25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	473	毛泽东 .....	242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	472	《毛泽东文集》 .....	24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	472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	243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	466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	243(4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471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	24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8	《毛泽东诗词集》 .....	24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9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 .....	245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470	毛泽东南巡 .....	244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9	毛泽东思想 .....	246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7	《毛泽东选集》 .....	25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466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	24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	467		

毛泽东率团访苏 .....	245
毛致用 .....	252
气象事业 .....	283
长江三峡工程 .....	22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 .....	23
长江、淮河洪水(1954) .....	22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	23
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 .....	22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政治协商制度) .....	23(471)
化学工业 .....	152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83
反右派斗争 .....	84
“反右倾回潮” .....	84
“反右倾”运动 .....	84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81
反对精神污染 .....	80
反对霸权主义 .....	80
“反经验主义” .....	83
反冒进 .....	83
“反修访修”教育运动 .....	83
反腐败 .....	81
从严治党 .....	38
分配制度改革 .....	90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108
公私合营 .....	107
公路事业 .....	106
“风云”气象卫星 .....	91
乌兰夫 .....	379
文艺政策调整 .....	378
“文化大革命” .....	375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	376
文物事业 .....	377
方毅 .....	86
火炬计划 .....	161
斗批改运动 .....	74
计划生育事业 .....	164
计划经济体制 .....	164
巴金 .....	4
邓力群 .....	45
邓小平 .....	45
《邓小平文选》 .....	49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 .....	50
邓小平访问美国 .....	47
邓小平视察南方(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的谈话要点》) .....	49(429)
邓小平复出 .....	47
邓小平理论 .....	47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	47
邓子恢 .....	52
邓兆祥 .....	51
邓颖超 .....	51
邓稼先 .....	45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	419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419
孔繁森 .....	208
水运事业 .....	333
水利事业 .....	330

## 五 画

玉门油田 .....	423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	441
甘苦 .....	94
艾青 .....	1
艾思奇 .....	1
可持续发展战略 .....	207
石油化学工业 .....	327
布达拉宫维修 .....	15
布赫 .....	15
龙云 .....	232
平反冤假错案 .....	278
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军事演习 .....	73
《北国江南》的批判 .....	8
北京大学 .....	9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 .....	9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 .....	10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	9
北京地下铁道 .....	9
北京西站 .....	10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	10
北戴河会议 .....	8
卢嘉锡 .....	232
叶飞 .....	413
叶圣陶 .....	414
叶选平 .....	414
叶笃正 .....	413
叶剑英 .....	414
叶渚沛 .....	415
叶群 .....	414
申纪兰 .....	324
电力工业 .....	66
电子工业 .....	71
电影事业 .....	69
田汉 .....	350
田纪云 .....	351



史来贺	329
史良	329
“四人帮”(见江青反革命集团)	336(173)
“四三方案”	336
四川二滩水电站	335
四个现代化	336
四五运动	337
四有新人	338
四项基本原则	337
四清运动	336
仪征化纤联合公司	419
白立忱	5
白寿彝	5
白杨	5
“白卷”事件	4
外汇并轨	360
外交	360
外贸体制改革	363
包玉刚	7
包尔汉·沙希迪	7
包兰铁路	7
包产到户	6
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	209
汉字简化	138
《汉语拼音方案》	137
冯友兰	91
冯兰洲	91
冯至	92
司马义·艾买提	334
尼克松访问中国(见中美关系缓和)	265(533)
民用航空事业	256
民主与法制	258
民主监督	258
民主集中制	258
民族	259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62
出版事业	34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67
加碘盐	167
对外开放	76
对外经济贸易	74
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77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344

## 六 画

邢台地震	400
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还击战	209

老舍	210
地下核试验成功	52
地方人民政府	52
地质事业	52
共同富裕	108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406
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406
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406
机械工业	162
再就业工程	427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387
“西单墙”	387
西藏平叛	387
西藏和平解放	387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429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429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27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27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2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28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429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5
有色金属工业	421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40
成仿吾	32
成克杰	32
成昆铁路	32
成思危	33
成都会议	32
成渝铁路	33
扫除文盲运动	311
“扫黄”、“打非”	311
《光明日报》	128
《当代中国》丛书	44
吕正操	234
吕叔湘	234
吕振羽	234
朱光亚	550
朱光潜	549
朱学范	550
朱蕴山	550
朱镕基	550
朱德	548
《朱德选集》	548
朱穆之	550

乔石 .....	288	刘思职 .....	231
“乒乓外交”(见中美关系缓和) .....	278(533)	刘复之 .....	225
任建新 .....	305	刘海粟 .....	226
任美镔 .....	305	刘家峡水电站 .....	226
任继愈 .....	304	刘斐 .....	225
任弼时 .....	303	刘靖基 .....	226
《任弼时选集》 .....	304	刘德海 .....	225
任新民 .....	305	刘澜涛 .....	227
价格体系改革 .....	170	齐白石 .....	282
价格管理 .....	169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125
华北军事演习 .....	152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	122
华君武 .....	155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	123
华国锋 .....	155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	122
华罗庚 .....	155	《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	119
伊犁塔城事件 .....	416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	120
向秀丽 .....	394	《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	121
全军大比武活动 .....	298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	127
全国人口普查 .....	29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12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296	《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	12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297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	120
全国工交计划会议 .....	295	《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 .....	125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	295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	114
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	298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	113
全国战备高潮 .....	298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114
全国科学大会 .....	296	《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	115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	297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決定》 .....	116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	295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	115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 .....	299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	115
“合二而一”论 .....	141	《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	115
企业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 .....	282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	114
《创业》《海霞》事件 .....	38	《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 .....	124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	104	《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的通知》 .....	110
庄希泉 .....	552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	113
刘大年 .....	225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	111
刘开渠 .....	227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	128
刘少奇 .....	227	《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	122
刘少奇、邓小平访问苏联 .....	228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	119
刘少奇平反 .....	229		
刘少奇访问亚洲四国 .....	229		
《刘少奇选集》 .....	229		
刘少奇冤案 .....	231		
刘仙洲 .....	231		
刘白羽 .....	224		
刘宁一 .....	227		
刘华清 .....	226		
刘伯承 .....	224		
刘青山、张子善案 .....	227		
刘国光 .....	225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	121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	121
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1号文件 .....	120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	118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	117
《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	118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	118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	124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	123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	112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	112
《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	112
《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	113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	113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	112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127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	126
《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	123
《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 .....	123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 .....	11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116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119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	110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	110
《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	110
《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报告》 .....	111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	124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	111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	112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	127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125
“米棉之战” .....	255
江青 .....	172
江青反革命集团 .....	173
江青集团“组阁”活动 .....	173
江泽民 .....	173
江泽民访问美国 .....	174
《江格尔传》整理出版 .....	172
汕头经济特区 .....	312
安子介 .....	2
安定团结 .....	2
安居工程 .....	2

冰心 .....	11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 .....	175
军事 .....	197
许世友 .....	403
许光达 .....	403
许海峰 .....	403
许涤新 .....	403
许嘉璐 .....	403
许德珩 .....	402
《论十大关系》 .....	237
《论人民民主专政》 .....	236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	236
农业 .....	268
农业生产互助组 .....	270
农业生产合作社 .....	270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	270
农业合作化 .....	269
农业学大寨运动 .....	270
农用塑料薄膜 .....	271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	276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266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	267
农村改革 .....	266
农、轻、重为序 .....	267
孙孚凌 .....	342
孙冶方 .....	343
孙俊人 .....	343
孙起孟 .....	343
孙晓村 .....	343
孙健 .....	342
孙家栋 .....	342
孙犁 .....	343
孙道临 .....	342
收回海关主权 .....	329
红卫兵运动 .....	146
红线女 .....	147
《红楼梦研究》批判 .....	146
红旗渠 .....	146
纪政 .....	166
纪登奎 .....	166

## 七 画

《玛纳斯》整理出版 .....	242
“远望”号远洋测量船 .....	425
邯钢经验 .....	137
芮杏文 .....	306
严济慈 .....	406

克林顿访问中国 .....	208	杨汝岱 .....	410
苏子衡 .....	341	杨秀峰 .....	411
苏州工业园区 .....	341	杨余傅冤案 .....	412
苏步青 .....	340	杨尚昆 .....	410
苏星 .....	340	杨明轩 .....	409
苏振华 .....	341	杨易辰 .....	411
苏联移交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海军基地 .....	340	杨沫 .....	409
村民自治 .....	38	杨勇 .....	411
李井泉 .....	213	杨根思 .....	409
李长春 .....	211	杨浦大桥 .....	410
李可染 .....	213	杨得志 .....	409
李四光 .....	215	杨献珍 .....	411
李宁 .....	214	杨静仁 .....	409
李达 .....	211	“两个凡是” .....	221
李先念 .....	216	“两参一改三结合” .....	221
李向群 .....	217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	221
李远哲 .....	217	“两航”起义 .....	221
李岚清 .....	214	扶贫攻坚 .....	92
李作鹏 .....	218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166
李沛瑶 .....	214	抓大放小 .....	552
李苦禅 .....	214	抓纲治国 .....	552
李宗仁 .....	218	批判“有鬼无害”论 .....	278
李宗仁归国 .....	218	批判《海瑞罢官》 .....	277
李贵鲜 .....	213	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	278
李顺达 .....	215	批评《苦恋》 .....	278
李济深 .....	213	批陈整风运动 .....	276
李敖 .....	210	批林批孔运动 .....	276
李素文 .....	216	批林整风运动 .....	277
李铁映 .....	216	抗美援朝运动 .....	202
李烛尘 .....	218	抗洪抢险(1998) .....	202
李雪峰 .....	217	连战 .....	219
李维汉 .....	216	“医疗卫生革命” .....	416
李富春 .....	212	医疗体制改革 .....	416
李富荣 .....	212	医药事业 .....	417
李登辉 .....	212	《求是》 .....	294
李瑞环 .....	215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170
李锡铭 .....	216	肖扬 .....	394
李鹏 .....	215	吴几康 .....	382
李新 .....	217	吴大猷 .....	381
李嘉诚 .....	213	吴仁宝 .....	382
李德生 .....	211	吴玉章 .....	383
李德伦 .....	211	吴仪 .....	383
李德全 .....	211	吴邦国 .....	380
李默然 .....	214	吴吉昌 .....	382
杨石先 .....	410	吴有训 .....	383
杨白冰 .....	408	吴阶平 .....	382
杨成武 .....	408	吴作人 .....	384
杨廷宝 .....	411	吴冷西 .....	382

吴法宪	381	沈鸿	325
吴学谦	383	沈雁冰	325
吴官正	381	宋平	338
吴树青	383	宋任穷	339
吴桂贤	381	宋庆龄	338
吴晗	382	《宋庆龄选集》	339
吴德	381	宋健	338
“时代精神汇合”论	328	宋涛	340
时传祥	328	证券市场试点	442
县级直接选举	390	评《水浒》活动	280
邮电事业	420	社会主义公有制	319
财政	1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22
财政体制改革	19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319
“利润挂帅”论	21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17
利润留成制度	21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317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33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319
《我的一点意见》	379	社会主义的本质	318
兵器工业	11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318
邱少云	294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20
邱会作	294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20
体育事业	348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	316
何干之	14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21
何长工	14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21
何其芳	142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316
何厚铨	141	迟浩田	34
何香凝	142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试验	94
何鲁丽	142	改革开放	94
住房制度改革	551	张大千	431
余秋里	423	张万年	434
希望工程	388	张云逸	436
谷牧	109	张艺谋	435
邹家华	558	张友渔	436
庐山会议	232	张文佑	434
汪东兴	365	张文裕	434
汪菊潜	366	张光斗	432
汪辜会谈	366	张廷发	434
汪锋	365	张冲	431
汪猷	366	张孝骞	435
汪德昭	365	张志新	436
汪德熙	365	张克辉	433
沙千里	311	张君秋	433
沙健孙	311	张劲夫	433
汽车工业	285	张秉贵	431
没收官僚资本	263	张岱年	432
沪市	152	张学良	435
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	152	张治中	437
沈大高速公路	325	张春桥	431
沈钧儒	325	张思卿	433

张闻天	434
张钰哲	436
张爱萍	430
张海迪	432
张家口地区地震	432
张鼎丞	432
张瑞芳	433
张震	436
张澜	433
陆定一	233
阿沛·阿旺晋美	1
陈云	30
《陈云文选》	31
陈丕显	27
陈永贵	29
陈永康	29
陈再道	32
陈运鹏	31
陈伯达	24
陈希同	27
陈希同案	27
陈其尤	27
陈叔通	27
陈岱孙	24
陈建功	25
陈垣	29
陈荒煤	25
陈俊生	26
陈原	30
陈寅恪	29
陈景润	26
陈赓	24
陈锡联	28
陈锦华	26
陈嘉庚	25
陈慕华	26
陈毅	28
陈翰伯	25
陈翰笙	25
陈镜开	26
邵荃麟	316
邵逸夫	316
纺织工业	86

## 八 画

环境保护事业	155
武汉“七二〇事件”	385
武汉长江大桥	385

《武训传》批判	386
青年志愿者行动	290
青藏公路	290
青藏高原隆起的综合研究	290
现代企业制度	390
范长江	85
范文澜	85
茅以升	253
林巧稚	224
林伯渠	223
林枫	223
林彪	222
林彪反革命集团	223
林彪一号命令(见全国战备高潮)	223(298)
林默涵	224
杭州会议	138
拉萨骚乱	209
拨乱反正	12
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	552
欧阳钦	272
欧阳海	272
尚小云	315
国民经济十年规划	131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31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30
国有企业改革	132
国有企业整顿	132
国家图书馆	130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131
国营贸易企业经济核算制	131
罗干	237
罗光燮	237
罗沛霖	238
罗荣桓	238
罗健夫	237
罗盛教	238
罗瑞卿	238
罗豪才	237
帕巴拉·格列朗杰	273
图书馆事业	356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445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445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445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445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446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42
和平演变	142
季方	167



荆江分洪工程	195
革命委员会	103
荀慧生	405
荣毅仁	305
胡子昂	151
“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	148
胡乔木	150
胡华	149
胡启立	149
胡厚宣	149
胡适	150
胡适思想批判	151
胡绳	150
胡厥文	149
胡锦涛	149
胡愈之	151
胡耀邦	151
南宁会议	264
南极科学考察	264
南沙群岛自卫战	265
南昆铁路	264
南京长江大桥	264
南京路上好八连	264
南浦大桥	264
南疆铁路	264
柯庆施	203
柳亚子	232
柳青	231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启动	255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3
轻工业	290
星火计划	400
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335
钢铁工业	95
氢弹爆炸成功	292
香港回归祖国	392
香港招商局起义	393
香港国际机场	392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393
科学技术	20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6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207
科学教育文化政策调整	207
科教兴农	204
科教兴国战略	203
复旦大学	92
保险业	7
保税区	7

侯仁之	148
侯外庐	148
侯宝林	147
侯隽	148
侯祥麟	148
侯德榜	147
侯镜如	147
胜利油田	326
逢先知	273
饶宗颐	300
施光南	327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61
姜春云	175
姜椿芳	175
籼型杂交水稻	390
炮击金门	274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273
洪学智	247
测绘事业	20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	164
宦乡	158
神府东胜煤田	324
费孝通	89
姚文元	412
姚连蔚	412
姚依林	413
姚雪垠	413
贺龙	145
贺绿汀	145
贺敬之	144
贺麟	144
骆玉笙	239
骆耕漠	239
统一财经	356
统计事业	354

## 十 画

秦山核电站	289
秦始皇陵兵马俑	289
秦皇岛煤运码头	289
秦基伟	289
珠海经济特区	551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6
袁伟民	424
袁雪芬	424
袁隆平	423
耿长锁	104
耿飚	104





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 .....	182
“教育革命” .....	178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	177
黄火青 .....	159
黄永胜 .....	160
黄华 .....	159
黄克诚 .....	160
黄炎培 .....	160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 .....	158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	158
黄继光 .....	159
黄菊 .....	160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 .....	159
黄鼎臣 .....	158
菜篮子工程 .....	19
萧华 .....	394
萧克 .....	394
萧劲光 .....	394
萧乾 .....	395
梅兰芳 .....	253
梅益 .....	254
曹志 .....	20
曹禺 .....	20
龚育之 .....	108
推广普通话 .....	359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文教事业 .....	182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	208
常香玉 .....	23
“跃进”号万吨远洋轮船 .....	425
“银元之战” .....	420
“银河”巨型计算机 .....	420
第一个五年计划 .....	65
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 .....	64
第一次全国基层普选 .....	65
第一次郑州会议 .....	65
第一汽车制造厂 .....	66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65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	57
第二个五年计划 .....	56
第二次郑州会议 .....	56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56
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 .....	61
第七个五年计划 .....	59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60
第八个五年计划 .....	55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55
第九个五年计划 .....	57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58

第三个五年计划 .....	60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61
第五个五年计划 .....	63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63
第六个五年计划 .....	58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58
第四个五年计划 .....	62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62
船舶工业 .....	37
康世恩 .....	202
康生 .....	201
康克清 .....	201
章士钊 .....	437
章伯钧 .....	437
商业 .....	312
商业银行 .....	314
阎明复 .....	408
清华大学 .....	292
清产核资 .....	292
清查“五一六”运动 .....	292
清理外国在华企业 .....	293
清理阶级队伍” .....	293
清理整顿公司 .....	293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	155
深市 .....	324
深圳经济特区 .....	324
梁思成 .....	220
梁漱溟 .....	220
尉健行 .....	375

## 十二画

超导体研究 .....	23
博物馆事业 .....	13
彭冲 .....	275
彭珮云 .....	275
彭真 .....	275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见庐山会议) .....	275(232)
彭德怀 .....	275
裁军百万 .....	19
斯霞 .....	335
葛洲坝水电厂 .....	103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	103
董必武 .....	73
董其武 .....	73
董建华 .....	73
董寅初 .....	74
蒋介石 .....	175
蒋正华 .....	176

蒋经国	176
蒋筑英	176
韩先楚	137
韩杼滨	137
朝鲜停战谈判	24
粟裕	342
厦门经济特区	289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347
揭批“四人帮”	182
援越抗法	424
援越抗美	425
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	406
赎买政策	330
程子华	34
程孝刚	34
程砚秋	34
程思远	33
程潜	33
税收制度改革	334
傅作义	93
傅雷	92
傅鹰	93
焦枝铁路	177
焦裕禄	177
童第周	354
普法教育	280
曾庆红	430
曾昭抡	430
曾宪梓	430
湘黔铁路	393
温家宝	375
谢希德	396
谢非	395
谢觉哉	395
谢晋	395
谢铁骊	396
谢雪红	396
谢添	396
谢富治	395

### 十三画

塘沽新港	346
蒲辅周	280
禁毒斗争	188
禁娼斗争	188
楚图南	36
楼适夷	232
赖宁	209

雷洁琼	210
雷锋	210
路甬祥	234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84
解放一江山岛	184
《解放军报》	18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83
新风霞	396
新华通讯社	397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	399
新型导弹驱逐舰	400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400
新闻事业	397
新疆和平解放	397
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419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220
粮棉油统购统销	220
数值天气预报	330
煤炭工业	254
剿匪反霸斗争	177

### 十四画

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45
蔡廷锴	20
蔡畅	19
蔡啸	20
臧克家	430
裴文中	274
稳定物价	379
廖汉生	222
廖承志	222
精简机构	195
精简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	195
赛福鼎·艾则孜	307
谭其骧	344
谭绍文	344
谭政	345
谭震林	344
熊庆来	400
缪云台	256

### 十五画

鞍钢三大重点工程	2
鞍钢宪法	3
镇压反革命运动	440
滕代远	347
翦伯赞	171
潘天寿	273

“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 .....	273
潘菽 .....	273

### 十六画

薛暮桥 .....	404
薄一波 .....	14
整风运动 .....	441
整党 .....	440
整党建党运动 .....	440
霍英东 .....	161
黔桂铁路 .....	288
穆青 .....	263

### 十七画

戴爱莲 .....	44
魏巍 .....	375

襄渝铁路 .....	394
------------	-----

### 十八画

鹰厦铁路 .....	420
156 项工程 .....	559
《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	559
《1956 年到 1967 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	559
1986 年学潮(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559(81)
1991 年洪涝灾害 .....	559
1998 年南北洪涝灾害 .....	560
20 万吨级船坞的建造 .....	560
211 工程 .....	560
30 万千瓦 60 万千瓦火力发电设备制成 .....	561
“61 人集团”冤案 .....	561
863 计划 .....	561

## INDEX OF ARTICLES

### A

abolition of imperialist privileges in China	89	"Army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15
"Accelerate our Pa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s, Openness and Modernization; Struggle for Greater Victories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67	Asia and Australia Trade Union Conference	406
<i>Accounting Law of the PRC</i>	512	Asia women's Congress	406
activities of Jiang Qing's Clique to form a "cabinet"	173	assistance to Vietnam against France	424
adjustment of policy toward literature and art	378	assistance to Vietna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425
adjustment of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445	<i>Auction Law of the PRC</i>	515
adjus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policies	207	<i>Audit Law of the PRC</i>	518
adjustments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352	automobile industry	285
<i>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i>	527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regions for minorities	262
aerospace industry	139	aviation industry	138
<i>Agenda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i>	463	<b>B</b>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269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ngzhou	129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271	banking	185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270	banning of drugs	188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tual-Aid Teams	270	banning of prostitution	188
agriculture first, light industry next, heavy industry last	267	Baoji-Chengdu Railway	7
<i>Agriculture Law of the PRC</i>	515	Baoshan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 Shanghai	314
agriculture	268	Baotou-Lanzhou Railway	7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491	<i>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i>	524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492	<i>Basic Law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i>	495
All-China Federation of Sports	492	basic line and basic program for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317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aiwan Compatriots	492	Battle of Shangganling	314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493	Beidaihe Conference	8
All-China Students Federation	493	Beijing Experimental Area for New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9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491	Beij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ctrodes collider and Beijing spectrograph	10
All-China Youth Federation	492	Beijing-Kowloon Railway	188
All-China Conference on Finance and Economy	295	Beijing-Tianjin-Tanggu Expressway	188
All-China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Work	297	Beijing's subway system	9
All-China Forum on Industry and Transport	295	Beijing's West Railway Station	10
all-PLA competition in military skills	298	blank examination paper incident	4
all-round contract system	40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My Big-Character Poster"	273
amnesty of war criminals	347	bombardment of Jinmen Islands	274
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s	264	bonded area	7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81	bourgeois reactionary line	552
anti-empiricism	83	break between China and Albania	447
anti-flood relief effort, 1998	202	break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536
"anti-right opportunism" campaign	84	Building of 10 000-ton hydropress	364
anti-rightist struggle	84	building of 30 000kw and 60 000kw thermal power equipment	561
April Five movement	337	building socialist moral civilization	321
<i>Arbitration Law of the PRC</i>	530	building of 200 000 ton dock	560
<i>Archives Law of the PRC</i>	500	business accounting in state-run trading firms	131

## C

campaign against bribery, tax evasion, theft of state property, cheating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stealing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384	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Democracy	478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waste and bureaucratism	307	China Central Radio	538
campaign for the liberation of Hainan Island	134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538
campaign of criticizing Lin Biao and Confucius	276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479
campaign of 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and Three Enthusiasms	384	China Democratic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479
campaign to bring the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ine to the rural area	376	China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462
campaign to counter-attack the Right-deviationist wind to overturn verdicts	83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Circles	490
campaign to criticize <i>Outlaws of the Marsh</i>	280	China Meteorological VSAT Information Network	479
campaign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311	China restores legitimate righ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474
campaign to learn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404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475
campaign to rectify and build the Party	440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474
campaign to struggle, criticize and reform	74	China Supervisory and Control Commission for the Insurance Services	462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ijing	10	China Union Medical College	490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PC	458	China Young Pioneers	489
central bank	539	China Zhi Gong Party	491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PC	459	China's counter-attack in self-defence along the Sino-Indian borders	540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461	China's presence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462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PC	460	China's counter-attack against Vietnam in self-defence at the borders	77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30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464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457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76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30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89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Agreement for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539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473
Centr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of the CPC	460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	479
centralized control over finance and economic affairs	356	Chinese People's Solidarity Delegation to the Volunteers in Korea	480
ceremony of the transfer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power from Great Britain to China	540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481
"Certain Decisions on Widening the Road, Enlivening the Economy and Solving Urban Employment"	128	Chines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480
"Certain Policy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Urban Non-Agricultural Individual Economy"	110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480
"Certain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Commerce Work (Provisional Draft)"	113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1
"Certain Rules for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111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488
"Chairman Mao'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While Inspecting the North, Central-South and East of China"	252	"Chinese <i>pinyin</i> -spelling system"	137
"Chairman Mao'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253	civil airlines	256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31	<i>Civil Aviation Law of the PRC</i>	514
checking up of assets and capitals	292	<i>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i>	513
chemical industry	152	cleaning up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293
Chen Xitong case	27	Cleansing of Class Ranks	293
Chengdu Conference	32	coal industry	254
Chengdu-Chongqing Railway	33	coastal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ests	407
Chengdu-Kunming Railway	32	<i>Collected Poems of Mao Zedong</i>	245
		"combat against the resurgence of Rightist deviation"	84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on Problems Concerning Urban People's Communes"	110
		commerce	312
		commercial banks	314
		<i>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i>	486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ecision on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459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464
		<i>Company Law of the PRC</i>	503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basis and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force 419

economy 189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Life of Geser* 103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Manas* 242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Hero Jianger* 172

educated urban youth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mountain areas 446

education 178

effort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state of affairs 12

Eight Orders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538

Eighth Five-Year Plan 55

Eigh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2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66

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5

*Electoral Law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of the PRC* 515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66

electrical household appliances industry 169

electronics industry 71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71

El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49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341

"Emancipating Though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United Forward" 183

*Encyclopedia of China* 462

environment protection 15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47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the PRC* 508

Ertan Hydropower Station, Sichuan 335

essential nature of socialism 318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171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33

establishment of Sino-French diplomatic relations 447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393

ethnic affairs 259

examination for self-educators in college courses 99

Expanded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CPC 460

Expanded Conference of the CPC Politbureau 461

experience of the Handan Steel and Iron Corporation 137

experimental stock exchanges 442

experiments in improving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94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320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Gang of Four" 182

expropriation of bureaucratic capital 263

expulsion of Kang Sheng and Xie Fuzhi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201

extraordinary forest fire in the Major Xing'an Mountains 41

## F

fabricated case of "Hu Feng's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148

fabricated case of "Village of Three Families" 308

fabricated case of "Pan Hannian and Yang Fan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273

fabricated case of "Peng Huang Zhang Zhou Anti-Party League" 275

fabricated case of the 61 Cadres 561

fabricated charge against Liu Shaoqi 231

fabricated charge against Yang Shangkun, Yu Lijin and Fu Chongbi 412

family planning 164

"February Counter-Current" 78

"February Syllabus" 78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70

Fifth Five-Year Plan 63

Fif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4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63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6

filmdom 69

First All-China Insurance Conference 64

first big character poster appeared in the cam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9

First Five-Year Plan 65

First Ful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5

First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5

first national grassroots general election 65

Fir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65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CPC 532

First Zhengzhou Conference 65

*Fisheries Law of the PRC* 528

five No. 1 documents on rural work 120

"Five Ones Project" 384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142

fixing of farm output quotas at household level 6

flood disaster in 1991 559

floods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in 1998 560

*Food Hygiene Law of the PRC* 518

foreign relations 360

*Foreign Trade Law of the PRC* 501

foreign trade 74

*Forestry Law of the PRC* 517

Forum on the Ideological Front 335

founding of Hainan province 134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337

Four Cleans campaign 336





<i>Insurance Law of the PRC</i>	496	<i>Law of the PRC on Education</i>	511
insurance	7	<i>Law of the PRC o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i>	521
intellectuals' return from abroad	135	<i>Law of the PRC on Individual Income Tax</i>	502
investigation of "5.16ers"	292	<i>Law of the PRC on Judges</i>	501
iodated salt	167	<i>Law of the PRC on Lawyers</i>	513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95	<i>Law of the PRC on Pharmaceuticals Control</i>	527
		<i>Law of the PRC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i>	499
		<i>Law of the PRC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i>	519
		<i>Law of the PRC on Procurators</i>	510
		<i>Law of the PRC on Product Quality</i>	497
		<i>Law of the PRC on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i>	498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ng the Disabled</i>	496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i>	524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Minors</i>	521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Relics</i>	521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State Secrets</i>	495
		<i>Law of the PRC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i>	501
		<i>Law of the PRC on Publicly-Owned Enterprises</i>	516
		<i>Law of the PRC on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i>	514
		<i>Law of the PRC on Sino-Foreign Joint Cooperation Enterprises</i>	529
		<i>Law of the PRC on Sports</i>	519
		<i>Law of the PRC on State Compensation</i>	505
		<i>Law of the PRC on Teachers</i>	510
		<i>Law of the PRC on the Control of Chinese Citizens Leaving and Entering China</i>	502
		<i>Law of the PRC o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i>	529
		<i>Law of the PRC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i>	512
		<i>Law of the PRC o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i>	523
		<i>Law of the PRC on Trade Unions</i>	502
		<i>Law of the PRC on Unfair Competition</i>	501
		<i>Law of the PRC on Urban Real Estate</i>	497
		<i>Law of the PRC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i>	519
		<i>Law of the PRC Sino-Foreign Joint Investment Enterprises</i>	529
		Li Zongren's return to China	218
		<i>Liberation Army Daily</i>	183
		liberation of Yijiangshan Island	184
		libraries	356
		light industries	290
		Lin Biao's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	223
		Lin Biao's number one order	223
		Liu Shaoqi's and Deng Xiaoping's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228
		Liu Shaoqi's visits to four Asian countries	229
		Liujia Gorge Hydropower Station	226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1
		loc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0
		Local Organs of the Autonomous Mino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14
<b>J</b>			
January Seizure of Power	415		
Jiang Qing's counter-revolution clique	173		
Jiang Zemin visits the United States	174		
Jiangsu sector of Shanghai-Nanjing Expressway	152		
Jiaozuo-Zhicheng Railway	177		
Jinan highway bridge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164		
Jingjiang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195		
Jiu San Society	195		
"Joint Chinese-Portuguese Declaration on the Macao Issue"	534		
"Joint Communiqué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33		
"Joint Declaration of All Democratic Parties"	104		
joint state-private ownership	107		
journalism	397		
judici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18		
July 21 Instruction	282		
<b>K</b>			
key measures in help-the-poor program	92		
Korean War armistice negotiations	24		
Kruschev's visits to China	145		
<b>L</b>			
<i>Labor Law of the PRC</i>	512		
<i>Land Administration Law of the PRC</i>	520		
<i>Land Reform Law of the PRC</i>	520		
land reform	358		
Lanzhou-Xining-Lhasa table project	209		
launch of "Plan for Revival of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255		
<i>Law of the PRC for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	511		
<i>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on of Tax Collection</i>	519		
<i>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y</i>	526		
<i>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i>	526		
<i>Law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i>	527		
<i>Law of the PRC on Advertisement</i>	504		
<i>Law of the PRC on Assemblies Processions and Demonstrations</i>	509		
<i>Law of the PRC on Certified Accountants</i>	531		
<i>Law of the PRC on Commercial Banks</i>	517		
<i>Law of the PRC on Compulsory Education</i>	528		
<i>Law of the PRC on Control of Aliens Entering and Leaving China</i>	520		
<i>Law of the PRC on Copyright</i>	531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52
Long March for Quality campaign	447
"Long March" series carrier rocket	23
long-term coexistence and mutual supervision	23
lowering of the tariff rates	176
Lushan Conference	232

## M

<i>machinery industry</i>	162
major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192
major enterprise corporations	42
manoeuvre in the East and South Seas and the Taiwan Strait	73
Mao Zedong criticizes the "Gang of Four"	244
Mao Zedong's inspection in the northern, central-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245
Mao Zedong's inspection in the South	244
Mao Zedong's letter to Jiang Qing	243
Mao Zedong's strategic deline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243
Mao Zedong's two instru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	243
Mao Zedong Thought	246
<i>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of the PRC</i>	507
marine programs	135
<i>Maritime Code of the PRC</i>	507
<i>Marriage Law of the PRC</i>	509
<i>Martial Law of the PRC</i>	511
Mausoleum of Chairman Mao	252
Mawang Mound Han Dynasty Tomb	241
May Seven cadre schools	385
May Seven Instruction	385
Mazhenfu Commune Middle School incident	241
measures against non-socialist remnants in the cities	33
measures to encourag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41
medical service	417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Fengyun"	91
meteorological service	283
<i>Metrology Law of the PRC</i>	509
military affairs	197
military manoeuvre in North China	152
<i>Military Service Law of the PRC</i>	496
"Milky Way" super computer	420
<i>Mineral Resources Law of the PRC</i>	512
modal operas	412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390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303
movement for civility and new habits	175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71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478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64
museums	13
"My Opinion"	379

## N

Nanjing bridg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264
Nanning Conference	264
Nanning-Kunming Railway	264
Nanpu Bridge	264
nation governed by law	80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4
National Capit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4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7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296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72
National Congress of War Heroes and Model Workers	298
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4
<i>National Defense of China</i>	463
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5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6
National Library	130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296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72
National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PC Politbureau	461
<i>Nationality Law of the PRC</i>	505
nation-wide census	296
nation-wide enthusiasm for war preparations	298
<i>Negotiable Instrument Law of the PRC</i>	515
new people with the four qualities	338
"New Problems That Have Cropped Up After the Essential"	319
new-type missile-launching destroyer	400
Ninth Five-Year Plan	57
Nin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3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67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8
Ni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48
No. 1 Automobile Plant	66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	421
nonparty democratic personage	380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534
normalization of Sino-Yugoslav relations	534
normalization of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537
No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473
"Notice on Establishing Agricultural Teams in 8 Norther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110
"Notice on Issuing the Revised Draft of Some Specific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Rural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125
"Notice On More Quickly Reexamining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115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y and Political Work in Enterprises”	115
“Notice on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125
nuclear industry	143

## O

oceangoing surveying ship “Yuanwang”	425
“On a Number of Issues Concerning Our Country’s Minority Policies”	124
“On Certain Issues in Speeding Up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13
“On Correctly Handl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26
“On Further Prevent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and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from Going into Business or Setting Up Enterprises”	118
“On Opinions Concerning Trialing of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Trusts”	123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236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23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415
“one key point and two basis points”	415
“One Strike Three Antis” Campaign	415
opening of border regions	540
opening of coastal cities	407
opening of coastal development zones	407
opening of the cities on the Yangtze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408
opening to the world	76
“Opin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bout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459
“Opinions on a Number of Questions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t the Present (Draft)”	111
oppose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81
oppose hegemonism	80
ordnance industry	11
<i>Organic Law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of the PRC</i>	500
<i>Organic Law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i>	516
<i>Organic Law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i>	506
<i>Organic Law of the Urban Residential Committees of the PRC</i>	498
<i>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s of the PRC</i>	499
<i>Organization Law of the CPPCC</i>	488
organizational consolidation of the Party	440
“Outline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1956 – 1967”	559
“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Academy’s Work”	207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economies in which the public sector plays the central role	108
overturning of Tian An Men case	350
overturning of unjust, false and wrong verdicts	278

## P

<i>Partnership Law of the PRC</i>	507
<i>Patent Law of the PRC</i>	531
patriotic campaign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economize	1
patriotic labor emulation	2
patriotic movement for public health	1
peaceful evolution	142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387
peaceful liberation of Xinjiang	397
Peking University	9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ver real economic benefits	194
People’s Communes	301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300
<i>People’s Daily</i>	302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30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9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ederal Government of Burma Agreement on Border Issues	508
People’s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539
“People’s Victory” inflation proof bonds	303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327
ping-pong diplomacy	278
planned economy	164
Polemic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537
<i>Police Law of the PRC</i>	516
policy of redemption	330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461
political criticism in the realm of ideology	419
“Political Report on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429
political upheaval in 1989	4
popularization of <i>Putonghua</i> (Mandarin)	359
<i>Post Law of the PRC</i>	528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420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329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New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00
price control	169
<i>Price Law of the PRC</i>	510
<i>Prison Law of the PRC</i>	510
<i>Proclama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	530
procuratori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10
production of nuclear submarines	144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1990s”	196
Program for Good Harvest	91
program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ree steps	307
Project “211”	560

Project Food Basket	19	reform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32
projec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aihe River	134	regain sovereign rights over the customs	329
projec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uaihe River	447	“Regulations on Certain Policy Issues of Urban Handicrafts Industries (Provisional Draft)”	110
Project Hope	388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113
project to date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389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112
“Proposals for Drafting the 9.5 Plan and the 2010 Long-Term Objectiv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127	“Regulation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112
prospecting and exploitation of oceanic mineral resources	43	rehabilitation of Liu Shaoqi	229
protec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377	rejection of “rash advanc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83
“Provisional Working Rules for Higher Education School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Draft)”	177	relax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33
publication industry	34	religion	553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80	Renminbi	300
		“Report on Promoting the Persistent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11
<b>Q</b>		“Report on the Draf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27
Qin Shihuang Tomb’s Terre-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289	“Report on the Question of Intellectuals”	126
Qinghai-Tibet Highway	290	“Report to the Expanded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	427
Qinhuangdao coal wharf	289	“Resolut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Political Report”	467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289	research in superconductors	23
		research in the methods in the ligand field theory and the molecular orbital graph theory	274
<b>R</b>		research in total synthetic bovine insulin	300
railroad sector	353	research on Goldbach’s conjecture	103
<i>Railway Law of the PRC</i>	519	resistance against spiritual pollution	80
recovery and growth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131	resistanc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sistance to Korea	202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o criticize Chen Boda	276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Unification of State Financial Work”	124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o criticize Lin Biao	277	“Resolution (Draft) on Improving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s”	112
rectification campaign	441	“Resolu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Rural Class Status”	113
Red Flag Canal	146	“Resolution on Certain Major Issues in Build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15
Red Guard movement	146	“Resolution on Certain Problems Concerning People’s Communes”	122
reduction of PLA strength by a million	19	“Resolution on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6
reduction of staff and sending urban population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195	“Resolution on Implementing the Planned Purchase and Planned Supply of Grain”	123
re-education of intellectuals	445	“Resolution on Issue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121
reemployment projects	427	“Resolution on the Guiding Poli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23
Reform and Openness	94	“Resolu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127
reform of Peking Opera	189	resolving of issues left over by history	184
reforms in distributive system	90	restoration of the Putala	15
reforms in economic system	194	return of Hong Kong to the motherland	392
reforms in education system	181	revival of examinations for college recruitment	161
reforms in foreign trade system	363	reviving agri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204
reforms in government finance	19		
reforms in rural area	266		
reforms in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316		
reforms in taxation system	334		
reforms in the circulation of grain	220		
reforms i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444		
reforms in the finance system	185		
“Reforms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44		
reforms in the medical service	416		
reforms in the structure of prices	169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178	self-defensive battles against Vietnam at Mount Laoshan and Mount Zheyinshan	209
"Revolution in Health and Medicine"	416	self-government of the villagers	38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KMT	473	sepa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443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103	September 13 Incident	196
re-organ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32	Seventh Five-Year Plan	59
"rice and cotton war"	255	Seven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3
R. Nixon visits China	265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60
roads	106	S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49
Rules for Rural People's Communes Work (Draft)	267	S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3
"Rules for State-Run Industrial Enterprise Work (Draft)"	131	"Several Issues i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Perfect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117
<i>Rules of the PRC for Punishing Corruption</i>	498	Shanghai Conference	315
<i>Rules of the PRC for Punish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i>	498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152
<i>Rules of the PRC on Academic Degrees</i>	527	Shantou Special Economic Zone	312
<i>Rules of the PRC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for Public Security</i>	528	Shanxi Coal Field Base	312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266	share-based cooperative systems	109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390	Shenfu-Dongsheng Coal Mine	324
<b>S</b>			
"Scale of Construction Is to B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172	Shenyang-Dalian Expressway	3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206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32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4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324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the Great Canyon on the Yalu Tsangpo River	406	ship-building industry	37
Second Five-Year Plan	56	Shuozhou-Huanghua Railway	334
Secon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2	Sichuan-Tibet Highway	36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6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with moderate inflation	102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4	signing by China of Tot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299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0	"silver dollar war"	420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1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138
Second Session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448	simplified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360
Second Zhengzhou Conference	56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540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460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535
<i>Seeking Truth</i>	294	Sino-Mongol-Soviet railway through transport	534
seizing large firms and releasing small ones	552	Sino-Soviet negotiation on border issues	535
<i>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	171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537
<i>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n</i>	31	Sino-Uited States ambassadorial talks	533
<i>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i>	49	<i>Situation of Chinese Women</i>	463
<i>Selected Works of Liu Shaoqi</i>	229	<i>Situ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in China</i>	463
<i>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i>	250	<i>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i>	491
<i>Selected Works of Ren Bishi</i>	304	Sixth Five-Year Plan	58
<i>Selected Works of Song Qingling</i>	339	Six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483
<i>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i>	544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8
<i>Selected Works of Zhu De</i>	548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49
"Selecting and Nurturing Middle-Aged and Young Cadres is a Pressing Task at Present"	347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5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1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2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4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1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52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69
Third Five-Year Plan	60
<i>Thirt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	466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	22
three key projects at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Works	2
"Three Pieces and One Less"	308
Three Red Banners	308
"Three Reforms and One Strengthening"	308
"Three Selves and One Contract"	310
"three selves"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310
Three Supports and Two Militaries	310
three years of severe economic hardship	308
Tianj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	350
Torch Program	161
total synthetic ribonucleic acid	552
tourism	235
<i>Trademark Law of the PRC</i>	517
transfer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eight military regions	4
trial of share ownership	109
trial of the main culprits of the Lin Biao and Jiang Q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	326
Tsinghua University	292
Twel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68
Twelfth Plenary Session (expanded)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448
"two aviation corporations" uprising	221
Two Basic Assessments of the Frontline in Education	182
"Two Participations, One Reform and Three Combinations"	221
"Two Whatever's"	221

## U

universal education in the need to condemn and prevent revisionism	83
Unrest in Lhasa	209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170
urban housing program	2
<i>Urban Planning Law of the PRC</i>	497
"Urgent Instruction on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ilitary Colleges"	119
"Urgent Notice Concerning Present Policy Questions of Rural People's Communes"	121

## V

Victory Oil Field	326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by a Chinese delegation led by Mao Zedong	245

## W

wage system	105
wall for spontaneous posters at Xidan	387
Wanjiashai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158
water conservancy	330
<i>Water Law of the PRC</i>	518
water transport	333
W. Clinton visits China	208
work teams incident	106
workers' propaganda teams stationed in schools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105
worker-peasant-soldier students	104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64	457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1978	457
<i>Works of Mao Zedong</i>	248
Wuhan July 20 Incident	385

## X

Xiam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389
Xiangfan-Chongqing Railway	394
Xiaolangdi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ellow River	158
Xingtai earthquake	400
Xinhua News Agency	397

## Y

Yangpu Bridge	410
Yangtze and Huaihe River floods, 1954	22
Yangtze bridge at Wuhan	385
Yanzhou Coal Field	408
Yingtian-Xiamen Railway	420
Yizheng Chemical Fibre Joint Corporation	419
youth volunteer operation	290
Yuanmou Neanderthal	423
Yumen Oil Field	423

## Z

Zhengzhou Grain Wholesale Market	443
Zhou Enlai participating Bandung Conference	542
Zhou Enlai's efforts to overcome leftism	542
Zhou Enlai's visits to eight Asian countries	543
Zhou Enlai's visits to India and Burma	544
Zhou Enlai's visits to six Asian countries	544
Zhou Enlai's visits to Soviet Union, Poland and Hungary	542
Zhou Enlai's visits to thirteen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543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551
10 000-ton oceangoing freighter "Yuejin"	425
156 construction projects	559
1976~1985 Ten-Year Long-Term National Economic Plan	131
26th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57
"863" Plan	561